
歲月艱難
吳法憲
回憶錄
吳法憲 著
香港北星出版社

吴法憲回憶録

吴法憲 著

特約編輯 金秋曉流
責任編輯 施蓟泉
美術編輯 古義仲夏

出版人 北星出版社
地址 香港北角木星街3號澤盈中心1702室
電話 852-28071435
電子郵件 hkstarnorth@hotmail.com
Star North Books Company
Room 1702 Com Yan Centre
No. 3 Jupiter Street North Point Hong Kong
Tel:852-28071435
E-mail: hkstarnorth@hotmail.com

發行人 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220-248號
荃灣工業中心16樓1609-1616室
電話 852-2381 8251
圖文傳真 852-2397 1519
電子郵件 info@lee-yuen.com.hk
LEE YUEN SUBSCRIPTION AGENCIES LTD.
RM 1609-1616,
TSUEN WAN INDUSTRIAL CENTRE,
220-248 TEXACO ROAD,TSUEN WAN,
NEW TERRITORIES,HONG KONG.
Tel:852-2381 8251
Fax:852-2397 1519
E-mail:info@lee-yuen.com.hk

2006年9月第一版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962-86438-2-7
定價 精裝本(全二卷) HK$ 218.00
平裝本(全二卷) HK$ 16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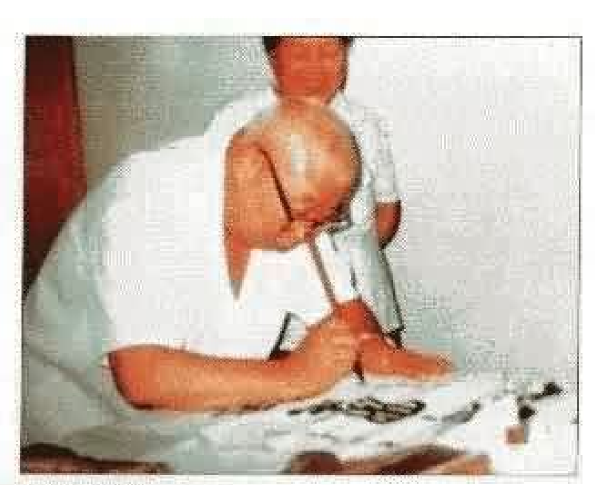
吴法宪与陈绥圻在办公室



全家福



吴法宪恢复公民权後第一次参加选举



吴法宪在练字



與軍委辦事組成員會見外賓　（前排左四為吳法憲）



吳法憲陪同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夫婦觀看飛行表演（右三為吳法憲）



吳法憲在天安門城樓上



七年中共軍委擴大會議與會者合影　（第二排左二為吳法憲）

吳法憲撰寫回憶錄的手稿



吳法憲書法

目　錄

（上卷）

第六章　抗日戰爭（二）新四軍三師

第七章　解放戰爭（一）激戰東北

（下 卷）

第十章 "文革"的前奏

第十一章 風風雨雨鬧"文革"

第十二章　九大前後

第十三章　九屆二中全會

第十四章 "廬山會議沒有完"

第十五章 階下囚

第十六章 保外就醫到濟南

寫在最後面的話：

附録

自　序

我從十五歲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在這支隊伍裏成長，至今已經六十多年了。在黨的領導培養下，在人民的教育幫助下，捫心自問，爲中國革命，爲祖國和人民，我盡力做了一些事情，但貢獻甚微；與此同時，那些漫長道路和艱難歲月中的酸甜苦辣，我也都一一嘗過。

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人民解放軍建軍五十四周年的日子，國家公安部派人來到秦城監獄，向我宣布：考慮到我的身體的狀況，安排我來濟南保外就醫。自那時起，至今已經十多年了。

這些年來，許多老同志、老朋友，以及一些年輕的朋友曾經向我建議，有的同志還主動提出要幫助我撰寫回憶録，使我深受感動。我由衷地感謝他們的好意。

寫回憶録，我早有此意。早在一九四五年在東北的時候，我看到我的妻子陳綏圻特别愛看書，老是到處去找書看，我就對她説："將來有機會，咱們倆一起寫點東西。"

但撰寫回憶録，實在是一件勞心費力的事情。我年邁體衰，深感力不從心，加之缺乏一些最基本的寫作條件（比如無法到有關部門查閲相關的原始檔案和文獻），祇能用最原始的方法，慢慢地，自己去回憶和思考；祇能參考一些已經公開發表的回憶文章，所以其中的錯誤絕不會少，我的主觀想法是實事求是，如實

地去反映我所親身經歷的事件和情節，不虛構，不造假，不粉飾，不渲染，不分析，不作結論。既不掩飾自己的過失和錯誤，也絶不違心的去承認那些無中生有的東西。

在歷史的長河中，很多歷史事件，是由很多的側面來展現，完善的。在我的回憶録中所涉及到的一些歷史事件，我所經歷和反映的衹是一個側面，還需要其他的史料來印證，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來濟南以後的十幾年中，我一直在做着這樣的努力。很難，太缺乏基本的條件了。但是我努力了，衹有這樣了。盡量爲讀者和歷史學家提供一些具有史料價值的東西，結論由讀者和歷史來做，這就是我的初衷。

既然是回憶録，必然要涉及到各個歷史時期我的那些同志和戰友，我的那些上級、下級和同級都會涉及到，因爲我没有條件去徵求他們的意見，如有錯誤，自當由我負責。

我的寫作水平，寫作能力都很低，希望讀者多予批評指正。

最後，謹以此書答謝五十多年來與我榮辱與共的老伴陳綏圻，以及我到濟南後悉心照顧我的兒子吴新潮和采芹、仲秋、京秋、巴璀、夢璀幾個女兒們。

一九九五年于濟南

第一章　我的一家人

一、四世同堂

我們家是四世同堂——曾祖父、祖父、父親和我及弟妹們。曾祖父的名字叫吴遐渭，是個十分老實的農民，他的一生都是在勞苦之中度過的。我八歲那年，曾祖父去世了。到現在我還記得，曾祖父去世後，我們一家人及親戚把他送到我們家後面一座小山上去埋葬的情景。那一年，曾祖父正好八十歲。這在當時已經稱得上是相當高壽了。

曾祖父生有兩個兒子，長子吴芳德，即我的祖父。次子即我的叔祖父，但叔祖父叫什麽名字，我却不記得了。

祖父曾在一個姓李的地主家當長工二、三十年，積蓄了五、六十塊錢才娶了我祖母陳氏。婚後，祖父租了這個姓李的地主家七、八畝地種，不再出去當長工。地租很重，是倒四六開。每年的收成，六成要交給地主，我家衹得四成，大約每年要交十二擔的租谷。年景好的時候，自己還能剩下七、八擔谷子。這點糧食也就够全家人吃半年，其餘則要靠秋季種地瓜和豆類來補充，以瓜菜過半年。年景稍差一點，就連半年的糧食都吃不上了。祖父一個大字不識，但是有點手藝，會用地瓜粉做粉皮。每年的秋後，他都靠做粉皮來掙回一點錢。

祖母陳氏出身于一個破落地主家庭，家裏的房子很大，但是

却破落不堪。由于家境敗落，祖母娘家的生活也十分困難。記得我小的時候，有一次到祖母的娘家去玩，她娘家裏都無法招待我，祇好拿番薯給我吃。祖母會納鞋底，鞋底納得又結實又好看，因此常有很多的人來找她納鞋底。她當時給人納一雙鞋底，一般是收兩個銀毫子。這樣每年也可以掙回一點錢。另外，爲補貼家用，祖母還在家里養了一些鷄和兔子，同時還養了一、兩口猪。

我家祖輩都居住在興國縣的南坑鄉，那是山凹裏的一個村子。以後祖父和叔祖父分了家，我們一家便遷居到離南坑鄉約三十里的永豐縣龍崗區君埠墟大安村。曾祖父也隨祖父一起遷居大安村，同我們一起生活。

我父親名叫吳功信，是個獨子，小的時候念過幾年書。十六歲時，父親結了婚。母親曾氏，是個普通家庭婦女，那年也是十六歲。

一九一五年，母親在二十歲上生下了我，家裏給我起名吳臣清。我是家裏的長子。母親生我時，家境已經有了好轉，剛蓋起了六間屋子，其中一間廳房、一間厨房，其餘四間用來住人。另外，還建了三間用來裝稻谷的兩層樓倉庫。以後，家裏又逐漸買了三畝地、一頭牛和一些農具。由于我正好是蓋新房那一年生的，因此父親給我起了個小名叫新福生，認爲是我給家裏帶來的福氣。

我出生一年半之後，母親生下了我的大妹妹，接着又生下了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到我參加紅軍那一年，母親又生下了最小的一個妹妹。這樣，我家一共有二男三女五個孩子。我弟弟叫吳臣洋，小名叫九生保。由于當時農村重男輕女的封建習俗，三個妹妹都沒有名字。當時可以說是我家的全盛時期，我們五個孩子，再加上曾祖父、祖父、祖母、父親、母親，一共十幾口，真的是一大家子人。

由于我父親讀了幾年書，識得幾個字，能寫對聯，也會記帳，所以總希望我也能讀書識字，將來能成爲一個耕讀之家。于是，我七歲那年，父親送我上了學。我還記得那一天，天未亮，鷄剛叫時，父親就拿了一盞燈籠，扛着一張桌子，叫我去“發蒙”（我們家鄉把孩子第一次上學叫“發蒙”）。那天，他把我送到了馬古州張賢左先生家去讀私塾。

張先生大約收了二十多個學生。他教我們讀《三字經》、《百家姓》、《論語》、《中庸》、《幼學瓊林》，以及孟子、曾文正公的書等，還學了珠算。在張先生家，我一共上了五年私塾。

上學之前我就在家裏負責放牛，上學以後，每天清晨我依然出去放牛，放完牛後才去上學。由于家中的燒柴都歸我負責，所以下午放學回家後，還要上山去砍柴。

我們家旁邊有一個名叫鐵爐下的村子。我十二歲時，鐵爐下村的人在村內的胡家祠堂辦了一個小學。學校辦起來後，父親就把我送了去。當時，鐵爐下村小學祇設甲、乙兩個班，過去讀過幾年書的上甲班，沒讀過書的上乙班。這樣，讀過五年私塾的我就上了甲班。我在鐵爐下村小學又學習了兩年，學了一些簡單的語文和數學。

一九三〇年五月，祖父因病去世，享年才六十歲。祖父去世後，我們把他安葬在住屋後面的小山上，跟曾祖父葬在一起。

隨着祖父的去世，我們家也開始日漸衰落。由于給祖父治病，我家欠了百餘元的債，家境日漸没落。家中僅靠父親一人勞作已難以支撑，于是我不得不輟學參加農田勞動，逐漸學會了各種農活。

二、十五歲參加紅軍

一九三〇年，我十五歲，就是在這一年裏，中國工農紅軍來到了我的家鄉。在紅軍的領導下，我們村裏也鬧起了革命，開始組織蘇維埃政府和赤衛隊、少年兒童團、婦女會等，組織和動員廣大群衆積極起來參加革命。

在這場革命運動中，我報名參加了村裏的兒童團，并任隊長。從此以後，我天天參加革命活動，無論是開會、鬥土豪劣紳、游行示威，還是破除迷信、唱革命歌曲、寫標語等，都非常積極。那年的六月，爲配合紅軍的行動，我們還曾到離家一百二十里的永豐縣苻田去進行革命宣傳活動。没想到，在那裏我們遇到了國民黨飛機的轟炸，把隊伍打散了。轟炸完了以後，我發現周圍什麼人都找不着了，衹好自己一個人走了百十里路回家。

不久，我們村又開始打“ＡＢ團”。什麼是“ＡＢ團”，當時我根本不知道，衹看到一些鄉蘇維埃的幹部和村蘇維埃的幹部被抓起來了，説他們“反水”，是“反革命”，弄得我稀裏糊塗。我還看到一些人被殺，像我們小學的校長胡風章、教員胡澤凡等都被殺了。這麼些人的被抓和被殺，使我心裏很害怕，不知所措。但是過了幾個月，又把一些未被殺的人放了出來，説是搞錯了。大家緊張的情緒這才放鬆了下來。

打完“ＡＢ團”後，我們村就開始了打土豪、分田地。先是把村裏的兩個惡霸地主李祖千、李祖碑抓起來，召開全村大會進行鬥爭，當場把他們兩個殺了。接着，就分田地。我家分到了八畝地和一座茶山。鬥倒了地主，分了田地，大家的革命積極性就更加高了。那年的村蘇維埃選舉，我們選舉了村裏的貧農許泰仁擔任村蘇維埃主席。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蔣介石調動十萬軍隊向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一次“圍剿”。爲配合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反“圍剿”，許泰仁代表村蘇維埃，動員全體村民同紅軍一起，參加粉碎國民黨軍第一次“圍剿”的鬥爭，保衛家鄉。經過動員，我們村裏的全體村民都行動起來，準備支援戰爭。當時紅軍部隊集中在于都縣的[illegible]陂、小布地區。我當時還是村裏的兒童團長，我們被派去爲紅[illegible]帶路、送信、站崗、放哨、抬護傷員和準備糧草。

十二月中旬，國民黨軍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率部進到了[illegible]們村僅二十里的地方，紅軍開始反擊。戰鬥打響前，我們村的[illegible]架隊被派到小別村，負責抬傷員。我便帶領村裏的兒童團，[illegible]

三十副擔架，跟着村長，準備收容傷員。

十二月三十日拂曉，戰鬥打響了。到上午十一點，傷員陸續下來了，我帶着擔架隊趕緊抬着傷員回到村裏。每家三、四人，一共住了一百多。傷員的醫治是由紅軍醫生負責的，他們到各家去救治。

就在那天晚上，上面傳來消息，説紅軍打了大勝仗，將國民黨十八師全部消滅，還活捉了師長張輝瓚。我們村裏的“老表”們高興得不得了。我們連夜趕到龍崗一帶的山上，幫助把紅軍傷員搶運到後方，并協助部隊打掃戰場。在龍崗，我們搶運傷員，爲紅軍收集槍枝、子彈、炮彈和軍用品，還掩埋死者，以及搬運一些國民黨軍的傷病員。我們兒童團撿了成千上萬的子彈殼交給紅軍。這次打掃戰場的工作，一共進行了四、五天才結束。這是我首次參加戰勤工作。

在協助紅軍進行第一次反“圍剿”鬥爭以後，我參加了共青團。從這時起，我就一直想參加革命。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村蘇維埃主席許泰仁召開全村大會，動員村裏的青年參加紅軍。在這次大會上，我和許泰仁的侄子許元懷等十七人一同報了名。

知道了我已經報名參了軍，父親倒是很開通，表示完全同意，而母親却衹是在一邊給小妹妹喂奶，一句話都不説。衹有祖母在聽説我要參軍後，哭得很厲害。在我離家參軍時，祖母一直眼淚汪汪地站在家門口，默默望着我遠去。我是由祖母一手帶大的，所以她最疼我。

在離家去參軍的路上，我遇到了弟弟。我告訴他，我要走了，家中的事情以後要靠他了，要他一定放好牛，多砍柴，幫父母多幹一點活。當時他才十二歲。

三、全家受到迫害

我參軍後，曾于一九三三年一月給家裏寫過一封信。不久，父親給我回了一封信，并隨信給我寄來了一雙布鞋。父親在信中告訴我，中央蘇區進行第三次反"圍剿"時，國民黨軍隊占領了我們家鄉，燒了我們的房子，搶光了我們的東西，全家被逼趕上山。由于沒有東西吃，沒有衣服穿，祖母、母親、弟弟和三個妹妹都相繼凍餓而死，一家七口人僅剩下父親一個，住在他自己搭建的一個簡陋草棚裏。一九三二年的夏季，山洪暴發，把父親栖身的草棚也衝走了。無可奈何，他衹能流落在君埠墟的街頭，靠五塊錢的本錢，以販賣黃烟爲生。

從這次通信以後許多年，由于我一直隨部隊行動，沒有辦法和居住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父親通信，全然不知道他的消息，就更不用說去照顧他的生活了。

一九四〇年秋，我在蘇北地區擔任八路軍蘇魯豫支隊政治部主任，同時還兼任淮海區的專員。當時我曾天真地認爲，既然國共兩黨合作，我的淮海區專員身份也可算作"國民政府"的官員，給父親寫封信大概是沒有問題了。于是，我從蘇北的鹽城向家裏發了一封信，把我的一些情况告訴父親。不料這封信落到了國民黨當局的手裏，他們據此把我父親抓進了監獄。事後幸虧鄉裏作保，凑了二十塊錢，才把我父親贖了出來，使他幸免于難。得知此事以後，我就再也不敢給父親寫信了。

一九四九年春，我的家鄉得到解放。家鄉解放之時，我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十三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隨部隊一路南下到了南寧。在南寧，我還兼任了南寧市軍管會副主任。得知家鄉解放的消息，我當即從南寧給父親寄去了一封信，并寄去了我和妻子陳綏圻、兒子吳新潮的合影照片。父親收到了這封信，他老人家很高興，并很快便給我回了信。父親在信中告訴我，他仍是孤身一人，在君埠墟以肩挑貨郎擔販賣黃烟爲生。接到信後，我爲父親還活着而高興，却又爲他的孤苦而擔憂。

一九五〇年六月，我接到調令，中央軍委命令我到北京任空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去北京之前，我打了個報告給當時的第四野戰軍兼中南軍區副政委譚政，想請假繞道回一次江西老家，把父親接出來，讓他和我一起去北京安度晚年。由于當時任務緊急，譚政沒有同意。他告訴我，組建空軍任務緊急，需要人手，要我先去北京報到，然後再去接父親。

我服從了命令，徑直趕往北京赴任，打算在北京安定下來以後盡快把父親接過來。不料想，我們于七月七日剛到北京，就接到我的一個遠房堂弟吳臣賢的來信。他在信中沉痛地告訴我，父親已經在日前因患痢疾去世了。他還在信裏説，由于沒有錢，買不起棺材，他們衹能用一領草席草草地將我父親埋葬了事。

我計算了一下日期，如果我從南寧出發趕去接他，還是可以把他接出來的，而且像痢疾這樣的病，以部隊當時的醫療條件和水平，是完全可以治好的。真是事出意外，爲我們始料不及。我後悔不已。但我當時也衹能用以革命利益爲重，"自古忠孝不能兩全"、"要革命就會有犧牲"等道理來安慰自己。

由于當時國家還實行供給制，我手頭沒有錢，衹好請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批準，由組織上給了我二百八十塊錢的救濟款。我將這筆錢轉寄給了吳臣賢，要他代我給父親買口棺材盛斂，并請他在重新埋葬我父親後做個墳頭，立一塊墓碑。我還請他代我用這筆錢還清父親生前欠下的欠款。後來我聽説在安葬父親的那一天，鄉政府還給他老人家開了一個追悼會，對此，我從内心裏深深表示感激。

四、解放後回家，只見一個個墳墓

一九六〇年二月，我在廣州參加完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後，向軍委請了個假，軍委領導同意我回家去看看。我從空軍在江西的新城機場要了一輛吉普車，讓他們到廣東韶關來接我。然後，我從韶關乘車經南雄，到新城機場住了一夜。第二天，抵達江西贛州。在贛州，行署的秘書長請我吃了一頓飯。在我到贛州之前，行署就我探家一事給興國縣打了電話，因此當我來到興國時，縣裏已作了安排，我的遠房堂弟吳臣賢到縣城來接我。

第三天，我們先從縣城坐吉普車到興國縣的良村。由于從良村到我家還有六十里路不通汽車，再往前就得走路了。爲此，良村公社派人前來引路，并給我找了一頭騾子代步。

我們接連翻越了幾座大山到達南坑鄉。那天晚上，我們就在南坑住下了。南坑是我們家的祖居地，那裏有我們吳家的祖宗祠堂。在我們到達南坑以後，村裏姓吳的鄉親聯合起來請我吃了一頓飯。我看到，鄉親們都很窮，生活很苦，就把身上的二十塊錢和一枝鋼筆都送給了他們。

從南坑到我家還有三十里路，要翻三座山，山高路滑。不巧天又下起了雨，使我們行路更加艱難。走不多遠，我的全身就濕透了，還一連摔了幾跤，弄得我又冷又累。走到雙嶺下，我遇到表哥曾遠洪，他帶着一把雨傘來接我。離別三十年，我幾乎都不認識他了，他背駝了。因爲山路狹窄，兩人不能并行，于是他把雨傘給我用，自己淋着。快到大安村時，雨越下越大，打着雨傘也不管用，我索性和大家一起淋着。

到了大安村外的河邊，我看到了離別三十年的家鄉。原先架在河上的那座木橋不見了。對那座木橋，我的印象非常深，從前一到夏天的夜晚，村裏的人都來到那座橋下乘涼。沒有了橋，大家現在衹好涉水過河。記憶中的家鄉全沒有了：樹林沒有了，竹

林沒有了，我家的房子沒有了，甚至連房基地都沒有了，都變成了一片片的稻田。原先的三家鄰居還有兩家在，但每家都衹剩了一間半面墻的土屋，那屋頂全是用稻草蓋着。

我的家沒有了，我們一行衹好在鄰居許元茂的房子裏歇歇。許元茂的妻子和母親都還在，但他的家裏却空蕩蕩的，衹有一條木凳和一張小木桌，其它什麽都沒有。由此我還聯想到，今天我們走了三十里路，沿途沒看見一間新房，所看見的房子全是破垣殘墻，頂無片瓦。建國十一年了，沒有看到老蘇區的家鄉有任何變化，我心裏十分難受。不久，另外一個鄰居李文福也來看我。李文福的父親七十歲了，我還認得他，他却不認識我了。

許元茂、李文福告訴我，國民黨軍第四、第五次“圍剿”時把我們村子燒光了，樹林和竹林都被他們砍去修了工事。原先村外的那座木橋，也是當年被破壞的，以後一直都無力修復。由于森林被伐，水土流失，當年緑樹成蔭的青山全都變成了黄土L

這時，村裏的一個老前輩特意從鄰村趕來看我。他告訴我一些國民黨軍第四、第五次“圍剿”的情況，還對我說起父親被抓起來後，全村鄰居湊了二十個銀元將其保出來的情況。我聽後内心十分感激，想到我這幾十年在外，不僅無以報答父親的養育之恩，也没有報答過鄉鄰的幫助，不由得雙眼模糊起來。

這時，已快到吃晚飯的時候了。走了一天沒吃飯怎麽辦？許元茂的家裏什麽都沒有，供不起我們一行人的飯菜。好在吳臣賢他們對此早有準備，已經從南坑帶來了大米、猪肉和一些蘿卜，我們的這一頓晚飯才有了着落。我便邀請村裏的幾個老人、許元茂一家及縣裏陪同前來的人一起吃了頓飯。飯後，我向吳臣賢借了十塊錢送給許元茂的母親，表示我的感謝。對其他的鄰居，我就衹好説抱歉了。

剛剛吃完飯，就碰到一件令人十分高興的事。這也是巧合，一九三二年初同我一起報名參軍的許元懷也回家探親，就住在鄰村妹妹家，聽説我回來了，他立刻跑來看我。儘管我們三十年沒見面了，但一見面就相互把對方認了出來。我們從小就在一起放

牛、砍柴，後來又一同參軍編入贛東游擊隊。祇是在贛東游擊隊編入紅軍贛東獨立團時，我由于身材較矮被獨立團拒絕接收，而他身材高大被留下。從此便同他分别，以後就一直没有音訊。今日意外重逢，真是讓我們悲喜交集，感慨萬千。

許元懷告訴我，他也參加了長征，在到達貴陽附近當了排長，後因生病掉隊落伍，與部隊失去了聯系。爲了生計，他先到一個地主家當了三年長工，以後到貴陽學成木匠，并成了家，有了三個孩子。這次，他帶着十歲的大孩子來探家，正好遇見我也在探家。和我相遇真是太巧了！

與許元懷見過以後，我决定到後面山上去看看我祖父、祖母、父親和母親的墓，我的表哥、表侄、吴臣賢、許元茂也同我一起去。我們去的時候，天仍然在下着雨。到了墓地，我十幾歲的表侄用隨身帶的鐮刀，先把我祖父母和父母墳上的草割了，然後我在每一個墳前鞠了三躬，就算我給親人們盡的一次孝，請親人們原諒我吧！

回到村裏，已是該休息的時候了，可住處却成了問題。區政府的人在附近的鐵爐下村，找了大隊的一個倉庫。這樣，我們一行又走了兩里路，過了一條河，到了鐵園大隊的這個新修倉庫裏，裏面還比較乾净。没有床，他們又去找了很多稻草來鋪在地下，我們十幾個人就睡在上面。這時，君埠墟鎮的黨委書記知道了，冒着大雨，帶着一些人給我們拿來了七、八床被子和一些大米、蔬菜和猪肉。他們在野地裏架起了一口大鍋，又給我們做了一頓飯。

當晚，我向"老表"們詢問了家鄉的生活情况。那位黨委書記説，"大躍進"時由于政令不統一，搞得很亂，導致人民群衆不聽指揮，思想混亂，造成生産下降，群衆生活很困難。尤其是農民群衆，不僅手裏没有錢、衣、被，不少老鄉家裏連吃飯都很困難。因爲集體生産搞得不好，很多人就不願出工參加集體幹活，而是跑到山上去種自己的自留地。

我聽了這些情况以後不好表態，祇好向"老表"們説，要聽

從區黨委的領導，努力搞好集體生産。可"老表"們却一定要我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反映一下區、公社幹部瞎指揮的情况，説區、社領導的生産指令一年變幾次，老鄉們無所適從。

第二日上午，我離開家鄉回良村。走了三十里路。途經中州墟時，看到這個從前很大的鎮子，現在剩下不到十户人家，感觸很多。

在中州墟，公社黨委留我住一晚，并熱情招待了我們一行。附近的"老表"知道我來了，紛紛來看我，向我反映意見，我要良村區黨委的同志也一起聽一聽。但是，對他們説的許多問題，我都無法表態，祇有含糊其詞。

第三天，回到了良村，區政府專門殺了猪來招待我們。我對良村區、公社的熱情照顧和接待表示了衷心的感謝，并答應他們要盡力支援家鄉建設。

回到北京後，我向總參副總參謀長張愛萍寫了一個報告，經他批準送給良村區政府一臺退役的解放牌大汽車。當時解放軍有支援地方克服困難的任務，良村又是中央蘇區老根據地，在第三次反"圍剿"時，紅軍就在這裏打了兩個大勝仗，應該説，良村的鄉親們是爲紅軍和革命事業作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的。我認爲支援一臺退役的汽車是理所應當。

那些年裏，我也就爲家鄉做了這麽一件事。不是我不想做，而是有很多事情讓我無法去做、無力去做。眼見着鄉親們生活得那樣艱苦，我却無力爲他們做些什麽，至今想起來，我的心中仍然感到十分慚愧。

那天下午我告别了良村，由空軍的一輛吉普車把我接到興國縣。在興國，我把家鄉的一些情况向縣委作了匯報，就離開興國，經泰和、吉安、漳樹到南昌，然後從南昌乘飛機返回了北京。從此，我再也没有機會回過家鄉。

第二章　在革命根據地
——中央蘇區

一、參軍到贛東獨立團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以井岡山爲根據地的中央蘇區迅速發展，紅四軍先出閩西到福建，再經興國、宜都、永豐、寧都、瑞金、瑞昌，向贛東北發展。那時紅軍發展勢如破竹，一天前進數百里，不久就建立了以瑞金爲中心，包括興國，黎川、泰寧等二十多個縣的中央蘇區根據地。

就在這一時期，"朱、毛紅軍"來到了我的家鄉，一個村、一個村地發動大家起來鬧革命，很快就掀起了一個革命高潮。就是在這次革命風暴中，我先是參加了村裏的兒童團，以後又用吳文長的名字參加了紅軍。

我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參軍離開的家鄉。參軍的第一天，我們先到君埠墟，第二天再走六十里路到寧都的黄陂集中。當時來報到的，共有二百多人，住在一個祠堂裏。

不久，把我們這二百多人編成紅軍贛東游擊隊，編爲一連和二連兩個連。我被分配到了一連。連隊的幹部都是紅軍部隊以前的傷員，傷好了以後，被留下來任職。一開始，既沒有給我們發

槍，也没有給我們發服裝，我們整個連没有一支真正的槍。我們每人依然是身着從家裏帶來的便服，腳穿草鞋，手持一杆紅纓槍。就這樣，我們開始了基本的軍事訓練，天天出操跑步。

訓練了一個月以後，組織上決定將贛東游擊隊編入贛東獨立團，部隊開始發槍。發下來的槍大多是土造槍，其中有"單響"的，也有"五響"到"九響"的。可没想到，在編入部隊時，獨立團把我和另一個名叫李文福的小青年給刷了下來，說我倆年紀小、個子矮，人還没有槍高，不要我們。我們不願意回家，就吵鬧着要留在部隊。這時，有一個區隊長過來告訴我們，紅十二軍在瑞金辦了個青年學校，學一、兩年後，就可以當兵，他叫我們跟他走。

没想到，我們剛走到寧都，就聽說紅十二軍的那個學校已經解散了。我們十分着急，還是那位區隊長想了一個辦法，把我們送到寧都地區的寧都獨立團，讓寧都獨立團收下了我們兩人。我被編到三連一班當戰士，李文福在連裏當了司號員。這樣，我們才總算是當上了兵。正式參軍以後，團裏發給我一枝"湖北造"，槍還是挺不錯的。

我們班長是一個湖北人，三十來歲，把我們看成是孩子。他對我非常關心，總是耐心地教我們下操打槍。我從部隊的起居作息到各項基本軍事訓練，一一開始從頭學起。

二、第一次打仗

當時寧都獨立團主要有兩項任務：一是維持寧都縣城的秩序，二是負責圍困離寧都十五里地的一個寨子，名叫翠微峰。寨子裏面駐了國民黨的一個靖衛團。這是當地的一支地主武裝，共有二百多人。這一圍困，前後就是半年多。

我們在寧都縣城駐扎期間，有一天隊伍操練行軍，由寧都出

發到石城，住在石城縣城北面的一條街上。第二天早上，全團會操，團長正下達會操命令時，突然聽到東面山上響起了槍聲。當時祇知道來了一支國民黨的部隊，但來了多少不知道。聽到槍聲，團長當即下達命令，全團停止會操，立即出發，跑步向東面山上打槍的地方前進。

我們一口氣跑了三十多里，來到了東面的高山底下。這樣的跑路我還從來没有經歷過，一路急奔，我跑得累得要死，幾乎連山都上不去了。可就在我拼命往山上爬時，前面傳來消息，説敵人已經跑了。

我當時有一支套筒槍和三排共十五發子彈。可没想到仗打下來，我一槍没放。這一仗打得稀裏糊塗，回來後我就對班長説："仗就這樣打法呀！"班長説："我也没有放一槍，因爲前面的隊伍已經把敵人打跑了。"我聽説是前面的隊伍把敵人打跑的，就問他："怎麼没有聽見槍聲呢？"班長有點驚訝，説："怎麼没有槍聲，你是太緊張了吧？"

我這才知道，原來是自己生怕掉隊，跑得太緊張了，竟然連槍聲都没有聽見。我又問班長："你看見敵人了嗎？"班長回答："看見了，你真是一個孩子，打仗連敵人都没看見！"接着，他又安慰我説："你不要着急，慢慢學，我會教給你的。"

我們是早上六、七點鐘出去，中午十二點左右回到城裏，來到原來會操的操場上。團長宣布説，這一次我們打了一個小勝仗，消滅了國民黨靖衛團的兩個連，俘虜了八十多人，打死、打傷了四十多個，繳槍七十多枝，其中最大的勝利是繳了一挺輕機槍。團長還告訴我們，要提高警惕，駐地附近要加緊修築工事，準備堅決打退來犯之敵，保衛蘇維埃政府。

後來才知道，來的那股敵人是石城縣的靖衛團，在我們來到石城以後，他們爲了躲避紅軍，一直躲在了大山之中。那天，他們以爲紅軍主力已經撤離了石城，就想過來占領縣城。走到東面山上時，他們先打了一陣槍，想進行一下火力偵察，看看城裏還有没有紅軍隊伍，没想到我們很快就趕到了，一下子消滅了他們

兩個連。

這就是我打的第一仗，是既没看見敵人，也没聽見槍聲的第一仗。

我們在石城縣裏住了大概一個星期，就返回了寧都，因爲我們的主要任務，仍然是負責圍困翠微峰的地主武裝。

翠微峰在寧都城西面，整個山峰像一塊大石頭，四面都是懸崖峭壁，祇有一條彎曲的石梯小路可以通到上邊。山上有三百多户人家和幾百畝地，但是缺水和燒柴。這個寨子易守難攻，由于祇有一條石梯小路可以通往峰上，祇要用一條槍封鎖那條小路，下面的人就很難攻上去。

紅軍打下寧都之後，國民黨寧都靖衛團的三百多人也跑到了翠微峰上，憑借着這易守難攻的山勢來同紅軍進行對抗。在我們之前，其它紅軍部隊曾多次前往攻打，但由于没有機槍、大炮等重武器，更没有飛機，多次攻打都没有把寨子攻下來。有一次，山上的敵人還趁着紅軍没在城裏的時候，下山大搶了一通，把附近幾個村子裏老百姓的東西都搶光了。

翠微峰上的這伙地主武裝是插在蘇維埃根據地裏的一顆釘子。上級領導决定用我們寧都獨立團五個連的兵力來包圍翠微峰，不讓山上的敵人下山，等他們彈盡糧絶以後，再發動强大的政治攻勢來瓦解他們。我們三連的任務，就是負責把守那條上下山的唯一小路。

翠微峰下有一條河，過河就是一個村莊。山上的敵人不僅經常趁黑夜派人下山來挑水、打柴，并且還不時過河到村子裏來抓猪、捉鷄、打狗、搶糧食。一天下半夜，敵人一個連大約七、八十個人慢慢摸下山，想到河這邊的村子裏來搶糧食。我們連長很有經驗，事先叫我們在河這邊利用田坎挖了一些工事，然後全連散開成一綫，隱蔽在河邊準備迎敵。那時天雖然還没有亮，但有月光。雖然看不見敵人的臉和手脚，但可以看到一些模糊的黑影子。

班長説："注意，吳文長，你看見了嗎？"我回答説："看見

了。”班長說：“準備好，我叫你放槍你就放槍。”

我一邊答應着，一邊緊張地注視着敵人。眼看着敵人下了河，正慢慢地向着河這邊走來。當敵人離岸大約還有三十多米時，班長下令開槍。我們便很快放了一排槍，有六、七個敵人被打倒在河裏。其他敵人一見，立即回頭就跑。

這時，連長命令追擊。但我不知道怎麼個追法。班長就叫我跟在他的後面。我見他一會兒利用樹，一會兒又利用石頭來隱蔽自己，就學着他的樣子，緊緊地跟在他後面，他隱蔽在哪裏，我也隱蔽在哪裏。就這樣，我們不斷向前追擊。眼看跑在最後面的敵人也快要上山了，連長叫我們班從左面快速迂回到敵人的前面去，截住敵人的退路，并使前面的敵人不能回來增援。就這樣，兩面一包圍，抓到了六、七個敵兵，其中包括兩個傷兵，還繳獲了六、七條槍。就這樣我們連打勝仗回來了。我們班也得到了表揚。這是我第一次真正參加打仗。

這次戰鬥以後我問班長，怎樣才能殺傷敵人、保存自己。班長告訴我幾條原則：要學着他的樣子，一是利用地形地物；二是前進時要分散，要哈腰，在平地上要匍伏前進；三是要隱蔽，要想法迂回到敵人後面去；四是要有進攻的，還要有掩護的，用火力截斷敵人；五是要挖工事，要有自己的窩。最後班長還告訴我，前進時一定要快。

打完這一仗，別的連隊就接替了我們的任務，我們連則撤回到了寧都城裏。集合後，團長、政委都來講了話，表揚了我們班。我們團長是個朝鮮人，叫什麼名字我忘了。政委的名字我還記得，叫封正吾。

三、打“ＡＢ團”

再說一下打“ＡＢ團”。

没有參軍以前，在家鄉時就看見打“ＡＢ團”。到了部隊以後，又趕上“肅反”、殺“ＡＢ團”。當時我不知道什麽是“ＡＢ團”，連“Ａ”“Ｂ”兩個字都不認識。後來領導才告訴我們，“ＡＢ團”就是國民黨，是藏在我們内部的敵人。那時各部隊抓的“ＡＢ團”很多，都關在老鄉家裏。這些被抓的“ＡＢ團”分子，很多都被殺掉了。别的部隊我不知道，反正我們部隊内殺的人就不少。

在這次“肅反”過程中，我們連負責押解“犯人”。那些被打成“ＡＢ團”的人一個一個地受審，我們就在外面放哨，等審訊完，再把他們送回到關押地點。負責審問的人都很凶，“犯人”經常挨打、受刑。有時他們還把“犯人”的兩個手指捆在一起，中間再加上一塊木頭，往下用力一壓，痛得“犯人”哇哇亂叫，哭喊不已。這些人究竟是真“ＡＢ團”，還是假“ＡＢ團”，我不知道，反正連長、排長抓了一大堆，最後連我們的團政委封正吾自己也成了“ＡＢ團”。不過，班長以下的被抓還不多。

最後，團裏派我們班押送五名“犯人”從寧都去黃陂。“犯人”被繩子綁着，由戰士拉着繩子跟在他們後面，兩個戰士押一個“犯人”，專門走小路。到了黃陂以後，我們班依然還是擔任押送“犯人”去受審和放哨的任務。

不少“犯人”是在夜裏被處決的，不過夜裏殺人没有派到過我們班。派去的都是連裏最勇敢的人，大個子，用的是梭標。有時候，一個人連着被捅了十幾下甚至二十多下都没有死，真慘。後來知道這些被殺的人絕大多數都不是“ＡＢ團”。

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肅反”和打“ＡＢ團”，一共搞了兩年左右的時間。我們各部隊都是一面打仗、一面打“ＡＢ

國"。就這樣，隊伍還是不亂，還能打仗，大家還是聽共產黨的話，聽"朱、毛"的話，這實在是不容易。紅軍真是好隊伍！

四、從通訊員、文書到青年幹事

完成押送"ＡＢ團"的任務以後，我們班就回到黃陂到寧都之間的安福鎮歸隊。在安福鎮，全團接到命令向廣昌進發。我們團的番號改成了廣南獨立團，駐在廣昌、甘竹地區。自從當兵以來，我一共到過三個縣城：寧都、廣昌和石城。在這之前，我從來沒有到過縣城。

在廣昌以南就有敵人。從廣昌向前再走一百二十里，就是南豐。南豐是國民黨的一個重要據點。我們到了廣昌以後，一直沒有打仗，因爲那時形勢好。第三次"圍剿"被粉碎了，第四次"圍剿"還沒有開始。國民黨統治的地區在收縮，而蘇維埃地區在延伸。我們發展了，隊伍也得以進行軍政訓練，當然主要是軍事訓練。

隊伍到了廣昌以後，團裏把我調到了一連當通訊員。一連的連長姓李，是興國人。我除了送信、晚上送口令以外，行軍時還負責扛連旗。我還記得，那是一面綉着鐮刀和斧頭的大紅旗。

當了三個月的通訊員，連長看我識得幾個字，會寫毛筆字，就叫我當連裏的文書。我不懂當文書是怎麼回事，連長就告訴我，第一是造連裏的花名册，把全連的名字寫下來，供連長早晚點名用；第二是幫司務長計算伙食帳；第三是代戰士寫請假條，送連長批准；第四是幫連長向上面打報告，將全連每天行軍、宿營發生的各種情況都寫下來，等連長蓋章以後呈報上級。

我衹念過幾年書，從當時的文化水平説，這些報告究竟怎麼寫，我也不知道。爲此，連裏專門送我到團裏去學習了一個星期。團裏一個以前曾當過師爺的書記官，教我怎樣寫呈子。都是老一套，我很快就學會了。

一九三一年六、七月，蔣介石又集中了三十萬人，而且調集了嫡系的部隊，對紅軍發動了第三次圍剿。蔣介石親自擔任總司令，何應欽爲前綫總指揮，住在南昌，聘請了英、日、德等國的軍事顧問，隨軍參加策劃。敵人兵分四路，長驅直入，向永豐，寧都進攻。第二次"反圍剿"以後，紅軍主力正在分散休整，擴大根據地，發動群衆，建立政權，没有想到敵人來得這麼快。當時紅軍衹有三萬人，要對付蔣介石的三十萬人。七月十日前後，軍委將紅軍主力相繼集中，繞道瑞金，寧都到了興國的高興墟一帶，準備誘敵深入，待機殲滅敵人。我們獨立團擔任了北綫誘敵深入和牽制敵人的任務。我們采取毛澤東的游擊戰術，襲擊敵人，打一下就跑，將敵人引誘到興國，永豐，寧都等根據地的中心地帶。整個紅軍經過蓮塘戰鬥，良村戰鬥，黃陂戰鬥，方石嶺戰鬥等幾次苦戰，取得了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共消滅敵人三萬餘人。這樣蔣介石的第三次"圍剿"宣告失敗。

一九三二年春，我在一連大約當了有半年文書以後，隊伍整編，把紅十二軍的一〇五團、廣南獨立團和石城獨立團三個團合編爲廣昌獨立師（也叫贛東獨立師，後稱江西軍區獨立第四師）。主力部隊一〇五團編爲十團，廣南獨立團編爲十一團，石城獨立團編爲十二團，其中衹有十團是老部隊。正好十團辦了一個文件訓練班，就派我到訓練班去學習。説是訓練班，其實連我在内才兩個學員。教員是十團的一個書記官，由他來專門教我們倆。

我到十團學習後不久，十團就向樂安進發，去那裏剿匪和打土豪、分田地。我在團部學習期間，經常被派出去搞調查，要搞清楚哪些人在當地有錢有勢，專門欺壓魚肉百姓。同時，我們還要研究擁有多少土地算是地主、土豪，擁有多少土地算是富農、中農，哪些人算是貧農，没有土地靠給地主做長工的是雇農。做好了調查研究，了解清楚當地情況後，寫出報告上報團政治處，由團裏派人抓土豪來罰款。罰款的錢數，三百、五百大洋不等，也有罰一千、兩千大洋的。我們在甘竹這一個鎮子，就搞到了十

來[illegible]了的銀洋，派人送到了廣昌師部。

當時部隊經常利用晚飯以後的時間開展體育活動，練練跳高、跳遠什麼的。有時正式操課時間也搞，還規定了必須跳多高、跳多遠。我們就在地上挖一個長方形的坑，再在坑裏加上沙子練習跳遠，再弄幾根樹枝當横杆練習跳高。

我那時候年輕，喜歡活動。一天中午，我們兩個訓練班的小文書利用午睡時間，偷偷跑出去練跳高。第一次我跳過去了，第二次横杆升到了一米多，我一跳就摔在那裏，昏了過去。到下午四點我醒過來以後，才發現自己躺在一張門板上。那個小文書就問我："剛才你到哪裏去了，你知道嗎？"

我說："不知道。"

他這才告訴我，當時我摔得人事不醒，他們把我抬回來，團長、政委都很着急。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敢去跳高了。

十團的團長叫戴福勝，是湖南人，政委叫李純安，是個知識分子。李政委看我在十團當文書當得還可以，就想把我留下。有一天他告訴我，他們已經研究好了，我不再回十一團，就留在十團政治處當青年幹事，管青年團的工作。

我雖然早已加入了共青團，但究竟怎樣搞青年工作我還是不太懂。反正是在政治處掛個名就是了，很少真正做青年工作。我成天跟着團政治處主任賴際發跑來跑去，部隊天天都有戰鬥準備，經常行軍打仗。有時政委就叫我在後面收容掉隊落伍人員，找老百姓搞擔架抬傷員。

一次，從南豐縣出來的國民黨軍一個團占領了甘竹鎮，師部下令要我們去把那個團搞掉。我們一跑就是三十里。可當我們趕到甘竹鎮時，敵人已經跑掉了。我們占領了甘竹鎮，在那裏駐了大約一個星期。

過了幾天，團長、政委又奉命帶領我們向驛前開進。因爲那裏的土豪劣紳和國民黨地主武裝搞了一個大刀會，他們個個手持大刀，頭上纏着紅布，赤臂，穿短褲。他們喝鷄血爲盟，說是槍打不進，刀砍不入。

到了驛前，我們剛剛擺開陣勢，大刀會呼啦呼啦地上來了。他們一支槍都没有，都是清一色的大馬刀，個個都是一副不怕死的樣子，很威武。我們走在前面的部隊看到他們這個樣子，有點害怕，就不够沉着，槍也打不準了，一連放了幾排槍也没打到敵人。于是，有的戰士真以爲他們是刀槍不入呢，就往後跑。

我們團長打仗有經驗。他把散亂的隊伍重新集中起來，排成前後兩排，前面的一排跪着，後面的一排站着。由團長統一下口令，一、二、三，兩排隊伍一起放排槍。結果大刀會的人一片一片地往下倒，剩下的没命往回跑。他們跑我們就追。這一仗，我們一個傷亡也没有。雖然没有繳到槍，但是繳獲了一堆大馬刀。戰鬥結束後，團長集合部隊講話。他說："什麼刀槍不入，你們看，這到底是入還是不入呢？"從此以後，我們再打大刀會就很沉着，也很有把握。大刀會再也不敢向我們挑釁了。

打完這一仗，我們全團又回到甘竹鎮，繼續負責警戒南豐方向的敵人。

一天團政委李純安把我叫了去，說師部來了電話，叫我到師部去，師長有話要和我談。我說："我連師長的面都没見過，都談什麼呀？"政委馬上安慰我說："你别害怕，我派一個人帶你到師部。"說完，他當即派了團裏的書記官和我一起，趕到駐在廣昌的師部，見到了師長龍普霖。

龍普霖是一個知識分子出身的黄埔學生，當時擔任我們廣昌獨立師的師長兼政委。我們師裏没有副師長，也没有參謀長，祇有幾個參謀，可以說師部領導就他一人。我從來没有見過大官，心裏很害怕。但師長對我挺和氣，我緊張的心也就慢慢鬆弛了下來。

他先問了我幾個問題，問我是哪裏人，多大歲數，什麼時候參的軍，什麼時候入的團等等。接着，他又問了我的家庭情況。對此，我都一一做了回答。然後，他開始考我，問我列寧是誰。我說聽過列寧這個名字，但列寧是哪裏人，我不知道。聽我這一說，他高興了，說："你還知道列寧呀，真不簡單！"接着他又

問我："你會唱《國際歌》嗎？"

我回答說，兩年前我就會了，在村蘇維埃的時候，每次開大會我們都要唱《國際歌》。他讓我唱了一遍，又問我為什麼要參加紅軍。我說紅軍來了以後，我們家鄉解放了，除了給我們家分了地，還分了茶山，每年可以收到幾百斤油茶子。再就是，我看到有的同鄉，祇比我先參軍幾個月，就當了副班長，我看紅軍當官很容易，我想當官。

龍普霖聽了哈哈大笑，說："你這個人挺老實的，是想當官才參的軍呀！"笑過之後，他又問我："你知道什麼是共產黨嗎？"我說："共產黨我知道，我是青年團員嘛，青年團就是共產黨的助手。"他再問："什麼叫助手？"這個問題對于我來說有點難，于是回答說我也說不清。師長就耐心地給我解釋說，助手就是幫幫忙的意思。

師長看我很忠厚、肯講實話，就很高興，還叫勤務兵給我倒茶。最後，他告訴我，中央準備在瑞金辦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校，不久就要開學，要我們師選派一個人去學習，師裏準備派我去。

我說我還願意留在部隊，因為我擔心自己去了後學不到什麼東西。師長叫我不要再多說什麼了，說他已經給我們團裏打了招呼，事情就這樣定了，學完了再回師部。言外之意，就是回來以後，就留在師裏做青年工作。

可是從師部回到團裏以後，大約兩、三個月都沒消息，我還在十團當我的青年幹事。

五、師長叛變

大約在一九三二年四、五月間，有一天，我們全師突然向國民黨軍駐扎的南豐開進，而且是大白天開進。在過去是極少這樣

做的。我們也不知道部隊是去幹什麼，祇是跟着隊伍前進。走了一天多，到太陽剛剛下山時，我們來到了南豐城的北邊，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南豐的城墻了。這時，師裏下令，讓部隊在一個離城祇有二十多里的山上休息。

當天晚上，突然發現國民黨的隊伍包抄過來了。正在大家準備迎敵的時候，早就對這次行動存有疑心的三個團的領導聚在了一起。三個團政委，包括十一團政委胡楚夫、十團政委李純安、十二團政委賴際發，都是堅定的共產黨員。三個團的領導認定：這次突然的行動是師長龍普霖想要帶領隊伍投敵。他們決定先帶着一部分人跑到師部把龍普霖抓了起來，然後帶着部隊快速向北撤退。敵人以兩個師的兵力在我們後面急趕緊追，但我們還是安全地撤退了。那天，一直跑到十團的原駐地才停下來休息。最後，隊伍回到了廣昌。

回到廣昌縣城，全師立即召開排以上幹部會議。由十一團政委胡楚夫向大家宣布，龍普霖是反革命，這次他帶我們廣昌獨立師南下，是企圖向國民黨投降。他準備在南豐附近等國民黨軍上來，把我們一包圍，他就宣布投降。胡楚夫還說，龍普霖同國民黨勾結大概已經有三、四個月了，國民黨還派來一個奸細到龍普霖那裏當副官，由這個副官溝通龍普霖同南豐城裏國民黨軍隊的聯系，并最後策劃了這次妄圖帶領隊伍投敵的反革命罪行。

當時我們部隊沒有電臺，廣昌離瑞金有二三百裏，胡楚夫和賴際發帶了一個連，把龍普霖押送到瑞金，當面向中央局領導報告龍普霖的叛變情況。以後經臨時中央蘇維埃最高法庭審判，將龍普霖和國民黨派來的那個奸細一起槍斃了。

胡楚夫和賴際發回到廣昌獨立師以後，全師又召開排以上幹部會議，由他們報告了審判龍普霖的前後情況。同時，他們還向大家介紹了中央新派來的師長和政委。新師長叫張世杰，是一個朝鮮人，會講中國話，他同時是中國共產黨和朝鮮共產黨的黨員。政委叫史猶生，曾是湖南長沙師範學校的學生，是一個久經鍛煉的地下黨員，到紅軍以後就一直做政治工作。

張世杰、史猶生來到師裏以後，就着手整頓司令部、政治部等機構。一九三二年的五月底，史政委把我調到了師政治部任青年科長。當時師政治部的編制有組織、宣傳、保衛、民運、青年等科。幾個科長都是小青年，也都是小學畢業生，我們經常在一起開會，一起行軍打仗，相互之間關系很好。史政委還經常給我們講課，講馬克思，講《共産黨宣言》，講列寧，講蘇聯的十月革命，講中國共産黨的歷史，講毛澤東、朱德，講紅軍、蘇維埃、共青團。他還告訴我們，共産黨現在還處在秘密狀態，不能公開黨員、團員的身分，要嚴守機密，服從組織，犧牲個人。通過史政委的講課，我慢慢地開了一點竅，對照土地革命的實踐，我認爲史政委講的都是正確的。就這樣，我逐漸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史政委的工作深入細致，不斷地和我們談心，了解我們的思想情況。我們每次召集各團的青年幹事開會，他總是親自主持講話。史政委對我很好，經常同我開玩笑，還給我起了一個外號叫“蘿卜”。當時我也搞不清楚這個外號是什麼意思，後來有一天他告訴我，“蘿卜”是潔白的，是純潔的意思。

六、參加青年團“一大”和在團校學習

一九三二年八月底，史政委通知我，師裏決定派我作爲全師共青團員的唯一代表，參加將于九月一日召開的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我當即動身到瑞金。我還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大會。當時會場布置得莊嚴肅穆，會議也開得十分隆重。在會上，除團中央書記顧作霖作了報告之外，少年先鋒隊總隊長張愛萍、團中央組織部長王盛榮、紅四軍青年部長蕭華等，也都在會上講了話。在會上，我還見到了江西軍區青年部長康爾柱。算起來，他應該是我的頂頭上司，因爲廣南獨立師歸江西軍區管。當時，江西軍區的司令員是陳毅，省委書記是李富春。

開完會往回走了三天，我回到了廣昌師部。見我回來，史政委便召集了全師幹部和團員大會，要我在會上傳達共青團“一大”的會議精神。當時我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大膽地在臺上講了一通。後來中央蘇區的《紅色中華報》和團中央刊物《青年實話》，還登了我們師的這次會議的情况。

到了九月底，江西軍區又召開了青年工作會議，我又去軍區駐地興國參加了這次會議。當時，江西軍區的司令部和政治部都住在興國城外的一個大教堂裏。軍區司令員陳毅來會上講了話。他講了青年團的任務，還講了列寧和第三國際。講完了話，他還同我們一個個地談話。當問到我的時候，軍區青年部長康爾柱在一旁介紹，說我們師的青年工作搞得還不錯。其實我那時還沒有什麼工作經驗，康爾柱這樣說衹是對我們的鼓勵罷了。

十月底，中央蘇區在瑞金開辦了第一期團校，抽調各師負責青年工作的幹部去學習。我又被調到團校去學習。團校開學時，團中央書記顧作霖作了報告。團校的編制和連隊一樣，由班、排、連組成。早上要出操，晚上做游戲。我當時被任命爲三班班長，我們班共十一個人。

團校的課程包括政治課和軍事課兩類。政治課學習中國革命運動史，共産主義青年團章程，少年先鋒隊、兒童團的組織、任務等等。記得給我們講課的除了團中央的領導人以外，還有一個理論家，叫張如心。軍事課則由紅軍大學派來的教員負責，課程從稍息、立正等姿式開始，以後有隊列訓練、戰術訓練、班排連進攻戰、游擊戰等。

到了十一月份，紅軍大學搞野外演習。我們團校八十多個人被編爲紅軍大學的一個連，與參加演習的紅軍大學隊伍一起，從瑞金出發，一路上演習行軍打仗到了會昌。紅軍大學的康克清來到我們連當指導員，以幫助我們工作。她天天找我們開會。早上出發前布置工作，晚上到了宿營地又召集大家聽取匯報。隊伍在廣昌駐了兩天，聽了縣委、縣政府介紹當地蘇維埃政權的工作。

演習結束後，回到瑞金進行總結，并召開了慶祝演習勝利的大會。在會上還給我們團校發了一個獎杯。演習結束後，康克清就離開了團校，回到紅軍大學。

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後，中央紅軍乘勢展開了全面的攻勢，先後進行了贛州、漳州等戰役。紅一軍團在林彪、聶榮臻的帶領下，不僅曾攻占過漳州，并且還到過厦門附近。紅軍籌集到了不少糧餉，并弄回不少的布匹和鹽。上級還給我們團校每人一身戴紅領章的新軍裝。

我在團校學習的時候，蔣介石已經集中了五十萬的兵力，向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發起第四次“圍剿”。在國民黨軍五十萬重兵的壓迫之下，紅四方面軍主力和紅三軍不得不于十月分別撤離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據地，向川陝邊和湘鄂川黔地區轉移。蔣介石隨即又開始集中四十萬的兵力，準備進攻中央蘇區。眼看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反“圍剿”即將打響，形勢發展需要幹部，第一期團校提前結束了。臨畢業時，紅軍總政治部的組織部、青年部共同找我談話。當時蕭華已是總政青年部部長了，他告訴我，廣昌獨立師已經改編，與獨立第四師及紅十二軍三十六師共同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二軍，廣昌獨立師編爲第六十四師，江西軍區獨立第五師編爲第六十五師，紅十二軍三十六師編爲第六十六師，紅二十二軍長羅炳輝，政委曠朱權，政治部主任譚政。蕭華要我直接去福建邵武找紅二十二軍報到，由二十二軍分配我的工作。他發給我一些路費和書，還有路條，當時在蘇區拿張路條就可以隨便通行。

我到了建寧時，遇到了寧都起義的紅五軍團十三軍政委朱瑞。紅軍都是階級弟兄，朱政委對我十分熱情，招待我吃了飯，住宿了一晚，他還告訴我到邵武怎麽走。

七、參加第四次反“圍剿”

到了福建邵武，我找到了紅二十二軍政治部。邵武縣城没有城牆，衹有一條大街，軍政治部住在一個中學裏。我找到了譚政主任，他表示歡迎我回來工作，還讓青年部爲我開了一個歡迎會。會後，譚政和青年部長馮功竹找我談話，要我回六十四師工作。

我第二天就動身回到我們師的駐地。見到我回來，師長張世杰、政委史猶生非常高興，歡迎我回來。接着，他們下了一個命令，任命我爲六十四師政治部青年科長。我又見到了吴茂和等幾個科長。政治部還爲我開了一個歡迎會。這時，已經是一九三二年年底了。

我離開部隊的時間很短，但部隊的變化却很大。一九三三年一月，我剛到職不久，部隊就接到上級的通知，説蔣介石又調集了三十多個師，分左、中、右三路，開始對我們進行第四次“圍剿”，其先頭部隊已經向我新蘇維埃區域的建（建寧）、黎（黎川）、泰（泰寧）地區發動了攻擊，企圖截斷紅軍的退路，消滅紅軍主力。部隊便開始進行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的動員、準備工作。我聽了非常高興。這是我參軍以來第一次趕上的大兵團作戰，而且我還聽説朱德總司令和周恩來總政委將親臨前綫指揮，我更感到興奮。我們用了三、五天的時間，徵集資財糧食、動員民衆和準備戰場，戰争很快就來到了。

這次是大規模作戰，戰鬥是在一個寬約二百里的廣闊正面戰場上進行。敵人分三路縱隊向我們逼近。第一縱隊，縱隊長羅卓英，率國民黨軍第十一師、第五十二師、第五十九師由宜黄、樂安向寧都、廣昌進攻；第二縱隊，縱隊長吴奇偉，率國民黨軍第十師、第十四師、第九十師向我建、黎、泰地區進攻；第三縱隊，

縱隊長趙觀濤，率國民黨軍第五師、第六師、第九師、第七十九師向金溪、黎川方向進攻。中央紅軍當時參加戰鬥的有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紅五軍團和我所在的紅二十二軍。紅二十二軍參加打的是吳奇偉所率領的第二縱隊。

戰役開始後，全軍包括軍部和第六十四、第六十六兩個師，在軍長羅炳輝、政委譚震林的指揮下，從金溪、貴溪出發，跟隨主力紅一軍團，直接摸向敵人的陣地。由于敵人旅途疲勞，剛到達宿營地，還没來得及修築工事，對我們的到來一點都没有準備，因此戰鬥一打響，我軍就勢如破竹，蔣軍全綫崩潰。當時，在我紅一軍團和配合作戰的我紅二十二軍的寬達七、八十里的正面戰場上，到處都是槍炮聲。我們由金溪沿着通往撫州的公路兩側攻擊前進，吳奇偉率領的幾個師則邊打邊退。從拂曉打到中午十二點左右，我們便占領了滸灣。我們一路收繳槍支，一路捉俘虜。吳奇偉的部隊，號稱"鐵四軍"，被認爲是國民黨軍最有戰鬥力的部隊。在他們丢下的斗笠上面，都寫着"鐵軍"的字樣。可是這一仗，"鐵四軍"都成了大軟蛋。

攻占了滸灣以後，史政委指定我帶領一部分人負責收容俘虜。我把各單位的俘虜約五百餘人，集中到一個村子裏，將他們編成班、排、連、營，對他們講俘虜政策，進行政治宣傳工作，然後把他們移交給了紅二十二軍政治部。

俘虜移交後，我却找不到自己部隊的去向了。我是一個普通政治工作幹部，第一次參加這樣大規模的戰鬥，一上戰場，到處都是槍聲，許多部隊混雜在一起戰鬥，到處都是友鄰部隊，隊伍的建制完全打亂了。一時弄得我暈頭轉向。後來我循着槍聲前進，看哪裏有送傷員，送俘虜下來的，我就往哪裏去找。幾經周折之後，終于在滸灣南面的一座高山脚下，找到了六十四師，才歸上了隊。

滸灣是撫州南面的重鎮，鎮子很大。紅二十二軍占領滸灣後，繼續向前追擊。黄昏時，追到了撫河邊。河面很寬，水也很深，敵人逃過河時淹死了不少人。吳奇偉的部隊大部分被我們消滅，

祇有少部分逃進了河對岸的撫州城。我們也就此停止追擊，戰鬥在此告一段落。我們師在撫河南岸向撫州城警戒，并在滸灣及其周圍地區打土豪籌款，搜集鹽和布匹。搞到的銀洋和物資，都送到了軍部。

接着，主力紅軍準備集中力量消滅羅卓英的第一縱隊，由我們紅二十二軍配合作戰。我們全軍于二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從滸灣南撤，星夜兼程趕往宜黄縣以南的黄陂、東陂一帶。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我們到達黄陂附近。當主力紅軍正在黄陂南面的高山上同國民黨軍進行激戰的時候，我們趕到了。部隊立即跑步前進，準備前去參加這一戰鬥。但我們快跑到山頂時，上面來了通報，説黄陂、霍源、摩羅嶂、登仙橋一帶的敵人，已全部被我主力消滅，敵五十二師師長李明被擊斃，五十九師師長陳時驥被活捉。

由于我們到晚了一步，没有參加上這一重要戰役。事後聽説，這一仗是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在前綫統一指揮的伏擊戰。紅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了一個大勝仗！

至此，敵人的第四次"圍剿"已被徹底粉碎。我們紅二十二軍奉命轉向永豐、樂安、新幹、清江方向，深入國民黨統治區域活動，繼續擴大蘇維埃區域。不久，我們攻占了新幹縣城，繳獲了大批資財，擴大了紅軍隊伍，開闢了新的區域。

八、藤田整編

粉碎了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後，一九三三年五月，紅一軍團和紅二十二軍在永豐縣的藤田進行整編。紅二十二軍被編入紅一軍團，將紅一軍團所屬的三軍、四軍和紅二十二軍的兩個師縮編爲兩個師、六個團。軍縮編爲師，師縮編爲團。紅三軍的九師、七師被編爲紅一軍團第一師的一團、二團，紅二十二軍的六

十六師被編爲第三團；紅四軍的十師、十一師被編爲紅一軍團第二師的四團、五團．紅二十二軍的六十四師被編爲第六團。原幾個師下屬的團就縮編爲營，每個營下編四個步兵連、一個機槍連。一師師部由紅二十二軍軍部編成．二師師部則由紅四軍軍部編成。三軍軍部分散做了安置。原來的師部均改編爲團部，師政治部也就成了團政治處，取消了原來的編制，衹設幹事若干人。經過整編，機構大大縮減了，非戰鬥人員減少了，部隊也得到了充實。

我原來所在的紅二十二軍和六十四師的建制均被撤銷，不復存在。整編後的紅一軍團軍團長仍爲林彪、政委聶榮臻，參謀長先後爲楊寧、左權，政治部主任先後爲李卓然、朱瑞。下屬的兩個師，一師師長先後爲羅炳輝、李聚奎，政委爲蔡書彬，參謀長畢占雲，政治部主任譚政；二師師長先後爲吴皋群、陳光，政委先後爲胡阿林、劉亞樓，參謀長曹裏懷，政治部主任先後爲劉亞樓、史猶生等。

我們原六十四師師長張世杰被任命爲六團團長，師政委史猶生爲六團政委（後來升任爲二師政治部主任），團政治處主任則爲賴際發。我仍留在六團政治處，由青年科長改爲青年幹事。

藤田整編對我個人也有着特殊意義。正是在這次整編中，我由六團政治處組織幹事羅澤中介紹，由共青團員轉爲了中國共産黨黨員。

藤田整編，使我所在的紅二十二軍，成爲了紅一軍團這個中央紅軍主力部隊的一部分。從此，我就開始在林彪的直接指揮下工作和戰鬥。

整編後，紅一、紅三、紅五軍團便分散活動。我們紅一軍團轉向宜黄、南豐方向，準備迎擊敵人的第五次“圍剿”。

一九三三年九月，蔣介石又集中一百萬兵力，兵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起了第五次“圍剿”。這一次，蔣介石還總結了前幾次“圍剿”失敗的經驗，決定采用德國軍事顧問的意見，集中兵力、步步爲營、穩扎穩進。每前進一步都修築堅固的堡壘，

再憑借着堡壘的支援逐步向前推進。敵軍每一路都集中了三至六個師的兵力，并配置山炮和野炮，空中還有飛機配合。他們每天至多前進二十里，一般是十五里左右，就停下來修築堅固的堡壘，等隊伍集中了，碉堡做好了，再利用飛機掩護向前推進。然後，再築堡壘，再前進。

這次國民黨軍采用的進攻方法也與以前大不相同。首先是以大批飛機整天輪番轟炸，摧毁我們的工事，用大炮摧毁我們的防線，再以坦克開路，集中兩、三個師的兵力，兩、三萬人齊頭并進，一起向我們發起進攻，叫你一時消滅不了他們。這種打法，我們以前從來没有見過，給我們增加了很大的困難。

敵人的軍事策略變了，我們的也在變，但遺憾的是，毛澤東因受王明路綫的排擠，離開了紅軍的指揮崗位，原來紅軍的那一套戰略戰術丢掉了，代之以李德的那一套。李德是個德國人，由第三國際派來指導中國革命，但他根本不懂得中國革命的實際，硬性搬來了蘇聯紅軍過去打仗的那一套。當時以博古爲首的臨時中央，完全聽從、采用李德的一套錯誤做法，先是主張御敵于國門之外，命令紅軍作冒險主義的進攻。進攻失敗後，又主張分兵把守，實行單純防御，搞“短促突擊”，以堡壘對堡壘，同敵人拼消耗，使紅軍陷于完全被動的局面。

九、硝石戰鬥

我參軍以後打的第一個敗仗就是硝石戰鬥。這實際上是第五次反“圍剿”開始的序戰。

在硝石戰鬥之前，紅一軍團在藤田整編後，就在李德等人的命令下，與紅三、紅五軍團分開活動，分兵把口，廣設防御陣地，以致紅軍不能在運動戰中集中力量殲滅敵人，從而造成被動挨打的局面。例如大雄關和草臺崗兩次戰鬥，皆因敵強我弱，致使紅

軍在陣地戰中傷亡過大而被迫撤出戰鬥。

一九三三年夏，紅三軍團轉入閩西作戰，占領了清流、歸化、將樂、順昌、沙縣五座縣城和閩北的一個重鎮洋口，繳獲物資甚多。隨後，我們紅一軍團也沿着紅三軍團的路綫向閩西轉移，以求鞏固和擴大紅三軍團的戰果。當部隊行進至將樂縣城時，突然接到命令要我們改變方向，去阻擊從撫州向我建（寧）、黎（川）、泰（寧）地區進攻的敵人。當時國民黨軍以四個師的兵力進攻黎川，而守衛黎川的紅軍祇有五、六百人的一個獨立團，待我們趕到時，敵人早已占領了黎川城。

按照常情，我們這時是不應當進攻黎川的，但臨時中央的軍事決策者却命令我們向黎川、南城之間的硝石進攻，并要求我們消滅敵人，占領硝石。而此時的硝石已成了敵人堅固設防的陣地。我們在一個拂曉，開始向硝石的堡壘群發起突擊。然而，連續多次衝鋒，都被敵人打了下來。這一天，我們從早晨一直打到中午十二點，毫無進展，一個碉堡都沒有打下來，而我們部隊傷亡很大。我們二師六團連續衝鋒六次，均未奏效，全團傷亡近六百人，團長張世杰犧牲，三個營長中有兩個負傷。但上面還命令我們繼續發起衝鋒，要我們在黃昏前拿下硝石城。

當天下午三點，當團政委宋成泉（長征以後聽説此人已叛變投敵）正在動員和整頓隊伍，準備再次組織進攻時，突然傳來命令，要我們停止進攻，立即撤退，而且是越快越好。結果除留少數人負責撤退傷員外，其餘部隊匆忙跑步撤出戰鬥，一口氣就跑了四、五十里。後來才告訴我們，如果當時不這樣做，進攻硝石的部隊就很可能會全軍覆没。因爲我們已鑽到敵人包圍圈中去了。當時國民黨軍在黎川的四個師、南豐的三個師和南城的三個師，共十個師的兵力，正分三路向硝石合圍過來，離硝石僅有三、四十里路。我們當時正處在敵人堡壘群的縱深之中，幾乎要被敵人全部消滅。

在接到撤退的命令後，團政委宋成泉在組織撤退時，命令我和政治處的其他幾個同志留下負責撤退傷員，但却没有留下任何

掩護部隊。部隊説走就走，在當時那樣的緊急情況下，我們祇來得及找兩副擔架，把兩個負傷的營長抬出來，還帶出來一部分輕傷能走的同志。

回到團部，政委要追究我的責任。我説："你們部隊一撤退就跑，都没有給我們留下一些掩護的人員，弄出來兩個營長和一部分能走的傷員就算不錯了，你就殺了我，我也無法把全部傷員弄出來。"這一情況後來反映到了師部，師政委劉亞樓、師政治部主任史猶生都認爲不能責怪我，不能給我任何處分。他們説，這是一次錯誤的戰鬥，打了敗仗，丢了傷兵，怎麽能怪吳文玉呢？這才免予追究我的責任。

十、任警通連指導員

硝石戰鬥後，紅一軍團自江西開往福建。一天，我們六團當前衛，我在後面負責收容工作，正好走在師直屬機關的前面。師政委劉亞樓看到我們六團掉隊的人太多，就很不高興地問我："你們六團怎麽搞的，隊伍怎麽這樣不行，掉隊落伍的人這樣多？"我解釋説，天氣太熱，又是這樣的長途急行軍，好多人都受不了，所以掉隊的就多了一些。聽了我的解釋，劉亞樓没再説什麽就走了。

部隊到達建寧附近的一個地方宿營後，團裏突然通知我，説師首長要找我談話。我心想，找我幹什麽，一定是劉亞樓要批評我收容工作搞得不好。我剛行了一天軍，很累，但還是不得不往返十幾里路去師部。

來到師部，師政委劉亞樓和師政治部主任史猶生兩個人找我談話。他們告訴我，要把我的工作變一變，調我到師部警通連當指導員。這個決定大出我的意外，我説："我從來没有當過指導員，怎麽當法？"

劉亞樓説："吴文玉，你别嫌官小。不要以爲衹是個連指導員，這個官比你當的青年幹事可大得多。警通連有一百八十多人，共四個排，包括警衛排、通訊排、偵察排、電話排在内，你可以指揮一百八十多人，實權比青年幹事大得多。至于工作嘛，慢慢就會熟悉的。"

我説："那我服從命令，我主要是怕當不好這個指導員，至于官大官小我不在乎。我是隊伍在藤田編隊前，才由青年團員轉爲黨員的，現在入黨才幾個月，就怕當不好這個指導員。當不好你們可别怪我。"

這次談話後不久，我就到警通連任了職。警通連的連長懂業務，架設電話、搞偵察都有一套。我當指導員，主要任務就是做幹部、戰士的思想工作。

我天天跟着連隊行軍。各個排的業務不一樣，做思想工作太籠統了不行，都得要具體布置。早晨連隊集合時要講話，要提出當天的注意事項；行軍時要走在隊伍的最後面，收容掉隊落伍人員；晚上一到宿營地，還得聽取匯報，解决問題，布置工作，工作確實是難搞。爲此我找史猶生訴苦，説這個警通連比一個營的人還多，又没有副指導員，我又是支部書記，什麽事都得我自己幹，實在是搞不了。

幾個月後，我對指導員的工作慢慢熟悉了。但突然來了調令，要我到紅一師政治部任青年幹事，重操青年工作。劉亞樓看到調令後，就問我是否向上面寫了報告。我十分委曲地説："我没有寫報告，我向哪裏去寫呀！"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軍團政治部組織部的青年幹事周冠南從中做的工作，他認爲一師的青年工作需要加强，于是通過軍團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把我從二師調到了一師。

就這樣，我離開了紅二師來到紅一師，又見到了譚政，又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了。當時紅一師政治部的組織科長是譚甫仁，宣傳科長是彭加倫，地方科長是方國華。政治部共約七、八十人，我們相互之間相處得很好。我這時對青年工作也比以前熟

悉了一些。

十一、烏江戰鬥和温坊戰鬥

第五次反"圍剿"期間，由于李德等人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我們在國民黨軍優勢兵力的攻擊下，一直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各條戰綫，包括南綫、北綫、東綫、西綫，都不得不一步步地向根據地的中心區域退却。就我所知，我們紅一軍團在這期間一共衹打了兩次勝仗，即烏江戰鬥和温坊戰鬥。

第一次勝仗是烏江戰鬥。當時，紅一軍團由東綫轉向南綫。經過連續幾天的急行軍，部隊來到永豐地區一條也叫烏江的河流附近。這時正好蔣介石的八十一師從永豐縣城出來，到了離永豐縣城約五、六十里路的烏江附近。敵人的另一個師也從青水往興國前進，但與八十一師相距較遠。當八十一師的隊伍正在向前行進時，我紅一軍團的兩個師突然趕到，切斷了敵人向永豐的退路，全部包圍了八十一師。戰鬥從上午十一點開始打響，到下午四點全部結束。把國民黨軍第八十一師全部殲滅在烏江地區。這是紅一軍團在第五次反"圍剿"開頭打的第一個勝仗。

當時我仍在紅一師政治部任青年幹事。譚政派我去一師三團參加戰鬥。三團的團長爲黄永勝，政委是鄧華。在黄永勝、鄧華的指揮下，三團的隊伍全部展開，像趕鴨子一樣，很快就把敵人趕到一個山頭上，全殲了敵人一個營。

烏江戰鬥是第五次反"圍剿"以來，我們打得最痛快的一仗。當時中央蘇區的各種報刊都發表文章贊揚紅一軍團，特别是把紅一團和紅五團大大宣傳了一番。

烏江戰鬥本來是一場遭遇戰，我們是遠道奔襲，八十一師離開堡壘群已五十多里，來不及修築工事，敵人另一個師在後頭又趕不上來，等他們趕到，我們已全部消滅了八十一師。後來那便

把這場戰鬥說成是“短促突擊”的勝利，這就有點牽强附會、强詞奪理了。

紅一軍團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打的另一次勝仗，是温坊戰鬥。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時，紅一軍團没有擔任防守任務，衹是作爲一個機動力量。一九三四年春，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的一個旅，在旅長區壽年的率領下，以堡壘戰術由建寧向廣昌步步挺進。在占領了建寧以西的一個鎮温坊後，在那裏修築了三個月的碉堡。

在這一年的二月，我紅一軍團在林彪、聶榮臻及左權的指揮下轉入這一地區，準備在建寧以西集結待機。在集結待機期間，部隊十分注意隱蔽保密，采取了各種嚴密措施來封鎖消息。我們在大、小路口都設有哨兵，不準任何人往敵人方向去，從敵人方向來的人也一律扣押不放。

從二月初一直到五月上旬，將近三個月的時間，部隊每天都是半夜起床，經過數十里的行軍，天不亮就到達預定殲滅敵人的地點，然後進入陣地，隱蔽在高山森林裏。森林裏非常潮濕和陰暗，很少見到陽光，但部隊就在這樣的條件下，堅持操課。白天不準點火做飯，餓了衹能吃帶去的冷飯團，渴了就喝山上的山泉水。一直到黄昏撤回駐地。

當時部隊的生活非常艱苦。由于國民黨軍隊對根據地的嚴密封鎖，部隊大都缺鹽少油，有時連青菜都吃不上，更見不到肉味。很多時候，每天衹能將乾笋泡開後煮一煮，稍稍放點油和鹽就吃。每天要早出晚歸，一天衹能睡幾個小時，還要行軍幾十里。拂曉吃完早飯，到晚上返回原駐地才能再吃上飯。這樣兩、三個月下來，把幹部、戰士個個都弄得面黄肌瘦，全身無力，疲憊不堪。

就這樣堅持了幾個月，還是不見敵人出來，根本打不上仗。指戰員們的埋怨情緒很大，都說從來没有打過這樣的仗，乾受罪。我們這些政治工作人員，不得不硬着頭皮向部隊講，說什麽

要耐心，不要心急呀！要相信短促突擊能打勝仗呀！要保守秘密不要暴露目標呀等等。

好不容易等到五月四日上午，敵軍在幾經偵察，甚至包括飛機偵察以後，始終没有發現我們的踪迹，這才終于出動了。區壽年旅的三個團，除一個團留守温坊外，其它兩個團由區壽年率領，從温坊出來，準備進到我們每天隱蔽的高山上來修築工事。我們在山上看到敵人浩浩蕩蕩地從烏龜殼裏出來，慢慢前進時，心裏都非常高興，認爲這一下可有打仗的希望了。

下午二點，國民黨軍開始進入我們預定殲敵的伏擊地區，軍團首長當即命令二師從北山出擊，一師從南山出擊，并截斷敵人返回温坊的退路。接到命令，我們一師師長李聚奎、政委譚政命令一團、三團擔任主攻。因爲二團的隱蔽地點離温坊大約衹有七、八里路，所以决定由二團下去切斷敵人的退路。

戰鬥由二師首先打響，以排山倒海之勢壓向山下。我們一師一團、三團的攻勢也十分猛烈。不到一個小時，敵人就全綫潰退。遺憾的是二團没有堅决執行命令，没能及時趕到路口堵截住敵人，本來可以打得很漂亮的一場殲滅戰，打成了個擊潰戰，眼睜睜地看着大部分敵人跑掉了。

戰後，二師師長陳光、政委劉亞樓受到表揚，一師師長李聚奎、政委譚政則受到軍團領導的嚴厲批評。二團團長李茁保、政委劉發科因没有堅决執行軍團命令，怕被敵人兩面夾擊而不敢指揮部隊進入陣地，指揮失職而被撤職。當時一師的很多同志都爲没有完成戰鬥任務而難受，我見到李聚奎、譚政都難過得掉下了眼泪。

盡管這樣，温坊戰鬥是個勝仗。這一仗共消滅敵人兩千多，俘虜千人，可能還多一些，并繳獲各種槍支兩、三千，取得了當時一次難得的勝利。

這一仗打完之後，臨時中央負責人就大吹特吹這是“短促突擊”勝利的典範。林彪還奉命寫了一篇文章，介紹這次“短促突擊”的經驗，在中央的《紅色中華報》上發表了，在總政的《紅

星報》上也發表了。爲了宣傳温坊戰鬥的勝利，一師政治部宣傳科長彭加倫還寫了一首歌，歌詞中有"去年的烏江，今年的温坊，打勝仗……" 等詞句。當時我們都下到團裏教唱這個歌。

事實證明，搞"短促突擊"，即乘敵人離開碉堡十到十五公里，尚未站穩腳跟時，兩翼包圍，斷其退路，聚而殲之，不讓他們縮回烏龜殼的這種機會是極少的，非常難打。况且敵人堡壘陣地上的炮火火力可以相互聯系起來，在大多數情况下，是不太可能截斷敵人退路的。

除了烏江戰鬥和温坊戰鬥外，紅一師在福建省三岬嶂還打了一次惡仗，也取得了一次勝利。那一仗，是一團打得最好，三團在黃永勝、林龍發的指揮下，也打得很好。因爲一團能順利攻下山頭，就説明三團已迂回到敵人的後方去了，從側翼牽制了敵人，爲一團的勝利創造了條件。

十二、請假回家未被批準

温坊戰鬥不久，部隊在經龍崗到良村的途中，在離我家祇有十五里路的中州宿營。我問譚政，能否讓我回家去看一看。譚政不同意，説是敵人正向興國前進，離中州不遠了，很可能我家那邊已經有了敵人，他不準我回去。

在此之前，我們部隊住在廣昌時，我曾收到過父親的一封信，説是第三次反"圍剿"時，敵人曾進到寧都，占領了我家鄉，搶光了我家的東西，燒光了我家的房子，把家裏的人都趕到了山上，使祖母、母親和幾個妹妹、弟弟凍餓而死，祇剩下父親一人在艱苦度日。同時還給我寄來一雙布鞋。從那以後，我就特別想家，想回去見父親一面，好給他老人家一點心靈上的安慰。

譚政有個小秘書，叫周振華，原是地主的兒子，是我們在吉安打土豪時抓來的。譚政看他人很聰明，是個小學生，字也寫得

很好，就把他留在了自己身邊，後來又讓他給自己當了秘書，刻鋼版印發命令、指示什麼的，都是他的事。我和他的私人感情很好，他很了解我的心事，就鼓勵我説："回去一下吧，怕什麼，去看看嘛！"我很猶豫，怕弄不好，被敵人抓去了怎麼辦。他對此不以爲然，跟我説："抓不走的，去吧！"

我又有些動心，讓他同我一起再去找譚政委説説。譚政還是不同意，對我説："不行，無論如何不行。不是不讓你回去，是敵人已經進到你家，在那裏修築工事了，你回去就會有危險，我們要對你負責。再説，你是共產黨員、青年科長，到現在還想家，政治影響也不好吧？"

我自從參軍以後，就再沒有回過家，也没怎麼想過家。但那幾天裏却特別想見父親一面。不準我回家，我心裏特別難過，但是沒有辦法，也祇好從此對家裏的事不想也不問了。祇是把父親給我寄來的一雙布鞋一直背在身上，捨不得穿，算是家裏給我的一點紀念品吧！

十三、第五次反"圍剿"的最後一仗

温坊戰鬥結束，我們一師稍事休整後，即向贛西南轉移，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初到達興國高興圩、師子林一帶擔任防御任務，堵截敵人的"圍剿"隊伍。高興圩、師子林的兩邊是高山，中間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帶，這個丘陵地帶就是敵人進攻的主要方向。一師的幾個團就守在這一綫。

八月下旬，正是天氣最熱的時候。部隊進入陣地後，我們白天休息，天一黑就忙于構築工事，一直幹到天亮。爲了構築工事，我們拆除了周圍的民房，砍掉了山上的樹。除部隊外，地方的赤衛隊和群衆也參加了構築工事。就這樣，我們緊緊忙了十多天。在修好的工事內，我們準備了糧食和水，還準備了大量的石頭，

以補充子彈和手榴彈的不足。

敵人以步步爲營的堡壘戰術，推進到了離陣地衹有十公里的地方。我們除留少數部隊在後面外，各團的主力都進入了陣地。敵人每天衹前進兩公里，每前進兩公里即停下來構築工事。因此，雖然衹相距十公里路，但五天後才進到我們工事前。

九月初，在步兵掩護下，敵人的一個炮兵旅開始構築炮兵陣地，開始零星炮擊，同時還用飛機向我們的陣地投擲炸彈。每天持續不斷。由于我們的工事比較堅固，損失不大。不過，敵人炸毁了一些村莊，使群衆遭受了很大的損失。

由于當時我們在蘇區實行"堅壁清野"，敵人所到之處找不到群衆、得不到我們的消息，弄不清我們的實力和兵力部署。九月十日，國民黨軍約五個師再加一個炮兵旅，采用縱深配置，開始向我們實行偵察性的攻擊，力圖摸清我們主力究竟在什麼地方。到九月二十日左右，敵人終于摸清了我們的工事情况，便開始向我們發起進攻。

第一次攻擊，敵人正面兩個師、左右各一個師，再加一個炮兵旅，主要攻擊我一師一團的陣地。從早晨起，敵人便連續向一團陣地發起攻擊。在團長楊得志、政委符竹庭的指揮下，一團奮勇反擊，敵人死傷成堆，第一次攻擊失敗了。我們白天不能出去，因爲國民黨軍有飛機、大炮，我們就晚上出去到陣地前去搜集敵人丢下的槍支彈藥，搞到了不少，甚至還有機關槍。

敵人經過三天的準備，又向我們發起了第二次攻擊。先是用飛機轟炸，然後用大量的炮火轟擊我們的陣地，最後在飛機、坦克的掩護下，以步兵向我們發起進攻。經過一個小時的激戰，敵人又被我們擊退了。那天晚上，我們又出去搜集了不少的槍支彈藥。

三天後，國民黨軍又發起了第三次進攻。這次他們集中力量打一點，還是主要攻擊我們一團的陣地。一團最後靠同敵人拼起刺刀，才終于打垮了他們的這次進攻。

第四次，敵人集中力量向我左翼的二團發動攻擊。雖然敵人

的飛機、大炮把二團的工事摧毁得很厲害，但在二團的奮勇反擊下，敵人的這次進攻還是被打退了。連續四次進攻均被我們擊退，國民黨軍傷亡較大，不得不休整了一個星期。我們抓緊這段時間，修復工事，補充糧食給養和彈藥。

到十月上旬，敵人又集中了六個師的兵力，在兩個炮兵旅的火力掩護下，向我們陣地壓來。那天從拂曉開始，先是大批飛機轟炸、偵察，繼而以排炮射擊。打到上午十點左右，我們的工事大部分被摧毁，部隊傷亡很大，營長、連、排長大多陣亡。雖然我們全力和敵人拼殺，但他們還是由兩翼攻了上來。

在這種情况下，軍團部命令我一師迅速後撤，以免全師覆滅。我們全綫撤退，連飯也没來得及吃，就一口氣跑了三十里。敵人衹敢以飛機、炮火跟踪射擊。接着，我們一路急行軍到達于都附近，在那裏暫時休整，學習上級發下來的博古的一篇叫作《一切爲了保衛蘇維埃》的文章，但誰也弄不清究竟怎樣保衛蘇維埃。

這就是我們在中央根據地的最後一仗，完全是分兵把口，同敵人拼消耗的單純防御作戰。

第三章 艱難的長征

一、首渡于都河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我白天還在一師三團宣講博古的《一切爲了保衛蘇維埃》，傍晚回到師部後，譚政告訴我，部隊將有新的行動，今晚就要出發，要我跟師政治部一起走，不要再下團裏去了。開始出發時，天已全黑，我們也没有向老鄉們告別。就這樣，我們靜靜地離開了駐地。一個小時後，我們來到了于都河，河上早已架起了浮橋，過橋時衹看得見一些模糊的影子。那時我們根本没有想到，艱苦卓絕的長征就在我們踏上浮橋的那一刻開始了。

以後才知道，幾天前，以博古爲首的中共中央機關和紅軍總部已從瑞金出發，率紅一方面軍的紅一、紅三、紅五、紅八、紅九五個軍團，正式開始了舉世聞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

于都河，又叫貢江，河面并不很寬，當時已是深秋，河流也不湍急。前面的工兵營已在河上架起了五座浮橋。可需要過河的人多，橋面狹窄，組織得又不好，部隊過橋的速度很慢，等我們全師通過于都河時，已是接近午夜了。

渡過于都河後不久，部隊就地隱蔽做飯休息。十月十七日晚，又繼續前進八、九十里路，就進入了國民黨統治的白區。我們從此離開了幾年來我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中央蘇維埃區域。

由于當時的中央領導强調保密，不僅我們這些基層幹部被蒙在鼓裏，不知道這就是生死攸關、征途漫漫的戰略撤退——長征的開始，就是一些高級幹部，包括師長、師政委以至軍團首長，也不完全清楚紅軍究竟要往哪裏去，要走到哪裏才是盡頭。衹有博古、周恩來、李德等少數幾個中央和軍委領導人做出決定，放棄中央蘇區，率領五個軍團和中央機關共八萬六千餘人開始長征。事後才知道，當時的計劃是向湘、鄂、川、黔邊界地區轉移，尋機與任弼時、賀龍、蕭克率領的紅二、紅六軍團會合。

但這個計劃，一開始就被蔣介石察覺了。他一方面派出自己的嫡系部隊窮追不捨，任命何鍵爲“追剿軍”總司令，劉建緒、周渾元、李元杰等爲下屬各路“追剿軍”司令，率十六個師尾隨追擊，另一方面，命令陳濟棠、白崇禧率五個師在粵北、桂北和湘黔邊堵截，同時指令粵、湘、桂、黔各省的軍閥和地方民團，在紅軍行軍途中處處設防，節節阻攔，企圖消滅紅軍于湘江以東。長征剛一開始，紅軍就被迫接連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綫，遭受了慘重的損失。

二、突破四道封鎖綫

湘粵、湘桂邊的安遠、信豐一綫，是蔣介石部署的第一道封鎖綫。國民黨中央軍及廣東軍閥陳濟棠、桂系軍閥白崇禧的部隊，在這裏構築了許多碉堡和工事，防範極其嚴密。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我所在的紅一師三個團，奉命襲占新田。我們猛攻了一個下午，把敵人趕跑了，但自己傷亡也不少。與此同時，紅二師和紅三軍團也都相繼取得了勝利，并且繳獲了敵人的大批精良武器和彈藥，成功突破了敵人的第一道封鎖綫。勝利的消息傳來，大家奔走相告，都非常高興。我們師政治部的同志們連夜分散到各團、營裏傳達勝利消息，以鼓舞鬥志。

十一月二日，譚政向我們傳達説，紅三軍團已在湘粵邊界的汝城和城口之間突破了國民黨軍的第二道封鎖綫。我們行經汝城時没有停留，繼續前進，大方向是湖南道縣、江華、嘉禾和蘭山，準備前進到湘江以西地區。

不久，紅軍到了廣東韶關北的昌樂地區。昌樂是一個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的地區，九峰山和大王山高聳入雲。這裏多雨，山高路窄，黄土路泥濘難行，一脚踩下去，幾乎讓人抬不起脚，挪不動步。部隊行軍的速度明顯減慢，有時一天衹能走二、三十里路。

在部隊進入山區小道後，擁擠不堪，而湖南、廣東的敵軍則乘機從兩側向我軍夾擊過來，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也尾追迫近。由于敵人三面緊逼，全軍和中央縱隊都擠在一路來了，情況十分危急。

當時，我所在的紅一師正在湖南南部粵漢路以東與廣東敵人進行戰鬥。師長李聚奎突然接到緊急命令，要他帶領三團繞道兼程前進，火速趕到全軍的最前面，爲全軍開路，掩護整個部隊通過粵漢路。而一團、二團則交由政委賴傳珠和政治部主任譚政、參謀長耿彪指揮，繼續留在原地抗擊敵人。

命令下來以後，譚政見三團有重要任務，就派我去三團幫助工作。我隨即帶了兩個幹事來到三團，見到了團長黄永勝、政委林龍發、參謀長彭明治、總支部書記易秀湘，向他們説明是譚政主任派我來幫助工作的。黄永勝他們表示歡迎，要我們三人和易秀湘在一起行動。

之後，我們三人馬上分散去各營，向部隊説明，我們這次打到"白色區域"的目的，是要以此粉碎敵人的"圍剿"，更好地保衛蘇區、保衛家鄉。也就是説，還是圍繞《一切保衛蘇維埃》這篇文章進行工作。但實際上，那時部隊已經離中央蘇區越來越遠，根本不可能再回去了。

紅三團接到開路任務後，火速趕往最前面。此時已是深秋季節，深山老林，天氣陰冷，加上絶大部分同志穿的是單衣單褲，更覺天氣陰冷异常。另外，中央縱隊機關隊伍龐大，工廠、醫院、印刷、出版機關等，甚至連機器設備都一起搬了出來，非戰鬥人員衆多，車輛、騾馬、擔架擠在一起走不動。敵人飛機一來轟炸就散了。爲了盡快給中央縱隊打開通路，減少損失，我們戰鬥部隊有時甚至不能停下來做飯，衹好餓着肚子前進。在這種又凍又餓、艱苦异常的情況下，死亡、掉隊、失散的人員甚多。

爲配合我們執行任務，紅二師四團占領了九峰山制高點——紅三軍團攻占了良田，從南、北兩個方向掩護中央縱隊，使我們順利完成了開路和掩護任務，并爲隨後攻占宜章城創造了條件。

十一月十五日，我們紅三團占領了粵漢鐵路上的兩個點，宜章和白石渡，突破了敵人的第三道封鎖綫。緊接着，紅一師師部率一團、二團相繼趕到，全師會合，繼續向嘉禾、蘭山、道縣、江華前進。我回到師部，向政委賴傳珠、政治部主任譚政匯報了隨三團行動的情况。賴傳珠政委就讓我歸隊了。

第四道封鎖綫就在湘江以西的全州地區，是國民黨桂系軍閥白崇禧控制的地盤。紅軍既已踏上征途，就無法隱蔽自己想同湘西賀龍、肖克所率領的二、六軍團會師的願望。蔣介石了解到紅軍的動向之後，就命令何鍵、薛岳、周渾元等部約七十多個團，二十多萬人的兵力，會同廣東、廣西的國民黨軍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三十多個團十多萬人的兵力，想把中央紅軍攔截和消滅在全州、興安和灌縣地區的三角地帶。

我回到師部後不久，部隊就按照上級的部署，來到了湖南的瀟水和湘江地區，幾乎是以直綫向湘江挺進。國民黨軍有三、四個師在和我們賽跑，要爭奪湘江岸邊的全州市。全州位于湖南和廣西的交界處，是一座四周建有城墻的古城。控制了這個城，就可以控制周邊的渡口。但當先頭部隊的偵察兵接近全州城時，發現國民黨的何鍵部隊已經占領了全州城。

不過在此之前，紅一軍團二師的部隊已經奪取全州以南的瀟水西岸，占領了通往湘江的咽喉要地道縣和渡口，并在湘江上架起浮橋，順利渡過了湘江。我所在的一師部隊接到軍團林彪、聶

榮臻的命令後，不顧一切，兼程西進，也于十一月二十六日過了湘江。

這時，何鍵的二十多萬部隊已趕到湘南堵截我們，防止我們轉向湘西；廣西軍閥部隊約十多萬人也在全州、桂林一帶集結，阻止我們進廣西。敵人的部隊差不多都已趕到了湘江附近。雖說我們紅一軍團已經先一步順利渡過了湘江，但後續部隊已經沒有時間渡江了，處境極爲險惡，不得不在湘江邊上與敵人展開一場生死存亡的戰鬥。

我們接到的命令是保衛渡口，阻擊國民黨部隊，直到中央縱隊和中央紅軍大部隊全部過江。從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三日，在湘江兩岸我們血戰了一個多星期，打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惡仗，我們所有的部隊，差不多全都投入了戰鬥。一軍團在最後掩護。別的軍團的情況我不清楚，一軍團，首先是二師，在進到全州東南三十里路的一個山鎮時，遭到敵人十六個團的攻擊，我們一師部隊在渡過湘江浮橋以後，立即上去和二師一起猛攻敵人的陣地。當時，在湘江西岸的這個狹隘地區內，到處都是槍炮聲，戰鬥全面展開了。我紅一師仍是三團在最前面。賴傳珠、譚政又派我跟隨三團行動。一上去，黃永勝就指揮全團從敵人的側翼打過去，連續猛攻了六次。最後一次，敵人連續出擊，三團幾乎快頂不住了，傷亡很大。

十二月一日，戰鬥更加激烈，紅一軍團全力守住了自己的陣地。大約正午時分，主力部隊和中央縱隊機關終于渡過了湘江，但他們所帶的一些電臺設備、發電機、醫療器械、印刷機等，通通都扔進了湘江，一些較重的槍、炮也都扔進了湘江。當時的湘江邊上，到處都是撕得粉碎的文件、書籍，銀元和鈔票也丟了一地。不過這樣一來，輜重隊伍減輕了負荷，部隊的機動能力增强了。

十二月三日，我們接到隊伍後撤的命令。我們三團負責掩護。于是，在黃永勝、林龍發的指揮下，紅三團一直堅守在陂田附近，掩護一師、二師撤退。但最後，敵人從四面包圍了上來。黃永勝指揮作戰很靈活，一看形勢不妙，就放少數部隊在前面抵御敵人，大部分部隊撤退了。除了没有來得及掩埋犧牲的同志外，部隊大都安全地撤下來了。

湘江一戰，紅軍損失慘重。根據我看到的現有資料，紅一方面軍離開中央蘇區開始長征時，大約是八萬六千餘人。在長征開始後僅僅一個半月，人員就折損過半，其中以突破湘江防綫時的損失最爲嚴重。一軍團本身損失也很嚴重。長征開始時，我一師三團有二千八百人，過了湘江後就祇剩下一千四百人了。

三、紅軍進入貴州

中央紅軍渡過湘江以後，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攻占了貴州邊境上的通道縣城，并在通道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被撤了職的毛澤東被請回來參加了會議。會議同意了毛澤東提出的放弃原先北上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決定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

紅軍進入貴州後，兩廣的軍閥部隊確信紅軍無意進入他們的地盤，就都掉頭回去了，祇有薛岳率領的蔣介石嫡系部隊繼續在紅軍後面窮追不捨。這樣一來，紅軍的軍事壓力減輕了不少。

進入貴州後，部隊就開始了正常行軍。部隊改爲白天行軍，晚上宿營。紅一軍團以二師爲前導，我們一師則跟在軍團部後面作爲後衛。

從江西出發以來，在連續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綫的一個多月時間裏，我們由于不知道要到哪裏去、去幹什麽，因此部隊思想政治工作缺乏明確的政治方向。特别是經過湘江兩岸殘酷激烈的戰鬥之後，部隊幹部、戰士的思想更加混亂，情緒十分低落。在進入貴州以後，譚政就組織師政治部的幹部，天天下到團裏、營裏、連裏，去做工作。當時，我帶一個小組到三團，彭加倫帶一個小

組到一團、譚甫仁帶一個小組到二團。我們每天要跟着部隊行軍七、八十里，還要利用休息時間，向幹部、戰士進行政治教育和宣傳鼓動工作，的確是相當勞累。好在當時年輕，都支撑下來了。

下到團裏之後，幹部、戰士提出了很多問題。回憶在湘江戰鬥中，誤入敵人所設的陷阱，部隊傷亡重大，掉隊落伍減員極多，不論是幹部還是戰士，衹要負了傷，就衹能將他們留在老百姓的家中，因爲找不到那麼多擔架，也抬不走，對犧牲的同志也來不及掩埋，更沒有辦法去通知他們的家屬，甚至連開個追悼會的機會都找不到。因爲部隊整天行軍打仗，沒有時間。這些對部隊指戰員的情緒影響極大。幹部、戰士問我們究竟還要走多遠、要到什麼地方去、向哪裏前進等等，我們都解釋不了。還是老一套，什麼"一切爲了保衛蘇維埃"，什麼"反攻到'白色區域'是爲了更好地保衛蘇維埃"等等。其實，中央蘇區早已不存在了，蘇區首府瑞金也已落入敵手，我們已不可能再回江西去了。

我們把這種情況向譚政作了匯報。當時通道會議尚未傳達下來，譚政告訴我們，他也不清楚部隊究竟要往哪裏去。但在他看來現在要到湘西去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已經不可能了，因爲蔣介石已調集了大量軍隊駐守在湘、鄂邊的城步、綏寧、會同、武岡一帶，準備攔截我們。盡管紅二、紅六軍團在桃源、常德一帶全力發動攻勢，以配合中央紅軍的行動，但蔣介石的大部隊已經把我們同他們隔斷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再要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是十分困難的。他要我們相信中央、相信軍委的指揮，并要我們把這個情況向各團的幹部、戰士講清楚。

隨後，我跟着三團走了一個星期，同三團的總支書記易秀湘一起，分別到各個連隊，利用行軍休息的時間，進行宣傳解釋工作。三團政委林龍發也親自集合部隊講話，進行宣傳工作。

十二月十五日，紅一軍團二師攻占了黎平。黎平原由貴州軍閥王家烈的一個團把守着，見紅軍一到，就不戰而逃了。貴州軍閥隊伍不經打的消息，就很快就在部隊中傳開了。

接着，軍團命令我們一師部隊迅速向劍河縣前進。又過了幾

天，就聽說前面的部隊已占領了貴州的黃平、施秉、餘慶三個縣，初步打開了局面。

我們到達黃平後，在那裏休息了一天。我們政治機關就忙着在當地打土豪，徵集糧食和資財，解決部隊生活問題。同時把帶不走的糧食分給當地的窮人，以擴大紅軍在當地的影響。黃平、施秉這個地方出橘子，幾乎家家都有橘子，地主家裏更是橘子成堆。部隊的幹部、戰士人人都吃上了橘子。

經過這段工作，部隊情緒比較好，也比較安心了。就在當天晚上，譚政召集師政治部的科長、幹事們開會，向我們傳達說，中央已在黎平召開了一個會議，毛澤東已重新出來領導紅軍行動。會議還通過了《關于在川黔建立新根據地的決議》，決定不去湘西了，就在川、黔邊創建根據地。這些情況可以向各團的團、營、連幹部傳達。

譚政還向我們介紹了貴州的政治、軍事形勢。他說，現在掌握着貴州省軍政大權的是王家烈，他是國民黨第二十五軍軍長兼貴州省政府主席。貴州省沒有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衹有王家烈手下的四個旅約十萬餘人。由于內部矛盾多，王家烈甚至連這四個旅都指揮不動，戰鬥力很弱，武器也不好，一打就垮。貴州地區盛產鴉片，軍隊就靠販賣鴉片來維持軍餉。軍官、士兵都公開地抽鴉片，每個士兵都有兩根槍。

說到這裏大家都笑了，說："一個人還能打兩根槍呀？"譚政讓大家別笑，并解釋說，他們一根是步槍，一根是烟槍。接着他又說，貴州的百姓很窮，地主、惡霸集中，剝削統治很厲害，他們都和王家烈一個鼻孔出氣。實際上，我們一路上都看到了，許多窮人都靠肩挑背馱，靠馱點鹽巴來賣點錢，種點稻子、包谷、地瓜度日，缺糧少衣，人民生活十分艱苦。不過，由于蔣介石沒有隊伍在貴州，國民黨在這裏的影響也不大，可以說貴州是個薄弱環節，估計紅軍很快就可以打開局面，特別是可以首先打開黔北的局面。

譚政接着向我們傳達了部隊下一階段的作戰任務：乘機擴大

戰果，繼續向餘慶、湄潭前進，迅速强渡烏江，打下遵義城，然後在黔北建立根據地。當前的首要任務是突破烏江。最後，他要我們迅速向部隊傳達這些内容，做好幹部、戰士的工作。

按照譚政的意見，我們分别回到各團向團、營、連幹部作了傳達。由于部隊行軍没有可能開會，我們都是利用行軍邊走邊談，休息時再向各營的營、連幹部集體傳達。當時，我們師政治部的人下到部隊很受歡迎，因爲我們向他們傳達消息，講形勢，這些人人都愛聽。

四、突破烏江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紅一軍團的部隊全部逼近了烏江，準備强渡烏江，拿下遵義。

烏江，是貴州境内最大的一條河流，兩岸都是堅硬的山岩所組成的懸崖峭壁，地勢十分險要。烏江的江水既深又急，沿江的渡口很少，更没有橋梁。沿江的渡船都已被王家烈的部隊控制了，我們找不到渡船。但也有一個有利條件，烏江的江面比較窄，從這一邊打槍就可以控制江的那一邊。在火力的掩護下，就有可能進行强渡。

我們一師各部隊在兩、三天内加緊準備，搜集來一切可以用來渡河的工具，主要是搞一些竹排和木排。同時，師裏還組織各團幹部偵察渡口，摸清水流緩急、江面寬窄等情況，組織好火力掩護點。

這時，敵人已經開始逐漸向我們靠了過來。國民黨的吴奇偉、周渾元率領的十多萬人即將進入貴州。他們從江西就開始尾追我們，後來又從湖南追到貴州，隊伍早已精疲力竭，所以我們對後面的追兵顧慮不大。但也必須盡力抓緊時間，迅速渡過烏江，然後利用烏江天險來阻擋尾追上來的國民黨軍隊。

馬上就要過新年了，可在這種情況下，部隊没有安排過年，也没有開會慶祝，都在全心全意地準備着渡江戰鬥。我們也都隨團進行政治動員。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紅二師在江界附近經過激烈的戰鬥，渡過了烏江。一月三日，我們一師一團在回龍場渡口開始强渡。戰鬥開始的兩個小時後，就渡過去了一個營，把對岸的敵人打跑了。二團、三團當即跟進，紅一師全部渡過了烏江。

五、遵義休整

渡江後，譚政用電話告訴我們，二師已接近遵義城，很快就可以占領遵義城，要我們協助動員部隊火速前進，支援二師打下遵義。部隊加速前進，一天行軍一百多里，直奔遵義。但等到我們一鼓作氣趕到遵義城下時，遵義已于一月五日被二師攻下來了。

我們没有進遵義城，而是在遵義到桐梓及四川瀘州的這條公路兩旁住了下來休息了幾天。我們回到師政治部，向譚政匯報這一階段隨團行動的情况。師政委賴傳珠也趕來聽取了匯報。他聽了很高興，在最後講話時表揚了政治部。他説："譚甫仁、彭加倫、吴文玉，方國華，你們做了很多的工作，很好。你們不斷進行政治思想工作，宣傳解釋形勢任務，傳達上級指示，在保證行軍作戰、鞏固部隊、改善給養生活等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希望今後繼續這樣做。"

這時，少共國際師編入了紅一軍團，原少共國際師政委蕭華調到紅一軍團政治部任組織部長。[1] 部隊有了增長。同時連日來，我們一邊行軍，一邊組織優秀共産黨員和連、排幹部在沿途開展擴紅工作，鼓動和吸收窮人參加自己的隊伍。對被俘的王家烈的士兵，抽鴉片烟的放他們回去，不抽的就動員他們參加紅軍。不

少連隊都補充到了新兵。

這時，部隊的生活也有了一些改善，吃得飽，吃得好，也有了肉吃。進入貴州後，師裏把司令部的管理科、政治部的地方工作科和供給部三個部門聯合在一起，由地方工作科長方國華帶領，每天行軍都跟着前衛部隊走。一到宿營地，他們就立即進行調查，查清哪些人是地主、惡霸，然後由地方工作科宣布抓地主，供給部緊跟着就清查物資、没收東西和罰款，把地主、惡霸的糧食、布匹，以及豬、牛、羊、鹽等都弄回來，除留下部隊需要的以外，其餘的都分給窮人。

當時，每到一地，我們都帶着由十五個人組成的師政治部宣傳隊，向當地的人民群衆做宣傳工作。我們到處召開群衆大會，宣傳紅軍的政策，宣傳打土豪、分田地，宣傳紅軍在貴州扎根建立根據地的意義，還大寫標語，貼布告，造成聲勢，以擴大紅軍的影響。我們着重向群衆説明紅軍是"乾人"的隊伍（貴州老百姓叫窮人爲"乾人"）。

六、任紅一師直屬隊總支書記

部隊進入貴州後，一天，我們紅一師政治部的幹部、戰士約七、八十人正在行軍途中休息，突然從山那邊飛來幾架國民黨軍的飛機，在我們頭上盤旋。當它們發現部隊時，就對着我們投下了五枚炸彈，一下子炸死炸傷了我們二十多人，師直屬隊的總支

[1] 在遵義休整期間，中央軍委決定對紅一方面軍進行整編。首先，是撤銷了紅八軍團番號，將其人員分别編入紅三、紅五軍團。撤銷番號的還有紅一軍團的十五師（即原少共國際師）。所屬部隊分别編入紅一師和紅二師。在撤銷紅八軍團和紅十五師番號的同時，軍委還決定除紅一軍團外，全部取消師的編制。這樣，經過這次整編，除紅一軍團還保留有師一級編制外，紅三、紅五、紅九軍團都取消了師的編制，將部隊分别縮編爲四個或三個大團。另外，中央教導師也被撤銷番號，編入了軍委縱隊。——編者注

部書記被炸死了。[2] 還炸死了其他七、八個幹事。幸好那天譚政在司令部和師長、政委一起行軍，没和我們在一起。敵機飛走以後，我們趕緊就地掩埋好犧牲的同志，把負了輕傷的同志送到了衛生隊包扎好，跟着衛生隊走，重傷的同志安置到老百姓家養傷，給幾塊銀元。那天譚政的小秘書周振華也負了輕傷，我給他包扎好了之後，就扶着他一步一步找到了隊伍，歸了隊。

見到政治部遭到這樣大的損失，譚政難過地説："我們當時在前面走，不知道炸了這麼多人，要是早知道，我也就留下了。你們在後面處理得很好，我很感謝你們，爲你們的階級感情而感動。"

師直屬隊總支書記犧牲後，譚政曾指定龍福才爲師直總支書記。不久，他又命令我去接替總支書記的工作。下午交待任務，晚上龍福才就來向我交代工作。幾天後，龍福才被調到紅二團任總支書記去了。全師的青年工作交給整編時由紅十五師來的青年幹事賴達超。

龍福才走後，我找譚政説，直屬隊單位多，司令部、政治部、供給部、衛生部，還有衛生隊、警衛連等等一大堆，最好能在政治部指定一、兩個人幫幫我，要不然我一個人跑來跑去的，實在忙不過來。譚政先不同意，説我年輕，有幹勁，問題不大，但最後還是指定了自己的小秘書周振華和敵工幹事胡保善兩個人幫助我。從這以後，我和周振華白天在一起行軍，一起下到各單位開展工作，晚上一起宿營，吃、住都在一起。譚政要找周振華辦點什麼事情，如下個通知、找個東西、寫個報告什麼的，都到我那裏去找他。

擔任師直屬隊的總支書記後，擔子比以前要重多了。我得天天把各個單位的指導員找來開會，布置、檢查各項工作。在這之前，我雖然也經常下到團裏，但團裏有政委、總支書記在，情況是大不一樣的。

[2] 總支部書記是紅軍時期一個特殊的職務稱謂，實際上就是團一級單位的政治處主任。——編者注

在從江西出發到遵義這段時間裏，我總結了一條重要的政治工作經驗，就是要及時做好宣傳解釋工作，使全體指戰員都能明確當時的形勢和任務，以及自己行動的目的，這樣就能自覺地進行戰鬥，自覺地遵守紀律，遵守規定，才能穩定住部隊的情緒。因此，每做一件事，都要在事前同全體指戰員講清楚，爲什麽要做這件事，做這件事有什麽好處，以及應該如何去做這件事，怎樣完成自己的任務等等。我認爲，這個問題是政治工作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如我們在渡烏江時，爲適應行軍作戰的環境，曾大規模地進行宣傳鼓動工作，沿途設立了宣傳鼓動棚，向部隊説明這次行動的目的，爲後來順利突破烏江起了一些作用。

另外，所謂的"政治動員"，不要多，有時一、兩句話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例如戰鬥激烈時，喊幾句"輕傷不下火綫，重傷不哭"，"衝鋒在前，退却在後"，"講究戰術，發揚火力"，"同心協力，消滅敵人"等口號，就很實際，行得通。還有，打仗時情况千變萬化，有時傷的傷，亡的亡，要戰士各自爲戰；班長犧牲了，要戰士自動出來代理班長；排長犧牲了，班長自動代理排長；連長犧牲了，班長、排長自動出來代理連長等等。這些口號都能在戰鬥中變成實際的行動。

一天下午晚飯後，譚政和我一起沿着公路散步。我們一邊走，我一邊向他匯報自己的這些想法。譚政説："你的思想很對頭，很好，講得很對，我也是這樣想的，因此我每次都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向你們這些科長、幹事們講一講、説一説。"

我説："這很重要，你不講，不告訴我們這些東西，我們就不了解情况。我們做政治工作的，就憑嘴巴子，不了解情况，到部隊講話就没有本錢。你一講，我們就有本錢了，下到部隊以後，團長、政委、總支書記、營長、教導員、連長、指導員等幹部、戰士都很歡迎我們，有時忘了帶飯，戰士們就把自己帶的飯給我們吃。我們同他們一起走，一起聊天，一起談問題，等部隊休息時，就給他們講話，因此他們非常歡迎我們到連隊去。"

譚政説："你把這一段寫一寫好不好，寫好了交給我，我向軍團政治部寫一個報告。"

回來後，我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把那些意見寫了出來，交給了譚政。

七、四渡赤水

當我們在遵義附近休整時，蔣介石已來到四川重慶坐鎮，調集了自己嫡系部隊和湖南、四川、雲南的國民黨地方部隊共四十萬大軍，從四面八方向遵義包圍，準備在紅軍向北移動接近長江時來個迎頭阻擊。此時，集結在遵義地區的紅一方面軍，雖仍有紅一、紅三、紅五、紅九軍團四個軍團的編制，但實際上已不足四萬人，與敵人的兵力之比是一比十。紅八軍團是從中央蘇區最後出來的一支部隊，一直擔任着中央紅軍的後衛。前面走不動，敵人上來了，這就非打不可，它一路打仗，一路抵抗，一天走不多遠。到湘江戰役結束時，整個軍團祇剩下還不到一半的人，以後被編入一軍團。還有一個少共國際師，師長彭紹輝，政委蕭華，從江西出發時，約有六、七千人，等過了湘江後，就祇剩下了千把人，以後被編入了紅一軍團。

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的直接指揮下，開始了四渡赤水的行動。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左右，我們剛剛在遵義休整了五天，就接到命令，要部隊繼續北上，向赤水縣方向前進。一月十七日，我們攻占了桐梓城。桐梓城不大，但却是衆多貴州軍閥的栖身之地。他們倉促逃跑前金銀財寶没來得及都帶走，我們在那裏没收了大量的黄金和銀元，好好地充實了一下我們的財庫。

就在桐梓，譚政向我們簡單傳達了這次行動的任務：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但到什麽地方去會合，他没有向我們再

作詳細的交代。

一月十九日，紅一師部隊從桐梓出發，經松坎向東皇殿前進。然後繞道土城，向旺隆場方向急進，任務是爲整個中央紅軍打開通路。一月二十六日，我們到達了離赤水縣城衹有三十里的黃坡洞。雖然連日來隊伍一直在日夜兼程，走得很急，人也很辛苦，但大家情緒很高。正當大家情緒高漲地準備去赤水縣城宿營時，突然與國民黨川軍章安平旅遭遇了。

後來才知道，這個旅是來增援土城的。土城原是王家烈隊伍的集中地，當時已被紅一軍團二師和紅三軍團的隊伍包圍了。經過激烈的戰鬥，敵人被擊潰了。但就在這個時候，川軍的郭勛祺旅和潘佐旅趕到了，就在青松坡一帶，與我軍展開了一場惡戰。由于形勢危急，軍委毛澤東、朱總司令、周恩來副主席都親臨前綫，親自指揮戰鬥。

軍委命令我們一師部隊無論如何要抗擊住章安平旅，阻止他們增援土城。四川軍閥的隊伍比貴州軍閥的隊伍能打，戰鬥力强得多。我們一師的三個團在黃坡洞擺開戰場，抗擊了三天，但由于敵人已先于我們占領了兩面的高山，三面包圍了我們，情況十分緊急，我們衹得在堅持到第三天黃昏時，撤出了戰鬥。

在這種情況下，久戰顯然對我不利。中央軍委當機立斷，决定放弃進占赤水北渡長江的計劃，轉而向西渡過赤水河。一月二十九日天亮前，紅軍迅速渡過赤水河，向四川的古藺前進。經過這一仗，中央紅軍到達扎西時，根據現有資料，大約衹剩下了三萬人。

我們是最後一批渡過赤水河的部隊。那天我一師部隊接到後撤命令後，立即返回土城場和元厚場，然後向西來到赤水河邊。待整個中央紅軍全部過河後，我們也開始了渡河。渡河的順序是，一團、二團在前面，師直屬隊和三團在一起。這時師長、政委、政治部主任都離開了部隊，隊伍交由參謀長耿彪帶領。後來才知道這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找他們談話去了。待三團一過河，浮橋就被拉上岸毀掉了。這是我們第一次渡過赤水河。

過河以後，我們師直屬隊跟着三團向古藺前進。這天下午，下起了毛毛雨，山路又窄又滑，很不好走。剛剛走到大壩，國民黨的四川地方軍就對我們發起了突然襲擊。我當時正跟着供給部、衛生部的騾馬擔子走。仗一打起來，三團就拼命向着戰場跑步前進，而我們師直屬隊則慢吞吞地走不動。我心想，這下可糟了，前面已經沒有了部隊，敵人一上來，我們就沒有辦法了。我看到敵人已經快上來了，就催着大家拼命往前趕。我還想把一些銅鍋都扔掉，但伙房的同志不願丢，硬是把鍋抬了過來。好在敵人摸不清我們的底細，不知道我們究竟有多少人，沒有敢追。眼看着天黑了下來，就找了個地方宿營了。

第二天，三團團長黃永勝、政委林龍發回頭來找到我們，連聲説："頭天晚上沒有把你們掩護好，要是把你們丢了，我們真擔負不起這個責任。"

我説沒關系，敵人沒有上來。不過，接着我又説："你們的隊伍打仗走得那麽快，我們挑着行李擔子走不動，實在沒有辦法，如果敵人上來，我們全得當俘虜。"

黃永勝、林龍發再一次表示歉意，并告訴我，前一天晚上他們打土豪時搞了許多臘肉，要送給我們一點。我謝了他們，説，"我們吃包谷，把你們這些臘肉轉送給師首長吧！"。

我們與師部會合後，李聚奎、賴傳珠、譚政、耿彪都很高興，説沒想到我把直屬隊都帶過來了，他們還以爲直屬隊被搞掉了呢。我説："差一點就過不來了，我都看到了敵人上來了。"接着，我把那天的事詳細匯報了一遍。

這場虚驚之後，我們繼續隨着大部隊前進，不久到了四川的叙永縣。叙永這個地方較爲富裕，遍地都是橘子樹。我們在這裏打土豪、殺猪，改善生活。這段時間内，部隊生活普遍的都比較好。

由于蔣介石判斷中央紅軍會穿過貴州西部而北渡長江，他于二月上旬又調動雲南地方軍的三個旅到鎮雄，以防止我們西進。同時又令川軍十多個旅由北向南壓過來，令中央軍周渾元部向雲

南扎西猛進。可蔣介石没想到的是，在他將軍隊部署就緒時，中央紅軍却在向相反的方向運動。二月十九日，我們一師部隊奉命在太平渡地區二渡赤水，重新進入了敵人的薄弱環節貴州省。

重渡赤水後，紅一師兼程前進，于二月二十四日重新占領了桐梓，守敵一個連望風而逃。第二天，紅一師部隊會同紅三軍團繼續向婁山關疾進。連日的强行軍，使得部隊極其疲勞，但當大家得知王家烈也正率部前往婁山關，企圖據險死守後，我們當即竭盡全力跑步前進，終于比敵人提前幾分鐘登上了婁山關的頂峰。至此，遵義的大門已經打開，沿途已無險可守。

隨後，紅三軍團又和紅二師一起直攻遵義城，我們一師部隊則奉命奪取遵義城南的一座高山。這時遵義城内的敵人已大部分被消滅。這次行動我們共消滅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兩個師和貴州地方部隊八個團，給敵人以重創，也使蔣介石合圍紅軍的企圖完全落空。這次勝利，極大地鼓舞了我們全軍的士氣。

遵義戰鬥即將結束時，我們一師經遵義南門，直追敵人到鴨溪，一直把敵人趕過了烏江。之後，我們在鴨溪休整了幾天。鴨溪這個地方很好，一坦平壩，稻田多，村莊也多。休整時，我們就清理收繳來的敵人物資，同時發動群衆，打土豪，分糧食，改善部隊和群衆的生活。大家都爲長征以來所打的第一個大勝仗而興奮和激動，部隊的情緒很高。

在鴨溪休息了幾天之後，國民黨軍又重振旗鼓，向遵義撲了過來。軍委當即决定，主動放弃遵義，從茅臺鎮第三次渡過赤水河。我們幾乎是一槍未放，就占領了茅臺鎮。茅臺鎮這裏是著名的茅臺酒産地，酒窖裏茅臺酒很多，大家都喝了一點。有的戰士不會喝酒，就用這樣名貴的酒來衝洗自己脚上打起的泡。

從茅臺鎮三過赤水河後，我們一師奉命由後衛變作前衛，兼程向古藺前進。但等到我們把敵人的注意力引開以後，毛澤東又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四渡赤水河，掉頭南下，把北綫的敵人甩得遠遠的。

就這樣，我們在毛澤東的直接指揮下，時而前進，時而後退，

忽東忽西，避實就虚，機動靈活地歷經千難萬險，最後終于北渡長江，實現了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的預定目標。像湘江戰役那樣硬往敵人口袋裏鑽的局面，再也没有出現過了。

遵義會議以後的四渡赤水，充分顯示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不過，那段時間的來回兜圈子，也的確把部隊拖得疲憊不堪。

八、再渡烏江

中央紅軍四渡赤水之後，毛澤東命令紅九軍團暫留黔北，迷惑和牽制敵人，自己則率領中央紅軍主力部隊直插烏江邊，準備南渡烏江。

就在渡江前夕的一天上午，譚政找我談話，通知我要調動一下工作。其實在前一天，譚政的秘書周振華就已告訴我，説譚政已向軍團部寫了報告，要把我調到三團去當總支書記。我當時没作聲。果然，第二天上午，譚政就找我談話，并要我下午就出發去三團。

我把談話的情况告訴了周振華，向他告别。當時我們都很年輕，他見我下午就要走，就哭了，説："你走了，我一個人很孤單，没有伴了。"

我對他説，我也没有辦法。我安慰他説："不是還有譚主任嗎？譚主任不是一直對你很照顧嘛！"但他還是很難受。

當天吃完午飯，我就拿着背包，帶上介紹信，往三團的駐地走去。大約走了十幾里路，我來到三團，見到了團長黄永勝、政委林龍發、參謀長彭明治、總支書記易秀湘和供給部長徐林等。黄永勝、林龍發等對我表示歡迎，説："你來了很好，我們原本就是老伙伴了。"接着，易秀湘就調到了别的部隊工作，我就當了三團的總支書記。

這天的下午四點鐘，師裏來了命令，要三團火速向烏江前進，

準備再次强渡烏江，即南渡烏江。部隊立即出發，順着公路往前趕。當時祇有團長、政委有馬騎，我們没有，全靠兩條腿，中途没有休息，一口氣直達。好在我們都很年輕，走路還行。

到晚上八點多鐘，隊伍來到了烏江邊上。這時，蕭華騎着馬，帶着警衛員來了。蕭華當時是紅一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長，林彪軍團長、聶榮臻政委派他來三團，幫助我們指揮攻占烏江渡口和殲滅渡口周圍敵人。一軍團命令我們三團必須在當晚渡過烏江，殲滅渡口守敵，奪取渡口和船隻，以便讓全軍主力渡過烏江。

這時，天已大黑，伸手不見五指。烏江天險，懸崖陡壁，無其它路可走。烏江對岸被國民黨軍第九十一師所占領，并築有工事。另外，渡口對岸有敵人的一個營，他們早就把這個渡口上的五條船，都控制在了河南岸。情況十分不利，任務十分緊急。

經蕭華與黄永勝、林龍發研究之後，決定部隊從我們當時所處位置右邊十里路的地方偷渡過去。我們到了預定的偷渡地點，經偵察員報告，河的對岸山上有兩個連的敵人駐守，搭有茅草棚，築有工事。從河邊到懸崖頂上平地，足有五百多米高，祇有一條小路通向山上。從這條小路可以迂回到敵人的後面，但敵人早已嚴密封鎖了這條小路。烏江兩岸山高地險，河水流急，又無渡船，形勢十分嚴峻。

在這種情况下，首先是要準備好渡河的工具。部隊砍了許多竹子，捆成竹排，還編一些竹繩，準備捆在兩岸的樹上。部隊就從竹筏上偷渡過去。那天晚上，天黑得什麽都看不見。但又不能驚動對岸山上的守敵，我們不能點燈，也不能發出大的聲響，因此部隊作業十分困難。

經過上半夜的艱苦準備，我們終于將竹排和竹繩準備好，下半夜就開始了偷渡行動。三團由一營擔任突擊營，一營三連爲突擊連。當三連的一個排乘坐竹筏到達河中央時，因水流太急，竹筏被衝散。好在指戰員們都很堅定、沉着、勇敢，每人抓住一根竹子，順流漂過去，在河對岸的高山底下，找到一塊小坪隱蔽了起來。

就在先頭排的竹筏被河水衝散的同時，蕭華等人又下令三團選擇五個水性較好的同志，每人身帶一根竹繩，游泳渡江。不久，游泳渡江的同志安全登陸，把竹繩拴在了對岸小坪的一棵大樹上。這樣，一根又粗又大的竹繩就拴在了烏江兩岸，順利地拴起了一條“蔑鏈橋”。

依靠這條“蔑鏈橋”，部隊開始用竹筏來往偷渡。每人站在竹排上，用手抓着竹繩。每次可渡過去兩個班二十人。經過一個多小時，三連全部渡過去了。

大約下半夜兩點鐘，蕭華、黄永勝、林龍發研究決定，要我跟隨一營行動，協助一營指揮戰鬥，消滅敵人。他們交待，首先消滅河對岸兩個連的守敵，然後沿河南岸向左前進，消滅渡口的一營守軍，奪取渡口和船隻。他們再三囑咐我，這次行動事關全軍的渡江大事，一定要完成這一艱巨而光榮的任務。我當即表示，雖然我剛到三團，部隊不熟，地形也不熟，但是我一定去堅決完成這一艱巨任務。

我當即隨着三連的一個排坐上竹排，手扶着竹繩，渡河到達南岸。一登上岸，就見到了先過河的一營營長王興邦和胡副營長。不知是什麽原因，營長情緒低落，蹲在石崖底下不吭聲，但胡副營長非常積極。看上去他人很精幹，見我過江後，主動向我提出，由他帶領三連摸上山去，偵察敵情，查明情况，隨時報告。我立即把胡副營長的意見報告了北岸的蕭華、黄永勝和林龍發，他們表示完全同意，并指示天亮前一定要摸上山去。不久，三連全部渡過了河。經過簡短的政治動員後，胡副營長即帶領三連開始行動。

我和營長仍留在山下繼續組織渡河。到下半夜三時半，二連也渡河到達南岸。經稍事休息，二連也沿着三連前進的路綫跟進。這兩個連都統歸胡副營長直接指揮。

清晨四點時，胡副營長回來報告，説已找到了上山的小路，但摸到半山腰時，看見有一處斷崖，祇有一座獨木橋可以通過，獨木橋邊祇有敵人的兩個哨兵把守，他們研究後，認爲可以由一

個班長率領五個戰士，用綁帶吊上斷崖，爬到敵人哨兵後面，活捉這兩個哨兵。我和營長認爲，胡副營長的這個辦法很好，完全同意他的意見，希望他親自去作布置。與此同時，我又把這一情況報告給河對岸的蕭、黃、林三人，他們都很高興，認爲這個辦法好，并交待，要我們一定把獨木橋保護好，不要損壞，并且還要派部隊去占領這個要隘。

凌晨四點半，胡副營長派五個戰士押送來他們俘獲的兩個敵哨兵。經過審訊，我們查明了敵人在山上的的全部防守情况，得知山上衹有兩個連，搭草棚而居，并没有修築工事。其實他們也剛到兩天，之前每天要走八、九十里的路，非常疲勞。現在天氣寒冷，他們的衣服又很單薄，飯也吃不飽，而且他們對地形不熟悉，連方向都搞不清楚，因此部隊士氣低落，官兵都不知道來貴州幹什麼。現在兩個連共一百五十餘人全都在草棚裏睡大覺。

問清敵情後，我立即把這兩個俘虜送回河北岸交給蕭、黃、林三人，并向他們報告了全部情况。我和營長一起給胡副營長寫了一張便條，表揚了他和三連全體同志，同時命令三連留一個班看守獨木橋，其他人繼續摸索上山，二連跟隨三連前進，一定要想辦法摸到敵人的後面去。我們還告訴他，等天稍亮，我和王營長便率領一連和重機槍排，從正面發起攻擊，兩面夾擊，殲滅山上的守敵，然後繼續向渡口方向前進，奪取渡口和船隻。這一計劃很快得到了蕭、黃、林三人的批準。他們準備率團主力迅速趕上，支援一營。

凌晨五時，一連和營的重機槍排已渡河集結好，團主力也開始過河。我和營長當即率一連和重機槍排上山。五時四十分攻擊開始。二連、三連首先在敵人的背後打響，隨即我帶一連從正面攻擊，二十分鐘就解决了戰鬥。我們開始攻擊時，兩個連的守敵都還在那裏睡大覺，没明白究竟怎麼一回事就全部被俘了。

我派人將俘虜押送回團部，然後率一營迅即向渡口攻擊前進。我們從敵人的側面打過去，很快就將把守渡口的一個營敵人全部消滅，奪取了渡口和五條船，爲全軍和總部渡過烏江打開了

通道。

之後，軍團部的工兵隨即在大塘河、底子崖、江口等三處架起了浮橋。四月一日，中央紅軍主力全部渡過了烏江。

這一仗以後，我們三團就一直作爲全軍的前衛，沿着滇黔公路，經馬場、牛場、羊場，直逼貴陽。幾天後，在行軍途中，我見到紅一軍團政治部油印出版的《戰士報》上，表揚了三團這次渡河的功績，其中第一個名字就是我，我當時的名字還是吳文玉，第二個是那個胡副營長。見到這份報紙，我很高興，感到很光榮。

建國後，蕭華還把這次戰鬥經過寫成一篇文章，發表在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紅旗飄飄》上。

九、與滇軍的遭遇戰

第二次遵義戰鬥後，蔣介石由重慶飛抵貴陽，部署了五、六十萬軍隊，以防紅軍北渡長江，或向西進入四川、雲南，或向南穿過貴州去廣東、廣西，或向東返回湖南、江西。國民黨軍的這幾個防區之間緊密銜接，想收緊最後的包圍圈，把中央紅軍全部消滅掉。但就是没有想到我們會直逼貴陽。

這時，蔣介石調集的幾十萬部隊已經分向了各個方面，貴陽兵力空虛，當中央紅軍主力出現在貴陽近郊時，全城震驚。蔣介石急電滇軍孫渡率三個精鋭旅馳援貴陽，從而使滇北成爲了防守較爲薄弱的地區，爲主力紅軍奔向金沙江讓開了路。

據説毛澤東曾説過："看來我們要直接北渡長江是不可能了，我們要取得勝利，就必須把滇軍引出雲南，這樣才能乘虚從金沙江北上。"就這樣，毛澤東以聲東擊西的辦法，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事實上，我們當時無意去攻打貴陽。

作爲全軍前衛，我們團在抵達貴陽近郊後轉而向南，向龍裏

前進。那天，我們沿着貴陽龍裏公路（即貴陽至昆明的大公路）邊上的小路上走了一天，準備在一個叫田家鋪的小集鎮宿營。我當時是跟着前衛一營一連的一個尖兵班行進。當日我們已走了九十多里路，但天還不黑，我滿心高興，以爲馬上可以到達宿營地了。但快到田家鋪時，突然迎面來了一支部隊，正好在公路上。兩軍相遇，他們是四路縱隊，我們是一路縱隊。相遇後，一連連長叫隊伍停止前進，説前面有敵人。我當時判斷也是敵人。因爲我們是前衛，在最前面。在我們的前面就再没有紅軍的隊伍了。

當時天已黑了下來了，祇看見前面密密麻麻的隊伍，究竟有多少不清楚。我們要對面的隊伍停止前進，他們也要我們停止前進，雙方在相距百十米的地方停了下來。開始雙方都没有開槍，我們問他們是哪個部分的，他們答復是滇軍二十五旅。我們騙他們説，我們是中央軍八十師的，是直接受蔣委員長指揮的，大家是一家人，千萬不要發生誤會。他們又問我們要到哪裏去，我們説奉命去守衛龍裏。我們又問他們要上哪裏去，他們説奉命到貴陽去保衛貴陽，于是我們就叫他們派個代表過來，結果他們真的派了個連長來了。但到我們這裏來一看，發現情况不對頭，因爲我們頭上帶的都是紅五星的帽子，不像是中央軍。他一看到不對，扭頭就跑。他這一跑，我們就開了槍，對方也緊跟着開了槍。這樣，就在公路上劈哩叭啦地打了起來了。那個連長究竟是打死了還是跑回去了，誰也不知道。

雙方一開始打，我就告訴一連長趕緊搶占山頭。接着，我趕緊帶着一部分部隊往右邊上山。這時天已大黑，公路旁有個深溝，有一兩丈深，我看不見，一下子就滚下去了，摔昏了過去。醒來一看，有三個戰士和我摔在一起，我身上背的手槍摔丢了，皮包帶也斷了。我在地上摸了半天，槍摸到了，可皮包帶子却怎麽也弄不好。這時，那幾個戰士也醒了，問我怎麽辦，我叫他們不要慌，都跟着我。

好不容易爬上了溝，却没想我把方向搞錯了，一下子又跑到敵人那邊去了。很快，我們就碰到了一伙人，一開始我還以爲是

一連的同志，可仔細一看，祇見他們戴的都是國民黨軍隊的青天白日帽，這才知道我們是走錯了方向。好在我們的帽子都摔在了溝裏，他們也弄不清我們是什麽人，我們才安全離去。

這時有一個敵人士兵來問我從哪裏上山，我讓他跟着我走，于是我們四個押一個，把那個滇軍士兵押着往回走。走了五里多路，才找到自己的隊伍。當時，他們已在山上露營，正在架鍋做飯。

我回到團部，向黄永勝、林龍發報告了自己的遭遇。他們責怪我不該跑到最前面去，我向他們解釋説，我是想先趕到鎮上去調查土豪，搞點東西來給部隊改善一下生活。我告訴他們，我還抓到了一個滇軍俘虜。

當晚吃了飯，我和那個滇軍俘虜睡在一起。我告訴他，我們來了七、八萬人，現在遍地都是。我跟他講，對我們紅軍不要害怕，你把槍交給我，你願幹，歡迎你當紅軍，你願回去就放你回去，他表示願意回去，説他是雲南人，是被抓來當兵的，想趁此機會回家去。第二天，我們就放他回去了。

十、掩護部隊過湘黔公路

就在第二天早晨，師部來了命令，要我們三團負責掩護紅一、紅三、紅五軍團和中央縱隊過湘黔公路。我們就在公路兩側同敵人對峙了兩天兩夜，一直堅持到部隊全部過了公路。

黄永勝善于指揮隊伍打阻擊戰，戰術運用非常機動靈活。他祇放了一個連在最前面，這個連有六、七十個人，還有三挺機槍。其它的連隊撤到了團部附近的山上，一面休息，一面隨時準備接受阻擊敵人的作戰任務，因爲部隊連日急行軍，實在是太疲勞了。

大概是我們放回去的俘虜告訴敵人，我們這裏有七、八萬人，

所以敵人根本没敢貿然進攻，雙方一直在那裏對峙。一直到第四天，敵人才開始向我們右翼包抄過來。黄永勝一看形勢不對，說大部隊大概也過得差不多了，就要林龍發帶兩個營先走，要我和他一起帶一營留守。之後，我們也開始交替掩護，逐次撤退。到最後一個排撤退之時，敵人才從側翼上來開始攻擊，可這時我們都已走完了。就這樣，打了幾天，我們衹傷亡了幾個人，就圓滿完成了掩護任務。我們沿着前面隊伍走過的路綫，日夜兼程，日行百餘里。我們原是全軍的前衛，結果變成了後衛。

十一、巧渡金沙江

在我們的前面，毛澤東爲使中央紅軍能渡過金沙江，作了一切準備。包括中央直屬縱隊和紅一、紅三、紅五軍團在内的中央紅軍主力，越過湘黔公路後，立即掉頭西進，于四月二十三日進入雲南省。之後，毛澤東又采用與佯攻貴陽的同樣辦法，命令林彪、聶榮臻率領紅一軍團盡量接近昆明，以迷惑國民黨的雲南軍閥龍雲。

林彪、聶榮臻奉命率紅一軍團急進，日行百餘里，包圍曲靖、馬龍、嵩明，一直趕到離昆明城郊約二十餘里的大板橋停住腳。爲了使敵人更加驚慌，林彪讓急行軍後的部隊稍事休息，然後作出一副準備攻城的架勢。

龍雲坐守昆明空城，膽戰心驚。他已經把精鋭部隊派到貴州去了，無法迅速調回，不得已匆忙地搜羅來一些民團來防衛昆明，從而進一步爲紅軍渡過金沙江敞開了大門。

五月三日，紅一軍團接到命令：停止佯攻，盡快回師金沙江。于是，林彪、聶榮臻率紅一軍團以空前的速度行進，先繞到城北，然後向西，占領了昆明西北的富民縣城。龍雲更加恐慌，他不斷命令部隊增援昆明。而没想到林彪在虚晃了一槍之後，就率部轉

向西北，經禄功、武定、元謀直取龍街，按計劃準備在龍街渡過金沙江。

我們三團接到的命令，是要我們盡快趕往龍街渡口，在那裏渡過金沙江。但等我們趕到龍街，却遍尋各處找不到師部、找不到軍團部，甚至連其它部隊也不見踪影，就衹有我們三團孤單單地在那裏。

金沙江屬長江上游，江面寬約一百五十米，水流湍急，兩岸都是懸崖陡壁，没有渡船，是不可能渡河的。怎麽辦呢？我們和師部斷了聯系，也不知道他們往哪裏去了。

好不容易在路邊樹上找到師部留下的一個通知。要我們立即向右轉，但却没有説是要往哪裏去。不久，師部又派了個通訊員送了封信來，説是由于在龍街組織渡河没有成功，要我們立即趕往皎平渡渡江，路上不能有絲毫耽擱，行軍速度越快越好。

接到通知後，我們連續行軍一天一夜，路上衹吃了一頓飯。特别是這一帶地形都是横斷山脉，翻過一個又一個山，拼命趕往皎平渡。等我們終于趕到渡口時，紅一軍團的其它部隊都快過完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也都已過去了。

五月八日當天，我們全團衹用了三個小時，就全部渡江完畢。後來聽説這個渡口是在我們佯攻昆明時，由軍委縱隊陳賡、宋任窮他們所率領的幹部團占領的。河對面有個石洞，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他們曾在裏面指揮部隊過江，總參謀長劉伯承也在那裏一直堅持指揮，掩護部隊過江到最後。紅一軍團最後渡江的是我們三團，等我們趕到時，劉伯承也已經走了，因爲後面已經没有什麽隊伍了。

渡江後，我們在離渡口二十五里路的地方住下宿營。黄永勝、林龍發都説，三團真危險，差一點就過不來了，如果過不來，我們也就衹好留在那裏打游擊了。當時我們還議論着，要給師部提個意見，這樣大的變動，爲什麽既不留人，也不派人，衹給我們在路邊留個便條，把一個團都不要了。後來師部解釋説，他們當時也不知道情況，也是看到貼在樹上的林彪親筆寫的便條後，才

匆忙改變行程的。

過了金沙江，大家總算鬆了一口氣。因爲，我們利用金沙江這道天險，已經把蔣介石、龍雲、王家烈的隊伍，通通甩在金沙江以南了。這等于在幾十萬追兵面前，關上了一堵大門。

中央紅軍長征以來，終于第一次贏得了主動權。

十二、傳達遵義會議精神

渡過金沙江以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凱豐來到三團隨團行動。這時，才由他向黄永勝、林龍發傳達了遵義會議的情況。但祇給黄、林二人傳達，連我這個總支書記和各營的營長、教導員都沒有傳達。因爲我是總支書記，所以黄、林陸續給我講了一些情況。但我根本就没有見到凱豐的面。

當時凱豐傳達的情況是這樣的：一月五日，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毛澤東重新參加軍委領導，領導和指揮軍隊。會議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路綫，但祇講軍事，不涉及政治；祇講博古和李德，不涉及王明。這是毛主席當時所采取的策略。在會上，當時大家還要選舉毛澤東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但毛澤東説："一些問題不講清楚，我不接"。所以毛澤東祇參加軍委領導，和周恩來、王稼祥一起組成軍事指揮小組，黨中央總書記就由張聞天擔任了。李德被撤銷了中共中央顧問的職務。會上，周恩來、朱德、王稼祥都表示擁護毛澤東的領導，認爲祇有毛澤東領導紅軍才有勝利的希望。會議還決定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據地的決定，繼續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

就因爲這些問題，我們對李聚奎、賴傳珠、譚政等師裏的領導人有意見。一是因爲遵義會議的情況，一團、二團早知道了，可就是不給三團傳達，一直到凱豐來，我們才知道了遵義會議的情況。二是因爲在龍街渡口，師裏不留人通知我們如何行動，以

後隊伍一天一夜沿江翻山越嶺，連續行軍將近兩百里，才到了皎平渡，險些過不了江。那次戰鬥減員并不大，但連續的急行軍使掉隊落伍的人增多，隊伍走得稀稀拉拉的，我和政治處的同志曾在江邊等候，想盡量使那些掉隊的同志趕上一起渡河。但有的人實在走不動，又没有吃飯，肚子餓就更加走不動。有一些人落在後面跟不上隊伍，被國民黨軍抓住就地槍决了。這些情況使我們很痛心。

後來我們就講開了怪話。講怪話當然是不應該的，但也反映了我們當時的一種情緒。我們説一團是模範團，二團是親兒子，祇有三團没人管。意思就是説，一團在江西就是個模範團，二團是李聚奎親自帶出來的隊伍，它們都得到應有的照顧，祇有三團是從紅二十二軍六十六師整編過來的，就没人管。我們還説李聚奎有宗派思想。這幾句怪話，我們一直講了很長時間。

十三、在會理休整

渡過金沙江後，我們迅速北上到達四川的會理城，在那裏休整了個把星期，補充給養和動員擴兵，準備向北進入凉山彝族地區。隊伍早已疲憊不堪，稍事休整，總算喘了口氣。

從江西出發開始長征以來，湘江戰役是我們所遇到的第一個難關。部隊戰鬥減員損失嚴重。遇到的第二個困難，就是從遵義會議以後，到四渡赤水，再到渡過金沙江，以及以後的搶渡大渡河，部隊日夜兼程，迂回前進，忽東忽西，忽南忽北，天天行軍，没有休息或休息極少，一天少則八、九十里，多則百餘里。走這麼長的路，到天黑才宿營，天亮又走了，長時間的急行軍，令人精疲力竭。雖然我們最後擺脱了敵人幾十萬部隊的追擊，又接連打了幾次勝仗，包括奪取遵義城的勝利，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部隊的士氣，這與湘江戰役後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但問題是部隊

戰鬥減員雖少，但掉隊落伍的却較多。犧牲的同志不說，傷員帶不走，負了傷衹能把他們寄放在老百姓家，一個老百姓給個三塊、五塊銀洋，就讓他養活一個傷員。生病的跟不上部隊，掉了隊就找不回來。幸運的給人家做了乾兒子，或是給地主家當了長工，慘的就被國民黨軍抓去殺掉了。所以在這一階段裏，部隊因掉隊落伍減員很多。紅軍到了會理後，衣衫襤褸，疲憊不堪。根據現有的資料，中央紅軍到達會理後，包括沿途擴充的新兵在內，大約衹剩下兩萬人。

我們這些政治工作人員的主要任務就是鞏固部隊，提高士氣。在當時，政治工作的好壞，是以非戰鬥減員爲標準。哪個部隊非戰鬥減員最少，就是政治工作做得最好，支部工作、黨的堡壘作用發揮得最好。政治處每天都要派幹部輪流在後面做收容工作，督促掉隊落伍的人員盡量跟上部隊。一到宿營地，就要向政治處以至團長、政委報告當天掉隊落伍的人員有多少。

政治工作人員的第二個主要任務，是開展反逃亡鬥爭，防止開小差，特別是要防範有人拖槍叛變投敵。當時部隊有法令規定，凡是開小差的，抓回來處分；帶槍逃跑的，一律槍斃。盡管這樣，逃兵還是有。特別是那些俘虜過來的，覺得當紅軍非常艱苦，有的當了一段時間就逃跑了。

政治工作人員的第三個主要任務，是擴兵。長征開始以後，從中央蘇區出來一直到湘江地區，我們都没有擴什麽兵。直到進入貴州以後，才開始注意擴招新兵。各個連隊的指導員，每到宿營地後，除抓部隊工作外，就是宣傳擴大新兵。

當時各個部門各有專職：司令部管指揮打仗，搞作戰計劃，分配宿營地；政治部門除上述工作外，還要沿途了解情況，調查當地土豪，分糧食給窮人；宣傳隊就每人提個石灰桶，一路寫標語、貼布告，開群衆大會，搞宣傳鼓動工作。行軍中在路上設鼓動棚，唱歌、講演，以鼓勵部隊行軍情緒和戰鬥意志；供給部搞給養，改善部隊生活；衛生部防治傷病員；每個部門都很忙。

我們這些人没有馬，就靠兩條腿，人家走八十里，我們前前後後了解情況、做解釋工作，至少要比人家多走十幾、二十里。有時一天衹能吃到兩頓飯，有時候甚至衹能吃上一頓飯。吃三頓飯的時候很少。大多數時間都是早晨出發時吃頓飯，喝點涼水，到晚上才能再吃上飯。至于鞋子，有的時候就把破破爛爛的鞋子修一修再穿。有的時候就靠機關打土豪，搜集各種各樣的鞋子發給部隊。衣服也是把地主家的長袍剪了，改成短褂穿，那個時候根本就没有機會做衣服。打開遵義後，揀到了國民黨士兵的不少衣服，誰弄到誰就穿，所以當時的生活是十分艱苦的，當然以後過草地時就更苦。

十四、穿過彝族地區，搶渡大渡河

在會理休息幾天之後，部隊繼續北上，準備穿過彝族人民聚居的大涼山地區，然後越過大渡河。這時，蔣介石也已開始向大渡河地區調集軍隊。紅軍又開始了與敵人、與時間的賽跑。

我們紅一師部隊經米易、德昌、西昌，很快就到了冕寧。西昌城裏有敵人，我們繞城而過，衹對守敵進行監視，未去攻占城市。

一到冕寧，就進入了彝區。由于歷史上的原因，彝族人懼怕漢人，同時也仇視漢人。中央决定，紅軍必須盡量避免和彝人發生衝突，一定要搶在蔣介石之前到達大渡河，决不能在彝區耽誤時間。後來我們才知道，是劉伯承、聶榮臻和蕭華率紅一軍團一師一團作爲先頭部隊，先期進入彝區，去尋求同彝族各部落達成互不侵犯的相互諒解約定，并借道彝區。後來，劉伯承與彝族頭領小葉丹歃血爲盟。由小葉丹親自帶隊，護送紅軍穿過了彝區。這樣，我們終于搶在國民黨軍隊之前，來到了大渡河的安順場渡口。

大渡河，發源于偏遠的西北青海省，是長江上游的主要支流

之一。由于地處高山地區，河的落差較大，水量也較爲充沛。大渡河從起伏的山岳中，挾着大量的泥沙奔騰而下，濁浪翻滾，濤聲如雷。河面并不很寬，但那河水的流速和多變的流向，以及水中的漩渦和礁石，都無不令人望而生畏。我們看到的都是黄泥巴水，浩浩蕩蕩，洶涌澎湃地往下流。渡江艱險，登攀大渡河的兩岸的陡峭山崖上的小路，也很艱險，是個危險的去處。

這次，我們三團仍是走在全師的後面。這一段，我們祇是跟着走，没有執行什麼任務，也没有什麼掉隊落伍的。當我們來到安順場渡口時，一團、師部、二團都已經順利渡過了河，祇有兩條渡船在等待我們。由于每條渡船每次祇能渡一個排，一直渡到五月二十七日中午，我們全團才過了河。

我們一個團渡河尚且如此，兩萬人的大部隊要靠兩條小渡船在短時間全部渡過去，顯然不太現實。蔣介石部署尾隨追擊我們的十萬嫡系部隊即將到來，而且四川軍閥調動扼守大渡河的部隊也將趕到，而我們在安順場祇有兩條渡船。如果我們在這裏延誤時機，紅軍將成爲“石達開第二”。

當時大渡河上祇有一座橋，那就是瀘定城邊的鐵索橋。我們已經渡過河的紅一師，奉命沿着大渡河右岸的崎嶇小路向瀘定橋急進。左岸的紅二師則由林彪親自率領，沿河向瀘定橋方向急進。就這樣，中間隔着一條大渡河，我們一師、二師并肩前進，準備不惜一切犧牲，飛奪瀘定橋。當時紅二師的師長是陳光，政委是劉亞樓。

五月二十九日，先頭部隊二師四團在團長王開湘、政委楊成武的帶領下，經過三天的急行軍，來到了瀘定橋邊，冒着對岸敵人點燃橋板的熊熊大火，在濃烟烈火中發起强攻，終于占領了瀘定橋。與此同時，我們一師部隊也在大渡河右岸，即敵人的背後發起攻擊，消滅了守敵，有力地配合了對岸二師奪取瀘定橋。奪下瀘定橋後，大部隊迅即從橋上渡過大渡河，終于甩掉了國民黨的追兵。

順利通過大渡河，祇是克服了漫漫長征路上的一道險阻而

已。在我們前面，還有爬不完的高山峻嶺，過不完的險灘急流，并且還要面臨饑餓的威脅、部隊的極度疲勞和少數民族的敵對情緒。有人説，紅軍在長征途中，面對着三種敵人：一是國民黨的追兵大隊伍；二是大自然的威脅；三是黨内的嚴重鬥争。那麼，我們下一步就將經歷雪山草地和張國濤分裂活動的嚴峻考驗。

十五、二郎山和鐵索橋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們渡過大渡河後，來到了二郎山腳下。二郎山海拔三千二百米，位于瀘定、天全、滎經三縣的交界處，北面連着夾金山。一九四九年二野進軍西藏，又經過二郎山時，作了一首歌，歌名就叫二郎山，很流行。歌詞前面幾句是：“二呀麽二郎山，高呀麽高萬丈，古樹荒草滿山野，巨石滿山岡，羊腸小道難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擋麽被它擋……”我們當時面對的就是這座二郎山，是我們北上的必經之路。

當時，二郎山的最高峰有國民黨四川軍閥劉文輝的隊伍在那裏扼守。祇有攻上山去，奪下最高峰，才能打通前進的道路。拿下二郎山峰的任務，軍委又交給了紅一軍團。

領受完任務，我們前進時，一師在後邊，二師在前邊，兩個師的部隊夾擊，經過兩天的激戰，才把最高峰奪下來。由于敵人是居高臨下，我們是往上仰攻，易守難攻，戰鬥打得非常艱苦。最後我們攀登懸崖峭壁，從敵人後面繞了上去。正好這時二師也從左邊上來了，消滅了劉文輝的一個團，其他的都跑了。四川軍閥的隊伍比較能打，跑得也特别快，尤其善于爬山，我們還真跑不過他們，祇好眼睁睁地看着他們跑掉。

翻過二郎山，我們下山一看，山那邊是一個三面環山的大平壩。在這個大平壩裏，匯集了天全、滎經、蘆山和雅安等幾個縣，其中數雅安最大。雅安是當時西康省内最大的城市，也是西康省

的省會，劉文輝的老巢就在這裏，是他的軍部所在地。

我們途經天全時，天全的敵人没打就跑了。我們繞天全縣城而過，而後直奔蘆山。在離蘆山十幾里的地方，有一條青衣江，江面寬約六、七十米。江上架着一座鐵索橋，橋板就直接鋪放在橋面的鐵索上，兩側的扶手也是鐵索，整座橋就好像是挂在翻滚的河面上一樣。人一走上去，橋就晃動得很厲害。

我們一師過大渡河時是用船渡過去的，没有從瀘定橋上走過，所以我們還是第一次過這樣的橋。前面的部隊不敢走，説人一到橋上像打秋千一樣，得蹲着，不然就摔倒了。當時林彪正隨我們一師前進，一見隊伍停止不前，就上前來批評我們爲什麽不過河。我們跟他説，橋晃得這樣厲害，誰都不敢過。他説："這有什麽呀！我先過，你們跟着來。"説完，他帶着一個六、七人的警衛班，率先走上了橋。林彪在過大渡河時走過鐵索橋，他上去後，雖然也是摇摇擺擺、一晃一晃的，但幾個警衛員一扶，就把他扶過去了。

林彪這一帶頭，部隊也就都跟着他，一摇一晃地過橋。林彪還告訴大家，橋晃的時候，身體就跟着晃，千萬不要害怕。結果大家按照林彪説的方法走，越走越勇敢。我們三團跟在師直屬隊的後面，也很快過了橋。

説實話，這個鐵索橋還真是不好走，過橋時我也真是害怕。橋那麽高，水那麽深，晃得又那麽厲害，一不小心就會掉下去。因此上橋以後，橋一晃，我就想往下蹲。在我後面的一個班長馬上提醒我不能蹲下來。他便走到我的前面，拉着我的手，要我跟着他走。就這樣，他邁一步，我跟着邁一步，就這樣邁過去了。其實走這種橋，衹要多走幾次就好了，像我們找的那個四川向導，他若無其事地就走過去了。

過這樣的橋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從此以後我就再也没有走過這樣的橋了。

十六、翻越雪山——夾金山

我們占領天全、蘆山後，就進入了平原，進入了一個比較好的地方。這裏是漢人地區，村莊稠密，糧食豐富。部隊駐了下來，好好休息了幾天。打從過金沙江、大渡河以來，我們經常吃不飽飯，加上在彝族地區不能打土豪，生活就更加艱苦。來到了天全、蘆山地區後，各個部隊就開始準備翻越夾金山。司令部的同志到處展開調查工作，搜集有關情況，研究過山時的注意事項；政治機關則會同供給部門調查土豪，抓地主，徵集資財物資，爲部隊過雪山準備糧食、草鞋等。各級軍政指揮員也在層層向部隊進行過雪山的動員。各部門都爲過雪山作了一些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準備。

同時，我們還在駐地附近大做宣傳工作。當地的老百姓，那個時候没有聽説過紅軍，也不知道有紅軍，一開始見了我們就跑，這時看到我們一不拉伕，二不抓壯丁，買東西還給錢，説話也和氣，從不打人、駡人，所以老百姓都很奇怪：這個軍隊是從哪裏來的，怎麽這樣好啊？跑出去的老百姓就在當天下午陸續回來了。于是我們就召開群衆大會，宣傳"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十大政策"。宣傳隊則到處貼布告，寫標語。對帶不走的糧食和其它物資，除留一部分給後面的部隊外，都分給了窮人。我們還乘機開展擴兵工作，宣傳窮人要當紅軍。有的擴來三、四個，有的擴來一、兩個。

休整了幾天之後，部隊繼續行軍，經寶興來到夾金山下。夾金山海拔四千二百米，到達山頂，要經過九拐十三彎。山上終年積雪，即使在我們翻越夾金山的六月中旬，山上也還是雪的世界，厚厚的積雪從山的這一邊，一直鋪到山的那一邊。當地老百姓把夾金山叫作"神仙山"，説上面有神仙，很少有人過去。如

果一定要上去，要先燒香磕頭，上山之後不要說話、不要笑，也不能在山頂上停留，否則神仙就要找你的麻煩。

紅一軍團是二師走在前面，一師隨二師跟進。二師翻過山後，不斷給我們傳來情況，說山上大雪紛飛，氣候變幻無常，要想過山，必須要在上午九點以後、下午三點以前，別的時間都不能過。他們還說，上山時要盡可能地多穿衣服，喝些白酒或辣椒湯以增加點體溫，最好每個人有個拐棍，以防滑倒。另外，他們還提醒說，一定要帶足乾糧和蔬菜，以防備萬一一天過不去，就得準備兩天過。

至于老百姓的在山上不能說話和停留的說法，二師傳過來的話是，在山上，坐下以後，風太大、太冷，受不了；上面空氣稀薄，人沒有力氣說話；上山後要立即下山，不要在山上停留，以免消耗體力。我們就分别下到連隊，把這些情況和需要注意的事項，一一向各個連隊的指戰員交待清楚。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三日，我們一師部隊開始翻越夾金山。我們是從上午九點鐘開始上山的，經過了"九拐十三彎"，每拐一個彎大家就休息幾分鐘，一直到下午三點才攀上山頂。在山下時，看到的還是一片葱緑，雖然没有大樹，但小樹很多，草也很茂密。一到上面，緑色就不見了，成了光禿禿的一片褐黄色。再往上，便成了雪的世界。山腳下還是酷暑天氣，開始走不久就大汗淋灕。可是一到上面，凍得人牙齒咯咯響，全身發抖。才剛剛走到"五拐"這地方，雪就有一米深。越往高走雪就越深，到山頂上差不多就有一米五到兩米深了。

到了第九個彎的時候，已快靠近山頂了，上面的彎就越來越小，到這時，人就不好受了，衹覺得呼吸短促起來，衹能大口大口地喘氣。戰士扛步槍的還好，扛重機槍的可真是有點够嗆。那個時候一挺重機槍三個人扛，一個人扛槍座子，一個人扛槍腿，一個人扛槍身。我們政治處正好走在機槍連的後頭，看到扛重機槍的戰士挺累，走不了，想幫他們，但我們也扛不了。最後，我們政治處的同志就幫他們扛步槍，讓他們騰出人手來，由三個

人扛重機槍改爲六個人輪流扛，好不容易才把重機槍弄上了山頂。政治處的俱樂部主任蕭元禮和技術書記郭成柱跟着别的連隊走，青年幹事蔡文福和我跟着機槍連走，每人幫戰士扛一杆槍，跟有病的戰士一起走，等到下山時再把槍交還給戰士。快到山頂時，我自己也覺得不行了，快要走不下來了。但最後大家還是咬牙堅持着爬上了山頂。

在夾金山的頂峰，有一個用石頭壘起來的小塔，塔上插有兩杆白旗，有人說那就是神仙塔，到那裏後要磕頭，以求神仙保佑平安下山。我們隊伍一到山上，連停都没有停，就拼命往山下跑，一直跑了半個小時以後，才覺得人好受多了。我們翻越山頂下山時，已是下午三、四點鐘，等跑到半山腰，天就快黑了。我們摸着黑一直往山下走。

到山腳後，部隊開始露營。大家馬上忙着架鍋弄柴做飯吃，總算休息下來了。我就下到各營去問了問掉隊落伍的情況和糧食儲存情況，回來後向黄永勝、林龍發作了匯報。由于那天準備得特别充分，没有掉隊落伍的，大家都過了山。而且情緒普遍都很高。

長征到達陝北後，紅一軍團政治部編了一個叫作《十二月長征》的歌，其中有幾句歌詞是："六月裏來天氣熱，夾金山上還積雪，膽戰心驚上雪嶺，下山猛虎撲羊群。"

十七、進入藏民區

翻過雪山以後，就進入了藏民地區。問題逐漸嚴重起來。主要是缺糧、饑餓和少數民族的敵對情緒。

部隊翻過雪山以後繼續前行，一直沿着大金川北進。河川裏的水很深，水流也很急，是從山上下來的雪水，很凉，就像冰水一樣。不久，部隊就越過懋功，抵達卓克基、兩河口。這一帶已

經全是藏族同胞的地區了，見不到一個漢人。藏人的房子一般都建築在山坡上，至少距離山底兩里路以上，山溝裏見不到一個村子。我們往往在走了一天之後，還要爬上二至五里山路，才能到達山上寨子裏的宿營地。第二天早晨出發，又要從山上下來，繼續在山溝裏行進。就這樣上山下山的一直走到了兩河口刷金寺。我們團部就住在一個山坡上的寨子裏。刷金寺廟很大，從長征以來，我還從來没有見到過這樣大的喇嘛廟宇，修得真是富麗堂皇。

由于藏民對我們不了解，附近的藏人都跑光了。但家裏的東西却没有弄走，家裏不僅有糧食，還有猪、有鷄、有牛、有羊。一開始，我們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没有動廟裏和藏民家的任何東西。可是走了幾天以後，没有吃的了，困難來了，怎麼辦呢？老百姓都跑了，一個藏人也見不到。原先從蘆山、天全帶來的糧食都吃完了，眼看部隊斷了炊。那時大家矛盾得很，一方面要講紀律，另一方面部隊又確實没有吃的。紅軍也是人，也必須吃飯，不吃飯就不能生存，更不用説去行軍打仗了。

一開始，説老百姓地裏的豌豆苗可以弄點來吃。可光吃豌豆苗不能解決饑餓問題，于是就進一步發展到吃老百姓家裏的糧食。有人説，那個時候吃了藏民百姓的東西，有的留了錢，有的留了借條。不過據我所知，絶大多數情況都不是這樣的，因爲即使想留錢，我們那時也没有多少錢。有的人倒是留了條子，説是以後還，可誰都明白，這是“老虎借猪，一借不還”。以後，那是到什麼時候啊！後來有的乾脆連條子也不留了。哪裏還還，不可能還了。所有的部隊都一樣，見到了就吃，找到了就拿，把藏民家裏的東西吃光，既不給錢，也不留條子。

部隊再向前進，困難就更大了。大概藏民知道了我們在前面的行爲，就把家裏的食物搬到外面山上埋藏了起來，還把鍋碗瓢盆也都搬到山上藏了起來。没有吃的，怎麼辦？爲了生存，衹能公開地違犯紀律了。有就拿，没有就搜，搜不到就挖。有時候，一挖，好家伙，能在地下挖出一窖一窖的青稞麥！凡是挖到這樣

的“大家伙”，一個部隊拿不了，就趕緊通知另外一個部隊來馱。有時，油、鹽等物品也可以從地下挖到。挖了以後，没有留錢，也没有留什麼條子，衹要能弄到就行，大家分了吃了。

藏民一向仇視漢人，國民黨又從中挑撥煽動，使得藏民自然對他們并仇視紅軍。一方面軍經過藏民區域時，看到的全都是一個個空蕩蕩的山寨和村落，沿途十室九空。我們來到一個人烟如此稀少的地方，無房可住，連個問路的人也找不到。見不到人，没有吃的，有時找到的，又是一點青稞，伙夫都不知道怎麼做着吃。部隊爲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到處去抓他們的牛羊，不得不想方設法把他們埋在地下的糧食挖出來，藏民覺得紅軍拿走了他們的財産，也就更加仇視紅軍。

有一天，我們三團來到卓克基附近。渡過一條凉水河，準備到河那邊山寨去宿營。那河水真凉，凍得要死。過河以後，就在一個山坡上，離下面大概有兩里路的一個山寨裏駐了下來。正好那天没有吃的了，團部没有，我們政治處也没有。于是，我帶了政治處的幾個同志去山上找吃的。山下面有地，是種糧食的，山上就是密密的樹林了。我們幾個人帶着槍，在樹林裏找到了一蘿筐臘肉，我想這下可好了，有吃的了。再往前，又找到了一條牦牛。這一下，大家就更高興了。這時已是下午四、五點鐘了，幾個幹事向我建議説，我們從早晨吃了一點飯，到現在也還没有吃上飯，是不是先弄點樹枝燒點臘肉吃。我同意説：“好，我們先吃飽了，再把東西弄回去。”

我不敢在山上多耽擱，怕有藏民躲在山裏襲擊我們，就叫大家先趕緊把臘肉和牦牛弄到山下，到離營房大約二百米遠的地方再把肉燒熟了來吃。没想到就在這時，好家伙，一下子來了好多藏民！有的拿槍，有的拿大刀，有的拿棍子，把我們嚇了回來。牦牛也丢了，衹拿回來幾塊臘肉。

這是我第一次碰到少數民族攆我們、打我們。也難怪，我們吃了人家的東西，拿了人家的東西，他們也没有辦法生活了，還能不打我們嗎？看我們衹有三、四個人，他們不敢嗎？他們把牦

牛牽回去了，也就不追我們了。

回到宿營地，我把這個情況告訴了黃永勝和林龍發，說想弄點東西吃，沒想被藏民們追過來，把我們給嚇回來了，衹弄回來兩塊臘肉。說完，我把其中一塊臘肉給了他們，另一塊留給了我們政治處。黃、林都說，是不是再派部隊去弄點吃的。我說："不要去了，他們有槍，傷亡了人劃不來，現在的戰士很寶貴，有一個就是一個，反正今天有點吃的了，能維持就維持吧。"黃、林就同意了我的意見。

第二天繼續往前走，終于弄到了一點青稞。菜呢？摘點地裏的豌豆苗、蘿卜苗、大蒜苗，大家就吃這個，這算不錯的了。

經過卓克基以後，還是沿着河走，這條河叫黑水河。這條河很長，是岷江上游的一條支流。一天在行進的途中，突然發現前面二師的隊伍有一部分人正在往回走。我們就問，我們正在往前進，你們怎麼回來了？是不是前面不能走了？他們說不是。然後告訴我們說，他們是二師四團和五團的，二師政委劉亞樓命令他們給六團送豬、牛、羊肉和糧食去。

我們很奇怪爲什麼要專門給六團送東西去，他們說，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朱瑞同二師師長陳光帶着六團，由左路北上，二師的四團、五團和師部則走右路。六團的團長叫朱水秋，政委是王集成。當六團部隊快到阿壩時，被藏族的騎兵打得一塌糊塗。少數民族的騎兵很厲害，有槍又有刀，部隊打不過他們。向前過不去，可後退又沒有東西吃，什麼也找不到，衹能挖野菜吃。就這樣忍饑挨餓地過了七天，全部東西都吃光了，連朱瑞、陳光、朱水秋、王集成都餓得不成樣子，走不動路了。這個團原來有一千三百人，回來時衹剩下五、六百人，死了一大半，不是被人家打死了，就是餓死了，槍也丟了不少。因此，劉亞樓才要四團、五團給他們送點吃的去，把朱瑞、陳光和六團的五、六百人救回來。那個時候真苦啊！

快到黑水附近時，我們轉而向北，又接連翻越了三座雪山。第一座雪山是夢筆山，這座山比二郎山還高一些，山頂上有一米多深的積雪。接着，我們又翻過了打鼓山、長板山。這兩座山雖然比夢筆山稍矮一點，但上山和下山的路却更陡，山頂上也都是雪，衹是雪比較少一點而已。不過，有了翻越夾金山的經驗，翻這些雪山也就順利多了。一天翻一個。早晨上山，午後下山，到山腳下宿營。宿營時有房子住房子，沒有房子就露營。好在那時正是六、七月份，天氣比較熱，完全可以露營。

算起來，從夾金山起，我們前後一共翻越了四座大雪山。

十八、到毛兒蓋

大約是一九三五年七月中旬，我們來到了草地邊上的毛兒蓋。毛兒蓋是一個比較大的藏民村，有三、四百户人家，喇嘛廟很多。此地盛產青稞，但我們到達那裏時，青稞還未黄熟。

到達毛兒蓋後，總部命令我們一師繼續向松潘方向前進，負責警戒駐在松潘的四川軍閥和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的隊伍，毛兒蓋這個地區則留待中央進駐。

在執行向松潘方向的警戒任務時，我們除放一個營在前面擔任警戒外，團部和其餘的兩個營就住在一起。師裏分配給我們三團的駐地沒有村莊，我們就住在一個藏族同胞放牛羊的草地裏。四面都是山，中間是塊小盆地，有一條小河，河邊還有一個石磨。我們住的是藏民用來放牧的房子，這種房子的墻是用柳條糊上牛糞做成的，地上是濕呼呼的草地，部隊住的就是這樣的房子，一住就是半個月。這半個月還真苦，老百姓都跑到山上去了，整天都見不到他們一個人。糧食本來就不多，再加隊伍人多，很快就沒有吃的了。沒有辦法，衹好天天派部隊出去到處挖地窖，想方設法地去搜尋老百姓的青稞。挖出來的青稞都來不及磨一磨，就用開水煮一煮，煮爛以後就整個地吃，連菜也沒有。有時就衹好吃野菜。那時，我帶着政治處的蕭元禮、蔡文福兩個人每天都下

連隊去做思想教育工作．郭成柱就專管政治處的生活，整天到山上去摘野菜。

因爲人多．野菜也很快被我們吃完了。半個月後，什麼吃的也没有了。這種狀况對部隊情緒打擊很大，大家議論紛紛。這時大家又講開了怪話，并紛紛詢問上級：部隊待在草地裏不走，這是爲什麼？見此情况，我給師政治部主任譚政寫了一個報告，説部隊現在吃没吃、穿没穿，老百姓一個也見不到，部隊情緒很不好。一團、二團都有房子住，祇有我們三團住的是牛屎房。當時我們一點都不知道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後鬧矛盾和張國燾搞分裂這些事，所以大家對部隊停在毛兒蓋不滿，爲什麼不打松潘？如果不趕快打出去，我們就餓死在草地上了。

我的報告交上去以後，一直没有得到回答。又過了五天，我們接到命令．紅一軍團軍團部、二師和一師都轉移到菠蘿茨，在那裏就地搞糧吃飯。

到菠蘿茨，大約有兩天的路程。這次還是以二師爲前衛，我們隨軍團部跟進。在這次行軍的路上，我們看到路旁的樹林裏，有一些因掉隊落伍而被藏民殺死的紅軍戰士遺體。因爲天熱，有的遺體已經開始腐爛、長了蛆。我們看了心裏真難受。當然也不能怪那些藏民，爲求生存，我們把他們的東西吃了，把他們的房子占了，他們没有地方去，祇好跑到山上，躲在樹林裏，受盡日曬雨淋之苦，所以恨死我們了。在我們大部隊行進時，一個挨着一個，他們不敢下來。但如果一看到中間有空隙，或有掉隊落伍的，他們就跑下山來，一下抓幾個，用刀砍死了就走。一路上就我親眼所見，被藏民殺死的紅軍戰士就有百把人。爲了搞點糧食，就犧牲這麼多人，真慘哪！

有了這個教訓，我們就通知部隊行軍時走慢一點，一個挨着一個，不要離得太開。特别是伙夫擔子，由于他們挑着銅鍋、水桶、洋油（煤油）桶，負擔太重，走不動，所以再三叮囑他們，千萬不要掉隊。

來到菠蘿茨，師裏分配我們三團住在半山上的一個村子裏。

到這個村子，要經過一條河。這條河，有深有淺，水流有急有緩，有的地方是淺水、有的地方是深潭漩渦。在組織部隊過河時，由于同志們長期吃不飽，又經過長途行軍、大家饑餓加勞累，體力太弱，結果我親眼見到十幾個人被河水衝倒深潭裏，接着就不見了。紅軍從江西出發，長途跋涉到這裏，就因爲過河宿營被水淹死了，真痛心哪！當時我不禁流下了熱泪。

看見這種情况，我們當即下令暫時停止過河．派部隊去砍了點竹子，編成竹篾繩，把竹繩從河這邊拴到那邊，讓大家拉着繩子過河。這以後，就再没有被河水衝倒的了。我第一次過河時，也差一點被水衝倒，是一個戰士把我拉回來的。最後．我也是扶着繩子過去的。

就在菠蘿茨，我們三團出了一個亂子。有一天，三營九連在放哨時，有個班拖槍逃跑了。當時林龍發政委讓一個派到我們團裏來的軍團保衛局特派員隨着九連去放哨。那個班跑了以後，特派員就被軍團保衛局逮捕了。責備他没有盡到責任。在紅軍的編制裏．保衛局是個獨立系統，保衛局長和政治部主任是一樣的待遇。特派員負責所在部隊的保衛、防奸和保密等工作，直屬保衛局領導。這個特派員後來到哪裏去了，誰也不知道，有人説他被槍斃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裏很難過。一個特派員跟着連隊走，連裏跑了一個班，他是有一定的責任，但是，逃跑的那些人不是他組織動員走的，也不是他煽動走的，把責任完全歸在他一個人的身上，逮捕他，還槍斃了他，這個理由就不够充分。

在菠蘿茨住了大約十多天，又没有東西吃了。原來我天天往山裏跑，到這個時候、我也因饑餓而跑不動了，兩、三天才下去一次。黄永勝、林龍發他們的情緒也不怎麼好。

我們的供給處長叫徐林，是個很能幹的江西人。有一天，他一下子挖出了一罈酥油，還挖出了一些臘腸（用猪腸灌肥肉做成的）。挖出來以後，他把這些東西分給了全團，還給團長、政委、參謀長、總支書記等人，一人一條很長的臘腸。這可真是寶貴了，儘管這種臘腸很難吃。那幾天裏，我們幾乎天天就靠這個過日

子。先是挖點野菜，放一小點臘腸，再弄點青稞麥炒着吃或煮着吃，日子就這麼過。

這個時期，部隊没有打什麽仗，但减員却很大，主要是因爲找糧食出了問題。每到一個地方，團長、政委要辦的第一件事，就是帶着部隊到没有住隊伍的村子去找糧食。我記得有一次，紅二師五團由政委帶着團直屬隊的人去搞糧食，結果被藏民打回來了，傷亡很大，直屬隊被打死了七、八十人，團政委也被打死了，還被藏民抓走了十來個人，其中有政治處的青年幹事。事後，二師師長陳光派人去向藏民道歉，表示願意賠錢把人贖回來。他們説不要錢，但如果我們不再去搞糧食了，他們就可以把人放回來。這確是真人真事。不僅我們這樣搞糧食，中央縱隊也一樣，也是每到一地就派出工作組出去到處搞糧食。劉少奇同志就曾經帶着隊伍去爲中央縱隊搞過糧食。

毛兒蓋地區有很多喇嘛廟，廟很大，裏面有很多菩薩，有大菩薩，也有小菩薩。大菩薩當然是泥塑的，上面塗有金粉；小菩薩是灰色的，上面灰塵很厚，大的有尺把高，矮的祇有幾寸高，不過做得都很精致，有手有腳。

我們一個司務長跑到喇嘛廟裏去看，七轉八轉的就用手去摸那些小菩薩，最後又用舌頭去舔。没想到一舔就覺得是甜的。再舔，還是甜的。原來那些上面有一層灰塵的小菩薩，不論大的小的都是甜的。好家伙，這可發現了新大陸！他把一些小菩薩帶了回來，用水洗，洗完了用水一煮，原來，那些小菩薩都是用面粉做的，很好吃。

後來我們才知道，藏族同胞家中有了喜事，做壽或是生了孩子，就用面粉加上酥油、蜜糖做成面菩薩到寺廟裏去進貢。日積月累、年復一年，寺廟裏的面菩薩就相當多了。這些面菩薩有三、五斤重的，也有一、兩斤重的，還有幾兩重的。土司、頭人和有錢人進貢的就大，而窮人進貢的就小。對這些貢在廟裏的面菩薩，他們都很恭敬，誰也不敢動一下。按道理説，我們也不該動。可由于我們没有糧食吃，餓得實在不行了，没有辦法，司務長就

去收集了兩籮筐，弄回來煮一煮，大家吃得都很高興。都説："這裏還有這樣的東西吃呀！"

從那以後，每到一地，司務長就到處去找喇嘛廟，把廟裏的面菩薩弄回來吃。等到把面菩薩都吃光了，有人又發現牛皮也能吃，于是就把廟裏的牛皮鼓也吃了。有的喇嘛廟裏的牛皮鼓很大。在我們實在找不到東西吃的時候，就進到廟裏，把用牛皮做的鼓皮剥下來，拿回來用水一泡，煮一煮也就吃了。實在没有東西吃的時候，就是弄到了羊肉，也非吃不可。羊肉本身又油，但没有鹽，就那麽吃，還真叫難吃。就在毛兒蓋，我學會了吃羊肉。

我們在毛兒蓋地區住了有一個多月，到過不少村莊，很少見到過藏族同胞。我們所到之處，不論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全都跑了。在菠蘿茨，我倒是看到過一個年輕的藏族婦女，披頭散發地在路上走。不過我們没有跟她説話，也不知道説什麽。由于語言不通，我們説話她不懂，她説話我們也不懂，真是没有辦法。

藏族是土司掌權，政權、財權都集中在土司之手。在土司下面有頭人。土司和頭人家中都有槍，并養有一些家丁。普通藏民也是家家有刀，用來上山砍柴開路，有的還有槍，甚至有駁殼槍和機關槍，這些槍大都是從四川買來的。土司和頭人常用宗教信仰等方式來欺騙和控制藏族同胞。當時就是土司和頭人帶着，甚至逼迫藏民離開村莊，躲進深山裏去的。

就在我們爲了生存而用盡各種方法去找尋所有能吃的東西之時，軍團領導林彪、聶榮臻、朱瑞等提出要整頓紀律。這真是够主觀主義的，一個老百姓都見不到，這種時候怎麽講紀律？要糧食没有糧食，要錢没有錢，可我們還要活命，還要行軍打仗，怎麽辦？其實各個部隊早就不講紀律了，早就把老百姓家裏的東西拿來吃了，把山上藏的東西搜來吃了，把地下埋的東西也挖來吃了，哪還有什麽紀律不紀律！不這麽樣怎麽辦，難道要部隊在那裏等着餓死？

就在這時，紅一師的主要領導有了變動。紅一師師長李聚奎此時被調到了紅四方面軍，紅二師政委劉亞樓調到一師當師長。

劉亞樓一來紅一師來就鋒芒畢露，想把一師整頓好，要求各團嚴格執行命令。當時，一團有個通訊員拿槍打了一頭豬，後來師裏知道了，要求嚴肅處理。一團開了個大會，說那個通迅員犯了紀律，把他給槍斃了。這個通迅員死得真是冤枉！實事求是地說，那個時候確實沒有辦法講紀律，大家都是這樣幹的，不然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那個時候，師裏還提出要講隊列條令，開會遲到幾分鐘都不行。有一次師裏開會，一團團長楊得志，政委黎林遲到了五分鐘，就被劉亞樓罰他們立正站了五分鐘。從師裏回來以後，黃永勝和林龍發就告訴我，說劉亞樓今天不錯，把一團整了一頓。因爲我們那時一直對李聚奎偏袒一團有點意見，不免有點幸災樂禍。

那天師裏開會，就是宣布整頓紀律，但黃、林二人回來後，連傳達都没傳達，因爲誰都知道，那時根本不可能做到。

這時，兩河口會議的決議傳達下來了。紅一方面軍在翻越夾金山以後，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央領導在懋功東南的達維，同紅四方面軍派來的李先念見了面。不久，毛澤東等人又從懋功、撫邊抵達兩河口，同紅四方面軍的領導人張國燾見了面，達到了同紅四方面軍會師的預定目的。紅四方面軍當時約有七、八萬戰鬥部隊，自五月從川陝根據地向西轉移以來，他們已在川西地區占領了金川、懋功、黑水等縣，控制了面積約九萬平方公里，人口有二十餘萬的一個地區。與他們相比，我們紅一方面軍的力量就顯得比較薄弱一些。根據現有資料，當時紅一方面軍剩下的可能還不到兩萬人。

紅一、紅四兩個方面軍會師以後，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兩河口召開會議決定，共同組織一個中央，由毛澤東擔任軍委主席，周恩來擔任副主席，朱德爲總司令，張國燾爲總政委，陳昌浩爲政治部主任，葉劍英爲參謀長。會議通過了《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提出"集中力量向北進攻，在運動中大量消滅敵人，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以便領導和推進全國的抗日運動"的方針。

七月中旬，紅一、紅四方面軍陸續來到毛兒蓋。八月一日，中共中央發表了《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紅軍東北同盟軍及各種反日義勇軍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

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兒蓋沙洞召開會議，作出了《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重申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抗日的主張，并創建川陝甘根據地。會後，中央決定紅一、紅四方面軍混合編成右路軍和左路軍，分兵兩路繼續北上。右路軍從毛兒蓋出發，經班佑、巴西向甘肅南部前進，左路軍則從卓克基出發，經阿壩北上。

右路軍包括紅一方面軍的一軍團、三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以及軍委縱隊的一部分與新成立的紅軍大學。右路軍設有前敵總指揮部，由紅四方面軍的徐向前任前敵總指揮，陳昌浩任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王稼祥等都隨右路軍行動。

左路軍包括紅四方面軍的九軍、三十一軍和紅一方面軍的五軍團、九軍團，以及軍委縱隊的一部分與總司令部。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總參謀長劉伯承等均隨左路軍行動。

這些決定傳達下來以後，大家非常高興，說這一下好了，中央統一了，一、四兩個方面軍合起來有十來萬人，如果這十來萬人鬧到甘肅南部，就可以占領洮河兩岸一大片地方，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前途很快就會光明起來！大家好一陣高興，紛紛表示保證克服一切困難，通過草地，向甘肅進軍。

後來，在毛兒蓋開了個團以上幹部大會，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國燾等都來參加了會議，朱德和張國燾還在會上講了話。記得張國燾在講話中說，爲了吃大米，就必須向北走，到平壩子裏去，到了平壩子，我們就會有大米吃，生活就會好起來。其他的就不記得了。當時大家那個高興勁兒，就別提了，說這下好了，統一了嘛！

十九、過草地

離開毛兒蓋，我們要去的甘肅南部，直綫距離不過二百餘公里。這點路程對我們來説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毛兒蓋處于大草地的邊緣，而這塊草地，是長江和黄河的分水嶺，完全泡在水裏，整個草地到處都是被野花野草掩蓋着的泥沼，一不小心踏上，人就會陷落下去，很快没頂，可以説是死亡的大陷阱。雖然短短的路程，却足以致人于死地。本來，北上甘肅可以經松潘而不必過草地，但松潘這時已被國民黨胡宗南部隊重兵把守。要北上，就祇好通過草地這個死亡地帶。

爲了能順利走過草地，上級要求大家每人準備十至十五天的糧食，大約每人要搞十五斤左右的糧食，還要上交一部分給中央縱隊和軍委縱隊，因爲這兩個縱隊的首長多，工作忙，没有辦法準備那麼多的糧食。我記得光我們三團就上交了四、五百斤糧食。

但是到哪裏去搞這麼多的糧食呢？我們在毛兒蓋地區轉來轉去，已經耽擱了將近兩個月。能搞到的糧食早就被我們吃得差不多了，附近又没有老百姓，到哪裏去弄呀！

爲搞糧食，我們全師又轉回到毛兒蓋附近，專門在那裏住了三天。在此之前，我們已經把藏民們山上藏的，地下埋的，廟裏供的，幾乎都吃光了，甚至連地裏快要成熟的青稞都叫我們吃得差不多了。地裏唯一剩下的，是一些剛灌完漿，成熟得比較晚的青稞。我們就把麥粒還是軟軟的青稞穗一個一個地摘下來，再用手去搓，麥穗上的刺很多，一搓就把手搓壞了。就這樣一共弄了三天，一天頂多弄個兩、三斤，多了弄不了。我弄到了大約八斤。有的戰士體力較强，就弄得稍多一些，不過平均下來，離每人十五斤的要求還是相差很遠。當然超過十五斤的人也不少，可惜這

地裏的青稞麥已經被我們拔光了，再也没有辦法弄了。

把青稞麥粒從地裏弄回來以後，我們就用臉盆盛着麥粒在火炒，炒熟了灌在米袋子裏，然後就靠着這點東西過草地。個人個人的，誰弄了就是誰的。

出發前的那天下午，師裏突然通知團長、政委去師部開會。時，中央軍委和軍團部住毛兒蓋，師部住毛兒蓋附近。開完會來，黄永勝和林龍發就告訴我，這個會主要是批評我們，因爲們經常説一團是模範團，二團是親生子，三團没人管這樣的怪。他倆説，不僅師裏的各位領導都參加了這次批評會，甚至連團政委聶榮臻也專門趕來參加。他們被批評鬥争了一下午，好當時還有人在會上提出要把黄永勝這個團長撤了，調離三團。來考慮到部隊馬上要過草地，所以祇是給黄永勝提出警告。他們二人還告誡我：“以後再不要説這樣的怪話了，是我們錯了，錯了就改吧！”

我當時心裏很難過。我雖然没有去參加會議，因爲我祇是個團支書記，没有直接挨批鬥，但我的心裏同樣很不好受。我問會上有没有提到我給譚政寫的信，他們説，譚政没有上報，也没有把信交出來，所以没批我，如果譚政在會上把我的信拿出來，那就肯定會撤了我的職。黄永勝還對我説：“好險，老吴！”

頭天下午挨批，第二天就開始過草地。過草地時，右路軍是由紅一軍團二師擔任前衛，軍團部跟着二師，我們一師又跟着軍團部前進。在一師的行軍序列中，是按一團、二團、三團排列的，我們三團又是走在最後面。草地十分危險，我們既没有地圖，也没有指北針，而且就是有地圖，也不可能在地圖上找到草地上哪些地方下面没有泥沼，可以通行。因此要過草地，就必須要找向導。

二師開始行動之前，軍團部給他們找了一個向導，是個藏族老大娘，大概有六十多歲了。這個藏族老人曾走過由毛兒蓋到班佑的這條路，知道該怎麼走，不過因她的年歲大了，所以一路上都是由戰士用擔架輪流抬着她。就這樣，我們靠着這位老人的指

引，一個跟着一個，踏上了草地。

過草地的第一天，我們三團是跟着前面的部隊走，我們後面就没有什麼隊伍了。二師走了，軍團部走了，一師師部、一團和二團都走了，三團跟在最後面。第一天走的都是大路，而且走得也不遠，衹走了五、六十里路就宿營了。沿途上一户人家都没有，但走的都是平路。向北走，没有什麼高山，都是高原草地。一般的山都衹有幾十米高，就像是起伏不大的丘陵。

第一天的行軍途中，我們還遇到了一個很大的原始森林，都是些松樹和柏樹，樹長得才怪呢！很粗，三個人都抱不過來，但不高，樹枝很長，一根松枝有三、四丈長，也有四、五丈長的，而且枝繁葉茂，能把整個的山頭山凹都覆蓋上。

那天晚上，我們就在這樣的樹底下露營，下雨都不怕。大家都很高興。我就跑到團部去向黄永勝和林龍發説，真没想到這裏還有這麼好的地方，在這樣的樹下宿營比住房子還好。

晚上大家燒火做飯時，都互相告誡，一定要注意在地下挖竈，千萬不要把森林給燒了。當晚，團部煮了一大鍋的青稞，我帶着政治處的人去打了一桶回來，裏面放着鹽。接着，我把一直留着没捨得吃的臘腸，切了一小段，用臉盆炒熟後，倒在那桶煮熟的青稞裏拌好給大家吃。政治處的人吃了都很高興，説我們今天的晚飯不僅有鹽，還有油，真是一頓“美餐”，大家飽飽地吃了一頓。

第二天早晨没有吃飯，隊伍就出發了。再往前走，就再也没有森林，也看不見大樹了，衹有像小孩那麼高的一些矮樹，其它都是草。走到中午，我們看到前面草地上有野馬和野鹿在跑來跑去，大家都説，要能打到一頭該多好啊，這樣就解决問題了。其實，你看着前面跑着的野馬、野鹿好像很近，實際上相距很遠，而且路邊的水草下有很多吃人的沼澤泥潭。所以，即便你看到了野馬、野鹿，也是可望而不可及，根本就打不到。

中午時分，我們過了一條河。説是河，其實也就是條小溝。河水從北往南流，水很清。看到河，隊伍就休息了下來，并拿出缸子舀水喝。大家在河邊一邊喝水，一邊就着炒過的青稞麥，一口水一口青稞，就這樣吃了一頓飯。

在毛兒蓋，供給處長弄到了一牛皮袋的炒面，臨出發前他分給了我一斤。我一直都没有捨得吃。這時，我倒了一點在缸子裏，放點水一攪，就吃起了炒面糊。

那天晚上的宿營地是個小山包。在這個小山包上，全團的隊伍擺開露營，大家找點乾柴草往地上一鋪，就睡在了上面。由于都分頭做飯，那天晚上的小山坡到處都是火。晚上我們剛剛睡下，就下起了雨。大家都没有雨具，衹好乾挨淋。我們政治處的幾個同志，把一塊演戲用的幕布挂在樹枝上，七、八個人就在那幕布下蹲了一個晚上。後來還好雨停了。

第三天繼續走，還是晚上煮點青稞麥吃，留下一碗到第二天再吃。這天就看見路上有犧牲的同志了。有的用土埋了，插上一塊小木頭牌子，上面寫着犧牲同志的姓名和籍貫。這些同志從江西出發，經過千山萬水來到這裏，没有在戰鬥中犧牲，却這樣餓死病死在草地上了。那天一路走來，大概看到了十幾個這樣的墳頭，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這一天部隊的情緒都不太好。因爲人就埋在附近，大家都看到了。

晚上宿營後，我就向黄永勝和林龍發提出，要給部隊做點工作。他們兩人都説是應當做點工作。這樣吧！把各連的指導員找來談一談，就談這麼幾條。第一條，據前面部隊傳來的消息，過草地的時間，大概需要半個月，我們已經走了三天，隊伍没有什麼減員，這很好。第二條，對前面的路程，要有足够的估計，要準備再走個十五天。各連要好好調查研究一下，一個人一個人地去摸一摸，包括戰士、班長、排長、連長和機關的每一個人，都要把自己所帶的糧食好好計算一下，以班爲單位討論討論，看看怎樣才能使所帶的糧食保證吃到十五天。第三條，要盡量使體弱有病的同志跟上隊伍。由于體弱，這些同志没有搞到多少糧食，如果他們没有吃的了，要以連爲單位自己調濟一下，幫助這些傷病員同志解决一點困難。第四條，所有連裏的幹部，包括連長、

副連長、指導員、副指導員，都要輪流走在連隊的後面，幫助督促戰士跟上隊伍。

那個時候最困難的就是沒有辦法把病號都帶出來，因爲沒有擔架抬他們，馬也少了。黄永勝他們都沒有馬了。那原來的馬呢？自從過夾金山以後，我們走的都是崎嶇小路，根本就不能騎馬。有時過河，河上的橋就是一根木頭，馬是無論如何也過不去的。過夢筆山時走的那條路，人勉强能走，馬却走不過去。所有有馬的人，都將自己的馬交由馬夫帶着繞道走另一條路。結果連馬帶人都沒有回來，從此便杳無音信，連放在馬背上的行李也丢了個乾乾淨淨。從此，就祇能靠自己的兩條腿走。

到第四天繼續走的時候，犧牲的同志就多了。犧牲的人一多，就没有人去個個都埋了。這樣一來，就不知道他們姓什麽、叫什麽，也不知道他們是哪個單位的。有一次，我一下就看到了五、六個人死在一起，心裏真是不好受。

越往前走，水草地就越多，走得不好，一踩都是水，有點像走在擺動的浮橋上，一挪步脚下就摇晃，地上的泥不僅滑，而且像膠一樣粘，非常難走。最可怕的是，有的地方就像磁鐵，人一陷進去馬上完蛋。我們陷進泥沼的人究竟有多少就難以統計了。一天走不了多遠就得宿營。還是晚上做好飯，吃一頓，留一點，第二天到了有水的地方，再喝點水，吃點青稞麥。

到第五天，犧牲的同志就更多了。一路上，不時都可看到路旁有兩個、三個，甚至四個、五個犧牲的同志倒在那裏。還有一些人拿根棍子，在一拐一拐地往前走。我們在後面看到這種情况怎麽辦呀？就去動員他們説，同志，走呀！你是那個單位的呀？堅持走吧，早一點過去就好了，關鍵就是這個草地，過完草地就好了。他們却説，同志們，你們走吧，我們"革命已經成功"了，我們不能走了。問他們是不是有病，他們説没有病，主要是餓的，餓得實在没有辦法再往前走了。當我們提出照顧他們一下、分給他們一點糧食，讓他們跟我們走時，他們説，我們要是爲了照顧他們，把糧食分給他們，就會連我們也走不出草地，大家都會餓

在裏頭的。他們還説，爲了保存點革命力量，爲了革命勝利，我們不要管他們，繼續往前走。

這種話説得我們很難過，聽後不由得泪如泉湧。但無論你再怎麽勸、怎麽拉，他們也不走。有時候，我看見兩、三個人一起撐傘坐在路邊，就那樣死在傘下面了。這種情況，一天至少能到六、七起。每當看到這種情况，我的心裏就非常難過，常常一邊走，一邊流眼泪。

對那些願意跟我們走的，我們政治處就把他收容起來。有一我們就收容了三個。那些實在不願意走的，我們也没有辦法。他們認爲走下去也是死，就不願意再走了，祇要求我們將來若是回到他們的家鄉，就告訴一下他們的家裏，他們已經死在草地上了。當時我們還一一記下他們的名字和單位，以及家裏的地址。其實，那是空的，是没有辦法一一去通知他們的家裏的。事實證明，這些同志真是徹底的共産主義戰士，爲革命爲國爲民犧牲了自己的一切。

到第六天以後，這種情况就更多了。雖然那些走不動的同志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但由于人數太多，我們確實無力再去照顧那麽多，祇好忍痛走開。

爲了盡可能地減少因掉隊而出現的部隊減員，有時一看到前面的路不好走，哪怕這時的太陽還挂在半空中，我們就宿營。一宿營，我們就召集連長、指導員開會，了解剩下的糧食情况。每次開會就是一件事，除了談糧食，還是談糧食，糧食這兩個字就像是幽靈一樣，老跟着我們，没完没了。開完會，大家就出去找野菜，以彌補糧食的不足。

大草地上，也跟毛兒蓋的那塊盆地一樣，有各種各樣的野菜。有像白菜，也有像野葱、野蒜、野韭菜、野莧菜的，還有一種苦菜，雖苦，但没毒，能吃。另外還有一種叫蒿子的，長得和韭菜差不多，祇是下面多了個疙瘩頭。每天一到宿營地，我就和政治處的技術書記郭成柱、俱樂部主任薛元禮、青年幹事蔡文福等人，一起到處去挖野菜。挖來以後，用臉盆一煮，没有油，也没

有鹽，就和着炒過的青稞麥粒吃一點，就算是一頓飯。由于長期缺油少鹽，營養不良，雖然我們當時都很年輕、才二十來歲，但全身沒勁，走不動路，扛不動槍。

有的野菜有毒。部隊上當不少：吃了那些有毒的野菜後，臉上乃至全身發腫，輕的拉拉肚子，嚴重的發燒、頭痛甚至昏迷。後來就統一由供給部門找人專門鑒別，哪種野菜有毒、哪種野菜沒毒，再分別通知各個連隊。這樣一來，中毒的現象才減少了。

有的同志實在沒有吃的了，就吃自己的皮帶。他們把皮帶用水泡了，切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再和着青稞麥粒一起煮來吃。不過有皮帶的人很少，吃皮帶也解決不了大問題。當時，我們還聽說不少高級幹部把僅剩下的馬殺了，和大家分着吃馬肉。

有時候，由于實在沒有吃的，一些掉隊的戰士就開始揀人家大便裏的青稞麥粒吃。因爲吃這種沒有磨過的青稞麥粒，很難消化，常常是吃麥子粒就拉麥子粒，雨一淋，麥子就露出來了。放進河水一洗，就再吃第二次。這樣做，主要還是爲了能走出草地。

草原的氣候時時變化無常，常常一下子天晴，一下子下雨，一下子刮風，一下子下冰雹，有時還飄雪花。有時太陽當空，一下子就會變得烏雲滿天，狂風暴雨。可不到半點鐘，天就又晴了，但衣服已經濕了。一天來這麼幾次，弄得我們的衣服是濕了乾，乾了又濕。中午一走路就出汗，但早晚却冷得不得了。

在過草地以前，我們凡是抓到了羊，就把剝下的羊皮留起來做衣服穿。我也弄到了一塊。怎麼做衣服呢？就在羊皮的中間挖個圓窟窿，從頭上套下去，然後在兩邊腋下各縫上一條帶子，把這兩條帶子一系，前面後面靠身就成了一個羊皮背心。就靠這塊羊皮，我過了草地。草地晚上非常冷，睡覺又沒有被子，每天晚上，我們都縮成了一團，我就靠這塊羊皮保護了身體，沒有生病。但到後來身上還是沒有勁兒了，也快走不動了。

就這樣走了九天多，到第十天，我們來到一個地方，突然看到了一大片用牛糞糊成的房子，就跟我們在毛兒蓋住的房子一樣，比那個要大。當時我們都很驚异，大家都說："天哪，草地上還有這樣的地方！"

我們是中午十二點鐘到達了那個地方，就在那些"牛屎房"子裏一邊休息，一邊做飯吃。但究竟還要向北走多遠，才能走出草地，誰也不知道。我就去問黃永勝。黃永勝說他也不知道，不過他告訴我，隊伍暫時先在這裏休息一下，他已經派人到前面偵察去了，到山那邊去看看有沒有村莊。他還分析說，既然有"牛屎房"，就會有牛，就會有人家。

結果偵察的人回來報告說，翻過山二十里，就是一片好地方，那裏兩邊山溝都有房子，還有村莊，地裏有蘿卜、白菜、葱、蒜、豆子什麼的，長得好得很。聽了偵察員的報告，黃永勝高興地說："這下可有希望了！"他下令部隊馬上出發往那裏走。得知前面有人家，大家的情緒馬上就起來了，腳下的路也變得輕快了許多。這二十五里的路，我們衹走了兩小時。

翻過了一座小山，走不遠，就來到那條溝，溝兩邊都是人家，牛、羊、鷄、鴨、麥子、蘿卜、青菜、豌豆，什麼都有。這一下大家高興得不得了，都說，好家伙，這下有吃的了！我們把剩下的一點青稞麥通通都吃了，吃了一個飽，不再留了，到了這樣的好地方，還留它幹什麼！

大約下午四、五點鐘，我們趕到了一個村子。一到，就趕緊去搞糧食。沒想到那一帶藏族的土司、頭人早作了準備，讓藏民們把家裏的東西都藏到了山上。除了地裏長的以外都藏起來了，剩下的就衹有個把鷄、沒有來得及趕走的個把猪，還有狗。那些狗咬人咬得很厲害。不過地裏有東西，豌豆、蘿卜、土豆、大蒜等都有，最重要的是土豆，一挖一大堆。有了土豆，我們就挨不了餓了。有的弄到羊就吃羊，弄到牛就吃牛。

這時，大家都在問：是不是我們已經走出草地了，前面究竟還有沒有草地？最後終于傳來消息說，前面已經沒有草地了，前面部隊已經到達了班佑和巴西。大家這才總算是鬆了口氣：真不容易啊，我們總算走出了這個饑餓和死亡的地帶！

這一階段，確實是我們兩萬五千里長征途中最艱苦的一個階

段，也是紅軍北上到新中國建立之前最艱苦的一個階段。最大的困難就是沒有吃的，衹能吃野菜、喝冷水。那水真涼，是從雪山上下來的水。有的人受不了，喝了這水就拉肚子。我當時仗着年輕，身體好，安然無事地過來了。

因爲找不到吃的，衹能吃老百姓的東西，不這樣做，紅軍就活不了。所以，在藏族地區，雖然藏民們逃避我們，也打死打傷了我們不少人，但是我并不恨他們，衹覺得對不起他們，覺得我們欠下了他們的一筆債。我認爲藏族同胞對紅軍的幫助很大，可以說是藏族同胞挽救了中國的革命和紅軍。沒有他們辛辛苦苦種植的糧食和放養的牛羊，我們就活不了，就過不了草地，就到不了甘肅，北上抗日也衹是一句空話。當然在藏族同胞中，有些當奴隸的，家無寸鐵，身無片布，就光着膀子，衹穿一條褲子，看到我們隊伍來了就跟着走的也有。但是是極個別的。有的就一直跟着我們到了陝北，成了幹部，成了共產黨員。但他們沒有出過遠門，要他們帶路，還是帶不了。

總而言之，這一階段我們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難，是很難用語言或文字完全形容得出來。當然，各個部隊、各個人所遇到的情況、所吃的苦也不完全一樣，有的稍好一點，有的就更苦。對高級幹部，總還是有點照顧，最苦，最困難的是下面的普通戰士。有的部隊經過的地區好一點，吃的苦就少一點；有的部隊經過的地區比較差，吃的苦就更多一些。有的部隊走在前頭，就好一點；有的部隊走在後面就差，能吃的東西都被前面的部隊吃了，後面的部隊要找到吃的就要困難得多。如二師一直擔任前衛，就比我們一師好一點；一師的一團、二團走在前面，就比我們三團要好一點。另外，各個部隊走的路也不一樣。我們行進時，是多路并進。有的路就好一點，有的就差一點。我們紅一方面軍衹過了一次草地，而紅四方面軍到了阿壩又南下過草地，最後又翻過草地北上，前後共過了三次草地，那就比我們更艱苦了。

二十、向臘子口進發

草地的那邊仍然還是藏族人民聚居的地區，我們看到的情況也跟毛兒蓋、菠蘿茨差不多：有村莊，有莊稼，但還是見不到人。

過了草地的第二天，我們沿着一條河，一直向北向臘子口方向前進。那天沒有太陽，我跟着後面的二營，準備收容掉隊落伍的戰士。二營的後面是個伙夫擔子。這時前面的隊伍已經走了。突然山上打開了槍，左一槍、右一槍地直往我們中間打來。我就喊，"隊伍快走啊！前面發生情況了！"。大家拼命地跑，總算趕上了前面的部隊。

我們剛過完，藏民們就從山上下來了，抓走了我們一些掉隊落伍的人。等後面的大部隊來到，他們就又上了山。後來聽說，二團在我們前面遭到襲擊，連團長龍振文都被藏民們從山上打冷槍打死了。這種打法，弄得我們挺難受。他從山上打你，看得清，打得準，你看不到他，他能看到你。一槍就把一個團長打掉了。

第三天又繼續走，晚上宿營的地方叫卧藏寺，是個喇嘛廟。我們三團跟師部住在一起。那時師長是劉亞樓。團裏派出一連在離我們兩里遠的地方放了個連哨。當時一連還有五十多人，由連長、指導員帶領着，執行警戒任務。放連哨的那個地方是個路口，沒有人家，一連就在那裏一邊露營一邊放哨。

由于當地的老百姓把糧食通通都埋了起來，黃永勝和林龍發就帶着團直屬隊的一部分人，和全團隊伍一起，到二十多里外的地方去搞糧食。他們出發前交待我，要我照顧留在後面的直屬隊機關和伙夫擔子、行李等。他們走時天未亮，是早晨六點多鐘。

天亮後不久，一個被刀砍傷了腦殼的一連戰士，突然之間血淋淋地跑到我的屋子裏，對着我"啊、啊"地亂叫，他已被砍得不能說話，那是幹什麼呀！我就趕緊派人去察看。原來是藏民趁

大部隊沒有回來的時候，從山上下來一百多人，個個手持大刀，把我們在那裏放連哨的五、六十個人，包括連長、指導員在內全都砍死了，所有的槍支彈藥，包括兩挺輕機槍也都叫他們拿走了。損失真大呀！好不容易走過了草地，我們二團的團長却在這裏被打死了、三團的一個整連也被搞掉了，實在令人十分痛心！

等黃永勝、林龍發帶着部隊回來，我們做了一個大墳，把犧牲的同志全都埋在了裏面。在墳前插了一塊木牌，上寫"紅軍一師三團一連全體戰士"。埋葬完了一連的同志以後，我們三團全體指戰員立正向犧牲的同志表示哀悼，黃永勝、林龍發兩人還講了話。然後，部隊繼續出發北上。由于一個整連都被人搞掉了，所以團長、政委和我的情緒都不好。

部隊繼續向臘子口進發。突然從前面傳來消息，說二師四團（即王開湘、楊成武率領的那個團）已經把臘子口拿下來了，而且消滅了國民黨軍第十四師魯大章的一個團。這下可好了，因爲臘子口是通往甘肅南部的咽喉，拿下了臘子口，我們就可以順利到達甘南的哈達輔，再也用不着重返草地了。這個消息極大鼓舞了全團指戰員的士氣。

來到臘子口一看，嚯，那可真是天險！臘子口兩側的山崖都是懸崖峭壁，山勢幾乎是拔地而起。峭壁下有一條臘子河緩緩流過，河的右岸還有座小山，有百多米高。國民黨軍在隘口小山上修有碉堡，真有一夫守隘，萬人難敵的氣勢。聽說四團最後是從後面爬上最陡的懸崖，然後居高臨下，打掉了小山上的碉堡，才消滅了國民黨守軍的。他們正面的强攻祇是牽制住敵人的火力而已，根本就無法衝破敵人的火力封鎖。

登上那座小山，我們向東一看，祇見一坦平原豁然就在眼前，莊稼、森林都很多。看到這一景象，大家的情緒突然之間就起了變化，高興了起來。

二十一、哈達鋪縮編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九日，我們來到了臘子口附近的哈達鋪。哈達鋪是甘肅岷縣的一個小鎮，鎮上祇有一條小街。

哈達鋪所在的那個地區是一塊起伏不大的高原丘陵，有小山，但不高，村莊稠密，莊稼也多，是一個回、漢民族雜居的地方。回族同胞頭上都戴白帽子，會說漢語。當地百姓說的基本上都是北方甘肅、陜西這一帶的話，我們都能聽懂，而且還不難懂。在走出臘子口之前，我們在藏族地區差不多有四個月沒有見到什麼老百姓，一到哈達鋪，見到了這麼多的回民和漢民群衆，可以互相通話，大家都非常高興。

我們三團住在哈達鋪附近的兩個小村子裏。一住下來，指戰員們就積極地向群衆宣傳紅軍北上抗日的主張，宣傳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宣傳紅軍的民族政策。群衆也熱烈地歡迎我們，給我們送來了糧食和各種食物，使我們再也不用忍饑挨餓了。

從這以後是真正恢復"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時候了。爲了同前一階段不講紀律的現象和思想徹底決裂，我連續召開了團裏的政工會議，先解決這一問題。我要求各級政工人員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教育廣大指戰員一定要嚴格遵守紀律，團結和爭取群衆。

到達哈達鋪的當天晚上，黃永勝和林龍發去師部開會，回來後他倆向我們傳達了部隊要進行縮編的決定。

我們這才知道，原來部隊過了草地，到達巴西以後，紅軍內部出現了嚴重的分裂鬥爭。紅一、紅四兩個方面軍會合後，張國燾對一方面軍很瞧不起。他認爲，四方面軍有七、八萬人，而一方面軍經過長途跋涉，從江西經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來到四

川。隊伍十分疲勞，沿途打仗很多，減員很大，剩下的也就一萬多人，人少兵弱，力量不大。當然，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則不這麼認爲。四方面軍同志普遍認爲，與一方面軍的會合，增加了紅軍的力量，加强了領導，因此十分歡迎我們。

在兩軍會合以後，張國燾與毛澤東等人的争論和鬥争就没有停止過。在兩河口會議上就有鬥争，一直到毛兒蓋，争論一直在繼續。主要問題是紅軍究竟應該往哪裏去？張國燾主張西渡黄河，前往青海、寧夏、新疆地區，而且認爲四方面軍力量强大，究竟往哪裏走，應當由他來作出决定。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則認爲，西進没有發展前途，那裏一無資源，二無糧食，三無兵源，而且語言不通，大部隊在那裏無存身之地。而且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行動正日益加劇，想把中國變爲自己的殖民地，而中國人民要求抗擊日本侵略者，這已成爲中國時局的基本特點。爲抗擊日本侵略者，我們已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幟，因此北上抗日才是名正言順。北上首先就應當占領甘肅南部，進而建立川、甘、陝根據地。那裏主要是漢族群衆的聚居區，有糧食，有兵源，語言相通，有我們發展的餘地。經過連續幾次會議，毛澤東等人才慢慢説服了張國燾，使他同意了北上。本來準備打開松潘、經松潘北上川北的，可由于中央意見不一致，我們在毛兒蓋一帶轉來轉去的轉了將近兩個月，我們于七月十日到達毛兒蓋，一直到八月下旬才開始繼續北上。在此期間，蔣介石趁機調動胡宗南的大部隊占領了松潘，堵住了我們原定北上的路。中央才不得不决定兵分左、右兩路并肩北上。

不料，正當我們右路軍按預定計劃穿過草地到達巴西，左路軍也到達阿壩後，張國燾突然變了卦。他借口前面河水上漲過不去，命令部隊停止前進，然後秘密發電報給右路軍前敵總指揮徐向前，要他也停止前進，率部南下。突然之間發生了這樣大的變化，當時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都不知道。葉劍英在這個問題上立了大功。他是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管司令部的工作，一般地説，電報來了以後，先送給參謀長看，再送給司令員、政委

看。葉劍英看了張國燾給徐向前、陳昌浩的命令後，把電報往袖子裏一攏，從參謀的枕頭底下拿出一張地圖，騎上馬，趕緊就到軍委縱隊所在地找毛澤東，把電報拿給毛澤東看，説張國燾要反了，要隊伍返回南下，不向北進了。毛澤東看了電報，覺得問題非常嚴重，萬一處理不好，長征就會中途而廢，紅軍甚至會自相殘殺，這是關系到黨和紅軍的命運的千鈞一發時刻。毛澤東那時年輕，思想敏捷，考慮周密，考慮片刻後他對葉劍英説：“你趕緊回去把電報拿去給徐向前、陳昌浩看，然後就大發脾氣，説軍委縱隊太不像話了，没有糧食就來跟指揮部要，我們哪來的這麼多糧食，叫他們自己去搞吧。然後以此作爲借口，把一方面軍的部隊調離指揮部的駐地。”葉劍英回到指揮部後，向徐向前提出讓一方面軍的部隊自己去搞糧食的建議，徐向前同意了。之後，軍委縱隊通知一、三軍團快速脱離徐向前、陳昌浩領導的前敵總指揮部，開始了單獨北上的行程。

後來聽説，當陳昌浩發現軍委縱隊和一、三軍團已單獨離去時，曾提出要派隊伍追，但徐向前説，没有這個道理，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這才避免了一場紅軍内部自相殘殺。如果當時發生了衝突，很可能會導致紅軍從此走向衰亡。在紅軍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是葉劍英和徐向前爲中國革命立了一大功。

但當時也發生了一些事情。當時有個新成立的紅軍大學，把一些暫時没有分配工作的師、團級幹部組織在學校裏學習，準備等開辟了新的根據地以後，再分配出去工作。其中有一方面軍的幹部，也有四方面軍的幹部，校長是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參謀處長李特。就在這個軍校裏，一方面軍的幹部要北上，四方面軍的幹部要南下，彼此發生了衝突。大家去找毛澤東，毛澤東説：“一方面軍的幹部願意北上的跟着我們走，四方面軍的幹部願意南下的就南下。”

當時李特很凶，堅持要所有的幹部都南下，不南下不行。不少一方面軍的同志對李特的舉動很氣憤，準備必要時就要開槍。毛澤東説：“絶對不能開槍，開槍就壞了，他們要去就讓他們去，

我們走我們的。”他還對四方面軍的同志説：“你們南下是對的，你們南下吧！我們北上也是對的，目的都是爲了幹革命。誰走的路正確，誰就能得到勝利，這得看將來的事實。我認爲我們北上是對的，你們將來也還會跟我們來的。”事情這才算平息了下來。以後還聽説，在雙方發生争執的過程中，個子高大的李德就站在李特的後面，準備萬一不行，就攔腰把李特抱住。

就這樣，毛澤東、周恩來等率紅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北上了。右路軍中原紅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去阿壩同張國燾會合。以後，他們又過了一次草地，回到了天全、蘆山一帶。但并不是所有紅四方面軍的同志都掉頭南下，如編入我們紅一軍團的那個團，即張雲初的團，就一直跟隨着紅一方面軍北上到了陝北。而在左路軍中，原紅一方面軍的五軍團和九軍團，包括朱德總司令、劉伯承總參謀長等，則被張國燾挾持南下了。實際上，朱德等人當時已被張國燾軟禁。就這樣，紅一、紅四方面軍分家了。紅五、紅九軍團隨紅四方面軍部隊隨張國燾再次北上時，被編入西路軍，在張國燾的錯誤指揮下，渡過黄河西進。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軍在馬步芳的騎兵部隊打擊下，于甘肅西北部山丹、高臺的沙漠地帶全軍覆没。這樣，紅一方面軍從江西出發時的紅一、紅三、紅五、紅八、紅九五個軍團，最後衹剩下紅一和紅三兩個軍團約六千餘人跟着毛主席到達了陝北。八軍團遭遇一九三四年底湘江戰役之後，損失嚴重，在其殘部被編入其他軍團之後，八軍團這一番號被撤銷了。紅五軍團和紅九軍團被張國燾挾持南下後，就再也没有回來。

上述情况是在部隊到達哈達鋪以後，上級逐步向我們傳達的。與此同時，還傳達了關于整編部隊的决定。

由于當時紅一方面軍已嚴重减員，中央政治局會議决定，將紅一方面軍改編爲紅軍抗日先遣隊陝甘支隊，繼續北上，把革命的立足點和出發點放在陝北。陝甘支隊的司令員彭德懷，政委毛澤東，副司令員林彪，參謀長葉劍英，副參謀長張雲逸，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楊尚昆，政治保衛局長羅瑞卿。支隊下轄一

縱隊、三縱隊和軍委縱隊。紅一軍團改編爲一縱隊，縱隊司令員由林彪兼任，政委聶榮臻，參謀長左權，政治部主任朱瑞。紅三軍團改編爲三縱隊，司令員彭雪楓，政委李富春，副司令員劉亞樓，參謀長蕭勁光，政治部主任羅瑞卿。軍委縱隊司令員葉劍英，政委鄧發，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蔡樹藩，參謀長張經武。縱隊下面撤銷了師的編制，由縱隊直轄團。一縱隊下轄一團、二團、四團和五團，我們三團和六團被編散，番號也被撤銷。三縱隊下轄原屬紅三軍團的十團、十一團、十二團和十三團。整個先遣支隊就衹有八個團，另加一個軍委縱隊。團以下的單位一律縮編，營縮編爲連，連縮編爲排。毛澤東在會上宣布：“所有的幹部通通降一級使用，師長當團長，團長當營長，營長當連長。”但允許幹部長以上的有馬騎。原來營長是没有馬的，像我這個當團總支書記的，就没有馬騎。政治處有匹馬，但不是總支書記個人的，是用來馱整個政治處幹部的行李。總支書記位于團營之間，實際上等于營級幹部。整編的目的，在于保持部隊的戰鬥力，保持部隊的實力，以便在繼續北上時更加有利于進行戰鬥。

决定傳達下來以後，黄永勝、林龍發和我一起研究，歸納了幾條關于部隊整編的理由，然後在當晚召開全團會議，向大家宣布整編的决定，進行了動員。黄、林二人和我在會上講了話，向大家説明：第一、整編是經常的事。目前部隊减員大，人員不充實，連不像連，衹比排大一點，每個連多的不過七、八十人，少則三、四十人。整編後，每個連可以有一百多人，能編成三個排，每個班也可以有十多人。這樣隊伍集中了，戰鬥力加强了。第二、整編後减少了勤雜人員，精减了機關，减少了非戰鬥人員，加强了連隊，充實了戰鬥力。第三、部隊繼續北上後，會遇到馬鴻賓、馬鴻逵、馬步青、馬步芳的馬家騎兵隊伍。馬家軍能騎善戰，是支驃悍的回族隊伍，我們必須作好和馬家騎兵作戰的充分準備。第四、從歷史上看，我們一直在根據情况的變化而不斷進行整編。一九三三年以前，我們從游擊隊改編成獨立團，繼而又擴編成獨立師，以後獨立師編入紅二十二軍，紅二十二軍又編入了

紅一軍團。隊伍擴大了要擴編，隊伍縮小了就要縮編。因此整編隊伍是常事，不是誰編誰，而是為了集中力量，加强戰鬥力。第五、各營、連的幹部，一定要把隊伍帶好。三團雖然暫時分散，但今後還會在一道戰鬥。一團、二團都是我們的兄弟，我們到那裏要很好地接受領導，尊重領導，要聽指揮，把自己的隊伍帶好，盡量減少部隊減員。第六、分編到其他各連的人，就在連隊好好幹，將來是有前途的。大家多年在一起是有感情，這是很自然的，但將來還可以聚在一起。例如打起仗來，就又在一起了。不能搞宗派主義、本位主義，也不要在同志之間有親疏厚薄之分，不要搞這些。就這樣，我們向全團指戰員講清了這些問題。

三團的部隊被編散了，番號也被撤銷了，有的營編成了一個連，有的營編成了兩個連，并分別被編入了一團和二團。團部的直屬隊也解散了，衛生隊編入一團，供給處編入二團，一些人被調入了連隊。我們團的幹部也都分散了，黃永勝到縱隊部重新分配工作，林龍發調到五團當了政委，我則到縱隊政治部重新分配工作。

開完全團動員大會，已經是夜裏十二點鐘了，但我們誰也不想睡覺。于是，團裏的幹部，黃永勝、林龍發、徐林、蕭元禮和我等幾個人，一起來到黃永勝、林龍發住的房子裏，說明天就要分散了，各走各的呀！大家都不免有點依依不捨。由于我們在一起爬過雪山，走過草地，共同度過了參加紅軍以來最艱苦的時刻，彼此之間感情很深。黃永勝說："分散是自然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將來我們還是有可能到一起工作的。" 接着，他解下腰帶，拿出僅有的一塊錢，說："明天買點東西，我們大家吃一頓再走吧！"

第二天，我們用那一塊錢買了兩隻鷄、兩斤肉，把團部裏的七、八個主要幹部，找在一起吃了頓飯，就分手了。當時大家是不喝酒的。這頓飯後，我們休息了一天，第三天早上便高高興興地各自分手，到自己新的工作崗位報到去了。在那天晚上開動員大會時，我們幾個團幹部就已經分別向各個連隊告了別，因此走

的時候就再沒有到各連隊去。幾個連隊就由各自的連長(即原來的營長)帶着，分別到一團或二團去了。那時的部隊少，住得也都很靠近，走不了幾里路就到達了新的駐地。

黃永勝和我到縱隊部也不是一起走的。他先走，等他走後，我把政治處的郭成柱、蔡文福事情都交待完了，人也都送走了以後，才一個人背上一個包袱、一條毯子，走了大約五里路，八、九點鐘就到了縱隊政治部。

這次在哈達鋪，我們一共衹用了兩、三天的時間，就將整個部隊的整編工作完成了。

二十二、到二團任俱樂部主任

到縱隊政治部後，政治部主任朱瑞直接找我談話。他告訴我，領導決定我的工作是到縱隊部的無綫電大隊去當政委。我表示自己沒有當過政委，問他無綫電大隊有多大。他說不大，一共十七個人，但工作很重要。我說："十七個人的政委不好當，我當不了。搞電臺工作的都有技術，我也不懂，我一直都沒有搞過電臺工作，怕搞不好。"

朱瑞說："是要你去當政治委員，你還不去呀！你看別的單位都不設政委，衹有團裏、師裏、軍團才設政委，這證明無綫電大隊是個很重要的單位。"

我說："再重要也是在機關裏，不能打仗，沒有仗打，打起仗來我們還得在後頭。"

朱瑞大概沒想到我不願意幹，就跟我說："我很重視你，才叫你幹這個，連這個你也不去呀？"

我表示願意在團裏工作，幹什麼都行，就是當指導員也行。朱瑞聽了我的意見，當即和縱隊政治部的宣傳部長商量了一下，決定把二團的俱樂部主任調回縱隊政治部，要我去二團接替他的

工作。我馬上答應説很好。事情就這樣決定了。縱隊政治部當即下了個命令，任命我爲紅軍抗日先遣隊陝甘支隊一縱隊二團俱樂部主任。命令是由縱隊政委聶榮臻、政治部主任朱瑞簽署的。當時對部隊政治幹部的任命，司令員一般是不簽署的。

我馬上動身，十點多鐘就來到了二團，見到了二團政委鄧華。鄧華原來是紅二十二軍六十六師的政委，編入紅一軍團後，就一直在二團當政委。鄧華是學生出身，文化程度比我們高，年齡比我們大，不僅領導能力强，而且待部下很寬厚，能在他領導下工作，我很高興。我還見到了二團的總支書記王道邦，以及青年幹事、民運幹事、特派員、技術書記等人，他們都表示歡迎我到二團來工作。

當天下午，鄧華就召集政治處的同志開會，布置了下列幾項工作：

第一、抓緊時間，做好調查研究工作。主要是根據黨的民族政策，調查了解回族同胞的風俗習慣，以便向部隊進行教育，從而達到團結廣大回族群衆的目的。

第二、幫助部隊做好防止減員的工作。部隊整編以後，人員已經比較充實，而且第二天就要出發，繼續北上。我們要防止逃亡，防止開小差，同時要防止掉隊。因病掉隊落伍的，可以找人幫助抬、也可以找車幫助推，無論如何要收容上來。各連的連長、指導員、尤其是指導員，一定要竭盡全力，減少本單位的減員。

第三、部隊到哪裏，就要把宣傳工作做到哪裏。西北的群衆過去從來没有見到過紅軍，因此要向他們多宣傳紅軍北上抗日的正確性，尤其要以不拉伕、不擾民、買賣公平和不打回民土豪等實際行動，來向群衆進行宣傳。一定要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是我們的“傳家寶”。

第四、繼續調查漢族的土豪劣紳，并徵集他們的物資錢財。

根據會議的布置，我們在會後分頭訪問了村裏的回民，向他們請教回族的風俗習慣。從他們那裏詳細了解情况後，我們向鄧華作了匯報，并將重要的幾條作爲紀律：

一、每個回民村子裏都有清真寺，這是回民做禮拜的地方，部隊不能隨便進去，宿營更不準住清真寺。清真寺裏有阿訇，是“管轄”回族人民的，要對阿訇表示尊重。

二、對回民不能講“猪”這個字，這是很重要的一條，因爲回民不養猪，不吃猪肉，也不吃猪油。至于爲什麽這樣，我們就不知道了。

三、回族婦女都比較嚴肅，部隊指戰員不要隨便和她們説話，特别是對年輕婦女，更不要隨便接觸。

這幾條紀律規定下來後，鄧華要我們分頭去到各營、連作了傳達。要求部隊除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外，一定要特别注意回民政策。

二十三、繼續北上

部隊從哈達鋪繼續北上後，我們又開始像以前一樣，每到一個村子宿營後，如果時間還早，我們就召開群衆大會，向群衆進行宣傳；如果天色已晚，就發動幹部、戰士在住宿的群衆家裏開展宣傳工作。

有了群衆，我們再也不會像前一階段那樣挨餓了。可部隊却又碰到了一個怎麽吃飯的問題。我們都是南方人，部隊在南方一直都是吃大米。到了藏族地區，雖説吃的是青稞麥，但我們也是把青稞麥粒像大米一樣煮着來吃，面粉很少，因爲來不及磨。現在到了北方地區，也就是在到達哈達鋪以後，我們有了面粉，但各部隊的炊事員都不知道怎麽做，既不懂得發面，也不會擀面條，祇好用水一和，做成一個個湯圓，結果把這些面團放到鍋裏一煮，就都成了面糊糊。大家當然覺得不好吃，吃了以後都説：“這個面怎麽這樣難吃呀！”

後來一問老百姓，才知道要把面做成烙餅、面疙瘩、擀成面

條，或是先把面發起來做成饅頭，這樣才好吃。當時紅軍的政治工作是很細致的。我們當即與供給處的人一起，召集各連指導員和司務長開會，并請來老百姓當教員，終于在一、兩天時間裏解决了吃飯問題。

部隊一路北上，衹幾天就通過了通渭城。聽説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曾在通渭召開了一個大規模的宣傳大會，可惜我們沒有能够參加。在直羅鎮戰鬥之前，我一直都沒見到過毛澤東。

那段時間裏，部隊都是正常行軍，日行夜宿，每天行軍大約六十到八十里。一般每走十里路，就有一次約五至十分鐘的小休息；走到三十里路左右時，則是一次大休息，吃午飯。每到休息時間，我們這些政治工作人員就對部隊講形勢、講任務，進行北上抗日的宣傳教育，同時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進行民族政策的教育，另外還利用空隙時間教戰士識字、唱歌，活躍部隊情緒。軍事工作人員則抓緊時間對部隊進行打騎兵的教育。

先前我們在毛兒蓋準備過草地時，爲防備藏族騎兵來襲，也曾在部隊中進行過打騎兵的教育和訓練。由于馬在草原上跑得快，戰士們看見騎兵來了，心裏都有些慌，結果槍打不準，被騎兵衝上來把我們的部隊給打散了。後來我們研究了一種對付騎兵的戰術，采取我們在江西打大刀會時的辦法，集中火力來打敵人的騎兵。同時教育戰士，遇到騎兵一定要沉着冷静，衹要我們沉着，瞄準了他，他在馬上就更好打。爲此，紅一師政治部宣傳科長彭加倫還專門編了一首歌，讓各個連隊來學唱。歌詞大意是：“敵人的騎兵不可怕，沉着敏捷來打他，目標又大又好打，排子槍齊放一起射殺。”這首歌對部隊的情緒鼓舞很大，使戰士們對打騎兵有了信心。不過，在以後過草地時，除六團外，其它部隊都沒有遇到過藏族騎兵。

部隊經通渭後繼續前進，快到静寧附近時，過了一條河，名叫葫蘆河，是洮河的支流。河水不深，衹及膝蓋，但石頭很多。鑒于以前過河時曾有人被河水衝走的教訓，這次過河，我們格外小心。當時鄧華提了一個口號，叫“摸着石頭過河”，意思就是要我們扶着河底的石頭走路，這樣就不會被河水衝走了。以後鄧華又向我們解釋説，這是一句成語，意思是説，我們每走一步，都要調查研究，了解情況，制定好對策，然後再腳踏實地往前走。這樣，我們一步接着一步地往前走，事情就會辦得比較穩妥一些。

我們過葫蘆河時，已是深秋，河裏的水又是從雪山上下來的，冰冷刺骨。那天，我在涉水過河時，一不小心，腿在石頭上碰了個大口子，立即就嘩嘩地流血。上岸後我找到衛生員，弄點碘酒擦了擦，簡單包扎一下。但以後傷口竟潰爛起來，一直到陝北都沒有好。後來還是鄧華告訴我，弄點辣椒擦一擦試試，我就找了點辣椒，用棍子擀成面，糊在傷口上。嘿，還真管用！不到一個星期，傷口就長好了。

二十四、部隊進入寧夏

過了静寧，就是六盤山。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我們翻過六盤山，進入了寧夏的古原縣。就在這時，二團的總支書記王道邦因病調走了，縱隊政治部命令由我接任王道邦的職務。這樣，我就由俱樂部主任改任總支書記，負責主持二團政治處的工作。

過了古原，前面都是一道一道的溝，是長期雨水衝刷而形成的，當地的老百姓叫“川”。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是沿着這樣的溝往前走。一天，我們來到了三岔鎮。一縱隊縱隊部住鎮上，我們住在附近的村子裏。那天宿營比較早，大約是下午三點左右。部隊住下來以後，縱隊部偵察連連長梁興初帶着一個排到前面去偵察。梁興初原是紅二師五團的一個營長，哈達鋪整編時降級使用，調到大約有一百多人的縱隊偵察連當了連長。每天行軍，他都帶着一個騎兵排走在隊伍的最前面，去偵察敵情和地形。

這天，他突然發現在離縱隊部不遠的地方，有一個懸崖。懸

崖上有幾個窑洞，每個窑洞都很大，一個窑洞就可住百把人，但衹有一條路可以通到上面。他還發現窑洞裏住有隊伍。經過調查，知道藏在窑洞裏的是國民黨地方保安團，連同團總等頭目一起，共約一百二十多人，幾十條槍，還有駁殼槍。這些地方保安團見我們來了以後，來不及逃跑，就跑到窑洞裏臨時躲藏起來。如果我們發現不了，等我們過去，他們再出來。

梁興初立即把這一情況報告了縱隊部。縱隊部看我們二團就在那些窑洞的附近，當即下達命令要二團去協助梁興初解決這部分敵人。鄧華要我帶一個連去執行這一任務。

我帶着部隊與梁興初會合後，與他共同商量，决定先派部隊把敵人包圍起來，然後進行宣傳喊話，告訴他們衹要繳了械，就可以把人放走，争取以和平談判的方式要他們繳械。因爲上下衹有一條路，他們想跑也跑不了。

我們把這個方案報告了林彪，他表示同意。我和梁興初當即找了政治處的幾個宣傳員，還找了當地的幾個老百姓，一齊把我們的話傳上去。最初他們死不開門，後來我們又喊話説，你們除了投降，是没有别的出路的，如果你們不繳槍，我們就開炮了，我們一炮打進去，你們就全都完了。其實當時我們没有炮，這叫"兵不厭詐"。這下他們答話了，要我們再等一下，讓他們考慮考慮，商量商量。我們説，好，但要快，限他們一小時，天黑前如果不投降，就要堅决消滅他們。我們還再一次保證説，衹要他們繳了槍，就保證他們的生命財産安全，大家各走各的路，不然一到天黑，我們就開炮了。很快，他們就答應了投降，并打開了窑洞的大門。

看到他們打開窑洞的門，梁興初和我帶着十幾個人就上去了。爲防止他們搗鬼，我們在下面架起了機槍。他們放下了槍，然後一個接着一個地下去了。就這樣，一百二十多人全部繳了械，一共繳了六、七十支槍，其中有駁殼槍，花機關槍（衝鋒槍）。這些人，包括團總在内，當場統統都放走了。那些團丁大部是胡子兵，年輕的不多。

在繳來的槍中，有一支很好的駁殼槍，梁興初看到後拿起來用上一頂，想試試槍好不好，不想"叭"地一聲槍響了，把他的手打了個窟窿，鮮血直流，把手打殘廢了。當時是大意了，没有注意到那支槍是上了頂膛子彈的。手一頂槍口，當然就響了。以後縱隊衛生部派人來把梁興初的傷口包扎好了。這是我們離開哈達鋪以後的第一次戰鬥，也是一次没有打槍的戰鬥。

從三岔鎮出發，走了三天，就聽説前面紅一團在青石嘴消滅了馬鴻逵的一個騎兵團。因爲敵人没有想到紅軍竟然來得如此迅速，没有準備，才在一團的突然襲擊下很快被消滅了。一團繳獲了不少的馬和槍，還抓了不少俘虜。我們這時也提高了警惕，防備"馬家軍"騎兵隨時可能的襲擾。同時我們打騎兵的信心增强了，覺得打騎兵并不困難，騎兵也并不可怕。但是我們二團在北上的途中，一直没有和"馬家軍"的騎兵遭遇上。

二十五、到達陝北根據地



紅軍長征後在陝北根據地

在繼續前進兩、三天以後，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我們終于到達陝北的吴起鎮，勝利完成了艱難一年的長征，完成了紅軍這次艱苦卓絶的戰略大轉移。

吴起鎮是個小鎮子，地處黄土高原，石頭較少，鎮上大都是用土磚砌起來的房子。另外，還有一些窑洞，街上基本上没有什麽人，也没有賣東西的，但却看到了墻上

寫有“紅軍勝利萬歲”、“共産黨萬歲”、“蘇維埃萬歲”等標語。看到這些標語，我們不禁喜泪交加，我們明白終于到達了陝北根據地，即將與陝北紅軍會師。雖説吴起鎮祇是根據地的邊緣，是一個“赤”“白”交界、你來我往的地區，到處都是斷垣殘壁，人烟稀少，但當時給我們的感覺却是：我們終于到家了！就在這塊中華民族發祥的土地上，我們又找到了自己的家！

經過吴起鎮，我們來到二道川住下，準備在那裏休息幾天再往前走。就在這時，“馬家軍”約四、五個團的騎兵隊伍，已尾追我們到達了頭道川，并在那裏襲擊了我們的後續部隊，抓走了我們的一些人。支隊領導趕緊組織部隊，準備進行反擊。

我們二團的部隊首先趕到陣地。上級就命令我們沿梁上進入頭道川，堵截敵人，掩護整個部隊進入根據地。騎兵在山上行動不便，祇能沿着溝跑，所以我們居高臨下，守住了陣地。

之後，二團的部隊往前去了，我與鄧華在山梁上用望遠鏡觀察敵人的動静。一股敵人突然從後面摸了上來，等我們發現這個情況時，他們已經上了山梁。我們的身邊已没有了自己的部隊，祇有幾個警衛員和通訊員，想從容撤走都來不及了。我們拔腿就跑，一連翻過兩個川，并在兩個山梁之間來回奔跑，終于從敵人的間隙之間衝了出來。幸虧當時我們年輕，跑得快，而騎兵在山上又無用武之地。接着，我們的部隊很快就把敵人擋住了。鄧華的一個叫劉家才的警衛員，把一支二十響的駁殼槍丢給了人家。回來後鄧華處罰了他，把他調離了團部，但整個部隊没有受到什麽其它的損失。

由于尾隨在後面的這些“馬家軍”對我們的威脅越來越大，在中共中央機關和支隊部都到達了吴起鎮以後，毛澤東下决心要砍掉這條尾巴。十月二十日，陝甘支隊一縱隊的一團、二團、四團、五團在毛澤東、彭德懷的直接指揮下，先將馬家軍的四個騎兵團誘入洛河河谷地帶，我們一陣猛烈攻擊，就將敵人打得落荒而逃。經此一戰，“馬家軍”的騎兵隊伍就退回了甘肅，從此再也不敢向陝北進犯了。

這一仗，我們一縱隊共俘獲“馬家軍”三、四百人，還得到了四、五百匹馬和幾百條槍，僅我們二團就繳獲了一百多支槍和上百匹馬。我們團長、政委等團裏的主要領導和各營營長都換上了好馬。

戰鬥結束後，毛澤東寫了一首詩來表揚彭德懷：“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横馳奔。誰敢横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

打完這一仗，部隊稍事休整，就沿着洛河東岸繼續向東南前進。路經保安西部時，看到洛河西岸山上有個寨子，駐有國民黨地方保安團好幾百人。這個寨子就像江西寧都的翠微峰一樣，是國民黨長期留在陝北根據地的一個據點。由于這個寨子山勢險要，易守難攻，因此陝北紅軍一直没能把寨子裏的敵人消滅掉。我們路經洛河東岸時，縱隊部通知我們先不要管它，因此我們也没有去動那個山寨。

部隊又繼續往前走了五、六天，來到了套洞地區。部隊奉命在這裏停下來進行休整。這裏已經是陝北根據地了，人家也較多，再也不愁没有糧食吃了。在經歷了兩萬五千里的長征以後，我們到這時才更加感受到，祇要有了根據地，什麽都能有辦法。

通過介紹我們得知，在一九三四年，以劉志丹爲司令員，謝子長、高崗爲政委的紅二十六軍創建了這個陝北根據地，包括了三十個縣的全部或部分地區。一九三五年五月，紅二十六軍與紅二十七軍在陝北的李家岔會師，劉志丹任前敵總指揮。九月，紅二十五軍在徐海東、程子華的率領下，自豫西來到陝西安定與陝北紅軍會合。不久紅二十五軍與紅二十六、紅二十七軍組成紅十五軍團，由徐海東任司令員，劉志丹任副司令員，程子華任政委，高崗任政治部主任。據説毛澤東是在哈達鋪的郵局找到國民黨的一些舊報紙，才從報紙上知道陝北有一大片蘇維埃根據地，而且劉志丹和徐海東他們都在那裏，這才下决心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來到陝北的。

不過，當時我們在下面的同志并没有見到十五軍團的同志，因爲他們住在洛川的那一邊，相隔還比較遠。祇是領導同志之間

保持着接觸。

在套洞地區休整時，上級給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第一、我們已經整整走了一年，歷經十一個省，没有休息，部隊相當疲勞，因此第一個任務就是好好休整，恢復體力。第二、加緊整訓，增强政治、軍事素質，提高軍事技術，提高政治覺悟，準備同陝北紅十五軍團共同迎接新的戰鬥，粉碎敵人新的"圍剿"。第三、調查了解陝北人民的風俗習慣，尊重他們，愛護他們，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陝北根據地扎下根來，同紅十五軍團一起鞏固和發展陝北根據地，使之成爲全國抗日的前進基地。第四、向紅十五軍團學習，發展和鞏固兄弟部隊之間的團結友誼，搞好和他們的關系，協同作戰。第五、當時蔣介石正在部署對陝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要準備迎接新的戰鬥，争取反"圍剿"鬥争的勝利。

另外在休整期間，我們還進行了一項重要工作，整編部隊。根據軍委命令，陝甘支隊的一縱隊和三縱隊（即原紅一方面軍的一軍團和三軍團）合編爲中央紅軍一軍團，原一縱隊縱隊部和三縱隊縱隊部的一部分合并爲一軍團軍團部。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副軍團長陳光，參謀長左權，政治部主任朱瑞，政治部副主任羅榮桓。軍團下面恢復師的建制，由原來一縱隊的一團和三縱隊的十三團，加上新組建的三團編爲紅一師，師長陳賡，政委楊成武，副師長楊得志，參謀長耿彪，政治部主任譚政。原一縱隊的二團、四團、五團編爲紅二師，師長劉亞樓，政委蕭華，副師長李天佑，參謀長鐘學高，政治部主任鄧華。原三縱隊的十團、十一團和十二團，組建成爲紅四師，好像師長由陳光兼，政委彭雪楓，這個我記不太清楚了。

我當時的名字還是叫吳文玉，被任命爲紅二師二團的政委，接替了鄧華的工作。團長是李英華，參謀長是胡發堅。鄧華被調任紅二師政治部主任。部隊整編後，每個團都有一千多人。如我們二團整編後有七個步兵連、一個重機槍連和一個警衛排。其它團的兵力也和我們差不多，有的還更多一點。

在軍事訓練方面，當時紅一軍團教育科長陳奇涵和副科長孫毅專門來我們師坐鎮幫助。他們在軍事訓練上很有經驗，天天從班教練、排教練、連教練，一直到軍容、風紀等各個方面，對部隊進行全面訓練。這是我們自離開江西以來，第一次進行這樣的正規訓練，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同時，我們對部隊還進行了政治教育。重點是總結兩萬五千里長征的經驗，使大家理解紅軍長征的偉大意義。目的是讓大家明白，在經歷了長征這一重大考驗以後，我們在任何艱難險阻面前都將無所畏懼。

陝北根據地的群衆對我們非常熱情，每到一個地方，他們都積極給我們騰房子，打掃衛生，幫我們燒水、做飯。行軍時，他們主動給我們帶路，幫我們挑擔子，并牽着驢子、推着小車幫我們送東西。傷病員也有了寄托的地方。大家都非常感動。我們隊伍一到駐地，地方政府就爲我們準備好了糧草。祇要頭天同當地村長聯系好，隊伍一出發，帶路的人和幫助運東西的馬、車就都來了。過去我們是一邊行軍一邊開展擴兵工作，現在則由地方政府負責動員補充兵源。總而言之，到了陝北後，我們許多事情都可以依靠有關組織和地方政府去搞。我們逐漸同陝北人民真正打成了一片，軍民親如一家。

陝北人民做的這一切，也促使我們更加尊重地方政府，愛護人民群衆。經過調查我們了解到，陝北人民的風俗習慣有一些和南方不一樣。比如說對商店主人的稱呼，在南方我們一般尊稱人家爲老板或老板娘，但在陝北這樣叫就不行，因爲這裏祇有開妓院的人，才稱之爲老板，對別的買賣人應當尊稱爲掌櫃。再有，我們在南方到了宿營地，就下人家的門板，對人説，借個板子睡睡覺。但在北方這樣就不行，一説這話，一些年輕婦女就都跑了，會以爲你要對她有什麼不規矩的行爲呢！還有，陝北窑洞的門上都吊着一個鈴，你要進去，就要先拉響這個鈴。雖然他們窑洞的門都是敞開的，可如果你不拉響那個鈴，不經許可就跑到裏面去，人家會不高興。另外，陝北的窗户紙都是糊在外面的，這個

紙不能隨便碰破，碰破了他也會不高興。

另外，陝北地區水源貧乏，没有水井，人們吃的大都是河裏的水。他們的窑洞大都建在山沿上，但水在溝裏。挑水就要從沿上下到溝裏去，或是人挑，或是用驢子馱，這一上一下，要走好幾里路，很辛苦。了解到這些風俗習慣之後，我們就及時對部隊進行教育，群衆對我們好，我們就應當更加愛護根據地的人民群衆。我們就讓大家多幫助老百姓挑水，每天都要注意把他們的水缸挑得滿滿的。

這個時期，部隊的政治機關發動廣大指戰員做了大量的群衆工作，宣傳黨中央，宣傳中央紅軍，宣傳長征的勝利，宣傳發展和鞏固陝北根據地的意義。部隊還經常派人到群衆中去檢查紀律，徵求群衆對部隊的意見。我們還經常以連爲單位與各個村子開聯歡會，戰士們自己演點小節目，并與群衆一起搞活動，做游戲，打籃球。地方的青年學生也不時跑到部隊來打籃球。可以説，軍民之間真正是魚水情深，關系十分融洽。

有了根據地，糧食、蔬菜、肉類等都有根據地群衆供應，使得部隊的生活比長征時好得多。戰士們吃得飽、睡得好，晚上睡覺，白天訓練，體力逐漸得到了恢復。另外，部隊也得到了充實。大家都情緒高漲，朝氣蓬勃，信心百倍。

不久，冬季到了。由于部隊基本上都是南方人，一開始對北方的冬天睡熱炕不大習慣，因爲在南方都睡床。不過慢慢地也適應了。長征路上，大家穿得都很單薄，這時候上級給我們每人發了一套棉衣，布是陝北當地土制的，裏面是羊毛，没有經過硝制處理，一穿毛就跑到外面來了。盡管這樣，大家還是感到非常温暖。團以上幹部還每人發了一件羊皮大衣，也是毛茸茸的。此外，每人還發了一雙鞋子，没有被子的也補發了被子，衹是襯衣褲没有解决，因爲一時趕制不及。總之，所有一切，都比長征路上好得太多了。

長征結束了。從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們渡過江西的于都河開始，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到達吳起鎮，我們整整走了一

里。我們先後經過了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南、貴州、雲南、四川、西康（建國後撤銷）、甘肅和陝西十一個省。近年來有文章說，紅軍長征共經過了十二個省，因爲在青海也發現了紅軍經過時所寫的標語，但那可能是紅四方面軍所寫的。紅軍行程兩萬五千里，創造了世界戰爭史上的一個奇迹。

我們長征到達陝北後，一個同志用原有的曲子填上新詞，創作了一首歌。這首歌實際上是對紅一方面軍整個長征的總結，因爲各個方面軍所走的路綫各不相同，經過的情况也不盡相同。我忘記了那首歌是紅一軍團政治部的什麽人寫的了，但由于它的曲調比較上口，當時流傳很廣，我們紅一方面軍的同志差不多人人都會唱。記得這首歌的歌詞大意是：中央紅軍勝利反攻，出發自江西。十二月長征，歷經險山和惡水，戰勝白軍與團匪，轉戰十一省，行程兩萬五千里，大小五百餘仗，潰敵四百一十團。英勇的紅色英雄，無堅不摧，終于到達陝北蘇區，會合紅十五軍團，粉碎了敵人三次“圍剿”，勝利向前進！

第四章 戰鬥在陝甘寧邊區

一、直羅鎮戰鬥

我們到達陝北時，中華民族正面臨日益嚴重的亡國危機。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在侵占我國東北之後，正進一步入侵華北。在這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蔣介石却堅持反共，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拒絶對日作戰，説什麽"和平未到絶望時期，絶不放弃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爲此，中共中央發表《爲日本帝國主義吞并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指出"抗日反蔣是全中國民衆救亡圖存的唯一出路"。

然而蔣介石不顧中國共産黨和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加緊部署兵力，準備對陝北根據地發動第三次"圍剿"。

這次"圍剿"，蔣介石以東北軍爲主攻，共兩個軍，五個師，兵分兩路。一路是第六十七軍王以哲率領的第一一七師，沿洛河經黄陵、洛川向富縣北上。另一路則是第五十七軍軍長董英斌親自率領的，由第一〇九師、第一〇六師、第一〇八師和第一一一師組成。這一路，董英斌以一〇九師爲前衛，讓一〇六師、一〇八師、一一一師依次跟進，從甘肅慶陽出發，經合水進入陝甘交界的太白鎮後，沿葫蘆河急速向鄜縣（今富縣）東進。這兩支進攻部隊一個由西向東，一個由南向北，其目的就是要把我們合圍

在洛河和葫蘆河之間的地區。

毛澤東審時度勢，决心在陝西鄜縣的直羅鎮打一個殲滅戰。爲打好這一仗，他親自組織中央紅軍和陝北紅軍十五軍團的戰前準備工作。林彪和徐海東等人則多次實地偵察地形，準備戰場。他們一起研究制定出了具體的作戰方案和計劃，考慮周到細密，對敵人行動了如指掌，整個戰鬥計劃完善無隙，是我們到陝北後最有組織最有準備的一次戰鬥。一切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戰略方針和計劃進行，打得乾脆利落，猶如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在江西龍岡粉碎蔣介石的第一次"圍剿"那樣漂亮的一次殲滅戰，一切都達到預期的目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上旬，我們開始進行戰前政治動員。首先，紅一軍團召開團長政委以上幹部會議，林彪、聶榮臻、左權在會上講了話，對當時的形勢進行了分析，并對紅一軍團的戰鬥任務作了傳達和布置。

第一步就是地形偵察。按照分工，我們紅一軍團主要看的是葫蘆河以北的梁上地形，而紅十五軍團則是在河的南邊梁上偵察。軍團長林彪率領各師師長及各團團長着重偵察了直羅鎮至黑水寺及和尚塬一帶的地形情況，把每一個山坡、小河、水溝、樹林、村莊都偵察到了，大小道路也搞得一清二楚。林彪一邊看地形，一邊對部隊的行動任務作了具體部署，詳細規定了各部隊隱蔽、伏擊和進攻的出發點，明確了攻擊目標。

看完地形，團長李英華回來告訴我，説那裏的地形好得很。從黑水寺到直羅鎮之間是一條大川，最寬的地方兩邊相距一至二里，最窄的地方僅五、六百米。川中有條葫蘆河，河水不深，已經結了冰。沿川邊修築有一條公路，公路的兩邊是黄土高山，山上草多樹多，很適宜隱蔽和集結部隊。敵人如果沿着這個川的公路行進，就很好打。我們可以在那裏以逸待勞，誘敵深入，等於是做好了一個口袋讓敵人往裏鑽。

李英華還説，林彪和劉亞樓告訴他，陝北游擊隊已開始在黑水寺地區進行假阻擊、真誘敵的行動。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

還準備派一個主力部隊前去，以引誘敵人進入我們預定的合圍地區。引誘的辦法就是，如果敵人不前進，我們就主動襲擊他們，等敵人一靠近，我們就馬上退却。這樣邊打邊退，一直退到直羅鎮爲止。這是我們過去經常運用的誘敵深入的策略。

他還告訴我，這次戰鬥準備兩面夾擊敵人。我們紅一軍團由毛澤東親自指揮，埋伏在葫蘆河以北的山上，紅十五軍團由彭德懷指揮，埋伏在葫蘆河以南的山梁上，等敵人進到直羅鎮後，我們從南北兩面同時發動攻擊，把敵人消滅在直羅鎮的川中。李英華最後强調說，這是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等人的集體決策，這個戰鬥計劃暫時還不能往下傳達，但要準備好打這一仗的各項工作。

與此同時，我們對敵情作了偵察。南面的敵人有幾個師，北面的敵人有幾個師，哪個師在前面，哪個師在後面，各個師的大致裝備、戰鬥力如何等等都摸得清清楚楚。

最後，大家對民情也作了分析，認爲這次戰場是選在我們根據地的邊緣，背靠陝北根據地，我們是民心所向，保密條件也好。而國民黨軍隊來到這裏則是完全孤立的，等于是聾子和瞎子。所有這些，都是我們打好這一仗的有利條件。

總之，直羅鎮戰鬥，從軍事訓練、後勤安排、形勢教育、政治動員、戰場準備、地形偵察、敵情研究，一直到部隊的行動部署，都事先作了周密細致的安排和部署，是事先組織、準備得最爲充分的一次戰鬥。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二日，即戰鬥開始的前一天，紅二師師長劉亞樓、政委蕭華、政治部主任鄧華、參謀長鐘學高召集各團團長、政委開會，又一次講了敵情、地形情況之後，傳達了軍團給二師的主攻任務是從北面的山上向直羅鎮發起攻擊，二師三個團，包括二團、四團和五團齊頭并進，共同攻擊，是主攻部隊。師裏要求各團一定要做到猛打猛殺，猶如猛虎一般撲向羊群，堅決完成自己的戰鬥任務，堅決消滅敵人。

我們負責打的是東北軍第一〇九師，也就是董英斌率領的那

一路敵軍中最前面的一個師，這個師的師長叫牛元峰。如果我們把這個一〇九師消滅了，後面的三個師很可能就不來了。師裏要求各團把自己所擔負的戰鬥任務，向自己的部隊交待清楚，首先要向共產黨員和排以上的幹部把這次戰鬥的任務、勝利的條件等都講清楚，要大家不怕犧牲，堅決完成任務，多抓俘虜多繳槍。現在傷兵有衛生機關收容，糧草有群衆支援，軍隊已無後顧之憂。因此一定要猛打猛殺，堅決拿下直羅鎮，徹底消滅第一〇九師全部。

從師裏開會回來後，我們立刻召集排以上幹部會議，對師裏的指示精神作了傳達和布置。晚上，李英華、胡發堅和我三人睡在一起，大家議論、商量第二天怎麼出發，怎麼行進。

十月十三日凌晨兩點鐘，我們就起床吃飯，準備出發。出發前，我們又集合全團隊伍進行了一次戰前動員，告訴大家當天作戰的主要任務和應注意的事項。

部隊出發後，團長李英華在前面跟着師部一起前進，以便就近接受任務，而我則帶着部隊走在師直屬隊的後面。部隊戰士穿的都是羊毛棉衣，任何人都不帶包袱毯子，輕裝前進，戰士們走得很快。當我們走了將近五十里路，到達了指定的埋伏地點時，天還没有亮。當時天上正下着小雪，山上一片白雪皚皚，山下川裏都是冰。我們靜靜地待在山頭後面的雪地裏等待命令。根據命令，不準點火，不準抽烟。軍團、師部領導，包括林彪、劉亞樓、蕭華和團長李英華都在山上。

就在我招呼好隊伍之後，李英華跑回來告訴我："毛主席也來了，正在上面和林彪、聶榮臻他們在一起。"我驚訝地說："啊，毛主席也親自來指揮了！"

李英華告訴我，他是專門下來告訴我這個消息的，馬上還要上山去和林彪、聶榮臻、劉亞樓、蕭華他們在一起，等接受完任務後，就回來帶隊伍。

一聽說打仗，大家都很高興，但陝北的冬天實在是太冷，凍得夠嗆，時間一長，大家就凍得直打哆嗦。一方面精神上很興奮，

但另一方面凍得實在不行。坐在隱蔽的地點，身上穿着的棉衣好像根本不管用。衹想起來活動活動。可一走就會有動靜，又不行。最難受的是兩隻腳，冷得生疼。怎麼辦？衹有自己拿手去搓，有的直接用雪來擦腳，結果越擦越熱。後來大家都用雪來擦腳擦手，才總算是保護了我們的手腳没有凍壞。

在待機的過程中，戰士們十分着急，都説要打就快打嘛！天太冷了，這樣乾等着太難受，衝下去算了。我們不斷地做工作，要大家耐心等待命令。同時還明確規定：第一、要注意保密，不要大聲喧嘩；第二、不準點火柴，不準冒火光；第三、每個人都要用白手巾系在左手上，走路時一個跟着一個，不能掉隊。

由于雪下得實在太大，到後來大家的身上都鋪滿了白雪，一個個成了雪人。甚至連左手臂上的白手巾看不見了，衹看見一個個黑影子。好在當時大家都很年輕，加上士氣旺盛，所以這些困難也都讓我們克服了。

總算是等到天放曉，部隊終于開始向半山腰運動，在那裏潛伏下來。天亮以後，東北軍一〇九師的大部隊就慢慢地過來了。擔任誘敵任務的游擊隊噼哩叭啦地這裏打幾槍，那裏打幾槍，一步一步地誘敵前進。當敵人被引到直羅鎮及其附近地區時，指揮部一聲令下，戰鬥打響了。

戰鬥打響後，我們立刻從潛伏的半山腰往下出擊。敵人這時才知中計，看見我們從山上衝下來，拼命向我們反擊，炮彈、子彈紛紛襲來，在我們頭上亂飛。部隊還没有完全展開，突然，一顆子彈擊中了李英華的頭部，他當場犧牲。我立刻把李英華犧牲的消息報告給了劉亞樓，他聽後命令我："現在二團就歸你指揮。"他叫我帶着二團從師部的左邊打下去。我立即帶着一連、三連、四連三個連，并肩直插直羅鎮，并交待其他兩個連和重機槍連迅速跟進。結果四團、五團比我們的動作還快，因爲他們本來就在前面。當時，遍地都是槍炮聲，四面八方一片火海，我在前面指揮隊伍前進，槍彈把我的棉衣打了十幾個洞，萬幸的是，我居然没有負傷。

不一會兒，部隊就攻進了直羅鎮。這個時候，部隊分散開來，衹能靠各連自已發展了。我交給各連連長的任務是，哪裏有敵人，哪裏有槍響，就往哪裏攻。就在這時，林彪派通訊員把我找了回去，通知我説："你們的團長犧牲了，現在派梁興初到你們那裏去當團長，和你一起指揮隊伍。"他當即叫來了梁興初，讓我和梁興初一起返回戰場，指揮二團的戰鬥。梁興初打三岔鎮時負的傷還没有完全好，這時候那隻手還用紗布吊在脖子上。

直羅鎮的敵人被我們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四面包圍，前進不能後退不得，左衝不靈右衝更難。四邊槍火猛烈，打得他們忽而東奔、忽而西逃。到上午九點來鐘，我們發現有一、兩千敵人想向北突圍，想從我們二團陣地的側面突圍。這裏恰恰就是紅一軍團指揮部的所在地，如果讓敵人衝過去，就會直接衝到林彪、聶榮臻的指揮陣地上。

發現敵人的這個突圍企圖後，林彪把我和梁興初叫回去，問我們還有幾個連。我説手頭還有兩個步兵連、一個重機槍連。林彪説："那好，以你們二團爲主，從我們這個指揮陣地的右側打下去，要快，馬上行動，把這兩千人解决掉。如果人不够，四團胡炳雲的這個連還在這裏，要他們從左側打下去。這個連統一由你們二團指揮。"接着，他要我們把輕、重機槍全部架起來，聽軍團部的號令，我們也直接歸他指揮，叫我們衝就衝。

結果軍團部一吹號，二團的兩個連加一個重機槍連，再加四團的一個連一齊開火、衝鋒，一下子就把這兩千人全部消滅了。這是我第一次直接在林彪指揮下進行的戰鬥。

消滅了這批企圖突圍的敵人之後不久，圍殲東北軍一〇九師的戰鬥也結束了。這時天已放晴，太陽出來，照得身上也比較暖和起來。這次戰鬥從開始到結束，大概衹用了個把小時。

我們在直羅鎮打的這一仗，全殲了東北軍牛元峰的一〇九師，繳獲的騾馬成群，槍炮成堆，還有很多其它武器、輜重。僅我們二團就俘獲了四百多人，繳獲了二十多挺輕機槍、四門迫擊炮、一百多匹馬和數十輛大車。直羅鎮戰鬥是我們到達陝北後第

一個大勝仗。

戰鬥結束後，梁興初和我先到軍團部，去向林彪、聶榮臻作了匯報。之後，我們集合好全團隊伍，列隊向原先的駐地走去。所抓的四百多俘虜，則由政治處的人帶着一個連專門負責押送。

走到後面高山上，我們又看見了林彪、聶榮臻。在他們的身邊，還站着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看到二團的隊伍來了，毛澤東、周恩來、林彪、聶榮臻都給我們鼓掌。我和團長梁興初、參謀長胡發堅向他們敬了個禮。林彪説："已向主席報告了，你們打得很好。"

因爲部隊正在行進，没有時間多説，毛澤東衹説："祝賀你們！"周恩來也説："你們立功了！"説完，毛澤東、周恩來又對我們微笑致意。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毛澤東，衹覺得心裏有一種説不出來的高興。

下午走了四、五十里路，我們回到了原駐地。到這時，我們差不多已經一整天没有吃飯了。可等飯弄好了，我和團裏的幾個人又都吃不下去，因爲團長李英華犧牲了，大家的心裏都感到很難過。我也没有吃晚飯。見我們這樣，梁興初就勸慰大家，説："飯還是要吃的呀！"可我還是無論如何也吃不下去。

梁興初是光杆一人來到二團的，什麽人也没有帶，連個警衛員也没有。我就給他選派了個警衛員，負責照顧他的生活。

當晚，我們剛準備睡覺，突然劉亞樓、肖華又來了命令，要我們繼續去追擊敵人，出發時間規定爲次日凌晨一點。我們當即通知各連趕緊吃飯睡覺，抓緊時間休息一會兒，準備再出發。

那天整天都在下雪，部隊出發時雪下得更大。我們一邊走，天上一邊下雪，路上很不好走。好在大家都是輕裝，全部行裝都留在駐地，隨身衹帶了槍和子彈。我們一直往黑水寺追擊，四團、五團在前面，我們二團在師部後面跟進。

到中午十二點左右，我們追到太白，包圍了東北軍一〇六師的一個團。不久戰鬥打響，劉亞樓命令二團從正面攻擊，梁興初和我即率領全團向敵人猛攻。很快，我們就在太白中消滅了東北

軍的這個團。我們二團又俘獲了幾百人，繳了幾百條槍。

這時，前來參加"圍剿"的敵人全綫崩潰，向慶陽退却。毛澤東和軍團部命令我們停止追擊，回到原地，總結戰鬥經驗。與此同時，派人去打掃戰場，搜集槍支彈藥，并掩埋尸體。

整個直羅鎮戰鬥，我們一共打了兩仗。頭一天，敵一〇九師全部被消滅，師長牛元峰被活捉。第二天追擊，又消滅敵一〇六師的一個團。

部隊回來後，清查我方的傷亡，得知兩次戰鬥我們二團傷一百三十多、亡八十多，共傷亡二百多人。最大的損失還是團長李英華光榮犧牲了。我們全團一起開了個簡單的追悼會，大家哭着向李英華默哀五分鐘。追悼會上，我和胡發堅講了話，對李英華的犧牲表示沉痛哀悼。

爲祝賀直羅鎮戰鬥的勝利，我們召開了慶祝會。慶祝會上，老百姓送來了很多的猪和羊，于是大家又一起會餐慶祝勝利。後勤供給部門忙着給各個連隊補充槍支彈藥、補充服裝鞋襪，各單位也在忙着總結戰鬥經驗，寫"戰鬥詳報"。

我們還補充了不少的俘虜兵。這些俘虜大多是東北人，都比較年輕，多在二十歲左右。日軍侵占東北後，他們失去了家鄉，從關外流亡到關内，因此對日本侵略軍十分痛恨。對他們一宣傳抗日，絶大多數人就自願參加了紅軍。也有些軍官混在士兵之中，我們清查出來後就把他們往上送。

經過這次補充人員、裝備和給養，我們的隊伍更加充實了，裝備也改换了。如我們二團原來衹有近千人，這一補充，一下子就擴大了一千四、五百人，各個連大多都補充到了一百三十多人。

總之，直羅鎮一戰，是我們到陝北後打的第一個大勝仗。這次戰鬥，乾脆徹底地粉碎敵人對陝北根據地第三次"圍剿"，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殲滅戰。在總結直羅鎮戰鬥經驗時，師政委蕭華向我們傳達了軍團部總結的四條勝利原因：一是毛澤東的英明決策指揮；二是有根據地政府和人民支援；三是兩個紅軍軍團緊密

團結，一致執行毛澤東的命令；四是戰場準備充分。

關于直羅鎮戰鬥的重要意義，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總結説："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了，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着陝甘邊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奠基禮。"

打完直羅鎮這一仗以後，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變"，東北軍再也没有向我們發動過進攻。

二、秋林鎮整訓

直羅鎮戰鬥後，部隊就着手準備東渡黄河，經山西奔赴抗日前綫。而在諸多的準備工作裹面，一項重要内容就是進行部隊的軍政整訓。

直羅鎮戰鬥後，部隊稍事休整，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經過五天的正常行軍，轉到了宜川縣秋林鎮以北數十里的地方駐扎。二團一共住了八、九個小村子，團部和重機槍連及其直屬單位一起，住在一個塬上的一排窑洞裹。在這裹，我們開始整訓，并在這裹過了一九三六年的元旦和春節。

這裹是陝北蘇區的邊遠地區，人民群衆都心向我們，地方上的鄉長、村長也都是我們自己人。到了那裹以後，鄉親們聽我們説話都是南方口音，就問我們是不是中央紅軍。我們説，我們是"朱毛紅軍"，從江西出發走了一年，才到了這裹。最近和陝北紅軍一起在直羅鎮打了個大勝仗，消滅了國民黨一〇九師和一〇六師的一個團，還把一〇九師的師長抓獲了。鄉親們一聽，非常高興，熱烈歡迎我們，爲我們騰房子，打掃院子，整理窑洞，有的甚至邀我們同睡一鋪炕，對我們非常熱情。

部隊剛到秋林鎮時，天正下着雪，路上的積雪很多。鄉親們就爲我們掃開了積雪覆蓋的路，然後由鄉長、村長帶頭，用小車把糧食、柴草給我們送到駐地。塬上没有水井，群衆就用驢子到深溝河裹給我們馱來了水。

部隊住下之後，幹部、戰士也積極幫助群衆開路、修路、修窑洞，幫助群衆挑水、打掃場地、幹家務。在上山爲自己打柴的同時，也幫房東打來燒柴。就這樣，我們的幹部、戰士很快就與當地群衆打成了一片，軍民親如一家人，彼此毫無隔閡。那年春節時，我們還請老百姓來一起會餐，一起開個聯歡會，由部隊戰士自己組織小節目演出，大家高高興興地在一起過大年。

我們當時用的錢，都是從軍團供給部和師供給處領來的，是根據地邊區政府出的票子。這種票子是用布而不是紙印成的。那時的東西很便宜，一塊錢就可以買到一、兩隻鷄，三、四斤猪肉。

陝北的老百姓一般不大吃魚，都喜歡吃羊肉，而且吃鷄不吃鷄頭，也不吃鷄肚子裹的東西。老百姓養猪不多，猪肉很少，我們則不同，部隊裹有很多人不喜歡吃羊肉，于是我們就號召部隊吃羊肉。老百姓就來告訴我們羊肉該怎麽做才好吃。按照他們的辦法，做出來的羊肉果然好吃多了。那時猪肉很少，一般都是祇在過年時才吃幾頓猪肉。每當會餐，我們每個班都是一大臉盆羊肉，一大臉盆猪肉，再加上豆腐、土豆等蔬菜，每次大家都吃得很快活。

在秋林鎮駐扎的期間，我們的主要任務是進行部隊整訓。當時，我們主要進行了以下幾項工作：

第一、傳達、學習、宣傳中共中央瓦窑堡會議的決議精神。瓦窑堡會議是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和陝北紅軍會合後最重要的一次會議。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在陝西安定縣的瓦窑堡舉行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和《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説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基本方針和政策。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闡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策略

和方針，說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了黨在統一戰綫中的領導作用，批判了黨内的“左”傾關門主義和急性病，揭露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錯誤政策，揭穿了日本帝國主義在侵占東北後，繼續侵占冀東、侵占熱河、侵占察哈爾，并進一步妄想吞并全中國的狼子野心。他在報告中指出，中華民族目前已處于生死存亡的空前緊急關頭，一定要把國内戰争轉變爲民族解放戰争，停止内戰，一致抗日。他還在軍事上部署，我們要打通北上抗日的道路，鞏固、擴大、發展陝甘寧邊區，在發展中求鞏固，在鞏固中求發展。

瓦窑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報告的精神，首先是在幹部和黨員中進行傳達教育的。紅二師是由師長劉亞樓、政委蕭華、政治部主任鄧華召集全師連以上幹部大會，由他們三人分别傳達瓦窑堡會議的决議和毛澤東的報告。會議開了兩天，然後各團回到自己的駐地，各自組織學習了一個多月，用會議、上課、討論等各種方式，向全體幹部、戰士進行傳達、普遍深入地學習、教育和宣傳。

第二、進行政治形勢教育。一九三五年冬，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漲，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北平“一二九運動”，震撼了全國。在“一二九運動”的鼓舞下，國内的愛國民主人士、知識分子、教授、學生、工人、農民都希望建立一個停止内戰、一致對外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綫。他們紛紛起來反對蔣介石的堅持内戰，不抵抗和向日本投降的政策。他們還提出了“一切愛國同胞、愛國軍人、各黨各派各人民團體聯合起來，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在國内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下，廣大海外僑胞也紛紛熱烈響應，從而形成了中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我們把當時的這一政治形勢，在部隊中進行了普遍的教育。經過教育，部隊團結抗日的情緒更加高漲，階級覺悟、民族覺悟有所提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三、進行軍事訓練。軍事訓練的重點是學習投手榴彈、射擊、刺殺和挖工事四大技術，同時進行戰術訓練。在陝北這個地方，訓練場地有的是。廣大幹部、戰士在冰天雪地裏摸爬滚打，個個精神抖擻，人人不怕冷、不怕苦，充分表現了革命戰士的大無畏精神。

第四、進行紀律、政策的教育。教育的内容包括整頓軍容風紀，嚴格執行群衆紀律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同時進行愛護陝北根據地及愛護陝北人民人力、物力、財力的教育。

第五、熟悉北方地區地形。熟悉北方陝西、山西、甘肅等省的地形，熟悉深溝高塬的特點，以便于行軍作戰。北方地形都差不多，都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嚴重，形成了一個個深溝和高塬。熟悉這些深溝和高塬的特點，對我們在戰術上很好地利用這些地形，充分發揮各種火力，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六、向群衆進行抗日宣傳工作。向群衆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野心，揭露蔣介石、閻錫山的不抵抗主義，宣傳停止内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必要性，宣傳建設好陝甘寧邊區這個全國抗日前進基地的重要意義，宣傳擴大紅軍，建設好民兵、少先隊、赤衛隊，健全婦救會、抗日救國會等各種群衆組織的重要性。

經過兩個多月的整訓，不僅提高了部隊的政治素質，而且使部隊的戰鬥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爲部隊進一步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三、東渡黄河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師裏召集各團的團長、政委開會，劉亞樓、蕭華、鄧華向我們傳達了中央軍委的决定：紅軍準備進軍山西，東渡黄河，依靠陝甘寧根據地，打通北上抗日的路綫，然後再進一步開向冀東，開向熱河、察哈爾，直接對日作戰。當時軍委認爲，我們和東北軍、西北軍有建立統一戰綫的可能，如果成功，我們就没有了後顧之憂，而且紅二、紅四方面軍也極有可

能北上與我們會合。在這種情況下，上級決定部隊東征，并有信心取得勝利。

劉亞樓等人在會上還向我們介紹了當時山西的一些情況。山西是國民黨統治區的薄弱部分，由國民黨地方實力派軍閥閻錫山所控制。一九三○年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大戰後，閻錫山與蔣介石的矛盾一直很深。閻錫山是山西的土皇帝，不準蔣介石的中央軍進駐山西。爲了防備外省力量進入山西，他甚至將山西全省的鐵路采用窄軌制，使外省的火車進入不了山西。

但閻錫山是一個堅决反共分子，本人又同日本有勾結。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他就開始命令自己的部隊，在沿黄河東岸的二十多個縣構築碉堡工事，并調派部隊前去駐守，形成了一道沿黄河構建的封鎖綫，試圖阻擋紅軍東渡黄河，向山西前進。另外，爲了對付共産黨和欺騙、控制群衆，閻錫山在山西搞了一個叫"公道團"的組織，幾乎所有的鄉長、村長都是鄉、村公道團的團長，團員則絶大部分是地主、富農，貧苦民衆很少參加這個組織。他還在山西實行所謂的"土地村公有"制度，土地名義上是歸村裏集體所有，可實際上所有的土地仍然是控制在少數人的手裏。另外，爲了拉攏人心和欺騙群衆，閻錫山還在山西成立了一個叫作"犧牲救國同盟會"的組織，以顯示自己支持抗日。抗日戰争開始以後，這個"犧盟會"爲薄一波等人所改組，成爲一個名副其實的抗日救亡團體。

此外，山西比陝北要富裕，在山西籌糧、籌款、籌物資，可以較好地改善部隊的供給。同時，山西的人口比較稠密，也便于我們開展擴軍工作。另外，閻錫山的部隊裝備很好，衹要我們打了勝仗，還可以改善我們的武器裝備。

師裏要求我們到了山西後，要很好地貫徹執行軍委東渡黄河作戰的戰略意圖，充分發動群衆，揭露閻錫山的欺騙手腕，積極進行抗日宣傳教育，擴大紅軍、壯大抗日救國武裝。會議結束之後，我和梁興初回到團裏，將會議上了解到的情况，向部隊一一作了詳盡的傳達。

不久，師裏又向我們團以上幹部傳達了東渡黄河前的政治形勢和我們的軍事部署，説中央决定：除留原陝北紅軍部隊保衛陝甘寧邊區外，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聯合組成抗日先鋒軍，由彭德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楊尚昆任政治部主任。紅一軍團爲右路縱隊，紅十五軍團爲左路縱隊，兩軍團分别從陝北東渡黄河，挺進山西。

一九三六年一、二月份是中央紅軍到達北方後所過的第一個冬天，陝北天氣很冷，遍地是雪。但三六年的春天比較暖和。爲進軍山西，軍團長林彪先召集紅一軍團的師長、團長等軍事幹部，分别組成若干個小組，與偵察科長及參謀們一起，穿上白羊皮襖，化裝成老百姓，沿着黄河偵察敵情、河情和渡口情况。我們這些政治幹部則留在家裏主持工作。

在陝北，黄河每年冬天都凍成堅冰，一直到次年的早春，老百姓都可以在上面往返行走。可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初春，由于天氣暖和，河面有的地方没有凍實，有的地方結了冰又裂開了。原先想從冰上過河，這樣比較方便，但現在就不行了。于是就趕緊準備第二套方案：準備船隻，選擇多處渡口，準備强渡。

梁興初，劉亞樓跟着林彪沿河偵察，整整搞了兩個星期。從黄河兩岸的溝口開始到五堡縣境的所有河邊都看過了。一路上，他們都住在老百姓家，和老百姓一起吃小米飯、窩窩頭，喝面條湯。每天他們都化裝成陝北農民，身穿便衣棉襖褲，頭扎白布手巾，肩上扛個筐子，手裏拿個小鋤，完全是一副陝北農民的模樣，從各方面觀察敵人。有時候，他們還在晚上偷偷摸過河去，偵察對岸敵人的據點和火力配備，畫上圖形，再回到河這邊來。

梁興初完成沿河偵察任務後回來告訴我，這次偵察地形，是由林彪、左權、劉亞樓等人親自率領的。林彪見到他時，還問他傷好了没有，他回答説還没有完全好。林彪就對他説："那你就一邊工作，一邊養傷吧。"梁興初在三岔鎮負傷後，到這時不過才四個多月，吊在脖子上的繃帶雖然拿走了，但實際上傷口并没有完全愈合。

梁興初接着告訴我，這次偵察跑了七、八十里路，到過延長、延川、吳堡三個縣，發現了閻錫山兵力部署的弱點，他的兵力并不太多，却把所有的道路都堵上了，這就造成了他的兵力過于分散。他還告訴我，林彪已決定二師的强渡點在陝北的溝口鎮。溝口鎮的對岸是山西的三交鎮，有閻錫山的一個團駐守。這個團大約一千多人，因打仗不多，戰鬥力不强，既没有什麽戰鬥經驗，士氣也不高，經常可以看到他們的士兵穿着大衣、背着槍在那裏睡大覺。不過，他們所修築的工事相當堅固，還有幾個很高的碉堡，上面設有　望哨。白天，可以看到不斷地有敵人的部隊在河邊游動，而且對過往行人都要搜身檢查。但我們這邊的河岸高，所以我們的機槍炮火完全可以掩護部隊强渡黄河，攻占三交鎮。另外，沿河戰綫很寬，山西、陝西以黄河爲分界綫的交界處極長，他們防不勝防，也搞不清楚我們究竟準備從哪裏渡河，所以强渡成功的可能性極大。

到了二月下旬，黄河水開始解凍，冰面開始出現裂縫，河水上涌。至此，部隊從冰上過河的可能性已經完全消失。看到這種情况，河對岸的閻錫山部隊思想上開始鬆懈。這是一個有利時機，一軍團總指揮林彪、政委聶榮臻當機立斷，决定立即開始强渡黄河，并指定二師四團、五團兩個團爲先頭部隊。二師師長劉亞樓、政委蕭華按照軍團的决定，命令五團爲主攻部隊，先行渡河，四團跟進，我們二團爲師預備隊，隨時聽命渡河執行任務。

接到命令之後，我們立即向全團進行政治動員，説明東征山西的必要性和有利條件，并强調保守軍事秘密的重要性，要求全體幹部、戰士熟悉地形，記住一切作戰通訊聯絡符號，同時分配渡河船隻，計劃安排每隻渡船上的人數等。另外，積極準備民伕、擔架、糧食和鞋襪等。

一切準備就緒以後，從二月十八日開始，我們開始向北行進。第一天正常行進，白天行軍，晚上宿營。第二天改爲晚上行進，白天宿營，而且不準部隊隨意行動，基本上不到村莊外走動。到第三天半夜時分，部隊來到河溝裏集結待命，就地宿營，不再進

人村莊。

二月二十二日夜裏，部隊接到軍團命令，于次日凌晨開始强渡黄河。二月二十三日凌晨，當黄河西岸邊我們的炮火布置就緒後，五團團長孫振山帶領部隊開始上船强渡，曾國華率領二十四名突擊隊員衝在最前面。對岸的敵人一發現我們開始渡河，就猛烈開火。但很快，我們的炮火就把敵人的火力壓制了下去。

那天，梁興初照例跟隨師指揮部行動，隨時準備接受劉亞樓、蕭華的命令。我帶領隊伍在原地待命。到早晨天快亮的時候，我聽到一片槍炮聲，知道戰鬥已經開始了。半小時以後，梁興初騎着馬跑回來了。他告訴我們，四團、五團已攻入三交鎮，敵人的碉堡已經被占領，很快就要解决戰鬥，師裏要我們立即渡河，準備追擊敵人，打敵人的增援部隊，切斷敵人的退路。

天剛亮，我們全團按原定計劃分批上船，順利渡過河去。這時，我軍已全部突破了敵軍黄河東岸防綫，控制了辛點至三交鎮的各個渡口，控制了河東灘頭陣地，在東岸已建立起了堅固陣地。

閻錫山的獨立第二旅正全綫撤退，拼命向後跑，因此二團上岸後没有集結，就沿着敵人的退路追擊前進。師裏命令我們要馬不停蹄地向關上鎮疾進，截斷關上鎮敵人的退路。四團、五團緊跟在我們後面，也直指關上鎮。

二月二十五日，我們二師會合一師在關上鎮截住了獨立第二旅旅部、第四團全部和一個炮兵連。敵人的這個團大約有一千六、七百人，加上旅部和炮兵連，共有兩千多人。該獨立旅的旅長外號叫“滿天飛”，據説是閻錫山的一員戰將。消滅關上被圍敵人的任務，軍團交由一師和二師的四團、五團負責。交給我們二團的任務，是切斷關上鎮敵人的退路，不讓他們跑掉，同時負責堵截從大麥郊和兑九峪向關上增援的敵軍。

我們過河後就沿着三交鎮繞道前進。那一天，天上下着小雪，北風刮得“呼呼”直響，連路都看不清楚。我們由一個向導帶領，非常隱蔽地在崇山峻嶺中的小道上一路前奔，一直前進到關上以

東十五里路的一個地方才停下來。接着，開始修築工事，準備堵截敵軍。那天晚上，我們一邊修築工事，一邊聽着關上方向的槍聲響了一夜。第二天中午，關上方向的槍聲停了下來，我想可能是那邊已經解決了戰鬥。這時，我們的工事也基本做好，部隊也全部展開了。

下午三點多，閻錫山的增援部隊趕到了。我們一開火，敵人馬上就停止了前進，大概他們已發現關上的敵人已被消滅。梁興初和我立即下令部隊主動出擊，一下包圍了敵人的三個連。没想到我們這一進攻，敵人很快就丟下被圍的三個連，往回逃跑了。四點多鐘，我們全部消滅了被包圍的三個連敵人，結束了戰鬥。這一仗，我們俘虜了敵人兩百多，還繳了兩百多條槍，九挺輕機槍和幾門炮。

戰鬥結束後，師部命令我們繼續追擊，向大麥郊、兑九峪前進。于是，我們又尾隨着撤退的敵人，向前疾進追擊，擴大戰果。沿途三個五個，哩哩啦啦地又抓來了六、七十個掉隊落伍的敵人。就這樣，部隊一路追擊前進，追到半夜，大家又累又餓，實在是跑不動了，這才找了個村子休息一下。前面放出了一個連哨，警戒敵人。部隊就地休息做飯，休息了兩、三個小時，就又開始繼續追擊，一直追到大麥郊附近才停止。這時，一師、二師的部隊都上來了，軍團部也來了。我們二團的負擔減輕了，阻止敵人、追擊敵人的任務完成了。

東渡黄河後的第一仗，一師和二師四團、五團消滅了關上敵人一個團，我們二團在追擊途中也消滅了敵人一個營。初戰告捷，我們取得了東渡黄河後的第一次勝利。

四、兑九峪戰鬥

關上戰鬥後，我們不分晝夜地向前挺進，乘勝擴大戰果，擴大佔領區。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驚恐萬狀。他一面請求蔣介石派軍隊增援，一面把自己能機動的部隊集中起來，編組爲四個縱隊，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開始，分路向我進行反擊，企圖把紅軍趕出山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想繼續打開局面，就必須粉碎閻錫山部隊的反撲。于是，抗日先鋒軍的領導决心集中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的主力，在山西孝義縣兑九峪附近，同閻錫山的軍隊展開一場大决戰。

這時，我們已前進到了吕梁山區。一九三六年三月的山西，天氣多陰雨。山上更是風雪交加，給我們行軍帶來了不少的困難。三月十日凌晨，我們奉命從大麥郊出動，向兑九峪的敵人發起攻擊。天剛亮，我們就同敵人接觸上了。戰鬥一打響，我們便按照既定的部署，集中兩個軍團的主力打垮了敵人的兩個縱隊，在追擊中，又消滅了一部分敵人，俘虜了兩千人左右。但後面增援上來的敵人越來越多。到下午三點鐘的時候，敵人的炮火增強，我們傷亡很大，逐漸變成了同敵人對峙的局面，

兑九峪戰鬥一打響，我們二師的三個團就全部投入了戰鬥。師長劉亞樓、政委蕭華、參謀長鍾學高、政治部主任鄧華等，都在前沿陣地指揮所指揮作戰。戰鬥開始不久，蕭華的左腿就負了傷。警衛員把他背到一個窪地裏，然後用擔架抬下了火綫。連師政治委員都負了傷，可以想見這次戰鬥的激烈程度。

這時，一軍團二師和四師的部隊仍繼續開展進攻。到了下午，我們二團攻到了兑九峪左邊的山腳下。當時天已黄昏，隊伍集結在山腳下，我們攻不上去，敵人在山上也打不到我們。這時，我們接到師裏的命令，要我們立即撤退。

看着近在山上的敵人，我們不願就這麼撤走，于是梁興初和

我決定，先派人偵察一下敵情和地形，搞清山上敵人的情況，再作下一步的打算。經過偵察，發現山上的敵人祇有一個營，大約三百多人，工事也不强。梁興初就同我商量，看來這股敵人好消滅，是不是"抓一把"再走。我表示同意，說："就這樣幹！"

于是，我和梁興初馬上集合隊伍講話，說明了我們的意圖和要求，要求全團同志猛打猛衝，同敵人拼刺刀。之後，我們組織了四個連，其中兩個連由參謀長胡發堅帶領，兩個連由梁興初和我帶着，分左右兩路，趁着天黑山上的敵人看不見，一下子猛摸上去。在重機槍的掩護下，集中兵力，用刺刀、手榴彈向敵人衝鋒刺殺，一下子就把敵人給壓住了。不到半小時，我們就攻進敵碉堡內，把一個營的敵人都給"吃"掉了。我們把俘虜趕下山來，把他們的槍栓下了，還要他們背着。"抓了一把"以後，部隊迅速下山，向後撤退。這一仗我們的傷亡也不小。我們上山參戰的四個連，屬二連的傷亡最大。上山時，八、九十個人幾乎全部打光了，祇剩下了十幾個戰士和幾個没有上戰場的伙夫，連裏的幹部則全都犧牲了。我們盡快把犧牲的同志掩埋了，把傷員抬上，趁着黑夜，拼命往後撤。不久，我們遇到劉亞樓派來的參謀，叫我們撤回到原來出發的地方去。這時師部已經走了，四團、五團也走了，祇剩下我們在後面。

當晚，我們全團回到了大麥郊附近。我和梁興初來到師部，向劉亞樓、鄧華、鐘學高作了匯報，講了打這一仗的情況，我們受到了師部的表揚，都說我們這一仗主動出擊打得很好。劉亞樓還表揚說："你們機動果斷，取得勝利，很好。"

我和梁興初說，看到這個機會很好，就想撈一把，但我們自己的傷亡也很大。聽了我們的話，劉亞樓就說，師裏會把這個情況報告軍團部，請求給我們補充新兵。接着，他給我們介紹說，那天閻錫山出動的不是四、五個團，而是三個步兵師、一個炮兵旅，共十四個團的兵力。由于我軍剛剛過河，還没有站穩腳，加上地形不利、没有群衆援助，要一口"吃"掉十幾個團很困難，因此毛澤東決定撤出戰鬥，改變進攻方向。

匯報完畢後，師部招待我們吃了頓紅燒肉。吃完飯回到團裏，我們馬上召開幹部會議，告訴大家，部隊準備在大麥郊附近休息幾天，補充部隊，恢復建制，換裝，補充彈藥，補充鞋襪衣服等。休息兩天之後，再繼續前進執行新的任務。我們要求各連整理好自己的隊伍，準備歡迎新兵入伍，并做好新兵的訓練教育和團結工作。同時開始清理繳獲的武器。這次戰鬥共繳獲了二百多支"三八式"步槍和十二挺機槍。這些武器準備全部補給二團的新兵。

第二天，軍團部很快就給我們補充來了四百多人，都是跟隨主力部隊前往山西參戰的陝北青年，我們重新組建了二連，從別的連抽調了班排長、正副連長、正副指導員。其他的新兵就分別補充給一連、三連、四連和五連。爲歡迎新戰士，團裏專門召開了一個歡迎大會，給他們發了嶄新的"三八式"步槍和手榴彈，新戰士的情緒都很高。這樣，二團又充實起來了。

兑九峪戰鬥是我們進入山西後打的第二個勝仗，粉碎了閻錫山組織的第一次反擊。連同上一次在關上鎮的勝利，這兩次勝利，鞏固了我們在山西作戰的前進陣地，使閻錫山逼迫紅軍退回黄河西岸的企圖落了空。

兑九峪戰鬥後，爲擴大戰果，擴大我們在山西的占領區，抗日先鋒軍領導決定，整個部隊分爲左、右兩路，分別北上和南下，各自獨立作戰。十五軍團爲左路軍，由大麥郊向東北方向的汾陽、太原前進。一軍團爲右路軍，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戰，相機占領晋南地區。晋南是汾河流域的主要糧産區，河兩岸都是大塊的平原，山很少，是一個比較富裕的地區。

按照命令，我們二師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早晨由大麥郊出發。二師以我們二團爲前衛，師部跟隨二團前進，四團、五團依次在後跟進。這一天，我們前進的目標是霍縣的南關村。南關村是同蒲路上的一個小火車站，師團交給我們的任務，是要占領這個車站。

這天晚上，我們在離南關村大約三十里路的地方宿營，作下

以後，派人前去偵察，結果發現南關村駐有敵人的一個騎兵連，加上其它一些地方隊伍，一共約二百來人。我們報告師部後，劉亞樓當即決定，要二團去占領南關，消滅南關的敵人。

第二天，我們早上七點多鐘出發，十一點鐘到達南關。經過觀察，發現南關村兩面都是高山，一條汾河淌在中間，白雪皚皚的河面上結着冰。按照師部的命令，梁興初和我商量後決定，首先帶領一部分隊伍占領西面的高山，同時要參謀長和當時新派到二團的總支書記，帶領兩個連從左翼繞過汾河，越過鐵路，爬到南關村東面的山上，占領制高點，然後兩面夾擊，把敵人壓在溝裏，消滅在車站中。

結果這個策略完全成功。待東面山上打響了戰鬥，西面山上也開始向下攻擊。兩面一打，敵人馬上就慌亂成一團，不到一個小時，敵人的那個騎兵連全部繳械。這一仗，我們繳獲了七十多匹馬、一百多條槍，俘虜了包括當地官員及車站工作人員在內的一、二百人。除此之外，我們還在車站倉庫裏繳獲了一大批物資。

戰鬥結束後，我們很快把戰鬥經過和戰果報告了師部，并把繳獲的物資派人送給了師供給部。馬和騾子也全部上交給了師部，因爲我們團没有騎兵連，要之無用，我們衹留下了一部分槍支彈藥。

在戰鬥結束後清查部隊人數時，我們突然發現新來的總支書記犧牲了！經過了解，才知道他是在隨三連衝鋒時犧牲的。我現在怎麼也記不起他的名字了，衹記得他當時很年輕，才二十多歲，打仗很勇敢。他是在我們要打仗的當天，才由師政治部派到我們團裏來的，結果剛來到團裏就犧牲了，真是可惜！

這次戰鬥，部隊的傷亡并不大，但是犧牲了一個總支書記，令我們大家都很難過。那天，全團集合爲新到的總支書記犧牲默哀三分鐘，以示追悼。

那天，在戰鬥快結束時，從南面開來了一列火車。我們從江西出發，到這裏爲止，還從來都没有見過火車，結果它轟隆轟隆地開了過來了，就一心想把它打下來。報告給劉亞樓以後，他要我們先不要驚動火車，把隊伍埋伏在山上，待它進到附近時再開槍。没想到火車上的人發現南關村有槍聲，很快就向後倒退回去了。後來知道，這是一列貨車，是開往太原去的。雖然這次没有打成火車，但戰士們看到了鐵路，看到了火車，也得出了火車不可怕的概念。

占領南關村後，師部命令二團休息一天，改調五團爲前衛，四團爲本隊，二團改爲後衛。這樣，剛剛走了兩天，我們就從師的前衛變成了後衛。我們繼續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越往南走，汾河流域就越開闊。我們南下勢如破竹，摧枯拉朽地攻擊前進。五團沿同蒲路一直南下，攻占了新絳、侯馬、曲沃等縣；二團和四團則包圍了臨汾城，并以臨汾爲中心，在臨汾以西和以東地區開展工作。四團在臨汾西南襄陵、古城、汾城等煤礦區的幾十萬工人中開展工作，我們二團則在臨汾以東，包括翼城、浮山、大陽鎮、北王村一帶開展工作。師部駐在臨汾附近的一個小村莊。臨汾城被我們四面包圍着，城裏的敵人不多，不敢出來騷擾，我們也没有去動他。我們的隊伍適當地分散了，休整了下來。

這個時期我們的主要工作任務是：擴大占領區，籌集資財，擴充部隊；做群衆工作，宣傳抗日，揭露閻錫山的罪惡；開展地方工作，建立地方黨委和游擊隊。這些任務都交由部隊來承擔。這樣，部隊由打仗轉入地方工作，大家都感到負擔很重。

要很好地完成任務，首先就要充分做好群衆工作。我們首先進行調查，了解閻錫山這個土皇帝統治山西幾十年的惡行。然後，組成工作組，每天打着紅旗一村一鎮地去向群衆進行宣傳，揭露閻錫山在山西推行軍事防共、政治防共、經濟防共的真實目的，揭露他同蔣介石又勾結又矛盾，在山西推行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一套政策，是意在消滅共産黨，讓日本人占領全中國。同時，我們還特别告訴廣大群衆，閻錫山的“土地村公有”和所謂的“公道團”，都是爲地主豪紳服務的，是欺騙人民的做法，實際上是剥削窮苦人民的種種手段。我們還向廣大群衆宣傳紅軍東進抗日的主張，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宣傳取消苛捐雜

稅、減輕人民負擔的合理要求。經過廣泛宣傳，加上紅軍紀律嚴明、官兵一致、愛護群衆，和我們打土豪、分糧食救濟窮人等實際行動，使群衆對我們越來越了解，廣大貧苦群衆也越來越熱愛和支持紅軍。很快，廣大人民群衆，特別是廣大貧苦群衆就同紅軍親如一家人了。當時，我們占領的廣大地區治安情况良好，群衆晝夜往來無阻，連小偷都見不到一個。閻錫山的隊伍和地方民團組織的政權都被摧垮了，但表面上保甲長還在維持秩序。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進行擴大紅軍的工作。我們找到了一些地下黨員，幫助他們發展地下黨組織，并建立了一些游擊隊和游擊小組。同時，工作組每天打着紅旗外出活動，一面宣傳，一面就進行擴兵。當時，劉亞樓、鄧華對擴兵工作抓得很緊，幾乎天天打電話催報數字。一天，四團在襄陵煤礦一下子擴了二百多，鄧華馬上把這個數字告訴我們，并號召我們三個團展開擴兵競賽。可我們這邊没有襄陵那樣的大煤礦，怎麼辦哪！經過努力，我們二團也擴大了六百多人，其中有一些是上過中學或小學的。我們還擴來了一個山西大學的畢業生，以後送到師政治部當了民運幹事。可以說，我們在山西擴兵很有成績。據統計，東渡黃河以後，一軍團擴充了八千名新戰士。

再就是籌款、籌物資。辦法還和以往一樣，由部隊的政治機關和供給部門共同組織打土豪。抓到地主，就一批一批地罰款，從幾百到幾千不等。同時没收地主家的布匹、糧食和鹽等物資。我們把布匹分給部隊，準備給戰士做單衣。没收的糧食，除留下部隊吃的以外，其餘都分給了當地的貧苦群衆。

我們在晉南地區共分散活動了將近二十天。在這段時間裏，我們不僅在晉南乃至整個山西地區擴大了共產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而且還發展了隊伍，增加了資財。

在我們離開山西的時候，我們一軍團還幫助山西的地下黨組織起一支有七百多人的游擊隊，并派蕭望東任這支游擊隊的支隊長，張國華任政治委員。不過，在紅軍西渡黃河回到陝北後，他們終因敵衆我寡，加之没有根據地，最後没能在山西站住腳，半年後由蕭望東和張國華帶着一批游擊隊的骨幹回到了陝北。

五、回師陝北

在我軍主力分兵南下、北上以後，閻錫山再次請求蔣介石派兵增援，同時加緊集結部隊，準備對紅軍發動反攻。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蔣介石派陳誠到山西擔任總指揮。四月中旬，他又派遣十個師的兵力，分兩路進入山西增援。其中一路五個師自潼關入山西，另一路五個師自正太路西進。與此同時，閻錫山調集了五個師又兩個旅，由晉中南趕來，企圖首先奪取由紅軍控制的各個渡口，封鎖黃河，堵住我們的退路，然後分別圍殲我左、右路軍于黃河以東地區。爲配合這一行動，蔣介石還强令在陝西的東北軍和西北軍向延長、延川出動，襲擊我軍後方。這樣，我們留在陝北的部隊，兵力顯得過于單薄，難以抵擋敵人的進攻。在這種情况下，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決定，爲保存抗日力量，避免與優勢敵人進行決戰，紅軍回師，逐步收攏兵力，西渡黃河，撤回陝北根據地，以徹底粉碎蔣介石"圍剿"陝北根據地的計劃。

四月下旬，我們二團奉命經臨汾、蒲縣、午城、大寧往西北轉移，逐步向十五軍團靠攏。這時，國民黨軍第二十五師已進抵晉南，而且占領了大寧縣城，正向午城前進。

四月二十八日，正當我們向西北轉移的時候，走在前面的五團同國民黨軍第二十五師關麟徵的隊伍遭遇，雙方隨即對峙起來了。我們二團、四團和師部迅速繞過午城，到了午城以西。這時軍團部給二師下的命令是，要堅決把關麟徵的隊伍堵住，不讓它再往前進，限期是一個星期，以掩護整個一軍團以至整個抗日先鋒支隊安全西渡黃河。

開始三天，是五團在那裏抗擊敵人，我們在後面待命。山西

的地形很特殊。由于山西地處黃土高原，到處都是因雨水衝刷而形成的高地和溝壑。像陝北一樣，山西的高地也叫塬，這種塬大都是四邊陡峭、下有深溝、頂上平坦，塬與塬之間衹有很窄的一塊地方相聯，名曰“腰險”，是個要隘，衹要守住了這塊地方，敵人就過不來，要想翻溝上塬也很困難。因此一開始五團守得還算順利。

没想到第四天午夜，國民黨軍從遠處繞到午城後面的師部附近，襲擊了五團。五團死傷了好幾百人，團政委林龍發負了重傷，師參謀長鐘學高也犧牲了。在這種情況下，師部决定把五團撤下來，要我們二團頂上，去接替五團的防務，堵截關麟徵的部隊。

二團上去後，利用各個塬口的“腰險”，構築堅固工事，頑强抗擊了三天，使敵人没能前進一步。到了第七天晚上，師部突然接到軍團命令，要二師向西南方向撤退，把敵人引向西南。因爲在我們的西北是永和縣，而永和縣就是我們預定的渡河地點。因此要我們二師誘使敵人向西南走，讓他們離我們的渡口遠一點。接到軍團命令時，正好是我們二團緊靠着敵人，于是師部就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們團。

接獲命令，我們當即與敵脱離接觸，回頭快速向吉縣前進。天快亮的時分，部隊就來到離吉縣十幾里路的地方，看到山坡上有敵人的一個連在放連哨，于是斷定吉縣駐有敵人的部隊。我們把這一情况報告了師部。這時師長劉亞樓的羊癲瘋病發作了，神志不清，什麼事都不知道，被人用擔架抬着走了，政委又負了傷，師裏衹剩下了政治部主任鄧華和接替鐘學高參謀長職務的熊伯濤。鄧、熊二人命令二團在吉縣附近堅守，掩護全師向西轉移，師部和四團、五團先走，我們在後面作後衛掩護。

當時，梁興初和我看到山坡上的敵人衹有百把人，而且離我們不到一里路，就想不如趁這個機會，把這個連搞掉。經過商量，我們當即下達命令，要一連和三連很快出動，消滅山坡上的敵人。這兩個連摸上去以後，很快就把敵人包圍了起來，衹二十來分鐘，敵人就全部繳械投降了，把這個連全部撈來了。天亮以後，

我們全團迅速撤退，吉縣的守敵没有敢追。就這樣，我們在山西打完了最後一個小勝仗。

回到師部，我和梁興初把作戰情况報告了鄧華。這時劉亞樓的病也已痊愈，恢復了神志。他們表揚二團作戰主動積極，認爲我們在這次掩護大部隊渡河的鬥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時指示我們要緩慢地向永和前進。

五月五日，當我們到達永和時，劉亞樓已在那裏等待我們。他告訴我們，四團正在渡河，要我們趕緊做飯吃，吃完飯立即渡河。他還告訴我們，毛主席剛剛渡過河去。到這時候我們才知道，毛主席是一直跟隨我們一軍團行動的。我們當時非常惋惜，因爲到得遲了那麼一點，就没能見到毛主席。

很快吃完了飯，我們開始緊跟着四團渡河。渡船很大，一條船可以坐七、八十個人，來回十多次，我們全團就都過了河。我和梁興初是最後跟隨三連一起過的河。

至此，我們的東征行動徹底結束。這次東征，從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强渡黃河開始，到五月五日重新渡過黃河回到陝北止，共歷時七十五天。

部隊回到陝北後，經過幾天行軍，來到清澗縣住下來，開始進行整訓。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東征紅軍部隊在延川縣大相寺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總結東征戰役的經驗和教訓。這次會議的參加者約七、八十人，我和梁興初也參加了這個爲期十天的會議。

大相寺是當地一個比較大的廟宇，前面有兩個門，兩面有廂子，後面是個戲臺，臺下有幾棵老柏樹，我們的會場就在這個戲臺子前。戲臺子上是主席臺，中央軍委領導、兩個軍團的領導和各師的師長、政委坐在戲臺子上，會議由毛主席親自坐鎮主持。我們團的幹部則在戲臺子下面，什麼也没有，每人撿一塊石頭當凳子，坐在老柏樹下參加會議。

會議的前一階段是總結東渡黃河的勝利經驗，毛主席和首長領導講了話。他們在講話中指出：我們這次東征山西意義很大，

不僅打開了北上抗日的前進陣地，揭露了蔣介石、閻錫山和日本軍國主義相互勾結的陰謀，打破了閻錫山的獨立王國，而且殲滅了閻錫山的一部分有生力量，在歷時七十五天的作戰中，共消滅敵人約七個團，俘敵四千餘人，繳獲各種槍支四千餘支、炮二十餘門。另外，通過組織渡河作戰，取得了江河作戰的重要經驗，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并迫使"進剿"陝北的晋綏軍撤回山西，使陝北蘇區得以恢復和發展。在此期間，我軍共擴充新兵約八千人，籌款三十餘萬元，并在山西的二十多個縣開展了群衆工作，宣傳了黨的抗日主張，擴大了我黨、我軍的政治影響，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和華北以至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會議的後一階段，就反開了一軍團的"本位主義"。毛主席在會上點了一軍團的名，説一軍團到達陝北後，就同十五軍團的團結存在着問題，同陝北地方部隊的團結存在着問題。他説，一軍團的問題，第一是驕傲，兩個軍團會合後，十五軍團就組織幹部到一軍團參觀學習，而一軍團就没有這樣做；第二，一軍團祇顧自己，不顧友鄰，對兄弟部隊幫助很少，不願意調出幹部去支援十五軍團和陝北的地方部隊，這是嚴重的錯誤；第三，一軍團的部隊不禮貌、不謙讓，并列舉了一些典型事例來説明這個問題。他還特别强調了這種"本位主義"的危害性，指出它會破壞紅軍和整個黨的團結，影響同友鄰部隊的關系，結果會孤立自己，造成嚴重的損失和後果。他最後號召大家對這種"本位主義"的作法，進行堅決的批評和勇敢的自我批評，堅决糾正錯誤，同時要求一軍團的領導幹部帶頭作出檢討。

這時林彪已調到紅軍大學去當校長，一軍團由參謀長左權代理軍團長，軍團政委仍是聶榮臻。毛主席提出批評以後，一軍團的領導幹部，特别是聶榮臻的精神非常緊張，看樣子負擔很重。因爲毛主席點了名，聶榮臻不得不帶頭承認錯誤，并要求一軍團的各師、各團幹部踴躍發言，揭發問題，檢查自己。

一開始，發言的人并不太多，所談的也主要是軍團部的問題。到後來，發言的人逐漸多了起來，不僅揭發了軍團部的問題，還

揭發到了師，揭發到了團，最後揭發到了我們二團的頭上。

事情的經過是：在直羅鎮戰役後，二團曾將幾個傷員，包括一個副連長、四個排長和十幾個戰士送到延長的後方醫院治療。傷愈後，他們要求歸隊，院方領導不準他們回部隊，要把他們留在醫院分配工作。我們得知這一情況以後，就報告了師部，師政委蕭華同意我們派人去要。但是醫院仍然不放人。後來在部隊東征山西時，一天我們行軍恰恰經過這個醫院附近，于是我和梁興初帶了一個排，到醫院門口去要這十幾個幹部、戰士，并强硬地説不給就不行。就這樣，硬是把人給要了回來。

就這件事，會上有人批評我們"本位主義"嚴重，説梁興初、吳文玉帶着部隊威脅醫院，硬把醫院的幹部拉走了。聶榮臻當即在會上問二團有没有這樣的事，我們實事求是地作了説明，并檢討説不應該帶隊伍去，更不應該以粗暴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我們講完以後，師長劉亞樓當場代我們二團承擔了責任。劉亞樓説："這件事情我們知道，有錯誤我們負責。我們認爲前方的部隊傷亡大，補充的新兵多，缺少幹部，傷愈的幹部就應當及時歸隊，是我們批準他們去要的。"

劉亞樓解釋完以後，毛主席和聶榮臻的眼睛就都朝向了我們。聶榮臻説："即使師裏同意了，你們這樣做也不對，人家不願意就算了嘛！"我很不服氣地頂撞説："那是我們的幹部、我們的傷員，傷痊愈了，不及時歸隊，醫院留着不放，這樣做對嗎？我們這樣做，也是應傷員自己的要求。"這一説可壞了，因爲聶榮臻當時也挨了批評，心裏本來就很惱火，聽我這一説，頓時火冒三丈，立刻就對我大喊："你這樣説法對嗎？"

見到這種情況，我不再吭聲了。這時梁興初站起來説："這件事我也有份，是我們兩個一起去的。"劉亞樓接着説："有錯誤我們師部負責，不能怪二團。"

這件事就這麼過去了。啊！當時還罰我和梁興初站了一會兒，後來才叫我們坐下。

真没想到，在總結東征的會議上，挨了這麼一頓批

六、西征甘肅、寧夏，迎接一、二、四方面軍大會師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發表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公開放弃反蔣口號，并呼吁蔣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愛國軍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從而將從前的抗日反蔣政策轉變爲逼蔣抗日政策。但是，蔣介石不顧日軍侵略造成的嚴重民族危機，依然堅持自己“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繼續調兵遣將，以圖盡快解決西北紅軍問題。爲此，他在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的軍隊積極在陝北進行“剿共”的同時，又調集了十六個師另三個旅，專門成立一個邊區“剿共”總指揮部，以陳誠爲總指揮，準備大舉“圍剿”陝北根據地。另外，蔣介石在得知紅二方面軍從湖南、紅四方面軍從四川開始北上後，又加緊調動駐湖北、四川的胡宗南部隊進到甘肅、陝西一帶，準備在川、陝、甘交界處阻擊紅二、紅四方面軍，阻撓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三大主力紅軍的會合。

中央軍委經過詳細研究後認爲，陝北根據地東部及東北部的晉綏軍是堅決反共的主力軍，到那裏去開展工作，阻力較大。南部的東北軍和西北軍的領導人，已同紅軍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統戰關系，我們的前綫部隊與東北、西北軍的廣大士兵不斷有聯系、接觸和對話，相互之間不衝突、不打槍，有的甚至像朋友一樣往來。特別是東北軍的士兵，他們傾向抗日、迫切要求打回東北老家去，應避免同他們正面作戰。祇有西部的寧夏軍閥馬鴻賓、馬鴻逵，雖堅決反共，但防區廣大，兵力分散，是個薄弱的方向。而且寧夏擁有富饒的河套平原、人口也在一百二十萬以上，是西北最爲富裕的地區之一。如果能進占寧夏，就可以和陝北根據地聯成一片，使陝北老根據地也得以鞏固。

一九三六年的五月中旬，中央軍委決定，紅一方面軍開始向

寧夏、甘肅方向行動，力爭建立廣大的陝甘寧根據地。這樣，向北可以爭取打通同蒙古和蘇聯的關系，向南可以爭取打通同紅二、紅四方面軍的聯系，并可爭取東北軍、西北軍共同走向抗日。

爲統一協調西征行動，中央軍委還決定，組成紅軍西方野戰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委。紅一軍團爲左路軍，代理軍團長左權（兼參謀長），政委聶榮臻，副軍團長陳光，政治部主任朱瑞，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紅十五軍團爲右路軍，軍團長徐海東，政委程子華，參謀長陳奇涵，政治部主任王首道。毛澤東、周恩來留在陝北，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沒有參加西征。

正在這時，因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在陝北安定縣的瓦窑堡成立，繼林彪調任紅軍大學校長之後，紅二師師長劉亞樓也被調去學習，由楊得志接任二師師長。二師的其他領導，如政委蕭華、政治部主任鄧華、參謀長熊伯濤等都未變。梁興初和我也仍在二師一團分任團長和政委，團參謀長胡發堅調紅大學習，由夏德勝來接任參謀長。

中央軍委關于西征的目的、任務傳達下來後，我們立即按照野戰軍的要求進行動員和準備。針對西征作戰區域主要是回民聚居區的特點，我們除向部隊進行政治形勢任務教育之外，還重點進行了關于嚴格遵守回民政策、紀律的教育。與此同時，我們還傳達貫徹了大相寺會議反對“本位主義”的精神，把會議精神一直傳達到連，傳達到每個黨支部，并要求大家展開討論，展開檢查，使大家深刻理解“本位主義”的危害性。在軍事上，我們則着重進行了戰場偵察和臨戰訓練。

陝北的五月，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我們又第二次來到吳起鎮，感想頗多。吳起鎮是陝、甘邊區最西面的邊沿，背負大山，俯瞰洛河，城寨築在河堤上。一九三五年九月，我們經歷了兩萬五千里長征，就是在這裏找到了家的感覺！現在舊地重游總能引起人們的親切回憶。

五月底，西方野戰軍分兩路從各自的駐訓地出發。一軍團奉命從陝北西經安塞、保安、吳起，向甘肅境內的環縣縣政府所在

地曲子鎮前進。一軍團以二師爲前衛，二師又以我們二團爲前衛。

頭幾天没有事，行軍路上，衹見起伏的黄土高原上人烟稀少，到處都是荒凉草坡，以及在上面奔跑的羚羊、紛飛的野鷄和亂竄的野兔。這裏吃水困難，小河溝裏的水都是苦水。當地老百姓吃的，大都是自家水窖裏的水。這些水窖裏所積存的，最主要的是夏天下雨時匯集起來的雨水，再就是在冬天下雪以後，出去將積雪運回來倒入水窖中所融化的雪水。水窖裏積存的水往往有限。部隊到了宿營地後找水做飯很困難，常常一天衹吃能兩頓飯。

六月三日，我們來到了離曲子鎮大約有三十里的一個地方。我們出發前還没有發現曲子鎮有敵人。但這時先去偵察的偵察參謀回來報告説，曲子鎮是個土城，城裏有敵人的騎兵部隊在那裏休息，多少搞不清楚。我和梁興初趕緊把這個消息報告給楊得志和蕭華。他們就命令二團準備消滅曲子鎮上的敵人，同時强調不管鎮上有多少敵人，都要先迅速地把曲子鎮包圍起來，絶不能讓敵人跑了，而且要争取不讓敵人發現。他們還交待，如果敵人少，二團就先發起攻擊；如果敵人多，就等後續部隊到來後再一起打。

接到消滅曲子鎮敵人的命令，我和梁興初兩人高興地跑回團裏，命令部隊繼續前進。我們在離曲子鎮十五里路的地方，稍事休息後，就召集各連連長、指導員開會，説明情況和任務，要求大家立即進行準備工作。在會上，我們具體分配了各連的包圍任務，選擇好突擊點和火力陣地，特别要求各連準備好梯子和竹木工具，以便爬城墻用。還要準備好鐵鍬，必要時挖地道，炸毁城墻。要組織好機槍火力點，以掩護爬墻隊伍。另外，還要選擇最好的幹部、戰士組成突擊隊，首先登城。由于任務緊急，我們最後還特别强調，各連的準備工作，務必要在短時間内完成。

部隊開始做準備工作的同時，梁興初和我就去偵察曲子鎮周圍的地形，發現曲子鎮的城墻方圓一公里多，墻高二丈，厚六尺許，四周建有碉堡，墻外還有一丈深的壕塹，但無水。經過詳細

偵察，梁興初决定從東南角主攻，在西南角助攻，并在城外的制高點架好機槍，以壓制敵人的火力。

我們是從下午一點鐘開始準備攻城的。奇怪的是，城裏的敵人既不打槍，也不吭聲。兩點半，對部隊的各項準備工作檢查完畢。三點，部隊開始攻城。我們一爬城墻，敵人就開始打槍了。由于我們準備充分，攻勢迅猛，不一會兒就打開了一個口子。梁興初和我帶領兩個連攻了進去。突擊隊的戰士們在猛烈的重機槍火力掩護下，很快爬上城墻，并攻占了城東南的小碉堡。緊接着，我們又攻擊前進到下面的街道上。守敵被迫退到西北角的居民區頑抗。楊得志、蕭華就在城邊外的馬路上指揮我們。

我們是從東南攻進城的，進城後一直向西北方向攻擊前進。待攻到西北角時，看到了敵人的一大片騎兵，大約有好幾百匹馬。從抓到的俘虜兵口中得知，那是馬鴻賓的部下，一個外號叫"野騾子"的旅長帶的三、四百人，主要是騎兵。他們準備從慶陽趕回寧夏去，這天正好路經曲子鎮，在這裏休息吃飯，不料想叫我們給圍住了。

我們部隊剛剛到陝北，衹是在吴起鎮的城外遇到過一次騎兵。我們對打運動戰比較有經驗，但是對城市攻堅戰，我們没有打過，對這次在鎮子裏的街道上打巷戰，更是没有充分的思想準備。由于没有經驗，我們攻進城後，一開始并没有順着房屋逐漸攻擊前進，也没有構築工事防備敵人的反擊，而是用兩個連沿街道横掃過去，直逼西北角。我們認爲敵人在街道上騎術施展不開，原以爲一鼓作氣把他們消滅掉是不成問題的。没想這就疏忽大意了。

就在我們一直向西北角攻擊前進時，"野騾子"抽足了大烟，緊門帶着他的全部兵馬從西北角的各個街巷裏鑽了出來，向我們發動反擊。"野騾子"的部下都是一些被金錢收買的亡命徒，他們不騎馬，全都光着膀子，提着一把或兩把馬刀，奮力反撲。他們來勢洶洶地衝出來，立刻就壓住了我們的前進道路。由于我們的部隊没有巷戰經驗，也没有反擊敵人的準備，敵人這一凶猛反

撲，很快就被他們用馬刀砍掉了一些人。這樣一來，前面的隊伍頂不住了，我們兩個連衹好邊打邊撤。我們一退，敵人就更向前猛壓，結果我們傷亡了百餘人。

就在這時，戰場情形又發生了變化，西北角被我們二師五團得手，在我們二團和五團的夾擊下，反撲的敵人退了下去，蜂擁在幾個石頭窑洞内同我們頑抗。

從俘虜的口供和當地群衆的口中得知，"野騾子"確實是馬鴻逵部隊裏一個强悍的幹將，因此肖華要我們告訴部隊，"野騾子"的部隊一定要消滅，但必須要勇敢加機智和技術。這時太陽已西下，夜幕將臨，我們二團的同志對半天未解决戰鬥很不服氣，請求再攻。楊得志、蕭華很照顧我們，命令二團和五團各派一個連從兩個方向進攻。

黄昏後，五團先用一個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城墻上的碉堡全部打下，把敵人逼進幾個院子裏。我們就用手榴彈一串串地投進去，炸得裏面的敵人人叫馬嘶，到處亂竄。乘此機會，我們衝了進去，用刺刀同敵人搏鬥，捅死了不少拿馬刀的敵人。在我們的猛攻之下，敵人抵抗不住，有的就竄進老百姓家，換上便衣，躺在炕上裝病，有的則把頭鑽進洞裏，把屁股露在外邊。我們一個房間一個房間地搜查，抓俘虜，繳槍繳馬刀。到晚上十點鐘，除"野騾子"自己盤踞的院子之外，其餘各處的敵人都繳了械。

最後，五團的同志把手榴彈投進了"野騾子"藏的那個窑洞，結果把他的衛兵炸死了，"野騾子"也負傷被抓。"野騾子"被俘後，五團把他送到師部。在師部，師領導對他做了很多工作，并給他治了傷，最後按照中央和軍委的指示，將"野騾子"個人放了回去。

這次戰鬥開始進行得很順利，一下子就突破了城墻，攻進了城。後來之所以受挫，總結起來就是一條，那就是在城市裏作戰，不應當衹在街道上一窩蜂似地勇往直前，而應當憑借房子，憑借障礙物逐步向前推進，退却時也一樣。如果衹在街上猛衝，把自

己完全暴露于敵人之前，是非吃大虧不可的。

這次戰鬥是楊得志、蕭華命令五團增援才解決的戰鬥，雖然最後戰鬥取得了勝利，但是我們二團却受挫了。因此，打完這一仗後，大家心裏都很難受。

事後鄧華來看我，問我負傷了没有。我告訴他，我没有負傷，衹是從城墻上摔了下來，自己也鬧不清是怎麽摔下來的。我和梁興初還向鄧華表示，這一仗没有打好，大家心裏都很難過。

鄧華安慰我們說："你們不是把敵人包圍起來了嗎？不是攻進城了嗎？表現得很英勇嘛！最後你們二團和五團消滅了敵人獲得全勝，爲今後攻堅戰取得了寶貴的經驗。對此你們要很好地總結，接受教訓，這是我們的財富。"

曲子鎮戰鬥打響了西征第一炮，此仗打完，馬鴻逵部便望風而逃，被迫退守寧夏，再也不敢與我們正面交峰了。

曲子鎮戰鬥結束後，我們在曲子鎮休息了一天。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部隊繼續西進，經洪德城、毛居井等地，到達七營川一帶，進入了寧夏地區。在這裏，部隊停止了前進，同南面東北軍何柱國的騎兵部隊對峙。此時，西征的紅軍西方野戰軍已占領安塞、安定、靖邊、保安、定邊、藍池、豫旺、環縣、海源、同心城、七營川、阜城、洪德城等陝甘寧邊境的廣大地區，開辟了縱横二百餘公里的新根據地，和原陝北根據地聯成一片，形成了新的陝甘寧根據地。至此，我們基本完成了西征作戰的主要任務。

我們暫時駐扎休整的地方是一個平川，附近有條清水河。清水河是當地的一條大川，水流由南向北，一直通向黄河。河兩面是山，山上有塬，山與山之間則是黄土高原上特有的溝。就在這裏，我們一直休整到八月底、九月初，前後住了將近三個月的時間。

休整期間，紅一軍團軍團部住豫旺堡，二師師部住李旺堡，四團、五團住七營川，我們二團則住最南面，直接與東北軍對峙。三營和五營負責向固源方向警戒，防御東北軍張學良、西北軍楊

虎城的部隊。當時在我們周圍，南面是張、楊的部隊，北面是馬鴻賓、馬鴻逵的部隊，往西是鄧寶珊的部隊。這些部隊中，屬張學良的東北軍實力最强，因此東北軍也就成爲我們争取的主要對象。

由于我們二團處于同東北軍對峙的最前綫，因此向東北軍開展抗日救國宣傳，就成了我們的一項重要任務。根據上級指示，我們自上而下地在部隊幹部、戰士中介紹東北軍的情况、進行争取東北軍抗日救國的政策教育。然後，讓政治機關的宣傳隊下到連裏開展宣傳、培訓工作，教唱《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歌曲，使連隊的幹部、戰士都參與對東北軍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工作。

在七營川附近休整的初期，南面的東北軍在蔣介石的重壓下，曾派出過兩個團的騎兵向我們尋釁。遵照上級的指示，我們没有予以反擊，而是向其喊話，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東北軍兄弟們調轉槍口打死蔣介石賣國賊"等。此後，他們没有再向我們進犯，我們也没有打他們，相互之間處于一種互不侵犯的狀態。

那段時間裏，雙方雖然對峙，但是不打了。這一時期裏，軍團部的主要任務就是開展統戰工作。我們白天就用各種方式向他們宣傳抗日救亡，晚上有時還開聯歡會。軍團政治部主任朱瑞奉中央的命令，經常換穿便衣，坐上牛車，進出我們團的駐地，去東北軍那裏開展工作。那段時間，我們和朱瑞的接觸比較多。他告訴我們，如果東北軍要來我們駐地聯歡，就歡迎他們來，但暫時不要到他們那裏去。後來發展到雙方部隊直接聯歡。當時的統戰工作，主要是在上層展開，部隊除擔任警戒、同東北軍對峙外，主要是進行聯歡。向他們宣傳停止内戰、共同抗日、收復東北失地，盡量和東北軍的下層交朋友，但我們也不放鬆對他們的戒備。不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朱瑞就同東北軍的一個師長簽訂了停戰協議，這是我們當時對東北軍進行統戰工作和抗日救國宣傳的第一個成果。

寧夏地處黄土高原，夏季氣候炎熱、乾燥，中午特别熱，早

晚却很凉，晚上要蓋棉被、早晨要穿棉襖，有"早穿棉襖午披紗"的説法。黄土高原上普遍缺水，盡管我們駐扎的平川裏有一條清水河，可這條河在流經同心城以下區域的過程中，溶解了大量紅色岩層，使河水變苦，不能飲用。居民大都靠挖井，冬季將雪儲入井中，就吃這樣的水。

七營川一帶村莊稀疏，人烟稀少。村子裏既髒又亂，很少有座像樣的房子，大多是破壁殘垣。老百姓都很窮，絶大多數穿得破破爛爛的。這裏土地貧瘠，鹽碱遍地，小麥産量很低，每畝地年産百把斤。見到這種情况，戰士們都很氣憤，説是馬家軍把老百姓害苦了。

我們的駐地是回民聚居區，根本没有猪肉吃，有時買點牛肉、羊肉吃，能買到鷄時就吃鷄。主食是麥子、玉米和土豆，蔬菜不多，但夏天有西瓜。生活很艱苦，因爲缺水，很少洗澡。

這裏是新開辟的區域。起初回民對我們不了解，有逃跑的，經過我們慢慢地做工作，就都回來了。我們團的七營、五營和三營住的村子都是回民村，做不好回民的工作，連腳都站不住。野戰軍專門向各部隊宣布了三大禁令：一、嚴禁住清真寺；二、不准吃猪肉；三、不準在回民區籌款，不打回民的土豪。部隊裏掀起了尊重回民、尊重回教和幫助回民的熱潮。比如有的村莊吃水困難，要到十幾里以外的山溝裏去挑水，我們就開展挑水運動，積極幫助回族同胞挑水。

當時我們部隊的主要任務，除對南面的東北軍進行警戒和開展抗日救國宣傳之外，就是開展群衆工作。這些工作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幫助當地回民建立回民政權，并依靠回民去摧毁清水河一帶的反動武裝，争取把馬鴻逵統治下的群衆統統解放出來。二是幫助回民群衆種地、收莊稼，如早晨出操後去幫助群衆拾肥、施肥、麥子成熟後幫着群衆割麥子、搞秋種等。

三是幫助回民群衆搞好環境衛生。這裏的道路全是坑坑窪窪，一下雨就成爲一片汪洋。老百姓家的牛、羊圈很簡陋，厠所很少，居民隨地大小便。由于衛生極差，一到夏天，蒼蠅、蚊子

就多得不得了，爬得到處都是，看了都叫人害怕。炕上的臭蟲之多，晚上咬得人没法睡覺。一開始我和梁興初一起睡在炕上，後來就不得不找人借了塊門板，睡在門板上。爲了幫助回民群衆搞好環境衛生，我們就幫助村民修築道路，整理牛、羊圈，修建厠所，滅蚊蠅、臭蟲。回民群衆的房子大都破舊不堪，一下雨就漏，我們就不斷幫助他們修理房子。這樣，我們所駐地區的衛生狀况都有了較大的改變。

同時，我們强調人人都必須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尊重回民的風俗習慣，不準吃猪肉，不準説"猪"字，不準接近回族婦女。

這樣一來，群衆對我們也就特别好。回民是很講感情和義氣的，他們稱贊紅軍是"仁義之師"，是真正的回民軍隊。他們把我們長征時期經過時送給他們的幾面旗都挂了出來，還請我們洗澡，請我們吃全羊，把我們當作了自己的家人。

至于部隊本身，由于基本上没有什麽戰鬥任務，我們就强調幹部、戰士學文化。由各個連隊的文書當教員，用樹枝作筆，大地作紙，堅持每天寫字、識字。

那時，我和梁興初都有馬，每天早晨起來我們倆都要在川裏騎馬跑上一段時間，借以練習騎術、鍛煉身體。

七、三大主力紅軍大會師

一九三六年九月上旬的一天，紅軍西方野戰軍司令部召集團以上幹部，到一軍團軍團部駐地豫旺堡開會。我和梁興初騎馬跑了七、八十里路，才好不容易找到了會場。會場設在豫旺堡城外的草地上，軍團部臨時搭了一個臺子作爲主席臺。

下午，一軍團、十五軍團團以上幹部約三、四百人齊集在那裏，一起開會。彭德懷首先在會上講話，然後左權、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也分别講了話。他們的講話都很短，主要是動員紅軍繼續向西南行進，沿西（寧）蘭（州）公路兩側進至靖遠、固寧、會寧、静寧一帶，策應紅二、紅四方面軍北上，同時負責籌集資財和糧食、蔬菜，迎接三大主力紅軍的大會師。

會議開完，又演出節目。看完演出，一軍團軍團部招待大家在一起會餐。那個時候吃的東西比較困難，軍團供給部花了很大的力量，買了十頭羊、一條牛和兩頭猪，做了紅燒猪肉、炖牛肉和紅燒羊肉，還有大米飯，這在當時已經是最好的待遇了。

會餐開始時，已是午夜時分，十多個小時没吃東西，我們個個都是饑腸漉漉。月光下，看見一擔一擔猪肉、牛肉、羊肉和米飯挑向會場。這時大家都餓了，我們一軍團的幹部就都拿着盆子，擁上去打了飯菜就吃。因爲這是在一軍團的駐地，十五軍團的幹部是客，他們在一旁等着，比較客氣。結果一軍團的幹部一下子就把飯菜差不多快搶吃光了。眼看着十五軍團的幹部没有多少吃的了，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就發了脾氣，説："一軍團的幹部太不像話了！你們就不能照顧一下十五軍團的幹部嗎？這樣搶吃像話嗎？"

聶榮臻這樣當着十五軍團幹部的面，當場給一軍團幹部的這一頓批評，使得我們再也不好意思吃下去了，于是不少人就迅速離開會場，飯没有吃完就走了。我也是剛吃了半碗飯，就同梁興初一起騎馬回到自己的駐地，天已快亮了。當時我們兩人也是一肚子的氣。一天一晚没有睡覺，飯也没有吃好，肚子餓着，又挨了個大批評。這是這次會議過程中的一個小插曲。

事後想起來，我們也認爲聶榮臻的批評是正確的，當時確實也是不像話。月光下也看不清楚是誰帶的頭，反正就這麽一擁而上了。應該説，這也是一種衹顧自己，不顧友鄰的充分表現。

盡管在會上挨了一頓批，但會後大家情緒還是很高，都説這下可好了，等二、四方面軍來了，我們就可以把甘肅、寧夏、陝西的大片地區建成鞏固的根據地。

九月底、十月初，西北已是晚秋季節，當時正籌備冬衣，準

備向西進發。然後，我們翻過六盤山，來到西蘭大道，以界石鋪爲中心的甘肅靜寧、會寧、定西這一帶。這時候，前面的部隊已和紅二、紅四方面軍見了面。十月九日，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到達會寧，同紅軍總部會師，十月二十二日二方面軍總指揮部到達靜寧以北的將臺堡，同一方面軍會師，至此，三大主力紅軍終于勝利會師了，紅軍的力量增强了。不出毛主席所料，整整一年，四方面軍又北上和我們會合了。

我們二師當時住在界石鋪是一個比較大的鎮子，師部住鎮上，我們二團住鄉下。師長楊得志則帶着部隊在前面，負責向天水方面進行警戒，以掩護二、四方面軍通過西蘭公路。政委蕭華留在師部。我們二團也是一樣，梁興初帶着兩個連去前面擔任警戒，我則帶着其它隊伍在後面。

我們在界石鋪附近駐了下來。這是一個漢人較多的地區，我們又開始打土豪，以籌集資金、糧食、物資、布匹和藥品。之後，我們殺豬宰羊，準備歡迎二、四方面軍的隊伍。

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我們這些團的幹部，既沒有見到朱德總司令，也沒有見到張國燾、徐向前、劉伯承、賀龍和任弼時等領導。來到我們師部的，是紅二方面軍政治部的同志。在師部，我們見到了紅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蕭華還把師部住的房子，包括他自己的房子都讓了出來，并請包括甘泗淇在內的二方面軍政治部的同志一起吃了頓飯。蕭華把我也找了去作陪，一起吃了一頓。那頓飯全部是羊肉，有十幾道菜，做得特別好。我們還把已經準備好的慰問品，送給了與我們見面的二方面軍的每個指戰員。

第二天，紅二方面軍的部隊繼續向西北前進，我們就在原地掩護，在駐地組織部隊夾道歡迎和歡送。看到他們過來，我們就鼓掌、呼喊口號和端茶送水，并幫着他們抬傷病員和招呼落伍掉隊的同志。二方面軍的部隊一共過了兩天，等他們過完後，我們便回到寧夏的同心城，就在同心城住下來了。

以後我們才逐漸知道，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八萬大軍，

自阿壩同紅一方面軍分手南下後，在"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號鼓舞下，開始部隊士氣很高，因爲大家都不習慣藏族地區的生活條件和藏族食品，也不喜歡雪山和草原。一開始，南下的部隊幾乎没有遇到什麼抵抗，進展挺順利，但正當紅四方面軍節節勝利，張國燾躊躇滿志地再次來到成都附近的天全、蘆山、寶興地區時，蔣介石已經集中了八十個團二十萬人馬在那裏等着他們。這一戰，紅四方面軍損失慘重，不得不重新向北撤回甘孜。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紅二、紅六軍團來到甘孜同紅四方面軍會合。七月初，紅二、紅四方面軍領導幹部在甘孜開會，紅二方面軍的任弼時、賀龍、關向應、蕭克和朱德、劉伯承一起堅持北上抗日，張國燾被迫同意北上的意見。七月十四日，紅四方面軍第三次爬雪山過草地，與紅二方面軍一起北上陝北。

八、九月份，紅四、紅二方面軍先後來到蘭州以南地區。這時紅四方面軍內部又發生了一場争論：張國燾主張渡過黄河，進占甘北，然後西進新疆，打通同蘇聯的聯系；陳昌浩則主張在甘南建立根據地，以作爲陝甘寧蘇區的延伸。争論的最後，在毛澤東、周恩來的同意下，張國燾作出了組建紅軍西路軍、西渡黄河的决定。這個决定，使紅四方面軍遭到了空前慘重的損失。

西渡黄河的决定作出後，還有三萬五千餘人的紅四方面軍即開始渡河西征。但當包括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等在內的五軍、九軍、三十軍共兩萬餘人，在靖遠的虎豹口渡過黄河以後，國民黨軍的一支精鋭部隊衝了過來，把紅四方面軍的隊伍分成了兩半，致使張國燾、朱德率領的四軍和三十一軍未能渡過黄河，被阻隔在黄河東岸。

紅四方面軍的三個軍西渡黄河後，于十一月十一日正式組成西路軍，但很快就被馬家軍切斷了同主力紅軍的聯系。由于西路軍是孤軍西進，情况越來越危急。最後終于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在張掖、武威地區被馬家軍圍攻，全軍覆没。馬家軍騎兵凶猛驃悍，能騎善戰，擅長奔襲，西路軍被包圍，彈盡糧絶，悲壯失敗。後來衹有少部分同志化裝潜行，歷盡千難與萬險，回到了陝北。

所以紅四方面軍在會寧同我們會師時，實際上衹剩下四軍和三十一軍兩個軍，合計一萬餘人。相比之下，紅二方面軍在長征途中所遭遇的困難，相對要小一點，人員損失也比較少一些。在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等同志的領導下，在静寧與一方面軍會師時，隊伍約兩萬人。

八、第二次國内革命戰爭的最後一戰
——山城堡戰役

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後，在陝甘寧根據地的紅軍部隊就有了四、五萬人，這對蔣介石的震動極大。他急調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的中央軍和東北軍、西北軍、馬家軍共三十多個師的兵力，包圍陝甘寧根據地，并親臨西安坐鎮指揮，以圖把紅軍消滅于甘肅、寧夏地區。

追逼我們最緊的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胡宗南。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胡宗南所率的四個師，已經進占環縣以北的山城堡、哨馬營、保牛堡一帶，對陝甘寧根據地造成了直接的威脅。鑒于這種情況，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決定，紅軍三個方面軍的主力應迅速向山城堡靠攏，集中全力，準備在山城堡地區打好對胡宗南部隊的這一仗。中央軍委指出，打好這一仗，對穩定陝甘寧根據地的局面，促進國内和平的實現，都具有重大的意義，否則敵人會以爲我們可欺，將不利于統一戰綫的建立和發展。

爲統一指揮，中央軍委任命彭德懷爲山城堡戰役的前敵總指揮兼政治委員，任命劉伯承爲總參謀長。前敵總指揮部决定，由一軍團、十五軍團和四方面軍的部隊擔任主攻，二方面軍負責打援。

從軍團部領受任務回來，楊得志、蕭華將敵我情况向各團領

導作了詳盡的傳達，并告訴我們，紅二師將由西南向東北進發，擔任山城堡戰役的主攻任務。師裏决定，由四團和五團在前面主攻，二團作爲預備隊在後面跟進。任務明確後，隊伍迅速北上。經過四天的夜行軍，進入了山城堡以西地區，利用山塬塬聯溝的地形，隱蔽在溝裏，决心打好這一仗。

十一月中下旬的西北高原相當寒冷，經常下雪。我們天天艱難地行進在雪地上，天冷，我們的棉衣單薄，沿途村子稀少，有時一夜行軍七八十里，竟然連一個莊子都看不見。這裏是沙漠地區的邊緣，每年都被沙漠吞噬掉一些村莊和窑洞，老百姓害怕沙漠，大多搬走了，有的空窑洞還很大，一個窑洞就可以住上百把人。一天晚上我們到了一個大村子，全團人都住下了。但由于村子裏没有人，我們自己帶糧食，帶菜，和着雪水做飯吃。

部隊雖然頂風冒雪，忍饑挨凍，長途行軍來到山城堡附近，但大家的士氣非常旺盛，决心要以打好這一仗的實際行動，來慶祝三大主力紅軍的勝利會師。

經過偵察我們了解到，胡宗南的部隊是從湖南起程，經過湖北兼程北上，當時剛剛到達山城堡一帶。這裏人烟稀少，收集糧食困難，水源也缺乏，所以他們也是人困馬乏，面臨的困難并不比我們少。不過他們比我們有利的，是上有飛機、下有汽車可以幫助運輸，但靠汽車運輸畢竟有限。而我們，地形熟悉，又東靠陝北根據地，有可靠的後勤保證。况且我們到山城堡附近時已休息了幾天，可以以逸待勞。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們各參戰部隊完成了對山城堡的包圍。當天下午，首先開始肅清外圍，并逐漸向山城堡鎮内壓縮。黄昏時分，外圍基本肅清，部隊開始從四面八方進行猛烈攻擊。經過一夜苦戰，到天快亮時，山城堡被攻了下來。接着，部隊開始分割包圍，乾净徹底地消滅了山城堡及附近的敵人。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戰鬥全部結束。這次戰鬥共消滅胡宗南七十八師二三二旅和二三四旅的兩個團，同時其它方向進攻的敵人也被紅二十八軍擊退。不過，我們部隊的傷亡也不小，二師五團政委陳雄同志

就是在這一次戰鬥中犧牲的。

在山城堡戰鬥打響的當天晚上，我們二團奉命没有動作。第二天早晨接到命令，要我們團進到山城堡以北，防止殘存敵人向寧夏方向逃竄，同時警戒并阻擊可能從甜水堡方向來增援的馬家軍，以掩護進攻部隊最後解決山城堡的戰鬥。因敵人的增援部隊未來，我們二團這次没有打上仗。

經山城堡一戰的沉重打擊後，胡宗南部的主力向西撤退，蔣介石精心部署的整個進攻計劃被粉碎。山城堡戰鬥後，部隊回到陝北邊境的桂家口進行休整。這時，三大主力紅軍已占領了陝西、甘肅、寧夏三省相交的一大片地區，約有三十多個縣。這一大片地區裏，到處都駐有我們的隊伍，真是人歡馬叫，好一片興旺景象。

部隊休整期間，朱德、彭德懷、張國燾、賀龍、任弼時、左權、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等領導，召集三個方面軍師以上幹部開會，慶祝一、二、四方面軍的勝利會師，慶祝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的第一次戰鬥——山城堡戰鬥的勝利。參加會議的各位領導都分别在大會上講了話，氣氛十分熱烈。

我們團一級幹部没有參加這個會議，是師政委蕭華回來向我們傳達的。據蕭華説，在會上，朱德總司令非常高興，熱情洋溢地和大家一一握手，致以親切的問候，而張國燾則不大吭聲，衹是在表面上對大家應付了一下。

這次會議的精神傳達到部隊以後，極大地鼓舞了廣大部隊幹部、戰士的士氣。根據地的老百姓也都非常高興。

山城堡戰鬥實際上是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期間的最後一戰。戰鬥的勝利，對國内和平的實現和抗日統一戰綫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九、西安事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上，二師師長楊得志、政委蕭華來電話命令我們二團繼續向寧夏前進。次日凌晨四時，我們全團按照師部的命令，作爲前衛開始向寧夏甜水堡前進，準備消滅駐扎在甜水堡的敵人。

那一天，梁興初帶着尖兵連走在前面，我帶着團部和其它各連在後面跟進。我們走得很快，到天剛亮時已走了四十多里路。師部隨後來了没有也不知道。到上午十一點，我們已在途中休息了兩次，可一看後面，師部還是没有來。因爲没有接到别的命令，雖然我們的心裏有些疑惑，還是命令部隊繼續往前走。

當我們走到離甜水堡還有十幾里路的地方，突然師部派來了一個騎兵，送來了師部的一封信，要我們向後撤回原地。至于爲什麽要後撤，信上没有説明，我們也不知道。這時梁興初帶着尖兵連已在前面跑得很遠了，離我們大約有好幾里路了。我們團没有騎兵，我衹好自己騎着馬去追上梁興初，把梁興初及其尖兵連找了回來。一路上，我們倆都在猜測究竟發生了什麽事。

在回原駐地的路上，我們正好經過紅四方面軍三十一軍軍部的所在地。我和梁興初就跑去找三十一軍的軍首長，想問問情况。當時三十一軍軍長是蕭克，政委是周純全，他們住在一個土窑洞裏。雖然我們過去并不相識，但他們還是很熱情地接待了我們。蕭、周二人告訴我們，現在不要北上了，要南下。已經發生了"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把蔣介石扣起來了，所以部隊要向南下去支援張、楊。

聽到蔣介石被抓起來的消息，我和梁興初不知道該有多麽高興。當時，蕭克、周純全要留我們倆吃飯，我們説什麽也不吃，衹想着趕緊回去。跟蔣介石打了近十年仗，没有抓住他，這一下可把他抓住了，大家那個高興呀，真是没法説！心裏一高興，走

路也不覺得累，平時行軍走上十里、八里就要休息一次，這一下也不休息了，一陣風似地跑回了師部。

在師部，楊得志、蕭華、鄧華告訴我們，十二月初蔣介石由洛陽親赴西安，督促東北軍和西北軍積極"剿共"，并且決定如張學良、楊虎城不聽命令就解除他們的武裝。在這種情況下，張、楊于十二月十二日凌晨發動"西安事變"，拘捕了蔣介石，之後他們電請紅軍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國大計，處理捉住蔣介石後的善後事宜。對此，中央已作出緊急部署，令紅軍南下，支援張、楊的部隊，防備國民黨親日派的乘機進攻。他們還解釋説，師裏在清晨接到軍團的電話後，還没來得及通知，我們就已經走了，衹好派一個騎兵通訊員去通知我們。現在隊伍回來了，很好。他們讓我們就在附近休息一下，明天就向南往慶陽前進。

從師部回來，我和梁興初決定召開全團排以上幹部會議，把"西安事變"的消息簡要地告訴大家。我們把幹部集合在一小塊草坪上開會，梁興初首先講話，他一開口就告訴大家，蔣介石在西安被活捉了。大家一聽都怔住了，整個會場靜得鴉雀無聲，不過看得出來，每個人臉上的表情都十分高興。片刻之後，才有人回過神來問究竟是怎麼回事。梁興初説："請政委給你們講。"

接着我告訴大家，剛才團長和我到師部，師首長告訴我們不再向北前進，而要轉而向南，向西安前進，因爲東北軍張學良、西北軍楊虎城在西安發動"雙十二事變"，活捉了蔣介石。這時，有人就問什麼叫"雙十二"。我解釋説，"雙十二"就是十二月十二日兩個"十二"的意思。接着，他們又問是怎麼捉住蔣介石的。我説："具體情況我也不清楚，怎麼告訴你們哪！這是好消息，我們大家都高興。現在部隊要向西安前進，去支援張、楊對蔣介石作戰。我們抗日的力量大了，形勢也大有好轉，不過形勢究竟怎麼好轉，要看黨中央、毛主席發的指示和文件才知道，你們不要再問了，上級有了指示，我們會告訴你們的。但目前我們就知道這麼多。"我要求在會議結束以後，各連都要向全體戰士傳達會議所談的情況，以鼓舞鬥志和提高士氣。

最後，我向各連布置了南下西安要注意的事項。南下可能要急行軍，晝行夜宿，要注意做以下的四項工作：一、要做好鞏固隊伍的工作，減少掉隊，防止逃亡；二、由于南下經過的地方都是新地區，而且是張、楊的地區，要特别做好沿途的群衆工作，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努力擴大紅軍的影響；三、要把東北軍、西北軍看作友鄰部隊，要向他們明確表示，紅軍是來支援他們的；四、可以在新區適當進行擴大紅軍的工作，個别地吸收一些工農群衆參加紅軍，以充實部隊的實力。

十二月十三日，二師開始向慶陽前進。我們二團由北上時的前衛，變成了全師的後衛。

一路上，部隊情緒極高，大家一邊走，一邊議論，猜測全國形勢究竟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但高興之餘，大家也存有一些疑慮。因爲紅軍就那麼多，根據地也衹剩下陝甘寧一個，國民黨的力量比我們大得多，抓住了蔣介石，内戰是不是能就此停止？我們和東北軍、西北軍究竟能不能結成鞏固的統一戰綫？這些都還没有把握，對此不能盲目樂觀。另外，究竟是如何抓住蔣介石的，在什麼地方抓的，張學良抓蔣介石同我們黨和紅軍有什麼關系，没有人清楚，都紛紛亂猜。至于抓到蔣介石以後應當怎樣處理，大家的議論就更多了。總的來説，大家一致擁護張學良、楊虎城把蔣介石扣起來，認爲這是一種正義的行動，至于抓起來以後怎樣處理，大多數人主張槍斃了他，也有不少人主張把蔣介石長期關起來，衹有少數人主張逼蔣介石抗日後放了他。

對"西安事變"後的形勢估計，大家也是議論紛紛。一種估計是，事變後我們和張、楊的部隊聯合在一起，可以把包括陝西、甘肅、寧夏在内的整個西北聯合起來，建成鞏固的根據地，以對抗國民黨的部隊。另一種估計是，把蔣介石扣起來以後，親日派何應欽乘機調兵進攻張、楊的部隊和紅軍，會引起更大規模的内戰。第三種估計是，張學良、楊虎城的下屬軍官意見不一致，導致張、楊部隊内部分裂。還有一種最壞的估計，就是張、楊可能會在國民黨親日派部隊的進攻下失敗，像當年的十九路軍一樣。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發動了“福建事變”，并且與紅軍簽訂了抗日反蔣協議。但事變不久，他們就在蔣介石的重兵壓迫下失敗了，十九路軍被編散。

當然，大家認爲最好的一種結果是，内戰就此停止，團結蔣介石一致抗日。這種分析的根據是，除國民黨和蔣介石以外，還要看到全國各個階層、各愛國人士的抗日情緒空前高漲，停止内戰，一致抗日，救亡圖存，已成爲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民心不可侮，中華民族一定會走向進步，抗日救亡一定能實現。當然，也有人提醒説，張學良、楊虎城是不會替共産黨説話的，而且我們也指揮不了他們，所以要謹慎，要提高警惕。

這時，一軍團政治部來了指示，要求我們按照中央所發表的新聞報導，向部隊進行宣傳解釋，并搜集各種反映，向上級匯報，以便編發統一的宣傳解釋材料。軍團政治部還向我們通報説，中央已先後派出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去西安參加談判。

向部隊幹部、戰士進行宣傳教育的主要内容有：我們黨歷來主張停止内戰，聯合包括國民黨及其軍隊在内的全國各黨各派各民族各階層，建立統一戰綫，一致抗日，以拯救中華民族，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救亡圖存，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實現中華民族的解放，這個責任就擔在我們黨和紅軍身上，我們要以實際行動，影響東北軍、西北軍，影響全國的軍隊和人民；這次“西安事變”處理的好壞，是關系到全國甚至是全世界的大事，大家要相信黨中央一定會妥善處理好這一問題，不要没有根據地亂猜瞎想，至于對蔣介石怎麽處理，我們要等待中央的決定，中央怎麽決定，我們就怎麽執行。

軍團政治部要求各部隊把上述這些内容編成教材，對所屬部隊進行系統的正面教育，作爲我們在“西安事變”爆發後，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教育的第一課。

當時我們團以上幹部還知道，“西安事變”之後，國民黨内部也是一片混亂。何應欽、汪精衛、張群等親日派主張投降日本，何應欽已與日本簽訂了出賣河北省和北平、天津兩市的《何梅協定》。在得知蔣介石被扣後的第二天，何應欽就自封爲國民黨軍隊的代理總司令，并在河南組織了總指揮部，加緊調兵遣將，組成所謂的“討逆軍”，準備進攻紅軍及張、楊的部隊。一時間，國民黨的大軍雲集鄭州、潼關一綫，隨時準備進攻西安，擴大内戰。何應欽還在洛陽集中了大批飛機，準備用來轟炸渭南和偵察西北。其目的就是想乘機奪取蔣介石在國民黨内的統治地位，以進一步和日本妥協。

國民黨内的另一派，就是宋美齡、宋子文、孫科等蔣介石的親屬。他們認爲衹要一開打，蔣介石就非死不可，因此竭力主張首先要把蔣介石救出去。

還有其它各省的軍閥隊伍，如山西的閻錫山，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廣東的陳濟棠，山東的韓復榘，各有各的想法，各人的態度也不一樣。不過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他們每個人都想在這樣的困難時期撈一把。

當然，國民黨内也有主張抗日的，如宋哲元、馬占山、傅作義等。

與此同時，虎視眈眈的日本帝國主義趁機加緊向平津、冀東、察哈爾、熱河、綏遠步步進逼。

在這種情况下，中國共産黨遠見卓識，以民族利益爲重，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争取蔣介石抗日。中共中央在給西安周恩來的電報中指出，當前的局勢是，“日本與南京右派聯盟，企圖奪取蔣系中央政權，造成大内亂，另方面是南京與各地左派企圖調和，而中間派在動摇中。”對此，中央認爲，西安方面的策略，“應扶助左派，争取中間派，打倒右派，變内亂爲抗戰。”

周恩來在西安向張學良、楊虎城詳細分析了逼蔣抗日的可能性，并代表中共和紅軍與張、楊及宋子文、宋美齡進行了談判。經過一系列艱苦談判，迫使蔣介石接受了抗日條件，以“領袖人格”擔保内戰不再發生，并發出撤兵手諭。之後，蔣介石被釋放回南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的發生與和平解決，是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轉折

點，有着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可以説，張學良、楊虎城二人，對挽救中華民族、挽救紅軍和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但張、楊二人自己却爲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楊虎城全家慘遭殺害。張學良在陪同蔣介石返回南京後被扣留，失去自由長達五十餘年。

此時，我們部隊繼續南下。走到離慶陽不遠的地方時，前面傳來消息，説前衛部隊已經在慶陽同東北軍會合了。慶陽是甘南比較重要的一個縣城，駐有東北軍的一個團。聽到這個消息，大家都很高興，認爲以後和東北軍大概是不會再打仗了。

部隊一面南下，一面開始進行一系列針對東北軍、西北軍的教育。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還專門爲此作了一個指示，大意是：越往南走，和東北軍、西北軍接觸的機會就越多，他要求我們，第一、要注意部隊的軍容風紀，着裝要整潔，隊列要整齊；第二、要有禮貌，同級幹部要互相敬禮，遇見對方的上級，要先敬禮，後握手問好，走時要告别；第三、隊伍行進時，遇到友軍要主動讓路，領隊人員要主動和對方打招呼；第四、態度要熱情、誠懇、友好；第五、對方請我們吃飯，一律婉言謝絶，如堅持要請就去，但要注意禮尚往來，有來有往，送東西也是如此。對聶榮臻的這些指示，我們向全團排以上幹部作了傳達。我們還對如何落實這些指示，作了一些具體規定。

等我們來到慶陽，見到駐守在那裏的東北軍時，感到他們的態度非常友好，在我們到來之前，就已經爲我們燒好了水，等着在那裏接待我們。當時慶陽還是由東北軍來防守，我們衹是經過那裏，按規定不住慶陽城内。爲表示謝意，我和梁興初專門到城北東北軍部隊的團部去拜訪了他們，并告訴他們，我們是經過這裏的最後一批隊伍，在我們後面就再也没有隊伍了。

從慶陽出來，再走兩天，就到了甘肅和陝西交界處的寧縣。這時蔣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戰，聯合抗日”的主張，并在張學良的陪同下回到洛陽。與此同時，何應欽組織的“討逆軍”也已開始撤往潼關。

我們隊伍在寧縣附近接到命令，要部隊暫時停下來休整待命。部隊休整期間，師部住在離寧縣縣城大約三十里地的早勝鎮。早勝鎮地處塬上，比較繁華，大約有八、九百户人家。師部決定，我們二團住在寧縣縣城裏，并負責和縣政府取得聯系。

寧縣縣城是建在塬下的溝裏，窮得不得了，衹有破破爛爛的一條街，一共不到兩百户人家。縣政府設在一個窑洞裏，裏面没有多少人。寧縣的縣長是個浙江人，穿着件舊長袍子，帶着個老婆，一看就知道是個窮縣長。不過這個縣長人挺精明，像一個小政客。我們進去時，他正蹲在窑洞裏。看見我們進去，一開始他嚇得要死，後來看我們并無惡意，才平静下來。我告訴他，我們部隊要暫時住在縣裏一段時間，請他多幫助。他聽了之後不住地説：“好呀，你們住在這裏，歡迎你們！衹是我們這裏窮得什麽也没有，招待不周，還請你們原諒。”

我跟他説，我們衹是住在城裏，不干涉他的事務，他管他的縣務，我們管我們的隊伍，衹是請他幫助我們解决糧食、燒草和馬料，其它的事情我們自己負責解决。對我們的要求，他滿口答應。我這是第一次見到國民黨的縣長，就是這麽樣的一個人。後來得知這個縣長還抽鴉片烟。

後來，那個縣長請我們吃了一頓飯。過了兩天，我們想，按照要禮尚往來的規定，得回請他們。于是我又去縣政府對縣長説：“今天一來是看看你們，二來是我們隊伍住在這裏，有什麽違反紀律之處，請向我們提出，我們一定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辦事。再就是請你到我們那裏吃頓飯，請你的夫人也去。”縣長聽後非常高興。那一頓飯，我們搞了十幾個菜，并請他們喝了點酒。

接着，師政治部就來了電話，説準備派民運科長到縣城來和縣長直接聯系，因爲早勝鎮屬寧縣管轄，許多事情還得通過縣政府來解决，要我們帶他去見縣長，介紹一下。以後這個民運科長就住在縣政府内，有關的一切事情都通過他去辦理，我們就不再插手了。

蔣介石回到南京後，背信弃義。在他的縱容下，何應欽等人又重新調集了二十多個師，進逼西安。隨後，我們也奉命繼續從寧縣南下，經陝西的旬邑和淳化，到達離西安不遠的三原地區，準備協同東北軍、西北軍迎戰何應欽部隊。這裏已離西安不遠了。三原地區，除西安外，是陝西最好的地區之一。渭河兩岸土壤肥沃，人烟稠密，農業發達，盛產小麥和棉花，有“八百里秦川”之稱。就在這個地區，我們渡過了一九三七年的元旦和春節。

利用在這裏休整待命之機，我們開展了擴兵活動，各個部隊都派出了擴兵小組，在自己的駐地周圍開展工作。我們二團由梁興初留在團裏照顧部隊，我則帶着一排人到富平至臨潼一帶擴兵。二十天左右的時間，我們就擴到了三百多人，這些人絶大多數是貧農、雇農，也有少數學生。我們整個一軍團擴了幾千人。這充分説明了人民群衆抗日情緒的空前高漲，中國共産黨和紅軍“團結抗日，把日本侵略軍趕出中國”的政治主張，已經成爲了全國人民的最大心願。

正當我們在三原地區歡度春節的時候，突然接到命令，要調一批幹部去延安中國人民抗日紅軍軍政大學學習，爲形勢的發展培養和儲存幹部。抗大原名紅大，駐保安瓦窑堡，一九三七年一月初，隨黨中央進駐延安而遷往延安。命令下來後，大家踴躍報名，都不想錯過這個學習機會，但結果還是軍事幹部被批準的多，政治幹部被批準的少。二師師長楊得志被調去學習，黄永勝又調來二師當師長，接替了楊得志。二團團長梁興初也被調去學習，四團副團長季廣順調到二團當了團長。我要求去延安學習的請求没有得到批準，留在部隊繼續工作。這時紅一軍團的代理軍團長還是左權，政委仍是聶榮臻，政治部主任則由鄧小平接替，朱瑞調延安學習。

我擴兵回來不久，就歡送梁興初去延安學習。那個時候幹部調動很簡單，一個命令下來，説走，集中到軍團部就都走了。那天，我叫人買了兩隻鷄，買了點肉，還買了點酒，請梁興初好好吃了一頓飯，就算歡送他走了。至于黄永勝來，楊得志走，我們

都没有到師部去參與歡迎和歡送。

十、寧縣整訓——抗日戰争的準備階段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國民黨五届三中全會在南京召開。會前中共中央就兩黨合作抗日問題，提出了系統的建議。會上雖未對中共中央的建議作出明確表示，但却確定了將武裝“剿共”改爲“和平統一”、適當擴大民主的政策，表示可以跟共産黨進行談判。這標志着國民黨實際上開始接受中國共産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主張。至此，國共合作初步形成，國内和平基本實現。

鑒于這一形勢變化，中央決定，進駐三原地區的紅軍隊伍撤回原駐地。于是，經過七天行軍，我們二團回到了甘肅的寧縣縣城。一軍團的三個師，一師駐正寧縣，二師駐寧縣，四師駐旬邑縣，軍團部則住在宫和鎮這個較大的鎮子裏。

回到寧縣時，除沿途人民熱烈歡迎我們之外，縣政府、保安團、商會及地主、士紳也都出來歡迎我們，他們的態度跟過去大不一樣，對我們都挺友好。這一變化，使我們十分直接地感受到，十年内戰停止了，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結束了，中國已經實現了由國内戰争向抗日民族戰争的歷史性轉變。親眼目睹這一轉變，使大家興奮不已。

爲了迎接即將開始的抗日戰争，中央決定紅軍各部隊進行集中整訓，爲奪取抗日戰争的勝利作好各方面的準備。我們團于一九三七年三月開始，在所駐的寧縣進行整訓。以後這個階段應當説是抗日戰争的準備階段，是一個重要的階段。

首先是抗戰的思想準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以後，中央曾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問題，陸續發出了許多指示和宣傳教育材料。一九三七年五月初，毛主席又在中國共産黨全國代表會議

上，相繼作了《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爲争取千百萬群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鬥争》的結論。中央的這些指示、教育材料和毛主席的報告，即成爲我們進行思想準備工作的重要學習材料。在整訓中，我們全團指戰員通過反復學習討論，澄清了許多模糊認識，克服了若干懷疑、抵觸、盲目樂觀情緒和“左”傾主義傾向，增强了對抗日統一戰綫的理解。

在這一過程中，一軍團政治部還把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史編成了系統的教材，從日本明治維新開始講起，講到甲午戰争、八國聯軍、日俄戰争，再講一九三一年日本策劃的吞并東北三省的“九一八事變”，講一九三三年日軍侵占熱河全省的事件，最後講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國主義積極策劃河北、山西、山東、察哈爾、綏遠等華北五省的“自治運動”，妄圖把華北變成“滿洲國”第二的陰謀，説明日本侵略軍已侵占了我們半個中國，如不奮起反抗，亡國滅種的慘禍即將面臨到我們的頭上。通過對這個教材的學習，更加激發了全團指戰員的民族仇恨，增强了他們把抗戰進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其次是抗戰的組織準備。爲促成全國抗戰，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需要，中共中央向國民黨和南京政府提出，將蘇區政府改爲中華民國特區政府，并將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番號、編制統一直接受南京政府與軍事委員會指導。爲適應這一變化，中央决定對部隊進行一次統一的相應教育。但對内强調：番號、名稱着裝可以變，保持共産黨的獨立性，堅持共産黨領導，政治工作制度絶對不能變。特區政府的一套獨立的制度不能變。當然，對一些政策作了相應的改變。如在土地政策上，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槍出槍，有糧出糧”的口號，代替過去“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以抗日累進稅代替過去提出的取消一切苛捐雜税的主張。

爲增强黨内團結，整訓期間，我們還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張國燾錯誤的活動。記得大概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紅一、紅四方面軍聯合在紅一軍團軍團部駐地宮和鎮，召開了一次兩個方面軍的團以上幹部大會，我們二團是我和季廣順兩個人參加了會議。爲召開這次會議，軍團部臨時搭了個大草棚，我們就在這個棚子裏開會。

任弼時專程由延安代表黨中央到宮和鎮來主持會議。參加會議的其他領導還有楊尚昆、聶榮臻、左權、袁國平等。會議首先由任弼時作報告，他系統地談了張國燾的錯誤，講了懋功會議、兩河口會議、毛兒蓋會議、巴西會議上張國燾同中央的分歧，講了張國燾怎樣阻止紅軍北上，怎樣拉隊伍南下，講了張國燾在被迫北上後，又怎樣力主紅四方面軍主力渡過黄河，以致西路軍遭到失敗，大部分同志被殺害，槍支被繳械，隊伍被消滅，僅剩下少數同志一個一個地分散回到陝北蘇區。在系統談了張國燾的錯誤後，任弼時又强調要把張國燾的錯誤同四方面軍的廣大幹部分開。他肯定了四方面軍全體幹部英勇奮戰的精神，强調一、四兩個方面軍團結的重大意義。

任弼時的報告後，接着發言的主要是四方面軍的同志，其中以王新亭的發言給我的印象最深，因爲他發言中批判揭露材料最多。我們一方面軍的同志由于不了解情况，衹是一般性地表了表態。

會議前後歷時十天左右，張國燾本人没有到會，批判是背靠背的。會後，中央還將張國燾的錯誤傳達到了全體幹部和黨員。以後，中央爲争取和教育張國燾，給予了他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分配他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副主席。至于張國濤最後隻身逃出邊區，投入國民黨的懷抱，那衹是他個人的問題了。

爲了提高幹部的軍政素質，除派遣部分幹部去延安抗大等學校學習軍政理論之外，各部隊對在職幹部的學習也都抓得很緊。由于我們這些幹部特别缺乏軍事理論知識，除了系統學習軍政理論外，還把毛主席在抗大所講的戰略戰術問題，向我們作了傳達，以幫助我們深入學習軍事理論。

在部隊的軍事訓練上，則主要是强調對戰士進行隊列戰術的教育，有計劃地開展軍事訓練。同時，在部隊開展以識字和算術

爲主要內容的學文化活動，由各個連隊的文書兼任文化教員。

鄧小平就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後，十分重視幹部的學習問題，尤其是對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抓得很緊，有時還進行測驗。一次鄧小平給紅一軍團每個團以上幹部發了一份試卷，上面有十幾個問題，要求大家寫出答案，由他親自一一批改。記得那次考試我得了九十五分。另外，鄧小平還要求大家寫日記，把每天做了些什麼事都寫出來，一是可以幫助記事，二是可以借此來提高文化水平。這個習慣我一直堅持了許多年。可惜的是，我寫的那些日記，後來在戰爭年代中都散失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一軍團還舉行了一次運動大會，參賽的有一師、二師、四師和軍團直屬隊。那時一師的師長是楊成武，政委是鄧華，二師師長是黃永勝，政委是蕭華，四師師長是李天佑，政委是楊勇。二師選了五團爲代表，由蕭華親自帶隊參賽。

運動會大概開了半個來月，一共分軍事、政治、體育三大項目。先是軍事技術比賽，如射擊、刺殺、投手榴彈、爬障礙、修工事、過獨木橋等。然後是體育比賽，包括籃球、排球、跑步、跳高、跳遠等。最後是政治測驗。每天晚上，各參賽隊還進行唱歌和演節目比賽。在這次運動會上，由于一師的楊成武、鄧華，特別是鄧華抓得很緊，事先作了充分準備，結果一師在大部分項目中得了第一，總分也是第一，二師全面敗下陣來。二師本來是一軍團的主力，各方面工作一直都是走在前面的，這一次敗陣，弄得二師的同志都很不高興。蕭華好勝要强，這時候一看二師成績不好，就認爲是裁判不公正。于是，在開會總結發獎的前一天晚上，私自把五團帶回了駐地。對此，軍團聶榮臻政委、鄧小平主任非常生氣，嚴厲批評了蕭華。

後來蕭華被調去延安學習，鄧華調到二師當了政委。鄧華要求嚴格，以身作則，什麼事情都從自己做起，從師司令部、政治部做起。他每天都親自到操場上去和大家一起參加訓練，有個小青年幹事，跳木馬跳不過去，他就幫助推着跳過去，這一下，大家都緊張起來了。軍事技術，體育運動，政治等幾大項目，很快

的就都上去了。黃永勝對軍事訓練抓得也很緊，天天親自帶着部隊演習，下操，親自到場檢查，部隊很快就變了樣。

通過整訓，部隊的軍容風紀也有了較大的改變。幾個月下來，各個部隊都是整整齊齊、乾乾淨淨，講衛生、講整潔、講禮貌、講文明。當時，部隊的住地比較寬裕，生活條件比較好，活動也比較多，真是有面目一新的感覺。

這個時期，部隊大大的鞏固了。那些在直羅鎮戰鬥被俘後參加紅軍的原東北軍戰士，大多經過正規訓練，基礎比較好，軍事上都有一手。因此，在政治上得到提高以後，許多原東北軍戰士被提拔當了班長、排長，甚至有當副連長的。當然，也有極少數原東北軍戰士開了小差，甚至有個別帶槍逃跑，被抓回來槍斃了的。那個時候部隊裏有條規定，凡是帶槍開小差的，抓回來一律槍斃。

從一九三七年三月開始，我們二團在寧縣一共進行了六個月的整訓。這是我參加紅軍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休整，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以前我們都是三天兩頭地打仗，甚至有一天打兩三仗的。從我參加紅軍以來，從來沒有在一個地方休整半年不動的，這是形勢空前大好的一個標志。從山城堡戰鬥以後，部隊就再没有打過仗。戰士們體力强壯，情緒飽滿，虎勁很大，部隊鞏固，朝氣蓬勃。

可以說，這個時期的整訓，爲即將到來的抗日出征，從各方面作好了充分的準備。這個時期可以說是抗日出征的準備階段。

第五章　抗日戰爭（一）建設蘇北根據地

一、三原改編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軍向駐守在北平城郊宛平縣盧溝橋的中國守軍國民黨第二十九軍發動進攻，盧溝橋的槍聲打響了，抗日戰爭從此開始。

中共中央于七月八日發出《爲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指出“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祇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中央軍委致電國民黨政府，要求立即將紅軍改名爲“國民革命軍”，作“抗日先鋒、與日軍決一死戰”。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命令紅軍集中到陝西三原地區，整裝待命，準備開赴華北前綫。

八月上旬，遵照總指揮部的命令，我們從寧縣出發，按照上一次去三原的路綫，又來到三原地區，休整待命。

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陝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確定了獨立自主地在敵後開展游擊戰爭的任務和政策。會上毛澤東主席指出，全國抗戰的戰略總方針是持久

，而不是速決戰。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所謂“獨立自主”，是在統一戰綫下堅持獨立自主的立場，保持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所謂“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區創建根據地，然後向平原發展。所謂“游擊戰爭”，就是指分散以發動群衆，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了就走。通過這次會議，明確了我軍在抗日戰爭初期這樣一個歷史轉折關頭，所必需實行的軍事戰略轉變。

洛川會議是中共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它明確了在抗日戰爭初期這樣一個歷史轉折關頭，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所必須進行的政治、軍事戰略的轉變。因此，洛川會議決議傳達到三原地區以後，我們普遍進行了深入學習，力求很好地領會會議的精神實質。

八月二十五日，中央軍委發出整編命令，宣布將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又改稱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參謀長葉劍英，副參謀長左權，政治部主任任弼時，副主任鄧小平。根據命令，由原紅一方面軍改編爲第一一五師，由原紅二方面軍改編爲第一二〇師，由原紅四方面軍改編爲第一二九師，每個師的編制人數爲一萬五千人左右。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參謀長周昆，政訓處主任羅榮桓，副主任蕭華；一二〇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參謀長周士第，政訓處主任關向應，副主任甘泗淇；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參謀長倪志亮，政訓處主任張浩，副主任宋任窮。

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共轄三四三、三四四兩個旅，一軍團改編爲三四三旅，旅長陳光，副旅長周建屏，參謀長孫毅；十五軍團改編爲三四四旅，旅長徐海東，副旅長黃克誠，參謀長陳漫遠，政訓處主任崔田民。我所在的二師改編爲三四三旅六八五團，團長楊得志，副團長兼政訓處主任鄧華（實際爲政委），參謀長彭明治。四師改編爲三四三旅六八六團，團長李天佑，副團長楊勇。二師的四團改編爲一營，營長姓劉，叫什麼名字我忘了；五團改編爲二營，營長曾國華；我所在的六團改編爲三營，梁興

初以後回來當了營長。

由于部隊改編，各級幹部通通都降一級使用──師長改任團長，團長改任營長，營長改任連長，連長改任排長。由于我在二團工作的時間比較長，從一九三五年九月哈達鋪整編來到二團以後，就一直都在二團工作，因此這次三原改編中，組織上沒有要我去三營任教導員，而是把我調任六八五團政訓處副主任兼組織股長。當時六八五團的宣傳股長是王輝球，民運股長是曾思玉。

二師接到改編命令後，即在三原駐地召開了八路軍抗日出征誓師大會，全師三千多人全體到會。大會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和軍團的決定，宣布了部隊改編後的番號和對各級幹部的任命，特別强調要在部隊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保證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堅持政治工作制度，保持紅軍的本質，牢記我們是人民的軍隊，要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要堅決拒絕和自覺抵制國民黨軍隊的那一套。

會後要求大家立即換裝，要大家脱下身上所穿的紅軍軍裝，改穿國民黨軍隊的制服。大家依依不捨地拿下有着紅五星帽徽之後，穿上了國民黨軍的制服。我看到，許多人都將八角帽和紅五星帽徽珍藏在自己的包袱中，準備留作永遠的紀念。經過一段時間教育，雖然極少數的同志還有點抵觸情緒，但是絕大部分同志完全擁護黨中央的英明決策，一致認爲祇有國共兩黨團結抗日，才是我們目前唯一的出路。

紅軍時期從此結束了。三原改編，正式標志着八路軍、新四軍時期的開始。從這一天起，我們這些以前的紅軍戰士，便身着八路軍軍服，投身到了抗日戰爭的峰火之中。

---

[1] 由于當時采用的是國民黨軍隊的編制，因此部隊不設政委，政治部（處）也改稱爲政訓處，其後不久，中央軍委決定在八路軍中恢復政治委員制度，命令聶榮臻、關向應、張浩分別任一一五師、一二〇師、一二九師政委，政訓處也恢復爲政治部（處）——編者注。

二、首戰平型關

“七七事變”的爆發，成爲我國全面抗戰的起點。日本帝國主義狂妄宣稱，要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開始，日本侵略軍發起大規模的進攻。七月底，日軍攻陷北平與天津。之後，日軍又以平津地區爲基地，沿平綏、平漢、津浦三條鐵路綫，向中國軍隊發起了全面的進攻。八月中旬，日軍又在上海制造事端，企圖攻占上海，并奪取南京，以迫使中國政府屈服。

由于華北戰局十分危急，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我們没有改編完全就緒，就在三原地區誓師出征。出征前，八路軍總部召開幹部會議，向我們介紹了當時的形勢和任務。會議向我們傳達說，當時侵華日軍已成立了華北方面軍司令部，兵力已增至三十餘萬人。敵人沿三綫南下，采取大迂回的進攻態勢，意在攻占太原，進而完成奪取華北五省的企圖。由于國民黨軍隊的潰敗，華北戰局已陷于混亂狀態，因此中央軍委要求我們立即開赴山西前綫，支持友軍作戰。中央軍委强調，我們不負擔正面戰場的作戰任務，不打硬仗，而是要堅持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深入到敵後，廣泛地發動群衆，創建抗日游擊根據地，鉗制敵人，使敵人不能順利南下。要設想在敵人占領整個華北後，我們能堅持廣泛有力的游擊戰爭。

當時進入山西的日軍，正兵分兩路直攻太原。兩路日軍，一路由大同進攻雁門關，一路由蔚縣、廣靈進攻平型關，如果這兩關失守，太原必然淪陷。爲了幫助友軍守住雁門關和平型關，挫敗日軍攻占太原的企圖，中央軍委決定，八路軍立即兵分兩路迎戰日軍：一二九師馳援雁門關，一一五師馳援平型關。

八月底，六八五團從三原出發，日夜兼程，趕到黄河邊韓城的芝川鎮集結，準備渡河後，繼續西進至侯馬，改乘閻錫山派來

的火車北上。河邊的船隻早就準備好了，衹用了兩個小時，我們全團的三千多人就都渡過了黃河。

渡河以後，部隊繼續前進，又走了二、三十里路，在天還没有完全黑時，部隊來到離侯馬不遠的地方駐了下來，準備在侯馬改乘閻錫山派來的火車北上。侯馬地處晋西南，平型關地處晋東北，從侯馬到平型關，幾乎要穿越整個的山西省。因此，在到達侯馬之後，各個部隊除忙于計算人數、分配車厢外，還準備了大量的乾糧，并帶了不少的咸菜和油、鹽及調料，我們整整忙了兩天。

到達侯馬附近的第二天晚上，我剛剛從下面部隊回到團部，羅榮桓和蕭華就騎馬來到了我們的駐地。當晚，他倆召集團裏的幾個領導開了個小型會議，就在一個老百姓家裏，桌上點着一盞油燈。會議的重點是批評黄永勝，主要問題是幹部之間的團結問題。羅榮桓當場宣布將黄永勝調師部另行分配工作，由楊得志來接任六八五團的團長。我當時對這個調動不理解，但因剛到團部，不了解情况，在會上就没有發言。會議一直開到了十二點左右，最後黄永勝表示，調動工作是常事，我服從組織的决定。第二天他就走了。隊伍由鄧華帶領到了侯馬。又調來了陳正湘和蕭遠久兩位副團長。這時梁興初也從抗大學習回來，當了三營營長。

經過兩天的準備後，部隊從侯馬上了火車。我們全團三個營加團直屬隊，一共坐了五列火車。每列車衹有少數幾個客車厢，大部分是悶罐子貨車。在這些悶罐子車裏，幹部、戰士一排一排地按次序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坐下以後，便不能隨便亂動了。我這是第一次坐火車，絶大多數人也是第一次，大家都覺得很新鮮。

閻錫山修的鐵路，鐵軌比較窄，火車比較小，和省外的不相通。單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閻錫山要搞獨立王國的野心。九月九日上午，火車開動後，一直沿同蒲路北上。火車停下來的第一站是臨汾，第二站是趙城，走了一天才到達霍州。到霍州時正好

碰上下大雨，從車厢裏可以看到汾河裏的水流很急。

從霍州到介休，鐵路所走的大都是山區，兩邊的山很陡。由于山勢陡峭、路軌狹窄，一下大雨，兩邊的泥石流就衝下來把鐵軌壓住，讓火車無法開行。那一段路，我們常常是乘火車走幾里，就得下來把鐵軌上的泥沙鏟掉，然後再上火車往前走。由于火車頭的馬力不足，有時上坡時還得叫我們下去推。俗話説，"牛皮不是吹的，火車不是推的"，但我們就硬是推起了火車。就這樣，從霍州到介休，連修路帶推車，一、二百里的路，我們走了一天一夜，到九月十一日下午才到達介休。

到介休以後，路就好走了，天也晴了。九月十二日，我們經平遥、祁縣，來到了同蒲路與正太路相交的榆次縣。九月十三日繼續乘火車北上，途經太原城時，天已黑了，遠遠望去，衹見到城内一片燈光。我們在太原站停了約個把小時，就又繼續北上。以後，再經陽曲、忻州到達原平。在原平我們下了火車。部隊集結起來後，迅速沿公路向平型關急進。我們相繼經陽明堡、代縣、繁峙，一路急行軍來到了平型關以西的大營鎮待命。

九月二十四日，團長楊得志去師部接受命令，并由師長林彪、政委聶榮臻帶領去偵察平型關的地形和前面的敵情。回來後，他召集了幹部會議，對領受的任務和觀察到的情况進行了傳達和介紹。我們得知，平型關位于古長城上，關内關外群山重叠，地勢十分險要。從平型關東北山口到靈丘縣南部的東河南鎮，是一條狹窄的谷道，其間從關溝至東河南鎮長十三公里的地段，地形極爲險要，而在這十三公里長的地段内，兩側高地十分便于我們隱蔽部署兵力，是伏擊殲敵的理想戰場。

楊得志傳達説，林彪、聶榮臻已决心利用平型關東北的有利地形，出敵不意，伏擊正由靈丘向平型關進攻的日軍第五師團（即板垣師團）的第二十一旅團，以配合友軍作戰。林彪還指定由三四三旅的六八五團、六八六團和三四四旅的六八七團擔任主要突擊力量。在師長林彪帶領大家偵察地形的同時，就已劃分好了突擊區域，明確了各個團的任務。

我們六八五團的任務是：占領老爺廟西南至關溝以北高地，截擊敵先頭部隊。由于平型關正面有國民黨部隊七個軍約二十萬人在防守，因此我們從後面截斷敵人以後，就向平型關攻擊前進，爭取把敵人消滅在靈丘和平型關之間的山溝裏。

師部命令我們團于九月二十五日凌晨前到達指定地點，把包括輕、重機槍和迫擊炮在內的火力陣地構築好，完成各項戰鬥準備。同時，爲保證這次戰鬥的突然性，師部要求各個參戰部隊一定要注意保密，保持高度的隱蔽性。

接着，政委鄧華在講話中指出，這次戰鬥，是抗日戰爭開始以來，也是我們改編爲八路軍以來同日軍進行的第一次戰鬥。日軍侵華以來，所看見的都是國民黨軍隊的節節敗退，因而氣焰十分囂張。我們這次一定要給予他們迎頭的痛擊，要打得勇敢頑强，敢于同敵人拼刺刀，白刃相搏，打出我軍的威風來。這次戰鬥，我們有許多有利條件，首先是地形險要，而且林彪、聶榮臻等師首長親自帶領各團領導幹部在前沿陣地作了詳盡偵察，選擇了最有利的地形，對整個戰鬥作了周密的部署。其次，我們所采取的戰術是伏擊戰、運動戰，突然襲擊，這對我們來説是拿手好戲，而對敵人來説，由于他們一直没有同我們作過戰，對我們這套拿手好戲還缺乏經驗。再就是，作戰地點是在中國，對地形，我們比他們熟悉，爬山也比他們行。他們的裝備笨重，靠的是坐汽車，而我們是輕裝，靠的是兩條腿，在山區要比他們輕便靈活得多。

鄧華還特別强調：我們六八五團在這次戰鬥中一定要打好，不能落後于其它兄弟部隊，要打出紅軍主力部隊的威風來。最後，他還要求我和政治處的幾個股長，立即分別到各營去幫助進行戰鬥動員。

根據鄧華的指示，我于當晚到了二營，找到營長曾國華、教導員劉振球，共同商量，然後集合全營指戰員進行戰前動員。爲保證消息不被走露，我們在動員會前規定了這次動員會上不準喊口號，不準有火光，不準鼓掌等。

接着，由我進行戰前的政治動員。我首先把自己剛剛了解到的情况，向全營指戰員作了傳達，之後向他們提出了堅决打好這一仗的幾點要求。然後，曾國華向全營指戰員宣布了出發路綫、聯絡口號、口令等。曾國華宣布完，部隊立即出發。根據鄧華的指示，我在這次戰鬥中隨二營行動。

當天晚上，天下着傾盆大雨，夜色如墨，伸手不見五指。爲了相互照應和聯絡，所有的幹部、戰士都把自己白色的洗臉手巾，綁在左手臂上作爲聯絡信號。我們冒雨前進，個個淋得像個落湯鷄，全身都是泥巴。好在山路并不太難走，路面有碎石子，走起來還不算很滑。

我們整整走了一夜，到九月二十五日拂曉，終于在規定時間之内來到指定地點，在公路南側的山背後埋伏了下來。等部隊埋伏好了以後，我爬到山頂上往下觀察，看到山下是一條深深的溝，溝兩側的山既高又陡。深溝裏，一條從東北向西南的公路，直通平型關。那時衹給團長、副團長配備望遠鏡，我是政治部副主任，没有望遠鏡，但從山頂也可以看見，公路上空蕩蕩的，什麽也没有，既没有人，也没有汽車，衹是隱隱約約聽到靈丘方向有炮聲，證明板桓師團正在沿着這條公路前進。

我們在埋伏地點等了兩個多小時，仍然没有見到日軍的隊伍。包括營裏幾個幹部在内的許多人有點着急，擔心我們會撲空。爲此，曾國華跑到團裏，去問楊得志和鄧華敵人怎麽還不來。楊得志叫他不要着急，要好好掌握隊伍，特别是要把火力點布置好，掌握好突擊的時機，準備一聲令下，就開始攻擊。楊得志還告訴曾國華，有什麽事情，團部會派通訊員給各營傳達，叫他以後不要再往團部跑。

等到八點鐘左右，我們終于聽到了從遠處傳來的汽車馬達聲，接着又隱隱約約在山下的公路上看見了汽車的影子。一會兒，就看見汽車一輛接着一輛地開過來了。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心裏驚嘆：啊，這麽多呀！看起來可能有一百多輛，每輛車的車頭上都插着一面太陽旗，一字長蛇陣的汽車後面，還跟着一大批馬

車。汽車車廂裏，身上穿著黄大衣、頭上戴着鋼盔、手裏拿着上了刺刀的槍的日軍士兵，一排一排、整整齊齊地坐着，每輛車有一個排的樣子，約三十多人。日軍的汽車一輛挨着一輛，走得很慢。

見到日軍的這種陣勢，我們又是第一次攔截車陣，不少戰士就有點沉不住氣，于是都來問："汽車好打嗎？"曾國華説："好打，他們在車上没有準備，我們一打槍，他們就連車都下不來了。"大家一聽高興了，説："是呀，我們突然一打，就能叫他們連下車都來不及。"

眼看着從我們面前過了幾十輛車以後，林彪從指揮陣地上給楊得志來了電話，命令隊伍出擊。接到林彪的命令，團部立即吹起了衝鋒號。頓時，我們的輕、重機槍和迫擊炮一起開火，各個部隊像猛虎一樣衝下山去。我也隨着二營衝下山去。

下山時，正好經過師的指揮陣地，我看到林彪正手拿着一個大望遠鏡，在那裏邊看邊指揮隊伍出擊。直到這時我才知道，師指揮部離我們六八五團的指揮陣地并不遠。

我們這猛一開火，立刻就把日軍打得懵頭轉向，一時間弄不清是從哪裏打來的槍。車是開不動了，他們慌慌張張地想從車上下來，有的就在車上向我們還擊，下了車的，就憑借車輛向我們回擊。由于道路狹窄、雨後泥濘，我們這迎頭一擊，很快就封閉了敵人前進的道路，把日軍的一百多輛汽車和二百多輛馬車，全都堵塞在公路中間四、五里路的範圍内，既不能前進，也不能後退。

這是一場十分艱苦的戰鬥。我親眼見到二營五連衝在最前面，連長曾憲生，指揮沉着，利用地形地物，一直衝到溝裏的公路上，兩支隊伍攪在一起，都分不清了。日軍想往山上跑，而我們則從山上往下壓。結果他們不少人就利用公路上的汽車和輜重作掩護，或用自己携帶的鐵鍬，在公路兩旁迅速爲自己挖個單人掩體，單個爲戰。

那些單兵作戰的日本兵非常頑强，拼命抵抗。你不過去，他

不開槍，你一過去，他就開槍。爲消滅他們，我們祇好分散開來，用手榴彈、用刺刀，一個一個地去打。就這樣，這場混戰一直打到中午時分，槍聲才基本停止。此時，活着的敵人已没剩下幾個。

日本軍國主義的教育還真厲害，日本兵都是被我們打死的，一個投降的也没有。以前我們打國民黨軍隊，一打就俘虜多少，這次却一個也没有俘虜到，都是一個一個地拼刺刀，我們一個坑一個坑的搜索前進。

這一仗，我們同日軍基本上是打了一場啞巴仗，雙方都是悶聲不響地拼刺刀，拼手榴彈，一直到把包圍起來的日軍全都消滅。因爲我們和日本人之間的語言不通，打起仗來，祇聽見他們哇啦哇啦亂叫，不知道他們究竟講的是什麽。同樣，我們喊"繳槍不殺"，他們也聽不懂，再加上槍聲、炮聲、手榴彈聲攪在一起，喊什麽都聽不清。

戰鬥結束後大家分析，這次戰鬥之所以没能抓來一個俘虜，除日本軍國主義武士道精神的欺騙教育外，語言不通，無法開展攻心戰術，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在敵人基本被消滅後，我跟隨着二營在戰場上搜索殘敵。這時，聶榮臻突然來到了公路上，見到我就説："現在給你一個任務，你負責找人把汽車上的東西，全都搬到我們來的那個溝裏去。"

我表示當時執行這一任務有困難，因爲戰鬥還没有完全結束，部隊正在搜索殘存的敵人，抽不出人來。聶榮臻就説："那你就叫機關的同志和伙夫來搬，另外到附近村子裏去找一些老百姓來幫着搬，無論是槍支、彈藥、物資、衣服、食品、罐頭等等，統統都要搬走，然後等待命令，放火把汽車都燒了，我們要這些汽車没有用，開不走。"我説："好，執行命令！"他又强調説："這個地段就歸你負責了，要快。"

我立即派通訊員先去找來團政治處的人，派他們到處去動員、集合人員來搬東西，不到兩小時就把汽車裏的東西都搬完了。

正在這個時候，天上來了一架日軍的飛機。也許是因爲鬧不清情況，分不清敵我，這架飛機既没有掃射，也没有扔炸彈，祇是繞了幾個圈，偵察一下就走了。

等敵人飛機走後，我就帶領幾個人把汽車都給燒了。燒汽車很簡單，用刺刀把油箱一捅，劃根火柴，馬上就能把汽車陣燒成了一片火海。那些馬車我們没有燒，因爲正好利用它們來拉繳獲的東西。

我們從車上搬下的東西還真不少，堆在那裏有一大堆，其中有三八式步槍和輕、重機槍，有一箱一箱的彈藥，還有日本大衣、鋼盔、鞋等等。吃的東西中，數餅乾最多，都是用塑料袋包裝得好好的。牛肉罐頭也不少，大的有幾十斤重，中的有五、六斤重，最小的也有一、兩斤重，一個大罐頭就够一班人吃的。還有糖，東西還真不少。

到下午兩三點鐘，東西搬完了，槍聲也不響了，隊伍撤回到了山上，準備着日軍的增援部隊來到。上山不久，就聽説由于六八七團的堵截，日軍的增援部隊没有能够過來。平型關戰鬥勝利結束。

平型關戰役後繳獲的日軍戰利品

打完仗開飯時，幾乎全團戰士都美滋滋的吃了一頓餅乾加牛肉罐頭。大家一邊吃還一邊高興地説：以前蔣介石是運輸大隊長，現在這個日本的運輸大隊長也不錯嘛！當時吃不完的就交給了各個連隊管生活的司務長，司務長可忙開了，動員大家把東西搬上馬車就往附近的村子裏撤，一路上就像長蛇陣似的，真够熱鬧。繳獲的槍就由戰士們分頭背上，準備換裝。

當天下午，我們清理戰場，掩埋犧牲同志的屍體，及時把傷員運往後方醫院，進一步搜檢戰利品。這時我們看到一些死了的

日本兵，身上都帶有護身符，是求神保佑他們不死。可這些護身符并没能保佑他們，最後他們還是無謂地死在這侵華戰場上，家中的妻兒老小依然日夜盼望他們能回國團聚，真是可悲又可嘆。

平型關一戰，我們共消滅了日軍板桓師團二十一旅團一千多人。有説消滅了三千多人，我看可能没有那麽多。繳獲步槍一千餘支，機槍二十餘挺，馬車二百餘輛，燒毁汽車一百餘輛。

這一仗打下來，我們的傷亡也很大，僅六八五團就傷亡二百多，其中以二營五連傷亡爲最重。五連因爲是衝在最前面，拼刺刀也拼得最厲害，最後共傷亡了六、七十個，一個連差不多損失了多一半。最令人痛惜的是五連連長曾憲生，他在同敵人肉搏中拉響手榴彈，與敵人同歸于盡了。曾憲生是一個著名的戰鬥英雄，壯烈犧牲時才二十多歲，真是英勇頑强。

也有經不起考驗的人。平型關戰鬥之前，就發生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時任一一五師參謀長的周昆，奉命去洛陽國民黨政府第一戰區領取一一五師的第一次軍餉。這個周昆竟然見利忘義，將領到的三萬銀元貪爲已有，携款私逃，脱離部隊，成了一名可耻的逃兵。以後周昆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

八路軍首戰告捷，使全國人民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極大地振奮了全國人民的民心和士氣，提高了中國共産黨和八路軍的聲望，同時也極大地挫傷了敵人的鋭氣，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後來在鄭律成所作的《八路軍軍歌》中，就有"首戰平型關，威名天下揚"的歌詞，給平型關戰鬥很高的贊譽。這首歌，一時成爲部隊指戰員最喜愛的歌曲之一，流傳軍内外。

平型關戰鬥，是一一五師領導林彪、聶榮臻、羅榮桓等正確執行黨中央、中央軍委戰略方針的結果，是林彪等正確指揮的結果，同時也是一一五師廣大指戰員浴血奮戰的結果。

平型關戰鬥的勝利，將永遠載于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史册！

三、創建晉西南根據地

在八路軍一一五師在平型關給敵人以有力打擊之時，日本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却南下突破了國民黨軍的内長城防綫。與此同時，平、津方向的敵人也經盧溝橋、淶源、上寨等地，直逼平型關南側之繁峙，閻錫山的幾個軍隨之全綫崩潰，向太原退却。由于正面的國民黨部隊一觸即潰，使整個戰場形勢起了相當大的變化，并把我們置于了日軍南北夾擊的態勢之中。根據中央軍委獨立自主開展山地游擊戰争的戰略部署，八路軍總部決定我們向五臺山區縱深撤退，在那裏休整待命。

撤退後，我們利用這個休整機會，進行了平型關戰鬥的總結。大家一致認爲，這次戰鬥打得好，打得頑强。所以能够打勝，大家認爲主要有以下幾條：

第一、戰前的準備工作做得好，地形偵察細致，所選的伏擊地點十分有利于我們發動突然襲擊。

第二、正面有閻錫山的部隊擋住了敵人的主力，吸引了敵人的注意力，使我們能够從後面打敵人一個出其不意。

第三、保密條件好，戰場周圍的老百姓是絶對擁護我們，幫助我們的。在群衆的幫助、帶領下，我們可以毫無聲息地從各條山溝通往我們預定的伏擊點，而日軍衹能通行在兩面毫無掩護的公路大道上。

第四、日軍的行進全部依靠車輛，我們一發動突然襲擊，他們一時之間下不了車，一個手榴彈扔在汽車上，他們馬上就死傷一大堆。這一有利情況是我們事先没有想到的。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熟悉伏擊戰、習慣于打伏擊戰，而且林彪指揮伏擊戰很有經驗。過去我們在江西打了很多仗，都采取的是這種辦法，在直羅鎮消滅東北軍一〇九師時也是用的這個辦法。這種辦法對我們來説是老一套，常用，但對日軍來説却很新，他們没有嘗過這樣的滋味。

尤其好笑的是平型關戰鬥後，日軍方面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説，你這個林彪，在平型關偷偷摸摸地打，這不算，應當公開布置一個陣地，從正面來打。這封信後來被林彪送到了中央，成了當時的一個笑話。

後來，我們打山西午城鎮時，也曾撿到過這樣的信。信是鉛印好了的，説你們八路軍要打仗，應該從正面來，不準在後面偷偷摸摸地打。這真是天大的笑話，我怎麽打仗還要你來規定！

在民主總結平型關戰鬥經驗的同時，大家還對一些具體的戰術進一步作了研究，例如怎樣打汽車、怎樣打汽車前面的魔托車部隊，還有飛機來了怎麽辦等等。大家認爲，在戰鬥進行中，如果來了飛機，最好的辦法就是不管它，因爲這時敵我雙方交織在一起，敵人是不敢隨便掃射、隨便亂扔炸彈的。

在總結中大家都談到一個現象，就是平型關戰鬥確實没有抓到一個活着的日軍這件事。大家都説，這些小日本還真够頑强，你就是把他殺了，他也是不投降、不繳槍。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認爲，雙方語言不通是個主要問題，語言不通，就無法展開攻心戰術。于是，在這次短暫的休整時間内，各部隊掀起了一個學日文的高潮。

蕭華給我們團派來一個日語教員，名叫張秀珂，黑龍江人，是流亡學生，也是著名女作家肖紅的弟弟，張秀珂以後一直給我當秘書，直到一九三八年冬。張秀珂來了以後，我們在鄧華的帶領下，先集中了各營的教導員、各連的指導員，以及團政治處的全體同志，大家坐在一個大草棚裏，先學字母，然後學幾句戰場上常用的簡單日語。

記得當時學的主要是“繳槍不殺”、“優待俘虜”、“不没收你們私人的財物”、“侵略中國是非正義的，你們爲什麽到中國來，我們并没有到你們日本去”等幾句。唉，就這幾句話，我們就學了整整一個星期！當時我們是反復地學、反復地念，念不準確，教員就一個一個糾正。大家的決心很大，認爲學日文是戰鬥的需

要、非學不可。平型關戰鬥，我們在軍事上的許多特長都發揮出來了，可就是因爲語言不通，才影響了戰鬥的進一步勝利。

平型關戰鬥中，我們曾繳獲了日本人的幾十匹馬。這種馬很大，很好看，不過我們全都交給了一一五師的騎兵連。從那以後，我們在行軍中經常可以看到，林彪穿着繳獲的日本軍大衣，騎着日本的大洋馬，帶着一個騎兵排穿越我們的部隊往前走，先到宿營地去工作。聶榮臻有時和他在一起，有時不在。戰士們見到林彪、聶榮臻都很高興，因爲是他們領導我們打了勝仗。

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一個下午，我們來到了五臺山頂。五臺山由五座山峰環抱而成，山高三千零五十六米，周邊長二百五十公里。五臺山的峰頂平坦寬闊，好像是土築成的一個平臺，所以稱之爲五臺山。五臺山是我國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山上共有寺廟四、五十座。這些寺廟大都建築壯觀，金壁輝煌，寺內的彩畫精美，塑像雕刻栩栩如生。一般情況下，寺廟裏香燭很多，香氣撩人。我還是第一次見到的這樣漂亮的寺廟。

在五臺山頂上，我碰到了黄克誠同志，當時他是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的組織部長，他帶着一個警衛員兩匹馬來我們這裏檢查工作，同鄧華一起住在一座廟裏。鄧華要我同他一起向黄克誠匯報了團裏的工作。

黄克誠來到團裏的第二天，延安新華總社的一個記者來拍電影，要六八五團重演一次平型關戰鬥。爲此，楊得志準備這準備那地忙了一整天，終于第三天趁有太陽時拍成了電影。

我們在五臺山期間，華北戰場的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抗日戰爭開始後，到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的短短幾個月内，華北日軍即占領了察哈爾、綏遠、山西、河北四省大部和山東省一部，控制了華北的主要交通綫。對此，毛澤東在十一月十二日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中指出："在華北，以國民黨爲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爲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十一月十三日，毛澤東又指出："八路軍當前的任務是堅持華北游擊戰爭，

同日軍力争山西省的大多數鄉村，使之化爲游擊根據地，發動群衆，收編潰軍，擴大自己，多打勝仗，興奮士氣，用以影響全中國。"

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決定，八路軍當前的中心任務應以山西爲主要陣地來支持華北抗戰，獨立自主地開展游擊戰争，創建根據地。根據總部的決定，我們六八五團當時的任務，是隨一一五師主力前去創建晋西南根據地。由于晋西南地區既是陝甘寧邊區的東部屏障，也是陝甘寧邊區聯系晋冀豫抗日根據地的紐帶，因此我們的任務十分重要。

這時，日軍板桓師團已占領太原，閻錫山的部隊在全綫崩潰後，已渡過黄河，來到陝西宜川的丘陵地區。由于太原淪陷，山西省其它没有淪陷的地區因得不到指令，大都各自爲政，亂成一團。我們接到一一五師師部的命令，要六八五團在五臺山的豆村休整一個星期，以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接到休整的命令，楊得志和鄧華便想趁機進行一次黨内的組織紀律教育，要我起草一份教材。可真把我難住了，因爲當時没有任何參考材料，加上我很長時間没寫這種文件了，但楊得志和鄧華的命令祇有堅决執行。當晚，我費盡了心思，用了一個通宵寫了一個"黨員組織紀律教育十八條"，内容主要有：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的支部組織分工和支部生活；黨員必須遵守組織紀律；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黨員必須以身作則，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一切，爲抗日戰争的勝利和中華民族的解放而犧牲個人生命等，詳細内容記不清了。天亮後，我將這份草稿交給楊得志和鄧華修改後，立即油印發給全團各連進行教育，并規定全團黨員必須在一周時間内學完。

就在我們快離開五臺山的時候，中央軍委突然之間來了一個命令，要一一五師政委聶榮臻帶一批幹部留在晋察冀創建根據地，把黄永勝留下了，鄧華和陳正湘也留下了，楊成武的獨立團和六八五團三營曾國華也留下了，要楊得志、蕭遠久和我帶着六

八五團的一營、三營和團直屬隊南下。這樣，六八五團就在五臺山分了家。我們趕緊叫司務長買了幾隻老母鷄，準備了一點酒菜。我把政治處王輝球、曾思玉等幾個股長都找了來，一起爲鄧華送行。這一頓送行酒，我們一直吃到天快亮的時候。次日天剛亮，我們出發了，鄧華也就留下了。

之後，我們六八五團從豆村出發，經五臺、盂縣、壽陽一路南下，到達了石拐鎮。這天，楊得志告訴我，要我帶領政治處的全體同志，跟隨六八六團政委楊勇到晋南去擴兵。這樣，我和楊得志在石拐鎮分了手。在這之後的一段時間裏，我的專職任務就是擴兵，不再管部隊的工作了。

從石拐鎮出來，我帶着團政治處的同志隨左權、楊勇一起，經沁源、安澤到達臨汾。在臨汾附近，我們見到了北方局書記楊尚昆。楊尚昆決定，楊勇留在臨汾，在這一帶擴兵，要我去運城地區，找運城特委的同志聯系。于是，我們又來到了運城。

運城位于晋西南的三角地帶，因爲西傍黄河，歷史上又將其稱之爲河東。在運城境内，海拔千米的中條山（太行山支脉）橫桓在東南部，像祗卧虎似地保衛着這塊富繞的盆地。據介紹，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歷代名人迭出，上至傳説中的舜、禹、成湯，下到名將關羽、薛仁貴等人的故鄉，都在這裏。

我們來到運城時，閻錫山的運城行政公署還在城裏，我們的黨還没有公開，是秘密的。運城特委書記名叫張稼夫，他已得到北方局的指示，要特委把擴兵工作視爲地方黨和部隊的共同任務。所以他們全力進行協助，出了很多的力，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

運城行署下轄十幾個縣，我們的擴兵工作就在這十幾個縣裏進行。我把政治處的人分成相應的小組，分别派到各個縣，我自己則留在運城城内擴兵，居中協調指揮。宣傳股長王輝球帶了一個組到河津，民運幹事石瑛帶了一個組到夏縣，組織股長曾思玉帶了一個組到臨猗，還有一個保衛股長帶了一個小組到萬榮。

擴兵期間，我們到處召開大會，向群衆進行抗日宣傳。通過宣傳，使廣大群衆知道中國抗戰的形勢已十分險惡，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紛紛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中華民族危在旦夕。我們還用各種事例向群衆説明，日軍所到之處，祖國的大好河山爲日軍鐵蹄所踐踏，到處尸骨成山，血流成河。我們號召有志熱血男兒奮起參軍，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救亡圖存，敵人從哪裏進攻，我們就要他在哪裏滅亡，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軍趕出山西，趕出華北，趕出全中國。與此同時，我們還向地方有名望的人士、抗日進步人士進行統戰工作，要求他們齊心協力，同仇敵慨，團結自救，化干戈爲玉帛，共同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

運城擴兵期間，我帶着技術書記楊永松和一個警衛班，住在城裏一座已經停課的中學校内。除了具體負責城裏擴兵工作外，我還借了一輛自行車，每天跑幾十里地去各地檢查擴兵工作，聽取有關擴兵情况的匯報。

各縣擴來的新兵，多了就直接送到臨汾團部，少了則先在運城集中，然後由運城轉送臨汾。一般來説，每半個月我們送一次新兵去臨汾團部，交給楊得志。我們在運城搞的這次擴兵，一直搞到了一九三七年的年底。經過兩三個月的工作，我們擴到了一千多人，其中有包括個别大學生在内的一批青年知識分子。那個時候的所謂知識分子，也就是一些中學生。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到了部隊以後，我們都相應地給他們分配了適當的工作。

由于原先曾國華帶領的二營留在了五臺山，一直没有歸隊，以後蕭華以曾國華這個營爲主力，到了天津以南，濟南市以北這個地區，開展游擊戰争，開創抗日根據地。這次新擴的一千多人來到團裏之後，楊得志就把他們編成了一個新二營，并任命周長勝爲營長，蔡元興爲教導員，同時從一營、三營中抽調人員去擔任各班、排、連長。新二營的人員是比較充實的，就是槍不够。其實當時我們發現了閻錫山在那裏封存的一窑洞槍、炮以及鴉片，而且窑洞没人看守，但爲了統一戰綫的需要，我們没有動這些武器。這樣，新二營的武器問題，就祗能依靠戰鬥來解决了。

經過這次擴兵，我們六八五團不僅重新健全了三個營的建

制，而且全團有了將近四千人，應當説已經很滿員了。

平型關戰鬥後，一一五師的兩個旅就分開了，三四三旅由師部率領，先到晋南後到晋西，準備創建晋西南根據地；三四四旅則在徐海東、黄克誠的率領下，轉到了晋東南，由八路軍總部直接指揮。晋西南這次擴兵，我們一一五師師部、三四三旅旅部和六八五團、六八六團都在駐地附近擴大隊伍，共擴到了三、四千人。這些新擴大的人員除了補充老部隊外，師部又將其餘的人加上晋西南原有的地方武裝，編成了一個補充團，并任命陳士榘爲團長。這樣，三四三旅在原來兩個團的基礎上，又新增了一個團，等于擴大了三分之一。

一九三七年年底，擴兵任務告一段落後，我們全部人員收兵回到臨汾，六八五團團部住在汾河以西一個叫蘇家村的村子裏。在這裏，我們度過了一九三八年的元旦。

在我去運城擴兵期間，團裏衹有團長楊得志和副團長蕭遠久、參謀長彭明治在家。由于團裏没有了政治幹部，羅榮桓派師政治部組織科長唐亮來團裏協助主持政治工作。聶榮臻留在晋察冀後，中央軍委又任命羅榮桓爲一一五師政委。我回到團部後，唐亮就回去了。

元旦過後，蕭華被任命爲三四三旅政委，接替了周建屏，旅長還是陳光。接着師裏又下達了一個命令，任命我爲六八五團政治委員。這時的六八五團，團長是楊得志，政委是我，副團長蕭遠久，參謀長彭明治。這樣，新的六八五團團部組成了，團裏的幾個主要幹部基本配齊了。下面的幹部也發生了變化：一營營長胡炳雲，教導員王東保；二營營長周長勝，教導員蔡元興；三營營長梁興初，教導員劉忠英。

團政治處的幹部中，由于曾思玉調旅政治部任民運科科長、王輝球調旅政治部任宣傳科長，我們又任命了石瑛爲民運股長，邱子明爲宣傳股長，還任命郭成柱爲組織股長。還有一個青年股長没有合適的人選，正好這時從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分配來了一批畢業生，其中有一個名叫肖奏萍的同志，各方面的條件都很不錯，我們把他安排到團政治處當了青年股長。

隨着這批抗大學生的到來，我們還逐漸把全團所有連隊的正、副指導員和文化教員，都换成了抗大學生。同時，以營爲單位，將所有的幹部按文化程度進行編班學習。各營除正副營長、教導員外，都另設一個文化組長，專管全營的文化教育。當時有個叫李恩求的抗大學生，就在二營當文化組長。團政治處還設了一個日文教員，名叫張秀珂，他不但日文好，寫作能力也很不錯，以後一直在六八五團教日文。這樣一來，部隊的文化水準有了提高，爲以後開展軍事、政治學習打下了基礎。學習的空氣很濃。

另外，我們還從延安來的抗大學生中，選擇了二十多個人組成團裏的宣傳隊，結束了六八五團没有團宣傳隊的歷史。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軍第二十師團分兵幾路，像梳篦子一樣沿鐵路及公路南下，向晋西南發起進攻，先後侵占了介休、孝義等地。面對來勢洶洶的敵人，林彪决定先避敵鋒芒，讓一一五師師部和三四三旅的幾個團從臨汾向西撤退，進人山區，然後再尋找戰機，再打幾次像平型關戰鬥那樣的伏擊戰。

爲了布置這次撤退和實施自己的殲敵計劃，林彪率師部來到了兑九峪附近的碾頭村。林彪來到後，立即就在師部召集三四三旅旅部的幹部以及所屬三個團的幹部開會。楊得志和我前去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議就在林彪所住的民房内召開。屋的中間擺了一張四方桌子，桌旁有幾條長板凳，我們就在那裏開會。板凳上坐不下的，就往旁邊的炕上坐。

林彪要我們先匯報部隊的情况。楊得志首先對六八五團的情况作了總的匯報，我補充匯報了擴兵情况。接着，楊勇、陳士榘等依次作了匯報。林彪聽了很高興，表揚我們説：平型關戰鬥後，我們轉移很順利，擴兵成績很大。現在我們不僅隊伍擴大了，減員很少，没有開小差的，而且部隊的士氣旺盛，鬥志很高，一路上群衆紀律也很好，這説明我們的工作是有成績的。

接下來，林彪對當時的全國形勢作了分析。他説，目前，日

軍正沿着津浦、同蒲、平漢三條鐵路綫南下，整個華北已完全淪爲敵後，今後，游擊戰爭即將成爲華北戰場抗戰的主要形式。但他認爲，雖然華北已完全淪陷，但全國的抗日形勢，將會越來越好。

他還向我們介紹，三四四旅經中央命令進入晋東南，在長治地區待命，由十八集團軍總部直接指揮；北方局和一一五師師部在一起，率三四三旅暫在黄河東岸、同蒲路西堅持鬥爭，在這裏開創和建立晋西南抗日根據地。

我們的任務是在敵人南進中再打幾個勝仗，以打擊敵人的氣焰，擴大勝利成果。最後，他布置了我們下一階段的具體任務是：一、堅持敵後抗日游擊戰爭。要打好仗，多打勝仗，多打犧牲傷亡小、勝利大的勝仗；二、要開創抗日根據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由我們自己派鄉長、區長和縣長，通過我們自己的政權籌款、籌糧、籌草和收税，解决部隊的供應問題；三、擴大組織抗日武裝，三人一組，五人一隊，逐漸擴編，從游擊隊改編成八路軍主力；四、同國民黨的抗日隊伍真誠合作，一起消滅日軍；五、支持在北方局領導下、由薄一波組建的山西青年抗敵决死隊，以及由薄一波負責的抗日統一戰綫組織——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六、對妥協投降、甘心當漢奸的，給予嚴厲打擊，没收其財産以補充軍費；七、在農村地區開展減租減息，改善貧苦人民的生活；八、部隊嚴守紀律，愛護山西人民。

我們回到部隊後，很快就將林彪的這一講話精神，向排以上幹部和全體黨員作了傳達。之後，部隊準備轉移。

二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就在一一五師師部向交口以南地區轉移時，林彪帶了一個騎兵連，騎着繳來的日本大洋馬，身穿繳來的日軍制服，沿公路向隰縣疾進，準備到隰縣城宿營。由于當時日軍正在向南攻擊前進，因此隰縣城内駐守的閻錫山部隊看見林彪等人，認爲是日本人來了，就要林彪一行停止前進。誰知林彪正跑在興頭上，没有聽清楚他們喊什麽，仍舊沿着公路向縣城前進。這下子就發生了誤會，城頭上劈裏叭拉的打開了機槍，把跑在最前面的林彪打成了重傷，傷口離肺部很近。由于敵後醫療條件差，在進行緊急救護後，中央下令立即把林彪送去延安治傷。

林彪負傷，當時我們并不知道，是羅榮桓事後向我們通報的。我們在聽到這一消息後都非常難過。在這之前，林彪經歷過許許多多次戰鬥，從没受過傷，在打平型關那樣殘酷的戰鬥中也没有負傷，現在反而在没有戰鬥的情况下，傷在了閻錫山的部隊手中。好在隰縣離延安還不算遠，否則情况可能會更糟。

林彪負傷後，中央軍委命令由陳光任一一五師代師長。

就在林彪負傷之後不久，日軍從祁縣出發，沿幾條公路南下，于二月底前後相繼占領了隰縣、軍渡和磧口，從而使陝甘寧邊區的黄河河防受到威脅。爲保衛陝甘寧邊區，一一五師代師長陳光、政委羅榮桓奉總部之命，帶領我們六八五團、六八六團和補充團，轉入隰縣、午城、大寧地區，準備在公路上與敵人糾纏，敵人每前進一步，我們就伏擊他一次，從而以這種方式來牽制敵人的兵力，保衛黄河渡口。這樣的戰法與敵人接觸和打仗都很多，在敵人進入到隰縣和午城之間時，我們就已經打過五、六仗了。

在我們的節節抗擊中，日軍的一個中隊占領了午城鎮，但後續部隊尚未趕到。這是一個大好機會。陳光、羅榮桓當即决定，要消滅午城鎮的這個日軍中隊，并命令六八五團主攻，六八六團打援。

當天晚上，六八五團三個營在楊得志的統一指揮下，居高臨下，由兩邊塬上往下攻，直逼午城鎮。在攻進鎮子後，我們又逐段逐段地攻擊前進，與敵人一間房一間房地進行激烈争奪。這一仗打得很艱苦，我們整整打了一個晚上，才最後消滅了那個中隊。但這一仗我們自己的傷亡也不小，也傷亡了百把人。

在這次戰鬥中，我們開始嘗試用剛學來的日本話喊口號。但戰士們喊口號，日本人聽不懂。最後我把張秀珂給叫來了，要他直接到前面去喊話，他說的話，日本人聽懂了，但爲時已晚，一個中隊的士兵，基本上都已打死打傷，最後衹抓到了一個活的。

這是我們第一次抓到的活着的日本人。這個日本人叫什麽名字，我記不清了，把他送師部後又轉送到了什麽地方也不知道了。

因爲敵人一共衹有一個中隊，所以這一仗我們繳獲的武器并不多。但有一個意外收獲：就是找到了閻錫山部隊潰敗時埋藏的武器。閻錫山潰敗時，丢下了不少武器和資財，有的埋在地下，有的放在窑洞裏。

那是在我們正在打掃戰場時，一營來人報告，説是發現了閻錫山部隊埋在地下的槍和炮。聽了這個報告，楊得志和我都很高興，立刻就動員全團戰士一起去挖，結果挖出了很多"三八式"步槍和一箱一箱的子彈，并且還有山炮。當時我們覺得山炮的用處不大，就没有要。挖出的槍和子彈，除補充本團外，其餘都上交給了師部。

打了午城這一仗，終于迫使這一路敵人轉而向東，到臨汾與同蒲路的敵人合流了，從而粉碎了敵西犯黄河河防的企圖。這一仗的戰果盡管不算很大，但對開辟晋西南抗日根據地和鞏固陝甘寧邊區河防都有重要意義。

午城戰鬥後，部隊奉命在大寧休整了幾天。

一天早晨，楊得志起得特别早，起來以後就在外面散步。我起得晚一點，就跟着他在後面走。走了一會兒，突然發現村子裏的好些窑洞都是封起來的。我們覺得很奇怪，就去問老百姓。老百姓告訴我們，那都是閻錫山封的，誰也不準動。得知是閻錫山封的，我倆就上去看了看，發現窑洞裏堆的都是鴉片烟，而且并没有人在那裏看守。于是我們商量，給羅榮桓打個電話請示一下，看能不能弄點鴉片來作軍費！問他要不要呀！如果要，就請師部派人來弄。

我當即回到團部給羅榮桓打了個電話。羅榮桓立即答復："絶對不能動，要照顧到統一戰綫政策的需要，對閻錫山在山西的東西，一點也不能動。"

根據羅榮桓的指示，我們就没有敢動。閻錫山的鴉片可真多，但是爲什麽没有人看守，難道不怕人偷和搶嗎？後來一查，這些

鴉片原來還是有人負責看守的，衹是都化裝成了老百姓，住在老百姓家裏了。當然，我們即使弄了，看守人員也不敢對我們怎麽樣，但影響總是不好。

一九三八年四月，陳光、羅榮桓又奉命率一一五師主力轉而往北，向汾陽、太原方向前進，深入敵後，在晋西南地區建立根據地，開展游擊戰争。

經過幾天行軍，我們來到了同蒲路的邊上。師部又回到兑九峪的碾頭村，我們六八五團在汾陽東南的孝義、介休、靈石、平遥一帶活動，團部住在西埠頭。而六八六團在汾陽以西，背靠黄河，過河就是陝甘寧邊區。補充團則在後面和師部在一起。這時，日軍爲控制晋西南地區，已經沿着同蒲路建立了不少據點。這樣，我們就在敵人的眼皮底下，根據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統一領導和部署，展開了建立晋西南抗日根據地的活動。

建立根據地，首先要做的就是鏟除僞政權，消滅維持會，建立包括鄉政權、區政權和縣政權在内的各級政權。此外，要擴大抗日武裝，組織游擊隊，建立婦救會、青救會等群衆性抗日組織，堅持敵後抗戰，并開展情報工作，深入敵人據點，掌握敵人動向。與此同時，積極進行減租減息工作，盡力幫助群衆搶收搶種、搞好環境衛生等。還要向地方進步人士及地主進行統戰工作等等。

羅榮桓按照北方局楊尚昆的統一計劃，對創建根據地的工作抓得十分深入細致，經常召集我們匯報和部署工作。

部隊休整下來了，我們就利用這個機會展開了一系列的訓練和學習。軍事方面的訓練，主要是組織廣大幹部、戰士學習軍事理論和基本戰術、技術，特别是着重學習怎樣打好夜間的伏擊戰和破擊戰（破壞公路、鐵路）。

政治方面的學習，則主要是組織營以上的幹部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學習政治理論和中國近現代史。每個星期，各團營以上的幹部都要集中到三四三旅旅部，由政委蕭華主持，由羅榮桓政委和楊尚昆書記分别給我們講一次課，羅政委講的是中國革命近代史和現代史，楊尚昆書記給我們講的是聯共黨史和哲學，我們

聽課回來後，再向連排幹部作傳達，組織他們一起學習。

羅榮桓還特別强調幹部學文化，要求能寫的幹部都要寫日記。他還指示，對文化程度比較低的團以上幹部，可以配備專職的文化教員。例如我們六八五團的副團長蕭遠久是工農出身，没有文化，羅榮桓就專門交待，要我們給他配備一個專職的文化教員。後來蕭遠久對我説："不要爲我專門配文化教員了，調個學生給我當警衛員吧，既當我的警衛員，又教我學文化。"

我説："好，就按你的意見辦！"就從部隊中選調了一個從平遥擴來的學生，給他當了警衛員。那個學生也很高興，表示很願意給蕭遠久當警衛員。但是他不懂軍事，没有戰鬥常識。有一次戰鬥中，蕭遠久要他把望遠鏡拿過來，結果他不知道正反，就倒着把望遠鏡拿給了蕭遠久。我知道這件事以後，就對蕭遠久説，那個學生兵還不懂得怎樣搞好警衛工作，就讓他專教文化，另外再單獨調個警衛員來吧！可蕭遠久不同意，説不用了，他就要這個學生兵，因爲這個學生兵人很好。不久蕭遠久得了肺病，很厲害，我們報告了師部，師部又報告了中央。中央認爲，蕭遠久是個老幹部、老紅軍，應當照顧，要他回延安進行治療和休養。蕭遠久對楊得志、我等幾個人都依依不捨，走的時候都哭了。最後，我們要供給部門給他拿了一點錢，他就騎着馬帶着那個警衛員走了。

從一九三八年四月一直到十月，我們在汾陽東南一住就是半年多，基本上没有打什麼大仗。這期間，楊得志和我經常帶着偵察員，穿著便衣，由當地的老百姓作向導，跑到日軍的據點附近去偵察地形，想尋找一個適當的地方打伏擊戰，但日本人始終在據點裹不出來，弄得我們一次伏擊也没有打成。

有一次出去偵察，時間一長我們兩人的肚子都餓了。但是找不到東西吃，因爲當地的老百姓很窮，據點附近的老百姓就更窮。楊得志祇好掏出一塊錢，請帶路的老鄉幫忙給買點鷄蛋，結果他用一塊錢買了二十斤。好家伙，這下可吃不完了！我們每人祇吃了幾個鷄蛋，剩下的全都帶回團裏給了炊事班。

我們出去偵察地形，經常到一家老百姓那裏去，時間一久，彼此之間就熟悉了。一次那老鄉問楊得志："長官，你有老婆没有，我給你找一個吧？"楊得志同他開玩笑説："我還没有呀，你給找一個吧。"

結果那老鄉把這話當了真，事後還真的去找了一個高小畢業的姑娘，當地人，長得挺俊。那天是姑娘的父親帶着她一起來同楊得志見面的，一見面，姑娘看到楊得志很年輕、很威武，就同意了。這邊，楊得志也覺得姑娘不錯。可姑娘的父親有條件，他硬是要楊得志拿出一百塊錢當彩禮。這一下，楊得志犯了難，説："我哪來的一百塊錢呀，公家的錢又不能給。"

我就給楊得志出主意説："給他幾百斤糧食算了。"那姑娘是願意的，可是她的父親硬是不幹。没有辦法，這事祇得暫時作罷。

這之後的一天，楊得志和我一起到師部去開會，我就代楊得志寫了一個結婚報告帶在身上。開會前，楊得志先試探着問羅榮桓："現在有的幹部想找老婆，怎麼辦？"羅榮桓馬上説："找什麽老婆，還早呢！連陳光師長都還没有結婚，别人着什麽急？"聽羅榮桓這一説，楊得志趕緊過來跟我説："不行，不行，千萬不能把報告拿出來，連師長都還没有老婆，我這個當團長的怎麽能跑在前面。"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没有死心。不久，由于三四四旅旅長徐海東因病回延安療養，中央軍委决定調楊得志任三四四旅副旅長、代旅長。當時，三四四旅在晋東南活動，爲了保證楊得志的安全，我將楊得志送到汾河以後，又特意派二營護送他過汾河去晋東南赴任。就在渡過汾河之前，楊得志還想把那個姑娘一起帶走，可最後還是没有帶成，主要還是因爲拿不出那一百塊錢來。

楊得志走後，師部下達命令，將彭明治由參謀長升任爲團長。因爲梁興初也是資格很老的同志，經我提議，師部同意將梁興初由營長提升爲副團長，同時任命田維揚爲參謀長，并將一一五師政治部青年部長王鳳鳴調任六八五團政治處主任，我還是任團政委。這樣，六八五團新的班子又組成了。

這一階段，一一五師政委羅榮桓曾多次騎着馬來我們團檢查工作。過去我同羅榮桓接觸較少，對他不太了解，經過幾次接觸後，覺得他這個人非常有耐心，也非常和氣，雖然在工作上要求嚴格，但態度好，對人和藹可親，能讓大家説出心裏話。他每次下來檢查工作之前，總是先寫個條子來告訴我們，我們就騎着馬到前面去接他。通常他都是上午來，下午回去。來了以後，總要到連裏看看，聽聽匯報。衹要看到部隊幹部、戰士的情緒高，他就很高興。

代師長陳光也經常來我們團檢查工作，但到六八六團去的時候更多一些。

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是全國抗戰的戰略防御階段，日軍采取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妄圖三個月内滅亡全中國。由于當時日軍的進攻重點是放在正面戰場上，主要作戰對象是國民黨軍隊，很少出來對我們進行“掃蕩”，因此這一階段我們也就没有打什麽仗。

但我軍挺進敵後，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也牽制了大量的日軍。對于我們六八五團來説，在晋西南的這段時間裏，無論是在根據地建設，還是在部隊軍事訓練和政治、文化學習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的成績。

四、蘇魯支隊挺進山東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日軍相繼占領了武漢與廣州。由于戰綫延長，兵力分散，日軍被迫停止了對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轉而采取以鞏固占領區爲主的方針，并將主要兵力逐漸轉移來對付打擊在敵後堅持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從而使中國的抗日戰爭由戰略防御，轉入了戰略相持的新階段。

針對這一戰爭形勢的重大變化，中共中央于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召開的六届六中全會上，確定了把黨的主要工作放在戰區和敵後，大力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按照這個總的戰略方針，中央决定在不同的地區根據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具體方針。如在抗日游擊戰爭已經充分發展的華北地區，主要方針是鞏固已經建立起來的根據地，作好在新階段裏抗擊敵人殘酷進攻的準備。而在游擊戰爭尚未充分發展或正在發展的華中及華南地區，主要方針則是迅速地建立、發展和擴大根據地，以防敵人回師後發展困難。

爲貫徹中央大力鞏固華北的方針，同時針對日軍在華北先取平原、後取山區的戰略，中央軍委决定八路軍三個師的全部主力，分别進入冀中、冀南、冀魯豫邊的平原地區和山東，廣泛開展敵後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并且在鬥爭中鞏固和擴大各抗日根據地，發展壯大自己。

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一天，羅榮桓帶着一份從延安中共中央發來的電報，來到我們六八五團駐地，召集我、彭明治、梁興初、田維揚、王鳳鳴一起開會。在會上，他給我們看了這份中央來的電報，大意是，要一一五師派出一個團，東進到太行山十八集團軍的總部接受命令，然後開赴山東敵後，開創游擊根據地。

看完中央的電報，羅榮桓告訴我們，蕭華已帶三四三旅旅部和我們六八五團的老二營從晋東出發，到達了冀魯邊區，這是我們的第一批先遣部隊。接着他宣布：“經師部研究，現在决定要六八五團作爲第二梯隊，過汾河，越同蒲路，到太行山十八集團軍總部接受命令，然後東進山東。”

他又告訴我們，在六八五團東進山東以後，師部以及六八六團，補充團，也將作爲最後一個梯隊進入山東，時間可能是在一九三九年春。他介紹説，一二〇師大概已進入山西，準備向冀中發展，而我們一一五師將來的發展方向是在整個山東，以及江蘇北部和河南部分地區發展。

因爲我們以後是單獨活動，爲了讓我們在心裏有個底，羅榮桓又把中央的整個部署及當時的形勢，向我們作了一下介紹。從

總體說，現在整個華北都已淪陷，同蒲路、津浦路、正太路等主要鐵路幹綫，都在日軍的控制之下。不過由于敵人的兵力不够，無法全面、有效地控制所占領的地區，在廣大已經淪陷的平原地區也有不少的空隙。另外，我們所要前去的那個區域，各派武裝十分復雜和混亂，不僅有日僞軍隊，有土匪，還有少部分留在敵後的國民黨部隊。我們黨領導下的游擊隊也有，但不多，也不强，需要主力部隊前去支持和幫助。

羅榮桓特別强調，今後的抗戰是持久戰，要想在短期內把敵人打出去是不可能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堅持長期的統一戰綫，堅持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反對妥協投降。他還告訴我們，國民黨內已經有了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苗頭。到了預定的活動地域後，部隊的作戰方式仍要以游擊戰、伏擊戰以及交通綫上的破擊戰爲主，在注意消滅日軍、僞軍、親日派和土匪的同時，也要注意防止同國民黨軍隊發生磨擦戰。要盡快建立自己的政權，組織游擊隊和各種抗日團體，要做好群衆工作，把群衆争取過來，讓我們的軍隊和群衆融合在一起，使抗戰成爲全民族的共同事業，這樣我們就將戰無不勝。

羅政委還對我們說："六八五團單獨行動後，要多注意集體領導，注意集體研究和决定問題，多思索，多考慮。因爲單獨行動和在上級指揮下統一行動是不一樣的，在上級指揮下的統一行動，實際上那是等待命令，不叫你走，你就不走，要你走，你就走，而且怎樣走都安排好了。單獨行動全靠你們自己，六八五團是紅軍的主力之一，相信你們是能够完成任務的，我對你們是有信心的。" 之後，羅政委當即指定由我們參加會議的五個人，組成一個軍政委員會，并指定我爲書記。

羅榮桓最後囑咐我們，要作好各種準備。首先是作好物資上的準備，師部可以補充少數東西，如鞋、襪、糧食等，但整個部隊的冬裝，要到總部去解決，總部已對此作了準備。至于軍事上的準備，最重要的就是偵察好汾河流域和同蒲路的敵人據點、碉堡情况，選擇好渡口和過封鎖綫的道路，并且最好是到靈石和介休一帶去選擇。

當天下午，羅榮桓就回去了。我們送他到村頭時，他又告訴我們，關于東進山東的準備情况，要我們過幾天去師部匯報一次。

大約過了半個月，羅榮桓來信要我和彭明治兩人一起到師部去匯報情况。我和彭明治趕到師部，就我們團東進的準備情况，向陳光代師長、羅榮桓政委一一作了匯報。陳、羅聽完匯報後，告訴我們，大致上是在十月底、十一月初向山東進發。先向總部發個電報，至于具體的從那天開始行動，由你們自己决定。

說到這裏，我突然想到以後怎麽和師部聯系呀，就問羅榮桓，他答應給我們一個電臺，說有什麽事可以發報。接着他又補充說，六八五團到晋東南以後，就直接歸總部指揮，師部將不再給團裏什麽指示，所以我們衹向師部報告一下情况就可以了。最後，陳、羅叫人弄了幾個菜，留我們吃了一頓飯。吃完飯，我們倆就告辭離開了師部。

在送我們出村莊時，陳光、羅榮桓又對行進路上應注意的一些事項，對我們作了再一次的具體交待。陳光說："你們行軍，每天走六、七十里就行了，不要走得太猛，要注意保持士氣，防止減員，防止掉隊落伍。過封鎖綫時，要注意選擇好道路，通過時一定要沉着，要待兩面的警戒部隊都布置好了以後再過。同蒲路旁有條汾河，但水不深，涉水是可以過去的。沿途要注意保密，不要暴露部隊的行踪。" 待陳光把事情都交待完畢，我們就向陳光、羅榮桓敬禮、握手告別。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四點，我們全團三千七百多人，從團部駐地西埠頭出發，開始向太行山八路軍總部行進。

當天晚上九點，我們就來到了汾河與同蒲路的邊上。同蒲路是傍着汾河修的，路與河十分靠近，自北向南，幾乎就是條并行綫。

我們的渡河點是選在靈石與霍縣之間。當我帶着團的主力到達汾河邊時，彭明治、梁興初兩位正、副團長已經在預先選擇好

的渡口附近，親自部署了兩面的警戒隊伍，準備指揮渡河。我們到達之後，立即開始渡河。八月份楊得志去晋東南時，我就是在這裏送他過的河，没想時隔兩個多月，我自己也在這裏渡過了汾河。

渡過汾河，接着我們又搶過了同蒲路。一過同蒲路，就進入了太岳山區。太岳山的西部較低，東部較高，抬頭一看，就可見到一條黑黝黝的山脉擋在面前。翻過這道山脉，我們就進入了太行山區。太行山爲華北平原至山西黄土高原的交通要道，要想從山西東進山東，這裏是必經之地。

在走出太岳山之前，爲了不被敵人發現我們的行動，我們一直都是夜間行軍，直到進入了太行山區，才改成白天行軍、晚上休息的正常行進。我們每天行進六、七十里，這樣走了七、八天之後，就來到了十八集團軍總部指定我們集結待命的北馬莊。一到北馬莊宿營地，我和彭明治就立即騎馬趕往總部所在地，向八路軍（十八集團軍）副參謀長兼前方總部參謀長左權報到。左權要我們先在北馬莊一帶駐下來待命，領取冬裝、錢糧，作好下一步進軍的準備。

這時，黨的六届六中全會剛閉幕。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由延安經西安、洛陽，回到了晋東南十八集團軍總部所在地。回到總部後，他們立即召集一二九師部分團以上幹部開會，準備傳達貫徹六中全會的精神。得知我們已到達總部附近，就讓我和彭明治也參加了會議。

會上，由彭德懷作傳達報告。報告主要分成兩個部分，前一部分是對十六個月抗日戰爭的總結，後一部分是對當時形勢、任務的分析，并重點闡述了全會制定的黨在敵占區的各項政策。最後，朱德也在會上講了話。

這次會議開了整整三天。會上，我見到了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政委鄧小平，也見到了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鐘和前方總部（集總）野戰政治部副主任陸定一。開完會，傅、陸兩位副主任要我和彭明治到總政治部，去匯報六八五團的政治工作情况。

聽完匯報，他們很高興，説本來想到部隊去看我們的，但因爲忙没有去成，所以才叫我們到總政治部來，聽取我們的匯報。

接着，傅鐘和陸定一又在總部附近的村子裏，召集總部直屬隊營以上幹部開會，傳達六中全會的精神。這次會議的規模不小，到會的約有六、七百人。在我們的要求下，六八五團的團、營幹部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我和彭明治又聽了第二次六中全會精神的傳達。會議還選舉我參加主席團，坐在主席臺上。就這樣，我們前後大約學習了半個月。

從十一月中旬起，太行山區就下開了雪，滿山遍野都是白雪，天已經很冷了。十二月的一天，總部用電話通知團裏，説朱德總司令和左權參謀長次日要來北馬莊，召集我們全團指戰員講話。我們趕緊臨時修了個大操場，并搭了個大臺子，以供開會用。同時，還想法弄了點茶，買了點花生。

第二天，晴日，萬里無雲。一早起來，彭明治、梁興初、田維揚就忙着集合隊伍，在大操場裏列隊等待朱總司令和左權參謀長的檢閱。上午八點，朱德、左權等人騎馬過來了。他們首先來到團部，和我們幾個團的幹部及各營營長、教導員見了面。朱德那時大約四十多歲，看上去還很年輕，而且身體健壯，精神抖擻。左權看上去更是如此。

到了團部以後，大家向朱德和左權致敬問好。朱德説，没有什麽東西給我們，他衹給我們帶來了兩盒蘇聯紙烟作爲禮物。這種紙烟，有三分之二是個紙筒子，衹有三分之一是烟，但在當時的情况下，這就是了不起的好烟了。

抽着朱德帶來的好烟，大家很高興，都樂呵呵地同朱總司令拉手，同左權參謀長拉手。然後我們請朱德和左權先在團部休息一會兒，圍着炭火喝杯茶、吃點花生。但左權説不用休息了，要先去看看隊伍。于是我和彭明治便引領着朱、左二人來到會場。

我們到達會場時，部隊早已整理完畢。大操場上，全團近四千人以連爲單位，成分列式，整齊地站立着，準備接受檢閱。看到我們來到會場，已先到會場等候的梁興初發出了立正的口令，

立刻全團肅立，向朱總司令和左權參謀長致敬。接着大家此起彼落地呼喊口號，熱烈歡迎總司令和參謀長的到來。喊完口號，朱德、左權在我們幾個團幹部的陪同下，檢閱了全團隊伍。

檢閱完畢，朱德發表了講話。他講話的大意是：六八五團是紅一方面軍的主力之一，原來是南昌暴動的底子，到井岡山後組成了紅四軍，以後又與紅三軍、紅二十二軍合并爲紅一軍團，最後經過長征到達陝北，是有光榮傳統的主力紅軍之一。因此，要我們一定要發揚自己的光榮傳統。抗戰以來，六八五團已經打了兩個勝仗，一個是平型關戰鬥，一個是午城戰鬥，可以說已經有了打勝仗的經驗。到了山東敵占區後，一定要貫徹六中全會的精神，進一步開展獨立自主的敵後游擊戰爭，收復失地，擴大根據地，充分發揚紅軍、八路軍的威力，多打勝仗，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左權講話的重點，是對我們挺進山東敵後的具體指示。他要求我們：一、在敵後，以打游擊戰爲主，但也不放弃在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二、搞好統一戰綫。對國民黨軍隊，凡是抗日的，我們都要同他們聯合；對消極抗日的，我們也暫時不要理他，不要動他。三、對地方抗日民主人士、國民黨政府人員，要尊重他們，可以向他們要求供應我們部隊的錢糧，但要注意同他們協商。四、注意發動群衆，爭取千百萬群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五、注意調查敵情、民情和友軍的情況，做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左權最後說："現在進到敵後的部隊越來越多，要很好地注意鍛煉自己在敵後單獨活動的能力。仗該不該打，怎麼打，都靠你們自己决定。總部離你們遠，祇能給予原則指示，一切都靠你們自己處理，自己來解决。"

朱德、左權講話後，我代表六八五團全體指戰員講了話。我說，我們這次來，見到了朱總司令、左權參謀長，感到很榮幸。朱德總司令原來就是我們紅軍的總司令，左權參謀長是我們一軍團的參謀長，後來又是我們一軍團的軍團長，今天能得見面，感到格外親切。我還特別感謝了朱德、左權來檢閱我們的隊伍，并祝他們身體健康。

我講完話，彭明治即向全場發出立正口令，向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參謀長兼集總參謀長左權立正致敬。隨後全團發出熱烈的歡呼聲和口號聲。

散會後，我們買了幾隻鷄，弄了點菜，請朱德和左權吃了頓飯。吃完飯，我問左權，我們是否把各營的營長、教導員找來，請他再作些指示。左權同意後，我趕緊派人通知各營的營長、教導員來團部集合。

等各營的主要幹部集合好了以後，我請左權作指示。左權首先說："你們下太行山以後，要從林縣和湯陰之間過鐵路，然後過衛河，經濮陽、東明，到山東的荷澤，再走定陶、成武，到山東西南部、江蘇北部的微山湖一帶活動。那裏有我們一個敵後游擊隊，叫挺進支隊，原來說有七、八百人。現在那裏的地方黨很孤立，挺進支隊的處境也很危險，被汗奸、日軍逼得没有出路，有被搞掉的危險。國民黨隊伍則是明哲保身，一心祇想保存自己的實力，根本不想打仗。你們就在那裏開展游擊戰爭，支持地方黨的發展，鞏固和擴大當地的游擊隊，創建蘇魯邊區的抗日根據地。"

他接着說："你們要實行黨的集體領導，組成團的軍政委員會，團一級的幹部都應成爲委員，重要事情都要經過軍政委員會進行集體討論。"我告訴他，在從晋西南出發之前，羅榮桓政委已幫我們組織了團的軍政委員會。左權問誰是書記。我回答說，當時羅政委指定我爲書記。左權點了點頭，說："好。"

由于當時羅榮桓祇指定我爲書記，于是我又向左權建議，以彭明治爲團軍政委員會的副書記。左權立即表示同意。就這樣，以我爲書記，以彭明治爲副書記的六八五團軍政委員會，在太行山上正式成立了。

下午四點，朱德和左權一行人離開北馬莊回總部，我和彭明治率全團營以上幹部集體送他們出村口。

第二天，我們就開始了各項具體的準備工作，特別着重于安排行軍路綫。爲此，我們派人到總部去領了河北、山東兩省的地圖。這些地圖都繪制得非常精細和詳盡。

十天之後，總部來電話通知我們，要求我們于十二月九日從北馬莊出發東進，并且爲我們擬定了一條下太行山的詳細路綫。我們還聽說，在這之前楊得志、黃克誠他們下太行山時，走的也是這條路綫。走這條路，總部所在地是必經之路。

五、東進湖西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清晨，我們全團近四千人從北馬莊出發，開始了東進山東敵後的征程。

按照總部擬定的下山路綫，走了二十多里路，我們就來到了總部所在地。在這裏，彭德懷派出他的秘書專門在路邊等着我們。他告訴我們，彭德懷要我和彭明治兩人到他所住的窰洞裏去一下。我們聽了很高興，因爲這次來，我們曾當面聽到了朱德總司令和左權參謀長的指示，可就是沒有時間當面請示和聆聽彭德懷副總司令的指示，盡管我們曾在傳達六中全會精神時，聽過他的報告。

一來到窰洞門口，就看見彭副總司令在那裏迎接我們。他拉着我和彭明治的手，很熱情，要我們看他墻上挂着的地圖。我們告訴他，那天朱德總司令和左權參謀長親自來到部隊作了動員，作了布置。

彭副總司令說："那好，他們都給你們交待好了，我就沒有多少話講了。但有幾點你們要注意。第一、你們一路行軍，不要進縣城，因爲縣城裏都駐有國民黨的隊伍。要走小路，走村莊，盡量注意隱蔽。第二、沿途多做統戰工作，我們現在是借路經過，盡量少找麻煩，不要引起糾紛，人家給你們打招呼，你們就要行禮節；不給你們打招呼，你們就走你們的。第三、撤銷六八五團的番號，改爲八路軍蘇魯支隊，下面的營就改爲大隊。因爲一說六八五團，人家就知道你們是一一五師的，是八路軍的正規部隊。改爲蘇魯支隊，那就是地方的游擊隊。我們現在穿的是國民黨軍隊的制服，戴的是青天白日的帽徽，衹要你們不吭聲、不宣傳，誰也不會知道你們是八路軍，你們衹管走你們的。第四、下太行山以後，過平漢路時，要經過日軍的封鎖綫。在這條封鎖綫的附近，有三四四旅黃克誠的隊伍，到時候可以找他們幫幫忙，給你們指指路。"

作完這些細致的交代後，彭副總司令親自送我們到窰洞口。我們就此告別了。

隨後，部隊從總部門口出發。我們走了一段平路，中午稍事休息了一下，部隊便開始離開已經住了一個多月的太行山，慢慢地下山了。

第二天還沒有走出太行山區，就碰到了一支游擊隊，并意外地遇見了這支游擊隊的領導人譚甫仁。譚甫仁是我在紅軍時期的老熟人，多年不見，想不到竟然在這裏巧遇了！之後，我帶了一個警衛員，到他們支隊部去呆了一個多小時，聽譚甫仁介紹周圍的一些情況。

第三天，我們來到了太行山腳下，到了山西、河南交界處的林縣林祁鎮附近。在這裏，我們駐下休息了一天。

駐下以後，我們聽說黃克誠同志就在附近，就想去找他。黃克誠這時已由總政治部的組織部長調任三四四旅的政委，帶着一部分部隊就在我們附近。而楊得志帶着三四四旅的另一部分部隊在另外一個地區活動。但不等我們去找，黃克誠政委自己騎着一匹馬就找來了。我在五臺山見過黃克誠政委，因此他認識我，却不認識彭明治。不過一見面，得知彭明治也是湖南人，他們也很快就相通了。

跟隨黃克誠一起來的，還有三四四旅政治部宣傳科長周振華。紅軍時期，我曾經與周振華一起度過了長征的艱難時刻。在

一起工作過一段較長的時期，彼此相處得很好，可以說是最好的朋友。這次他聽說我到了這裏，特意隨黃克誠跑來看看我。他雖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經過了長征的考驗，已被吸收爲中共黨員。我們這次見面之後不久，黃克誠就派他去團裏當了政委。他打仗很勇敢，最後在一次戰鬥中犧牲了。一直到一九四○年黃克誠同志率八路軍第二縱隊南下時，我向他問起周振華，這時他告訴我，周振華已經在一次戰鬥中犧牲了，聽到這個消息，我難過了好幾天。

黃克誠來到我們駐地以後，詳盡地給我們介紹了當地情況，告訴我們哪些地方有日軍據點、哪些地方有國民黨隊伍，在什麼地方過平漢路最適當，過了路到什麼地方去最好。他還告訴我們，平漢路一帶到處都有日軍的據點，幾乎是每隔三十里就有一個，其中最大的據點是湯陰和安陽，我們要過路，就必須得從這些據點中穿過去。他說，他可以派部隊掩護我們過鐵路，負責把湯陰、安陽這兩個大據點監視好，有情況及時通知我們，但主要還是要靠我們自己派隊伍進行警戒。

黃克誠特別重視部隊的紀律，在談話中一再强調沿途一定要把紀律搞好，因爲這是區分我們和國民黨軍隊的主要標志。他說，群衆對我們親，對國民黨軍隊疏，主要就是因爲我們的紀律好。當天下午，黃克誠就回去了，準備組織部隊掩護我們過平漢鐵路，我們也立即着手準備過路。

第二天黃昏，我們全團整隊出發。走到離平漢路還有二十多里路的時候，我們就休息下來了。我們先來到一個村子裏集結隱蔽，進行衝過平漢路封鎖綫的最後準備工作。我們派出了警戒隊伍，由梁興初、田維揚各帶一個連，一個向南、一個向北進行警戒。當晚九點，趁着天黑，部隊按照預定的路綫，一口氣衝過了平漢路。

相比較起來，過平漢路比過同蒲路容易，因爲平漢路兩邊既没有溝，也没有護路的河。我們感覺很好過。可是一過了路就感覺不對了。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到處漆黑一片。過了路以後就聽見前面響起了劈哩叭啦的槍聲，却看不見哪裏有敵人。這個情况，黃克誠同志没有給我們介紹過，我們也没有思想準備。加上部隊長時間没有聽到過敵人的槍聲，一些戰士就有點沉不住氣。一過鐵路，大家跑得那個快呀！没有一個掉隊的。但由于平漢路以東是一大片平原，到處都是道路，處處可通，隊伍開始走散了。

當時我和彭明治帶着團直屬隊走在前面，梁興初和田維揚帶着團的主力走在後頭。過路以後，我們幾乎一直聽到劈哩叭啦的槍聲，但又弄不清楚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于是我和彭明治就問帶路的老鄉，爲什麼到處打槍，是不是日軍出來了？他們說不是，說打槍是當地的一種正常現象。因爲這一帶地上的土寨子很多，差不多每個村子都有土寨子。差不多的村子都有土圍墻，外面有外墻，裏面有碉堡，碉堡裏守夜的都有槍。一到晚上，崗樓上守夜的人就開始放槍。放槍的目的，一方面是爲了互相聯系，是一種寨子之間、碉堡之間的聯絡信號；另一方面，也是爲了防止僞軍和土匪的騷擾，防止他們拉牲口、搶東西。老鄉們都說，日軍晚上一般不會出來，他們都是白天出來。

盡管槍不是日本人打的，也不是衝着我們打的，但那天晚上我們可亂了套，除團直屬隊外，衹有三營跟着我們到了預定的五陵鎮宿營地。就是團直屬隊，也有一些單位和伙夫擔子走散了。見到這種情況，彭明治很着急，要自己出去找。我勸他再等一等，因爲夜色漆黑一團，往哪裏去找？反正出發時規定在五陵鎮宿營，各營、連幹部都知道，他們一問老百姓就會自己找來的。果然，我們耐心等到天亮以後，失散的隊伍就逐漸在五陵鎮集攏來了。

五陵鎮位于衛河邊上，是當地一個較大的鎮子，也是個渡口。第二天，我們在五陵鎮休息了一天。我和彭明治召集了營以上幹部會議，總結這次通過平漢路的經驗教訓。在會上，我們先解釋了晚上地上土圍子持續打槍的原因，之後强調不論遇到什麼樣的情况，在行軍中都一定要按照預定的路綫行進，不能各走一條

路，否則就會走亂。最後，要求各單位清點人數，看有掉隊落伍的沒有。

第三天從五陵鎮出來，我們就改爲正常行軍，白天走路，晚上宿營。一般早晨六、七點鐘出發，下午三、四點鐘宿營，每天行進約六、七十里。同時，沿途利用休息時間，我們向部隊進行平原地區行軍的教育。因爲一進入平原地帶，大家一方面感到興奮，另方面也感到生疏，需要時間去熟悉它。

我們部隊絶大多數幹部、戰士都不是在平原地區長大的，而平原地區的行軍却有着不同于山區的一些特點。我們下太行山一出林祁鎮，在山底下，向東一看，一坦平原，根本就看不見山，這塊平原，比西安的平原地區大得多。這對我們這些在山溝裏走慣了的人來説，就好象到了國外一樣，完全進入了一個新的陌生環境，被搞得蒙頭轉向，沒有山，我們就辨不清方向。在山區我們辨別方向很容易，因爲我國的山脉，一般都是東西走向，而且山上的道路有限，一般衹有一條道路可通。而一到平原，到處都是路，象蜘蛛網一樣，大路小路到處都通。不容易分清東西南北。黄克誠同志給我們介紹情況時也曾説過，他剛下山時，也是這樣，感覺很不習慣。

爲學會辨別方向，使部隊能按指定的方向前進，我們專門作了一番調查，請教了當地的老百姓，對幹部進行了教育。要在平原地區辨別方向，一個是看村莊，一般村莊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的居多。另一個方法是看土地廟，土地廟的門一般都是朝南的，再一個是摸樹，朝南的一邊比較光滑，朝北的一邊比較粗糙。晚上最主要的是看北極星，要學會認識北極星的方位。

闖過平漢路以後，我們就亮出了八路軍蘇魯支隊的旗號。與此同時，我的名字也報請上級批準，由吳文玉改成了吳法憲。

部隊從五陵鎮出發，經濮陽、東明、菏澤、定陶、成武，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達江蘇、山東交界處的微山湖以西地區。按照行前彭德懷的指示，這一路上，凡是經過的縣城，我們都沒有進去，而且連地主土圍子也不進，住的都是一些小村

莊。除我們自己所帶的糧食外，沿途就派幹部向土寨子要糧食。實在沒有糧食，就在地裏找老百姓遺下的地瓜吃。秋收過後，留在地裏的地瓜還有的是。

盡管我們當時穿的是國民黨軍隊的制服，戴的是國民黨軍隊的帽子，并沒有表明八路軍的身份，可看到我們紀律嚴明，對老百姓秋毫無犯，同時説話和氣，買賣公平，不論在哪裏宿營都幫老百姓挑水、掃院子，而且凡請向導帶路和雇車馬拉東西都給錢，跟別的隊伍完全不一樣，所以老百姓很快就認出了我們的八路軍身份。當時，常常是我們剛進到一個宿營地時，村裏的老百姓還躲躲藏藏的，可等第二天我們離開村子時，老人、小孩都出來看我們，送我們，對我們很親。這充分證明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威力。

在山東成武，有一天我們想進入一個大寨子宿營，但寨子裏的人却對我們説，衹要我們不進去，我們要猪他們送猪，要糧食他們給糧食，一句話，我們要什麽他們就給什麽。既然他們這麽説，那好，我們就不進去，就在外面露宿。結果他們真的送來了糧食和猪。這樣，他們很高興，部隊也很高興。以後，凡是遇到有地主土圍子的大寨子，我們就采取這個辦法，衹要他們送吃的東西出來，我們就不進寨子。至于寨子裏的槍，我們一條也不要，因爲那都是他們用來保家的。經調查，這些槍大都是國民黨軍隊在平漢路潰退時扔的，被地主撿來用以保家。在這個地區都是一個地主，帶一大片佃户，種一大片地。地主住的都是高墻的磚平房，貧下中農住的是草房破屋。就這樣，我們一路較爲順利地到達了微山湖以西地區。

我們一到湖西地區，就開始打聽挺進支隊。一天下午五點鐘左右，我們在一個叫雞順集的小村子宿營。駐下以後，就派人出去偵察，目的是想找一找看附近有沒有挺進支隊的人，再了解一下當地的情况。可一問老百姓，他們都不知道這個挺進支隊，衹知道國民黨的劉耀庭帶着一部分人住在單縣縣城裏，究竟有多少人，他們也弄不清楚。

正在我們不知如何找到挺進支隊時，天黑以後，有一個人穿著便衣、帶着兩個人來到我們駐地附近，恰好同我們的偵察人員迎面相遇。偵察人員問他是哪裏的，他說是挺進支隊的，來搞聯絡。

來到支隊部同我們幾個支隊幹部見面以後，那個穿便衣的自我介紹說，他是挺進支隊的政委，名叫郭影秋。他說，前幾天得到山東分局的通知，知道我們快到這裏了，所以到這裏來迎接我們。他還介紹說，挺進支隊的司令員是李貞乾，留在支隊照顧部隊，没有來。他是遵照分局的指示，來找我們聯絡的。

得知他們正是我們要找的挺進支隊，我們很高興。我說："那正好，我們正等着你們呢！"

當天晚上，我們召開了支隊的軍政委員會會議，還請郭影秋參加了會議。會上，我首先請郭影秋介紹當地的情况。郭影秋一開始就說，這裏的形勢現在非常危急。他介紹說，在我們駐地往東不遠的地方就是豐縣，那裏有一支號稱有七千人的漢奸王獻臣（外號王歪鼻子）的隊伍。雖然這支漢奸隊伍實際衹有四千人左右，但却非常猖狂、非常囂張，現在正在全綫向挺進支隊發動進攻，已經把挺進支隊逼到了歡口鎮以北的十字河口地區。挺進支隊現在衹剩下一、兩百人。爲了避免更大的損失，一些幹部、戰士已經開始帶着槍回家隱蔽起來了。由于戰局不利，湖西特委和挺進支隊在當地很孤立。幸虧我們及時趕到，不然再過一個星期，挺進支隊就有可能被打散。

至于附近幾個被國民黨占領的縣城，凡是堅持抗日的，幾乎都垮了，如碭山縣政府已經没有什麼人了，沛縣縣長馮子固的手裏也没有了多少隊伍，衹有豐縣縣長董玉珏手下大概還有百把人。這個董玉珏原來和我們是合作的，但現在他的態度已變。單縣縣城裏還有國民黨的一個旅，旅長叫劉躍庭，手下大概有三千人左右，他們與日僞軍是互不侵犯。在整個湖西地區，真正的日軍并不多，主要集中在豐縣和沛縣這兩個地方。豐縣的據點裏大概有三、四百人的樣子，沛縣的日軍稍多一點，約有六、七百人。

漢奸隊伍裏，最大的就是王獻臣這支隊伍，他占領了豐縣以北的大片土地。可以說，王獻臣是湖西地區的一個漢奸頭子。

聽完郭影秋的情况介紹，我們就開始研究先打哪裏，什麼時候打，怎樣打法。郭影秋的意見是，擒賊先擒王，要打就先打漢奸頭子王獻臣，而且要打就快打，打就打他個措手不及。當然，這得看我們的部隊疲勞不疲勞。

經研究，我們同意了郭影秋的意見，决定次日就開始向王獻臣部發動進攻。從太行山下來一路東進，部隊雖然疲勞，但一路上都是正常行軍，部隊還不算太累，完全有精力打好這一仗。另外，根據郭影秋介紹的情况，王獻臣這支隊伍雖然有四千多人，但兵力却很分散。在他所占領的豐縣以北大片村莊中，差不多每個村莊都駐有他的部隊，人數從幾十人、百把人到幾百人不等。這些部隊大都是些烏合之衆，戰鬥力不强，又不懂得做工事，衹是憑借幾個土圍子來進行守備。在這種情况下，如果我們出其不意，突然開始進攻，把他們完全消滅是不成問題的。

接着，彭明治同志提出了作戰計劃和部署及具體打法，我們全體同意。于是我們連夜召集各大隊長、教導員開會，部署作戰，發布作戰命令。除介紹情况外，主要是攤開地圖，研究如何打法。

根據會議最後决定的作戰計劃，這次戰鬥以一大隊和三大隊打主攻，由西往東，一路向王獻臣司令部所在地崔莊攻擊前進；二大隊打援，負責切斷王獻臣的退路，并阻擊可能由豐縣出來增援的日軍。一大隊由副支隊長梁興初帶領，二大隊由支隊參謀長田維揚帶領，三大隊由大隊長劉宗英、教導員蔡永指揮，我和彭明治及郭影秋則帶領一個特務連，隨主攻方向追擊前進。我們計劃，次日凌晨天亮以後各部隊就開始行動，從曹馬集出發，争取一天時間解决戰鬥。

會後，支隊司令部作戰股長黄煒華立即草擬了作戰計劃。這個作戰計劃經支隊軍政委員會成員傳閱後，由彭明治和我共同簽署，并下達了作戰命令。

第二天早晨六點半，各部隊開始出發。一個半小時以後，到

八點鐘，槍聲響起，戰鬥正式開始。由于我們的部隊很整齊，戰鬥素養好，戰鬥力强，而且武器裝備也好，所以打得敵人一觸即潰。戰鬥開始没多久，我們一大隊、三大隊兩個大隊全綫推進，很快就將王獻臣部占領的村莊，一個接一個地攻了下來。我和彭明治及郭影秋一起，帶着一個特務連，一直緊隨在主攻隊伍後面前進。

到中午十二點左右，就把敵人都包圍在兩個較大的莊子——崔莊和大王莊之内了。彭明治當即下達命令，要一大隊攻占崔莊，三大隊攻占大王莊。之後，兩個大隊稍作了一下準備，就發起了攻擊。下午一點鐘，兩個大隊就先後攻進莊子，解决了戰鬥。

這時，豐縣的日軍百餘人出來增援，被守候在那裏的二大隊擊退。當時，王獻臣正好在崔莊。他見勢不妙，立即帶了三十多個便衣，從二大隊防綫旁邊的村子溜過去，跟隨增援的日軍逃進了豐縣城。

這一仗，打得王獻臣最後衹剩下了幾十個人，隊伍基本被消滅。戰鬥結束後清查戰果，共俘獲一千五百餘人，另有一部分逃散了。經過清查，俘虜中有一些是老百姓，真正的僞軍官兵八百多人。我們還繳獲步槍一千多支、輕機槍三十餘挺，駁殼槍三、四十支。不過，由于戰鬥中一些槍彈打在麥垛和房子上，使有的村子着了火，崔莊和大王莊也都燒掉了一些房子，給群衆造成了一些損失。

戰鬥結束後，我們部隊在郭影秋的帶領下，經兩天的行軍，到達順河集以北的十字河口肖莊，同挺進支隊和湖西特委會合。這時，已是一九三九年的元旦。老百姓紛紛送來慰勞品。部隊和湖西特委、挺進支隊一起會餐，共同祝賀我們順利到達目的地，并歡慶首戰勝利。

在中共湖西特委的所在地肖莊，我們住了一個短時期。當時湖西地區黨的領導機構稱爲特委，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後，改爲湖西區黨委，當時的特委書記是白子明。特委下屬的各縣都有黨的組織，有縣委，也有區委，但人數都很少，而且大多還處于秘密

狀態。各級組織當時的工作主要是發展抗日武裝，組織游擊小組、游擊分隊，没有建立其它的群衆組織。

當湖西特委知道我們在八路軍總部聽過黨的六届六中全會精神的傳達以後，就請求我們向他們傳達會議精神。經支隊軍政委員會討論，决定同意他們的請求，由我向特委進行傳達。參加這次傳達六中全會精神會議的，有特委組成人員及幾個縣委書記，約十餘人。我首先傳達了全會精神，然後，對六中全會精神進行了學習和討論，同時根據全會所確定的路綫、方針、政策，對湖西地區黨的工作、政權工作、統戰工作、婦女工作、青年工作和根據地的群衆工作，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并作了重新部署和安排。由于當時地方工作還是歸特委負責，我們衹是給予協助，所以我在會議上衹是建議特委，要充分利用我們到來的這個時機，鞏固和發展崔莊戰鬥的勝利，打開局面，恢復和擴大湖西抗日根據地。

在我們消滅了王獻臣這一股湖西地區的最大的敵人後，湖西地區的形勢很快就扭轉過來了。原先回家隱蔽的挺進支隊幹部、戰士紛紛帶槍歸隊，挺進支隊新的領導班子也組成了。挺進支隊的新領導班子共有四人，即司令員李貞乾、政委郭影秋、副司令員李發、參謀長孫鶴一。挺進支隊司令員李貞乾，在當地被群衆尊稱爲“李司令”。李貞乾出身于豐縣北部的一個大地主家庭，曾是國民黨豐縣縣黨部委員和進步人士，在當地群衆中威信很高。豐縣一淪陷，中共湖西特委就以他的名字爲號召，組織了一個抗日義勇軍挺進支隊，隊伍發展很快，一下子就發展到了七、八百人。挺進支隊組織起來以後，日本人把他家裏的房子燒了，還把他家裏的人也殺了，可以説爲了抗日，他是傾家蕩産，爲抗日救國作出了重大犧牲。

挺進支隊政委郭影秋，原爲國民黨銅山縣政府的教育科長，是中共地下黨員，一直在敵後堅持抗戰。挺進支隊成立後，湖西特委派他擔任這支抗日武裝部隊的政委，是挺進支隊的主要領導者。副司令員李發、參謀長孫鶴一都是老紅軍幹部，是由部隊派

去負責軍事指揮工作的。就由他們幾個人組成了挺進支隊的新的領導班子。不到半個月的時間，隊伍又恢復到了原有的規模。

按照總部的決定，部隊的發展方向，主要是微山湖西，東部就到微山湖邊爲止。我們在肖莊小住一段時間以後，便迅速把三個大隊分別撒了出去：一大隊撒到往沛縣這一邊，向東朝銅山發展；三大隊撒到魚臺、金鄉那一邊，向西北方向發展；二大隊撒到豐縣那一邊，向南往碭山和單縣發展。挺進支隊則在豐縣以北、魚臺以南地區活動，并尋機向東往微山湖邊發展。我們支隊部和區黨委靠攏在一起，在單縣、豐縣、魚臺、金鄉一帶活動。一時間，軍地雙方密切配合，工作進展得很順利。

國民黨的幾個縣政府知道是我們八路軍到了，紛紛向我們靠攏，希望依靠我們來幫助他們恢復政權。首先是豐縣縣長董玉珏、縣大隊長黃體潤，大擺了一桌宴席，專程來支隊請彭明治和我去縣政府吃飯。然後是碭山縣縣長竇雪岩，派人給部隊送來了糧食和猪肉。最後沛縣縣長馮子固也來要求我們派部隊，去沛縣支持他們的抗日鬥爭。他們甚至公開向我們表示，現在他們離省政府很遠，省政府對他們是鞭長莫及，管不了他們，因此他們願意把我們當成上級看待，在日軍"掃蕩"時，聽從我們的指揮，叫他們怎麼打就怎麼打。出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的考慮，我們同他們商定，由這幾個縣供給我們糧食和物資，平時雙方互通情報，戰時配合作戰。

在我們的幫助下，幾個國民黨的縣政府很快就鞏固了政權。他們還利用這個時機，拼命發展自己的武裝。不久，豐縣董玉珏、黃體潤的隊伍就發展到了四、五千人，沛縣馮子固的隊伍更是發展到了六千多人，連碭山縣竇雪岩的隊伍也由幾個人發展到了二百多人。這些人都是地頭蛇，借助我們的力量，鞏固了政權，發展了武裝，隊伍的發展比我們還快得多。

這個時期，是湖西地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發展的高潮時期。不過事後看來，當時我們的思想有點"右傾"，對國民黨人的支持太多，以至于他們以後還有能力反過來和我們搞"摩擦"。如

果當時把他們搞掉，後來的局面就會大不一樣。但當時他們打的也是抗日的旗號，而我們又要堅決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如果真的把他們搞掉了，極有可能還要説我們犯了一個大錯誤。

與此同時，我們也在積極建立自己的政權。占領了魚臺、全縣和金鄉等地以後，我們派出了自己的縣長，其中金鄉縣的縣長，就是我們支隊政治部的民運股長李英。不久，我們又建立了兩個縣的抗日民主政權，并開始籌備成立專員公署，準備由李貞乾任專員。在部隊的發展上，蘇魯支隊經幾次擴兵，隊伍由三千多人發展到了將近萬人。挺進支隊也發展到一千多人，下編爲三個營。

當時的湖西地區有個特點，就是散落在民間的槍不少。原因是一九三八年國民黨軍隊在臺兒莊會戰後，隊伍全綫潰退南撤到徐州的途中，丟下的步槍、機關槍、駁殼槍和各種子彈不計其數。這些槍彈有的被地主搞走，拿去組織了地主武裝，有的則被當地的老百姓收藏了起來。因此，有了人，就不愁没有槍。要想發展隊伍，祇要把國民黨軍隊丟下的槍支收集起來，就可以編成一支像樣的隊伍。

一九三九年二月，沛縣北部有一支僞軍部隊，約一千四五百人，司令員名叫藉興科，副司令員何玉祥，經我們同湖西特委的郭影秋同志的一系列工作，主動提出反正，要求我們派部隊前去支持。結果我們隊伍一到，他們就反正起義了。事後，經報請十八集團軍總部批準，我們將這支隊伍改編爲八路軍蘇魯支隊的獨立大隊，由何玉祥任大隊長，郭影秋兼任政委。因爲藉興科年紀既大又吸大烟，不適宜在部隊工作，所以由特委統戰部門給他另行安排了工作。

這一年的三月，一一五師代師長陳光、政委羅榮桓率領師部、六八六團和補充團進入到了魯西北和沂蒙山區，在惲城、寧陽、汶上等地連打勝仗，殲滅了僞軍兩、三千人。勝利消息傳來，我們知道是師部到了，于是立即發電聯系，很快師部就來了命令，

要我們將挺進支隊正式編入蘇魯支隊，統一對湖西地區抗日武裝的領導。接到師部的命令，我們立即向湖西特委作了通報、并隨即將挺進支隊改編爲蘇魯支隊的第四大隊，由李貞乾任大隊長，郭影秋任政委并兼獨立大隊政委，李發任副大隊長，孫鶴一任參謀長。

不久，我們將支隊下面原相當于營級建制的四個大隊，改編爲相當于團級的建制，并在每個大隊下編四個營，每個營下編四個連。獨立大隊編入三大隊，編爲三大隊下屬的一個營，由何玉祥任營長。我們以蘇魯支隊和湖西特委的名義共同發電報，將改編情況報告了一一五師、山東軍區和山東分局，同時報十八集團軍總部，得到了批準。

經過我們幾個月的作戰與工作，湖西地區的局面基本是打開了。湖西的抗日根據地，北面到了金鄉、魚臺，東面到了微山湖邊，南面逼近隴海鐵路，占領了碭山等縣。因爲西面是國民黨的占領區，我們没有過份進逼，可是也進入了中共魯西南地委的所在地曹縣。與此同時，我們蘇魯支隊也發展到了一萬三千餘人，在當地是聲名大振，稱得上是當時整個蘇魯地區舉足輕重的一支重要武裝。可以説，這個時期是我們在湖西地區發展的鼎盛時期。

六、南下隴海路，番號改為蘇魯豫支隊

在鞏固和發展湖西抗日根據地的同時，我們也曾多次尋求向南發展的機會，我們的部隊就曾兩次南下越過隴海路進入過蕭縣境内，當時蕭縣屬江蘇省。

第一次越過隴海路，是應蕭縣縣委之請。抗戰開始以來，蕭縣的形勢一直比較好，差不多整個縣都在我們黨的領導和控制下。縣委書記叫李中道，解放後曾任過吉林省的省委書記。縣長

叫彭笑千，縣委還有縱漢民等同志。在他們的領導下，蕭縣的武裝曾發展到四、五千人。但由于蕭縣距徐州較近，敵僞活動很厲害，這也給縣委的工作帶來了困難。聽説我們支隊到了湖西，從一九三九年三月起，縣委就再三派人來，要求我們派一部分隊伍南下支援他們。經支隊軍政委員會討論，我們决定派支隊副司令以梁興初、政治部主任王鳳鳴率二大隊越過隴海路，去蕭縣開展工作，同時偵察了解情況。

半個月以後，他們回來報告説，隴海路很好過，祇要兩邊搞好警戒，一下子就過去了。到了蕭縣以後，在縣委提供的情報和帶領下，半個月内打了好幾仗，這裏二百，那裏三百，把一些土匪、漢奸的隊伍打掉之後，局面就打開了。

他們還講了一件事：有的土匪頭子聽説八路軍到了，怕被我們消滅，就想向我們靠攏，同我們結成統一戰綫。但蕭縣縣委認爲，這些土匪武裝在打着抗日的旗號，依然還去搶老百姓的東西，坑害當地群衆，性質根本没有改變，因此絶不能同他們搞統一戰綫。根據縣委的意見，梁興初、王鳳鳴他們想了一個辦法。一天，我們部隊在白樓子東面一個叫窪子口的地方住下以後，搭了個臺子，宣布要召開聯合抗日大會。把那些土匪頭子及其部下找來開會，并把他們放在會場中間，我們的部隊則布置在會場的四周。一宣布開會，梁興初就向空中打了一槍，以此爲號，我們的部隊立即舉起槍，把那些土匪嚇得要命，一個個乖乖地繳了槍，一下子就俘虜了四百多人，都交給了縣委

梁興初等人還反映，在蕭縣搞槍很容易，那裏村村寨寨都有國民黨軍潰敗時扔下的槍支，那時發展部隊，多麽需要槍呀！二大隊南下祇半個月，就搞了十幾挺機槍和幾百條步槍。他們認爲，在安徽宿縣、河南永城等地區，盡管漢奸、土匪活動猖獗，但如果支隊主力南下，相信很快就可以打開局面。

聽了匯報，我和彭明治商量後認爲，根據黨的六届六中全會精神，以及總部和師裏的指示，在湖西地區局面基本打開以後，部隊可以而且應該繼續向南發展。于是我們向湖西特委提出，留

挺進支隊在湖西堅持鬥爭，蘇魯支隊的全部主力南下，往豫東、皖北方向發展。特委同意後，我們又向總部及師部發電請示。總部回電報説，按照情况，是否南下，由我們自己考慮决定，如果决定南下，要注意同彭雪楓部隊取得聯系。總部還告訴我們，一一五師師部已經進入山東，我們的行動以後由一一五師直接指揮，與總部祇要保持聯系就可以了。

接到總部的電報，我們决定南下。四月初，支隊部率領一、二、三大隊和獨立大隊開始越過隴海路南下。我們這次南下的目的地是銅山以南、宿縣以東、靈璧以西的地區，主要是想把這一地區的僞軍和土匪隊伍消滅掉，壓縮敵占區，擴大抗日根據地。

我們很順利地過了隴海路，之後又在地方黨的幫助下，在徐州和宿縣之間的夾溝順利通過津浦路。在津浦路東，我們第一個襲擊的目標是位于濉唐河邊的靈璧重鎮時村。

濉唐河是一條東西向的河流，來往船隻很多。在時村設有僞軍的一個收税大卡，據説一天可以收到好幾千塊錢。時村駐有僞軍三百多人。

在我們到達的當天晚上，就由彭明治和我親自指揮三大隊向時村發起突然攻擊。當時我們一個大隊已經發展到了兩千多人，兩面一包圍，很快就攻進去了，三百多名僞軍全部被消滅，一個也没有跑掉。這次戰鬥一共繳獲了步槍三百餘枝，機槍七、八挺，子彈上萬發，另外還有包括布匹、食鹽等在内的一大批資財。聽説我們打下了時村，國民黨靈璧縣縣長許之信馬上就來了。由于我們和地方黨一時聯系不上，衹好把時村交給了他。

我們在時村住了大約一個星期，就又回到津浦路以西，開始向豫東方向推進，一直前進到了永城。我們南下後一直都很注意與彭雪楓支隊取得聯系，可我們後來得知，彭雪楓支隊還在平漢路以東，與我們相距較遠，相互之間一時聯系不上。于是我們向東走了一圈，最後回到蕭縣。

通過這次偵察性的南下行動，我們認爲，部隊向東發展很有前途。當然，向西發展也有着相當的空間，但那裏已經有彭雪楓支隊在活動，就没有這個必要了。

我們回到蕭縣時，中共湖西特委剛剛改組爲湖西區黨委，區黨委書記仍爲原特委書記白子明。湖西區黨委聽説日軍即將對湖西抗日根據地發動"掃蕩"，就要求我們返回湖西地區，準備反擊日軍的"掃蕩"。我們决定尊重區黨委的意見，即刻返回湖西。我們走豐縣南部，順路消滅了那裏的一部份僞軍以後，就回到了湖西和區黨委會合，并休整了一個時期。

由于八路軍蘇魯支隊兩次南下，威脅到了歷來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從而引起了日軍的注意。爲了加强守備，日軍不僅將沿津浦路、隴海路一綫的各個據點都增加了兵力，而且在豐縣、沛縣也增加了部隊，準備對湖西根據地進行"掃蕩"。

一九三九年四月底，我們回到了湖西以後不久，日軍對湖西地區的"掃蕩"終于開始了。日軍的這次"掃蕩"，主要依靠汽車來完成，而且攻擊的對象也包括國民黨縣政府的部隊。一開始，敵人是坐着汽車出來"掃蕩"，沿着公路跑一圈就回去，讓我們打都不好打。後來我們采用游擊戰的方式，在公路旁邊的各個村子裏進行分散伏擊，等日軍的汽車一來，就用機槍掃射。結果證明，這個辦法還很奏效，我們每進行一次伏擊，都能殺傷他們一些人員。我們打了五、六次這樣的小仗以後，日軍就退回據點，再也不出來了。

日軍對湖西根據地的第一次"掃蕩"，就這麽過去了。我們大多數人感到，敵人的"掃蕩"也就是這麽一回事。但作爲支隊的領導，我們感到不能這樣盲目樂觀。爲此，我們專門召開了支隊的軍政委員會會議，對這次反"掃蕩"行動進行總結。

大家認爲，平原地區，村子稠密，大車路、公路四通八達，汽車到處都可以通，敵人一掃蕩，我們就很困難。衹要有路的地方，他的汽車就一定比你跑得快。而我們的部隊白天就不能轉移，一轉移就很可能會暴露目標，就會有傷亡。所以，我們到了一個村子以後，就必須得在那裏堅守一整天。這種情形是不是可以改變一下？

針對這個問題，大家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最後終于找到了一個辦法：挖溝。湖西地區是平原，既不利于部隊隱蔽，也無險可守，但是可以挖溝，讓村與村之間都以深溝相通。這樣，一則部隊可以利用這個地形來有效襲擊敵人，二則在日軍"掃蕩"時，老百姓可以從溝裏跑掉，以減少損失。最主要的，我們在公路和大車路上挖出的溝，可以使日軍的坦克、汽車不能够橫衝直撞，從而讓它們無用武之地。

總結了前一段反掃蕩的經驗之後，支隊軍政委員會認爲，一定要動員群衆，把村與村之間的道路，統統挖成溝。我們認爲，湖西地區土質鬆軟，少有石頭，衹要大家心齊，挖成溝應該是問題不大的。經商量，這個挖溝的具體任務，我們就交給了支隊副參謀長黄緯華，讓他去組織調查研究，畫出路綫圖來，并具體組織實施。先動員幾個村子，挖出個樣板來，然後要各縣來參觀學習，統統按照這個辦法來搞。

在區黨委的支持和推動下，在群衆的積極努力下，時間不長，整個湖西地區村與村之間的溝都挖通了。當時，大家管這種溝叫"抗日溝"。真是人心齊，泰山移。在軍民、上下心氣相通的共同努力下，没有辦不成的事情！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們接到十八集團軍總部的一份電報，命令我們往南，向豫東、皖北方向發展。電報告訴我們，彭雪楓支隊正從河南的竹溝往東發展，要我們盡快與彭雪楓取得聯系，以配合彭雪楓部打開平漢路以東、隴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大別山以北這一大片地區的局面。同時，總部正式批準，將我們的番號由八路軍蘇魯支隊改爲蘇魯豫支隊。

接到總部命令，我們立即進行研究、部署，決定兵分兩路：將四大隊（原挺進支隊）留在湖西地區堅持鬥争。爲加强四大隊的力量，再從其它三個大隊各抽一、二個老連隊，編入四大隊，并留下支隊副司令員梁興初、政治部主任王鳳鳴，由他們兼任四大隊的大隊長和政委。另外，立即給湖西區黨委組織一個警衛營，同時把各縣的游擊大隊也都劃歸區黨委直接指揮，以保證區黨委能安全開展工作。同時，由支隊部率一、二、三大隊南下，配合彭雪楓支隊向豫東、皖北發展，我們將這一南下部署，報告十八集團軍總部和一一五師師部後，很快得到了總部和師部批準。

隨後，我們立即將南下部隊集中在單縣、豐縣和碭山之間，然後用一個晚上的時間全部越過隴海路，再次進入到皖北蕭縣境内。當時的蕭縣縣委，已歸屬于湖西區黨委的領導。

我們到了蕭縣，彭雪楓支隊的政治部主任蕭望東帶了一個騎兵連來和我們聯系。當時彭雪楓是司令員兼政委，參謀長張震，政治部主任蕭望東。我們雙方各自介紹了部隊的活動情况，商討了今後的聯系辦法。蕭望東主任提出，他們準備要往東來，要我們慢慢地同他們靠攏，他建議把重點放在西面，先打開津浦路以西地區的局面，然後再逐步向津浦路以東發展，我們同意了這個意見。

要打開津浦路西的局面，首先就要把蕭縣的工作做好。當時，蕭縣縣委領導下的縣大隊有一千七百多人，大隊長耿蘊齋，副大隊長孫象涵，吴信容。我們到達蕭縣後，又把這支部隊編爲蘇魯豫支隊的第七大隊，并派去蘭廷輝當了政委。七大隊分作兩個部分，一部分在津浦路以東，由孫象涵率領，大約有五個連，一部分在津浦路以西，由耿蘊齋帶領，也是五個連。我們到蕭縣後，除縣城外，幫助所有的區都建立了民主政權。同時，又幫助縣委新組建了一個縣大隊，很快又發展到一、兩千人。這段時期，我們基本上没有打什麽仗，但由于我們收繳到了大量國民黨軍遺弃的槍支，武裝了部隊，隊伍發展極其迅速。

不久，我們又越過津浦路，向靈璧、泗縣、睢寧推進。這樣，就從西北到東南再到西南，形成了對徐州的三面包圍之勢。我們的這一行動，使得日軍大爲惱火。在此之前，日軍根本不把八路軍放在眼裏，他們狂妄地認爲，八路軍衹是一些手持土槍土炮的農民，用僞軍就足以對付了。他們萬萬没有想到，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下，八路軍不僅没有被消滅，反而像滚雪球一樣越滚越大、

在不長的時間裏創建了大片抗日根據地，開辟了廣闊的敵後戰場，而且還闖入了他們的心臟地區。這使日本侵略者大吃一驚，開始認識到八路軍絶對不是一伙不堪一擊的烏合之衆。因此，開始準備認真對付我們。

六月初，專門針對八路軍的日軍大“掃蕩”開始了。在掃蕩以前，我們就得到消息説，日軍的這次“掃蕩”，集中了近六千兵力，從徐州、夾溝、宿縣、靈壁、睢寧、時村，分七路向我們蘇魯豫支隊進行合圍，下定决心要把我們搞掉，最少也要把我們攆出徐州東南地區，解除對津浦路的威脅。

過去我們還没有經歷過的這樣大規模的“掃蕩”，當時，支隊部衹剩下我、彭明治、田維揚三人。我們三人研究後一致認爲，要應付敵人的這次“掃蕩”，就必須將部隊集中到四面都有山的銅山縣張山集和褚蘭集一帶去。因爲我們的部隊剛剛南下，還没有開展挖“抗日溝”的活動，敵人一來“掃蕩”，我們在平原地區没有什麼依托，而敵人的汽車、坦克却可以横衝直撞，暢通無阻。在這種情况下，要準備反“掃蕩”，就必須要依靠山。張山集、褚蘭集一帶四面都是山，雖然山不是很高，但比平地還是要好得多。

彭明治和我隨即發出命令，命令部隊立即全部集中到張山集和褚蘭集地區。當晚，部隊經一夜急行軍，全部到達了指定位置。部隊剛部署完畢，就發現敵人的坦克、汽車一路一路浩浩蕩蕩地過來了。很快，將近六千人的日軍的快速部隊，就包圍了張山集和褚蘭集。除步兵外，日軍還配置有五十多輛汽車、二十門大炮和兩輛坦克。

根據戰前的部署，我們四個大隊各擋一方，日軍用坦克衝了幾次，始終也没有衝進來，反而衝到山溝裏去了。山區不通公路，敵人的汽車也過不來。日軍便改用大炮轟，從中午十二點一直打到天黑，不知道打了多少炮。那裏的山没有樹，都是光秃秃的石頭，炮彈打來，石頭就滿天飛，弄得我們很難受。我、彭明治、田維揚三人，各在一塊石崖下，用電話指揮部隊。隊伍各自依憑

緊急修築起來的工事，獨立頑强抗敵。就這樣，敵人發起的幾次攻擊，都讓我們給打了下去了。一直到晚上八點，敵人也始終没能前進一步。我們守住了這個山區。

隨着黑夜的來臨，彭明治問我，“政委，怎麽辦呀？”我説，“你的意見呢？突圍吧！”彭説，“對，要突圍，還回到津浦路西去，西面的蕭縣、永城是我們的根據地，往東不行，我們對那裏的地形不熟，對我們不利。”

我完全同意他的想法，認爲應該趁着黑夜突圍出去。我們當即安排全支隊分三路突圍，一大隊、二大隊各一路，三大隊和七大隊一起爲一路，支隊部隨一大隊跟進，七大隊斷後。

天黑以後，我們派偵察部隊下山偵察，發現前來圍攻的七路敵人之中，已有四路由原路退回了，衹有三路敵人還没有走。村子裏没有動静，敵人的包圍圈中就出現了空隙。

我們迅速從敵人的空隙中穿插行進，因爲隊伍没有什麼輜重，都是輕裝，很容易的就突了圍。敵人還在那裏打炮，我們就已經走到敵人的後面來了。我們隨即加快脚步，整整走了一個晚上，仍從夾溝越過了津浦路。因敵人抽調兵力圍攻我們，這裏防守空虛，是個空檔。一過津浦路，天就大亮了。

夾溝的西面有一塊叫黄藏峪的山地，山裏有個大寺廟，廟前有個大森林。過了津浦路後，我們考慮部隊打了一整天，又接連兩個晚上都在趕路，就把二大隊放在黄藏峪的口子上警戒，讓其餘部隊在森林中稍事休息。不料還没等我們吃上飯，敵人已跟踪前來。聽到槍響，部隊顧不得吃飯就衝上了山頂。彭明治下了死命令，要二大隊無論如何也要在山口守住。敵人拼命地攻，二大隊堅决抗擊，連續打退了敵人的幾次衝鋒。由于戰場是在山區，敵人的坦克、汽車無法前進，而山背後却是我們的根據地，因此我們在二大隊頑强阻擊的掩護下，支隊主力很快就撤到王白樓、宿羊山地區，回到了根據地。就這樣，經過兩天一夜的阻擊，我們終于脱離了敵人的包圍圈，徹底粉碎了敵人的七路圍攻。前來圍攻的日軍全部退回了據點。

這一仗，是我們到蘇魯豫邊區以來，傷亡最嚴重的一次戰鬥。我們全支隊傷亡近六百人。當然是傷的多、亡的少。二大隊政委蔡元興被炮彈擊中犧牲了，犧牲了這麼好的一個幹部，真令人痛心！除此之外，還犧牲了一些連、排幹部。

應當說，彭明治在這次戰鬥中指揮若定，表現得很沉着、很堅定。本來，敵人的這次七路圍攻，兵力和武器裝備都超過我們，敵人把我們看成是心腹大患，不把我們攆走他就不會放心，所以下定決心發動這麼一次大"掃蕩"，對我們來說這一仗非常難打。當時彭明治的身體不好，梁興初又不在，但他仍然同我和田維揚一起堅持了兩天一夜，沒有犯病，而且始終精神飽滿、情緒高漲，最終指揮部隊突出重圍，打破了敵人精心布置的七路圍攻。

部隊能基本完整地回到根據地，我很高興。回來後，我直誇彭明治這次指揮得好。他却說："政委，你還說這個話。這次我沒有搞好，傷亡了這麼多人。"我說："還要怎麼好法呀？想把敵人全部消滅，那是不可能的。他們都是機械化部隊，武器裝備好，行動迅速。主要是我們的傷亡大了一點，這是個損失，不過我們把傷兵都弄回來了。而且，經過這一次戰鬥，我們嘗出了滋味，知道敵人的大'掃蕩'是怎麼個'掃蕩'法，小'掃蕩'是怎麼個'掃蕩'法，這種經驗對我們以後進行反'掃蕩'很有意義。最重要的是，從這次戰鬥中可以得出這樣的一條經驗，對我們八路軍，日本鬼子就是没奈何。"彭明治很贊同我的意見，説："政委，你說得好啊！"

經過了這次反"掃蕩"，我覺得彭明治在打仗這方面很有經驗，他很沉着，很穩重，從不冒裏冒失，經過這段時間單獨行動的考驗，我認爲他是一個非常稱職的軍事指揮員。

結束了這次反"掃蕩"，我們便從王白樓、窪子口地區繼續向西、往蕭縣、碭山、永城前進，最後在孫老莊住了下來。

七、挺進皖東北

一九三九年六月底，一一五師代師長陳光在梁興初所派的一支部隊護送下，帶了一個騎兵排，出乎意料地來到了我們支隊部。看到陳光到來，大家不知道有多麼高興。剛粉碎了敵人的"掃蕩"，現在師長又來了，這對我們是多麼大的鼓舞。

陳光代師長住下以後，首先聽取了我們的匯報。我們匯報的主要內容是：

一、隊伍發展情況。我們六八五團從一九三八年十月從山西離開一一五師師部以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已經由三千多人發展到了一萬二千多人。現在的蘇魯豫支隊一共是五個大隊，每個大隊下編四個營，每個營下編四個連，同時每個大隊還另編有一個重機槍連。此外，我們還有四個縣屬游擊大隊。由于國民黨軍潰退時，在湖西等地區遺弃了大量槍支，部隊的武器裝備都得到了更新，原有的都移交給了游擊隊。

我介紹說，彭明治很注意炮兵的建設。我們經過調查，挖到了一門山炮，于是彭明治就組編了一個炮兵連。由于缺少炮彈，這門山炮我們平時都捨不得用，但在打漢奸土圍子時就很有用。一次在河南永城有個汗奸土圍子，他有一百多條槍，就是不開門，不投降，彭明治就下令調來山炮。結果，我們祇對着城門打了一炮，他們就嚇得乖乖地開門繳了槍。

匯報到這裏，我開玩笑地說："那麼厲害的山炮是很好，但敵人的這次七路圍攻，炮彈打了千百發，我們不是也挨住了嗎？并没有嚇倒我們嘛！"

陳光也插話說："師部在反'掃蕩'時，也曾在陸房挨了日軍很多炮彈，但我們也没有被嚇倒。"

二、彭明治同志就蘇魯豫支隊這段時間的戰鬥情況作了詳細匯報，粗略計算，這段時間內我們大體上打了四、五十仗，粉碎

敵人大小“掃蕩”共五次，最大的一次就是銅山東南張山集敵人七路圍攻的這一次。在這些戰鬥中，我們共俘獲敵人，主要是僞軍，將近三千人，也繳獲了數千支槍支。

三、創建了根據地。我說，我們在金鄉、魚臺、蕭縣、永城以及單縣、沛縣、豐縣、銅山的大部分地區都建立了我們自己的縣、區政權。這些地區的敵僞都已基本趕走或肅清，衹剩下日軍孤立地留在據點裏。在根據地內，爲抗擊敵人的軍事“掃蕩”，挖“抗日溝”的活動正在逐步推廣。

四、開展了同國民黨抗日部隊的統戰工作。同國民黨的縣政權，地方部隊聯合抗日，他們都聽我們的調遣、指揮，衹是對國民黨人恐怕是有點“右”，以致于現在他們的武裝也發展了起來，而我們又沒有什麼理由把他們搞掉。

在匯報的最後我們强調，湖西地區的局面之所以能够打開，主要是因爲我們執行了十八集團軍總部和師裏的指示，積極依靠了山東分局的領導。同時幾個縣委也密切配合，積極組織地下黨、地下武裝和情報網開展工作，對我們幫助也很大。如原挺進支隊和蕭縣縣大隊等，在我們創建湖西根據地的工作中，都起了很好的作用。還有，彭雪楓支隊對我們的配合，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總之，湖西地區局面的打開，完全是上級正確的領導，以及地方黨、地方黨領導的軍隊和兄弟部隊對我們支援的結果。

聽完匯報以後，陳光代師長也簡略給我們介紹了師部東進以來的情况，以及日軍在陸房進行大“掃蕩”的情况，接着就和我們一起研究蘇魯豫支隊的下一步工作部署。

陳光代師長完全同意我們的建議，下一步將蘇魯豫支隊分別在三個地區進行活動：一、四大隊繼續留在湖西地區堅持鬥爭，鞏固和發展湖西抗日根據地。由于在軍事上一時找不出適當的人選，仍由副司令梁興初兼任四大隊大隊長，政治部主任王鳳鳴兼任四大隊政委。又由于湖西地處隴海路北，離支隊部較遠，陳光代師長的意見是，四大隊就直接歸一一五師師部指揮，我們表示完全同意。

二、一大隊加七大隊的孫象涵部，進入津浦路以東、隴海路以南、洪澤湖以北的皖東北地區活動，以打通和魯南師部的聯系。陳光代師長非常同意這一安排，說，“這個意見好，這樣一來，師部和你們之間的聯系就打通了，占領了這一地區非常重要。可是要誰去指揮呀？”我自告奮勇地說，“我去可不可以呀？”陳光說，“很好，就你帶一大隊和孫象涵部東去吧，衹是可能會遇到困難。”彭明治說，“政委還能離開支隊部嗎？”陳光說，“没有關系，還有你們嘛！”

三、支隊司令員彭明治，參謀長田維揚，副參謀長黄煒華，政治部副主任郭成柱，率支隊主力二、三大隊及七大隊耿蘊齋部，在隴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淮河以北地區活動，打通同彭雪楓支隊的聯系。

四、七大隊耿蘊齋部和孫象涵部由于歷史形成的關系，暫不合編，仍舊分兩部分活動。

下一步的行動計劃研究决定之後，陳光代師長高興地說：“這一部署實現以後，徐州的西北、西南和東南都有蘇魯豫支隊在活動，如果我們山東的部隊再南下，就將對徐州形成包圍之勢。徐州在歷史上向來就是個重要戰略區，我們如果能够控制這個地區，在這一地區堅持抗戰，就能牽制住大量日軍，這對全國的抗戰都有極其重大的意義。”他還交待說：“我回去後，口頭向師部、向羅榮桓政委匯報這一新部署，你們就不用再發報了。”

研究完工作以後，我們又陪陳光代師長到部隊去檢查了一圈工作，接着就召集各大隊的大隊長、政委開會，請陳光給大家講當前的形勢和今後的任務。對蘇魯豫支隊過去的工作，他表示滿意，認爲我們在湖西地區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對今後的部署，陳光代師長强調主要是發展根據地，壓縮敵占區，消滅僞軍、孤立日軍、建立和擴大自己的隊伍。在戰術上，要盡量打小仗、打勝仗，以牽制敵人兵力。他還告誡我們，對津浦路、平漢路、隴海路，暫時都不要去破壞它，破也破不了。因爲我們現在還没有力量去控制敵人的交通綫，所以任何的破壞都衹能是暫時的。

相反，如果我們那樣做了，就會引起敵人的注意，從而促使敵人發動大“掃蕩”，增加我們活動的困難。

講話的最後，陳光代師長還要我們很好地總結反“掃蕩”的經驗，發動群衆堅持鬥爭，繼續在平原地區開展挖“抗日溝”的活動，準備粉碎日軍的大“掃蕩”，鞏固和擴大抗日根據地，縮小敵戰區。同時，他還要我們注意經常與師部保持聯系，并答應給我們增加一個電臺，供我和東去的部隊使用。

陳光代師長在支隊部住了一個星期以後，説他離開師部很久了，準備回去，要我們派兩個連送他，并説，這兩個連將來有可能回來，也可能就留在師部。臨走的那天，我們牽着馬，依依不捨地將陳光代師長一直送過了隴海路，才在那裏和他分手告別。他帶去的兩個連到師部後没有回來，被編入了其它部隊。

按照與陳光代師長一起商定的計劃，一九三九年七月初，我率一大隊及七大隊一部從駐地出發，開始往東向皖東北行進。彭明治、田維揚、黄煒華、郭成柱等一直送我到村口，我和他們也分了手。彭雪楓支隊特意派出的張愛萍和劉玉柱二人和我們一起東進，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去皖東北建立區黨委。從此，我們三人就住在一起，吃在一起。

部隊出發後的第三個晚上，我們按預定計劃在宿縣以南、固鎮以北地區，順利越過了津浦路。過去的幾次過路，我們走的都是宿縣以北的夾溝，這次爲避免引起敵人注意，我們改走了宿縣以南。

越過津浦路的當晚，部隊在楊屯集宿營。宿營地距固鎮、宿縣敵據點有五十里路，距靈壁敵據點也是五十里，距時村據點二十五里。另外這個地區是河網地帶，有新濉河、老濉河、濉唐河、新河、沱河等五條河流，從西北到東南橫貫其間。河網密布的特殊地形，使得敵人的機械化部隊很難順利通行。我們原以爲，在這樣的地區宿營，不會有什麽問題。

不料第二天早晨，前面擔任警戒的部隊發現，敵人正從宿縣、固鎮、靈壁分三路前來合圍我們。由于在河網地區，他們無法使

用汽車，每路約七、八百人，徒步前進，一下子就來到了我們大隊部的附近，等警戒部隊發現他們時，敵人的先頭部隊已離大隊部駐地衹有一里路左右了。

所幸當時正值青紗帳起，遍地都是一人多高的高粱、玉米，敵人突然來襲後，我們急忙進到青紗帳裏去隱蔽。我和一大隊大隊長胡炳雲、政委王東保趕緊指揮隊伍挖掘工事，準備抗擊敵人的進攻。同時，派出偵察員到前面去偵察敵情。

由于青紗帳很密，敵人看不見我們，我們也看不見敵人，整整一天，敵人没有發動攻擊。他們都衹是在外面用炮轟，看樣子是想把我們攆走就算。正當敵人開始炮轟，我忙于指揮隊伍挖掘工事時，張愛萍主動提出，要我派幾個警衛員給他，他要去前面看看地形，幫助我們偵察一下敵情。時間不長他就回來告訴我，看樣子敵人一時還不敢輕易發動攻擊。

果然，我們前面的幾個連同敵人頂住了，打了一天也没有什麽傷亡。到天黑以後，我們順利地突圍了出去，敵人并没有追擊，很快也退了回去。就這樣，我們剛過鐵路，就跟敵人打了一整天。晚上突圍後，脱離了敵人的追擊，進入了我們預定的區域孫家寨一帶宿營。

以前南下時，我們到過這裏，對這一帶地區比較熟悉，所以隊伍住下以後，我就召集胡炳雲、王東保和七大隊副大隊長孫象涵來共同研究，看看下一步怎麽走，先向哪裏發展。孫象涵是夾溝人，對附近的地形和情況都非常熟悉，他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見。經研究，大家認爲，按照陳光代師長交待的要同魯南師部打通聯系的任務，隊伍應當首先向北發展，如再往南走，就會進到大濉河流域，河流更多，更不好活動。最後我們決定，部隊下一步先轉而向東，經泗縣、泗洪靠向洪澤湖西岸，再沿運河向北發展。張愛萍同志也同意了這一方案。

部隊來到了泗縣時，張愛萍同在皖東北活動的地下黨負責人楊純聯系上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的皖東北專員公署就設在泗縣，專員名叫盛子瑾。爲了隱蔽在國民黨的專員公署裏，楊純這

個女同志竟然推光了頭發，女扮男裝，化裝成了一個男人。

不久，山東分局又派來了金明，由他擔任皖東北的區黨委書記。這樣，就由金明、張愛萍、楊純組成了中共皖東北區黨委，來共同負責皖東北地區的工作。從此，張愛萍和劉玉柱就留下來專搞地方工作，不再跟隨部隊活動了。我專門派了一個連掩護他們。他們經常派人來同我們聯系。我也曾到區黨委駐地住過兩次。我去區黨委的目的，是想多了解些情況，同時也把我們的行動計劃告訴他們，徵求他們的意見，看區黨委需要我們向那裏發展，好及時派隊伍過去。

至于地方黨的建設工作，我們不參加意見，不作任何干預。但我們和區黨委有一個共同的任務，就是分別同盛子瑾、許志遠搞好統戰關系。具體分工是，區黨委負責對盛子瑾專員的工作，我負責對許志遠的工作，共同做好創建皖東北抗日根據地的工作。

盛子瑾的專員公署裏，除了楊純外，還有我們地下黨的另一位負責人江上青及地下黨員吳雲村。自我們來到皖東北以後，他們兩人就開始同我們取得聯系，供給情報，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

關于盛子瑾及皖東北地區的一些情況，我主要是從江上青、吳雲村那裏了解到的。他倆曾兩次前來我們駐地，向我們介紹情況。據江、吳二人介紹，盛子瑾本人是堅持抗戰的，手下也有一千多人的一支武裝，但他的部隊打仗很少，戰鬥力較弱。

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一天，由張愛萍和我分別做工作，動員盛子瑾和許志遠在張大路鎮進行會談，以消除相互之間的敵意，共同携起手來抗擊日本侵略者。那天的會談進行得較爲順利，雙方達成了再不“摩擦”，握手言和，共同抗日的協議。

會談結束後，江上青、吳雲村在隨盛子瑾回專員公署的途中，突然遭到大柏圩子村地主柏逸蓀武裝的襲擊。襲擊中，江上青不幸當場犧牲，吳雲村僥幸逃脱，來到我們駐地，把情况告訴了我。

之後，皖東北區黨委在泗縣的李楊鎮附近爲江上青舉行了追悼會。區黨委金明、張愛萍、楊純等參加了追悼會，張愛萍在追悼會上致了悼詞。我也專門從五十里外的部隊駐地，趕去參加了這個追悼會。我們一起爲江上青安葬，并修了墓。

這一段時間，我們接連打了七、八仗，基本上打開了靈璧、泗縣、睢寧這一個三角地區的局面。但我們還有後顧之憂，一個叫高樓的寨子裏有一支地主武裝，對我們構成了一定的威脅。

高樓位于靈璧以北，寨子裏共有八百多户人家，爲首的是一家姓高的地主，手下有一支幾千人的武裝，共有四十多挺輕機槍、兩千多支步槍。高樓的土圍子很堅固，不僅裏面築有炮樓，而且周圍有一道很深的壕溝，溝裏都是水，水很深，人過不去。對這個土圍子，誰也不隨便動它。日本人不動它，是因爲這個寨子與敵僞有關系；國民黨部隊和我們不動它，是因爲要是硬攻，傷亡就會比較大。

當時一大隊三營教導員石瑛，搞民運工作很有經驗，他自告奮勇，説願意進寨子去談判。于是，我要秘書寫了一封公函，希望他們與我們共同合作抗日，并供給我們一部分糧食和款子。

石瑛拿着公函去了，受到了很好的款待。回來時也帶回了一封信，信中説：你們來了，支援你們是我們應盡的義務，祇是我們力量有限，杯水車薪，多了不行，少供給一點是可以的。石瑛還向我匯報説，他感覺他們祇是敷衍，説得很好，但實際上不給。要他們跟我們合作的希望不大。我説，“那我就再寫信，限期要他們把糧、款送過來。”

好，過了幾天，他們不但不給我們糧、款，還集合了一千多人，從北往南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向我們攻擊，見我們就打。對他們的進攻，我們開始祇是避讓，後來見他們過于猖獗，就拿出一個主力營繞道到他們後面，待他們的隊伍離開圍子後，一下子就把他們的退路掐斷了，然後圍而殲之，繳了他們一百多條步槍，四、五挺機槍，還抓了四、五百俘虜。

由于對方的背信弃義，讓我當時非常生氣，我馬上集合俘虜進行訓話，斥責他們跟日本人站在一邊，想把我們攆走，是漢奸、

賣國賊。接着，我詢問他們，是誰領頭來襲擊我們的。嚇得他們誰也不敢啃氣，都不作聲。石瑛在旁邊告訴我，中間有一個人是他們最壞的頭子。這時我掏出了槍説："你們不講，我就先槍斃你們一個。"

結果我一開槍，打在那個壞頭頭的腰上，雖然没有把那個壞頭頭打死，但却把其他人嚇壞了。他們口口聲聲地告饒，説衹要放他們回去，馬上就給我們送糧食來。我説："那好，就放你們回去，如果再出來騷擾絶不會再這麼客氣，一定消滅你們。"

我們把這些俘虜放回去以後，他們很快就送來了糧食和猪肉，雖然很少，但也就算了。從此，他們就龜縮在自己的土圍子内，再也不敢出來挑釁了。我們也没有再動它，衹是讓它孤立起來就完了。

後來日軍出來"掃蕩"時，一下衝進去抄了他們的家，把東西搶得光光的，槍也給收繳了。從那以後，這個寨子的態度改變了，逐漸的向我們靠攏，和我們互通情報，要求共同抗日。這個寨子解决後，我們在這個地區就再没有後顧之憂了。

之後，我們又繼續往東發展，逐漸進入了洪澤湖畔的半城、南新集、蔣壩等地區。這期間，一大隊大隊長胡炳雲帶部隊出去了半個多月，接連打了幾次勝仗，繳了幾百條槍。從此出了名，當地的老百姓都知道，蘇魯豫支隊有個胡老大。當時，在僞軍中曾普遍流傳着這樣一句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胡老大。"因爲在這裏，再没有其它的主力部隊在活動了。

打開皖東北局面的同時，我們也順利地同魯南取得了聯系。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山東南進支隊的近千人，由支隊長李浩然、政治部主任胡茄(唐棣華)率領，來到睢寧以南同我們會合了。這是我們第一次同魯南的部隊打通聯系。以後李浩然、胡茄等經常同我們聯系，有時兩支部隊還共同開展活動。

在此之前，有個叫抗敵演劇第六隊的，經過長途跋涉，來到皖東北找到我們，想要我們把他們送到山東去。這個演劇隊全隊約有五、六十個人，基本上都是一些大、中學生。他們是在重慶

響應周恩來、郭沫若的號召，在我們黨領導下組織起來的一支文藝演出隊。他們在皖東北逗留期間，非常活躍，經常給部隊演戲、唱歌，幫助做群衆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南進支隊會合後，我們就把演劇隊交給了他們，請他們把演出隊送到沂蒙山區去。

到了八月，山東縱隊政治部主任江華(黄春甫)又帶領一個團南來，在睢寧、宿遷之間同我們會合。團長翁徐文，原是一一五師的供給部長，和我很熟悉。這次在敵後重新相見，我們都很高興。會合後，我們各自介紹了自己的活動情况，互相交流了經驗。這是我們第二次同魯南部隊打通聯系。從此，我們與在山東的師部、黨組織及山東的部隊，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系，順利完成了陳光代師長交待的任務。

不久，江華返回山東，但翁徐文這個團没有跟着回去，一直留在皖東北活動。到後來重建新四軍，張愛萍出任新四軍三師九旅旅長時，翁徐文的這個團同孫象涵、韋國清所帶的部隊一起，合編成了九旅的一個主力團。韋國清還成爲九旅的政委，當然這都是後來的事了。

當時，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的書記是朱瑞。朱瑞是安徽宿遷人，知識分子出身，紅軍時期曾任過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對我比較熟悉。我們打通與山東的聯系後，他得知我以前叫吴文玉，是一軍團下屬的一個幹部，就給我發電報説："我是宿遷人，在宿遷的上層人士中還有一定的影響，我現在擬了一封信，致宿遷及蘇北的父老兄弟，請你用我的名義印好後散發出去。"

我接到電報後非常高興，當即叫人出去買紙。當時紙張極其困難，我們到處買紙，也衹能油印二百多份。後來，我們通過各種關系，把他這篇《告蘇皖邊父老兄弟書》，在蘇北、皖東北各地散發了出去。

就這樣，到一九三九年的夏末秋初，我們把皖東北包括一部分蘇北地區的局面基本上打開了，東到運河邊，西到津浦路，北到徐州附近，在這片土地上，我們建立了抗日根據地，有自己的政權，有我們的黨組織，有游擊隊，有主力部隊在活動，軍隊、

地方各負其責，局面打開了。

八、湖西“肅托”事件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是蘇聯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紀念日。我們召開了地方、軍隊聯合慶祝大會。大會由我主持，并由我講了十月革命的意義。我講話之後，張愛萍代表皖東北區黨委講了話，隨後吳雲村也講了話，會開得熱鬧而簡單，唱了《國際歌》，就結束了大會。

就在這次大會的進行過程中，我突然接到一一五師政委羅榮桓專門給我的一份電報，命令我立即返回湖西地區。電文大意是：吳法憲同志：我來到你們支隊部已有一個禮拜了，我來處理湖西“肅托”事件。你們支隊部業已回到湖西，請你也立即回來，我在這裏等你，請你馬上動身。

接到電報，我立即在會後把情況告訴了張愛萍。隨後，我召集胡炳雲、王東保、孫象涵在一起，告訴他們，羅榮桓政委來電報要我立即返回湖西地區，一大隊、七大隊在這個地區的任務不變，由胡炳雲、王東保、孫象涵組成集體領導，要他們把張愛萍當作上級領導，因爲他代表區黨委，有什麽事情都應當及時向他請示匯報。同時，我也希望張愛萍在我走後多幫助照顧一下這支隊伍。

十一月八日，我把電臺留給一大隊，自己帶着秘書和警衛員就出發了。爲了保護我的安全，一大隊派出一個連護送我。這時樹上的葉子已開始轉黄，天已開始轉冷。我帶着這個連，先過津浦路，再過隴海路，經過五天的急行軍，終于回到湖西，來到了支隊部。

這時，支隊部正好又住在我們初到湖西時和挺進支隊會合的地方——十字河口的蕭莊。我進村後，首先見到了羅榮桓政委。他同我緊緊握手後，説我一路趕來很辛苦，要我回去先休息一下再談。羅榮桓單獨住在村中一個地主家的一間房裏。

晚上，我來到羅榮桓的房間，先向他匯報了我們在皖東北、蘇北的活動情况。羅政委衹是聽，没有説什麽。接着他就告訴我，這次湖西“肅托”，搞得一塌糊塗，有很多幹部被殺，很多幹部被抓，最後甚至把梁興初也抓了起來，還差一點把他給槍斃了。由于問題非常嚴重，因此他才同山東分局的郭洪濤、張經武專程前來湖西處理“肅托”問題。他們來了以後，感到這個問題很棘手，所以先把支隊部調了回來，又發電報要我回來，已經等我一個多禮拜了。他説，郭洪濤、張經武已去延安匯報情况。等我來後，把一些情况談清楚以後，他也要回山東去了。

當天晚上，羅榮桓同我談了一夜。他告訴我，湖西肅托的錯誤是少數人搞起來的。大概在這一年的八月左右，湖西區黨委幹校的學員因不服從分配而鬧事，區黨委派組織部長王須仁到幹校去處理。王須仁將鬧事的主要責任者魏定遠抓到區黨委來親自審訊，逼魏承認自己是“托派”，并逼供出了一份“托派”名單。接着，王須仁在得到區黨委書記白子明的支持後，將這一“肅托”行動擴大到了區黨委内。後來，王須仁又取得了蘇魯豫支隊政治部主任王鳳鳴的支持。于是，王鳳鳴、王須仁兩人在部隊和地方相互配合，開始獨斷專行，變本加厲地搞“肅托”擴大化。他們用捆綁、吊打、壓杠子、灌凉水、灌辣椒水等各種刑罰，進行逼供、指供、串供，幾乎將湖西區黨委的所有部長和各縣縣長、縣委書記，全部打成“托派”關押了起來。如區黨委組織部長郝中仁、組織部副部長馬霄鵬、統戰部長王文彬、軍事部長張如、社會部長趙萬慶等幹部，都被抓了起來，被王鳳鳴、王須仁等嚴刑逼供。再以後，“肅托”行動越來越擴大化，最後發展到縣區幹部大部分被抓、打成托派，扣上“托派”帽子，最後將抗日挺進支隊長李貞乾、王文彬、郭影秋等主要負責人都抓起來，并對他們進行嚴刑拷打。之後，他們竟然把蘇魯豫支隊的副支隊長兼四大隊長梁興初也抓了起來，還誣蔑梁興初同徐州日僞有聯系，是

“托派” 總司令，最後差一點把梁興初、郭影秋、李貞乾槍斃了。

在整個 “肅托” 行動中，白子明和湖西區黨委被王鳳鳴、王須仁控制擺布，不起任何作用，王鳳鳴、王須仁可以隨便抓人、殺人，終使大批幹部被抓，近三百人被冤殺，最後甚至連區黨委書記白子明自己也被抓了起來。這樣大的事情，王鳳鳴獨斷獨行、不請示、不報告師部。在師部和山東分局知道此事後，幾次電令王鳳鳴停抓停殺，但他們不聽，仍然一意孤行。在這種情況下，羅榮桓政委衹好親自同山東分局的郭洪濤、張經武一起，來湖西處理 “肅托” 問題。

羅榮桓政委還告訴我說，我到來之前，他們已經初步處理完了湖西 “肅托” 事件，被冤枉的幹部全部給予了平反，被錯殺的也全部給恢復了名譽，給予道謙，并按照烈士標準給予撫恤。對此，湖西地區的黨和人民萬分感激山東分局這一處理。被平反的幹部和黨員及其家屬對羅政委永遠銘記在心。

羅榮桓認爲，王鳳鳴、王須仁他們没有接受我黨、我軍歷史上所犯的 “肅反”、“肅托”、“肅 AB 團”、“肅改組派”、“肅社會民主黨” 錯誤的教訓。這次湖西 “肅托”，是抗日戰爭開始後，在我根據地内第一次犯這樣大的錯誤。這次 “肅托” 擴大化的嚴重後果，是湖西地區幾乎全部垮掉了，隊伍削弱了，黨的影響搞垮了，黨和八路軍的威信受到損害，湖西群衆因 “肅托” 同我們開始疏遠了。七大隊的耿蘊齋已叛變投敵，國民黨頑固派隊伍乘我們之危擴大了，豐縣、沛縣隊伍都已發展到六七千人，碭山縣也發展到兩千多人。如果羅政委和郭洪濤、張經武不來這裏，湖西的局面就很難挽救。

最後他對我説：“我們查明，那個王須仁才是真正的‘托派’，他想以‘肅托’來保護自己，奪取湖西地區黨的領導權。爲此，他殘害了大批真正的共産黨員，我們已經將他逮捕了。對他的錯誤，我們還要請示中央和山東分局後再作出處理。至于王鳳鳴，暫時仍讓他兼任四大隊政委，四大隊由梁興初和王鳳鳴率領東去魯南，歸師部直接領導和指揮。以後怎麼處理，也要由中央和山東分局來作出決定。”

聽了羅榮桓這一番有關湖西 “肅托” 經過的介紹，我驚心動魄。我向羅政委解釋，我是七月份離開支隊部的，離開時絶没有想到湖西竟會發生這樣大的問題！我根本不知道肅托的事，我的[illegible]同四大隊不通報，支隊電臺可以通，但彭明治、郭成柱也没有説到湖西肅托問題，我連傳説都没有聽到，我根本不知道梁興初被抓起來了，王鳳鳴無法無天，我不清楚。我提出想見見梁興初，但羅榮桓説，“梁興初己帶四大隊離開湖西去魯南了。” 後來才知道因爲羅政委要走，梁興初帶着隊伍到微山湖東邊滕縣和鄒縣布置警戒去了。因此，我這次回來連梁興初的面也未見着。

羅榮桓政委最後説：“正因爲你不知道‘肅托’的事，所以我才要你回支隊部。‘肅托’的錯誤我不怪你，你不用多心。”

但緊接着，他又對我進行了嚴厲地批評。他説：“你是蘇魯豫支隊的政治委員、軍政委員會書記，你離開大部分主力部隊，單獨帶一支部隊出去活動，這是爲什麽？這樣做行嗎？”

我表示，羅政委批評得完全對，我完全接受。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過去歷史上這樣的沉痛教訓多得很，想不到現在又在我們湖西再現了。

不過我同時也向羅榮桓説明，當時我們將整個支隊一分爲三，分别在三個地區進行活動，是陳光代師長來這裏時同意決定下來的。陳光代師長要我向東打通同山東魯南的聯系，要彭明治向西打通同彭雪楓支隊的聯系，梁興初、王鳳鳴留守湖西地區，這些都是陳光代師長點頭批準并親自安排的。陳光代師長當時還特别交待，留在湖西的部隊由師部直接指揮。

没想羅榮桓聽了我的解釋後却説：“陳光同志來你們這裏，并没有經過師黨委批準。在羅坊戰鬥中，我們帶着師部突圍後，他就到你們這邊來了，這事當時我不知道。”

我繼續檢查説：“我們把梁興初和王鳳鳴留在湖西時，没有給他們之間規定領導上的主次關系，結果王鳳鳴竟然把梁興初給逮捕了，這是我們的錯誤。幸虧羅政委及時趕到，不然這個損失就

無法彌補了。"

說到這裏，彭明治和王鳳鳴來了。羅榮桓當場又將王鳳鳴十
分嚴厲地批評了一頓，王鳳鳴衹能唯唯稱是、不敢作聲。

第二天上午，我在徵得彭明治的同意後，又跑去找羅政委
向他建議說："現在一大隊在皖東北已發展到一千七、八百人，還
有孫象涵部的八百多人，加起來將近三千人，是不是再派一政委
去，以加强領導。"羅榮桓問："叫誰去呀？"我回答說，我已徵
得彭明治的同意，想讓參謀長田維揚去一大隊兼任第一政委，讓
王東保任第二政委。這樣，兩個政委，領導力量就增强了。羅榮
桓聽後回答："好，同意。"

我又說："如果你同意，我就留在支隊部不回去了。我從一大
隊還帶了一個連在這裏，向田維揚交代清楚以後，就要他跟這個
連馬上出發到一大隊去，我就不走了，先解决了這個問題。"羅
榮桓很快回答："完全同意，就照這麽辦。"我們當即下了命令
任命田維揚兼任一大隊第一政委，通知他馬上走。

那天下午和晚上，羅榮桓又接連找我們支隊部的幾個同志談
話，研究蘇魯豫支隊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在談話中，他首先對我
們的工作進行了充分肯定。他說："一年來蘇魯豫支隊的隊伍壯
大了，地區局面打開了，現在大片土地都在你們的控制之下，這
很好。今後，堅持湖西地區的鬥争，挽回'肅托'造成的損失和
影響，還是要依靠你們蘇魯豫支隊。衹要把情况向群衆講清楚，
群衆是會相信你們的。"

關于我們以後的主要任務，羅榮桓指出，第一要恢復這個地
區的工作。要恢復黨的組織、黨的影響，恢復地方政權，恢復地
方武裝部隊，恢復工、農、青、婦等各種群衆組織。第二是要繼
續處理好因"肅托"擴大化而遺留下來的問題，給所有受迫害的
同志平反。山東分局準備再派人來幫助湖西區黨委處理"肅托"
問題，進一步把"肅托"事件調查清楚。

羅政委接着說，"第三是今後支隊部不要再離開這個地區了，
支隊部和二、三大隊留在湖西堅持鬥争，把四大隊交給我，仍由
梁興初，王鳳鳴率領，跟我走，渡過微山湖，到微山湖以東，隴
海路以北的地區活動，隊伍直接歸師部指揮，你們可以同他們聯
系，但指揮權屬師部。你們要趕緊把隊伍疏散開，在整個湖西地
區擴大宣傳，宣傳'肅托'是犯了錯誤，但這個錯誤衹是黨內極
少數人造成的，目前正在清查糾正中，要力争盡快地恢復黨的影
響。第四是湖西區黨委書記白子明，是'肅托'問題的直接責任
者，已無法再主持區黨委的工作。我無權委任你們哪一個人繼任
區黨委書記，因爲這是要由山東分局决定的事，但是我可以代表
山東分局指定吴法憲暫時幫助湖西區黨委的工作。這些問題，我
也已經向區黨委交代清楚了，今後湖西地區的工作，主要要依靠
蘇魯豫支隊的幫助，區黨委開會，要請你吴法憲到會。"

工作安排完畢以後，第二天，羅政委就走了。我和彭明治等
一直送他到谷亭，就在那裏向他告别。他要經谷亭，南陽，直奔
微山湖。梁興初已于先幾天到達微山湖東邊準備船隻，組織掩護
迎接羅政委東渡。後來，梁興初率領的四大隊一直在微山湖東的
鄒縣、滕縣一帶活動。至于在活動時是繼續沿用蘇魯豫支隊四大
隊的名義，還是師部又另外授與了什麽番號，我就不清楚了。

送走羅榮桓以後，我和彭明治、郭成柱等經過研究，决定按
照羅政委的交代，首先把兩個大隊撤出去，把二大隊撤向沛縣、
碭山、銅山一帶，三大隊撤向魚臺、金鄉、單縣一帶。支隊部帶
領警衛營進駐谷亭，要區黨委也一起轉移到谷亭。

然後，我們立即開展羅政委布置的工作。我們召開了營長、
教導員以上的幹部會議，把這次湖西"肅托"的全過程向他們交
代清楚，說明這次湖西"肅托"事件的主要責任者衹是王須仁一
個，這個人已被逮捕，關押，查明情况後，已被處决。蘇魯豫支
隊"肅托"事件的直接責任者是王鳳鳴，他已隨四大隊離開了湖
西。對這次錯誤，山東分局還準備作進一步的調查處理。現在，
我們部隊的主要任務，是協助地方黨，做好根據地的群衆工作，
恢復黨的影響。

第一步先做區黨委的工作，把區黨委的幹部都集中起來，這

時白子明、郭影秋、李貞乾、郝中士等一批區黨委和區黨委部
都已被釋放出來，要他們先出來工作，繼續辦公，納入正軌，
黨委工作仍由白子明主持，他一邊檢查，一邊工作，重大問題
區黨委集體討論決定。同時强調加强内部團結，不要互相埋怨
要團結一致，先執行羅榮桓政委的指示，要把湖西地區恢復
來，至于那些没搞清的問題，要相信黨組織以後一定會逐漸搞
楚的。

第二步，恢復地方政權，重新建立魚臺、金鄉縣政府，以
豐縣、沛縣、銅山的幾個區政權，并恢復了各地的工、農、青
婦等群衆組織。對"肅托"中的冤假錯案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被捕的一律釋放，被打傷的養傷，傷愈後恢復工作，被殺的追
他們爲烈士，安撫其家屬，開除了黨籍的恢復其黨籍。同時，
廣大群衆公開道歉認錯，恢復黨在人民群衆中的影響。

第三步，向國民黨頑固派發出警告，同他們公開談判，指
他們的錯誤，告誡他們不要利用我們"肅托"的錯誤，公開的
立我們，侵占我們的地區，限制我們的發展，并把我們擠走。
路軍在敵後抗戰的功績是磨滅不了的，希望他們不要忘了一年
來，我們對他們的支援和幫助，迅速退回原來的地區，把侵占
的地區還給我們，繼續共同抗日，不要輕舉妄動，否則，王歪
子就是他們的前車之鑒。

當時他們都同意了，都退回到了原來的地區。這個時候，
方雖然還没有發生磨擦，但對立情緒已經明顯增加了。在一九
九年一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國民黨確定了"溶共
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從這以後，豐縣的董玉珏、黄體潤，
沛縣的馮子固，碭山的竇雪岩，單縣的劉耀庭，都明顯的同我們
疏遠了，態度完全變了，處處戒備我們，不同我們接觸。我們也
向部隊指戰員，地方黨和政權作了交代，要防止頑固派對我們的
挑釁。

第四步，以實際行動幫助群衆，恢復黨的影響。當時春節已
過，春耕即將開始，我們便組織部隊幫助群衆積肥、翻地，準備

種子，給麥子澆返青水。我們還特別注意抓好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逐漸挽回影響。

經過這段時間的艱苦工作以後，湖西地區的局面基本穩定下來了，情况開始得到好轉，黨和八路軍在人民群衆中的影響，也有了一定的恢復。

這個時期敵僞的"掃蕩"次數減少了，衹有碭山和金鄉的敵人出來過一次，轉了一圈，經過五、六天後，就又回到了據點裏。在這次敵人的"掃蕩"中，國民黨的縣大隊同我們一起，與敵僞打了一些小仗。在這次"掃蕩"中我們没有什麼損失，但在前一段"肅托"期間，一部分"抗日溝"因下雨而垮塌了，没有及時得到修整。這時我們又加緊動員群衆搶修，以對付敵人可能進行的新的"掃蕩"。

一九四〇年二月，羅榮桓政委派山東分局保衛部長劉居英來到湖西，直接調查和處理"肅托"問題，并負責指導湖西區黨委的工作。劉居英在湖西期間，住在我們支隊部，由我們負責照顧他的生活。我們向他詳細匯報了"肅托"善後工作情况。

我向他建議説："你没來以前，羅榮桓政委要我兼管一下區黨委的工作，現在你來了，是不是就請你直接主持區黨委的工作，今後區黨委的活動我就不再參與，以便集中精力照顧部隊工作。"劉居英表示同意，于是我便脱離了區黨委的工作。

劉居英在湖西一共待了兩個多月，一直到四月份才返回魯南的山東分局。

在這一年的年初，一一五師師部和山東軍區來電報説，準備在魯南師部召開高級會議，要我與彭明治兩人中去一個參加會議。彭明治看了電報説，"我去參加會議，你還要照顧區黨委的工作，擔子很重，還是你留在湖西主持工作。"我同意了。

到了二月下旬的一天，在事先没得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之間，彭明治和一一五師保衛部長朱滌新一起回來了。當時我還以爲朱滌新是來檢查工作的，彭明治在一邊也不吭聲。後來我問彭明治，朱滌新來幹什麼，彭明治這才告訴我，朱滌新是來當

政委的。他還説："羅榮桓政委要我轉告你，同你説一下，因
你曾對羅政委表示過，不願意當政治委員，願意當政治部主
所以這是根據你自己的要求决定的。"

聽了彭明治的話，我心裏非常難過，很不高興。我想我是
經對羅榮桓説過這個話，因爲我願意帶着部隊單獨出去活動，
得當個政治委員太不容易，擔子太重。但領導真的作出了這樣
决定，又使我感到十分傷心。雖然我表面上不得不表示歡迎，
内心不痛快。

當天晚上，我給羅榮桓政委發了一份電報，説朱滌新政委
經到職，請求調動我的工作。我因一時感情衝動，還寫了一些
生氣的話。我寫道："羅政委你當時在湖西，并没有同我談要
動我的工作，相反還表揚了我。現在突然之間就把我降爲政治
主任，這是爲什麽？請回答。"當時我這些話説得很"衝"，也
不冷静。但羅政委的涵養好，并没有責怪我，也没有給我回
第一份電報没有得到回音，我就又給羅榮桓發了一份電
我在電報中説："我現在已到了政治部，支隊部的工作我已向
滌新政委交待清楚，希望盡快把我調離蘇魯豫支隊。我要求離
蘇魯豫支隊，是因爲我好像已犯了什麽嚴重錯誤，可組織上又
麽也没跟我談，讓我不知道爲什麽有這樣的變動。"

同樣，第二份電報也没有接到復電。見此情况，三天後我
搬到了政治部。政治部當時同區黨委住在一起，于是區黨委的
些同志就天天來找我。這樣，我就又開始插手過問一些區黨委
工作。

我到了政治部後，朱滌新專門來找我。他對我説："我來，
羅政委要我來的。我當時説情况不熟，羅政委説没有關系，一
工作還是要吴法憲來做，區黨委的工作也還是要吴法憲幫助抓
你衹是在總的方面多管一下。這樣我才來了。"

我説，"那好。"因爲這件事不怪朱滌新，我對朱滌新没有
見，不願意使他太難堪。我衹是對羅榮桓有點意見，認爲他不
在决定前不找我談一談。

但不久之後我也想通了，服從組織决定，必竟是一個共産黨
人的天職嘛，無所謂，可上可下嘛！加之以後朱滌新凡事都同我
商量、同我研究，彭明治他們也像過去一樣地尊重我，我的思想
也就逐漸地穩定了下來。

九、南下蘇北

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陷後，抗日戰争由戰略防御階段開
始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侵略者對國民黨軍隊的策略，改以政
治誘降爲主，軍事打擊爲輔。同時，日軍逐漸將其主要的兵力，
用來打擊堅持敵後抗戰的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部隊，以鞏固其占領
區，并把自己的打擊重點放在了華北。針對日軍的這一進攻策略
變化，中共中央决定，在華北，以鞏固爲主，在鞏固中求發展；
而在華中和華南，則以發展爲主，在發展中求鞏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二月間，由當時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在華中主持召開了三次中原局會議。會議按照黨中央的戰略意圖，結合華中敵、友、我各方面的情况，深入研究了我們在華中的戰略發展方向。會議認爲，蘇北地區已成爲敵後，國民黨衹有韓德勤部在那裏活動，而韓部内部矛盾重重，并爲人民所痛恨，因此我們如向中發展，開辟蘇北，不僅在政治上有理，在軍事上有利，而且蘇北地區靠近山東，還可與山東的



在蘇北淮海抗日根據地

八路軍相互依托、相互策應，共同發展。據此，中原局會議決定，向東發展，開辟蘇北抗日跟據地，并以此作爲發展華中的戰略方向。

劉少奇即向中共中央建議：命令八路軍的一部南下，江南新四軍主力北上，大力發展蘇北根據地。對劉少奇的這一建議，中共中央復電完全同意，并指出，在整個江北，都應廣泛、猛烈地向東發展，一直發展到海邊，不到海邊，絶不停止。復電還强調：一切有敵人而無國民黨軍隊的區域，均應堅決而有計劃、有步驟地去發展。

一九四〇年三月，我們收到一一五師師部的一份電報，除傳達上述中原局的決定外，還命令蘇魯豫支隊全部離開湖西，南下并東進蘇北，以配合新四軍的渡江行動。電報通知我們，湖西地區的工作由黄河支隊來接替，要求我們立即作好準備，包括思想上的準備（政治動員）和物質上的準備（夏裝）。至于支隊留在地方工作的幹部，一概不動，一律不帶走。

我們接到電報以後一個星期，黄河支隊就呼呼地下來了，并很快在豐縣、單縣和金鄉接替了我們的防務。黄河支隊共三個團，支隊長彭雄，政治委員張國華，他們兩人是同一個縣的，都是江西永新人。張國華先到支隊部來拜訪我們，我們大致上給他談了一些情况，他要求我們派人去他們那裏，對湖西的情况作一下詳細的介紹。彭明治、朱滌新當即答應説："我們已經商量好了，要吴法憲到你們那裏去匯報。"張國華當即表示歡迎。接着我便跟隨張國華去了一趟黄河支隊。

在黄河支隊，我受到了他們非常熱情的接待。我將湖西地區的敵情，即日軍、僞軍、漢奸的情况，以及國民黨部隊頑固派的情况、國民黨部隊的情况，還有我們的地方工作情况、根據地建設情况等，都向黄河支隊的同志作了全面的介紹。我還特别向他們介紹了湖西曾經發生的"肅托"錯誤，以及我們爲清除這一錯誤所做的各項工作。

我回到支隊部之後不久，彭雄、張國華又來到我們支隊部看

望彭明治和朱滌新。在閑談中，我説起國民黨在湖西的部隊已有近兩萬人，這些部隊原先同我們合作得很好，隨着蔣介石態度的變化，反共高潮的到來，他們的態度就變了，不斷同我們發生"摩擦"。我説，在這一點上我們也有錯誤，因爲剛開始他們衹有千把人，而我們蘇魯豫支隊則有八、九千人，一擺出去，不就把他們搞掉了嗎？如果那個時候就派我們的人去當縣長，這政權也就都是我們的了。

彭雄是個工農幹部，完全是工農幹部的本色，性格比較直率，他一聽我這話就説："現在我就派部隊去把他們搞掉。"我趕緊告訴他，現在國民黨部隊的力量大了，我們可不能輕舉妄動，衹能加以嚴密的防範。最主要的還是，如果他們不向我們主動進攻，黨的政策就不允許我們這樣去做。

當時，由于蘇魯豫支隊的一大隊和七大隊孫象涵部還在皖東北没有回來，于是我們發電報請示師部，詢問對孫象涵部如何處理，是編入一大隊，還是另行編制。師部復電説，孫象涵部不動，留在皖東北交由張愛萍領導指揮，一大隊可以帶走。

一九四〇年六月，正當我們準備離開湖西但還没有走的時候，黄克誠率三四四旅、新編第二旅共五個團一萬二千餘人，從河北南部下來，先我們過了隴海路，在豫皖蘇邊區與彭雪楓支隊會合了。根據中央軍委命令，這兩支部隊合編爲八路軍第四縱隊，彭雪楓任司令員，黄克誠任政治委員，活動區域是津浦路以西、隴海路以南。隨後，我們蘇魯豫支隊也越過隴海路到達泗縣。當時，八路軍第四縱隊的兩支部隊還未來得及整編。

我們到達泗縣不久，中央軍委根據毛澤東關于控制隴海路以南、津浦路以東、長江以北、大海以西地區的戰略意圖，急電催促黄克誠率部越過津浦路，東進皖東北。八月中旬，黄克誠率部到達盱眙縣中原局駐地。

在此前後，劉少奇提出"向東發展，向西防御，集中力量發展蘇北"的具體方針。之後，經被中央批準，由彭雪楓任司令員的八路軍第四縱隊，包括其下屬的第四、五、六旅共九個團一萬

七千餘人，執行向西防御的任務。將淮河以北，津浦路以東所有我黨領導的武裝部隊，包括新編第二旅、第六八七團、蘇魯豫支隊、隴海南進支隊、新四軍第六支隊第四總隊，統一組成八路軍第五縱隊，由黃克誠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下轄第一、二、三支隊隨即又編爲七、八、九三個旅，共九個團兩萬餘人，執行東進淮海的任務，配合新四軍的北上部隊，共同開辟蘇北根據地。

在這次整編中，蘇魯豫支隊的番號被撤銷，改編爲八路軍第五縱隊第一支隊，以後又編爲第五縱隊的第七旅。第一支隊下轄的一、二、三大隊分別改稱一、二、三團。支隊長彭明治，政委朱滌新，副支隊長田維揚，我仍爲政治部主任。一團團長胡炳雲，政委王東保，二團團長黃煒華、政委馮志祥，三團團長王良太，政委羅友榮。

部隊整編結束後，隊伍立即東進，準備渡過運河進入淮海區。所謂淮海區，即運河以東，隴海路以南，廢黃河的西北，直至黃海邊的大片區域，包括淮陰、漣水、泗陽、沭陽、灌雲、海州等縣、鎮。這一區域内，有運河、鹽河、沂河、沭河、六塘河、灌河等河流橫貫其間，由西南向東北流向黃海，完全是一個河網密布的地區。

作爲第五縱隊的先頭部隊，我們率一支隊二、三團一路東進，經皖東北根據地到達了十九團的駐地南新集。在南新集，我們停下來布置偵察，部署渡運河。

經過幾次偵察，我們了解到，運河東岸的廣大地區全部被日偽軍所占領，運河邊上都建有敵人的據點。據點與據點之間，大約有二、三十里路的空隙。與南新集隔河相望的淮陰、王營、魚溝是日軍三個較大的據點。北面的泗陽、衆興、陳道口也有日軍駐防，而東北面的陳集、錢集、徐溜等地則爲偽軍所駐守，各有偽軍七、八十人到百把人。

八月底的一個晚上，正好運河漲水，我們决定趁這機會實施渡河行動。我們以一團爲主，向清江市警戒，并佯攻日軍駐守的魚溝，以保證渡河部隊右側的安全，向左，則向泗陽加强警戒，

與此同時，支隊主力很快渡過了運河，在日寇的據點之間穿插行進，按原定計劃，順利打下徐溜、成集、錢集三個偽軍據點，敵人全部被消滅，我們自己傷亡不大。

隨後，黃克誠率第二支隊也渡過運河，與一支隊會合在一起。我們衹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就占領了南到淮陰、漣水、西到泗陽、宿遷，東到射陽、東北到響水口，灌雲。淮海廣大地區，雖然没有占領一個縣城，但重要集鎮都在我們的控制之下。我們便以支隊部所在的陳集、錢集爲中心，三個團分别向南、向北、向東北方向繼續發展，以擴大我們的占領區。

在我們進入淮海地區後，原皖東北區黨委負責人之一的楊純，也奉命進入淮海區，任淮海地委書記，跟我們政治部住在一起。這時，部隊除了打仗消滅敵人以外，重點也是開展地方工作。

淮海地區没有國民黨的政權，因此，我們每控制一個地區，就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政權。不久，我們就相繼建成了沭陽、漣水、淮陰、泗陽、灌南五個縣政府及縣委領導，并由地委負責籌備成立淮海專員公署。

九月，我們在錢集召開淮海區人民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淮海專員公署。在這次大會上，經楊純推薦，選舉我兼任淮海區專員，選舉原沭陽縣委書記徐一鳴任專員公署秘書長。從這以後，我的工作重點便轉爲配合地委搞地方工作，一支隊的大部分政治工作，我則交給了政治部副主任郭成柱。

這時情況又發生了變化。九月二十八日，劉少奇急電黃克誠，要八路軍第五縱隊火速向東南推進，控制阜寧、益林地區，支持新四軍在黃橋反擊國民黨頑軍的鬥争。接到電報，黃克誠急調以張愛萍爲支隊長、韋國清爲政委的八路軍第五縱隊第三支隊，進入淮海區，接替一支隊的工作。同時命令我們一支隊，即刻南進，渡過鹽河，進占阜寧、鹽城，開辟鹽阜區，争取同新四軍的蘇北指揮部會合，以配合新四軍的黃橋反頑鬥争，使蘇北同山東根據地聯成一片。接到命令後，黃克誠親自來一支隊進行動員和布置，幫助我們進行各種準備工作。

經過幾天準備，九月三十日晚，我們從漣水和響水口之間東渡鹽河，進入阜寧地區。然後兵分兩路，一路沿羊寨、阜寧、上岡，南下鹽城；另一路沿甸湖、東溝、益林、湖垛，向鹽城夾擊。兩路部隊邊打邊走，沿途連續戰鬥，擊潰、消滅了國民黨頑軍韓德勤部保二旅、第八旅各一部分，占領了阜寧縣城、鹽城縣城及下屬的大部分地區，共消滅敵人約兩千人。

在我們進入阜寧地區之前，爲執行開辟蘇北的戰略任務，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渡江北上，東進黃橋，并于七月奉命改稱新四軍蘇北指揮部。蘇北指揮部下轄第一、第二、第三縱隊，共九個團七千餘人。

在蘇北地區，國民黨的力量較强，僅國民黨蘇魯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部，就約有十萬人。由于韓德勤消極抗戰，積極反共，任其部隊魚肉鄉裏，他深爲蘇北人民所痛恨。當時在蘇北群衆中曾流傳着這樣的歌謡："天上有個掃帚星，地下有個韓德勤，手下白養幾萬兵呀，偏偏欺侮老百姓，咳！。"

新四軍進入蘇北後，韓德勤企圖乘我北上的新四軍立足未穩之時，開始調集重兵共四十個團，計五萬人，向新四軍發起了進攻。他還挑撥，拉攏與威脅駐在蘇北的國民黨蘇魯皖邊游擊軍李明揚、李長江兩部，出兵七千餘人，與他一起圍攻新四軍。蘇北新四軍在陳毅的指揮下，采取後發制人的方針，于十月初將韓德勤的主力一萬餘人殲滅于黃橋地區。黃橋一戰後，韓德勤率殘部逃往曹甸、興化，蘇北局面隨之打開。

黃橋戰役，新四軍之所以能以少勝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群衆的幫助。在戰争中，人心的向背，常常是决定戰争勝負的關鍵。當年有首流傳甚廣的歌，就是説這種情景的。這首歌的歌詞大意是："黃橋燒餅黃又黃，黃黃的燒餅真好看。燒餅要用熱火烤喲，軍隊要靠老百姓幫。同志們呀吃個飽，多打勝仗多繳槍。" 我軍剛到黃橋，就受到當地群衆携老扶幼的熱烈歡迎，他們以當地特産黃橋燒餅犒勞我軍。

我們進入蘇北地區時，新四軍正在進行黃橋戰役。爲支持新

四軍的黃橋戰役，我們一支隊在殲滅韓德勤的部分主力部隊，并占領了鹽城、阜寧後，奉命繼續揮師南下。十月十四日，八路軍第五縱隊一支隊一團進抵東臺縣白駒鎮，與新四軍二縱隊司令員王必成、政委劉培善率領的二縱六團會師。這是抗戰以來，八路軍和新四軍在蘇北第一次勝利會師。這是一次有歷史意義的會師，使我華北根據地終于和華中根據地聯成一片。新四軍江南指揮部率主力北上，八路軍第五縱隊主力南下，共同開辟了蘇北抗日根據地。

不久，八路軍第五縱隊另一支主力部隊二支隊也相繼南下，占領了阜寧的東坎、八灘等地，從而控制了阜寧全縣。隨後，又攻占了淮安的東部和車橋的北部。這樣一來，南面是新四軍，北面是八路軍，我們就把韓德勤所率領的部隊緊緊包圍在車橋、曹甸之間一個狹窄的區域裏了。

一支隊南下時，因爲我在淮海區兼任專員工作，一時脱不開身。所以帶着隊伍東渡鹽河，南下蘇北的是彭明治、朱滌新、田維揚和郭成柱。待我到達蘇北時，支隊部已經進鹽城，正着手部署成立鹽城縣政府和縣委。

蘇北地區是魚米之鄉，比北方富裕，人民生活水平比北方高，農忙季節以及過年時農民的餐桌上可以見到鷄鴨魚肉，海邊盛産刀魚、蝦、螃蟹，整個地區的人口比較稠密，文化程度比較高，商業比較發達，當地的風俗民情也比較開化。

鹽城，有人口約兩三萬人，市内有一部分小手工業，小作坊，商業是主要的。這裏河網交織，水路交通是主要的，可以通達上海、南通、揚州、鎮江等地，南來北往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

進駐鹽城後，我們政治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地方工作。爲了盡快穩定民心，我們首先是出安民布告，宣傳黨的各項政策，恢復地方秩序。我們的重點是，穩定工商界，使之照常開業、照常營業。同時建立黨組織，建立鹽城縣政府，組織民兵和游擊隊，開展統戰工作，建立財政稅收，恢復經濟，恢復市屬各大小鎮子的工作。南方的城市比較繁華，凡有五十戶以上人家的小鎮子，沿

街都開設有不少店鋪，有飯館和澡堂子，這在北方還是不多見的。

十、參加蘇北抗敵和平會議

一九四〇年十月下旬，正當我們在鹽城陸續開展這些工作時，突然接到八路軍第五縱隊司令員兼政委黄克誠的一份電報，説蘇北的新四軍要召開一個抗敵和平會議，邀請八路軍派代表參加，并指定我代表八路軍第五縱隊去參加這一會議。接到電報後，我當即給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發了一份電報，詢問會議地點，復電説會議地點是在泰州的曲塘。

隨後，我便去與彭明治、朱滌新商量，説我過去從没有走過這條路，沿途的敵情不太清楚，蘇北又是個水網地區，加之青紗帳已落，一旦遭遇敵人，不好隱蔽，是否帶點警衛部隊去。他倆都説，當然要帶，最好帶一個騎兵連去。我認爲一個連一百多人、一百多匹馬，太多了，走起來不方便，還是帶個騎兵排，去個連長帶隊，就足够了。這樣一共三、四十匹馬，路上也好辦一點。聽我這一説，他倆都表示同意。

十月二十七日，我帶着騎兵排從鹽城出發，前往曲塘參加蘇北抗敵和平會議。我們沿着一條被破壞了的從灌雲到南通的公路走。頭天我們經伍佑、大岡、白駒，到達東臺宿營。因爲馬多，爲便于喂馬，我在城南找了一座學校住了下來。

第二天我們由東臺出發，經梁垛、安豐、富安，到達了駐在海安的新四軍蘇北指揮部，見到了副總指揮粟裕。剛一見面，他就告訴我，曲塘現在就等着我去開會，要我趕緊去，并且説已經爲我準備了一條汽船。他要我把騎兵排統統留在海安，由指揮部負責安排照顧，我和警衛員馬上坐汽船走。我們趕緊上了汽船，大約兩個小時後就到了曲塘，這時天還没有黑。一下汽船，我馬

上去見陳毅總指揮。陳毅見了我，當即把我介紹給當時在場的其他人，説這是八路軍的代表吴法憲。

晚上住下後，我去請示陳毅，對他説："陳總指揮，對蘇北抗敵和平會議的情况，我一點都不了解，黄克誠司令員叫我來聽候你的指示，請你安排。"

陳毅聽了很高興，他告訴我説，這個會議是根據中央指示召開的。中央指示，在蘇北要繼續團結地方實力派和開明士紳，大力進行根據地建設和擴大軍隊。根據這個指示，蘇北指揮部爲進一步争取李明揚等人與我們合作，决定召開有各界人士參加的蘇北抗敵和平會議。會議除邀請了李明揚、李長江、陳應泰以及國民黨江蘇省參議員韓國鈞、蘇北地方代表黄玉峰等人以外，還邀請了韓德勤的代表，但遭到韓德勤的拒絶。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討論在蘇北地區如何實現統一戰綫，劃分防區，團結抗日，共商大計。會議的主要目的，是争取"兩李"（李明陽、李長江）和陳應泰，孤立韓德勤。

説完這些以後，陳毅就同我拉開了家常。他先問我是否參加了長征，從什麽地方出發，經過了些什麽地方。我一一作了回答。我説："總指揮，你可能把我忘了，你在江西軍區當司令員兼政委的時候，我在六十四師當青年科長，當時你住在興國縣的一個天主教堂裏。江西軍區政治部召開青年工作會議時，你還給我們作過政治報告。"

陳毅馬上説："啊，那是老部下了！"我説："是啊，是老部下，你是我們的老司令員。我那時是個青年科長，是個小小的幹部。"

抗敵和平會議從十月二十九日開始，到三十日結束。會議大致定下來兩條：一、當前的大前提是共同建設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籌備召開蘇北各界人民代表大會，按照"三三制"的原則（即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中間派占三分之一，進步人士占三分之一），成立蘇北行政委員會及縣、區政權，吸收廣大非黨人士參加政權；二、堅持蘇北地區國共兩黨軍隊現在的各自的防區，互

不侵犯，互不攻擊，停止"摩擦"戰，不打消耗仗，互通情報，互相支持，團結對敵。會上各個代表都發表了一通意見，都表示同意陳毅總指揮的意見，口頭上達成協議，但没有形成文字的東西，會議就這樣結束了。

十月三十一日，我隨同陳毅坐一條小船回到海安新四軍蘇北指揮部，又見到了粟裕。在海安，我向陳毅、粟裕簡略匯報了我所知道的八路軍第五縱隊的情況，他們也把新四軍的情況向我作了簡略介紹。我請陳毅、粟裕在本子上給我簽個字。他們一人給我寫了幾句話，作爲鼓勵。他倆對我們在各自分别經過敵後游擊戰争和長征後，又重聚在一起，表示十分高興。

當天晚上，由陳毅及蘇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鐘期光出面，請包括韓國鈞、黄玉峰等當地知名人士吃飯，也請政治部的同志和我參加。十月份，正值盛産螃蟹的季節，大家興致勃勃地吃了一次螃蟹宴。

十一月一日，我準備回去了，但陳毅總指揮挽留我再住一天，説讓我參觀參觀海安這個鎮子。海安這個鎮子比較繁華，商業也比較發達。正好當天下午，韓國鈞回請陳毅，粟裕、鐘其光等，把我也邀了去，參觀了他的家庭花園，還吃了一頓豐盛的晚宴。

十一月二日，我向陳毅、粟裕正副總指揮和鐘期光主任告别，當天回到了東臺，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們又在白駒新四軍第二縱隊司令員王必成、政委劉培善處住了一晚。十一月四日，我們回到了鹽城。

由于黄克誠當時率縱隊部駐在東溝、益林地區，因此回到鹽城後，我以電報向他請示，準備去他那裏匯報一下這次蘇北抗敵和平會議的情況。可黄克誠復電説："不用來了，簡單寫個書面報告就可以了。"

我遵照他的指示，寫了個簡短的會議情況報告，并轉達了陳毅、粟裕對他的問候。同時，我也向彭明治、朱滌新等轉達了陳、粟兩位首長的問候，以及對我們一支隊全體指戰員的問候。

回到鹽城，我的工作重點放在鹽阜抗日根據地的建設上。當

時的阜寧、鹽城兩縣，各有一百二十多萬人口。在根據地的政權建設過程中，黄克誠曾指示我用淮海區專員的名義，委任宋乃德爲阜寧縣縣長。宋乃德是山西人，老幹部，以後他成了鹽阜區行政公署的專員。另外，我還委任了鹽城縣縣長，是個本地人，地下黨員，但是他的名字，我却怎麽也想不起來了。

十一、新四軍總指揮部進駐鹽城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中旬，遵照中央軍委的指示，成立了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葉挺爲總指揮部總指揮，劉少奇爲政治委員，陳毅爲副總指揮。

不久，總指揮部準備北移。彭明治和朱滌新認爲，應當把鹽城讓出來，讓總指揮部駐鹽城。我們搬到二團駐扎的岡門鎮，在得到批準後，我們很快搬到了在鹽城西面約二十里路的岡門。岡門這個鎮子很大、很繁華，有兩、三萬人。

我們剛剛搬到岡門，陳毅就坐着汽船來了。他是代表新四軍來看望我們的，我們熱烈歡迎了陳毅。當天晚上，陳毅跟我們幾個支隊的幹部，相互之間談了很多情況。陳毅同志還給我們講了許多有關三年游擊戰争的故事。

陳毅同志剛走，過了三、四天，劉少奇同志又從洪澤湖經淮海區、阜寧地區，來到了鹽城。彭明治、朱滌新和我趕緊回到鹽城，接待劉少奇同志。

在鹽城，劉少奇詳細地給我們闡述了東攻西防的重要性。他説，在長江以北的八路軍、新四軍慢慢向東發展，而皖南的新四軍向北轉移，這樣就可以逐漸地把華北、華中的根據地連成一片，可以擴大抗日隊伍、增强力量，必要時粉碎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國民黨原來强令新四軍把江北的部隊全部調到江南的一塊狹小地區，企圖隔斷八路軍與新四軍的聯系，以便在適當時機消

滅新四軍。此計不成，又强令我八路軍、新四軍全部撤至黃河以北，然後沿河封鎖，置我于日、蔣夾擊中。對此，中央決定的對策是，在皖南取讓步政策，即同意轉移。對華中取自衛政策，必要時粉碎其軍事進攻。在全國發動大規模的反投降、反內戰運動，用以爭取中間勢力，打擊親日派的陰謀挑釁。

劉少奇强調說，當前我們工作的重點，是建設蘇北根據地。而鹽城，又是蘇北的中心。因此新四軍蘇北指揮部及中原局都準備遷到鹽城來。他還告訴我們，他已向中央提出建議，將隴海路以南包括第五縱隊在內的所有八路軍，統統編入新四軍，而且所有的幹部統統都要留在華中，不再北調。

恰恰就在這個時候，我們接到山東軍區的一道電令，將原蘇魯豫支隊改編爲山東軍區教導第一旅，同時命令我回山東去，任教導第二旅政委，旅長爲曾國華。我把這個命令給劉少奇看了，并請示他怎麼辦。看完電令，劉少奇立刻說："一支隊的部隊肯定不回山東了，你也不能回山東。現在應當是幹部向南來，而不是向北去。你應當就在蘇北工作。"就這樣，劉少奇把我留下來了。

又過了幾天，八路軍第五縱隊司令員兼政委黃克誠下達命令，將我由一支隊的政治部主任提升爲第五縱隊的政治部主任。我又去請示劉少奇同志。他答復我，這個命令要執行，因爲這是經中原局同意，又經過十八集團軍總部批準了的。不過，他要我暫時還留在鹽城這裏不動。因爲中原局和總指揮部現在要管整個華中的工作，鹽阜地區的工作一時管不過來，所以暫時還得由我們一支隊政治部先管着。他說："過幾天調幾個幹部來，等他們組織起鹽阜地委和鹽阜行政公署，正式開始工作後，你就可以離開一支隊了。"

十二、斷橋事件

這裏我順便講一下我們從鹽城遷向岡門時發生的一件事。

蘇北地區的最大特點，就是這裏的大江小河連在一起，是一個河網密布的地區。有的河，如沭河、鹽河等，直通黃海。海船四通八達，可以直通上海，也可以轉入長江，通往南通、鎮江、南京等地。這裏的公路大都已被破壞，這裏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許多村莊就直接建在河邊，一出家門就可以上船

在水網地帶，在陸上的行動就很不方便，一出門就得過橋，橋很多，但都不是什麼堅固的大橋，有的是獨木橋，也有的是用幾棵樹，用繩子把兩頭一綁，連接在一起，就算是一座橋，這樣的橋就很不堅固。當然也有稍好一點的，是用石板或木頭建築而成的橋。

地形變了，在戰術上就要不斷的總結經驗，做出改變。在水網地帶打仗，要跑掉是很容易的，春夏秋三季岸邊的蘆葦很多很高，也便于隱蔽。但是要包圍和消滅敵人就比較困難，有時候明明你看到了敵人，可偏偏有一道河淌在面前，你就是過不去。所以一打仗，首要的任務就是控制橋和船，有了橋和船，就可以過河，大部隊展不開，就用小分隊，這樣運動迅速，便于包抄敵人。

彭明治是個軍事指揮員，他很注意占領橋梁和渡口，很注意保護橋的完好，這是完全對的。

那天，我們從鹽城移防到岡門，把鹽城讓給中原局和總指揮部住，岡門原爲二十團駐地，他們往西挪了挪，把岡門讓給了我們。從鹽城到岡門，一共祇有二十多里路，就過了十幾二十座橋。快到岡門的時候有一座橋比較長，有三截。我們旅部行動的時候，常把騎兵連和偵察連放在前面。正當騎兵連在這橋上過一半的時候，馬把橋踩斷了，六、七個戰士掉進河裏，馬也掉進了河裏，不會水的人就被淹死了。

彭明治聞訊以後非常氣憤，立即趕到前面去處理這一問題。他嚴厲查問橋是怎麼斷的，是誰在橋上掉下去了。正好這時從河裏爬上來一個青年幹事，彭明治就問，你爲什麼把橋踩斷了，萬一有個情况怎麼辦？結果不問三七二十一，撥出手槍，"砰、砰、砰" 連打三槍，把那個青年幹事打死了。

我和朱滌新得知了此事，覺得彭明治這樣隨便槍斃人不對，就批評彭明治説，騎兵連已經過了那麼多，很可能是前面的人把橋踩壞的，恰恰他倒霉，走到這裏，一下掉進河裏，幾乎淹死，結果一上來，你 "砰、砰、砰" 幾槍就把人家給打死了，這樣做很没有道理。

彭明治不敢分辯，衹説，他當時脾氣上來了，想也没想就開了槍。已經開了槍，怎麼辦哪？

我們説，這樣做不對，第一、這不是戰場，在戰場上你有權力，誰不執行命令就槍斃誰，但現在我們是在移防，不是在打仗。第二、究竟是誰把橋踩壞的，現在弄不清楚，其實我們當時不應該要騎兵走這個橋，應該讓他們騎馬游泳過去就行了。

彭明治一聽，也有點後悔了，説："人已經死了，没有辦法了。" 我們當時也就原諒了彭明治，但表示，事情還是要上報。朱滌新和我兩個人就把這件事情，上報給黄克誠和劉少奇。

黄克誠是個群衆觀點很强的人，劉少奇更是如此。但劉、黄二人考慮到一支隊是華中八路軍、新四軍的主力之一，打仗很得力，彭明治在軍事指揮上又很有經驗，不便在戰争吃緊的時候給予他太重的處分，就指示我們批評一下就算了。這件事就這樣了了。

這件事情，説明了在水網地區保護橋梁的重要性。事情已經過去了幾十年，現在回想起來，還覺得這個青年被槍斃得够冤枉。我衹記得他是個山西人，叫什麼名字也都忘了。

十三、曹甸戰鬥

在一九四〇年十月新四軍黄橋戰鬥勝利後，國民黨韓德勤部雖號稱爲蘇魯戰區，實際上已衹剩下三千人左右，龜縮在到淮安之間的曹甸，車橋一帶。韓德勤頑固堅持其反共立場，不斷利用手下的殘餘力量，對我蘇北根據地尋隙挑釁，制造"摩擦"，成爲我們蘇北抗日戰争的一大障礙。

劉少奇、陳毅等進駐鹽城後，不久，黄克誠率八路軍第五縱隊二支隊，也到達阜寧的八灘，東溝等地區。于是，陳毅決定打擊蘇北地區最頑固的反共分子韓德勤，以鬥争求團結，争取中間的中間分子，如李明揚等，同我軍合作抗日。

十一月下旬，陳毅親自偵察了曹甸的外圍地形。曹甸這個鎮大約有幾千户人家，鎮子的外面築上圍子，是座土城。從上面下來的水，一直流入曹甸外城的塹溝，成爲城周圍的一道防御工事。另外，韓德勤的部隊剛進駐曹甸不久，没有修築什麼堅固的工事，主要就是利用這個有水的外壕和圍墻據守。

陳毅下令，要我們五縱隊一支隊由東向西，首先肅清曹甸外圍。我們一路横掃，從鹽城的岡門出發，經樓王莊和安豐戰鬥，一直打到運河邊上，抵達曹甸西側，切斷敵人的退路，完成了肅清外圍的任務。

之後，陳毅旋即命令我們一支隊繼續向東力攻曹甸，同時集新四軍在蘇北的主力部隊，由粟裕、葉飛率領，由南向北對曹甸發起攻擊。同時，又調集第五縱隊二支隊的四團，由北向南夾擊曹甸。這樣，曹甸就完全處于我們的包圍之中。應當説勝利是有把握的。

然而事出意料，十二月十三日晚八時，總攻曹甸開始時，北面的第二支隊四團因在水網地區受阻，没有及時趕到。我們一支隊由一團和二團擔任主攻，在曹甸西門外城水壕邊，連續猛

次，但都因溝寬水深，我們的攻城器材準備不足，加之部隊缺乏水網地區攻堅經驗，這幾次攻擊均未奏效。攻城部隊在敵人的猛烈反擊下，傷亡不小。結果，北面的隊伍没有趕到，東面的隊伍也没有攻進去，衹有南面粟裕、葉飛指揮的隊伍約一千多人，突入了曹甸鎮内，致使韓德勤得能集中力量反擊新四軍。最後，突入部隊孤軍奮戰，傷亡較大，衹得撤出曹甸。

這次總攻開始時，陳毅就在我們一支隊指揮部，在距曹甸大約衹四里路的地方，坐鎮指揮。當天晚上，陳毅看到没有攻下曹甸，就準備下令再攻。

但黄克誠不同意進行第二次攻擊。他認爲，從蘇北鬥争形勢看，我們剛剛到達淮海、鹽阜地區，頑軍殘部、僞軍、土匪、特務、反動地主武裝，到處騷擾暴亂，根據地内很不穩定。所以當務之急，應是剿滅頑匪，發動群衆，鞏固根據地，然後再相機解决韓軍爲好。[4]

粟裕、葉飛等這時也不贊成再打了。他們認爲，這次攻擊，部隊傷亡太大，再攻也不太好打了。看大家都不同意再攻，陳毅當即决定，那就把部隊都撤回不打了。

接到撤出戰鬥的决定，我們一支隊便開始撤回鹽城。但部隊剛走到安豐附近，劉少奇同志親自來了。要求我們重新回攻曹甸。按照劉少奇同志的意見，我們跟隨劉少奇同志又回到了曹甸附近。

劉少奇來到曹甸附近後，親自偵察了解情况，并相繼同陳毅、粟裕、葉飛、黄克誠、彭明治、朱滌新等一起研究。大家的意見還是逐漸趨向一致，認爲韓德勤就那麽幾千人，局促于曹甸，車橋一帶，西面是日軍，東面是我們，諒他也不會有多大的作爲，就讓他在那裏耽一段時間，也没有什麽了不起，不妨過一段時間再打。

最後，劉少奇同意了大家的意見，也認爲倉促之間没有準備，再打也難以打好，不如把隊伍先撤回各自的駐地，肅清土匪，進

[4] 見黄克誠回憶録308，編者注

行根據地建設，準備迎接日軍“掃蕩”。他説，能把韓德勤[illegible]在曹甸當然更好，暫時留在那裏問題也不大，蘇北根據地已[illegible]成，暫時不打，對我們的妨礙也不大。勉强去打，就會過多[illegible]耗我們的力量。

曹甸戰鬥就這樣暫告一段落。曹甸戰鬥，實際是一次失[illegible]戰鬥。

對曹甸的攻擊没有奏效，原因很多。一九四二年，陳毅[illegible]結曹甸戰鬥時曾指出，曹甸戰鬥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illegible]倉促作戰，準備不够，變成浪戰。[5]

我個人認爲，陳毅的看法是對的。對這次曹甸戰鬥，[illegible]存着輕敵思想。我們調集的部隊共萬餘人，而韓德勤實際上[illegible]幾千人，所以總認爲攻下曹甸，消滅韓德勤是十拿九穩，以[illegible]在攻城的準備工作上，過于簡單草率。運河下來的水是切斷[illegible]但曹甸外壕的水并没有減少，説明外壕的水并不完全來自運[illegible]我們對水源的判斷有誤。又由于我們缺乏水網地區攻堅的經[illegible]過水溝的器材，木板、小船也極少，攻城的梯子也準備不足[illegible]没有一定數量的爆破材料，没有炮兵的配合，主攻方向突破[illegible]選擇和確定，也缺乏仔細的偵察研究，我們一支隊選擇的[illegible]口，恰恰是最難攻的地方，所以一攻不動，再攻也不動，這[illegible]本來應該打好的仗，最後没有打好。

另外我還認爲，當時因八路軍和新四軍剛剛會合，相互[illegible]缺乏一定的了解，動作不够協調，而且内部意見也不完全[illegible]這也可能是打敗仗的原因之一。

在這之後，韓德勤一直在曹甸堅持了兩年多。一直到一[illegible]三年春，在新四軍軍部的統一指揮下，調動新四軍三師、二師[illegible]部分主力，和四師相互配合，才一舉全殲韓德勤所部，終于[illegible]掃除了國民黨頑固派留置于蘇北的這一抗戰障礙。

[5] 見黄克誠回憶録311頁，編者注

十四、鹽城會議

曹甸戰鬥後，我一支隊回駐鹽城附近。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原局和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在鹽城召開了一次幹部會議，到會的有新四軍一師師長粟裕、副師長葉飛，政治部主任鐘共光，八路軍第五縱隊司令員兼政委黄克誠，政治部主任吴法憲，五縱隊一支隊隊長彭明治，政委朱滌新等。會議歷時三天，首先由劉少奇同志傳達了中共中央對當前國内外形勢的分析，和中共中央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一日關于建立和鞏固華中根據地的指示。

對國内外形勢，劉少奇同志講話的大意是，一九四〇年夏秋以來，國際反法西斯戰争形勢十分嚴峻，德、意法西斯在西方所取得的勝利，助長了日本的南進野心。現在，日本侵略者决心乘英、美無力東顧之際，實行南進政策，奪取英、美、法、荷等國在東南亞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國際形勢的這些變化，直接影響日本侵華的方針政策，也直接影響着國民黨的内外政策。

他指出，一方面，日本在中國的重點，將轉爲以打擊敵後共産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爲主，力求鞏固其占領區，而對正面戰場的國民黨軍隊將暫不作大規模的進攻。另一方面，蔣介石集團看到日本决心實行南進政策和改變侵華方針後，必定會决心繼續執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政策，不斷調整其軍事部署，包括加强華中兵力。蔣介石已密令第三戰區的顧祝同準備圍殲皖南新四軍，密令蘇魯戰區的韓德勤進攻蘇北新四軍。

因此，華中的敵後抗戰，將面臨着敵頑夾擊的嚴重形勢。在敵頑夾擊中奮鬥，將是我黨我軍在華中鬥争的特點，一切軍事上、工作上的計劃，都必須根據這一特點來布置。

劉少奇同志同時傳達了中共中央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一日發出的關于建立和鞏固華中根據地的指示，要求新四軍學習華北的經驗，抓緊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堅决實行"三三制"，根據地的各項政策，要以統一戰綫的原則爲依據；要準備長期抗戰，節省民力、物力；要特别加强地方武裝的建設；要密切黨群關系，嚴格軍隊紀律，并做好聯絡友軍的工作；要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參加根據地的建設。劉少奇同志最後强調，對這個指示，一定要在蘇北、蘇中貫徹落實。

陳毅也在會上講了話。他着重闡述了堅持敵後抗日游擊戰争的方針與策略，强調要孤立日軍、消滅僞軍，縮小敵占區，擴大和鞏固蘇北、蘇中根據地。同時，要加强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工作，針對國民黨一面抗戰、一面反共的兩面政策，我們應實行一面團結抗戰、一面進行反頑鬥争的革命的兩面政策。在反頑鬥争中，要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要争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在蘇北地區，要集中力量孤立和打擊韓德勤，争取團結李明揚、李長江一道抗日。

會議最後，劉少奇宣布，由新四軍一師負責蘇中根據地的建設，由八路軍五縱隊負責蘇北根據地的建設，并指定粟裕負責蘇中的一元化領導，黄克誠負責鹽阜區和淮海區的一元化領導。同時，他代表中原局，指定了各個部隊的駐地範圍：指定五縱隊一支隊住鹽城，并擔任保衛中原局和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的任務；二支隊駐阜寧的東坎、東溝、益林一帶；縱隊部和三支隊住淮海區。他指示，五縱隊和一師要成立軍政委員會，統一領導軍隊和地方的工作，準備在條件成熟時進一步成立蘇北區黨委。另外，他還要求一師和五縱隊的政治部，除抓好部隊的建設外，重點要放在協助開展蘇北、蘇中的政權工作和地方黨的建設工作上。

以上就是當時這一會議的主要内容，在討論中大家發表了很多意見，但一些詳細情况，現在都回憶不起來了。

這是一次很重要的會議，是中原局和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進駐鹽城後所召集的第一次會議。

第六章　抗日戰爭（二）新四軍三師

一、建設新四軍三師政治部

一九四一年一月，蔣介石蓄意制造了親痛仇快，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爲代理軍長、劉少奇爲政治委員、張雲逸爲副軍長，賴傳珠爲參謀長，鄧子恢爲政治部主任。一月二十五日，以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爲基礎，新四軍軍部在蘇北鹽城重新成立了。將我黨領導的隴海鐵路以南的部隊統一編爲新四軍，全軍共七個師，一個獨立支隊，計九萬餘人。我八路軍五縱隊奉命改編爲新四軍第三師，黃克誠任師長兼政委，彭雄任參謀長，吴法憲任政治部主任。原八路軍第五縱隊的第一、二、三支隊依次改編爲新四軍第三師的第七、八、九旅。

鹽城會議結束後，黃克誠因爲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處理，要繼續留在鹽城一段時間，就要我不用再管一支隊的事情，盡快到縱隊部去主持政治部的工作。我當即離開鹽城，趕到阜寧縣益林鎮的縱隊部。不久，軍部來了調令，把縱隊參謀長韓振紀調到軍部另行分配工作，把政治部副主任鄧逸凡調到軍政治部任秘書長。

這樣，就剩下了我帶領着三師的司令部、政治部、供給部，衛生部等直屬機關駐在阜寧。一月下旬，黃克誠同志從鹽城回來了，就開始和我一起調整并充實三師的各級領導機構，要我重點負責建設政治部。

我首先是要健全政治部的機構。當時政治部下面不設二級部，都設科。經我提議，調來了沈鐵兵任組織科長，調王恨爲宣傳科長，調王央公爲政工科長，調周彬爲保衛科長，調傅東華爲民運科長，調唐克爲統戰科長。給我還配備了一個秘書，起初是跟了我多年的張秀珂，後來是廖一帆。他們兩個都是大學生，都會日語，對我的幫助都很大。

接着，我開始抓創辦刊物，編教材，指導三師各旅及鹽阜、淮海兩分區的工作。由于當時還不具備辦報紙的條件，黃克誠同志提出，要政治部先辦個雜志，定名《先鋒》，半月一期。黃克誠同志還專門請陳毅同志題寫了刊名。爲辦雜志，黃克誠同志下令抽調七旅政治部的李恩求同志來師政治部，專門主持雜志的編輯工作。

爲辦雜志，又必須建設起一個印刷廠，要解決紙張、印刷機械和印刷工人問題。爲此，李恩求同志在駐地附近到處搜集，在一個老百姓家裏秘密地辦起了一個小型印刷廠。這個印刷廠很小，主要着眼于一旦出現敵情，便于打埋伏，或是搬動。

《先鋒》雜志主要是負責上下情況的交流，轉載上面的東西，包括延安黨中央、十八集團軍總部、中原局、新四軍軍部的指示。另外，轉載延安新華社的時事通訊，同時發表三師軍政委員會、師長兼政委黃克誠同志和司令部、政治部負責人的指示及文章。再就是部隊工作的經驗交流，通訊和一些小文藝。

就這樣，《先鋒》雜志很快就辦起來了。我們又通過地方根據地的聯絡站，很快地建立起了一條完整的發行路綫，使雜志在短時間內就可以投送到各個部隊。

在創辦《先鋒》雜志的同時，我們决定讓朱鴻同志負責整個部隊的教育工作，負責主編部隊的各種教材。

這是當時三師政治部的兩項主要工作，一個是辦雜志，一個是編寫教材。


在新四軍時和周彬、王恆、楊光池在一起，前右一爲吳法憲

這時，三師直屬隊總支書記丁仲提出，他們也要辦一個師直單位的油印小報。黃克誠同意了他們的請求。于是，又從各部隊調來了幾個刻制蠟板的人，出版了一個油印的師直小報。出版日期三天、五天的不定。

在當時三師的直屬機構中，司令部的各科是健全的、供給部也是健全的、由劉炳華任供給部長。相對而言，由張化一任衛生部長的衛生部就差一點。後來，我們從軍部調來齊仲恒、吳之理，相繼任師衛生部長，加强了領導。與此同時，爲適應戰爭的需要，我們又集中力量建設了一座野戰醫院，放在比較安全的地方。

除此之外，我們還在東溝、益林、東坎、八灘、羊寨等地開設了一些商店，以籌集一點經費，支援部隊和根據地的建設。

黃克誠一直力主機關要精幹，越精幹越好，認爲祇有這樣才便于行動，便于在敵後堅持鬥爭。因此，當時我們的整個師直屬隊，包括司、政、供、衛各部門在內，一共祇有四百人左右，即使加上警衛部隊也祇不過才六、七百人。

機構整頓完畢，我們師部便按照軍裏原來的決定，于二月初開始向淮海區轉移。我們從東溝、益林出發，經羊寨、佃湖，第二天晚上就渡過鹽河，越過了封鎖綫。第三天，我們到達六塘河邊上，駐在六塘河附近一個叫劉老莊的較大莊子裏。

在劉老莊住下的第二天，黃克誠即要我和他一起到了九旅旅部。當時，九旅旅長張愛萍、政委韋國清，他們熱誠地歡迎并接待了我們。黃克誠向他們傳達了中原局會議的情況，他們也向黃

克誠匯報了九旅的工作情況。

九旅有兩個團是我熟悉的，一個是翁徐文帶領的從山東南下淮海區的一個團，另一個就是孫象涵率領的一個團。孫象涵的這個團原來在皖北是蘇魯豫支隊七大隊的一部分，一九三九年曾隨我南下開辟皖東北抗日根據地。我離開皖東北以後，這個團被改編爲九旅的一個團，歸屬九旅指揮。我特地去看了看他們，久別重逢，彼此都倍感親切。

這時，我已辭去了淮海區專員的職務。當時的淮海地委已很健全，地委書記楊純是個很能幹的女同志。後來，華中局又把金明調來任淮海區黨委書記。

二、鹽城高幹會議

一九四一年四月下旬，中原局和新四軍軍部在鹽城召開高幹會議。黃克誠帶了幾個通訊員和一個騎兵班去鹽城參加會議，責成我帶領三師直屬隊留在淮海區活動。這時，彭雄還沒有到職，司令部就一個參謀處長沈啓賢，我感到擔子很重。

五月中旬，黃克誠來電報，說他不再回淮海區了，要我帶領三師直屬隊返回鹽阜地區。于是我帶領部隊又渡鹽河，重過封鎖綫，回到了鹽阜區，駐在羊寨以南的一個村子裏。大約六月九日，黃克誠回到了師部，召集各旅的幹部開會，傳達鹽城高幹會議和中央軍委華中分區會議的決定，同時部署蘇北根據地的工作。

從黃克誠的傳達中我們得知，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劉少奇在鹽城主持會議，宣布了一個重大的組織變動：中共中央決定，東南局和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華中局，同時成立中央軍委華中分會，由劉少奇任華中局書記兼華中軍分會書記，饒漱石任華中局副書記。

五月十五日至十九日，華中局又在鹽城召開高級幹部會議，

劉少奇同志在會上總結了華中地區前一段的工作，大意是：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給予我們的發展華中的任務，基本上完成了。今後我們的任務就是在敵頑的夾擊中求得鞏固與發展。

六月上旬，華中局又在鹽城召開了華中軍分會擴大會議，陳毅同志在所作的關于建軍問題的報告中，提出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軍事工作，建設一支正規化黨軍的任務；同時作出了建立軍區、軍分區和加强地方武裝的決定。

根據這個決定，一師兼蘇中軍區，二師兼淮南軍區，三師兼蘇北軍區，四師兼淮北軍區，五師兼鄂豫皖軍區，六師負責蘇南地區的工作，七師負責皖江地區的工作。這樣，新四軍七個師都分別兼任所在根據地的軍區，或負責所在地區的工作，統一領導和指揮主力和地方武裝。各師的軍政委員會兼任軍區的軍政委員會委員。

黃克誠最後還宣布，根據中央軍委五月三十日的電令，新四軍第三師軍政委員會由黃克誠、吴法憲、彭雄、彭明治、朱滌新組成，黃克誠任書記。

黃克誠同志同大家商量後決定，由九旅兼任淮海軍分區，七旅、八旅不兼軍分區，鹽阜區單獨成立一個軍分區，由洪學智同志任軍分區司令員。

三、第一次反“掃蕩”

一九四一年春，重建新四軍軍部後，我們很快奪取了長江以北、隴海路以南、津浦路以東的廣大地區，建立了蘇北、蘇中兩個抗日根據地，并同山東抗日根據地聯成了一片。這一情況，很快就引起了日本侵略軍的極大注意。日軍決定對蘇北、蘇中抗日根據地進行一次“掃蕩”，并加緊威逼利誘國民黨蘇魯皖邊區游擊軍副總指揮李長江投降。二月中旬，新四軍軍部指揮一師討伐

公開投敵的李長江，共俘獲李部官兵五千餘人。這一勝利，更加引起了日軍和汪僞軍的重視。

三月中旬，日軍開始調兵遣將籌集兵力。到七月上旬，日軍獨立混成第十二旅團、第十二軍一部及僞軍李長江殘部，集結在東臺、興化、鹽城以西的射陽和陳家洋等地，準備重點進攻鹽城，妄圖消滅新四軍軍部等領導機關，破壞夏收，摧毁抗日根據地。

新四軍軍部對日軍這一企圖早有察覺，早于六月三日就向各師發出了反“掃蕩”的指示，大意是：

第一、這次敵人進攻的重點，將是我蘇北根據地的中心鹽城，作戰方式可能是多路分進合擊和突然襲擊；

第二、華中局和軍部機關分散隱蔽，主力部隊也應適當分散，隱蔽集結于機動位置，避免過早與敵作正面的決戰，地方武裝以連排爲單位，準備廣泛襲擊、疲憊敵軍。

第三、動員群衆堅壁清野，破壞橋梁道路，控制船隻，糧食等重要物資應分散隱藏于蘆葦蕩裏。

第四、一師和三師應作好充分準備，密切注意上海、南京、揚州、蚌埠、徐州、連雲港等地的敵情，分工負責，搜集情報，加緊偵察工作，及時主動地掌握情況。

爲便于指揮，新四軍軍部于七月十日撤離鹽城。七月初，三師師部移駐射陽河以西，司令部住橋頭，我們政治部住碩家集，都緊靠射陽河。

大概是七月十九日的清晨，突然之間，劉少奇、陳毅、曾山、賴傳珠等領導同志，從射陽河坐汽船，一下子就到了我們師政治部的駐地碩家集。我一面匆忙迎接他們上岸登陸，一面給他們做飯吃，并立即通報黃克誠同志。

他們吃完飯，稍事休息後，黃克誠同志趕來向他們匯報了反“掃蕩”的準備情況，他們表示滿意。然後，軍部繼續西進，進駐陳家集西北的名頭。因爲名頭是阜寧地區的中心地帶，相對比較安全，于是華中局和軍部就決定暫時駐在那裏。隨即決定三師司令部也西移到瓦屋許，離名頭約七、八里路，靠近軍部，我們

師政治部住和尚莊，離司令部約二里路。這樣，軍部和三師師部靠到一起，指揮就非常方便了。

從七月二十日開始，日僞軍一萬七千多人，開始由東臺、興化、射陽和陳家洋等地，南北同時出動，從南面、東北面、西南面和北面四個方面，對鹽城分進合擊。我三師的主力部隊，避開敵人的鋒芒，轉移至敵人側翼，向劉莊、陳家集、板湖等地區隱蔽集結。

七月二十二日，日軍占領鹽城，占領了原新四軍軍部的所在地。接着，日軍便以鹽城爲中心，對四周地區進行“清剿”，并控制水陸交通要道，對這一地區實行分割封鎖。他們在水網地區使用特制的裝甲汽船，到處搜索、尋找我新四軍軍部和主力部隊。由于我們事先進行了分散轉移和隱蔽集結，使敵人連連撲空。

七月二十八日以後，日軍的掃蕩重點轉向阜寧、東溝、益林地區，并占領了阜寧縣城。新四軍軍部立即命令三師七旅部隊，尾隨襲擊敵人，命令八旅部隊在正面迎戰敵人。同時，命令一師二旅破襲鹽城至東溝的交通，阻斷敵人的補給綫；命令其它一師主力在蘇中向日僞各個據點進行圍困攻襲，騷擾敵人後方。

就這樣，蘇北和蘇中的軍民，在新四軍軍部的統一指揮下，密切配合，相互策應，使敵人顧此失彼，完全陷于被動局面。

八月七日，日僞軍大部不得不從鹽城、阜寧地區南撤，東溝、益林地區被我們三師收復。到八月底，日軍没有達到目的，被迫停止在蘇北的“掃蕩”行動，撤退了。

根據當時的戰報，在這一個多月的反“掃蕩”鬥爭中，新四軍各部隊共進行大小戰鬥一百三十餘次，用自制水雷擊沉敵汽艇三十艘，斃傷敵僞一千九百餘人，俘日僞軍一千餘人。而新四軍傷亡一千餘人，大大少于敵人。

這是我們在創立蘇北根據地之後，蘇北、蘇中的黨政軍民經受的第一次考驗。我們取得了第一次“反掃蕩”的勝利，鹽阜軍民經受了考驗，尤其是一些新從上海來參軍的學生，青年知識分子，通過這次戰火洗禮，更提高了他們堅持敵後抗戰的信心。通過反“掃蕩”，他們吃苦耐勞，英勇戰鬥的精神大大地培養和發揚起來了。他們在敵後根據地成長發展、壯大勝利，樹立起了必勝的信念。

四、相對穩定时期

一九四一年八月底，粉碎敵人的夏季大“掃蕩”以後，蘇北根據地出現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

新四軍三師于九月五日至九月十五日，在瓦屋許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參加的是全師團以上幹部。爲開會，借用老百姓的木頭、竹杆和稻草，搭了一個大草蓬，作爲會議室，兼作食堂。

和新四軍三師參謀長彭雄在一起

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三師進入蘇北以來對頑軍作戰和反“掃蕩”對日作戰的經驗與教訓，以及總結部隊的工作、檢查部隊的紀律。在執行紀律的問題上，會議着重批評了七旅和八旅。

這次會議，實際上是在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劉少奇、陳毅等領導十分關心這次會議，親自參加了會議。劉少奇同志親自在會上作了目前形勢和建設華中根據地的任務和政策的報告，向大家分析了當時的形勢，任務和政策。陳毅代表華中軍分會講話，就加强軍隊的軍政工作，特别是加强軍隊政治思想工作、加强黨的領導、加强軍事訓練、加强軍民關系、整訓部隊和整頓紀律等問題，作了指

示。當時的新四軍政治部主任饒漱石，又根據劉少奇的意見，在會議上作了增强黨性修養的報告。

師長兼政委黄克誠同志在會議開始和結束時都講了話，對加强根據地和軍隊建設的若干問題，提出了具體意見。黄克誠同志根據中央和華中局軍分會的指示精神，提出三師在今後一段時間裏的主要任務是，深入總結反“掃蕩”的經驗教訓，趁粉碎敵人“掃蕩”之際，擴大抗日根據地，縮小敵僞占領區，恢復各種組織，恢復各項工作，恢復抗日政權，進一步精簡機構，調整組織，全面加强蘇北根據地的建設，即津浦路以東，隴海路以南，長江以北的根據地的建設，力求同皖東、皖東北和山東打成一片。經過討論，會議取得了一致意見，統一了大家的思想。

在此之前，我已得知黄克誠與劉少奇、陳毅之間，在一些問題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打曹甸，黄克誠就不贊成；對華中局在日軍大“掃蕩”前提出保衛鹽城的口號，也有不同的意見。爲此，劉少奇和陳毅對他提出了批評，認爲他“右傾”，作戰不力，但當時我并不太清楚其中的詳情。後來我看到《黄克誠回憶録》中有關于此事的叙説，現將這一段抄録于此：

曹甸戰役没有打好，華中局領導認爲我“右傾”，作戰不力，撤了我五縱隊司令員職務，保留政治委員職務，第五縱隊司令員一職由陳毅兼任。但陳毅作爲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需要照管全局，并没有到第五縱隊視事。因此，我這個政治委員還得兼管司令員的工作。後來日軍“掃蕩“開始，我又與華中局發生保衛鹽城之争，華中局及軍部就認爲我不服從指揮，在阜寧停翅巷召開幹部會議，對我進行批評。我不服争辯説：“作戰前我提的意見，我至今認爲是對的。作戰未達到預期目的，也不是我不服從指揮，而是上級指揮失當。”我聯系打曹甸和反“掃蕩”作戰情况説：“這兩次都是上級指揮失誤，本來有的仗不應該打，要打也不是這種打法。”這次會議華中局領導最後下結論認爲我是錯誤的，堅持要我在幹部會議上作檢討。我爲了顧全大局，服從組織，雖對于所有的争論問題并没有改變看法，仍按組織决定，

在旅以上幹部會議上作了檢討。我想當時可能是由于我從八路軍剛剛劃歸華中局指揮，相互缺乏一定的了解，所以才會産生我不服從指揮的誤會。事後，我找到陳毅對他説：“你是我的老上級，有什麽不服從指揮？”一九四二年陳毅在總結曹甸戰役時曾指出：“曹甸戰鬥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我很輕敵，倉促作戰，準備不够，變成浪戰。我們的戰鬥手段是攻堅，這就要有很好的準備和按作戰的原則作戰才行，當時我們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撲是解决不了問題的。如果我們采取了坑道作業，就有可能成功。”我覺得陳毅的這番話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况的。[a]

這次會議的召開，成了我們加强蘇北根據地建設和三師部隊建設的一個重要開端。爲貫徹落實會議决議，會後我們先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加强組織建設。經華中局和軍分會批準同意，我們成立了蘇北區黨委，黄克誠同志兼任書記，金明爲副書記，統一蘇北地區的黨政軍一元化領導。

蘇北根據地下設鹽阜、淮海兩個根據地，建立兩個地委，兩個行政公署，兩個軍分區。由金明兼任淮海地委書記，李一氓爲淮海行署主任；向明擔任鹽阜地委書記，曹荻秋爲鹽阜行署主任。

同時，我們三師的部隊也做了一些調整。在這之前，新四軍四師十旅，在豫西反頑鬥争中失利，部隊受到較大損失。經黄克誠同志提議，華中局和軍部批準，將四師十旅與建制完整比較充實的三師九旅對調。十旅歸屬三師建制，九旅歸屬四師建制，旅團番號不變。九旅旅長張愛萍調任三師副師長。因此，淮海軍分區改由十旅兼任。十旅旅長劉震，兼淮海軍分區司令員，十旅政委吴信泉，兼任淮海軍分區政委。鹽阜軍分區仍是單獨組織，由洪學智任司令員，楊光池任政治部主任。七旅和八旅仍爲機動部隊

---

[a] 見黄克誠回憶録，編者注

我們在軍分區下面，分別建立了縣人民武裝部、區武裝中隊、鄉游擊小組等各種地方抗日武裝，健全和建立民兵制度。

不僅如此，師的領導也比以前充實了。除師長兼政委的黃克誠和政治部主任的我外，參謀長彭雄已于八月反"掃蕩"期間到職，副師長張愛萍也于九月初來到師部，這就增加了師的領導力量。

在調整充實部隊的同時，我們還積極協助地方開展政權建設工作。由于當時的鹽城、阜寧兩縣較大，各有一百二十萬人口。爲了便于管理，將原阜寧縣分爲阜寧、阜東和射陽三個縣，將鹽城縣分爲鹽城和建湖兩個縣。這樣，再加上淮安、灌南和漣東，鹽阜區共有八個縣。其後，我們分別建立了八個縣委和縣政府，加强了地方建設。

當時，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都做了精簡，把華中局和軍部的一些幹部，下放到地方，加强了地方黨的工作領導。軍部把抗日軍政大學五分校下放到我們三師。早在日軍夏季大"掃蕩"開始後不久，抗大五分校就由副校長馮定、洪學智率領，轉移到了我們鹽東。當時，他們的女生隊曾遭到過日軍的偷襲，一死一傷一被俘，損失了幾個人。好在敵人的人數不多，洪學智在發現情況後，指揮離女生隊最近的男生四隊，一個衝鋒就把敵人擊潰了。這次抗大五分校歸入三師建制後，校長爲謝祥軍，政委爲吳盛昆，政治部主任爲于輝。

軍部的魯迅藝術學校也同時下放到了三師，改組成爲魯迅文藝工作團，由孟波任團長，歸師政治部直接領導。魯迅文藝工作團共有一百七十多位團員，大部分是從上海來的學生。還有一部分從上海來的著名文藝工作者和音樂家，如賀綠汀、何士德、孟波、章牧等。隨後，又有如阿英、魯莽、戈揚等著名新聞、戲劇、繪畫、木刻家，分到我們師政治部來工作。

第二、加强組織紀律性，尊重群衆，尊重地方，提高部隊的政策觀念。我們進入蘇北以來，部隊的紀律一般是比較好的，但侵犯群衆利益的事情也不少，干涉地方工作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對這些問題，在三師高幹會上，黃克誠同志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和教育，特别是對七旅的批評更多一些。這就使七旅的同志對我發生了誤會，以爲一些問題，都是我到師政治部以後向黃克誠反映的。黃克誠同志對此作了解釋，說明這些問題是由各個方面反映上來的。我個人認爲，盡管七旅原來是紅軍、八路軍的主力之一，戰功卓著，但在執行群衆紀律方面，確實也存在着一些問題，黃克誠同志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

從這次會議以後，七旅在遵守紀律方面有很大的轉變，八旅、十旅也都有提高，進一步密切了軍民關系。從此，地方對軍隊更加尊重，軍隊更加支持、幫助地方工作，出現了軍愛民，民擁軍，軍民團結一家人的新局面。

第三、發展經濟，發展生產，加强根據地的建設。我們在根據地實行了統一的財政稅收，實行公糧制，軍隊所需的糧食、蔬菜、衣服及其它物資的供給，統一由地方政府籌劃供應。爲開辟財源，減輕地方負擔，我們在素有金東坎、銀八灘之稱的一些重要集鎮開設了商店，以籌集部分資金。此外，我們在阜寧東部海灘開辟了一個棉墾區，每年種植的棉花遠銷至上海、南通、蘇州等地。同時，同地方一樣，軍隊本身也開展了大生產運動，種菜、餵猪、喂鷄、有條件的地方還自己養魚，捕魚，捉蝦，力争做到部分副食品自給。少數部隊還利用海水曬點鹽，這也是增加收入的一種好辦法。

在這次大生産運動中，我們整個三師從機關到部隊，上上下下都在搞生產。那一段時間裏，早晨部隊都不出操，起床後即分散外出去拾糞；晚飯後，則去菜地澆水、施肥，管理自己的一塊菜田。種的菜地是向老百姓借的，給老百姓一定的補助。如果打仗了，就交給地的主人暫時看管，打完仗回來再搞生產。如果不回原駐地，就連地帶菜都交還給群衆。敵後生產，當然不可能像南泥灣那樣大規模地去搞，但我們也從一九四二年一直堅持到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三年秋，我們曾開過一次三師直屬隊的生產展覽會，

著名作家、詩人白樺參加展覽會後，寫了一篇《記師直生產展覽會》。現將這篇文章照錄如下：

大路從中間穿過去，把展覽會的場子分成東西一樣長的兩塊。

西邊是"小菜場"，一攤挨一攤，司令部、政治部、供給部……各攤前都插起用木頭做的招牌。

特務一連的一顆黃芽芽十五斤，它和四個五十斤以上的大冬瓜擺在一起，活像一窩净的肥猪。

菜的種類是數不清的，有大鍋煮、大碗吃的青菜、蘿卜，也有調味的葱、蒜之類。

還有冬天的小菜、醬菜、乾菜、腌咸菜，也有自做的豆腐和豆芽。

還有不少的手工作品：簍子、籃子，各式各樣的布鞋、氣眼鞋、綫結鞋，戰士們自做自穿，跑路打仗，淌水都方便。

東面是家畜場，猪、羊、鷄、鴨，鬧鬧嚷嚷一大片。政治部的小馬駒，看見人就亂蹦亂跳。老母猪的大肚皮着地，爬下哼哼的懶得動。供給部的那些"九斤黃"的雄鷄，長到七斤半，今天在人面前，不敢喔喔高喊了。

展覽室的墻上貼着各單位的生產統計表，全直屬隊合計生產各種疏菜十七萬六千一百九十斤，平均每人一百八十五斤。特務一連成績最好，共生產三萬零七百斤。

展覽場的松門兩旁，貼着一副對聯，上面寫着：

到前綫拿槍，在平時拿鍬，是戰鬥英雄，又是生產模範。

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菜，改善自己生活。

横幅是：親自動手。

除了大力發展生產以外，我們還大力提倡節約運動。當時部隊的幹部、戰士都不發錢，祇是每人每天有一定數額的伙食費。節約下來的錢就叫"伙食尾子"。每月的"伙食尾子"，我們都平均分配給每個人，有時可以分到一元，有時分到五角。這點錢，

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就先用來交黨費、團費，剩下的錢，有的就買點烟抽，有的就買點牙刷、牙粉、肥皂之類的日用品。

爲活躍地方經濟，我們對城市工商業采取保護政策，同時進行二五減租政策，(即減收百分之二十五)以改善群衆生活。當時在鹽阜的一些沿海地區，經常有海水灌入，淹了不少地。我阜寧縣長宋乃德，領導群衆修築了一條九十華里的海堤，擋住了海水的倒灌。當地群衆把這條堤顲稱之爲"宋公堤"，很好地擴大了我黨我軍在當地的影響。

第四、清剿土匪。蘇北地區在歷史上是有名的的土匪出没地。當時，一些土匪還有政治背景。他們與國民黨頑固派相勾結，與韓德勤那些被打垮的部隊搞在一起，搶劫殘害群衆，殺害我們的地方幹部，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爲保衛蘇北抗日根據地，保衛人民群衆生命財產的安全，大"掃蕩"過後，我們即下決心抽調部分主力及地方部隊，大力開展清剿土匪的工作。經過三個月的大大小小的艱苦作戰與政治攻勢，同時教育爭取一些窩藏土匪的不法分子，終于將横行蘇北多年的土匪完全剿滅。

肅清了土匪以後，我們將一部分主力部隊分散做群衆工作，大力發動群衆鬥爭惡霸，實行減租減息，實行合理負擔，改善人民生活。剛開始實行減租減息政策時，有的地方群衆心裏有顧慮，害怕地主報復，白天減的租，晚上他們又偷偷送回去給地主，形成明減暗不減的情况。阜寧縣委書記唐棣華派出檢查組，到各地檢查進行教育，全面糾正、爲群衆撑腰，當時阜寧縣委工教科有個幹部編寫了一個劇本叫《照減不誤》，到處公演，轟動阜寧以至全鹽阜區，其中有一個女演員薛飛曾大出其名，紅極一時。

第五、整訓部隊。清匪反霸工作告一段落以後，部隊立即開始了全面的整訓。整訓工作由黄克誠統一領導，張愛萍、彭雄負責軍事訓練，我負責政治教育。

軍事訓練方面，一是着重搞投手榴彈、射擊、刺殺、土工作業和炸藥爆破五大技術訓練，二是以班、排爲單位進行進攻和防御的戰術訓練。同時，我們還加强軍容風紀、内務衛生等方面的

教育，力求全面提高部隊的軍事素質。

政治教育方面，主要是學習、貫徹華中局關于建立鞏固的蘇北根據地的決定，學習黨在敵後根據地的各項政策，加强黨的建設，健全連黨支部、營黨總支、團黨委，健全部隊的黨、團生活制度，堅持每周上一次黨課，加强黨的組織性、紀律性、黨性和黨員的修養的教育。同時還在幹部中進行抗日持久戰、游擊戰等教育，并且在連隊裏開設語文、數學、歷史等各項課程，以幫助幹部、戰士學習文化。

此外，部隊裏的年輕人多，我們還特別注重加强青年工作，在青年中進行組織發展工作。針對年輕人喜好娛樂的特點，我們恢復了連隊俱樂部的工作，積極開展各種文藝、體育活動，包括唱歌、體育、墻報等，表揚好人好事，注意發展黨團員。我們還要求連隊的經濟公開，在各個連隊組織經濟委員會，管理連隊的伙食。另外，要求各連隊一個月開一次軍人大會，以發揚民主，動員戰士對部隊的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見。

經過整訓，部隊的軍事技術得到提高，政治覺悟有了進步，整個部隊的團結增强、情緒高漲。

一九四二年夏，師軍政委員會决定開一個運動大會，爲對部隊這一段軍政教育的成果進行一次檢閱。當時我們就在司令部的駐地孫河莊與政治部的駐地戴舍之間，借用了幾十畝土地，修了一個大運動場，搭了一個大篷子和一個戲臺。運動大會分軍事、政治、文化、體育四個項目進行競賽。有關軍事技術，作戰演習，由張愛萍，彭雄負責組織測驗，政治學習，文化學習的測驗題，以及歌咏比賽，體育竟賽，包括蓝球、排球、田徑、游泳等，統由政治部負責，後勤部還組織了一個伙食比賽。

部隊不可能全部集中競賽。就由七旅、八旅、十旅、師直屬隊、抗日軍政大學五分校各組織一個代表團參加大會，每個團抽一個連，每個旅共抽四個連組成一個代表團，競賽期間的晚會，由魯藝工作團和各旅的宣傳隊負責組織。司、政、供、衛各部門全力組織競賽，前後搞了有半個多月。

從各個參賽的代表團比賽結果來看，成績都比較好，最後總結時，劉少奇、陳毅、饒漱石都來講了話。在競賽過程中，他們有時也來觀看比賽。在新四軍軍部的一些著名文化人，如范長江、楊帆、賀綠汀、呂振、姚汝覺等都到三師參觀過，并在會上作過講演。陳毅經常帶一些文化人到我們政治部同黄克誠和其他人下圍棋。

總之，通過這段時間的整訓，部隊的軍政素質、政策水平、組織紀律性，都有較大的提高，是部隊工作比較活躍的一個時期。

第六、培訓幹部，參加黨校學習。粉碎敵人"掃蕩"過後，環境比較安定。華中局在阜寧板湖附近的汪朱集辦了一個黨校，抽調新四軍各師的團以上幹部、地方縣委以上幹部，輪流到黨校學習。學習期限一般爲半年至一年。除此之外，也吸收外地來的一些知識分子在那裏學習。劉少奇兼任華中局黨校的校長，陳毅、饒漱石和華中局的組織部長曾三、宣傳部長彭康等，都是黨校的當然教員。學習的科目主要是馬列主義、中國革命史和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等。

由于我們的駐地離黨校不遠，也是近水樓臺先得月，凡是黨校組織講大課，我必定帶着師直屬隊的一些幹部前去聽課。一般每個星期都去兩、三次。

我記得，劉少奇當時主要是講聯共黨史和中共黨史，講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他首先從理論上闡述統一戰綫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然後再講一些具體的政策問題。他還講共産黨員的修養問題，講人爲什麽會犯錯誤和怎樣對待錯誤，講當時反法西斯鬥爭的形勢和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陳毅主要是講持久戰的問題，講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講國共之間"摩擦"與反"摩擦"鬥争的策略問題，講軍隊的建設，加强黨的領導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問題。彭康主要講哲學，講什麽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講唯物辯證法。

一些著名學者和文化人也經常作各種報告，如錢俊瑞、范長江、李恩求的時事報告，駱耕漠、孫冶方、薛暮橋的經濟學報告，

齊仲桓、吴之理的衛生與保健講座，鄒韜奮、阿英的文學報告等。辦黨校，使一些幹部得到了一個理論學習的機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華中局當時還出版了一個理論刊物叫《真理》，對指導幹部的理論學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七、成立"文化村"，團結各界知識分子共同抗日。一九四一年秋，日軍進占上海的英法租界前後，許多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和革命知識分子，如鄒韜奮、范長江、阿英、薛暮橋、賀緑汀、錢俊瑞、孫冶方、駱耕漠、孟波、崔雨田、沈其震、吴之理、章央芬、楊帆、胡考等，陸續撤退到蘇北根據地。爲便于照顧他們的生活，陳毅軍長在新四軍軍部駐地附近找了一個村子，取名"文化村"，安排他們集中居住在那裏，由陳毅軍長直接管理和指導他們進行活動。

以後，華中局給一部分上海來的人相繼分配了工作，如錢俊瑞當了新四軍政治部宣傳部長，沈其震成了新四軍的衛生部長，馮定和薛暮橋被分配到抗日軍政大學五分校當了副校長和訓練部部長。有一些從上海來的著名文化人，如賀緑汀、何士德、孟波、章牧、阿英、魯莽、戈揚、吴之理、章央芬、胡考、蘆芒等，則被分配到了我們三師來工作。其中孟波擔任三師政治部魯藝工作團團長，吴之理、章央芬在三師衛生部當了衛生部長和醫務主任。

阿英到三師後繼續搞創作，他曾根據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寫了一個叫作《闖王進京》的劇本，公演後一舉轟動整個鹽阜區，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評。另外，胡考和蘆芒在分到三師政治部宣傳部後，繼續搞他們的畫畫和木刻專業。後來由蘆芒負責設計，我們在阜寧蘆浦還修建了一個烈士紀念塔。

長期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楊帆，先是在鹽阜區擔任公安局長，以後又到我們三師政治部任保衛部長。一九四三年夏，在延安"整風"中不幸遭康生陷害，由延安方面直接用電報通知我們，將楊帆送至華中局駐地關押。不久他被放了出來。但解放後，他在上海市出任公安局長時，又遭到逮捕，并冤死在獄中。

除了分配到各單位工作的人外，其他人就住在"文化村"。在陳毅的直接領導下，"文化村"的一些同志非常活躍。由于三師離軍部較近，他們時常下部隊來作報告，幫助部隊和地方開展文娱活動，培養了一大批群衆文藝骨幹，繁榮了蘇北根據地的文藝宣傳活動。

當時在蘇北根據地，還有一個青年文藝工作團體在活動，叫新安旅行團。新安旅行團最早是于一九三五年十月由江蘇淮安新安學校十五個貧苦兒童組成的，以後逐漸擴大，由陶行之負責組織和領導。抗戰開始後，郭沫若也曾以國民政府軍委會第三廳廳長的名義，領導過這個團體。他們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抗日宣傳活動，歷經十九個省。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後，他們由重慶來到蘇北根據地，在鹽阜行政公署主任曹荻秋、副主任兼財政廳長宋乃德、教育處長戴白濤的領導下，開展文藝宣傳和青少年的組織工作。我記得，當時新安旅行團的團長好像叫汪達之，一些團員後來成了我們的文藝骨幹。

總之，當時新四軍大量吸收了上海來的地下黨員、知識分子、進步人士，他們在敵後做了不少工作，自己也得到了很好的鍛煉。後來在敵人"掃蕩"時期，爲保證他們的安全，華中局將他們分散地護送到山東，再轉赴延安。

在根據地内，我們還恢復和發展了中小學教育，普遍建立小學、各縣建立中學，還辦了不少公學、冬學，廣泛團結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參加抗日救國活動。

第八、開展統戰工作。劉少奇、陳毅都十分重視對各階層有代表性人士的工作，親自與一些地方開明紳士接觸。當時在鹽城、阜寧、淮海地區有影響的人士，如計雨亭、楊芷江、龐友蘭、韓紫石等，都很尊重劉少奇、陳毅以及黄克誠同志。經常來三師拜會黄克誠師長，我們則根據"三三制"的原則，把他們吸收到抗日民主政權中來，團結他們一起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發揮他們在抗戰救國中的特殊作用。

第九、加强對敵宣傳工作，特别是對僞軍的宣傳工作。通過工作，僞軍中間有不少同情我們，經常有人和我們通情況，同我們聯絡，我們的偵察人員經常在敵僞據點進進出出，通行無阻。在鹽阜和淮海之間有條封鎖綫，那就是鹽河，但少數人就可以暢行無阻，隨時都可以過。那時敵僞據點縮得很小，交通往來很方便。

第十、提倡愛護群衆利益，幫助群衆解決問題。部隊除自己發展生産外，一旦群衆的生産發生了困難，例如遭了淹，受了旱，部隊就立即行動起來，幫助防澇抗旱。農忙季節，幫助搶收搶種，那是經常的。另外，幫助駐地群衆打掃衛生，挑水，有病幫助看病，更是普遍現象，幾乎天天如此。軍隊愛護人民，人民就更加熱愛自己的子弟兵。打仗時，替我們傳遞情報，運送傷員，保護我們的家屬、孩子，和一些帶不走的物資，包括書籍、文件、印刷機器等，使之免受損失。所以堅持敵後抗戰，基本上就是軍民一家、分工合作、互相掩護，互相幫助，互相解決困難。這個時候軍民關系是最好的時候，確實是軍民親如一家人。

五、 陳道口戰鬥

黄橋戰鬥結束以後，湯恩伯奉蔣介石之命，率所部占領了津浦路以西的豫皖邊區根據地。之後，又企圖越過津浦路，東進至淮北的洪澤湖以北、運河以西一帶，同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在車橋、曹甸的據點打通聯系，截斷淮北根據地同淮海根據地的聯系，企圖以運河爲依托組成一條封鎖綫，分割包圍蘇北新四軍部隊。

當時，韓德勤率領所屬的王光夏部一個旅，于一九四一年七月間侵占了我淮海根據地的泗陽至陳道口一帶，構築了堅固的據點，切斷了淮海區同淮北根據地的聯系、封鎖了運河。同時，他

又派劉立卓、余士梅、徐繼泰率領一一七師、三十三師侵占了泗陽、漣水之間的大興莊。

王光夏原是泗陽縣的一霸，爲人凶狠殘忍，殺人成性。占據陳道口之後，就瘋狂摧殘我抗日根據地，屠殺抗日根據地的幹部、群衆，還曾活埋我們的區委書記劉水安，對我們的干擾極大。

爲了消除這個威脅，陳毅軍長決定，調集新四軍二師四旅、五旅，三師七旅、十旅，四師九旅，以五個旅的兵力，要一舉攻下陳道口這個據點。爲支援新四軍部隊作戰，山東還調派了教導第五旅南下進入淮海區，協同進攻陳道口。

陳毅當時的部署是，以教五旅全部以及四旅、七旅各一部，共六個團的兵力作爲主攻部隊；以五旅和九旅集結在皖東北地區，準備阻擊東進的國民黨頑固派軍隊；把十旅放在淮陰地區，八旅放在淮陰和漣水之間，準備阻擊韓德勤向陳道口的增援。

陳道口在泗陽西北，位于運河和六塘河的交叉之處。整個鎮子由三個圩子組成，即東小圩子、老圩子和西小圩子。兩個小圩子和老圩子之間隔以水溝，以吊橋相通。陳道口的工事非常堅固，三個圩子的四周都是丈把高的圩牆，圩牆下面是寬一丈、深一丈五尺的水溝，水與六塘河水相通。水溝的外面，密密地設置着四道鐵絲網，鐵絲網的外面還設置了兩千米的掃清射界。這樣的據點，確實是易守難攻。

據偵察，陳道口的據點内有王光夏所部三個團，約三千餘人，有迫擊炮兩門，輕、重機槍二十多挺，大小碉堡數十個。王光夏親自在據點裏組織指揮，自吹是兵精糧足，氣焰十分囂張。

我三師七旅奉命于十月上旬從東溝到達黄圩子。在那裏，陳毅軍長親自向部隊作了動員報告。這個情况，當時的三師司令部參謀楊緒亮曾有一段回憶，現將這段回憶照録如下：

我三師七旅奉命于十月上旬從東溝到達黄圩子。在那裏，陳毅軍長親自向部隊作了動員報告。他説："蔣介石正在醞釀一個很大的陰謀，早在今年初，他就調集了三十萬大軍，企圖肅清津

浦路東的我軍，然後再向蘇北前進，將我軍'驅逐'至黃河以北，配合日軍殲滅我軍于華北地區。六月份，湯恩伯以其三十一集團軍，共九個師，約七倍于我四師的兵力，占領了我四師的地區。他們第一步計劃實現了，得意忘形，企圖進一步東犯我蘇北根據地。看得出來，湯恩伯馬上就要東進，向我蘇北根據地進攻。而王光夏侵占陳道口，建築堅固的據點，是想以陳道口爲中心，控制運河兩岸，然後向兩邊擴張，東接曹甸、車橋，西達津浦鐵路，構成一條通道，以便接應湯恩伯。我們勸他走開，去打日軍，他們不聽，他們的反共方針已定。既然如此，我們也祇好用自衛反擊戰來徹底粉碎這個陰謀。關鍵是爭取時間，要搶在他們東犯之前打下陳道口，切斷他們的通道。這一仗關系到全局，我命令你們十九團，堅決攻下陳道口，拔掉這個釘子，祝你們戰鬥勝利。"

陳道口戰鬥是由陳毅親自組織指揮的。他根據曹甸戰鬥的經驗教訓，將這次陳道口戰鬥分爲了四個步驟進行：

第一步，挖坑道，通過掃清射界。我們從十月上旬就開始包圍陳道口，逐步肅清敵人的外圍據點，穩扎穩進。十月十六日，我們的包圍計劃就緒，部隊開始坑道作業，利用所挖的交通溝，步步爲營，步步緊逼，斷絕了敵人的一切外援和糧食供應。當時，部隊在前面挖，老百姓在後面修，整整四晝夜的連續作業，我們的地道就已經挖到了鐵絲網的跟前。敵人用機槍、手榴彈，甚至土炮來打我們，都没有傷到我們一根毫毛。

第二步，集中火炮轟擊，摧毀碉堡群。坑道挖到外壕邊，再也挖不過去了。我們便集中了所有的山炮、迫擊炮，瞄準敵人的碉堡，一個一個地予以摧毀，把敵人的主要火力點摧毀了，總攻就開始了。

第三步，破壞鐵絲網。當時我們七旅十九團和教五旅一團擔任主攻。十九團由陳道口的西北方向向西小圩進攻，一團由東北方向向東小圩進攻。十月二十日的黃昏時分，總攻開始。衝鋒號一響，先砍鐵絲網。破壞組的同志每人一把大刀，把鐵絲網砍破

一個洞，就從洞裏鑽進去，再砍第二道，四道鐵絲網終于被我們全破了。

第四步，攻城。第二次衝鋒號響，就用事先準備好的浮橋，搭在外壕上，部隊一過外壕，就架梯子，架好一個，就爬上去一群。爲掩護部隊爬上圩墻，我們集中了部隊的輕、重機槍和幾乎是百發百中的特等射手，祇要敵人在圩墻上一露面，我們就立即開槍射擊，密集的火力壓得敵人抬不起頭、還不了手。同時，總攻部隊在圩墻下實施爆破，爆破成功了，把圩墻炸開了一個大缺口，部隊衝進去了。

部隊攻進去以後，順着街道與敵人展開拼殺，一座房子一座房子地與守敵爭奪，敵人越來越縮小。大概經過兩個多小時，西小圩子就被我十九團攻占了。不久，東小圩子也被教五旅一團攻占。

東、西兩個小圩子被我們攻克後，敵人士氣十分低落，已無鬥志。第二天晚上，祇十分鐘的戰鬥，我們就進了大圩子。

陳道口戰鬥，我們共消滅了敵人三千多，俘虜了國民黨泗陽縣的縣長、專署秘書和各類軍官三十多人，繳獲步槍一千多支，輕、重機槍十四挺，迫擊炮兩門，還繳獲了電臺及其他各種器材。

可惜的是，王光夏在戰鬥中乘亂化裝逃跑了。陳毅軍長説："他跑掉就跑掉好了，他是一個頑固派，他還會再來的嘛，他再來就再把他消滅掉。"果然，後來我們在洪澤湖的山子頭戰鬥中，把他擊斃了。

陳道口戰鬥，是一次完全勝利的戰鬥。在陳毅軍長的親自領導和指揮下，在實踐過程中，集中群衆智慧，我們不斷研究，摸索和創造出的一套水網地區的攻堅經驗，是比較完善的，是寶貴的，戰後推廣到了整個部隊。

王光夏的部隊被消滅後，運河上的整個封鎖綫全部瓦解。徐繼泰、張守義的部隊撤回原地，都走了。韓德勤也回了曹甸原地，湯恩伯的部隊也在津浦路西停止了東進。整個淮海區的根據地恢復了，同淮北四師的交通綫也暢通了。

因此，陳道口戰鬥的勝利，對鞏固整個蘇北根據地以及淮北和淮南根據地，都有重要戰略意義。陳道口戰鬥是蘇北一次極重要的戰鬥。

六、單家港會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侵略者突然襲擊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基地珍珠港，緊接着又入侵美、英、荷在太平洋地區的殖民地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和東印度群島，發動了太平洋戰爭。

爲貫徹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關于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敵後抗戰方針和政策的指示，總結和部署工作，中共中央華中局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至三月五日，在江蘇省阜寧縣單家港舉行第一次擴大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華中局委員、華中各根據地黨委書記和政府、軍區及有關方面負責人，共九十四人。我們三師去參加會議的有黃克誠、張愛萍和我三個人。彭雄留在機關看家，没有去參加會議。

劉少奇、陳毅代表華中局分別作了形勢、任務和軍事工作的報告。

劉少奇在報告中强調指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華中日軍駐有十四個師團，三個獨立混成旅，總兵力達到二十九萬人。他們還大力擴大和利用僞軍，使華中僞軍總兵力達到十六萬人，以便騰出日軍兵力用于機動作戰。爲鞏固其占領區，確保主要交通綫，掠奪戰略物資，謀求支援太平洋戰場作戰，他們必然加緊對我各根據地的"清鄉"和"掃蕩"。而国民党顽固派也必然利用日军放松对正面战场进攻的机会，不断制造军事"摩擦"。因此，敵後抗戰仍舊面臨着敵、頑夾擊的嚴峻形勢。因此，鬥争是長期的、艱難的和殘酷的，堅持今後兩年的艱苦鬥争，最爲重要。

劉少奇同志詳細地分析了敵頑我三方在華中的態勢。指出：敵人占據大中城市、交通要道，控制了經濟富裕地區，所以仍占有優勢，但其兵力不足與分散，社會基礎薄弱，是它不可克服的弱點。

國民黨頑固派勢力在華中較强，對敵後抗戰仍起相當的牽制和破壞作用。

我黨我軍在華中敵後控制着廣大的鄉村，建立了根據地，在鄉村占有優勢，但群衆尚未充分發動，根據地不够鞏固，在敵軍和頑軍的進攻下，部分地區已經縮小和喪失。

這是一種復雜的、不平衡的長期的相持鬥争的局面。在這種特點下，劉少奇提出了我們在華中的任務："繼續堅持華中敵後抗戰，完全鞏固各根據地，加强與聚集力量，以便在適當的時機反攻敵人，争取中國抗戰的最後勝利與中國人民的徹底解放。"

陳毅在會上作了關于華中軍事工作的報告。他在報告中進一步論述了華中地區敵我相持鬥争局面的長期性、復雜性，總結了反"掃蕩"、反"清鄉"鬥争的經驗教訓，論證了我軍應采取的戰略、戰術，并提出了加强軍隊建設方面的方針政策等問題。他還强調指出，在長期鬥争中，我們必須要密切配合國際、國内形勢的變化，依靠主觀指導的正確性，才能改變敵我力量的對比和强弱的態勢。懂得這一點，才不會被敵人瘋狂的"掃蕩"所嚇倒，才不會因爲逆流高漲而使自己手足無措。

饒漱石在會上作了提高黨性修養的報告。他要求共産黨員加强學習，努力提高自己的黨性修養水平，服從組織、服從領導，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忠實執行黨的決定和上級的命令。

三師師長兼政委黄克誠被華中局指定，也在會上作了政治工作報告。他講了四個問題：一、軍隊政治工作的重要意義；二、對友軍的統戰工作和對日軍、僞軍的争取瓦解工作；三、加强幹部工作和黨性修養，加强對幹部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幹部的文化知識水平，愛護、培養德才兼備的幹部；四、要正確執行黨的肅奸政策，注重實事求是、調查研究，不可輕信口供，絕不能搞

逼、供、信，絕不能搞擴大化，寧可錯放，不可錯殺。

華中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一共開了四十五天。會議分成幾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聽取劉少奇、陳毅、饒漱石、黃克誠同志的報告。

第二階段，分組匯報。由各個地區的區黨委書記，新四軍各師和各個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分蘇南、皖東、淮南、蘇中、蘇北、淮北等地區，依次分別匯報了建設根據地以及反"掃蕩"、反"清鄉"鬥爭的經驗，包括政治、軍事、作戰、黨的建設、部隊本身的建設、群衆組織的建設，民兵、地方武裝的建設等，都作了全面的匯報。在我的記憶中，好象衹有五師，在鄂中因交通阻隔，沒有來參與匯報。

第三階段，討論華中局擴大會議的決議草案。這個決議，我記得大約是九條，大意是：

第一條、加强對敵鬥争，敵後各根據地的形勢可能越來越嚴重，但我們在各方面都有有利的條件。我們有根據地的廣大群衆，有新四軍主力部隊，地方部隊，和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有過去的鬥争經驗，完全可以堅持各個根據地的鬥争。

第二條、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綫。争取民主進步人士共同抗日。同時加强對敵僞的宣傳教育工作，争取僞軍反正。

第三條、堅持反擊頑固派的鬥争。在反頑鬥争中堅持有理、有利、有節，力求每戰必勝。

第四條、加强軍隊建設。加强軍隊的軍事訓練和政治教育，思想工作，保持高昂的士氣，提高戰鬥力。要區分主力部隊和地方部隊的作戰任務，主力部隊主要用于機動作戰，地方部隊主要是分散襲擾敵人，同敵人不斷的進行游擊戰争。

第五條、開展群衆工作，特別要搞好"二五"減租減息工作，使之落到實處。

第六條、開展生産自救。在各根據地開展大生産運動，争取部分糧食蔬菜自給。

第七條、加强政權建設，各級政權都要實行"三三制"，加强黨委建設，加强基層黨支部的堡壘作用，加强黨員的修養，加强組織紀律性。

第八條、發展文化教育事業：辦好報紙，搞好中、小學教育，辦好黨校，搞好幹部的輪訓工作，提高幹部的工作能力。

第九條、加强鋤奸保衛工作。肅清漢奸，防止敵人奸細混入根據地的黨政機關。

對這個決議草案，大家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討論，最後逐條通過，形成了華中局擴大會議的決議。同時，會議也正式通過了劉少奇等人作的報告。

第四階段，是總結階段。劉少奇最後代表華中局作了會議總結，他還逐個評比了各個根據地工作的優劣好壞。由于華中局當時駐鹽阜區，鹽阜根據地的工作基本上是在華中局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也許是出于嚴格要求自己的原因，劉少奇把鹽阜區的工作，擺在了華中各區最後一位。有些同志對這個結論提出了些意見，但都被駁回來了。這樣，就使一些同志背上了包袱。

會議期間，華中局還組織各地區及各師的負責人輪流到黨校去作報告，介紹本地區、本部隊的鬥争經驗，如一師的粟裕、二師的譚震林、三師的黃克誠、四師的鄧子恢、六師的江渭清等，都去黨校作過報告。我們三師參加會議的三個人，都曾去黨校講過一次。張愛萍講的是他怎樣領導和部署消滅洪澤湖土匪的經驗。我也由華中局指定，去黨校講了一次戰時政治工作的經驗。黨校的學員們聽後都反映，這個辦法好，好就好在使黨校的同志學習很實際。

這次會議結束後不久，中央就來了命令，把劉少奇調回延安中央工作。由饒漱石代理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陳毅仍是新四軍軍長，并代理軍分會書記。

七、淮海軍民反“掃蕩”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日軍第十七師團一部及偽軍第三十六師共五千餘人，分别由泗陽、淮陰、漣水、南新安鎮、沭陽等地出動，向淮海區黨委、行政公署、軍分區和十旅旅部的所在地小湖莊、陳圩、張圩等地分進合擊，企圖一舉把我淮海根據地的黨、政、軍領導機關全部消滅掉。

根據新四軍三師司令部的部署，十旅的部分主力在地方武裝的配合下，于内綫堅持鬥争，而十旅主力大部與淮海區的黨政領導機關一起，跳出合圍圈，轉向灌雲東北等敵人後面比較薄弱的地區。敵人的五路合圍撲了個空，黨政機關主力部隊都走了，没有找到任何一點痕迹。

敵人撲空以後，就在六塘河（這是一條從東向西南的河流，拐入運河）兩岸，反復“掃蕩”，尋找我主力部隊。同時，他們又在高溝、楊口、陳家集、錢家集、湖莊等地設置據點，并修通彼此之間的公路，以相互策應。淮海根據地被這些據點和公路嚴重分割，從而加重了淮海根據地以後堅持敵後鬥争的困難。

淮海根據地被分成幾塊以後，敵人就實行分區“清剿”，一個地區一個地區進行“掃蕩”，就像梳頭一樣，今天梳過來，明天梳過去，反復地梳。這樣一來，就使淮海區軍民處于根據地創建以來最艱難的時期。當時，師裏曾有意讓十旅和淮海區的黨政領導機關暫時轉移到鹽阜區來，但他們一直没有離開淮海，始終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堅持着淮海地區的敵後鬥争。

淮海區軍民對付敵人反復清掃的辦法是：

第一、保存主力，精簡機關，疏散、轉移到敵人側翼的虚弱地點，暫時隱蔽，使敵人找不到我們的主力和領導機關。

第二、以小股武裝，一個排或一個班，加上民兵，天天晚上襲擾敵人的據點。用打槍、打炮、爆破等方法襲擾敵人，弄得敵人日夜不安，疲憊不堪。

第三、發動群衆，軍民同挖抗日溝，用來隱蔽伏擊敵人的“清剿”部隊。常常一陣手榴彈或一陣機槍，就能打死一堆敵人。然後再趁敵人慌亂之際，我們就順着“抗日溝”跑了。

第四、聲東擊西，以小股部隊襲擾東面的敵人，但實際上我們的主力已轉到西面去了。等敵人往西面一撲，我們又轉到了東面，使敵人捉摸不定。我們力争以最小的代價换取較大的勝利。

第五、展開夜間活動，所有部隊的活動統統在夜間進行，是夜露日宿。因爲群衆是我們的，敵人在晚上是不敢出來的，所以每天一到晚上，就是我們活動的好時機。

第六、動員群衆堅壁清野，把所有的糧食統統埋在地下，把猪、羊、牛、鷄趕出莊子，放養于隱蔽處。敵人不來，群衆就在地裏生産，種莊稼；敵人一來，立刻就躲得無影無踪。

第七、破壞公路，斷絶敵人的運輸補給綫。敵人修一次，我們就破壞一次，敵人在日間修，我們夜間馬上去破壞掉。衹要汽車一來，我們就在溝裏用槍打、用手榴彈炸，直到汽車動不了爲止。這樣一來，群衆的糧食他們搶不到，補給的糧食又往往到不了目的地，這就給敵人造成了很大的困難。

第八、孤立日軍，重點打擊偽軍，殲滅偽軍。衹要偽軍一出來，就這裏幾十人、那裏幾十個地殲滅他，使偽軍不敢囂張。

就這樣，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作戰，終于迫使敵人暫時停止了“掃蕩”。但由于敵人的據點并没有被拔掉，整個根據地仍被分割成幾塊，給以後的作戰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八、整風運動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和八日，毛澤東相繼在延安中央黨校開學典禮和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

股》的報告，號召全黨開展整頓黨的作風的活動。這次“整風運動”的主要内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總稱爲“整頓三風”。當時，毛澤東給“整風”規定的總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

從此，延安就開始了整風運動。

直到這一年六月，我們在敵後才得到延安發來的有關“整風運動”的正式文件，同時接到華中局、華中軍分會、新四軍軍部關于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

接到華中局、華中軍分會和軍部的指示以後，黄克誠立即召開了三師的師黨委會議。會議决定，在三師各部隊中展開“整風運動”，“整風”的重點是師部、旅部機關各部門和部隊營、團以上幹部。具體辦法是，由師政治部負責開辦一個“中幹隊”，調王恨爲隊長，主要負責師直屬隊和七旅、八旅、十旅營、團幹部的“整風”，每期半年，輪流集中，如有敵情，“中幹隊”就隨師政治部行動。

這時，鹽阜區、淮海區的兩個黨校已接受任務，準備對縣、區以上幹部進行輪流集中“整風”，因此師黨委會議决定，將軍分區的營、團幹部也調去黨校學習，師部和旅部的一般機關幹部，可以一邊工作一邊學習，時間也可以適當放長一點。部隊的連、排幹部，由團裏組織學習文件，以教育爲主，每周集中學習一次或兩次。

“整風”的學習文件，主要是毛澤東的兩個“整風”報告、《關于糾正黨内的錯誤思想》，即紅四軍九次代表大會的决議、中共中央《關于領導方法若干問題的决定》和劉少奇的《論共産黨員的修養》等。這些文件都由三師政治部編印成册，下發到各部隊，作爲整風文件。

在敵後進行“整風”，不僅要堅持抗戰打日軍，又要同國民黨頑固派軍隊進行反“摩擦”作戰，同時還要進行生産和軍事訓練。這許多任務穿插在一起進行，日軍來了打日軍，頑固派來了反

“摩擦”，在前兩項主要任務之間進行後三項工作，利用戰争的空隙進行“整風”、軍訓和生産。所以，敵後“整風”的主要特點，就是“整風”是在戰争中穿插進行的。

就在戰争的空隙裏，三師第一期“中幹隊”開學了。開學時，黄克誠親自作了動員報告，講了“整風”的重要意義、目的、方針和方法。我也在會上講了一下關于“整風”的具體步驟和辦法。

“整風”主要是以自學文件爲主，適當作些輔導報告。黄克誠、張愛萍、我、彭雄、洪學智、楊光池，還有政治部的李恩求、朱鴻幾個部長，以及“中幹隊”的隊長王恨等，都曾輪流在“中幹隊”作過報告。

我們“整風”的具體步驟是：第一階段，學習、閲讀文件，認真做筆記，對不理解的問題提出來大家討論；第二階段，對照文件，聯系自己的思想，寫出檢查、心得，有的能寫的就再寫個自傳；第三階段，給上級機關和領導提意見；第四階段，總結。

我們從一九四二年下半年開始辦“中幹隊”，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爲止，一共大概辦了四期，其間因反“掃蕩”停辦了一段時期，每期約一百多人。輪訓完畢之後，學員們就各自返回原崗位。

機關幹部的在職學習，步驟和辦法與“中幹隊”的集中學習是一樣的，祇是時間比較長一點。因爲連隊的工作比較忙，連、排幹部參加“整風”，祇限于每星期集中上一、兩次課，他們工作的重點，還是放在部隊的整訓和戰鬥準備上。

黨校的“整風”學習，由區黨委直接負責，師裏不插手。

三師的這次“整風”，在黄克誠的領導和掌握下，搞得是比較穩妥的。在“整風”過程中，主要是解决思想問題，以弄清思想，團結同志，增强部隊的戰鬥力爲目的，没有搞什麽“坦白運動”、“搶救運動”。因爲在敵後搞“審幹”，既没有什麽地方可去進行調查，交通又不方便。那樣一搞，勢必影響團結，造成混亂。因此，我們祇是開展正常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和風細雨，與人爲善，幫助同志。能接受的就接受，不能接受的就自勉之。自己説多少，算多少，没有開過任何的鬥争會，没有處理過任何人，更没有出

現什麼大的偏差。可以説，三師的“整風”，取得的效果是比較好的。

比如，我們師直屬隊的科、團以上幹部三十餘人，由我主持，在師政治部集中進行了二十多天的“整風”。我們主要是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而以自我批評爲主，互相之間提的意見衹供本人參考。各個同志在“整風”中的自我檢查都很中肯，對領導提意見也很誠懇；參加“整風”的人没有一個被鬥、被整的，也没有一個因此背上包袱。經過“整風”，大家的工作責任心、黨性更加增强，互相之間也更加團結。

當時師黨委的幾個同志，和鹽阜地委的向明、劉彬、曹荻秋，淮海地委的金明、李一氓，劉震等一起整風，差不多有半個月的時間，天天開會，進行自我批評，自我檢查。有時也互相提點意見，但這種批評不會造成隔閡和不團結，更不會造成成見。通過這些批評與自我批評，師部和地方的關系更加密切，内部更加團結。打起仗來，軍隊和地方政府協同動作，後來反“掃蕩”時，我們三師政治部就和鹽阜行政公署在一起行動。



在新四軍三師和彭明治、李恩求、朱涤新在一起。前排右一是吴法宪

我們這次“整風”，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才結束。“整風”結束時，我們于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間召開了新四軍第三師兼蘇北軍區政治工作會議，對“整風”運動進行全面的總結。由于黄克誠去淮南軍部開會，由我在會上作了總結報告。這個總結報告經師黨委一致通過，却因戰鬥任務緊急，一直没有整理發表。

就在“整風”總結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黄克誠從淮南軍部開會回來了，既然師長回來了，我就請他在大會上講話，他立刻就同意了。

他説：“這次會議開得很好，我衹講一個問題，就是軍隊正規化和現代化的問題。現在形勢變了，日本已經每況愈下，而我們解放區壯大了，部隊也多了。今後幾個部隊聯合起來、協同作戰，打大一點規模的戰鬥，甚至是戰役，將是不可避免的。新四軍是如此，八路軍也是一樣。如打陳道口，就有四師的隊伍，三師的隊伍，二師的隊伍，還有從山東下來的梁興初的隊伍。在三師的隊伍中，有鹽阜區的隊伍、還有淮海區的隊伍。這樣幾個部隊聯合作戰，如果没有正規化、現代化的一套，就不能集中統一指揮，就可能各自爲戰，就不可能打勝仗。因此我要講一講這個問題。”

他認爲，現代化、正規化的軍隊有六條標準：

一、集中統一指揮行動。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要集中統一，堅決執行命令，聽指揮，强調令行禁止。反對游擊習氣，各自爲戰；反對本位主義，不顧整體。

二、軍隊的裝備要逐漸改進。除繳獲敵人的以外，在自己的根據地要盡量設法制造各種比較好的武器，如手榴彈、地雷、炸藥等，要盡量的多搞。

三、要加强軍隊的正規訓練，包括軍事技術訓練。手榴彈、刺殺、爆破本是我們的專長，但這還不够，還要學會使用炮兵，要學會使用迫擊炮、六〇炮，甚至野炮、山炮。眼光要放遠一點，不要以爲現在没有，就不學了。現在没有的也要學，要學會用炸藥對付敵人的坦克車、裝甲車。不僅要會跑，會防御，還要學會攻堅戰，會攻城，攻碉堡。軍事訓練要全面加强，軍事訓練的時間要增加。要大力開展體育運動，加强部隊的體力。要加强幹部的軍事學習，加强對指揮員的訓練。

四、嚴格軍隊的紀律，整頓軍容風紀。要頒發隊列條令，紀律條令，嚴格按條令辦事。對部隊要求嚴格，説到做到。軍隊必須堅決執行命令。

五、加强現代化軍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黨的領導。總結“整風”的經驗，繼續以“整風”的精神，加强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軍隊應當實行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對這一

點，黃克誠在蘇北時就已經提出來了，以後在北京任總參謀長期間又加以重申。

六、要建立和健全有頭腦的司令部。一定要加强司令部的各項工作，包括作戰、情報、後勤、衛生、供給等部都要加强，使之能集中力量爲戰爭服務。

黃克誠的講話向來不長，頂多一、兩個小時。他那個時候就能有這些思想，就是現在看來也不落後呀！

這次會議開完，我們三師的“整風”運動就基本結束了。經過這次“整風”，三師和蘇北軍區部隊内部的團結，以及軍地之間的團結，都比以前有了進一步的加强，真正達到了“整風”的目的。

就這樣，“整風”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結束了。這時，抗日戰爭的形勢已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九、第二次反“掃蕩”

一九四二年五、六月間，美軍相繼在珊瑚海和中途島的海戰中，給日軍以沉重的打擊。日本侵略軍爲改變自己在太平洋戰場上的不利態勢，阻止美軍反攻，急于盡快結束對華戰爭，以便從中國戰場抽調更多兵力用于太平洋戰場。爲此，華中日軍企圖盡快消滅我新四軍的領導機關及新四軍主力，以確保其占領區的安全。

蘇北的鹽阜地區是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的所在地，又是三師師部及主力的所在地，向來爲日軍所矚目。

一九四二的秋末冬初，日僞軍開始“掃蕩”淮海、淮北和淮南等抗日根據地，并開始向蘇北鹽阜區和蘇中各根據地的據點增兵，同時加緊進行偵察和作戰演習。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根據敵人的這些動向，斷定敵人在淮海等地區進行的“掃蕩”，祇是偵察性的行動，接下來他們將對我華中各抗日根據地進行空前規模的大“掃蕩”，其重點可能是蘇北和蘇中地區，首當其衝的很可能是鹽阜區。因此，華中局要求華中各根據地的黨、政、軍、民，一定要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作好充分的準備。

爲保證領導機關的安全和不間斷的指揮，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于一九四二年底從蘇北的鹽阜區，轉移到淮南盱眙縣東南的黃花塘地區。這次搬遷是絶對保密的，定下來以後很快就走了，具體什麼時候走的，連我都不知道。

遵照華中局和軍部的指示，我們也從十月份開始，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了很多準備工作。

第一、在黨、政、軍、民中間公開、全面地進行反“掃蕩”動員。向大家説明敵人的這次“掃蕩”，比一九四一年的夏季“掃蕩”的規模會大得多、情況也會嚴重得多。但是，經過一年多的建設，我們的政權更加鞏固了，軍隊擴大了，我們的力量也大大增强了。群衆對我們更加信任和擁護，我們的物質基礎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强，再加上我們有第一次反“掃蕩”的經驗，我們完全有把握粉碎敵人的這次掃蕩。

第二、加强情報偵察工作。那個時候，我們在上海、南京、揚州、泰州等都建有直接的情報網。在司令部住了個方志達，在政治部住了個袁信之，他們都是專門負責搞情報工作的，有的情報關系，還是由黃克誠親自掌握的。除司令部的情報處以外，政治部的保衛部、聯絡部都搞情報工作。自行車偵察隊大大地擴大了，他們各有自己的分工，騎着自行車，穿着便衣，天天往據點跑，路上碰到敵人就往青紗帳裏一躲。當時決定，在南面，要加强對淮陰、揚州、東臺、鹽城的偵察；在北面，要加强對徐州、新安鎮、灌雲、連雲港的情報工作。在這些地方的據點，一旦有什麼動静，我們隨時能掌握住。

第三、加强通訊工作。在鹽阜與淮海之間，在各個根據地之間，通訊聯絡工作都加强了。除電臺之外，我們控制了各個陸路交通口和渡口，建立了不少通訊站，有個交通站就設在鹽河邊，

從而保證了通訊聯絡暢通無阻，郵件和報紙的傳遞，一直就没有中斷過。

蘇北當時的這兩條是受到表揚的，一個是敵僞聯絡工作，一個就是通訊網的工作。新華社爲此發表過好多條消息。

第四、認真精減領導機構，充實連隊，加强戰鬥部隊，增加連隊的槍支、彈藥、手榴彈、地雷等各種武器，提高部隊戰鬥力。同時，地方黨政機關人員也大大地精簡，精簡下來的幹部用來充實基層。

最重要的一條，是把師、團的一些幹部，包括師參謀長彭雄，七旅政治委員朱滌新，八旅旅長田守堯，政治部主任張赤明，十旅政治委員吴信泉等幾個團長、政委，調往延安學習，以保存幹部。他們之中，衹有吴信泉因交通阻塞，没有去成。

第五、把一些文化人，統統分散予以安置。解散了政治部的魯迅文藝工作團。在這個問題上，我同黄克誠是有不同意見的，我有點捨不得，黄克誠説，“胖子，現在不解散，將來够你負擔的，會遭受損失的。”

當然最後還是按照黄克誠的意見辦了。魯工團的一百七十多人，統統分散了，有的到了延安，有的回到了上海，大部分交給了八旅，當時八旅由張愛萍負責，我找到張愛萍，問他能不能在八旅重新組織起一個文工團，張愛萍説，“行，你不要，我要。”以後阿英所寫的大型話劇《闖王進京》，就是八旅這個文工團演出的。

我們把醫院的傷病員，醫務人員也全部分散到民間，在醫院下面組織了三個衛生所，分別安置在羊寨、板湖和益林。部隊家屬也統統分散，大部分安置在阜寧和阜東的老百姓家中，也有的疏散到了上海等地。

第六、發動群衆，破壞道路和橋梁，堵塞河道，剪斷敵人的電話綫，拔掉敵人的電話杆子，以此來切斷敵人的運輸綫，孤立敵人的據點，使他們彼此之間完全失掉聯系。同時，發動群衆挖溝、改造地形，以利我之隱蔽和限制敵之行動。

當時我們還采取了很重要的一條措施，决心是全體群衆下的，那就是把敵人可能安據點的一些大城鎮統統拆掉。所有的城鎮居民都搬到了農村，使敵人無落脚之地。如東坎，原有五、六里路長的一條街道，統統拆掉了。還有八灘，這麼大的一個鎮子，把所有的街道全部拆掉了。在東溝和益林也拆掉了一部分，還有一些小鎮子裏的高樓、炮樓、堅固的廟宇、祠堂，凡是估計敵人可能修築爲據點的統統拆掉了。這些地方如果都讓敵人按了據點，我們的活動範圍就太小了，就太困難了。更重要的是，一旦讓敵人站住脚，就會對周圍的莊子燒殺搶掠，群衆就會遭殃。所以這個决心是全民下的，我們一動員，群衆自動地就把該拆的都拆掉了。也衹有共産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的人民，才有這樣高度的覺悟。

第七、動員群衆堅壁清野，把物資統統埋在地下，把牛羊猪都趕走。我們還組織群衆，進行轉移演習，衹要敵人一來，村村都是空的

第八、組織游擊小組，給他們發了槍。這些三五成群、一組一組分散活動的游擊小組，主要任務就是偷襲敵人，迷惑敵人。他們聲東擊西，大造聲勢，衹要敵人一來，就要讓他們日夜不安，疲憊不堪。看來好象是我們主力在那裏，其實都是民兵游擊隊。

第九、擴大對僞軍的宣傳工作。我們公開警告僞軍，如在“掃蕩”中幫助日軍侵犯我根據地，殘害群衆，搶劫東西的，將給予嚴厲的懲處。如在“掃蕩”中給我們送情報，保護根據地的老百姓和幹部的，將會立功授獎。我們還動員僞軍家屬一起做瓦解工作，要他們做一個外表是白的，但内心是紅的真正的中國人。對日本人可以應付，但實際上應當心向根據地的人民，不要騷擾根據地的人民。

第十、搞反奸鬥争。村鎮中凡當過漢奸、土匪的，或是同敵僞有聯系的，還有會道門和流氓、地痞等，都統統交由群衆控制、監督起來，不準他們亂説亂動，不準他們同敵人通情報，不準他們爲敵人帶路，否則將追查他們的責任。另外，組織少先隊，兒

童團到處放哨，盤查行人。

第十一、部隊領導機關統統劃小，地委、行署、縣委、縣府少數人和師、旅、團、軍分區指揮所一起行動，實現黨、政、軍、民的一元化領導，這是很重要的一條措施。

第十二、反掃蕩作戰的具體部署是：

經軍部批準同意，以第八旅主力和第七旅二十一團及鹽阜軍分區地方武裝，堅持鹽阜區內的反"掃蕩"鬥爭；以第七旅主力，和第八旅二十團在敵"掃蕩"開始時，轉移到淮海區，與在該區的第十旅配合行動，策應鹽阜區的反"掃蕩"作戰。同時，決定由三師副師長張愛萍兼任鹽阜區區黨委書記，并兼任八旅旅長、政治委員和鹽阜軍分區司令員、政治委員，使鹽阜區的黨、政、軍領導統一起來；以劉震爲十旅旅長兼淮海軍分區司令員，金明爲十旅政委兼軍分區政委，由他們兩人統一淮海區的黨、政、軍領導。與此同時，華中局、華中軍分會和軍部也決定由洪學智接替彭雄，出任三師參謀長。

總之，這次掃蕩前的準備工作，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做得更要深入，更要充分。

一九四三年一月中旬，日僞軍相繼出動，敵人兵力增至兩萬四千餘人，完成了對鹽阜根據地和國民黨韓德勤部所駐的淮安以東地區的包圍。

根據上述情況，軍部判斷敵人很可能首先"掃蕩"韓德勤所部，然後再轉移兵力"掃蕩"鹽阜根據地。一月十六日，軍部發出了反"掃蕩"作戰指示，指出，現在，東南亞的緬甸、印尼等國已開始同日軍作戰，使得日軍的兵力嚴重不足，因此敵人這次對鹽阜區的"掃蕩"是局部性的，時間也不會太長。在敵人的"掃蕩"開始時，三師主力可以暫避敵之鋭氣，但必須要把一部分主力留在鹽阜區，選敵弱點，不失時機地予以打擊，以鼓舞黨、政、軍、民堅持和保衛根據地的鬥争情緒。已過鹽河進入淮海區的第七旅，應立即停止于適當地區。一師、四師和三師十旅也應積極襲擊敵之據點及交通綫，配合鹽阜區的反"掃蕩"作戰。指示還要求各部隊適當配合韓德勤部的作戰，以擴大我們的政治影響，改善國共關系，但要謹防其乘機破壞我們的根據地。

果然不出軍部之所料，一月二十二日，敵人由淮陰、寶應等地出發，首先對曹甸地區的韓德勤部進行合擊。韓德勤部在敵人的進攻下，一部阻敵，大部在我軍的掩護下，退入淮海根據地。

一月二十六日，敵人開始向鹽阜根據地發起大規模的"掃蕩"。反"掃蕩"初期，我們按照在反"掃蕩"的預定方針，避敵鋒芒，保存主力，保存幹部。

一月二十七日，日軍加上僞軍一部共兩萬多人，合擊鹽阜區的東坎和八灘地區，企圖圍殲我們的領導機關和主力部隊。爲了避開敵人的鋒芒，我們除留一部分主力由副師長張愛萍率領，于内綫阻擊遲滯敵人，與敵周旋外，師部、七旅主力及八旅一部已先期向鹽東、阜東和淮海地區轉移。敵人的合圍企圖落空後，他們又以"梳蓖拉網"戰術，連續合擊我阜東和濱海地區，繼續尋殲我領導機關和主力部隊，但連連撲空，始終未能得逞。

早在敵人對鹽阜根據地的合圍之前，我們師部就已經分成了三個部分：師長兼政委黄克誠率偵察隊及司令部部分機關指揮人員，活動于阜寧以東、射陽河一帶的沿海地區，指揮整個鹽阜地區的反"掃蕩"作戰；參謀長洪學智帶領司令部的主要機構，轉移到東坎以東地區；我和鹽阜區行政公署主任曹荻秋，帶領師政治部和行署的部分幹部，由師部警衛營四連（這個連共七十多人）保衛，轉向鹽東地區。我們三路人馬在阜寧西南的張郭莊分手，各自向規定地區轉移。分手前，黄克誠還指定我，除指揮所帶部隊外，還負責指揮七旅二十團在阜寧以南、鹽城以北、湖垛以東這一帶活動。

我和曹荻秋率部隊經過兩天的急行軍，相繼渡過射陽河、通河、串腸河，在上岡以北通過了敵人的封鎖綫，于二月十九日拂曉到達新洋港口北岸。由于連日急行軍疲勞，導致我一時大意，下令部隊在離港口不遠的三竈地區宿了營。這個地方離港口以南的南洋岸、伍佑等敵僞據點都很近。

天剛亮，日軍一個大約有百把人的中隊，就分坐幾條汽船，一下子就到了我們住的南岸。鹽東地區地廣人稀，新洋港又比較寬闊，河道没有被堵塞住，敵人的汽船來得很快。幸好我們所帶的警衛營四連張連長還没有睡覺，正在偵察地形布置警戒。敵人一靠岸，他就發現了，趕緊跑回來報告我。我當時和曹荻秋同住在一間屋裏，剛剛睡下，還没有合眼。聽説有情况，就趕緊起床，一面要張連長趕緊通知四連集合準備迎敵，一面通知保衛部長周彬趕緊保護曹荻秋及政治部以及行署的工作人員往北撤退。因爲當時政治部衹有保衛部還帶有一個駁殼槍班，其他的人有的有一支手槍，有的根本就没有槍，無法作戰。

我同張連長到了最前面，布置兩個排先利用地形、地物隱蔽待機，另外一個排分散開來，準備流動作戰。等到敵人臨近時，我一聲令下，我們集中在前面的這兩個排就機槍、手榴彈一陣猛打，另外的那個排也東面打幾槍，西面打幾槍，打得敵人蒙頭轉向。他們弄不清我們究竟有多少隊伍，遲疑着不敢輕易前進。

他們事先大概没有得到我們來到鹽東的情報，這次來三竈，和我們衹是偶然的遭遇。他們隨身衹帶了幾挺輕機槍，因此更加畏縮不前。

又是我再次疏忽大意，當我用望遠鏡觀察敵人情况時，暴露了自己的身形，敵人一陣子彈打來，我的兩個警衛員，一個叫張廣林，一個叫聶繼祥的都爲掩護我而犧牲了。

敵人不進攻，我們也不出擊，就這樣一直僵持到八點多鐘。這時，我估計機關人員大概已經撤到了安全地帶，就組織四連交替撤退，一直撤到十五竈，同機關人員會合。

我們走後，據説日軍又在海邊仔細搜索了一番，最後才坐上汽船，退回到南洋岸去了。這是我們在反“掃蕩”開始後與敵人打的第一仗。

這次遭遇戰，我們打死打傷了一些日軍，但自己也死傷了六、七個，特别是我的兩個警衛員的犧牲，更是令我十分痛心。戰鬥結束後，三師政治部和警衛四連爲張廣林、聶繼祥舉行了追悼

會，哀悼他們爲國家、爲人民、爲保衛蘇北根據地獻出自己的生命。在這裏，我再一次向他們表示深深的謝意，并向他們致以崇高的敬禮！他們將永垂不朽！

打完這一仗，我立即發電報，分别將這一仗的情况報知黄克誠及張愛萍、洪學智。他們都立即復了電，表示對我們的處境很擔心，要我們向北靠，不要過分向南走。黄克誠還再三强調，反“掃蕩”的第一階段要以避敵鋒芒，保存自己爲主，一定要保護好指揮機關和幹部不受損失。對我的疏忽大意，他們却没有提出絲毫批評。他們的復電，給我很大的安慰。

此後，我們在鹽東堅持鬥爭，今天這裏、明天那裏地天天搬家，再也没讓敵人鑽我們的空子。這段時間裏，我們同地方黨政幹部一起，組織游擊小組，偵察情報，襲擊和迷惑敵人，破壞公路，堵塞河道，截斷敵人的通訊聯絡。就這樣，在“掃蕩”期間，我們再没有遭受什麽損失，同黄克誠、張愛萍、洪學智之間的電報聯系，也没有中斷過。

在鹽東，我們同敵人游來游去，兜來兜去地搞了一個多月。張愛萍帶領主力，黄克誠和洪學智帶領機關，也在同時與敵人轉來轉去地轉了好幾個圈子，但都没有碰到敵人，衹有我一開始就和敵人遭遇上了。

這就是“掃蕩”開始時的一些情况。

在“掃蕩”中，敵人集中兵力對阜寧東部、西部以及射陽河以東地區進行“清剿”，并修築公路，安設據點，建立僞政權，妄圖長期控制這一地區。這時，我們堅持内綫作戰的八旅主力、七旅二十一團，以及鹽阜軍分區的地方武裝和民兵，互相配合，不斷地襲擾敵人。與此同時，外綫的十旅、七旅主力和八旅二十二團，也不斷地配合作戰。

那個時候，我們部隊都是白天休息，晚上出動，因爲晚上是我們的世界。部隊三五成群，到處活動，遍地打槍。這樣，敵人白天不敢出來，怕遭到伏擊；晚上不敢睡覺，怕遭到襲擊。敵人的每個據點，都處于孤立、疲憊和恐慌之中。

在這一時期，我們自己的部隊雖有傷亡，但不大，就連後方醫院都沒有遭到什麼損失。這是因爲我們生活在根據地的群衆之中，有群衆和我們一道活動，在群衆的汪洋大海中，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就這樣，敵人在我們內、外綫部隊的有力打擊下，顧此失彼，不得不于三月初開始收縮兵力，準備撤退。根據這一新的動向，軍部于三月三日命令我們三師，密切注意敵人的行動，準備集中兵力尾追、側擊撤退之敵，攻取敵之薄弱據點，力爭恢復鹽阜根據地的原有態勢。

隨後，黄克誠下達命令，要我和曹荻秋帶領三師政治部和行署幹部，返回八灘以東地區。這時，黄克誠已先期從射陽河以東返回了這一地區，洪學智也帶領司令部的幹部到達了這個地區。待我們到達以後，師部的領導機關就在這裏匯齊了。相隔一個多月，大家重新見面，都非常高興。大家都認爲，這次反"掃蕩"行動進行得非常順利。在敵人的大規模進攻中，部隊没有遭到任何大的損失。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實現軍部的指示，恢復我根據地的原有地區。

師部匆匆召集了一個會議。經研究決定，立即集中兵力，實施反擊。黄克誠要洪學智和我留在原地待命，自己帶領少數人員趕往八旅，去與張愛萍共同研究具體戰鬥計劃。

三月二十五日，三師各部開始展開全面反擊。各主力部隊、地方武裝和民兵緊密配合，內、外綫部隊互相策應，以"圍點打援"、伏擊和襲擊等手段，先後攻克了東溝、陳集、八灘、單家港和湖垛等據點，收復了這些地區。

在這些反擊戰鬥中，尤其是黄克誠、張愛萍親自指揮的陳集戰鬥打得最爲漂亮。張愛萍經過詳細偵察，制定了周密的戰鬥計劃。八旅先用五天的時間挖坑道、修築工事，然後在火炮和機槍的掩護下穩扎穩打，經過兩天激戰，將日軍一個中隊及僞軍共五百多人全部消滅，没有跑掉一個敵人。這一仗給了敵人很大的震動。當然我們自己八旅主力也傷亡了二、三百人。

到四月十四日，反"掃蕩"作戰勝利結束。這次蘇北地區的第二次反"掃蕩"，由于我們在戰前對敵情掌握準確，準備充分，部署周密；在敵人的"掃蕩"中，部隊行動迅速，機動靈活，內、外綫配合默契；在敵人將要撤退時，迅速集中兵力，適時發起反擊，因而順利粉碎了敵人的"掃蕩"，取得了較大的勝利。我們先後共殲敵一千八百餘人，攻克據點三十餘處，基本上恢復了原有的根據地，挫敗了敵人消滅我領導機關和主力部隊的企圖，鼓舞了抗日軍民的鬥爭情緒，爲以後徹底恢復和擴大蘇北抗日根據地，創造了有利條件。

十、"劉老莊八十二烈士"

在蘇北第二次反"掃蕩"期間，根據地軍民中涌現了很多英雄集體和個人，其中最爲著名的是"劉老莊八十二烈士"。

一九四三年三月中旬，正向淮陰進行撤退的敵人，由于偵察到我們淮海區黨委、淮海行政公署、淮海軍分區等黨、政、軍領導機關都住在六塘河劉老莊一帶，于是集中步、騎兵一千多人，在日軍師團長川島的指揮下，于三月十八日拂曉突然包圍了劉老莊，想一舉消滅我淮海根據地的領導機關。

幸運的是，我淮海區領導機關已于前一天離開了劉老莊，住在離劉老莊衹有二、三十里路的一個村子裏。當時，三師七旅十九團在團長胡炳雲、政委劉錦平領導下，堅持淮陰、漣水之間的反掃蕩鬥爭，住在劉老莊的是該團一營的第四連。

發現敵人突然來襲，四連連長白思才、指導員李雲鵬馬上意識到，領導機關所住地離劉老莊不遠，敵人個把小時就可以趕到。在這危急關頭，爲掩護領導機關安全撤走，白思才、李雲鵬立即集合部隊，布置伏擊，以阻滯敵人前進。他們迅速把部隊布置到有利陣地，作好戰鬥準備。當敵人最後完全進入我埋伏圈以

後，白思才下令集中全連的機槍向敵人猛烈開火，打得敵人蒙頭轉向。敵人一下子摸不清這裏究竟有多少隊伍，立即倉惶撤退。

但一個小時以後，敵人發現劉老莊裏的新四軍部隊并不多，就重新進行部署，展開兵力，從四面八方向四連形成了一個大的包圍圈。敵人集中各種火器向劉老莊進行猛烈射擊，把劉老莊轟得烏烟瘴氣。于是，四連撤入"抗日溝"固守，一時間倒也没有什麽大的傷亡。

上午九點，敵人發起第一次衝鋒，被我四連用機槍、步槍和手榴彈打了下去。接着，敵人又組織了第二次、第三次衝鋒，并衝到了四連的前沿陣地。四連戰士先用手榴彈集中投擲，繼而又同敵人拼刺刀，又把敵人打了下去。

敵人見三次衝鋒都没有奏效，就集中炮火猛攻四連陣地。四連全體戰士在連長、指導員的指揮下，沉着堅定，憑借着一段不長的"抗日溝"，經受住了敵人千百發炮彈。結果，連長白思才被炮彈炸斷一隻手，立即昏迷了過去。指導員李雲鵬也在戰鬥中負了幾次傷，滿身都是血。四連的戰士有的斷了腿，有的斷了臂，整個戰場上血肉横飛，尸體縱横。但是，四連的幹部、戰士懷着對敵人無比的民族仇恨，以鋼鐵般的堅强意志，從拂曉起戰鬥了將近一天。一天下來，戰士們一口飯没吃，一滴水没喝，腦袋餓得發暈，喉嚨乾得冒火，眼睛被炮火熏得充血，鼻子也被嗆得出了血，却仍然堅守戰鬥崗位。

到了下午四、五點鐘，在敵人最後一次衝鋒之前，連長白思才咬緊牙關，命令剩下的戰士上起刺刀，把子彈全部搜集起來集中使用，嚴陣以待，準備灑盡自己的一腔熱血，同敵人展開最後的一場肉搏戰。

臨近黄昏時，敵人終于從四面八方攻上來了。四連爲節省子彈，不再輕易使用武器，一直等敵人離陣地衹有十來米時，連長才命令開火。隨着這一陣猛打，敵人又倒下去了一大片。但這時，四連的同志已傷亡了一大半，子彈也越來越少。等敵人又重新衝了上來時，連長、指導員大喊，"同志們，殺呀！"戰士們躍出

"抗日溝"，同敵人拼殺在一起。到天黑以後，全連幹部、戰士共八十二人全部壯烈犧牲。

待我增援部隊趕到時，敵人已經撤退，戰鬥已經結束。我們八十二烈士的犧牲，換來敵人的傷亡是一百七十多。

這次戰鬥後，淮海區和蘇北的新華分社，專門寫了這次的戰鬥經過，發到了延安，延安向全國作了廣播。在全國特别是在各抗日根據地内，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朱德總司令把四連的"劉老莊八十二烈士"這一悲壯事迹，贊爲"我軍指戰員的英雄主義的最高表現"。

後來，淮海區人民在劉老莊建起了"八十二烈士"陵園，用碑文記述了"八十二烈士"的英雄業績，記載了戰鬥詳情。人民爲緬懷戰士忠骨，經常前往悼念。

十一、彭雄、田守堯的犧牲

這次蘇北第二次反"掃蕩"，我們還遭受了一個重大損失，這就是新四軍三師參謀長彭雄和八旅旅長田守堯的不幸犧牲。

在日軍調兵遣將即將對蘇北根據地開始"掃蕩"時，中央和中央軍委來了電報，要我們三師抽調四、五名旅以上幹部去延安學習。經師黨委研究，黄克誠最後决定師參謀長彭雄、八旅旅長田守堯、八旅政治部主任張赤民、七旅政委朱滌新、十旅政委吴信泉五人，携妻子一起去延安學習。臨離開部隊時，師裏給他們配備了警衛部隊和馬匹，發給了經費。

彭雄、田守堯、張赤民三人原準備從鹽阜區趕往淮海區，會同在淮海區的吴信泉和朱滌新一起，經山東轉赴延安。不料這次"掃蕩"，恰恰是從北面先開始。敵人一從淮海區開始掃蕩，就封鎖了鹽河，過不去了。彭雄他們先是避敵鋒芒，轉移到了阜東海邊，準備用船從海上前往山東根據地，再從陸路去延安。由于

這個原因，吴信泉和朱滌新這次没能去成延安。

由于情况緊急，他們在八灘找了一條木帆海船。他們化裝成平民，帶上隊伍，帶上機槍，船上用麻袋裝沙包做了工事，準備得很充分。

船行的第一天，雖然由于船舶的顛簸，大家頭暈、惡心、嘔吐，滴水粒米不能下咽，但總算平安無事。

第二天拂曉，船行至山東境内奶奶山附近的海面時，日軍的汽艇追踪而至，要求立即停船進行檢查。一開始大家隱蔽到船艙裏，衹留少數人在外面應付，想以商船的名義蒙混過去。不料敵人一上船，一眼就看見一個警衛員身上帶的駁殼槍，于是一場海上短兵戰揭幕了。敵人跑回自己的汽艇後，立即將汽艇駛離海船，然後用重機槍猛烈掃射。經過一段時間的對射，船上不少人都身負重傷，彭雄、田守堯及田守堯夫人、張赤明的夫人等都已犧牲在船上。幸好這時艇上的敵人也彈藥用盡，暫時離開了我們的船。

到天近黄昏時，海船憑借風力，駛近山東魯南根據地海濱。但這時船又擱了淺，後面又有三隻敵艦追來。正在危急之時，一一五師的一個連隊正在海邊活動，聞聽槍聲，趕來解救了剩下的一些同志，包括張赤明本人和彭雄的夫人吴爲真同志。把他們接上了岸。

經過短時間的休息，没有犧牲的同志，如張赤明等繼續經山東、河北、山西到延安。對彭雄、田守堯等犧牲了的同志，山東方面舉行了公葬，開了一個隆重的追悼大會後，把他們葬在了濱海地區。以後山東軍區發電報告了中央軍委，軍委又轉告我們，我們這才知道這一慘重損失，但這一慘案前後的詳細情况，我們是在彭雄的夫人吴爲真在大"掃蕩"結束後返回蘇北根據地時，從她那裏才得知的。當時吴爲真已身懷有孕，她覺得繼續長途跋涉困難較多，就要求返回蘇北根據地。

這是我們在這次反"掃蕩"中受到的最慘重損失。

隨着第二次反"掃蕩"的勝利結束，蘇北根據地很快就恢復

了正常工作。

首先是總結經驗，宣傳勝利。黨、政、軍、民、主力部隊、地方武裝，都自下而上的總結了反"掃蕩"中間的經驗教訓，然後綜合匯總，向延安黨中央、中央軍委，向華中局、新四軍軍部送出作戰報告。

其次是召開祝捷大會，隆重慶祝反"掃蕩"作戰的勝利。除各地區、各部隊分别召開祝捷大會外，師部和鹽阜地區聯合召開了一個萬人祝捷大會，主要負責幹部在會上講了話，表揚了一些好的單位和個人，樹立了好的典型，如"劉老莊八十二烈士"。對個别表現不好的進行了批評。如八旅一個團政委，在"反掃蕩"期間，擅自離開部隊達半個月之久。張愛萍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并撤了他團政委的職務。

第三、對犧牲了的幹部、戰士召開了追悼大會，并决定立即修建鹽阜區陣亡將士紀念塔，以紀念死者、激勵生者。僅僅兩個半月的時間，由蘆芒參與設計的蘆鋪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塔就落成了，塔高六丈，背靠黄河堤，上面站着一個鐵鑄的黑炯炯的戰士像，全副武裝，脚穿草鞋，手中緊握鋼槍，樸素、莊嚴、肅穆地站在高高的塔上。塔的東北角，築有彭雄參謀長和田守堯旅長的紀念碑。修塔所用的材料，都是群衆自願捐贈的，并以最快的速度建成。這座塔，是鹽阜人民團結的象徵，也是犧牲烈士崇高的民族氣節的象徵。

第四、發展地方武裝，充實主力部隊。我們把游擊小組發展到班，班合成排，排又合成連，依次上升。最後差不多所有的縣，如阜東、射陽、阜寧、建湖、鹽城等都組成了獨立團，後來，我們又將獨立團陸續編入主力部隊。這時，新的游擊小組又如雨後春笋般地起來了，擴大了一批又一批。反"掃蕩"的勝利，激發了群衆的參軍熱情，不少的青年直接到主力部隊要求參軍，使主力部隊不斷得到充實和擴大。

第五、在我們的政治攻勢下，僞軍投誠反正的增加了，一個兩個，三五成群，一個班、一個排地到我們部隊來投誠。凡是家

在根據地的，幾乎都跑回來了。有的還帶回了槍和手榴彈。僞軍投誠的數字在當時没有統計，但估計人數是不少的。

第六、組織搞了一些在根據地可行的建設工作。由于蘇北是水網地區，修橋補路，拆除河障，勢在必行。對海堤，河堤也進行了修補，防止水流侵襲。没有公路的地方就修上路，以便手推小車的通行。祇有拆毁的房屋一時修復不了，祇有逐步施工修復。

第七、黨的領導本領更加提高。當時，不論是在部隊還是在地方，要求入黨的積極分子很多。我們經過審查，不斷發展新黨員入黨，黨的組織也迅速擴大。同時，我們在地方開展擁軍優屬，在部隊開展擁政愛民，黨、政、軍、民更加團結，更加親如一家。人民群衆都踴躍執行黨的各項政策。

第八、爲擴大黨和軍隊的影響，我們還組織人搜集戰鬥故事，編印成册，廣泛宣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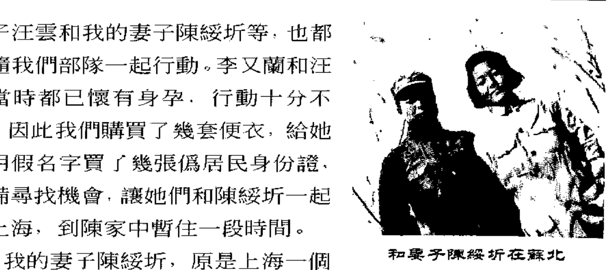
到一九四四年初，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遭受重大失敗。爲扭轉被動局面，確保日本本土和東南亞的聯系，日軍集中大量兵力用于打通中國大陸的交通綫，敵後戰場的兵力有所削弱。從一月份起，我們乘機展開局部的反攻，接連攻克湯溝、高溝、楊口、王集、徐溜、林公渡等二十餘處敵僞據點，基本收復了敵人第二次大“掃蕩”時侵占的地區，使六塘河兩岸的地區全部得以恢復，而且把淮海、鹽阜兩區完全連成了一片。

我們順利地渡過了最困難的一九四三年，打開了擴大和發展蘇北抗日根據地的新局面。

十二、陳綏圻重返上海

蘇北第二次大“掃蕩”初期，我和曹荻秋率三師政治部和鹽阜行署機關的部分同志到鹽東。張愛萍的妻子李又蘭、曹荻秋的

妻子汪雲和我的妻子陳綏圻等，也都跟隨我們部隊一起行動。李又蘭和汪雲當時都已懷有身孕，行動十分不便。因此我們購買了幾套便衣，給她們用假名字買了幾張僞居民身份證，準備尋找機會，讓她們和陳綏圻一起去上海，到陳家中暫住一段時間。


和妻子陳綏圻在蘇北

我的妻子陳綏圻，原是上海一個女子中學的學生，一九四[illegible]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一年六月，上海地下黨組織決定，要她撤離上海，到蘇北來參加了新四軍。她在軍部的抗日軍政大學五分校學習了一段時間後，即留校工作。在敵人第一次“掃蕩”期間，軍部精簡機構，將抗大下放給三師師部。一九四二年四月，師政保衛部長周彬去抗大檢查工作時，把陳綏圻要到了師政保衛部任内勤幹事。我們就這樣相識了，并于這一年的十月結了婚。

在决定陳綏圻她們去上海後不久，我們得知鹽東一個名叫潘幹臣的大地主，有幾條平時用于捕魚的木帆海船，也經常往返于上海和鹽東之間，販運點貨物，做點買賣。于是我們找到他，請他把李又蘭、汪雲和陳綏圻送到上海去。

一九四三年二月，陳綏圻她們三個在鹽東的海邊登上了海船。當時與她們同行的還有三師衛生部藥材科長洪振聲和鹽阜行署的一個工作人員李毅。他們準備通過上海地下黨的關系，爲部隊醫院購買一部分必需的藥物回來。

陳綏圻他們一上船，船工就揚起巨大的船帆開始南下。由于不習慣海上的生活，經不住海船的顛簸，上船不久他們就開始嘔吐，最後吐得祇剩下了一些緑水。在船上的兩、三天，他們躺在船艙裏，粒米未進，根本就不敢起來活動一下，更没有興致去觀賞什麼海上的風光。好在總算安全地到達了上海。

陳綏圻的家裏祇有母親和哥哥陳籽圻，陳綏圻離開上海後，他們是借住在別人的一間樓房裏。由于房子小，一下子來了這麼

多人，怎麽安排也是住不下。于是大家商定，女的，包括母親在家住，男的，包括陳釬圻、洪振聲、李毅去外面找旅館包房暫住。

過了幾天，陳釬圻一早趕回家中，告訴家裏人説，洪振聲和李毅昨天一晝夜都没有回到旅館，估計可能已經出事了。他説他有個同學在警察局做事，準備去問問他，看能不能打聽出一點消息。

不久，陳釬圻就趕回家來説，洪振聲、李毅兩人確已被逮捕。事情的經過也弄清楚了，原來新四軍一師曾在上海設置了一個地下機關，主要任務是爲部隊采購藥材、布匹等軍需物資。這個機關早些日子已被日僞特務破獲，特務們就在那裏坐等，進去一個就抓一個。洪振聲和李毅剛一找到那裏，立即就被抓走，關押在警察局裏。陳釬圻説，對洪、李二人究竟作何處置，還没有確實消息，但他已告訴他的同學，這兩個人確實是爲做買賣，想賺點錢才到那裏去的，請他同學盡可能幫幫忙，放了這兩個人。

這件事使大家吃驚不小，尤其是陳綏圻的母親受不了了。老人年輕守寡，好不容易才帶大了一雙兒女。她整日裏擔驚受怕，吃不下飯，睡不着覺，整夜整夜地坐在床上抽烟，腦子裏胡思亂想，有時甚至胡説八道。眼看着當時可能發生問題，她的精神崩潰了。正在這時候，同樣身懷有孕的黄克誠的妻子唐棣華，也來到了陳綏圻的家中。唐棣華原來是和楊光池的妻子孫紅一起，去了江蘇泰州孫紅的家，這時又從泰州轉來上海。

又過了幾天，陳釬圻回來告訴家裏人説，他的同學告訴他，因爲洪振聲、李毅堅持説自己衹是個商人，去那個地方衹是爲了洽談生意，并不知道對方是些什麽人。敵人從他們的供詞中找不出什麽破綻，又没從他們身上搜出任何東西，别無證據，加上那個同學的周旋，就把他倆放了。洪振聲很快就返回了蘇北根據地，衹有李毅還流落在上海。他已經給了李毅一點錢，叫他自行設法返回蘇北，不要再到我們這裏來了。得到了這個信息，大家才稍微放寬了點心。

不久，陳綏圻的母親接到浙江紹興老家的來信，説是祖母病重，要她回去探望。母親堅持要陳綏圻兄妹二人一起，隨她返回浙江紹興老家。唐棣華、李又蘭等人見到母親身體如此境况，而且形勢也已趨向緩和，雖然李毅仍滯留上海，但估計他還不至于出賣别人，因爲如果真要出賣的話，在獄期間他就這樣做了。因此，她們都勸陳綏圻還是順從母親的意見，隨母親一起回鄉下去，以免她病勢加重。後來大家又商定，陳綏圻和哥哥隨母親回紹興農村，李又蘭也返回寧波老家，剩下唐棣華和汪雲仍住在陳綏圻家中，等候根據地的消息，待敵人"掃蕩"過去後，再設法返回蘇北根據地。

大概是一九四三年五月，陳綏圻一家三口從紹興鄉下重新回到上海，這時唐棣華已返回蘇北，而汪雲却不幸因産後得病，搶救無效，病故在醫院裏。汪雲遺下一女，由一個姓李的老中醫收養。這位李大夫是地下黨員，在上海行醫多年，很有點名望。李大夫有位義女和汪雲相識，因而收養了這個孩子

陳綏圻到上海後，立即去李大夫家看望了汪雲留下的那個女孩。不久，又經過李大夫的關系，跟隨一個經常往返于蘇北和上海之間的商人，回到了蘇北。

陳綏圻回來的那天，我正在司令部開會。聽到她回來的消息，會議一結束，我顧不上吃飯，就匆匆回到政治部。兩人見面，喜出望外，互相叙述離别後的種種情况，真是一言難盡了。

可陳綏圻的母親在經歷那場驚嚇後，得了精神分裂癥，而且一年比一年嚴重。到後來，竟然發展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地步。整天就默默地坐在那裏，一句話也不説，喂她吃飯她就吃一點，不喂她也不知道要，一切都要依靠别人。一旦發病，整天就叨嘮不休，什麽話都説，但不亂動，還是文静的坐在那裏。全國解放後，我們曾把她接到北京，想爲她治治病，但終因久病而醫治無效，于一九五三年病逝了。

十三、再戰韓德勤

一九四三年初，國際國內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盟軍已在歐洲和太平洋戰場轉入反攻，德、日、意已處于不利地位。在這樣的形勢下，蔣介石一方面希望盟軍在迅速戰勝德國以後，能集中力量打敗日本，能很快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另一方面，他也擔心抗日戰爭勝利後，共產黨的力量更加壯大，使他的統治難以爲繼。爲此，他準備發動一次新的反共高潮。

這一年的三月，蔣介石公開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大肆鼓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并把“制造内戰，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的罪名，加在中國共産黨的頭上。同時，他又密令所屬部隊，對中共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進行嚴密封鎖，進行包圍和進剿，力求逐步消滅八路軍和新四軍。

三月上旬，駐華中阜陽、蒙城地區的國民黨第三十一集團軍王仲廉部越過津浦路，東犯淮北抗日根據地。與此同時，在第二次大“掃蕩”期間被日軍逼得無路可走，由我們三師部隊保護退入淮海根據地的國民黨蘇魯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竟然背信弃義，以收復失地爲名，突然率國民黨第八十九軍、獨立第六旅和保安第三縱隊西渡運河，進占淮北根據地的中心區域青陽鎮、山子頭地區，并派第八十九軍趕赴靈壁，接應王仲廉部。

陳毅軍長以大局爲重，派人去直接同韓德勤談判，對他曉以大義，但韓德勤却依然執迷不悟。在這樣的情况下，爲粉碎王仲廉、韓德勤兩部東西對進的圖謀，新四軍軍部當即決定，在王、韓兩部會合前，首先給韓德勤部以堅決打擊，然後再轉移兵力阻止王仲廉部東進。

山子頭戰鬥就是在這樣的情况下進行的。

山子頭戰鬥是在陳毅軍長的親自指揮下進行的。這場戰鬥打得好，打得漂亮，完全是按照中共中央規定的原則“有理、有利、有節”的條件下進行的。

三月十七日，在陳毅軍長的親自指揮下，調集了四師、二師和三師各一部，以四師爲主，開始包圍侵入山子頭地區的韓德勤部隊。我軍各個部隊都是星夜趕到預定地點，作好了一切準備，把敵人包堵得嚴嚴實實。三月十八日晚，隨着陳毅的一聲號令，在炮兵的掩護中，四師、三師及二師發起了總攻。首先是三師七旅十九團突破了敵人的陣地，其它部隊也隨後跟進。經過一夜的戰鬥，山子頭的守敵被全部殲滅。

這次戰鬥，我們俘獲了國民黨蘇魯戰區副司令長官、江蘇省主席韓德勤，從陳道口戰鬥中僥幸跑出來的保安第三縱隊司令王光夏，在這次戰鬥中被我擊斃，還打死了韓部獨立旅旅長李仲。這一次，共消滅韓德勤所部六千多人，繳獲輕、重機槍六十多挺，大炮六門，電臺兩部，以及許多軍用物資。

後來，陳毅軍長遵照中央、中央軍委的命令，釋放了韓德勤，并歸還了部分人槍，共千把人，八、九百支步槍，二十多挺輕、重機槍。同時給了他一塊地方，把靠近日軍據點的睢寧、宿遷地區交由其駐守，并警告他不得再侵犯抗日根據地，敦促他與我們共同抗日。

從此，韓德勤再也没有同我們蘇北、淮北部隊發生過“摩擦”。

十四、屢立戰功的第七旅

《黄克誠回憶録》曾寫道：“第七旅作爲軍部的機動部隊，轉戰蘇北、淮北、淮南等地區，屢立戰功。”

現在我簡略的介紹一下七旅的情况。這是一支什麽部隊呢？

新四軍第三師是新四軍的主力，而第七旅是新四軍主力的主力。作爲蘇北抗日根據地的機動部隊，它是三師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有時候由師的[illegible]部直接指揮。

七旅是一支有着光榮革命傳統和卓越戰功的老部隊。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在井岡山時期，它是"朱毛紅軍"的第二十八團，當時的團長是林彪。一九三〇年下井岡山以後，部隊擴大，編爲紅一方面軍的一軍團，林彪升任爲軍團長，聶榮臻任政委，二十八團編爲一軍團第二師第四團。這以後，它都始終是紅一方面軍的主力團。紅軍長征時，搶渡烏江，打臘子口的，就是這個第四團。當時的團長是王開湘，政委是楊成武。紅軍改編爲八路軍的時候，包括紅四團的整個紅二師改編爲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三旅六八五團。平型關戰役後，到一九三九年進入蘇魯豫邊區後，改爲蘇魯豫支隊。皖南事變後，改編爲新四軍第三師第七旅。

進入蘇北以後，七旅在蘇北、淮北、淮南進行過許多戰鬥，爲蘇北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除前面已經提到的及後面將要提到的阜寧、兩淮戰役等戰役以外，還有以下一些較大的戰鬥：

一、八月十五，中秋夜戰馬圩

馬圩位于隴海路沿綫的邳縣之東，是漢奸馬坤的據點。馬坤經常配合日軍到我們根據地裏來"掃蕩"，瘋狂欺壓人民。群衆都非常痛恨他，當時有首歌謡："天上烏雲漢奸心，豺狼本性要害人，不滅日軍和漢奸，窮人日子難翻身"。

一九四三年的農歷八月十五，當馬坤正和他的三個姨太太飲酒賞月，歡度中秋，匪兵們也都在大吃大喝，許多人喝得酩酊大醉時，七旅二十團經遠距離奔襲，突然包圍了馬圩。在團長王東保、政委宋維軾、參謀長彭飛的指揮下，不到兩個小時，就攻下了敵人的四個炮樓。這時，馬坤退入到圩子中最高的一個炮樓裏，拼死頑抗，死不投降。他憑借着制高點，用機槍向進攻部隊進行猛烈掃射，打死打傷我不少同志。眼看離天亮衹有兩個多小時了，馬坤據守的那個炮樓還是打不下來。

彭飛參謀長命令三營組織了一個爆破組，組長王二保、戰士李啓全在我火力的掩護下，帶着彈藥包，爬到了敵人的炮樓下，李啓全同志用自己的身體和竹竿頂着炸藥包，拉響了導火綫。隨

着一聲巨響，敵人的炮樓被炸了一個大口子。乘着烟霧瀰漫的機會，戰士們很快登上雲梯，衝進了炮樓，當場擊斃了馬坤。

但王二保、李啓全兩同志也壯烈地犧牲了。由于我們在政治工作上的缺點，對烈士的英雄業績宣傳不够，烈士的英名没能得到相應的褒獎和傳揚，幾乎被煙没了，這使我們深感遺憾。

二、保安山，打得敵頑團團轉。

一九四四年十月，國民黨頑軍王毓文、陳夢洲率兵近四萬人，向新四軍四師部隊駐地發動襲擊，企圖消滅四師部隊。

由于四師師長彭雪楓這年夏天在河南夏邑縣與日僞軍的戰鬥中不幸犧牲，爲統一作戰指揮，軍部命令成立臨時指揮部，任命七旅旅長彭明治爲前綫指揮，九旅政委韋國清爲前綫政委，統一指揮三師七旅、四師九旅和山東部隊王秉璋旅的五十二團迎敵作戰。

我七旅部隊奉軍部命令，一路急行軍趕往指定地點保安山，支援四師。部隊剛剛到達保安山準備宿營，敵人的炮火就連珠般地向我襲來。面對敵人的猛烈炮火，七旅一面組織部隊堅守陣地，一面組織飛虎隊，抽調能打善戰的戰士八十餘人，每人配備一支衝鋒槍、一把大馬刀、四枚手榴彈，并配備了兩挺機槍、兩個擲彈筒。飛虎隊由一名連長帶領，趁黑夜一直衝到敵人的軍部附近。一個班長抓住了敵人的一個哨兵，逼問出了敵軍部的所在地和當晚的口令，然後就直奔敵人軍部。他們先是用擲彈筒和手榴彈向敵襲擊，再用機槍和衝鋒槍猛射。這一出奇不意的襲擊，打得敵人暈頭轉向，敵人當官的就乘馬逃走。這一跑，敵人軍心立刻動摇，那些當兵的也紛紛逃跑。

偷襲成功後，帶隊的連長按照事前的約定，下令點燃三堆大火，向指揮部報告。指揮部看到信號，立即命令七旅、九旅和山東王秉璋部全綫出擊。一時間，衝鋒號四起，各部隊乘勝追擊，一直打到了蒙城、龍山集等地，共消滅頑軍兩個師，繳獲了不少軍用物資，取得了這次反擊戰的勝利。

這次反擊戰後不久，華中局和軍部就下令，調三師副師長張

愛萍接任了四師師長。

三、支援二師，淮南反頑戰鬥。

一九四五年四月間，爲支援二師的反頑鬥争，七旅來到安徽省的懷遠、蚌埠、鳳陽、定遠一帶。根據軍部的决定，由二師四旅、五旅和三師七旅統一成立一個臨時指揮部，由二師政委譚震林、七旅旅長彭明治分任正、副指揮。

當時，駐在淮南津浦路西的國民黨桂系部隊的一七二師、一七一師，在一七二師師長李本一、一七一師師長曹茂琮的率領下，分兩路向新四軍二師攻來。爲鼓舞士氣，一七二師師長李本一竟抬着棺材上陣，口口聲聲要與新四軍决一死戰。擔任正面阻擊的七旅十九團、二十團，在站鷄崗拼死迎戰，并取得了首戰勝利。

接着，七旅部隊又在黄疃廟一帶，包圍了一七一師的兩個團。一七一師師長曹茂琮效法李本一，也命令士兵抬着棺材上了陣。衹見黑漆漆的棺材兩邊，寫着“不成功，便成仁”的碗口大白字。曹茂琮還叫嚣，“不消滅共産黨誓不回還”。曹茂琮親自上陣督戰和指揮，還親手槍斃了一個身負重傷的團長。敵人組織起强攻隊，在二十多挺機槍的掩護下，向七旅的陣地猛撲過來。七旅沉着應戰，向敵人反衝過去，與敵人拼開了刺刀，白刃格鬥，刀光閃閃，敵人一下就垮了。戰到最後，曹茂琮既没有成功，也没有成仁，扔下棺材就跑了。

打掃戰場時，發現被曹茂琮槍斃的是五二七團團長莫春灘。從他的尸體上，搜出了一本“陣地日記”。日記中有四句話，寫的是：“站鷄崗，多傷悲，壯士衝鋒不見歸，千軍萬馬無退路，北上剩共幾人回？”

七旅這次配合二師，在淮南津浦路西打擊國民黨廣西部隊，兩次戰鬥都取得了勝利。爲此，華中局、新四軍軍部給他們發了嘉獎電。

七旅是個有光榮歷史的部隊，從井岡山到紅一軍團，到八路軍一一五師，再到新四軍三師，幾乎每一次參戰都起了重要的作

用。所以寫上這些，主要就是想多記載下七旅的一些活動。

十五、攻克阜寧城

一九四四年，日軍在太平洋戰争中連續失利，敗局已定。

十二月十五日，毛澤東主席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發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務》的講話。他要求全軍在一九四五年裏開展攻勢作戰，把一切守備薄弱，在我們現有條件能够攻克的淪陷區，全部化爲解放區，迫使敵人處于極端狹窄的城市與交通要道之中，等到各方面條件成熟後，就將敵人完全驅逐出去。

之後，黄克誠師長兼政委，幾次召集會議，研究貫徹落實毛澤東的指示。正好，當時國民黨在冀魯豫邊區的孫良誠率部投降日本，被編爲僞第二方面軍，孫良誠被委任爲總司令，張綬蘁爲副總司令，下編兩個軍，第五軍軍長爲王清翰，第四軍軍長爲趙雲祥。一九四四年底，他們從冀魯豫邊區出發，沿隴海路東進，到達了東海邊，并在新安鎮、灌雲一綫集結。隨即，再經響水口、東坎、阜寧、上岡到達鹽城。之後，第二方面軍孫良誠司令部以及四軍軍部駐鹽城，第五軍王清翰部駐在阜寧，周圍都没有據點。

這時，我們蘇北鹽阜、淮海根據地的軍民，以臨戰姿態，監視着敵人的一舉一動，原準備在敵人的前進途中，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但由于敵人采取密集隊形推進，隊伍聚集在一起，不好打而作罷。

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我們終于趁敵人在蘇北地區立足未穩，南下隊伍前面緊密，後面疏鬆之時，打了他們的尾部，一到三月份消滅了他們一千二百多人，解放了灌河以北的廣大地區。這些地方人口都比較稠密，這一地區的解放，使根據地一下子就增加了近百萬人口。

三、四月間，日本侵華軍和南京汪精衛僞政權爲加强長江下游的防務，再次收縮兵力，把阜寧、東坎等地區的日軍全部調走。這樣一來，阜寧及城北各據點的守軍，就衹剩下了王清翰軍的五個團，約三千四百多人。

黃克誠決心抓住這個戰機，利用日僞軍交替防務的大好機會，攻克阜寧城。他立即在師部所住的阜寧與淮安、漣水邊界地區的孫老莊，召開了新四軍第三師兼蘇北軍區黨委會，參加會議的有洪學智、我，以及十旅旅長兼淮海軍分區司令員劉震，十旅政委金明、吳信泉，八旅旅長張天雲、政委李雪三，還有師司令部的參謀處長沈啓賢。會上，大家一致認爲，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全國各抗日根據地都已經開始了奪取能够奪取的城市的行動，我們也應當立即開始行動。接着，大家分析了鹽阜區的形勢，認爲在鹽阜區，比較好打的是阜寧，原因是孫良誠部的主力已全部南下了鹽城，阜寧城比較孤立，北面已經没有可以增援的部隊，從鹽城到阜寧的一百二十里路中間，也没有什麽敵人的隊伍，加上目前日僞正在交接換防，因此打阜寧是最有利的，比較有把握的。于是會議决定，攻打阜寧城。

目標選定以後，要研究的就是攻打阜寧城的具體部署。當時七旅已歸軍部直接指揮，到淮南津浦路西支援二師反頑鬥争去了。所以會上大家一致同意，集中八旅全部、十旅主力、師特務團以及阜寧獨立團、阜東獨立團、鹽城獨立團、射陽獨立團、建陽獨立團，共十一個團的兵力，發起阜寧戰役。

阜寧城地處射陽河邊，城南就是射陽河。阜寧城外，主要是東面，西面和西北面都設有許多大小據點。鑒于這種情况，會議又决定，以八旅全部和十旅主力先攻取阜寧城北的外圍據點，并以主力一部阻擊向阜寧增援之敵；攻擊據點時以東坎的馬路爲界，馬路以東由十旅負責，馬路以西由八旅負責。同時，以師特務團爲主，加上阜寧獨立團和射陽獨立團，將這三個團部署在川場河的兩岸，阻擊鹽城或蘇中可能向阜寧增援之敵，或截擊阜寧可能南逃之敵；再將阜東獨立團、建陽獨立團和鹽城獨立團，分

別部署在阜寧城以西、湖垛以北、魯公祠、新興場以東，牽制各處敵軍的行動。

以上就是當時在師部决定的阜寧戰役的整個部署。

阜寧戰役從四月二十日、二十一日開始，參戰部隊分别向阜寧城以北、以西及東北方向開進。師部直屬隊也于四月二十一日從孫老莊出發，經過三天的急行軍，于四月二十三日黃昏進入頭竈以西的張家灣，并在張家灣成立了臨時指揮所。

臨出發的前一天，黃克誠在上厠所時不慎摔了一跤，腰部受傷不能行動，是用擔架把他抬進指揮所的。他一面接受師衛生部長吳之理的治療，一面指揮戰鬥。

這時，八旅已進到了阜寧的西北地區，十旅也已進到了阜寧以北及東北地區。在四月二十三日這一整個白天，十旅的劉震、吳信泉，八旅的張天雲、李雪三，以及各旅的參謀長、偵察人員，加上各團、營的幹部，都在按照師裏的規定，對自己所負責的各自作戰目標，進行偵察，選擇突破口、前進路綫和火力陣地，準備各種攻堅器材、爆破炸藥等。到二十三日黃昏時，統統作好了準備。

師特務團團長黃勵華負責指揮的阜寧、射陽獨立團及其它三個獨立團，也各自進入了自己的指定位置，隱蔽集結待命。部隊所在的地區，由民兵、地方武裝封鎖消息，滴水不漏，不使敵人發現我們大部隊的行踪。

四月二十四日黃昏，黃克誠發布攻擊令。黃克誠、洪學智、我及沈啓賢這時都在張家灣作戰指揮所裏，緊張地等待着戰鬥的開始。

午夜時分，先後，或者説，幾乎是同時，各部隊開始攻擊各個據點：八旅主力在張天雲、李雪三的指揮下，以二十二團猛攻頭竈、七竈、張莊等據點；十旅主力在劉震、吳信泉的指揮下，攻擊阜寧以北的大孤莊和小孤莊兩個據點，并以十旅主力一部，進到小孤莊以南地區，準備打擊從阜寧出來增援的部隊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旅和十旅先後順利解决了戰鬥，據點

裏的敵人被全部消滅掉，沒有跑掉一個。

在攻擊各個據點的戰鬥正緊張進行時，駐阜寧的僞第五軍軍長王清翰沉不住氣了，他于四月二十五日拂曉時分，率領兩個團分三路拼命前進，增援大、小孤莊。但這時大、小孤莊的戰鬥已經結束。十旅二十八團，在團長鐘偉的指揮下，又回過頭來猛攻王清翰帶來增援的兩個團。敵人支持不住，立即向阜寧城潰退。十旅二十八團和二十九團見狀，乘機向潰退的敵人發起猛攻，尾追敵人進了城，與敵人展開巷戰。這時，掃清了阜寧西北敵人據點的八旅二十二團、二十四團，同時也從張莊向阜寧城發起了攻擊，占領了阜寧城北門外壕兩側的據點和炮樓。不久，也攻入了城內。十旅和八旅部隊各自按照劃分的攻擊區域，一個街道一個街道地攻擊前進。

這個時候，黃克誠、洪學智、我及沈啓賢，還有司令部各科室的人員，也前進至張莊指揮攻城作戰。上述四個團，就是按照黃克誠的命令，在阜寧城與敵人展開了激烈的巷戰。

四月二十五日晚，王清翰乘雙方在城中混戰之際，令人在阜寧城的南邊架起浮橋，率部分殘敵渡過射陽河，向鹽城方向逃跑。但橋小人多，逃跑的敵人一下子過不去，我二十八團很快就攻到了浮橋邊，堵住了敵人的退路，敵人跑不了了。隨即，二十八團與二十九團會合在了一起。至此，阜寧城全部被包圍。我們這時是戰鬥攻勢和政治攻勢同時進行，通過喊話，要被包圍的敵人放下武器，出來投降。結果，大部分敵人都繳械投降了。

洪學智和我提出要到城裏去看一看，黃克誠批準了，同意我們去城裏，要我們看實際情況實施指揮。結果我們進城後，八旅和十旅的部隊已經會合，戰鬥基本解決。我們見到了二十二團和二十八團的團長、政委，他們報告說，戰鬥已經結束，殘餘的敵人由一個副師長帶領，已放下武器投降了，正在集合聽命。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阜寧城内的戰鬥全部結束，我們勝利完成了攻取阜寧城的任務。

王清翰所率的南逃隊伍，也在川場河兩岸被黃勵華所指揮的

三師特務團和阜寧獨立團、射陽獨立團堵截。一場混戰，又俘敵八百多人。我們自己的傷亡很小，但繳獲很大。可惜的是，最後王清翰還是帶一部分人跑掉了。這樣，堵截敵人南逃的戰鬥也結束了。

阜寧戰役從四月二十四日開始，到二十六日結束，共歷時三天。我們斃傷敵人四百人左右，俘敵副師長以下兩千二百多人，攻克阜寧縣城及外圍據點二十二處，給孫良城部僞軍以沉重的打擊，不僅擴大了蘇北根據地，切斷了南通至贛渝這條連結蘇北與蘇中的重要公路，而且爲即將開始的大反攻積累了寶貴的攻堅經驗。

攻克阜寧以後，從四月二十七日開始，師前指及八旅、十旅的參戰部隊集結于東溝、益林、羊寨、周門、甸湖一綫，以一星期的時間，進行休息、整頓和總結。這次戰鬥總結，先是八旅、十旅分別開會，然後再集中到師裏開會，共同總結阜寧作戰的經驗教訓。

總結阜寧戰役的勝利經驗，我認爲主要有以下一些：

第一、戰前計劃周密，部署得當，準備充分細致，這是最重要的一條。所有的軍事幹部都仔細看過地形，都了解自己所擔任的任務，都組織部隊進行了充分細致的準備。

第二、突破點選擇正確。我們先打阜寧城以北的據點，如張莊、大、小孤莊等。這些據點大都築有堅固的工事，守備的部隊也比較强，都是防護阜寧城的要害。我們一打，敵人就會從城裏出來拼死增援。我們剛打下據點，敵人就來增援，我們乘機入了城，減少了攻城這道步驟。這樣，戰鬥結束得很快，也減少了我們的傷亡。

第三、主力部隊和地方部隊配合作戰，充分發揮地方部隊的作用。這次攻打阜寧城，把五個獨立團和師的特務團全部用上去了，牽制和截擊了阜寧南逃之敵，這一着布置得好，最終使敵人沒能全部退走，擴大了阜寧戰鬥的勝利。戰後，有一次黃克誠對洪學智和我說，把師特務團放到射陽河以東是有點冒險，因爲這

樣一來，我們手頭就没有了一點機動兵力。但不這樣做又不行，總得有足够的兵力，才能堵截南逃之敵呀！當時如果有足够的兵力擔任打援和堵截任務的話，王清翰就跑不了了。

第四，對孫良誠部隊的政治攻勢和瓦解工作做得好。自孫良誠部南下以後，我們就專門開展了針對孫良誠部的政治攻勢。他們的士兵以冀魯豫邊區的北方人居多，我們三師也是北方人多。我們就通過各種關系，利用老鄉關系去做孫部僞軍的工作，散發傳單、寫聯絡信，以及用小孔明燈，通過射陽河，由上而下，使之飄到阜寧城裏去，向阜寧城發出各種宣傳品。我們在宣傳品中指出，他們原來是國民黨的部隊，現在却向日本人投降，當了漢奸，這是多麽可耻的事情，希望他們能回頭是岸，弃暗投明，千萬不能跟着賣國賊汪精衛走絶路。在阜寧戰役進行之中，我們又組織政工人員，向他們喊口號，要求他們過來談判。這樣才使得被圍敵軍在走投無路的情况下，向我們繳械投降，從而使我們以最小的代價，取得了較大的勝利。

自蘇北根據地創建以來，淮海、鹽阜兩區的部隊共同作戰，打這麽大的戰鬥，還是第一次。因此，兩個地區的部隊勝利會師後，大家交流作戰經驗，互相學習，互相幫助，親熱得不得了。許多幹部好久都不在一起了，這次見了面，都很高興，互相來往訪問。這次相互配合作戰，加强了淮海、鹽阜兩區部隊的團結和戰鬥友誼。

阜寧戰役中的地方支援和配合工作也做得很好。戰前他們封鎖消息、準備糧草。戰役剛一結束，鹽阜區的黨政部門和群衆就殺猪宰羊，送來了各種慰問品，慰問參戰的各主力部隊和各獨立團，以及在戰鬥中負傷的傷員們。

淮海、鹽阜兩支部隊會師不久，我們就集中師政治部的全部力量，在東溝以北召開了一個幾萬人的祝捷大會。這個大會由我主持，黄克誠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淮海地委書記金明，十旅旅長劉震、政委吴信泉，鹽阜地委書記劉彬、行署主任曹荻秋、八旅旅長張天雲、政委李雪三等，也都在會上講了話。會議結束後，

十旅和八旅的文工團還分别給部隊、群衆演出了節目。這次祝捷大會對部隊和群衆的鼓舞很大。

阜寧是我們在蘇北地區從敵人手中解放出來的第一座縣城。這次戰役打得比較順利、漂亮，是我們新四軍第三師在蘇北所進行的一個比較大的戰役，僅次于以後的兩淮（淮陰和淮安）戰役。

十六、兩淮戰役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國政府在波茨坦發表公告，敦促日本立即無條件投降。八月六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九日，又在日本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八月八日，蘇聯對日宣戰，并宣布參加《波茨坦公告》。九日，蘇聯紅軍一百五十萬人，從北、東、西三個方向分多路突破日軍防綫，進入中國東北境内，向六十七萬日本關東軍展開全面進攻。

八月九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對蘇聯宣戰一事發表聲明，表示中國人民熱烈歡迎蘇聯的對日宣戰，認爲這樣一來，抗日戰争的時間已大大縮短。他號召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于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殲滅這些敵人的力量，猛烈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

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也于八月十日和十一日，連續發布延安總部第一至第七號命令，要求各解放區抗日武裝部隊根據《波茨坦公告》規定，向附近各城鎮及交通要道上的敵人送出通牒，限他們在一定時間内繳出全部武器，否則予以堅决消滅。

當時延安有個部署，主張南進。中央的命令是，由粟裕率領的新四軍一師打前陣，華中二十萬大軍隨後跟進，向南京及其以西地區前進，把上海甩在後頭。

根據中央的决定，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命令我們三師部隊除

留十旅仍駐蘇北以外，七旅、八旅部隊全部西調，集結于津浦路西，會同二師部隊，準備向蚌埠以南的明港、浦口、南京方向前進，并準備阻擊國民黨桂系李品仙部的東犯。此時，一師部隊也已到達了南京與杭州之間的天目山。

這時，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在淮南的"整風"還没有結束，華中局所屬各地區的區黨委書記和新四軍各師的師長、政委，都在盱眙縣黄花塘開會。由于形勢變化，會議正準備結束，這時發生了一個小問題，臨時把洪學智、劉震、劉彬和我等幾個人都從各自的駐地叫到了黄花塘。

接到華中局通知的當時，我和洪學智都住益林以南的南窑，我們立即騎馬出發，到落馬湖改乘帆船去黄花塘。臨出發前，突然又接到中央的一個命令，要新四軍二十萬部隊停止西進，命令三師部隊首先向東肅清敵僞各據點。

就在開往黄花塘的船上，洪學智和我交談，商量怎樣貫徹中央要三師東進的指示。洪學智説："現在部隊不向西了，我們幹啥？"我説："目標衹有兩個，淮陰和淮安，這就是我們的任務了。"洪學智表示同意："對，那就打淮陰和淮安。"我又説："如果兩淮没有打下來，我們再往前走，敵人就是在我們的屁股後面，會給我們造成後顧之憂。"當然，這些我們都是閑扯，到底打不打淮陰和淮安，最後下決心的是華中局、軍部和黄克誠。

我們到達黄花塘以後，才知道是讓我們來對質。原來是韓先楚向中央告了黄克誠一狀，説黄克誠在搞宗派主義。韓先楚的電報從延安轉到了華中局。爲證實黄克誠究竟搞没搞宗派主義，華中局就把我們都調到了黄花塘。

看了中央給華中局的電報，我們一致認爲，黄克誠爲人非常正派，他是不會搞宗派主義的。然後，由我們七個人（金明、李一氓、曹荻秋、劉彬、洪學智、劉震和我）聯名向延安發了電報，説清楚了這個問題。

接着，黄克誠同洪學智和我一起商量部隊的下一步行動。我們向黄克誠談了先打兩淮的意見。他同意我們的意見，并立即向

華中局和軍部作了報告。

當晚，華中局書記饒漱石、新四軍副軍長張雲逸召集黄克誠、洪學智、我和劉震談話，宣布華中局的決定，先打淮陰和淮安，任務由三師執行。他們還説，淮陰打開以後，華中局和軍部立即就過去。

由于華中局"整風"没有結束，黄克誠一時還不能離開黄花塘。談完話以後，他就對洪學智和我説："麻子（指洪學智）、胖子（指我），你們先走，先去淮陰前綫指揮。我在這裏連夜發報，下達命令，把隊伍調集起來。七旅、八旅已經西去，來不及趕回，先調十旅圍淮陰，調鹽阜各獨立團圍淮安。先圍起來，等你們趕到以後，再作具體部署。"

自從彭雄犧牲，張愛萍調四師以後，三師師部就衹剩下了師長兼政委黄克誠、參謀長洪學智和我這個政治部主任。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親密無間。當時，我們都尊稱黄克誠爲"老頭子"。又因爲他的眼睛高度近視，所以有時我們也戲稱他爲"黄瞎子"。黄克誠則稱洪學智爲"麻子"，稱我爲"胖子"。那時，我們從不介意這樣的稱呼，反而覺得備感親切。

我是政治部主任，按照習慣，是不指揮隊伍的。由于黄克誠一時還不能離開黄花塘，因此，黄克誠在八月二十二日從軍部所發的電報上明文規定，兩淮戰役由洪學智、吴法憲統一指揮。

按照黄克誠的意見，第二天一早，爲争取時間，我和洪學智兩人衹跟黄克誠打了一個招呼，就騎馬離開了黄花塘。中午過了蘭山河，到了蔣壩，接着又過了落馬湖，第三天就趕到了淮陰城南的一個叫作十里長街的村莊，决定立即調師部、政治部機關連夜前來。

當時，師部已經按照黄克誠發出的命令到達了指定位置，住在淮陰南面的一個小村子裏，離淮陰城衹有七、八里路。鑒于任務非常緊急，師部各機關趕來後，我們就馬不停蹄地部署攻打淮陰和淮安的行動，生怕敵人向南逃跑了。

當天晚上，洪學智和我先聽取了李新宇、王扶之、何凌登等

師部幾個參謀的匯報，他們主要是講哪些隊伍已經到達指定地點，哪些隊伍還沒有到。我們還了解到，負責圍城的十旅部隊已經出動，但還沒有完全形成包圍圈。

在黃花塘時就定下了，打淮陰由十旅負責主攻。十旅旅長劉震爲急于趕回部隊，執行任務，比洪學智和我早一天離開了淮南，待我們趕到淮陰時，十旅已大體完成了對淮陰的包圍。當時劉震率十旅指揮部駐王營，在淮陰城北，洪學智和我率師部駐十里長街，離運河南面的閘不到十里路，由于要指揮打仗，在攻打兩淮期間，我一直沒有回政治部去。那些日子，洪學智和我住在一起，我們兩人形影不離。我們準備讓部隊從東南、西北兩面夾擊淮陰，然後到城裏會合。

次日清早，洪學智和我就帶着司令部的一些人，騎上馬先去前面看看，看究竟是哪些地方已經包圍好了，哪些地方還沒有完成包圍。結果發現，淮陰和淮安之間的聯系還沒有被完全截斷，還有敵人在那裏活動。由于鍾偉率領的十旅二十八團和特務團和我們靠得近，回到師部以後，我們就向二十八團團長鍾偉下達命令，要他們負責截斷運河，截斷兩淮之間的這一通道。

晚上，我們約劉震和鍾偉來十里長街會面，互相交換一些情況。然後，洪學智急着要去偵察地形。我說："隊伍已經把淮陰包圍起來了，慌什麽，睡會覺，第二天再去吧！"

我們就一覺睡到了天亮，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發去看地形。我們先到南面去看了一會，主要是考慮怎麽打。回來以後，我們召集了劉震、吳信泉以及二十八團、二十九團、三十團、師特務團的團長、政委開會，由洪學智主持，研究和部署怎麽打淮陰。

會後，按照分工，劉震他們從王營出發，再次偵察淮陰西北部的敵情和地形；洪學智和我負責再次偵察東南部的情况。兩路偵察回來，我們又一起開會，互相通報偵察結果。經過偵察，大家對敵情和地形已搞得清清楚楚，哪裏好攻，哪裏不好攻，都心中有數，所以會上的意見都趨向一致，基本上沒有什麽不同的意

見。

因攻打淮陰主要由十旅負責，所以洪學智要劉震先提出攻打淮陰的具體計劃。劉震提出來以後，大家基本上都同意了這個計劃。

會後三、四天時間裏，各部隊作攻城的準備，主要是做工事、挖坑道，做梯子，搞土炸藥等等。等到準備工作基本就緒以後，我們又召集一次會議，進行了檢查。

在第二次看地形回來的途中，洪學智下了馬，牽着馬，和我并肩走在一起。洪學智對我說："胖子，你看是不是用政治部的名義，出個布告，安定一下民心。" 我答應道："你說得有道理，我贊成搞一個，但是不要用政治部的名義，要用新四軍第三師兼蘇北軍區司令部、政治部的名義。"

洪學智說，"那好，加上司令部的名義好。" 這件事情本來應先請示黃克誠，可是當時情况緊急，我們就先辦了。

晚上，我們兩人就你一條我一條地湊起來了。湊完告示的主要内容以後，找誰寫呢？我們就找來了司令部的通訊參謀李新宇。我們告訴他，要搞個布告。你把意思記一記，再整理一下。布告的大意是：

一、本師和軍區部隊奉命進攻淮陰、淮安，消滅日寇、汪僞，目的是解放淮陰、淮安人民，徹底殲滅日僞。

二、本軍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三、保護人民，除日僞外，其他城市人民一律受保護。

四、執行黨的城市政策，保護工商業，各行各業照常開工、營業。

五、作戰期間，實行戒嚴，以維持秩序，防止壞人、漢奸搗亂，搞好治安。

六、收繳一切槍支，號召人民檢舉揭發敵、僞漢奸。

七、兩淮的政權，由蘇北行署（主任李一氓，副主任曹荻秋）接管。

八、淮陰屬淮海區，淮安屬鹽阜區。

九、照章納稅（當時運河上往來的船隻裝載豬、鹽的很多，主要是鹽，鹽稅的收入所占比重很大）

十、鄉下的農民，進城捉拿漢奸，要經過兩淮政府的批準（那時漢奸跑進城的很多，如果都來，豈不是搞亂了。）

李新宇寫完以後，洪學智和我又改了一遍，然後交由當時的文印股張學讓、許光華他們刻印。這個布告很重要，因爲打完仗後，要按政策辦事。安民布告大概就這十條。

對了，還有一條，布告裏明確規定要保護寺廟，保護歷史文物。淮安縣有個湖心寺，是很大的一個廟宇，在當地很有名。以後黃克誠、洪學智和我都去參觀過，還見了湖心寺的方丈。這個方丈和我們有點關系。當時的保衛部長周彬反映，他曾給我們提供過情報。

在攻城的前一天，我們趕印了一些布告，準備進城後張貼。

八月二十八日，各部隊開始肅清外圍。經過三天的戰鬥，外圍敵人的各個據點全部被我們肅清。

九月二日下午二時，總攻開始。戰鬥打響後，洪學智和我就到了南頭。這時，二十八團的隊伍已向前推進了五、六百米。團長鐘偉的準備工作做得很充分，他找了一口大棺材，裏面填滿了黑色的炸藥。然後，二十八團用這口大棺材，在淮陰城的東南角炸了一個大洞。爆炸聲剛停，二十八團就從洞裏衝進了淮陰城。與此同時，王營那邊的進攻部隊也從西邊衝進了淮陰城。

戰鬥進行得很順利，到下午三、四點鐘，就基本解決了戰鬥。我們衹用了一個多小時，就攻占了蘇北的歷史名城一淮陰縣城。我記得，那一天是個陰天，没有太陽，還下了點小雨。

這一仗，我們共殲敵約九千人，并擊斃了僞二十八師師長潘幹臣。潘幹臣有一個小舅子，是從妓女院裏搜出來的，在押送途中，跳進護城河自殺了。

在攻打淮陰前，我們曾想爭取潘幹臣起義。當時寶應縣的一個縣長（名字我忘了）是咱們的人，和潘幹臣認識，兩個人是同學關系。我們把這個縣長調來了，讓他設法進城去見潘幹臣，做些工作，結果潘幹臣天天説要見，但始終没有見他。衹讓一個參謀長天天陪他去喝酒。後來就把這個縣長抓起來了，關在監獄裏，把他打得要死。打開淮陰以後，我們才把他從監獄裏救了出來。

攻克淮陰以後，三師政治部曾編了一個反映淮陰戰鬥全過程的話劇。其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在戰鬥打響以前，我們派了一個菜農張老漢去淮陰城送最後通牒，但潘幹臣却把他殺了。這件事，引起了人民的義憤。劇中的這個情節，就是根據這件事改編的。

由于鐘偉及其所領導的二十八團在攻克淮陰的戰鬥中表現突出，戰鬥結束後，黃克誠、洪學智和我三人聯名簽署，發出了一個嘉獎令予以鼓勵。

打開淮陰之後，洪學智就把鹽阜軍分區司令員謝祥軍、政委楊光池叫到了師部，當面交待要他們繼續調動分區的部隊南下，加强對淮安的包圍，等八旅、七旅的部隊回來擔任主攻。

原來準備二十日開始攻打淮安，因爲黃克誠師長還没有回來，他來電指示要等七旅到了以後，再主攻淮安，因此又等了兩天。這時，八旅的隊伍西進没有走成，回來了。七旅的隊伍在津浦路西和廣西李品仙部打了一仗以後，緊接着也回到了蘇北。

到八月二十二日，正好黃克誠也從黃花塘趕了回來，就馬上親自指揮這場戰鬥。他在師部作了一個簡短的動員，我們就分批出發。洪學智和我隨同黃克誠一起，來到設在淮安北面裏夏河的師指揮所指揮戰鬥。

參加攻打淮安的部隊是七旅、八旅，以及射陽獨立團和鹽阜獨立團。攻城的具體計劃由八旅旅長張天雲和七旅副旅長胡炳雲負責實施指揮，當時七旅旅長彭明治因肺病休息，七旅暫由胡炳雲負責。

黃克誠一發起攻擊令，八旅就從靠近運河的西南接近淮安城。他們用預先運去的重磅炸彈，將西南城牆炸開一個大缺门，

然後部隊立即從這個缺口中涌入城内，迅速排除各種障礙，全面發起攻擊。

七旅則是從城東南和南面突破敵人城墻的一綫防御的。發起總攻前，七旅已將工事推進到了城下護城河邊。然後，他們用麻袋裝上河沙，在護城河邊構築起比城墻還要高的碉堡，并且還占領了一座高塔。總攻一開始，七旅在碉堡和高塔上集中了幾十挺輕、重機槍，對着早已選好的突破口進行猛烈射擊，一下子就把敵人的火力全部壓住。趁此機會，突擊隊奮勇登城，衹幾分鐘的時間，就把敵人的防綫突破了一個大口子。七旅部隊順城而下，把敵人打得四處逃竄，潰不成軍。

激烈的戰鬥衹進行了兩個來小時，淮安守敵就被我們全部殲滅，共俘獲敵人五千多。至此，兩淮戰役全部勝利結束。

整個兩淮戰役，我們新四軍三師以極小的代價，取得了殲滅僞軍近一萬四千人的重大勝利。這是自我們三師成立以來，在對日僞作戰中所獲得的最大一次勝利，也可以算是我們在抗日戰爭中對日僞打的最後一仗。

淮陰、淮安是蘇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蘇北地區重要水陸交通樞紐和重鎮。當年兩淮被日軍侵占後，曾成爲分割蘇北、蘇中、淮南、淮北四個抗日根據地聯系的一個大釘子。當時決定拿下兩淮，考慮的不僅是三師的問題，還關系到一師、二師和四師。拿下兩淮，整個津浦路以東就聯成了一片，我們就控制了北起隴海路，南至興化的五百公里的運河綫，使華中解放區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這就是當時攻克兩淮的重大戰略意義。

在結束這一章之前，我還想就三師再説幾句。新四軍第三師自一九四一年初成立至抗戰勝利的五年中，共作戰五千餘次，殲敵六萬餘人，自己傷亡一萬餘人，部隊由二萬餘人發展到七萬餘人（包括主力和地方部隊），開辟了擁有四万平方公裏土地和八百多萬人口的解放區。除完成蘇北戰鬥任務外，第三師還先後調兩個團（淮安大隊和二十三團）、一個獨立旅（後又歸建）支援山東和皖江地區作戰。師主力第七旅作爲軍部機動部隊，曾轉戰

蘇北、淮北、淮南等地區，屢立戰功。

這一點，也得到了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的認同。當時華中局曾向中共中央報告説：“三師的戰鬥力較强，部隊充實，基本上保持了過去優良的作風和制度，尤以政治工作能深入與反映部隊的問題，保證一切、每一號召能很快地動員起來，自上而下地去推動執行。”

就像黄克誠在自己的回憶録中所説的那樣，在堅苦的抗戰歲月裏，新四軍第三師就是以這種艱苦奮鬥、英勇頑强的作風，打敗敵人，創建了蘇北根據地，與蘇北廣大的人民群衆結下了深厚的魚水之情。[7] 可以説，新四軍第三師爲蘇北、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爲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7] 見黄克誠回憶録第六章３２１—３２２頁　編者注

第七章 解放戰爭（一）激戰東北

一、進軍東北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打下淮安後的第二天下午，中央就來了命令，要黃克誠率新四軍第三師去東北，部隊要編足三萬五千人，十月一日出發，十月十日到達山東蒙陰地區待命。

東北歷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早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關于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時，就說明了爭取東北的重大意義。他說："東北四省極重要，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之下。有了東北四省，我們即有了勝利的基礎。" 他又向全黨說明，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和將來的前途看，如果我們把現在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衹要我們有了東北，那末，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毛澤東的話真是一言九鼎。

事實上也是如此。東北物產豐富，松遼平原是我國最大的糧食產地之一，大、小興安嶺和長白山的森林面積廣闊，覆蓋面積超過內地的總和，各種礦藏儲量豐富，很多都是全國之最。而且東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要地，國共雙方誰擁有了它，誰就可能在未來的角逐中有勝算的把握。

從當時的情況看，我軍挺進東北，極其有利。當時蘇聯出兵東北，日本關東軍迅速潰敗，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接受無條件投降，蔣介石的精銳大軍還窩在西南，美械裝備的主力尚在緬甸，一時來不及去填補東北這塊在蘇軍撤退後留下的真空地帶。這就使我軍挺進東北奪取東北這一戰略要地成爲可能。

于是，就在慶祝抗日戰爭勝利的歡呼聲中，以中國共產黨爲一方，和以蔣介石爲一方的國共雙方對東北的爭奪就開始了。

爲搶奪東北，從蘇軍出兵東北以後，中共中央連續下了十幾道命令：

八月十二日，決定派幹部去東北工作；

八月二十二日，電令山東分局立即抽調大批幹部到東北去；

九月十一日，要求山東分局抽調四個師共二萬五千至三萬人的部隊去東北；

九月十四日，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北局；

九月十九日，決定由羅榮桓等率山東六萬部隊、四千幹部，迅速從海陸兩路進軍東北，限十一月底前到達；

九月二十三日，命令黃克誠率新四軍第三師三萬五千人去東北；

十月二十三日，指示東北局："竭盡全力，霸占全東北，萬一不成，亦造成對抗力量，以利將來談判"；

十月三十一日，決定成立東北人民自治軍，任命林彪爲自治軍總司令，彭真爲第一政委，羅榮桓爲第二政委。總部于十一月四日成立。

與之相對應，八月三十一日，蔣介石任命熊式輝爲東北行營主任，并公布劃分東北三省爲遼寧、遼北、安東、吉林、松江、合江、黑龍江、嫩江、興安九省和沈陽、長春兩市，任命了九省主席和兩市市長，同時要求蘇聯根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規定，把東北全境交給國民黨政府，實行"行政接收"；

十月十六日，蔣介石將"昆明防守司令部"改組爲"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任命杜聿明爲司令長官；

十月二十四日，杜聿明率部由昆明經南寧到達廣州，并從廣州海運北上，于十一月中旬在秦皇島登陸；

十一月一日，美國軍艦將國民黨石覺部第十三軍從上海全部運抵秦皇島，後又從越南海運國民黨趙公武部第五十二軍至秦皇島，兩個軍共七萬人；

十一月十六日，杜聿明在美軍飛機的支援下，以優勢兵力攻占山海關，隨即沿北寧路蜂擁北進，從而正式打響了東北爭奪戰。

要想同國民黨軍隊爭奪東北，時間是決定一切的，時間就是生命。但由于國民黨有美國的援助，有飛機、輪船和汽車，而我們衹有兩條腿，我們是以兩條腿，和國民黨的飛機、輪船、以及汽車輪子賽跑。賽跑的結果可想而知。

在接到中央將三師部隊調往東北的命令以後，我們就立即分頭進行準備。可以説各項準備工作真是千頭萬緒。從整編隊伍、編排行軍順序、選定路綫、設置兵站，到部隊的政治思想動員，再到安排留守隊伍、準備後勤供應，同時還要盡可能地準備一些冬裝等等，我們天天從清晨一直忙到深夜。

一九四五年九月底，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進駐淮陰，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饒漱石和新四軍副軍長張雲逸、參謀長賴傳珠等都已到達。我們就在淮陰當面接受了軍部的命令，經過十天緊張的準備，隊伍開始行動了。

根據中央的命令，新四軍三師北上東北的部隊，除師的主力第七旅、第八旅、第十旅、獨立旅和師部的特務團外，還帶走了鹽阜軍分區的兩個獨立團，阜寧獨立團和淮安獨立團，按照命令上的要求，編足了三萬五千人。留在蘇北根據地的部隊，也是三萬五千人。

我們部隊的指戰員有很大部分是蘇北人，要他們遠離家鄉，北上東北，需要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但由于時間緊急，衹好一邊走一邊進行政治動員。最爲要命的是，出發時，我們每人衹領到了一身適于南方氣候的夾衣，先頭部隊甚至連這身夾衣都没

有，仍是一身單衣。

隊伍出發時，三師黨委常委成員衹三個人，就是黄克誠、洪學智和我。隊伍到達東北以後，在興城縣的江家屯，黄克誠告訴我，林彪準備派李天佑來擔任三師的副師長，但他的意見是，準備要劉震任第一副師長，洪學智任第二副師長兼參謀長。我們到阜新時，才正式任命劉震爲第一副師長。從那以後，三師黨委常委成員就是四個人。

部隊在向北行駛，我有時去司令部和洪學智一起處理一些問題，有時則在政治部率隊前進。黄克誠是跑前跑後，有時住八旅，有時住七旅，有時去十旅。黄克誠經常把擔子甩給洪學智和我兩個。在蘇北時也是這樣，黄克誠經常或是出去開會，或是下去檢查工作，很多時候都不在師部，每當這時都是洪學智和我兩個人在師部看家。

部隊從蘇北出發後，經沭陽，過隴海路，就來到了我們第一個預定集結地點——山東臨沂地區。在臨沂，我們見到了新四軍軍長陳毅。陳毅是在延安參加完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返回蘇北途中，得知新四軍軍部已決定遷至臨沂，于是就在臨沂等待軍部的到來。

黄克誠、洪學智和我去見陳毅。陳毅軍長向我們介紹了“七大”精神和延安情况。之後，我們請求陳毅軍長同我們部隊的幹部見見面，作些指示。陳毅很爽快地答應了，説他親自爲三師部隊送行。

陳毅軍長主要是講當時的國際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他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六個帝國主義强國中，德、意、日被打垮了，英、法受了重傷，衹有美國没有受多大損失，而且還得了不少的便宜。另外，戰爭期間，盡管蘇聯受到了很大損失，但東歐的幾個國家解放了，波蘭、捷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東德都成了社會主義國家。這樣，世界上除了帝國主義陣營之外，又出現了一個以蘇聯爲核心的社會主義陣營，這就是反法西斯戰争的偉大勝利。現在的世界，蘇聯和美

國是最强大的兩個國家，它們分别是兩個陣營的領導力量。

在遠東，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了，是不是也能出現社會主義國家，這就要看我們共産黨的力量和鬥争情况了。

他告訴我們，蘇聯對日作戰，是迫使日本投降的一個主要力量。東北獲得解放，也完全是依靠蘇聯的力量。但蘇聯人不能長期占領這個地方，因爲中國也是個戰勝國，《開羅宣言》上明確規定，要把東北交還給中國政府。但現在的中國政府是國民黨一黨獨霸，在國際上也是由國民黨政府代表我們國家的。

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新四軍、八路軍，是抗日戰争的中堅力量和對日作戰的勝利者，完全有這個權利去接收東北。

他説，蔣介石現在想靠美國的支援來獨吞抗戰的勝利果實，不僅是東北，就連我們艱苦奮鬥犧牲流血建立起來的敵後抗日根據地，他也要獨占。毛澤東去重慶，同蔣介石簽了一個《雙十協定》，但那是不算數的，因爲蔣介石一貫不講信用，他簽這個協定衹是個緩兵之計，想争取點時間，好把遠處西南邊陲的精鋭部隊，調到他所需要的地方去，調到東北去。

他還指出，東北是蔣介石和我們的必争之地，誰能搶先到達東北，誰就對今後的勝利增加了幾分把握。蔣介石有美國的援助，有飛機、有軍艦，正從海上、空中向東北運兵，而我們衹能靠兩條腿走路去。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已經派了幾支部隊去東北，先頭部隊已經到達，但力量還遠遠不够。

陳毅在講話的最後鼓勵我們説："你們要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兼程北進，堅决向東北進軍。同志們，我們要和國民黨賽跑，跑得越快越好，要趕在國民黨的前頭。關鍵的第一步是要搶占山海關，不讓國民黨部隊在秦皇島、葫蘆島和營口登陸。現在蘇聯紅軍已經决定要從東北撤軍，繳獲日本人的武器準備留給我們。所以，我們不能輕易讓國民黨進入東北，你們一定要火速前進，争取更大的勝利。"陳毅的講話很有感染力。他的講話，大大提高了大家的鬥争情緒和北上争取勝利的信心。

爲了盡快趕到東北，我們在臨沂把全師部隊分成了兩個梯

隊：由司令部、政治部率領主力部隊作爲第一梯隊，晝夜兼程前進，直奔山海關；由供給部、衛生部率醫院、幹部家屬組成第二梯隊，隨後跟進。這樣，我們的行軍速度顯著加快。從蘇北出發北上時，部隊每天行軍約六十里，而從臨沂繼續北上後，每天至少行軍八十里。

從臨沂出發後，我們經蒙陰、萊蕪、章丘、商河、寧津進入河北省，再經獻縣、河間、任丘、廊坊、香河、薊縣，然後轉向東，經玉田、豐潤、遷安，向山海關前進。這一路行進，所經過的地方，全是自己的根據地。所到之處，當地的黨、政領導機關和人民群衆都是全力支援。一切生活供應，食宿經費全靠他們解决。我們要糧食給糧食，要錢給錢，還幫助我們組織車馬運輸，一直把我們送到了山海關附近。

一路上，山東、河北根據地的群衆除用歌舞表演來熱烈歡迎和歡送我們之外，還不斷爲我們送各種各樣的慰問品。部隊長時間的長途行軍，能有雙合腳的鞋穿，保護好雙腳，是至關緊要的頭等大事。地方政府就積極動員和組織群衆給我們做鞋，在這次部隊的一路北上行進中，我們常常是這雙鞋剛穿上腳，那雙鞋就又"慰問"來了。真是穿在腳上，暖在心間。

當時，雖然我們一天至少走八十里路，最多要走到一百二十里，體力消耗極大，但因爲一路上都有群衆的歡迎和鼓舞，部隊幹部、戰士仍然情緒飽滿，精神充沛。

到河北的河間縣以後，爲加快部隊的行進速度，我們又將原先的二個梯隊組建成三個梯隊，司、政領導機關率主力部隊仍爲第一梯隊，供給部、衛生部、醫院爲第二梯隊，一些帶着孩子的幹部家屬爲第三梯隊。一梯隊的行進速度，每天至少一百里，二梯隊的速度稍慢一些，但每天至少也在八十里。三梯隊的速度則更慢一些。

可惜的是，盡管我們馬不停蹄地日夜兼程，但鐵腳板終究没能走過汽車和輪船，更追不上飛機。當我們一路緊趕慢趕，終于趕到山海關附近的建昌營時，才得知杜聿明及其所部，已由美國

海軍海運到秦皇島登陸，先于我們攻占了山海關。算起來，他們啓程的時間要比我們晚二十天左右，路程要比我們遠一倍多，却比我們早十多天到達了山海關。

因秦皇島、山海關已被國民黨軍隊占領，我們不能再走山海關，祇能偏西經建昌營，于十一月下旬出冷口進入東北。隨後，第二、第三梯隊也分别于十二月初相繼出喜峰口、古北口進入東北。

就這樣，新四軍第三師部隊三萬五千餘人，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初分别從蘇北鹽阜、淮海地區出發，徒步行軍約兩個月，跨越江蘇、山東、河北、熱河、遼寧五省，在十二月初完成了進軍東北的戰略任務。

二、初到東北

新四軍第三師部隊進入東北以後，不久就出現了一些問題。

首先，是部隊的日常供應問題。在關内，我們雖然一路行軍，但部隊的供給是有保障的，需要多少糧、菜、油和飼料，由先遣隊找到村公所報個數就行了。因爲部隊所經過的地方，都是我們的老根據地，對于我們到來，事先都有準備。但是一出冷口就不行了，没有了根據地的支持，部隊的供給毫無保障。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人民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受着奴化教育，對我們毫無了解。他們向往的祇是正統的國民黨軍隊，對我們的到來往往十分淡漠。

再則主要是窮。十四年來，東北人民過着極爲貧窮的生活。從吃的來説，他們祇能吃配給的橡子面和發霉的棒子面，像大米、白面這樣的食品，則是日本人的專用品。如果有人膽敢違反禁令，吃了這些東西，一旦被日本人發現，就會被當作經濟犯抓起來投入監獄。

從穿的來説，每個人每年祇配給三尺“更生布”。所謂的“更生布”，就是用麻袋和破布制造的再生布，數量既少又不耐穿，因此在當時的東北地區，全家人合穿一條褲子的現象相當普遍。這樣的人家，誰有事就穿上褲子外出，没事的就披着麻袋片偎在炕上。我們到東北不久，就已是數九寒天了，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凛冽北風中，還能看見不少孩子一絲不挂地站在路口，眨着好奇的雙眼觀看我們這些過路的大兵。見到這種情况，我們部隊的許多同志都出于同情心，把好不容易才帶到東北的一些衣服，拿出來給了這些孩子們。

除此之外，在日本的高壓政策下，東北人民還要每年出勞工，去義務爲日本人幹各種苦活。有的去邊防爲日本人做工事，有的是下窑爲日本人挖煤和開礦，有的甚至還要去當“國兵”，被日本人訓練成炮灰。

亡國奴的生活真不是好受的。當時，在日本人的滿州國統治下，中國人没有任何自由，絶大多數都窮得叮當響。在富饒的黑土地上生活的中國人，油水都被榨乾了，自己都養活不了自己。

就這樣，他們哪有什麽多餘的糧食來供應部隊。加之，東北一下子來了這麽多人。最早是蘇聯紅軍，一百五十萬，蘇聯紅軍占領期間，還運走東北大量的大豆和牛、羊、馬匹和各種物資，蘇聯紅軍紀律不够好，絶對不能與我們八路軍、新四軍相比較。

然後，按照黨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從九月初到十二月初，我們先後到達東北的部隊和幹部約十三萬人。與之相應的，國民黨部隊也在此期間陸續到達有八個正規軍，三十萬人左右。這麽多的人要吃要喝，很快的，一些村子就空了。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黄克誠在給中央軍委的電報中説：“三師出發到東北已一月，僅領到滿洲僞幣二百萬元，够伙食十六天用，一切經費均停發。……糧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糧外，其餘的到一處，吃一處，吃空燒盡。”

黄克誠的電報，確確實實是當時我們的真實寫照。到最後，實在没有辦法，就祇好讓傷病員吃糧食，其他人吃點野菜摻些糧

食煮的大鍋粥。

我們遇到的第二個大問題，就是嚴冬酷寒。東北冬天零下四十度左右，實在讓我們這些南方人經受不住。由于部隊在蘇北時倉促出發，好一點的領到了一身夾衣褲，還有的人則什麽都沒有。可是越往北走，天就越冷，待我們到達東北時，已將近數九寒天。部隊夜晚行軍，不消多久，露在帽子外面的頭發上，眉毛上就會結成一層白霜。因爲冷，鼻子裏老往下淌鼻涕，不久，淌下來的鼻涕就會凍成一根一根的小冰柱。另外，槍炮上的鋼鐵部分，火車上的扶手，不能用手去摸，一摸就會沾掉你一層皮。炮兵營的指戰員没有經歷過這樣嚴冬，早上起來擦炮兩隻手沾上炮身就拿不下來，强行拿下來時，手就被剥了一層皮，血淋淋的。

當時部隊的減員，絶大多數都是因爲凍傷。許多戰士被凍壞了雙腳。又由于我們對防治凍傷缺乏經驗和常識，不能得到及時和有效地防治凍傷，也加大了減員的比重。

後來我們才知道，對凍傷的處理，像我們吃凍梨那樣，不能一下子就把凍梨泡在熱水裏，這樣凍梨就會爛掉。人體的凍傷也一樣，如果發現有人凍傷了手或腳，必須動員他們先不要進屋，就在外面先用雪搓，待凍傷部分的膚色由黑開始轉紅以後，再進屋用凉水去拔，最後才能用熱水去洗。如果一開始就用熱水去洗，凍傷的部位就會壞死，最終的結果就是截肢。

還有，部隊夜間行軍，走不多久，鞋後跟就會沾上厚厚的一層冰雪，使人走起路來就像穿上了一雙高跟鞋，很容易把腳扭傷，因此必須及時把這層冰雪敲掉。另外，行軍時，途中休息的時間不能過長，騎在馬上的時間也不能太久，騎一會兒就必須下來走動一段，否則這雙腳就不是你的了。

當時，先到東北的一些部隊，從日本人的被服倉庫裏搞到了大頭鞋、皮帽子、皮大衣等，什麽都有。而我們後到的部隊，什麽也没有搞到，穿着一身秋裝，真是越走越冷。到了這種時候，也顧不得什麽軍容風紀了，被子也好，毯子也好，衹要能御寒，就都往身上披。就這樣，好不容易挺到阜新，黄克誠才親自下令

搞了些白布和棉花，讓各單位自己做棉帽子和大衣，這才算是過了一冬。

我們遇到的第三個大問題，就是部隊的裝備問題。

九月初，冀熱遼軍區十六分區司令員曾克林等，最先率兩個團跨出山海關，來到錦州、沈陽一帶。他們從日本人在東北的一些軍工廠和軍火倉庫中，搞到了大批武器和彈藥。後來就傳説，在東北，武器堆積如山，有的是槍炮子彈，根本不怕没有槍，怕的是没人扛槍。他們向中央建議，準備到東北的部隊可以少帶甚至不帶武器，到東北以後，就可以全部换裝。

中央本來也是要我們少帶或者不帶武器的，由于黄克誠的堅持，所以我們三師北上時，部隊仍是全副武裝，衹把多餘的武器留下來交給了留在蘇北的部隊。但在北上途中，由于行軍速度一再加快，部隊也相應作了一些輕裝。加上一路上各級黨政領導和人民群衆都熱烈的歡迎和歡送我們，對這種感情，我們無以爲報，根據他們的要求，沿途也留下了一些槍支彈藥。當時，大家心裏都認爲，既然東北有那麽多的武器彈藥，留下一些也是完全應該的嘛！到了東北就會有更好的，就可以换裝了嘛！

那知道，到了東北一看，什麽都没有，日本關東軍留下的武器，先到的部隊拿走一些，在民間又散落一些，還被蘇聯紅軍運走了一大批。我們到得比較晚，什麽也没有搞到。换裝没换成，連原有的火力配備，也相應削弱了不少。

十一月二十六日，黄克誠給中央發的一封電報説："部隊五十多天行軍，極疲勞，因自華中沿途動員均説坐火車、汽車及到東北换裝備等樂觀心理出發，現遇到極爲困難之情况，無黨、無群衆、無政權、無糧食、無經費、無醫藥、無衣服鞋襪等，部隊士氣受到極大影響。"

十二月十七日，黄克誠在給軍委的電報中又説："部隊武器僅補充步槍一千二百支，輕、重機槍四十四挺，山炮十門，野炮四門，尚不能補足沿途留下的武器，且多殘破不全，爲新部隊丢下不用者。""幹部戰士對新部隊裝備完善，老部隊破破爛爛，極不

滿意。"

軍隊没有武器，就像老虎没有牙齒一樣，别説打仗，連嚇唬人的資格都没有。

不過當時最可怕的還是無根據地、無群衆，無群衆，也就無人抬傷員，無兵員補充，無情報來源，無後勤供應保障。

總之，剛到東北的新四軍第三師，完全是個疲憊之師，極需要休整和補充。可當時東北的形勢十分嚴峻，要得到休整和補充，幾乎是不可能的。

三、到東北以後的第一仗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東北人民自治軍改稱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分爲前總和後總，由林彪帶領前總極少數參謀人員在遼西前綫指揮作戰。待林彪趕到遼西前綫的時候，國民黨部隊已經占領了山海關和綏中，接着又進占了興城、錦西和葫蘆島。

當時林彪帶着幾個參謀和秘書，就在興城的江家屯等我們。我們經建昌營出冷口、再經青龍到達江家屯。就在江家屯，我們見到了林彪。在這之前，梁興初率領的山東第一師約七千五百人，已經到達興城。這樣兩支隊伍共約四萬多人會合到了一起，由林彪直接掌握親自指揮。

整個十二月份到一月份，美國一直在幫助蔣介石運兵，搶占戰略要點。當時，除國民黨第十三軍、第五十二軍已由美國軍艦海運至秦皇島登陸外，全部美械裝備，號稱國民黨軍"五大主力"中的兩支主力，新編第一軍和新編第六軍也被運進東北，充當進攻東北的骨幹力量。

自奪取山海關以後，國民黨軍隊憑借精良裝備，初戰鋭氣，長驅直入，沿北寧綫疾進。杜聿明的氣焰十分囂張，叫囂着要在三個月内解決整個東北問題。這些到達東北的國民黨軍，其中百

分之八十系海運，百分之二十爲空運。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稱：美國僅爲空運國民黨軍，就耗資三億美元。

然而，就在這樣一種敵我力量明顯懸殊的形勢下，延安中央及以彭真爲書記的東北局，却要求我們在錦州地區與來勢洶洶的敵人進行一場大決戰。

林彪是十一月十八日到達遼西前綫的。經過對敵我雙方的一番觀察和了解，他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向中央軍委拍發了一份電報，大意是："連日我在興城、錦州一帶，所見所聞，我部隊已參加作戰者，疲憊涣散，戰鬥力甚弱，武器彈藥不足，而未得補充；自總部起，各級缺乏地圖，對地理形勢常不了解，通訊聯絡至今混亂未能暢通。地方群衆則未發動，土匪甚多，故迂回包圍時，無從知道。敵人利用我以上弱點，向我推進。我有一個根本意見，即：目前我軍應避免被敵各個擊破，應避免倉促應戰，應準備放弃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讓敵拉長分散後，再選弱點突擊。目前黄、梁兩師，皆我親自指揮，如能求得有利作戰時，即極力尋求戰機，進行側面的殲滅戰，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擬輕易投入戰鬥。"

林彪避免在錦州決戰的意見，得到了中央的批準。這是林彪對東北解放戰爭的第一個大貢獻。對此，陳雲在一九四七年五月給高崗的一封信中，曾把避免錦州决戰和成功指揮四平撤退，稱作共産黨人在東北前七個月中的兩件大事。他在信中還説，如果這兩件事當時有錯誤的話，東北就很難有以後的好形勢。

我們到了錦西後，林彪親自指揮我們三師和山東一師的部隊向後退却。不過就在從錦西後撤的途中，我們還是同國民黨軍隊打了到東北以後的第一仗。當時林彪一直想以武力偵察一下敵人的戰鬥力，想先打一仗試一試，摸摸敵人的情况。

正好，十二月初的一天，國民黨五十二軍的一個先頭師進到了江家屯附近。林彪同黄克誠商量以後，命令梁興初所帶的山東一師同新四軍三師八旅，在第二天的拂曉時分，向五十二軍的先頭師發起突然襲擊。當時敵人正在徒步前進，我們一打，他們很

快就守住了興城以西的主要山地。在山上，我們前進了十幾里，把敵人擊潰了。

戰鬥從早上打到了下午，雙方仍然是一個僵持局面。林彪在同黃克誠商量後，下令把部隊撤回到江家屯、紅螺寺一帶，不打了。在我們撤退時，敵人也没有再向我們攻擊，因爲他們也是剛從秦皇島登陸，不了解情况，不知道我們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之後，國民黨軍不敢再盲目前進，就暫時在興城住下了。

這次戰鬥，我們雖然抓到了一些俘虜，有少量的繳獲，但我們自己的傷亡也比較大，因爲無後方，傷員送不出去。打了這一仗，我們發現這個部隊全是美械裝備，戰鬥力很强，每個班有三挺輕機槍還有衝鋒槍。

正如《東北三年解放戰争軍事資料》中所寫的那樣："進入東北之敵軍爲蔣系精鋭，大部美械裝備，經過美國訓練，參加過印緬作戰，炮火和自動火器多，戰鬥力强，老兵很多，都有三、五年的軍齡，其中甚至有個别排長仍當戰鬥兵者，較頑强，不容易繳槍，甚至打到七、八個人還不繳槍，帶着遠征軍、常勝軍的驕傲態度，尤其是新一軍、新六軍特别驕傲，戰鬥力也確實頑强。"

通過這次武力偵察，我們得到兩點印象：一是敵人武器精良、火力强，不好打；二是我們自己的隊伍過于密集，而且是一面推，使敵人得以集中火力打我們的一面，導致傷亡太多。我們在這一仗中所取得的實戰經驗，爲林彪以後提出"一點兩面"、"三三制"打下了思想基礎。

四、明確東北的作戰方針

國民黨軍隊在奪占山海關之後，依靠其兵力優勢，與我們争奪中長路及沿綫的大、中城市，先後占領了綏中、錦州、錦西、長春、沈陽等地。

對如何開展東北的工作，林彪有自己的看法。林彪認爲，不應與優勢敵人去争奪交通要道及其大、中城市，而要把我們的主要兵力放在廣大的農村地區，進行發動群衆、組織群衆的工作，建立一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然後再依憑這個根據地，與敵人進行争奪東北全境的鬥争。

林彪的這個意見，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央在給中共駐重慶代表團的電報中，明確提出了"讓開大路，占領兩厢"的東北工作方針。十一月二十四日，劉少奇電告東北局："你們今天的中心任務是建立可靠的根據地，站穩腳跟。"

十二月七日，中央復電東北局彭真、羅榮桓，再一次指出："我們企圖獨占東北特别是獨占東北一切大城市，已經肯定是不可能。因此，我們目前不應以争奪沈陽、長春爲目標來布置一切工作，而應以控制長春鐵路兩側地區，建立根據地，利用冬季整訓十五萬野戰軍，建立二十萬地方武裝，以準備明年春天的大决戰爲目標來布置一切工作。這是一個工作方針問題。望你們迅速考慮成熟加以確定，否則，動摇不定，妨害工作，喪失戰機。"電報同時還指出："林彪冬電部署以旅爲單位，分散打土匪，做群衆工作，是對的。"

在得到中央的支持後，林彪果斷停止了與國民黨軍隊在錦州的决戰，于十二月上旬直接指揮新四軍三師和山東一師大踏步地後退，到達了錦州以北的義縣，在那裏休息了一天。然後，又繼續沿清河後撤，到達了阜新。

在阜新，林彪召集我們團以上幹部開了個會，傳達中央對東

北工作方針的指示精神，并總結了興城附近一戰的經驗教訓。林彪和黃克誠分別在會上講了話。他們講話的總的精神是：

按照中央的決定，在東北的當務之急，應當是建立根據地，廣泛發動群衆，肅清土匪，建立黨的組織與政權，爲今後的反攻打下可靠的基礎。

中央這個方針的提出，主要是基于當時整個東北的敵我態勢，還是敵强我弱。從兵力上看，國民黨部隊將近三十萬人，而我們衹十餘萬人。從裝備上看，國民黨部隊幾乎都是美械裝備，而我們基本上還是一般的輕武器，也就是步槍加輕重機槍，而且彈藥甚少。有的部隊裝備甚至比以前還有所削弱。加之我們的部隊都是長途跋涉，疲憊不堪，又無根據地作依托；而敵人則是乘坐輪船、飛機來的精鋭之師，他們冬裝齊全，武器精良，就憑借這些優勢，他們長驅直入。東北的一些大城市相繼爲國民黨部隊所占領，鄉村則被土匪所占據，而我們，則處于既少工人又少農民的中、小城市。

因此，林彪和黃克誠在講話中都指出：部隊當前不宜進行大規模作戰，最重要的是盡快建立後方，站穩腳跟，讓部隊能得到短期的休整，使傷病員能有安置之處，使後勤供應和兵員能得到源源不斷的補充，爲將來的大規模作戰打下基礎。

林彪還談到了重慶談判問題。他説，蔣介石要毛澤東去重慶和談，衹是個陰謀，目的在于拖延時間，好讓他能調集精鋭部隊到關外大打，先解決東北問題。因此我們必須立足于打，立足于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没有自衛戰争的勝利，就不會有真正的和平，對這一點不保持警惕，就不會有真正的和平。

之後，結合興城戰鬥的經過，林彪又講了對敵作戰的一些戰術原則。在作戰的規模上，林彪强調先以小打的方式，摸索經驗，熟悉情况，然後在適當時期再打大仗。在作戰的原則上，林彪强調：每戰要以數倍、以至十倍，二十倍的兵力去對付敵人。對作戰時機的選擇，林彪則强調，應當是在敵人剛剛到達一個新的地點，還來不及築好工事的時候，發動突然襲擊，使敵人措手不及。

在作戰的具體戰術上，林彪提出了很重要的一條，即“一點兩面”、“三三制”。

所謂“一點”，就是集中力量攻敵人的一點。所謂“兩面”，就是包圍好，截斷敵人的後路。所謂“三三制”，具體的説，就是把一個班分成三個組，每組三至四人，在戰鬥中充分利用地形地物，以疏散的隊形前進，從而避免敵人的火力殺傷，減少自己的傷亡。

我個人認爲，林彪提出的這些戰術原則，如“一點兩面”、“三三制”，及以後提出“四組一隊”、“四快一慢”等，既簡單又實用，在以後的東北戰場上，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我們部隊後來的訓練和打仗，完全都是按照林彪的這些戰術原則進行的。

由于東北的條件比較艱苦，與出關前動員時的描繪有較大的差距，所以林彪在會上提出，各部隊必須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深入細致地做好戰士們的思想工作，動員大家克服困難、戰勝困難。他還要求各個部隊必須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動員一切力量發動群衆，組織和依靠群衆，剿滅土匪，建立自己的政權，要在近幾個月内打下可靠的根據地基礎。

這是我們到東北以後第一次團以上幹部會議的大致情况。

這次會議開完，大約過了十天左右，毛澤東于十二月二十八日給東北局發來了後來被題爲《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電報，明確指出，我黨現時在東北的任務，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應把東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離國民黨占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廣大鄉村方面，“讓開大路，占領兩厢”，以便發動群衆，建立鞏固的根據地，逐步積蓄力量，準備將來轉入反攻。電報還指出，目前我黨在東北的工作重心是群衆工作，衹要我們能够將發動群衆、建立根據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幹部和戰士中去，動員一切力量，迅速從事建立根據地的偉大鬥争，我們就能在東北和熱河立住腳跟，并取得確定的勝利。

毛澤東的這一電報指示，進一步統一了大家的思想，明確了東北的工作方針，爲以後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五、秀水河子戰鬥

阜新團以上幹部會議結束以後，林彪同黃克誠商量後决定，部隊繼續後撤。

撤退時，我們分爲兩路。梁興初帶領的山東一師和新四軍三師七旅，這兩支部隊相互靠攏在一起，沿着北寧路北上，由林彪直接掌握和指揮。山東一師和新四軍三師七旅都是在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三旅六八五團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原六八五團團長彭明治，副團長梁興初，我任該團政委）。新四軍三師的其它部隊，包括師部、八旅、十旅和獨立旅，由黃克誠指揮，從阜新出發，經彰武繼續向北，最後占領了通遼。

部隊從阜新出發時，天氣變得更加寒冷，沿途一片冰天雪地。我們沿着鐵路往北走，看到沿途人烟稀少，居民大都爲少數民族，以蒙古族居多。我們走了將近一個星期，才到達通遼。到了通遼之後，部隊就停下來進行休整。在通遼，我們度過了一九四六年的春節。

在我們前往通遼的同時，林彪直接帶領的山東一師和新四軍三師七旅，經彰武到了法庫，駐在法庫以南的秀水河子。秀水河子位于由北向南的秀水河與東西橫貫的彰（武）法（庫）公路縱橫交錯處，是當地一個較大的村莊。就在這個秀水河子，我們在林彪的親自指揮下，打了出關以後的第一個漂亮殲滅戰。

這一仗，是在我們當時節節後退的情况下完成的。它對打擊敵人氣焰，恢復和堅定我們的鬥爭信心，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春節，林彪的東北民主聯軍（東北人民自治軍在一九四六年一月改稱爲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就設在秀水河子的一個小學校裏。所謂總司令部，其實也就是幾個參謀、一個秘書，一部電臺而已。林彪就是用這麽幾個很少的人在那裏指揮隊伍。

春節，按照習慣，一師的梁興初，七旅的彭明治，朱滌新分別帶領下屬各團的幹部，去給林彪拜年，林彪給大家講了話，并集體會了餐。

這時，一直尾隨我們北上的國民黨軍已經占領了新民、彰武。敵人的氣焰十分囂張，他們的第十三軍八十九師二六六團全團、二六五團的一個營和師山炮連、汽車連，竟然毫無顧忌，孤軍深入，逼近了秀水河子。

這個機會難得。從兵力上説，我們占絶對優勢。敵人衹是四個營，而我們一師是三個大團，七旅也是三個大團。我們是以六個團的兵力，打敵人的四個營。

從雙方部隊的部署上看，林彪率領的這兩支部隊，已在秀水河子附近活動，在部署上不用作多大的變動就可以投入戰鬥。而且這兩支部隊經過了半個月的休整和練兵，體力和戰鬥力都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提高。相反，國民黨軍是遠道而來。

善于抓住戰機的林彪，當然不會放過這個難得的殲敵機會。他當即决定，部隊撤出秀水河子，在附近集結待機，等敵人進入秀水河子以後，打他一個措手不及。爲統一作戰指揮，林彪决定成立臨時指揮部，由彭明治任指揮，梁興初任副指揮。

林彪指揮打仗時一貫都是親臨第一綫，具體部署指揮，選擇主攻突擊點。他擬定的作戰部署是：七旅十九團和二十一團，在秀水河子東南方向，實施主要攻擊任務；七旅二十團進到劉家窩棚地區，負責阻擊新民、公主屯方向的來援之敵；遼西軍區保安第一團歸七旅指揮，配合二十團作戰；一師一團和二團在秀水河子以北和西北方向，實施主要攻擊任務，三團集結于四愛窩棚、柴茂臺一帶，負責阻擊由彰武方向的來援之敵；遼西軍區的保安第一旅，布置在後新秋一帶，負責監視彰武之敵，保障我側後安全。

二月十一日黃昏，七旅部隊按照戰前部署向秀水河子接近，在團子山與敵人先頭部隊的一個營接觸，十九團當即由正面進行攻擊，二十團則繞到團子山以西，準備斷敵退路。但敵人發現我

軍後，立即退回到秀水河子。

二月十二日上午，七旅二十一團進到東西八家子和拉拉屯，與秀水河子隔河相望。下午，敵人以兩個營的兵力向二十一團出擊。二十一團扼守陣地，戰鬥到傍晚，敵人又退回到了秀水河子。

二月十三日下午十七時三十分，總攻開始。隨着指揮部的一聲令下，一師一團、二團從東北、西北方向發起突擊，七旅十九團、二十一團從西南和東南方向發起突擊。敵人以猛烈的炮火攔阻我部隊前進，并在村北和西北高地拼命抵抗。一師部隊反復衝鋒多次，仍没有衝破敵人的防綫，敵我雙方始終處于膠着狀態，戰鬥非常激烈。

秀水河子的南部，是敵人防守最薄弱的地方，七旅十九團、二十一團的突擊方向正好就選在了這裏。結果他們一突成功，占領了秀水河子南側的一些村莊和一個高地，并乘勢向北繼續發展。

南部被突破後，敵人慌亂起來，把炮火倉促向南轉移。趁此機會，北面的一師一團、二團再次發起進攻，集中火力打開了一個突破口，并于二月十四日零時三十分進入村莊。至此，七旅和一師部隊全部突破敵人的層層防守。

之後，我們的進攻部隊冒着敵人密集的槍彈，猛打猛衝，迅速向秀水河子中心發展。敵人則傾其全力，利用工事、房屋、院墻，進行拼死頑抗，不斷向我反擊。戰鬥進入到了最激烈的階段。

戰鬥進行到二月十四日凌晨四時，攻入秀水河子的各部隊，勇猛穿插、穿墻越院，逐街、逐院、逐屋地與敵人爭奪。各部隊互相配合，從四面八方向敵人的團部壓縮，終于打掉了敵人的這個指揮機關。這時，敵人已潰不成軍，大部分繳槍投了降，衹有第二六六團團長率少數殘部向西南逃竄，最後也被我全部截獲。凌晨六時三十分，秀水河子戰鬥全部結束。

正當秀水河子戰鬥激烈展開之時，國民黨第五十二軍二師六團從新民、公主屯方向來援，進到秀水河子以南太平莊、大荒地一帶。我擔任阻擊任務的七旅二十團迅速進到黄家荒地、鳳鳴山一綫與來敵死打硬拼，殲敵一百多人，迫使援敵狼狽竄回，增援没有奏效。

這一仗，我們全殲了敵人四個營，俘獲的敵官兵近三千人，并繳獲了敵人所有的武器。包括火箭筒，六〇迫擊炮、火焰發射器，輕重機槍、三〇步槍和彈藥等不計其數，另有美制十輪卡車十二輛，戰防炮六門。有些新式武器，我們過去見都没有見過。

秀水河子一仗，完全打出了我軍的威風。事實證明，我們完全能够戰勝全副美械裝備，在裝備上占絶對優勢的敵人。在戰鬥中，我們看到敵人的火力的確很强，黑夜中曳光彈，在天空中四處飛舞，就像節日裏放出的禮花。但是我們正確運用了在戰略上以少勝多，在戰術上以多勝少的原則，抓住敵人輕敵冒進的有利時機，集中優勢兵力，打擊孤立突出之敵，打得乾净利落。可以説，這是我們出關以後所打的第一個漂亮殲滅戰。

它，打擊了敵人的氣焰，提高了我們的鬥爭信心。它，對僞滿殘餘勢力是個打擊，對新解放區發動群衆，進行土改是個支持，對東北廣大人民群衆是個鼓舞。

秀水河子戰鬥後，中央軍委發來了賀電。賀電説："在頑敵進攻下，如能再打兩次這樣的戰鬥，國民黨將不能不承認我在東北的地位。"

六、建立西滿領導機構

一九四六年春節以後，黄克誠率除七旅之外的新四軍三師，離開通遼，來到鄭家屯，與李富春率領的中共中央西滿分局和西滿軍區會合。不久，打完秀水河子戰鬥的七旅也來到了鄭家屯。

根據中央和東北局的命令，在西滿成立了分局和軍區。所謂西滿即指中長路沈陽至長春綫以西的齊齊哈爾、洮安、開魯、阜新、鄭家屯、扶餘等地區。中央任命李富春任分局書記兼軍區政



在西滿軍區

治委員，黃克誠任分局副書記兼軍區司令員。分局和軍區的駐地在鄭家屯。

就在鄭家屯，新四軍三師的領導機構分成了三下子。師長兼政委黃克誠率師部留在鄭家屯，與西滿分局和軍區機關一起工作。副師長劉震帶領八旅和特務團北上，在前郭旗、扶餘一帶建立了遼吉軍區，負責開辟松花江兩岸的工作。副師長兼參謀長洪學智和我帶領師主力七旅、十旅和獨立旅，隨遼西軍區司令員鄧華、政委陶鑄南下法庫。洪學智兼任了遼西軍區副司令員，我兼任了軍區副政委。遼西軍區的前綫指揮所就設在法庫城内，部隊分别住法庫、康平、開原、鐵嶺一綫，沿着北寧路和中長路，在遼河兩岸同國民黨軍相對峙。

當時我們的任務有三：一是監視敵人，阻滯敵人向北前進的時間；二是阻擊敵人，力争在阻擊戰中消滅有可能被我們消滅的敵人；三是保護根據地的建設，同時發動群衆，搞土改，清剿土匪，建黨建政，在李富春、黃克誠的領導下，全力以赴地建設西滿根據地。

這段時間裹，林彪總是在我們附近，直接指揮我們遼西軍區三師的部隊和從山東來的一部分部隊。鄧華司令員、陶鑄政委、洪學智和我大都隨從林彪指揮所行動，一切聽從林彪的指揮。

由于大批國民黨精鋭部隊已經調進東北，一九四六年二月，國民黨政府在南京組織七千學生上街游行，要求蘇軍立即撤出東北。隨即斯大林下令，要蘇軍從東北各大城市中全部撤走。三月十三日，蘇軍開始由沈陽沿中長路撤退回國。

第二天，三月十四日，國民黨軍隊進占沈陽。接着，又先後占領鞍山、海城、營口、撫順、鐵嶺和法庫等地。

東北民主聯軍也拉開了架勢。三月十四日，蘇軍撤出四平，

林彪命令三師十旅趁勢于三月十八日攻下四平。四月中、下旬，蘇軍又陸續從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城市撤退，我們的部隊則相繼于四月十八日攻占長春、四月二十四日攻占齊齊哈爾、四月二十八日攻占哈爾濱，填補了蘇軍撤出後的真空。國民黨政府原以爲蘇軍撤出東北會對他們有利，却不料給我們造成了進占大城市的機會。

部隊進占大城市後，獲得了一部分軍用物資，使我們的武器裝備得到一些改善，給養問題也迎刃而解。部隊的戰鬥力得到了提高，從而加快了根據地的建設步伐。

七、四平保衛戰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國共雙方簽訂的《停止軍事衝突的協議》正式公布。同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和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同時下達停戰令。但國民黨方面堅持，東北不在停戰範圍之内。

一直到了三月二十七日，國民黨政府才勉强同意在東北停戰，雙方同意并由軍調部派出東北執行小組進入沈陽，以實現東北停戰。

但實際上，東北的戰事并没有停止，一天也没停。

在這之前，國民黨軍隊繼續源源不斷地由美國軍艦運入東北，其目的衹有一個，就是奪取全東北，其重點又首先是四平。雙方都在醞釀着一場東北土地上的第一次大會戰。

四平位于中長、四梅、四洮鐵路的交叉點上，是進出東南滿、西北滿的重要通道，戰略位置非常重要，誰控制了它，誰就可能控制了東北的命脉。因此，國共雙方對四平都十分重視。蔣介石説："没有四平，就没有東北。"毛澤東説："東北戰争，中外矚目。"

在給林彪同志并告彭的關于組織四平會戰的電報中，毛澤東説："必須準備數萬人傷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項代價，才能打得出新局面。"我們當時在東北的部隊一共也衹不過十餘萬人。

從一九四六年二月初到四月上旬，在將近兩個多月的時間裏，敵人因兵力未到齊，就逐步向前推進。他們先進至鐵嶺，而後進至開源。在開源暫停一段時間後，又向昌圖前進。我們三師七旅、十旅從鐵嶺開始，節節抵抗至昌圖一綫，構築堅固工事，并且在昌圖、開源之間多次反擊打退了敵人的進攻，阻止遲延了敵人的進攻近兩個月。

國民黨軍進攻四平的計劃，是蔣介石親自布置的。他派了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到沈陽，當面向杜聿明交代和布置任務。杜聿明共調集了十個師，準備兵分三路突擊四平：右翼兵團爲新六軍及八十八師、一九五師，以北寧路爲中心，沿撫順、開源、大臺子、哈福車站、公主嶺，向四平以東攻擊前進；中央兵團爲新一軍，沿鐵路綫向四平街、雙榆樹、雙城子攻擊前進；左翼兵團爲七十一軍，沿遼河向昌圖、八面城、鄭家屯攻擊前進。

我們的對策是：根據中央和東北局要在四平打一場生死保衛戰的指示，林彪調集了十四個師（旅）的兵力，以四平市區爲中心，構建成了一條東西蜿蜒百餘里的防綫。林彪命令，原山東的部隊，包括梁興初、李天佑、梁必業、萬毅、周赤萍所屬的各部，在四平以東的東豐、平岡、到火石嶺、西豐這一帶阻止敵人前進；遼西軍區所屬的原新四軍三師七旅的部隊扼守中長路，在開源到泉頭車站、四平一綫抗擊敵人；原新四軍三師十旅，堅守昌圖、八面城；原新四軍三師獨立旅，在通江口、胡家屯、三江口一綫布防，阻止敵人向鄭家屯、雙遼前進。

以上就是我們當時的部署，全部部隊擺開，一綫式的配備，後面沒有縱深部隊。

林彪實際上不想打這個仗。

四月十一日，林彪給中央和東北局的電報裏，把理由説得很清楚："在此種情況下，及在蔣介石繼續增兵東北的情況，我固守四平和奪取長春的可能性和東北和平迅速實現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軍方針似應以消滅敵人爲主，而不以保衛城市，以免被迫作戰。其結果既不能保衛城市，又損失了力量，而造成以後雖遇有利條件亦不能殲滅敵人。故我意目前方針似應脱離被迫作戰，采取主動進攻。對于難奪取與鞏固之城市，則不必過分勉强去争取，以免束縛軍隊行動。"

黄克誠也不想打這個仗，爲此他曾向林彪，向中央發過不進行四平保衛戰的建議電。在《黄克誠回憶録》中，他曾對此有過較爲詳細的叙述，現將這一段叙述抄録如下：

應當把四平及其它大部分城市讓出來，讓敵軍進來，我們則到中小城市及廣大鄉村去建設根據地，積蓄力量。……我連續給林彪發去好幾封電報，建議他從四平撤退。但林彪既不回電，也不撤兵。于是，我于五月十二日給中央發了長文電，電文如下：

一、由關内進入東北之部隊，經幾次大戰鬥，戰鬥部隊人員消耗已達一半，連、排、班幹部消耗則達一半以上。目前雖尚能補充一部分新兵，但戰鬥力已減弱。

二、頑九十三軍到達，如將大量炮兵及部分坦克用上來，四平堅持有極大困難。四平不守，長春亦難確保。

三、如停戰短期可以實現，則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長春亦絶對必要。如長期打下去，則四平、長春固會喪失，主力亦將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繼續戰鬥。故如停戰不能在現狀下取得，讓出長春可以達到停戰時，我意即讓出長春，以求得一時期的停戰也是好的。以求争取時間，休整主力，肅清土匪，鞏固北滿根據地，來應付將來决戰。

四、東北已不可能停戰，應在全國打起來，以牽制國民黨軍向東北調動。東北則需逐步消滅國民黨兵力，來達到控制全東北的目的。

五、我對整個情況不了解，但目前關内不打，關外單獨堅持消耗的局勢，感覺絶不利。故提上面意見，請考慮。

我發給中央的這封電報，也始終未見回音。

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一天，毛澤東約我到他住地吃晚飯，我們邊吃邊爭論問題。當談起四平保衛戰的情況時，毛澤東問我，難道四平保衛戰打錯了？我說：開始敵人向四平推進，我們打他一下子，以阻敵前進，這并不錯。但後來在敵人集結重兵尋找主力決戰的情況之下，我們就不應該固守四平了。毛澤東說：固守四平當時是我決定的。我說：是你決定的也是錯誤的。毛澤東說：那就讓歷史和後人去評說吧。通過這次同毛澤東的談話，我才明白，當初林彪既不撤兵又不給我回電報的原因所在。[8]

林彪當時不能不服從毛澤東和當時東北局書記彭真的決定。

四平保衛戰之前，林彪在梨樹鎮召開了一個所有參戰部隊團長、政委以上的幹部會。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林彪首先傳達了毛澤東和東北局彭真的指示，主要意思是，要保衛四平，爭取時間，實現停戰，以保證長春在我們的手裏。

接着，林彪對四平保衛戰進行了部署：第一、要構築好工事，堅守工事，利用工事，盡可能地用各種武器殺傷敵人，以挫傷國民黨新一軍、新六軍等精鋭部隊的鋭氣。這是戰鬥中的主要任務。第二、不輕易放弃一個山頭，不輕易放弃一個村莊，不輕易放弃一個陣地。第三、一面作戰，一面研究和學習戰術。第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部隊士氣。

至于東北局甚至中央的一些人提出的“最後一戰”的口號，林彪是反對的，因此他在這個會上根本就没有提及這個口號。

會後，我們就在“保衛四平”的口號下，全力進行作戰準備。首先是沿着鐵路，一段一段地修築工事。按照命令，我們遼西軍區修築工事的重點，是從開源到泉頭車站這一綫。這個陣地比較好，從平原到山區，還有一個遼河。沿途工事築得比較堅固，成爲以後保衛四平的一個重要條件。

遼西軍區所屬的三師十旅修築工事的重點是在昌圖、八面城

[8] 《黄克誠回憶録》，346頁至348頁。編者注

一綫，獨立旅修築工事的重點是在通江口、胡家屯、三江口一帶。也就是説，三路進攻四平的敵人，我們遼西軍區部隊要負責阻擊兩路，即沿鐵路的一路和鐵路以西的一路。

到四月初，敵人開始行動了，但每天走的路很少，一天也就是走二、三十里路左右，有點像他們在江西五次“圍剿”時的步步爲營的做法。三路敵人中，西面的七十一軍最先開始行動。隨之，我遼西軍區司令部便主動撤出法庫，向八面城、鄭家屯方向轉移。四月四日，法庫被七十一軍占領。

四月十五日，七十一軍八十七師先頭部隊兩個團，突然冒進至八面城以南、昌圖以北的大窪，離他們的大部隊已比較遠。林彪的既定方針，是趁敵人在運動中，或立足未穩之際，集中優勢兵力打敵一路，求得徹底殲滅一部。現在，既然八十七師的兩個團已經送上門來，林彪當然不會放過。他立即會同鄧華，在遼西軍區司令部指揮山東一師和我們三師十旅的部隊，就在大窪、金山堡一帶，采取拂曉前隱蔽伏擊的辦法，趁敵人順着公路前進時，發起突然襲擊，將八十七師的先頭一個團全部消滅，團長被打死，另外一個團在後撤中被擊潰。

大窪戰鬥，是我們在秀水河子戰鬥後獲得的又一個較大的勝仗。這次戰鬥共殲敵四千三百餘人。這一仗一打，國民黨軍就縮回到開源以南去了。由于受挫，七十一軍就在遼河邊上駐着，没有再敢前進。

中路敵人新一軍是從四月七日開始行動的。他們剛從海輪上下來，喘息未定，就開始猛攻，搶占了鐵嶺和開源。接着又組織飛機和大炮，猛攻開源以北的泉頭車站。他們白天攻擊，晚上退回開源城，天天如此。駐守泉頭車站的剛好是我們三師七旅部隊。七旅是從井岡山下來的老紅軍部隊，戰鬥力很强，加之泉頭地形險要，又築有堅固的防御陣地。新一軍在八天時間内發起的十多次衝鋒，始終都没能攻破七旅的陣地。七旅部隊堅守在這一綫上，利用堅固陣地殺傷敵人，造成了新一軍的大量傷亡。

右路敵人是新六軍外加兩個師，也是全部美械裝備，戰鬥力

很强。這一路敵人由撫順、本溪出發，在東豐附近遇到山東部隊的堅決抗擊。山東部隊也是在紅軍主力部隊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抗戰初期與我們遼西軍區部隊一樣，都是八路軍一一五師的一部分，因此戰鬥力也相當强。新六軍也是白天進行攻擊，晚上就退回清源，退回安豐。他們攻了一個星期左右，没有攻動，没有前進，相反還造成了大量傷亡。

就這樣，敵人在東路、中路和西路都遇到了我們堅決的抵抗，都没有攻動，一時間，雙方形成了對峙的局面，一直對峙到五月十日左右。

由于四平久攻不下，蔣介石十分惱火。嚴令杜聿明必須在一星期内攻占四平，并再次指派白崇禧到東北督戰。

五月十日以後，敵人增加了飛機和大炮，繼續向我們發起猛攻。因敵人的火力太猛，我們遂有計劃地向四平、平岡、西豐一帶後撤。敵人乘機前進，我們又堅决予以阻擊，就這樣一直打到了四平街頭。

後來由于我們在東面的部隊比較少，被新六軍在東豐突破了防綫，到五月十六日，新六軍占領了西豐和哈爾蘇，然後新六軍向四平以東迂回包圍四平，攻占了哈福車站，同時，他們又配合新一軍，占領了四平東南之重要高地塔子山，形成了對四平的威協。

鑒于部隊減員較多，戰場形勢對己不利，林彪當機立斷，决定于十八日晚撤出戰鬥。這時，敵人已迂回到四平東北的火石嶺一帶，我們再不撤退，就可能要吃大虧。當晚，各部隊按照林彪的部署，有計劃地分批撤出了戰鬥。四平保衛戰宣告結束。

五月十八日，林彪致電中央東北局，請求放弃四平保衛戰。他報告説，敵本日以飛機、大炮、坦克車掩護步兵猛攻，城東北主要陣地失守，無法挽回，守城部隊處于被敵切斷的威脅下，現正進行退出戰鬥。

五月十九日，毛澤東在給林并告彭的電報中，同意林彪放弃四平。在復電中，毛澤東還表示，同意由陣地戰轉變爲運動戰，

究應采取何種方針，由林根據情况决定之。

就在毛澤東復電同意放弃四平的同一日，國民黨軍隊進占四平。

四平保衛戰歷時月餘，共殲敵一萬餘人，但我們自己也傷亡了八千餘人。

關于我們在四平保衛戰中的損失，《東北三年解放戰爭軍事資料》有較爲詳細的記載：

> 四平保衛戰中我軍傷亡總數達八千人以上，部隊元氣損失甚大。黄克誠之三師七旅，原爲井岡山老部隊，四平撤退後祇剩下三千餘人，失去戰鬥力；萬毅之三師原有一萬三千人，經四平戰鬥傷亡及撤退被擊散，祇剩下四、五千人，失去戰鬥力；一師梁興初部剩五千人，還保持有戰鬥力；二師羅華生部還保持有戰鬥力；鄧華保一旅損失相當嚴重，其次是三師八旅、十旅；楊國夫部都弄得疲憊不堪和不少損失。

在撤出四平的前夕，五月十七日，林彪曾通知鄧華、陶鑄、洪學智和我到公主嶺去接受任務。林彪當面交代我們，準備放弃公主嶺、放弃四平，全綫撤退。要求東面山東的部隊，向東和東北方向撤退，西面遼西軍區的部隊，向西和西北方向撤退。

具體部署是，東面的部隊，一部分撤往伊通、雙陽、吉林市，一部分撤往梅河口和通化方向。遼西軍區的部隊，七旅歸由林彪直接指揮，沿中長路撤到陶賴昭，撤到松花江北岸，阻止敵人北上。七旅從此就離開了我們的建制，離開了三師。三師的八旅、十旅和獨立旅，撤至雙山、長嶺、農安、懷德、雙榆樹一綫。

林彪的這個部署，是根據中央"讓開大路、占領兩厢"的戰略方針制定的。林彪總的意圖，就是要求各個部隊都撤到中長路的兩側，讓出中長路，讓國民黨軍隊沿着中長路前進，而我們則深入到廣大的鄉村地區去發動群衆，建立鞏固的根據地。

在公主嶺，林彪對我交代，部隊分散以後，定有三條任務。第

一、堅守中長路兩側的陣地，敵人如果來犯，要尋找機會消滅敵人。第二、抽調大批幹部，大力開展根據地的工作，發動群衆，實行土改，建立民兵，籌集物資，準備過好到東北以後的第二個冬天。第三、要很好的解決部隊的裝備，在注意恢復戰士疲勞的同時，加强政治、軍事訓練，準備到冬季再作較大規模的戰鬥。

離開林彪以後，我們率領部隊立即開始行動，撤到了指定的雙榆樹一綫，司令部就在雙榆樹宿營。因爲這是有計劃有組織的撤退，撤退途中没有遭到損失。

國民黨軍占領四平以後，也没敢立即貿然前進。一直到五月二十二日，他們才進到公主嶺。之後，發現我們又主動從長春撤退了，才北上占領了長春。又過了一個星期左右，他們才推進到了松花江南岸，逐步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廣大地區。

我們東北民主聯軍的主力，則陸續撤至松花江以北。從此，國共兩軍就在松花江兩岸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

八、建設根據地和整頓部隊

我們撤出長春不久，軍調部東北執行小組就到了東北，東北表面上實現了停戰。實際上，因爲我們已經後撤，這個時候也没得打了。

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蔣介石、周恩來、馬歇爾達成《東北停戰協議》。六月六日，國共雙方下令，自六月七日起，東北停戰十五天。《東北停戰協議》期滿後，國民黨方面又要求延長停戰期，我們都同意了。

這是因爲國共雙方都需要時間。國民黨需要利用休戰時機，整頓内部，鞏固占領區，等待增援部隊，爲發動更大規模的進攻創造條件。六月十五日，林彪曾就當時形勢答新華社記者問，説國民黨軍"侵占地區越大越多，他的兵力就越分散而處處薄弱"，此次宣布停戰十五天，"是全國人民堅決反對内戰、要求和平的結果，但就國民黨反動派的企圖來説，可能是暫時無法進攻的停戰，是準備作新的進攻的停戰。"

同樣，我們也需要時間，利用休戰時機，集中全力，加强根據地的建設，整編和整訓部隊，以積蓄力量，準備粉碎敵人新的大規模進攻。

就在這停戰期間，黨中央决定對東北局的領導班子進行一次大的調整。六月十六日，中央給東北局發出了《關于東北局主要領導幹部重新分工的决定》指示電。《决定》指出："目前東北形勢嚴重，爲了統一領導，决定以林彪爲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以彭真、羅榮桓、高崗、陳雲四同志爲東北局副書記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羅、高、陳組織東北局常委。中央認爲這種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諸同志必能和衷共濟，在重新分工下團結一致，爲克服困難争取勝利而奮鬥。"

七月三日，根據中央的指示，東北局在東北民主聯軍駐地哈爾濱召開了擴大會議，會議由林彪主持，我們都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議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總結了近一年來創建根據地和阻擊國民黨軍進攻的經驗教訓，對敵强我弱、和與戰、城市與鄉村、作戰指導方針等問題，統一了認識。七月七日，會議通過了由陳雲爲東北局起草的《關于形勢和任務的决議》（即有名的《七七决議》）。《决議》首先糾正了在和戰問題上的錯誤思想，特别强調必須堅持黨中央關于創造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方針。

爲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决議》提出的任務有三，即深入鄉村、清剿土匪、整頓部隊。爲此，《决議》要求各級幹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車，脱下皮鞋，换上農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資格，一切可能下鄉的幹部，統統到農村去，確定以能否深入農民群衆爲考察共産黨員品格的尺度。一切深入農村者給以獎勵，不願到農村去的給以批評，造成共産黨員面向農村，

深入農村的高潮。”

《七七決議》，是林彪擔任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的司令員、政治委員之後，在第一次召開擴大會議上所作的關于東北工作的重要決議。

當時東北局的領導力量很强，在東北的中央委員有林彪、彭真、羅榮桓、陳雲、高崗、李富春、李立三、張聞天、蔡暢、林楓，候補中央委員有黄克誠、王首道、譚政、程子華、陳郁、雲澤（烏蘭夫）、肖勁光、萬毅、呂正操、古大存等，共約二十人，占全部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近百分之三十。其中彭真、高崗、陳雲、張聞天四人，還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員。他們都參加了會議，一起作出了七七決議。

在東北局擴大會議召開前不久，六月二十六日，國民黨軍隊進攻中原地區，中國内戰全面爆發，隨後敵人先後對各解放區發動大規模進攻。

有鑒于此，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東北局發出了《關于目前形勢與任務的補充決議》，進一步指出：“全黨同志目前的中心任務，就是抛弃一切僥幸和平的心理，抛弃對于美國和蔣介石的任何幻想，抛弃戰争很快就會結束，勝利會很快到來的思想，堅決執行東北局七月七日的決議，一心一意準備以長期戰争保存已經取得的革命勝利果實，争取全國範圍内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的實現。”

以後的形勢發展充分證明，《七七決議》和《補充決議》的制定，對統一東北地區全黨、全軍的思想，指導東北地區的對敵鬥争，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這次東北局擴大會議是東北全黨工作的一次重要轉折，它給以後東北戰争局勢的轉折，奠定了基礎。

哈爾濱會議後不久，彭真就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離開了東北。

一九四六年七、八兩個月的時間裏，北滿、西滿、東滿各地，根據東北局擴大會議精神，從地方黨、政機關，抽調了三分之二

的幹部，組織了大量的工作團、工作隊，深入鄉村地區開展土地改革工作。我們部隊機關雖有戰鬥任務，但也盡可能地抽調了一部分幹部。當時，下鄉幹部的總數，曾多達一萬兩千餘人。這樣，很快就使東北廣大農村的土改運動蓬勃興起。

經過反霸清算、分地鬥争，農民有了土地，我們共産黨人也有了家。有了土地的廣大農民非常感謝共産黨。他們踴躍參軍，据《東北三年解放戰争軍事資料》統計，三年中，在東北共有近一百五十萬農民參加了我們的軍隊。

同時，東北民主聯軍也開始了第一次整編。整編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將地方兵團和主力部隊分開。根據東北局的決定，成立了西滿、遼東（南滿）、吉林（東滿）、内蒙古、冀察遼五個軍區，下轄十二個軍分區，管轄地方兵團。撤銷原北滿軍區，所轄的幾個軍分區，分别由總部或西滿軍區管轄。

主力部隊則分别編成野戰縱隊。這項工作是從一九四六年八月開始的。

八月份，東北民主聯軍原山東第一師、第二師第七縱隊三五九旅，合編成第一縱隊，司令員李天佑，政委萬毅，下轄第一師、第二師、第三師。

九月份原新四軍第三師的八旅、十旅和獨立旅，奉命改編爲第二縱隊，司令員劉震，我被任命爲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并指定我爲二縱隊的黨委書記。這時，七旅早已被撥出去了，特務團也撥歸遼西了。三個旅編成了三個師：八旅被編成第四師，師長陳金鈺，政委李雪三；十旅被編成第五師，師長鐘偉，政委王楓梧；獨立旅被編成第六師，師長兼政委吴信泉。稍後，吴信泉調任二縱隊副司令，李雪三調任二縱隊政治部主任，由張天雲接任六師師長，石瑛任政委，李世安接任四師政委。下轄的三個師都各自成立了騎兵大隊和山炮營。全縱隊三萬餘人。

十月，原新四軍第三師七旅，與原山東第七師合編爲第六縱隊，司令員陳光，政委賴傳珠，下轄第十六師（由七旅改編）、第十七師、第十八師。一九四七年八月，以原新四軍第三師在西滿

的三個特務團爲基礎，加上地方部隊，組建爲東北民主聯軍第七縱隊。

就這樣，我們新四軍第三師的部隊，在這次整編之後，分別被編入了二、六、七三個縱隊，均集中于北滿，由總部直接指揮。

整編後，二縱隊繼續北上整訓，縱隊部來到了齊齊哈爾。在這裏，東北局與總部又命令我們與駐在齊齊哈爾的西滿軍區領導機構暫時合并。這時，西滿軍區的司令員仍是黄克誠，政治委員仍是李富春。我們與西滿軍區暫時合并後，洪學智任西滿軍區副司令員，劉震兼任西滿軍區副司令員，我則兼任了西滿軍區政治部主任。

我們在齊齊哈爾及其周圍地區住了近兩個月。其中縱隊部駐在齊齊哈爾，四師駐安達，五師駐哈爾濱以北的綏化，六師駐白城子以北、齊齊哈爾以南的賚和鎮。另外，除了我們二縱隊以外，一縱隊和六縱隊也都駐在北滿地區。

這兩個月時間裏，部隊除整訓外，還擔負了北滿的剿匪任務。東北地區的土匪，是日僞殘餘、封建勢力和國民黨三位一體的政治武裝，人稱“中央胡子”，活動十分猖狂。據《四野戰史》載：“北滿匪數龐大，最少不下十萬人，大股都經常盤踞在數個縣境之內，且裝備優良，有野戰重炮。”

由于匪患已成爲根據地建設的嚴重障礙，東北局決定，以師爲單位劃分地區，抽調三分之一的兵力剿匪。因爲不肅清土匪，建設鞏固根據地就十分困難。

在西滿軍區這一時期，我曾兩次到哈爾濱開會。第一次是去參加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召開的政治工作會議。在哈爾濱，我見到了原任過山東分局書記兼山東軍區政委的朱瑞，當時他正在到處收集山野炮、坦克及炮兵器材，負責組建東北民主聯軍的炮兵和特種兵縱隊。

第二次是去參加東北各省人民代表大會。當時，我是作爲西滿的軍隊代表去參加會議的。在這次大會上，成立了東北最高政權領導機關——東北各省行政聯合委員會（簡稱“東北行政委員會”），并推舉林楓爲主席。兩次開會，回來後我都向部隊作了傳達。

自一九四六年五月我們從四平撤退以後，一直到十月份，除了在南滿仍有戰事發生之外，整個西滿和北滿一直處于穩定狀態，國民黨軍隊始終没有超過松花江一步。利用這個時機，我們全力建設根據地，清剿土匪，整頓和整訓部隊。在剿匪過程中，僅六、七、八三個月，就發展了十多萬人民自衛武裝，并將一部分地方兵團升級爲主力兵團，使原來的主力兵團得到進一步的充實，每個師基本上都編足了一萬人。

同時還加强了特種兵的建設，收集和修復了日僞遺留的殘破坦克、大炮，組成了十個炮兵團和一個高炮大隊，一個坦克大隊，擁有各種火炮一百多門，戰車四十餘輛。不久，又成立了東北民主聯軍炮兵司令部，統轄各特種兵部隊，任命朱端同志爲司令員。

至此，東北民主聯軍已組建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共五個主力縱隊，外加四個獨立師和特種兵部隊，主力部隊已達十二萬人。再加上主要由翻身農民組建的地方武裝，到十一月底，我們在東北的總兵力已發展到約三十六萬人。

與此同時，國民黨也在利用休戰時機，加緊增調和整補部隊，到九月底，國民黨在整個東北地區，也一共擁有第九十三軍、第十三軍、第五十二軍、第六十軍、第七十一軍、新編第一軍、新編第六軍共七個軍二十五萬人。連同地方團隊，國民黨當時在東北地區的總兵力共約四十萬人，祇比我們稍多一點。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于八月底致電東北局，通報國民黨軍可能于十月份向東北解放區發動大舉進攻，要求加緊做好一切作戰準備。根據總部的指示，二縱隊在九月份就把建設根據地和剿匪工作，交給了北滿軍區的地方兵團。劉震和我離開了齊齊哈爾，率縱隊司令部進駐中長路上的太康縣，我們負責主持二縱隊的工作，加强部隊整訓，全力準備冬季作戰。

這時，洪學智已奉命調到北安軍區任司令員，就和我們分手了。

九、新開嶺戰鬥

新開嶺戰鬥，是繼秀水河子戰鬥、大窪戰鬥之後，我們在東北打的比較成功的一次殲滅戰，也是我們在東北第一次殲滅了敵人一個完整師的戰鬥。

當時東北的敵人雖然略多于我們，但由于占地廣、戰綫長，沒有力量發起全面進攻，因而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後北”的方針。敵人對南滿發動進攻，對北滿采取守勢，準備先集中主力進攻南滿解放區，切斷東北解放區與華北解放區的聯系，待穩固地控制南滿以後，再集中兵力奪占北滿。

一九四六年十月初，國民黨軍開始進攻南滿解放區。至十月中旬，先後攻占我柳河、興京等地，打通了沈陽到吉林的鐵路綫。接着，又集中八個師的兵力，于十月十九日起，分三路向通化和遼東軍區領導機關所在地安東（今丹東）進攻。

遼東軍區根據東北民主聯軍總部的指示，決定誘敵深入，準備必要時放弃安東，待敵人兵力分散後，再集中兵力殲敵一路或一部。爲此，遼東軍區先以小部隊迎敵，誘敵放膽進攻，而主力三縱、四縱隱蔽集結于通化以西，待機殲敵。

十月二十六日，國民黨第五十二軍、新六軍各一部占領安東。十月三十日晚，第五十二軍二十五師進至新開嶺至陽邊的袋形谷地。這時，先期到達新開嶺的第四縱隊主力早已占領了有利地形，完成了攻擊部署。

十月三十一日拂曉，四縱以五個團的兵力向敵發起攻擊。開始，四縱由于戰術部署不當，兵力、火力不够集中，加之敵人又控制了戰場的制高點老爺嶺，致使攻勢一度受挫。

十一月二日凌晨，第四縱隊重新調整部署，將進攻兵力增加到八個團，同時集中炮兵支援十師，首先攻克了老爺嶺。制高點一丢，敵人隨即全綫崩潰，被四縱壓制于河套谷地內，敵第二十

五師被全部殲滅。

這次戰鬥，我們殲敵一個完整師，約八千餘人，四縱自己傷亡約兩千人。

戰後，中共中央專門發來賀電，并且向各部隊通報了新開嶺戰鬥的經驗。電報指出：“此次作戰證明，戰役上要集中兵力，戰術上亦須集中兵力。你們三十一日包圍二十五師，一日，九次攻擊皆未奏效；二日拂曉集中炮火破南北山（指老爺嶺）一點，從此擴張戰果，即于半天內將該師全部殲滅。爾後作戰每次均須采用此種方法。”

這次戰鬥，主要是四縱打的，四縱當時的司令員是吳克華，政委是莫文驊。在南滿的另一主力縱隊，三縱隊的司令員是韓先楚，政委是羅舜初。

我們二縱隊没有參加新開嶺戰鬥，但在通報上學習了新開嶺戰鬥的經驗。我相當强烈地感覺到，三次戰鬥，從秀水河子戰鬥、大窪戰鬥，一直到這次的新開嶺戰鬥，都證明林彪的“一點兩面”、“三三制”，以及集中優勢于敵人數倍的兵力，攻其一點的打法是非常成功的。

十、“三下江南，四保臨江”

針對國民黨軍在東北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後北”的戰略方針，林彪和我東北民主聯軍總部，針鋒相對地决定：堅持南滿，鞏固北滿，采取“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戰略戰術。也就是說，以南滿地區的主力部隊，迎殲來犯之敵，保衛解放區；以北滿地區的主力部隊，看機會南渡松花江，策應南滿部隊，南北滿部隊密切配合，力求改變東北的形勢。

爲很好地實現這一戰略部署，經中央同意，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成立了南滿分局和南滿軍區，以加强南滿對敵鬥爭的領

導。同時，派出東北局副書記陳雲兼任南滿分局書記、南滿軍區政委，并決定東北民主聯軍副總司令蕭勁光兼任分局副書記、軍區司令員，蕭華任分局副書記兼軍區副司令員、副政委，率領第三、第四兩個縱隊和三個獨立師，堅持南滿鬥争。

同時，爲配合南滿鬥争，我們北滿的部隊從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中旬起，利用松花江冬季封凍期，先後三次過江進行支援南滿部隊的作戰行動。在此期間，南滿的部隊也進行了四次保衛臨江的戰鬥。這樣，我們在以松花江爲阻隔的南滿北滿兩戰場，展開了歷時三個半月的作戰。這次作戰，就叫作"三下江南，四保臨江"。

當時，在根據地没有完全建設好、氣候嚴寒、武器裝備比敵人差的條件下，不論是南滿的部隊還是北滿的部隊，冬季作戰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難。

在北滿，由于松花江的阻隔，祇能在十二月至下一年三月半，松花江冰凍很厚的期間，人馬輜重車輛才能暢通無阻，才適合于大兵團作戰。三月半以後開始化凍，大兵團作戰就困難了。由于我軍御寒裝備不足，嚴寒季節受凍傷的威脅很大，難以堅持長期的作戰活動。

南滿的情况就更爲困難，當時南滿根據地祇剩下四個小縣，即長白山麓的臨江、蒙江、撫松和長白縣，人口僅二十二萬，地方又窮。三縱、四縱集結在這一狹小山區，二十二萬人要養活近六萬部隊和地方幹部，非常困難，總之是天寒地凍衣食困難。加上在這一地區，敵人很囂張，僞滿遺留的反動勢力較强，土匪較多，而且群衆基礎又差，部隊偵察敵情，安置傷員，補充糧食彈藥都有較大的困難。而且當時南滿領導層對根據地的意見不統一，有的主張留，有的主張走，把部隊全部撤往北滿。這樣，他們的處境更爲困難。

爲統一幹部思想，十二月上旬，南滿分局書記、軍區政治委員陳雲，軍區司令員蕭勁光在七道江召開會議，作出了堅持南滿根據地鬥争的重要決定，并得到了中央軍委和民主聯軍總部的批准。七道江會議所作出的決定，爲改變以後東北的形勢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長官鄭洞國坐鎮通化，指揮六個師第一次進攻臨江，南滿部隊開始"一保臨江"的行動。三縱從正面進行阻擊，四縱深入敵後，兩個縱隊互相配合作戰，共殲敵七千餘人。

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爲配合南滿部隊作戰，我北滿主力一縱，二縱，六縱和三個獨立師，冒零下四十度的嚴寒，越過冰封的松花江，一下江南。一縱和六縱先後殲滅了國民黨新編第一軍的兩個團和保安團隊一部。我們二縱隊攻克了伏龍泉，還在靠山屯打了一個勝仗，殲敵一千多人。我們的進攻迫使敵人暫時停止了對臨江地區的第一次進攻。由于寒流侵襲，北滿我軍凍傷減員日益增多，于是總部命令我們于一月十九日轉回江北休整。

當時對我們來說，天氣是朋友，也是敵人。因爲天氣嚴寒，松花江冰凍三尺，車輛、馬匹、汽車甚至輕型坦克，都可以從冰上通過，給大兵團的作戰行動帶來了方便。但同時，零下二、三十度以至零下四十度的天氣，給我們的部隊帶來了極大的威脅。"一下江南"的時候，正值東北"'三九'、'四九'，凍裂石頭"之時，一個晚上行軍下來，各師少則凍傷幾百，多則上千，部隊的凍傷減員數有時甚至要高出作戰傷亡數的幾倍。最容易凍傷的部位是手和脚，尤其是脚，輕者凍腫，重者發黑，就可能致殘。另外，傷員的死亡率也很高，有凍死在戰場上的，也有在向後方轉移過程中，凍死在路上的。

另外，嚴寒的天氣也給打仗帶來了很多的麻煩。因爲天氣實在太冷了，槍栓經常拉不開，凍住了。而且手一碰就粘下一塊皮。好不容易把槍栓拉開了，裏面的撞針又因冷縮變短，槍還是打不響。以後戰士們就把槍栓卸下來揣在懷裏，打仗時再裝上去。

最苦的還是守山的部隊。行軍打仗時還能活動一下身子，蹲在山上却不能動彈，乾受凍，那才是最艱苦的。送上山的窩頭，都變成了冰砣，得用槍托砸碎了，才能就咸菜吃。這個時候部隊

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管理，主要是對部隊進行如何防護凍傷的常識教育，注意保護好幹部戰士的身體，不被凍傷。還經常針對在酷寒條件下作戰的困難，對戰士們進行精神教育，并進行物質準備。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日，杜聿明又調集四個師的兵力，第二次向臨江地區發起了進攻。南滿部隊進行了“二保臨江”的戰鬥。二月六日，三縱、四縱向敵發起反擊，使敵人被迫停止了對臨江地區的第二次進攻。可到了二月十三日，南滿的形勢又緊張起來，國民黨軍又集結了五個師的兵力，分三路向臨江地區發起第三次進攻。

這時，東北民主聯軍總部下達命令，要我們在北滿的部隊“二下江南”，支援南滿作戰。二月二十一日，我們北滿的第一、第二、第六縱隊和三個獨立師，再一次越過松花江，向長春、德惠、農安方向發起進攻。六縱、一縱以遠距離奔襲手段，殲滅了新一軍的一個團。我們二縱隊則奔襲德惠，陳兵于中長路以西，擺出了一副準備進攻長春的態勢。敵人以爲我們真的要進攻長春，趕緊從南滿抽兵增援長春，從而減輕了南滿的壓力。最後經南滿部隊奮勇作戰，敵人第三次進攻臨江，又以失敗而告終。

“二下江南”的時間較短，我們衹打了一個禮拜，隊伍就撤往江北休整。當我們北撤時，國民黨軍打開了小豐滿電站水庫的水，洪水漫平了松花江的江面，淺處没膝，深處及腰。過江時，水凉扎骨。一上岸，棉褲立刻就上了凍，再加風助寒威，真算得上是透骨寒。

回到江北，部隊衹在江岸邊休整了一個禮拜，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就又命令我們第三次越過松花江南下。

這次下江南，與前兩次不同。前兩次下江南，林彪率領的前指總部，都是設在哈爾濱以南的雙城，并没有同我們一起過江。可這次下江南，林彪就帶領少數參謀，一開始就成立了一個前綫指揮所，與我們二縱隊司令部會合後，同我們一道過了松花江，在農安前綫指揮。

就在長春外圍，德惠的西北面，國民黨軍有個極爲重要的據點，名叫靠山屯。“一下江南”的時候，我們二縱隊曾攻占過這個據點，消滅了新一軍的一個加强連。鑒于這個據點對守衛長春的重要性，我們走了以後，國民黨軍又調來一個加强營外加一個地方保安團，約一千五百多人。這一次，他們精心構築了堅固的工事，想以此來作爲長春北部的屏障。

經過偵察，林彪下决心要拔除這個據點

林彪把我、劉震及五師師長鐘偉、政委王鳳梧叫到指揮所，當面向我們交代任務。他説：“這個據點雖然重要，但是離長春比較遠，比較突出。上一次，我們打過，這一次我們也要把它打掉，把守軍全部消滅掉。”

林彪又告訴我們説，新一軍難打，他一個營，我們就要用一個師去打。五師一萬多人要全部出動，還要外加一個坦克中隊的四輛坦克。爲了增加戰鬥的突然性，他還要五師采取遠距離奔襲的方式，突然包圍靠山屯，然後圍而殲之。之後，他又親自交代坦克中隊，要坦克中隊聽從五師的指揮，協助五師衝進靠山屯。

領受完任務後，五師在鐘偉的指揮下，一晚上走了八十里路，于次日拂曉前把靠山屯包圍了起來。我和劉震則跟隨着五師進行指揮。

隨行的坦克中隊，由于天黑，道路又不熟，有的一開，就開到溝裏去了，好在溝不算太深，上面還有一層很厚的冰，總算又爬出來了。

拂曉時分，總攻開始。由坦克掩護步兵衝鋒，一攻就破。大概衹經過三個小時，新一軍的一個加强營加上一個保安團，就全部被我們消滅了。這是我們第一次與坦克協同作戰，感覺這坦克真是個好東西。

這一仗打下來，我們更加敬佩林彪。以這樣一位全東北的統帥在冰天雪地中親臨前綫，與前方將士同甘共苦，除指揮整個戰局外，還直接指揮我們縱隊一個師去進攻一個據點，這是多麼的不容易呀！

我們攻占靠山屯後，敵人迅速調集第七十一軍的八十八師和八十七師一部向北增援。林彪又指揮我們以突然襲擊的手段，在農安至長春之間消滅敵人兩千多，迫使增援的敵人縮回到長春以南的公主嶺、大屯一綫守備。

我們的這一系列行動，使國民黨的東北主帥杜聿明以爲，我們這次"三下江南"的目的，是要攻占長春。因此，爲保衛長春，他繼續抽調南面的部隊向北增援。林彪見到這種情況，加之松花江開凍在即，便指揮我們又撤回到了北滿。這次"三下江南"期間，林彪自始至終都和我們在一起，是林彪親自和我們在一起打了這一仗。

由于松花江即將開凍，暫時不會有過江的作戰行動，因此回到北滿後，我們二縱隊就退回到前郭旗、長嶺、扶餘一帶，進行集結和短時間的休整。

在我們撤回北滿以後，杜聿明又開始集中大約七個師的兵力，于三月二十七日分三路向臨江地區發動第四次進攻。我南滿部隊在陳雲、蕭勁光、蕭華的指揮下，集中兵力，主動出擊，以積極的進攻達到防御的目的。四月初，南滿部隊終于打退了敵人，不但保住了臨江，南滿的局勢也大有好轉。

至此，歷時三個半月的"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勝利結束。整個戰役，東北民主聯軍共殲敵四萬餘人，迫使敵人由攻勢轉入守勢。從此，東北戰場的主動權已開始操縱在我們的手裏了。

十一、東北軍事工作會議和政治工作會議

"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結束之後，東北民主聯軍總部（簡稱"東總"）在哈爾濱分别召開了軍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會議，總結"三下江南，四保臨江"的軍事和戰時政治工作的經驗。由

于東北戰鬥頻繁，間隙時間很短，因此軍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會議是分别開的，這就節省了時間，會議都是三、五天就完了。

軍事工作會議由林彪主持，各縱隊司令員及各師師長參加了會議。會上，林彪首先聽取了各縱隊司令員的匯報，然後由林彪總結了作戰經驗，并提出了對下一步行動的要求。

林彪在會上就戰略、戰術、指揮方法、部隊作風等幾個方面，陳述了自己的一些意見。

在戰略方面，林彪指出，"三下江南，四保臨江"之後，杜聿明已變"南攻北守"爲"防御待援"，被迫采取了守勢。而我們，則衹有堅决的進攻，才是勝利之本。按照中央軍委的指示原則，"圍城打援"，應該是我們下一個階段殲滅敵人的主要手段。林彪説："堅决進攻，包圍城市，誘敵增援，消滅運動中的敵人，這就是我們下一階段作戰的目的。"

林彪要求各部隊必須盡快學會攻堅，要立即準備和訓練指揮員戰士學會各種攻打據點，攻打城市的辦法。爲此，必須加强部隊的爆破力量，學會用各種爆破手段去爆破敵人堅固的工事。日本人在東北留下了許多爆破筒，一根爆破筒就能炸掉敵人的一個大碉堡。這是我們的一個有利條件。要普遍訓練幹部、戰士學會爆破筒的使用辦法。

爲更好地進行爆破，還必須學會挖坑道。要把進攻的道路挖成溝，讓部隊從溝裏向前運動，以避免敵人的火力殺傷。另外，要攻堅，還必須要加强部隊的火炮力量，要把各種火炮集中起來使用，攻其一點，不能滿城都打。過去有的部隊的打法是錯誤的，最典型的是"三下江南"時打德惠的那一次。德惠的守敵衹有一個團，而我們的炮彈打了幾千發，滿城噼裏叭啦地響，還是没有把德惠打下來。正確的火炮使用方法，應當是首先集中炸他一個點，頂多打開個二、三十米的口子，待部隊突進去以後，再往前延伸射擊。就這樣突破一段，延伸一段，火炮才能發揮出最大的威力。

在戰術方面，林彪過去曾在阜新提出過"一點兩面"、"三三

制"。這次會議上，他總結了"三下江南"作戰經驗，又提出了"四組一隊"和"四快一慢"兩個原則。

關于"四組一隊"，林彪解釋說，"四組"，即火力組、爆破組、突擊組和掩護組。由這樣四個組，合成一個尖刀隊，這就是"四組一隊"。尖刀隊突進目標以後，對敵實行猛烈的攻擊，在敵人肚子裏面開花。

提出"四組一隊"的目的，主要是提醒大家，突擊連隊要分工，小組要互相掩護、互相配合。至于實際運用，應根據具體目標。同志們提出可以組成三個組、五個組，也有將機槍組加在一起合成一個戰鬥班的，這都可以。總之在實際運用中，要根據具體情況來定。

所謂"四快一慢"是指：第一、向敵前進要快。譬如打某個地方，怕敵人跑了，前進時要快，包圍敵人要快。第二、抓住打擊敵人的戰機後，進行準備要快。不僅看地形、選突破口、構築工事要快，準備炸藥、戰前動員、調動兵力、布置火力等也都要快，忙個滿頭大汗才好。第三、突破後擴張戰果要快。一旦突破，要盡快投入兵力，迅速擴大戰果。第四、追擊敵人要快。敵人整個潰退了，離開了陣地，我們追擊時要快，這時要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白天黑夜。

"一慢"，是指什麼時候，在什麼事情上慢呢？是指總攻發起時機的決定上要慢。一定要認真、仔細檢查準備工作是否做好，再慎重考慮一下，再下決心。在這個問題上，各級指揮員一定要沉住氣，不管是上級來催，通信員來左催右催，都要沉着應對，反正是要準備好了再打。不過，總攻一旦開始，一切就都要快。

在指揮方法上，林彪提出，要改變過去傳統的那種逐級指揮的方法，必要時，總部可以直接發出命令，指揮到師，甚至到團。總部的電臺，要保證和每個主力師、獨立師，甚至團的電臺，都能聯系上。發報的順序一般應該先是師，後縱隊，再兵團（也叫前方指揮所，即南滿前方指揮所和冀察遼前方指揮所）。部隊接到命令以後，要立即行動，各自向既定的目標前進，各走各的。

時間就是軍隊，兵貴神速，這樣，動作起來，才能比什麼都快速，要是一級一級的往下傳達，敵人早就跑了。

在部隊作風上，林彪强調，軍事行動，必須是高度的集中指揮，高度的統一行動。各級部隊都要做到聞風而動，一有命令，立即執行，不允許有一點遲疑。有不同意見可以提，但必須先堅決執行命令，然後再提出意見。

林彪還經常强調要抓緊根據地的建設，積極發動群衆，强調做好群衆工作和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我每次見到他，他都講：他衹抓三條，一作戰、二政治思想工作，三根據地建設。其它分別由東北局和民主聯軍總部領導同志分工負責。

以上就是林彪對"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的經驗總結。我個人認爲這個總結非常重要，是我軍轉入反攻前的重要精神準備。他總結、提煉出來的這些戰術原則和指揮方法，對以後東北的戰局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實上，我們以後的訓練和作戰，完全是按照林彪提出的"一點兩面"、"三三制"、"四組一隊"、"四快一慢"等戰術原則進行的。

這次哈爾濱軍事工作會議，實際上可以說是林彪和劉亞樓兩個人共同主持的。劉亞樓于一九三六年底被中央派去蘇聯學習。學習完畢，正值蘇聯衛國戰爭爆發，他不得不留在了蘇聯。一九四五年八月，他以紅軍少校軍官的身份隨蘇聯紅軍回到了東北。一九四六年初，他在大連充當我方和蘇聯紅軍之間的聯系人。隨後，林彪把他留在東北，當了東北民主聯軍總部的參謀長。林彪對劉亞樓十分欣賞，幾乎是言聽計從。據說，對炮兵的使用方法，都是劉亞樓提出來的。

在召開軍事工作會議的同時，也在哈爾濱召開了政治工作會議。東北民主聯軍各縱隊及各師的政委在一起專門總結"三下江南、四保臨江"的戰時政治工作經驗。當時的東北局副書記、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羅榮桓因患腎病，經中央批准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去蘇聯治病未歸，沒有參加這個會議。會議是由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主任譚政主持的。

會議也是首先聽取各縱隊政委的匯報，然後進行總結，最後由譚政講話。譚政講話的重點是如何加强戰時政治工作的問題。他認爲，要加强戰時的政治工作，最基本的是要抓基層，特別是要抓好連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因爲我們打仗，靠的就是連隊。連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部隊才能普遍保持高昂的士氣、必勝的信念、才能英勇頑强，果敢進取，遵守紀律，服從命令，戰爭的勝利才有可靠保證。而要抓好連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就必須先要抓好連隊的黨支部建設，這是連隊的核心。

譚政指出，"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以後，東北的軍事形勢，已開始向着有利于我們的方向發展，我們已經取得了主動。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加强進攻戰中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大力宣傳中央"圍城打援"的戰略方針和總部的"一點兩面"、"三三制"、"四組一隊"、"四快一慢"等戰術原則，使部隊指戰員都能懂得下一仗該怎麽打，該如何在盡量減少自己傷亡的基礎上，大量消滅和殺傷敵人。進攻戰中的政治工作是最重要的，要加强，但堅守陣地的教育也要做好，要做到攻必破、守必牢。攻，就能攻城、克池，迅速消滅敵人；守，就能堅決守住，做到人在陣地在。

他强調，一定要結合部隊的實際進行政治思想教育，把政治工作做得生動活潑。一定要結合每個人的職責、每個部隊的任務和每個單位所擔負的工作，來進行有針對性的工作。要按照每次戰鬥任務，在每個戰鬥行動中，指戰員們所存在的實際思想問題進行工作。這樣的思想教育，才是最實際的。

他還説，東北的部隊來自四面八方，因此，搞好部隊的團結，是政治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要注意强調部隊内部的團結，幹部、戰士團結一心，上下一致，艱苦與共，共患難，同生死。同時，更要特別强調各個部隊之間的團結和協作，强調各個班、各個排、各個連、各個營、各個團、各個師、各個縱隊之間，兄弟部隊之間，都要加强團結。要做到協同一致，互相幫助、互相照顧，互相依靠。在協同作戰時，不爭俘虜、不爭槍，以完成共同的戰鬥任務爲主要目標。

他還認爲，搞好戰勤工作，也是部隊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戰爭打到那裏，兵站就要設到那裏。尤其是在東北的冬季，天寒地凍。嚴冬作戰，部隊很苦，很冷，一定要搞好前綫部隊給養，保障供應，保持指戰員的健康和體力，同時加强防凍教育，減少部隊減員。

另外，在戰場上喊話，對瓦解敵軍很有作用。要讓所有的戰士都學會一定的喊話内容。當然，有的時候不能喊，因爲要保守軍事秘密。衹有在戰場上形成了對峙，包圍了敵人以後才可以這樣做。

他還在講話中特別强調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執行工作。他説："對過去規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定要堅決執行。我們打仗，一定要依靠人民、依靠群衆，搞好軍民關系。尤其是在東北這個新地區，執行好'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最有效果的。"

譚政最後説："總之，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與每個戰鬥、戰役的實際行動完全結合起來、一定要把工作做到每個人的身上，不要説空話。"

譚政講話的要點，我能回憶起來的，大致上就是這麽幾條。當然，這些也是羅榮桓過去一再强調的。

我可以這樣説，譚政講的這幾條政治工作原則，在以後東北的戰場上是長期起作用的。雖然在以後的每個戰役、每次戰鬥，都有不同的任務，不同的内容，而且我們都要隨時結合當時當地的敵人情况，地形情况和戰術要求，戰鬥方式，以及各種武器、槍炮、刺刀、手榴彈的使用去做思想政治工作，注意怎樣結合實際來鼓舞士氣，但是一些總的原則是不會變的，也没有變，以後一直是這樣做的。

會議結束後，由于兩個會議都要立即深入傳達到連隊的每個戰士，要反復進行教育，以便使他們在作戰行動中能堅決貫徹執行，所以我開完會就趕回部隊，布置傳達貫徹執行，没有在哈爾濱多呆半天。

十二、夏季攻勢

一九四七年五月初，東北局召開了一個會議。會議根據毛澤東二月一日發表的《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一文的精神，對東北的形勢和任務作了分析。五月五日，會議作出了《關于東北目前形勢與任務》的决議（即《五五决議》）。决議指出，從貫徹執行《七七决議》以來，東北的敵我力量對比已發生了變化。當前，東北正處于一種新的形勢，敵人已不得不從進攻轉入防御，而民主聯軍則從防御逐漸轉入了進攻。這就在東北全黨面前提出了一個新的任務，即："積極組織力量，全力準備大反攻，大量殲滅敵人，大量收復失地，鞏固和擴大解放區。"

一九四七年春末，國民黨在東北的軍隊，還保持有正規軍七個軍，連同非正規軍部隊，共約四十八萬人，主要配置于松花江以南的鐵路兩側，以及赤峰、承德地區。他們根據蔣介石當時對東北的"内綫作戰，持久守勢"的方針，企圖鞏固其占領區，等待關内抽兵增援後，再發動攻勢。

而同時，東北我軍全部野戰軍和地方軍，連同一九四七年四月劃歸東北民主聯軍建制的冀察熱遼軍區部隊，總兵力已達四十六萬人，敵我兵力基本相等。但我們的機動兵力已超過了國民黨軍隊。

當時我們在北滿根據地已經比較鞏固，而且有松花江阻隔，無須重兵防守。林彪决心待松花江開凍後，率北滿主力大舉南下，打通南北滿的聯系，變兩個拳頭爲一個拳頭，轉入戰略反攻，從根本上扭轉東北戰場的形勢，并配合關内各戰場作戰。

五月十三日，東北民主聯軍開始發動夏季攻勢。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林彪集中南、北滿主力，在長春至沈陽段和沈陽至吉林段鐵路兩側對國民黨軍發起了戰略性的反攻戰役。

林彪初定的整個夏季攻勢作戰計劃，原來祇是一步。在後來的實際執行過程中，變作了兩步：第一步，從五月十三日開始到六月三日，各個主力部隊同時對防御薄弱之敵，實施突擊，殲滅分散孤立之敵，收復小城市，即縣城，和廣大鄉村；第二步，從六月十一日至七月一日，集中兵力機動作戰，相機奪取中等城市，并尋求機會，殲滅敵人部分主力。

在夏季攻勢作戰的第一階段，"東總"給予我們二縱隊的任務，是和一縱隊及兩個獨立師一起，遠距離奔襲懷德縣城，"圍城打援"。

接到"東總"的命令，五月十日，我們全縱隊就集結在前郭旗、扶餘一帶，進行臨戰前的最後準備。"三下江南"以後，我們一直都在積極準備下一步的戰鬥行動，在軍事、政治以及後勤等各個方面，作了全面的部署。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準備，就是向部隊指戰員全面傳達"東總"軍事工作、政治工作會議和《五五决議》的精神。同時，根據"東總"的要求，全面開展了攻堅打援的軍事訓練，取得了很好的訓練效果。

五月十三日上午，部隊開始出發南下，一晝夜行軍將近二百里，以遠距離奔襲的方式，突然包圍懷德縣城。

當時二縱隊縱隊部，衹有劉震和我兩個人，没有副司令，没有參謀長，連政治部主任也没有。在走到離懷德縣城大概還有十來里路的地方，劉震和我兩個就分開了。劉震直奔懷德城下，率領四師和六師，直接指揮包圍懷德城。我則帶着直屬隊的一部分，在那裏布置兵站運輸、糧食接濟，設置醫院、傷員收容所等，準備各種後方工作。

後方工作部署完了以後，我趕到懷德城下，與劉震會合。我們一起召集四師和六師的師、團幹部開會，研究攻城計劃。我們命令鐘偉、王鳳梧帶領五師部隊，繞道進到懷德以南，在公主嶺與懷德之間的大黑林子一帶，阻擊敵人的援兵。

從五月十四日開始，我與劉震同四師和六師的師、團幹部一起看地形，偵察敵情，修築工事，挖掘坑道，布置炮火，選擇突破口和主攻方向，研究兵力配置，以保證主攻方向的絕對優勢兵

力。各攻城部隊晝夜都在進行攻城準備。五月十七日清晨，在一切準備就緒後，劉震一聲令下，四師從西南向東北，六師從東北向西南兩路合圍，開始攻城。結果一突就破。經過短時間的巷戰，黃昏時分就結束了戰鬥。

懷德一戰，我們全部消滅了國民黨第九十一軍的一個加强團，團長在逃跑時被當場擊斃，副團長以下二千四百多人被俘。這是夏季攻勢開始後，我們打的第一個勝仗。

好，正在這個時候，懷德城內剛剛解決，五月十七日黃昏，國民黨第七十一軍軍部率八十八師全部及九十一師大部趕來增援，就在大黑林子一帶，被我預先埋伏在那裏的一縱、二縱五師及兩個獨立師團團圍住。當時敵人正在進行中，還没有來得及修築工事，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被我們圍住了。在我們的伏擊下，敵人很快就垮了下來，祇幾個小時就解决了戰鬥。除第七十一軍軍部有少數人跑掉以外，八十八師和九十一師一萬五千多人全部被殲。

我們二縱四師和六師在攻占懷德城以後，乘勝前進，又攻占了四平以北的公主嶺，切斷了長春同四平之間的鐵路聯系。同時，我東滿的部隊占領了四平以東的東豐、西豐及梅河口，南滿的部隊攻占了四平以南的昌圖、開原，切斷了四平和沈陽之間的鐵路聯系。另外，遼西軍區的部隊在向四平以西的鄭家屯推進，也攻占了玻璃山和雙山。中長路兩側分散孤立的敵人據點已基本上被我們清除乾净，四平陷于孤立。此時，我們的主力部隊就擺在中長路的兩側，準備圍攻四平和阻擊向四平增援之敵。這就是夏季攻勢第一階段結束時的敵我態勢。

六月十一日，夏季攻勢的第二階段開始。這一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是圍攻四平和打援。當時林彪和"東總"的部署是，集中七個師的兵力圍攻四平，把十七個師放在四平以北及以南地區，擔任阻援打援任務。

在這一階段中，"東總"給我們二縱隊的主要任務是打援，要我們把四師、五師和六師三個師的部隊，全部擺在昌圖、泉頭車

站這一綫，構築好堅固工事，堅決打擊從沈陽出來增援四平的敵人。

由于夏季攻勢開始以來，我們的部隊攻無不克，因此輕敵思想就有所抬頭。前綫指戰員根據所得情報，估計四平守敵約一萬八千人，就極力請戰，攻取四平，結果林彪同意了，下達了攻擊命令。

從六月十一日開始，圍攻四平的部隊開始攻打外圍據點。六月十四日攻城，一直打到六月三十日，攻城部隊打得英勇頑强，但仗打得十分艱苦。雙方的幾百門火炮對射，十多萬士兵手中的步槍、衝鋒槍、輕重機槍同時嘯叫，手榴彈象冰雹似的互相砸向對方。天空中，國民黨的飛機輪番俯衝轟炸。地面上，人對人地激烈巷戰，一堵墻，一堵墻地争奪。白天，民房和各種建築物熊熊燃燒，濃烟滚滚；黑夜，整個城市火光衝天，如同白晝。

經過半個多月的激戰，雙方都損失慘重。據事後統計，國民黨軍損失兩萬餘人，我們也傷亡了一萬多人，我們有些部隊失去了戰鬥力，但四平始終没有攻下來。實際上當時堅守四平的是國民黨七十一軍由軍長陳明仁指揮的三萬五千多人，他們構築了堅固的工事，拼命死守，等待援軍。雖然損失了兩萬多人，但還剩下一萬餘人。後來，陳明仁成爲蔣介石風雲一時的戰將，蔣介石還給了他一枚勛章，并且升他爲兵團司令員。在四平，林彪没有捉住他，然而他得到了教訓，一九四九年在長沙還是率領他的兵團向四野司令員林彪投降起義了。據説，當時他伸出大姆指説："明仁敬佩林彪和四野。"當然，這是後話了。

就在這時，六月二十日分别從長春、沈陽出來增援的國民黨十個師的部隊，采取穩扎穩打，齊頭并進的戰術，已逐步逼近了四平，而這時，四平又久攻不下。林彪果斷决定：從四平撤兵。

根據總部的部署，當時我們二縱會同其他兄弟部隊，一直隱蔽集結在昌圖、泉頭車站一綫，準備迎戰沈陽北援的敵人，但因敵人隊形過于密集，使我們無隙可乘，在殲滅了敵人一個團之後，六月三十日就接到"東總"的命令，所有部隊全部停止攻擊，

撤出戰鬥。夏季攻勢宣告結束。

四平攻堅戰以失敗而告終。我跟隨林彪打仗多年，極少看到他打敗仗，但四平攻堅一戰，却是他所打的少有的一次敗仗。雖然是勝敗乃兵家常事，世上没有一仗不敗的常勝將軍，但是，從總結教訓的角度看，四平攻堅戰的失敗，主要是由于輕敵。

由于輕敵，對敵人的力量估計不足，原估計不超過兩萬，實際兵力三萬五千人，超出原估計數約一倍。而且敵人有空投接濟，彈藥充足，而我們則有時打着打着，彈藥就供應不上了；由于輕敵，在外圍據點還没有全部肅清，炮兵還没有全部進入陣地時，就匆忙發起了攻擊；由于輕敵，攻城時，也没有集中絕對優勢兵力，由于兵力不足，以致不能多路突破，突破了的也難以迅速發展。

由于輕敵，對自己的力量估計也過大。應當説，我們還是第一次打這樣的實打實的大規模的攻堅戰。雖然夏季攻勢前，我們曾就攻堅問題作了一些準備，但經驗還是十分不足。這次攻城，就缺乏事前的深入調查研究和細致的準備工作。

夏季攻勢歷時五十天，共殲敵八萬三千餘人，收復城鎮三十六座。攻勢結束後，東滿、西滿、南滿、北滿和冀察熱遼解放區連成了一片，南滿和北滿的主力會師，形成拳頭，基本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攻勢結束後，我們的部隊集中在中長路、北寧路兩側的廣大地區。我們二縱來到了雙山、長嶺一帶進行整訓。後勤支援這時已全部溝通，部隊前進到哪裏，兵站就設置到哪裏，後勤補給綫就跟到哪裏。從此，傷病員、彈藥、糧食、裝備等一切運輸，全由後方負責，部隊已無後顧之憂了。

不久，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司令員兼政委林彪，副政委羅榮桓，在哈爾濱以南的雙城指揮部，召集軍事工作會議，總結夏季攻勢中的經驗教訓，各個縱隊的司令員參加了會議，政治委員留在家中主持整訓工作。于是，我們二縱隊的劉震司令員帶着我們攻克懷德和大黑林子阻擊敵人的作戰經驗，去雙城參加了會議。

會議結束後，劉震回來向我傳達説，林彪在會上就城市攻堅的戰術問題，講了許多意見。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進一步强調了“四快一慢”的戰術原則，强調在決定發起總攻的時機上一定要“慢”，但又不能變成慢慢騰騰、懶懶散散，要防止左、右偏差，政治上是如此，軍事上也是如此。

林彪説，攻城的目的是既要攻城，又要打援，有時以攻城爲主，有時以打援爲主，有時兩種情况兼而有之，這要根據當時的敵情區别對待。但要注意的是，攻堅時必須集中兵力、集中火力，突破一點。爲此，一定要組織起尖刀隊，以“四組一隊”的隊形，直插敵人心臟，首先集中力量打擊敵人的首腦機關。另外，進攻時隊形一定要分散，要教會戰士如何利用地形來保存自己，减少傷亡。

林彪還强調，要搞好部隊的訓練。在軍事訓練方面，首先要抓好連隊，抓好戰士的五大技術訓練，即射擊、刺殺（拼刺刀）、爆破、手榴彈和土工作業（會做工事、會挖坑道），并且要讓戰士多練習班進攻、排進攻，使每個連隊都能獨立作戰，成爲戰鬥中的一把尖刀。在訓練時，應要求部隊構築起同敵人一樣的工事，有外壕、有鹿砦，有碉堡，有鐵絲網等各種障礙物，也就是説，把敵人工事中所有的一切都做上，然後反復進行對抗演習，以提高部隊的戰術運用能力和突破能力。

除此之外，林彪還要求我們的團部、師部、軍部的指揮機關要進一步練好夜間作戰，在戰術上，要争取先發制人，動作要迅速突然，長途奇襲，使敵人想跑也跑不了。

會上，林彪還就四平攻堅戰的失敗作了檢討。認爲四平歷時半個月的攻堅戰，最後打成了得不償失的擊潰仗，成爲相持不决，消耗自己力量的不利戰鬥，對此，總部應進行檢討與吸取教訓。

這次會議的召開，主要是對夏季攻勢經驗教訓的總結，實際上也是對秋季攻勢的一個重要準備。

十三、秋季攻勢

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勢結束後，我們收復了大片地區，爲此中央東北局發出《關于新收復區工作的指示》，要求東北全黨象一九四六年七月初那樣，動員幹部下鄉工作一樣，抽調大批有經驗的新、老幹部，組織工作團到新收復區去，深入發動群衆，實行土地改革。

與此同時，爲適應戰爭發展的需要，八、九月間，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又下令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部隊整編工作。將西滿遼吉軍區的部隊編爲第七縱隊，由鄧華出任司令員，吳富善爲政治委員。以冀熱遼軍區的部隊組成第八縱隊和第九縱隊。八縱司令員黃永勝，政委劉道生，後爲邱會作，九縱司令員詹才芳，副政委李中權。以東滿的三個獨立師，組成第十縱隊，司令員梁興初，政委周赤萍。同時成立南滿軍區前方指揮所，司令員蕭勁光，政委蕭華，成立冀察熱遼軍區前方指揮所，司令員程子華，政委黃克誠。

整編以後，東北民主聯軍的主力部隊已發展到九個縱隊（中缺第五縱隊），三十九個師，連同地方武裝共五十一萬人。

八月十五日，蔣介石因國民黨軍在東北戰場失利，決定撤銷東北保安司令部，將其并入東北行轅，派總參謀長陳誠兼任東北行轅主任，鄭洞國、羅卓英爲副主任。杜聿明、熊式輝被免職後，離開東北。

陳誠到東北後，將國民黨在東北原有的九個軍，編成四個兵團，同時大量收編游雜武裝，將其編爲十一個暫編師，撥歸各正規軍指揮。這樣一來，東北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也增至了五十萬人。

陳誠認爲，杜聿明“防御待援”的戰略方針實際上是被動挨打的方針，因此他開始將主力部署于長春至沈陽和沈陽至錦州一

綫，以軍爲單位進行重點守備，并把重兵集結于沈陽地區，以便隨時都能向南和向北增援，從而確保北寧路、維護中長路，打通錦承路。陳誠把這一戰略方針稱之爲“機動防御”。

這樣，在秋季攻勢發起以前，敵我雙方的總兵力已基本相等，我還略占優勢。

九月上旬，爲配合全國各個戰場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攻勢，林彪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精神，決定發起秋季攻勢。他準備采取大兵團作戰的方式，首先向國民黨兵力較爲薄弱的南綫發動進攻，調動其北綫兵力南援，爾後乘機在北綫出擊，南北相互配合，交替進攻，以求大量殲滅國民黨軍隊的有生力量。

九月六日，陳誠爲打通錦承路，指揮國民黨軍隊分三路向建昌方向進攻。林彪在得知敵人這一行動以後，當即命令南滿第八、第九縱隊兼程向建昌方向急進迎敵。九月十四日晨，八縱、九縱與敵遭遇。一場戰鬥下來，殲敵將近兩個師。

爲配合南綫部隊作戰，林彪又命令北滿的一縱、二縱、三縱、四縱、六縱、七縱、十縱共七個縱隊，以遠距離奔襲方式全面展開行動，分別向沈陽以北各據點發起攻擊，并破襲北寧路和中長路，同時佯攻吉林市，誘敵增援，尋機殲敵。

十月八日，蔣介石飛抵沈陽，親自調整東北的軍隊部署。并緊急從華北抽調五個整編師（軍）和一個炮兵團出關增援。却没想，這些增援的大部分部隊剛一出關就被圍住，前進不得，祇有一小部分部隊到達了預定地點。

在秋季攻勢中，我們二縱隊的四師、六師始終集結在長春與四平之間的公主嶺、梨樹這一綫。總部給我們的任務是箝制新一軍，祇要新一軍敢出來，就要打他個措手不及。但新一軍始終都没敢出來。所以，在整個的秋季攻勢中，我們二縱的四師、六師同一縱一樣，始終没有打什麽大仗，祇消滅了敵人的幾個據點，大概前後一共殲滅了四千多人。

祇有五師是個例外，他們在這次秋季攻勢中參加了一次大的戰鬥。五師的戰鬥力很强，可以說是東北民主聯軍中主力的主

力。《東北三年解放戰爭軍事資料》是這樣評價五師的：

“該部隊系東北部隊中最有朝氣的一個師，突擊力最强，進步快，戰鬥經驗豐富，攻、防兼備，以猛攻、猛打、猛追三猛著稱，善于運動野戰，攻堅力亦很頑强，爲東北部隊中之頭等主力師。”

五師師長鐘偉打仗勇猛如虎，深得林彪的喜愛。鐘偉以後升任十二縱隊的司令員，是東北野戰部隊中唯一的由師長直接升任縱隊司令員的。五師政委石瑛，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工作幹部，他善于做部隊的政治工作，而且善于團結鐘偉，善于調動師團軍事指揮員的積極性。

在秋季攻勢中，五師被林彪抽調出去，由東北民主聯軍總部直接指揮。在戰役中，他們打了個勝仗，殲敵兩千多人。林彪當時很重視五師，五師經常都是由他直接指揮，那裏需要增援，他就把五師調往那裏。

當時東北民主聯軍總部有個好作風，就是使所有的縱隊幹部都能够及時了解中央的指示，了解總部對東北的整個部署，這是當時林彪在指揮上的最大特點。當時，祇要有部隊行動，我們很快就能知道。不管哪個部隊往哪裏去了，總部都及時通報，使我們這些縱隊幹部都能心中有數。

十一月五日，歷時五十天的秋季攻勢結束。在整個秋季攻勢中，我們共殲敵近七萬人，攻克城市十五座，迫使敵人孤守在長春、吉林、沈陽、四平等三十四座城市及其附近地區，所占地區祇占東北總面積的百分之十四。

秋季攻勢結束後，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又召開了軍事工作會議。在會議上，林彪對秋季攻勢中的經驗、教訓加以總結，又提出了“三猛戰術”和“三種情况，三種辦法”兩個戰術原則。

“三猛戰術”，即“猛打、猛衝、猛追”。所謂“猛打”，就是在選定的主攻點上，應將各種機關槍各種炮、適當的配備齊，而且盡量秘密地接近敵人，讓各種火力交叉集中，再加爆破組的爆破，統一向主攻目標射擊，于同時猛烈開火，這就是我們所謂“猛打”。對各種火力用法，林彪是一向反對零敲碎打，反對把火力到處分散使用。

所謂“猛衝”，就是在用猛烈的火力對主攻點開始攻擊後，突擊部隊應乘敵人發呆、發慌，一時拿不出主意和來不及調兵之際，猛烈衝鋒，躍然奮進，以刺刀、手榴彈開路，奮勇向前衝，以刺刀刺殺敵人。林彪認爲，不敢以刺刀殺敵的，不算最勇敢的部隊與戰士。他要求我們各部隊，都必須具有刺刀見血的威風和隨手榴彈飛出爆炸而猛進的勇氣。

所謂“猛追”，就是對已被衝亂而潰亂的敵人，應實行猛烈追擊，要一直壓下去，追到底，一直到把敵人殲滅爲止。

“三種情况”，講的是處于防守中的敵人三種不同的狀態：一種是敵人守，一種是敵人要退不退，一種是敵退。針對這三種不同的情况，林彪提出了三種基本不同的打法。如果敵人守，就要經過正式的準備，等完成一切準備工作後再發起攻擊；如果敵要退不退，我們若是準備好了再打，敵人會跑掉；不準備就打，又可能會被敵人碰下來。因此，這時應先將敵人圍起來，圍而不攻，或圍而小攻。用一部分力量跟他打，抓住他，使他走不掉，然後準備好了再大打；如果敵人退，就要猛追，這時不要等待命令，這時，不準備就是合乎戰術要求，準備了反而不合乎戰術要求，而且不要怕部隊少，也不要怕情况不清楚，追就是了。這就是“三種情况，三種打法”戰術原則的基本內容。

林彪還要求，東北民主聯軍從上到下的所有軍事指揮員和政治幹部，都要把這些戰術原則準確地掌握，并靈活地根據具體情况應用于實戰中。當然他也强調，戰役指揮員是應該組織有計劃的追擊。

以後，我們就將“一點兩面”、“三三制”、“四快一慢”、“四組一隊”、“三猛戰術”、“三種情况，三種打法”，統稱爲“六項戰術原則”。這“六項戰術原則”，是林彪根據當時東北的戰爭進程，及時總結經驗教訓，經過深思熟慮而提出來的，各個階段部

有側重。這些戰術原則在以後東北的解放戰爭中起了應有的作用。應當説，衡量這些戰術原則的成功與否，應該是創立者所指揮的戰爭的勝利或是失敗，是戰爭的實踐。

“九一三事件”以後，有許多不負責任的説法，對林彪提出的這“六項戰術原則”進行了惡意的貶低或曲解，這是極不尊重歷史、極不尊重事實的行爲。即便就是毛澤東，當年對林彪的這些戰術原則也是充分肯定的。

當然，無論多麼成功的戰術原則，都祇能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對這一點，林彪自己當年也曾説過，這些經驗，是在一定條件下產生的，因此，不是在任何條件下都可以運用這些經驗。在不同的條件下，會產生不同的經驗。

我個人認爲，當時東北民主聯軍，由小到大，由弱變强，由被動轉爲主動，在全國率先轉入全面反攻，并取得全面勝利，固然是由于有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正確領導，有關内各戰場的密切配合、協同作戰，有東北局的集體領導和决策，有廣大指戰員的共同努力，但林彪當時在東北戰場上刻苦鑽研戰爭藝術，善于總結戰鬥經驗，善于把握戰機的能力和高超的戰爭指揮藝術，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個原因，否則就無法解釋我們在東北戰場上各次戰役的勝利。

十四、冬季攻勢

在五十天的夏季攻勢和五十天的秋季攻勢以後，連續九十天的大規模的冬季攻勢又開始了。

秋季攻勢結束，爲了與我們相抗衡，國民黨東北行轅主任陳誠竭力擴編正規軍。除原有的九個軍以外，又編成了新三軍、新五軍、新七軍三個軍，另加三個暫編師，使其總兵力達到了五十八萬餘人。陳誠在吉林、長春、四平等戰略要點上，各配置三至

五個師來擔任獨立防守任務。對鐵路沿綫的一些次要城鎮，也各配置一至兩個師，用以擔任守備任務和互相支援。另在沈陽、鐵嶺集結重兵，以利于往來增援，這就是冬季攻勢開始以前敵人的態勢。

東北我軍在秋季攻勢結束以後，根據“東總”的指示，進行了短期的休整。經過休整，部隊士氣旺盛，鬥志高昂。東北民主聯軍的總兵力達到七十三萬人，已超過了東北國民黨軍的總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六。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報請中央、中央軍委的同意和批準之後，林彪决定利用江河結冰，便于機動兵力作戰的有利條件，集中全部主力，發起冬季攻勢。

在冬季攻勢中，我們除同樣采取南北夾擊，東西呼應的大規模運動戰之外，針對敵人集中兵力，固守大中城市，我軍打運動戰的機會日益減少的情况，又進行了必要的有利條件下的攻堅戰。

冬季攻勢的作戰行動共分爲四步。

第一步，我們第二縱隊和其它縱隊自公主嶺以北地區迅速南下，二縱和七縱于十二月十五日包圍了法庫的守敵。第八、第九縱隊由朝陽地區東進，于十二月十六日包圍了新立屯的守敵。其餘各縱隊同時向鐵嶺、沈陽之間的地區開進，準備迎殲沈陽、鐵嶺出援之敵。

我們突然包圍法庫、新立屯之後，國民黨新六軍、新二十二師及新三軍于十二月十六日分别由鐵嶺、沈陽出援。新二十二師在進至鐵嶺以西的鎮西堡、娘娘廟一綫時，發覺了我們的打援企圖，即向鐵嶺回撤。十二月十八日，二縱五師追殲該敵近一個團。同時，第七縱隊也在法庫以南的大孤家子等地，殲國民黨新三軍暫五十九師主力一個團。這就是冬季攻勢第一階段的一些情况。

第二步，陳誠在發現我們主力集結于沈陽以北地區後，于十二月二十日急調長春、四平、開源、錦州和遼南等地的新一軍、第七十一軍、新五軍主力向鐵嶺、新民、沈陽地區集結，以解除

我們對沈陽的威脅。爲創造戰機，林彪、羅榮桓命令第一縱隊一
部佯攻法庫，而將主力隱蔽集結于沈陽西北，準備迎殲可能從沈
陽出援的敵人。同時，命令第二和第七縱隊及炮兵司令部主力，
向西迅速突擊進攻彰武。根據林彪、羅榮桓命令，這次攻襲彰武，
由二縱隊司令員劉震實施前綫指揮，但一些問題都是由我們和七
縱隊以及炮兵司令部的領導，共同商量决定的。

接到進攻的命令，我們二縱隊和七縱隊一起，于七月二十日
晚迅速從法庫遠距離奔襲彰武，一夜之間就完成了對彰武的包
圍。

在一起看了地形之後，劉震、我和七縱司令員鄧華、政委吳
富善，炮兵司令部司令員蘇静、政委邱創成共同開會研究决定作
戰方案。整個的作戰部署是，先肅清彰武周圍的敵人據點，由二
縱負責打掉彰武東南的三個據點，由七縱負責打掉西北的兩個據
點，由二縱五師擔任打援任務，準備迎擊由新民、新立屯可能來
援的敵人。攻城時，二縱以兩個師從東南向彰武并肩突擊，七縱
以兩個師從西北向西南并肩突擊。炮兵集中使用，主力放在二縱
這邊的主要突破口上，炮兵司令部政委邱創成負責在我們二縱這
邊指揮炮兵。炮兵的一部分，放在七縱的突破口上。二縱與七縱
的作戰分界綫，是彰武城最中間的一座廟宇。廟宇以南地區由二
縱負責，以北地區由七縱負責。作戰方法是，先打外圍據點，進
而包圍彰武城，部隊以土工作業，在地下挖溝，一直挖到彰武城
的外壕、鐵絲網和城墻跟前，然後進行爆破攻城。同時還商定
會後每天以電話互相交流準備工作情况，待一切準備好了以後
就發起總攻。

十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兩天，二縱和七縱各自打掉了指
定的據點，肅清了外圍。然後，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個
晚上挖溝，白天因防止敵人飛機、炮火的偵察、轟炸，祇能安排
部隊休息，天黑以後，才開始作業。當時正值冬季嚴冬，天寒地
凍，凍土難挖，有的實在不好挖的，祇能用熱水在上面澆，把凍
土化開後再挖。就這樣，經過三個晚上的艱苦作業，二縱和七縱
按照既定部署，各自挖了一條長達三千多米的深溝，一直挖到了
彰武城下。

然後，我們又同在我們二縱這邊負責指揮的炮兵政委邱創成
一起，研究確定了炮兵的位置和部署。全部準備工作完成以後，
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二縱、七縱和炮兵司令部的領導又共同開
會，研究確定了攻擊日期和步驟。我們將總攻計劃報告了東北民
主聯軍總部，報告了林彪司令員和羅榮桓副政委，建議在二十八
日晨六時開始攻城。

建議很快得到了批準。于是，我們命令二縱、七縱如期開始
行動。

十二月二十八日早上六點，炮兵開始集中火力轟擊突破口。
打了大概祇四十分鐘，就把突破口前沿的工事、鐵絲網全部摧毀
了。接着，突擊部隊引爆了堆在城墻根下地道口裏的炸藥。我們
原來還準備了不少梯子，準備爬城墻用。結果炮兵一轟，加上城
根前地道口的炸藥一炸，幾乎就把城墻打平了，連外壕都差不多
被填了起來。

結果，部隊一突就破。等部隊突進城以後，炮兵就延伸射擊，
五十米一打，五十米一打，一直掩護部隊打到分界綫。由于我們
的炮火猛烈，把敵人打得躲在地堡裏，統統不敢抬頭，有的就藏
在屋子裏不敢出來。

到上午十點多鐘，二縱和七縱的部隊就在分界綫上會合，攻
克了彰武城。經過四個多小時的戰鬥，彰武守敵國民黨第四十九
軍七十九師等部一萬多人，全部被我們消滅，一個不漏，并俘獲
了他們的少將副師長李福太。

攻占彰武不久，林彪、羅榮桓就來了命令，要二縱、七縱就
在彰武地區原地整頓休息，準備繼續戰鬥。這就是冬季攻勢的第
一步。

早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林彪、羅榮桓就致電中央
軍委，建議將東北民主聯軍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以示中國共產
黨領導的軍隊之統一性。對此提議，周恩來代表中央軍委復電表

示贊同。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中央軍委正式批示，東北民主聯軍改稱爲東北人民解放軍，仍由林彪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第一副司令員高崗，第一副政治委員羅榮桓。這一決定傳達下來以後，東北部隊的全體指戰員都很高興。當時正值新年，各個部隊都殺猪宰羊，一來歡度新年，二來慶祝改變番號。

接着，開始了冬季攻勢的第三步。

在我們攻打彰武期間，沈陽之敵按兵不動，不敢出來增援，使我們"圍城打援"的計劃落了空。這時，林彪下了命令，以三縱、六縱、十縱三個縱隊，除以一部包圍法庫外，主力在沈陽西北隱蔽待命。其餘各縱分別向沈陽以南、以西地區出擊，擴張戰果。到十二月底，各個縱隊先後攻占了北票、黑山、大虎山、臺安等地。

各縱隊在沈陽以西、以南地區的活動，造成了敵人的錯覺，認爲我們主力已經分散。于是，從一九四八年元旦起，陳誠集中新五軍、新三軍、新六軍、第七十一軍和新一軍的主力共十五個師，分三路向彰武、法庫推進，想解法庫之圍。

這個時候，林彪的目的達到了，敵人終于動了。原來不出來的敵人出來了。這正好造成了理想的在運動戰中分批殲敵的有利時機。林彪當即決定，集中主力，首先殲滅比較孤立突出和戰鬥力較弱的左路軍新五軍，爾後再視機擴張戰果。

一月五日，我們二縱和原先在沈陽西北地區隱蔽待命的三縱、六縱、十縱，奉命按預定部署，將新五軍主力合圍于公主屯地區。接着，對被圍之敵展開猛攻。經一月六日和七日兩天激戰，我們就在公主屯周圍地區，像抓鴨子一樣，把新五軍軍部及第四十三、第一九五師的官兵，包括伙夫、馬夫在內，全部都俘虜過來了。新五軍軍長陳林達，第四十三師少將師長留光天、少將副師長程化龍、少將參謀長易希般，第一九五師少將師長謝代蒸、少將副師長閻咨筠、少將參謀長陳士杰，一個不落地都被我們抓了過來。

在圍殲新五軍的戰鬥中，二縱和三縱的部隊還發生了爭繳槍

支，爭搶俘虜的情況，鬧了一點小衝突。兩個縱隊的領導知道這一情況以後，立即各自制止了自己的部隊，没有發生大的問題。這一情況被東野總部領導知道以後，不僅没有批評，反而還表揚了我們，說二縱和三縱互相讓步的這種態度很好。

新五軍主力被殲後，其它兩路敵人倉惶退回鐵嶺、沈陽。林彪見暫無戰機可尋，又正值嚴寒，于是决定結束第三階段作戰，命令各縱隊轉入短期休整，治療凍傷，補充兵員、彈藥，調整部隊，總結經驗。這是東北戰場冬季攻勢的第三步。

由于國民黨在東北的部隊屢受打擊，損兵折將，丢城失地，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蔣介石于一月十日飛抵沈陽，召開軍事會議，進行重新部署。蔣介石决定，成立"東北剿匪總司令部"，并在錦州成立冀遼熱邊區指揮所，以衛立煌爲"東北剿總"總司令兼東北行轅副主任，鄭洞國爲副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范漢杰爲副總司令兼冀熱遼邊區指揮所主任。雖然陳誠還是東北行轅主任，但已無實權。當陳誠于二月五日返回南京後，衛立煌就兼任東北行轅主任。這是繼陳誠更换杜聿明以後，國民黨在東北第二次更易主帥。

一月二十日，爲繼續發展冬季攻勢的勝利，林彪、羅榮桓發布命令，各縱隊結束短期整訓，繼續向敵人發動攻勢。冬季攻勢的第四步就又開始了。

命令下達後，到二月二十七日，我們在不到四十天的時間裏，先後攻占了新立屯、溝幫子、盤山、遼陽、鞍山、營口、法庫、開原等地。在我們攻占這些城鎮時，沈陽之敵孤守沈陽，祇作了一些象徵性的出援。

這個時候，林、羅爲完全切斷沈陽與長春之敵的聯系，在攻占法庫、開原後，命令主力向北移動，再次攻奪四平。如果沈陽之敵出援的話，就力爭殲滅他們一部分，爲最後奪取全東北創造條件。

林彪的部署是：以一縱、三縱、七縱及獨立第二師主攻四平，由一縱司令員李天佑、政委萬毅統一指揮。我們二縱、六縱、八

縱、十縱及三個獨立師，集結在昌圖、開原、通江口地區，準備殲滅可能從沈陽、鐵嶺向北援救四平之敵。

三月十三日凌晨，主攻四平的部隊順利攻克四平。另外，在我軍圍攻四平期間，吉林守敵已先于三月九日弃城逃往長春，我們當即收復吉林。

由于沈陽之敵始終沒敢出來，我們二縱隊和其它準備打援的部隊，無仗可打。

隨着四平的攻克，冬季攻勢就全部結束了。

這次冬季攻勢，從一九四七年的十二月十五日開始，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結束，整整打了三個月。在這三個月中，我們共消滅了國民黨新五軍等部八個師，并争取了一個師起義，共殲敵十五萬餘人。我們攻克了戰略要點四平、吉林、營口等城市十八座，將敵人壓縮于長春、沈陽、錦州等幾處相互不能聯系的孤立城市内，爲爾後全殲這些敵人奠定了基礎。

這次冬季攻勢，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評價。毛澤東在《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一文中指出："我東北野戰軍在冬季攻勢中，冒零下三十度的嚴寒，殲滅大部敵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國。"

冬季攻勢結束後，林彪、羅榮桓又召集了所有縱隊的司令員到雙城開會，總結冬季攻勢的經驗與教訓。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等在會上講了話。他們的講話歸納起來大致如下：

第一、要靈活地處理集中作戰和分散作戰的關系，攻城作戰和力争殲敵于運動之中的關系。也就是説，有利于攻城打援的時候，就攻城打援；敵人出來了，有利于運動戰的時候，就打運動戰。

第二、組織好連續作戰，恰當處理好作戰與休整的關系。現在的仗一打起來就是四、五仗，甚至七、八仗，往往是分散打了，集中起來再打。因此，我們就要着眼于連續作戰的組織，處理好作戰與休整的關系。比如，這次我們打了彰武，就在彰武休整；打了公主屯，就在公主屯休整。因爲那個時候，主動權已經在我

們手裏了，敵人是被動的，我們想什麼時候打，就什麼時候打。這樣，我們各個縱隊可以進行輪番作戰、休整的休整、作戰的作戰。在天氣嚴寒的條件下，在連續行軍作戰之後，要進行一個短暫的休息和整頓補充，使指戰員們的體力得到恢復，使部隊戰鬥力不致被削弱，這是十分必要的。這次冬季攻勢，由于在戰役指揮上恰當地處理了這兩個問題，因而在攻城作戰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績。

第三、戰鬥的勝利依靠兩個基本條件，一個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另一個就是正確的戰術，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則是這兩個基本條件中最主要的一個。衹有政治工作强的部隊才能發揮全體戰鬥員的勇敢，才不至于在敵人面前趴着不動，才不至于發生那種人多（密集隊形）才敢前進，人少（三三制）就不敢前進的現象，才能使戰鬥員在戰鬥中有主動性和在戰術上有創造性。

從秀水河子戰鬥起，在東北我軍部隊陸續廣泛運用的"一點兩面"、"三三制"等六個戰術原則，在戰争實踐中經過了檢驗，是成功的。這實際上也是廣大指戰員的集體創造，是根據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提出來的。

第四、東北各野戰軍、野戰師，在東北野戰軍總部的集中指揮下，互相幫助，互相協同，互相體諒，互相指揮，共同執行命令、遵守紀律，出現了一個大團結的局面，這是戰勝敵人的主要因素之一。

會上所總結的，以及以後在部隊中進行傳達教育的，大致上就這麼幾條。

十五、政治整訓和軍事大練兵

冬季攻勢結束後，從三月下旬到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一直到九月上旬，在差不多將近半年的時間裏，我們一直處于

政治整訓和軍事大練兵中。

遵照中央軍委指示，東北人民解放軍利用作戰間隙，用訴苦和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的方法，進行了“新式整軍運動”。整軍運動主要是以師爲單位進行。我們縱隊這一級在作統一布置以後，就深入到下面，幫助基層部隊開展這一活動。這次“新式整軍運動”，是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的重要發展，對加强部隊建設和爭取解放戰爭的勝利起了重大作用。

按照東北野戰軍司令部的命令，二縱隊的整訓地點，六師在公主嶺，五師在四平，四師在東豐、開原以東。我們縱隊司令部、政治部和直屬隊，則在四平至梅河口，鐵路邊一個叫平岡的小鎮子裏。我們就在這裏，指揮和組織三個師的整頓，訓練和休息。

作爲政治委員，整個縱隊的政治整訓都是由我負責的。將近半年的部隊政治整訓，主要進行了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進行形勢教育。當時東北的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敵人才五十多萬人，而我們已發展到將近百萬人，我們的力量已遠遠超過了蔣介石的力量。蔣介石的五十多萬軍隊，大多被圍在幾個點，一個長春，一個沈陽，一個錦州，一個山海關，還有一個綏中，就這麼幾個點。而且鐵路沿綫都已經被我們所控制，這幾個點互相不能聯系，補給也没有來源，全靠飛機空投，但數量畢竟有限，所以他們的糧食、衣服和彈藥補充都十分困難。當時蔣介石曾説，國民黨在東北的軍隊是軍心顫裂，戰力不能恢復正常，將士没有鬥志。在這樣的情况下，我們完全占據着主動地位，要怎麼幹就可以怎麼幹。

中央從全國考慮，决定先要我們把東北的敵人堵住，把他們全部就地消滅在東北。不能讓他們跑到華北去，也不能讓華北的敵人跑到東北來。要在東北的問題解决之後，再來解决華北問題。這就是當時中央軍委的决策。

一九四八年春，新華社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爲《衝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這篇社論非常重要，非常及時。它從全國形勢的根本變化，説明革命新高潮到來的必然性，要求大家從思想上準備迎接全國性的勝利。


與妻子陳綏圻在東北

再從部隊本身來看，冬季攻勢以後，部隊充實得很，一個連隊將近兩百人。由于蔣介石這個運輸大隊長的補充，我們全部都換成了美式裝備，武器彈藥充足，裝備齊全。就拿我們二縱隊來説吧，那時的編制就不是三個師了，而是四個師，將近七、八萬人。大家一看，就非常興奮。部隊的士氣受到了極大的鼓舞。

就在這時，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我們唯一留下來的兒子在齊齊哈爾出生了。由于他正好是在“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過程中誕生的，于是我就給他起了個名字叫“新潮”。

第二、訴苦運動。以“憶苦思甜”爲主要内容的階級教育，是在西北野戰軍和東北野戰軍的三縱隊首先搞起來的。後來經過中央軍委的總結，就在全軍各部隊中普遍推廣了這一活動。具體的方法是，各個連隊先選擇一些苦大仇深的戰士，向大家訴説入伍前所受的剥削和苦難，引導大家都來“倒苦水”、“挖苦根”。從訴過去的苦，到思現在土改後分得土地、成爲土地主人的甜。這就叫做憶苦思甜。通過這樣的教育，使戰士們普遍懂得爲誰當兵、爲誰扛槍、爲誰打仗，懂得我們打仗就是在愛國保田的道理。特别是那些從國民黨軍俘虜過來後參軍的士兵，經過訴苦運動教育後，階級覺悟大大提高，鬥志更加高昂。這個教育，在當時各部隊中都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這個教育，效果最大，最好，因此，中央軍委毛主席稱之爲“新式的整軍運動”。

毛澤東在《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中指出：“由于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所給予勞動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運動的正確進行，大大提高了全軍的指戰員爲解放被剥削的勞動大衆，爲全國的土地改革，爲消滅人民

公敵蔣介石而戰的覺悟性；同時就大大地加强了全體指戰員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堅强的團結。在這個基礎上，部隊的純潔性提高了，紀律整頓了，群衆性的練兵運動開展了，完全有領導有秩序地在部隊中進行的政治、經濟、軍事三個方面的民主發揚了。這樣就使部隊萬衆一心，大家想辦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犧牲，克服物質條件的困難，群威群膽，英勇殺敵。這樣的軍隊，將是無敵于天下的。"

第三、進行各種政策的教育。重點是進行城市政策教育、統戰政策教育、俘虜政策教育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教育等。

進行城市政策教育，就是要使部隊廣大幹部戰士懂得，東北的敵人現在衹剩下幾個爲數不多的大中城市。這幾個城市從國民黨手裏奪過來以後，就是我們自己的了，因此，對城市的一切建築，必須加以保護，不能予以破壞。對中央先後頒布的城市政策，必須認真學習，要注意保護城市工商業、交通運輸和歷史文物，要維護好社會治安，把新解放的城市治理得跟老解放區一樣。

進行統戰政策教育，就是要讓廣大幹部、戰士認識到，現在要進一步擴大黨的民族統一戰綫，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愛國、反蔣的民主人士，團結一切知識分子、科學技術人員，把他們團結到共産黨這方面來，團結到解放區來，和我們一起建設新中國。

對俘虜政策教育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教育，是要求廣大幹部、戰士一定要嚴格執行俘虜政策，對俘虜的國民黨官兵，身上的東西，除武器之外，一概不沒收。對起義的要熱烈歡迎。同時要堅決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堅決執行上級的命令，集中統一，團結一致，同心協力，互相幫助，共同對敵，以大局和全局爲重，反對本位主義，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

第四、加强對新戰士的教育。新戰士的教育工作，是部隊政治工作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部隊的新兵，一般都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解放區內經過土改後的翻身農民，階級覺悟較高，有保田、自衛的自發願望；另一個方面就是被俘國民黨官兵。他們在經過初步教育後，自願參加解放軍，他們大多談不上什麼

階級覺悟，但這部分人却比較多。有的連隊，"解放戰士"差不多要占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四十，後來甚至高達百分之五、六十。所以，對他們進行階級教育，就特別重要。在當時，怎樣去團結他們，怎樣去像自己的階級兄弟一樣對待他們、愛護他們、教育他們，使他們變成一個有政治覺悟、有階級覺悟的解放軍戰士，是我們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當然，要使敵人的士兵，變成我們自己的階級兄弟，這個工作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辦到的，必須經過深刻的教育，才能使他們真正的轉到人民這方面來。在"新式整軍運動"中的"訴苦"活動，一般都能把蔣介石軍隊的士兵，變成蔣介石自己的"掘墓人"。因此，這個教育就是當時整個政治教育的中心。

另外，由于連隊的新戰士多，我們還要求充分發揮老戰士的作用，强調每個老戰士都必須要團結幾個新戰士，同時還强調連隊的政治工作要扎扎實實地做到每個人的身上。由于經過"憶苦"和"三查"，連隊的黨支部和團支部對每個戰士的家庭情况都非常清楚，可以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因此經過兩、三個月的教育之後，"解放戰士"一般都能覺悟過來。

第五、進行保衛、愛護解放區的教育。這也是我們當時的政治教育內容之一。通過這項教育活動，使全體指戰員懂得，必須要以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觀點教育自己和家屬，愛護和建設好解放區，堅決執行黨的路綫、政策和政府的法令、規定，加强軍民團結，做好擁政愛民工作，做到軍愛民，民擁軍，軍民團結一條心。

在冬季攻勢後長達近半年的整訓中，我們是把政治整訓放在第一位的，首先拿出了三個月的時間來重點進行政治整訓，然後，我們又用了兩個月的時間來重點進行軍事訓練。當然，這兩個方面的整訓，也是穿插進行的，不能截然分開。

我們這次軍事大練兵的指導思想，是林彪提出的三句話、九個字，即"大兵團，正規化，攻堅戰"。由過去的野戰變攻堅，這可真是個新課題。從縱隊來說，必須演練幾個縱隊的協同作戰，

練步炮協同，練各兵種的聯合行動。在師、團的演練内容上，除了練協同作戰之外，主要是練“一點兩面”，練“四快一慢”，練“三猛戰術”。從連隊來説，主要是練“三三制”，練“四組一隊”，練捆炸藥包，練爆破，練射擊、刺殺、投手榴彈，練攻城，練巷戰，練翻墻、練穿墻打洞，練破地堡，練過外壕，練土工作業，練實戰演習等。

部隊把前一時期在攻堅作戰中所取得的經驗、教訓，集中起來，對部隊進行再教育。演習中所做的工事，要盡量同國民黨軍的城市防御體系相仿，外圍據點、地堡、碉堡、外壕、鐵絲網一應俱全，盡量做得逼真。在演習時，先分股訓練，然後進行合練，最後采取對抗演習。

各兵種的聯合行動，是這次大練兵中的一個重要的新課題。過去，我們衹是步兵的單一作戰；現在，我們自己有坦克，有炮兵、還有工兵、通訊兵、鐵道兵和後勤運輸等各種兵種。聯合訓練的重要内容，就是各兵種之間要協同好，以作戰攻城或野戰爲中心，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務，做好自己的工作。不然，自己的炮把自己人殺傷了，這不行吧，所以，各兵種必須主動協調好。後勤兵站運輸跟不上也不行吧，對這些如果訓練不好，就會出問題。

再一個，就是幹部訓練，對班長、排長、連長、營長這些軍事幹部，包括政治幹部，單獨進行軍事訓練，教給他們怎麽指揮隊伍，怎麽組織火力，怎麽修築工事，怎麽挖溝接近敵人的據點。在溝裏，敵人的火力打不到，飛機炸彈也不容易打中，很安全。

這許多教育，都要實際操作，所以部隊很累，一天八小時的訓練都不够。“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的口號，當時是深入人心。

還有一個後勤問題，也是軍政整訓的一個重要内容。俗話説，“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嘛！大規模的兵團作戰，與以前的作戰方式不一樣，要組織鐵路運輸，要有一定的供應綫，要有兵站，有醫院，有後方。部隊到哪裏，醫院就要設到哪裏，部隊到哪裏，

兵站就要跟到哪裏。部隊到哪裏，糧食就要運到哪裏，彈藥就要運到哪裏。因此，後勤工作也是這次政治整訓和軍事大練兵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軍政整訓的過程中，我們還表彰了戰鬥中立過功的英雄模範，表彰他們的功績，給他們發紀念章，功勛章，給予各種精神鼓勵。在那個時候，是不可能給予物質獎勵的。

我們還利用這個時間，爲犧牲的同志開了追悼會，并以烈士的典型事迹來教育部隊，强調要繼承和發揚爲人民服務，爲了人民粉身碎骨都在所不惜的這樣一種精神。與此同時，搞好烈屬的撫慰工作，撫恤慰問，向地方政府開出證明信，請他們協助安置好烈士家屬。另外，我們還分别組織慰問隊，到醫院和後方去慰問本部隊的傷員。傷愈的希望他們早日歸隊，繼續到前方作戰。

還有，當時部隊團以上的幹部，有不少人已經結了婚。因此，利用這個較長的戰鬥間隙時間，我們還安排了幹部家屬到前方來和丈夫見見面，作短暫的團聚。

整訓期間，部隊的作息時間還是比較正常的，一般是白天整訓，晚上就可以休息。那時縱隊有個電影隊，但片子很少，所以部隊看電影的機會并不多，主要還是靠自己搞文娱活動。開晚會的時候，戰士們自己演、自己唱、自己跳，非常熱鬧。此外，各部隊也很注意開展體育訓練，搞各種體育活動，利用早、晚鍛煉身體。

總之，在那將近半年的時間裏，大大小小的工作，忙得我們不亦樂乎。經過這次整訓，部隊士氣旺盛，情緒飽滿，生龍活虎，如虎添翼。

總之，這次政治和軍事整訓，可以説對最後整個消滅東北蔣介石的隊伍，解放全東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我們二縱整訓期間，還有過這麽這麽一個小插曲。大概是在一九四八年的五月份，當時劉震已經到部隊檢查工作去了，我和縱隊副司令員吳信泉在家裏主持部隊整訓工作。突然之間，上面來了命令，要我到吉林市去開會，所有的縱隊都去了人，説是

討論準備攻打長春。東野後勤部準備了各種招待，連會議室都布置好了。我們一到，就先組織我們參觀了日本人修建的小豐滿水力發電站，然後就回來開會。開會時，我没有見到林彪司令員，衹見到了羅榮桓政委，劉亞樓參謀長和譚政主任。一開始開會，羅榮桓就宣布，"現在這個會不開了！"他解釋說，總部原來準備打長春，但中央軍委來電報指示，暫時不打長春，先搞部隊整訓，準備下一步奪取全東北，消滅蔣介石在東北的全部部隊。

對長春，則繼續由第一兵團蕭勁光、蕭華的部隊圍而不攻。後來對長春從來也没有發動過攻勢，直至一九四八年十月固守長春的國民黨軍起義或投降。有人說，林彪對長春久攻而不下，這不是事實。林彪原準備攻長春，但接到中央軍委命令攻錦州後，林彪連準備攻長春的會議都没有開，那裏來的久攻不下呢！衹有圍而不攻而已。從一九四七年夏天就開始對長春圍而不攻，而蔣介石對長春長期空投，堅守不出。

結果，打長春的會還没有開始就結束了，我們白跑了一趟，坐了兩天的汽車，又回到了平岡。隨即我就到達公主嶺（現在的懷德）一一六師檢查、督促訓練工作去了。

十六、遼沈戰役

在我們各主力縱隊進行政治整訓和軍事大練兵的前後，東北人民解放軍又進行了一次整編，新組建了三個縱隊：將直屬的獨立第二、四、五三個師組建成東北人民解放軍第十二縱隊，司令員鐘偉，政委袁升平；將遼東軍區獨立第一、第二、第三，三個獨立師組建成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五縱隊，司令員萬毅，政委劉興元；將熱河軍區獨立第一、第二、第三，三個師組建成東北人民解放軍十一縱隊，司令員賀晋年，政委陳仁麒。到八月份，又以護路軍爲基礎，成立了東北人民解放軍鐵道縱隊。同時，以七個

炮兵團，主要爲山炮、野炮、榴彈炮、高射炮，組建成炮兵縱隊，蘇静任司令員，邱創成任政委。又將兩個前綫指揮所改編爲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兵團、第二兵團。

八月十四日，考慮到下一步作戰的需要，中央軍委決定，東北人民解放軍領導機構與東北軍區分開，各負其責。同時，成立東北野戰軍領導機構，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林彪任野戰軍司令員，軍區第一副政委羅榮桓兼任野戰軍政委。野戰軍下轄十二個步兵縱隊，十五個獨立師，一個炮兵縱隊，一個鐵道縱隊，一個坦克團，三個騎兵師，共七十萬人。加上軍區所轄地方武裝，東北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已達一百餘萬人，已遠遠超過衛立煌下屬的國民黨軍五十五萬人。

不僅如此，冬季攻勢後，東北解放區土地面積已達東北總面積的百分之九十七，人口占了東北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六。而且，經過土地改革，解放區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工農業生產蓬勃發展，尤其是軍工生産有了較大的發展，整個解放區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繁榮興旺的景象。

這一切都說明，冬季攻勢以後，東北戰場上的敵我力量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已呈現出敵弱我强的態勢。

這時，蔣介石及其統帥部判斷我東北解放軍主力的下一步行動，可能是入關尋求機動作戰。因此，蔣介石決定固守東北，鉗制我軍，不讓東北解放軍入關，以利于鞏固華北。

根據蔣介石的這一命令，國民黨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決定集中兵力，進行重點守備，確保沈陽、錦州、長春的安全，并相機打通北寧路。他讓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官鄭洞國指揮十萬人守備長春，讓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錦州指揮所主任范漢杰指揮十五萬人防守錦州，他自己則率三十萬人駐守沈陽。

蔣介石和衛立煌的這一作戰方針和兵力部署，正中毛澤東和林彪的下懷，他們一直在尋找東北大決戰戰機。敵人的這一兵力部署，對我們來講，是較爲理想的部署之一。因此，部隊整訓完

[illegible]以後，毛澤東就決定適時發起遼沈戰役，全部殲滅東北的國民黨軍。

進攻方向的選擇，是遼沈戰役勝利的具有決定意義的一着。明擺着，除長春、沈陽、錦州三地敵人外，無仗可打。沈陽是重兵防守的"剿總"所在地，不可能先從沈陽開刀，祇能在長春和錦州之間進行選擇。戰役究竟應該首先從哪兒打起呢?

毛澤東從全國通盤考慮，始終矚目于錦州，要"關門打狗。"

早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冬季攻勢還未結束時，中央軍委、毛主席就對東北的情況就作了全面的分析，并致電東北野戰軍首長林彪、羅榮桓，指出："對我軍戰略利益來説，以封閉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爲有利。"也就是説，不準東北蔣介石的部隊往關裏跑。要東野將主力轉到北寧綫，切斷蔣軍從陸路、從海上撤回關内的要道，抓住敵人予以各個殲滅，各個擊破，全殲蔣介石在東北的部隊。

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毛澤東又發出電報指示："爲了殲滅這些敵人，你們現在就應該準備使用主力于該綫，而置長春、沈陽兩敵于不顧，準備在打錦州時殲滅可能由長、沈援錦之敵。"

毛澤東的這封電報還指出："于此，你們應當注意：（一）確立攻占錦、榆、唐三點并全部控制該綫的决心。（二）確立打你們前所未有的大殲滅戰的决心，即在衛立煌全軍來援的時候敢于同他作戰。（三）爲適應上述兩項决心，重新考慮作戰計劃并籌辦全軍軍需（糧食、彈藥、新兵等）和處理俘虜事宜。"

對于毛澤東的這一部署，國民黨的錦州主帥范漢杰在被俘之後曾説："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來的，錦州好比一長扁擔，一頭挑東北，一頭挑華北，現在是折斷了。"

而林彪的考慮則有些不同，他從東北的局部出發，主張先打長春。

四月十八日，林彪、羅榮桓、高崗、陳雲、李富春、劉亞樓、譚政一起聯名致電軍委，提出："故目前祇有打長春的辦法爲好。"電報認爲南下北寧路作戰，困難很多，不如先打長春，等待沈陽之敵出來增援，再消滅敵人。

四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復電同意，但指出："不應當强調南下作戰之困難，以免你們自己及幹部在精神上處于被動地位。"七月二十二日，他又在給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并告東北局的電報中重申："不要將南進作戰的困難條件説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將自己限制起來，失去主動性。"

不僅是林彪，就連衛立煌和蔣軍東北"剿總"，也判斷我軍先攻長春的可能性很大。遼沈戰役期間，曾率"東進兵團"從葫蘆島增援錦州的國民黨第十七兵團司令侯鏡如，在其回憶録中就曾寫道："衛立煌當時對東北解放軍冬季行動判斷有錯誤。他認爲東北解放軍發動對長春攻勢的可能性極大。理由是解放軍主力在北滿，長春已被包圍，國民黨軍在長春雖然工事好，但糧食、燃料都困難；解放軍進攻長春，交通補給條件都好。他認爲，確保沈陽、錦州是没有問題的。國民黨軍主力都集中在南滿，從北滿到南滿交通補給綫長，同時解放軍大城市攻堅作戰經驗不足。"范漢杰也回憶道，我以前認爲解放軍不可能從長春越沈陽側面行動全力南下。

林彪對南下攻打錦州的打法，有不同意見，是從東北局部考慮的。他和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電報往返，各抒己見。其間，中央軍委曾提出嚴肅批評，并强調，應從戰爭的全局利益出發，迅速下决心以主力南下北寧綫，全力奪取錦州。幾經反復之後，林彪最終還是在毛澤東的堅持和説服下，放弃了自己的意見，按照毛澤東的計劃，以主力南下北寧綫，全力奪取錦州，完成"關門打狗"的任務。

整個遼沈戰役可以分作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　攻克錦州和平解放長春。在林彪放弃自己的意見，同意完全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先南下攻打錦州以後，一九四八年九月十日，他同羅榮桓、劉亞樓、譚政一起，擬定了南下作戰的具體計劃，决定攻打錦州之役分爲兩步走：第一步先奔襲殲滅北寧綫除山海關、錦州、錦西以外各點之敵，切斷關内外敵人的

聯系；第二步，集中兵力攻取錦州和打增援之敵。在兵力配置上，他决定以六個縱隊來攻擊北寧綫，以五個縱隊集結于沈陽西北及長、沈之間，擔負阻援和打援任務。九月十一日，毛澤東復電表示同意這個作戰計劃。

我們二縱隊當時接到的任務是：以五師配合第三、第四、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等兄弟縱隊殲滅義縣至昌黎一綫之敵，爾後相機奪取錦州、錦西和山海關。其他兩個師會同第一、第五、第六、第十等兄弟縱隊，阻擊沈陽向錦州或向長春增援之敵，并隨時準備參加攻錦作戰和殲擊長春突圍之敵。

在接到進軍命令之後，經過準備，九月十二日，我們就開始行動了。到九月三十日，東北野戰軍各部均已到達指定地點，并肅清了北寧綫上的高橋、塔山、興城等地的敵人。

十月一日，二縱五師配合三縱，在炮縱主力的協同下，攻克了國民黨軍的重要據點義縣，殲敵約萬人。至此，東北野戰軍已切斷北寧路，完全孤立了錦州，使錦州處于我們的四面包圍之中。攻克義縣後，五師就回到了二縱隊，回歸二縱隊的建制。

但在義縣戰鬥中，我們有很大的損失，東北野戰軍炮兵縱隊司令員朱瑞在戰鬥中犧牲了。當時義縣戰鬥已經結束，但爲及時總結經驗，戰鬥剛剛結束，朱瑞親自趕去第一綫視察炮兵陣地，不幸在途中踏上地雷，光榮犧牲。

朱瑞對建設東北的炮兵和指揮作戰建立了重要的功勛。他一點一滴，一門一門炮地搜集，組織起來并訓練了炮兵部隊。東北炮兵縱隊的建立，和他是分不開的。朱瑞的犧牲，是我軍的重大損失。除此以外，其他部隊傷亡不大，攻城很順利。

在攻克義縣的當天，東北野戰軍總部發出《準備奪取錦州，全殲東北敵人》的動員令。動員令指出："我在北寧綫上的第一步任務已勝利完成。第二步，是準備奪取錦州，殲滅守敵，并準備打沈陽西援、北援之敵及長春突圍之敵。錦州之戰有很大可能發展成爲敵我兩軍主力的大决戰。我必須以最大決心拿下錦州，并于攻錦過程中準備打擊援敵和突圍之敵，使這一攻錦、打援、打突圍戰役，成爲解放全東北有决定意義的戰役。這一戰役必然是極其緊張、激烈的連續作戰，望各部抱定打大仗、打惡仗的决心、準確地執行命令，不怕傷亡，不顧疲勞，不因傷亡泄氣，不因疲勞偷懶，準備付出重大代價去争取戰役的全部勝利。"接到動員令以後，我們立即分頭向部隊進行了傳達教育。

東北野戰軍的首長是跟着部隊前進的。當我們二縱隊經過一夜的緊張行軍，于十月四日晨七、八點鐘到達帽兒山一帶，與九縱相會合時，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和譚政，已先于我們到達帽兒山上。他們得知二縱隊已到達，就派警衛員把劉震和我叫到了山上。我們當時感到很突然，心想林、羅怎麽走得這樣快呀！比我們還先到呀！

待我們到達山上時，衹見林、羅、劉、譚他們都在觀察地形。帽兒山離錦州大概有八至十里路，山下就是一片開闊地，再也没有山了。在帽兒山頂，東面可以看到打虎山，西面可以看到塔山，可以縱觀錦州全局。林、羅、劉、譚當時就在帽兒山上對攻打錦州，作了具體的安排和部署。

就在帽兒山上，林、羅親自向我們交代了任務，大致上確定，二縱和三縱是從北面攻擊錦州的主攻部隊，并具體規定了我們的突破口、攻擊道路和與其他縱隊的會合點。林彪很重視五師，特别交代最好把五師擺在什麽地方，哪個地方最重要等。對四師、六師擺在什麽地方，林彪也都提出了意見。我們當即表示，一定按林總的意見辦。林彪要我們立即回去，準備和三縱并肩從北向南攻擊錦州（二縱在右，三縱在左）。

同樣，在帽兒山上，林彪、羅榮桓也分别向七縱、九縱和八縱布置了任務，要七縱、九縱從錦州南面，越過大甯河、女兒河，由南向北攻擊錦州；八縱從高橋這邊，由東向西向錦州進行攻擊。

林彪將炮縱的一部分主力安排在七縱那邊，要他們把炮陣地設在罕王殿南山、紫荆山一帶。炮縱其餘的大部分主力，林彪擺在了帽兒山，也就是安排在我們二縱進攻陣地的後面。炮縱政委

邱創成同我們在一起指揮。炮縱的裝備大部分是三八野炮、最遠的炮射程可達二十多里。也就是說，在帽兒山上，炮縱的炮火不僅可以控制錦州的機場，而且還控制了錦州所有的據點。

待給各縱隊布置完任務，天已經完全黑了。我和劉震回到了帽兒山下的指揮所。林、羅、劉、譚等人也走了。他們住在義縣南邊的一個小村子裏。

我和劉震回到指揮所以後，連夜召集各師師長、政委開會，傳達東野總部首長的命令，部署了我們二縱自己要完成的任務。然後，我們大家一起實地觀察了總部指定的進攻道路和突破口，明確劃分了各師的作戰分界綫，并根據地形地貌，選擇了各師攻擊的路綫。通過觀察，我們决定先從錦州車站下手，那裏有五、六個據點，必須先拿掉，不先占領車站，就不好攻打錦州城。

經過兩天的準備，我們于十月七日開始肅清外圍據點。結果集中火力一打，這幾個據點一攻就破，守敵全部被殲。

七號以後，我們就全力準備攻城。第一、是給各部隊下達任務，進行政治動員，然後區分三個師的作戰分界綫。

第二、部署挖掘攻城時用的壕溝。這是作戰部署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從帽兒山下去，一直到錦州城前，全部都是開闊地。加上敵人飛機的空中偵察和轟炸，這就更顯得挖溝的重要性。秋季天氣晴朗的日子居多，地還没有封凍，挖溝也還比較容易。部隊全部擺開，一個連接一個連，每個師負責挖兩條溝，四師兩條，五師兩條，六師兩條，一切運輸往來，都在溝裏進行。白天休息，晚上挖溝。一到黃昏就開始挖，到晚上十二點左右，給部隊送一次夜餐，吃完飯就再挖。拂曉以前，撤回駐地睡覺休息。由于幾個師同時都在挖溝，大家拼足了勁，比賽着幹，進度非常快，一個晚上就挖兩三里路。走在溝裏，敵人看不見，槍炮又打不着，我們完全安全，敵人完全被動。三個晚上，我們就把溝挖到了錦州城下敵人的炮樓跟前。林彪曾來視察過我們二縱隊三個師所挖的這幾條溝，并表揚我們説："二縱隊這個部隊真不錯，你們真是説到做到。"

第三、搞好火力配置。在突破口的前沿陣地，輕重機槍迫擊炮，六〇炮的位置得部署好。掩體、陣地得構築好，大量的炸藥包、爆破筒得準備好，手榴彈得一束一束的捆好。尖刀隊、火力組、爆破組、突擊組、支援組，統統都得組織好。所有的指揮員包括從班長到排長、連長、營長、團長等的代理人統統都得指定好，萬一戰鬥中有人犧牲或負傷，馬上就會有人出來接替指揮。

第四、搞好後勤準備。戰鬥打響之前，衛生所設在哪裏，傷員送什麽地方，彈藥和糧食、蔬菜在哪裏領，這些都得事先安排好，并通知到每個連隊。還有，抓到的俘虜往哪裏送，收容俘虜的地方，也都得事先準備好，通知到。

部隊這時的士氣很旺。經過將近半年的政治整訓和軍事大練兵，幹部戰士鬥志昂揚，意氣風發，人人奮勇，個個當先。大家紛紛表示决心，争先恐後地争取參加突擊隊和爆破隊。這些行動完全是自覺的，説明了部隊政治覺悟的空前提高，"新式整軍"運動收到了顯著的效果。

經過幾天的緊張工作，各項戰前準備完畢。經過我們的認真檢查，準備工作全部就緒。我們便向林彪、羅榮桓報告，説我們一切都準備好了，隨時聽候林、羅的總攻命令。

十月十日左右，羅榮桓、譚政又在他們的駐地，召集各參戰縱隊的政治委員開會，聽取各縱隊政委簡單匯報攻城政治動員教育的情况，以及戰術、技術準備情况。聽完匯報，羅、譚就執行城市政策問題再次作了交代，要求各部隊入城後一定要做到，保護好城市人民的生命財産，保護好工廠、商店，保護好學校、醫院、科學文化機關及城市公共設備，保護好名勝古迹和建築物，看管好敵人的倉庫、物資及其它財物，一切繳獲都要歸公。同時，還要遵守公共秩序，不滋擾人民，維護好解放軍的聲譽，切實做到人人守紀律，人人以實際行動作宣傳。羅、譚還要求，參戰的兄弟部隊之間，一定要團結一致，以消滅敵人爲共同的目標，互相支持、互相幫助，不争搶俘虜兵，不争搶繳獲。

會上還對戰前的動員口號，作了統一規定。記得這些口號有

“一定要打下錦州”、“奪取全東北的咽喉”、“活捉范漢杰”等。

回到縱隊後，我立即將會議精神向各師作了傳達與布置。

十月十三日晚，林彪發出命令，要求所有參加攻打錦州的部隊，在次日早上八點鐘以前，都進入到最前面的突擊陣地，準備上午十點開始攻城。

十月十四日上午十時，隨着林彪的一聲令下，參戰各縱隊開始向錦州發起總攻。幾百門大炮一齊轟響，猛烈的炮火集中飛向突破口上的工事、碉堡。衹見炮彈所到之處，塵烟飛騰，遮天蔽日。霎時間，敵人防守的錦州城就被打得城垮堡飛。

我們二縱隊進攻的錦州城北是敵人的防御重點，工事非常堅固，要從這裏攻城，困難是比較大的。但由于林彪將炮縱的主力集中放在了帽兒山上，使炮兵居高臨下，容易發揮出威力，因此衹經過了大約二十分鐘的炮擊，我們進攻突破口上的敵人工事就全部被摧毀了。

這時，前面的突擊部隊報告，說可以開始攻擊了。我們立即電話報告給林彪，說二縱可以開始攻擊了。林彪要我們再稍等一下，說先讓坦克爲我們開路，要我們到十一點鐘時再突進城去。不大一會兒，就見坦克躍出隱蔽地，衝向錦州城。我們一見，馬上下令部隊跟隨坦克，沿着已挖好的交通壕溝，衝向錦州城。

三十分鐘後，我們的部隊就全綫突破，突擊部隊迅速進入城内，連續打退了敵人的幾次反衝，牢牢控制着突破口。接着，後面的部隊就源源不斷地跟着向前突擊，直向錦州城的縱深發展。

十二點鐘時，林彪打電話告訴我們，說南面突破了，東面也突破了，要我們大膽地分割、穿插，先把敵人插亂，再以火力、爆破、突擊相結合的攻堅動作，對固守樓房、碉堡的敵人實施堅決攻擊。

按照林彪的指示，我們要求各部隊在錦州城裏大膽地進行分割、穿插，逐街逐巷地攻擊前進。對固守在堅固的樓房、碉堡裏的敵人，一定要先組織火力掩護，再以爆破筒或炸藥包炸，最後組織部隊衝上去。

到十月十五日拂曉，各路攻城部隊先後在指定的會合地點白雲公園、中央銀行地區勝利會師。打掉了國民黨東北“剿總”錦州指揮所和第六兵團司令部。但這時，由市區退入老城的殘敵一萬餘人仍在頑抗。林彪命令我們二縱與七縱南北夾擊，再次向老城發起攻擊。二縱和七縱，經常在一起配合打仗，前不久打彰武就是二縱和七縱，這次打老城又是二縱和七縱。

我們攻克老城的戰鬥打得十分激烈。當時的老城内有個城隍廟，敵人做的工事十分堅固。守敵借着這個工事，不斷進行反擊。戰鬥中，雙方的手榴彈都是成串地往對方砸，子彈密集得幾乎在空中相撞。經過幾個小時激戰，老城才終于被我們拿了下來。

十月十五日下午四點，在經過三十一小時的激戰之後，錦州之戰全部勝利結束。這一戰，我們全殲十五萬守敵，而且俘獲衆多，共俘敵九萬餘人，包括國民黨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錦州指揮所主任范漢杰、第六兵團司令官盧浚泉，僅我們二縱隊就俘虜了兩萬人。

說到俘虜范漢杰，還有一個小插曲：十月十四日下午兩點，我們各個方向的部隊都已經攻進錦州城。就在這最緊張的關頭，范漢杰乘上一輛吉普車，直奔錦州機場。當時，我、劉震和炮兵縱隊政委邱創成一起，正在指揮所裏一起指揮戰鬥。范漢杰的吉普車從城裏出來後，我們看得很清楚，這輛車是直向西開往機場。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又看到從北平方向來了一架飛機，降落在機場裏。林彪這時來了電話，命令邱創成，要打掉這架飛機。結果炮兵乒乒乓乓一氣打了二十來發炮彈，還是没有打中。林彪又來電話批評說：“你們的技術太差了。一定要打掉，非打掉不可！”林彪這一批評，邱創成趕緊指揮炮兵又打，結果一下子把飛機打着了火。看到飛機起火，我們大家都非常高興，一下子都跳了起來。這架飛機，顯然是蔣介石從北平派來接范漢杰的，把這架飛機打掉，范漢杰就無法再跑了，衹能是束手就擒。我們一開始打炮，范漢杰就没敢再向飛機靠近，就停下來蹲在機場的草窩裏。飛機一着火，他眼看没有了逃走的希望，就跑回錦州城裏。

我們攻下錦州以後，他又向南跑，藏在一個老百姓家裏，最後還是被我們抓住了。

國民黨重兵防守的東北咽喉之地錦州，僅僅衹守了三十一個小時，就被我們攻了下來，這樣的結果不光蔣介石、衛立煌等人想不到，也是林彪自己所始料不及的。

打下錦州，完全截斷了衛立煌集團向關内撤退的陸上道路，爲全殲東北的敵人奠定了基礎。爲此，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在致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的電報中指出：錦州之戰，"部隊精神好，戰術好，你們指揮得當，極爲欣慰，望傳令嘉獎。"

攻克錦州以後，十月十七日，國民黨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在長春率部起義。十月十九日，國民黨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官鄭洞國，率部放下武器，長春和平解放。

至此，遼沈戰役的第一階段結束。

遼沈戰役的第二階段，是全殲廖耀湘兵團。

打下錦州後，我們就馬上處理戰後的一些善後工作。這些工作非常多，諸如安置傷員，悼念陣亡將士，處理俘虜，調整部隊的幹部配備，調配武器裝備，組織部隊休整，補充糧食和冬衣，對新補充的大批"解放兵"進行短暫教育等等，一系列的工作，把我們搞得十分緊張。

正在這時，林彪來了命令，説是國民黨廖耀湘兵團已經從沈陽出來了，要我們立即準備回師東進，吃掉廖耀湘這條大魚。

我們攻克錦州以後，長春守軍曾澤生起義，鄭洞國投降，東北重鎮長春和平解放，這使蔣介石受到了致命打擊。他和杜聿明一起親自坐飛機趕到沈陽另作部署。當時蔣介石估計，我軍攻打錦州，傷亡很大，可能得休整個把月，因此下决心趁這個機會，將東北的蔣軍統一從海上撤回關内，準備放弃東北，實行總退却。

由于他對衛立煌已失去信任，十月十九日，他宣布任命杜聿明爲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冀熱遼邊區司令官，統一指揮這一撤退事宜。

在這之前，我們攻打錦州期間，由沈陽出援的廖耀湘兵團于十月十一日攻占彰武以後，因害怕我軍的威力，以後就一直觀望、徘徊在彰武、新立屯之間，不敢繼續前進。我們攻克錦州後，廖耀湘不願聽從衛立煌的命令重回沈陽，便直接致電蔣介石，要求經黑山、大虎山直退營口。蔣介石同意廖耀湘的請求，命令廖耀湘兵團由彰武、新立屯地區南下北寧綫，準備撤入關内。

攻占錦州以後，我們有兩個攻擊方向：一是向南攻擊侯鏡如的東進兵團；一是向東攻擊廖耀湘的西進兵團。林彪决心向東。這裏，有《陣中日記》的兩段文字爲證："十六日：我决乘勝回頭，圍殲沈陽西援之敵。""十八日：形勢發展對我更有利，我决在錦州以東地區，再殲敵一、二十萬人。"

十月十九日，林彪在獲悉廖耀湘兵團一部已占領新立屯，并繼續南進後，判斷他們有可能南下實行總退却，當即向中央軍委建議：東北野戰軍的攻錦主力回師東進，采取誘敵深入的方針，用攔住先頭，拖住後尾，夾擊中間，分割包圍的辦法，在遼西的新立屯、黑山、溝幫子地區，圍殲廖耀湘兵團。中央軍委立即批準了這一建議，并指出，一定要把營口堵住，占領營口，不讓敵人從營口向海上退却，這是中央的命令。

十月二十日，林彪發出了攻擊廖耀湘兵團的命令：

命令原在遼西牽制廖耀湘兵團的十縱隊，由新立屯東北地區後撤到黑山、大虎山地區構築堅固工事，隱蔽待命，敵不動則我不動。若敵西進，則堅决遲滯敵人前進；若敵東退，則插到新立屯以東，切斷敵人退路，爭取時間，等待大部隊的到來。

命令攻克錦州以後尚未得到休息的一縱、二縱、三縱、七縱、八縱、九縱、六縱十七師和炮縱主力，立即向新立屯、大虎山、黑山方向急進。要求各部隊馬不停蹄，日夜兼程，中途衹能作短暫的休息。不管部隊多麽疲勞，衹要走到了黑山、大虎山、溝幫子一帶，就是勝利，誰先趕到，誰就會得到最大的勝利。

命令四縱、十一縱繼續在塔山地區阻擊侯鏡如的東進兵團，保障主力的作戰安全。

命令十二縱及五個獨立師進到鐵嶺、通江口地區，鉗制沈陽地區之敵。

命令獨立第二師以四天的行程趕到營口，切斷敵人的海上退路。

命令還指出，如果廖耀湘兵團先轉向營口撤退，全軍主力立即跟踪追擊，爭取在營口、牛莊一綫殲滅撤退的敵人。

十月二十一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聯名致電各縱隊："我軍決定全力乘敵撤退中與敵決一死戰，以連續作戰方法力求全部殲滅敵人。此戰成功，則不僅能引起全國軍事形勢之大變，且必能引起全國政治形勢的大變，促成蔣介石迅速崩潰。我全體指戰員須振奮百倍勇氣與吃苦精神，參加此一光榮的大決戰，不怕傷亡，不怕疲勞，不怕遭受小的挫折，雖每個連隊遭受最大傷亡（每個連隊打得衹剩幾個人也不要怕），對全國革命來説，仍然是最值得的。"

接到命令以後，從十月二十二日開始，我們二縱隊連續四天四夜不間斷地行軍，一直向指定的方向前進。爲了搶時間，我們先是急行軍，後是强行軍，衹管向前走。當時東野總部的指示是，不要去管掉隊落伍的，掉隊就讓他掉隊，落伍就讓他落伍，趕到多少部隊就算多少部隊。在這種情況下，部隊白天黑夜地向前趕，幹部、戰士都是十分疲勞。這四天四夜都没有宿過營，衹是在途中做飯吃的時候，指戰員們在地上躺一會兒，然後爬起來吃完飯又走。

那幾天，有這麼多的縱隊向着同一個方向前進，路上十分擁擠，有的時候簡直就是走不動。由于路窄，總部就要你自己找路走，有時就得繞路，這一繞路，就更增加了行軍的困難。

十月二十一日，南下北寧綫的廖耀湘兵團，開始猛攻十縱隊堅守的黑山、大虎山陣地。我十縱的全體指戰員抱着與陣地共存亡的决心，頑强抗擊，一次又一次地打垮了敵人整營、整團的多次衝擊。盡管敵人調來飛機集中轟炸這個山頭，但十縱始終堅守陣地，没有後退一步。經過五晝夜的激戰，到十月二十五日下午

和二十六日上午，我們幾個主力縱隊終于陸續趕到了。十縱光榮完成阻擊任務，阻住了廖耀湘兵團的前進，爲全殲廖耀湘兵團創造了條件。這一仗，十縱打得空前慘烈。事後了解，十縱有的連隊打得衹剩了十幾個人，有的甚至衹剩下了七、八個人。

十月二十六日，我們從錦州城趕來的東野主力部隊，在黑山和大虎山以東，繞陽河以西，無梁殿以南，魏家窩棚以北這大約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區域内，把廖耀湘兵團團團圍住。這裏正是殲敵的好戰場，敵人既無堅固工事可守，又無有利地形依托。這一場空前規模的圍殲戰，從十月二十六日清晨開始，十縱攔住先頭，六縱截斷後尾，我們東返的主力縱隊往中間猛打猛衝，廖耀湘兵團就亂了套了。

當時，林彪給我們下的命令是全綫出擊。我們幾個縱隊也不用講什麽戰術、策略，反正就在這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範圍内，哪裏有槍聲，就往哪裏打，一直打到把敵人全部消滅爲止。圍殲戰開始後，敵我雙方幾十萬隊伍扭打在一起，到處都是槍聲，到處都是戰鬥。我們的部隊則不管三七二十一，以團、以營、以連爲單位，從四面八方向敵人猛打、猛衝、猛追，包圍圈越壓越小，仗也越打越亂。

正在這時候，三縱隊在胡家窩棚，一棒就打碎了敵人的腦袋——廖耀湘兵團的前進指揮所，同時還打掉了新三軍、新一軍和新六軍三個軍的司令部。這一下子，失去了指揮的敵人就徹底地亂了套。我各個縱隊乘機向敵縱深，猛烈穿插，分割圍殲，激戰至二十八日拂曉，全殲廖耀湘兵團的五個軍，十二個師及特種兵部隊共十萬人，其中包括蔣介石"五大主力"新一軍主力及新六軍全部，俘虜了廖耀湘本人，取得了遼沈戰役决定性的勝利。

在趕往遼西的過程中，數我們二縱隊繞路最遠。我們是一直繞到阜新，從阜新拐彎，再向黑山前進。所以這次圍殲戰中，我們二縱是最後趕到的。等我們趕到時，廖耀湘兵團大部分已被殲滅。我們衹是在向黑山、大虎山前進途中打了一下，大概衹俘虜了三、四千人。

戰鬥結束後，在這片圍殲的戰場内，敵人丢下的輜重、行李、騾馬、大車、汽車、裝甲車、坦克、榴彈炮、槍支、彈藥漫山遍野，到處都是，俘虜兵也到處都有，真是一派兵敗如山倒的凄慘景象。而對我們來説，這些都是我們全部殲滅廖耀湘兵團以後的輝煌戰果。

廖耀湘兵團被殲之後，衛立煌匆忙從沈陽乘飛機逃走，將沈陽交給國民黨第八兵團司令官周福成，由他統一指揮殘餘的十四萬人孤守沈陽。

林彪是一個極善于抓住戰機的人。圍殲廖耀湘兵團的戰鬥剛一結束，他就立即乘勝部署打沈陽的工作。由于我們二縱隊在這次圍殲戰中，基本上没有打上多少仗，因此林彪將攻打沈陽的任務交給了我們。

圍殲戰的槍聲剛一停，東野總部就來了命令，要我們二縱隊和從長春下來的一縱部隊，于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就出發，日夜兼程，向沈陽進發。立即準備進攻沈陽，一定要全部消滅沈陽之敵。這樣，遼沈戰役就到了第三階段，解放沈陽，解放全東北。

總部命令我們二縱和一縱經新民、巨流河，迅速進抵沈陽西郊，會同已經進抵沈陽以南的十二縱隊和進抵沈陽北郊的六個獨立師一起，包圍沈陽。

二縱隊接到這個命令以後，于十月二十八日黄昏出發，連夜行軍并架浮橋渡過了遼河。這時，遼河已開始結有一層薄冰。晚下半夜我們就趕到了巨流河。渡過巨流河以後，經興隆店、三臺、馬三家，連續兩天三夜的急行軍，于十月三十一日晨到達沈陽西郊。

在我們從遼西出發的二十八日晚，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坐的小吉普車在我們部隊的行進路上與我們相遇。他們是要去指揮沈陽的殲滅戰，要趕在我們的前面。林、羅當面向我和劉震交待，到達沈陽後，一定要先截斷敵人往南的退路，切斷蘇家屯往鞍山、營口方向的鐵路綫，不讓敵人從海上逃跑。部隊到達沈陽附近後，就等待總部攻擊沈陽的命令。

三十一日早晨，我們到達沈陽附近，完成了對沈陽的包圍，并切斷了從沈陽到蘇家屯的鐵路聯系，然後積極準備攻打沈陽。縱隊部對四師、五師、六師的戰鬥部署如下：四師準備從正西向沈陽車站進攻，五師進至蘇家屯，準備由蘇家屯向北進攻。六師準備由西南向沈陽進攻。

十一月一日早晨，我們接到林彪、羅榮桓下達的向沈陽發起總攻的命令。

八點鐘，我們在掃除外圍據點後，就集中炮火，轟擊敵人的防御工事，打開突破口。沈陽没有城墻，一遇到敵人的碉堡或堅固的房子，我們就用爆破的辦法來解决。我們三個師很快就突了進去，然後分八路向沈陽市中心攻擊前進。先攻占了西車站，繼而又攻占了鐵西區，在攻占了沈陽市中心和平區以後，又轉向東北，最後攻占了沈陽市的老城和小故宫，即原張作霖的住所。接着，我們又轉向北攻，在環行大馬路中心的太和旅館附近，同一縱隊和獨立師會師。

到十一月二日，沈陽全部解放。我們殲滅和俘虜了國民黨第八兵團司令周福成以下的國民黨守軍十三萬四千餘人。這一戰，光我們二縱隊就抓了四萬多俘虜。

沈陽是蔣介石在東北最大的據點，也是最後的一個據點，是蔣軍的老巢，攻占了沈陽，就解放了全東北。沈陽這個城市，雖然經過戰鬥，但破壞不多；因爲守備沈陽的蔣軍已經毫無鬥志，我們是一攻即克，差不多是攻一地就下一地，最後是一路繳械，一直到全部解决戰鬥爲止。

由于沈陽守敵的抵抗并不激烈，所以解放沈陽時，我們二縱隊的傷亡很小。但可惜的是，在戰鬥結束之後，我們却犧牲了一個好幹部。他是九師的一個團長，名叫薛劍强。薛劍强是豫東永城縣人，在我們二縱隊一直是一個拔尖的幹部，從排長、連長、營長一直到團長，都非常優秀。薛劍强這個人打仗非常勇敢，也非常機智，幾乎每打一仗，身上都要帶一次傷。當時我們還没有開展評選英雄的活動，實際上他是一個真正的戰鬥英雄。沈陽戰

鬥勝利後，仗已經打完，我們繳獲了很多東西，他高興了，就擺
弄起剛繳獲的一門火箭炮，結果引起了爆炸，把他自己給炸死
了。我們當時都很痛心：他在激烈戰鬥中歷次負傷，都没有犧牲，
結果却在擺弄戰利品時犧牲了，這是一個多麽沉痛的教訓呀！他
的犧牲，是我們二縱隊一個很大的損失。從那以後，我們就下了
一道命令，要求所有的幹部，對繳獲來的炮和炮彈，在不熟悉它
們的性能之前，都不準隨便擺弄。

在我們攻占沈陽這個國民黨在東北最大也是最後一個據點的
同時，東北野戰軍的其它縱隊也解放了遼陽、鞍山、海城、營口
錦西、葫蘆島等地，使東北全境均獲解放。至此，遼沈戰役勝利
結束。在這個戰役中，東北人民解放軍以傷亡近七萬人的代價
殲敵一個總部、一個邊區司令部、四個兵團部、十一個軍部、三
十三個整師又十六個團（内有一個軍起義、一個兵團部并一個
投降），共四十七萬餘人。東北國民黨軍除杜聿明率殘敵一萬餘
人從營口乘船逃跑外，其餘的全部被殲。

遼沈戰役是解放戰爭中具有決定意義的三大決戰中的第一個
戰役。這個戰役，加上人民解放軍在其它各個戰場上的勝利，
底改變了整個解放戰爭的進程。一九四八年的十一月十四日，
澤東在《中國軍事形勢的重大變化》一文中指出："這樣，就使
我們原來預計的戰爭進程，大爲縮短。原來預計，從一九四六年
七月起，大約需要五年左右的時間，便可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
反動政府。現在看來，祇需從現時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
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

從一九四五年冬天，十萬大軍陸續出關進入東北，到一九四
八年冬，全部解放東北，東北野戰軍的部隊發展到一百多萬人
接着又是八十萬大軍入關支援華北，解放平、津，一共祇用了三
年時間。在這短短的三年時間裏，我們經過的道路是曲折的，但
最後的勝利是屬于我們的。

東北的全部解放，爲奪取全中國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在這麼
短的時間裏，取得了這麼大的勝利，我個人認爲，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最主要的是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正確領導、指揮。抗日戰爭一勝利，黨中央、中央軍委就立即從山東、蘇北、華北、西北等地調集大批部隊和全國各地的幹部，共十三萬多人進入東北。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去東北的是最多的。黨中央下了最大的決心，下了最大的本錢，要奪取全東北。

第二、東北的黨、政、軍、民團結一致，密切配合，上下一心，將士用命，結成了一個堅强的整體。上面指到哪裏，就打到哪裏。打到哪裏，就勝利到哪裏；打到哪裏，交通運輸兵站就設到哪裏，後勤就支援到哪裏。不管我們部隊走到哪裏，各級地方政府帶領民工、擔架、車輛，把糧食和各種物資送到那裏。部隊不怕疲勞，不怕犧牲，連續作戰，地方政府也就連續支援，一直支援到我們進關打天津爲止。僅以遼沈戰役爲例，據不完全統計，參加支前的民工就達一百六十萬人，其中經常在前綫參戰的有十萬人，由後方運送到前綫的糧食約七千萬斤，爲戰役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第三、東北背靠蘇聯和外蒙古，使我們完全没有後顧之憂。從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動以後，我們歷來就是在敵人的四面包圍之中，祇有在東北，敵人没有把我們全部包圍住。雖然當時蘇聯剛剛取得衛國戰爭的勝利，自己也有很大的困難，但蘇聯紅軍撤退時及撤退以後，都給予了我們適當的援助。盡管援助不多，却完全可以解除我們的後顧之憂。我認爲，這也是我們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四、不能否認東北局、東北野戰軍、東北軍區的領導成員，特别是林彪，在具體指揮上的功績。林彪曾是東北局的書記，東北野戰軍的司令兼政委，是事實上的"東北王"。在三年的東北解放戰爭中，他充分發揮了他杰出的軍政才能，他的特殊功績是無可非議的。

攻占沈陽以後，我們在沈陽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按照東北野戰軍總部的命令，除留下必要的部隊看守倉庫以外，全部撤出城外駐扎，就連我們縱隊部也撤到了城西和蘇家屯一帶。城裏

的統統由東北軍區指定的衛戍部隊來擔任警戒，維持市内秩序。

部隊撤離沈陽之前，我們先清理了戰場，將街道上的敵人尸體全部運出城市，就地掩埋。除將我們自己的傷員送往醫院外，也把敵人傷兵收容起來，送到醫院。俘虜兵集中編隊，由我們派班長、排長、連長帶領着，也全部撤到城外。

就在部隊撤出城後，我們二縱隊發生了一件事，讓我後來作了檢查。這就是部隊私拿倉庫東西的事。

蔣軍在沈陽市還是留下了不少東西：軍火庫裏有不少的槍支彈礮和各種車輛；被服倉庫裏有不少的冬衣，如絨衣、毛衣、風衣、棉衣、大衣、鞋襪等；糧食倉庫裏有不少從美國運來的面粉和罐頭食品，一日三餐，分別打開一個罐頭就可以了。按規定這些東西是一概不準動，要交由沈陽軍管會主任陶鑄統一處理。但是，當時陶鑄手下没有兵，還得由我們部隊來看守這些倉庫。我們二縱隊攻占的地區，是蔣軍主要倉庫的所在地。這些倉庫就由我們二縱隊派部隊進行看守。

按照政策，一切繳獲都應當歸公。我們也是這樣進行教育的。但是由于勝利，又有大量的繳獲，使我們有的部隊看到眼紅。有的就搞本位主義，偷偷摸摸地把倉庫裏的面粉搬到部隊裏去吃，把衣服裝備拿到部隊裏去穿去用。這些事情最終傳到了我們縱隊黨委的耳朵裏。當時我是縱隊的黨委書記，我很擔心，怕這件事情萬一被查出來，就不好交代。可我把這件事拿到縱隊黨委常委内部議論時，大家的意見却很不一致。有人就説："咳，政委，拿這麼一點點算啥呀！倉庫裏的東西多的是，而且倉庫是由我們守備的，拿了以後人家也不知道。"他們這樣一説，我也就不好再説什麼了。我也就睁個眼，閉個眼，説我是官僚主義也好，是縱容也好。究竟下面拿了多少東西，我當時也是心中無數，

可也不能讓部隊就這樣任意拿下去，于是我就説："拿了就算了吧，但是以後再也不能拿了，得把倉庫全都封起來。"結果我們到處貼封條，然後把倉庫交給了軍管會。當時軍管會也是忙得緊，根本就没有時間去詳細檢查，所以這件事就一直没有被發

現。

後來我們自己一檢查，好家伙，弄的白面够我們吃半個月的！當時在東北，部隊都吃高粱米，這一下弄到了這麼多的面粉，大家都高興得不得了。這些面粉，我們不僅在沈陽吃，進關的時候還帶走了一些。還有，從倉庫裏拿出來的服裝，我們全縱隊六、七萬人每人分到了一件毛衣、一件襯衣、一條皮帶、一雙鞋。毛衣有薄的，也有厚的，質量很好，全都是純羊毛的。

這件事，我一直憋在心裏，内心受到譴責，感到不好受。最後，北平和平解放後，一九四九年一月，在北平城裏一個叫九爺廟的地方，東北野戰軍總部召開了全軍師以上幹部會議。會議期間，我先和二縱隊黨委常委的幾個同志商量説，我們在沈陽犯了政策性的嚴重錯誤，如果在這次會議上不作檢討，不作交代，以後就不好交代了。與其將來受處分，不如現在受處分。我是黨委書記，我願意負責，願意接受組織上的處分。

于是，經過二縱隊黨委常委的同意，這次會上，由我發言，對這件事作了一個全面檢討，并且上交了一份書面檢討材料。大意是説，在沈陽戰鬥中，我們二縱隊違反了城市政策，私分了一部分繳獲的東西，裝備了自己的部隊。而且，對拿了些什麼東西，怎麼分配的，我也全部都作了交代。

我在會上這麼一檢討，其它縱隊的同志立即嘩然，説："你們二縱隊怎麼這麼幹哪！"我們受到了大家的責難。但林彪在我作完檢討之後没有説話，衹有羅榮桓問我："你現在才講，早爲什麼不説？"我説："早，我不敢講。"以後羅榮桓也没再説什麼了。

後來，野戰軍政治部把我的檢討全文登了出來。這個檢討書一登，整個東北野戰軍内的所有人都知道了。不少人爲此議論紛紛，有的人還駡："這個吳胖子，當面説得漂亮，這個政策，那個政策，輪到自己就抓一把。從沈陽撈了，到北平才作檢討，現在還刊登他的檢討全文，好像是表揚他似的。"不少人爲此議論紛紛。我覺得這是自己參加革命以來犯的第一次大錯誤，越想越覺得嚴重，包袱一直背到四野南下。已經錯了，無法挽救，給我

什麽樣的處分，我都誠懇接受，毫無怨言。

後來因爲我主動作了檢討，部隊又急于要南下完成解放中南的任務，這件事情就這樣算了，林彪、羅榮桓没有給我任何處分，祇批評了一次就算完事。

從我自己來講，打了一輩子的仗，還没有幹過這樣違反紀律規定的事，可以説是被勝利衝昏了頭腦。當然，事情不是我幹的，是下面的部隊自己搞起來的，但我後來没有頂住，實際上是默認了。不管怎麽説，把倉庫裏繳獲的東西私自拿來照顧自己的部隊，而且拿的數量還不少，是説不過去的。我們全縱隊有六、七萬人哪！從歷史上來説，這次是犯了一次不小的錯誤。

十七、準備入關

沈陽剛剛打下來，大約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我們就接到了東北野戰軍總部轉達的中央軍委命令，要東北野戰軍在作短暫休整後，于十二月上旬立即準備進關，協同華北野戰軍，消滅傅作義部隊。

接到命令以後，我們就想，從遼沈戰役開始，任務一個接一個，部隊没有得到任何休息，幹部、戰士都已經相當疲勞，一行起軍來，拖得相當厲害，掉隊落伍的戰士相當多。另外，還有許多戰後的善後工作要做。馬上進關，確實有一定的困難。對此，縱隊黨委的一些常委很着急。

由于我在紅軍時期就是東北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的老部下，當他在紅二師、紅一師師裏的工作時，我在師所屬的團裏工作，我們彼此之間比較熟悉。我就找到劉亞樓説："我們二縱隊打了這麽多仗，也打得很苦。你看，從打義縣以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我們都没有得到任何休息。現在要進關了，這樣多的部隊，總不是一天就走得完吧！"

劉亞樓當即告訴我，部隊入關的行進順序已經排好，我們可能走在最後。這樣的話，等前面的部隊開始行動以後，我們至少還有半個月的時間可以休整。

聽了劉亞樓的話，我很高興地説："那好，我們一定在這半個月的時間裏，把部隊整頓好、補充好。"我還要求説："如果是這樣，能不能讓我們縱隊部搬到沈陽城裏住幾天呀？"

劉亞樓答復説，那得請示林、羅首長決定。第二天，他來電話通知我，已經把我們的意見反映給林、羅首長了。當時林彪没有説話，是羅榮桓説："算了，可以，搬來吧！"就這樣，我們二縱縱隊部就搬到了城裏，住在和平區，全部都是日本式的房子。

我們再次進城時，沈陽市的秩序已經基本恢復。一天，沈陽市軍管會主任陶鑄請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和野戰軍以及東北軍區的幹部看戲，也請了我們二縱隊的幾個幹部，并且準許我們帶妻子和孩子一起去。我的兒子新潮，那個時候還不到一歲，我抱他坐在腿上看戲。正好，我們的位置就在林彪和羅榮桓的後面，孩子不懂事，把兩隻手扒在了林彪的肩上。林彪回頭一看，見是我的孩子，就笑了笑，問我："這是你的兒子嗎？你也有兒子了！"我説："是的，有了。"這時，羅榮桓也回過頭來同孩子拉了拉手，親了親他，我們都很高興。孩子看不懂戲，没看多長時間他就又哭又鬧，我們祇好向林、羅首長告辭，先回去了。



和大兒子吳新潮

接着，我們抓緊時間進行部隊入關前的一系列準備工作，趕緊處理完諸如俘虜、傷員和安置後方等工作，并向部隊進行入關教育、介紹華北解放區情况及華北敵情，説明進入華北地區後我們應注意的政策和各種事項。另外，還有補充兵源、彈藥、物資、冬裝，設置兵站，安排交通運輸綫，整

編部隊，把一些涉及到地方的工作，向地方政府辦理移交手續等等，忙得一塌糊塗。

入關之前，爲了進一步加强各縱隊的實力，東北局和東野總部决定，將東北軍區屬下的十四個獨立師分別編入各個縱隊，使各縱隊都有四個師的編制。我們二縱隊就增加了一個以羅華生爲師長、邱子明爲政委的獨立第七師，約一萬餘人。

在此期間，爲保障東北野戰軍順利入關作戰，東北、華北解放區共組織了三十萬民工隨軍行動，還組織了一百五十七萬群衆及三十四萬輛人力車，參加修橋補路，運輸物資等戰勤工作。

經過十幾天的緊張工作，我們已基本作好了各項準備，衹等一聲令下，就立即入關開赴華北戰場。這時，我不禁回憶起三年前出關的情景。我們新四軍三師奉命進入東北以後，除七旅編入六縱隊和師特務團編入七縱隊以外，其它部隊，于一九四六年九月，改編爲二縱隊。我們二縱隊，在黨中央、中央軍委、東北局、東北野戰軍的正確領導下，以及部隊全體同志的努力下，打了不少勝仗，和其他部隊一起共同圓滿地完成了解放全東北的光榮任務。

有本書上介紹了這麼一段資料：

在"林、羅、劉"簽署的一份《沈陽解放後關于火炮調整》的命令中，指出：從二縱調出的火炮共三十五門，占十二個縱隊調出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六還多。

還説：二縱隊在東北跑得最快，打仗最多，功勞最大，傷亡最大，繳獲最多，受的處分也最多（指打沈陽犯了違反紀律的嚴重錯誤）。

第八章 解放戰爭（二）揮師南下

一、入關

東北全境解放以後，華北的國民黨軍已成了驚弓之鳥。當時，國民黨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所部的五十餘萬人，駐守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張家口的一個狹長地帶内。傅作義正舉棋不定，是堅守平、津？是從海上撤逃，退守江南？還是西竄，縮回綏遠老巢，保存實力？

與此相反，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對策則非常明確，這就是：就地殲滅華北國民黨軍，絶不能讓他們跑掉了。如果他們跑了，不管他們竄到哪裏，都會對迅速解放全中國十分不利。遼沈戰役結束前後，毛澤東就接連給東北野戰軍的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發出電報指示。歸納起來，這些指示的主要内容有：

一、應該清醒地看到，敵人或逃或縮，都對我們不利。我們的方針是，不讓敵人逃走，更不能讓敵人縮回。要迅速地完成對敵人的戰役分割和戰略包圍，以求全殲。在遼沈戰役未結束之際，就應組成先遣队，戰役一結束，就火速向北平開進。

二、部隊要分多路，以最快的速度突然隔斷北平與天津、天

津與塘沽、塘沽與唐山之敵的聯系，不讓敵人縮回，也不使敵逃掉。

三、部隊行動必須十分隱蔽。東北局要讓新華社及東北各廣播電臺，在部隊入關的兩個星期内，多發沈陽、新民、營口、錦州等地的主力部隊慶功、祝捷、練兵、開會的消息，以迷惑敵人。林、羅、劉等，可携帶輕便指揮機構先行，并于走後一星期左右在沈陽報上登出一條表示林彪在沈陽的新聞，還由新華社播發了這條新聞。

這樣，遵照中央軍委指示，在向沈陽發起攻擊前，由東北野戰軍四縱和十一縱組成的先遣兵團，就已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先行入關。

東北野戰軍先遣兵團入關以後，十一月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中央軍委連續電報指示東北野戰軍火速隱蔽入關，并于十八日命令東北野戰軍停止休整，各縱隊以一、二天的時間完成出發準備，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取捷徑，以最快的速度進關，突然包圍唐山、塘沽、天津三處敵人，不讓敵人從海上跑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開始，東北野戰軍主力正式開始入關行動，各縱隊先後分爲三路，分别由山海關、冷口、喜峰口陸續入關。至十二月上旬，東北野戰軍主力已全部入關，進關的部隊共計十二個步兵縱隊，一個鐵道縱隊，一個特種兵縱隊，包括九個炮兵團，三個裝甲團，兩個工兵團，一個重迫擊炮團等共五十五個師，約八十萬人。

進關初期，爲了行動保密，部隊夜行曉宿，每天都是夜間行軍，拂曉宿營。部隊是邊開進，邊動員，以各種生動活潑的形式，反復進行入關教育。我們反復向廣大幹部、戰士説明，入關作戰，主要是爲了配合友鄰部隊解放整個華北，以加速解放全中國。我們特别强調，要堅决執行中央軍委的統一命令，積極配合華北野戰軍，兩軍團結一致，共同消滅蔣軍在華北的全部部隊。

到十一月底，我軍進關的行動被敵人察覺。八十萬大軍進關，車馬轟隆，人如潮涌，要絶對保密，幾乎是不可能的。行動暴露後，部隊索性改爲晝夜疾進，行進速度更加加快。

十一月三十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等率東北野戰軍指揮機關，由沈陽乘火車到錦州，然後再换乘吉普車和大卡車入關。

根據東北野戰軍總部的安排，我們二縱隊幾乎是最後一批入關的。我們于十二月三日從沈陽出發，經過七天的急行軍之後，到達了山海關，在那裏奉命休整了兩天，等待命令。

二、平津戰役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根據中央軍委“隔而不圍”和“圍而不打”的方針，華北軍區第二、第三兵團和東北野戰軍先遣兵團向平綏路東段發動進攻，包圍張家口、新保安，切斷敵人西逃的道路，從而正式發起了平津戰役。

在東北野戰軍主力全部入關以後，十二月十一日，毛澤東爲中央軍委起草了致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的指示電。這個後來被題爲《關于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的電報指示要求：“東北野戰軍主力十二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數日内即取神速動作，以六個縱隊包圍天津、塘沽、蘆臺、唐山諸點之敵，以兩個縱隊位于廊坊、楊村諸點，以五個縱隊插入天津、塘沽、蘆臺、古冶諸點之間，構築兩面陣地，防敵逃跑。我們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圍北平，而是先包圍津、塘、蘆、唐諸點。休整後，力争先殲塘沽之敵，控制海口。衹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兩點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從本日起的兩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則是圍而不打（例如對張家口、新保安），有些則是隔而不圍（即衹作戰略包圍、隔斷諸敵聯系，而不作戰役包圍，例如對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後各個殲敵。尤其不可將張家口、新保安、南口諸敵都打掉，這將迫使南口以東諸敵迅

速決策狂跑。”

電報還指出：“敵人對于我軍的積極性總是估計不足的，對于自己力量總是估計過高，雖然他們同時又是驚弓之鳥。平津之敵決不料你們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爲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上列部署，你們應該鼓勵部隊在此兩星期內不惜疲勞，不怕減員，不怕受凍受饑。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後，再行休整，然後從容攻擊。”

電報還規定了攻擊的次序：第一塘蘆區，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區，第四天津、張家口兩區，最後北平區。并說，“祇要將塘沽（最重要）新保安兩點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同時，爲協調平、津地區兩大野戰軍的作戰行動，中央軍委決定，整個戰役的指揮，在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入關之前，由中央軍委直接指揮，林、羅、劉入關以後，即由林、羅、劉統一指揮。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中央軍委又決定由林彪、羅榮桓、聶榮臻三人組成平津前綫總前委，以林彪爲書記，統一領導奪取平、津的作戰行動，并負責爾後一個時期（大約三個月）管理平、津、張、唐及其附近區域的一切工作。

根據中央軍委的這一部署，從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起，東北野戰軍三個縱隊由薊縣地區南下，于十二月二十日先後到達寶坻、廊坊等地，隔斷了平、津之間的聯系；三個縱隊由豐潤、撫寧沿北寧綫南進，于十二月二十日解放楊柳青、唐山等地，完成了對天津的包圍；兩個縱隊由山海關向天津、塘沽地區前進，準備攻占塘沽，阻斷敵人的海上退路；以四個縱隊會同華北軍區第七縱隊，于十二月十七日起，先後攻占海淀、豐臺、南口、通縣、南苑機場和黃村等地，完成對北平的包圍。

十二月十二日，東北野戰軍首長來了命令，要我們二縱隊立即從山海關出發，同七縱、十二縱一起，并肩攻占塘沽。接到命令的當天，我們就從山海關出發，日夜兼程，迅速向塘沽地區進發，并在塘沽附近與七縱、十二縱會合。

這時，林彪又來了命令，要求二縱、七縱和十二縱迅速偵察

塘沽地形，限一星期之內把情況搞清楚，并把塘沽包圍好，等候攻擊命令。

按照命令，我們三個縱隊的領導幹部，包括二縱隊的我和劉震、七縱隊的鄧華和吳富善、十二縱隊的鍾偉和徐斌洲，大家一起前去偵察塘沽的地形和通道。我們看到，塘沽東靠渤海，是海河的出口地，其它三面都是鹽場。由于海潮咸水倒灌，終年都是一片汪洋，是盛産蘆鹽的地方。盡管當時已是十二月底，別的地方已是滴水成冰，但塘沽這裏因是海水，鹽田上面祇結了薄薄的一層冰，一踩就破，而且鹽田四周祇有一條狹窄的小路，大部隊無法通行。我們還觀察到，塘沽守敵侯鏡如所屬的五個師，都已移駐到海上的軍艦中，隨時都可能逃跑。我們的炮火封鎖不了，當時我們又没有海軍，無法對塘沽形成四面包圍，更無法切斷敵人的退路，全殲守敵。

經過三、四天的偵察和研究，我們大家一致認爲，我們無法對塘沽實施包圍，建議放弃包圍塘沽的計劃，改爲對塘沽采取監視牽制的作戰方針，先攻打天津。我們把這個建議報告給總前委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諸首長，總前委又報告給了中央軍委，都迅速得到了批準。

經中央軍委同意後，總前委決定改變原定計劃，除以十二縱主力位于軍糧城監視塘沽敵人外，集中兵力轉攻天津。由東北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率人組成前綫指揮所，集中一縱、二縱、七縱、八縱、九縱五個縱隊、二十二個師共三十四萬人，并配屬大口徑火炮五百餘門、坦克十六輛、裝甲車十六輛，包圍并强攻天津。劉亞樓率領的前綫指揮所，設在天津西南的楊柳青。

天津守敵共約十三萬人，由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統一指揮。天津這個城市鄰近海濱，市郊多低窪地，市內河流縱橫，而且多高大建築物，這些自然條件，形成了天津易守難攻的特點。不僅如此，國民黨軍還修築了相當堅固的城防工事。在城外，他們環市挖掘了一條長四十五公里、寬十米、深三到四米的護城河，引進運河、海河的水，水深經常在一米半到兩米上下。護城

河的外側，設有鐵絲網、鹿砦和布雷場，以及二十餘處外圍據點。護城河的內側，修有高約六米的土墻，墻上有鐵絲網、電網，每隔三十米還築有一個碉堡。市區内，陳長捷還利用高大的建築物，構成了一個嚴密的市區防御中心。北部是防守重點，南部的兵力相對的弱一些。

于是、根據天津東西窄、南北長的地形，以及守敵北部兵力強、南部工事强和中部兵力、工事均不强的特點，劉亞樓經與參戰部隊的領導集體討論後，明確提出了“東西對進，攔腰截斷，先南後北，先分割後圍殲”的作戰方針。具體部署是：

以一縱、二縱配屬三分之二的炮兵部隊和十輛坦克，由一縱隊司令員李天佑、政委梁必業統一指揮，于和平門南北地段，由西向東實施突擊；以七縱、八縱配屬三分之一的炮兵和十輛坦克，由七縱隊司令員鄧華、政委吳富善統一指揮，從王串場、民族門一綫由東向西實施突擊。另外，以九縱及十二縱三十四師由南向北實施助攻，以小部兵力在北面實施佯攻，以六縱十七師為預備隊。大家同時還商定，西、東兩個主攻集團的會合點爲金湯橋（即今解放橋）。

任務分配完畢，各參戰部隊很快就完成了對天津城的包圍。同時，各部隊都對自己所負責區域内的敵情、地形作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從縱隊，到每個師，每個團都擬制了詳細的攻城計劃，并以保障順利突破護城河爲主。

戰鬥開始之前，“前指”根據中央軍委和總前委的指示，還特別要求各部隊在攻城的過程中，對那些據守在市内高大建築物、工廠、學校的敵人，應采取先包圍、暫時不攻的辦法，待打下天津、大部敵人就殲之後，再回過頭來解決這部分敵人，以減少戰火對城市建築物的破壞，以利今後的建設。

中央軍委、總前委林、羅、聶決定，一九四九年的一月三日至十二日，爲我攻津部隊掃除外圍據點的時間，在此期間，陳長捷曾幾次派代表來找劉亞樓談判，要求允許他們携帶輕武器南撤。針對陳長捷的要求，我們針鋒相對地提出了要他們徹底放下

武器，實行和平解決的建議。陳長捷拒絶了我們的反建議，決心頑抗到底。

從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起，參與包圍天津的各個縱隊開始負責清掃自己進攻地段上的敵人外圍據點。這些外圍據點的形式多種多樣，不僅有明碉堡群，也有暗地堡群，還有一些是普通村莊改建的。我們把二縱隊的指揮所設在和平門以西五里路的地方。在那裏，我們利用河堤挖了一個地下指揮所，就在那裏用電話指揮幾個師各自肅清攻擊道路上的外圍據點。

肅清外圍的命令下達後，我們二縱四師便開始沿着北平到天津的公路，逐個肅清北倉到西車站之間的據點，打了一個多禮拜，全部都打了下來。五師則沿楊柳青河堤以南，橫掃附近敵人設置有工事的村落和一群群暗地堡。這些暗地堡基本上都築于地下，上面衹留出一個瞭望孔和一些槍眼，而且暗堡群和村落就位于護城河的外面，堡與堡、村與村之間有交通溝相通，很不好打，但五師還是把這些村莊和暗地堡一個一個地打了下來。六師是沿着北興莊到和平門往前橫掃，徹底肅清了在楊柳青河以北，和四師相接的西車站這一段的村莊和暗地堡。

到了一月十二日，我們全部完成了肅清突破地段上全部敵人外圍據點的任務，俘虜敵人近兩千。

一月十三日，我們全天都在作攻城的準備，包括火力準備、突破點的準備、渡護城河的準備、攻擊梯隊配置的準備等等。其實，有的準備工作早就開始了，例如，對渡河器材的準備等。

天津的護城河寬十米，水深經常爲一米半至兩米。我們臨攻城的前幾天，陳長捷垂死掙扎，命令打開西郷三元村附近的水閘，使南運河的水大部分都流入護城河，同時堵塞護城河流入海河的通道，使護城河的水有進無出，導致河水暴漲，嚴重影響了我們攻取天津的行動。這時，疏通河道，迫在眉睫。經過老鄉們的指點，我們終于在南運河的上游找到了一個閘門，落下這個閘門後，南運河通往護城河的水終于斷了流。盡管如此，當時護城河的水也已經深達三米，當時天氣很冷，但冰很薄，水還在流動，

冰上不能過人，没有橋，部隊就很難過河。

前綫指揮部給我們派來了一些工兵部隊，專門爲我們架橋，就這樣也無濟于事，架的橋遠不够用。攻城時，我們將是三個師齊頭并進，後面還有一個預備師，攻擊面相當寬，都要從橋上通過是不可能的。而且護城河緊靠城墻，就在敵人炮火的有效射程內，部隊集中從橋上通過，傷亡就會增大。在這種情况下，我們部隊就自己想辦法作準備，不完全依靠工兵。

經過研究，我們決定祇要求工兵幫助我們排除地雷，其它事情我們自己去做。天津護城河外側，設有鐵絲網、鹿砦和地雷場。進攻時，如果有人踩到地雷，傷亡就不會少。因此，攻城之前，我們首先要求排除敵人埋下的地雷。爲了加快掃雷速度，除"前指"派下來的工兵以外，我們自己還組織了一些小工兵連、小工兵排，一邊學習排除地雷，一邊清除鐵絲網、木樁、鐵釘、竹簽、玻璃渣等障礙物。

一切準備就緒之後，一月十四日上午十點整，在前綫指揮部的統一指揮下，我們開始向天津城發起了總攻。

隨着總攻命令的下達，天津城外的幾百門大炮一齊轟鳴。經過四十分鐘炮火的猛烈轟擊，我們二縱三個師主要攻擊地段上的突破口，都被轟開了一段二十米到三十米的一段口子，鐵絲網、鹿砦、城墻等也被摧毁得差不多了。而且敵人的地堡被掀掉，高層建築物上的火力點也被壓制住了。

這時候，我們下令部隊開始渡河。這個渡河呀，真是五花八門，渡河器材各種各樣，有的用橡皮船，有的用氣包，有的用樹幹，有的用木排、木板，有的用竹竿，有的甚至用簸箕，用盆用桶。一些會游泳的就游泳過去了，我甚至還看到有的戰士扒在用麻袋裝的棉花包上過了河，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熱鬧得不得了。不過最有效的，還是拉繩子，在河這頭的木樁上拴根繩，派人拉到河對岸拴上，然後大家拉着繩子過河。指戰員們用盡了各種各樣的辦法，一擁而過。真正從橋上過去的，實際上祇有彈藥箱和騾馬大車。

攻城的關鍵是渡河，但由于準備充分，我們祇用了二十分鐘的時間，部隊就全部過了河。

一過護城河，部隊立即從被轟開的城墻缺口處，突進了天津市郊。進城以後，四師主攻車站，五師主攻和平門，六師在和平門與車站之間，和五師并肩前進。

戰鬥進行到十二點鐘的時候，四師的前進受到了阻礙。他們在攻占車站以後，迎面就遇到了一個高大的建築物——天津面粉廠，也是國民黨第六十二軍軍部所在地，周圍工事堅固。按照林、羅、聶遇到堅固的建築物先包圍，暫不攻的命令，四師部隊先把軍部和其所轄部隊包圍了起來，暫時不再前進。

可是五師呢？他們一路單刀直入，向和平門攻擊前進，一直攻到了老城。六師也很順利，一路前進，和五師在老城會合。然後他們又各自繼續前進。不久，六師攻占了勸業場，而五師也攻占了中原公司。中原公司是天津市的最高建築物之一，陳長捷的指揮部原來就設在這裏。

下午四點，天津面粉廠的國民黨六十二軍軍長表示願意談判投降，要我們暫時停止攻擊，給他們一點時間在內部統一意見。到晚上八點鐘，六十二軍軍長以下的人員全部放下武器，我們占領了天津面粉廠。

晚上，四師、五師、六師繼續沿海河南岸攻擊前進，三個師的目標，統統指向金湯橋。一月十五日的凌晨五點，五師首先來了報告，説他們已經占領了金湯橋，并已和橋北的七縱部隊會師。這就是説，我們已經完成了上級交給我們的任務。到清晨六點鐘，四師和六師也都到達了金湯橋，并先後與橋北的七縱、八縱部隊會合。

十五日下午三點，前綫指揮部宣布：天津十三萬的守敵已全部被消滅，我們解放了天津市，活捉了陳長捷。

天津解放的當天晚上，攻進城裏的各縱隊除留一定數量的部隊維持市內秩序外，主要的部隊都撤出城外休息、吃飯和睡覺。我們的部隊從一月十四日早晨八點進入陣地後，一直打到了十五

日下午三點，已經有兩天一夜沒有睡覺了，指戰員們都非常疲勞，撤出城外，可以讓他們好好休息一下。

大部隊出城後，我帶着縱隊領導機關，組織司、政、後各部門的幹部和少數部隊，開始進行戰鬥的善後工作。主要是：

一、打掃戰場，清查國民黨軍的散兵游勇和潛藏在老百姓家的敵人，收容俘虜，收容傷兵、集中掩埋犧牲了的同志，準備將來修建烈士陵園，收集武器彈藥，維持城市秩序，保護工廠、商店，嚴格執行城市政策，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這些工作都是很重要的，影響面很廣。

二、分派部隊看守倉庫，包括糧倉、被服庫、軍械庫、彈藥庫等。將繳獲的各種車輛和各種火炮，統統集中起來交給了天津軍管會，經過他們的接管和查封以後，我們就算完成了任務。

三、向城市人民進行大量的宣傳工作。我們用開會、撒傳單、寫標語、街頭演講等各種方式，向天津市人民宣傳我們的城市政策，宣傳“約法八章”，宣傳我們軍隊的紀律，號召人民自動檢舉和清查國民黨的散兵游勇，以及潛藏着的槍支彈藥。我們的這些政治宣傳，使群衆完全放了心。

四、作群衆工作。戰鬥中，有的房屋被炮火打着起火，戰鬥結束後，我們立即組織部隊，幫助撲滅火災，防止火勢蔓延，并幫助群衆清理現場，整理東西。我們還特別注意幫助清理敵人據點周圍的地雷、炸彈，防止造成群衆的意外傷亡等等。

經過這一系列的工作，人民群衆對解放軍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們紛紛打着旗子，前來熱烈歡迎我們，歡迎東北野戰軍的隊伍。還有不少人給部隊送來了猪肉一類的慰問品。這些慰問品，我們統統交給了軍管會統一處理。

天津戰鬥中，各參戰部隊模範地執行了城市政策，除個別工廠、學校被敵人縱火燒毀外，其餘均完好無損，保證了整個城市的順利接管。爲此，戰鬥結束以後，各參戰部隊很快就受到了中央軍委的通令嘉獎。

戰鬥結束後，劉亞樓在天津召集各縱隊的領導幹部開會，傳

達了林、羅、聶的指示，要求各部隊很快撤出城外，稍事休整後，立即轉移準備下一步攻打北平城。

這樣，整個天津戰役就宣告結束了。天津戰役，是東北野戰軍首次在水網低窪地條件下，實施的大規模城市攻堅戰，也是我軍參戰的各兵種協同最多，協同最好的一次戰鬥。戰鬥中，各兵種，包括步兵、炮兵、坦克兵、工兵、鐵道兵，統一行動，密切配合。如坦克爲步兵開路；炮兵壓制敵人的火力；工兵排除地雷、清除障礙；通訊兵保障部隊的通訊聯絡，部隊前進到哪裏，電話綫就架到了哪裏。這些都保障了戰鬥的順利發展。

加之，我們在戰前準備了各種各樣的渡河器材，制定了詳細的作戰計劃。而且我們采取了先南後北，東西對進，攔腰斬斷，穿插分割的正確戰術手段。因此，祇用了短短的二十九個小時，就攻克了這個既有重兵守備，又有堅固設防的擁有兩百多萬人口的大城市。事後，中央軍委向全軍通報了我們攻克天津市的經驗。

在這裏，我想特別的講一下，在天津戰役中，我們防空工作也是做得最好的。當時，“前指”將高射炮兵分布在天津四周，敵人的飛機祇要一來到天津上空，就會遭到高射炮火的密集射擊，敵人的飛機往往來不及擲下炸彈就嚇得飛跑了。我們打天津的那幾天，天氣非常晴朗，但祇要敵人的飛機一到，我們所有的高射武器就都一起向它開火，飛低了用高射機槍打，飛高了用高射炮打。它頂多飛到四千公尺，再高它也飛不了。我當時親眼看到，我們的高射炮一開火，所有的炮彈都在飛機四周爆炸。從我們開始肅清周圍據點起，一直到全部解放天津，幾乎天天都有敵人的飛機來，但幾乎都沒能把炸彈投下來。開始總攻的那一天，天上一下子就來了三、四架飛機，可我們的高射炮一陣轟擊，就把他們攆走了。原來駕駛員也都是怕死的呀！

連帶說一句，我從參軍到打天津，打了將近二十年的仗，幾乎沒有一仗不受敵人飛機的威脅，不挨敵人飛機的炸。抗日戰爭時期，挨日本飛機的炸，紅軍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挨國民黨飛

機的炸，直到打天津這一仗，才第一次對敵人的飛機毫無顧慮。這一仗，敵人的飛機不僅没有投下一枚炸彈，還被我們的高射炮打下了好幾架。看見敵機往下掉，我和劉震都興奮得跳起來鼓掌。當時，這真是一件非常高興的事！

天津戰役結束後，我們二縱隊奉命由天津楊柳青轉移到楊村、武清、廊坊三個地方休整待命，準備打北平，消滅蔣介石和傅作義在華北的全部力量。我們縱隊司令部設在武清縣城。我們當時的任務是：一方面是待命，準備接受新的任務，攻打北平城；另一方面是總結經驗，休整部隊。

當時被我們圍在北平的敵人，共有兩個兵團部、八個軍部、二十五個師，連同其它地方部隊，共計二十五萬人，由傅作義統一指揮。在天津被攻克和西撤退路被切斷的情況下，北平守軍已完全陷入絶境。如果傅作義堅決不投降，北平也會炮火再現。

與傅作義的接觸和談判，早已在秘密進行。早在一九四八年底，中共中央、平津前綫指揮部和北平地下黨就開始和傅作義進行談判，謀求和平解放北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表《關于時局的聲明》，提出了同南京國民黨政府，及其它任何國民黨的地方政府、軍事集團進行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根據這八項條件精神，一月十六日，平津前綫指揮部致函傅作義，提出和平繳械出城接受改編的兩種辦法，敦促其認清形勢，當機立斷，站到人民方面來。

在解放軍大軍臨城的情況下，經過北平地下黨的耐心工作和一些開明人士的敦促，傅作義終于表示願意接受我們提出的和平條件。一月二十二日，北平守軍開始按協議撤離市區，進至平津前綫指揮部指定的地點，接受改編。一月三十一日，解放軍進駐北平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隨着北平的和平解放，平津戰役也勝利結束了。整個平津戰役歷時六十四天，殲滅和改編國民黨軍一個總部、一個警備司令部、三個兵團部、十三個軍部、五十個師（内含兩個騎兵旅），共五十二萬人。平津戰役的勝利，連同其它戰場的勝利，已經奠定

了解放戰爭在全國勝利的基礎。

北平是華北的第一大城市，也是世界馳名的文化古城，當時擁有人口兩百多萬。爲保護這座古城免遭戰爭破壞，平津戰役期間，中央、中央軍委一再指示平津前綫指揮部，要盡量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以便能完整保存這座城市。所以，北平和平談判的各種問題，一直都是在中央、中央軍委的全面安排下，由平津前綫總前委的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等領導具體負責執行的。北平和平解放後，我記得好象是由葉劍英任北平軍管會主任兼北平市長、彭真任市委書記。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我們的部隊舉行了入城儀式。入城式是代表性的，參加儀式的既有東北野戰軍的部隊，也有華北野戰軍的部隊；既有步兵，也有包括坦克、裝甲兵、工兵等各特種兵。當天，參加入城式的部隊先從各個方向進入南苑機場，然後在林、羅、聶及劉亞樓的統一組織領導下，從南苑機場開進北京。一路上，入城部隊都受到了北平市民、學生和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

平津前綫指揮部進駐北平後，林、羅、聶、劉等首長都住在當時的北京飯店。各個縱隊則都返回原駐地不動。

到三月二十五日，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由西柏坡遷入北平。在進駐北平以前，平津前綫指揮部，在南苑機場舉行了閲兵式，各個部隊接受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央領導的檢閲。由于當時北平城内的情况還比較復雜，中央領導同志都暫住香山。

之後，我記不得是那一天了，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在香山接見了東北野戰軍全體師以上幹部。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都講了話。他們在講話中要求東北野戰軍準備繼續南下，擔負起解放中南地區，即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等省的任務，配合二野、三野打過長江，消滅蔣介石、湯恩伯、白崇禧、余漢謀等國民黨部隊，堅決貫徹執行七届二中全會的決

定，解放全中國，將革命進行到底。聽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大家都極爲興奮，感到這對東北野戰軍的百萬指戰員來說，都是極大的鼓舞。

接着，東北野戰軍在北平城内朝陽大街的九爺府，召開了全軍師以上的幹部會議。這次會議前後一共開了十天，我們二縱隊的幹部就住西單飯店。會議的主要内容是：

一、傳達學習毛澤東主席在黨的七届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七届二中全會是在一九四九年的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西柏坡召開的，當時正是天津戰役的關鍵時刻，林彪没有出席這次會議，由羅榮桓去參加了會議。毛澤東主席在七届二中全會的講話裏，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

二、會議同時組織我們學習了毛澤東爲新華社所寫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和毛澤東主席關于時局的聲明。毛澤東主席在《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中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將要獲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偉大的勝利。"現在看來，問題就更加清楚了，毛澤東的這些話，顯然是有針對性的。

三、總結了遼沈、平津戰役的偉大勝利和經驗教訓。林彪在會上作了一個半小時的講話，專門講了一個團結問題。强調不僅東北的部隊内部要團結，更要在中央、中央軍委的統一領導，統一號令下，和全國各個兄弟部隊團結一致，互相配合，共同消滅蔣介石的全部力量，解放全中國，把革命進行到底。

林、羅講話之後，各個縱隊的幹部都相繼發言表態。我除表態之外，還在這次會議上檢查了前面提到的二縱隊在沈陽私分糧食、衣服的錯誤。由于我主動地作了檢討，没有受到更多的批評。回到二縱隊，我們緊接着召開了團以上幹部會議，對會議作了傳達，要求各部隊深入動員，準備立即南下，打到海南島，打到鎮南關（後改睦南關），解放全中國。

這個時候，我們已經完全有把握在全國範圍内戰勝國民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内的勝利是肯定無疑的了。

三、南下途中，打獵負傷

平津戰役後的休整期間，遵照中央軍委關于統一全軍組織及部隊番號的指示，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進行了整編。這次整編，主要是上面機構的改編，下面軍、師、團的建制都不變。當時中央軍委的命令是：

西北野戰軍改稱第一野戰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下轄第一、二兵團，全野戰軍共十五萬五千人；中原野戰軍改稱第二野戰軍，由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員，下轄第三、四、五兵團，全野戰軍共二十八萬人；華東野戰軍改稱第三野戰軍，由陳毅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下轄第七、八、九、十兵團，全野戰軍共五十八萬一千人；東北野戰軍改稱第四野戰軍，由林彪任司令員，羅榮桓任政治委員，下轄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團，全野戰軍共九十餘萬人；原華北的第一、第二、第三兵團，依次改稱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團，歸中央軍委直接指揮，三個兵團共二十三萬八千人。

同時，除四個野戰軍以外，中央軍委還將全國劃分爲六個大軍區，并决定由第一野戰軍兼西北軍區，第二野戰軍兼西南軍區，第三野戰軍兼華東軍區，第四野戰軍兼中南軍區，此外，組織東北軍區，由高崗任司令員兼政委，組織北京軍區，由聶榮臻任司令員，薄一波任政治委員。

東北野戰軍的十二個縱隊，從一至十二縱隊，依次改編爲第三十八至第四十九軍，共十二個軍，外加特種兵縱隊。我們二縱隊被改編爲三十九軍，和第四十一、第四十二軍共同隸屬于十四兵團，兵團司令員劉亞樓，政治委員莫文驊。我們二縱隊的四師、五師、六師和獨七師分别改稱第一一五師、第一一六師、第一一七師和第一五二師。

隨着十四兵團的組建，我被任命爲十四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

治部主任，劉震被任命爲十四兵團副司令員兼三十九軍軍長。這樣，我便離開了三十九軍。三十九軍政治委員由原二縱隊副司令員吳信泉接任。

隊伍整編以後，從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起，第四野戰軍在林彪的率領下（羅榮桓因病留天津治療），分多路由平、津地區南下，差不多每個軍都分成了兩路。經過半個多月的行軍，行程約兩千公里。部隊經河北、河南到達湖北長江沿岸。五月三日，發起渡江戰役，從漢口以東的團鳳、武穴地區强渡長江，相繼解放了武漢三鎮，并在渡江戰役中殲敵二十五萬餘人。之後，按照中央軍委的命令，繼續進軍江西、廣東、廣西各省，負責消滅華南的國民黨軍及白崇禧率領的桂系部隊。

這次進軍，實際上是又一次的長征，所不同的是，這次是向南方長征，走的都是大路。而且我們是勝者，主動權操在我們手裏，要走、要停、要打，都由我們自己掌握。當然，有一點却與紅軍時期的長征一樣，那就是這次南下同樣是都依靠兩條腿來走路。天氣炎熱，兼程南下，部隊指戰員都非常艱苦疲勞。

四野部隊以東北、河北和山東籍的戰士居多，初到南方，由于生活習慣和氣候不同，指戰員們不習慣南方的氣候、水土，不熟悉水網稻田地和山地作戰特點，再加行軍疲勞，日曬雨淋，酷暑，部隊指戰員普遍感到非常艱苦和疲勞。而且南方雨多、蚊蟲多，後勤部門却來不及給每個人配發雨具和蚊帳。這樣一來，疲勞加上淋雨和蚊蟲叮咬，因病減員的數字相當大，影響了部隊的戰鬥力。但和以前長征時不同的是，這些病號都被收留到地方醫院休養了，再也不會有因病掉隊而犧牲的事情發生了。

盡管有這些困難，但廣大幹部、戰士在"解放全中國"這一口號的鼓舞下，士氣非常高昂，一路上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愛護群衆，尊重沿途各地的黨、政組織，注意和他們搞好關系，就這樣，部隊一鼓作氣，一路挺進到了鎮南關和海南島。

令人遺憾的是，我由于一次意外事故，没能跟着部隊一起行動，因此没有經受這個鍛煉。

隊伍南下時，我被留在天津，等待組織十四兵團。我和劉震兩家住在一起。當時劉震還兼任三十九軍軍長，不久，劉震走了，返回三十九軍指揮部隊去了。我和其他幾個人就在天津等了一段時間。

趁着在天津逗留無事的期間，我與鄧華、莫文驊等人先後參觀了塘沽、大沽和天津市的一些工廠。當時天津市的市委書記兼軍管會主任，是我們新四軍三師的老師長兼政委黄克誠。我們幾個人就去拜訪了他，向他匯報了一些情况，并請他照顧一下我們留在天津的家屬。他向我們交代了一些南下時應注意的事項，還請我們在天津一個名叫"吉士林"的法國餐館吃了一頓飯。

四月底，我接到命令，要我與第十五兵團司令員鄧華、第十四兵團政委莫文驊，以及謝阜民、劉轉連等一批調動工作的幹部一起，從天津出發，去武漢就任。我們隨即從天津出發，先坐火車經濟南到徐州，然後在徐州换車直達開封。當時，四野司令員林彪、第一參謀長蕭克、第二參謀長趙爾陸和政治部主任譚政都在開封。林彪司令員告訴我們，四野司令部和中南軍區司令部準備立即搬到武漢去，要我們先走，到武漢集中報到，接受任務。

按照林彪的指示，我們繼續經鄭州，到了漯河。那時的火車衹能通到漯河，于是我們幾個人就改乘吉普，沿着四野的兵站綫走，經上蔡、汝南、正陽，來到羅山以北的銅鐘鎮。走到銅鐘鎮時，正值天下大雨，河水暴漲，汽車過不了河，衹好在鎮上住下了。

不久，雨過天晴，大家都想去鎮外玩一玩，看一看銅鐘的風景，順便拿上了鳥槍，想打幾衹斑鳩回來燒着吃。

這時天已近黄昏，走着走着，我看到一座寺廟的屋頂上，停着三衹鴿子，就要警衛員把我的鳥槍拿過來。那是打天津時繳獲的一支德國鳥槍，是三十九軍後勤部政委于輝給我拿來的。我覺得這槍的確不錯，就一直帶在身邊，并曾用它打過幾次野鴿子，都打到了。

警衛員把槍拿來之後，推上了子彈。我一看，嘿！裏面裝的是個打老虎用的大號子彈，就把子彈裏的火藥倒了一些出來，再裝上去。遺憾的是我没有注意到槍筒子裏都是土，因爲緊急趕路，一路上都顧不及把槍擦乾净，我負傷以後才發現了這個問題。

當時我靠在土墻上瞄準鴿子，一扣板機，轟隆一聲，槍就炸了，把我左手的大姆指炸飛了，中指和食指各炸掉了一節。當時，大量的流血，加上十指連心的疼痛，使我昏了過去。是我自己犯了個大錯誤，突然之間出現了這樣的災難。

一看這種情況，鄧華、莫文驊、謝阜民和劉轉連他們趕緊就跑過來招呼我，把我扶起來。幫我用手帕把傷處一扎，然後叫警衛員從旁邊的村子裏弄來了一個竹床，讓我睡上。鄧華、莫文驊他們幾個親自動手，把我抬到銅鐘鎮一個地主的家中。當時，這個地主全家都已逃跑，衹有一個母親帶着個小女孩在家。

然後，鄧華、莫文驊他們就在鎮上到處給我找醫生，可就是找不着。本來，鎮上駐着地方軍區一個獨立團的團部，但部隊已經出發剿匪去了。就在鄧華他們急得没有辦法的時候，説來也巧，這個獨立團的醫生回來了。他請假回家探親，正好在那天回來，準備去追趕部隊。鄧華他們就找到了他。那位醫生立即就用大量的酒精給我消了毒，并重新爲我包扎好傷口，同時給我打了一針破傷風血清。

獨立團的醫生告訴我們，對我的傷勢來説，這些處理衹是一些臨時性的措施，還需要進一步地徹底治療，但他已經無能爲力了。

又是一件巧事，恰恰在這時候，三十九軍的南下隊伍正好路過這個地區。鄧華和莫文驊帶着我的警衛員，連夜找到了一一五師副師長黄經耀和師衛生部長石光華。黄經耀聽説我受了傷以後，當即要石光華帶領醫生、護士連夜趕到銅鐘鎮，爲我做手術。

那天，大概是晚上十二點鐘開始做的手術。手術一開始，石光華就給我吃了麻藥。這是我第一次嘗到麻藥的滋味。一直到清晨手術完畢，我還没有清醒，就一直睡在當作手術臺的竹床上。

鄧華、莫文驊他們爲了我一夜都没有合眼，整夜都在爲我奔波、忙碌。想起他們當年以老紅軍戰士之情照顧我，至今令我激動。我衹能在這裏向他們表示我深深的感激之情！

很快，十四兵團副司令兼三十九軍軍長劉震、政治委員吴信泉都知道我負了傷，他們説，讓我一個人在那裏不行，不安全，又從一一五師給我派來了一個一百七十多人的連隊，專門爲我警戒，保護我的安全。他們還决定，把石光華部長和醫生、護士都留下，專門爲我繼續治療傷口。可見劉震、吴信泉、黄經耀、石光華等同志對我愛護關懷備至。戰爭年代的那種同志之情、戰友之情，真是没法比！

第二天，鄧華、莫文驊、劉轉連和謝阜民等看到我已經有了警衛部隊，又有醫生在我跟前，一切都已安排妥當，就離開了銅鐘，繼續向武漢前進。他們在臨走時還向開封發了個電報，把我受傷的事，報告了四野的林彪司令員，蕭克和趙爾陸參謀長，當時他們都還在開封。莫文驊是我們十四兵團的政委，更加關心我，後來又給我派來一個組織幹事王春本給我當秘書，到武漢後，照顧我的生活。

林彪得知我受傷後，又指示四野後勤部給我派來了一個技術比較高超的日本醫生。這位日本醫生在銅鐘住了兩天，看見我的傷口已經基本上被控制住，没有什麽大事，加上又有醫務人員在我跟前守護，就告辭回去了。這時，四野領導機關已開始向武漢轉移，所以那個日本醫生臨走時，勸我再休息幾天後就轉到漢口去繼續養傷。

我在銅鐘整整住了十天。我痛定思痛，心情一直非常沉重，情緒很不好。我總感到自己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對不起四野的領導。回想我自參軍以來，經歷了無數次的大小戰鬥，很僥幸，没有負過一次傷，這次我由于勝利衝昏了頭腦，用槍打鳥，自己把自己的左手拇指給打掉了，真是無法向組織上交代。後來又聽説，四野已經向中央軍委打了報告，并通報全軍，批評我違犯了

紀律，説吴法憲用槍打鳥，把手炸壞了，要大家注意，以後不要隨便用槍打鳥。我聽説之後，更加感到内疚和難過。

十天以後，石光華看我的傷勢比較平穩，就準備護送我去漢口。臨行前，我要劉震和吴信泉派來的那個警衛連回一一五師報到，祇要石光華和一、兩個醫護人員護送我到漢口。然後，我帶着幾個警衛員分乘一輛吉普，一輛中卡，從銅鐘出發，經羅山、宣化店、三河口、黄陂、灄口到了漢口。當時正值雨季，公路上都是泥巴，遍地泥濘，很不好走，我們整整走了兩天一夜，才到了漢口。

一到漢口，我立即去見林彪。見到林總，真覺得不好意思。林彪司令員看了看我的手問道："痛不痛"？我説："不痛"。林總説："什麽不痛，十指連心哪！好一點没有？"我説："好了一點。"林彪司令員又説："現在什麽也不要説了，就在漢口住下，找醫生治療，好好休養三個月再説，别的事，你就先不要管了，現在的任務就是好好養傷。"

接着，我又去見了四野政治部主任譚政和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兼武漢軍管會主任陶鑄。他們都知道我負了傷，也都安慰我，要我好好養傷。

就這樣，我在武漢住了下來。關于我在武漢的生活，譚政、陶鑄已經指定要四野司令部管理局負責人蘇焕清負責，一切費用都由他們供給。正好，蘇焕清是原來我們新四軍三師司令部的管理科長，我們早已熟悉。最早蘇焕清給我安排在揚子口飯店四樓住了幾天，以後在蘭陵路給我找了一座房子，最後又在勝利路給我找了一座更大的房子住了下來。這時，莫文驊派的十四兵團的組織幹事王春本也到了，一邊給我當秘書，一邊照顧我的生活。

在銅鐘受傷以後，我一直没有把自己因槍炸負傷的消息，告訴我的妻子陳綏圻。因爲她在天津還帶着一個吃奶的孩子，告訴了她，祇能增加她的焦慮，也于事無補。因此在銅鐘，我給她寫信時，祇説自己到了什麽什麽地方，一切都很好等等，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我負傷的事。

不想劉震在給他妻子李玲寫信的時候，告訴李玲説，我在銅鐘負了傷，還可能有感染破傷風的危險。李玲看到這封信後，爲我十分擔憂。第二天，正好陳綏圻到她家裏去，李玲一見陳綏圻就掉開了眼泪。陳綏圻當時覺得十分詫异，緊盯着連聲追問："是否前方來了信，出了什麽事？"李玲一開始不説，陳綏圻就一定要李玲把劉震的信拿出來看一看。李玲被逼無奈，祇好把信拿了出來。陳綏圻一看就慌了神，馬上回到自己的住地，就準備來找我。因爲當時還處于兵荒馬亂的時候，她怕帶着孩子路上不好走，就把新潮托付給了一直負責照顧他的日本保姆。當晚臨走前，她給新潮喂了一次奶，就自己一個人乘火車到了南京，想從南京轉乘輪船到漢口來看我。但就在這個時候，國民黨的空軍正加緊轟炸南京，轟炸上海，轟炸長江航道上的一切船隻，輪船無法通行。困在南京的陳綏圻心挂兩頭，急得不得了。後來實在没有辦法，祇好想辦法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在確切知道我的情况之後，她就又回到了天津，準備帶上孩子再設法乘火車到武漢來。我得知她一定要來，就派了警衛員去天津接他們母子。不久，我們全家就又在漢口團聚了。

我在武漢從一九四九年五月一直住到了十月。最初，什麽事也没有，光是休養治療。後來，十四兵團在漢口成立，調來了原熱河軍區的架子，組成了十四兵團的司令部和政治部。當時，十四兵團司令員劉亞樓還留在北京待命，我就協助政委莫文驊籌建十四兵團的機構。不久，十四兵團副司令員黄永勝也來到了武漢，我們三個就共同擔負起了組織十四兵團領導機關的任務。

七月十一日，中央軍委召見正在北平待命的劉亞樓，責成他提出空軍主要領導幹部人選名單及空軍領導機關組成的建議，決心建立我們自己的空軍。劉亞樓建議，空軍領導機關由十四兵團機關再加上原航空局所轄人員組成。中央軍委同意了這個建議，并很快將十四兵團部調到北平的命令下到了四野。但四野把莫文驊、黄永勝和我都留下來，祇由當時兵團司令部的參謀處長何廷一，于八月中旬帶領十四兵團機關共兩千五百多人，從武漢前往

北平報到。機構既已調走，我在武漢就又没有什麼事了。

由于我負了傷，結果有兩個重大戰役我没能參加。一個是沙市、宜昌戰役，十四兵團所屬的三十九軍和四十一軍、四十二軍，在林彪的直接指揮下參加了這個戰役，打了勝仗，從沙市、宜昌一帶渡過了長江。再一個就是衡寶戰役，這個戰役，消滅了白崇禧率領的國民黨桂系軍隊四萬多人。這兩個戰役我都没有能參加上，失去了兩次很好的鍛煉機會，一直覺得非常遺憾、非常可惜，同時也深感這是對我個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衡寶戰役後，林彪的指揮所就離開了武漢，搬到了衡陽。不久，莫文驊和黄永勝同時接到調令，要他們去十三兵團分别任政委和副司令員。這樣，他們就先走了。

他們都走了以後，我感到非常不習慣。當時，我離開了部隊，一個人同家人，以及幾個警衛員、一個厨師、一個司機單獨住在一起，各方面都有困難，非常的不方便。

不久，林彪司令員通知我，軍委决定調我也去十三兵團，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時還調曾國華去十三兵團任參謀長。這樣，我和曾國華兩個很快就結伴離開了武漢，去十三兵團報到，準備參加進軍廣西的戰役。

莫文驊、黄永勝、我和曾國華四人走時，都没有帶家屬，我們的妻子、孩子就暫時留在了武漢。

四、進軍廣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上旬，在國慶大典後不久，我和曾國華一起離開武漢，坐汽車沿粤漢鐵路南下。

我們首先到了長沙，見到了湖南省委副書記、副省長王首道和十二兵團政治部主任黄志勇。王首道、黄志勇等熱烈歡迎了我們，并堅持挽留我們在那裏住了兩天。當時，中央任命的湖南省委書記兼省長黄克誠尚未到職，由王首道主持湖南的工作。

繼續從長沙出發後，我們經湘潭、湘鄉，再往南走就來到了衡陽。在衡陽，我們見到了林彪、蕭克和趙爾陸。林彪有個習慣，每逢指揮大的戰役，總是把指揮所移到最前面。當時衡寶戰役剛剛結束，林彪的指揮所就設在衡陽附近的一座小山上。

就在這個小山上，林彪接見了我和曾國華，跟我們談了話。他對我們説："你們到十三兵團報到後，要立即準備進軍廣西。你們要把敵情、地形、道路統統摸準、搞清楚。部隊經過了長時間的行軍和一系列的戰鬥，已經很疲勞，你們在湘西可以適當休息一個短時間，養精蓄税，然後準備進軍廣西。這次進軍，要從湘西一直打到廣西與越南的邊境地，要作好充分的準備。廣西的地形復雜，石山很多，溶洞很多，山路崎嶇，道路很不好走。因此，進軍廣西，可能要比從北方進軍湘西還困難。對此，你們要注意作好部隊的思想準備，做好動員工作，作好體力準備。要千方百計地把敵人截住，把他們插亂割斷，不使他們逃往雲南，逃往海南島，以至逃往越南。"

第二天，我們就經邵陽走向湘西。在邵陽，我們見到了四十九軍政治部副主任周彬。經他招待，我們在邵陽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們又在洞口遇見了三十八軍軍長梁興初和政委梁必業。老戰友見面，他們熱情招待我們，我們就在洞口又住了一個晚上。

從洞口再往南走六十里路，就到了三十九軍的駐地武岡。在武岡，我們見到了劉震和吴信泉。對他們在我受傷期間對我的照顧，我當面表示了謝意。

從武岡起程，我們再往北返，翻過雪峰山，來到安江，見到了十三兵團司令員程子華、政委莫文驊，向他們報了到，并匯報了林彪關于進軍廣西行動的指示。之後，十三兵團便立即開始了進軍廣西的一系列籌備工作。

來到十三兵團後，我便立即開始了工作。首先我住到兵團政治部了解情况，熟悉幹部和政治部各部門的工作。然後，我又組織由兵團政治部各部部長帶領的工作組，深入到所轄的幾個軍裏

去進行政治動員和政策教育。當時，歸十三兵團指揮的共有三十八軍、三十九軍、四十五軍和四十九軍。除三十九軍外，我對其它三個軍的情況都不了解。因此，我到任後，首先就是去部隊了解情況，幫助部隊實際準備進軍廣西的工作。



給部隊作報告。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十三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我在下面部隊一直工作到十一月初，才回到兵團部。我回來不久，兵團機關即轉移到衡陽。十一月六日，我們正式開始進軍廣西。十三兵團的四個軍先後從駐地出發，進軍廣西。根據行動計劃，三十八軍沿會同、南丹、即湘、黔桂邊境前進，最終目標是百色，負責截斷白崇禧退往雲南的退路。三十九軍沿龍盛、荷茨、柳州、南寧、憑祥，直撲鎮南關（即今天的睦南關），進抵中國與越南邊境最重要城市防城。四十五軍從廣東韶關西進，一直進到湛江以北，負責占領整個廣西東部。四十九軍負責占領廣西的西北部，即全州、桂林一帶。

到十二月中旬，四個軍都各自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全部解放了廣西，消滅了白崇禧的主力，共殲敵十七萬人，實現了中央軍委制定的在廣西境內殲滅白崇禧集團的作戰計劃。

部隊開始行動後，兵團機關就沿湘桂路進入了原國民黨政府廣西省省會桂林。在桂林，我們接到了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命令，決定將廣西的新省會建在南寧。同時，中央公布了廣西省領導的任命名單：廣西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長張雲逸，第二書記陳漫遠，書記莫文驊、賀偉，副省長賀希明和雷經天。雷經天是參加百色起義的老同志，賀希明則是原鹽阜根據地的財政廳長。

與此同時，中央還決定成立廣西軍區，由十三兵團兼，任命張雲逸兼軍區司令員，莫文驊兼政委，第一副司令員黃永勝，副司令員彭明治、李天佑，我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曾國華任參謀長。李天佑剛調來不久，彭明治就調去了北京外交部，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波蘭大使。另外，原十三兵團司令員程子華在進軍廣西時，被中央調任山西省委書記兼省長，後來指揮十三兵團進軍廣西的是黃永勝代司令員。

廣西軍區成立後，我們又進一步組建軍分區，先後組建了桂林軍分區、柳州軍分區、百色軍分區、武鳴軍分區、梧州軍分區、貴縣軍分區、南寧軍分區、玉林軍分區等各個軍分區，并派遣幹部，組織機構。這時，第四野戰軍和中南軍區又決定，在南寧成立軍管會，并任命莫文驊爲軍管會主任，我爲副主任。

這時，我們兵團部已移到了位于廣西中部的柳州。在十三兵團機關進入柳州時我們就商定，由十三兵團兼軍區副司令員彭明治帶領一部分直屬隊，先進入南寧負責治安衛戍工作，之後我再率兵團政治部進入南寧負責軍管工作，政治部的全體成員就作爲軍管會的成員，參加接管南寧的工作。莫文驊和黃永勝則暫時留在柳州，以便指揮和掌握各個軍的工作進展情況和戰鬥情況。我們同時還決定，把三十九軍所轄的獨立第五師暫時留在廣西，兼任南寧軍分區的工作，師長羅華生兼任軍分區司令員，政委邱子明兼任軍分區政委。

從衡陽開始，一路進軍廣西，我們在沿途所見到的廣西的地勢、風景真是特殊。尤其是廣西的東北部，一些山峰幾乎是從平地拔地而起，如玉笋，如翠屏，如巨象，如駝峰，真是千姿百態。廣西的山多岩洞，洞内石鐘乳、石柱、石花等應有盡有，組成各種景色。最美的還要算桂林至陽朔一帶，處處青山緑水，地地奇山异石，構成了長達百里的灕江美景。

我們兵團部所在的柳州，風景也十分秀麗，隨便走到那裏，放眼望去，群山奇特蒼翠，柳江水清澈如鏡。在進入廣西之前，我沒有想到廣西的景色居然如此別具一格。遺憾的是，當年軍務

倥傯，沒有閑情逸致，去一一觀賞品評廣西的奇山异水，衹是在行軍途中匆匆一瞥而已。

南寧的風景就不如桂林和柳州了。但向南到憑祥友誼關的風景也很美，特别是武鳴、百色也很漂亮，以及到欽州、北海、十萬大山也都有許多特殊風景。後來我才知道，廣西不僅全省的風景都很美，而且冬無嚴寒，天氣暖和，雨水充沛，一年四季都可以進行各種生産。在這裏，衹要人勤勞就餓不着。

到了南寧後，我才了解到，廣西是一個壯族占多數的少數民族地區，有壯、漢、瑶、苗、侗、回、彝、水、仡佬等十三個民族。壯族是我國五十六個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個民族。

五、重建廣西

廣西解放以前，李宗仁、白崇禧的廣西省政府機關都在桂林，南寧衹是個一般的城市，全市衹有十六萬人口，地方很小，而且經濟也不發達，整座城市没有什麼好的建築。現在南寧一下子突然改爲省會，各方面就比較困難了。

比如，南寧居然没有一所大醫院！于是，我們把十三兵團在東北接收的一個日本人的醫院，改爲了南寧醫院。南寧當時也没有什麼電影院和劇院，也没有大學，衹有幾所中學。當時，廣西唯一的一所大學——廣西大學，是在桂林。

其實，不光是南寧，當時的整個廣西，都是一個百廢待興的局面。蔣家王朝推翻了，廣西全部解放了，廣西變成了人民的廣西。但什麼都要搞，一下子究竟從哪裏開始呢？

當時，廣西省委書記、省長、軍區司令員張雲逸召集省委、省政府、省軍區有關領導研究後，决定首先從建立廣西的行政秩序入手，同時抓緊剿匪工作，恢復生産，積極配合兄弟部隊解放雲南。我們首先抓了以下幾件事情：

一、建立廣西省的行政秩序。我們首先建全了省委、省府、軍區、軍分區等各級領導機構，配備好各級幹部，明確分工，各司其職。從上到下的建立起一系列的黨組織，從省委、地委一直到縣委、區委和鄉黨委。同時，還建立起各種群衆組織包括工、農、青、婦、少先隊等等，把人民群衆都組織起來。再就是，建立統一戰綫的組織，組織省政協，地區政協，縣政協等各級政協組織，搞好統一戰綫工作。

二、清剿土匪。廣西國民黨部隊被消滅前夕，白崇禧將總數約爲四十萬的部隊分散開來，化整爲零，隱藏在各處，騷擾社會治安，嚴重妨害人民群衆的生産和生活。不肅清這些土匪，基層的一切工作都無法進行。由于三十八、三十九兩軍由中央軍委和四野命令，戰役結束後就調出了廣西，組建成機動兵團，軍區决定由四十五和四十九軍兩個軍分散進行剿匪工作，劃分了各自負責的區域，大力剿匪和肅清暗藏下來的反動勢力和國民黨部隊的殘餘勢力。同時，結合剿匪開展土改反霸工作。把剿匪、土改、反霸三項工作結合進行。

三、恢復工農業生産。我們當時十分重視盡快恢復交通、工商業、文化、衛生、經濟等各方面的工作，建立和健全財政、税收制度，盡快建立各種新秩序。

四、支援二野進軍雲南。二野的陳賡兵團當時奉命進軍雲南。這個兵團非常辛苦，從山西出來以後，相繼參加了冀魯豫戰役、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然後又從南京到安徽、浙江、江西、廣東，一路橫掃過來，最後軍委决定由他們進軍雲南。他們走的路最遠，也最辛苦。這次他們進軍雲南，要路過廣西，軍委要求由廣西負責陳賡兵團進軍雲南的一切準備工作，

爲了很好地完成中央軍委交給的這個任務，我們派人修整道路、準備糧食等。一切支援工作，我們當時都作爲一項重要的工作來抓。當陳賡兵團經過廣西的時候，我們在南寧，都熱烈的歡迎，接待和歡送他們。除此之外，三十八軍的部隊還執行了爲陳賡兵團開路的任務。他們從廣西的百色先于四兵團向雲南前進，

很好地配合了陳賡兵團解放雲南。

從全省來說，要抓的就是這幾件大事。當然，還有很多的具體事情要抓。就我個人來說，當時我的精力主要是集中在南寧軍管會的工作上。莫文驊雖然是軍管會主任，但他衹是在總的方面管一管，没有參加多少軍管會的實際工作。他當時的工作重點是抓軍隊和軍區的軍政工作。另外，莫文驊是南寧人，許多事情都牽涉到他的親戚、朋友，一些關系不大好處，因此采取回避政策，一些事情都由我來出面處理。這也是他比較聰明、穩重的一種做法。

從一九四九年的十二月份一直到一九五〇年的一、二月份，經過一系列緊張的工作，南寧市算是建立了初步秩序。我們當時所做的工作，概括起來主要有：第一、清查敵人所遺留下來的人和物，把包括各種機構、人員、設施、車輛、資財及倉庫裏的所有物資，一一加以清點後進行接管，并對留用人員給予妥善的安置；第二、協助省政府派來的市長，召開市人民代表會議，建立市政府機關，產生新的人民政府；第三、協助市委召開黨代表大會，產生新的市委領導機構；第四、協助市政府召集南寧工、農、商、學、軍各界代表和著名人士（或稱民主人士）代表會議，成立南寧市政治協商會議；第五、恢復教育，幫助各中、小學生開始正常上課；第六、發展文化事業，組建了南寧劇院。由十三兵團政治部負責，我們在一個被燒毁的廢墟上修建了一個南寧劇院。這個劇院既可以放映電影，也可以進行文藝演出。我們兵團文工團就經常在這個劇院裏，進行和負責組織各種演出活動；第七、組建衛生機構，以軍區的醫院爲主，組建了一個比較大的醫院；第八、恢復商業。南寧傍靠邕江，各種商業活動以前還是比較活躍的。經過我們針對工商業者的宣傳教育活動，使商人們逐漸懂得了我們的城市政策。很快，各個商店就陸續恢復了營業；第九、恢復公路交通，并恢復邕江航運；第十、開始建設南寧人民公園。

這許多事情，都是由我率十三兵團和廣西軍區政治部全體人員，協助當時南寧市委、市政府主要負責人來努力完成的。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南寧市的工作上。直到南寧市的秩序初步建立以後，我才逐漸的抽出精力參與部隊的剿匪工作。正好在這個時候，中南軍區司令員林彪，第二政委鄧子恢，第三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譚政，第一參謀長蕭克，第二參謀長趙爾陸，在漢口召集中南各省軍區負責人員開會，專門討論剿匪問題。軍區司令員張雲逸指定我代表廣西省軍區去參加會議。

我于一九五〇年三月初到達武漢。這次剿匪工作會議開了將近一個星期，首先由各省軍區匯報剿匪工作情況，然後聽取林彪、鄧子恢、譚政、蕭克、趙爾陸等領導的講話。林彪限定廣西一定要在兩個月内發動群衆，造成巨大的聲勢，基本肅清境内的土匪，建立起廣西的新秩序，保障省内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保障交通運輸的安全。

這時我的妻子陳綏圻、兒子吴新潮都還在漢口。開完會，我就帶着他們一起沿湘桂路到了柳州，再從柳州坐汽車來到南寧。

我一回到南寧，就立即向十三兵團和省軍區的領導匯報了會議的情況。然後，我們立即召開全廣西的剿匪工作會議，要求所有在廣西參加剿匪的軍隊幹部和各軍分區的幹部統統到會。

剿匪工作會議由張雲逸司令和莫文驊政委共同主持，我在會上傳達了各位中南軍區領導、特別是林彪的講話精神和要求。張雲逸司令員對這個會議非常關心，天天都來坐鎮參加會議，天天提出意見，連我的傳達都全部聽了，非常重視。在這個會議上，正式部署了廣西的剿匪工作，并決定由黄永勝、莫文驊、李天佑和我四個人專門負責剿匪工作。

爲造成聲勢，全力開展剿匪工作，三月份，我們在南寧召開了一個慶祝廣西全省解放和動員剿匪的群衆大會，到會群衆有三萬多人。省委第二書記陳漫遠、書記賀偉和我在會上講了話，動員全省軍民積極行動起來剿匪。我們還在會上着重宣傳了黨的一些政策，例如對主動投誠者給予優待，對頑抗到底及窩藏土匪者進行從嚴處置等。大會最後還宣布，民間所藏的槍支彈藥，一律

都要收繳。會後，《廣西日報》通版刊登了動員剿匪的材料，宣傳黨的政策，以造成聲勢，使老百姓中的少數人不敢再收藏土匪，使土匪在群衆中無立足之地。

通過我們的艱苦工作，廣西的剿匪工作開始還是有成績的，但後來效果不够理想，因而受到了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批評。後來，中南軍區又派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來廣西坐鎮督促剿匪，才完全肅清了廣西全省的土匪。那已經是一九五〇年下半年的事了。

一九五〇年五月，我們接到通知，中央軍委決定把十三兵團團部機構調到鄭州，負責先期到達鄭州、開封、洛陽、漯河的三十八軍、三十九軍、四十軍、四十三軍的整訓，同時任命黄永勝爲十三兵團司令員，我爲政治委員，曾國華爲參謀長，杜平爲政治部主任，準備要我們帶領這四個軍去參加抗美援朝。原十三兵團政委莫文驊、副司令員李天佑則留在廣西不動。

接到命令之後，我工作重點立即就轉到了十三兵團這邊，但還是在廣西繼續呆了一個多月，因爲在廣西還有一些未了的工作，確實一時脱不了身。當時，黄永勝也因有事準備先到廣州，然後再從廣州到鄭州，最後是曾國華帶領十三兵團司令部、政治部等機構，先去了鄭州。

等我把廣西的工作都交待完畢，時間已是七月初了。我走時，廣西省委、省政府和省軍區熱情地歡送了我。

在去鄭州的路上還有這麽一段小插曲。離開南寧，我們一家人先坐吉普到柳州，準備從柳州再换乘火車，去武漢中南軍區接受任務。吉普車剛到柳州市郊，迎面遇到一個大陡坡，坡下面就是柳江。司機同志開車迎坡而上，想從這裏進入市區。不料車到半坡，上面突然下來一個交通警，攔在車前不讓走。這時司機同志就十分爲難，往前開吧！就會把這個冒失鬼壓死，不開吧，車在半坡，停不下。眼看着車就要往坡下滑，一滑就要滑入江中。

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爲人十分機警的警衛員戚永法趕緊跳下車，抓起路面上的一塊石頭，趕緊墊在吉普車的後輪下面，這才總算是讓車停住，把這場危險渡過去了。當時的吉普車，祇是

上面有個篷子，兩邊是空敞着的，這一路上，戚永法就一直將自己的雙腿搭在車外面，準備一旦有什麽事情，好隨時跳下車去。也真是多虧了戚永法，如果不是他，不是路上正好有那塊石頭，我們一家三口就會墜入柳江喂魚去了。從這件事情來説，戚永法對我們全家有救命之恩。這些年來，我一直都很懷念他，不知道他現在在哪裏？

車停下以後，戚永法就和那個交通警察吵了起來，責問他爲什麽要這樣幹。那個警察解釋説，市交通部門有規定，不準從這裏上坡進入柳州市，主要就是怕出事，怕車滑入江中。戚永法生氣地説："我們初到柳州，不知道有這個規定。再説了，如果我們違反了交通規則，你可以等我們上去，再對我們進行批評教育。你看現在這樣多危險！你攔在前面，車又停不下，如果不是我用石頭墊着，車就會滑到江裏去，車上的人會全部死掉的，到那時，我看你怎麽辦。"

我告訴戚永法，先不要吵了，想辦法把車開上去再説。後來我們好不容易才把車弄上了坡，開到了柳州市裏。不久，市裏的同志就來道歉，説要處分那個交通警。我告訴他們算了，他今後注意再别把車攔在半坡上就行了。

一到武漢，譚政就找我談話。他告訴我，我的工作可能有變化，可能不去抗美援朝，而改去空軍工作了，要我立刻去北京。

當初我剛到南寧時，曾給江西永豐老家去過一封信，詢問家中情況。不久就收到了父親的回信，才知道從我離家以後，一家老小都已凍餓而死，祇留下了老父親一人，肩挑黄烟，靠做小買賣爲生。這時，我就向譚政提出，要求在我去北京之前，繞道江西回家一趟，把孤苦無依的老父親，一起帶到北京去。

但譚政没有同意我的請求。他告訴我："你先去北京報到，建設空軍的任務緊迫，還是以工作爲重。至于你父親，等你到北京以後，再派人去接也是一樣的。"他還説："林總現已因病在北京休養。他這幾年心力交瘁，勉强支持到現在，中央已批準他去北京休養。你到北京先去找找他，你的任務他會當面向你交代的。"

没有辦法，我衹得服從譚政的決定，帶着妻兒，立即乘火車趕往北京，因此我没能及時地將父親接出來。剛到北京不到十天，就接到家中族人的一封信，告訴我父親已經患痢疾去世了。這樣，家中剩下的唯一親人，没有能再見一面就離我而去了，我心中十分傷痛。當時没能及時趕回去，我至今想起來都很後悔。

第九章　建設空軍

一、到空軍工作

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們到達北京時是個清晨，正好是七月七日，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的那一天。

車過盧溝橋，衹見橋柱上所雕刻的四百多個大、小石獅，神態各异，栩栩如生。我竭力想尋找一下當年戰火的殘迹，但已經事過境遷，當年被炮火損壞的石獅都己修整好，抗日戰爭的硝烟已不復存在，我們的國家也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幹部部的部長

當我們一家三口到達北京站時，當時的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派出空軍政治部的譚石冰來接我。他把我們安排在前門外的鄉村飯店暫住。當晚，劉亞樓來看我，并把我帶到了林彪那裏。林彪當時因病在北京休養，住在北京西城毛家灣的一個四合院裏。

見到林彪，我先問候了他的身

體。林彪對我説，身體不好，這次病得比較嚴重。然後他對我説：“你的工作有變動，不到十三兵團去了，要留在空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幹部部部長。原來的空軍政委蕭華已調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總政主任羅榮桓要他去作助手，這樣空軍就没有人負責政治工作了。劉亞樓希望把你調到空軍來，已經報告了軍委、毛主席，得到了批準，就這樣定下來吧！”

我説：“我挨過國民黨空軍和日本空軍飛機無數次轟炸和掃射，非常希望能建設起一支我們自己的空軍隊伍，但是我對搞空軍一竅不通，要我來搞空軍不合適，我不懂技術，又没有航空知識，搞不了。我還是願意去抗美援朝。”

林彪説：“抗美援朝已經另外調鄧華和賴傳珠去了，你就不去了。黄永勝也不去了，已調任廣東軍區司令員。”看我没吭聲，林彪又説：“到空軍，你還是搞你的政治工作。搞空軍，没有黨的領導，没有政治工作，還是不行的。另外，你還年輕，還可以學嘛！”

見到林彪這樣説，我也就没有再説什麽了。林彪接着又説[illegible]“我現在身體很不好，不能見人，今天因爲是你吴法憲剛到北京第一次來，所以見見劉亞樓和你。現在我不在位了，今後空軍的一些事情你們直接去請示中央和軍委，直接請示毛主席、朱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周恩來總理，請示聶榮臻、羅榮桓，請示總參、總政、總後各總部。”

林彪説完後，劉亞樓接着對我説：“這下子你應當安心了吧！”我説：“我先幹着看吧，幹不好，我還是回陸軍去。”劉亞樓説：“你還能走嗎？中央選到你，是對你的信任，你走什麽呀！”他接着又説：“我們兩個合作起來，同空軍全體同志團結在一起，一定要把空軍建設好。”我説：“空軍的工作主要是靠你[illegible]還有其他同志。你在蘇聯學了八年，有基礎，我啥也不懂，主要是向你學習，盡量争取做好你的助手。”于是，我的工作就這樣定了下來。

第二天，我先去各總部報到，然後又專門找到蕭華，問他對

空軍的工作還有没有什麽交待。蕭華告訴我，他在空軍的時間也不長，對空軍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他要我先到空軍去，到工作崗位後再逐漸地去了解情况。他建議我要調查研究空軍政治工作的特點，抓好幹部隊伍的建設，邊工作邊學習，從實際出發開始工作。另外，他囑咐我要安心在空軍工作，不要再提出變動工作的要求了。

一九五[illegible]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準中國共産黨空軍委員會名單，决定：劉亞樓、吴法憲、王秉璋、常乾坤、王弼五人爲空軍黨委常委，劉亞樓爲書記，吴法憲爲副書記。

二、空軍初建

這樣，我的情緒就穩定下來了，開始了解情况。我依次召集了司、政、後各部的負責人來匯報情况。匯報會上，我祇聽不説，更不提什麽意見。當時我的内心很緊張，因爲我對空軍應當怎樣搞，心中無數，而且我對空軍的一些技術業務，包括飛行、領航、地勤、氣象、雷達、機場建設、營房建設、通訊等都一竅不通，祇能是先當學生，先學習，求教于各種專業幹部和人員。至于政治工作，由于我參軍以來一直搞政治思想工作，對有些問題就能比較主動提出一些意見，但對怎樣結合空軍的飛行業務和各種技術業務，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也還是心中無數。

通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我了解到空軍的各級領導骨幹，主要來自三個歷史時期。第一批以常乾坤和王弼等人爲代表，是在大革命時期由黨中央派去蘇聯學習的。我們的黨中央，早就有意建設起一支自己的空軍飛行部隊，早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就派了一些人去蘇聯學習航空，其中就有常乾坤和王弼。常乾坤是山西人，黄埔學生，在蘇聯曾入茹可夫斯基空軍學院學習，學的是飛行和領航，主要是領航。王弼是江西人，參加過南

昌起義，在蘇聯學的是地勤，從機械師一直幹到了工程師。他們
兩個去蘇聯以後，一直没有機會回來。直到抗日戰爭開始後，中
共中央通過關系，才把他們先接回新疆，以後又接回到延安。以
後就在中央軍委航空處擔任領導工作，負責搞航空工作。

第二批是一九三七年由中央派去新疆航空隊學習的學員。抗
日戰爭開始後，國民黨政府新疆督辦盛世才，在蘇聯政府的援助
下，開設了一個航空訓練班，在各地公開招生。爲此，中央在延
安挑選了十九名有點文化的青年戰士和基層幹部，并就近在西路
軍失敗後滯留新疆的部隊中挑選了二十五名幹部、戰士，送進了
這個航空訓練隊學習，其中在飛行班學習的二十五人，機械班學
習的十八人，一人因病返回了延安。在經過刻苦學習，這批人終
于順利畢業了。不想，在一九四二年，盛世才在蔣介石的逼迫下
變臉反共，殺害了中共中央駐新疆辦事處的陳潭秋、毛澤民等，
同時還把航空隊的這一批人都抓起來關進了牢裏。一直到抗戰結
束，毛澤東、周恩來去重慶談判，通過同當時的國民黨新疆省政
府主席張治中進行協商，才把這批人弄回延安，統一分配在軍委
航空處工作。這批人中間，有吕黎平、陳熙、安志敏、方子翼、
袁斌、胡子昆等人。

第三批是解放戰爭時期東北老航校的畢業學員。一九四五年
八月日本投降後，中央决定在東北創辦一所航空學校，爲創建人
民空軍培養人才。常乾坤、王弼告訴我，蘇聯紅軍進入東北後，
關東軍，包括關東軍空軍全部繳械投降，但好多飛機被蘇聯人搬
走了，衹剩下一些殘兵游勇，交給了我們，其中包括一個日本的
航空大隊。這個航空大隊中，有機械員、機械師和工程師，還有
一個飛行技術比較好的大隊長林彌一郎和二十多個飛行教員。我
們就利用這些人，組織了一個航空隊。我們同時派幹部進去，告
訴他們要很好的工作，服務好了，就讓他們回國去，這是他們當
時最大的願望。

不久，常乾坤、王弼他們率領延安航空處的一批幹部來到東
北，同日本這些飛行技術人員會合在一起。這幾批人，包括大革

命時期派到蘇聯學習後回來的，一九三七年派到新疆學習後回來的，從國民黨軍隊起義過來的劉善本，以及接收過來的日本飛行人員和地勤人員，就一起組成了東北民主聯軍的第一所航空學校，以後就稱之爲老航校。他們在日本人遺留下來的一些機場裏艱辛地搜尋被遺弃的飛機、發動機，航空器材和汽油，拼凑成了一百多架飛機。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正式成立，代號"三一部隊"。以後當務之急就是招生問題了。

航校的第一批學員就是從新疆航空隊回來的那些人，他們雖然在新疆分別學過飛行和地勤，但是入獄幾年，再加上在延安没有飛行的條件，四、五年下來，也就生疏了。航校辦起來以後，首先就讓他們重上飛機，由日本教官帶飛，待他們的技術業務恢復和熟練以後，再吸收新的學員。由于所找到的航空汽油很少，油用光了，就試驗用酒精來代替，結果也是一樣可以飛行。

一開始打算從部隊幹部、戰士中挑選學員的，但前方戰事吃緊，部隊正在打仗，衹好作罷。後來又想在東北地區招生，但是那裏的青年學生大都長期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文化水平比較低，身體素質比較差，在政治上又要經過審查。正好在這個時候，山東抗大一分校到達東北，他們帶來了一千多名學生，都是從戰鬥部隊中選送培養的青年戰士和膠東老解放區吸收的青年學生。這些人就成了航校選調飛行學員的最好對象。結果，航校從東北和山東的抗大分校中選拔了一百二十多名學員。就是這批人，在後來的抗美援朝中，不少人都成爲了戰鬥英雄，如王海、鄒炎、張積慧、劉玉堤、魯珉、林虎、李漢、馬杰三、白雲等。

這樣幾批人，就成爲組建空軍的主要力量。當然，最主要的還是中央抽調的大批成建制的陸軍部隊機構和人員。中央、中央軍委對籌建空軍十分重視。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毛澤東寫信給周恩來，提出組建空軍的問題。他在信中指出："我們必須準備攻占臺灣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空軍。"第二天，七月十一日，中央書記處就召見正在北平，曾在東北兼任過老航校校長的

劉亞樓，談建立空軍的設想，并責成劉亞樓提出空軍主要領導幹
部的人選名單，以及空軍領導機關組成的建議。

在聽取了劉亞樓的意見後，七月二十六日，中央軍委給第四
野戰軍領導發去電報，提出"空軍領導機關準備以第四野戰軍十
四兵團直屬機關加上軍委航空局的人員組成。"八月一日，中央
軍委又致電四野："由四野撥來作爲成立空軍司令部之基礎的十
四兵團指揮機構（包括司、政、供、衛的全部人員，以及警衛
在內），請即令開來北京待編。"根據中央軍委的決定，四野于八
月五日發出命令：着第十四兵團直屬部隊全部機構調歸軍委成立
空軍司令部。

就這樣，十四兵團司令員劉亞樓還沒有在兵團到職，就直
去了空軍，而且還把兵團部也統統調到了北京，祇把莫文驊、
永勝和我留下來，改去十三兵團任職。八月十九日，十四兵團
屬隊全體人員兩千五百多人，全部由兵團司令部參謀處長何廷
率領，從武漢來到北平南苑，正式成立了空軍機關。

十月二十五日，中央軍委正式任命劉亞樓爲空軍司令員，
華爲政委，王秉璋爲參謀長。十一月十一日，中央軍委通告各
軍區、各野戰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已經成立。後來中央軍
又確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爲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成立
日。

空軍正式成立後，中央領導對空軍的建設曾多次提出明確
求。毛澤東主席曾指示："要加速培養空地勤人員，準備解放
灣。"朱德總司令也在一次講話中指出："我們的任務是很緊
的，人民實在等得焦急了，他們希望我們很快地學會，學會了
打（指解放臺灣）。"當時，周恩來總理曾根據中央關于解放臺灣
統一祖國的戰略部署，向劉亞樓提出："航校第一批學員最好
在一九五〇年九、十月畢業。"

中央領導同志的要求，一方面是對空軍建設極大的鼓舞，
一方面也是重大的壓力。爲順利實現中央領導的要求，空軍的
體同志都不敢稍有懈怠。我來到空軍之前和來到空軍之後，空

領導機關每天的工作時間都采用三班制，即上午、下午和晚上都要上班，晚上一般都要到十二點左右才能下班回家，而且星期天也根本不休息，工作非常緊張，唯恐完不成中央交代的任務。

爲建設好空軍，根據中央、中央軍委的指示精神，以劉亞樓爲首的空軍黨委決定首先抓好兩條，即：辦好航校和建設好空軍的領導機關。

一、辦好航校是建立空軍的關鍵。如果辦不好航校，也就沒有組建好空軍部隊的可能。這一點過去我們不懂，以後懂得了。所以，中國的空軍是先有學校，後有部隊。空軍各部隊的飛行、領航、通訊、雷達、機務、地勤、氣象、油料等各種幹部和專業技術人員，都是在學校學好後，才能組成部隊。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中央軍委批準了劉亞樓關于建立第一批六所航空學校的報告。經過緊張的實地勘察，選定第一至第六航校的校址分別爲哈爾濱、長春、沈陽、錦州、濟南和北京的南苑。十月三十一日和十一月一日，六個航校的校址先後報經中央軍委批準後，整修航校使用的機場、營房、教室等又成爲最緊迫的任務。我們本着因陋就簡、逐步改善的原則，將六個航校的教室、營房，在十一月底都大體上準備就緒了。

當時之所以要將六所航校都設置在北方，主要是因爲那時解放戰争還没有完全結束，爲保證航校訓練能順利實施，必須有比較安全的環境。在北方，受臺灣國民黨空軍轟炸的威脅比較小。後來，我們又將東北老航校改爲第七航校，校址仍設在牡丹江。這樣，我們就一共有了七個航校。

要辦好航校，校長和政委的人選十分重要。遵照中央指示，空軍黨委從東北老航校中，挑選了七個富有飛行經驗和組織領導能力的幹部，任命爲各航校校長。至于航校的政委，空軍黨委于十月二十一日報告中央，要求從各野戰軍中挑選。毛澤東當即批準了這個報告，并指出：這批政治委員必須認真挑選最適當的人來擔任，要各野戰軍提出三倍于任命人選的名單交由軍委選定。隨後，各野戰軍根據軍委的指示，共提出了十九名預選對象。十

一月十八日，中央軍委從中確定了七名。這七名航校政委都是陸
軍中的師以上幹部，各方面的能力都比較强。航校的領導體系也
跟陸軍一樣，政治委員都是黨委書記，負責全盤的政治領導。

當時，航校的校長、政委，經空軍黨委提出意見後，都報
中央軍委批準任命，而不是由空軍自己任命的。足見當時中央
中央軍委對空軍的重視程度。組建航校的架子，也都是陸軍的
的機構，由陸軍一個一個的調來，組成了航校的校部。有的就
調來的師政委帶來。

作爲空軍的主要領導人，劉亞樓對航校的建設更是尤爲
視。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他在空軍第一次航校負責幹部會
上强調，以"一切爲了辦好航校"作爲空軍工作的一個原則，
論是幹部和人員的調配，機場、營房的修建，飛機器材的分配
還是航空工廠的整頓、建設，物資供應的保證等等，都要首先
辦好航校爲前提。他還提出，空軍初建，没有經驗，工作中要
動腦筋，開動機器，辦事要迅速、準確，并且要注意加强組織
律性。

對航校學員的選調，中央軍委也十分重視。早在一九四九
八月三日，軍委就向各大軍區、各野戰軍發出指示，要求從陸
作戰部隊和各地軍政大學中選調空、地勤學員，并規定了嚴格
選調條件。之後，經過認真選拔，七個航校都接收了所能容納
一大批學員。這批學員，成爲新中國的第一批空軍學員。

就這樣，經過緊張的籌備，七所航校終于在一九四九年底
一九五〇年初相繼開了學。朱德總司令對航校的飛行訓練非常
心。他指出："空軍能不能搞好，掌握技術是個關鍵。在一定
義上，技術決定一切。空軍作戰的勝負，有時往往是一分一秒
事情。如果我們别的都好，就是技術不好，那也一樣不能完成
務。祇有掌握了技術，才能戰勝敵人，不然就要被敵人所打敗
朱德的這個講話，空軍黨委及時在各個航校作了傳達，進行了
育。通過學習和教育，給了航校學員以極大的鼓舞。

爲迅速滿足組建空軍部隊的需要，一九五〇年間，空軍曾

後三次擴大了航校的訓練規模。通過將近一年的培訓，第一批空地勤學員先後畢業。以後，又陸續擴建了一批新的航校。通過這些措施，較快地培訓出了一批部隊急需的人員。

二、在抓緊航校建設的同時，也抓緊了建設空軍領導機關的工作。劉亞樓對空軍機關的組織、業務工作和作風建設等都非常重視。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在空直機關參謀、幹事以上幹部會議上提出，空軍建設總的任務，是"建立人民空軍，保衛人民祖國"。根據這個總任務的要求，空軍機關一定要建立正規化的機關業務工作，樹立和培養良好的工作作風。爲此，他還明確提出了空軍機關作風培養的七條要求。

劉亞樓司令員對空軍機關的工作抓得緊，要求嚴。他要求各部門既要抓好中心工作，又要完成日常工作；既要講究工作方法，提高辦事效率，又要對機關工作有預見性，講究完成任務的徹底性和及時性。他對時間的要求是論分論秒，不能論小時。他要求各部門和各級幹部，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動腦筋，出主意，努力完成黨和毛主席、中央軍委交給空軍的任務。劉亞樓的這些要求，基本上都在空軍領導機關中得到了較好的體現。

但是，畢竟空軍領導機關當時正處于初建階段，幹部又大都來自陸軍，不懂技術，不懂業務，不懂航空知識，因此對如何組織、如何編制、如何組建好空軍部隊等工作，祇能是在學習、摸索之中前進。

一開始，空軍初建時期的組織結構，祇是在各大軍區設立航空處。航空處的主要任務，是接收、保管和維護國民黨軍隊留下的飛機、器材、零件，以及所有的機場。後來，才在航空處的基礎上，組建了各個大軍區的空軍司令部。與空軍黨委的工作重點一樣，大軍區空軍司令部組建後的主要精力，也是放在航校的建設上。

航校的建設很快就見到成果。一九五〇年底前後，各航校的速成班學員相繼畢業。這些學員畢業後，空軍就有了組建部隊的基本條件。至于組建部隊所需的領導機構，經中央軍委、毛澤東

主席批準，都是總參謀部下達命令，從陸軍成建制地調來，如果我們需要軍就調軍的機構，需要師就調師的機構，需要團就調團的機構。當時，凡是空軍的報告、請求，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幾乎是有求必應。送上去的報告，差不多都能得到這樣的批示，"照辦，完全同意。"

但是，從陸軍調來的團長、政委都不會飛，怎麼辦？我們考慮，不會飛不要緊，先組建以後再作培訓調整。劉亞樓曾幾次對我說："像我們這樣不會飛的幹部，終究是個過渡幹部，遲早是要由會飛的同志來擔任領導職務的。"

因此，在空軍部隊的建設初期，團長、政委以上的幹部基本上都不會飛，都不懂得飛行的基本常識。但是，大隊長、中隊長都是飛行員，全部是飛行幹部。當然，在團裏的幹部裏，我們也盡可能地配備了一些飛行幹部，有的是團長能飛，有的是副團長能飛。

為盡快解決航空部隊的飛行指揮幹部問題，空軍常委采取了緊急措施，準備在陸軍中選調符合條件的幹部，送入航校中進行緊急培訓。劉亞樓趁列席黨的七屆三中全會的時候，把急需解決航空部隊的指揮幹部問題，當面報告了毛澤東主席。毛主席對這一問題十分關心，很快就會議之便，口頭指示有關軍區負責人如數送調。結果，各軍區很快選調了符合飛行條件的營團幹部九十多人。經航校培訓後，這批幹部成為空軍第一批飛行指揮員。

三、蘇聯專家幫助我們建空軍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下決心組建空軍以後，全黨、全軍全力投入空軍建設，包括海軍航空兵和民航的建設。決心雖下，但當時正值建國伊始，百廢待興，我們自己不光沒有飛機，沒有汽油，甚至全國連一個汽車制造工廠都沒有，連輛汽車

也造不出來。更不用說是航空工業了。給我們建設空軍帶來了不小的困難。

那麼，靠什麼來建空軍？在技術和裝備上問題上，當時路祇有一條，祇有依靠蘇聯。空軍初建時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同蘇聯談判，要蘇聯幫助我們搞空軍，搞航空工業。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就在中央書記處召見劉亞樓以後半個月，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在莫斯科與斯大林會談時提出，中共中央準備在一年左右時間，組成中國人民的空軍戰鬥部隊，配合渡海解放臺灣，要求蘇聯向我出售飛機，并幫助中國訓練空軍技術人員，并請蘇聯派出空軍顧問來華，參加中國空軍的建設工作。

在達成初步協議後，八月一日，中央又委派劉亞樓率王弼、呂黎平等人赴莫斯科，就蘇聯幫助中國建設空軍的各項具體問題進行商談。劉亞樓等在莫斯科，會見了蘇聯國防部長華西列夫斯基和空軍總司令維爾希寧等人。經商定，蘇聯同意向我出售飛機，并派專家、顧問，幫助我國建設六所航校和組建一個空降旅，因為那個時候中央正考慮攻打臺灣。接着，王秉璋又三次去到蘇聯，商談援建空軍的各項具體問題。

根據中蘇雙方的協議，從一九四九年十月開始，一直到一九五〇年的一、二月份，蘇聯政府將航空設備和教學設備陸續運抵滿洲里。這些設備絕大部分都是用火車運來的。當時正值數九寒天，在冰天雪地的滿洲里，負責接站轉運的同志冒着攝氏零下三十多度的嚴寒，在露天站臺認真地進行檢查、登記和分配，按時把一百多架飛機，以及相應的航空發動機、航空器材、降落傘、塔臺車、活動修理車、充電車、充氧車、空氣壓縮機、加油車、滑動車、交通車、吉普車等，安全地分別送到了第一至第六航校的領導人手裏。老航校即七航校，則依舊使用原有的日式飛機進行教學。

隨着蘇聯援助設備的到來，聘請的蘇聯專家也陸續先後來到第一至第六航校。從校長顧問一直到空、地勤教員，以及維護飛

機的機械師，都是全套的蘇聯顧問；航校所用的教材，甚至一直
到有關條例、條令和規章制度，幾乎一切都是蘇聯航空學校在中
國的翻版。

爲了解決蘇聯專家的翻譯問題，我們一方面自己積極尋找
物色翻譯人員，另一方面向中央提出這一問題，請中央幫助
決。後來經中央同意，我們到各省和一些大城市選了一批俄文
譯，分配到各個航校。對這些翻譯，我們在生活上給予了很好的
照顧，讓他們享受空勤竈的待遇。這樣航校的翻譯工作就大有
善，翻譯水平提高了，各個航校的教學質量和效果也就進一步
高了。

同時，爲了迅速提高空軍指揮機關的指揮能力和工作水平
一九五〇年一月，在劉亞樓的倡議下，空軍聘請了十九名蘇聯
家及翻譯來空直機關幫助工作，請他們分別擔任顧問長、參謀
顧問及作戰、情報、訓練等顧問，其中顧問長和參謀長顧問是
有少將軍銜的蘇軍高級軍官。

一九五〇年底，我們又爲空直機關增聘了十五名蘇聯顧問
這些顧問絶大多數都是搞技術業務的，也有個別政治顧問，但
們祇管蘇聯顧問團内部的黨的工作，祇管他們自己的事。

當時，我們空軍的司令部、政治部，設在北京天安門附近
交民巷的原美國兵營。蘇聯顧問團來了以後，有關方面就把空
機關東邊的原荷蘭駐華大使館和德國駐華大使館，劃爲顧問團
駐地。這樣，顧問團與空直機關相距僅一箭之遥，顧問團在東
我們在西頭，我們可以隨時去找他們談工作，聯系和商量問
有時候就合在一起辦公。那一段時間，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參
長王秉璋等，都配有專職的俄文翻譯。我同顧問團的接觸相對
少，所以没有配翻譯。

同時，各大軍區的空軍領導機關也聘請了相應的蘇聯顧問
正是在這些蘇聯顧問的幫助和指導下，我們逐漸熟悉了空軍領
機構的一整套業務工作，爲空軍的建設和發展奠定了最必要的
礎。所以，完全可以這樣説，中國空軍的建設，同蘇聯黨、政

和蘇聯空軍的幫助是分不開的。正是由于這些特殊的歷史情况，中國空軍領導機構和航空學校的建設，不可避免地一開始就基本上都是蘇聯空軍的翻版。

對這一現象，我們當時也有着清醒的認識。在空軍建軍初期，空軍黨委曾提出了一個原則，就是"學到手、消化了、再提高，再創新"，即：先把蘇聯的經驗學到手，然後再在學到的基礎上進行進一步的提高。也就是説，要先向蘇聯專家、顧問學習，積極與他們交流經驗，認真吸收他們的經驗，并主動徵求他們的意見，在學會并很好地消化了他們的經驗之後，再來根據我們自己的實際情况，改進我們自己的指揮系統、戰術訓練和改裝訓練。我們把這條原則作爲建設空軍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針。

由于蘇聯專家對初創時期的中國空軍起着非常關鍵和重要的作用，因此，團結好蘇聯顧問和技術人員及翻譯，做好他們的工作，管理好他們的生活，就成爲空軍政治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和主要内容。

早在一九四九年底，航校的蘇聯顧問來華以後，劉亞樓就在空軍黨委提出了兩條，第一、對蘇聯專家的知識和經驗，要全部照搬、全部照學，等搬過來、學到手之後，再結合中國的實際進行創新。第二、要和蘇聯專家搞好關系，要把他們看成是老大哥，尊重他們、團結他們，向他們學習，并且照顧好他們的生活，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使他們全心全意地培養中國的飛行人員和技術幹部。

爲了做好這方面的工作，以後，我們又陸續提出和實行了幾條：

一、搞好"一對一"的關系。所謂"一對一"，就是要求蘇聯專家同中國學員按專業對口結成對子關系，對子之間，包教、包學。例如：由一個蘇聯飛行員包教一個中國飛行員，一個蘇聯機械師包教一個中國機械師。我們强調，在"一對一"的活動中，老師必須愛護學生，學生必須尊重老師，對子之間的關系必須搞好，要親密地團結在一起。我們還特别要求中國學員，要力争把

蘇聯專家所教的全部學過來。因爲，我們和蘇聯專家的共同的目標，就是建設一支强大的中國人民空軍。

二、强調同蘇聯專家搞好關系，尊重他們，一般的不提缺點，不批評。當時空軍有一句話，叫做“有理無理三扁擔”，意思是説，如果和蘇聯專家的關系搞壞了，不管你是有理還是無理，都要受到批評。

當然，我們同蘇聯專家之間有時也會發生矛盾，小的矛盾也就算了。遇到一些大問題，我們就反映給周恩來總理，由周恩來總理反映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蘇聯總顧問，通過他去對空軍顧問團進行説服教育和處理。當時，有那麽幾個顧問表現不好，總喜歡調戲婦女。聽到我們的反映以後，蘇聯總顧問就把這幾個人調回國去了。當時空軍顧問團有意見，來問我們爲什麽把他們調回去。我們解釋説，我們兩國的風俗習慣不同，中國的婦女比較嚴肅，不像你們那裏開通，有一些做法，在我們這裏是不允許的。聽了我們的解釋，顧問團的專家們也説，我們蘇聯也一樣，不能那麽隨便。

以後，我們就注意找機會向他們介紹中國人民的風俗習慣、禮節、禮貌、規矩等，介紹的含意就是，我們十分尊重你們，你們也得尊重我們。這個辦法很起作用，以後就很少發生這方面的問題了。

三、盡量照顧好專家的生活。盡管當時我們在各方面都很困難，但我們都想方設法地照顧好蘇聯專家們的生活。比如住房，寧肯我們自己住得差一點，也要把好房子留給顧問團。尤其是時間稍長，專家們的妻子、孩子來了以後，更是盡量讓他們有一個舒適的居住條件。在伙食上也是如此，我們經常加强對炊事人員的教育，要求他們在規定的範圍内，盡量把伙食搞好，尤其注意要搞好空勤竈和地勤竈，讓蘇聯專家們吃好。

我們注意幫助蘇聯專家搞好文娱活動。當時，我們除在顧問團駐地安排電影室，定期放映電影外，還準備了國際象棋、臺球、排球、籃球等文體器具。蘇聯人喜歡跳舞，而在航校單獨組織

會有困難，好在航校的駐地一般都是大、中城市，通過同當地文化部門的交涉，他們都同意對蘇聯專家參加舞會給予特殊照顧，并爲此發了專門的票證，從而解決了專家們的周末活動問題。于是，每逢星期六的晚上，各航校都專門有人帶蘇聯專家出去參加地方上組織的舞會。

四、對犧牲的專家給予厚葬和悼念。在航校建設過程中，專家們都是全心全意的幫助我們培訓空地勤人員，但有的也存在着急躁冒進情緒，希望培訓得越快越好。結果出了事故，不僅犧牲了中國的飛行員，也犧牲了蘇聯專家。碰到這種情况，我們就舉行隆重的追悼會，并優厚撫恤犧牲的蘇聯專家的妻子兒女。

還有一次，空直機關顧問團的少將顧問長，星期天打網球時突然發生心肌梗塞。他回到住地後，躺在床上休息。突然之間，舊病復發，經搶救無效，僅三個小時就死了。他死後，我們全力做好他妻子、孩子以及其他專家的工作，并在隆重追悼後，專門派飛機把他的遺體及家屬送回了莫斯科。

五、作好對專家表彰和歡送的工作。我們每年都要對蘇聯的專家顧問搞一次評功記優活動，以表彰他們的成績。凡是評上功、記上獎的，我們都要給他們挂紅榜，號召大家向他們學習。對完成了任務，輪换回國的專家，每個人都送一點東西，作爲紀念。同時，我們還召開歡送會，表揚其功績。這樣，他們回去時都很高興，有的還戀戀不捨，不願意走。

六、同時也照顧好蘇聯的士兵。蘇聯官兵不平等，他們把義務兵不當人看，當兵的衹有服從，没有民主、平等的習慣。當時隨團來了一批蘇聯士兵，這些士兵都是義務兵，服役完了就回家。對這些士兵我們在生活上也非常照顧他們，使他們深受感動。人民解放軍内部官兵平等一致的關系，也使他們深受教育。臨到回國的時候，他們之中不少人都哭，有的説不想回去了，就在中國幹。我們勸他們説，你的家就在蘇聯，不回去行嗎？經過我們的説服和動員，他們才戀戀不捨地走了。

七、辦好圖書館和俱樂部。每個大單位都有俱樂部和圖書館，

内有書籍、報刊。另外，有專家的單位一般每個禮拜六開一次晚會，搞演出和其它文娱活動。

以上就是我們當時對蘇聯專家的一套政治思想工作方法。我們主要是理論聯系實際，因人而施，按照蘇聯同志的特點而進行工作。我們對他們各方面的照顧，目的是在于調動積極性，讓他們自覺地爲中國的空軍建設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從一九四九年冬蘇聯專家來到中國，幫助我們訓練出第一批和第二批飛行員以後，到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他們就開始分批撤退回國，祇留下少數人給我們當顧問。這兩年，正是中國空軍的初創階段，可以説，蘇聯專家、顧問在這一階段裏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爲中國空軍的建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空軍建軍初期這一階段中，空軍黨委曾提出了這樣一個原則，叫作“擺脱摸索，進行綜合，走向提高”。也就是説，一開始，我們不懂得怎麽辦航校，怎麽訓練，怎麽建設部隊，就祇能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進行摸索，這是當時唯一可行的選擇。等他們一走，我們就進入綜合階段，我們把這比作“甩拐棍”。在這個階段，我們必須把所有學到手的技術和知識綜合起來，選擇與自己有用的、好的繼續發揮。把他們的各種教材、條例、條令和規章制度，結合中國空軍的實際來進行改進，創造出自己的一套東西來。這是建立中國空軍包括從辦航校開始，到大批組建部隊這一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方針。這個方針得到了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的高度肯定。正是由于我們制定和實行了這個方針，才使得我們在以後的空軍建設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國特點的培養空、地勤人員的辦法。

四、“在陸軍基礎上建設空軍”

“在陸軍基礎上建設空軍”這一新中國空軍的建軍思想，版權

屬于空軍第一任司令員劉亞樓。

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就在我第一天來北京的晚上，劉亞樓帶我到毛家灣林彪的住處，在談完我的工作問題之後，劉亞樓對林彪説：“林總，我想提一個關于創建空軍的基本指導思想。”林彪問：“你想提什麽，怎麽提呀？”劉亞樓説：“我考慮是不是可以這樣提，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基礎上建立空軍。”林彪説：“空軍也是人民解放軍的一部分，怎麽叫作在解放軍的基礎上建立空軍呢？”劉亞樓反映很快，馬上説：“那麽，改成在陸軍的基礎上創建空軍好不好？”林彪沉吟了一下，然後説：“在陸軍的基礎上創建空軍，很好。就是要在陸軍的基礎上創建空軍，這樣提很好。”

劉亞樓又回過身問我：“這樣提行不行？”我説：“林總都説了行嘛！當然行！我剛到空軍，什麽也不懂，我聽你的。”于是，“在陸軍基礎上建設空軍”的思想，就這樣定了下來。

回到空軍以後，我們首先就這一思想在空軍領導層中進行醖釀，在常委會上進行討論。經過幾次會議討論，大家一致認爲，“在陸軍基礎上建設空軍”這一方針要明確定下來，成爲空軍建軍的指導思想。但是，要將這個方針的具體内容和爲什麽要實行這一方針的理由考慮好，并逐步向下徵求意見，待醖釀成熟後，再報請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批準。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日，劉亞樓向四個新成立的航空兵師領導同志傳達了毛澤東主席的“創建一支强大的人民空軍，殲滅殘敵，鞏固國防”的指示，并對他們進行了詳盡的解釋和闡述。然後，他着重指出：“我們過去没有空軍，没有經驗，現在要搞空軍，就必須要打好基礎。空軍部隊必須要養成好的工作作風、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在空軍第一次機務工作會議上，劉亞樓初步闡述了“在陸軍基礎上建設空軍”的建軍思想，説明這一建軍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要從陸軍調機構來，從陸軍調幹部來，從陸軍帶作風來，從陸軍帶傳統來。要把紅軍、八路軍、

新四軍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優良作風統統運用到空軍來。把陸軍的一些作戰原則、訓練原則、幹部政策、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統統運用在建設空軍的工作中，并且要同空軍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創造出一套人民空軍的思想作風和經驗來。從這以後，我們就開始在各種會議上對這一思想不斷地醞釀宣傳，不斷地補充其內容。

一九五一年二月，空軍黨委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當時劉亞樓是黨委書記，我是副書記。在這次會議上，經過集體討論確定："在陸軍基礎上建設空軍"，是空軍建設的總的原則。要强調人民空軍是人民解放軍的一部分，具有人民軍隊的的一切內在本質，這是肯定不移的。因此，陸軍的建軍思想、原則、傳統和作風，對于空軍是完全適用的。當然，我們不應滿足陸軍已有的經驗，要結合空軍這個兵種的實際情況、特點和需要，向前發展。

會議結束後，我們將會上確定的"在陸軍基礎上建設空軍"的建軍方針，上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很快得到了批準。從此，"在陸軍基礎上建設空軍"就正式成爲中國空軍的建軍指導方針和原則。

爲了進一步向全空軍闡明空軍的建設方針，我們以空軍政治部宣傳部長朱鴻爲主，組成了一個寫作小組。寫作小組集中了空軍黨委的討論意見以及各方面的意見，寫成了一篇題爲《在陸軍基礎上建設空軍》的文章。這篇文章經空軍黨委常委再次集體討論，修改定稿後，經劉亞樓署名，發表在《人民空軍》雜志的創刊號上。

説句實話，在"陸軍的基礎上建設空軍"的方針，也是根據我們在空軍初創時期的實際情況。那時，我們團以上的領導機構，即團、師、軍、軍區空軍和空軍領導機關的幹部、工作人員都是陸軍調來的。我們所熟悉的從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到解放軍的條令、規章、制度，都是從陸軍來的，我們所知道的建軍思想、傳統作風和作戰的實際經驗，也都是從陸軍來的。這一切，都是幾十年以來，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和克

敵致勝的精髓和靈魂，對人民空軍的創建是十分寶貴的。所以，我們衹能也必需在陸軍的基礎上建設人民空軍。

就這樣，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解放軍各總部的關懷和正確領導下，在蘇聯政府和軍隊在裝備上、技術上對我們的多次援助下，在陸軍老大哥的無私支援下，在空軍全體指戰員的努力下，衹經過了短短的一、兩年時間，就在組織上、建制上、工作上、制度上爲空軍以後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順利完成了中央、中央軍委交給的爭取在一年的時間內組建起一支空軍部隊的任務。

歷史證明，"在陸軍基礎上建設空軍"的這一空軍建軍方針和原則，是完全正確的。包括劉亞樓和我在內的衆多來自陸軍的同志，爲建立人民空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五、抗美援朝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一開始，金日成領導的北朝鮮軍隊進展順利，把南朝鮮的軍隊壓在了朝鮮半島的南端。九月十日，以美國爲首的十五個國家軍隊，以聯合國軍的名義，在朝鮮仁川登陸。美軍登陸後，很快就挽回了劣勢，并且越過"三八綫，"把戰火引向了中國的邊境。

在金日成的一再請求下，毛澤東決定派部隊赴朝支援北朝鮮作戰。十月二十日，以彭德懷爲首的中國人民志願軍，以"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爲口號，跨過鴨綠江，開赴朝鮮前綫，與朝鮮人民軍一起抗擊美軍。

盡管當時我們空軍正在初建，但我們考慮，還是要盡自己的力量參加這場抗美援朝戰爭。十一月上旬，劉亞樓和我就空軍參戰問題，去向毛主席當面請示報告。毛主席當時正在緊張地考慮朝鮮問題，在他聽完了劉亞樓和我匯報的意見，就說："很好，你

們就準備吧！”

接着，毛主席當場向劉亞樓和我交代了三個任務。第一個任務，是要準備自己參加作戰，參加抗美援朝，支援地面部隊作戰。要組織志願軍空軍，空軍有多大力量，就使用多大的力量。第二個任務，是現在就要準備同蘇聯空軍一同參戰。蘇聯準備派出一個空軍軍、三百架飛機到東北支援朝鮮作戰。我們的任務，是要同蘇聯空軍搞好關系，負責蘇聯空軍作戰的一切供應保證，并很好地向他們學習打仗。這樣，我們自己的隊伍也就鍛煉出來了。第三個任務，是不僅要修建、擴建東北的機場，還要由空軍派主要負責人去朝鮮修建機場，準備志願軍空軍進入“三八綫”以北。如果美國轟炸中國，就要準備同蘇軍一起保衛東北，保衛朝鮮，保衛“三八綫”以北的一切地區。

接受了毛澤東親自布置的這三項任務以後，劉亞樓和我立即回到空軍，貫徹落實毛主席的指示。劉亞樓首先召集了空軍黨委常委會議，向常委們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接着，又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吸收各部門的主要幹部參加，再次傳達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同時研究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下如何完成這三項任務。這兩次會議整整開了一個星期，常委各同志吃、住都在辦公室，隨時碰頭研究各種問題。連劉亞樓和我都幾乎整整一個星期沒有離開辦公室，沒有回家。

最後，常委擴大會議在集中大家的意見後決定，一、組織指揮機構，成立中國人民志願軍空軍聯合司令部，簡稱“聯司”，决定調原沈陽軍區空軍司令劉震任“聯司”司令員。劉震原任十四兵團副司令兼三十九軍軍長。建國初，外交部曾想要劉震出任大使，但後來我們向軍委提議，要劉震出任沈空司令員。軍委批准後，就把他留下了。

二、確定作戰方針。經常委擴大會議反復研究、討論，提出了當時參戰的三條方針：第一、從實踐中鍛煉，從實戰中成長；第二、積蓄力量，選擇時機，集中使用；第三、一切爲地面部隊服務，以地面部隊的勝利爲勝利。

這三條作戰方針，上報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後，毛澤東批示“完全同意”，并明確指示：“使用空軍，采取穩當的辦法爲好。”

三、調動部隊，準備參戰。按照中央軍委的指示，第一支準備入朝作戰的部隊，就是我們建軍後成立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隊空軍第四混成旅。混成第四旅是空軍爲準備執行解放臺灣的作戰任務，而組建的第一支航空部隊。當初，中央在決定成立空軍時，毛澤東曾向空軍提出過兩條要求：第一要盡快準備好兩百五十架戰鬥機，參加解放臺灣的戰鬥；第二要組建一個空降旅，訓練好傘兵，準備在解放臺灣的戰鬥中進行空投作戰。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我們于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九日在南京成立了人民空軍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隊——空軍第四混成旅。我們之所以把第一支航空部隊稱爲混成四旅，用意在于要繼承和發揚毛主席在井崗山創建紅四軍的光榮傳統，把人民空軍建設好。七月中旬，組建完畢的混成四旅第十團又移駐上海，擔負保衛大上海的重要防空任務。

鑒于赴朝參戰的任務很緊急，很重要，劉亞樓在常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要我親自坐飛機到上海去，向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政委饒漱石匯報中央軍委的決定，請他們支持，把這支部隊盡快調到東北去。

四、加緊戰前訓練。當時空軍黨委常委考慮，應當提出意見，報告毛澤東主席，參戰關鍵問題是改裝。由于我們的空軍才剛剛建立，不僅缺乏訓練，更缺少必要的作戰裝備。當時，美國在朝鮮的飛機基本上都是噴氣式飛機，而我們祇有混成四旅的十團，是我們唯一的噴氣式飛機團，其它各團都是螺旋槳飛機，根本不能上戰場。解決這一難題，必須向蘇聯請求緊急援助，盡快購買二百五十到三百架米格十五飛機，祇有等這些飛機運到東北後，盡快在航校組織改裝訓練，繼續擴大殲擊機部隊，才能適應參戰的需要。會後，我們立即以空軍黨委的名義，向中央和毛澤東寫了要求盡快購買噴氣式飛機的報告。之後，中央很快就跟蘇聯方面接洽，滿足了我們的要求。

五、當時空軍黨委常委決定，由常乾坤副司令負責，組織一個領導小組，帶領工程技術人員進到朝鮮三八綫以北，建設所需機場。

會議結束以後，我們馬上就開始了一系列緊張的準備工作。首先，按照劉亞樓的意見，我立即坐飛機到了上海，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商調混成四旅的問題。

把我們的第一支航空部隊駐防上海，是因爲當時上海的特殊情況所致。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後，這座城市曾多次遭受國民黨飛機的輪番轟炸，尤其是在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的那次大轟炸，上海市損失重大。爲解决上海市防空的急需，經中國政府與蘇聯政府商定，由蘇聯派出一個米格十五飛行團，經北京到達上海，進駐虹橋機場，擔負上海、南京一帶的防空任務。帶領這個飛行團的是蘇聯空軍中將巴基斯基。上海是當時華東軍區領導機關的所在地，陳毅是華東軍區司令員兼上海市市長，饒漱石是華東軍區政委兼上海市委書記。蘇聯的這個米格十五飛行團來就直接在陳毅、饒漱石的領導下，由他們直接指揮。

一九五〇年七月中旬，我們自己的第一支航空部隊——混成四旅的第十團——組建完畢後，這個團就進駐上海，由蘇聯同志采取師傅帶徒弟的辦法，一對一地進行米格十五噴氣式機型的改裝訓練。十月初，十團改裝任務順利完成，成爲我國第一個噴氣式殲擊機團。之後，按照中蘇兩國政府的協議，蘇聯空軍向我們移交飛機、裝備和上海的防空任務。不久，蘇聯空、地勤人員奉調回國，衹暫時留下了團長顧問、訓練顧問和各大隊長顧問等少數人，繼續協助我們工作。

在十團正式接替蘇軍擔負上海防空任務之前，蘇聯空軍飛機就已經擊落了臺灣國民黨進入大陸的五架飛機，使國民黨空軍的氣焰大爲收斂。從那以後，國民黨空軍的飛機就再也没有對上海進行過轟炸。這樣，保衛上海、南京地區的任務就算是基本上完成了。

抗美援朝開始後，毛澤東主席親自决定把混成四旅下屬的四

個團全部調往東北參戰。我到達上海以後，由南京軍區上海航空處政委王集成陪同，馬上去請求陳毅司令員和饒漱石政委接見。我把軍委要調混成四旅到東北去參加抗美援朝的意見，向他們作了報告。陳毅馬上表態説，既然是軍委的意見，就堅决執行。接着，饒漱石也表示同意。

晚上，陳毅司令員和饒漱石政委邀請我留下，同幾個蘇聯空軍顧問一起吃飯。席間，大家互相敬酒。我不會喝酒，但在這種情况下，不得不起立向他們祝酒表示敬意。但我一向都是滴酒不沾，衹能裝個樣子。蘇聯顧問就説："你搞空軍，當政委，不喝酒怎麽能行。"我解釋説，"我真的不行，不能喝。"結果他們就要硬灌。陳毅司令員也説："怎麽樣，你就喝這一杯嘛！連這一杯也不能喝嗎？"没辦法，我衹能硬着頭皮把這杯酒喝了。好，這一杯酒喝下去，身體就産生了過敏反應，那一個晚上我都是迷迷糊糊的，什麽事也不能幹了。衹好第二天又重新談，具體商定混成四旅調動的有關問題。談完以後，我就回到了北京。

不久，混成四旅被調到東北，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四師。混成四旅走了以後，上海的防空就由防空軍負責，軍委專門給上海調來了一個高射炮師，用高射炮來構成上海的防空體系。

其次，我們準備的另一項工作是，組成了志願軍空軍聯合司令部。一開始，我們曾考慮志願軍空軍入朝作戰後，還有一個會同朝鮮人民軍協同作戰的問題，爲此專門組建了中朝空軍聯合司令部，司令員由中方的劉震擔任，另由朝、中雙方各配一名副司令員。但以後朝鮮人民軍空軍因遭受美機的狂轟濫炸，基本上已喪失作戰能力，因此以後的中朝空軍聯合司令部，事實上是由我們同蘇聯空軍的領導人，以及輪流參戰的國内各軍區空軍的領導人組成。司令部建在安東（以後改稱丹東）一個大銅礦裏頭，我們修建了一些簡易的木頭房子，還利用了一部分老百姓的房子修成了一個聯合空軍司令部的指揮所，下面又分成中國和蘇聯兩個指揮所。

我們的指揮所是由劉亞樓、劉震、聶鳳智、段蘇權等幾個司

令員，加上空軍司令蘇聯顧問、軍區空軍司令蘇聯顧問等實施指揮，加上一些翻譯和參謀人員作爲助手。蘇聯的指揮所則由援朝蘇聯空軍軍長羅泊夫中將指揮。當時援朝蘇聯空軍吃的、穿的、用的及交通運輸、地面供應等，全歸我們負責，而飛機、器材、零備件、油料、車輛等，則由蘇聯有償提供。

聯合司令部建好後，劉亞樓同我商量，說他準備在"聯司"指揮所至少待上一年，好同蘇聯空軍顧問在一起摸索一些空軍作戰的經驗。他要我和王秉璋、王弼在北京主持工作，把後方的事情全部交由我們負責。

一開始，我也在安東待了大概有兩個月，想盡可能多地學習一些空軍實戰經驗。但不久劉亞樓就催促我回北京主持工作。回到北京後，我又去了幾次安東，但每次大約祇呆了個把月左右。

再有，了解敵情也是我們在部隊入朝前的一項重要工作。經調查了解，當時美國投入朝鮮戰爭的空軍和海軍航空兵大約是十五個聯隊，美軍的一個空軍聯隊相當于我們的一個飛行師，聯隊下面還有大隊。加上其他參戰國家的飛機，總的實力大概是一千二百多架，飛行員的飛行時間，一般的都在六百小時以上，有的多達三千小時以上。飛行員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二分之一的人能在復雜的氣象條件下作戰。

在南朝鮮地面部隊遭受損失，向南撤退時，他們就全靠美空軍掩護，才阻滯了北朝鮮部隊的推進。那時，我們的空軍還沒有出動，北朝鮮的空軍力量也很弱。美國空軍十分驕橫，經常是低空飛行，以機槍掃射或狂轟濫炸，如入無人之境。北朝鮮所有的大城市，甚至一些不大鎮子，幾乎統統被炸，交通樞紐也被嚴重破壞，嚴重影響作戰部隊的行動和物資的供應。

而當時，我中國人民空軍僅有新組建的幾個師和團，作戰飛機不足二百架，加上蘇聯參戰的一個軍，總共也才五百多架飛機。我們飛行員的飛行時間，基本上都在一百小時左右，有的還不足一百小時。另外，我們地面的各種保障工作，如雷達、通訊和氣象等，也遠遠不如美國。很顯然，這將是一個雙方力量極爲

懸殊的較量，我軍明顯處于敵强我弱的態勢。了解這些情況，就會使我們的指揮員、飛行員有充分的思想上和心理上的準備。

另外，在參戰的各項準備工作中，趕修機場也是一項十分重要而又艱巨的任務。從決定中國空軍入朝參戰開始，到一九五〇年底的短短一個多月時間裏，我們共新修和修復了東北地區的機場三十一個，其中，鞍山、錦州、沈陽等機場歸蘇聯空軍使用，丹東、遼陽等機場歸我們使用。我們在前面，他們在後面。我們在一綫，他們在二綫。作戰時也是這樣，我們在低空作戰，他們在高層進行掩護。而且，我們兩個指揮所也相互挨近，靠在一起。

爲了準備志願軍空軍入朝作戰，由空軍副司令員常乾坤負責，組成一個領導小組，帶領工程技術人員，進到朝鮮"三八綫"以北，搶修了十幾個機場。但我們一邊修，美國飛機一邊轟炸，常常是我們剛剛修好一個機場，美國飛機就來炸。等美國飛機走了，我們趕緊進行修補，可修補完了又被炸。我們抗美援朝三年，朝鮮境内的機場也修了三年，一直修到停戰爲止，幾乎從來沒有使用過，始終不能降落飛機。偶爾那麼幾次，我們的飛機在朝鮮上空作戰時被打壞了，不得不降落在那裏，但修好以後，就又回來了。除此以外，不論是我們的飛機，還是蘇聯的飛機，基本上都沒有在朝鮮修的這些機場降落過。

還有，我們最重要的準備工作之一，就是抓緊改裝訓練。在中央與蘇聯方面緊急磋商之後不久，我們請求蘇聯支援的新型噴氣式戰機就運來了。此後，在蘇聯空軍的直接幫助下，我們對準備參戰的飛行人員突擊進行改裝訓練。一個月以後，參加訓練的飛行員都初步掌握了米格十五型戰鬥機的架駛技術，百分之二十的飛行員還進行了七千米以上的高空戰鬥訓練和中、大隊的編隊訓練。與此同時，我們對其他戰勤保障人員，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和訓練。經過突擊訓練，我們逐漸擴大和組建了幾個裝備了米格十五型噴氣式飛機的殲擊師。

除此之外，我們還在部隊中廣泛深入地進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入朝參戰的空軍全體指戰員都要樹立

敢打必勝的信心。

經過各項緊張的準備工作之後，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四日，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下達命令，令空四師十團二十八大隊首批進駐丹東浪頭機場，準備入朝作戰。

部隊進駐浪頭機場後，連續進行了四次飛行訓練，以熟悉航綫，熟悉地形。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空十團全部轉至浪頭機場。空四師師長方子翼、政委李世安和該師的蘇聯顧問也隨十團一起在機場組成了前綫指揮所。在浪頭，他們抓緊熟悉美空軍的活動情況與特點，研究作戰方法，很快就做好了戰前的各項準備工作。這時，以劉亞樓爲首的空軍黨委鄭重向空四師提出，一定要慎重初戰，要在初戰中打出士氣來，提高我們的勝利信心。

一月二十八日，二十八大隊首次進入北朝鮮迎戰美機。第一次戰鬥出動的當時，劉亞樓和我都在銅礦空軍指揮所坐鎮。很快，傳來喜訊，大隊長李漢，在戰友們的協助和掩護下，取得擊傷美機一架的戰績。第二天又取得擊落一架、擊傷一架的勝利。李漢首創戰績，立即就鼓舞了其他飛行人員的勝利信心。爲鼓舞士氣，經我們空軍黨委研究批準，給李漢記一等功，以後又授予他二級戰鬥英雄稱號。

首戰告捷之後，劉亞樓認真總結了首戰的經驗，分析了當時的敵我形勢。根據劉亞樓提出的意見，空軍黨委決定，在我們的飛行員還缺少實戰經驗的情況下，先在蘇聯空軍的掩護下作戰，而後再單獨作戰；先打性能較差、兵力較小的小機群，而後打性能好的大機群。這個作戰方針送呈毛澤東主席後，毛主席批示：“完全同意。”我們在北京接到這一批示後，隨即就按照這一方針進行作戰部署和準備。

爲使更多的航空兵部隊得到鍛煉，空軍黨委決定，采取“逐步前進，輪番作戰”的方針，組織已組建的航空兵部隊輪番入朝作戰。從一九五一年一月開始與美機交戰起，一直到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鮮戰爭停戰爲止，先後有十二個航空兵師入朝參戰，得到了寶貴的實戰鍛煉。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最先參戰的是四師，他的前身是混成四旅，是我們最早組建的一支航空兵部隊。在改變番號時，劉亞樓和空軍黨委研究決定，航空兵第一師的番號暫缺，在抗美援朝中，那個師打得最好，就授予一師的番號，作爲空軍的排頭兵。

後來，空四師先後參戰五次，擊落擊傷敵機八十餘架，成爲戰績最好的一個師。在戰鬥中，這個師涌現出英雄、模範、功臣一千餘人。比較典型的，有戰鬥英雄張積慧。在一次戰鬥中，祇在戰鬥機上飛過一百小時、空中戰鬥經驗不多的張積慧，憑着自己的勇敢和智慧，一舉擊落了參加過二次世界大戰、作戰二百六十多架次、飛行過三千多小時的美國王牌飛行員戴維斯的飛機，將他擊斃。戴維斯的被擊落，在美國軍方引起了很大的震動。美遠東空軍司令威蘭中將在特別聲明中承認，戴維斯的死是對遠東空軍的一大打擊，是一個悲慘的損失，它給朝鮮的美國噴氣機飛行人員帶來了一片暗淡氣氛。

由于空四師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創造了特殊的戰績，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日，空軍黨委决定，將空四師的番號改爲空軍第一師，下轄第一、第二、第三，三個飛行團。以後，我們又另外重新組建了一個空四師。此後多年，空一師的訓練與工作一直保持在先進水平上。事實證明，我們最初的考慮是對的。

接着，劉亞樓决定，從一九五二年四月份開始，不再由蘇聯空軍帶領作戰，改由空四師帶領十二、十五、十七師等兄弟部隊作戰。這樣，中國空軍就開始了由自己帶領自己的聯合作戰的階段。

入朝參戰的航空兵另一個主力，是空三師，三師師長是袁彬，政委高厚良。空三師可能參戰三次，擊落、擊傷的敵機和空四師相差不遠，也有七十架左右。擊落敵機最多的大隊，是空三師的王海大隊，共擊落敵機約十七架。擊落敵機最多的飛行員，是空三師的劉玉堤，他一個人就擊落了敵機七架，他自己的飛機也曾被打掉三次，但他三次跳傘，都得到成功，安全地降落在朝鮮，然後順利返回了基地，他真可以稱得上是戰爭中的幸運者。

總的來説，志願軍空軍在將近三年的時間内，擊落、擊傷敵機大約在四百架左右。當然，我們自己損失的飛機可能超過美國人。至于蘇聯飛機擊落、擊傷的美機，我們當時没有統計，不過肯定要比我們多。

由于我手頭没有具體的材料，以上這些數據，僅憑記憶所及，可能有誤。

志願軍空軍同美軍作戰之初，力量是明顯的懸殊。我們之所以能在戰鬥中不斷地取得勝利，我個人認爲，主要是由于以下的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有蘇聯空軍的支援、掩護和帶領。在抗美援朝的空戰中，絶大多數情况下都是中、蘇空軍聯合一起作戰，蘇聯空軍在高空，我們在中、低空。開始時，我們的飛行員不能在夜間和復雜氣象條件下出動，因此一旦夜間和有復雜氣象情况，就衹能靠蘇聯空軍出動。後來我們在蘇聯空軍的帶領下，分批組織部隊進行夜航訓練和復雜氣象條件的訓練。經過一段時間，我們的飛行員也掌握了夜間和復雜氣象條件下的飛行技術。以後，就基本上由我們自己全部承擔了作戰任務。

前來參戰的蘇軍飛行員大多參加過蘇聯的衛國戰争，有熟練的飛行技術和良好的戰鬥作風。在戰鬥中，他們往往士氣旺盛，勇敢機智，有的還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對志願軍空軍的參戰，起到了積極的指導作用。另外，在參戰的過程中，我們不僅向蘇聯空軍學到了空中飛行編隊、作戰戰術，而且還全面學到了地面指揮及氣象、雷達、通訊等各方面的技術業務。通過戰鬥，中蘇兩國空軍團結一致，共同對付美國空軍，取得了空戰的勝利。

當時，蘇聯空軍實際上也是采取輪换的辦法，雖然飛機不回去，指揮機構不回去，但飛行員却是一批一批地輪换，反正總是保留一個軍的兵力在東北。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板門店談判達成停戰協議不久，蘇聯空軍就撤離了東北。當時，我們的部隊也停止了抗美援朝，但仍留在原地待命。

第二個重要原因，是美國空軍基本上不過鴨緑江。志願軍對美軍轟炸我們的國土，轟炸我們的機場，采取了嚴密的防空措施。最初負責入朝指揮美軍的美國遠東總司令麥克阿瑟，也曾提出過要飛過鴨緑江轟炸中國領土，但美國政府没有采納他的意見，因此美軍飛機基本上以鴨緑江爲界，甚至在轟炸鴨緑江橋時，都在江那邊，不過來。

大概衹有兩次，美軍飛機闖進了鞍山。蘇軍飛機立即起飛攔截，先切斷了鴨緑江上空的退路，使美機轉不回去了，被蘇軍擊落在鞍山，他們的飛行員也被擒獲了。從此以後，美機就再也没有過江來。

這對我們來説，是個非常有利的條件，我們完全掌握主動權：有利時我們就過去打，不利時我們就不過去；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回來。最初，看到是小機群，就乘機而入，打兩仗，取得了勝利，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基地。以後，就以多層次、多梯隊的混合編隊，插入美機的大機群中作戰，同樣取得了不斷的勝利。最後，就逐步發展到能以師爲單位，雙方同時起飛兩、三百架飛機，在空中打大的空戰。到這時，爲減少地面部隊的傷亡，衹要敵機一出動，我們必定盡全力牽制敵人，使他們不能集中力量轟炸。

當時陸軍曾有少數同志編了個順口溜，諷刺我們空軍説：“抗美援朝不過江，保家衛國不帶槍，稀裏糊塗得了個紀念章（指朝鮮政府頒發的紀念章）。”其實，這是由于他們對空軍情况的不了解。空軍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强，有一個發展過程。同陸軍部隊一樣，空軍也是需要在戰鬥中鍛煉，在戰鬥中成長的，空軍的力量是逐漸積蓄起來的。所以，在抗美援朝之初，毛澤東主席就曾批示，使用空軍以采取穩當的辦法好。

第三個原因，是我們在戰争中不斷研究改進戰術、技術。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從參戰伊始，就在前方待了一年多。參戰初期，我們完全没有空戰的經驗。劉亞樓雖然在蘇聯學了八年，但學的都是陸軍方面的知識，對空軍應當怎麽指揮，應當怎麽打仗，完

全沒有經驗。因此，他親自帶着一個翻譯，同蘇聯顧問在一起，摸索空軍作戰的經驗。他對空戰戰術的研究十分重視，根據美軍當時的戰術、對參戰部隊對空戰戰術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見。劉亞樓同劉震、聶鳳智以及所有指揮幹部經常一起研究，并參考蘇聯空軍的經驗，同蘇聯顧問交換意見，采取領導與群衆相結合的辦法，反復實踐、研究和總結，最後提出了“一域、多層、四四制”的戰術原則。這個戰術原則在提交空軍黨委討論、通過後，報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批準後，正式成爲中國空軍的作戰戰術原則。

所謂的“一域”，是指在一個空域内；“多層”，則是將一個空域分成多個層次，例如四千米一層，六千米一層，八千米一層，一萬米一層。不管敵人的飛機從那裏來，我們都可以應付。所謂“四四制”，是指在空中進行戰鬥編隊時，以四機編隊爲基礎來執行戰鬥任務。當然，也可以采取兩個隊形，即八機，但最多是十二機。

這一戰術原則，符合當時的空戰實際，較好地體現了在局部集中優勢兵力和靈活多變的原則，完全具有中國的特色。以後在飛行部隊中，就按照這一原則進行改裝訓練、作戰訓練和戰術訓練。這一戰術原則的不斷研究和改進，對以後的空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個原因，是我們飛行員的技術加拼命精神，再加機動靈活的戰術。在明顯的敵强我弱情况下，志願軍空軍要想戰勝敵人是困難的，可我們還是取得了一定的勝利。靠的是什麼？靠的就是飛行員的勇敢和技術，加拼命精神，再加機動靈活的戰術。我們的飛行員都是來自陸軍，都經過了地面戰鬥的鍛煉，他們面對强敵，敢于鬥争，敢于以少勝多，積極求戰。在戰略上，他們藐視敵人，把敵人看作是紙老虎；在戰術上，他們則重視敵人，把他們看成是真老虎，是有牙齒會吃人的真老虎。雖然我們在裝備上、技術上不如敵人，但在思想上、士氣上，則遠遠超過了敵人。在朝鮮戰争中，我們就是以這樣的精神來戰勝敵人的。

第五個原因是，在邊參戰、邊擴大組建部隊，使他們輪番參

戰的同時，還注意到對有經驗的飛行人員的集中使用。當時我們新組建了一個空十六師，正在青島進行米格十五飛機的改裝訓練。剛改裝訓練完，劉亞樓就從丹東前綫來了電話，要我趕緊把十六師的飛行員全部調出補充到參戰的兩個主力部隊、空四師和空三師去。

接到劉亞樓的電話，我就在想，十六師是剛成立的一個師，要把他們的飛行員全部調走，這個工作估計比較難做。我就和當時的參謀處長何廷一，立即坐飛機飛往濟南，從五航校那裏又搞了一個教練機，直飛青島的流亭機場。一到青島，我就立即找到了十六師的政委張雍耿，告訴他要把十六師的全部飛行員用運輸機送往東北，補充到四師和三師去。我還告訴他，十六師的機構不動，師的空架子就暫時保留在流亭航校，凡是以後航校畢業的飛行員，立即補充給十六師。當時張雍耿還不太滿意，我就對他說：“你要服從命令，這是空軍黨委的决定，空軍黨委是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决定的。”

當晚，我又召集十六師的飛行員作了動員，鼓勵他們勇于參戰，爲祖國、爲人民立功。去的飛行員都興高采烈。就這樣，我們很快把十六師的飛行員全部調到了東北。這樣做，飛行員的補充就比較快，如果從航校調學員培訓，速度就太慢了。

第六個原因，是全國人民的支援。抗美援朝期間，全國人民開展了捐獻飛機的運動。據統計，全國各地捐獻的款項，大概可以買到三千七百多架殲擊機，這給初建的空軍增加了一筆巨大的財富。

第七個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央、中央軍委的正確領導、指揮與大力支持。當時，凡是空軍上報的請示報告，毛主席都是隨到隨批。有的是口頭報告，毛主席點了頭之後，我們就去辦。因爲是戰争時期，不可能那麼按部就班。例如，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爲解決空軍裝備的急需，毛主席還親自與海軍領導人商量，把準備購買艦艇的外匯轉買了飛機。

在抗美援朝期間，劉亞樓一直是在前面指揮。開始時是劉亞

樓同沈空的司令員劉震在一起。後來是南空的司令員聶鳳智接上去了，他實施指揮的時間比較長。最後是北空司令員段蘇權。其它的軍區空軍司令員，以及軍長、師長、團長，也曾輪番到丹東指揮所學習，但真正擔任指揮的是劉亞樓、劉震、聶鳳智和段蘇權。

當時在空軍的蘇聯顧問，包括空軍司令員顧問、參謀長顧問和各大軍區的司令員顧問，還有一些工程技術人員，也都在丹東指揮所，同我們一起工作、生活和休息。我們同他們交流經驗，徵求他們對我們的意見，吸收他們的經驗，來改進我們的作戰指揮，戰術訓練和改裝訓練。我們力爭先把他們的經驗學到手，在學到的基礎上再提高，我們把這個叫作"學到手，消化了，再提高，再創新。"這是我們當時領導建設空軍很重要的一個方針，是經過空軍黨委集體討論後提出來的原則。

抗美援朝期間，空軍經過初戰，積累了一些經驗，雖然不多，但把蘇聯空軍的經驗加在一起，我們也就有了比較多的經驗。經過蘇聯專家的指導，我們的空中指揮員從不會指揮、不會打仗到會指揮，會打仗，地面引導由不懂到懂。經過一個階段的學習和戰爭的實踐，我們最後已經能够在同一個指揮所裏，同時引導四個、五個甚至更多的機群打仗。

劉亞樓之所以在"聯司"待了一兩年，目的就在于要摸索出一套經驗，然後在北京建立起真正能指揮全國空軍的指揮所。

最後我想介紹一下，抗美援朝期間空軍黨委常委的分工。我們幾個常委當時的大致分工是這樣的：劉亞樓主要在丹東指揮作戰，同時也兼顧空軍主要工作，間或回到北京主持工作；我大部分時間在北京主持工作，政治工作方面由我負責，組織機構、幹部調配，由我和幹部部長楊春甫負責。我也曾三次去到前綫指揮所，但每次衹呆一兩個月，主要是去總結政治思想工作的經驗，總結黨的領導的經驗，黨委集體領導的經驗，以及組織動員部隊、鼓舞士氣。在這些方面，我做了一些工作。

王秉璋以後是空軍副司令兼參謀長，留在北京，專門負責軍

事行政，特別是同蘇聯的談判；常乾坤差不多三年都在朝鮮修建機場，同時擔任志願軍同朝鮮人民軍之間的聯絡；王弼則主要管地勤保障，以及訓練機務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

六、一九五五年授銜

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國家主席毛澤東下令，正式頒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其中最爲令人關注的，就是要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實行軍銜制。

在此之前，中央軍委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先後發出了《關于評定軍銜工作的指示》，對評定授予的步驟和範圍，評定的標準、批準的權限等問題作出了規定。總幹部部也在一月份召開了全軍軍銜獎勵工作會議，就軍銜評定工作中的標準掌握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具體問題，作了具體部署。軍委決定，軍官的授銜工作要在一九五五年全部完成。

空軍的評銜工作是在空軍黨委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劉亞樓對這項工作非常重視。我們成立了空軍評定軍銜和授勛工作的辦公室，專門負責這兩項工作。

當時軍銜等級的設定，主要是以蘇聯軍隊的軍銜制度爲藍本，也參考了朝鮮的軍銜制度。因此，我們的軍銜制度既不同于美國等西方國家，也不完全同于蘇聯。《軍官服役條例》規定，我國軍官的軍銜共分爲元帥、將官、校官和尉官四等，其中元帥分爲大元帥和元帥兩級，將官分爲大將、上將、中將和少將四級，校官分爲大校、上校、中校和少校四級，尉官分爲大尉、上尉、中尉和少尉四級。另外，軍士分爲上士、中士和下士三級，士兵分爲上等兵和列兵兩級。後來實際授銜時，由于毛澤東不接受大元帥的軍銜，故大元帥軍銜空缺。同時，考慮到大批副排級幹部，

又增設了準尉軍銜。

軍委規定，少將以上的軍銜由軍委直接掌握和評定，所以我們空軍黨委的任務衹是負責評定大校以下軍官的軍銜。

授銜工作開展以後，立即引起了幹部的普遍關注。大多數幹部都有比較正確的認識和態度，但也有不少幹部擔心自己的軍銜評低了，面子上不好看，有的還公開向幹部部門提出要什麼樣的軍銜，有的人甚至哭鼻子。據説毛澤東當時曾説過"男兒有泪不輕彈，衹因未到評銜時"。

經過一系列艱苦、細致的工作，到一九五五年九月，我們空軍及全軍軍官的軍銜評定工作基本完成，我被評定爲中將軍銜。我們空軍（包括後來合并進來的防空軍同志）中没有大將以上軍銜的人，上將有劉亞樓和劉震兩人，中將則有我、成鈞、王秉璋、聶鳳智、曹裏懷、譚家述、鄺任農、王輝球、常乾坤、曾國華、余立金、徐深吉、羅元法、吴富善等。少將有幾十人，我已不能一一記起來了。

近些年來社會上流傳着一種説法，説是一九五五年授予軍銜後，大將粟裕、上將劉亞樓二人對所授的軍銜不滿意，認爲授低了。粟裕我不知道，但我確實没聽到過劉亞樓有這樣或類似的表示。在授予上將軍銜的五十七人中，他排名在第三十名，排名在他的後面的還有不少比他資歷要老的同志，所以我想他不會對被授予上將軍銜有太大的意見和看法。

當然，在具體掌握評銜標準的方面，除了依據現任職務、政治品質、業務能力、在軍隊服務的經歷和對革命事業的貢獻以外，還適當照顧了各個方面軍幹部，照顧少數民族幹部、起義將領和已調到地方工作的幹部。如劉震之所以能授予上將軍銜，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原是紅二十五軍和紅十五軍團的幹部。

我對自己被授予的中將軍銜還是滿意的。當時軍銜評定有幾條硬性的規定，比如大將必須要在紅軍時期任過軍以上的職務，上將必須要任過師以上職務，中將必須要任過團以上職務，少將必須要任過營以上職務。我在紅軍時期没有任過師以上的職務，

所以中將軍銜是當時我能達到的最高軍銜，也是對我過去工作的肯定。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授銜典禮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毛澤東主席親自將命令狀授予十位元帥。同日，國務院舉行了授予將官軍銜的典禮，周恩來總理分别把大將、上將、中將、少將軍銜的命令狀授予我們。

二十八日，國防部進行授予校官軍銜的典禮，由國防部長彭德懷授予在京部分校官軍銜。此後，各軍、兵種和各大軍區，相繼舉行了授銜典禮。與此同時，各部隊還舉行了授予士兵軍銜的典禮。至一九五六年初，全軍授銜工作基本結束。

軍隊實行了近十年的軍銜制。一九六五年，林彪有病，賀龍代替他主持軍委工作。賀龍提出要撤銷軍銜制，"恢復紅軍時期官兵一致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這一想法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和批準，于是，在這一年的六月一日，軍隊正式撤銷了軍銜制。

七、"穩步前進"的訓練方針

我們在空軍中一直强調要堅持"穩步前進"的訓練方針和加强訓練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主要目的既是爲了完成訓練任務，又是爲了保證飛行安全，减少飛行事故。

在空軍，飛行員不僅需要在航校進行培訓，下到航空兵部隊以後，也同樣需要進行經常性的訓練，與航校不同的是所飛的機型和科目而已。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這些訓練都是在空中進行的，稍有不慎，就有機毁人亡的危險。一九五〇年初第一批航校剛開始飛行訓練時，就付出了血的代價。當時，第四航校的一個學員在放單飛時，飛機撞在機場邊的水堤上，結果飛機摔掉了，學員也犧牲了。

在這血的教訓之後，空軍黨委就重點抓飛行安全的工作。我

們黨委一班人在劉亞樓的帶領下，經過反復研究和集體討論，認爲首先必須提出明確的訓練方針，統一大家的思想。當時提出的空軍飛行訓練方針是："穩步前進，提高質量，保證安全，消滅事故"（簡稱"穩步前進"的訓練方針）。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中央軍委正式批準了"穩步前進"的訓練方針。以後，我們就一直堅持下來了，用這一方針指導飛行訓練。

實際上，要想完全消滅事故是不可能的，之所以要提出這樣的訓練方針，衹是想將此作爲一個奮鬥目標，要求大家盡量減少飛行事故，保證飛行安全。因爲一旦出現飛行事故，就造成最大的損失，不僅飛機價值昂貴，更主要的是飛行員。如果是運輸機，特别是載有乘客的飛機出事故，其損失更是無法估量的。

從多年的飛行訓練實踐來看，無論是在航校還是在飛行部隊，無論是在初建時期還是在以後技術水平得到提高以後，無論是在平時還是進行戰備訓練，如果離開了這個"穩步前進"的訓練方針，就必然事故嚴重，往往會欲速則不達。

比如説，一九五八年，在當時"大躍進"的形勢影響下，個别航空兵師急躁冒進，提出"幾晝夜完成全天候訓練計劃"的口號，結果師長本人就因飛行事故而犧牲了。這是又一次血的教訓。

可以説，"穩步前進"訓練方針的提出，對于保證訓練質量和飛行安全，對于中國空軍的發展和壯大，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八、飛行訓練四個階段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空中防綫

空軍建軍初期，自蕭華走後，一直没有政委，我作爲空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軍黨委副書記，實際上是當時空軍政治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因此我到空軍工作以後，就很想研究摸索一下如何加强飛行訓練中的政治工作，以利于保證訓練中的飛行安全。

一九五二年春，我帶領空軍政治部的一些同志，到第二、第三航校蹲點三個月。三個月下來，通過向飛行技術人員學習和自身的觀察，發現通常的飛行訓練過程，一般分爲四個階段，即飛行預先準備階段、飛行直接準備階段、飛行實施階段和飛行講評階段。這四個階段中的每一個階段都有其不同的内容和重點。每個階段都對各級政治工作幹部的工作提出了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要求。

從航校回來後，我召集了航校和部隊的一些政治幹部，對如何針對飛行訓練的四個不同的階段作好我們的政治思想工作進行了討論和研究。我們認爲，我們的各級政治工作幹部，在不同的階段中，應該對我們的政治工作對象有不同的要求，其目的在于使政治工作與飛行訓練緊密結合，更好地爲飛行訓練、飛行安全服務。在我們統一思想以後，又對這個"飛行訓練四個階段的政治工作"的内容，進行了座談討論，最後我們正式把它的内容確定了下來。

接着，我向空軍黨委常委會作了匯報。經常委會同意後，又向總政羅榮桓、蕭華作了匯報，并報經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批準後，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以空軍政治部的名義，下發了《飛行訓練四個階段的政治工作》的文件，在航校和飛行部隊中試行。試行一段時間後，經過補充和完善，文件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正式下發空軍各部隊執行。從此，《飛行訓練四個階段的政治工作》，就成爲空軍政治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以後，我們又組織了一些文章，在《人民空軍》雜志上發表，進一步闡述了《飛行訓練四個階段的政治工作》的基本思想和内容，論述怎樣才能使政治思想工作更加與飛行訓練業務結合在一起。這樣一來，就使這一原則更加深入人心，各級政治工作幹部都能自覺地執行。這樣就很快使空軍的政治思想工作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幹空軍的人，最怕的就是跑飛機。如何把好空中防綫，這是空軍政治工作建設中的一個重大課題。從組建飛行部隊開始，空軍黨委和劉亞樓同志就非常重視這個問題。黨和人民把最優秀的兒女送到空軍，如何把他們培養成爲合格的飛行員，特別是不能發生叛逃事件，這是一個時刻令我們縈繞心懷的問題。過去的國民黨軍隊以及蘇聯空軍，都是采取一些消極的防範措施，甚至是采取監視等手段，防範叛逃事件的發生，但我們不能這樣做。

于是，在了解蘇聯空軍這方面做法基礎上，我們經過長期的摸索、總結和改進，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做法。概括起來，這些做法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嚴格挑選，把好入門關。建設空軍初期，中央、中央軍委從陸軍爲我們挑選了一批基層骨幹。這些人首先是政治可靠，而且經過了戰爭的考驗，是我們空軍的基礎。以後，我們改由從地方適齡青年（主要是高中畢業生）中挑選飛行員。這項工作，很多次都是經周恩來批示，由國務院、中央軍委下達文件的。當時，挑選飛行學員難度非常大，政治思想、身體、文化以及社會關系都有十分嚴格的要求，嚴格把關，往往是百裏挑一，甚至是千裏挑一。這樣就保證了飛行人員的質量，特別是政治質量。

第二、加强培養教育。對飛行人員，我們在進行嚴格技術訓練的同時，也不斷提高他們的文化素質，加强對他們的思想教育。空軍是高技術兵種，部隊和飛行人員素質的好壞，與文化素質有着很直接的關系。爲提高飛行人員的文化水平，空軍政治部還編印了一套文化教材，下發給飛行人員學習。我們還針對空軍飛行部隊大多是單兵訓練和單兵作戰的特點，强調政治思想工作和思想教育一定要落實到每一個人。我們提出，師、團政治委員要對飛行員實行面對面的領導方法，要了解和熟悉每一個飛行人員的思想、技術、生活以及家庭等情況，有問題、困難要及時解決，做到思想問題不上天（即不使飛行人員帶着思想問題進行飛行訓練和參加作戰）。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甚至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動亂時期，不管社會上是如何動蕩、混亂，我們都始終

堅持對飛行部隊進行正面教育的方法，保持了飛行人員的思想穩定和部隊的穩定。正是堅持了這一點，才使得我們在各個時期内都完成了包括國土防空在内的各項任務。

第三，加强管理。在當時那種作戰和訓練任務十分繁重的年代，空軍飛行人員都象連隊戰士那樣過集體生活。除節、假日以外，工作、學習、訓練、吃飯、睡覺都在一起。這樣做，有利于集中精力組織飛行訓練，有利于保障飛行員充分的休息，因而保證了飛行安全。有一些飛行員，都三十甚至四十出頭了，也仍然過着這樣的集體生活。由于他們的思想覺悟高，都能自覺遵守這些規定。除了飛行員，我們對飛行團的軍、政領導幹部，也都要求他們同樣執行這些規定。現在看來，這種做法在當時來講，實在也是迫不得已。對這些同志多年來爲黨的事業和空軍的建設所作出的巨大犧牲，我在這裏向他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第四，提高飛行人員的各種待遇。飛行人員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待遇，在空軍中是最高的，其中，空軍飛行人員的伙食標準是軍隊中最高的。各飛行部隊、航校、領導機關都設有專爲飛行人員服務的空勤竈，有的還從地方上請了最好的厨師，調劑并不斷改善飛行員們的伙食。空軍在全國各風景勝地都建有療養院，飛行人員每年都能到這些療養院裏享受一個月的療養，主要是保健和體育鍛煉。飛行人員如果生了病，醫院裏有專門的科室、病房。結婚的飛行員，不受軍齡、職務的限制，其配偶都可以隨軍。子女上學、就業的問題，也由政治機關負責解決，以盡量解除飛行人員的後顧之憂。工資、級別的調整方面，對飛行人員也有特殊的照顧。飛行訓練中犧牲的飛行員，經報請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批準後，一律追認爲革命烈士。

通過這些措施和辦法，我們的空中防綫工作成績較大，重大惡性案件和叛逃事件極少發生。當然，重大惡性事件也不能説一件没有。一九六三年就曾發生了一起，空十四師的一名飛行員，因爲懷疑其未婚妻與大隊長有曖昧關系，就槍殺了這位大隊長，制造了一起惡性案件。案件發生後，我親自到空十四師作了調查

處理，并將這起事故的教訓整理成材料，發到全體空軍部隊中進行教育。再有就是一九六九年七月，在我接任空軍司令不久，在南空五師發生了一起飛行員駕機叛逃臺灣的事件。但從這以後，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前，再没有發生過類似的惡性事件。

我在空軍共工作了二十一年，其中前十五年的時間主要是負責空軍的政治工作。我爲空軍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和政治思想工作的開展，作出了應有的努力和貢獻。當然，在那些年的空軍政治工作方面，也難免有不少的缺點和失誤，對此我也很清楚。

九、空軍、防空軍合并

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空軍的建設，開始走的是蘇聯空軍的道路。蘇聯是把空軍和防空軍分開的，國土防空軍是空軍之外的另一個軍種。防空軍不僅有高射炮、探照燈等裝備，也有飛機、雷達部隊。根據蘇聯的模式，我們在建國後建設中國空軍的同時，也開始建設防空軍。同我們空軍一樣，防空軍經過幾年的發展，到五十年代中期，已經具有一定的規模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國共産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提出，要進一步削減軍、政費用，以加强國家的經濟建設。根據這一精神，一九五七年一月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作出了《關于裁減軍隊數量，加强質量的決定》，決定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五個軍種，改爲陸、海、空三個軍種，撤銷公安軍，將防空軍并入空軍。

遵照中央軍委的決定，空、防兩軍黨委成員于一九五七年月十八日和三月四日，兩次召開聯席會議。在三月四日的會議上，總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總幹部部部長蕭華、副部長甘渭漢，總參謀部軍務部部長蘇静也參加了會議。會議對空軍和防空軍合并的組織形式、臨時黨委的組成、主要幹部的配備、合并的時間步驟和政治思想工作問題等，作了通盤的研究，決定組成一個空軍、防空軍合并工作委員會，來統一領導與組織實施這兩個軍種的合并工作。

這次空軍和防空軍的合并工作，是在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彭德懷、總參謀長黄克誠親自主持下進行的。合并之前，他們選委派空軍司令員劉亞樓、防空軍司令員楊成武分赴沈陽、南京、廣州等軍區，具體研究與解决有關空、防合并的一些主要問題。

三月二十八日，中央軍委公布了空、防合并後空軍的主要領導幹部名單：劉亞樓任司令員，吴法憲任政治委員，王秉璋、劉震、成鈞、曹裏懷、譚家述、常乾坤、徐深吉任副司令員。空軍黨委，仍由劉亞樓任書記，我任副書記。

一切準備工作就緒以後，五月十六日，總參謀部命令，軍委空軍和防空軍從五月十七日零時起正式合署辦公。緊接着，各軍區的空軍、防空軍，也于五月九日至九月十日先後合署辦公。至此，空軍和防空軍的合并工作即告結束。

空、防合并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很復雜的事。我們在合并過程中，做了很多的政治思想工作，開了很多會議，打通了思想，使這次空、防合并得以順利完成。

比如説當時有一種思想，認爲空、防合并是空軍吞并了防空軍。對這種思想，我們及時進行了批評和教育。我們向大家解釋説，空、防分開有很大的弊病，防空軍有高射炮、雷達和探照燈，主要擔負國土防空任務，而空軍有殲擊機。由于兩軍分屬不同的指揮系統，一旦敵機來襲，兩者往往不能密切配合，往往會矛盾很大。爲解决這一矛盾，起初各軍區空軍曾指定一名副司令員兼任軍區防空軍副司令員，專門負責指揮殲擊機進行防空任務。但工作起來，仍然很别扭，因爲殲擊機歸空軍建制，可國土防空方面的指揮權却又屬于防空軍。這樣的體制有很多的不便，一旦有了作戰情況，運作起來都會感到很不順當。空、防合并以後，在國土防空方面就完全協調一致，再也没有這種隔閡了，也再没有人説什麽你是防空軍，我是空軍什麽的了。經過我們的解釋和教

育，絕大多數同志都對空軍和防空軍合并有了正確的認識。

至于防空軍的領導，除防空軍司令員楊成武調任副總參謀長之外，其他副司令員都轉到空軍來任副司令員。比如成鈞到了空軍，仍然擔任副司令員，仍然主管高射炮、雷達、探照燈這些部門的工作；譚家述到空軍，也仍然是副司令員，不光主管以前的防空兵學校的工作，還統一負責全空軍的學校工作。各軍區防空軍的領導，也都在各軍區空軍中擔任了相應的工作。

空、防合并以後，以前的矛盾基本上得到解決，兩者的關係更加密切，工作更加協調一致。所以，從實際效果來看，這個合并是很成功的。

十、組建空降兵

還在籌備建國之時，毛澤東就曾提出要建立一支空降兵部隊。遵照毛澤東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共中央代表團在莫斯科與蘇聯商談幫助中國建立空軍時，同時也就組建傘兵部隊的問題進行了磋商。一九五〇年一月，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在隨毛澤東去莫斯科訪問時，又與蘇聯政府進行了具體商談。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七日，中央軍委正式決定組建空軍陸戰部隊。七月十七日，確定該部隊番號爲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陸戰第一旅，歸空軍建制。

空軍陸戰第一旅成立以後，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如何使用降落傘，如何掌握跳傘技術和怎樣進行訓練等問題。當時我們在這方面没有任何經驗，祇能臨時聘請蘇聯顧問來進行專門的指導和幫助。經過一個短期的訓練，傘兵們基本上都掌握了跳傘的動作要領和叠傘的技術。

九月二十九日，傘兵部隊正式組建兩個月之後，陸戰第一旅組織了新中國傘兵的第一次跳傘。這次跳傘的成功，使傘兵們克服了畏難情緒和害怕心理，提高了跳傘成功的信心。不久，我們又專門組織了一個運輸機團，來爲傘兵旅的跳傘訓練服務。

一九五九年九月廬山會議以後，林彪擔任了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部長。一天，中央軍委在三座門軍委辦公廳召集常委會議，就擴大組建空降兵的問題進行討論。到會的有賀龍、陳毅、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羅榮桓等元帥和羅瑞卿大將。由于是討論空降兵的問題，因此也吸收劉亞樓和我參加旁聽。

會上，林彪首先發言說，現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是强大的，没有問題。海軍、空軍和各個兵種，也都在發展之中。相比之下，就是空降兵不够，現在祇有一個旅。現代戰争，需要大規模地在敵人後方進行跳傘作戰。也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有空降部隊，還要有空降武器，包括空降坦克、空降汽車、空降炮兵等。這樣，才能適應現代戰争的需要。因此，我們需要擴大空降部隊的建制。不過由于目前我們運輸機的數量有限，就先擴大一個軍，成立一個空降軍，歸空軍建制。這個空降軍，要從陸軍調一個最强的軍，來改建爲空軍的空降軍。

陳毅元帥接着發言。他說："我完全同意，這樣做完全必要。在南京組建空降兵旅的時候，我就很重視這個旅的組成。當時我把華東野戰軍的很多戰鬥英雄、模範、功臣等，都調到了這個旅。實在數量不足時，也按政治可靠、身體健康、戰鬥勇敢、表現好等條件，從戰士中補選。"

林彪對陳毅的講話十分欣賞。他說："陳老總這樣重視空降部隊，比我的想法又進了一步。就是應當從陸軍部隊調戰鬥英雄、模範、功臣來。要調一個最好的軍，戰鬥經驗最多，打得最好的軍來改建成空降軍。"之後，賀龍、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羅榮桓和羅瑞卿，也一一發言，表示贊成林彪和陳毅的意見。

軍委常委會議開完，就寫了報告，上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送上，毛澤東很快批示："完全同意。"于是，成立空降軍成爲定局。

毛澤東批準後，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羅瑞卿（軍

長蕭華，召集空軍和各軍、兵種負責人開會，具體討論要調那個軍。經反復研究，最後確定調抗美援朝中表現最好的第十五軍，來組建空降部隊。這一決定上報毛澤東、林彪，得到批準。不久，陸軍第十五軍正式劃歸空軍建制，改稱空十五軍。

在抗美援朝中，十五軍部隊以“血戰上甘嶺”而聞名于世，湧現了特級英雄黃繼光，一級英雄邱少雲、孫占元等一大批英雄人物。以這樣一支戰功卓著、英雄輩出的部隊改建爲空降兵部隊，毫無疑問，肯定能成爲空降部隊的排頭兵。

空十五軍改建以後，首先狠抓了空降部隊的基本訓練，達到了一般條件下人人會跳傘的標準。接着，他們又開始進行各種復雜條件下的特種跳傘試驗。開始是在廣州進行水上跳傘試驗，繼而又在東北的齊齊哈爾、海拉爾進行雪中跳傘試驗，以後又在青海、西藏進行高原跳傘訓練，最後還在湖北孝感進行山地、丘陵地和水網稻田地帶的跳傘試驗，在雲南思茅地區進行森林地區跳傘試驗。他們還不斷研究改進跳傘方法，從一般的步槍、輕機槍、重機槍到炮兵，到坦克、到汽車，都進行空降。從個人到整連、整營的跳傘訓練，每次都取得了成功。

從空降兵成立到一九七〇年，我國空降兵部隊從理論到技術訓練、戰術訓練，再到各兵種聯合作戰的訓練、各種氣象條件下的訓練、各種地形條件下的訓練、各種空運條件下的訓練，都基本上獲得成功，從而使空十五軍成爲了一支戰鬥力較强、能够擔負各種作戰任務的部隊。

十一、金門空戰

一九五八年七月，毛澤東决定炮擊金門。爲了實施這一行動、掩護大批炮兵進入前綫，中央軍委命令空軍奪取福建前綫的制空權。

一九五八年的七、八月份，劉亞樓和我帶領空直機關的幾個人，來到東南前綫坐鎮指揮，歷時四十多天。首先，我們逐一檢查了參戰部隊的各項準備工作，并針對國民黨空軍的力量和特點，同福州軍區空軍司令員聶鳳智等進行研究，對部隊的部署作了一些調整。

作爲金門炮戰的序幕，爭奪福建前綫制空權的激烈空戰，持續了半個多月。這次空戰，國民黨空軍損失了五十多架飛機，我們則損失了二十多架。戰鬥的結果，福建前綫的制空權被我們基本掌握。之後，敵人變得老實多了，再也不敢隨隨便便地飛過臺灣海峽，從而爲我們大批炮兵安全開進廈門地區，炮擊金門打下了基礎。也使我們又一次得到了實戰鍛煉。

金門空戰中，空軍的很多部隊都參加了戰鬥。其中一些組建時間不長的部隊，如空九師、空十四師、空十八師等打得比較好，而空一師、空三師等幾支老部隊，則表現平平。戰鬥結束後總結時，我們幫助他們認真分析了原因，總結了經驗和教訓。

金門空戰，是我們在抗美援朝戰爭之後，所經歷的又一次實戰鍛煉。通過這次空戰，我們年輕的空軍部隊不僅經受住了考驗，而且還積累了寶貴的戰鬥經驗，較好地完成了中央軍委交給的任務。

十二、國土防空

到了一九五八年底，我國的防空力量又發生了重大變化。在蘇聯援助下，我國第一支空軍導彈部隊正式組建。

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就在國慶十周年大慶剛剛結束後的幾天，我們組建不過十個月的年輕的空軍導彈部隊，就首戰告捷，在北京上空擊落了美制國民黨空軍ＲＢ－５７Ｄ高空偵察機，開創了世界防空史上首次運用地空導彈擊落敵機的記錄。以前，

于國民黨空軍高空偵察機的飛行高度，能夠到達一萬八千到兩萬米，而我們過去的戰鬥機飛行高度不够，我們衹能對着這種高空偵察機“望機興嘆”。現在終于用導彈把它揍下來了！更爲難得的是，當時擁有這種導彈武器的其它國家，都還衹是停留在靶場上的射擊階段，衹有我們第一次用在實戰上，并取得了成功。

國民黨高空偵察機被擊落，立刻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飛機殘骸墜落在北京近郊通縣東南，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以及其他一些負責同志，都曾前去看過。

可是在那以後，中蘇關系突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赫魯曉夫片面撕毀了原訂的協議，斷絶了有關援助，我們的導彈部隊也暫時不可能再擴大了。以當時我們僅有的那一點地空導彈兵力，要把守全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兩萬米以上領空，幾乎是不可能的。

正在這個時候，美國又先後部署了幾架U－2型高空偵察機到臺灣，并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直接控制，由美國專門訓練的蔣軍空軍飛行員駕駛，完成到大陸偵查的任務。這種飛機比RB－57D飛得更高，實用升限將近兩萬三千米，而且偵察設備也更好。依靠這種較爲先進的飛行，國民黨空軍屢次進入大陸進行偵察活動。

這時，總參謀長羅瑞卿指示空軍部隊，對打U－2飛機，一定要“海底撈針，總不死心”。根據這個指示，劉亞樓作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認爲，與其守株待兔，不如退而結網，把固守在北京的地空導彈部隊拉出去，進行機動設伏。不久，這一戰術果真取得了戰果。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一架U－2飛機在江西上空“咬鈎”了，被預先埋伏在那裏的地空導彈部隊二營一舉擊落。

U－2飛機被擊落後，劉亞樓立即報告給了周恩來。周恩來馬上就説：“很好，這是個偉大的勝利。美國的U－2飛機前幾天入侵蘇聯，蘇聯衹是提了警告，而我們却把這種飛機打掉了。”

隨後，我們的地空導彈部隊在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又相繼擊落了三架U－2飛機。在一九六四年地空導

彈部隊第三次擊落U－2飛機後，我們向毛澤東作了匯報。聽了匯報，毛澤東對周恩來説：“這個部隊在哪裏，我要見見他們。”

一九六四年七月，參戰的地空導彈部隊全體官兵，受到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李先念和彭真等中央領導的接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對導彈部隊以至全空軍都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這之後，從一九六四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年底，國民黨軍的美制無人駕駛飛機又侵入大陸領空九十七架次，先後被我們擊落了二十架，其中，空軍航空兵擊落十四架，地空導彈部隊擊落三架，海軍航空兵擊落三架。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擊落的美制蔣軍無人駕駛飛機，是空軍在六十年代的最後一次勝仗。當然，上述幾次戰鬥，對空軍部隊來説僅僅是個開始，但在當時，不僅是對我們空軍自己，對全國乃至全世界，所起到的影響都還是比較大的。

十三、立空軍為標兵

一九六三年元旦，我清早起床，劉亞樓就來約我到劉少奇、朱德、鄧小平、賀龍、聶榮臻、彭真等領導那裏去拜年。最後，我們拜到了毛家灣林彪的家裏。

對林彪這個人，我們是很了解的。到了他那裏，不能像到其他領導家那樣，是没有什麽閑話可談的，要談就是談工作。所以一到林彪家，我們就向他匯報空軍的一些情況。

在匯報中，我們談到了北京市委當時正在大力進行的宣傳空軍領導機關的衛生工作。北京市委在空軍大院召開了現場會議，組織北京市的一些機關到大院裏來參觀學習。之後，衛生部長李德全又帶領部裏的全體領導到大院來學習，賀龍、聶榮臻、葉劍英等元帥也來視察。説到這裏，我們説，每天來訪的人很多，并



和劉亞樓一起視察空軍部隊

得我們應接不暇，但是又不好拒絕。

說到這裏，林彪就說："我也去看過呀，我看你們的工作搞得不錯！"林彪這天很高興，就又滔滔不絕地講開了："我看空軍的工作搞得不錯，應該宣傳，應該立爲標兵、樹爲榜樣。樹立標兵這也是一種工作方法，'四個第一，'要有標兵，'三八作風'要有標兵，'四好連隊'要有標兵，'五好戰士'要有標兵，每個單位都可以立標兵，各行各業都可以立標兵，使大家學有榜樣，趕有先進，在全軍造成一個比、學、趕、幫的熱潮。北京市委的這個辦法很好，我們解放軍要學習。"[9]

他接着說："我心裏早有這個想法，想提出以空軍爲標兵。現在看來，這個時機已經成熟了。空軍自建立以來，工作是有朝氣的，要求是嚴格認真的，有些方面做得是比較好的。所謂標兵，就是排頭兵，連隊站隊第一個就是排頭兵，就是標兵。樹立標兵，就是像站隊一樣，大家都要向他看齊。"說到這裏，他問："你們能不能把空軍建設的經驗，搞他個十條、八條甚至幾十條，向大家作一個介紹？你們能辦得到嗎？"

劉亞樓回答："這比較困難。我們根據黨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沒有很好的總結，現在就要的話，一些經驗恐怕一時總結不起來。"

林彪說："不要顧慮那麽多，你們就搞吧，搞那麽幾十條出來，給大家介紹介紹。不好的，也可以作個自我批評嘛。"林彪這麽一說，劉亞樓不敢再表示异議，我更是不敢說什麽。

[9] "四好連隊"，即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訓練好，生活管理好。"五好戰士"，即學習毛主席著作好，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技術好，組織紀律好。編者注

看我們面有難色，林彪就說："這個意見我已經决定了，你們不要再說了。等一下我再和羅瑞卿、楊成武、蕭華、梁必業、劉志堅他們說一下，由他們去布置，你們衹要準備總結經驗就是了。"我們表示回去再研究一下，再將具體意見向林彪報告。林彪說："不要報告了，就這樣定了。"我們長期跟隨林彪，知道他作出的决定，別人一般是改變不了的。

從毛家灣回到家裏，剛剛吃過午飯，總參副總長楊成武和總政副主任梁必業就來了。原來林彪没有找到羅瑞卿和蕭華，就把他們兩個人找去了。林彪告訴他倆說，他已向軍委提議樹立空軍爲標兵，并且在全軍樹立各種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要掀起一個比、學、趕、幫的熱潮，以推動部隊的革命化和現代化建設，要總參和總政具體負責，拿出一個文件來，并要他倆先來同我們談談。

楊成武和梁必業還說，這件事情回去以後還要向羅瑞卿總長報告，學習空軍是一件大事，一定要羅總長出來主持才行，他們衹是代表總參、總政來向我們表示祝賀和學習的。

這就是林彪的作風，說幹就幹，絶不拖泥帶水。衹是他給我們的這個任務，却使劉亞樓和我都感到了很大的壓力。當天我們就没有休息，這麽大的壓力，還過什麽年呢？楊成武和梁必業走了以後，我們立即召集空軍司令部、政治部、黨辦、報社等幾個部門的負責人，成立了一個領導班子，開始研究空軍建設十多年來的各項成功經驗。經過反復討論和研究，我們總結出了幾十條經驗。我記得主要有這麽幾個方面：一、繼承紅軍、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的光榮傳統，在陸軍的基礎上建設空軍的經驗；二、怎樣聯系中國空軍建設的實際來學習、吸收蘇聯空軍的經驗；三、空軍在緊跟黨中央、毛主席、中央軍委方面和突出政治思想工作的經驗；四、怎樣加强軍事訓練，結合實戰提高部隊戰鬥力方面的經驗。我們把這些一條一條地拉成提綱，没有做好的就作自我批評，實事求是。

林彪把空軍樹爲全軍標兵的這個決定，對我們是一個比較大的壓力，但同時也是對整個空軍工作的一個很大鞭策。我們馬上就在空軍機關中作了進一步的動員，整個空軍機關都動了起來。當時，劉亞樓和我還有一個分工，他負責起草報告，我負責空軍的日常工作。劉亞樓負責起草的這個報告稿，真是費了很大的力氣，前後不知反反復復修改了多少次，光空軍黨委常委會就討論了許多次。最後定下來以後，就上報軍委秘書長羅瑞卿批準。後來，我們又報告林彪，可他說："羅總長批準了，我就不看了。"林彪就是這樣的一個工作作風，大政方針他說了算，一般的事情他就不再過問，放手讓大家工作。

一九六三年四月，經中央軍委林彪、賀龍、聶榮臻三位副主席和秘書長羅瑞卿共同決定，由軍委出面，召集各總部，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各軍事院校的負責人一百多人，在北京三座門開了十天的軍委擴大會議，由劉亞樓介紹空軍的經驗。會議由羅瑞卿主持，賀龍、聶榮臻出席了會議。

劉的報告一講就是兩天。然後，羅瑞卿在會議上講話。他在講話中說："林副主席指示，要在全軍開展比、學、趕、幫的運動，要立標兵，樹立榜樣，我們現在找到了空軍。林副主席說，空軍工作搞得不錯，比較起來，空軍可以成爲標兵。現在開這個會議，請同志們聽一聽他們的意見，看看是不是有的地方值得學習，空軍的經驗是不是可以作爲借鑒。我們不作結論，大家可以學習，也可以不學習。比空軍做得好的，也可以講出來，也可以列爲標兵。總而言之，要借這個機會，推動全軍的比、學、趕、幫運動，推動'四個第一'、'三八作風' 和'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運動，推動政治思想工作、軍事訓練和科學技術工作，推出一批積極分子、先進人物的事迹，加以宣揚，要在全軍樹立一個立先進、學先進、超先進的熱潮，從而推動全軍的各項工作，使全軍大踏步地在革命化、現代化的道路上前進。"

接着，賀龍、聶榮臻兩位軍委副主席也講了話，他們都在講話中表示擁護林彪的決定，同意羅瑞卿秘書長的講話。他們這樣一講話，其他參加會議的同志也紛紛表態，擁護林彪和軍委的決定，贊成樹立空軍爲標兵。

軍委擴大會議以後，中央和軍委又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了一個萬人大會，請駐京部隊、軍事機關和院校營以上幹部，中央和北京市黨、政機關處以上幹部統統到會，由劉亞樓再次介紹空軍的工作經驗。

我記得那些年裏，在人民大會堂介紹過工作經驗的衹有兩個人。一個是當時的石油部長余秋里。在他的領導下，我們在黑龍江搞起了一個大慶油田。大慶油田是黨中央和毛澤東下決心搞起來的，搞之前曾說過，即使犧牲多少人也要搞，可見決心之大。因爲中國是一個貧油國家，蘇聯一卡我們，國家就十分困難。油田一搞起來，毛澤東、周恩來他們都十分高興。周恩來當時還說："中國用洋油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樣，余秋里搞油田立了大功，國務院把石油部樹立爲榜樣。

再一個就是劉亞樓。因爲我們空軍十多年的工作較有成效，被樹爲全軍的標兵和榜樣。一九六二年，毛澤東提出"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林彪隨即又相應提出"解放軍學全國人民"，以示謙虛。這次林彪又提出"解放軍學空軍"。這樣，全國人民學解放軍，解放軍又學空軍，就把空軍推到了最前面，成爲了榜樣之中的榜樣。

從此以後，羅瑞卿對空軍的工作特別關心，要求非常嚴，拼命督促空軍。在一次空軍的會議上，羅瑞卿還把對空軍的工作要求歸納爲四句話："辦事要認真，工作要落實，經得起考驗，不要翹尾巴。"他的這四句話，我們在空軍內部廣爲印發，把四條傳達到了空軍各個部隊，要求各部隊認真貫徹執行。

在羅總長的具體領導下，部隊的比、學、趕、幫運動推廣下去了。以後，各大軍區，各總部，各軍、兵種每年都要召開一次"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四好連隊"，"五好戰士"的代表大會，以後大家把這個會叫做"三代會。"各地還樹立了不少的標兵。例如，空軍樹立了一個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的標兵，

名叫潘復生；南京軍區樹立了一個軍事訓練的標兵，名叫郭興福，等等。在南京軍區樹立郭興福時，葉劍英和羅瑞卿曾親自到南京，主持過兩次現場會議，以推廣郭興福創造的訓練方法和教學方法。

從此以後，全軍各部隊的比、學、趕、幫運動紅紅火火、蓬蓬勃勃地開展了起來，各類先進模範人物不斷涌現，全軍各項工作非常活躍。我認爲，這一階段的軍隊工作，是建國以來我們軍隊工作的最好時期。

十四、劉亞樓去世

就在全軍工作蒸蒸日上、空軍工作進一步有所提高時，劉亞樓身體却越來越不行了，精力也越來越差。面對空軍工作越來越大的壓力，劉亞樓竭盡全力，想把空軍的工作搞好一點。但到一九六四年，他身體已經不大行了，精力已經耗盡，開始走下坡路了。他開始是覺得身體不大舒服，有些腹瀉，但是在一九六四年年底被診斷爲肝癌。這時，已經無法挽救他的生命了。

在一九五九年林彪接替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并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以後，劉亞樓的工作就一直受到重視。一九六〇年春，劉亞樓被任命爲國防部副部長兼空軍司令員。從此，劉亞樓的工作熱情更高，對林彪及羅瑞卿也更加尊重。

到了一九六〇年三月，劉亞樓認爲，中國空軍應當有結合自己實踐經驗的一整套東西，光依靠蘇聯的一些條例、條令和教材是不行的。自從開始建設空軍以來我們已經度過了十二個春秋，積累了自己的一些經驗、教訓，現在開始搞自己的一套東西，條件已經具備。他曾多次說，我們應當爲空軍建設，爲下一代留下一點東西。

劉亞樓的意見得到空軍黨委常委們的一致同意，經報請中央軍委批準後，劉亞樓便親自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集中了空軍各方面的技術尖子和寫作人才，住在風景秀麗的杭州，擺脫一切具體事務的干擾，集中時間、精力，專心編寫各種條例、條令和教材。這一段時間，劉亞樓本人，大部分時間也都在杭州主持編寫工作，而空軍黨委的日常工作，就交由我及其他常委負責。

編寫工作到一九六五年八月告一段落，前後共完成了有關條例和條令三百零六本。中央軍委條例、教材驗收會議在審查時，認爲這一批條例、條令和教材編寫得好，體現了黨的領導和以我爲主的精神，很好地結合了我們自己的經驗，内容充實，規定具體，便于掌握和執行。可以說，由劉亞樓直接主持編寫的這批條例、條令和教材，不論是在當時還是在以後，對于指導空軍的戰備、訓練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工作，對于整個空軍的建設和發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編寫空軍條例過程中，一九六四年，中央决定派一個代表團去訪問古巴，以了解和加强同南美洲兄弟黨之間的關系。中央决定以劉亞樓爲團長，莫文驊爲副團長。之後，劉亞樓率代表團在古巴一共訪問了二十天左右。

回國以後，劉亞樓就感到自己的身體非常疲勞，很不舒服，于是開始到北京醫院、協和醫院等北京各個醫院去檢查身體。經過許多醫生的多次檢查，于這一年的十月底正式確診爲肝癌。確診以後，爲了慎重起見，我曾經兩次到協和醫院去聽取專家的論證和匯報。專家們都一致認爲劉亞樓確實患有肝癌。這個事實雖然嚴酷，但已是不容置疑。我當時認爲，對劉亞樓隱瞞病情是無益的。經過研究，大家同意了我的意見。于是，我直接告訴劉亞樓："專家們對你的病情已經確診爲肝癌，你需要立即停止工作，安心休養，進行徹底治療。"記得當時劉亞樓對我說："還是你對我坦率和真誠，謝謝你直接告訴了我，這樣，我心裏就有了底，思想上也好有個準備。"

我又把這一情況報告了林彪、羅瑞卿和蕭華，他們一致決定要劉亞樓立即停止工作，接受治療。我同時報告了周恩來，後來

林彪和周恩來又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得知後，親筆給劉亞樓寫了一封信，要他好好休息，認真治療，精神上不要有負擔，但是又不可忽視。

劉亞樓自己要求去上海，他認爲上海華東醫院的治療條件比較好。我們尊重他的意見，立即派飛機把劉亞樓和他的妻子翟雲英，以及保健醫生、秘書、警衛人員等一起送到了上海。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對劉亞樓十分照顧，專門在華山路騰出了一座花園小樓，供他們居住。同時，還派來了一個高級廚師，照料他們的生活和飲食。

黨中央、中央軍委對劉亞樓的病情十分重視，責成國家衛生部和總後衛生部派出由張孝騫教授等著名專家組成的高級醫療小組，隨後也來到上海。這個醫療組就住在劉亞樓寓所的附近，專門負責他的治療工作。但醫療組把各種藥物用盡，各種辦法想足，但劉亞樓的病情却始終不見好轉。

劉亞樓病重期間，正在蘇州養病的林彪，帶着葉群從蘇州趕往上海，親自坐鎮，照料劉亞樓的治療工作。他不光天天派秘書或葉群去看望劉亞樓，自己也親自去過幾次。其關心的程度，確實是少有的。

林彪到蘇州、上海休養後，羅瑞卿主要在北京主持軍委的工作，確實非常忙。但就是這樣，羅瑞卿也在百忙之中，幾次坐飛機到上海看望劉亞樓。另外，還有周恩來、葉劍英和其他幾位老帥，以及中央的一些領導人、各部部長、解放軍各總部的負責人等，也都曾先後到上海看望過劉亞樓。

在劉亞樓去上海治療期間，空軍的工作就暫時由我來主持。那段時間，我一方面在北京主持空軍的工作，另一方面則經常到上海去探望劉亞樓，并就一些重大的問題，徵求他的意見。

一九六五年春節前後，羅瑞卿總長和我一起去上海看望劉亞樓。我們當時見到他，面容憔悴，臉色蠟黄，虛弱得幾乎連說話的力氣也没有了。這與以前的劉亞樓相比，幾乎就像是换了一個人。看到我們到來，劉亞樓勉强坐起來和我們說了一會兒話。我

知道事情不妙，心情十分沉重，但這種情緒絶不能表露在臉上，祇好强顔歡笑，勸慰劉亞樓一定要安心養病，好好治療。但是一離開病房，我的眼泪就不禁奪眶而出。

不久，劉亞樓打電話到北京，要我到上海去一下。我以爲他有什麽重要事情，就立即坐飛機到了上海，趕到他的住所。没想我進了病房後劉亞樓告訴我，林彪的女兒林豆豆已經在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了，葉群的意見，想把她放到《空軍報》社當記者，想問一下我的意見。我當即表示，完全同意劉亞樓的意見。第二天，我就帶着林豆豆回到北京，把她安排在《空軍報》社當了記者。

到了五月初，我在北京接到翟雲英的電話，她告訴我，劉亞樓已經病危。接到電話後，我立即報告了羅瑞卿、楊成武，并馬上會同他們，以及空軍的幾個主要幹部和我的妻子陳綏圻，一同飛往上海。

到了上海，我們立即趕到劉亞樓的住所。我們到時，劉亞樓已經開始便血，神志也開始模糊，躺在床上起不來了，但他好像還是認出了羅瑞卿、楊成武、陳丕顯和我。這時的他，盡管已經説不出什麽話來了，可嘴裏却還是翻來覆去一直念叨着兩句話："毛主席重要，'一〇一'重要。"甚至到了第二天，他陷入肝昏迷并且一直昏迷不醒之後，可嘴裏翻來覆去就是兩句話："毛主席重要，'一〇一'重要……。""一〇一"是林彪在東北時的代號。我們這些林彪當年的老部下，後來也時常這樣稱呼他。

五月七日上午十點，一直在劉亞樓身邊不時爲他測量血壓和脉搏的兩個醫生，停止了工作，站起身來同翟雲英握了握手，然後又同我們守護在劉亞樓身邊的幾個人握了握手。這個握手，也就是宣告了劉亞樓的死亡。當時，我們不禁失聲痛哭，悲悼空軍失去了第一代杰出的領導人。劉亞樓逝世時才五十五歲，真是英年早逝！

我和劉亞樓在空軍共同工作了十五年，我們之間相互支持、相互諒解，彼此親密無間，無話不談。我在紅軍時期就在劉亞樓

的領導下工作，我對他始終懷有深深的敬意。他待我有如兄長，不光在工作上幫助我、支持我、鼓勵我放手去幹，而且也在生活上給予我很大的關心和照顧。每次我外出休假，如果需要妻子陳綏圻陪同，他必定親自給陳綏圻的工作單位打電話代爲請假。每次休息，總是約上我們全家一起活動。我爲失去這樣一位好領導、好兄長而萬分痛心！

劉亞樓同志雖然和我們永別了，但是他爲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爲人民空軍的建設，所付出的心血，所立下的功績，永遠留在了我的心間。

劉亞樓逝世時，林彪還在上海。劉亞樓遺體火化時，林彪派人參加了火化儀式。當劉亞樓的親屬、我以及空軍的幾個主要領導幹部，隨專機一起護送劉亞樓的骨灰返回北京時，林彪已先于我們回到了北京。

我們的飛機到達北京時，包括林彪、賀龍、聶榮臻、葉劍英等中央軍委領導，以及解放軍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主要負責人，一共二、三百人到西郊機場參加迎靈。劉亞樓的大兒子劉煜南、二兒子劉煜奮捧着劉亞樓的大幅遺照先下飛機，小兒子劉煜賓捧着骨灰盒緊隨其後。當劉亞樓的妻子翟雲英走下飛機後，在場的人都一一同她握手，表示哀悼。

隨後，我們把劉亞樓的骨灰，直接從機場送到了天安門西側中山公園的中山堂。把劉亞樓的骨灰放在中山堂，這算得上是種特殊的待遇了。因爲按照當時的規定，衹有黨和國家領導人，如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以上級別領導人不幸逝世時，才能使用中山堂。劉亞樓當時衹是國防部副部長、空軍司令員，按理說不到享受這樣待遇的級別，但是中央卻決定給予他黨和國家領導人一樣的待遇。這樣特殊的舉動，也充分說明了黨中央、毛澤東以及林彪對劉亞樓的重視程度。

我記得當時中山堂裏的正面墻上，懸挂着劉亞樓的遺像，上面安放的骨灰盒上覆蓋着黨旗，由四名士兵持槍守衛着。靈堂

內，除了親屬以外，空軍直屬機關、駐京院校和部隊大校以上的幹部，也輪流值班守靈，每班十六人。對劉亞樓的悼念活動，整整持續了三天。每天從上午一直到下午，大約有十萬人輪流進入靈堂致哀。

開追悼會的那天，除了毛澤東以外，全部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到會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和所有的元帥、副總理，以及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和北京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幾乎全部到場，并一一在簽到簿上簽字。這樣隆重的追悼會，是少有的。順便提一句，這本簽到簿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簽名最全的一本，如果劉亞樓的親屬保存到現在，將是一本稀世之寶。

追悼會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主持，中央軍委秘書長、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致悼詞。悼詞是我主持起草的，最後報軍委羅瑞卿總長審查定稿的。追悼會後，靈車車隊由劉少奇和林彪護送，前往八寶山革命烈士陵園。靈車行進途中，沿途所有的軍人全部立正敬禮。這種場面，是很少見到的。

在劉亞樓患病和逝世期間，一向不輕易對人表達感情的林彪，表現出了异乎尋常的特殊關注：從一開始親自到上海去親自主持劉亞樓的治療工作，到親自去機場接劉亞樓的骨灰，最後親自向劉亞樓的遺像獻了一個花圈，又親自送劉亞樓到八寶山。這些事情表明，劉亞樓確實是林彪的一員寵將。

劉亞樓逝世以前，我曾經多次聽他講過，在黨中央決定送他去蘇聯學習的時候，林彪曾經向毛澤東詳細介紹過他的情況。于是，毛澤東把劉亞樓接到了自己的窑洞裏住了將近半個月。在這近半個月的時間裏，毛澤東系統地向他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從遷到中央蘇區以來，到遵義會議的一些情況。有時林彪也參加了毛澤東與劉亞樓的談話。林彪特別向他介紹了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以後所起到的正確領導作用，希望劉亞樓把這些情況記在腦子裏，到蘇聯以後匯報給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這說明，無論是毛澤東還是林彪，對劉亞樓都是非常器重的。

劉亞樓還告訴我，在他去蘇聯之前，林彪還專門給他寫了封信，鼓勵他好好學習。林彪在這封信裏表示，他同劉亞樓情同手足，生死與共。信的最後，署名是“共患難的朋友林彪”。

劉亞樓逝世後不久，還在上海時，林彪就同我談話，對我說：“劉亞樓同志逝世了，這對空軍工作是一個不可挽回的損失。我考慮要很快決定空軍司令的人選問題。劉亞樓在世的時候舉薦過你。根據劉亞樓同志的意見，現在我決定提議你改任空軍司令員，你可以自己選一個能同你合作的政治委員。”接着他又說：“我已經同楊成武說了，讓他先回北京，把我的意見向其他老帥匯報，徵求他們的意見，我回去以後要親自向毛主席匯報。”

我表示：“空軍這樣復雜，我怕搞不了，我還是當我的政委，是不是可以另選一個人來擔任司令員？”我還向他建議，是不是可以考慮如楊成武或者劉震這樣的人來擔任空軍司令員，我保證和他們能好好合作。

林彪說：“我已經下了决心，你就自己選一個政委吧。”我知道林彪的脾氣和性格，就不好再說什麼。想了一想，就向林彪提議說：“比較起來，還是余立金比較合適，他有點魄力，幹勁大，又是二方面軍的幹部。”林彪很快就答應說：“那好，就是余立金當政委。”

不久，由毛澤東主席親自簽署了中央軍委的命令，由我接替劉亞樓任空軍司令員，由余立金接替我任空軍政委。

另外還有兩件事情，也想在這裏說一下。第一件事情，是劉亞樓逝世以後，我們在整理他的文件時，發現了林彪一九五四年二月初寫給劉亞樓的一封信。當時，在黨的七屆四中全會上，正在批判高崗、饒漱石。開會以前，高崗曾經拉過林彪，要林彪出來擔任國家部長會議主席（即國務院總理）。林彪當時住在杭州，他給在北京的劉亞樓寫信，要劉亞樓把他的意見轉告給高崗。林彪在信中說：“劉亞樓同志，我對高崗的意見，請你轉達。我不同意他的意見，并請他考慮。毛主席對我非常重視，非常信任，他的意見不妥。我不會考慮。”林彪的意見，劉亞樓向高崗轉達

了，但是信却没有還給林彪，他自己保存了起來。這件事情，在劉亞樓生前我曾經聽他提起過。所以我在發現這封信以後，當即就退還給了林彪。

第二件事情，是我們在清點劉亞樓的遺物時，還發現了羅瑞卿寫給劉亞樓的一個便函。函中對劉亞樓有一點批評的意思，大意是說，希望劉亞樓好好休息，不要太好勝，在空軍的事情上，可以放手一點的，就不要多管了。這封信，是在劉亞樓逝世以後，由劉亞樓的妻子翟雲英拿給我看的。她告訴我說，劉亞樓在看了羅瑞卿的這個便函以後很不滿意，說：“不相信我，請軍委派人來檢查好了！”不過，劉亞樓對羅瑞卿的這個不滿，從來没有在我面前表露過，但是在別人面前，如在林彪、葉群去看望他時，他對此是否有所表露，我就不知道了。

十五、對空軍工作的簡單回顧

從一九五〇年七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在空軍一共工作了二十一年。這二十一年裏，一九六五年以前的近十五年，空軍工作主要由劉亞樓負責，他是空軍司令員、黨委書記，我作爲空軍政委、黨委副書記，一直是他的助手。

劉亞樓在工作上十分好强，從不甘心落在人後。自主持空軍工作以來，他竭盡全力想把空軍的工作搞好，每天的工作都在十個小時以上。勤奮加上魄力和才華，再加上善于思考，他對空軍的建設和發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可以稱得上是新中國空軍的主要創建人。

總結劉亞樓對空軍的貢獻，概括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他根據中央、中央軍委的指示精神，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制定了“在陸軍基礎上建設空軍”的原則，一下子就爲空軍的建設鋪平了道路。第二、他强調部隊工作要政治挂帥，思想領先，政治

和技術相結合，高標準，嚴要求，辦事認真，有問必答等等。以後，他又把對空軍各項工作的總要求，歸納爲“高標準，嚴要求”這兩句話。他强調對空軍各項工作的總要求，就是高標準嚴要求，也就是要空軍全體同志永遠不要滿足現狀，工作要不斷前進，水平要不斷提高。第三、他在幾乎是基本上脱離了空軍的日常工作的情况下，運用他在蘇聯正規軍事學院學到的知識，以及在蘇聯紅軍服役過程中的經驗，結合在創建和發展中國空軍中的實際情况以及所得到的寶貴經驗，組織了包括空軍副司令員劉震、副參謀長姚克佑等一班人，專門在杭州全力以赴地編寫出了空軍一整套工作條例、條令和教材，爲空軍的正規化建設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至于一九六五年前我自己在空軍的工作，簡單地説，也主要有三個方面。一、組織落實空軍黨委根據中央、中央軍委方針、指示，所制定的措施、决策，負責空軍的政治工作。劉亞樓由于身體不好，大部分時間祇能處理一些大的問題，具體的工作就由我來承辦。比如空軍歷次黨代會、歷屆空軍黨委會的召開，在確定會議的指導思想和主要内容後，會議文件的制定等各項具體準備工作，以及會議結束後的傳達、貫徹、檢查和落實，就都由我來負責實施。

二、負責處理空軍的日常工作。空軍日常工作經常由我負責。雖然空軍工作中的重大問題，是在常委辦公會議討論决定後，按照常委的分工各自辦理的，但總的檢查、落實工作，是由我來負責的。另外，空軍貫徹落實中央、中央軍委的一些文件、指示，也大都由我來組織研究和落實。我還曾經多次下部隊基層蹲點，也曾經下連隊當過兵。

三、是做好團結工作，特别是抓好空軍黨委一班人的團結。劉亞樓工作能力比較强，但有時工作方法和態度過于簡單粗暴，不尊重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同級幹部及上下級之間的關系。當時，凡是有類似的問題出現，我一方面要維護他的威信，另一方面，也要對他進行規勸和批評，同時還要注意做好其他同志的

工作，以緩和與解决矛盾。總的看來，空軍黨委一班人是團結的，内外、上下的關系也是融洽的。有了這樣的基礎，就使得我們黨委一班人，能領導全體空軍按照中央、中央軍委的部署開展工作，取得比較大的成績。

當然，空軍當時的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點和錯誤，如形式主義、教條主義、要求過高、作風簡單粗暴等。比如説，在空軍機關大院搞衛生的過程中，檢查人員戴着白手套到處去摸，手套上沾一點塵土都不行。現在回過頭來看，這種形式主義，未免太過了。

我没有權利來全面評價空軍的工作，也不可能在這裏全面評價空軍的工作，因爲我手頭没有任何資料，祇能就回憶所及、參考我出獄後看到的一些書報雜志，寫下這麼一點“點滴資料”，供後人評論空軍當時工作做參考，希望後人能公正地評價歷史！

第十章 "文革"的前奏

一、廬山鬥争彭德懷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避暑勝地廬山召開擴大會議，主要内容是總結經驗，繼續糾正經濟建設中的一些錯誤。會議期間，彭德懷于七月十四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一九五八年以來産生的一些"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見和看法。誰也没想到，這封信引發了一場政治大風暴。

在建國後的國家經濟建設中，毛澤東的領導和決策，已經不再像戰争年代那樣得心應手了，他在經濟建設上出現的一些嚴重失誤，導致了黨内一些不同意見産生。他没有去很好地檢查自己的失誤，反而對一些提出不同意見的、曾經生死與共過的戰友産生了一些疑慮。特别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以後，這種疑慮更是有所增長，以至于他先後幾次告誡人們：要警惕像赫魯曉夫一樣的人物睡在我們身旁。

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以及黄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幾個人，對經濟建設方針提出不同意見，毛澤東就感到有些人不那麼聽話了，需要采取點措施來樹立個人威信。他親自領導開展了批判"彭德懷、黄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彭德懷和他的幾個戰友，轉眼之

們就成了一批犧牲品。

八月十六日，全會通過了《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爲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决議》，解除了彭德懷的國防部長、黄克誠的總參謀長、張聞天的外交部副部長、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祇是分别保留了他們在黨内的職務，而這些職務僅僅是挂個名而已，他們已經没有什麽實權了。

毛澤東還于八届八中全會閉幕的當天，作了一個題爲《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的批示。他説："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争，是一場階級鬥争，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産階級與無産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争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争，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二十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争才會止息。"毛澤東的這個批示，爲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論基礎。

全會結束以後，毛澤東在廬山上又主持召開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决定任命林彪爲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以接替彭德懷的工作。之後，林彪推薦羅瑞卿爲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以接替黄克誠的工作，會議也同意了這個提議。

在這裏我要附帶説明一下，林彪接任國防部長，這個職務并不重要，國防部長這個職務祇是挂一個名，實際上軍隊的整個工作都是中央軍委在管。彭德懷那時不但是國防部長，同時是軍委第一副主席。如果祇是國防部長，而没有軍委副主席或第一副主席這個職務，國防部長也就成了一個擺設。林彪同時接任了軍委第一副主席，這樣他才能全面主持軍委工作，指揮整個解放軍，這才是主要的。

對廬山會議的具體情况，我起初是一無所知。當時在空軍，祇有一個中央委員和一個候補中央委員。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是八届中央委員，副司令員劉震是八届候補中央委員。他們兩個上山參加了後來召開的八届八中會會。

廬山會議前，空軍黨委决定我和副司令員王秉璋共同去大連休假。八月十六日晚上，我突然接到劉亞樓從廬山打來的一個電

話。就在這個電話中，他給我傳達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彭德懷在廬山發生了問題。

劉亞樓告訴我，彭德懷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綫"的代表，在廬山會議上對黨中央、毛主席發起了攻擊。毛主席已經决定要林彪出任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接替彭德懷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林彪還提議要羅瑞卿當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説到這裏，劉亞樓興奮地説："這是一個好消息！"

他還告訴我，雖然由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但由于林彪身體不好，工作起來很勉强，祇能在原則上進行主持，許多具體工作不能親自參與，必須要找别人來代替他做一些日常性的工作，因此林彪選擇了羅瑞卿。是林彪親自提出，要羅瑞卿來出任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的。林彪選擇羅瑞卿，不僅因爲他有才幹，而且因爲他身體好，能組織實施許多具體的工作。

從電話裏聽得出來，劉亞樓當時非常高興。劉亞樓當時爲什麽這樣高興呢？我想主要是因爲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劉亞樓和彭德懷的關系不那麽好；第二是劉亞樓和林彪、羅瑞卿的關系非常好。

説到劉亞樓和彭德懷的關系，這裏我説一件事情。在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時候，一九五五年，空軍後勤部的一個助理員丢了一個工作筆記本，在這個筆記本裏記録了空軍後勤部一部分"五年計劃"。這個筆記本丢了以後，空軍黨委專門開會作了討論和研究，并進行了認真的追查。同時，我們也老老實實地報告了軍委和總參謀部。没想到，就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幾次三番地受到主持軍委工作的彭德懷的責難。彭德懷説："這還得了，丢了'五年計劃'，就是泄露了國家機密，一定要追查到底。"這一查，不但追查了劉亞樓，還追查了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

在這之後不久，我陪同彭德懷去東北檢查空軍部隊的工作，準備先到丹東志願軍空軍指揮所駐地去看看。我過去從來没有陪同過彭德懷，這是第一次。開始的一路上，彭德懷要我同他下象棋，大家説説笑笑，一直都很好。車到沈陽東站時，因火車頭加

煤上水需要一個多小時，他還動員我到市裏去看看，對我非常關心。可沒想到，車到丹東的那天早上，彭德懷突然翻了臉，就在車廂裏指着我的鼻子大駡："你們空軍丟了那麼一個重要的本子，根本不在乎，到現在還没有找到，把國家的機密都泄露光了，你們怎麼一點都不感覺到痛心。"駡了一通後，他又氣哼哼地説，要撤劉亞樓的職，空軍司令應該讓劉善本來當，劉善本是個内行。這是我頭一次領教他的脾氣，還真有點嚇人。

不知道彭德懷當時因何故對劉亞樓不滿。當然，他當時説要撤劉亞樓的職，衹不過是借機發發脾氣而已。實際上，要想撤掉劉亞樓的職務，并不是一件簡單和容易的事，更不是彭德懷一個人所能決定的。

劉亞樓知道這件事情以後，情緒很不好。他當時身體不好，于是就要求去休養，差不多前後休息了一年。

因爲羅瑞卿是公安部長，這個丟筆記本子的事情，後來也牽涉到了他。在一次軍委會議上，彭德懷當着我們的面大駡羅瑞卿："空軍丟了這麼一個重要的本子，你這個公安部長爲什麼不去追查？爲什麼要袒護空軍？你不破這個案，我拿你是問！"接着，他又駡劉亞樓和我。

其實彭德懷也是小題大作，真正的原因不在這個本子上。一個公安部長應該破的案子比這個多着呢。彭德懷之所以如此，實際上可能是因爲他在歷史上和羅、劉有些恩怨。關于這一點，我在後面還要談到。

爲了丟筆記本子的事情，我兩次挨駡，實在是有些想不通，于是就跑到我的老領導、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那裏去訴苦。我跟他説："彭老總怎麼那麼厲害呀！爲了一個本子，要撤這個，要撤那個，把羅部長也牽進去了。"羅榮桓聽了我的話，衹是叫我不要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這之後不久，彭德懷在毛澤東那裏開會，向毛主席匯報軍隊的工作。由于劉亞樓還在休養，我去參加了這個會議。没想到會開到最後，當着毛澤東的面，彭德懷又説起空軍丟了本子的問

題。他還説："我這個人是高山上倒馬桶，臭名遠揚。但是我主持軍委工作，一定要公事公辦，對什麼問題都要一查到底。"當時弄得我十分緊張。

那個筆記本到最後還是没有找到。筆記本究竟丟在了哪裏，又對國家造成了多大的損害，到現在還是一個謎。

坦白地説，因爲這個本子的事，當時我對彭德懷的印象是不太好的。後來在劉亞樓休養期間，空軍的工作暫時由我主持，有關空軍的問題也就由我直接向彭德懷匯報和請示。另外，彭德懷在這段時間裏，也有幾次來空軍參加過我們的會議。這樣，時間一長，慢慢的我的看法就有了一些改變。我認爲，彭德懷秉性剛直，炮筒子脾氣，好訓人、駡人，有話就説，憋不住。但是真正辦起事情來，對部下還是很關心的。

與此相反，劉亞樓同林彪及羅瑞卿的關系一直都很好。據我所知，劉亞樓與林、羅二人的關系，是從紅軍時期開始的。大革命失敗後，羅瑞卿被派到閩西去開展武裝鬥争，從而認識了閩西人劉亞樓。閩西暴動以後，羅瑞卿成爲閩西紅軍的領導人之一，劉亞樓則在閩西紅軍中初露鋒芒。一九二九年七月，閩西紅軍被編爲主力紅軍紅四軍的第四縱隊。一年以後，林彪接替朱德擔任紅四軍軍長，從此羅、劉二人便開始在林彪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并先後分任十一師和十二師政委。一九三一年，羅瑞卿在林彪任軍團長的紅一軍團任政治保衛局長。那時的保衛局在建制上是和軍團司令部、政治部并行的。因此，羅瑞卿當時也是紅一軍團的領導人之一。一直到長征結束，林彪和羅瑞卿的關系是非常好的。他們天天在一起，行軍騎馬，走在一起，住在一起。

那時軍團下面的建制就是師，劉亞樓先在紅一軍團二師當政委，後來又在一師當師長。紅軍到了陝北以後，劉亞樓又回到二師當了師長。隨後，林彪、羅瑞卿、劉亞樓一起到了延安，進了紅軍大學。紅軍大學改爲抗日軍政大學後，林彪任校長，羅瑞卿任教育長，又抽調劉亞樓任訓練部長，專管軍事訓練。當時，林、羅、劉三個人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

抗日戰爭開始以後，劉亞樓被派往蘇聯學習并治病。不久，林彪也因爲負傷去蘇聯治療和休養。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林彪被毛澤東派到東北，擔任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此時的劉亞樓，正作爲蘇聯紅軍的一名少校軍官，在蘇聯紅軍遠東方面軍司令部任情報處處長。日本投降後，劉亞樓隨蘇軍來到了大連，并堅决要求回中國工作。不久，經過林彪的提議，劉亞樓出任東北民主聯軍參謀長，成爲林彪的得力助手。

一九四八年十月東北解放後，在平、津戰役中東北的第四野戰軍和華北野戰軍并肩戰鬥共同完成平、津戰役的重大任務。在戰役進行過程中，林彪、劉亞樓和當時任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兼二兵團政委的羅瑞卿，在共同的作戰中更加深了彼此之間的情誼。

建國以後，林彪、羅瑞卿、劉亞樓三人雖然不在一起工作，但却經常見面，關系依然如故。所以，林彪接替彭德懷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以後，羅瑞卿自然成爲了林彪的助手。正如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以後，就把總參謀長粟裕撤掉，而讓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黄克誠來當總參謀長一樣。毛澤東説過："黨外有黨，黨内有派，歷來如此。"這話一點没錯。

關于粟裕被撤職這件事，我認爲彭德懷的作法是欠妥當的。紅軍時期，彭德懷一直是紅一方面軍三軍團的主要領導人。黄克誠也是紅三軍團的，是彭德懷的老部下，兩人的關系一直都不錯。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以後，爲了用起來順手，就必然要把黄克誠調來當總參謀長。本來，當時的總參謀長粟裕，也是我們軍隊中一位非常有名的戰將，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軍事人才。林彪這個人自視甚高，但他却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視粟裕的意見和建議。然而彭德懷不光一下子把粟裕撤掉了，還給他戴上了好幾頂政治上的大"帽子"。這幾頂大"帽子"一壓就是好幾十年，最後在粟裕逝世時也没能完全拿下來，以至成了他的一件終身憾事。

對黄克誠本人，我是很敬重的。他是一個堅强的共産黨員，在抗日時期，我一直在黄克誠的領導下工作。我認爲，黄克誠是位好領導，好老師，尤其在個人品格方面，是我學習的榜樣。對于他的一生，我們黨中央已經在對黄克誠同志的悼詞中作了公正的評價，我認爲他是當之無愧的，願他的在天之靈，能原諒我在他生前曾對他有過的不敬。

對彭德懷也是一樣，我對彭德懷也一向都是相當敬重的。在彭德懷的問題徹底平反之後，我們黨對他一生的功績也作了公正的評價，這些我都基本同意。但是，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我也認爲，彭德懷的"山頭主義"也確實是存在的。不承認這一點，也就無法理解他撤换粟裕總長的理由以及有關空軍的一些事情。

二、軍委擴大會議批鬥彭德懷和黄克誠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晚上，我接到劉亞樓從廬山上打來的電話，得知了廬山上發生的重大事件。第二天一早，就接到北京的電話通知，要我和王秉璋立即返回北京，參加軍委擴大會議。接到這個通知，我同王秉璋當天下午就乘飛機返回了北京。我還記得，那天下午北京下了一場大雨，飛機在南苑機場降落以後，我們在坐車回家的路上，看見到處都積滿了水。這場雨整整下了兩天，一直下到了八月十八日。

我們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也就是八月十八日的下午，賀龍、劉伯承與彭德懷、黄克誠同坐一架飛機，從江西九江返回北京。把賀龍與彭、黄二人放在同一架飛機上的安排是周恩來决定的，實際上是一種監視。

那天，按照空軍黨委的規定，我正在機場指揮所值班。賀龍、彭德懷等人乘坐的飛機從九江機場起飛後，飛到濟南上空時，因爲北京正下大雨，飛機不能降落。于是，根據當時的氣象預報，我要求賀龍等人的飛機在濟南機場降落，暫住一晚。八月十九

日，飛機才從濟南起飛回到了北京。得知飛機從濟南起飛後，我隨即去南苑機場迎接他們。

我剛到機場，飛機就降落了。機場上，除了我及賀龍等四個人的司機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人來接機。第一個走下飛機的是賀龍，他和平常一樣面帶笑容。第二個是劉伯承，也是神態祥和。第三個是彭德懷，他的臉色陰沉，很難看。第四個是黄克誠，也是面無表情。我走上前去，向他們一一敬禮。他們分别和我握了握手，但誰都没有跟我説一句話，上了汽車就走了。我本是黄克誠的老部下，和他非常熟悉，但這個時候他也没跟我説話。我看到黄克誠的那種樣子，感到情况不好，心裏非常難過。我不知道在廬山上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然而在這種場合下，我不好問，也不敢問。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軍委擴大會議正式開始，會場設在中南海懷仁堂，毛澤東没有到會，但以劉少奇爲首，朱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粟裕、陳賡、譚政、蕭勁光、張雲逸、羅瑞卿、王樹聲、許光達等都到了會。除了將要被批判的彭德懷、黄克誠和患病的徐海東以外，所有的元帥和大將都在主席臺上就坐。參加這次會議的，有駐京各部隊、各軍事機關、各軍事院校和京外部隊選派的一千零六十一名師以上幹部，以及五百餘名有關列席人員。這麽多人擠在一起開會，把整個懷仁堂擠得滿滿的。

會議由林彪主持。我記得好像是羅瑞卿先傳達了廬山會議的精神，但傳達得很簡單，連彭德懷七月十四日給毛澤東的信都没有全部照念。彭德懷的這封信一直没有公布，也没有在會上印發。會議上什麽文件都没有，衹是聽羅瑞卿傳達説，廬山會議出了一個“反黨集團”，并且點了彭德懷、黄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的名字，説他們四個人組成了一個“反黨集團”和“軍事俱樂部”，猖狂向黨中央和毛澤東進攻，是“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

接着是劉少奇講話。他説，彭德懷對當前形勢的估計，是一種“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這是彭德懷犯錯誤的思想基礎。從

政治上説，彭德懷有個人野心，想奪權。

再下來是陳毅講話。他説：“彭德懷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在廬山公開跳出來反對毛主席，應當徹底批判。”他還説：“林彪這個人在井岡山時我就知道，有一次他在朱沙衝，一下打了一個殲滅戰，把進攻的敵人消滅了。以後到紅四軍、一軍團，都打了很多勝仗。我一直很崇敬林彪同志，所以由他來主持軍委工作，我們是完全可以信任的。”然後，主席臺上的其他人一個接着一個發言，其内容都是批判彭德懷，并表態擁護林彪出來主持軍委工作。

林彪在最後講了話，主要是號召大家繼續批判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的錯誤。在林彪的講話中，還講到了一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林彪説：“彭德懷這個人有野心。他以前的名字叫彭得華，就是説，他要得整個中華。”

會議到了最後，羅瑞卿宣布，將所有到會的師以上幹部，劃分爲兩個大組，分别在兩個地方揭發批判彭德懷和黄克誠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還宣布，了解彭德懷的人參加鬥彭德懷的那個組，了解黄克誠的人參加鬥黄克誠的那個組。這樣，劉亞樓和王秉璋被分配到了鬥彭德懷的那個組，我和劉震則被分配到了鬥黄克誠的那個組。

會議一直開了半個月，天天鬥，天天揭發。對鬥争彭德懷的情况，我不完全清楚。前幾年看到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彭德懷自述》，在這本書中，對當時的鬥争情况有這麽一段描述，我認爲是如實反映了當時歷史面貌的。

彭德懷在《自述》中説：

在會議發展過程中，我采取了要什麽就給什麽的態度，我就是持這種態度，趕回北京來作檢討的。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些不合事實的誇大檢討。唯有所謂“軍事俱樂部”的問題，我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對于這個問題，在廬山會議期間，就有追逼的現象。特别是以後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期間，這種現象

尤爲嚴重。不供出所謂"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目的、名單，就給加上不老實、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檢討時，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號："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騙我們了"，逼得我當時氣極了。我説："開除我的黨籍，拿我去槍斃了吧。你們哪一個是'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就自己來報名吧。"有幾個同志就説我太頑固，太不嚴肅。

在我們那個鬥争黄克誠的那個大組會議上，大家出于對毛澤東的無比信任，也是鬥得非常起勁。這個大組裏，是蘇振華、劉震在主席臺上主持會議。有些人在臺上大喊大叫，非常積極，真有點像以後紅衛兵的那種勁頭。我想當時出的會議簡報，是會真實地記載下一些人的歷史形象的。

批鬥黄克誠的過程中，一開始我没有發言，後來有的人看我不發言，就對我説："你跟他在一起工作了那麽長的時間，了解他的事情不少，怎麽不講啊？"我一看，大家都在積極發言批判，我如果什麽話也不説，肯定是過不去的。于是，我就説了關于他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説黄克誠打仗有點往"右"偏，有點保守。由于他的這一指導思想，抗日戰争時期新四軍三師在蘇北有些仗打得就不是太好。到東北後，他又認爲没有前途，一定要在平原地區建立根據地。

第二件事，是説黄克誠有"本位主義"思想。這件事説的是，他把新四軍三師的一些剩餘的黄金，走到哪裏帶到哪裏。他先把"小金庫"帶到東北，繼而又帶到天津，最後竟帶到湖南去了。

第三件事，是説黄克誠一件任用自己侄子的事。我們在蘇北的時候，黄克誠有一個侄子叫黄楚三，原在國民黨軍李明安的部隊裏當情報科長。來到三師後不久，就由黄克誠和洪學智介紹，在齊齊哈爾入了黨。入黨後，就當了師特務團的參謀長。我認爲，黄楚三的職務提升得太快了，不妥當。

那次會議上，我對黄克誠就揭發了這三件事。對廬山上的黄

克誠的所謂錯誤，我一句也没有説。不過，受到當時會場氣氛的影響，説到最後，我也對黄克誠拍了桌子。

我當時想，這幾個問題都是一些鷄毛蒜皮的小事情，揭發出來，既能讓我安全過關，也不會對黄克誠有什麽大的損害。我萬萬没有想到，我所説的第二個問題，竟然被人利用，成了一件讓黄克誠十分痛心的事情。

一九九四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克誠自述》中，有關于這件事的兩段文字，現抄録如下：

鬥争會上對我的揭發中最聳人聽聞的是莫須有的"黄金"問題。提出此事的是空軍的吳法憲。這一來又像是爆發了一顆炸彈，會上一片嘩然。我一向被認爲是清廉、克己的人，忽然間似乎成了大貪污犯，人們感到意外。但了解我的同志都不信。

所謂"黄金問題"，是指新四軍三師奉令從蘇北開到東北時所帶的一部分經費。當時數萬大軍千里出動，當然不能不帶錢。但當地的抗幣衹能在本地使用，一離開根據地就不能用了。三師在蘇北根據地經營了好幾年，經濟情况較好，大軍出動時，除换了些法幣外，還設法换了些黄金，以備緊急情况下使用。由于用得節省，一直到東北根據地建立、部隊改編時，師部所帶的金子還有一些剩餘。我取得組織同意，將這一部分經費，帶到西滿軍區。東北解放後我出任天津市軍管會主任及市委書記。那時這剩餘的黄金，仍在負責保管它的翁徐文之手。翁問我怎麼辦？我當時已知將到湖南任省委書記。湖南的烈士很多，從前是老革命地區，現在又是新解放區。我一向多考慮困難，怕有特殊需要，就讓翁徐文請示并取得李富春批準，把這筆錢又帶到湖南。到湖南後，開始還用過少許救濟軍屬、烈屬。但省的經濟情况較快好轉，問題均能解决，這筆錢就用不着了。于是我讓翁徐文將這筆錢上交給湖南省財政部門。這筆款項由始至終，均由翁徐文經管。我雖有批用權，但從没有直接經手過。

當時我的確没有想到，我在會上説的這個"本位主義"問題，

竟然在那種場合下被人曲解爲黃克誠有貪污行爲，并導致了羅瑞卿等人以後對這一問題的調查。雖然以後的調查證明，黃克誠在這個問題上没有任何徇私的問題，但對于一向注重自己廉潔名聲的黃克誠來説，這件事情已經對他造成了較大的傷害。因此，這些年來，我每當回想起這件事，總是感到深深的痛心和内疚。

不過話又説回來，直到現在我也仍然認爲，我在批鬥黃克誠會上所説的三個問題，除了在第一個問題上因受到當初華中局不正確看法的影響，對他有所誤解，説得不對之外，其它兩個問題，包括這個所謂的“黃金問題”，都没有什麽大的差錯。就拿這個“黃金問題”來説，他的這種行爲，的確有些值得商榷。部隊已經整編，就應該把剩餘的黃金交由上級部門去處理。可他不僅没有及時將這些黃金交給上級部門，反而將這些黃金帶到西滿，帶到天津，帶到湖南。不管他當時是怎麽考慮的，我還是認爲，他這樣的做法，多少都有一點“本位主義”的味道。

毋庸置疑，黃克誠是一位黨性强、作風正派、堅持原則、廉潔奉公和敢于堅持自己意見的好同志，也一直是我尊敬和感謝的人。抗日戰爭時期，我很長時間都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對他是有一定了解的。我認爲，黃克誠是一位好領導、好老師，是一個堅强的共産黨員，在他的身上，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尤其在個人品格方面，他更是我學習的榜樣。關于他的一生，中央已經在他的悼詞中作了評價，我認爲這些評價是當之無愧的。但話又説回來，在這個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點缺點也没有，黃克誠也一樣。所以，一些小小的缺點，絲毫不會影響黃克誠的形象。

當然我必須承認，我當時在會上的“揭發”，不論我自己是出于什麽樣的用心，事實上都給黃克誠帶來了較大的傷害，使他蒙受了不應有的屈辱。在此，我再一次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願他的在天之靈，能原諒我在他生前曾對他有過的不敬。

就這樣，鬥爭黃克誠的會議，開了五、六天後，大家該説的也差不多都説完了，就没有什麽人發言了。就在這時，羅瑞卿突

然來到批鬥黃克誠的會場。他一來就直接站到主席臺前，厲聲責問道：“黃克誠，你在三軍團時就造我的謠，説我在長征後期，在三軍團當政治部主任的時候，殺了三軍團的一些人。我殺了什麽人呢？你的根據是什麽？”

聽了羅瑞卿的責問，黃克誠很快就回答：“不錯，是我講的，是鐘偉告訴我的。他現在也在會場上，你可以問他。”羅瑞卿當場指名，要鐘偉出來作證。鐘偉馬上站起來説：“是的，有這回事。三軍團從哈達鋪編隊出來，隊伍很疲勞，減員大，掉隊多。到最後，有的人實在走不動了，我們又没有條件把他們抬走，你怕他們被追上來的國民黨軍隊抓去受折磨，就下令打死了好幾個。這是我親眼所見，後來也是我告訴黃克誠的。”

羅瑞卿説的這件事，是長征後期的事。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央紅軍于哈達鋪改編以後，毛澤東派當時任紅軍北上先遣支隊（陝甘支隊）政治保衛局長的羅瑞卿，到由紅三軍團改編的第二縱隊兼任政治部主任，又將劉亞樓調到第二縱隊任副司令員。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雖然同屬紅一方面軍，而且經常在一起配合作戰，但我們紅一軍團長期在毛澤東、朱德和林彪的直接領導之下，軍政訓練、作風紀律甚至作息時間等各方面都抓得很嚴，而由彭德懷指揮的紅三軍團在這些方面則與我們有些差距。因此，當羅瑞卿和劉亞樓兩人到了第二縱隊，并且用紅一軍團的管理方式來管理第二縱隊以後，曾引起一些幹部、戰士不滿。于是有的人就通過各種途徑反映到了彭德懷那裏，因而引起了彭德懷對羅、劉二人這種行爲的猜疑，認爲這可能是在消除他在紅三軍團的影響。

羅瑞卿之所以對這件事始終耿耿于懷，就是因爲當初鐘偉把這事告訴黃克誠以後，黃克誠又告訴了彭德懷。彭德懷本來就對羅瑞卿和劉亞樓在紅三軍團搞整頓不高興，知道了這件事後，更是非常生氣，不但借機把羅瑞卿狠狠地痛罵了一頓，還將這事告到了毛澤東那裏。也正因這些事，彭德懷也同羅瑞卿及劉亞樓結上了怨。造成了彭德懷對羅、劉二人的長期不滿和隔閡，這才有

了以後他主持軍委工作期間的一些事情。

說實在的，我當時真的很佩服鐘偉的這份坦誠和勇氣。其實，鐘偉講的這件事情，我也知道。那還在抗日戰争時期，在蘇北根據地，黄克誠在一次和我閑談中，就説起過。處于當時的壓力，很少有人有鐘偉這樣的勇氣來爲黄克誠辯解。當然，在那個年代，講真話往往是要付出代價的。這之後，鐘偉就被解除了北京軍區參謀長職務，發配到安徽省去當農業廳副廳長去了。

我雖然當時没有起來爲黄克誠辯護，但我内心裏對羅瑞卿的話很不以爲然。那都是幾十年以前的事情，現在又搬出來，和廬山會議又没有什麽聯系，這種算老賬的作法，没有多大意義。

會議就這麽亂哄哄的鬥了黄克誠半個多月。以後不知怎麽回事，鬥着鬥着又把鄧華也扯了進來。鄧華也跟我一樣，是紅一軍團的幹部，以後又在四野工作，本來與彭德懷没有什麽直接的關系。一九五〇年夏，爲了籌組入朝作戰部隊，根據林彪的提議，把四野十五兵團部與十三兵團部對换，由本任十五兵團司令員的鄧華轉任十三兵團司令員，率十三兵團赴朝參加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戰争期間，鄧華先後出任志願軍副司令員、第一副司令員兼第一副政委、代司令員兼代政委。朝鮮戰争期間，鄧華與時任志願軍司令員兼政委的彭德懷關系較好。也許就因爲這個原因，他才被扯進了所謂的“軍事俱樂部”裏。

由于我與鄧華的關系，我又被叫去批判鄧華。紅軍時期，我在鄧華的直接領導下工作過兩年多。解放戰争時期，又在一起工作有半年左右。在我南下打獵負傷時，他還曾對我悉心照料過。但大部分時間，我們可以説是各處一方。這次，我雖然參加了會議，但確實是没有什麽意見可提。後來有人揭發説，鄧華在沈陽軍區任副司令員的時候，曾主張組織野戰軍的機動兵團，主管全國性的機動作戰，以此證明鄧華有野心。我對這件事情作了説明，説鄧華的確提出過這個建議，我當時也參加了討論，但我認爲這衹是正常的問題討論。

現在看來，當時的揭發，不少都像這件事情一樣，完全是牽

强附會，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從這麽多年的黨内鬥争歷史看，鬥人的和挨鬥的，不過是一種角色的轉换。今天鬥人的，明天也可以變成挨鬥的。十年動亂年代更是如此！

後來，又要我去鬥洪學智。洪學智爲什麽挨鬥我同樣也不大清楚，大概也是因爲在志願軍任過副司令員，才被認爲與彭德懷關系密切而挨鬥的。我與洪學智在一起工作多年，對他也有相當的了解，不認爲他有什麽值得批判的地方。所以，在批鬥洪學智的會場上，我一言未發，在會上坐了一個下午，我就離開了。

九月九日，軍委擴大會議在懷仁堂舉行全體會議，聽取劉少奇作報告。在講話中，劉少奇首先表示支持這次軍委擴大會議，并且代表中央表揚這次會議開得很好、很成功。接着，他作了題爲《無産階級革命家對待群衆運動的態度問題和所謂“個人崇拜”問題》的報告。他在報告中系統批判了彭德懷的“錯誤”，認爲清除“彭德懷反黨集團”是我們黨的一個很大的勝利。他還説，“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個人崇拜”，一種是錯誤的“個人崇拜”，我們要的就是“正確的個人崇拜”，反對“錯誤的個人崇拜”。

又過兩了天，九月十一日，軍委擴大會議再次在懷仁堂舉行全體會議。這次毛澤東親自到會，并發表了講話。他在講話中説，彭德懷等幾個人，“據我看，他們從來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他們衹是資産階級分子、投機分子混在我們黨内。”

接着是陳毅講話。他首先批判了彭德懷，并列舉了若干事例，説明彭德懷的一些意見是和毛澤東對立的。之後，他還檢討了自己在歷史上的一些問題，同時繼續宣傳林彪，再一次表示完全擁護林彪出來主持軍委工作，表揚林彪善于作戰，井崗山朱沙衝一仗打得非常英勇，對保衛井崗山起了一定的作用。

最後，由林彪講話。他在講話中説，這次會議傳達了廬山會議精神，揭發了“彭、黄反黨集團”的問題，基本肅清了彭、黄在軍隊中的影響，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今後，中國人民解放軍一

定要緊跟毛澤東，緊跟黨中央，大家團結一致，争取更大的勝利。接下來，他就在講話裏大力提倡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他說："我們軍隊離開了毛主席就不行。戰爭時期，所有的戰役都是毛主席親自和直接指揮的。我們對馬克思主義怎麽學呢？我向同志們提議，主要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捷徑。這不僅是因爲毛主席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而且也因爲我們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比較容易，學了以後馬上就可以用。"

林彪講完話，這次軍委擴大會議就結束了。會議結束後，我們回到空軍，開會布置傳達，將這次會議的精神，一層一層地往下傳。

以後所發生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對所謂"彭、黄反黨集團"的鬥争，可以說是一發不可收拾，一鬥再鬥，一直延續到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一直鬥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底，彭德懷含冤死去，才告結束。這時，我也已經入獄三年了。

從軍委擴大會議以後，我一直都没有見到過彭德懷和黄克誠。直到一九六七年初，才在一個批鬥會上見到他們一面。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初起階段，全國一片大亂，解放軍的駐京各總部和各軍、兵種機關，幾乎都被造反派衝垮，各項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頓狀態。各單位的黨委差不多都被"踢"開了，一切都由造反派說了算。

一天，總參的造反派頭頭把軍隊過去和當時一些"犯了錯誤"的領導人，都弄到了總後的大院，開萬人大會進行鬥争。我參加了這個會，看到被批鬥的人裏面有彭德懷、黄克誠，還有羅瑞卿。當時在主席臺上坐着的，有楊成武、蕭勁光和我等各總部，各軍、兵種的一些負責人。我坐在主席臺的側面，所以我看到了他們，但他們却看不到我。在這以後，我就再也没有見過他們。

現在，歷史已經證明彭德懷當時的意見是正確的。毛主席在勝利面前急于求成，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一度瞎指揮，導致了當時高指標、浮誇風、共産風的大泛濫。什麽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趕美。這些提法都是不符合實際的。這場"大躍進"，使

中國的經濟幾乎陷于崩潰，人民遭受了長達三年的空前大饑荒，上千萬的人在這場災難中死去。

廬山會議的另一個嚴重後果，就是八届八中全會後在全黨開展的反"右傾"鬥争，這次鬥争使得黨内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從而導致了"左"的偏差越來越嚴重，以至于後來發展成爲"文化大革命"。

從彭德懷開刀，把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賀龍、譚震林、鄧子恢等一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搞掉了，真是歷史上的慘痛教訓！

三、廬山會議後的新軍委

一九五九年十月，廬山會議後新組成的中央軍委，在北京三座門召開了第一次常委會議。毛澤東和朱德没有出席會議，但其他八位元帥：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全部到會。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負責人都列席了這個會議。我以空軍政委的身份也列席了這次會議。

會議一開始，林彪首先宣布："新的軍委已經組成。軍委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常委毛澤東、林彪、賀龍、聶榮臻、朱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羅瑞卿、譚政。新軍委實行集體領導，一切問題經過討論研究後，報毛主席審定。"接着，林彪正式宣布了軍委常委的分工：軍委日常工作由林彪、賀龍、聶榮臻三人負責，劉伯承主管軍事院校，葉劍英負責軍事訓練和科研，徐向前負責民兵工作，陳毅分管軍事外交，羅榮桓主管軍隊政治工作。

林彪在會上還說："我的身體不好，具體處理日常工作有困難，我就委托給羅瑞卿、蕭華和譚政他們。總而言之，具體的事情由他們管，需要的話我過問一下。重大問題要集體討論，最後

都要請示毛主席，由毛主席定。希望各位元帥、各位常委給予支持。”

林彪講完後，其他幾位元帥輪流發言，紛紛表態支持林彪的意見。陳毅還表示：“除了國務院的工作以外，一定積極參加軍委的工作。軍委開會，通知我，我必到。”

元帥們的講話，都表示出新軍委的團結一致。從一九四九年以來，我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多老帥在一起開會。聽到老帥們的講話和表態，劉亞樓和我都非常高興，覺得今後我們空軍的工作好做了。

果然，從這以後，空軍的工作更加受到了重視。應當說，空軍的工作一直都是很受重視的。剛剛組建空軍的時候，許多工作就是毛澤東親自抓的，連空軍的裝備，也是毛澤東親自過問；同蘇聯的談判，則是周恩來親自抓的。當時，空軍副司令員王秉璋主管這方面的工作，他曾經常到周恩來那裏去開會。不過，在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以後，空軍的工作就更加受重視了。

據我所知，廬山會議以後，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羅瑞卿去辦。軍委的工作，實際上是羅瑞卿在那裏具體主持。大大小小的事情，以及每次召開的各總部、各軍、兵種負責人的辦公會議，都是由羅瑞卿主持，另外還有蕭華在一旁協助。在當時，一些事情他們不點頭，就辦不通。林彪實際上没管多少事情，但他衹有一條，就是對毛主席完全畢恭畢敬。毛主席說東他決不說西，衹要是毛主席批了的，他一定劃圈，同意照辦。一直到後來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

但在羅瑞卿主持軍委具體工作以後，對有的老帥不够尊重。例如對葉劍英，他就不够尊重。葉劍英當時分管軍事訓練及科研工作，他所需要的經費，羅瑞卿就不那麼支持，因而産生了一些意見和矛盾。這件事情我曾聽葉帥說起過。

當然，對軍隊的工作，林彪并不是什麼都不管，他管得最多是一件事就是“突出政治”。一九六〇年九月初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林彪在會上講話指出：政治工作是很重要

的工作，正像毛澤東同志說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綫，是統帥，是靈魂，是一切工作的保證。做工作要靠黨的領導，靠政治工作，靠群衆路綫，靠人的覺悟。我們要求抓下面的思想，貫徹上面的思想。思想仗是很重要的戰鬥，不打好思想仗，其它仗就打不好。他還更進一步地强調：“這是我軍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個軍隊建設的方向。在新的歷史時期中，我們更應該緊緊掌握這個方向。”

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林彪提出了“四個第一”和“三八作風”。

林彪提出的“四個第一”，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而“三八作風”的基本內容，則是毛澤東當年爲抗日軍政大學題的“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林彪將這三句話、八個字概括起來，命名爲“三八作風”。和平時期的林彪，也仍然喜歡用一些簡潔的語言，來高度概括和表達一些新的思想或原則。這是他的習慣，也是他多年來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這樣，經他概括提出的“四個第一”和“三八作風”，就成爲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原則。

林彪認爲，要加强軍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就要搞“四個第一”，發揚“三八作風”，即發揚延安抗大的作風。這對于加强軍隊的紀律性，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發揚人民解放軍的光榮傳統，是非常必要的。他的這些意見，會後在全軍進行了傳達和學習，并由此掀起了部隊政治思想工作的一次高潮。

爲了更好地貫徹林彪加强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四日至十月二十日，中央軍委又在北京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專門討論軍隊政治工作的問題。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以及各大軍區的負責人，都參加了這次會議。主持這次會議的是羅瑞卿和蕭華，林彪自己很少到會。根據林彪的指示，這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是要起草、制定一個《關于加强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把“四個第一”、“三八作風”和“三大紀律，八項

注意”等軍隊政治工作的原則，用文件的形式固定下來。

爲了寫好這個決議，會議組織了一個決議起草小組，由當時的總政副主任梁必業、總政宣傳部長姜思毅、《解放軍報》社社長唐平鑄和我及其他幾個人組成。大家經商量決定，由梁必業帶領幾個人起草了一個稿子，同時由我帶着姜思毅、唐平鑄等負責起草另一個稿子，并要我在我們的稿子裏，加進空軍政治工作的一些經驗。

兩個稿子起草完畢後，羅瑞卿主持會議討論決定，兩個稿子一起用，在這兩個稿子的基礎上，形成了會議最後決議，即《關于加强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這個決議首先强調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提出一定要把毛澤東思想學到手。決議中有不少在後來廣爲流傳的“名句”，如“全軍指戰員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對毛主席的話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等。

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批準這一決議時指出：“決議不僅是軍隊建設和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針，而且它基本的精神，對于各級黨組織、政府以及學校、企業部門等等都是有用的。”于是，這個決議就成了全國各行各業共同的政治工作原則。

一九六一年春節前，軍委又在廣州新蓋的珠江賓館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總結新軍委成立一年多的工作。會議由林彪主持，除了朱德及彭德懷以外，其他八位元帥和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的負責人全部到會，算得上是軍隊的又一次盛會。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是會議的東道主，他對參加會議的代表非常熱情和關照，安排最好的地方給我們住，搞最好的東西給我們吃，最後還送給我們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和一套福建漆的烟具。

與會的幾位老帥都在會上發表了講話，他們一致認爲，新的軍委在林彪的主持下，取得很大的成績。林彪也在講話中表揚了羅瑞卿，説羅瑞卿在工作上積極肯幹，任勞任怨，自主持軍委的

日常工作以來，處理了日常事務八百多件，彭德懷、黃克誠時期積壓下來的問題，已經全部處理完畢。另外，他也表揚了蕭華。

這次軍委擴大會議一直開到春節過後才結束。由于我們是在會議期間過的春節，所以軍委領導決定，與會人員可以接自己的家屬來廣州，一起過春節。這個決定得到了大家熱烈的擁護。于是，大家紛紛接來了自己的家屬。劉亞樓要我派人把他和我的家屬子女一起接來，但我的妻子陳綏圻因爲工作忙離不開，劉亞樓的家屬就把我的兒子吴新潮帶了來。同我們一樣，我們的家屬也受到了最好的招待。

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以後，所做的最主要事情，就是吹捧毛澤東，强調學習毛澤東著作和宣傳毛澤東思想，强調要把政治工作擺在各項工作之上，要求以“四個第一”、“三八作風”的原則來全面建設部隊。爲此，他還在部隊中開展了創建“四好連隊”、争當“五好戰士”的運動。

林彪在軍隊中一手搞起來的這套東西，得到了毛澤東的充分肯定。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澤東在給軍委的一封信裏説：“四個第一這是個創造，解放軍的政治思想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以後，比較過去有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也更理論化了。”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又在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説：“四個第一好，我們以前也從未想到什麽四個第一，這是一個創造。誰説我們中國人没有發明創造呀，四個第一就是創造，就是發明。”“我們以前是靠解放軍的，以後仍然要靠解放軍。”從這裏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澤東對林彪大搞政治和大力樹立自己權威的舉動，是十分支持和贊賞的。由于得到毛澤東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提倡，當時對林彪搞的這一套，宣傳得不得了，也捧得不得了，并由此而形成了一個“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的高潮。

這裏，我想説幾句心裏話。林彪這個人肯動腦子，點子非常多。戰爭年代，他曾提出了不少這樣的條條。和平時期，他又提出了這一套一套的政治工作原則。我們不説這裏有多高的馬列主義水平，而且這裏形式主義的東西也肯定不少，但是我感到這些

東西很實用，很務實。説是“土政策”也可以。可是這些“土政策”對我們軍隊的工作和建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經歷了建國前後解放軍建設幾個歷史時期，比較而言，林彪主持軍委工作的一段時間裏，軍隊工作是最好的。從當時的物質生活和軍事裝備來説，肯定是比現在差得遠。但是當時的部隊，政治思想素質，精神面貌，却比現在要好得多。那時候部隊高度的集中統一，官兵一致，從而産生了高度的凝聚力。與此同時，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領導同心協力，團結在軍委領導的周圍，爲着共同的目標拼命工作，不計較個人得失。因此，當時的各項工作，包括政治思想，軍事訓練，國防戰備都是很有生氣，很有起色的。這一切也爲以後在“十年動亂”中人民解放軍經受得起考驗，成爲穩定全國的一支重要力量奠定了基礎。我認爲，當時的人民解放軍是很有戰鬥力的，這段歷史是不應該予以抹殺的。這一時期軍隊工作的成績，也不應該輕易予以否定。

四、“七千人大會”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了一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各地委、縣委和重要工礦企業黨委以及部隊的負責幹部，共七千餘人。因此，這次會議也叫作“七千人大會”。

“七千人大會”是在“大躍進”導致的“三年困難時期”還沒有結束的情況下召開的，這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對建國十二年以來的各項工作，特别是“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進行認真的總結，清理“左”的錯誤，以統一全黨的認識。同時，進一步作好國民經濟的“鞏固、充實、調整、提高”的工作，促進國民經濟的好轉。

大會的開始階段，主要是討論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大會報告稿。在這之前，主持“一綫”工作的劉少奇，曾親自帶人到農村蹲點，了解到了一些實際情況。然後，由劉少奇主持，吸收了一批幹部，包括中央分局，省委、地委、縣委的一些負責人參加，認真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草擬了這份供大會討論的書面報告稿。這個稿子，并沒有對許多真實情况進行全部揭露，没有説得那麼嚴重，對很多問題都留有一定的餘地，但大部分情况都講到了。特别是報告稿説，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失誤，是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主要原因。雖然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原因不祇一個，但“人禍”占了七分，“天災”祇占三分。報告稿同時還認爲，我們在工作上存在一種急躁的情緒，農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

毛主席看了這個稿子以後，在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召集了一個中央委員的擴大會議。到會的約有三、四百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以及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都到會了。作爲中央委員，劉亞樓也出席了這次會議。

劉亞樓回來後，告訴我説，會議上印發了劉少奇組織起草，并根據大會討論意見又一次修改了的書面報告稿。毛澤東叫大家先看看這個稿子，説看一看能不能發表，能不能用。在接下來的發言中，很少有人提出不同意見。當然，也有一些人提出异議。

但接着毛主席表態説：“從六一年十一月份以來，我們連續召開了兩個會議，前面開了一個人大，這次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人大的報告中，説全國形勢一片大好，一片光明。這次七千人的大會，却完全相反，來了個一片黑暗，没有前途。這樣我們怎麽向全國人民交代呢？”

這幾句話，一下子就震動了所有到會的人。接着他又説：“這個稿子祇看到一點現象，没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寫一個。重寫的稿子，中央不參加起草，中央分局的人也不參加起草，由下面的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大家來寫。”

毛澤東這樣一表態之後，大家又相繼發言，都表示完全同意

毛澤東的意見和提議。就這樣，毛澤東的提議得到了通過。這就當場給劉少奇一個下不了臺，因爲原來的稿子，是劉少奇主持起草的。他衹好來了一個不吭聲，一句話也没說。

毛澤東在這個會上的一番話，震動了大家。外邊的情况我不大清楚，但在我們軍隊内部開始了兩個措施。第一個是，林彪和一些元帥們，還有羅瑞卿、蕭華、譚政、劉亞樓等人都說要緊跟毛主席，不要跟着起哄。他們跟軍隊的幹部打招呼，要大家不要在會議上亂發言，因爲"大躍進"呀，大煉鋼鐵呀，軍隊都没有參加，與軍隊的關系不大，不存在什麽"出氣"的問題。他們還再三强調，軍隊幹部不要跟着地方幹部走，有話讓地方幹部去説好了。軍隊參加這次會議的，衹是軍以上幹部，人數本就不多，再加上軍隊内的"反右傾運動"剛剛告一段落，大家心有餘悸。因此，在聽了軍委領導打招呼以後，軍隊的幹部基本上没有什麽人在會議上發言。

第二個措施是，軍隊及地方的一些人，一直在林彪那裏"燒火"，鼓動林彪出來講話，以維護毛澤東的威信。據我所知，這些人中有陶鑄、羅瑞卿、劉亞樓等。林彪起初很猶豫，不願意出來講話。最後包括軍委的一些領導，也都來慫恿林彪出來講話。他們都説，現在别人出來講話都不適當，衹有林彪最具備這個條件。他們的理由是：從歷史關系上看，林彪是一向擁護毛澤東的；廬山會議以後，林彪又接替彭德懷主持了軍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在黨内、軍内威望很高。所以，不論是地位，還是威望，或是時機，衹有林彪這時候出來講話最適合。否則，就難以緩和形勢，維護局面。這一説，就把林彪鼓動出來了。林彪就説："那好，你們要我講，我就講。"經過幾天的考慮，林彪自己寫了一個提綱，準備在大會上發言。

這些情况，我是怎麽知道的呢？是劉亞樓告訴我的。我那時與林彪的關系不像劉亞樓那樣密切，在工作之外的問題上同林彪幾乎説不上話。而且，雖然我参加了這次"七千人大會"，但因不是主席團的成員，很多情况不知道。作爲一般的與會者，我基本上衹在那裏聽會，不發表任何意見。我知道的一些内部消息，都是劉亞樓告訴我的。林彪同意在大會上發言以後，劉亞樓很高興地告訴我説："林總願意出來講話了，我們都認爲衹有他出來講話最好。"

一月二十七日，劉少奇將經過修改後的報告稿正式提交給大會討論，同時又對這個書面報告作了補充説明。盡管修改後的報告稿已經没有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禍"等説法，但他在講話中仍然堅持説，他在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説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

在這種情况下，林彪于一月二十九日在大會上發表講話。那一天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并親自宣布，"請林彪同志講話"。林彪的講話很長，講了總有兩個小時，而且越講越有勁。

林彪講了些什麽呢？首先，他分析了國内外的形勢。林彪認爲，當前的形勢是一片光明。他在一開始就説："我們黨做了很多工作，取得的成績是偉大的。如果説有缺點的話，比較起來，是小得多，是次要的方面。"他還説，我們黨在近幾年内提出的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是現實生活中的反映。在國際上，中國目前威望很高，抗美援朝，打敗了美帝國主義。在國内，我們的國家經濟已經恢復，土改、"鎮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三反"、"五反"，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總之，當前的形勢是一片光明。當然，他在講話中也承認了當時存在的一些困難，不過他認爲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他認爲，造成當時困難的主要原因，是持續三年的自然灾害。

在林彪的講話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宣傳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他説："'大躍進'以來的錯誤，是由于什麽原因造成的呢？現在的困難，恰恰是由于我們許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都聽毛主席的話，那麽，困難就會小得多，彎路就會繞得小一些。毛主席的領導，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是正確的。在過去，當毛主席在中央領導革命戰爭的時候，我們的革命事業就勝利；當毛主席離開

中央領導的時候，我們的革命事業、革命戰爭就受到挫折，就失敗。這是過去歷史所證明的。”

他又説：“正確的東西是什麼呢？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優點是多方面的。我個人幾十年來的體會，他的最突出的優點是實事求是，他總是從實際出發，總是圍繞着實際，總是從調查研究出發，總是腳踏實地。毛主席對待事物和實際總是八九不離十。他總是在實際周圍，圍繞着實際。過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勝利的時候，正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思想受到尊重，不受到干擾的時候，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不受到尊重，受到干擾的時候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

聽了林彪的講話，毛澤東的興致可高了。在林彪講話時，他一直顯得神采奕奕。林彪一講完話，他就接着講話説：“林彪同志作了一個很好的發言。林彪同志經過調查研究、慎重考慮和分析，作了這樣一篇重要的講話，大家可以好好的研究、考慮。”然後，他建議延長原定的會期，號召大家“要真心實意地發揚民主”，把心裏的話通通講出來，有氣出氣，開一個出氣的會議。用他的話來説，就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乾一稀，皆大歡喜”。

緊接着第二天，毛澤東又在大會上發表了一個長達三個小時左右的講話。在這個講話中，他還作了“自我批評”，説：“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爲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他的“自我批評”，曾經在當時和後來感動了很多的人。

林彪和毛澤東的講話，果然一下子就把整個會議的氣氛都扭轉了過來。于是，“七千人大會”就進入了“出氣”的階段。當年，爲了“大躍進”，爲了大煉鋼鐵、“超英趕美”，各地的幹部都把老百姓家裏的鍋碗瓢盆，衹要是帶鐵的，都拿出來煉鋼；把一些大樹，甚至是上千年的大樹都砍了來煉鋼。結果鋼没有煉出來，農業被破壞了，工業被破壞了，生態環境被破壞了，整個經

濟也全都被破壞了。大煉鋼鐵的一個直接後果是，一些地方雖然是豐産，但是因爲缺乏壯勞力去及時收回來，造成田園荒蕪，糧食歉收。彭德懷所描述的“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婦，來年日子怎麼過”，就是當時中國各地的一個真實寫照。

糧食没能完全收回來，又加上當時毛澤東搞的農村共産主義化，一個村辦一個食堂，吃大鍋飯，吃飯不要錢。有了不要錢的飯，大家便到食堂裏放開肚子吃，吃不下還要硬撑。這樣一來，僅僅過了幾個月，食堂就難以爲繼了。由于村裏在辦食堂時，把老百姓家裏的糧食連同做飯的鍋都收走了，這一下不僅大鍋飯没得吃，連小鍋飯也吃不成了。就這樣，農民們没有糧食吃，就吃樹葉，吃野菜，吃草根，從而導致因營養不良而造成的浮腫病在全國範圍内蔓延，并且餓死了不少人。當時全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好像到現在也没有一個精確的統計。據我所知，僅導致河南省委書記吴芝圃下臺的著名的“信陽事件”，餓死的人就近百萬。當然，這衹是一個典型的事件，不可能每個地方都像信陽一樣。不過我相信，像信陽這樣餓死很多人的地方，在全國應該還有不少。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對此有責任還是没有責任的，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意見。但是，對着誰出氣呢？對縣委書記、省委書記、黨中央、毛澤東？誰敢呀！另外，到會的許多人，他們自己就是當事人、責任者。甚至可以説，參加“七千人大會”的絶大多數人，都在響應毛澤東“大躍進”的號召下，不同程度地説過一些錯話，辦過一些錯事。因此，一旦反映了客觀實際情況，就會反到自己的頭上。真要這樣，烏紗帽就戴不成了。再者，彭德懷在廬山被撤職，被批判，被定爲“反黨集團”，這記憶猶新的前車之鑒，使得許多人心裏有疑慮，想講又不敢講。有的剛講了一個開頭，就堅決要求不登簡報。實際上，在這樣的會議上是發揚不了民主的。不過，對林彪的講話，大家都表示了贊同和擁護。這樣一來，就把劉少奇搞的第一個報告，完全給推翻了。

以後，劉少奇帶着一批人重新修改大會書面報告，也不再説

造成當時的困難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改成“七分天災，三分失誤”，把成績和失誤比作是“七個指頭和三個指頭的關系”。修改後的報告對造成當時困難原因講了兩條：一是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還不够；二是由于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够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衆路綫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第二個稿子寫成以後，劉少奇又于二月八日提交給大會，并在大會上作了説明，表示要將毛澤東關于民主集中制的講話精神，加進報告裏去。以後，各小組在討論這個報告稿時，大家都表示贊同。接着就再次召開大會，通過了這個報告。

二月十一日，是“七千人大會”的最後一天。這一天舉行的閉幕大會，是毛澤東親自主持的。大會一開始，毛澤東就請周恩來講話。周恩來在講話中，表示擁護毛澤東的講話，擁護大會的報告，擁護并贊揚了林彪的講話。同時，他還在講話中對如何克服困難，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措施，如精簡機構、壓縮城鎮人口、縮短基本建設戰綫、搞好市場供應等等。

然後，毛澤東又請鄧小平講話。鄧小平講了黨的工作、民主集中制等問題，但對林彪的講話没有表態。

毛澤東接下來請陳雲講話，但陳雲回答説：“我没有什麽好講的。”毛澤東馬上語含譏諷地説：“陳雲同志向來謹慎，是不輕易講話的。現在還没有要講的，到要講的時候再講。”

就這樣，在“七千人大會”上發生了這麽大的風波，把兩位主席之間的分歧基本上暴露了。以後，這一分歧和矛盾愈加發展，最終釀成了“文化大革命”。

林彪的講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臺的。林彪講話以後，軍隊的幹部都很高興，紛紛贊揚林彪的講話講得好。衹有林彪本人不以爲然，他説：“我這樣講是出于無奈，不這樣講，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響，整個局勢就不好維持了。”會後，林彪把他的講話稿送給在武昌的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上面作了一點文字上的修改，然後批示説：“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看了會使人大爲高興，要發給大家學習。”

“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澤東常提到的一句話就是：“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内無派，千奇百怪。”

五、太倉“四清”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八屆十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重提階級鬥争問題。同時，還提出要在全國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從一九六三年起，“社教運動”先後在全國城鄉開展。運動初期，農村以清工分、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的小“四清”爲主；城市則開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新五反運動”。不久，中央又决定把城鄉的“社教運動”内容統一起來，規定爲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四清運動”。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毛澤東又在北京召集中央工作會議，主持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又稱《二十三條》）。通過這個文件，毛澤東斷言，全國有三分之一的基層政權，不是掌握在無産階級的手裏，一個“官僚主義階級”已經在全國出現。出于這個判斷，文件明確提出，“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黨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些觀點，後來發展成爲“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論基礎。除此之外，這個文件還指責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的一些作法是“形左實右”，并不點名地批判了王光美所搞的“桃園經驗”。

雖然“四清運動”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但一開始，軍隊裏一直衹在内部進行正面教育，没有介入地方的運動。直到一九六五年春，解放軍總政治部根據中共中央的决定，才頒發了一

個通知，要求軍隊派出幹部，到地方去參加這一運動。

正當空軍黨委在研究如何貫徹執行總政治部的通知要求時，葉群從蘇州給我打來了電話。劉亞樓逝世以後，林彪和葉群又回到了蘇州繼續養病，由許世友派了一支部隊保護。葉群在電話裏説，根據林彪的要求，她準備下去蹲點搞“四清”，但是她一個人去不行，想依靠空軍。她還説，由于林豆豆在《空軍報》社，看能不能從空軍政治部、宣傳部、報社調一些人，組成一個“四清”工作隊，她就參加這個工作隊，把豆豆也帶上。

由于當時正好我們也在根據總政的指示，布置參加“四清”工作，我就在電話裏答應她説：“好啊，就這樣辦。”葉群又問：“你也參加，看可以不可以？”我説：“現在大家都在搞‘四清’，我參加一下也好，但是這個問題想聽一下林總的意見，還要請示一下羅總長和蕭華主任。”葉群看我同意去，便説：“如果你去的話，我給你選個地方。我已經看好了蘇州的太倉縣，這個地方離蘇州比較近，我來來往往比較方便，有什麼問題向林總匯報也近。如果你同意的話，我負責去交涉，并辦理一切手續。”對葉群選的太倉，我表示没有什麼意見。接下來我們商定，她先帶幾個人去太倉，我去請示一下羅瑞卿總長和蕭華主任，他們若是没有意見，我安排好工作隨後就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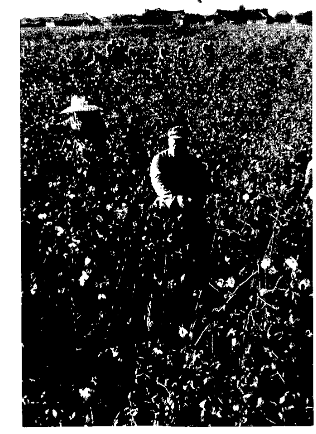
放下電話，我立即召集了空軍黨委辦公室和空軍政治部的王飛、何汝珍、朱鴻、王啓夫等幾個人開會布置，組織了一個四、五十人的“四清”工作隊，進入江蘇省太倉縣，葉群和林豆豆就參加了這個工作隊。當時，我們空軍副政委王輝球也帶着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一些人，組織了一個工作隊，進入到湖南省的一個縣參加“四清”。

在請示了羅瑞卿和蕭華，并得到他們的同意後，我把空軍政委余立金留在家裏，負責主持空軍的日常工作，就趕到了太倉。到了太倉以後，葉群就把她原來住的一間房子讓給了我，自己搬到一個貧下中農的家裏。那是一間茅草房，房子陰冷潮濕，葉群派人把那間房子打掃乾净以後，便帶了一個秘書和林豆豆住到了

那裏，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我原本也想住到貧下中農家裏去，房子都搞好了，但是葉群告訴我：“林總説了，搞‘四清’不一定非要住在貧下中農家裏不可。你是空軍司令，還是住在一個有電話的地方爲好，萬一有什麼事情好找。”

葉群讓給我的房子，是在一個鎮子上，原來是一個堆放材料的倉庫，房子也很破爛。我讓人簡單收拾了一下，便搬了進去。在太倉期間，駐上海的空四軍政委江騰蛟給我派來了一個炊事員，爲我們做飯吃。除了我之外，空軍工作隊的其他人也與葉群一樣，分散在太倉縣的四、五個區裏，分別住在貧下中農家裏，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們來到太倉不久，蘇州的地委書記就專門來看望了我們，對我們參加蘇州地區的“四清運動”表示感謝。

我們在太倉期間，華東局也有一個工作隊在那裏搞“四清”。葉群讓我和他們聯系，以便統一行動。華東局工作隊的同志很尊重我們，有什麼事情都和我們商量、徵求我們的意見。我跟他們説：“我們部隊的同志，對地方的工作不熟悉。在這裏，我們聽你們指揮，你們分配我們幹什麼，我們就幹什麼。”



在太倉搞“四清”

我在太倉的期間，正是農作物收獲的季節。我們一天天參加勞動，同農民們一起收稻子、摘棉花，在勞動中和他們談心、了解情況。在整個“四清”過程中，葉群每個星期六下午都要回蘇州去向林彪匯報，到了下個星期一的早上再回到太倉。那段時間裏，我同葉群經常來往，相互通報情況、交流經驗、交換意見。我當時覺得葉群還比較能吃苦，“四清”期間，她一直都同當地

的貧下中農吃一樣的大米飯、紅薯，没有特意加什麼菜，不搞什麼特殊化。她衹是帶了一點麥乳精，用開水衝了喝。葉群還要把她的麥乳精送一些給我，我謝絶了，説："我的身體好，不用了。"

到了十月份，空軍突然出了一個大亂子。一天中午十二點，我突然接到電話，説是南京空八師的一架轟－５型飛機，從杭州起飛訓練後，飛行員李顯斌將飛機飛到臺灣去了。跑飛機的消息，對我來説好像是一個晴天霹靂。我立即找到葉群，告訴她，空軍出了大事，我必須立刻去處理。之後，我就近從空軍的"四清"工作隊裏找了幾個人，立即帶着他們坐上飛機，于當天下午就趕到杭州查處這件事情，以便及時從中總結經驗教訓。當夜查到凌晨三點，才搞清楚了事情的經過，主要是飛行員李顯斌脅迫領航員和射擊員，把飛機强行飛到了臺灣。跑飛機的那個大隊，正好是余立金蹲點的那個大隊，而且當時又是余立金在北京主持空軍的工作，因此我在生氣之下，打電話批評了他。對此，余立金多少有點不滿意。

這次的李顯斌事件，是空軍建軍以來第一次跑飛機，又發生在我接任空軍司令員之後不久，當時我的思想負擔非常沉重。在查處的那些天裏，我多少天都睡不好覺，白天黑夜地工作。很快，我把跑飛機的情况和查處的情况，連同自己的檢討，一起上報給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林彪等，請求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給自己處分。

我在杭州一連給軍委發了幾個電報。林彪看了電報後安慰我説："没有那麼嚴重，衹要好好接受經驗教訓，今後不再發生那樣的事情就行了。"羅瑞卿當時正在外地視察工作，他也專門派人坐飛機到杭州來送一封信給我，要我接受教訓，不要緊張，不要着急。在這中間，林彪還不斷通過葉群給我傳話説："飛機已經跑了，要作好防範措施，要堅决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同時不要太緊張，不要把自己的身體也搞垮了。"

我在杭州調查了事情的原因後，又帶着工作組到空軍所有沿海的部隊，一個師一個師地去通報情况，檢查工作，要求大家認

真汲取教訓，堅决防止類似事件發生。我們還將這一事件的教訓整理成材料，印發給全空軍的部隊，進行深入、細致的教育。通過這一系列的措施，以後在我任空軍司令員的整個期間，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樣混亂的情况下，我們的空軍部隊也始終保持了穩定，再没有發生過類似的問題。不僅如此，整個部隊的鬥志還十分高昂，接連擊落了進入大陸的臺灣國民黨軍飛機。一九六七年，在一次毛澤東、周恩來召集的會議上，毛澤東還説："有人説，'文化大革命'是'天下大亂'，可是空軍没有跑一架飛機嘛！"

李顯斌事件發生後，我一直都在部隊處理這件事情，再也没有時間過問太倉的事情。不久，羅瑞卿來了電話，要我立即停止"四清"，回到北京主持空軍工作。根據羅瑞卿的决定，我馬上回到太倉，把空軍工作隊交給葉群，隨即回到了北京。以後，葉群仍然不斷地同我聯系，向我通報太倉的情况。

六、羅瑞卿大將的下臺

一九六五年秋，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因患肝炎，住在上海養病。蕭華患病期間，副總參謀長楊成武經常去上海探望蕭華，同時順便去蘇州問候林彪。這樣，林彪和楊成武之間的來往接觸，就比較多了起來。

不久，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突然被撤職了。蕭向榮究竟有什麼"錯誤"和"問題"，是辦公廳的工作搞得不好，還是有其它什麼原因，我就説不清楚了。後來，是楊成武兼任了軍委辦公廳主任的職務。這樣，林彪和楊成武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了。

這一階段，羅瑞卿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外地視察。他經常坐飛機往來于各地，檢查各大軍區的戰備和防御工程，那一年，他先到沿海各地區，從東北一直到海南，然後又去西南、西北，總

之對全國的地形，差不多都看遍了。由于經常外出，他對林彪難免有些疏遠。于是林彪開始覺得羅瑞卿有些變了，認爲他翅膀變硬了，有些大的事情也不請示報告。例如，在未報告林彪的情況下，羅瑞卿組織了全軍“大比武”，被認爲在“突出政治”的這個問題上，同林彪唱了對臺戲，這就逐漸引起了林彪的不滿。當時林彪還在蘇州，據說羅瑞卿曾經幾次想到蘇州去匯報工作，但是每一次打電話都被林彪拒絶，說：“你工作忙，讓楊成武來就可以了。”到這時，羅瑞卿已經發現林彪在有意冷淡他，可又不好表示什麽，衹好讓楊成武到林彪那裏來來往往，靠楊成武通報一些消息。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羅瑞卿離開上海時，到正在上海的毛澤東那裏，對毛澤東說，他要到蘇州去看看林彪。由于毛澤東對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非常欣賞，始終不忘，就說：“去看看好，要林彪好好休養，要養得和‘七千人大會’時一樣，能够作三、四個小時的報告。”没想到，羅瑞卿到了蘇州，來到林彪的住所門口要求見林彪，但葉群借口林彪身體不好，没有讓羅瑞卿進去，讓羅瑞卿碰了一鼻子灰。

這個時候，葉群還在太倉搞“四清”。十一月末的一天上午，葉群從蘇州用保密電話找我，要我馬上派一架飛機到蘇州去。她還特別告訴我，她要去杭州毛澤東那裏，并再三囑咐我不要向任何人講，要絶對保密。我告訴葉群，上海空軍有一架小型的裏－2型飛機，爲了保密，可以不通過北京，我直接命令上海空軍用這架飛機送她到杭州去。放下電話，我便向上海空軍下達了命令，要他們當天用這架飛機送葉群到杭州。晚上，這架飛機又載着葉群，從杭州返回了蘇州。

回到蘇州後，葉群用保密電話告訴我，她下午見到了毛澤東，她把林彪對羅瑞卿的一些意見，全部向毛澤東作了匯報。匯報完，她還把一些單位反映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的材料，呈送給了毛澤東。匯報完時，天已經黑了。毛澤東要她當晚就返回蘇州，并告知林彪，說他要考慮一下怎麽處理，要林彪在蘇州提高

警惕，注意安全。

葉群的這些話讓我當時非常吃驚，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同羅瑞卿之間的關系，已經壞到了這種地步！我想不出這究竟是爲了什麽，可在電話上也不好問。

十二月二日，毛澤東在一份報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在毛澤東作出這個批示幾天之後，十二月七日，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通知我：“毛主席決定，從八號開始，在上海召開一個小型會議，要你去上海參加會議，并準備飛機，把北京的一些主要領導人送到上海去參加會議。”至于會議的内容，葉劍英始終没有對我透露。此時，毛澤東已經先期到達了上海。

按照葉劍英副主席的指示，我安排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各乘一架飛機飛往上海，我同參加會議的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的主要負責人，以及國務院的一些主要負責人，分乘四架飛機飛往上海。

到了上海，我剛剛在錦江飯店住下，楊成武和蕭華就來告訴我，說林彪要找我談話。緊接着，我就接到了葉群的電話，要我立即到她那裏去。我很快到了葉群那裏。葉群告訴我，毛澤東決定召開這次上海會議，主要就是要解決羅瑞卿的問題，因爲上次她去杭州向毛澤東匯報羅瑞卿的事情時，對如何處理羅瑞卿，林彪没有提什麽意見。這些天來，毛澤東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最後決定在上海開會，背靠背地批判羅瑞卿。

聽到這個決定，我十分震動，想不到廬山會議才幾年的功夫，林彪和羅瑞卿的關系竟然發展到了這個地步！想到這裏，我不禁問葉群：“羅瑞卿究竟有什麽問題？”

葉群說：“你不了解情況，我告訴你一點材料，你好在會議上揭發和批判。第一、羅長子反對林總突出政治的觀點，說什麽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軍事，政治、軍事都重要，搞折衷主義。第二、長期以來不向林總報告工作，對一些重大的問題不商量、

不通氣。有的事情林總根本就不知道。例如在北京十三陵搞的那次大比武，林總當時在外地，羅瑞卿就没有報告他。這種作法林總是根本不同意的。第三、逼林總交權讓賢。有一次，羅長子到林總這裏來匯報工作，林總身體不大好，没聽完就讓他走了。他在走廊裏大吵大嚷，說什麼'病號嘛，還管什麼事？病號就應該讓賢，不要擋路'。把林總氣得差一點暈過去。第四、羅瑞卿曾經對劉亞樓講了四條意見，包括要林總退居'二綫'，或者衹搞中央工作，至于軍委的工作，放手讓羅瑞卿去管等等。還有，林總讓我去參加'四清'，好得到第一手材料來向林總匯報，但是羅長子就是反對，還說'你何必去搞什麼'四清'，主要是保護好林總的身體就行了'。"

說完這些，葉群就要我在會議上發言，說就講這些材料就行了。她還說："現在知道這些材料的衹有楊成武、蕭華、雷英夫和你，别人都還不知道。你們幾個人要在會議上帶頭發言，把這些材料捅出去。"

我當時并没有見到林彪，這些都是葉群向我布置的。由于我知道這個會議是毛澤東决定而且親自來上海坐鎮主持召開的，是一個相當高級别的會議，加上要我發言又是林彪的意思，所以我向葉群表示願意發言。話是這樣說了，可從内心來說，我并不願意作這樣的發言。羅瑞卿一向對我很好，我對他還是很有感情的，何况我確實也不知道他有什麼錯誤，一時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所以我一時也拿不定主意。

這個會議是十分保密的，與會的除了從北京趕到上海的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及解放軍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負責人以外，衹有華東局第一書記陳丕顯，總共不到一百人。我們全都住在錦江飯店，我住在八樓，同楊成武、蕭華他們住在一層。

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點，會議正式開始。整個會議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主持，周恩來協助。會議先是分組，把與會人員分爲三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各負責一個組。我被編在第三組，是鄧小平負責的那個組。毛澤東和林彪既没有參加編組，也没有

在會議上露面，但每天的會議開完以後，由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會議，聽取匯報和作出决定。

會議開始的第一天，我們第三組的人都不知道羅瑞卿究竟有什麼問題，一開始會上没人發言。主持會議的鄧小平就說："有人說，吴法憲知道點情况，是不是你先講一講。"

鄧小平這一點名，我衹好硬着頭皮，把葉群告訴我的情况在會議上說了一遍，主要講羅瑞卿是折衷主義。由于講這些話本來就不是我的意思，我說話聲音比較小。鄧小平就讓我過去和他坐在一起。我很快說完後，鄧小平問："没有啦，就是這些？"我說我就是知道這些，别的確實不知道，講不出多少。于是，會議就冷場了。後來在鄧小平的一再啓發下，大家這個講幾句，那個講幾句，但都講不出什麼名堂來。時間剛到十一點，鄧小平就宣布散會了。

與我們第三組相比，葉群、蕭華、楊成武他們所在的那一組，鬧得就比我們熱鬧多了。小組會議開始後，葉群在會議上連續發言了幾個小時，指責羅瑞卿有野心，葉群說，一九六四年以後，羅瑞卿就開始逼林彪讓賢，叫嚷"病號不要擋道，要讓賢"。

葉群在發言中還抛出了一個材料，說羅瑞卿曾經要劉亞樓轉告葉群四條意見：第一、林總早晚都是要出中央政治舞臺的，現在不出，將來也要出；第二、要保護好林總的身體；第三、林總不要再干涉軍隊的工作了；第四、要放手讓羅瑞卿工作，軍委的事情交羅瑞卿辦就可以了。葉群說，她聽了劉亞樓轉達的四條意見以後，當時就對劉亞樓說："林彪的榮譽已經很高了，無意再進。"回家以後她對林彪說起這件事情，林彪說："羅瑞卿是個野心家。"

葉群在小組會議上的發言，當晚就由主持第二小組會議的周恩來向中央常委會作了匯報。當天晚上，周恩來就找我談話。我剛到周恩來住房的門口，正好碰到雷英夫從裏面出來。我一進去，周恩來就問我："羅瑞卿是怎麼反對林彪的？"我很驚訝，反問他："你也不知道嗎？"他說他也不了解情况。于是，我就把

葉群告訴我的事情又説了一遍。説完後，我還補充説："聽説海軍有一些材料。"

第二天上午，劉少奇又找我談話，我又照樣把葉群告訴我的話説了一遍。到了中午，劉少奇請我一起吃飯，我乘機在吃飯時把在太倉搞"四清"的一些情况，向他當面作了匯報。劉少奇聽了很高興，當即作了一些指示。我馬上將劉少奇關于軍隊"四清"工作的指示進行了整理，并報告了總政治部。以後，總政治部又將這個材料發給了全軍。

這個時候，我對這次會議産生了一些疑問：像這樣一個會議，連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不知道什麽情况，這是怎麽搞的呢？但當時我是堅信毛主席的，既然毛主席都親自到上海主持這件事，我也就不多想了。

如果這種情况出在我們下面的黨委，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我當時連一個中央委員都不是，對中央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衹好相信毛主席的决定是正確的。盡管這樣，我還是感到，在這樣一個高級别的會議上，讓我來帶頭發言，與我的身份是不相符的。基于這個考慮，一直到會議結束，我都没有再發言。

會議的第三天晚上，周恩來突然來找我交代任務，要我派一架飛機，配備最好最可靠的機組，到昆明把羅瑞卿接到上海來。他特别交待，要我親自掌握好這架飛機，作好應變措施，飛機衹準往東飛，不準往西飛。我明白他這話的意思，就是要防止羅瑞卿跑到緬甸或印度去。

周恩來還告訴我，這架飛機到上海以後，衹要三個人去接：一個是陳丕顯，代表東道主；一個是謝富治，當時的公安部長；一個是我，是管飛機的。除了我們三個，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去。他一再强調，羅瑞卿到上海的事情，要嚴格保密，不要告訴任何人。

聽完周恩來的指示，我當即報告他，準備派空軍運輸十三師的副師長時念堂去駕駛這架飛機。等他同意後，我又告訴他，羅瑞卿曾經從昆明打電話到北京找我講話。周恩來馬上問我："接

電話了嗎？"我説："没有接，我已經離開了北京，是留在家裏的秘書打電話告訴我的。"周恩來聽了後强調："不要接，就説你不在家。"

我剛剛想離開周恩來的房間，秘書就進來告訴我，説是彭真從北京來電話找我。我剛想去接電話，周恩來立即阻止我説："不要接，就説找不到你。他可能是來了解會議情况的。"

我當時感到很奇怪，心裏想，彭真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爲什麽不告訴他會議的情况？難道彭真也有了問題？但是我絶對不敢問，衹能帶着這樣的疑問離開周恩來的房間。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兩點，接羅瑞卿的飛機回到上海。按照周恩來的規定，我和陳丕顯、謝富治一起到虹橋機場去接羅瑞卿。飛機降落以後，我看到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和羅瑞卿一起走下機艙。羅瑞卿的臉色很難看，顯得很緊張，似乎意識到了什麽。他同我們握手以後，就同陳丕顯坐一輛車向市區駛去。陳丕顯把羅瑞卿帶到錦江飯店裏的一個小院。周恩來、鄧小平等在那裏準備同羅瑞卿談話。我没有資格參加這次談話，我就離開了。羅瑞卿來到上海以後，一直没有見到他參加會議，我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羅瑞卿已經到了上海。

會議進行到第四天，也就是羅瑞卿到達上海的那一天，大家繼續揭發、批判羅瑞卿的折中主義。這時候，發言的人比較多了起來。第五天，大家就講得差不多了，實際上也没有什麽可以講的了，于是小組會宣布休息。同時，也宣布了紀律：不準上街，不準會見朋友。

第六天下午，在錦江飯店頂樓餐廳開大會，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鄧小平等領導到會，衹有毛澤東和林彪没有露面。大會由周恩來主持，鄧小平做總結發言，記得鄧小平一共講了五點：一、這次會議初步揭發了羅瑞卿的一些問題，會議暫時告一段落；二、羅瑞卿的主要問題是没有堅决執行林彪同志關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犯了折中主義的錯誤；三、會議上揭發批判羅瑞卿的一些

問題，將轉達到本人，給他一點時間來認識錯誤；四、對羅瑞卿的問題，不能擴散，衹限到會人員知道；五、會後怎麽辦，回北京以後由中央研究解决。

鄧小平一共講了半個小時。他講完話，其他人全都没有再講什麽話，就散會了。這個會議開得很沉悶。

回北京的時候，周恩來、鄧小平、羅瑞卿同坐一架飛機。按照慣例，我還是趕在他們前面回到北京，然後候在機場接他們。在他們下飛機後同我一一握手時，我看到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情緒都還好，衹有羅瑞卿一聲不響，心情沉重。這是我最後一次當面見到羅瑞卿。

上海會議剛結束，毛澤東就又召集中央軍委常委開會。他在與林彪、葉劍英、賀龍、聶榮臻、徐向前等老帥一起研究後决定：撤銷羅瑞卿的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職務，由葉劍英副主席兼任軍委秘書長，楊成武代理總參謀長。從此羅瑞卿就靠邊站了。羅瑞卿下臺以後，由林彪、葉劍英、楊成武、蕭華形成了軍委新的領導核心，并由葉劍英及楊成武、蕭華三人主持着軍委全盤的日常工作。

隨着羅瑞卿的下臺，楊成武的地位越來越高，并且在林彪那裏成了紅人。楊成武在上海時就曾經同我通氣，説毛澤東在上海同軍委幾位老帥一起商量過，準備安排十幾個副總參謀長，這裏面包括所有的大軍區司令員以及我和海軍的李作鵬。但這個安排，以後并没有全部實現。

上海會議結束以後，一直都没有聽到有關羅瑞卿的消息。一九六六年三月初，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中南海懷仁堂去參加會議。這是一個由鄧小平總書記代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個小型會議，到會的僅三十人，很顯然，這個會議是毛澤東决定召開的。

會上，鄧小平總書記跟大家説："關于羅瑞卿的問題，上海會議已經揭開了蓋子，現在毛主席决定，繼續在北京開會，仍然是小型會議，以軍委爲主，吸收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和軍委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以及中央機關各部門和國務院的有關負責人參

加，人數不超過一百人。軍隊方面，由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和楊成武、蕭華組成領導小組，負責主持會議，領導這次同羅瑞卿進行的面對面的鬥争。開會的地點在京西賓館，以便保密。"

鄧小平接着宣布，他將和李富春副總理一起出巡西北，中央書記處的工作由彭真在北京主持。所以，這次批判羅瑞卿的會議，就由彭真負責，參加會議的人員也由彭真决定。

三月四日，批鬥羅瑞卿的會議在京西賓館正式開始。這次會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等中央常委都没有參加。林彪當時仍然住在蘇州養病，没有回北京。空軍參加會議的是我和余立金兩個人。羅瑞卿這次參加了會議，但他到會時，大家對他形同陌生人，没有一個人上前同他打招呼。他每次來參加會議，都衹是孤獨的一個人，拿着鋼筆和筆記本坐在會場的桌前，根據大家的意見作記録。這個時候，羅瑞卿實際上已經被隔離起來了，每天的事情就是到會聽取大家的意見和批評。

會議的第一天，葉劍英首先説明了會議的目的和要求，要求羅瑞卿主動交代問題和深刻檢討，并要求其他與會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還規定要對會議的内容保密，任何人都不準外傳。彭真在這一天到了會，以表示對會議的支持。

在第一天的發言中，以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大將的發言對羅瑞卿的震動最大。在發言中，許光達對羅瑞卿在延安的一些言行進行了揭發。看得出來，羅瑞卿對此很吃驚，也很生氣，但是却敢怒不敢言。

會議期間，葉群經常同葉劍英、楊成武、蕭華保持聯系，有時也給我打電話，了解會議上的發言情况。會議的第二天，葉群從蘇州給我打來電話，問我發言了没有。我告訴她没有。她便叫我趕快發言，同時在電話裏再一次向我重復了上海會議時所講的"四條"内容。她還告訴我，這"四條"是羅瑞卿要劉亞樓轉告她的，一九六三年後劉亞樓幾次想談都没有説出口，一直到上海養病期間，劉亞樓自知不久于人世，這才把這"四條"意見轉告

了她。她說，當她再次去劉亞樓那裏核實這“四條”內容時，有劉亞樓的妻子翟雲英在場。因此，她要我立即去找翟雲英了解情況，還要我帶上秘書，準備在一旁作談話記録，以便作爲旁證。她還叮囑我，談完話，一定要翟雲英在記録上面簽字，然後把這個材料立即送到蘇州林彪那裏。

我帶着秘書找到了翟雲英。没想到翟雲英説，她在上海没有聽見劉亞樓説到有關“四條”的事情。但後來她又説，當劉亞樓和葉群談話的時候，她曾經看到劉亞樓伸出過四個手指。這次談話我叫秘書作了記録，經翟雲英簽字以後送到了蘇州。

會議開了一個星期，我仍然没有發言。葉群就又從蘇州打電話來責問我，爲什麽還不把“四條”重新捅出去，以證實在上海會議的發言。我對她説，這個材料我没有聽劉亞樓講過，翟雲英又不能完全證明，祇是説看到劉亞樓伸出了四個手指。葉群聽我這樣説就急了，對我説：“劉亞樓是空軍的人，你不講誰講？祇有你講最合適。你要趕緊發言，還要告訴余立金也要發言。我向毛主席匯報的時候和在上海會議上，都已經講了這‘四條’，你還怕什麽？”

説實在的，我當時確實有些猶豫。從一九五〇年我到北京以來，羅瑞卿真的對我一直不錯，我們倆的關系很好，現在他挨批鬥了，却要我來衝鋒陷陣，提這個“四條”，我實在是下不了這個决心。于是，我把這些思想向楊成武作了匯報。楊成武責怪我説：“你不講，怎麽向林總交代？”

即便這樣，我當天還是没有發言。結果第二天葉群又來了電話，對我説：“我已經問了楊成武，你在會議上還没有發言。林總説，一定要吴胖子在會上講這‘四條’，現在講已經遲了，再不講你就被動了。林總説要你好好考慮考慮，究竟是跟林總還是跟羅長子？林總讓我告訴你，羅長子向黨伸手，要奪取軍權，毛主席親自主持和掌握這次會議，來解决羅瑞卿的問題。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把羅長子在空軍講的幾句話，到處張貼印發，把他抬得那麽高，爲什麽？林總講了，你同羅長子的關系是很密切的，

你一定要徹底揭發羅長子，同他劃清界限。”

我聽了葉群這些話，好大一會兒説不出話來。她這些話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我不照她的話去説，就要把我劃進羅瑞卿的圈子裏去了。想清楚了後，我忙表態説：“我當然是跟林總的，怎麽會跟羅長子呢？”葉群説：“那好，明天上午你就在會議上發言。劉亞樓説的事情你講最合適，你和余立金都要在會議上講這幾條。我已經告訴楊成武，你們講了以後他們會跟上來的。另外告訴你，梁必業已經陷入羅瑞卿的圈子裏去了，你要注意。”

葉群當時打的是林彪的旗號，他們又遠在蘇州，我無法也不敢去林彪那裏辨别真僞。“一定要在會議上發言”的這個指示，是確實來自林彪，還是葉群假傳聖旨，我真的鬧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

就這樣，經過一夜的準備，我和余立金都于三月十二日在會上發了言。我們發言之後的幾天裏，大家紛紛發言批判這“四條”，幾乎是一面倒地批判羅瑞卿的“野心”。這一來，就使得羅瑞卿的問題更加嚴重了。

三月十八日上午，羅瑞卿在家中跳樓了。他從二樓上跳下來，並没有摔死，但是摔傷了一條腿，被送到北京醫院救治。在跳樓之前，他曾經寫了一封“絶命書”。這封信的内容在羅瑞卿女兒羅點點的《非凡的年代》裏有記録：

> 治平：
>
> 會議的事情，没有告訴你，爲了紀律。
>
> 永别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
>
> 我們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你要繼續改造自己，永遠革命。

羅瑞卿跳樓以後，這封信交給了汪東興。三月十九日，葉劍英在會議上宣布了羅瑞卿跳樓自殺的事情，并給大家念了羅瑞卿的“絶命書”。葉劍英爲此還寫了一首詩，我祇記得其中一句是

"將軍一跳身名裂"。

聽到羅瑞卿跳樓的消息，我心裏十分内疚，但已經無法再挽回了。

羅瑞卿跳樓以後，會議就又轉入背靠背地批判。到了三月底的一次大會上，彭真、葉劍英、楊成武、蕭華先後講了話，然後葉劍英宣布會議結束，羅瑞卿的問題就暫告一段落。

羅瑞卿治療以後被關在什麼地方，我就不知道了。我衹是聽説，羅瑞卿的家屬一直住在原來的房子裏，後來李德生調北京任總政治部主任時，由于没有房子住，經周恩來批準，有關部門才要羅瑞卿的家屬搬走，把房子讓給了李德生。

羅瑞卿是黨内高級幹部中在"文革"前後被打倒的第一人。單就這件事而言，羅瑞卿的下臺，提出問題的是林彪，但下決心的却是毛澤東。批示羅瑞卿是折衷主義的是毛澤東，决定召開上海會議并親自坐鎮的是毛澤東，要鄧小平在北京召集會議繼續批判羅瑞卿的是毛澤東，决定撤銷羅瑞卿的軍職，并分别由葉劍英、楊成武繼任的，也是毛澤東。至于毛澤東爲什麽要這樣做，我不知道。

我出獄之後，看到一些報紙和書刊登載過不少有關羅瑞卿事件的文章，有一些是涉及到我的，其中有實事求是的部分，我完全承擔責任。在羅瑞卿的問題上，我始終都感到十分内疚，當初審理我問題的時候，我也作了如實的交代。但是，有許多文章的作者，嚴重違背歷史事實，别有用心地歪曲和捏造事實，更有一些人對我進行惡意的人身侮辱和攻擊。對這些不實之詞和惡意的人身攻擊，我表示抗議。我想歷史事實總是會被澄清的。

第十一章

風風雨雨鬧"文革"

一、牽連到彭真

開始批判羅瑞卿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已經拉開了序幕。早在一九六五年初，毛主席派江青到上海同柯慶施、張春橋聯系、策劃，然後由姚文元執筆寫了一篇題爲《關于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經毛澤東多次修改、審定後，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發表在上海的《文匯報》上。毛主席下定决心要以批判《海瑞罷官》爲突破口，開展一場政治運動。但是，毛澤東組織的對吴晗和《海瑞罷官》的批判，在北京遭到了彭真的抵制，彭真想把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限制在一場學術争論中。這樣，彭真的命運就决定了。

彭真没有參加在上海對羅瑞卿的批判，但在北京批判羅瑞卿的會議上，他和謝富治有個聯合發言。發言的具體内容我記不太清了，好像是説羅瑞卿反對彭真提出的"公安工作十條"什麽的。這個發言送到杭州後，毛澤東一看，認爲謝富治采取與彭真聯合發言的這種形式不妥，就準備找謝富治到杭州去談一談。大約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汪東興通過蕭華打電話給我，要我連夜派

飛機，秘密地把謝富治送到上海，再由上海的空四軍政委江騰蛟派汽車，送謝富治到杭州去見毛澤東。至于毛澤東要謝富治到杭州去幹什麽，我并不知道。

謝富治回到北京時，我去南苑機場接他。之後，我們兩人同坐一輛車回城。謝富治告訴我，中央又出了問題，以彭真爲主。彭真在二月初搞了一個《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并作爲中央正式文件發到了全黨。《二月提綱》與姚文元的文章是完全對立的，毛澤東看了以後，認爲《二月提綱》混淆了階級界限，是錯誤的。現在中央正在杭州開會，準備批判和撤銷這個文件。

謝富治還告訴我，毛澤東對他説，彭真對北京是一統天下，什麽都不準泄露，水潑不進，針插不進，什麽情况都不向中央反映，不向他本人反映，搞獨立王國。謝富治説，看得出來，毛澤東的言談之間，表示了對彭真的不滿。關于去杭州一事，他告訴我説，這次毛澤東要他去杭州，没有别的事情，就是告訴他，批判羅瑞卿的稿子不要和彭真聯名，但是這件事情要他對外保密，不要讓彭真知道。

這樣，我才從謝富治那裏知道彭真也出了問題，毛澤東準備要把彭真拿掉了。這個時候，楊成武也和我通氣，説中央有個"十四號文件"，是彭真搞的，這個文件有錯誤，不能向下面傳達。楊成武和蕭華出席了杭州會議，所以他們對彭真的情况是比較清楚的。

其實在此之前，我就知道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央領導正在杭州開會。四月中旬，中央辦公廳就不斷通知我，要我派飛機去接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到杭州集中。接着，又派專機送中央領導以及國務院各部門、軍委各總部的負責人去杭州。我先是按照要求作了相應的布置，然後每天坐鎮指揮所，親自指揮，直到安全準時地完成運送任務，我才鬆了一口氣。雖然當時没告訴我中央在杭州開什麽會，但從這些情况來看，我猜想中央一定是在杭州召開重要的會議。

後來我才知道，在杭州，毛主席親自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會議上以及會後，毛主席親自對彭真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四月二十四日，毛主席主持通過了《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的草案，這個草案是陳伯達等人負責起草的，而且據説，"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名詞，也是陳伯達提出的。陳伯達的這個提法得到了毛主席的贊賞，并爲他所采納。

到了五月四日，在北京由劉少奇主持繼續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當時毛主席在外地，没有參加。五月十日中央宣布改組北京市委，從組織上把彭真拿掉了，并將彭真同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一起，打成了"彭、羅、陸、楊反黨集團"。

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又稱《五一六通知》）。《通知》分爲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宣布撤銷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綱》（即"中央十四號文件"），撤銷以彭真爲組長，包括陸定一、康生、周揚、吴冷西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以及辦事機構，重新設立以陳伯達爲組長、江青爲第一副組長、康生爲顧問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領導全國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是向全黨解釋撤銷《二月提綱》的理由，列舉了《二月提綱》的十條罪狀。

《五一六通知》最重要的是第三部分。《通知》要求各級黨委"高舉無産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産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産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通知》還説："我們對他們的鬥争也衹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争，我們對他們的關系絶對不是什麽平等關系，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系，即無産階級對資産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系。"

在《五一六通知》裏還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説："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産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産

階級專政變爲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的已經爲我們所識破，有的則還没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重用，被培養爲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式那樣的人物，他們正在我們身邊，各級黨組織必須充分注意到這一點。"

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發出後，全國很快便掀起了那場"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二、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在空軍很快就引發了一場鬥爭，這就是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體會議。這次會議是從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開始的，一直開到了九月十日才結束，前後經歷了三個多月。會議時間之長，在中國空軍歷史上很可能是空前絶後的。説到底，這場鬥爭也主要是因爲"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引起來的。



下部隊檢查工作，和戰士們一起勞動

在這之前的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在中國西部上空進行一次空投氫彈的試驗。這次試驗，由當時的副總參謀長兼國防科工委副主任張愛萍負責主持。具體負責執行這一任務的，是二十一基地的全體同志，而空投氫彈的任務，則交給我們空軍來完成。接到這一命令後，我認爲這是空軍第一次接受這樣的任務，責任重大。雖然具體的任務由蘭州軍區空軍負責，而我作爲空

軍司令員，應該親自到試驗現場去指揮，以防出現萬一。

在徵得空軍黨委常委一些同志的同意，并得到軍委秘書長葉劍英的批准後，我留下政委余立金在北京主持工作，然後與當時負責基地試驗的空軍副司令員成鈞一起到西北基地，在張愛萍的統一領導下，共同主持這次氫彈試驗。

五月九日，氫彈空投任務順利完成，整個試驗取得了圓滿成功，讓我們都非常高興。這時，我與成鈞商量，待聽完張愛萍的總結報告以後，我們倆順道去駐在和闐、哈密、張掖、武威、蘭州、臨洮等地的航校、高炮、導彈、飛行部隊去檢查一下工作，并準備在每個單位去住上幾天，了解一下情況，與這些單位進行上下交流和溝通。平時我的工作很忙，很少能有機會去看望這些基層的部隊。

到了五月底，正當我和成鈞按照預定的安排，來到武威航校檢查工作時，余立金從北京給我來了一個電話，告訴我説，中央下發了一個《五一六通知》，要在全國開展"文化大革命"，他準備把這個文件送到西北來，給我和成鈞看一看。

第二天，余立金就派了一架飛機，給我們送來了《五一六通知》。看完這個文件，我心裏想，這個文件僅僅是個通知，并没有規定具體的辦法，究竟應該怎麽搞法，誰也没有底，還是等中央和軍委有了進一步的文件、部署具體的辦法後，再一起開會傳達不遲。因此，我繼續和成鈞一起，來到蘭州軍區空軍司令部，檢查蘭空的指揮機關和所屬的飛行部隊、高炮部隊的工作。

就在臨洮，余立金又來了電話，要我和成鈞立即返回北京，説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他説，對《五一六通知》要立即進行討論，我不回去，他們没有辦法討論。這個電話剛剛放下，余立金又第二次來了電話，告訴我説，葉群要他轉告我，要我盡快趕回北京，否則就會變成"恩克魯瑪"了。

葉群説的這個"恩克魯瑪"，原先是非洲西部加納共和國的總統，一次，在他出國訪問期間，國内發生了軍事政變，他被政變軍人趕下了臺，成了流亡總統。葉群這句話的用意何在，我當時

不太明白，但想可能是家裏發生了什麼情况。于是，我匆匆結束了西北之行，于六月三日清晨乘飛機和成鈞一起回到了北京。

六月三日下午，我剛剛回到家裏，葉群就給我打來了電話。她告訴我説，空軍副司令員徐深吉到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那裏告我的狀，説“吴法憲躲出去檢查工作，遲遲不歸，對《五一六通知》既不傳達討論，也不下發執行，對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按兵不動”。由于徐深吉到劉志堅家裏去的時候，正好碰到葉群，所以劉志堅在徐深吉走了之後，把他的話告訴了葉群，葉群這才通過余立金向我發出了警告。

六月四日上午，我召集空軍黨委常委會議，討論如何貫徹執行《五一六通知》的問題。與此同時，我還準備將這次西北執行氫彈空投任務的情况，以及檢查空軍部隊發現的一些問題，一起向常委會作一個匯報。

誰知道會議剛一開始，氣氛就不同尋常，完全變了。首先是劉震，接着是曹裏懷、王輝球等人提出：“你作爲空軍司令員、黨委書記，對《五一六通知》不主持開會，不組織學習、討論，躲在外面檢查工作，遲遲不回北京，不抓‘文化大革命’，這是爲了什麼？對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按兵不動，是什麼態度？”當時就向我轟了起來，上綱上綫，給了我迎頭一棒。我當時還蒙在鼓裏，不知道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幹。我根本不知道，常委一些人已經在北京醖釀和串聯了一些日子。在我回京之前他們已計劃好了，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機會，在空軍鬧一場，要把我拿掉。

本來我和成鈞的關系是很好的，在西北時，一路上我們兩個人也協作得很好，成鈞對我很尊重，講話、作報告也都同我很協調，没有什麼不同的意見。可是在這個時候，成鈞也突然跟我翻了臉，説什麼“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呀，空軍按兵不動不行呀之類的話，與劉震他們搞在了一起。

這樣一來，常委會剛一開始氣氛就很緊張。對他們一上來就給我扣的那個“對中央通知按兵不動”的罪名，我當時毫無思想準備，感到非常突然。我解釋説：“據我的了解，駐京的各部隊

機關和軍委各總部，包括我們的鄰居海軍機關，都没有動。現在中央祇是發了一個通知，主要是叫大家有一個思想準備，而且文件主要是講地方上的問題，軍隊方面怎樣搞，誰都不清楚，軍委也没有安排，不等一下行嗎？着什麼急呀！”

好，我這一説，他們幾個就都哄了起來，祇見劉震帶頭，不僅曹裏懷、徐深吉、成鈞，甚至連譚家述、常乾坤、王輝球都跟了上來。常委裏面，祇剩下我和余立金、鄺任農站在一起。張廷發在會議上不表態，他對劉震他們的行動不滿，但是也不和我們站在一起。看到常委會開成這個樣子，真是讓我傷心。

劉震他們仗着是多數，在會上咄咄逼人地要我第二天召集空軍黨委全體會議。我説，來不及呀！空軍黨委委員有五十多人，就是連夜用電話通知都來不及呀！要開也起碼得等到六號才行。可以要求參加會議的人五號晚以前趕到北京報到。我這樣一説，他們才總算是同意了。對會議的議程，我提出，第一步是傳達學習文件，第二步才是討論如何貫徹執行。對我這個建議，大家没有异議。

在回家的路上，我對張廷發説：“今天的會議情况不大對頭。”張廷發當時也説：“氣氛是不大對頭，可能有什麼名堂。”

六月四日下午，我立即向中央軍委寫報告，請求軍委同意我們從六月六日起召開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體會議。這個報告交上去以後，很快就批了下來。

六月六日上午八點，我們在空軍東交民巷招待所禮堂正式召開了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九十多人，除空軍黨委委員五十多人以外，各軍區空軍的主要領導和空軍領導機關二級部部長以上領導四十餘人列席了會議。

會議開始，我首先代表空軍黨委常委會説明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我説：“我和成鈞剛剛從西北參加氫彈空投試驗和檢查部隊工作回來，由于多數常委同志要求立即召開全會，學習和討論《五一六通知》，因此匆忙之中召開的這次會議，常委會還來不及討論和制訂出一個貫徹《通知》的具體措施，希望大家首先集中

精力，學習和領會好《通知》的精神，然後集思廣議，研究和制訂出一整套在空軍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辦法。最後，拿出一段時間，對空軍黨委提意見，發揚民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

我講了大約有十分鐘。我剛講完，幾個常委就衝出來了。首先是劉震，然後是成鈞、曹裏懷、譚家述、徐深吉、王輝球和常乾坤，他們一個接着一個地搶着上臺發言。講的大致意思都差不多：空軍的“文化大革命”搞遲了，吳司令在西北躲風，遲遲不回來，遲遲不作討論，不作決定，對中央的指示、對《五一六通知》按兵不動，耽誤了空軍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時間。他們幾個這樣一講，立即就使得會場的氣氛非常緊張。我看看阻止不住，就索性靜坐在那裏，任憑他們自己上臺講話。他們這一講，就是一個上午。

很顯然，劉震等一些人這樣做的目的，并不是在乎我和余立金傳達和組織學習討論《五一六通知》的早晚。他們指責我傳達和組織學習討論《五一六通知》不得力，衹不過是用來整倒我的一個借口。他們看到了當時中央改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學黨委的先例，就想借這樣的一個機會，憑借着他們在常委會占多數的優勢，來强行改組空軍的領導班子，把我和余立金趕下臺。這些是他們事前早已經醞釀好的，衹不過是瞞着我和余立金而已。

認真説起來，即便就是他們表面上的這個指責，也是站不住腳的。中央當時才剛剛發了一個《五一六通知》，并沒有具體開展運動的部署，而且軍委也没有任何指示。以後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通過的《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條》）就有明確規定：“關于部隊的文化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按照這個精神，我們靜候中央和軍委的進一步指示至少是没有什麼錯。我們召開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的時間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離《十六條》正式通過的時間還有兩個多月，中央的規定當時還没有下來，就更不要説軍委和總政的部署了。難道空軍能不等軍委的指示自己另搞一套？再説，從

我們收到《五一六通知》到開會前後，也不過才十多天的時間，難道這就是遲遲不動，是我有意躲風?

我個人認爲，常委的一些同志之所以要這樣做，是有其它原因的。首先，是對劉亞樓逝世後由我來繼任空軍司令員不滿。在劉震看來，他是八届候補中央委員、上將軍銜，而我却没有進入八届中央委員會，并且衹是中將軍銜（當時在全空軍，衹有劉亞樓和劉震兩個人是上將軍銜），所以劉亞樓逝世以後，如果從條件上來看，似乎應當由劉震來接任空軍司令員。但後來事情的發展并非如此，中央和軍委最後决定由我來接任空軍司令員，對此劉震當然是不會滿意的。

其次，是他們對劉亞樓在世時的一些作風不滿意，多年來一直耿耿于懷，這時想要借機發泄一通。劉亞樓在任空軍司令員的時候，對工作要求非常嚴格，盡管劉震、曹裏懷、徐深吉、常乾坤、成鈞、譚家述等都是空軍副司令員，但劉亞樓對他們的批評也是絲毫不留情面，常常弄得他們下不來臺，因此他們對劉亞樓的工作作風、領導方法都很有意見、很不滿意，這些情況我是知道的。例如常乾坤，因爲經常受到劉亞樓的批評，于是覺得自己在空軍的地位不高，受到了壓抑，因而很不滿意。他曾經跟人説過，他在空軍由于經常穿小鞋，“三寸金蓮”都穿成兩寸半了。又例如另一位副司令員，一次搞了一個文件，劉亞樓看完後批評他説：“你搞的這叫什麼東西，衹能給我當擦屁股紙用！”這樣的話，當然會讓人感到莫大的侮辱。

劉亞樓在世的時候，他們曾經嘗試過一次與劉亞樓的抗争。那是在一九六四年劉亞樓出國去越南訪問期間，我曾經主持過一次空軍黨委常委會議，會上一些常委對劉亞樓提了不少意見，爲此會議還專門延長了兩天。當時我的想法是，盡量讓他們把心中的不快都吐出來，以便調解相互之間的關系。但他們的想法却與我不同，他們是想要我領導大家對劉亞樓開展鬥争。我没有這樣做，衹是在會上對他們提的一部分意見作了解釋。在劉亞樓回到北京後，我告訴劉亞樓，説常委的同志在會議上對你提出了一些

意見，希望你今後能够注意。當時，劉亞樓問我都提了什麽些意見，我告訴他説，都是作風上的一些問題，例如要求太高、批評不留情面、態度不好、粗暴等等。希望你今後能够注意到常委之間的相互團結。但僅僅這樣并没有，也不可能平息他們對劉亞樓的種種不滿。于是他們把心中對劉亞樓的那股怨氣，就延續到了我的身上。

我想，大概就是由于這樣的兩個原因，使得劉震他們幾個人搞到了一起，借着我没有及時傳達和組織學習討論《五.一六通知》這件事，鬧了起來。結果在這次黨委會上，文件討論不成，大家也没有興趣，就是轟呀，鬧呀的。我當時一句話也不説，心想，反正文件也學不成了，既然大家有意見，那就轟吧，讓他們盡量把意見説盡放完。

没想到，劉震他們幾個常委這樣帶頭一鬧，下面的人也都跟着鬧了起來，因爲有常委帶頭嘛！北京軍區空軍還比較好，没有跟着起哄，其他如沈陽軍區空軍的黄立清、南京軍區空軍的聶鳳智、廣州軍區空軍的吴富善，都是些老資格，還有成都指揮所的高厚良、武漢軍區空軍的傅傳作、廖冠賢等，他們和常委一些人結合在一起，哄啊、鬧啊的，足足有半個來月時間，一直鬧到七月中旬。

在所有起來指責我的人裏面，以吴富善最爲厲害。有一次他拿了一根手杖，在主席臺上一邊講，一邊用手杖敲着講臺，乒乒乓乓地敲了半天，那副樣子真是讓人看了難受。

在那半個來月的時間裏，他們提意見的矛頭主要是對着劉亞樓和我的，另外也包括了余立金和張廷發。至于他們所提的意見，我現在手頭没有資料，也没有當時的記録，根據我的仔細回憶，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這麽幾條：第一，説我與中央的指示相對抗，對“文化大革命”按兵不動，在西北“躲風”，躲避“文化大革命”。第二，説劉亞樓、我同彭真的關系密切，每年元旦，必到彭真那裏去拜年，還把彭真的兒子安排在空軍工作。第三，説劉亞樓、我同羅瑞卿關系密切，羅瑞卿説東，劉亞樓和我絶不説西。不光如此，我們還把羅瑞卿説過的“辦事要認真、工作要落實、經得起檢査、不要翹尾巴”四句話，到處印發，到處張貼。第四，空軍存在嚴重的“霸王作風”，好大喜功。説我没有原則，對劉亞樓一味遷就，甚至爲劉亞樓助威。第五，説空軍每年對師以上幹部的集訓，系統地一本一本學習毛澤東著作，收效甚微，不符合林彪學習“老三篇”的要求。另外，“三代會”開得太多，形式主義嚴重。第六，説劉亞樓和我没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光批評下面，亂提口號，過于强調高標準、嚴要求，要求過分。第七，空軍大院搞衛生、整内務、植樹緑化，完全是給人看的，是形式主義。第八，抗美援朝戰争期間所上報擊落敵機的數字有假。第九，鋪張浪費，修建機場花錢太多。第十，最後也有少數人攻到了立空軍爲標兵的這個問題，説劉亞樓和我欺騙中央軍委，欺騙林彪等軍委領導人。他們説，空軍建立以來有成績，但劉亞樓和我一直報喜不報憂，光報好的，不報缺點錯誤。因此，空軍不能被樹立爲標兵，這個標兵是假的，建議軍委立即取消空軍的標兵稱號。

就這樣天天轟還不算，常委的幾個同志又提出，要請中央軍委派個工作組來，那個時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初起，不是興派工作組嗎？如六月三日《北京日報》在刊登中央改組北京市委決定的同時，不但公布了新市委的組成，而且還宣布中央派出以張承先爲首的工作組，對北京大學的“文化革命”進行領導。

緊接着，在六月五日以後半個月左右的時間裏，北京市教育系統的絶大部分單位，都被進駐了工作組。除此之外，一些奪權鬥争激烈的單位，如中宣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以及一些外省市的敏感單位，也于六月中旬被派進了工作組，并由工作組代行黨委職權。他們認爲，既然學校和單位能派工作組，那麽，空軍黨委開會，也得請軍委派工作組來。如果軍委也能同意派出工作組到空軍來，那麽我這個空軍司令員、黨委書記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

但結果，軍委决定不派工作組。當時，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正

好因病休息，副主任劉志堅便以總政的名義派來了個工作組。工作組由總政組織部副部長胡愈之爲組長，包括青年部副部長蕭麥萍等三人。他們來參加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住在空軍招待所。此外，主持軍委工作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也直接派了他的秘書李文芳來參加空軍黨委的十一次全會。

說實在的，空軍當時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績，但缺點、錯誤也不少。加上劉亞樓在世時鋒芒畢露，平時對總政的一些人不够尊重，總政有些人對空軍實際上是不怎麽滿意的。所以，總政工作組一來到空軍，常委的一些人就很快同他們搞到了一起。那段時間裏，總政工作組的人見到我和余立金，不說話，不握手，還拉長了一個臉，表示和我們疏遠。可是見到劉震、成鈞、曹裏懷他們就親熱得很，一起吃飯、一起喝酒。有了總政工作組的支持，常委的一些人就更加躊躇滿志，對我和余立金冷嘲熱諷，甚至漫罵。當然，總政工作組三個人的意見也不完全一致，蕭麥萍就和胡愈之的看法不一致。對當時空軍的很多問題，蕭麥萍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曾幾次安慰我說："不要着急，有些情況是會變化的。"

葉劍英辦公室的秘書李文芳是個師級幹部，他一直站在我們這一邊，始終是支持我們的。他認爲，空軍黨委常委一些人的搞法不對頭，完全是一種罷官奪權的地下活動，是小組織行爲，風頭不對，所以他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他告訴我："要沉住氣，讓他們放。"

李文芳的態度顯然代表了葉帥的一些看法，于是，我對他說："我沉得住氣，當不當空軍司令我確實無所謂，衹要事實求是，講道理我就不怕。我怕的是出事故、摔飛機，怕飛機跑到臺灣去，別的我都不怕，讓他們放好了。"

有了李文芳交的這個底，我心裏就更踏實了。于是，我在會議上更是衹聽不說，讓他們盡量放。我衹是告訴黨辦的幾個秘書，要他們把提的一些意見很好地記録下來。

從一開始，參加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的人就形成了三派。這裏面，我和余立金，以及軍區空軍和空軍領導機關的一部分人是一派，我們這派人是天天受氣。劉震、成鈞、曹裏懷、徐深吉、常乾坤、譚家述、王輝球等幾個常委以及軍區空軍的另一部分人是另一派，他們是天天出氣。張廷發是孤立的，他一個人一派，兩邊都不靠。他當時的情況，說得不好聽一點，叫作"坐山觀虎鬥"，他在中間看好戲。不過他也没能看多長時間。會議放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又有些人抓住了張廷發，攻擊張廷發工作蠻横，民主作風差。

大概是到了七月初，在連續批了我們一個來月之後，他們認爲時機已經成熟，應該對我們采取措施了。于是，由劉震牽頭，成鈞、曹裏懷、徐深吉、常乾坤、譚家述、王輝球署名，正式向中央軍委遞交了一份控告信。這份控告信一共羅列了二十五條意見，基本上概括了大家在會議上所提出的問題，其中有十條是針對劉亞樓，另外十五條是對着我的，拉了這樣一個材料。當時林彪在大連休養，這封控告信由劉震打電話到大連，找到"林辦"的秘書，將信的全文傳了過去。

與此同時，成鈞、黄立清、廖冠賢、傅傳作等原紅二方面軍的幾個幹部，又到了軍委副主席賀龍那裏，向賀龍匯報說，空軍黨委正在開會，空軍的問題很多，到現在，已經亂糟糟地開不下去了，吳法憲已經不能主持會議了。據說賀龍當時說："這個會，吳法憲、余立金他們不能開，你們就組織起來繼續開嘛。有話就說，有問題就揭嘛"。這個情况是真是假，我鬧不清楚，因爲我當時没有直接見到賀帥。這些話我當時并不知道，都是以後成鈞他們自己做檢討時講出來的。成鈞、黄立清、廖冠賢、傅傳作他們都同時説到了這一點。

曹裏懷是葉劍英的老部下，會議期間，他向葉帥匯報了空軍黨委全會的一些情況。葉劍英聽了後對曹裏懷說："曹裏懷你要注意呀！"曹裏懷聽不進去，說："我有把握。"葉帥說："你有什麽把握呀？！"

總政工作組的胡愈之，也經常向劉志堅副主任匯報會議的情

况。有一次在匯報時他説：“吴法憲看來是不能再當這個空軍司令了，不能再當黨委書記了，要撤下去。”劉志堅表示同意，説：“對，可能是這樣吧，看看再説。”

在軍委這邊，葉劍英也在天天聽取李文芳的匯報，可以説全部掌握着會議的進展情況。就在劉震他們向軍委寫控告信時，葉帥感到他應該介入了。于是，他首先在電話上向林彪匯報了空軍黨委全會的情况。林彪聽完後説：“他們不僅如此，還告狀到了我這裏，劉亞樓、吴法憲一共是二十五條罪狀。等一下，我讓秘書傳到你那裏去。”接着，林彪開始講他的意見。他説：“空軍這個情况不正常。劉亞樓、吴法憲有缺點、有錯誤，應當批評，但是這種作法不對頭。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機，搞罷官奪權。”

很快，空軍七個常委聯合署名的控告材料傳到葉劍英副主席那裏，葉帥一看心裏更有數了，因爲裏面并没有多少實質性的内容。葉帥看過信以後，就把信轉給了我。

對劉震等人寫控告信這件事，我當時并不知道，我是在看到葉劍英轉給我的控告信後才了解這一情况的。對他們這種背後告狀，我并不在乎，因爲我確實有很多毛病，大家給我“洗洗澡”，我是很歡迎的。可這封控告信裏的有些内容，也確實是站不住脚的。

大概是七月十五日，葉劍英找總政工作組匯報情况。聽完匯報後，他説：“你們哪，到空軍以後的作法不够妥當，你們不找空軍黨委第一書記吴法憲，也不找第二書記余立金，專門找常委的那幾個人，和他們搞在一起，聽他們的一面之詞，你們的這種作法是公正的嗎?!你們是代表總政去參加空軍黨委會議的！你們支持他們，知道他們在搞些什麽名堂嗎？再這樣下去你們也要陷進去了。”

葉劍英這一説，總政工作組警惕了，態度就明顯改變了，胡愈之見到我和余立金也開始講話了。一天，胡愈之和總政工作組幾個人把我和余立金找到總政的辦公室談了一次話，態度非常明朗。他告訴我們：“前一個時期，全會上有一些人亂轟亂批，現在情况已經搞清楚了，是他們背着你們兩個黨委書記搞地下活動，搞罷官奪權，這種作法是錯誤的。”總政工作組態度的這種轉變，很顯然是葉劍英副主席做工作的結果，也説明葉帥的話他們是聽進去了。

從全會開始以後，我就没有打電話到大連去找林彪，即使就在我被攻得最厲害的時候，我也没有和“林辦”聯系，主要是不想給林彪增添什麽麻煩。到七月十七、八日，葉群從大連給我打來一個電話，告訴我説：“這個時期的情况，林總統統都知道了，空軍全會的情况，葉帥經常向林總通氣。現在你要沉住氣，問題會很好地解决的。另外，以劉震爲首的七個人，到林總這裏告你們，這些材料林總要我轉給你，你一看就明白了。”

大概是七月十九日，葉劍英副主席告訴我，林彪的意見已經轉到了中央，到了劉少奇副主席那裏。爲此，劉少奇召開了中央常委會議，通過了林彪的意見。中央認爲，以劉震、成鈞爲首的空軍黨委常委幾個人，是在搞地下活動，搞罷官奪權，他們的目的和動機都錯了。劉少奇副主席還説：“空軍黨委全會的情况，按照共産黨員的組織原則和修養來看，都是不允許的。背着空軍黨委的主要負責人，背後搞非法的小組織活動，也可以叫地下活動。由幾個人合伙搞罷官奪權，是絶對錯誤的，此例不能開，一定要把問題搞清楚。”

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也在這個會上批評了曹裏懷，説：“曹裏懷到了哪裏，就把哪裏搞亂。”這些都是葉帥親自告訴我的。

最後葉副主席還説，軍委常委準備在七月二十日召開會議，包括張廷發在内的空軍黨委常委全部成員都到會，由他來傳達中央常委會議的指示，并研究空軍黨委全會下一步如何進行。

七月二十日上午八點，中央軍委常委會議在北京三座門軍委辦公廳召開。軍委常委到會的有葉劍英、聶榮臻、賀龍、徐向前四位老帥，林彪照例没有出席，陳毅因工作原因也没有到會。根據軍委指示，空軍黨委常委全體成員參加了這個會議，但總政工

作組的成員没有參加這個會議。

在這次軍委常委會議上，首先由葉劍英副主席傳達了中央常委會議的指示。他説，中央常委會認爲，在空軍黨委的這次全會上，有幾個人完全是在搞地下活動，搞罷官奪權，他們的目的和動機都是錯誤的，方法上也是錯誤的，想達到目的也是錯誤的，這是不行的，也是不允許的。這幾個人告的二十五條狀裏没有具體事實，説劉亞樓、吳法憲緊跟彭真、羅瑞卿没有根據，不能成立。最後，葉帥對劉震、成鈞、曹裏懷等人一個一個地點名進行了批評。

葉帥講完，賀龍和徐向前元帥在表示擁護中央常委會議意見後，也各自批評了自己的老部下。賀龍還特别批評成鈞説："你成鈞對吳法憲不支持，站在對立面，想幹什麽？"徐向前也批評徐深吉説："人家空軍想要有四方面軍的領導幹部，才把你從華北調到空軍去，你爲什麽要在空軍裏搞這些活動？"聶榮臻因爲是紅一方面軍的領導，我又是一方面軍的幹部和他的老部下，所以對這事没説太多的話，衹是籠統地批評説："你們搞的這些都錯了。"

我和余立金因爲是當事人，在這個會議上没有説什麽話。但劉震、成鈞他們因受到了嚴厲的批評，一個個都灰溜溜的。劉震説了一句"我們有錯誤"，成鈞也跟着説了一句"我也有錯誤"，其他人都没有説話。

最後，葉帥説："這樣吧，明天召集空軍黨委全體會議，我到會講話，你們去準備吧。"

第二天，七月二十一日，葉劍英來到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并在會上講了三個多小時的話。他首先傳達了中央常委和軍委常委的指示，指出了空軍黨委常委七個人的錯誤，并告訴大家，這個會議要轉過來，不能再這樣開了。

聽了葉帥的講話，參加空軍黨委會議的絶大多數人，都表示擁護中央的指示和葉帥的講話。這樣一來，會議的形勢就一下子轉了過來。

可以説，葉帥爲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順利進行是出了大力的。他一直在全神貫注、認真負責地關注着這次會議，在會議的關鍵時刻，及時向林彪作了匯報，并親自出來講話，使會議走上了正常的軌道。不然的話，空軍當時肯定就亂套了。因此，直到現在爲止，我始終都是對葉帥抱着由衷的感激之情。

葉劍英講完話之後，又下來個别對我説："法憲，你應該先作一個檢討，這樣才好將會議轉過來。你不可能没有缺點錯誤，你這樣一檢討，就主動了。

遵照葉劍英的指示，我找了沈陽軍區空軍司令員曾國華、中國民航總局局長鄺任農、空軍副參謀長梁璞、空司黨辦主任王飛，以及我的秘書王南山、蔡秉林等一些人在一起，認真研究如何寫好我的這個檢討。我們大約準備了一個星期，寫出來一份有兩萬多字的檢討。之所以寫了這麽多，我當時的想法是，盡量檢討得深刻一點、全面一點。我認爲。對自己的錯誤認識得深刻、全面一點，總是有好處的。

另外，我在檢討裏衹講自己的缺點錯誤，不對任何人作任何形式的批評，因爲中央常委和軍委常委都講了話，我如果再講，搞得不好，就會被人認爲是在報復。

寫完檢討，我便將檢討的内容向葉劍英作了匯報。他聽了後，認爲我衹作自我批評的作法很對。但他對我説："不要講那麽多，還是要實事求是，有的講，没有的就不要去講。"

開會時，我在會上連念稿子帶舉事例，一共檢討了七、八個小時，用了整整一天的時間。在這個檢討中，我把自己到空軍以來的情況作了一個全面的回顧。我認爲做對了的，以後就要堅持，做錯了的就檢討，以後要逐步進行整改。

我的這份檢討以及講話記録，都留在了空軍的有關檔案中。由于時間相隔太久，我又無法去查閲檔案，僅憑記憶，不大可能把所有的内容都回憶起來，能記住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我首先對空軍建軍以來的基本工作進行了肯定。我認爲，從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開始組建空軍司令部、組建航校以來，空軍的

建設都是在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并且都是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的直接領導和幫助下開展工作的。空軍的一切工作，都是按照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的指示進行的。空軍的建設，較好地貫徹了黨中央的路綫、方針和政策，是向着“建設一支强大的人民空軍，保衛祖國領空，準備戰勝侵略者”這個目標，不斷奮鬥前進的。

我說，我們提出“在陸軍的基礎上建設空軍”的建軍方針，是經過黨中央、中央軍委批準的。我們所講的“在陸軍的基礎上建設空軍”，就是說要繼承和發揚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軍的光榮傳統，要在人民軍隊過去的光榮傳統上來建設空軍，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還提出，要在黨中央、中央軍委的統一領導下，依靠各大軍區，依靠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和政府，依靠全國人民來建設空軍，要争氣，要艱苦奮鬥，這些提法也都是正確的。

我說，我們提出不能辜負全黨和全國人民希望有一支自己的空軍部隊的願望，强調學習現代化的航空技術和各種知識，强調組織性、紀律性，强調高標準、嚴要求，强調由上到下、以身作則，這是非常必要和正確的，不這樣我們就不能很好地完成黨中央、中央軍委交給我們的任務。我們還强調，空軍各級黨委所有的同志都要緊張地工作，從空軍建軍以來，我們每天工作差不多都是在十個小時以上，這些也都是對的，没有大的錯誤。

我還針對有人說空軍是假標兵的說法，進行了駁斥和解釋。我說，空軍這個標兵不是假的，不是我們自己要立空軍爲標兵的，我們更没有欺騙中央和軍委。劉亞樓代表空軍黨委總結的五十多條經驗教訓，那都是一條一條按照事實來進行總結的，每一條都是事實。我們并不願意被立爲標兵，主要是考慮當標兵的壓力太大，負擔太重，這個排頭兵不好當。况且，立空軍爲標兵，不是劉亞樓、吴法憲能够說了算的，甚至也不是林彪個人所能定的。首先是北京市委把空軍大院樹立爲衛生標兵，這引起了林彪的一些想法，然後由他報告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經中央和毛澤東同意之後才樹立起來的。

我還說，報喜不報憂的情况也是不存在的。空軍哪一次出了事故、摔了飛機，哪一次仗没打好、貽誤了戰機，或哪一次仗打好了，打下了敵機，都是向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寫出報告，作出分析了的。再說，打下的敵機有殘骸，打中的敵機有膠卷在，都是有案可查的，說我們所報的擊落飛機數量有假，是没有根據的。

我認爲，在我的檢討前面說這些是十分必要的，因爲空軍建軍以來所取得的成績是主要的，對這些成績必須要旗幟鮮明地加以肯定。這不是劉亞樓和我等幾個人的事情，而是空軍全體同志在黨中央、中央軍委的領導下，經過多年努力工作得來的，在這個問題上絶對不能有任何的含糊。所以，我一定要在自己的檢討前面加以說明。

除了這幾條以外我就是檢討自己。我檢討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十幾個方面：

一、我到空軍以來，對領導空軍的工作很不得力，這主要是因爲我以前一直是搞陸軍工作的，没有搞空軍的一套經驗和知識，一切全靠自己在實踐中學習和摸索。就空軍的政治工作來說，在怎樣把政治思想工作同空軍的技術工作相結合、同空軍的實際相結合這個大問題上，我雖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真正做好。由于我從一九五〇年到空軍工作以來，就一直負責空軍的政治工作，所以，凡是空軍政治工作方面的缺點和錯誤，統統都應當由我來負責。

二、空軍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是按照中央、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的。但是在一些運動過程中，有時候打擊面過大，鬥的人過多，致使有些人蒙冤，被錯整或被處理過嚴。這些責任都應當由我來負責。

三、空軍建設中有鋪張浪費的現象。爲了建設空軍，盡管在百廢待興、國力艱難、財政十分緊張的建國初期，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及財政部都是竭盡全力，給空軍撥了不少款。各中央局和各省、市黨委，對各大軍區空軍也都是大力支持。使我們感

到內疚的是，由于對下屬人員教育不够，使得一些部隊在修建機場、營房等各項基本建設中間，有鋪張浪費的現象出現。另外，在"三反"中間，我們空軍也發現了貪污分子，甚至還抓出了一些"大老虎"。這些責任，也應當由我來負責。

四、空軍建設以來，空中事故、地面事故不少，每年都差不多要摔掉二、三十架飛機，還跑了一架飛機到臺灣去。這些錯誤，我也應當負責。

五、調查研究不够。對空軍這樣一個新的技術兵種，我没有很好地去進行調查研究，没有培養和發現更多更好的典型。因此在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如何緊密結合空軍的實際情況和技術工作方面，產生了不少問題。

六、在修建機場方面，有違反政策的地方。如在修建河南長葛機場時與地方發生了糾紛，脱離了群衆，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滿。後來雖然糾正了錯誤，并且向中央寫了檢討，但是這件事情的影響很不好。

七、在一次戰鬥中，我們在海南島把一架從印度飛往香港的英國運輸機打傷了，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批評。這件事不但使國家遭受了經濟損失，陪了錢，還嚴重影響了國家的聲譽。應當説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故。

八、對部隊的組織性、紀律性要求不够嚴格，并因此出了不少事故，犧牲了一些飛行員。這些痛苦的、深刻的、血的教訓，應當深深地引以爲戒。究其原因，這是由于我們雖然搞了不少安全運動，却是電報發得多，文字要求多，而落實到各方面的實際比較差，所以才會經常發生事故。當然，出事故較多，也有飛機質量不够好、一些零備件不過關的緣故。盡管當時的飛機制造工業不歸我們管，但在飛機質量的問題上，我們也有責任，因爲我們在那些相關的工廠裏都派駐有軍代表。

九、空軍在作風上確有驕傲自滿情緒，鋒芒畢露，而且有形式主義、好大喜功的傾向。例如對衛生過分的要求，這就是形式主義的表現。還有，對下面的要求太高、太嚴，常常是批評下面

多，自我批評少，這些情況都是存在的。但是，我們的目的不是整人，我們也没有隨便撤職查辦過一個幹部，主要是進行教育。空軍的老幹部很多，將軍也不少，這些老同志對空軍建設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些我們是承認的，不過其中也有少數人保守思想嚴重，不接受新鮮事物，經常在新事物前裹足不前。對這一傾向，我們應該批評。空軍是個現代化的軍種，不經常學習，就無法適應空軍的發展需要。

十、空軍搞了好幾個戲劇，如《江姐》、《年輕的鷹》、《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等，都得到了好評。在全會上有人提出，我們工作的方向錯了，説我們不管空軍的主要工作，而去抓什麼文藝表演，還邀請中央首長來觀看演出，這是沽名釣譽。我認爲，這種説法不是事實。空軍的文化工作也是政治思想方面的一項重要的工作，應該抽出一定的時間和精力去抓。而且我們在抓空軍文化工作的同時，也并没有放鬆其它的主要工作。

十一、在搞基地化的問題上（所謂基地化，就是基地不動，飛機飛到哪裏，就由哪裏負責地面保障），我們在没有經過很好準備和試驗的基礎上就推廣了，結果出現了很多問題，引起整個空軍上下對此都有意見。由于各飛行大隊的飛機機型各异、情況不一，飛行大隊和地勤大隊、場站供應脱離以後，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一些問題。可以説，在這個問題上，没有經過充分準備和試驗就想進行獨創，是我們犯的一個較大錯誤，也是我們以後一定要注意認真汲取的一個經驗教訓。

十二、在學習蘇聯的問題上，我們有教條主義的傾向。空軍建設初期，蘇聯對我們的幫助很大，不論是在人力上，還是在物力上，他們都給予了很大的支持，給了我們不少飛機，派了不少的專家。當時我們的想法是，先原封不動地把蘇聯的經驗照搬過來，再結合中國的實際加以改進。因爲在開始的時候，我們還什麼都不會，飛機飛不起來，地空導彈不會用，不按照人家的學習怎麼辦哪！所以，在一開始時，我們没有自己的條例、條令和教材，一切都照搬蘇聯的。當時祇有先學會了人家的那一套，然後

才能再搞我們自己的這一套，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我認爲，我們當時的這個想法是對的。在這個問題上的主要不足是，我們到一九五九年以後才由劉亞樓親自主持，開始搞自己的條例、條令和教材，這顯然是晚了一點。不過，盡管是晚了一點，我們最後還是把中國空軍自己的條例、條令和教材搞出來了。當然，這裏也有一個客觀原因，就是這一工作衹有在蘇聯顧問全部撤退以後，我們完全獨立了，搞自己的這一套才有可能。

十三、空軍開始建軍的時候，由于缺乏經驗，編制過于龐大，人員過多。

十四、提拔飛行幹部不够快，不够大膽。空軍初建時期，團、師以上幹部大都不會飛行，是外行領導内行。以後有了一定的基礎，我們就强調，各級領導班子要配備飛行人員。起初是團、師一級，以後是軍一級，我們都相繼配備了飛行人員，可是軍區以上的主要領導幹部目前還没有飛行人員。就這樣，有些人還批評我們這是過分强調飛行，是單純技術觀點。不過我認爲，在這一問題上，我們還是有保守思想，如果早一點把一些飛行幹部，如把王海、張積慧、劉玉堤等抗美援朝時期的一批戰鬥英雄，提到主要領導崗位上來，我們空軍的發展可能還會更快一些。没有及時、大膽地提拔專業技術好的飛行幹部，這是我們工作中很大的一個失誤。因爲像我們這些幹部，由于自己不會飛行，不懂技術，就衹能説空話。劉亞樓也常常説，我們這樣的幹部，衹能是過渡幹部。

在我的檢討中，還有一部分是代表劉亞樓作的。劉亞樓雖然去世了，但作爲他在空軍工作期間的主要助手，我理應代表他對工作中的一些缺點和不足，作一個檢查。

劉亞樓這個人有很多的優點和長處，但在思想上却的的確確有驕傲自滿情緒。他平時對事對人，總是鋒芒畢露。據我所知，“鋒芒畢露”這四個字，是林彪對劉亞樓的批評。他經常對同級幹部、對下級幹部的批評過于苛刻，過于諷刺挖苦，尤其是對同級幹部的尊重很不够。在工作中，他説什麽就必須是什麽，人家

一聽反對意見，他心裏就不痛快。所以大家都説，劉亞樓有“霸王作風”。我自己也認爲，這是劉亞樓身上存在的最大缺點。對劉亞樓的這種作風，我曾不時向他提出過意見，也曾把大家的意見向他反映過，可在這個問題上他始終没有什麽明顯的改正。直到他去杭州主持編寫條令，身體開始不好了以後，我就没有再向他提過了。所以我這次也替他向大家作了檢討。

但是，劉亞樓已經去世了，我希望大家學習劉亞樓的長處，對劉亞樓的不足之處，衹能引以爲戒。畢竟劉亞樓對空軍的建設是有功勛的，尤其是空軍建設的初期，部隊迅速擴大，機構不斷增多，幹部來自四面八方，大家都對空軍的一整套技術業務非常生疏，而且當時戰争狀態還没有完全結束，國民黨軍的飛機不斷進入大陸，這使得我們的建軍工作一開始就存在着很大的困難。緊接着，在空軍部隊并没有真正組建好的情况下，中央又下達了要求空軍部隊立即參加抗美援朝的作戰命令。在這種情况下，要團結和領導空軍幾十萬幹部、戰士共同完成任務，其困難是可以想象的，這就迫使劉亞樓不得不要求空軍各級黨委和全體幹部、戰士都要雷厲風行，令行禁止，緊張地工作，否則就不能在保衛祖國領空和抗美援朝的戰鬥中打下敵機，立下戰功，也不可能把空軍部隊帶出一個好的戰鬥作風和工作作風來。

另外我還特别指出，不僅劉亞樓有“霸王作風”，我也有，空軍黨委的其他同志同樣也有。我對别人的批評也過于苛刻，有時缺乏分析，還有好大喜功的思想，喜歡聽悦耳之言，不喜歡聽反面意見。

這些年來我常常在想，如果劉亞樓没有在一九六五年去世，以他的性格和與林彪的關系，他必定會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下去。如果真是那樣的話，後來被監禁在秦城的，將會是他，而不是我。

我在會上檢討完并通過後，會議就告一段落。接着，會議轉入第二階段，開始批評劉震、成鈞、曹裏懷等人，要他們進行自我批評。

七月底，林彪從大連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說，空軍黨委的這次全會，一定要全部按照中央常委、軍委常委和葉劍英副主席的指示辦事。除劉震和張廷發之外，一定要把空軍的大多數人團結起來，從工作上、感情上團結在一起，把空軍的工作搞好。對犯錯誤的同志，主要是進行批評教育，要抱着與他們團結共事的態度，不要傷害他們，衹要他們檢討認錯，表示今後願意在軍委的領導之下，願意在三總部的領導之下，在空軍黨委内部團結一致、搞好工作，有這一點就行了。

遵照林彪的指示，我同余立金商量，對劉震等人的批評要適可而止，搞得過頭了不好，不要像他們對我們那樣去對待他們。本着這種精神，劉震等七位空軍黨委常委除了在大會上先後作檢查、進行自我批評以外，主要就是在小組會議上，由大家對他們作了一些批評。我和余立金都没有再説什麼。直到會議的最後，我和余立金才一個一個地找每位常委談話，然後又同各軍區空軍的一些同志分别談了話。會議結束後，各軍區空軍的同志離開北京時，我和余立金還專門到機場去爲他們送行。

在常委一些人的檢查過程中還發生了一件事。首先是成鈞在檢查中講到，會議進行中的一天晚上，他和傅傳作、黄立清、廖冠賢四個人到了賀龍那裏，向賀龍匯報了空軍黨委全會的一些情况。賀龍聽了以後説："這個會議吴法憲、余立金不能主持了，你們就組織起來開嘛！你們繼續講你們的意見嘛！吴、余有錯誤，你們就繼續揭嘛！" 成鈞講了這件事以後，黄立清、廖冠賢、傅傳作他們幾個人也先後在自己的檢查中談到了這件事。

大概是八月七日，林彪從大連回到北京，住在人民大會堂的浙江廳。八月九日，林彪把我找了去，要了解一下空軍全會的情况。當我講到成鈞他們四個人曾經到了賀龍那裏，向賀龍匯報空軍全會的一些情况和賀龍的表態時，林彪説："這件事，你要他們寫一個材料，然後送給我。"

回到空軍，我就找到成鈞他們四個人，要他們實事求是地把這些情况寫出來。然後，我和余立金以我們兩個人的名義，將這

此材料送給了林彪。我們還附了一封短信。信的大意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現送上成鈞、黄立清、傅傳作、廖冠賢四人所寫的材料，請閲。現在看來，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之所以開成這樣，是因爲有兩條綫操縱着。一條是以林副主席爲首的一條紅綫，貫穿着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的始終；另一條是以賀龍元帥爲首的黑綫，在控制着這次會議。"

材料是林彪要的，成鈞等四個人寫的，但信中"兩條綫"的提法是我和余立金加上去的。這個問題我經過反思，當時這樣對賀龍元帥無限上綱，是非常錯誤的。

這個情况，就是一九八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書上所列舉的"林彪指示吴法憲編造誣陷賀龍在空軍陰謀奪權"這一條罪狀的來龍去脉。在這個問題上，我承認，我們這樣對賀龍無限上綱，是非常錯誤的。但是，説我們"編造誣陷"，却不是事實，因爲材料是成鈞他們寫的。我們衹是把别人寫好的材料轉交上去而已，不存在我們編造的問題。

八月下旬，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第二階段結束。在這一階段中，絶大多數同志都認真地檢查了自己，受到了教育。最後，我們這個會議還是開成了一個團結的會議。

根據林彪和葉劍英的指示，我們在向軍委寫了報告并得到批准後，對劉震和張廷發兩個人宣布了停職檢查的决定。

對劉震進行停職處理，是因爲這次風波是他挑的頭。但爲什麽還要對張廷發也進行停職檢查呢？

在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第一階段，劉震等人除了把矛頭對着劉亞樓和我以外，還針對着張廷發。很多人都説，張廷發這個人很驕傲、很霸道，處處訓人。我認爲，這些批評是對的。張廷發有很多優點，他有能力，有魄力，工作積極肯幹，因此我們向軍委建議，將他由空軍參謀長提爲副司令員。但是他有個致命的缺點，就是嚴重脱離群衆。也許是因爲劉亞樓在世時，有一度曾經想把他培養成爲自己在空軍的接班人，因此，張廷發更加蠻横和目空一切，對空軍的一些老同志很不尊重，并且與司令部一

些同志的關系也搞得很僵，大家對他的意見很大。十一次全會開始以後，我在他“坐山觀虎鬥”時，就在心裏想，劉亞樓生前對你張廷發不錯，現在那些人如此攻擊劉亞樓，你至少也應該站出來爲劉亞樓説幾句公道話吧。可他就是一句話也不講，祇想一個人脱離出來。

大概是軍委領導對張廷發這個人的情況也有所耳聞。葉劍英副主席聽到了下面的一些反映，要李文芳轉告我説：“張廷發可以停職，他太脱離群衆了。停職不是撤職，教育一下，轉變過來了，還可以復職嘛！”

遵照葉劍英的指示，我和余立金一起給中央軍委寫了報告，請示對張廷發進行停職。報告送上去以後，很快就批了下來。在張廷發被停職的問題上，我們祇是被動地執行軍委領導的決定，甚至可以説軍委作這樣的決定還有點出乎我的意料。至于軍委領導爲什麽要决定停張廷發的職，我至今也不清楚具體原因。

根據軍委領導的指示，除了對劉震和張廷發兩個人進行了停職檢查的處理以外，對其他人我們則一概不動，祇是希望他們能接受教訓，團結共事，共同搞好工作。

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第二階段即將結束時，我主持召開了一次空軍黨委常委會議。我和余立金在會上提出，要組織人寫一個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大事記，把會議的過程全面地寫一個紀要；要整理和保存葉劍英副主席在全會上的講話；把這次會議的大小記録全部保存起來，把所有人的發言記録在案；常委七個人聯名告狀的二十五條也存檔；成鈞等四個同志到賀龍元帥那裏的匯報材料以及我的檢討，也都要全部存檔。

會後，空軍有關部門按照這一原則，對會議的所有材料進行了處理和保存。應該説，所保存的這些材料，都是最原始的，是確實可信的。盡管後來空軍黨委的變化很大，但是我想，如果没有人有意銷毁，當年存檔的這些材料應該都還在。

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體會議還有一個第三階段，這就是擴大會議的階段。中央軍委常委會議决定，從九月一日起，空軍黨委應當召開一個擴大會議。對此，葉劍英具體指示，空軍團以上幹部都應該來參加這個會議。但我們考慮，整個空軍團以上的幹部人多了，都來了我們没有那麽多的地方讓他們住，于是提議改爲師以上的幹部到會。葉劍英副主席最後同意了我們的意見。

這次會議的重點，是傳達黨的八届十一中全會精神，然後通報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情况，傳達中央常委會和軍委常委會的指示，傳達林彪和葉劍英的講話。

擴大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正好病愈恢復工作。在了解了情况之後，他召集參加空軍黨委擴大會議的全體同志在京西賓館開了個大會，再次傳達八届十一中全會精神。同時，他還根據林彪和葉劍英關于空軍問題的指示，結合空軍的實際情况，講了幾個問題。他在講話中對空軍黨委明確表示了支持，并對空軍工作好的地方予以了表揚和肯定。因爲蕭華是空軍的第一任政委，對空軍的情况是了解的。

蕭華的這次講話，是繼葉副主席講話以後的又一次重要講話。蕭華講話以後，葉劍英副主席又專門接見了參加會議的全體同志。最後，在九月十日，歷時三個多月的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體會議終于結束了。

就在會議即將結束的時候，空軍機關司令部、科研部、工程部的一些人，已經在會場上貼出了大字報，指責空軍黨委的這次會議是個馬拉松式的會議，開了好幾個月還開不完，應當趕緊結束，開始在空軍搞“文化大革命”。

這些大字報，意味着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雖然結束，但“文化大革命”却已經在空軍中悄然開始。從此，整個空軍就一直没有平静過。

三、接林彪回北京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由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開始以後，毛澤東先于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向各大、中學校派工作組的行爲，進行了嚴厲地指責。然後，他又于八月五日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點名地對劉少奇進行了更加嚴厲的指責。當時知道這些事情的人很少，所以我當時并不知道。

據我的了解，八届十一中全會的前一段會議，林彪并没有參加，仍然住在大連休息。

在毛澤東寫下他的“第一張大字報”之後兩天，八月七日晚九點鐘左右，我接到周恩來的電話指示，要我在第二天，即八月八日上午派專機去大連，把林彪和葉群接回北京。周恩來還特別交代：“要絶對保密。這件事情，衹準你一個人知道，不能告訴任何人。”他同時還規定，飛機返回北京西郊機場的降落時間，要直接報告他，他要親自去接。其他的人，除了我可以去機場接林彪外，任何人都不要去。至于大連林彪那裏，由他直接去電話聯系，就不用我管了。我當即表示：“一切遵照總理的指示辦理，請總理放心。”

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八月八日一大早，我就派出專機赴大連去接林彪。上午十點半，從大連返回北京的專機降落在西郊機場。飛機降落時，周恩來已經先期趕到了機場。

根據周恩來的要求，飛機滑到機場跑道的北頭停下，没有像往常那樣進入停機坪。機艙門一打開，周恩來就立即登機去見林彪。我就在飛機下面等候。就在這個時候，汪東興也匆匆趕到了機場，同我打了聲招呼後也很快進入了機艙。汪東興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是代表毛澤東來迎接林彪的。

周恩來、汪東興和林彪幾個人在機艙裏談了大約有半個多小時，至于他們在飛機裏談的是什麼，我就不知道了。不過他們幾個人下了飛機以後，我聽見周恩來問林彪，是不是先到毛澤東那裏去一趟。他還問林彪，天氣很熱，是不是就住在人大會堂浙江廳，因爲那裏裝有空調，并且已經通知他們作了準備。林彪下飛機以後，我本想和林彪説幾句，但看見林彪當時表情很嚴肅，就没敢上前搭話。

就這樣，周恩來把林彪接走了。汪東興和葉群走在後面，他倆的談話，我從旁邊聽到了幾句。我聽見汪東興告訴葉群，説毛澤東和江青都同意把李納放到《解放軍報》社去當記者，是否請林彪轉告蕭華安排一下。葉群當時很高興，説：“主席信任解放軍，才把女兒送到《解放軍報》社來當記者，我們熱烈歡迎。我一定盡快轉告林總，把這件事情安排好，請主席和江青同志放心。”説着，他們兩個人也坐車離開了機場，可能也是去了人民大會堂。他們走後，我隨即坐車回到了空軍大院。

盡管我這次也去機場接了林彪，却對毛澤東、周恩來爲什麼要急于把林彪接回北京，是一點也不知道。因周恩來和汪東興對我都是點滴不露，這件事對我來説就是悶葫蘆一個。

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八號那天下午，周恩來突然之間又來電話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開會。我整八點準時來到了福建廳，當時廳裏還没有人到，就數我到得早。我剛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他人陸陸續續地來了。我記得參加那天會議的有楊成武、張愛萍、蕭華、許光達、蕭勁光、蘇振華等人，還有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總共大約有二十多人。我們這些人都是周恩來親自通知來開會的，但都不知道開的是什麼會議。于是，大家没有事，就一邊等，

一邊扯亂談。等了大約有兩個多小時，先是陶鑄來到福建廳，隨後周恩來也到了。周恩來一來，就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紙說："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寫的一張大字報，是手稿，我念給你們聽聽。"

周恩來所念的，就是以後衆所周知的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是何等的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爲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對這張"大字報"，周恩來一連念了兩遍。念完之後，他又說："現在看來，多年的事實證明，劉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來想培養劉少奇當接班人，現在看來不行了，他辜負了毛主席的希望。現在中央決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劉少奇，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現在先通知你們一下，暫時不要再往下傳，就你們知道就行了。待中央決定往下傳達時，再通知你們。"

聽了周恩來所念的"大字報"和他的一番講話，我這才恍然大悟：急着要把林彪接回北京，原來爲的就是這個！

毛澤東的"大字報"没有點名，可是誰都知道，實際上指的就是劉少奇，還有鄧小平。聽了周恩來的一番提示，大家心裏也就清楚了。毛澤東的這張"大字報"，由五十多天前派工作組的矛盾開始，一直扯到了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是新帳、老帳一起算。尤爲令人感到震動的，是毛澤東在"大字報"中，公開提出了中央存在兩個司令部的觀點。這篇所謂的"大字報"，全文不過二百多字，可實實在在是字字千鈞，哪個能擔待得起呀！

我當時的感覺十分矛盾：對林彪即將出任中央第一副主席，我心裏當然很高興。但是，我對劉少奇也一向是很尊重的，從在蘇北接受他的直接領導以來，我一直都認爲他是一個黨性强、能堅持原則的好領導，特別是他主持的中央常委會議解決了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的問題，我更是深懷着感激之情。

我看了看在座的其他人，發現他們雖然都很驚訝，但因爲對當時的情况不知道底細，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情，所以都沉默不語，誰也没有發言。這些同志的資歷都比我老，軍銜都比我高，他們都不講話，我就更不敢隨便講話了。所以，我没有露出任何情緒。

當時在場的陶鑄，也没有講話。周恩來講完以後，他們兩個人就一起走了。會也就散了。

關于這件事，直到一九六七年秋，周恩來才告訴我一點情况。那時我已經參加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一天，周恩來要我和他同乘一輛車，去人民大會堂參加一個會議。在車上周恩來告訴我，八届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曾問他："看來劉少奇不行了，我對他觀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對鄧小平也觀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劉少奇拿下來，現在怎麽辦?"他回答説："那就衹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劉少奇最合適。"他説完後，毛澤東點了點頭説："好，那就把林彪接來北京吧。"

當時在毛澤東開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單上，副主席是兩個，一個是林彪，一個是周恩來。名單傳到周恩來那裏時，周恩來表示謙虛，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這樣，林彪就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五、列席八屆十一中全會

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正是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緊張階段。八月十二日上午，我正在主持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時，接到軍委辦公廳的通知，要我下午三時到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列席八屆十一次全會的閉幕式。

下午兩點半鐘，我提前來到了東大廳會議室。因爲是列席人員，我就坐在了最後一排，同曹軼歐坐在一起。當時我還不認識她，也不知道她是康生的妻子，衹是估量着她和我一樣，也不是中央委員，是列席會議的，所以才坐在最後一排。

那天的會議給每個與會者發了一個文件袋，裏面有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印發的四個會議文件。第一個文件，是毛澤東八月五日所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第二個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一封公開信。

這裏順便說說毛主席給紅衛兵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五月底，在北京清華附中的一些青年學生，開始組織了全國第一個造反組織，并起名叫做"紅衛兵"。"紅衛兵"開始是秘密組織，和劉少奇、鄧小平派到清華附中的工作組進行鬥爭。不久北大附中、地質學院附中等其它中學也相繼出現了紅衛兵的組織。

這些紅衛兵，利用了一次江青到清華附中視察的機會，將他們所寫的"論無産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文章交給了江青，并希望得到毛澤東主席的支持。這一下毛主席找到了機會，便大做文章，親自寫信給清華附中紅衛兵，信中說："你們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剥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産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信中還說："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采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們采取同樣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

和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一樣，這封信火藥味道十足，上綱上綫。這兩個文件的印發，就等于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對立態度公諸于衆，允許紅衛兵們去攻擊劉少奇的所謂"資産階級司令部"。

第三個會議文件，是八月八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條》）。這個文件明確規定："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産階級的反動的學術'權威'，批判資産階級和一切剥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文件指出，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方法，是用大字報和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决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産階級代表人物舉行進攻，讓群衆自己教育自己。

最後一個會議文件，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即後來被稱之爲"政變經"的那個講話。林彪的這個講話，除了以大量的篇幅談及政權和政變的問題以外，還歌頌毛澤東是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之後的天才。他說："毛主席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國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他還說："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作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據我所知，把林彪的講話印發中央全會，這還是第一次，足見他的那次講話，在當時的確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贊賞和重視。

閉幕式快要開始的時候，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董必武等中央領導人進入會場。頓時，全場歡聲雷動，大家熱烈鼓掌。

各位領導人就座以後，毛澤東主持了閉幕式。他首先宣布開會，接着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公報》熱烈頌揚了毛澤東："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公報》還贊揚了林彪，認爲"林彪同志號召人民解放軍在全軍展開學習毛澤東同志著作的群衆運動，爲全黨全國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公報》順利通過後，會議就開始進行選舉。這次選舉，實際上是對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進行調整。我没有選舉權，祇是看到了選舉的情況。選舉結果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來的七人增加到了十一個人。這十一個中央常委的排列順序爲：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劉少奇的名字從原來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則上升到了第二位，并成爲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同時，會議還增選了陶鑄、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爲中央政治局委員，補選了李雪峰、宋任窮、謝富治爲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另外，通過選舉，會議還改組了中央書記處，撤銷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和楊尚昆的候補書記職務，補選了謝富治、劉寧一爲中央書記處書記。

選舉結束後，毛澤東發表了講話，主要講要籌備九大、執行正確決定和要給犯錯誤的同志出路。毛澤東講完，林彪又作了一個簡要的講話，接着便宣布散會。

我列席八屆十一中全會，雖然祇有一天，但是目所睹、耳所聞，對全會的情况還是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可以看出，八屆十

一中全會的鬥争鋒芒，首先是直接指向劉少奇和鄧小平。實際上，這是毛澤東以會議的形式，來解决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問題，儘管當時在表面上還保留了他們的一些職務，但實際上他們已被拉下了馬，而且注定了不久後被徹底打倒的命運。

六、中央工作會議

十一中全會結束不久，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毛澤東將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國務院各部、委的負責人，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主要負責人，召集到一起，在北京舉行中央工作會議，并親自主持了這個會議。我接到軍委的會議通知，參加了這個會議。會議的主要方式，是開大組會議。我被編入東北大組，由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任組長，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任副組長。

會議地點就在新落成的京西賓館，會議的主要内容是學習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和《中共中央關于開展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重點是批判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鎮壓群衆的問題"。看來，毛澤東召開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意圖，是要把劉少奇和鄧小平的錯誤，公布到全黨。

會議原定祇開三天，後來一拖再拖，一直到十月二十八日才告結束，前後一共開了二十天。在這個會上，最活躍的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們，如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人，他們在各大組之間到處竄，不停地指責各省、市、自治區，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解放軍各部門的負責人，説他們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到處鎮壓和破壞"文化大革命"，打擊學生和紅衛兵小將。

除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以外，參加這次會議的多數人説話都很少，即使發言，也大多是三言兩語，表個態而已，對劉少奇

和鄧小平沒有多少意見可以講。我則基本上沒有發言。

眼看着會議開了十天，局面還是沒有打開。經過中央文革小組提議，周恩來親自指揮我派出飛機，去各地接造反派的頭頭來北京參加會議，揭發問題。

我們東北組來的是貴州造反派頭頭，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辦公廳派專車接到京西賓館，神氣十足。他來了以後，周恩來親自到東北組來參加會議，以示重視。他滔滔不絕地一直講了三個鐘頭，專門揭發當時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正林等人如何破壞“文化大革命”，如何鎮壓學生運動和逮捕紅衛兵的情況。我看到，在這個人講話過程中，周恩來一直在頻頻點頭，贊揚他的揭發。

讓各地的造反派來會上點火的這一招還真管用，這些人一來參加會議，會議就逐漸掀起了高潮。特別是圍繞着派工作組的問題，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意見就開始多了起來。很多人發言都認爲，派工作組是錯誤的，工作組一進門，就把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從而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大家都表示，擁護毛澤東關于撤銷工作組的決定。

關于派工作組的問題，在這之前毛澤東曾經説過，他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的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他還説，誰反對“文化大革命”？是美帝、蘇修、日修、反動派。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有人天天説走群衆路綫，爲人民服務，而實際上是走資産階級路綫，爲資産階級服務。全國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綫錯誤，執行了一條資産階級反動路綫。

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親自召集了一次全體會議，講了幾十分鐘的話。大致上是講“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要求各級黨委和負責人挺身出來領導運動，不要怕群衆，要到群衆中去先做學生，後做先生，要引火燒身。

説實在的，聽了這些話，當時我就在心裏想：這樣引火燒身的人有嗎？誰能甘心情願地讓群衆轟，讓群衆罵，讓群衆搞“噴氣式”，讓群衆挂牌游街、亂轟亂鬥，進行人身侮辱?！又有誰能以身作則，站出來讓群衆鬥？就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也未必能够這樣做！以我的内心來説，我就不願意。但是，毛澤東又號召我們要這樣做。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怎樣去應付以後即將發生的問題。我當時很有些彷徨不定，無所適從。

在這終于逐漸形成的會議氣氛下，劉少奇、鄧小平被迫在會上作了檢查。

十月二十三日晚，在京西賓館二樓第一會議室召開全體會議，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等中央常委，以及國務院的各位副總理，軍委的各位副主席全都到會。

會議開始以後，毛澤東要林彪主持會議。林彪當即宣布説：“今天晚上的會議，是由劉少奇和鄧小平同志作檢查。”到會的人一片沉默，整個會場鴉雀無聲。劉少奇開始念他已經寫好的稿子，承認他對“文化大革命”中的群衆運動受挫負有責任。他還説，他對怎樣進行“文化大革命”心中無數，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制定“資産階級反動路綫”是認識問題。他還表示，他聽候黨的考驗和審查，遵守黨的紀律，絶對不搞地下活動和派别活動，保證做到一個共産黨員應該做的。

鄧小平的檢討就更簡單，我記得他衹檢討了“專擅”兩個字，至于“專擅”兩個字的下面究竟有什麽具體内容，他没有去説。

劉少奇和鄧小平兩個人檢討以後，林彪問毛澤東還有什麽指示没有，毛澤東立起身來説了幾句，大意是劉少奇、鄧小平兩個人犯錯誤，他也有責任，他也要負責等等。至于别的問題，我就記不清楚了。

這次會議結束以後，會議的情況很快就被人捅到了社會上。十一月初，天安門前就出現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從而把毛澤東發動“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目標——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向全世界公開了。

從此，我就再没有見到過劉少奇和鄧小平。很可能從這次會議之後，他們就遭到了軟禁和監視，没有了行動自由。

七、八次接見紅衛兵

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和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當時雖然没有公開發表，但是還是很快就傳遍北京，傳遍全國，在社會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動。此後，紅衛兵作爲一種政治力量，進入了中國的歷史政治舞臺。這些本來無權無勢的大、中學校學生組織，之所以能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翻江倒海，主要還是由于有了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開始利用年輕學生的熱忱和無知來大鬥"黨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了毛主席的大力支持、撑腰，這一下，紅衛兵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搞起來了。毛澤東對紅衛兵的支持，尤其是以他在北京八次接見了紅衛兵而著名。

以後一次周恩來對我説，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在杭州召開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就説："全國各地的學生要去北京，應該贊成，應該免費，到北京去大鬧一場，才高興哪！"正像毛主席自己説的：他要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八届十一中全會閉幕之後不久，爲了表示自己對紅衛兵運動的支持，毛澤東决定于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首都各界慶祝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大會"，他要親自接見紅衛兵。他的這一舉動，可以説是史無前例的。那一天，毛主席親自挂帥，穿上了緑軍裝，登上天安門，檢閲紅衛兵。他接受了紅衛兵給他戴的紅衛兵的袖章，表示他願意當他們的"紅司令"，從此領導全國紅衛兵，更加猛烈衝擊"黨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每次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重大慶祝活動，都有一個防空警戒的問題。八月十八日那天，爲了保護毛澤東等人的安全，我以空軍司令員的身份，于清晨五點鐘就上了天安門城樓，親自執行防空警戒的任務，因此看到了大會的一些情况。

那一天，從凌晨一時開始，百萬紅衛兵和群衆就開始陸續進

入廣場，其中有一千多名紅衛兵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數萬紅衛兵登上金水橋兩側的觀禮臺。天安門城樓和觀禮臺從來都是舉行盛大慶典時，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各部門高級官員才允許上去的。讓群衆特别是年輕的大、中學生們登上這些地方，這是建國以來從没有過的。

九時半左右，毛主席、林彪以及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毛澤東出人意料地穿上了一套嶄新的草緑色軍裝，頭戴一頂綴有紅五星的新軍帽。然後，我看到他在天安門城樓的休息室裏，一邊等待大會的開始，一邊和林彪、周恩來、陳伯達一起審閲和修改大會的講話稿，也許是因爲稿子寫得有些匆忙。

十時正，慶祝大會正式開始，在《東方紅》的樂曲聲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宣布會議開始，并致詞。在他的致詞中，非常醒目地給毛主席加上了"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三個頭銜。

接着，林彪講話説：這次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的毛主席，毛主席是"偉大的統帥"。這樣，林彪又給毛主席加上了一個統帥的頭銜。從此以後，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有了四個頭銜，以後被人們稱之爲"四個偉大"。"四個偉大"，其中有三個最早是陳伯達提出的，衹有一個"偉大統帥"是林彪加上的。這就是"四個偉大"的由來。

在這之後不久，林彪以"四個偉大"做了題詞。他所寫的"四個偉大"題詞，在《人民日報》上與廣大讀者見面。從此，"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偉大的統帥"這"四個偉大"，就在全國範圍内廣爲流傳開來，也就與林彪的名字連在了一起。

在慶祝大會上，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宋彬彬，將一個紅衛兵的袖章戴到了毛澤東的左臂上。毛澤東當然知道，他戴上紅衛兵的袖章意味着什麽，這是他欣然默認了自己是紅衛兵的總司令。

就在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高興地對林彪説：這個運動規模

很大，確實把群衆都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

林彪講完，周恩來也發表了講話。周恩來講完後，大會就開始群衆游行。當游行隊伍通過天安門時，毛澤東帶頭在城樓上由東向西，又由西向東，不停地揮動着手裏的軍帽，向游行隊伍和觀禮臺上的紅衛兵致意。毛澤東的這一舉動，使得觀禮臺和廣場上都沸騰了，天安門城樓兩側的觀禮臺上，數萬名紅衛兵舉着毛主席語録一起高呼："我－們－要－見－毛－主－席"，震耳欲聾。廣場上，游行的群衆都拼命地喊着"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響亮的口號聲淹没了一切。這種場面，通過廣播，也感染了全國的人民。

第二天，全國各大報紙，都以大量的篇幅報道了"毛主席同百萬群衆共慶文化大革命"的盛大活動。不久，大型彩色記録片《毛主席和百萬文化革命大軍在一起》在全國放映，進一步神化了毛澤東，毛澤東的地位被無限地提高了。

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以後，全國各地大、中學校的師生紛紛來到北京，要求得到毛澤東的接見。由于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的巨大成功，毛澤東遂決定于八月三十一日，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及北京的五十萬紅衛兵。

這次接見活動是從當日下午三點開始的。會上，周恩來首先代表中央講話。他在講話中對各地的紅衛兵來到北京表示熱烈的歡迎，并肯定了全國"大串聯"這一行動。他説："現在，全國各地的同學到北京來交流經驗，北京的同學也到全國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我們認爲，這是一種很好的事情，我們支持你們。中央決定，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全部和中學生一部分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來。"

周恩來還在講話中號召紅衛兵學習解放軍，要紅衛兵像解放軍那樣，"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活學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永遠做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戰士。"

周恩來講話以後，林彪臂戴着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的袖章，向大會發表了講話。他説："紅衛兵走上街頭，横掃'四舊'，'文化大革命'已經觸及到國家的政治、經濟，由學校的鬥、批、改發展到整個社會的鬥、批、改，群衆的革命洪流，正在改變着我國整個的面貌。"他在講話中還要求紅衛兵"敢于鬥争，敢于革命，善于鬥争，善于革命"，"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要注意團結大多數，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資産階級右派分子。打擊的重點，是鑽進黨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定要掌握這個鬥争的大方向。"

據我所知，林彪歷次接見紅衛兵的講話，都是由中央文革代爲起草的，林彪從不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見，每次都衹是照稿宣讀而已。

周恩來、林彪講話以後，大約下午五點鐘，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走下天安門城樓，分别乘坐檢閱車，準備進入廣場檢閱紅衛兵隊伍。車輛是周恩來親自安排的，第一輛車上是毛澤東和賀龍，第二輛車上是林彪，第三輛車上是周恩來和陳伯達、康生。後面還有幾個人，我就記不清楚了。

廣場上，是北京軍區和北京衛戍區負責組織部隊維持秩序，組織通道，以便讓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的車輛通過。可是，毛澤東的檢閱車剛剛出了金水橋，好不容易由部隊戰士組織起來的人墻，就讓紅衛兵衝垮了。當時，紅衛兵們一個個拼命蜂擁前衝，想要和毛主席握手，一下子就把通道給阻塞了。大家拼命向毛澤東的座車擠來，甚至把座車都擠扁了。這一下天安門上的人緊張了，都擔心毛澤東會被擠傷。爲了排除險情，周恩來和汪東興緊急組織一隊又一隊的部隊戰士，從天安門裏衝出來保護毛澤東。與此同時，北京軍區和北京衛戍區的領導也不斷地給紅衛兵們做工作，這才疏通了道路，用一輛吉普車把毛澤東給搶了出來。

有了這一次的教訓，毛澤東第二次乘車出來的秩序就好多了。檢閱車出了金水橋後，沿東西長安街緩緩走了一圈，所到之

處，紅衛兵們都十分激動地連連高呼"毛主席萬歲"。一時間，口號聲此起彼伏，喊聲震天。

檢閱車回到金水橋前時，天已經快黑了，但紅衛兵仍舊不散，還要求再見毛澤東。見此情境，毛澤東又在天安門上停留了一段時間。一直到夜幕完全降臨，這次接見活動才告結束。八月底，北京的天氣還比較熱，接見結束以後，不少從外地來的紅衛兵當晚就露宿在天安門廣場。

第二天的報紙要報道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消息，報紙上要發照片。中央文革的陳伯達和康生一看，就提出了意見，説照片不好，這樣不好辦了，因爲第一輛檢閱車上是毛主席和賀龍，而不是林彪。這個照片怎麽登，讓周恩來很是爲難，因爲讓賀龍與毛澤東在第一輛車裏一起檢閲，是周恩來的安排。他同中央文革的人反復研究了好幾次也没有結果，最後還是他自己在西華廳的辦公室裏考慮了半天，才找中央文革的人再次商量説："這樣吧，照片還是照登，但是照片上的説明寫成'第一輛車上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和軍委副主席賀龍，第二輛車上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周恩來這個以"毛主席的親密戰友"的提法來突出林彪的建議，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同意，這才使照片第二天在報紙與讀者見了面。從此，不論是報紙上、文件上，還是在各種場合中，"親密戰友"的這種提法就傳開了。

這些情況我當時并不知道，後來我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同周恩來的接觸比較多了以後，他在一個偶然的場合下親口告訴我的。

林彪的"副統帥"稱號，也是這樣來的。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林彪、周恩來、陳伯達等都稱毛澤東爲"偉大的統帥"，紅衛兵也稱呼毛澤東爲"最高統帥"。既然毛澤東是"最高統帥"，林彪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副統帥"。以後，"副統帥"的稱謂就成了通稱。例如在當時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我聽到周恩來不論是會上講話，還是在會下打電話，對林彪都是統稱"副帥"，經常説副帥如何如何。最後，這稱呼成了他的口頭禪，不稱"林彪

同志"，衹説"副帥"。

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不久，中共中央、國務院于九月五日發出了《關于組織外地高等學校學生、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這一通知的發出，就正式肯定了在此之前群衆自發到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大串聯活動。由于毛澤東要求對紅衛兵的串聯要有幾個保證，叫做"保吃、保住、保行"，中共中央、國務院就在《通知》中規定，來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外地大、中學生和教職員工，一律免費乘坐火車，生活補助和交通費用由國家財政開支，來京以後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負責安排，在京時的飯費則由國家財政負擔。

通知發出後，全國各大、中學的學生和教職員工，就開始了在全國範圍内的大串聯。整個串聯活動在毛澤東直接的公開支持下，很快就掀起了一個又一個的高潮。當時，全國各地進行大串聯的人的首要目的地就是北京，都想到北京來接受毛澤東的接見。這樣，在《通知》發出以後，毛澤東又先後在北京接見了六次紅衛兵。連同前兩次接見，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最後一次爲止，毛澤東一共接見了八次紅衛兵，總共接見的紅衛兵人數大約在一千一百萬人左右。我作爲空軍司令員，全部參加了毛澤東這八次對紅衛兵的接見。

每次接見紅衛兵，周恩來都要做大量的具體組織工作。據我所知，這些工作非常繁重，也可以説是中央和北京市各部門一個額外的沉重負擔。接見之前，周恩來每次都要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國務院、解放軍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負責人，研究組織和安全工作，布置好警戒。我們這些跟着周恩來做具體工作的，也經常要忙上幾天幾夜。

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像這種乘車、吃飯、住宿都不要錢，而且有數以千萬計的人參加的大串聯活動，恐怕還從未有過的。到九月十五日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時，就很快出現了一些問題。由于有限的交通工具無法滿足爲數衆多紅衛兵流動的需要，

就開始出現交通運輸史上罕見的運載量高峰，長途汽車、內河船隻、海運輪船，特別是火車的超載，都到了十分危險的程度。在當時的火車車廂裏，到處都擠滿了人，不僅茶幾上坐了人，椅背上坐了人，走道上坐了人，甚至連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坐着或躺着人，造成了車廂裏的行李架普遍斷裂，各種設備被破壞。可以說，紅衛兵的大串連，已經造成了全國各地交通綫上的一片混亂。

到了十月份毛澤東第四、第五次接見紅衛兵以後，更多的紅衛兵涌向北京及全國各地，使交通運輸部門不堪承受，反映更加强烈。在這種情况下，經周恩來請示毛澤東同意，開始提倡徒步串聯。這以後，盡管不少學校的師生響應號召，進行徒步串聯活動，一支支命名爲“長征隊”的紅衛兵串連隊伍不斷出現，但仍然有大批師生搭乘各種交通工具進行串連，使全國交通運輸緊張的狀態，没有得到任何緩和。

“走”的問題没有解决，接着又發生了“吃”的問題。在當時大串聯的熱潮中，除了北京以外，一些革命“聖地，”也是串聯師生的目標之一。但問題是，大多數“革命聖地”缺乏必要的接待條件。如井岡山，本來山上就没有多少人家，結果一下子就上去幾十萬學生，很快就没有吃的了。這一來，上山的學生都餓得不行。周恩來知道這一情况後十分着急，馬上就動員武漢、南昌、廣州、福州、杭州等大城市的群衆，蒸饅頭，做面包、餅乾、點心等。把這些食品集中起來後，要我派空軍的飛機，從四面八方向井岡山上空投食品。我們前後一共向井岡山空投了半個多月的食品，才使大多數的學生們免于餓死。不過，最後還是餓死了極少數的幾個人，還有因爲肌餓一下吃多了，撑死的也有。這樣的現象不僅僅局限于井岡山一地，在韶山等其它的“革命聖地”，也發生了類似的情况。

後來，周恩來實在没有辦法，就去向毛澤東請求說：“現在鐵路、汽車和輪船都很緊張，糧食和住房也緊張，是否可以對串聯的人數作一個限制。”毛澤東對周恩來的這個話不滿意，回答說：

“現在才接見了六、七百萬，少了，要再加一倍，還要保吃、保住、保行。”

周恩來看到這種情况，就不敢再吭聲了。回來以後，就又召集國務院、北京市、軍隊各部門的負責人，一起再開會研究，再動員。他接着召開了一個萬人大會進行動員，號召北京市的軍民，全心全意接待毛主席請來的客人，要求各部門各負其責，要準備糧食、準備房子，搞好交通。所有的學校、機關、廠礦、招待所和賓館統統讓出來，準備接待紅衛兵。

就這樣，毛主席又開始接見紅衛兵。我記得毛澤東最後一次接見紅衛兵，除了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一部分以外，大部分是在北京西郊機場進行的。由于西郊機場的跑道不够，在周恩來的親自布置下，我們連夜加工，臨時擴展飛機場的跑道，在跑道的兩側各延伸了二百五十米的地帶，并且築路修橋，以便使大隊人馬能順利進出。

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毛澤東連續兩天在天安門和西郊機場接見了兩百五十萬紅衛兵。當時，飛機場上所有的道路上都擠滿了人，真可謂是人山人海。由于人太多，到最後散場時，擠傷了好幾十個人。

散場後，我將擠傷了人的事報告了周恩來，他要我負責把受傷的紅衛兵統統送進空軍或海軍醫院。爲此，我們和海軍又忙了半天。事後，周恩來還親自帶領我們，去醫院看望、慰問那些受傷的紅衛兵。周恩來這種認真負責的精神，的的確確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在當時的中國，幾乎所有的人都覺得，能見毛澤東一面是無上光榮、無限幸福，人人都渴望着能見到毛澤東。另外，像這樣面對面地接受紅衛兵的頂禮膜拜，毛澤東自己可能也覺得是一種心理上的享受。可當時他畢竟也已是七十三歲高齡的老人，雖然每次接見時，他衹是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或者是乘坐車輛進行檢閱，然而每次在天安門或車上一站就是一、兩個小時，有時通道一堵塞，站立的時間還會更長。這樣，每次接見紅衛兵，也確實

夠他累的，他也有些吃不消了。到第八次接見完了以後，精疲力盡的毛澤東終于說："不能再見了。"有了毛澤東的這句話，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才發出通知，要求外地的大、中學校紅衛兵停止前往北京串聯。

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不知道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也不知道給國家、社會和有關地區的政府、人民帶來了多麽大的負擔。幸虧是毛澤東最後自己受不了了，如果當時真的是像他說的那樣，接見人數再增加一倍的話，情況不知會糟到一個什麽樣的地步。

八、紅衛兵的興衰

毛主席的八次接見紅衛兵將紅衛兵運動推向了高潮。各地紅衛兵以串聯之名到北京集合，然後，一面等待毛澤東接見，一面就衝擊黨中央、國務院各部、委和各軍事機關。那個時候，這些紅衛兵什麽地方都可以衝擊，甚至連中南海、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機關，都有人衝，但是唯獨中央文革所在地釣魚臺不可以衝。當時，江青發出了命令，誰要衝釣魚臺，誰就是反革命，衛兵就可以開槍。

那一段時間裏，毛澤東每次接見完紅衛兵以後，周恩來都要帶一些人，去開會動員來京的學生返回本單位"就地鬧革命"。但他們哪裏聽得進去呢！任你周恩來說破了天也不回去。他們在北京有吃、有喝、有住嘛，回去幹什麽？于是，整天就在北京抄家呀，破"四舊"呀，鬧得整個北京城不得安寧。不僅如此，中央文革還派出北京的紅衛兵頭頭到外地去"傳播革命火種"。這些從北京出去的人走到哪裏，就到哪裏的黨、政機關去大衝、大鬧。這一來，上海、杭州、廣州、沈陽等城市都亂了，當地的黨、政機關也差不多都癱瘓了。這樣一種鬧法，全國的混亂是必然的。

就這樣，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各地的紅衛兵到處衝擊，在短短的幾個月裏，搞得全國没有幾個黨政機關能够正常工作，幾乎無一處能幸免于難，各單位的領導人更是一個個被揪鬥、坐上了"噴氣式"。就拿這時的國務院來說，除了周恩來自己，其他副總理都已經統統被打倒，或"靠邊站"了。這個時候，除了毛澤東說的話有人聽，中央文革說的話有人聽之外，其他任何人說話都不行，連周恩來也不行。所以，這個亂是自上而下的亂，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亂。

紅衛兵運動，涉及到了中國整整的一代人。就這些紅衛兵個人來說，大多都是一些真誠革命的青年，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最早在北京組織起來的中學紅衛兵（也有人叫他們"老紅衛兵"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幹部子女，包括一些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子女。在剛剛開始的時候，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部分紅衛兵是比較盲目的、狂熱的，但是隨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開展，面對當時的一些現實，他們便逐漸清醒了，開始認識到了紅衛兵運動所具有的一些負面作用。

在這一背景下，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的一些中學紅衛兵集會，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以後被大家稱作"西糾"）。不久，又成立了東城糾察隊、海淀糾察隊等。糾察誰呢？主要是對當時紅衛兵的一些錯誤行爲進行糾察，想以這種方式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糾察自己。實際上，這標志着一部分青年學生對當時"文化大革命"的一種重新認識，是對"文化大革命"的一種反思。

西城糾察隊成立以後，即發出了一系列通令，强調要"文鬥，不要武鬥"，要求對紅衛兵中違反政策、隨便打人者，要進行嚴肅的批評教育，并規定了"嚴禁打人，嚴禁體罰和變相體罰，嚴禁侮辱人，嚴禁逼、供、信"的紀律。這些通令曾在全國流傳一時，産生了一些積極作用。除此之外，"西糾"還保護過宋慶齡、何香凝、郭沫若、張治中、李宗仁等一些著名人士的安全。

不久，隨着"文化大革命"鬥爭的更加擴大化，許許多多的

老幹部，包括相當一部分中國最高階層的領導人被打倒、被靠邊站的時候，這些青年學生在政治上就更加清醒了。到了十一月，北京的三個紅衛兵糾察隊在北大附中成立了“聯合行動委員會”，并且喊出了“踢開中央文革鬧革命”、“江青不要太猖狂”等口號。這一下驚動了毛澤東、江青和中央文革。爲了應付這一局面，江青與中央文革一起，專門研究了“聯動”的問題，親自將“聯動”定爲“反動組織”。于是，“聯動”被强行解散，“聯動”在各地的聯絡站全部被摧毁，負責人也幾乎都被逮捕。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四月，這些被逮捕的“聯動”負責人，才由毛澤東親自下令予以釋放。

隨着“聯動”的被解散，在一片批評聲中，北京乃至全國的中學紅衛兵運動也就走向了末路。不少以前“鬧革命”十分積極的青年學生，這時變成了“逍遥派”，他們從此不再關心“文化革命運動”，各自找自己的出路，不少幹部子弟就在這個時候參了軍。

與北京的中學紅衛兵相對應的，是以大學生爲主體的“首都紅衛兵司令部”，他們的領袖是五個人，即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和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這五個人，當時被人們稱爲造反派的“五大領袖”。當時，他們五個人受到了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全力支持，他們對中央文革真可以説得上是有令即行，有禁就止。當時在北京乃至全國，都可説得上是風雲一時的人物。

不過，這些“司令部”存在的時間也不長。隨着紅衛兵使用價值的終結，這些“司令部”以及當年威風八面的“五大司令”，也就很快隨之烟消雲散了。“五大司令”之首的聶元梓，一九六九年底被發配到江西的一個農場勞動，一九七一年初被隔離審查，一九七八年四月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七年。

與聶元梓一樣，其他幾大“司令”的命運也差不太多。一九六六年因打倒劉少奇的需要，而在一夜之間大紅大紫的“學生領

袖”蒯大富，一九六八年底就被毛澤東拋弃，流放到寧夏，一九七〇年被隔離審查，一九七八年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七年。譚厚蘭一九七〇年被隔離審查，一九七八年被逮捕，一九八二年因患宫頸癌在保外就醫中死于湖南湘潭老家。韓愛晶一九七一年被隔離審查，一九七九年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王大賓一九七一年被隔離審查，一九七八年以反革命罪被捕，關押在武漢第一看守所，一九八三年得以獲釋。

這就是當年叱咤風雲的“五大司令”的結局。

九、軍隊院校的“文革”

在軍隊怎樣搞“文化革命”的這個問題上，林彪與中央文革以至毛澤東之間，曾經有過不少的矛盾和衝突。

從總的方面看來，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的杰出人物，林彪長期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對他一直都十分崇敬。對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擁護，但同周恩來一樣，他都全力去執行毛澤東的部署和計劃，這是毫無疑問的。至于對江青，最初因愛屋及烏，林彪對江青也是很尊敬，對江青提出的問題，也很重視。

但是，作爲主管軍隊工作的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至少在兩個問題上，林彪的態度是比較明朗的：一個是希望軍隊能相對地穩定下來，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樣搞得一團糟，否則如果敵人乘機入侵，就無法履行保衛祖國的職責，也無法向黨中央和全國人民交代；另一個就是不希望軍隊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認爲地方的事情，應該讓地方自己去搞。

但在當時，林彪的願望是很難實現的。首先，他不希望在軍隊裏搞“文化大革命”的這一想法，在軍隊院校裏就行不通。當

時軍隊的院校很多，單是空軍就有四十多所，其中包括十八個飛行學校和空軍學院、空軍技術學院、空軍工程學院、空軍政治學校、空軍地勤學校，以及雷達、高炮、導彈、通訊、後勤等學校。至于全軍的學校，那就更多了。

一開始，當一九六六年五、六月全國各地的地方院校“停課鬧革命”、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涌之時，出于林彪不在軍隊中搞“文化大革命”的想法，軍委及時對軍隊院校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幾條規定，明確規定軍隊院校衹進行正面教育，衹在本單位內搞“四大”，不準搞串聯。但是，自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北京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以後，一種狂熱的政治氣氛逐漸影響了全國。與全國的形勢相比，軍隊院校就顯得跟不上形勢了。于是，軍隊院校的不少人就涌向北京，到中央文革那裏去鬧，要求和地方院校一樣，同樣給予他們在全國進行大串聯的權利，并要求允許他們進北京接受毛澤東的接見。

于是，在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以後，中央文革和江青就把軍隊院校師生的意見，端到了軍委，端到了林彪那裏，説：“地方的學生能串聯，軍隊的學生爲什麽不能串聯？應當讓他們進北京來接受毛主席的檢閲。”

鑒于江青與中央文革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對此加以認真對待。經過考慮，他要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同各總部，各軍、兵種的負責人一起討論一下，看看究竟怎麽辦。在會上，大家提出，軍隊的院校師生進北京來見毛澤東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接見以後，必須立即返回原單位，不能同地方的學生搞串聯，不能干預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林彪接受了大家的意見，對軍隊院校師生進京接受毛澤東的接見作了三條規定：第一、軍隊院校的師生可以分期分批地來北京，接受毛澤東的檢閲，但是接見以後，必須馬上返回原單位。第二、來北京以後，一定要模範地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切行動聽指揮，要有組織地來，并且一定要有領導帶隊。第三、來京以後，由軍隊負責接待，不準到外面去串聯。

之後，林彪又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上旬授意全軍文革草擬了一個《關于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這個文件由林彪當面請示毛澤東同意之後，于十月五日經軍委和總政治部聯合簽署下發執行。《緊急指示》雖然也説：“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衆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要充分發揚民主，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這方面，軍隊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樣。”但同時又明確規定：“爲了搞好軍隊院校的鬥、批、改，應當允許進行革命串聯和調查，但軍隊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緊急指示》一發出，大批的軍隊院校師生涌入北京。結果怎麽樣呢？他們也跟地方學生一樣，來了就不肯回去。衹有空軍的飛行學員，因爲要進行飛行訓練，間隔時間不能太長。我一動員，他們就立即回去了。這些飛行學員算是聽指揮的，在毛主席接見以後就回去了，可其餘的根本就不肯走，有的回去了，但是第二次又來了。這些滯留在北京的軍隊院校學員，很快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與地方院校的學生串聯在一起，開始在北京“鬧革命”。

這些軍隊院校的學員在北京首先衝擊的是國防部。當時，國防部在北京北海公園一帶，與總參、總政、國防科委等單位在一起。十一月上旬的一天凌晨三點，軍隊院校學員們突然包圍了這幾個軍事機關，吵吵鬧鬧地叫嚷着要揪出副總參謀長李天佑。他們認爲李天佑不久前去張家口檢查工作時，執行了“資産階級反動路綫”。那天，學員們在毆打了警衛戰士之後，衝進大院，賴在裏面不走，非要把李天佑揪出來不可。

面對着這種局面，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副主任劉志堅在請示軍委葉劍英秘書長以後，向林彪提出，這個問題是嚴重的，必須進行嚴肅、果斷的處理，否則會對統帥機關的安全和戰備工作，造成難以設想的後果。爲此，他們建議：命令衝進國防部大院的學員立即撤出大院，否則以違反軍令論處。同時，抓一、兩個帶

頭鬧事的頭頭。對衝進大院的學員，要他們寫出書面檢討，保證今後不再重犯。

林彪没有接受這個建議，相反來了一個"四不政策"，即要求對學員們實行"打不還手，駡不還口，不抓人，不開槍"；要求在這個前提下，對衝進國防部大院的學員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動員他們退出大院。

遵照林彪的指示，總政文化部長謝鏜忠、宣傳部長李曼村、青年部長辛國治等幾個全軍文革的成員，先後出來講話，想動員學員們離去，但都是講不了幾句，就被學員們齊聲高呼的口號聲給壓了下去。最後，還是張春橋和戚本禹拿着陳伯達的一張便條到了現場，向學生們宣讀説："我聽説你們衝進了國防部，心裏很不安。國防部是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親自領導的地方，你們衝了不好。你們的革命熱情是很好的，但是你們的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我希望你們很快撤離國防部。"聽了陳伯達的這幾句話，學員們雖然感到很意外，并且也很不滿意，但是無人敢提出异議。不久，衝進國防部大院的軍隊院校學員們陸續散去。

但這僅僅是軍隊院校學員衝擊駐京的軍事機關的一個開頭。從一九六六年冬開始，軍隊院校的師生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横衝直撞，到處串聯，無法無天，不但衝擊國防部，衝擊總參、總政、總後，還衝擊空軍、海軍、工程兵、鐵道兵、炮兵、裝甲兵、通訊兵和北京軍區，幾乎所有的軍事機關都被他們衝遍了。他們每衝一個軍事領導機關，都是先進住領導機關的辦公大樓，然後再白天黑夜地揪鬥這個機關的領導幹部。另外，在這些軍事機關裏貼大字報、炮轟、火燒、并且搶檔案，肆無忌憚地隨意折騰，幾乎把所有的軍事領導機關都搞癱瘓了。當時，全軍文革組長劉志堅以及全軍文革的全體成員，全都忙于處理各種問題，日夜應接不暇，忙得不可開交。現在想起來，對我們這些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負責人來説，一九六六年冬到一九六七年初這一段時間是我們最難過的日子。

别的單位情况我不完全清楚，單單從我們空軍來説，當時從各地來北京串聯的空軍院校和空軍工廠的造反派，到處衝擊北京的空軍機關，把我們空軍鬧得烏烟瘴氣。當時進駐空軍大院的軍隊院校學員，就大約有三千多人，住在空軍其它機構的學員還没有計算在内。這些造反派一衝進空軍大院，就將所有的辦公室、禮堂、飯廳統統占領，使空軍領導機關陷入癱瘓狀態。

那個時候，造反派都是以揪"走資派"爲榮，誰揪出的"走資派"越大，誰的功勞也就越大。所以，空軍院校和工廠的造反派到了北京以後，最主要的矛頭就是對着我，想揪出我這個"空軍最大的走資派"。爲顯示這個决心，他們還在我家門口前面的馬路上，寫了好幾米見方一個字的大標語，"打倒吴法憲"。除了揪我以外，他們也揪余立金和成鈞等。鬧得最凶的，是西安空軍通訊學校、空軍技術學院，以及太原空軍機務學校的學員。除了院校的學員，空軍下屬一些工廠的工人也來了不少，他們和學員們會合在一起，天天要你接見，要你交代問題，要你參加批鬥大會。

在這種情况下，我們根本無法正常工作。空軍每天都有那麽多的飛機在天上飛，搞得不好就會摔飛機、出事故。更令人擔心的是，萬一形勢動亂，失去控制，飛機跑到臺灣或國外其它地方，我這個當空軍司令的，怎麽向全國人民交待！不得已，我向代總長楊成武作了匯報。他當時也面臨着造反派的衝擊，爲避開學員們的揪鬥，已經離開了總參謀部的所在地和自己的家，住在總參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裏。他聽了我的情况後，要我直接請示葉劍英，是否也像他一樣，住到第五招待所去。于是，我又把自己的情况報告了葉劍英，葉帥要我先上他家裏去住幾天。他還把這一情况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對此表示同意，并説："暫時不要叫吴法憲回去了。"

可是老住在葉帥家裏也不行啊！這樣不僅對他干擾太多，而且空軍的機關亂成這樣，我也放心不下。因此，我在葉劍英家裏祇住了三天就出來了。

哪知道，我剛剛回到空軍大院，造反派就要來揪鬥我。他們用痰盂做成了高帽子準備給我帶，準備了墨汁要塗我的臉，還準備了剃刀和剪子要剃我的陰陽頭。這一切準備好了以後，就通知我去"營建大隊禮堂"。那時我們在黨中央、國務院不準建樓、堂、館、所的三令五申下，整個空軍大院都没有建什麽像樣的禮堂，更没有後來那樣的體育館，衹是把建設大院時施工部隊留下的一個簡易飯堂，修改成爲一個簡易禮堂。這個簡易禮堂，就被人們稱爲"營建大隊禮堂"。周圍的同志都告誡我不能去，説是一旦去了，很可能就回不來。他們説，在這種批鬥會上，萬一局勢失去控制，後果就會很嚴重。

不得已，我把這些情况告訴了葉劍英。葉帥叫我不要參加大會，并立即離開大院，以免被造反派揪住不放。按照葉帥的指示，我帶了一個秘書、一個警衛員，時而在空軍的指揮所，時而在西郊機場，時而在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每天以電話和空軍指揮所及各軍區空軍的指揮所密切聯系，時刻關注空軍各部隊的動向。我還不斷要求空軍各領導機關和各飛行部隊注意防空警戒，注意不要跑飛機、摔飛機。

我躲出空軍大院後，造反派們找不到我，就弄了幾部汽車，到處對我進行跟踪偵察。他們當時决定，如果一旦在路上與我相遇，或者是發現了我的住處，就要闖進來抓人。就這樣，我整天一邊東躲西藏地躲避學生和造反派，一邊指揮部隊。時間一長，拖得我精疲力竭。我還是没有辦法正常工作。最後我請示了葉副主席，葉帥説："你住到京西賓館吧，我要軍委辦公廳給你一間房子，就在那裏住些日子。京西賓館現在由衛戍區警衛，學生是不敢衝的。"

不久，軍委辦公廳按照葉劍英的指示，給了我一間房子，我就在京西賓館住了下來。那一段時間，我晚上出去工作，白天回賓館睡覺，就這樣一直過了兩個月。京西賓館雖然就在空軍大院旁邊，但是在這兩個月的時間裏，我始終没有回過大院。躲進京西賓館以後，我倒是稍稍清静了一些，可家裏的人却受够了造反

派的騷擾。造反派們找不到我，就晚上越墻進我家裏去找。每次進去，他們都要在各房間裏搜查一番，看到我確實不在才算完事。

我妻子陳綏圻當時在中國民航總局任生産計劃處處長，除星期天以外，每天都要到東四的民航總局大樓上班。從位于北京西郊的我們空軍大院到民航總局大樓，兩者相距二十來里路。那時正值紅衛兵串聯的高峰期間，公共汽車十分擁擠，有時連等四、五輛車都擠不上去。好不容易擠上去了，車厢裏也是擠得水泄不通。以後她經常開玩笑説，那個時候坐公共汽車，簡直是天天在練習跳芭蕾舞。意思是説，那個時候她在公共汽車上往往被擠得連腳跟都落不了地。

由于交通十分困難，每天上下班往返一次，花在路上的時間要三、四個小時。每天這樣上班實在是太辛苦了，所以有時候她就想住在辦公室裏，不回家了。但想到每天晚上造反派們氣勢洶洶地闖進家裏，常常把幾個年齡較小的孩子嚇得哇哇直哭，她放心不下孩子們，衹好每天都堅持回到家裏，第二天早上再去上班。這樣，她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裏，往往一夜裏要起來幾次，和在家裏值班的秘書一起，應付前來尋找我的學生造反派。這樣的日子，差不多持續了兩個多月。

這樣一種極不正常的生活狀况，持續的時間長了，就不可避免地對孩子們幼小的心靈造成嚴重影響。尤其是我最小的女兒，當時才衹有六歲，有時候晚上一覺醒來，就會條件反射似地喊："媽媽，又來人找爸爸了。"其實，當時并没有什麽動静。這説明，那些造反派的行爲，已經對一個不懂事的年幼孩子造成了相當的心理損傷。

十、十萬人大會

由于外地來京的軍事院校學員在北京的衝擊行動，已經嚴重

影響了駐京各軍事領導機關的正常工作，給國防戰備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隱患。因此，爲了使各軍事領導機關能够進行正常的工作，穩定軍隊，經林彪同意以後，軍委決定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一個十萬人的大會，動員外地來京的軍事院校學員，各自撤回本單位去進行"文化大革命"。大會還專門邀請了賀龍、陳毅、徐向前、葉劍英四位老帥參加大會，想利用老帥們的威望，動員這些外地學員離京返校。我們這些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負責人，也應邀參加了大會。

大會由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和副主任劉志堅一起主持。大會正式開始後，蕭華首先請陳毅講話。因爲陳毅既是軍委副主席，又是國務院副總理，德高望重，在群衆心裏的威望較高，所以蕭華首先請他講話。

陳毅在講話中公開批評了到會的軍隊院校師生，批評他們無組織、無紀律，到處衝擊，搞打、砸、搶，隨意抓人揪鬥。他說，這種行爲是極端錯誤的，這不叫"文化大革命"，這叫破壞。他在講話中說："搞路綫鬥爭，第一要顧全大局。毛主席多年作路綫鬥爭都顧全大局，不考慮個人得失，不考慮個人利益和小單位利益。作路綫鬥爭，要顧全中國革命大局、世界革命大局。爲顧大局，可以犧牲局部利益，犧牲個人利益。那天，有的學生衝中南海，衝國防部，我是堅決不同意的。我們不怪大家，以前沒講清楚，是我們工作没做好。講清楚了，希望今後不要發生這事。你那個單位再重要，能比中南海、國防部的安全更重要？不要誇大本單位的重要，把局部誇大。打解放軍、打幹部，都是解放軍，解放軍打解放軍，我是没有見過，没有什麽事比這更痛心的了。我是一九二七年參軍，當解放軍三十九年，還没有見過解放軍打解放軍。要顧大體、識大體，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從大道理。"

他還說："你們年輕没有經驗，我跟毛主席幾十年，我懂得毛主席要我們幹什麽和怎樣幹，不是你們現在所做的。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你們片面地理解了毛主席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你們的行動完全違背了毛主席的本意。我們大家還要好好地學習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他的精神實質。毛主席的學問，我們學不完，我們必須認真學習，努力真正學到手。"

陳毅的講話博得了大多數人的熱烈掌聲，尤其是我們這些參加會議的解放軍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幹部，大家更是一致認爲，陳毅元帥敢于講話，說出了大家心裏的話，講得真是太好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對陳毅的講話都表示贊同，也有少數學員在陳毅講話之後當場表示了反對，而且還有那麽一小部分人蠢蠢欲動。由于大多數人不支持他們，這才把他們壓了下去。

陳毅講完後是賀龍講話。賀龍講話的主要内容，是推薦空軍十七航校幾位學員提出的關于軍隊院校師生串聯的十點建議。

接着，是徐向前講話。徐向前在講話中着重談了在現代修正主義、美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聯合反華，企圖在政治上孤立我們，在軍事上包圍我們的情况下，要保持高度警惕性，密切注視敵人，隨時保持戰鬥狀態，一刻也不能中斷指揮，否則敵人來襲就不得了。他說："你們從白天到黑夜，從黑夜到白天纏住一些領導同志，這怎麽得了！國家的安全怎麽考慮？領導機關怎麽領導你們？要考慮到國家的安全，要考慮到敵人會襲擊我們。因此，請同志們考慮一下，一方面他們要滿足你們的要求，另一方面，你們要照顧他們的工作、作戰的任務。他們都是老家伙，都五、六十了，有的還有病，你們要照顧一下他們的身體健康和工作。"

最後講話的是葉劍英。由于葉帥是主持軍隊日常工作和長期負責全軍院校工作的，因此在講話中提出了一些具體要求。他要求軍隊院校的師生們堅决執行毛澤東親自制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遵守中央軍委原來的規定，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以後，要立即返回原單位，不要在北京逗留。他還規定了具體的時間，要求在外地來京的軍隊院校師生們，在這個限定的時間内，迅速離開北京。

葉劍英講到這裏時，下面不斷的有條子遞到主席臺上來責問：你們的這些講話，經過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同意了没有？今天爲什麽没有中央文革的人到場？

葉劍英看了這些條子非常生氣，他拿起一張條子，向全場的人說："有個獸醫大學紅色造反團的×××，遞來了條子，說我們的會議没有經過中央的批準，是背着毛主席和黨中央召開的。你們說，我們中央軍委召開的會議不經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同意，又經過誰的同意呀，大家相信我們嗎？"

這個時候，有人在臺下高喊："把×××揪出來。"葉帥摇摇手說："要允許人家犯錯誤，也要允許人家改正錯誤。衝擊國防部，衝擊中南海，衝擊解放軍的各個機關，還有解放軍打解放軍，這是無産階級的感情嗎？解放軍打解放軍是幫助誰？是幫助敵人。"

這個時候臺下面群情激動，絶大多數與會者都對葉副主席的講話報以熱烈的掌聲。但也有少數人，大概有那麽一、兩千人的樣子，不滿意幾位老帥的講話，在會場上轟起來了。他們亂喊亂叫，企圖鬧事。蕭華和劉志堅看到這種情况，待葉帥講話告一段落以後，就立即宣布散會。隨後，立即護送老帥們離開了現場。

十一月二十九日，總政治部又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了一次軍隊院校來京人員的大會。由于國務繁忙，周恩來無法參加這次大會，但他還是抽出時間，在大會正式開始前來到會場繞場一周，與參加大會的軍隊院校人員見了一面。

這次大會仍然由陳毅首先講話。他在講話中反擊了上次大會後一些人對幾位老帥的攻擊，并再次講，搞路綫鬥争，不要打擊面太寬、太大，不要把路綫鬥争擴大化、簡單化。"真正的黑幫、真正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真正執行資産階級反動路綫的，是極少數。"他强調說。

接着，他嚴厲斥責了那些亂批亂鬥的人："我接觸過一些同志，他們造反的搞法，我是不同意的，没有打中要害，反而打中了同志。他們的作法就是簡單化、擴大化。我對他們說，你們的

作法不糾正，我交班也不交給你們。現在你們大學還没畢業就這樣凶，將來掌了大權，還不整死人？將來還了得呀！我就是這樣講話，刺激人。老毛病改不了，但這是老實話、真話。"

陳毅講完話，葉劍英又發表了講話。他一開始就說，自己本來不想講話的，但看到又遞了很多條子，所以忍不住要講幾句。他先念了幾張條子，其中有說陳毅講話有嚴重錯誤的，有問葉劍英有什麽資格代表軍委的，也有要求給×××恢復名譽的。然後，他嘲笑了遞條子的那些人，并說："我把我自己的意見講一講，也許明天又來大字報了。來大字報也不怕，我還要講一講。"

接下來，他也像陳毅一樣，斥責了衝擊軍事領導機關的行爲。他說："我們的最高統帥是毛主席，軍委主席也是毛主席，但是一小撮人煽動一部分群衆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辦公的地方猛衝、猛打，這行麽？你們如果不改，就是廢品，將來不能用的。有人說我又挑動群衆鬥群衆，不是！我不敢挑動群衆鬥群衆。這樣的人不是群衆，是廢品，要洗刷！有人衝我們的國防部，這是個大錯誤，嚴格講是反革命，還有比這嚴重的錯誤麽？"

這兩次大會開過以後，少數學員就大鬧起來了，一時間，"打倒陳毅"、"打倒葉劍英"的大字報就貼遍了東、西長安街。他們還向中央文革告狀，告陳毅、告徐向前、告葉劍英、告蕭華。這一告，中央文革就站在了他們一邊，公開爲這些學員們撑腰，認爲老帥們的講話是錯誤的，還公開點了劉志堅的名，并通過劉志堅，一次又一次地要陳毅、葉劍英作檢討。

過了幾天，中央文革决定在首都工人體育館同樣召開一次十萬人大會，但他們决定參加這次大會的人以地方學生造反派爲主，以保證大會的成功。他們點名要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幾位老帥和解放軍三總部，各軍兵種的負責人出席大會，準備狠鬥老帥和軍隊負責人。他們還把大會的請柬分爲兩種，一種是紅的，一種是白的。白色的請柬是給大會鬥争對象準備的，而我們收到的都是白色請柬。

那天下午，葉劍英召集我們各總部和各軍、兵種負責人，到

他的家裏一起研究一下，看看究竟去不去參加會議。葉劍英主張去，説要去看看學生們究竟有什麽名堂。我們都勸他不要去，因爲事情是明擺着的，去就是挨批挨鬥，而且很可能不僅僅是批鬥，還可能會有各種各樣的體罰，甚至是人身的侮辱。大家認爲，如果擔心不去收不了場的話，最好是陳毅和葉劍英兩位老帥不去，讓我們這些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人去，要批鬥，我們大家就一起去挨批鬥，無論如何要保證陳老總和葉帥的安全。可是，葉劍英又不同意由我們去替他們挨鬥。就這樣，從下午三點，一直研究到了午夜十二點，也没有研究出什麽結果來。

在這中間，會議的工作人員，實際上是中央文革的人，幾次打電話來催問，葉帥都没有給予明確的答復。由于中央文革的人追得很急，葉帥不得已，就分别向林彪和周恩來匯報了這個情况。但林彪這時已經吃安眠藥睡下了，周恩來則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很快就否决了這個大會，説："不能去，不能召開這樣的會議。"他還責備江青説："這種作法是錯誤的。"江青没有辦法，衹好通知，這個大會不開了。

大會取消了，使得學生們在工人體育館稀裏糊塗地白等了一天，挨了一天的餓，最後大會還是没有開成。這一下把那些學生們惹得火冒三丈，回去以後就大寫特寫，炮轟、火燒、打倒幾位老帥的大字報越來越多了。

由于毛澤東的干預，中央文革召開大會批鬥幾位老帥和軍隊負責人的企圖没有得逞。但事情到此并不算完，中央文革仍然堅持要葉帥作檢討，説什麽："大會可以不開，但是必須在一定的會議上作檢討。"他們讓劉志堅準備一個檢討稿子，讓葉帥在會議上念。

這樣，在一九六六年的除夕之夜，中央文革在京西賓館禮堂召集了一個兩千人的會議，指名要葉劍英作檢討，并要我們一起參加。會議于晚上八點開始，蕭華没有到會，由劉志堅主持會議。會議開始後，就由葉劍英作檢討。結果葉帥的檢討還没有念完，下面的一些人就按照中央文革事前的布置，轟起來了。衹見一排

排的學生手持大字報衝向主席臺，準備對葉劍英有所動作。見到這種情况，劉志堅和我們這些各總部及各軍、兵種負責人，就趕緊保護葉帥從後臺走了。緊接着，我們也從後臺陸續出去，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住所，會議就這樣散了。由于當時京西賓館是已經軍管了的單位，任何人都不準衝擊，因此學生們衹能從前門進去，其它的地方他們是去不了的。我們這才得以安全脱身。

這次會議結束以後，關于會議的情况立即反映到了林彪那裏。林彪隨即向毛澤東作了匯報，説："葉劍英在會議上作檢討，還是遭到了學生的圍攻。"毛澤東説他事前不知道這個會議，當即表示説："這件事情一定要追查。"

事後追查下來，中央文革和江青推卸責任，把這件事嫁禍給劉志堅，説這個會議是全軍文革劉志堅搞的，把劉志堅當作了替罪羊。于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劉志堅就被江青點名，撤銷了全軍文革組長、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職務。不久，他就遭到了隔離審查、關押的嚴厲處置。

十一、改組全軍文革小組

劉志堅被打倒，全軍文革就没有了組長，加之一些成員也靠邊站了，使得全軍文革一下子癱瘓了。這樣一來，中央文革在軍隊裏就没有了辦事機構。爲此，江青去找林彪説，全軍文革這個機構很重要，没有組長不行，必須找一位有聲望的、能壓得住的老帥來擔任。她建議，由徐向前元帥來接替劉志堅的工作。她還告訴林彪，她的這一提議已經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除此之外，江青還提出，由中央文革的成員關峰來擔任總政治部副主任。

由于江青是打着毛澤東的旗號，林彪衹能接受，答復她説："好，行。"但他不能肯定這就是毛澤東的意思，于是他又直接請示毛澤東，没想到毛澤東果然答復説："可以。"

在這種情況下，林彪不得不按照江青的建議去辦。他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親自主持了一次會議，到會的有軍委常委以及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負責人，同時還邀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會上，林彪親自宣布："經毛主席批準，重新組成新的軍委文革小組，以徐向前爲組長，空軍政委余立金和海軍副政委王宏坤爲副組長，負責全軍的文化革命工作。" 另外他還宣布，任命關鋒爲總政治部副主任。這樣，江青和中央文革終于在軍隊中有了一個耳目。

十二、對民航軍管

從一九六三年開始，中國民航總局由國務院直屬改爲由空軍管理，空軍副司令員鄺任農兼任民航總局局長。從中國民航成立到一九六六年，中國民航已經開辟國内外航綫近百條，建成了北京首都機場、上海虹橋機場等大型國際機場，年運送旅客近百萬人，當時的業務十分繁忙。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以後，在軍隊院校師生衝擊軍事機關的同時，民航機關也受到了造反派的衝擊。最初，民航下屬工廠、學校來京造反的學生和工人，未進入總局的機關大樓，祇是在民航總局機關辦公樓對面的一條馬路上，采用静坐包圍的形式，每天紅旗招展，圍着民航大樓又鬧又叫，同時在民航大樓周圍到處貼出大字報和標語，要揪鬥民航總局局長鄺任農和政委劉錦平。這時從外面看，形勢雖然顯得相當緊張，不過工作人員仍然可以正常上班，國内外航班的正常飛行和安全生産還能得到保證。

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一天下午，民航大樓外的造反派突然采取了進一步的措施。他們串聯總局機關内部的一些人，衝進了民航機關的辦公大樓，占據了辦公室。總局領導立即打電話向我告急，他們擔心總局機關會被衝垮，會癱瘓，以致影響國内

外航班的正常進行。

我在京西賓館接到民航總局的電話以後，馬上把這一情况報告了葉劍英。葉帥認爲，民航的問題必須立即解决。他要我向林彪辦公室打電話，請示怎麽辦。我當即向林彪辦公室匯報了這一情况。

當天晚上，葉劍英在徵得林彪同意以後，通知北京衛戍區派出兩個連的兵力，把衝進民航大樓裏的工人、學生全部趕了出來，同時還十分嚴肅地告誡他們，不能再衝擊民航辦公樓，以保證航班的正常飛行。

接着，在一月二十六日，國務院、中央軍委頒布《關于民用航空系統由軍隊軍管的命令》，具體規定了三條：第一、對民航總局、各大區管理局，省（區）局、航空站，指揮勤務保障體系、機場和飛行學校，一律由軍隊接管，接管工作由空軍負責實施。第二、在軍隊接管後，民航系統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按軍隊系統的安排和作法進行。第三、在軍隊接管後，民航系統各單位的革命組織，對民航系統以外的革命組織，一律不進行串聯。

命令發布後，由空軍派出的代表馬上進駐了民航總局機關。經請示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和中央文革批準，我們規定，除總局機關以外，各大區的民航管理局以及下屬單位，一律不搞"四大"，祇進行正面教育。這些措施的采取，使民航系統在當時十分混亂的局面下，得到了相對的穩定，從而保證了國際、國内航班的正常、安全飛行。

在那種大動亂的年代裏，在"左"傾思想的指導下，民航總局自然也不免犯下了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是民航的國際、國内各個航班，始終都在正常、安全地運行着，没有發生大的事故，保障了國内外客貨運輸的需要，維護了我國的國際聲譽。這些成績，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殺的。

十三、“一月風暴”和“全面奪權”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使全國各地本已十分混亂的形勢變得更加錯綜復雜，也更令人擔憂。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和五日，由中央文革張春橋和姚文元支持、策劃，上海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造反派，分別發表了《告讀者書》，宣布接管報社。《文匯報》和《解放日報》一直是上海市委所領導的報紙，這個時候，實際上已經由造反派奪權了。這兩張報也就從黨的報紙，變成了造反派的報紙，帶頭向上海市委開火了。

一月五日，《文匯報》發表由上海十一個造反派組織聯合署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把鬥争的矛頭直接指向上海市委。這樣公開由報紙來煽動，實際是向上海市委全面奪權的一個訊號。

到了一月六日，張春橋和姚文元又策劃了由上海各界造反派聯合召開的十萬人大會，從上午十時一直開到下午三時，中心口號是打倒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打倒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市長曹荻秋。大會結束時，發出了三項通令：一、不承認曹荻秋是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市長；二、罷免曹荻秋黨內外一切職務，監督勞動；三、限陳丕顯在一周以內交代自己的罪行。這一下，上海市委就完全癱瘓了。

關于這次大會，姚文元在《情況簡報》中寫道：“會議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說是完全垮臺了。”張春橋後來也公開說：“一月六日的大會就奪了權了。”

上海的奪權，實際上是毛澤東親自支持和決策的。一月八日，毛澤東在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談話中，對上海的全面奪權活動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文匯報》由‘左派’奪權，這個方向是好的。《文匯報》五日《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可以轉載、廣播。他們內部造反，過幾天可以寫一個綜合報道。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他還說：“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毛澤東的這個談話，實際上成爲在全國進行全面奪權的號令。

根據毛澤東的這個談話精神，《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的負責人當場寫了一個“編者按”。經毛澤東當場審定後，這個“編者按”于一月九日在轉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時發表。同一天，上海市“工總司”等三十二個造反派組織共同發出《緊急通告》，責令上海市委照這個通告執行。《文匯報》、《解放日報》還同時發表了根據毛澤東一月八日談話寫成的記者述評——《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發起總進攻》。

一月十日，毛澤東對《緊急通告》和《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發起總進攻》的記者述評作出批示，認爲“此兩件很好”，要中央文革替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起草一個《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他要求，賀電“要指出他們方針、行動是正確的，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

一月十六日，毛澤東批準了上海市的奪權行動。同日，《紅旗》雜志發表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人民日報》也同時進行了轉載。文章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文章高度贊揚上海的奪權行動，號召“堅決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

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的社論。社論說：“一場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展開奪權鬥争的偉大革命風暴，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席卷全中國，震動全世界。”社論還指出：“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新的飛躍。這是今年開展全國全面奪權鬥争的一個偉大開端。”

這些文章都是由毛澤東親自審定的，也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第一次明確無誤地號召在全國進行全面的奪權。

上海奪權以後，張春橋、姚文元上報毛澤東，建議仿照巴黎公社的形式，并于二月五日正式宣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但毛澤東經過考慮以後，認爲叫"上海人民公社"不妥當，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

二月二十三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中央批準張春橋爲上海市革委會主任，姚文元、王洪文、王秀珍等爲副主任。

上面這些情况都是在我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以後，江青透露給我的。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奪權鬥爭宣傳報導問題的通知》。這個文件規定：第一、各省、市、自治區領導奪權鬥爭的臨時機構，叫什麼名稱？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結合（即由真正代表廣大群衆和革命組織的負責人、人民解放軍在當地的駐軍代表、黨政機關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領導幹部組成的）？今後要先報告中央，經過中央批準以後，再在當地報紙上發表。第二、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城市的政權組織形式，除對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一般的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稱。

這樣，毛澤東的一聲令下，上海作榜樣，還有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全國個省、市就照此辦理，造反派們紛紛開始到處奪權。當時，不僅對各省、市、自治區，對中央各部、委都進行了奪權。而且下面的千千萬萬個單位，全國上下，處處在奪權。總之，一場轟轟烈列的全面大奪權在全國陸續開始了，并在奪權後相繼成立了革命委員會。

一月十四日，山西省奪權，一月十九日，中央批準成立山西省革命委員會，由劉格平任革命委員主任；一月二十二日，青島市奪權，接着山東省奪權，二月三日，中央批準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王效禹任革命委員會主任；一月二十五日，貴州省奪權，二月十四日，中央批準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李再含任革命委員會主任；一月三十一日，黑龍江省奪權，三月中央批準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潘復生、汪家道任革命委員會正、副主任；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中共中央常委，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代表毛主席、黨中央、國務院宣布决定，謝富治、吳德、鄭維山分別任正副主任；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準天津市奪權，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員會，解學恭任革命委員會主任；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批準江西奪權，江西革命委員會成立，程世清任革命委員會主任；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準河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李雪峰任革命委員會主任；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批準湖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曾思玉任革命委員會主任；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準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黃永勝任革命委員會主任；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準吉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王淮湘任革命委員會主任；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批準浙江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南萍任革命委員會主任；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準江蘇省成立革命委員會，許世友任革命委員會主任；等等，等等……。

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包括新疆和西藏在内的大陸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全部進行了奪權，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當然除了臺灣，因爲紅衛兵是不可能去那裏奪權的。當時，有人把這叫作"全國山河一片紅"。這裏還有一個小插曲：當時郵政部門爲此還專門發行了一枚"全國山河一片紅"的郵票，但因爲錯誤地將臺灣也印成了紅色，被有關部門在還沒有正式發行之前就收了回去。而遺漏的爲數不多的幾張，後來就成爲集郵者爭相收藏的"珍品"。

由毛澤東主導這個全國全面奪權，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實際上就是號召打倒一切，奪取所有領導幹部的領導權。當時的奪權運動，已經不是對"黨内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奪權，而是對中國共産黨在二十八年艱苦鬥爭中建立起來的各級政權的全面否定。爲什麼要奪權？是因爲這個政權不行了，才奪權嘛！難道所有的省、市、自治區以及各級政權和黨組織都不行

了嗎?

幸虧當時没有在我們軍隊裏進行奪權，因爲毛澤東當時考慮到可能需要軍隊的支持。如果當時軍隊亂了，全國就會完全失去控制。當然，如果那樣，我們這些各總部、各大軍區和各軍、兵種的負責人，也就都完了。

與我們這些軍隊幹部相比，從中央到最基層的衆多地方幹部的境遇就要慘多了。在全國“打倒一切”的口號聲中，他們中的絶大多數人都在這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中被打倒了，甚至連農村生産小隊的隊長都不能幸免。這千千萬萬被打倒的幹部中，最爲著名的是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人。

從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開始，劉少奇便處于了一種“等待被徹底打倒”的狀態。但是，在那一段時間裏，他還是能作爲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參加一些公開的活動。這種不尷不尬的狀態，一直持續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從十二月十八日開始，江青、康生、張春橋、謝富治等人，開始相繼公開煽動打倒劉少奇，而且口徑完全一致。可以斷言，這絶不是他們個人的意見。

江青等人在上面這一煽動，下面的造反派就積極響應。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清華大學的蒯大富等人就把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騙出中南海，拉到清華大學裏去進行批鬥，并對她進行了人身侮辱。一月上旬，中南海裏的造反派兩次衝進劉少奇的住宅，對劉少奇、王光美進行批鬥。以後，又對他們加以軟禁，使他們失去了人身自由。同時，還掐掉了電話綫，使他們失去和同外界的一切聯系。

就這樣，一個國家主席、黨中央副主席，不經過任何會議的討論，没經過任何手續，就被造反派打倒了。從此，鬥争逐步升級。最後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召開的八届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被戴上“叛徒、内奸、工賊”三頂大帽子，撤銷了黨内外的一切職務，并被“永遠開除出黨”，從而走完了被徹底打倒的全過程。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長期被折磨之後，劉少奇終于在河南開封含冤逝世。

陶鑄的被打倒，在當時對我們來説，真是有點出乎意料。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會上，他突然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爲中國的“第四號人物”。這之後不到半年，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就在接見湖北省“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宣布，“陶鑄同志到中央來并没有執行以毛主席爲代表的無産階級革命路綫，實際是劉、鄧路綫的忠實執行者”，還説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幾天之後的一月八日，毛澤東就在中央會議上認可了江青他們關于陶鑄的講話，并説：“陶鑄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當時問鄧小平，陶鑄怎麽樣？鄧小平説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以前，堅决執行劉、鄧路綫，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上都有劉、鄧的照片，這是陶鑄安排的。”

毛澤東的這番話實際上是批準了打倒陶鑄。這個話一傳出來，紅衛兵一下子就把打倒陶鑄的大字報貼遍了全國。就這樣，毛澤東的一番話，造反派的幾張大字報，陶鑄這位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就被打倒了。没有下發任何文件，甚至連一個正式的手續都没有。陶鑄不僅被污蔑爲叛徒，而且在社會上成了衆矢之的，造反派們把他的名字和劉少奇、鄧小平的名字排列在一起，從中國的“第四號人物”，一下子變成了中國被打倒的第三號人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陶鑄在遭受到長期折磨之後，在合肥含冤去世。

我在東北西滿軍區的時候，曾經在陶鑄的領導下工作過一個較短的時間。我感到，陶鑄是一個非常能幹和對工作非常認真負責的人，對毛澤東及林彪非常尊重和敬佩。由于他長期在四野工作，因此對我們這些四野的幹部非常熱情，每次我們到廣州，衹要有時間，他都要請我們吃飯或來看望。因此，對陶鑄的突然被打倒，我一來是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二來也不免感到有些難受。

可以説，在“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的狂潮中，絶大多數在位的各級領導幹部，或輕或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過影響和牽連。至于那些早已被打倒的人，更是難逃其難。這些人裏，彭德懷是最著名的一位。

“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彭德懷正在四川任“三綫”建設副總指揮。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戚本禹、關峰給陳伯達、康生、江青寫信，指責彭德懷在“三綫”工作時，還在積極進行不正當的活動，説從揭發的一些情況看，彭德懷“一直到現在還是修正主義的一面黑旗”，建議中央考慮撤銷他“三綫”副總指揮的職務。

四個月以後，毛澤東在十月二十四日召開的中央匯報會上，對彭德懷的問題作了如下的講話：“高崗、饒漱石、彭德懷都是搞兩面手法，彭德懷與他們是勾結在一起的。彭德懷發動的百團大戰，是搞獨立王國，那些事情都不和我打招呼。”

有了毛澤東的指示，戚本禹就親自布置，要北京地質學院和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去四川把彭德懷揪回北京。周恩來聞訊後，派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趕去，將彭德懷接到衛戍區監護起來。

後來我才知道，一九六七年底，身在獄中的彭德懷曾經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的大意是：主席命令我去“三綫”，除了任副主任以外，没有擔任任何工作，辜負了您的期望。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被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抓到了成都，二十三日轉到北京，現在被中央警衛部隊與紅衛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後一次敬禮，祝您萬壽無疆！

從這封信的內容看來，彭德懷當時對毛澤東還寄托着一綫希望，但毛澤東根本没有去解救他的意思。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懷在北京獄中含冤逝世。

賀龍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并被折磨至死的一位黨和國家領導人。一九六六年，經毛澤東批準，林彪在中央軍委碰頭會議上打招呼，指出：“賀龍有問題。”十月，打招呼的範圍

擴大到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和各大軍區的負責人。十二月，江青在清華、北大説：“賀龍有問題，你們要造他的反。”她還對賀龍的兒子賀鵬飛説：“你爸爸犯了嚴重錯誤，我們這裏有材料，你告訴他，我可要觸動他了。”

關于賀龍的問題是毛澤東親自決策的。據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在中南海專門研究賀龍的問題。後來周恩來告訴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對賀龍采取隔離措施，并要他親自去落實。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區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衛戍區預先作了安排。然後，他把賀龍找到中南海，先是問賀龍：“聽説你身上帶了手槍？”賀龍説：“有一支。”于是，他要賀龍立即交出身上携帶的手槍。待賀龍交出手槍後，他便要警衛部隊把賀龍夫婦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區。從此，賀龍夫婦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飽受折磨的賀龍在北京三〇一醫院逝世。

至于毛澤東等人爲什麽要打倒賀龍，我不得而知，但當時我曾聽説過幾件與賀龍有關的事情。第一件事是總參王尚榮、雷英夫反對楊成武代總長的事情；第二件事是解放軍政治學院蔡順禮反對莫文驊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海軍蘇振華反對李作鵬的事情。再有，就是我前面提到過的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事情。這幾件事情，一下子都追查到了賀龍那裏。在這幾件事情上，前三件我不敢妄加評論，但關于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事情，那完全都是屬實的。

除了以上提到的和其他没有提到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外，一些省、市、自治區的領導也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至死，如被迫自殺的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彦。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閻紅彦白天被揪鬥七、八個小時後，晚上打電話給中央，請求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保護。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回電話説：“你還是出來見群衆，不要怕。”結果，閻紅彦第二天一出來，就被群衆揪住不放。當天深夜，感到没有出路閻紅彦就自殺了。得知這一消息，大家都紛紛議論説，陳伯達的一個電話，就送了閻紅彦

的命。

事實上，在當時那種十分混亂、完全處于無政府狀態的情況下，單純向群衆檢討認錯，没有一個是能够過關的。那個時候，群衆組織多如牛毛，各自爲政，大家都以多抓“走資派”爲榮，亂抓、亂揪、亂鬥現象極爲普遍。除非你不出來，衹要你一出來，立刻就被揪鬥，而且被他們一抓走就很難回來，甚至連生命保障都没有了。一些老幹部或是被隨意綁架關押，或是自殺，或是被折磨至死。如山西省委書記衛恒、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等，就都這樣慘死了。最慘的要數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他是被造反派毒打至死的。

總之，毛澤東號召的“全面奪權”，必然導致全面打倒一大批原來的領導幹部，造成很多冤、假、錯案，甚至使不少領導幹部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這些被打倒的幹部，後來雖然基本上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但也有不少的人没能活着見到這一天。

十四、全面奪權變成了全國武鬥

遍布全國的“全面奪權”、“打倒一切”，很快就使衆多的群衆組織産生了分歧。一開始，雙方衹是用嘴和筆來進行辯論。以後，辯論和争鬥逐漸升級，從“文鬥”發展成了“武鬥”，而且所使用的武器也逐漸發展，有的地方甚至出動了坦克、大炮。

關于全國武鬥的情況，我手裏没有具體的材料和統計數字，但是從我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和中央常委碰頭會議上接觸到的一些全國武鬥情況看，特别是從我隨周恩來一起處理大量的武鬥事件看，這一場全國範圍的武鬥，按毛澤東的話來説，的確可以叫“全面内戰”，也可以説是一場浩劫。在這場全國性的武鬥中，死的人不説，僅國家財産的損失，就無法估量，更不要説由此造成的人們相互之間感情上的分裂和仇恨了。

上海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抓的典型，可正是在上海，最先開始了大規模的武鬥。當時上海有兩大派組織，一派叫“工總司”，一派叫“赤衛隊”。“工總司”的頭頭就是王洪文，他們是堅決反對上海市委的，所以從一開始就得到了張春橋、姚文元的支持。作爲“工總司”對立面的“赤衛隊”，實際上是保上海市委的。

上海的武鬥是從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開始的。有關材料説，爲了保證奪權行動的順利進行，“工總司”在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支持下，組織了數萬人，决定對“赤衛隊”采取武裝行動。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他們首先向守衛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書記處院内的“赤衛隊”發動了襲擊。據目擊者説，許多赤手空拳的“赤衛隊”成員在這場襲擊中被打得鮮血淋淋。這次武鬥，“工總司”一共俘獲“赤衛隊”兩萬多人，由此可見這次武鬥的規模。上海的這次武鬥，算是開了全國武鬥的先河。

繼上海武鬥之後，在其它各省、市、自治區以及各地、縣甚至單位的奪權鬥争中，也都相繼發生了兩派群衆組織的激烈衝突。武鬥的形式，從一開始的拳頭、木棍，到鋼釺、梭標，最後發展到了搶奪解放軍的槍，一些有軍工廠的地方還用上了重武器。

可對于這樣嚴重的混亂局面，中央文革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公開支持。記得江青在一次講話中就曾公開對造反派宣傳説：“文攻武衛，這個口號是對的。如果有人拿着大刀、長矛對着你，你們放下武器，這就不對了。當階級敵人進攻我們的時候，我們手無寸鐵怎麽行呢？”

中央文革的這種態度，使得造反派更加有恃無恐。到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間，全國各個省份普遍都發生了衝擊解放軍、搶奪解放軍槍枝、搶劫戰備倉庫、攔劫軍車、攔劫援越物資以及自制武器彈藥的情況。到了這時，各地都形成了一支支的造反派武裝，許多地區武鬥的形勢和規模，也已經發展成爲了大規模的武裝衝突，流血犧牲的人數，可想而知。

在當時全國的武鬥中，較爲有名的有四川宜賓、重慶、成都、

涪陵，新疆石河子，湖北武漢，廣西南寧、梧州、桂林，河北保定，吉林長春，遼寧沈陽，以及黑龍江等地。在這些地方，都發生了大規模的武裝衝突，不僅動用了重型武器，像宜賓、涪陵和廣西等一些地方甚至把軍隊都牽涉進去了。

根據以後看到一些零星的統計：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疆石合子發生武鬥，雙方開槍打死２４人，傷７４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四川宜賓地區大規模武鬥。同月重慶大規模武鬥，除動用了常規武器外，還使用了高射炮平射。一九六七年六月武漢地區武鬥死１０８人，傷２７７４人。

另外，據我所知，廣西南寧武鬥燒了一條街，而廣西梧州武鬥幾乎把城市都燒光了。四川成都的武鬥發展到動用機槍，迫擊炮；黑龍江武鬥使用了坦克；河北保定，廣西桂林，長春、沈陽都發生了長時間的大規模的武鬥。

對于全國各地都發生武鬥甚至大規模武裝衝突的這一情況，毛澤東是怎麼想的呢？一九六七年中，余立金曾陪同毛澤東視察全國“文化大革命”。回來以後他向我說，七月份毛澤東在上海時，王洪文在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支持下，策劃了攻打上海柴油機廠的武鬥。策劃完畢，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來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表示支持他們的行動。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八月四日凌晨，王洪文率領十萬人向上海柴油機廠發起了猛攻。這一場武鬥，雙方死傷嚴重。武鬥結束以後，張春橋他們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聽了後就說：“打得好！”

余立金還說，毛澤東在南京時，看到江蘇一家最好的飯店發生武鬥，幾乎把飯店都燒光了。在聽到全國各地一些武鬥的情況時，他還說：“這是亂了敵人，鍛煉了自己。”

在上海時，楊成武、李作鵬、余立金他們還一起陪同毛澤東觀看了上海造反派鬥爭陳丕顯、曹荻秋的電視鏡頭。當時，造反派强迫陳、曹二人低頭彎腰，搞“噴氣式”。毛澤東說：“這算不了什麼嘛！”

正是因爲有了毛澤東的默許和支持，江青與中央文革才敢于

公開支持武鬥，全國範圍內的武鬥才可能發展起來。如果一開始中央文革就采取斷然措施來嚴禁武鬥，嚴禁搶槍、制槍，這個武鬥也許就不會發展起來，至少不會發展到動槍、動炮、甚至動用坦克的嚴重地步。

總之，一九六七年這一年，真是一個十分難過的年頭，各級領導機關癱瘓，各級領導幹部被打倒，人民群衆的生命毫無保障，到處一片混亂。所幸的是，長期以來所形成的毛澤東崇高的個人威望，以及解放軍軍以下機關和部隊的穩定，還算勉强控制着局勢。否則，一旦敵人入侵，後果不堪設想。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那種狀況，真是有點讓人不寒而栗！

十五、“可以炮轟、火燒，但不要打倒”

一九六七年初，爲了躲避造反派的揪鬥，我仍然住在京西賓館裏。一月初的一個下午，我突然接到葉群的一個電話，要我立即趕到空軍東交民巷招待所，同她一起接見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劉素媛、邵錦輝等五人。

對劉素媛、邵錦輝等幾個人，我是比較熟悉的。“文化大革命”前的每個星期六晚上，中央辦公廳都要在中南海裏舉行舞會。我們空政文工團長期擔任舞會的伴舞任務，去的人都要經過嚴格的審查和篩選，而劉素媛、邵錦輝就是其中參加伴舞的兩個人。當時，劉素媛等人在空政文工團内的身份比較特殊，因爲她們經常出入中南海，陪伴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跳舞。她們對毛主席非常崇敬，毛主席也把她們當孩子看，所以她們經常陪毛主席談心、說笑，而毛主席經常也通過她們了解一些基層單位和社會上的情況。

至于這次爲什麼突然之間葉群找我一起見她們，我心裏不禁有些詫异。放下電話，我就坐車到了空軍招待所，接着葉群和劉

素媛、邵錦輝她們也來了。

首先，劉素媛向我和葉群匯報了空政文工團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她說，“文革”一開始，文工團就分成了兩派，她們這一派是保我和余立金，保空軍黨委的。另一派則與她們相反，是要打倒我和余立金。現在她們這一派衹剩下了五個人，成了少數派，幾乎天天都遭受另一派的圍攻，甚至不讓她們幾個人回到團裏，處境十分困難。萬般無奈之下，她們衹好到處尋找毛澤東求援。一見毛澤東的面，劉素媛就大哭了一場。毛澤東詢問原由，劉素媛就向毛澤東訴苦，談起了空政文工團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情況，訴說了她們在團裏的境遇。談話中間，劉素媛想證實一下自己的看法，就直接了當地問毛澤東，對吴法憲究竟應該采取什麽態度？毛澤東回答說：“吴法憲可以炮轟、火燒，但是不要打倒。”毛澤東的這句話，實際上就是向劉素媛交了底。

由于毛澤東不便直接干涉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文化大革命”，就給葉群寫了一封信，要葉群想辦法出面支持劉素媛的這一派。信是由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送給葉群的，葉群接到這封信後，就把我和劉素媛等人找來商量。

聽了劉素媛的這番話，我很高興。有了毛澤東的表態，我的心裏就有了底。最後，劉素媛向我和葉群提出：讓我“站出來”以後，明確表示支持她們，我同意了。我和葉群都表示，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辦，一定幫助她們把空政文工團的形勢翻過來。

然後，首先由林豆豆出面，在《空軍報》社制造輿論，說劉素媛她們是無産階級革命派。然後，再經過一番工作，空政文工團裏支持劉素媛的人就多了起來。這時，劉素媛她們自己也公開說，毛澤東和林彪是支持她們的。于是，在短短的時間裏，空政文工團的形勢就急轉直下，劉素媛成了多數派的頭頭，并奪取了文工團的領導權，成立了空政文工團革命委員會，劉素媛和邵錦輝分别任革委會正、副主任。由于她們能够經常到中南海和人民大會堂直接向毛澤東匯報情況，接受指示，在空軍成爲顯赫一時的人物，人稱“劉司令”、“邵政委”。

接見了劉素媛等人之後，我接連給林彪打了幾個電話，意思是：空軍每天都有飛機在天上飛，空軍領導機關老是像這樣亂，我上不了班，出了事情誰負責？再這樣下去，飛機跑了，或者是摔了，或者是敵人的飛機進來，我都負不了這個責任。

後來，林彪就通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兼總政治部副主任關峰四次來空軍大院保我，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也通知副總參謀長王新亭來大院保我。但是，效果都不大，造反派不聽他們的。林彪没有辦法，衹好通過葉群告訴江青說：“毛主席有指示，對吴法憲可以炮轟、火燒，但是不要打倒。空軍的飛機不能出問題，機關也不能出問題、不能亂，必須讓他們有一個安定的工作環境。”

江青表示：“吴法憲可以保，但是要寫一個比較好的檢討。”葉群回來轉達了江青的意見，并勸我說：“檢討寫了，就可以過關了。”就這樣，我按照江青的要求，寫了一個檢討送給她。她看了後説：“還可以，就這樣吧。”

當時我每天都在京西賓館、西郊機場或北京軍區空軍指揮所、與各軍區空軍司令員、政委保持聯系，聽取他們的匯報，共同商量决定一些措施。當時我的思想是，衹能讓機關亂，絶不允許部隊和飛行學校亂，必須保證他們的絶對穩定，嚴防跑飛機和敵機入侵。

事情也湊巧，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臺灣國民黨空軍的五架飛機，當時估計是美制Ｆ－１０４型戰鬥機，爲了偵察，沿福建海上飛行，有進入大陸的迹象。接到報告，我立即趕到指揮所，命令華東地區空軍部隊的雷達全部開機，嚴密監視敵情。同時，命令福建軍區空軍、廣州軍區空軍指揮所，以及臺灣國民黨軍飛機可能進入地區的飛行和高炮部隊，進入一級戰鬥準備。果然，敵機在福建晋江以東海面突然改變航向，直飛大陸。得知這一情况，我立即命令航空兵××師起飛×批×架迎敵，并命令其它部隊作好攔截準備，防止敵機跑掉。結果，飛行員果斷地進行對頭攔截射擊，一下子就擊落了一架敵機，立了大功。不久，部隊找

到了被擊落敵機的殘骸，證實這是一架美制F－104G型戰鬥機。

應該說，這次戰鬥的勝利是來之不易的。在當時那種全國一片混亂，空軍領導機關被造反派長期圍困、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空軍機關和部隊的全體同志，堅守工作崗位，保持高度的戰備狀態，高度協調一致，各個渠道暢通，才保證了這次戰鬥任務的勝利完成。這是空軍全體指戰員高度責任感和覺悟的體現。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我們空軍進行了多次國土防空作戰，擊落、擊傷敵機多架。其中有：一九六六年四月在雷州半島擊落Ａ－３Ｂ攻擊機一架；五月在雲南馬關擊傷ＲＢ－６６型偵察機一架；九月在廣西東興、友誼關擊傷Ｆ－１０５型戰鬥機兩架；一九六七年四月在廣西板興擊落Ｆ－４Ｂ戰鬥機兩架；五月在廣西峒中擊落Ｆ－４Ｂ戰鬥機兩架；八月在廣西隘店擊落Ａ－６Ａ攻擊機兩架（這三次在廣西的戰鬥，後來被稱爲"三戰三捷"）；九月在浙江嘉興擊落Ｕ－２偵察機一架。此外，我們還擊落美國無人駕駛飛機９架。據統計，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的幾年裏，我們一共擊落、擊傷進入大陸的敵機二十餘架，而我們僅損失一架飛機。

"文化大革命"以後，擊落、擊傷敵機情況和跑飛機、摔飛機等重大事故情況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在"文革"那樣亂的情況下，我們整個空軍部隊都没有跑飛機，也没有摔過大飛機（包括民航在內），事故也是比較少的，而且還取得了擊落、擊傷多架敵機的勝利。在今天，我仍然要説：在"文化大革命"中，盡管我有這樣、那樣的嚴重錯誤，但是在空軍機關、部隊以及廣大空軍指戰員共同努力下，我們大家團結一致，保證了戰備、防空作戰和"三支兩軍"任務的完成。這些成績是不容抹殺的，也是不應該抹殺的。

關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這次在福建上空擊落敵機的情況，我當即報告了林彪、周恩來以及葉劍英。消息傳到中央以後，江青决定利用這個機會來保我。

就在擊落臺灣國民黨軍飛機的當天下午，葉群派秘書郭連凱在西郊機場找到我。郭連凱對我説："江青已經决定，晚上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空軍院校師生的代表，保你出來正常工作，但是要準備揪出劉震、成鈞、何廷一。"他向我解釋説，揪出劉震、成鈞是林彪的决定，揪出何廷一是江青的意見。郭連凱還説，葉群要他告訴我一下這個情況，好讓我有個思想準。葉群要我簡要寫幾條關于劉、成、何的錯誤，以便轉交江青，讓她講話時作參考。我當即按照郭連凱轉達的葉群意見，簡單寫了幾條，交給他帶走了。

當天晚上，江青、關峰接見了空軍院校的造反派。當時我不在場，江青講話的內容，是第二天由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的幾個秘書傳給我的。江青在講話中贊揚了空軍部隊擊落敵機的戰績，同時點了劉震、成鈞、何廷一的名。江青説："空軍的同志們，你們的鬥争方向錯了，你們不應當指向吴法憲，而應當指向劉、成、何，他們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在空軍搞地下活動，進行罷官奪權的主要人物。"

江青講話的第二天，打倒劉震、成鈞、何廷一的大字報、大標語就貼滿了空軍大院，甚至貼上了北京街頭。就這樣，江青的一句話，劉震等人就被打倒了。雖然江青説了要保我，但我還是出不來，因爲我的檢討造反派通不過。他們説："吴法憲必須再檢討。"結果我又在空軍大院連續作了三次檢討，每次參加批鬥大會的空軍院校的師生，都在兩千人左右。這三次批鬥大會，他們都讓我一直站着，不準坐下，最後我實在支持不住了，才讓我坐在地上。

三次檢討作完，總算是讓我過了關。不久，空司、空政的一些機關幹部及造反派的頭頭，才開始到京西賓館找我匯報和商量工作。以後，又經過他們半個多月的工作，大約是在三月十五日，由空司的造反派組織"紅尖兵"和空政的造反派組織"紅愚公"出面，組織了一千多人在營建禮堂開了一個大會，"熱烈歡迎"我我回空軍大院主持工作。從此，就再也没有造反派來成天揪鬥我

了。

還有一件事，我也應該在這裏説一下，這就是成鈞被逮捕的事情。這件事與我有關，也是我感到特別對不起成鈞的一件事。事情是這樣的：被江青點名以後，劉震、成鈞、何廷一“靠邊站”了。成鈞當時寫的一份檢討，檢討字數不多，却反映了他一些真實的思想情况。他在檢討裏説，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種宗派主義鬥争，是一方面軍的整二、四方面軍的，是四野的整一、二、三野的。成鈞的這份檢討交上來後，我看完就與余立金商量，共同簽名將成鈞的這份檢討送給林彪。林彪又直接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再批給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傳閲。于是，成鈞的這份檢討就到了江青、陳伯達和康生的手裏。康生看完後，大筆一批就是一大篇。他認爲：“檢討中有些話是反動的，例如説，文革是一種宗派鬥争，這是對文革的一種污蔑，是以檢討名義借機放毒。這個人是反革命，必須予以逮捕。”（這是批示的大意，原件當時我要空軍黨辦復印後存空司擋案室）。康生那個時候是中央常委，他這樣一批，問題就嚴重了。文件又轉到毛主席、林彪、周恩來那裏，他們都畫了圈表示同意康生的意見。

余立金接到毛、林、周同意的康生批示文件，親自跑到京西賓館來找我，問怎麽辦。我一看，事情到了這一步，就對余立金説：“没有辦法了，衹好照辦吧。不過最好把文件拿給成鈞自己看一看。”這樣，由于康生的一個批示，就把成鈞關了好幾年。

從我自己這方面檢查，當時確實不應該同余立金把成鈞的檢討往上送。如果我們不送，康生就不會批，這樣的事情也就不會發生了。有了成鈞的這次教訓，以後劉震、何廷一等人的檢討，我們就再也不往上送了。

空軍院校的師生一直在北京搞到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才陸續返回本單位。到了這時、空軍領導機關才好不容易平靜下來。

十六、一九六七年軍委擴大會議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經請示毛澤東同意，中央軍委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了一次軍委擴大會議。我以空軍司令員的身份參加了這次會議。

這個會議破天荒地一直開了三個月。當時全國到處都在揪“走資派”，很多軍隊的領導幹部都同我一樣，天天被揪鬥，無法進行正常的工作。于是，軍委領導請示林彪同意，借開會的名義，把大家接到北京保護起來。林彪還規定，不經過他、葉劍英、徐向前三人的批準，任何人都不準返回本單位。

另外一個意圖，是借開會議之機，來研究軍隊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問題，讓大家集思廣益，共同商量對策，以穩定軍隊，盡量减少運動給軍隊帶來的損失。

當時，前來參加會議的軍隊領導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造反派的衝擊，對“文化大革命”都有些不滿。南京軍區就有八個領導被揪鬥、被罰跪，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爲此經常喝酒，還跑到了大别山，并警告説，如果有人揪他，他就開槍。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也説：“首都‘三司’的學生跑到福州來胡鬧，弄得戰備工作無法進行。如果再這樣搞我，我就要上山打游擊去了。”當時我們大家都認爲，如果聽任那些造反派們這樣搞下去，軍隊就要亂了。

會議由林彪委托葉劍英主持，每天會議的情况都要向林彪匯報。周恩來經常來參加這個會議，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也不時來參加會議。盡管在當時的情况下，會議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央文革及當時形勢的干擾和影響，但在林彪的要求和葉劍英的主持下，穩定軍隊的這個主題，却始終貫穿于會議之中。

關于這次會議，我手頭有一個資料。這次軍委的會議討論、制訂的文件一共有十七個，所有的文件都體現了這樣一個精神，

即穩定局勢，穩定軍隊。這些文件，在當時是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的。這裏舉幾個例子説明一下。

會議首先制定的是《中共中央關于不得把鬥争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文件指出："人民解放軍是無産階級專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擔負着備戰和保衛國家的偉大任務，擔負着保衛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任務。今後，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這個文件經毛澤東批準後，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發各地。

第二個文件是《中央軍委命令》(即《軍委八條》)。文件規定：軍以下和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不搞運動，衹堅持正面教育的方針，"一切指戰員、政治工作人員、勤務、醫療、科研和機要工作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軍隊内部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要"嚴格區別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一切外出串連的軍隊人員，迅速返回本地區、本單位進行鬥、批、改，不準在北京和其它地方逗留，今後一律不許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和軍隊内的戰備系統、保密系統。

關于這個文件，葉群告訴我説，一月下旬，林彪緊急約見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元帥以及楊成武，林彪説：軍隊這樣下去很危險，要搞一個"條條"。然後，林彪根據大家的意見，口授了七條意見。這個意見，在場的葉、徐、聶帥都同意。這個"七條"，很快送到軍委擴大會議進行討論。可江青和中央文革不同意這"七條"，因此葉帥他們和中央文革争論得很厲害。後來葉帥打電話給林彪，説是不是想個辦法，找一下主席？這樣，林彪決定立即帶徐帥去見毛主席。毛主席見了林彪，同意了這個"七條"，還提議再加上"加强對子女的教育"這一條，這樣成了"八條"。當毛澤東在文件上批完"所定八條，很好，照發"之後，林彪説："主席你簽了這個字，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呀！"

《軍委八條》于一月二十八日下發。這個文件下發以後，衝擊解放軍的歪風開始被剎住，對保障整個軍隊的穩定，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赢得了全軍指戰員的熱烈擁護。

第三個文件是中央軍委《中央軍委關于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文件規定：解放軍軍以上機關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在黨委的領導下進行；軍隊領導機關不宜成立各種"文化革命戰鬥組織"，一律不允許自下而上的奪權。軍以下機關，堅持進行正面教育，一律不得進行"四大"。于二月十一日正式發出的這個文件，對減少"文化大革命"運動對軍隊的衝擊，起到了較爲重要的作用。

在軍委擴大會議通過的衆多文件中，《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于人民解放軍堅决支持革命左派群衆的决定》，是一個例外。關于這個文件，我要説幾句話。我認爲，這個文件的制定，并非出于林彪的本意。

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林彪對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有這樣兩個原則：一是保證軍隊的穩定，二是軍隊不介入地方的運動。在當時的情况下，依我看衹能如此。但對林彪的這個態度，毛澤東是不滿意的。所以，他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南京軍區關于是否派軍隊支持造反派的請示報告》上批示説："林彪同志：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衆。""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請酌。"

很顯然，毛澤東的這個批示是對林彪的一個批評。林彪當然知道，毛澤東説的不是"請酌"，而是要必須執行。于是，在接到毛澤東的這一指示後，他立即開始了行動。就在毛澤東作出這個批示的第二天，軍委擴大會議就通過了《關于人民解放軍堅决支持革命左派群衆的决定》，并在毛澤東批示"照發"以後，于一月二十三日正式發出。這個文件，可以説是被毛澤東逼出來的。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央軍委又發出了《關于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

決定》。這個文件的制定和執行，就使軍隊支援地方的任務，從之前的“支左”，一下子擴大到了“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五項。通過執行“三支兩軍”的任務，軍隊全面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一結果，顯然是與林彪以前的想法相左的。

除以上這些文件之外，會議制定的其它文件還有：《關于軍以上機關進行文化革命的補充規定》；《關于軍隊奪權範圍的規定》；《關于外出人員串聯人員限期返回本單位的通知》；《關于重申切實執行軍委二月八日決定的通知》；《關于國防工業系統所屬廠礦企業、科研、設計單位和基建單位不準串聯的通知》；《關于基建工程兵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關于森林警察部隊進行文化革命的通知》；《關于軍事研究機構和機要密碼工廠進行文化革命的通知》等等，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

以後形勢的發展充分證明，這些文件的制定和執行，不僅有效地穩定了軍隊，控制了軍隊的局勢，而且通過穩定軍隊，進而逐步穩定了全國的局勢，爲恢復軍隊和地方的正常秩序，都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這次軍委擴大會議是在林彪直接領導下進行的，這些文件都是由葉帥他們向林彪匯報，并由林彪和周恩來共同領導制定的。這些文件的制定，很好地體現了林彪力求穩定軍隊、盡量減少“文革”對軍隊衝擊的指導思想。在這個問題上，周恩來、葉劍英等人與林彪的想法是一致的。對這一點，參加這次軍委擴大會議的同志都可以證明。

林彪倒臺以後，有些文章說：林彪是個反軍、亂軍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手中竊取的權力，煽動在軍隊搞全面“四大”，拼命想把軍隊搞亂，等等。這個說法顯然是極不客觀，也是極不負責任的。林彪是軍委的主要領導人，他爲什麼要一心把自己搞亂？這個說法于理不通，也絕不符合事實。大量事實已經證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自始至終都在注意保持軍隊的穩定，甚至不惜與以江青爲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發生激烈的衝

突。

十七、林彪痛斥江青

軍委擴大會議所確定的穩定軍隊、盡量避免“文化大革命”對軍隊衝擊的主題，顯然與中央文革的意圖不相符合，因而引起了中央文革一些人的不滿。爲此，葉劍英、徐向前等老帥與中央文革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特別是林彪與江青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也就開始了。

首先是揪鬥蕭華的事件。大約是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全軍文革共同在京西賓館召開一個小型會議，我也參加了。這個會議由關鋒主持，重點是批評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對軍隊“文化大革命”運動領導不力。

陳伯達在會上首先發言，批評蕭華，而且把很多問題都引到了軍委身上。他說：“蕭華是個‘資產階級政客’，他把部隊的政治工作引導到了資產階級的軌道上去了。軍隊的‘文化革命’清規戒律太多，這也不準，那也不準，把軍隊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軍隊已經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邊緣。我一路過‘三座門’（軍委所在地）就有氣，那裏的官僚主義嚴重，政客風氣難聞，是個閻王殿。我們都不敢進這個‘三座門’。”

他還指責蕭華說：“蕭華你這個人驕傲自滿，看不起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請你參加，你一次都不來，周恩來主持的中央常委碰頭會議，你是每次必到。你請四位老帥參加首都十萬人大會，動員軍事院校的師生離京，都不通知中央文革一聲。你這種作法，就是和中央文革唱對臺戲，就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就是違背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定。”

聽了陳伯達的這番話，在座的絕大多數軍隊幹部都感到憤憤不平。蕭華當時坐在主席臺上，臉上一陣陣變色，最後終于忍不

住，站起來說："讓我申辯幾句好不好？" 陳伯達却說："我們不願意聽你講話，要講，到鬥爭你的大會上去講吧。"

聽到這裏，葉劍英怒不可遏，猛力拍案而起。由于用力過猛，他把自己的小手指都敲斷了。他憤怒地斥責陳伯達："你陳伯達胡說！你憑什麼對蕭華橫加指責？你這是對人民解放軍的污蔑。你們已經把地方搞亂了，現在又想把軍隊也搞亂。你們這樣搞究竟對誰有利？你們究竟想幹什麼？"

葉劍英這一發火，會場上的氣氛立即極爲緊張起來。看見這樣，身爲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就不得不出來批評了蕭華幾句。他說："你蕭華是有錯誤的。你把軍隊的政治工作搞成了這個樣子，影響了我們全軍。"

也許徐向前的本意是爲了緩和會場的氣氛，但兩位老帥在蕭華問題上的公開矛盾，給了我們這些與會者很大的震動。一時間，整個會場上鴉雀無聲。這天晚上的會議就這樣不歡而散了。參加會議的同志回到房間裏休息，但是背後都議論紛紛。

就在這天夜裏，蕭華的家遭到了北京軍區文工團和一些軍事院校造反派的包圍。這些造反派不但抄了蕭華的家，搶走了家中一部分文件和檔案，還要揪走蕭華。但蕭華從後院跳墻出走，跑到葉劍英的家裏躲了起來。

葉劍英非常生氣，他立即打電話，請求毛澤東的指示。毛澤東表態說："抓蕭華、抄家和搶檔案都是不對的。" 毛澤東還馬上找到江青，要江青親自到蕭華家裏去處理這個問題。

在毛澤東的明確指示下，江青不得已來到蕭華的家裏，對那些軍隊造反派說："誰讓你們來抄家的？是誰讓你們來揪蕭華的？還不趕快撤出去！天亮以前，一定要把'打倒蕭華'的大字報全部覆蓋住。" 江青這樣一訓，把造反派訓走了。江青還批評了蕭華的秘書，責怪他不該隨便把保險櫃的鑰匙交給那些造反派，讓他們抄走文件和檔案。

第二天，二十日上午七點半，楊成武在京西賓館召集大家繼續開會，專門傳達蕭華的問題。他告訴我們說，江青要他來向大家宣布，昨天晚上在蕭華家裏發生的事情已經查明，泄露會議情況的是楊勇。楊勇在前一天晚上散會以後，向北京軍區文工團傳達了陳伯達的講話。對于這件事情，楊勇要負責任。他還傳達說，毛澤東已經對這件事表示了態度，認爲抓蕭華、抄家、搶檔案都是不對的。

這件事情究竟是不是像江青等人說的那樣，我不知道。不過這次會議以後，中央文革就批準又把楊勇抓了起來。

這之後的一天晚上，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觀看演出時遇到蕭華，對他說："蕭華，你寫個簡單的檢討，我給你批一下，就沒有事了。" 蕭華聽了後很高興，連聲說"好"。誰知他這個檢討一寫，造反派就繼續揪住不放。于是，毛澤東又要蕭華寫了第二次檢討，這才讓他好不容易過了關。

二十日上午，葉劍英也向林彪匯報了那天晚上會議的情況，以及後來發生的抄蕭華家的問題。林彪聽了以後勃然大怒，當即要秘書打電話，叫江青專門到毛家灣來一趟。

下午三點，江青來到了林彪的家裏，想向林彪解釋一下發生的問題。不料林彪一見江青就火冒三丈，不等江青開口，就大發脾氣，連珠炮一樣地責問江青："你們說解放軍已經走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已經被我們帶到了資產階級軌道上去了，有什麼根據？說'三座門'是閻王殿，你們一見'三座門'就有氣，你們太放肆了！這完全是對軍隊和軍委領導的污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是毛主席指揮的，軍隊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何解釋？你們這樣仇視軍隊，仇視軍委領導，我幹不了，不幹了！我辭職總可以吧？我要報告毛主席，你們不同我商量，就大罵蕭華，鼓動抄家、搶檔案，這是爲什麼？你們不通過軍委，就直接插手軍隊的工作，想搞掉總政，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嗎？我要找毛主席，請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職務。"

在林彪說話的中間，江青一直想插話解釋，但林彪連說帶罵，根本不讓江青解釋。等林彪稍一停，江青立即說："林副主席，你請息怒，我說幾句行嗎？軍隊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這句話，不是

我說的，我昨天晚上沒有參加會議。陳伯達是組長，我是副組長，我没有權力制止他的發言。"

林彪說："中央文革是你說了算嘛，實際上是你把持着的嘛！陳伯達出席軍委會議你不知道？他要講什麼你也不知道？不經過你的同意他敢隨便講？"江青回答說："昨天晚上，他講了什麼我確實不知道，這些話確實不是我要陳伯達講的。不過，陳伯達對總政、對蕭華有批評是可能的，中央軍委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清規戒律多一點也是真的。"

聽到這裏，林彪更加火了。他一下子把身邊的茶幾也掀了，說道："什麼叫清規戒律？《八條命令》是毛主席親自批發的！你們一定要把軍隊搞亂才罷手嗎？搞亂了軍隊究竟對誰有利？毛主席批準的《八條》，你們也要推翻嗎？"

憤怒之下，林彪連聲高叫警衛參謀備車，說："我們兩個人馬上去見毛主席，把事情說清楚。是我的問題，我辭職，我不幹了！"這時，葉群走進了林彪的辦公室。林彪一見又大叫："葉群你來得好，我同江青鬧翻了。我現在馬上去見毛主席，提出辭職，我不幹了！"

葉群趕緊攔在他們兩人中間，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兩人不要吵。葉群事後告訴我，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即使見到了毛澤東，也不會冷静下來，可能會鬧出大亂子來。没有辦法，葉群衹得在林彪面前跪下來，抱住林彪的腿不讓他往外走。她向林彪勸說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都肩負着重擔，在這種困難的時期不要鬧意見，有話好好說。你們應當相互諒解，這麼鬧出去影響太大，對你們兩人都不利，你們這麼鬧怎麼得了。"

接着她又勸江青："請江青同志不要見怪，林總脾氣不大好，現在正在火頭上。等他冷静下來，再好好商量，把問題講清楚，現在不要急于解決問題，更不能到毛主席那裏去，影響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說："你是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我有錯誤，你可以批評我。你批評我、斥責我，甚至駡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裏去呢？那些話的確不是我說的。駡蕭華、抓蕭華、抄家，都是不對的，絕對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檢查。這件事情我已經報告了毛主席，是我錯了，我檢討。"

江青說完以後，葉群又勸林彪說："江青同志已經接受了批評，向你表態了，就不要再鬧了吧。"江青這一軟下來，林彪也不吭聲了，坐到了沙發上。葉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了下來。葉群又向江青說了許多好話，然後，又陪着江青坐車回到了釣魚臺。

這次林彪與江青大鬧，撕開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說是種下了分裂的種子。林彪對江青是不滿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過分譴責。就這樣，雙方的矛盾和鬥争一直延續到"九大"，延續到廬山會議，延續到"九一三"林彪的終結。

據我所知，在當時的中央常委以至整個的中央領導層裏，敢這樣當面斥責江青的，除了毛澤東之外，就衹有林彪了。

十八、中央文革檢討

在與江青大吵之後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一日晚上，林彪通知葉劍英和徐向前，讓他們兩人主持召集軍委會議，請中央文革的陳伯達、江青、康生等參加會議，傳達毛澤東對蕭華問題的處理意見，并通知蕭華本人參加會議。

當天晚上的會議，中央文革的成員衹有關鋒一人到了會，其他人都没有來。會上，關鋒代表中央文革對蕭華的問題作了解釋。他說："陳伯達昨天晚上的講話，是因爲開會之前喝了一點酒，糊裏糊塗亂說的，講了一些錯話，造成了不良後果。對此，江青同志已經請示了毛主席，及時作了糾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會議上已經批評了陳伯達，陳伯達也已作了檢討，他承認事前没有和江青同志商量。"這樣，就把陳伯達推到了第一綫，保護了江青。

關鋒講完後，徐帥接着問大家有什麼意見。蕭華第一個站
來發言，說："你們說我反對'文化大革命'，難道穩定軍隊就
反對'文化大革命'嗎？軍隊亂了又怎樣保衛祖國，保衛'文化
大革命'？"

之後，與會的軍隊幹部争着發言，以發泄自己心中的不平
廣州軍區司令員黄永勝在發言中嚴厲斥責中央文革，斥責陳伯
達、江青、康生等人不聽毛澤東的話，不執行毛澤東的指示，胡
亂批評解放軍，亂鬥解放軍的幹部，要奪解放軍的權，希望中央
文革作出認真、深刻的檢討。說到這裏，黄永勝的話被關鋒打斷
了。關鋒責問他："你這樣說，是指責江青同志嗎？你是反對江
青同志嗎？"

聽關鋒這樣一說，徐向前顯得十分緊張，因爲他是全軍文革
的組長，要對中央文革負責，不得已，就想替黄永勝掩飾一下，
說："黄永勝是亂說的，有意見可以提嘛，不要指責江青同志，江
青同志是擁護毛主席的。"當時我也很怕黄永勝這樣說，會遭致
江青的不滿和仇恨，反過來整黄永勝，就趕緊說："江青同志是
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綫的，是聽毛主席的話的。"接着葉群也說：
"江青同志是無産階級司令部的人，不能亂說。"

就這樣，會議的氣氛才稍稍緩和一些。大家逐漸冷静了下來，
但還是紛紛提意見，要求中央文革注意穩定解放軍，不要把軍隊
搞亂。

關鋒回去以後，把會議的情况向陳伯達、江青、康生作了匯
報，江青、康生聽了大怒。江青說："今天這個會議是個反對毛
主席、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我的會議，軍委文革組長徐向前召開
這樣的會議，是鬥争我們的。"他們把問題一下子追到徐向前身
上，責問他爲什麼要開這樣的會議。徐向前没有辦法，祇好說：
"既然是黄永勝放的炮，那就由黄永勝來作檢討吧。"于是，他幾
次催黄永勝寫個檢討，由他轉交中央文革。爲此，黄永勝跑去請
示林彪，要不要寫這個檢討。林彪說："絶對不能寫這個檢討，要
堅决頂住。我去直接報告毛主席。"

江青拿林彪没有辦法，祇好把這筆帳算到徐向前的身上。從
，江青對徐帥表示不滿，幾次建議林彪撤换徐帥的全軍文革小
組長的職務。林彪說："徐帥德高望重，由他出任全軍文革組
又是你們提出來的。如果連徐帥都不合適，那麽，在軍隊裏我
找不出合適的人選，就請你們再提一個吧。"

林彪事後對我說："誰當全軍文革的小組長，過不了多久，就
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帥，全軍文革那就讓他名存實亡
吧。"

後來果然如此，徐向前下來以後，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由楊成
武代理了一個短時間。不久，楊成武隨毛主席東巡以後，全軍文
革也就銷聲匿迹了。

接着就又發生了"二月逆流"事件。我想，"二月逆流"事情
的發生，是和當時軍委擴大會議的氣氛分不開的。

十九、"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事件發生的時候，我還没有參加中央文革碰頭
會，這些情况都是以後周恩來告訴我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和二月十六日下午，他在中南海
懷仁堂兩次召集中央常委碰頭會議，研究"抓革命、促生産"的
問題。在這兩次會議上，陳毅、李富春、譚震林、葉劍英、徐向
前、聶榮臻、李先念以及谷牧、余秋裏等幾個人，當場就跟陳伯
達、康生、江青、王力、關鋒等人吵了起來。陳毅等人說，"文
化大革命"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把黨和政府搞亂了，把國
家搞亂了，還要把軍隊搞亂。葉劍英還對張春橋等人策劃的"上
海一月風暴"進行了抨擊，他說："上海奪權，改名爲'人民公
社'，涉及到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也不請示毛主席，就
擅自改變名稱，這是想幹什麽？什麽是巴黎公社的原則，不要黨

的領導就是巴黎公社的原則嗎？”

這兩次會議上，要數譚震林鬧得最厲害。他說：“一天到晚，老是群衆自己解放自己。這是什麼？這是形而上學！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是殘酷鬥争、無情打擊。蒯大富是個什麼東西？是個反革命！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幹部通通打倒。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争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他還說：“我從來没有哭過，現在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想來想去，自己不該那麼早參加革命，不該活六十五歲，不該跟着毛主席。”

這時，陳毅說：“譚老板，你說話真有水平，坐下來說。”接着，陳毅又從當時的“文化大革命”，聯系到了“延安整風”。他說：“在延安，過去有人整老幹部整得很凶。延安‘搶救運動’搞錯了很多人，到現在都還有意見。這個歷史教訓，不能忘記。那次挨整的還有我們這些人。”

李先念指責了大串聯，說：“那樣大規模的串聯，把交通和秩序都搞亂了，經濟損失嚴重。”另外，徐向前、聶榮臻、余秋裏等也斥責了中央文革。當時，他們幾個人的情緒都很激動。

周恩來跟我說，當時他不好說什麼，衹能勸雙方冷静下來。結果，這兩次會議都不歡而散。

現在想起來，老帥們當時說的都是對的，周恩來大概也有同感，但是不敢說，也不好說。所以一直在調解。所以我覺得周恩來在政治上是很老練的。

果然，這一下子激怒了毛主席。

以後葉群告訴我，第二次中央常委碰頭會後兩天，也就是二月十八日的晚上，毛澤東突然找葉群到他中南海的住所談話。一開始，毛澤東就怒氣衝衝地說：“葉群，我準備帶你和林彪到南方去。”

葉群說，她聽到這些話，感到莫名其妙，神經非常緊張，不知道毛澤東的用意究竟何在。毛澤東接着說：“陳毅、譚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李先念他們幾個，都反對‘文化大革命’，不聽我的話，不跟我走了。他們討厭群衆運動，他們對‘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從根本上反對。我的决心是不會改變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們不跟我走，還有林彪和你，我就帶你們兩個到南方去。解放軍不跟我，我和你們到南方另外組織一支解放軍，重上井岡山，重新開始。”

葉群當即表示，林彪死也要跟着毛澤東，是永遠忠于毛澤東的。她還說：“主席請放心，要保重身體。”說着，葉群就哭了起來。這樣一來，毛澤東又反過來安慰她說：“不要難過。你回去以後告訴林彪，說陳毅、譚震林他們反對‘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說‘文化革命’是要打倒老幹部，現在全國有百分之八十的老幹部都被打倒了，整了這麼多人。還說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不是要把所有的老幹部統統整光嗎？他們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動謬論。他們認爲‘文化大革命’一點好處也没有，反而把全國搞亂了，現在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葉群表示，林彪是永遠忠于毛主席的，主席請放心，要保重身體。她一定會將毛澤東的這些話完完全全地轉達給林彪。這時，毛澤東問葉群：“林彪現在的身體怎麼樣？”葉群說：“林彪現在的身體不太好，所以不能來參加會議。”毛澤東聽後說：“林彪同志身體不好，不能常來參加會議，一些情况不知道，也不行。這樣，今後的中央常委會議和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由你來參加。你回去以後，再把會議的情况向林彪報告。”葉群聽了非常高興，馬上說：“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辦。”

從此葉群便一步登天。當然，這是有江青作爲先例的。在那以後，葉群就與江青一起，一直出席由毛澤東或周恩來召集的中央常委會議以及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議。這兩位夫人一直參與我們黨和國家的最高政治决策，從此越發不可收拾。

葉群還告訴我，就在二月十八日的晚上，毛澤東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她列席了這個會議。會上，毛澤東大發了一通脾氣，十分嚴厲地批評了陳毅等四位老帥和李富春等三位副總理。他

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同志，他的地位也不穩哪，有人要奪他的權哩。讓他作好準備，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

毛澤東還說："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的組長吧，把江青、陳伯達逮捕、槍斃，讓康生充軍。我也下臺，你們把王明請出來當主席嘛！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你譚震林也算是老黨員，爲什麽站在資產階級路綫上說話呢？"

他還特别挖苦譚震林說："你說你不該那麽早入黨，不該活到六十五歲，不該跟我革命，那你可以退黨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于你該不該活六十五歲，那怎麽辦哪，你已經活了嘛。"

毛澤東最後表示："這件事情，我提議政治局開會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發動全體黨員來解决。"說罷就退場走了。

以後，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在中南海的懷仁堂幾次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幾位老帥和副總理進行批判。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因有了毛澤東撑腰，神氣十足，猛攻幾位老帥和副總理，給他們扣了很多的大帽子。

後來，毛澤東又點名讓周恩來帶領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到正在京西賓館舉行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作檢討。我參加了這個會議。第一個作檢討的是陳毅。他說，他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在一些場合說了一些錯話，造成了不良影響。今後一定要認真學習毛澤東關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不斷地改造自己。

第二個發言的是譚震林，他非常沉悶、抑鬱，臉色非常難看。他說自己對"文化大革命"說了一些錯話，請大家批評。

第三個發言的是徐向前。他說，他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學習不認真，工作不得力，對"文化大革命"也說了一些錯話。另外，他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也不稱職，雖然對軍隊院校師生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效果不大，軍隊仍然受到衝擊。今後一定要好好學習，改造思想，把"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其他老帥和副總理没有發言。周恩來最後說："以上幾位老同志，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說了一些錯話，向軍委擴大會議作自我批評。希望到會的同志接受教訓，很好地學習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各項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周恩來講完，就讓大家發言。由于當時我們都不了解情况，所以没有一個人發言。于是，會議就這樣冷冷清清地散場了。

不久，江青等人就把這件事情捅到了社會上，在全國掀起了一個大規模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三月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策劃下，北京組織了十萬人的大游行，反擊所謂的"二月逆流"。一時間，炮轟、火燒的標語，貼遍了北京的街頭。

四月下旬，造反派開始圍攻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葉劍英、徐向前他們的家也遭到了圍困。這些都是中央文革小組出面搞的，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也都知道這些情况，但没有人發出指示爲李富春等人解圍。從這以後，這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就很少在公開場合中露面了。接着，中直機關黨委又組織幾位老帥、副總理宿舍的黨支部成員，對他們進行批鬥。據說，這種方法是康生和江青想出來，由江青請示毛澤東决定的，其目的就在于不讓這幾位老帥和副總理舒舒服服地過這一關，把他們搞得精疲力竭。

對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們進行批判以後，毛澤東還是對他們不放心，特别是老帥們，因爲他們在軍隊中有一定影響。我知道一件事。一九六七年一月，當時空軍副司令王秉璋，被造反派們揪住，先是將他用汽車押着在北京市轉圈游行示衆，以後又把他關押起來。一個多月後，王秉璋得了肝炎，身體不行了。他的妻子

史導來找我，要求我把王秉璋的情况報告給林彪。我把這件事情告訴了葉群，請葉群報告林彪。林彪得知此事，就要葉群報告毛澤東説，七機部是重要的機要部門，把王秉璋搞掉了，就無法維持七機部的工作。毛澤東同意了林彪的這個意見，這樣就把王秉璋放了出來。

這時，毛澤東就想起了幾位老帥，不知道在批判了他們以後，這幾個人會不會在背地裏有什麽不滿，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有没有轉變。毛澤東想知道他們住在西山究竟在幹些什麽，就想派人去暗地裏察看一下。

毛澤東先找到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劉素媛，讓劉素媛告訴葉群，要葉群乘機把王秉璋送到西山，去和老帥們住到一起，看看那些老帥們在幹些什麽，説了些什麽，都有那些活動，有没有串聯？劉素媛還告訴葉群，毛澤東要王秉璋注意經常了解一點情况，并且直接向毛澤東匯報。

後來，葉群就帶着她的女兒林豆豆來到王秉璋的家，把毛澤東的意思告訴了他，向他布置了這個任務。後來，林豆豆把這件事情告訴了我。

後來，王秉璋通過我轉給毛澤東的報告至少有兩個。我還記得，這兩個報告都是用記録本的紙寫成的。在報告裏，王秉璋把他與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三位元帥，大概在什麽時間、什麽地點一起散步、談話什麽的，都寫得清清楚楚。兩個報告都説，老帥們在受到批判以後，接受了教訓，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都有所轉變，一致認爲這個運動搞得好，對"反修、防修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起了很大的作用。兩個報告都是這樣的内容。

毛澤東看了這些報告，曾經批轉給林彪、周恩來以及中央文革的人傳閲。不久，毛澤東就采取了一些措施，來保護這些老帥們。所以，王秉璋實際上是爲老帥們做了一件好事，他的這兩個報告實際上起到了保護幾位老帥的作用，使他們没有受到進一步的迫害。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晚上，毛澤東請周恩來、李富春、徐

向前、聶榮臻、李先念等人到他的住所開了一個"團結會"。當晚，周恩來擬訂了一個參加"五一"勞動節首都慶祝大會的領導人員名單，這個名單裏就有李富春等人。毛澤東批準後，第二天他們全都上了天安門城樓。當時，在報紙上露面是個標志，衹要參加了重大活動并且在報紙上一露面，就意味着"站出來"了；一旦在報紙上没有了名字，就意味着可能被打倒了。

以後，毛澤東又采取了進一步的措施。一九六七年八月，經毛澤東提議，李先念被吸收參加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後來，又吸收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參加了毛主席召集的中央常委碰頭會議。不過，這些老帥和副總理雖然參加了會議，但却極少發言，顯得十分嚴肅和謹慎。另外，毛澤東幾次接見軍隊團以上幹部時，這些老同志也都參加了接見，而且位置的安排都比較靠前。

但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底，葉劍英在北京西山的宿舍再一次被圍，參加圍困的人有數千人之多，主要是外地來北京串聯的學生和軍事科學院的造反派。這些人分乘七十多輛汽車，來到西山中央軍委的駐地安營扎寨，樹起了數十面紅旗，日夜輪流呼喊口號，要葉劍英出面回答問題。林彪很快就把這一情况向毛澤東作了匯報，但一直没有動静。一直到五月三日，毛澤東才委托黄永勝代表他去西山做工作，命令圍困葉劍英家的學生和造反派各自撤回原單位。經過黄永勝兩個多小時的説服工作，那些學生和造反派們才逐漸撤離西山，事情才告一段落。

接着，林彪又向毛澤東建議，應停止老帥們家裏的黨支部對他們的批判。林彪認爲，這種辦法不宜多搞，會把老帥們的身體搞壞了。毛澤東同意了林彪的意見，也認爲，搞了一段時間後，應當適可而止了。于是，林彪就委托黄永勝和我代表毛澤東和他，去幾位老帥和副總理的家做工作，"解放"他們。

黄永勝和我接到通知，先到了西山葉劍英的家裏，然後依次到了聶榮臻、徐向前和李富春的家裏。當我們説明來意，并向家裏的工作人員宣布毛澤東和林彪的指示後，葉劍英等幾位老同志

都要我們代他們向毛澤東和林彪表示感謝。

我們最後到的是陳毅家，當時他正在聽收音機，見到我們進去連聲說“歡迎，歡迎”。他還告訴我們，他夫人張茜上班還没回家。當我們說明來意後，陳毅高興地說：“好、好。支部的同志說，我的檢討很好，已經有一段時間没有批判我了。現在有了‘尚方寶劍’，更不怕批鬥了。”隨後，他還堅持把黃永勝和我一直送到大門口，看到我們上了車，才肯回去。

至于譚震林的家，毛澤東不同意我們去，我們也没有辦法。這使我想起一件事情，誰反對過毛主席，最後都没有什麼好結果。徐海東就是個例子。

徐海東是一九二五年入黨的老同志，紅軍時期曾經任紅二十五軍軍長和紅十五軍團軍團長。抗日戰爭開始後，相繼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旅長、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副總指揮，在鄂、豫、皖地區，在陝北和江北地區都立有赫赫戰功。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了大將軍銜。但他就是因爲一件事情得罪了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屆全國人大以後，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到了“第一綫”，而毛澤東則退到了“第二綫”。就在這個時候，聽說徐海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信裏說：“毛主席年歲大了，應該交班了，應該交給劉少奇。”毛主席見到這封信很不滿意，從此以後，就再没有理過徐海東。

徐海東以後就長期休養。他最初是住在總參謀部。當時，一些在北京的老部下經常前去看他。我因爲長期在新四軍三師工作，這支部隊裏的八旅、十旅都是在紅二十五軍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對他很有感情，也經常去看他。後來他轉到大連休養，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難，我們還曾以老部下的名義，幫助他解決了一些問題。爲此，他還送給我一個很好的白玉印章作爲答謝。當然這些是題外的話。

關于“二月逆流”的問題，我原以爲就此可以告一段落了，没有想到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又掀起了一次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而且調子和規模都大大超過了懷仁堂會議。

本來，八屆十二中全會，是爲了討論和準備中國共産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各項工作而召開的。會議要討論的問題有：代表名額的分配、選舉的辦法，修改黨章以及準備文化大革命的總結。當這些問題討論和決定以後，在中央文革碰頭會議上，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突然向周恩來提出要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要清算他們的錯誤。而且還要批判朱德。他們的理由是，這樣才好讓他們過關，出席“九大”。當時我感覺，這都是他們事前商量好的，也絕不衹是代表他們幾個人的意見。

周恩來要江青請示一下毛澤東。不久，江青請示回來說：“毛主席已經批準了，可以批三天，如果不够還可以多批幾天。總之，要參與‘二月逆流’的人作出認真的檢討。”

于是，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的事情，就這樣定了下來。周恩來提出，把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分别安排到全會的各個組裏去，以便他們參加會議。結果，朱德分到了華北組，葉劍英分到了中南組，陳毅分到了華東組，徐向前、李先念、鄧子恢、李富春等也都分到了各個組。唯獨譚震林，毛澤東不同意他參加會議。

由于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意見，這次參加八屆十二中全會的人，除了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以及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和各大軍區負責人以外，還有一批造反派，是中央文革從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區找來的，是所謂的“新鮮血液”。這些造反派一上來就亂“放炮”，猛轟這些老同志，一些“左”得出奇的口號也喊了出來，并且登在了簡報上。這樣，江青等人通過他們第一天就點燃了大批判的烈火。

中央文革還給各個小組提供了一些“炮彈”（批判材料）。這些“炮彈”裏，不僅有幾位老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所謂“錯誤”，而且還有他們幾十年來的“老帳”。據我看來，這些“炮彈”裏的有些材料的來源，即使是中央文革的那些人，恐怕也是不會知道的，但是都提供了出來。在會議上就不僅僅衹是批判老帥們

在一九六七年的問題，而是徹底算開了這些同志的歷史老帳，把這些老同志參加革命以來所犯的“錯誤”統統翻出來進行批判。所以，鬥爭他們的内容就很廣，連紅軍初創時期、第一次國内革命戰爭時期、井岡山時期、瑞金根據地時期、長征途中、延安時期和建國後等各個時期的問題，都提了出來。當然，主要還是抓住他們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進行批判，鬥得這些老同志的情緒都不好。

在會議上，毛澤東始終没有公開批評這些老同志，但他也没有出來爲他們説過一句公道話。其實，會議上的一切，都取決毛澤東的一句話，也都是在他的眼前進行的。所以，我的感覺，這一切實際上是毛澤東親自決策的。

這次八屆十二中全會，我是以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的身份參加的，被分到了華北組。在當時的會議氣氛下，我曾經錯誤地批判了分到這一組的朱德委員長和李先念副總理。我説：“朱老總，你當了一輩子的總司令，實際上指揮打仗的是毛主席，真正的總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是紅司令。聽説你在井岡山的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會議上要把毛主席趕下臺，你把這些情況説一説，也可以教育我們嘛！”

紅四軍七次黨代會的事情，是我在中央文革提供的材料裏看到的，但其它的話却是我自己説的。在講完這些話以後，我仔細想了一想，覺得這些話説得太過了一些，是犯了一個錯誤。可是，朱德委員長的胸懷非常寬大，他聽了我的話以後并没有生氣，祇是解釋説：“我没有反對毛主席。”以後，每當我回憶起這件事情時，都深感内疚和慚愧，同時朱德委員長這種寬宏的態度也使我深受感動和教育。

在小組會議上，我還批判了李先念副總理。我説：“你認爲‘文化大革命’没有保護老幹部，就好像祇有你要保護老幹部，而毛主席不知道保護老幹部似的。”

盡管在當時那種特殊的場合下，大家都這樣説，不這樣説誰也過不了關；但我隨大流，這樣無原則地批評李先念副總理，也

是很不應該的。除此以外，整個會議期間我没有對其他老同志提出過任何批評意見。

全會閉幕以後，中央決定，按規定範圍傳達會議的情况，同時要傳達“二月逆流”問題。因此在空軍的傳達會議上，我也按照中央的决定作了傳達。

康生和江青一直想充當反對“二月逆流”的英雄。八屆十二中全會剛剛批完，到了九大即將開始的前夕，康生在一次中央碰頭會議上向毛主席書面提出了要搜集和整理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批判“二月逆流”的記録，寫成一個文件，發給九大代表。這樣，他們要將批判“二月逆流”的問題列入九大議程。當時祇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同意這一建議，而林彪、周恩來、黄永勝、汪東興和我們都不同意。毛主席最後表示：“不要再批了。”這樣才使這一問題告一段落。

這樣，所謂“二月逆流”的問題，從一九六七年二月開始批起，到一九六九年四月才結束。也就是説，這幾位老帥和副總理整整被批了兩年多。

從十年動亂所造成的損失和後果看，陳毅、譚震林等幾位老帥和副總理當時對“文化革命”所提出的意見是對的，但是，由于他們的批評觸及了毛主席，不符合毛主席的心願，所以他們在以後的兩年裏一直作檢討、靠邊站。

二十、青海事件與内蒙事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軍委擴大會議通知開大會。下午三點，大家集合在第一會議室。大家一邊等着開會，一邊交頭接耳地閑談。不一會兒，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的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人陸續來到會議室。與他們同時來的，還有青海省的造反派代表和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副司令員趙永夫。

周恩來首先宣布說："在青海發生了大規模鎮壓革命群衆的事件，青海省軍區調動軍隊，圍殲革命群衆。根據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經向各方面進行了反復調查，青海省的問題已經基本清楚。"接着，中央文革的成員一個一個講話。

從他們的講話中，我們得知了這個青海事件的大致情況：一九六七年一、二月，青海省的造反派集中在西寧市，準備奪取青海省的黨、政大權。當時，青海省委的主要負責人爲了躲避造反派的圍攻，已經住進了省軍區大院。于是，造反派就衝向省軍區所在地，要求省軍區交出省委主要負責人。後來，造反派占領了青海日報社，軍區派人包圍了報社，勸造反派退出，但毫無效果。雙方對峙了九天後，在二月二十二日發生了衝突，部隊開槍打死、打傷了一些人。這件事報上來以後，毛澤東三月十一日批示："可以調查一下，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就值得研究了。"接到毛澤東的批示，中央文革先後作了兩次調查。他們在聽取了造反派的片面控訴後，向毛澤東作了匯報。三月二十四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作出《關于青海問題的決定》。

接着，就在會議上宣讀這個《決定》。《決定》指出："第一、青海省軍區内部問題是一個反革命政變，副司令員趙永夫玩弄陰謀手段，推翻了司令員、軍區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的領導，篡奪了軍權。第二、趙永夫篡奪了軍權以後，勾結二〇五部隊副主任張曉川，對西寧'八一八'等革命群衆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打傷革命群衆三百餘人，甚至向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開槍，逮捕革命群衆近萬人。第三、趙永夫謊報軍情，欺騙中央，蒙蔽群衆，所謂'八一八'等革命群衆組織擁有大批槍支，并首先開槍，毫無根據。經向在現場的群衆調查，守衛青海日報社的'八一八'群衆，并没有槍支。趙永夫等人，派了專門小組進行搜查，至今未搜到一枝槍。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書記王昭直接有關。"

《決定》規定的處理辦法是：一是以中央軍委的名義發布命令，由軍區司令員、黨委第一書記劉賢權全權負責處理青海問題，除獨立師、獨立團歸劉賢權指揮外，八〇六一部隊、八一二二部隊、二〇五部隊，在處理青海問題上也統一歸劉賢權指揮。二是向群衆宣布"八一八"爲革命群衆組織，二月二十三日的流血事件應由趙永夫和張曉川負責，并爲死去的恢復名譽，對負傷的負責治療，被逮捕的一律立即釋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三是成立以劉賢權爲首的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員會，將趙永夫隔離受審，張曉川、王昭隔離反省，聽候處理。

《決定》宣讀完，就當場逮捕了趙永夫。之後，周恩來又講話强調："軍委擴大會議應當很好地討論這個《決定》，接受青海的教訓。今後，解放軍要堅決支持'左派'，支持'無産階級革命派'，絶對不準開槍，更不準打死、打傷和逮捕革命群衆。"

我同趙永夫很熟悉。他原來是東北軍的人，直羅鎮一仗他成了我們的俘虜，就參加了紅軍，并從此成了我的部下，從班長、排長、連長一直提升到了團長。解放以後，他在青海省軍區當了副司令員。

青海事件發生後，趙永夫曾經打電話報告了軍委副主席葉劍英，葉劍英答復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可是突然之間，由于中央文革的插手，事情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不僅說趙永夫是打死、打傷"革命群衆"的罪魁禍首，把他抓了起來，而且幾乎把他槍斃了。這樣的處理，弄得葉劍英也是措手不及。

青海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我到現在也搞不清楚。不過以後有人告訴我，青海發生的事件，是西寧市的造反派組織"八一八"在北京來西寧串聯的一些學生支持下，借口《青海日報》的一篇社論有問題，强行衝進報社。他們在報社大搞"打、砸、搶"，有幾個報社的工作人員竟被他們活活打死了。不僅如此，他們還搞來了一批槍枝彈藥，對向他們做工作的解放軍戰士進行武力威脅。省軍區以趙永夫爲代表的領導認爲，這樣的局面很危險，于是派出部隊對造反派占據的《青海日報》社進行了武裝包圍，命令他們立即退出報社，交出武器。但占據報社的造反派向部隊開

了槍。在這種情況下，部隊不得不開槍進行反擊，從而致使一些造反派被打死、打傷。當時的情況，趙永夫立即用電話報告了軍委和葉劍英。

中央文革對青海的事件最初保持了沉默，但幾天以後就利用簡報刊登了青海“紅衛兵”的來信，控訴被“武裝鎮壓”的經過。張春橋、王力、關峰、戚本禹、姚文元還聯名給毛澤東寫信，要求重新審查青海事件。這才有了毛澤東三月十一日的批示。

以後，中央文革找造反派幾次了解情況，都是一些一面之詞。依據這些一面之詞，中央文革向毛澤東作了匯報，促使毛澤東下決心這樣解決青海事件。這就是我們這次會議的由來。

就在處理青海事件的同時，又發生了內蒙事件，兩個事件的經過大體都差不多。事情也巧，內蒙古軍區司令員王良太也是我的老部下。我任東北野戰軍第二縱隊政委的時候，他當過縱隊參謀長。一九六六年，他任內蒙古軍區參謀長。“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以後，他是堅決支持原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烏蘭夫和王逸倫、王鐸等人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內蒙古呼和浩特“三司”等造反派組織在衝擊自治區黨委時，王良太組織部隊保衛區黨委，最後開了槍，可能打傷了幾個人。事情很快就反映到了北京，周恩來要我派飛機把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和軍區的一些領導人，以及造反派的代表接到北京，大概是要聽取他們對這一事件的說明。

由于這個事件又牽涉到軍隊開槍的問題，所以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又一次把這個問題弄到了軍委擴大會議上。跟上次青海事件一樣，造反派一攻，就把王良太也逮捕了起來。

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當時也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向我們宣布了。《決定》認爲：“內蒙古軍區的個別領導人，二月五日以來，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綫錯誤，嚴重打擊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衆組織，大批逮捕了革命群衆，支持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烏蘭夫的代理人王逸倫等人以及他們所操縱的保守組織。”

“內蒙古軍區黨委的一些同志，不經過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批準，把軍區黨委書記、副政委吳濤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還擅自逮捕了已經站在革命群衆組織方面的自治區黨委書記高錦明等同志，并宣布他們爲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是嚴重的政治錯誤，是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行爲。”《決定》還認定，內蒙古軍區有些負責人，在中央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還采取兩面的態度，進行對抗中央的活動；內蒙事件主要由王逸倫、王鐸和內蒙古軍區的領導負責。

《決定》同時還宣布：“中央決定由原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擔任內蒙古軍區司令員，由吳濤同志任軍區政治委員。以劉賢權、吳濤二同志爲首改組內蒙古軍區黨委，并對軍區所發生的問題，進行處理。”“成立以劉賢權、吳濤二同志爲首的內蒙古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革命群衆組織的負責人，可以參加籌備小組。自治區黨委高錦明等同志經過群衆的同意也可以參加籌備小組。革命委員會的籌備小組，負責籌建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領導內蒙古地區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負責處理善後問題，并組織‘抓革命、促生産’，把工農業生産和財貿工作抓起來。”《決定》還要求“對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衆組織、革命群衆和革命幹部一律平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烏蘭夫的問題，要在內蒙古公開揭露。”

內蒙事件的真實情況究竟如何，我同樣不清楚，以後對王良太是如何處理的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相信，歷史就是歷史，事情總會恢復它本來面目的。

青海、內蒙事件處理完不久，軍委擴大會議就結束了。于是，大家又回到本單位，繼續接受群衆的衝擊和“再教育”。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回了原單位，因爲當時有些地方的情況比較好，有些地方則比較亂，爲了保護一些較亂地方的軍隊領導，軍委在會議結束以後，又安排他們在北京住了一段時間。比如沈陽軍區的陳錫聯和廣州軍區的黄永勝，就是在北京一直住到了夏天才分別回去的。

這次爲期三個多月的軍委擴大會議，在維護軍隊穩定、保護軍事機關不受衝擊、保證軍隊紀律、組織軍隊參加“三支兩軍”，以及維護國家的基本穩定、維護國家的基本生產、保護國家領土完整不受侵犯等方面，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這一點是不可抹殺的。

二十一、“五一三演出”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解放軍在北京的幾個文藝團體——北京軍區文工團、海政文工團、空政文工團和二炮文工團等，爲了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準備于五月十三日晚上聯合在北京展覽館搞一次文藝會演。當時，包括軍隊文藝團體在内的駐京部隊，已經明顯地分成了兩派：一派是後來被稱之爲“老三軍”的，這一派是支持軍隊現任領導的；另一派是後來被稱之爲“新三軍”的，這一派實際上是由北京“三司”造反派所支持的軍隊造反派。這一次的演出，是“老三軍”聯合起來，支持所屬文工團舉辦的，所以他們又被稱作“演出派”。而“新三軍”則因準備衝擊這次演出，而被稱爲“衝派”。

當時，“新三軍”把這次演出看成是與軍隊“老保”之間的大決戰。爲了這場大決戰，他們早與中央文革所支持的北京“三司”等造反派密謀策劃，調集了大批力量準備武鬥。他們認爲，衹要制造出事端，中央文革就會站出來支持他們，這樣軍隊裏的“老保”就完了。

他們事前制造輿論說：首都的文藝舞臺決不能讓“老保”占領。如果要演出，一切後果由演出派自負。這時，連總政治部主任蕭華都聽到了這些傳言。當“老三軍”在演出前，報告蕭華，請求批準演出時，蕭華怕因爲演出引起雙方武鬥，就没有同意演出的要求。

在“老三軍”這邊，有一些演員是能够直接“通天”的。于是，她們把演出的問題直接匯報到了毛澤東那裏。毛澤東聽了說：“你們去找林彪同志。”有了毛澤東的這句話，林彪就說：“你們演出吧。”

五月十三日晚上，“老三軍”組織的文藝會演，如期在北京展覽館劇場舉行。演出剛剛開始不久，北京“三司”的造反派果然領着軍隊的造反派就來了。他們分乘幾十輛汽車，包圍了劇場，然後一邊高喊着口號往裏衝，一邊見物就砸，見人就打。兩派發生了武鬥，打得一塌糊塗。一瞬間，劇場變成了戰場。由于來衝擊的造反派很多，準備也很充分，于是設施、樂器被砸，在場的演員被打傷，參加演出的同志損失嚴重。

一聽說發生了武鬥，而且“衝派”又人多勢衆，北京軍區、海軍、空軍、二炮機關裏的人坐不住了，紛紛準備出動支援。與我們空軍大院僅相隔一條馬路的海軍領導機關，由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和政委李作鵬親自率領機關的人員前去支援。臨走前，李作鵬給我打了電話，說他們這一走，海軍大院就空了，叫我們在家裏先不要動，萬一有情況，我們既可以支援，又可以守衛，幫他們看好家。我說：“好，我們就這樣分工。你們放心地去吧，有我們在就有海軍大院在。你們去現場支援，擔子要比我們重。”

放下電話，我立即發布命令，要求空軍機關的全體人員集合在辦公室，高度戒備，并密切保持與演出現場的聯系。然後，我立即向周恩來和林彪報告這一情况，并一直在辦公室裏守着電話機，準備一旦有情况，就馬上調動人員去支援，并隨時報告周恩來總理和林彪。當時的氣氛十分緊張，幾乎不亞于戰争年代進行的一場戰鬥。一個文藝演出活動，竟然鬧到了這樣的地步，也真是史無前例。

蕭勁光、李作鵬率領的海軍機關人員一趕到北京展覽館劇場，就立即衝進去搶救傷員。“衝派”看到有人來支援，也馬上調集力量，又包圍了海軍的人。恰好在這個時候，北京軍區機關、二炮機關和其它部隊的人員也陸續趕到。雙方一場混戰，武鬥一

直持續了好幾個小時。一直到最後，中央文革派陳伯達、林彪派蕭華來到現場制止，這場武鬥才算停了下來。

陳伯達一到現場，就指責“演出派”不該堅持演出，以至引起武鬥。蕭華也説：“我叫你們不要演出，就是怕發生武鬥，你們爲什麼不聽我的話呢？”“演出派”原本就對蕭華不批準演出心中有氣，認爲是受到了壓制。現在被衝、被打以後，反而又受到指責，就更加不滿。他們紛紛責問陳伯達和蕭華：“我們搞演出是爲了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難道是錯了？他們聯合地方學生衝擊演出，搞打、砸、搶反而是對了？”

“演出派”本來是保蕭華的，但蕭華在這件事情上的表現，使得“演出派”對他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由此而種下了他日後被打倒的禍因。

武鬥被制止下來了，可問題并没有解决。五月十四日晚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解决兩派武鬥的問題。他在講話中批評了雙方武鬥的行爲，并且認爲蕭華的講話是對的。結果，他的話引起了“老三軍”的不滿。下來以後，海軍政治部主任張秀川跟周恩來説：“總理，這件事你最好不要再管了。”他把這裏面的一些情況告訴了周恩來，後來周恩來也就不再説話了。

這個時候，從不輕易出面干預具體事情的林彪親自出面了。他冒着對抗中央文革的危險，公開支持“老三軍”對抗“新三軍”、“三司”等造反派。五月十五日上午，林彪要葉群帶領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領導人，到醫院去慰問“老三軍”被打傷的人員，并發給他們《毛主席語録》和“毛主席像章”。對另一派的人員則置之不理。林彪以這樣的方式，明確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林彪明確表態後，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着轉了過來。

五月二十三日，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紀念日，“演出派”這一天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紀念演出。這一次，林彪不僅派葉群前來觀看演出，還派出北京衛戍區的部隊進行保護，這次演出就再没有受到衝擊。

六月九日，“演出派”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一次演出。這一次，林彪親自出席，并帶領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楊成武、汪東興、姚文元等前來觀看了演出，給演出派撑腰。這一下子，軍内的造反派垮了，“老三軍”一下子翻過身來，成爲林彪和軍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憑借着這支力量，林彪和軍委可以直接與北京“三司”等學生造反派對抗，從而開始穩定北京的局勢。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領袖”一手遮天的時代成爲了過去，我們的日子也好過多了。

相反，蕭華的日子却不好過了。“演出派”因對蕭華在“五一三演出事件”上的態度不滿，不幾天就貼出了炮轟蕭華的大字報。其實，軍内造反派一直都想要打倒蕭華。這一年的二月中旬，造反派還曾經抄過他的家。而“老三軍”一直是支持蕭華的。但在“五一三事件”之後，“老三軍”對蕭華不滿，也反起蕭華來了。他們把蕭華弄到京西賓館，一連鬥了十多天，要蕭華承認這個、承認那個，把蕭華鬥得抬不起頭來。

“五一三事件”後，林彪仍然準備保蕭華。他告訴蕭華，暫時住在西山不要出來，等過一段時間，“演出派”的氣消了，再出來工作。誰知道，蕭華自己在西山犯了錯誤，被海軍的造反派組織“紅聯總”直接向毛澤東遞了一份材料。毛澤東一看就説：“蕭華是個扶不起的天子，我不保了。”這句話一傳出來，蕭華立刻就被打倒了。

這些年裏，我看到有不少文章説蕭華是被林彪有意打倒的，我認爲這不符合事實。蕭華長期以來一直在林彪領導下工作，林彪對蕭華是很信任的，而且在“文革”開始後屢屢保他。要説林彪有意搞掉蕭華，我認爲這是不真實的。

二十二、軍委辦事組的成立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由于以前負責處理軍委日常事務的羅瑞卿、賀龍等人先後被打倒，經毛澤東同意，中央軍委成立了一個由葉劍英、楊成武和蕭華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處理軍委的日常事務。

大約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初，毛澤東到南方去巡視“文化大革命”的情況。爲了保證他的安全，中央軍委決定，由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余立金和海軍政委李作鵬隨同前往。這時，葉帥已因“二月逆流”事件靠邊站了，蕭華也被轟得不能工作，楊成武再一走，“三人小組”就名存實亡了。于是，周恩來以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名義向林彪提出：“是不是先成立一個軍委臨時看守小組，在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領導之下，暫時負責處理軍委的日常工作？”林彪同意周恩來的意見，并提出由我、邱會作和張秀川三人組成這個看守小組，由我任組長。

七月十七日，我接到通知，要我當晚去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在這個會上，周恩來宣布：“經毛主席批準，由吳法憲、邱會作和張秀川三人組成中央軍委臨時看守小組，由吳法憲任組長。臨時看守小組的任務是，接受中央文革碰頭會議交代的任務，負責處理軍委的日常工作。”從此以後，我便參加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凡是會議上通過的有關軍隊問題的決定，或者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對軍隊有什麼指示，就由我們看守小組來傳達和辦理。看守小組的辦公地點在京西賓館，下面的具體工作機構是中央軍委辦公廳。這些都是楊成武臨走之前給安排的。

我們這個看守小組一共存在了兩個多月。在這兩個多月的時間裏，我們實際上没有幹多少事，因爲當時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機關，大部分都已經癱瘓，看守小組成立後也就没有向下面宣布，因此没有人向我們反映情况，我們什麼事情也辦不成，

什麼也守不住，反而是經常挨江青的批評。在那兩個多月時間裏，我們就向中央文革寫了三次檢討。

九月二十六日，楊成武回到北京。當晚，在中央文革碰頭會議上，周恩來就宣布撤銷了看守小組，另外成立以楊成武爲組長的軍委辦事組。我被任命爲軍委辦事組的副組長，同楊成武一起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我們這個辦事組的成員還有葉群、李作鵬、邱會作。葉群在軍委辦事組衹是挂個名，她衹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軍委辦事組的會議她一次都没有參加過，對辦事組的工作也從來不加干預。

與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實際上行使中央常委會議的職權一樣，我們的這個軍委辦事組，實際上行使的是中央軍委常委辦公會議的職權。從這個意義上説，軍委辦事組的正、副組長，實際上也就相當于以前軍委的正、副秘書長。

軍委辦事組的成立，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下，所産生的一種特殊領導機構與領導形式。軍委辦事組成立以後，開始衹是在中央碰頭會議的領導下做一些具體的工作。中央碰頭會議通過的有關軍隊的决定或文件，由周恩來簽名以後上報毛主席和林彪，經他們同意以後，才能正式形成文件，再交由我們以中央軍委或者是總參、總政、總後的名義下發。

軍委辦事組對下不單獨行文，不發文件，不下命令。實際上是一個辦事機構。軍委辦事組采取集體辦公的形式，每天下午三點開始辦公，集體討論需要辦理的事情。需要提交中央碰頭會議的，晚上就由正、副組長帶到碰頭會上去研究；剩下的就由我們酌情處理和解决，并交有關部門辦理。

軍委辦事組的成員，以後屢有變動，先後參加過軍委辦事組的有黄永勝（楊成武被打倒後，由黄永勝接任軍委辦事組的組長）、謝富治、劉賢權、李德生、温玉成、紀登奎、張才千等人。

二十三、中央文革碰頭會議

中央文革碰頭會是在一九六七年初產生的。在這之前，中央曾經是兩個會議：即中央常委碰頭會和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

一九六六年底、一九六七年初，由于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陶鑄先後被撤消職務，中央政治局會議、政治局常委會議和書記處會議都先後停頓。這樣一來，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任務，就全都落到了周恩來的頭上。當時，他既要管國務院的工作，又要管中央常委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于是，經請示毛澤東同意，周恩來就以中央常委碰頭會議的形式，集體處理一些重大問題。中央常委碰頭會議由周恩來負責主持，吸收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各部門的負責人參加，主要討論和解決黨、政、軍方面的一些重大問題，并且把討論決定的重要事項報請毛澤東批準後執行。

當時，還有一個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議，由陳伯達主持，也吸收黨、政、軍各部門的負責人參加，主要負責解決全國“文化大革命”的有關問題。所討論決定的所有重大問題，也需經毛澤東的批準才能執行。這樣，就形成了兩個中央日常的工作會議。中央文革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對周恩來意見很大，他們要求周恩來取消中央常委碰頭會議，要周恩來直接參加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議，以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議爲黨中央日常工作機構。

最初，周恩來没有同意江青等人的要求，照常舉行中央常委碰頭會議，主要的問題都拿到這個會議來解決。于是陳伯達和康生等人就通過江青到毛主席那裏發泄不滿，要求毛澤東下令取消中央常委碰頭會議，以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議來代替它，江青甚至提出公開挑戰，宣稱：“一定要把中央常委碰頭會議摧垮。”

毛主席當時的態度如何我不知道，但是到了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後中央常委辦公會議開不成了。參加中央常委碰頭會議的大部

分成員都已經被打倒，幾乎衹剩下了周恩來光杆一人。周恩來把這些情況向毛主席作了匯報，經毛主席批準，取消了中央常委碰頭會議。將中央常委碰頭會議與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議合并，由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一并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和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問題。

我是一九六七年七月開始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這時候我才知道周恩來早已經是這個會議的負責人了。當時參加會議的共十一個人，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楊成武、我、葉群、汪東興。不久經過毛澤東的批準，李先念也參加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

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辦公地點，在釣魚臺國賓館十六號樓。釣魚臺國賓館原來是國務院招待外國元首的地方，一共有三十多座小樓，裝修極其豪華，其中江青住的十號樓、康生住的八號樓是最華麗、最好的。當時，江青一人獨占了三座樓。除了住宿的一座樓以外，她還有一座專門放電影的樓和一座專門帶舞廳的樓。江青也曾爲毛澤東在釣魚臺準備了一座樓，但毛澤東除了去西郊機場接見紅衛兵時，曾在裏面休息過幾小時以外，再也没去住過。

釣魚臺裏也有一座樓是供周恩來使用的，這就是五號樓，但周恩來一直住在中南海西華廳。另外，陳伯達住在七號樓。從條件上看，五號樓和七號樓比江青住的十號樓、康生住的八號樓要差一點。張春橋和姚文元兩人都住在十六號樓裏。十六號樓是一座大樓，樓上是他們生活的地方，樓下則是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辦公地點。中央文革碰頭會議一般是晚上辦公，一直到凌晨三、四點左右。

整個“文革”期間，釣魚臺都是北京的一塊禁地，全部由中央警衛團警衛，戒備森嚴，任何人都不能衝擊。江青曾經下令，如果有人膽敢衝擊釣魚臺，一律逮捕，并且可以開槍。那個時候，造反派可以衝擊北京的任何地方，包括中南海都被造反派衝擊過，但是没有人敢衝擊釣魚臺。

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所決定的重大問題，由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四個人簽字以後，報毛澤東及林彪批準。有一次陳伯達提出，以後會議上定的文件，由周恩來一個人簽名上報就可以了。但是江青提出了意見，說："還是總理的一貫作法好，這樣可以表示由總理和中央文革的正、副組長共同負責。"周恩來轉而徵求其他人的意見，大家誰都没有說什麼。就還是照原樣辦理。經毛主席、林彪同意的文件，有時用中共中央的名義，有時用國務院的名義，有時聯名下發。

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是九大以前中央的一種集體領導形式。一般是用文件的形式將所討論的問題報告毛主席。但有的時候，由毛主席直接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一些更重大的問題，這種情況也不少。林彪因爲身體的關系，除了毛主席親自召集的會議以外，很少參加會議，都是由葉群代替他參加會議。

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周恩來對江青、康生都十分尊重，幾乎從來不否定他們的意見。相反，江青對周恩來的態度十分傲慢。我記得，有一次，江青對周恩來說："你過去對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不感興趣，現在該相信我們了吧，我們還是能處理一些問題的吧。"

周恩來說："當然囉，中央文革小組現在的威信很高，釣魚臺是我們爲招待外國元首而修建的，現在讓給中央文革小組作爲辦公地點，這是我們對中央文革的一種尊重。"

江青說："你們現在也是無賓可待，閑着可惜，讓出來給我們辦公也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早就建議你和我們合作，由你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但你就是不聽，硬要維持你那個中央常委碰頭會議，一直到會議開不成了，你才來釣魚臺。這個教訓，你是應該吸取的吧。"接下來她又說："你想和我們中央文革唱對臺戲，那是不可能的。現在全國都搞'文化大革命'，衹有中央文革的旗號才打得響。你是中央常委、國務院總理，由你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是合理又合法的。"

還有一天晚上，中央文革碰頭會議開會，我遲到了，進去的時候看見江青正在大發雷霆。她說："你周恩來，不是我們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挂'，對你沒有什麼可怕的。你周恩來比我强的，衹是組織才能，這點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則、大政方針是不行的。"周恩來勉强地說："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學習。"江青則說："我們兩個人配合起來處理問題，就是完人了。"

聽到這裏，所有到會的人都不知說什麼好，會場一片寂静。等了一會兒，康生才說："希望周恩來同志多尊重江青同志的意見，你們兩個人密切合作，就成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領導核心，可以爲毛主席多出主意，江青同志領會毛主席的意圖是很快的。"周恩來衹好點頭稱是。江青又問大家有什麼意見。大家都沉默不語，很難表示什麼。

當時，我嘴上雖然没說什麼，但我心裏感到難過。周恩來是我們黨和國家的主要創建人之一，長期擔任中央副主席和軍委副主席，德高望重，是我們心裏非常敬佩的領袖之一。而江青是狐假虎威而已。以後江青越來越囂張，而周恩來對江青，唯唯諾諾不敢犯顔。

我相信，别人對此也有看法。一次葉群專門告訴楊成武和我，一定要積極支持周恩來的工作。葉群告訴我們，周恩來到林彪那裏匯報工作時，林彪曾明確表態說："我的身體不好，一切工作還希望你鼎力主持。"

在中央文革碰頭會議裏，除了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以外，就是江青和康生在起作用。陳伯達衹是中央文革小組一個有名無實的組長，衹有江青才說了算。江青上能通天，下能命令周恩來，除了康生以外，其他人都不在她的眼裏。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員，都要看着她的眼色行事，誰不聽她的，在中央文革就呆不了幾天，甚至會被打倒。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對我們這些人也非常傲慢。因此，每次碰頭會上，我們基本上衹有反映情況、聽取命令以及具體貫徹執行的權利。

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時間不長，我就開始感到緊張、疲

勞和力不從心。因爲我們要經常接見各地的造反派，處理各省、市、自治區的一些問題，我對地方的問題本來就不熟悉，每次接見基本上都是陪襯。時間一長，我感到非常厭倦。

有一段時間，楊成武經常不去參加會議，他要我參加會議以後，向他匯報情况就行了。可江青抓得很緊，每次都追問我，我衹好替他打圓場說："楊代總長的身體不好，要我代爲請假。"

在當時，我除了任軍委辦事組副組長和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之外，還一直擔任着空軍司令員、黨委書記的職務，并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工作相當忙。每天中午起床以後，都是先抓緊時間處理一下空軍的事情。我們辦公室的同志們說，這是"搞點自留地"，下午去做軍委辦事組的工作，晚上再去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至于我擔任的副總參謀長職務，那基本上是挂名的，總參的事情我一般不管。但空軍的事情，是我的責任所在，我一點也不敢疏忽。這樣一來，弄得我每天精神都非常緊張。

二十四、武漢"七二〇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漢市發生了一場反對和揪鬥"中央代表團"成員王力、謝富治的事情。這一事件的發生，震驚了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反應十分强烈。

這個事件的發生，還得從軍隊"支左"說起。在毛澤東作出關于軍隊應該支持"左派"的指示以後，全軍各部隊便逐漸開始了"支左"。但關鍵的問題是，誰是"左派"？究竟應該支持誰？在這個問題上，絶大多數軍區的領導的認識，和中央文革小組是不一樣的。中央文革小組是以支持"造反"爲目的，而地方上的領導更着眼于當地的穩定。

在當時，武漢地區也同全國各地一樣，各種各樣的群衆組織分裂成了兩大派。其中一派是號稱有一百二十萬人的"百萬雄

師"，他們的政治傾向是反對全面否定和打倒湖北省委，擁護軍隊。因此，這個組織得到了武漢軍區的支持。事實上，"百萬雄師"的本身就包括了很多部隊的幹部、戰士，也可以說是在軍區支持下組成的一個群衆組織。

與"百萬雄獅"相對立的另一派，是被稱爲"三鋼"（"鋼工總"、"鋼三司"、"鋼九一三"）的造反派組織，"三新"（"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的學生造反派組織，以及"三司革聯"等造反派組織。這一派的政治傾向非常激進，主張全面奪權。他們在人數上盡管比"百萬雄師"要少，但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另外，武漢還有"毛澤東思想戰鬥隊"和"武漢地區工人總部"兩個造反派組織，但這兩個組織已被陳再道打成"反革命組織"，其首領朱洪霞、胡厚民等也被逮捕入獄。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晚，毛澤東在南巡途中，帶領楊成武、汪東興、李作鵬等人到達武漢，住在東湖賓館的梅嶺一號。由于武漢的局勢動蕩，爲了保證毛澤東的安全，周恩來還特意先期來到武漢，住在東湖賓館的百花一號，爲毛澤東的到來作準備。

毛澤東到了武漢以後，聽取了關于湖北和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匯報，認爲"百萬雄師"是個保守組織，而"三鋼"和"三新"是革命造反派，武漢軍區在這個問題上犯了"方向、路綫錯誤"。毛澤東的意見一言九鼎，一句話就決定了武漢地區兩大群衆組織和武漢軍區領導人的命運。對毛澤東的這個意見，周恩來衹能照辦。

在這之前，由于重慶、昆明、貴陽等地區先後發生了嚴重的武鬥，當周恩來還在北京的時候，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決定組成一個三人小組，代表中央去這些地區處理武鬥問題。這個三人小組由謝富治帶領，成員有王力和余立金。謝富治等人到達重慶以後，發現問題嚴重，認爲其主要原因是軍區領導在"支左"問題上方向搞錯了。他們覺得，要解決這一問題，不是他們幾個人的能力和身份所能辦到的，必須要向中央匯報，由中央出面來解決。當他們得知毛澤東和周恩來已經到了武漢，就没有繼續飛往

昆明和貴陽去處理問題，而是轉飛武漢，準備向毛澤東、周恩來當面匯報重慶的問題。

這個中央代表團到達武漢以後，也住在東湖賓館的百花三號。謝富治、王力、余立金他們一到，毛澤東就要他們到街上去看看大字報，了解一下情況，聽聽群衆的意見。謝富治、王力一上街就被造反派發現了。十六日，造反派組織了大規模的游行來歡迎謝富治、王力來武漢解決問題。

在東湖賓館裏，毛澤東、周恩來于七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上午連續召開兩次會議，討論解決武漢問題。毛澤東指示，要給“三鋼”、“三新”平反，把被抓的造反派頭頭朱洪霞、胡厚民放出來。他說，“百萬雄師”是群衆組織，要謝富治、王力派專人做好他們的工作。他還説，軍區對兩派都要支持，陳再道如果支持造反派，造反派就會轉過來擁護陳再道。他還要周恩來在武漢多住幾天，做好武漢軍區的工作。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從七月十五日起，一直到七月十八日，周恩來每天下午都在東湖賓館召集會議，聽取武漢軍區師以上幹部對“支左”問題的匯報。匯報結束之後，周恩來嚴肅地說：“武漢軍區在‘支左’中有錯誤，甚至是很嚴重的錯誤。但是，這個責任主要由軍區領導同志來承擔。建議陳再道、鐘漢華同志主動承認，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綫錯誤。軍區要給‘三鋼’、‘三新’平反，迅速將朱洪霞等人放出來，支持造反派。估計給‘三鋼’、‘三新’平反以後，他們會對‘百萬雄師’進行報復，這個工作由中央來做。”

周恩來開完這些會以後，于七月十八日下午乘專機回到了北京，因爲北京還有許多事情等待他來處理。回到北京的當天晚上，周恩來就主持召開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上，周恩來介紹了武漢的情況和毛澤東關于處理武漢問題的意見。會議決定，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義發一個文件，指出武漢軍區在“支左”上犯了“方向、路綫錯誤”，主要責任應當由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鐘漢

華來負，但是中央并不追究責任，衹是要求武漢軍區轉變立場。會議還決定，要陳再道、鐘漢華立即支持“三鋼”和“三新”，并且要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公開表態，像支持上海的“工總司”和王洪文那樣，支持武漢的造反派。同時，會議還要求解放軍各總部和各軍、兵種各自打電話給所轄的駐武漢部隊，做好工作。

第二天，我根據會議上的決定，給武漢軍區空軍司令員傅傳作、政委蕭前和副司令員劉豐打電話，要求他們按照中央的決定辦。當時我想，中央的決定一定要執行，何况，作出這一布置的是周恩來總理。

盡管中央作出了决定，但要陳再道、鐘漢華他們承認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綫錯誤”，他們是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他們認爲，他們是完全按照毛主席關于《如何處理軍隊受衝擊問題》的書面批示和“軍委的八條命令”來作的，没有錯。

事實上，由于當時武漢兩大派群衆組織的對立非常嚴重，要做到毛澤東所説的那樣，軍區對兩派群衆組織都支持，使兩派群衆組織都滿意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現實的。另外，朱洪霞、胡厚民等人是陳再道下令抓起來的，現在又要放出來，還要平反，陳再道當然不會服氣。况且，如果“三鋼”、“三新”翻過身來，也必然要揪陳再道，這是顯而易見的。

毛澤東、周恩來的講話傳出去以後，“三鋼”、“三新”就活躍起來了。他們組織了幾十輛車上街游行示威，很快將“打倒陳再道”、“打倒鐘漢華”的大字報貼遍了武漢街頭。另一方面，“百萬雄師”也不甘示弱，也組織隊伍上街游行示威。這一下，兩派群衆組織的對立情緒就進一步激化了。

七月十八日晚上，謝富治、王力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造反派總部講話。王力在講話中説，武漢軍區的“支左”方向錯了，“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三鋼”、“三新”才是革命造反派。他還説，要爲“三鋼”、“三新”平反。王力講話以後，“三鋼”、“三新”就開始到處播放王力講話的録音，“揪出陳再道”的聲浪也越來越高。這就引起了“百萬雄師”的不滿，他們開始組織大規

模的游行，反對王力的講話，把反對王力的大幅標語貼滿了整個武漢。兩派的鬥争就越來越激烈。

七月二十日凌晨，“百萬雄師”組織了兩千人，頭戴安全帽，手執長矛，分乘二十多輛汽車和消防車，來到武漢軍區大院想質問王力：“百萬雄師”究竟是不是群衆組織？武漢軍區的“支左”方向是不是錯了？但王力就是拒不接見。軍區領導對群衆作了大量的説服工作，但没有奏效。

上午七時，“百萬雄師”的代表二百多人及軍區獨立師的一些幹部、戰士，衝進東湖賓館，包圍了王力的住處——東湖賓館百花三號，强烈要求王力到軍區大院去回答問題，但王力不敢去軍區大院。這些人根本不知道，他們來到的這個地方，離毛澤東的住處——梅嶺一號别墅，已經很近了。

這時，隨同王力來到武漢的幾個北京航空學院“紅旗造反團”的學生，仗着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氣勢洶洶地開始辱駡群衆，激起了群衆更大的憤怒。于是，在一片轟叫聲中，王力被抓了起來，塞進一輛小汽車，拉到了軍區大院。

接着，“百萬雄師”又調動幾百輛汽車，出動了數萬人。他們頭戴安全帽，手執長矛，在武漢大街上游行。同時，武漢軍區獨立師的數百名軍人，全副武裝，帶上“百萬雄師”的袖章，槍上刺刀，在汽車上架起機槍，公開與“百萬雄師”一起游行。這一場大游行，導致了武漢三鎮的工廠停工、交通中斷、街道堵塞。一時間，“揪出王力”、“揪出謝富治”的標語、口號鋪天蓋地。當天下午，“百萬雄師”又召開了七萬人的大會，向王力、謝富治等示威。七月二十一日，“百萬雄師”再次出動幾百輛汽車，繼續在武漢大規模游行。後來人們把這些統稱爲“七二〇事件”。

王力被“百萬雄師”弄到武漢軍區大院的當天下午，軍區領導設法將他弄了出來，并轉移到了二十九師的駐地。不久，二十九師領導又將他轉移到了小洪山。一直到了七月二十一日中午，才由劉豐將他轉移到武漢軍區空軍司令部。

武漢的形勢越來越亂，毛主席雖然親自在那裏坐鎮，但是問

題不但没有解决，矛盾反而更加激化，問題更加嚴重了。在北京的領導着急了。在七月二十日上午，當“百萬雄師”衝進東湖賓館抓走王力以後，江青就非常擔心武漢局勢的變化可能威脅到毛澤東的安全。爲了毛澤東的安全，江青當即找到林彪，問他怎麽辦，并説她想自己到武漢去一趟。在此之前，她已經勸過毛澤東，要他離開武漢，但是毛澤東不願意。她衹好來找林彪。林彪説：“你去怕有困難。你還是去和總理商量一下，派個人去勸毛主席離開武漢。”

江青聽了林彪的話，去找到周恩來。周恩來説：“林副主席的意見是對的，你不能去。可以寫封信，派個可靠的人去。”按照林彪和周恩來的意見，江青立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上的詳細内容我不清楚，主要是勸毛澤東盡快離開武漢到上海去。同時，江青又給張春橋打電話，要張春橋立即趕到上海，親自安排毛主席到上海的一切事情。

信寫好了以後，江青請示林彪派誰去，林彪説：“派邱會作同志去吧。”于是我立即準備飛機，把邱會作送到武漢。飛機是七月二十日下午兩點多鐘到的武漢，之後邱會作由劉豐帶往東湖賓館，見到了汪東興，然後再由汪東興帶着去面見毛澤東，當面把信交給毛澤東。送信的任務完成後，邱會作馬上又乘飛機回到了北京。

周恩來當時在北京也很爲毛澤東的安全擔心，他决定再一次去武漢。我很快安排了一架飛機專門送他去武漢。周恩來的飛機于二十日下午從北京起飛。在飛機飛往武漢的途中，我突然接到劉豐的電話，説有幾十輛汽車衝進了周恩來的飛機預定降落的王家墩機場。這突如其來的情況讓我緊張起來，爲了保證周恩來的安全，我要飛機臨時改爲降落在離武漢大約六十公里的山坡機場。山坡機場的條件遠不如王家墩機場，在那裏降落有一定的風險，但我當時别無辦法。

周恩來到達武漢不久，晚上八點鐘，毛澤東終于决定離開武漢，轉移到上海。毛澤東的决定傳來，我們在北京爲他這次轉移

研究、設計了兩種方案：一個是用飛機直飛上海，一個是調一條軍艦從長江到上海。最後，毛澤東決定坐飛機。汪東興直接從武漢打電話給我，要我立即準備專機，而且一定要保證毛澤東的安全。

一九五五年以後，中央對毛澤東乘坐飛機有一個規定，就是爲了保證他的安全，他不能乘坐飛機。從那以後，毛澤東一直没有坐過飛機。但這一次情况緊急，就衹好破例了。我深知這次飛行任務非同小可。爲了保證毛澤東的絕對安全，我立即命令空軍三十四師對飛機進行仔細檢查，并進行試飛，待確保一切正常以後，我才在七月二十日晚上九點多鐘批準飛機從北京起飛，降落在武漢的王家墩機場。

在武漢那邊，負責送毛澤東等人到機場的是劉豐。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一點多鐘，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劉豐找了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路，用一輛吉普車把毛澤東和汪東興秘密送到了王家墩機場。與此同時，楊成武和李作鵬則走另外一條小路，差不多同時也到達了機場。凌晨兩點，毛澤東等人乘坐的飛機從王家墩機場起飛。當時，我一直在指揮所裏坐鎮指揮，直到毛澤東等人乘坐的專機在上海虹橋機場安全落地，我才鬆了一口氣，離開指揮所。

周恩來在武漢送走毛澤東之後，接着又召開會議，對陳再道、鐘漢華采取了臨時措施，并指定武漢軍區副司令員孔慶德和副政委葉明暫時負責武漢軍區的工作。他還要孔、葉二人轉告陳再道和鐘漢華，趕緊表態爭取主動。之後，周恩來離開武漢，于七月二十二日上午乘飛機回到北京。

二十二日凌晨三點多鐘，王力在余立金和劉豐的護送下，轉移到了山坡機場。周恩來上午回到北京後，就立刻通知我派飛機把謝富治、王力接回北京。二十二日下午三時，謝富治、王力、余立金三人一起回到了北京。飛機到達西郊機場時，中央文革組織了三萬多人在機場兩邊夾道歡迎。當謝富治等三人走下飛機時，首先是周恩來，然後是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一一上前和

他們握手、擁抱，就象迎接英雄一樣。王力下飛機的時候，是一瘸一拐走下舷梯的，腿上還打着綳帶，説是腿被打傷了。然後，謝富治三人由周恩來、江青等人陪同，坐着汽車在機場跑道上轉了一圈，向群衆招手致意。

有人説，周恩來返回北京的飛機，本來要比謝富治、王力乘坐的飛機晚起飛半個小時，是由于我從中操作，才使周恩來的飛機早到北京，硬是强迫周恩來不得不在機場歡迎謝富治、王力回北京。真虧他們想得出來！事實上周恩來回北京的飛機，要比謝富治、王力、余立金他們早半天，根本不存在我從中操作的問題。爲了給周恩來的一些行爲開脱，有些人竟編造了這樣的謊言！如果周恩來總理還健在的話，他自己會同意這種説法嗎?!

在毛澤東等人安全離開武漢以後，七月二十三日，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向全國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的三軍聯合行動，進行武裝游行，聲討武漢的"七二〇事件"。同時，會議又決定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向武漢軍區發一份電報，要陳再道、鐘漢華等十五人到北京來開會。

七月二十四日凌晨三點，陳再道、鐘漢華一行來到北京。一下飛機，中央就派車把他們直接送到了京西賓館。緊接着，中央文革就把陳再道、鐘漢華一行來到北京的消息透露給了造反派，馬上就有造反派包圍了京西賓館，在周圍遍地插上紅旗，把賓館圍了個水泄不通。然後，中央文革又組織了駐京部隊部分幹部、戰士，由江青、戚本禹和關峰帶領，在京西賓館對面的軍事博物館前面集合，分乘幾十輛大汽車，圍着京西賓館一邊繞圈一邊喊口號，向陳再道、鐘漢華等人示威。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中央文革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了三十萬人的大會，歡迎中央代表團勝利返回北京。這個大會，本來林彪不想參加，但江青打電話給葉群説："這樣的大會，林彪同志不出來不好。"這樣，林彪不得不上了天安門。

七月二十六日，經毛澤東批準，武漢軍區發表了《公告》。《公告》承認："我們軍區領導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綫錯誤，尤

其是陳再道對上抵制毛主席、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領導，對下打擊壓制群衆意見，長期地、頑固地堅持錯誤，以致發展到反毛主席、反黨中央、反中央軍委、反中央文革的‘七二○’叛變事件。”武漢軍區還在《公告》中說，七月二十日在武漢發生的事件，是“明目張膽地反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無産階級革命路綫、反對黨中央、反對中央軍委、反對中央文革的叛變行動”，“而王任重和陳再道則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禍首。”

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表了《給武漢市革命群衆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信中說：“武漢軍區個別負責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綫錯誤。”這封信認爲，“武漢軍區個別負責人”利用了“百萬雄師”的一些“受蒙蔽的群衆”，“公然反抗毛主席的無産階級革命路綫，反抗中央軍委的正確指示，煽動不明真相的群衆，反對中央，反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蠻手段，圍攻、綁架、毆打中央代表”，這是“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造成的嚴重政治事件”，“受到了全國人民的嚴正譴責。”

就在公開發表《給武漢市革命群衆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正式下達文件，撤銷了陳再道、鐘漢華的職務，任命曾思玉爲武漢軍區司令員，劉豐爲武漢軍區第一政委。

接下來，就是召開批鬥陳再道等人的會議。會議的地點是在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到會的主要是駐京各部隊的負責人。批鬥會議由周恩來、葉劍英和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成員輪流主持，但是葉劍英始終坐在那裏一言不發。

會議的前一天，周恩來帶領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召集我們開了一個預備會議。他在這個會上要求，大家不要心軟，要狠狠地揭發批判。周恩來講完話，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人也相繼講了幾句。在這些人的講話中，數江青的調子最高，她說：“這是一個反革命事件。”陳伯達也說：“這不是一個一般的會議，而是一場保衛毛主席的鬥爭。”

正式會議的第一天，中央文革在會議開始後便派車去接王力。不久，王力由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陪同，坐在輪椅上被推到了會場。剛一進門，周恩來和中央文革成員馬上起立帶頭鼓掌歡迎，其氣氛同歡迎毛澤東差不太多。那一天，來參加會議的中央文革成員全都換穿了軍裝。

接着，周恩來讓大家開始批判陳再道和鐘漢華。大家都是你一言、我一語，没有一個人系統地發言。陳再道和鐘漢華則站在那裏，一言不發。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坐在主席臺上，看着大家亂轟一氣，也是有點無可奈何。

中間稍事休息以後，江青和楊成武組織了一幫秘書來到會場。這些秘書一個個手持《毛主席語録》，衝到陳再道、鐘漢華面前示威，責問他們爲什麽要趕走毛澤東，爲什麽要搞“七二○事件”。在責問過程中，就有人對陳、鐘二人推推搡搡，并打了陳再道。

到了下午再開會時，會議的氣氛就更凶了。我同陳再道以前很少交往，對“七二○事件”也不够了解，本來不準備發言，但是想起了一件事情，不由得我氣往上衝。這件事，就是我前面說的周恩來專機改降山坡機場的事情。我當時想如果飛機降落時發生了什麽意外，我就將成爲黨和國家的最大罪人。一氣之下，我就衝到了陳再道的面前，訓斥他說：“你弄來那麽多的群衆，占領了機場，結果總理的飛機不能降落，要是出了事故，你我都得掉腦袋，你知道嗎？”我越說越氣，一時衝動之下，就打了陳再道一個耳光。

會議休息的時候，周恩來責怪我說：“你怎麽打人哪！再說我當時也没有危險哪！因爲你所說的問題涉及到我，我就要批評你。”這個時候我已經冷静下來了，意識到打人是不對的，我就對周恩來說：“打人是不對的，總理你就批評吧。”

在第二天的會議上，周恩來公開批評我打人是不對的。我當場表示承認錯誤，接受周恩來的批評。從那以後，一直到會議結束，我都没有再作任何發言。後來，當周恩來要我主持會議時，

我還要在這之前一直站着的陳再道坐下來聽取批評，以表示我對他的一種歉意。

事過幾十年，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的行爲過于魯莽。在當時那樣混亂的情况下，百萬群衆的行動，豈是一兩個人控制得了的？群衆衝進了機場，又與陳再道何干？設身處地想一想，陳再道應該也是不願意事態進一步擴大，造成“七二〇事件”這樣嚴重後果的。我想，事情鬧成後來那樣，恐怕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不久，毛澤東從上海給林彪、周恩來轉來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現在形勢好了，軍隊要轉過來支持造反派。軍區“支左”犯了“路綫錯誤”的領導同志，衹要檢討承認錯誤，不再堅持錯誤，就可以重新革命，包括陳再道同志在内。這最後一句話是最重要的。有了毛澤東的這個指示，批判會開完以後，對陳再道、鐘漢華就没有再進一步處理了。

現在看來，“七二〇事件”不是陳再道、鐘漢華和武漢軍區其他人所組織和操縱的。事件的爆發，主要是由于武漢廣大軍民對把百萬人參加的“百萬雄師”打成保守組織不滿，對否定武漢軍區對他們的支持不滿，對全盤否定湖北省委、武漢市委十七年工作成績不滿，對中央文革亂説話，亂表態不滿，是一場大規模的自發的群衆對抗中央文革的運動。

二十五、逮捕王、關、戚

作爲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自“文革”開始以後，王力、關鋒、戚本禹一直都非常活躍，真正算得上是當時中國政治舞臺上的幾個風雲人物。尤其在武漢“七二〇事件”後，王力等人可以説是紅極一時。可大約在一九六七年八、九月的一次中央文革碰頭會議上，我突然聽到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和康生談起了王力、關鋒、戚本禹的問題。當然，王、關、戚都没有到場。

江青首先説：“王力、關鋒、戚本禹三個人表現不好，有野心。他們想搞掉三個常委，問題很大，錯誤嚴重。”江青所説的三個常委是誰呢？後來我才搞清楚，是周恩來、陳伯達和康生三個人。但是，王、關、戚三人具體是怎麽想搞掉三個常委的，有些什麽嚴重的錯誤？會上并没有細説。

後來我才逐漸了解到，王、關、戚的倒臺，大致上與一九六七的這麽幾件事情有關。

第一件事情，是提出“揪軍内一小撮”的口號。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晚，在新華社送審的《首都百萬軍民集會支持武漢造反派》的新聞稿裏，由關鋒執筆，康生審定，加上了“堅決打倒黨内、軍内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提法。接着，在八月一日的《紅旗》雜志社論《無産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裏，也提出要“掀起一個對黨内、軍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從此，“揪軍内一小撮”的口號就響遍了全國各地，促使全國範圍内的反軍、亂軍事件不斷發展，有的地方發展到了軍隊與軍隊之間的對立，有的野戰軍甚至也參加了兩派之間的衝突。毛澤東嚴厲地批判了“揪軍内一小撮”的口號，并提出要“還我長城”。

第二件事情，是“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反對周恩來的事件。一九六七年八月初，王力公開鼓動外交部一個名叫姚登山的造反派頭頭，起來奪外交部的權，而這實際上就是要奪周恩來的權，因爲外交部一直都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姚登山原來是我國駐印尼大使館的一個工作人員，因印尼共産黨在印尼政變未遂，印尼掀起反華浪潮的時候，他在鬥争中堅持原則，表現不錯，受到了表揚。回國以後，曾作爲英雄人物，在江青的陪同下登上天安門，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從此，姚登山同中央文革的接觸較爲頻繁。八月七日，王力對外交部造反派講了一次話，公開動員他們起來奪權。結果，在姚登山等人的帶領下，外交部的造反派奪了外交部的大權。之後，周恩來把王力講話的記録直接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完後批了三個字：“大毒草”。

第三件事情，是北京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之後，關鋒向毛澤東告康生的狀。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外語學院等學校及北京第一機床廠的造反派，爲抗議港英當局“迫害”中國駐香港新聞工作者，在英國駐北京代辦處集會後，衝進代辦處内進行打、砸、搶，并放火燒了英國代辦處的辦公樓和汽車。這件事情發生後，毛澤東嚴厲批評了周恩來和陳伯達、康生。關鋒在得知此事後，想趁機扳倒康生。于是，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隨信附上了康生幫助劉少奇修改《論共産黨員修養》一書的手迹。他想説明康生和劉少奇的關系非同尋常。當時毛澤東在上海，關鋒要我派飛機去給毛澤東送封信，後來我才知道他送的就是這封告康生的信。

這幾件事情都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視。毛澤東在審閲姚文元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發表的《評陶鑄的兩本書》時，加上了這樣一段話：“請同志們注意：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上極右的口號，利用‘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産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摇和分裂無産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徹底的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過來，反戈一擊，切勿上當。”

九月份，毛澤東回到北京，很快就跟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人就王、關、戚的問題打了個招呼。王力等三人的命運也就基本决定了。這幾件事情背後的真相究竟如何，我至今仍不怎麼清楚。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些事情固然是王、關、戚本人的問題，但是那時候許多問題同中央文革是扯不清的。既然如此，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就再一次順水推舟，把王、關、戚抛出去當了替罪羊。

十月初的一天晚上，周恩來、江青、謝富治、楊成武和我一起，在首都劇場審查“樣板戲”。散場以後已經是夜裏十二點鐘了，這時毛澤東的秘書突然通知我們到毛主席的住處開會。接到通知，我們立即趕到了人民大會堂。我們趕到時，陳伯達、康生、汪東興已經在等我們了。由于林彪已經服下安眠藥睡覺了，按照慣例他没有到會。

在會上，毛澤東指示：“王、關、戚三個人，不能繼續在中央文革小組工作，要拿掉。但是戚本禹還比較年輕，錯誤也比較輕，所以要把王、關、戚三個人分割開來，先拿掉王力和關鋒，争取戚本禹轉過來。”

第二天上午，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在釣魚臺十六號樓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會上，周恩來當面嚴厲批評了王力和關鋒。然後，江青、陳伯達和康生也對王力和關鋒進行了批評。接着周恩來當場宣布，對王力和關鋒進行隔離反省。會後，王力和關鋒就分别被軟禁在了釣魚臺國賓館的一座樓裏。很快，王力、關鋒被隔離反省的事情就傳了出去，一日之間，打倒王力、關鋒的大字報就貼遍了北京城。

到了十一月，毛澤東本來還想“争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江青本來非常器重和喜歡戚本禹，經常把戚本禹帶在自己身邊，一起進進出出，還要戚本禹學會游泳、學會騎馬、學會打槍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當作自己母親一樣看待。可能就因爲如此，讓戚本禹有點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紅樓夢》給李納，以至江青懷疑戚本禹對李納有非份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澤東反映，説戚本禹這個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澤東同意了。

第二天，周恩來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會議改在人民大會堂進行。到會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謝富治、楊成武、葉群、汪東興和我。在這個會上，周恩來宣布：“毛主席决定，由于對戚本禹挽救無望，要立即把他抓起來。”宣布以後，説抓就抓，立即行動。周恩來指定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帶領楊德中和幾個警衛戰士，在毛澤東召集會議和經常休息的那個大廳裏，等着戚本禹的到來。我們其餘的人就在會議室裏休息，等待消息。

一切布置好了以後，周恩來就打電話給戚本禹，通知他來開

命。戚本禹接到通知，興衝衝地坐汽車就來了。他剛一走進大廳，謝富治就對他宣布："今天要逮捕你。"戚本禹楞了，説："開什麼玩笑，要逮捕我？"由于戚本禹個子高大，爲怕他反抗，楊德中趁着他還没完全反應過來，帶警衛戰士一下把他抱住，拷上了手銬。這一下，弄得戚本禹更加莫名其妙，説："爲什麼要銬我，我究竟犯了什麼罪？什麼都没有對我宣布就把我銬起來，這是哪一條法律呀！"戚本禹還對江青存在幻想，在他被帶上汽車前，還連叫了三聲："姚文元，請代我問江青同志好！"他哪裏知道，正是江青力主把他抓起來的。這些具體情況，是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他們回來以後，向我們講述的。

到戚本禹被打倒時，原先由十四個人組成的中央文革小組，就祇剩下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五個人。想來也是有點好笑，整天打倒這個打倒那個的中央文革，最後居然也被打得祇剩下這麼幾個人！

王力、關鋒、戚本禹相繼被逮捕以後，没有人去過問他們的問題，也没有人敢去過問。他們的事情一直由中央文革負責，除了中央文革以外，誰也不能插手。當時，對其他重要的人物都設有專案組，唯獨對他們三個人没有設立專案組。因爲他們的問題一經追查，必然要涉及到江青、陳伯達、康生等，甚至還可能涉及到毛澤東本人。所以，對他們是破例作爲特殊情況處理的，既没有公布罪狀，也没有進行任何批鬥，祇是把他們關起來拉倒。

至于"揪軍内一小撮"的口號究竟是誰提出來的，我到現在也搞不清楚。當時《紅旗》雜志的主編是姚文元，主管意識形態的是陳伯達和康生，中央文革實際負責的是江青，這個問題是扯不清的。把這個責任完全扣在王、關、戚的頭上，我認爲是不公正的。

到了後來，又有人把"揪軍内一小撮"和這個口號歸罪于林彪的頭上。我認爲，這更是于理不通和毫無根據的。林彪當時是軍委的負責人，把軍隊搞亂了對林彪究竟有什麼好處？事實上，林彪一直都在盡力維護軍隊的穩定，甚至不惜與江青發生矛盾和

衝突。讓軍隊介入文化大革命也是林彪所不情願的。

另外還有一件事，也在這裏説一下。戚本禹被關起來以後，江青還不肯罷手，又讓人把戚本禹的妻子也關了起來，這一下就殃及到了他們的孩子。當時，戚本禹的兩個孩子都没有上學，兩個孩子没人養了怎麼辦？爲此，江青找到楊成武，然後她和楊成武又找到我商量説："兩個孩子放到什麼地方去，是不是可以放到你們空軍的一個機場？"我不明白他們的意思，就問："放到機場怎麼辦哪？"江青説："你交給一個幹部嘛！讓他管着，把孩子帶好，撫養費由公家負責。"我説："那就放到通縣機場吧。"楊成武説："放到通縣機場不行。"我又提出放在涿縣和上海。江青都説不行，説要放得遠一點。最後，直到我説出放在青海格爾木機場，江青和楊成武才同意了。

那天晚上，汪東興連夜派人把那兩個孩子送到了西郊機場，讓我派飛機把他們送到格爾木去。飛機起飛前，我通知了格爾木機場的一個負責人，要他負責收養這兩個孩子。

二十六、中央專案組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包括劉少奇在内的許多中央領導人被打倒了，爲處理他們的問題，中央陸續成立了一些專案組。除了這些中央專案組以外，下面各省、市、自治區，國務院，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以及各地、縣直至基層單位，都分别設立了自己的專案組。有的雖然没有專案組之名，確有專案組之實。總之，"文革"期間的專案組究竟有多少，誰也説不清。

據我所知，從一九六七年九月開始，到我被捕時爲止，一共成立了十四個中央專案組。當時，決定成立什麼專案組、由誰來分管、選派專案組工作人員等，這些問題都是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由周恩來親自提出，經大家討論同意，再由周恩來簽名報毛

澤東、林彪批準。

中央專案組成立以後，還下設了三個辦公室。第一辦公室主任是汪東興，辦公地點在中央辦公廳，下屬一共是七個專案組：一、劉少奇專案組；二、王光美專案組；三、所謂“薄一波等六十一個叛徒”專案組；四、陶鑄專案組；五、陸定一專案組；六、張聞天專案組；七、彭真專案組；

第二辦公室主任先是楊成武，後來是黄永勝，副主任是我，辦公地點在軍委辦事組，下屬一共是三個專案組，一、彭德懷專案組；二、賀龍專案組；三、羅瑞卿專案組。

第三辦公室主任是謝富治，辦公地點在公安部。下屬四個專案組：一、“五一六”專案組；二、抓叛徒專案組；三、葉向真專案組；四、其他一些人的專案組。

每個專案組的領導都分爲兩層，最上一層是中央文革碰頭會負責，但是實際上掌握着中央專案組工作的是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四個人。比如在中央專案組“一辦”裏，主管劉少奇專案的是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主管王光美專案的是陳伯達；主管薄一波等人專案的是康生；主管陸定一專案的是陳伯達，我和謝富治是陸定一專案組的成員；主管彭真專案的是康生；主管陶鑄專案的是江青。又如中央專案組“二辦”裏，主管彭德懷專案的是黄永勝；主管賀龍專案的是康生；主管羅瑞卿專案的是江青。中央專案組“三辦”裏的各個專案，主管都是謝富治。

專案組的具體工作人員和負責人，由軍委辦事組，根據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决定從部隊選派。專門抽調了一批軍、師一級的幹部。每個專案組少則十幾人、多則幾十人。我記得前後一共從部隊抽調了三次，一共大約是五百多人。所抽調的人員在北京集合以後，就由周恩來帶領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召集他們開會，講話，説明任務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來每半個月就在人大會堂的東大廳，主持召開一次專案組全體工作人員會議，四、五百人全部到會，然後由每個專案組依次匯報工作。會議常常一開就

是一夜，從晚上的八、九點鐘一直開到第二天的拂曉，大家累得不行就散會。幾乎每一次都是這樣，其實好多人都是陪會的。

據我所知，從我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開始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起，一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被捕時爲止，這一段時間内，除了劉少奇以外，中央再也没有正式開除過一個人的黨籍，整個專案組的進展都不大。由于弄來的材料究竟那些是真、那些是假，無法判定，時間一長，辦專案的人就越來越不積極。而這時上面就來壓，就批評工作人員“右傾”，要求他們嚴格審查呀！認真調查呀！趕快作結論哪！然而不管上面如何壓、如何批，進展還是不大。本來嘛，都是些冤、假、錯案，又從哪裏搞得到過硬的材料呢?!

關于幾個專案組我還記得幾件事情，在這裏説一説。

第一件事，關于劉少奇被定案的問題。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届十二中全會前夕，汪東興突然拿了一份材料到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説是專案組的工作人員從武漢一個外國領館搞來的。然後，憑着這份材料，給劉少奇安上了“叛徒、内奸、工賊”等一大堆帽子。最後，由專案組的工作人員寫了一個報告，經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通過，并由周恩來簽署，上報毛澤東、林彪批準。後來，就據此“證據”在八届十二中全會上給劉少奇定了案，“永遠開除”了他的黨籍。

第二、關于彭德懷專案組的審查報告。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七日，彭德懷專案組整理出了《關于反黨頭目、裏通外國分子彭德懷罪行審查的綜合報告》，報告説：“彭德懷一貫反黨、反毛主席、裏通外國，罪行累累，證據確鑿。在被審查期間，態度不老實，時而出爾反爾。我們建議，撤銷彭德懷黨内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出黨，判處無期徒刑。”這個報告送上來以後，黄永勝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日批示：“同意。”

這些年裏，經常能看到一些報刊和書籍上説，黄永勝在這個報告上寫下的“同意”兩個字，是他“殘酷迫害彭德懷的一個鐵證”，是他的一個“反革命罪行”。而黄永勝一直衹承認，當時他

祇是同意上報黨中央。

關于當時的這個報告還在，我已經找到了。節録部分如下：

時間是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七日，彭德懷專案組《關于反黨頭目，裹通外國分子彭德懷罪行審查的綜合報告》

此報告的開頭寫道："永勝同志，遵照您對彭德懷結案材料可以上報的批示，現整理好，呈上，請審示。"

黃永勝的批示："同意"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日

按照我們們當時的作法和理解，黃永勝當時批示的意思，應當是同意上報中央。

由于黃永勝已經去世，我不得不在這裏替他説幾句話。雖然黃永勝是彭德懷專案組的主管人，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彭德懷的問題不是黃永勝能説了算的。彭德懷的問題，中央早已經定了調子，除了毛澤東本人以外，任何人對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變。黃永勝個人同彭德懷没有什麼恩怨，他在這個位置上祇是替中央或毛澤東辦事而已。其實，當時的各個專案組的工作，事無巨細都由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周恩來負責。大一點的事情，要由毛澤東來决定。這是當時黨内一般的組織原則，也是一個常識。對彭德懷這一類人物的處理，别説黃永勝對此事没有任何决定權力，就是林彪、周恩來，也是作不了半點主的。

彭德懷的問題應該由毛澤東來負全部或主要責任，算到黃永勝的頭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黃永勝對彭德懷的問題是没有决定權的。當時中央專案組上報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絶大多數都有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簽字。我想這些文件應該都還在。爲什麼祇算没有决定權的黃永勝的帳，而不算有决定權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帳呢?

第三、關于爲羅瑞卿做手術的問題。一九六八年七月羅瑞卿因腿傷的問題，住到了解放軍總醫院——三〇一醫院。由于傷口長期不愈合，幾次做手術都没有達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本人要求截肢。之後，總醫院組織有關專家會診以後，寫了一個報告，也建議爲羅瑞卿做截肢手術。這個報告經中央文革碰頭會研究後

請示林彪，林彪回復："到秋天以後再動手術爲好。"他的考慮是，八月上、中旬天氣太熱，傷口很容易感染，而截肢是個大手術，在手術過程中出問題不好。再一個就是羅瑞卿的問題還没有搞清楚，要抓緊時間搞一點材料。于是，專案組根據林彪的意見寫了一個報告，建議將羅瑞卿的手術推遲到秋凉以後再進行。這個報告上報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由周恩來主持研究通過。

以後給羅瑞卿做的截肢手術很成功。關于這次手術，我看到一篇報道是這樣寫的："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由總院副院長曹根慧主持羅瑞卿大將的截肢手術，手術醫生是骨科副主任黨光博和主治軍醫王一德、麻醉科主治軍醫宋運琴、手術室護士張曉媛。外科主任陸唯善到場指導。整個手術進行順利。當時羅瑞卿平躺在手術臺上，頭對着門，腳對着窗户，陸唯善主任從側門進入手術室，一直站在手術臺邊，視察了整個手術的過程。手術做得不錯，手術以後恢復良好。但是因爲股骨頭已經壞死，所以截肢以後又進行了切除股骨的手術。當時的病例至今都保持着。"我認爲這個描述基本屬實。但不知爲什麼，三〇一醫院給羅瑞卿做手術的幾個醫生，"九一三事件"以後也都被逮捕了。我認爲，他們爲羅瑞卿做手術是認真負責的，在羅瑞卿的問題上没有任何責任。

羅瑞卿專案組始終没有搞出什麼材料，實際上也没有什麼可以搞的。一次，專門從海軍調來負責羅瑞卿專案的張曉山對我説："對羅瑞卿確實搞不出什麼材料，東拼西凑的還是不行。"

一九五九年以前，羅瑞卿一直任公安部長，在這期間他曾搞過幾次反偵察工作。專案組實在找不到什麼材料，就把這些也拿來當作材料。比如，一次駐厦門一個高射炮兵師的師長跑到了臺灣，并在那邊升了官。羅瑞卿利用我們控制下的一個臺灣特務，向臺灣發了一個假情報，説那個人是假投降，結果臺灣就把我們跑過去的那個師長抓起來槍斃了。還有一次，當毛澤東南巡的時候，負責保衛工作的羅瑞卿怕臺灣潛伏在大陸的特務搞刺殺行動，于是就要浙江省公安廳利用我們控制下的一個臺灣特務，發

報給臺灣，說毛澤東已經到了杭州，問怎麼辦。臺灣方面立即回電說，應當怎樣怎樣。這樣，我們就掌握了臺灣方面的情況，很快就采取了相應的措施。

這些都是我們反偵察的工作，當然不能算作羅瑞卿的“罪行”，到最後也衹好不了了之。因此，一直到我被逮捕以前，對羅瑞卿的問題也一直没有作什麼結論。

第四、關于陸定一的專案問題。陸定一的問題，是由他的妻子嚴慰冰引起來的。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約陸定一談話，拿出一叠材料交給他，并告訴他，這是由公安部轉來的一批寫給林彪的匿名信照片，公安部進行了調查，核對了許多人的筆迹，確認這是他妻子嚴慰冰寫的。彭真還說，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給他寫匿名信，這個問題被認爲是政治問題。另外，這許多匿名信的署名都是王光X，發信的地址也是用王光美母親所辦的托兒所地址，這自然會被看作是挑撥中央常委之間的關系。而且，不少信是用明信片的方式發的，這等于是公開的傳單。

過了幾天，彭真又告訴陸定一：“關于嚴慰冰的問題，中央常委討論過了，認爲嚴慰冰是個危險分子，中央常委决定要保護你，要你離開嚴慰冰，住到醫院裏去。嚴慰冰的案子由中央來處理。”

需要説明的是，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是中央常委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顯然，是他們委托彭真把這一情况告訴陸定一的。

爲了避嫌，陸定一于一九六六年三月六日離開北京前往南方視察工作。四月，中央專案組要中宣部一位副部長以約嚴慰冰談話爲名，將嚴慰冰帶出中南海增福堂的家，到懷仁堂前，要她坐上一輛黑色的“吉姆”車裏，一直送到了炮局胡同一號看守所裏予以關押。一九六七年初，又將她送進了秦城監獄。

嚴慰冰在匿名信中究竟寫了些什麼呢？後來我才知道，嚴慰冰在匿名信中說：“葉群在結婚的時候不是處女，以後又跟别人亂來，生下了兩個小雜種。”還說：“葉群是王實味的情婦。”林

彪見了這些匿名信非常生氣，爲此專門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向中央寫了一個證明：“我證明：一、葉群在與我結婚的時候是純潔的處女，婚後一貫正派。二、葉群與王實味等人根本没有戀愛過。三、老虎、豆豆是我和葉群的親生子女。四、嚴慰冰的反革命信裏所談的一切全是造謠。”

因爲嚴慰冰的問題而受到株連，陸定一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打成“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遭到了軟禁。一九六八年，也被關進了秦城監獄。

二十七、“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晚，在北京外交部街四周的郵箱裏，同時被人投入一種油印的傳單，署名爲“中國共産黨中央非常委員會”。傳單說，當前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與其所宣傳的革命詞藻完全相反，實際上是在政治上、組織上、經濟上、文化上、思想上對黨和國家的全面破壞，時間越長所造成的惡果就越加嚴重。

傳單還指名道姓地批判了中央文革的主要領導人陳伯達、康生和江青，認爲陳伯達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除此之外，傳單還指責了林彪：“爲什麼這伙人如此猖狂？主要是因爲黨内身居高位的人爲他們撑腰打氣。林彪過去在戰争中立有卓越的功勛，但是如今却充當了這伙人的主持者。由于林彪是掌握槍杆子的，不是他助紂爲虐，事情就不會糟到如此可悲的地步。”

傳單還進一步指出：“作爲黨的領袖，毛主席也不能辭其咎。毛主席以他的偉大的革命實踐，在黨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聲譽，但是他反復無常，遇事多疑，往往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一位領袖如果有了這些弱點而不能自拔，不可能不給他所領導的

人民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傳單唯一贊揚的人是周恩來，認爲正是由于有了周恩來的日夜操勞，苦撑大局，局勢才有一縷可能挽救的希望。在批評和批判了許多人之後，傳單對周恩來的這種贊揚顯得非常顯眼和突出。

接下來，傳單提出了一些建黨建國的綱領性主張，要求全黨予以支持，并建議成立一個新的中國共産黨中央非常委員會來代替舊的中央委員會。傳單最後還表示：“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他們不乏自己的真正領袖，不過這位能够收拾目前混亂局面的領袖人物，必須是與這場浩劫没有牽連的人，是大多數人民所真正信賴的人。”

十月九日上午，郵局工作人員打開信箱收取郵件時，發現了這份傳單，便立即上報有關部門。上午十時，這份傳單送到了周恩來的手裏。周恩來看完後十分重視，立即就轉送給了毛澤東一份。

這天晚上，在釣魚臺十六號樓召開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周恩來拿出這份傳單讓大家傳閲，并説：“這張傳單很重要，一定要組織破案。”當時大家誰都没有發言，就連江青也没有説話，衹有陳伯達拿着傳單説：“這很像是‘二月逆流’的口氣，内容也和‘二月逆流’差不多。”當晚的會議，對傳單的問題没有作出任何結論，衹是定下來，要毛澤東來决定。

第二天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號親自召集中央常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傳單問題。除了我們這些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人以外，林彪也來了。毛澤東詳細地詢問了傳單的情况後，讓大家發表意見。陳伯達説，這樣的傳單一般人是寫不出來的，衹有高級領導人的秘書，例如鄧小平的秘書才能寫出來。這個時候毛主席對周恩來説：“恩來，你負責組織專案組去破這個案，一定要破案。”

當天晚上，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研究具體落實毛澤東的指示。他當場指定陳伯達負責這個專案工作，同時又指定謝富治和我也參加專案組的工作，因爲謝富治是公安部長，我是軍隊方面的，由我們兩人參加，這樣，我們三個人組成了這個專案組。

十月十一日晚上，陳伯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專案組會議，出席的除了我們三人外，還有公安部各方面的負責人。會議一開始，陳伯達就説：“這個案子主要由謝富治和公安部的同志負責，我和法憲就不插手具體工作了。”謝富治點頭同意，説：“我是義不容辭。”接下來，會議開始研究案情。公安部的人認爲，從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在北京做案的可能性比較大，應當首先把北京作爲破案的重點，同時注意北京周圍的幾個地方。

這次會議之後，公安部就展開了破案工作，但是查來查去，始終没有查出什麽結果來。很快一個月過去了，案子没有什麽進展，陳伯達也没有再召開過專案組會議。這一來，周恩來着急了。因爲傳單是在外交部街發現的，周恩來急于要查清，傳單和外交部的人有没有關系？因爲周恩來不僅主持外交部，而且傳單裏唯一贊揚了的就是他。

後來，周恩來聽到公安部的一個人講，“非常委員會”有個寶塔型的組織，涉及到朱德、陳毅等人。于是他借機嚴肅批評陳伯達説：“對公安部的這份材料，你爲什麽不開會呀？這份材料究竟是真還是假呀？毛主席一直等着破案的情况，你們怎麽這樣對待毛主席交給的任務呢？”

事也凑巧，恰好在這個時候，天津市公安局來了一個報告，説做案的人已經找到了，對原稿筆迹和做案工具進行了鑒定，證實那個傳單完全是這個人搞的。接到這個報告，陳伯達立即召集天津市革委會和天津市公安局的人來北京匯報情况。謝富治、我以及公安部的有關負責人參加了這個匯報會議。天津方面在會上匯報説，做案的人是個工人，傳單從書寫、油印，到來北京將八十份傳單分别投入外交部街附近的郵筒，始終是一個人所爲。經鑒定，可以證實這一點。

聽完匯報，陳伯達不相信，他懷疑地説：“一個工人，能寫出

這樣的傳單來嗎？一定還有後臺，要往上追，追到誰就是誰。傳單上説，有一個人可以出來收拾殘局，這個人究竟是誰？你們應當挖一挖嘛。”天津市革委會主任解學恭問：“你們認爲這個人是誰呢？”謝富治回答説：“還不是‘劉、鄧司令部’的人。”

聽到這裏，我對陳伯達和謝富治説：“你們要説清楚，不説清楚，人家搞不明白。”然後我解釋説：“陳伯達同志的意思是要你們查一下，有没有劉、鄧家裏的工作人員插手這件事，當然要實事求是。”這樣，“非常委員會”專案組的第二次工作會議就結束了。

過了一段時間，陳伯達又召集了專案組的第三次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天津市的匯報仍然同上一次一樣，没有發現其它問題。聽了這個匯報，我認爲這個案子基本上可以結束了，再追查下去没有多大的意思。散會以後，我和謝富治交换了意見，他也同意我的這個看法。接着，我們兩個人便直接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聽了我們匯報，説：“也許就是這樣吧。”對這個案子，以後就没有再追查下去了。

二十八、到上海带人

一九六八年春，上海的紅衛兵搞到了不少材料，這些材料涉及到了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一些生活作風方面的事情，并將這些材料印成了小册子，在上海市悄悄流行。江青知道以後着急了。在一次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江青哭哭啼啼地向周恩來説：“這麽搞怎麽得了，看來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

周恩來同意派人到上海去徹底處理這個問題。他當即布置説，去上海的人有兩個任務，一個是把搞江青材料的人統統都抓起來，另一個就是把上海市有關江青的材料，包括小册子和傳單，都統統收到北京來。

事情决定了，但是派誰去呢？周恩來和江青都要我去。江青説：“吴法憲有飛機，來去方便，就要他去。”我不想去，怕事情辦了反而不討好，就説：“我對上海地方的事情不熟悉、不了解，怕辦不了事情。”這個時候陳伯達説話了，他説：“不要緊，由我們碰頭會議全體給你寫個授權書，集體授權給你，這樣事情就好辦了。”聽了陳伯達的主意，周恩來馬上點頭説：“好！”

于是，陳伯達當場起草了一個授權書，并給這個任務起了一個代號，好像是叫“四一二任務”。在授權書上第一個簽名的是周恩來，第二個是陳伯達，第三個是江青，以後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等所有到會的人，也都依次簽了名。這樣一來，我再也不好説什麽，衹好同意去上海跑一趟。

會議接着决定，我負責到上海去把抓到的人和收到的材料送過來，由楊成武負責在北京接人和材料。至于怎麽處理這些人和材料，會議没有具體討論。

會後，我把授權書復印了幾份，保留在我的辦公室裏。江青這個人反復無常，經常出爾反爾。像這次去上海的事情，我怕弄不好江青以後會説成是我去收集她的材料，就留了一個心眼。

到了上海以後，我把授權書交給了張春橋，同時向他傳達了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周恩來交待的兩個任務。我還特别向張春橋説明，由于我在上海不熟悉，具體問題需要他來辦理，他交來什麽人，我就負責轉送到北京去；他交來什麽材料，我也就負責統統轉交給周恩來和江青。

結果不久，張春橋就把黄赤波等人交來了，我就派飛機把這些人都送到北京，交給楊成武。至于紅衛兵們在上海散發江青的材料，到處都是，没有辦法收幹净，反正張春橋交給我多少，我就接收多少送回北京。

大約過了一個星期，我就回到了北京。我把帶回來的材料全部交給了周恩來。對這些材料，周恩來不拆封，更不看，衹是貼上了封條就全部交給了江青本人。我把這次去上海的情况，寫了一個報告，并由楊成武和我兩個人簽名，提交給了中央文革碰頭

會議。我想，這個報告是會存在中央檔案館裏的。

另外還有一件事，我也想在這裏説一下。在我臨離開北京時，江青當面向我交待，要我爲她找到一個叫孫竣青的人，把他帶到北京來，説是想見一見他。我説我不認識孫竣青這個人，她就説，“你自己想想辦法嘛！”接着她告訴我，這個人是個作家，寫了一本書。最後，她還特別吩咐我，把這個人帶來的時候，一定不要讓張春橋知道。

不讓我告訴張春橋，我就衹好通過空軍找。正好碰到了空四軍政治部的一個文化部長，他對上海文化界的人很熟悉。他說他知道孫竣青這個人，于是就通過這個文化部長，把孫竣青找了來。孫竣青來了後，我告訴他説，江青要他到北京去，想見一見他。孫竣青聽了很高興，問我什麼時候去。我説，“明天晚上就有飛機，具體時間我再通知你吧。”我是把孫竣青當作江青的客人送到北京的，還以爲是做了一件好事。我哪裏知道，孫竣青一到北京，就被江青抓了起來。至于江青爲什麼要抓他，還有江青爲什麼不讓張春橋知道這事，我實在是至今也搞不清楚。

二十九、林立果到空軍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全國各個大、中學校便很快開始了“停課鬧革命”。到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學校裏混亂的情況還没有好轉。當時，林彪的兒子林立果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的學生，學校停課以後書讀不成了，葉群又不願意讓林立果到處去串聯。當時，她認爲參軍是一個好出路，把林立果放到軍隊裏控制起來，比讓他參加社會上的一些活動要好。

由于空軍是個技術性比較强的兵種，很多高級幹部都願意把孩子送到空軍裏來。比如毛遠新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以後，根據汪東興的意見，實際上是毛澤東的意見，我把他安排在

空軍一個新組建的地空導彈部隊當了幹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我又根據周恩來和汪東興的意見，把送他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很快成了學校造反派的頭頭。以後，他又相繼成了中央文革駐東北地區的聯絡員、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沈陽軍區空軍政委、沈陽軍區政委、中央政治局聯絡員等職務。

另外，還有周恩來、朱德、董必武、彭真、劉伯承、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楊成武、許世友、韓先楚、汪東興、楊德中等許多人的子女和親屬，都先後來到了空軍，空軍雲集了許多中央和軍隊領導人子弟。

一九六七年初的一天，葉群問我，把林立果放到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當個參謀是不是可以。我説：“放到北京軍區空軍，還不如直接放到空軍司令部。林立衡現在空軍政治部，如果把林立果放到北空，就比他姐姐低了一個擋次，他能願意嗎？不如就放在空軍司令部，我也好直接管理和照顧，再説離你也近一些。”

聽了我的話，葉群很高興，説：“那好，就放在空軍司令部。可是幹什麼好呢？”我説：“當個參謀也可以，當秘書也可以。當秘書可以放在空軍黨委辦公室。”葉群説：“那還是當個秘書吧。但是立果不熟悉業務，不會做工作怎麼辦？”我説：“那好辦，‘黨辦’有老秘書，我可以指定一、兩個人來專門培養立果。”

我們就這樣商定了。我萬萬不會想到，當時的這一決定，竟會在以後發生那樣嚴重的後果！

不久，林立果來到空軍，我把他安排到了空軍黨委辦公室，并且指定了“黨辦”一個叫周宇馳的科長來負責幫助他。以後，幫助他的人又加上了一個劉沛豐。

周宇馳原來是哈爾濱第一航校的一個宣傳科長，後來給劉亞樓當了秘書。一次，因爲他積壓文件犯了錯誤，被下放到部隊去鍛煉。由于他的寫作水平不錯，一九六六年冬天，我們又把他調回“黨辦”當了科長。周宇馳和林立果相識以後，很快就得到了林立果的信任。他們倆幾乎到了形影不離的地步。

剛開始的一段時間，林立果表現還不錯。過了半年以後，葉

群就提出："立果到現在還不是黨員，能不能培養他入黨。"我說："可以。周宇馳是一個老黨員，就要他培養林立果入黨好了。"

接着，葉群又要我給"黨辦"主任王飛作一個交代，要王飛多關照一下林立果。所以我又告訴王飛："要多照顧和鍛煉林立果。他是林副主席的獨子，林副主席把林立果交給我們，這是對我們空軍的信任，一定要把林立果培養成才。"

不久，周宇馳向我匯報說："可以發展林立果入黨了。"我對他說："林立果在政治上當然是沒有問題，現在要看其它方面的表現，主要看他的思想意識、工作情況怎麼樣。"周宇馳認爲，林立果在各方面都够條件，沒有問題。他還提出："由首長你和我兩個人作爲林立果的入黨介紹人。"我表示，衹要他够條件，我就可以做他的入黨介紹人。

以後，作爲入黨介紹人，我親自參加了通過林立果入黨的支部大會。我還在這次會上講了話。我說："林立果到空軍以後，有不小的進步，工作表現很好，介紹他入黨是應該的。希望林立果同志繼續努力，成爲一個真正優秀的共產黨員。"

在會上，支部的其他同志也對林立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然後，林立果發言表態說："我一定要努力學習，力爭從政治上、業務上很好地提高自己，決心爲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奮鬥到底。"我又鼓勵他說："有這樣的決心就好。希望今後不斷地學習，不斷地努力，不斷地進步。"最後，支部大會全體人員一致通過了林立果的入黨申請，預備期爲一年。以後，林立果轉正的支部大會，我就沒有再參加了。

林立果入了黨，葉群非常高興。她對我說："空軍是可以信得過的，把林立果放在你們那裏是很正確的。"她還說："立果在空軍，對你們也會有幫助，他可以支持你的工作，可以直接向林總匯報。"我表示說："這樣很好，立果向你們反映什麼問題都可以。空軍有林總和你的支持，工作是一定會搞好的。"

在對待林立衡和林立果的問題上，葉群的態度有些不太一樣。從一九六五年林立衡來到《空軍報》社以後，葉群對林立衡在空軍的情況，一般都不予過問，更不加干涉。我對林立衡也沒有給過什麼特殊的照顧，衹是在後來把林立果提升爲空軍黨辦副主任的同時，也將林立衡任命爲《空軍報》的副總編輯。

林立衡爲空軍辦了好幾件實事。例如毛澤東爲《空軍報》的題詞，就是我通過她去辦的。當時我對她說："你經常到毛主席那裏去，能不能請毛主席爲《空軍報》寫個報頭？"結果她很快就辦成了。毛澤東還在題詞上特別寫道："送林彪同志的女兒林豆豆。"我把毛澤東寫的這個報頭和題詞，轉交給了《空軍報》社的社長朱鴻。這就是現在還在使用的《空軍報》這個報頭的來歷。毛澤東還很欣賞林立衡寫的一篇題爲《三訪九廠》的通迅，他曾經當面對我說："林立衡的這篇文章寫得不錯。"

林立果來到空軍以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對林立果的事情，葉群不僅經常過問，而且不時地要我們爲他做這做那，有時候還通過林立果直接插手空軍的事情，讓我們很難辦。

第十二章　九大前後

一、"楊、余、傅事件"

經過將近兩年的時間，亂糟糟的"文化大革命"終于逐漸安定下來，籌備"九大"一事也被開始提上議事日程。然而就在這時，一九六八年三月，北京發生了"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這個事情，實際上連我也一直搞不清楚真正的原因。

楊成武是林彪在紅軍時期的老部下，林彪與楊成武的關系一向很好，對楊成武也一直較爲器重。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會議批判羅瑞卿時，楊成武就是軍委三人領導小組的成員。羅瑞卿下臺後，經林彪提議，楊成武被任命爲解放軍代總參謀長。一九六七年九月，中央決定成立軍委辦事組，楊成武又當了組長，實際上也就是軍委秘書長。

楊成武與林彪之間的關系，從楊成武大女兒楊毅的工作安排也可見一斑。楊毅到《空軍報》社工作，是葉群出面要我安排的。據我所知，對下屬的子女如此關心，由葉群親自出面安排工作的，僅楊毅一人而已。

除了林彪，楊成武與江青的關系也很好，江青經常找楊成武辦一些事情。楊成武對江青也很尊重，江青叫他辦什麼，他就辦什麼。但江青這個人很難相處，有時候爲她辦了事，不僅聽不到

她的好話，反而要挨她的罵。

有這樣一件事，大概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楊成武派人去上海爲江青取材料。葉群通知我，要我從空軍裏派一個人，交楊成武統一安排去執行任務。我當即派了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的朱鐵峥。楊成武也選了總參一個叫陳洪的幹部，與朱鐵峥一起去上海辦這件事。然後，江青、葉群、楊成武三個人在京西賓館開會研究，布置任務。在他們開會研究之前，葉群跟我說，這個會議參加的人越少越好，讓我不要參加。

事後，朱鐵峥告訴我，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着江青的一箱子材料，江青要楊成武負責把這些材料拿回來。這個任務，楊成武就交給了朱鐵峥和陳洪去具體完成。朱、陳二人到了上海，把這一箱材料拿回來交給了楊成武。然後，楊成武就把這箱材料保存在京西賓館。

過了一段時間，有一天，中央文革碰頭會在懷仁堂開會。那天，江青到得很早，我和楊成武到懷仁堂時，江青突然向楊成武發開了脾氣。她説："你楊成武是'放長綫釣大魚'呀！你從上海搞來的材料，遲遲不作處理，你是想釣我這個大魚呀！"楊成武一聽，趕緊申辯説："我怎麼是'釣魚'呢？我能放長綫'釣'你江青同志嗎？"江青説："你從上海拿來的材料，爲什麼不燒了，放在那裏想幹什麼？"楊成武當時臉都變色了，説："你江青同志不叫我燒，我敢燒嗎？"江青説："你早就應該燒了。你和謝富治、戚本禹一起立即燒掉。"楊成武説："好，馬上辦。"當天晚上，楊成武就與謝富治、戚本禹一起，在京西賓館把這箱材料燒掉了。

另外，當時還有一件事情與江青和楊成武有關，這就是關于組織寫作"兩條路綫鬥争史提綱"的事。一九六七年冬，在一次中央文革碰頭會議上，江青突然提出，要寫一個"兩條路綫鬥争史"，并且提出要先寫出一個提綱。對江青的這個提議，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都表示同意。那麼這個提綱究竟由誰來寫呢？江青提議由楊成武負責。于是會議决定，這個提綱由軍隊來組織寫。

會後，楊成武專門從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抽調了三十多名“筆杆子”，集中在京西賓館的一層樓上，專門來寫這個“兩條路綫鬥争史”的提綱。楊成武把自己的女兒楊毅，也從《空軍報》社調進了這個寫作班子。

過了三、四個月，提綱的初稿出來了。討論的時候，楊成武要我也去參加。我一看，這個提綱裏面總共衹剩下了三個人，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林彪，再有一個就是江青。這個中國共產黨的黨史裏連周恩來都没有！于是我就跟楊成武説：“連朱老總和周恩來總理都没有，能行嗎？”楊成武和我咬耳朵説：“是江青不叫寫的。她不讓寫周恩來，也不讓寫其他人。”我這才明白，江青哪裏是真的要寫什麽“兩條路綫鬥争史提綱”，她這樣做的目的，衹不過是借機抬高自己，爲日後進一步掌權作鋪墊而已。

我又聯想到了另一件事。在這之前，有一次，江青把楊成武和我叫到她那裏，拿出一包材料對我們説：“這些都是周恩來的材料，但是你們現在不能看，你們衹要知道有這些材料就可以了。”後來我才知道，這些材料是許世友送來的，裏面裝的就是著名的“伍豪啓事”。材料送到毛澤東那裏以後，毛澤東一看就説：“我早已經知道了，那是假的，没有用處。”我把這兩件事情一聯系，我當時就感到江青這個人，用心叵測。

“兩條路綫鬥争史提綱”寫成後，楊成武就送給了江青，江青又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了很不高興，一下就把提綱摔到了地上，并且告訴江青，趕緊把這個提綱燒掉，一份也不要留；參加寫作的人全部送回原單位，一個也不要留。

從毛澤東那裏出來，江青連夜通知楊成武，要他把所有的人全部遣散回原單位。

到了一九六七年底以後，我就感覺到情况有了一些變化，毛澤東、林彪對楊成武的信任已經開始發生了動摇。其中真正的原因，我不得而知。但是事情總有癥候。從表面上看有兩件事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件事情，是與以楊成武名義發表的《大樹特樹偉大統帥

毛主席的絶對權威，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絶對權威》這篇文章有關。這篇文章是楊成武領導下的總參寫作組寫的，文章寫好以後，楊成武在陪同毛澤東南巡的時候，曾親自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批示：“我不看了，送伯達、文元酌處。”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楊成武隨毛澤東回到了北京，便將這篇文章送到了陳伯達處。以後經陳伯達同意，這篇文章以楊成武的名義發表了。文章見報以後，全國各大報紙都轉載了，電臺一天三、四次地廣播。我還記得，文章發表以後，楊成武曾高興地對我們軍委辦事組的成員説：“文章點名批判了羅瑞卿，羅瑞卿聽了廣播以後，馬上就承認了自己是假黨員。”

誰知道，這篇文章，在不久之後遭到了毛澤東的批評。十二月十七日，毛澤東在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報告上作了六條批示。批示中的前兩條都提到了楊成武的這篇文章。其中第一條批示説：“絶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没有什麽單獨的絶對權威，凡是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絶對的東西都衹存在于相對的東西之中，就如絶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絶對真理衹存在于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第二條批示説：“大樹特樹的説法也不妥。權威或威信衹能是從鬥争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權威必然會垮下來。”

毛澤東將這個批示轉給了林彪、周恩來以及中央文革。十二月二十一日，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名義，將毛澤東的這個批示轉發給了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解放軍各總部和各大軍區、省軍區，以及新華社、中央廣播電臺、《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和各個地方的新聞機構。這樣一來，就等于在全國公開了毛澤東對《大樹特樹》一文的批評，使人不得不聯想到楊成武。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一九六七年底，有一次我們在京西賓館審查樣板戲，周恩來和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員都參加了這次審查。這個時候，總政治部實際上已經癱瘓了，中央軍委任命劉賢權爲軍委辦事組政工組組長，主持全軍的政治工作，實際上等于總政

治部主任。但是當時劉賢權還没有到任，政工組的工作是由政工小組副組長劉錦平在主持。劉錦平原是中國民航總局的政委，經楊成武提議，調來軍委辦事組政工小組的。那天的晚會就由劉錦平主持。

這個晚會，江青一定要請林彪到場。這個事，楊成武頭一天晚上曾經告訴過我，但他那天大概因爲在忙于别的事情，把這件事情給忘了，没有及時通知葉群。林彪有一個習慣，每天晚上到了八點鐘就要吃安眠藥睡覺，如果晚上八點鐘以後有什麽事情需要他參加，就一定要早一點通知他。那天因爲事前没有接到通知，依照慣例，林彪到了晚上八點鐘就吃藥睡覺了。而在京西賓館這邊，所有預定來的領導人都到了場，唯獨林彪和葉群没有到。看到林彪没到，江青不幹了，非要堅持等林彪到場不可。結果林彪迷迷糊糊地被人從床上拉起來，送到京西賓館看節目。

這一折騰，葉群不幹了。演出剛剛開始，她就把楊成武和我叫到休息室，就在那裏對我們破口大駡："你們兩個當了總長、副總長，就得意忘形了，忘恩負義了，眼睛裏就没有林總了！你們兩個主持這次演出，爲什麽要等林總睡了覺才通知我們，要江青同志在這裏等林總。你們這是幹什麽，用意何在？"楊成武解釋説："這次演出，我已經委托劉錦平主辦，要他全權負責。"葉群斥責説："叫劉錦平主辦，你就撒手不管了？你這個總長是幹什麽吃的？"她這一駡，駡得楊成武一聲也不吭了。

被葉群這樣一通駡，楊成武不高興，我當然也不高興。但當時我的心裏納悶，僅僅是爲了審查節目這件事情，就至于這樣駡我們嗎？看來葉群這場發作，主要還是衝着楊成武來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其中可能還牽涉到了一些什麽别的問題，祇是我實在搞不清楚罷了。所以，第二天晚上，我跑到楊成武家裏問他："葉群爲什麽發這樣大的脾氣？"楊成武祇是説："我也搞不清楚，駡就讓她駡吧。"對這件事情，楊成武不滿意，我也不滿意。

這兩件事情以後，楊成武的情緒有些低落，經常不參加軍委

辦事組的會議，甚至連中央文革碰頭會議也經常不參加，祇是要我在會議以後向他通報情况。

楊成武和我在紅軍時期就相互認識，一起在軍委辦事組工作，也有半年多時間。本來我們倆的關系一直都是很好的，在軍委辦事組工作時也相互配合得很好，但是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我們兩個人之間却出現了矛盾。

矛盾是由楊毅引起來的。一九六八年三月的一個晚上，我正在京西賓館辦公處理問題時，空軍黨辦主任王飛和副主任周宇馳一起闖了進來，他們一見到我就説："吴司令，空軍發生大問題了！余政委的秘書單世充的老婆縱素梅找到黨辦，哭哭啼啼地來告狀，要我們救救她。"

事情是這樣的：余立金有一個秘書，叫單世充，人長得比較精神，又能説會寫，給劉亞樓和我都當過秘書。那天下午，他的老婆來到空軍黨辦大鬧，説單世充和楊毅有不正當的男女關系。她提出的根據是，在那一段時間裏，楊毅因參加"兩條路綫鬥争史"的寫作班子，住在京西賓館，而單世充則幾乎天天往京西賓館跑，還經常給楊毅帶一些吃的東西。每次縱素梅問單世充去幹什麽，單世充就説是到京西賓館洗澡。

除此之外，她還在單世充的日記本裏，發現了單世充和楊毅兩人的合影和兩首詩，其中第一首詩上説"春風遥盼玉門關"，第二首詩裏却已是"春風已度玉門關"了。還有，縱素梅本來和單世充的感情很好，一直没有發生過什麽問題，但是單世充這時突然向縱素梅提出要離婚。在這種情况下，縱素梅説她已經忍無可忍，祇能向領導上提出求救。

我聽了以後，不覺大吃一驚。我説："怎麽會發生這樣的問題？真要是這樣，對楊代總長的影響就不好了，楊代總長會怪我們的。但是，事情還需要進一步搞清楚。你們先找單世充談一談，問清楚究竟是怎樣情况。如果事情真的是這樣，就要單世充承認錯誤，不準再鬧離婚，同時不準縱素梅到外面去亂告狀，要注意保護楊代總長的威信。"

王飛、周宇馳回去後就找單世充談話，但由于單世充堅決不承認，談話就形成了僵局。王飛和周宇馳一怒之下，就把單世充給軟禁起來了。

我聽説單世充被軟禁以後很生氣，因爲關押了單世充，一是叫我無法向楊成武和余立金交代，二是我認爲這是黨辦王飛等人借機擴大事態，要整垮我和余立金的幾個秘書。當時空軍黨辦的王飛、周宇馳等，對黨辦另一個和他們有分歧的科長衛球不滿。由于衛球曾説過不同意"大樹底下好乘凉"這句話，而這句話又正好是林彪講過的，于是王飛、周宇馳直接向葉群控告説，衛球反對林彪，是"現行反革命"。王飛、周宇馳的這一舉動，引起了黨辦另一些秘書的不滿，從而就在黨辦裏形成了兩派。一派以王飛、周宇馳爲首，有林立果的支持；另一派以衛球爲首，包括了我和余立金的幾個秘書。當時，他們兩派之間對立情緒嚴重，關系十分緊張。

正是由于這個緣故，我一聽説王飛等人扣押了單世充，反映到我腦子裏的就是王飛、周宇馳要借機整人了。于是，我立即讓人找王飛，王飛不在，我找到了周宇馳。盛怒之下，我駡了周宇馳，讓他馬上把人放出來，并且對他説："不經過我的同意，你們就扣人，實際上是奪了我的權嘛！"

没想到周宇馳回去不久，葉群就打來電話，向我大發脾氣。她問我："你怎麽説林立果在空軍要奪你的權？我們把立果放到空軍，是要幫助你掌權，而不是要奪你的權。你好没有良心！如果你懷疑，那我們馬上要立果離開空軍好了。"我解釋説："葉主任，你這樣説不是事實。我批評的是周宇馳，并没有説立果。是周宇馳不經我的同意就扣了人，我是批評周宇馳奪了我的權，怎麽成了立果要奪我的權？"葉群説："你説周宇馳就是説立果，因爲他們兩個人是在一起的。"我説："葉主任，你要這樣説我也没有辦法。我是批評了周宇馳，周宇馳是空軍黨辦的副主任，難道我連批評周宇馳都批評不得嗎？"葉群説："你一批評周宇馳，他很害怕，現在都不知道躲到什麽地方去了，連立果都找不到他。

你是不是已經把周宇馳關起來了？你把周宇馳藏到什麽地方去了？"我説："周宇馳從我這裏走了以後，我就根本没有見到他。他不是和立果在一起嗎？"葉群説："根本不在一起，連立果都找不到他了。你是不是跟周宇馳談一談，要他安心工作，别躲着立果了。單世充這個人有錯誤，應當審查清楚，你怕什麽？連'一一'都説，這是爲了維護楊成武的威信，應當把單世充弄起來，你又顧慮什麽？"我一想，和葉群的關系搞僵了可是不行，于是就答應下來，馬上去找周宇馳談一談，要他安心工作。

消息傳得很快，剛剛放下葉群的電話，楊成武的妻子，也是楊成武辦公室主任趙子珍的電話就打過來了，她要我和余立金馬上到楊成武家裏去一趟。林彪和楊成武都是我的上級，而葉群和趙子珍這兩位主任也都是了不得的人，我誰都惹不起。在當時，爲了一個單世充，真弄得我左右爲難。一邊要我放人，一邊不讓我放，真是弄得我好爲難。

明知道這次去楊成武家不會輕鬆，當時我實在是不願意去，但還是硬着頭皮去了。就在我和余立金坐車剛剛走進楊成武的家門，趙子珍就開始對我們大發脾氣，説："楊毅和單世充之間的關系是正常的，你們空軍爲什麽要把單世充抓起來？你們憑什麽關單世充？你們要把楊毅搞出空軍，也不必要用這樣的辦法！王飛、周宇馳、何汝珍都是壞人，你們不作處理能行嗎？"

我當時衹能申辯説："我這樣做也是爲了維護楊代總長的聲譽。對單世充，我需要嚴加管教，不能放任，否則我就對不起你們了。"接着，我要求見楊成武説明情况。趙子珍拒不讓見，説："楊成武身體不好，不見！"這種情况在以前是從來没有過的，我當時就想，看來這一下子把楊成武也得罪了。

余立金看到這種情况，就動上了心思。這以後，他就一下子靠到了楊成武那裏。余立金是我向林彪建議，由空軍副政委提升爲政委的。我自己認爲，幾年來我們兩個人一直合作不錯，我當時真的没想到他會這樣。

這兩位主任都是不得了。

回家以後，我把這一情況打電話報告了葉群。葉群告訴我，楊毅和豆豆對我的態度是不一樣的，豆豆是支持我的，而楊毅早就給我寫了大字報，批評空軍的幹部政策有宗派主義傾向。她還對我說："余立金早就和楊成武串通一氣在奪你的權了。許世友不久以前送來一份材料說，余立金在皖南事變時曾經被俘叛變，自首以後才到了上海，是個叛徒。這個材料也送到了毛主席那裏，毛主席也知道這件事情。"

她說的這些情況我不知道，而且也不歸我管，但對單世充究竟作如何處理，我却一時舉棋不定。爲了慎重起見，當天晚上，我親自找縱素梅談話了解情况。縱素梅所說的情況，與黨辦幾個人向我反映的情況基本相同。在同縱素梅談話過程中，我一邊談話，一邊要秘書作記録。最後，這份記録交縱素梅自已看過，并簽了字。爲了防備萬一，我還叫秘書去復印了幾份，以備日後查證。

第二天上午，趙子珍帶着余立金突然來到林彪的住處，先送上一桌福建菜，說是送來給林彪嘗一嘗，然後哭哭啼啼地想說服葉群報告林彪，說空軍以整單世充爲名整楊毅。余立金這個時候承認，是他交待單世充多關照楊毅的。空軍想整單世充是無中生有，敗壞了楊成武的聲譽。他還說："吳法憲這個人很專制，我這個政委没有權，什麼都得聽吳法憲的。許多人反映劉亞樓的時候是吳（無）政委，現在是余（多餘）政委。"但葉群說："不管怎樣，縱素梅的意見已經記録在案，是有案可查的。"

余立金回到空軍大院以後，就立即找縱素梅談話，警告她不要爲人所利用，擴大事態。并一再對她曉之以利害。縱素梅留戀與單世充的感情，不想讓單世充真的受到傷害，就想要改口，但是話說出以後，再改也難了。

趙子珍和余立金走了以後，葉群把他倆對我的控告報告了林彪，林彪聽了很生氣。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他下午把我叫到了毛家灣，告訴我說："趙子珍和余立金來告你的狀，看樣子是要奪空軍的權，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這種行爲是錯誤的，你要

堅持原則，要敢于同楊成武鬥爭，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來，要頂住！"

我報告林彪說："楊成武已經要秘書給我打來電話，要我晚上到他那裏去，他要見我。"林彪說："你不要一個人去，最好帶上一個人，這樣有些事情，也好有人作證。"

回到空軍大院以後，我就想，帶誰去呢？想來想去，衹有帶我的妻子陳綏圻一起去比較合適，因爲楊成武當時稱病在家休息，與陳綏圻一起去探視他的病情，顯得比較自然一些。另外，當天是星期天，陳綏圻也正好在家休息。于是，我告訴陳綏圻，要她和我一起到楊成武家裏去一趟。

臨走的時候，我又帶上了秘書張雲龍。我的本意是，在楊成武和我談話時，如果有機會，就請他記録一下。後來，車到了楊家門口時，我又考慮這樣恐怕不太妥當，就叫張雲龍在車上等候。

我和陳綏圻進門後，趙志珍把我們帶到了樓上楊成武的卧室。當時，楊成武躺在床上，我和陳綏圻上前問候了他的病情，說了幾句話。這時，趙志珍向陳綏圻說："成武同志要和法憲說幾句話，你先到外面坐一坐。"

陳綏圻走了以後，楊成武就開始說服我："第一，不要講余立金是叛徒。余立金現在空軍没有權，再一宣傳他是叛徒，他在空軍裏就根本没有地位了。第二，單世充没有錯，不要整單世充，事情鬧大了，就不好辦了。今天我找你主要是這兩件事情。"

我跟楊成武說："余立金究竟是不是叛徒，我不清楚，那是許世友從南京直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報告的材料，我在外面絶没有吐露一個字。我不能證明這個材料是真是假，當然我希望没有這回事情。這個材料怎麼辦，也不是我能做主的事情，要上面來定。我是司令，他是政委，這個事情我無權處理。至于說余立金在空軍没有權，那不是事實。你也知道，我每天下午在軍委辦事組，晚上在中央文革碰頭會，空軍的事情我没有時間處理，基本上都交給了余立金，怎麼能說他在空軍没有權呢？第二對單世

充，空軍的處理没有錯。對他，我們是需要教育一下，并没有説要對他進行處理。我們是怕事情處理不好，會影響楊毅的聲譽，更怕影響到你楊代總長的聲譽。要是弄得滿城風雨，影響好嗎？”

説到這裏，楊成武顯得很不耐煩。我就説：“那就這樣吧，你身體不好，耽誤久了，會影響你的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我和陳綏圻走的時候，楊毅還在那裏哭哭啼啼。趙志珍送我們走的時候，還一個勁地在那裏大聲叫喊：“要把楊毅弄出空軍也不要用這種辦法嘛！”

三月二十三日凌晨一點鐘，中央辦公廳突然來了一個電話，叫我到人民大會堂毛澤東那裏去參加一個會議。會議的内容没有通知，衹是説要趕快去。

我朦朦朧朧地上了汽車，到了人民大會堂時，會議早已開始了。我看到在場的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葉群和汪東興。這個會議原來没有要我參加，是臨時叫我去的。

毛澤東一見到我就説：“你同楊成武的問題，我都知道，你是對的，楊成武是錯的。”説完這些話，就没有再説了。過了一會兒，毛澤東問林彪：“這樣，誰來當這個總長呢？”

毛澤東這一問我才知道，原來在我來之前，他們就已經決定把楊成武拿下來了。我不禁大吃一驚，因爲在楊毅和單世充的問題上，即使他全是錯的，也不致于受到這樣嚴重的處理！除了空軍這件事情以外，是不是還有别的問題？這樣處理是不是太重了？我當時也不敢多問。

林彪聽了毛澤東的提問以後，想了一下説：“現在也没有别的人選了，是不是調廣州軍區司令黄永勝任第一副總長或者是代總參謀長。”毛澤東又問：“黄永勝是從哪裏來的？”林彪回答説：“黄永勝是武漢警衛團的一個班長。秋收暴動以後，就跟你上了井岡山，上山以後當了排長。”

毛澤東聽到這話，特别高興，説：“原來是武漢警衛團的，在井岡山就當了排長，那就不要這個‘代’字了，就叫黄永勝當總長吧，就這樣定了。”他們兩人這樣一説，誰都没有意見，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

可是對余立金怎麽處理呢？毛澤東説：“許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這裏來了，説余立金是個叛徒。既然是這樣，那就逮捕起來，予以審查吧。”

接着，江青又提出來，北京軍區和北京衛戍區這兩個崗位很重要，傅崇碧和楊成武的關系又一直很密切，一直都在楊成武的直接指揮下工作，况且傅崇碧還帶人衝過釣魚臺。爲了防範，還是動一動爲好。毛澤東也同意了。那麽調到哪裏爲好呢？最後決定調到沈陽軍區當副司令。這樣北京衛戍區的司令由誰來擔任，又成了問題。經林彪提議，毛主席决定，調廣州軍區副司令温玉成任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毛主席還説：“至于北京軍區司令鄭維山就不要再動了，動得太多不好，但是要找他談一談，把問題説清楚。”

這幾個人事問題决定了以後，毛主席就對林彪説：“下面的事情，就交給周恩來去處理，我們兩個退出會場，休息去吧。”

毛澤東和林彪走後，周恩來繼續主持我們開會。周恩來的組織能力很强，考慮問題非常周密。在他的主持下，會議繼續討論和决定了五個問題：

第一、要我立即派飛機去廣州，最遲要在當天上午把黄永勝接到北京來。黄永勝到北京以後，衹準我一個人用自己的車去接，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去。從機場出來，直接回到人民大會堂，路上什麽也不要説。到人民大會堂以後，周恩來在福建廳親自找他談話。

第二、通知李作鵬和邱會作兩個人，帶領中央警衛團的部隊，到楊成武的家裏去，把楊成武帶到人民大會堂來，由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集體跟他談話。

第三、通知鄭維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會堂來，由周恩來找他們談話，同時準備飛機把傅崇碧送到沈陽。沈陽方面，通知沈陽

軍區司令員陳錫聯作好安置傅崇碧的準備工作。

第四、要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帶領警衛部隊到空軍大院，執行逮捕余立金的任務，逮捕後送秦城監獄關押。同時，通知公安部，作好接收準備。我問周恩來說："夜深人靜，這麼多的人闖到余立金家裏，動靜太大了。"周恩來說："你想個辦法嘛！就說你要找他談話，把他找到你家裏來好了，我交代楊德中帶警衛部隊在你家裏等，你負責要秘書通知余立金到你家裏來就行了。"

第五、決定于三月二十三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駐京部隊團以上幹部會議，傳達中央對楊、余、傅問題的決定。

周恩來布置完這些事情以後，就要我先回空軍大院，一是安排飛機到廣州接黃永勝，二是協助楊德中逮捕余立金。回到空軍大院以後，我立即通知指揮所安排飛機，同時給黃永勝打了一個電話。我奉命轉告他，說中央決定要他立即到北京來，飛機可能很快就到廣州，請他作好準備，等飛機一到，就立刻隨機前來北京。

處理完這件事情，我回到家裏，通知空軍副參謀長梁璞和警衛營長田廣林到我家裏來。這個時候，楊德中也已經到了。我們一起商量好，由他帶領警衛團的人在我家的院子裏等候，等余立金一來，就執行逮捕任務。接着，我要秘書通知余立金，請他到我家裏來一下，說我有事情要同他商量。

然後，我就到了樓上的陽臺觀察動靜。院子裏黑黝黝、靜悄悄的。等了一會兒，我看見余立金走進了院子。這時，楊德中上前對他說："余立金，你被逮捕了！"緊接着幾個警衛戰士走上前去，把他帶走了，没有驚動任何人。

接着，我又通知空軍黨辦和空政保衛部對余立金的家進行搜查和監視。這時，余立金的秘書打電話到楊成武家裏，說，吳司令半夜裏把余立金政委抓走了，想問問楊成武，這是不是吳法憲搞的政變。當時楊成武正在睡覺，衹是秘書聽到了這個情況，没有驚動楊成武。

大約就在同時，由李作鵬和邱會作帶的部隊也到了楊成武的家，把楊成武帶到了人民大會堂。以後聽李作鵬和邱會作談起，他們到楊成武家，要楊成武跟他們走時，楊成武還以爲是我伙同李、邱在搞政變呢。

我把兩件事情辦完以後，就又回到了人民大會堂，此時已是拂曉，天快亮了。周恩來正在帶領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成員同鄭維山談話。周恩來見我來，就叫我也一起參加。我坐下後聽見周恩來告訴鄭維山，楊成武犯了錯誤，已經被撤銷了代總參謀長的職務，要鄭維山與楊成武劃清界綫，揭發他的錯誤。

接着，周恩來又帶領我們一幫人找傅崇碧談話，不過這次談話是由林彪親自主持的。林彪説："現在向你宣布中央的決定：爲了加强沈陽軍區的領導，任命你爲沈陽軍區的第一副司令，副總參謀長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衛戍區司令，接替你的工作。由吳法憲同志派飛機，送你到沈陽去。"

上午十時左右，林彪、周恩來又帶領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全體成員找楊成武談話。林彪第一個講話，他說："今天找你談話，主要是處理你的問題。你的錯誤是什麽呢？主要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和'曲解馬克思主義'。你和傅崇碧勾結在一起要打倒謝富治，和余立金勾結要打倒吳法憲。還想排擠許多和你地位差不多的同志，如許世友、韓先楚、黃永勝等。主席親自主持了四次會議，討論了你的問題，決定撤銷你的代總參謀長職務和總參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

楊成武當時想申辯幾句，但没有容他多講，林彪就接着對他說："你先不要回家了，人大會堂已經給你找了一個住的地方，你先在這裏休息。中央已經決定，要你離開北京，住到武漢東湖去。可以帶上你的全家，包括你的母親、老婆和孩子一起去。要用的東西也可以統統搬走。你到那裏一方面好好反省自己，也好好休息一下。"

林彪當場命令我，準備飛機把楊成武一家送到武漢去。同時，要我通知武漢軍區立即作好準備。談話完畢後，林彪、周恩來、

陳伯達、江青等人便同楊成武一一握手告別。

楊成武走了以後，林彪同周恩來一起商量，要我負責清查楊成武所有的文件，并封存備查。這時，江青在會議上又提出，是不是把余立金的妻子陸力行也一起收審，以便徹底清查問題。陸力行的姐姐原先在上海市檔案館工作，上海市有關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材料都是由她姐姐保管的。在此之前，江青已叫人將陸力行的姐姐收審了。對江青的這一提議，在座的人沒有一個人表示反對，于是就算通過。陸力行被抓起來以後，可能被關押在北京市第二監獄。

從大會堂回來，我按照林彪的命令，立即通知空軍指揮所準備一架大飛機，把楊成武一家人和家裏的東西一起送到了武漢。

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兩點左右，去廣州接黃永勝的飛機即將降落在西郊機場。我接到報告以後，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立即坐車去接黃永勝。

黃永勝下了飛機，顯得有點緊張。因爲他一路上都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爲什麽這樣緊急要他來北京。由于周恩來曾明確交待過在路上不要對他說什麽，我祇好含含糊糊地對他說："三言兩語也說不清，總理在人大會堂等你，由他親自和你談，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我把黃永勝送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後不久，林彪又找我談話。他對我說："現在總參的問題和北京衛戍區的問題都解決了，空軍政委的問題怎麽辦？你可以考慮一個能同你合作的人選。"我想了一下說："現在空軍没有別的人了，祇有一個王輝球。他是從井岡山下來的老同志，現在任空軍副政委，提他任空軍政委，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王輝球在空軍的時間也很長了，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原來空軍是兩個副政委，一個是余立金，一個是王輝球，現在余立金不行了，那麽就是王輝球吧。"林彪聽了很高興，說："很好，提一個反對過自己的同志當政委也是很好嘛！你寫個報告來吧。"

回去以後，我立即寫了一個報告。不久，這個報告經過林彪

報毛澤東批准，王輝球就正式接替余立金當了空軍政委。

三月二十三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裏召開了駐北京各部隊團以上幹部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一萬多人。這個會議從晚上九點，一直等到了二十四日凌晨才開始。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全體成員，以及剛剛到北京的黃永勝，都出席了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

林彪在會議上首先講話。林彪的這個講話，事前和毛主席商量過，毛主席要林彪一共講三個問題：一是反對宗派主義，二是反對兩面派，另外一定要講一下哲學上的"相對與絕對"的問題。

林彪說："今天這個會是要向同志們宣布中央的一個重要的決定。最近我們黨的生活中間又出現了新的問題，發生了新的矛盾，發生了階級鬥爭中新的情況。這個問題雖然没有像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那樣大，但是比其它一般的問題要大一些。所以毛主席說這是一個不大不很小的問題。這就是說最近在空軍裏面發生了楊成武同余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排除韓先楚、排除黃永勝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裏，最近接連開會，開了四次會，主席親自主持的。會議決定撤銷楊成武的代總長的職務，要把余立金逮捕起來法辦，撤銷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的職務。決定由黃永勝同志當總參謀長，決定由温玉成副總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

接下來，林彪講了楊成武個人所犯的錯誤，認爲他的錯誤主要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和曲解馬克思主義"。之後，林彪又遵照毛澤東的意見，重點從哲學上講了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的關系，批判了楊成武所署名的"大樹特樹"那篇文章。

周恩來接着講話，表示完全擁護"林副主席剛才宣布的我們偉大領袖、偉大統帥毛主席的英明決定和命令"。他還在講話中要大家永遠忠于中央文革，號召大家繼續揭發楊成武等人的錯誤，認爲在楊成武的後面可能還有黑後臺。

周恩來講完話，是江青講話。她的講話不長，衹是表示了"完全擁護林副主席所宣布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命令。"

陳伯達的講話稍長一些，他除了表示"完全擁護林副主席所宣布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命令"以外，還回顧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過程。他認爲，從"文革"開始到一九六八年三月，一共經歷了五個回合。第一個回合是揭發了"彭、羅、陸、楊"；第二個回合是打倒"劉、鄧、陶"；第三個回合是"二月逆流"；第四個回合是清除"王、關、戚"；第五個回合就是這次與"楊、余、傅"的鬥爭。他在講話中還就批準發表楊成武的文章作了自我批評，説由于楊成武不斷地催促，就讓這篇文章發表了。

接着是康生和姚文元講話。他們講完話後，時間已是凌晨一點三十五分了。就在這時，毛澤東從休息室走上主席臺，接見全體到會的軍隊幹部，以表示對處理"楊、余、傅事件"的支持。看見毛澤東走上主席臺，全場頓時沸騰起來，到會的軍隊幹部長時間高呼"毛主席萬歲"、"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等口號，場面十分熱烈。

這次會議開過以後，本以爲事情就到此爲止了，没想後來又召開了一次更大的會議。這次大會是江青提議召開的，原因是出自一件小事情。駐京部隊團以上幹部會議的第二天，江青給温玉成寫了一封信。這封信送到北京衛戍區收發室時，收發室的人説："我們這裏衹有一個傅司令，哪裏又來一個温司令！"他們把江青的這封信退了回去。這個情況反映到江青那裏後，她大爲惱怒。就在當天晚上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江青提出，要單獨召開一個衛戍區的幹部和地方幹部一起參加的會議，對"楊、余、傅"問題進行傳達。這樣，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又决定召開了第二次大會，傳達中央的兩個命令，即撤銷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職務和黄永勝、温玉成任職的命令。另外，會議還决定，這兩項命令都發到解放軍團以上單位，并向全體指戰員宣布。

第二次大會是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參加者約有十多萬人。大會首先宣布了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名義發布的《關于撤銷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職務的命令》。命令説："楊成武犯有極嚴重錯誤，决定撤銷其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職務，并撤銷其中共中央軍委常委、軍委秘書長、總參黨委第一書記職務"；"余立金犯有極嚴重錯誤，又是叛徒，决定撤銷其空軍政治委員、空軍黨委第二書記職務"；"傅崇碧犯有嚴重錯誤，决定撤銷其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職務"。接着，又宣布了黄永勝、温玉成任職的命令。兩個命令宣布完畢，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等相繼講了話。

楊成武到了武漢之後，衹住了一個星期就暴露了。很快，武漢的紅衛兵就準備包圍楊成武的住地，把楊成武抓走批鬥。這個情況報告給中央文革以後，經碰頭會議研究，又把楊成武一家轉移到了河南的龍門，并在那裏住下了。

至于楊毅，由于她已經不能在《空軍報》工作，我們把她調到四川的一個航校當了幹事。但是楊成武的事情對她刺激實在太大，她到了四川不久就吞服安眠藥自殺，好在發現及時被搶救了過來。楊毅自殺的這件事，我報告了林彪。林彪説："那就把她送到楊成武那裏，讓他們全家住在一起吧。"按照林彪的意見，我派人把楊毅送到了龍門。至于那以後的情況，我就不知道了。

以後空軍黨辦主任王飛還向我提出，要把我的兩個和單世充關系比較好的秘書調到五七幹校去，我没有同意，在一般的情况下，司令員的秘書和政委的秘書關系比較好是正常的，完全没有必要爲此擴大打擊面。

"楊、余、傅事件"以後，葉群對我説，"要防止'後院起火'，你要把陳綏圻調到空軍來，替你管管家。"不久，葉群就通過軍委辦事組，把當時任中國民航局生産計劃處處長的陳綏圻調到了空軍，任"吴法憲辦公室"主任。與此同時，對黄永勝、李作鵬、邱會作的妻子，也同樣作了相應的安排。

一次，林彪還曾經要葉群對我解釋，説當時爲什麽没有提我當總參謀長，是因爲我的資歷不够。我當時就對葉群説："我自己做夢也没有想要當這個總長。我當不了總長，這一點自知之明

還是有的。”我說這個話，主要是因爲我看到，建國以來有好幾個總長倒臺了，如黄克誠、羅瑞卿和楊成武，甚至包括粟裕。

黄永勝接替楊成武任總參謀長以後，軍委辦事組進行了改組。改組後的軍委辦事組由黄永勝任組長，我仍任副組長，成員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劉賢權、李德生、温玉成。同時周恩來宣布，改組後的軍委辦事組所有成員，都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同時中央文革碰頭會議還决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政工小組，劉錦平被調回民航局工作。

關于恢復總政治部，是江青在一次碰頭會議上提出，要李德生任總政治部主任。林彪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要軍委辦事組寫出報告，上報毛澤東。毛澤東很快就作出了“同意”的批復。這樣，李德生就被任命爲總政治部主任。以後，李德生的兼職很多，既是總政的主任，又是北京軍區的司令員，還是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國務院業務組成員等。

“楊、余、傅事件”以後的人事變動，就大體上是如此。我所知道的楊、余、傅事件就是這些情况。

“楊、余、傅事件”發生後，我曾經冷静地想過，要説楊成武通過余立金奪我的權，那是缺乏根據的，以此爲理由就撤了他的職，太過牽强，也太過嚴厲。至于逮捕余立金，以至牽連到他的妻子陸力行，那更是不應該的了。這裏面可能還有更深的原因，但究竟是什麼原因，我現在也依然不知道。

二、中央文革碰頭會進一步分裂

毛澤東常説，“黨外有黨，黨内有派，歷來如此”。軍委辦事組全體成員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以後，江青就開始對軍委辦事組不斷尋釁鬧事，從而導致中央文革碰頭會議開始分裂。

當時，中央文革碰頭會議裏明顯分爲兩派，一派是江青、康

生、張春橋、姚文元，另一派是黄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至于陳伯達、汪東興、李德生、温玉成等其他人，則在兩派的鬥争過程中，或逐漸向兩派分化，或保持“中立”。

黄永勝出任總參謀長以後，我們與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對立逐步明顯。主要是江青想通過黄永勝來抓軍權，但黄永勝根本不理江青那一套。黄永勝認爲，軍委辦事組衹對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三個人負責，不對中央文革負責。于是江青就認爲黄永勝對她不够尊重，認爲總參謀長的人選不够理想。相反，黄永勝則認爲江青不聽毛澤東的話，不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辦事。由于認識上的分歧和立場上的不同，到了五月份就出了事情。

在“文革”期間原來有規定，軍委辦事組調動一個排以上的兵力執行任務，都要通過毛主席、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這樣的報告上要寫一大串名字，要等所有的人都閲讀完畢，所有的人都畫了圈。兵力調動才能够實施。

一九六八年五月，毛主席在一份報告上批示説：“象這樣的報告，衹要寫上三個人（即毛主席、林彪　周恩來）的名字就可以了。寫上一連串的名字，既使行動遲緩，又容易泄密。”

有了毛澤東的這個批示，黄永勝和我們當然就這樣做了。可這樣一來，由于得不到有關部隊調動的報告了，江青心中大爲不滿。一天晚上，她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突然破口大駡：“黄永勝、吴法憲，你們目無中央，無組織、無紀律，搞獨立王國，封鎖消息。”她還提出，要停止黄永勝和我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資格，讓我們清理思想，寫出檢討。會後，周恩來、康生、姚文元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找黄永勝和我談話，要我們兩個人檢討錯誤，并暫時停止工作。

下來以後，我們把事情向林彪作了匯報。林彪認爲，調動部隊的報告如何上報，要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辦，我們無權作出變更，更不能寫檢討。黄永勝也認爲，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没有錯，不能寫檢討。就這樣，彼此之間僵持了半個月之久。我們不作檢討，他們就不讓我倆參加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讓我們“靠邊站”

了半個多月。

正巧，在此之前，中央曾決定由黃永勝作爲中國黨政代表團的團長，率團出訪阿爾巴尼亞。出訪的日期到了，但因黃永勝堅持不作檢討，江青就是不讓黃永勝出國訪問。由于時間緊迫，而且外交部早已經將代表團的成員通知了阿方，臨時換人也來不及了，于是周恩來祇好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説話了，他説："江青不對，黃永勝仍然應當出訪阿爾巴尼亞。軍委辦事組没有錯，仍然應當正常工作。黃永勝、吴法憲還是碰頭會成員，仍然應當照常參加會議。" 周恩來把毛澤東的意見傳給江青，江青没有辦法，祇好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辦。

不過事情并没有完。黃永勝出訪前的頭一天晚上，周恩來決定由陳伯達到機場送行和迎接。但黃永勝走時，陳伯達没有去送；黃永勝回國時，陳伯達還是没有去接。爲此，周恩來追查陳伯達爲什麽不去。陳伯達説，是江青不讓他去，所以他不敢去。可見江青當時霸道到了什麽程度！

黃永勝回國後的第二天，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號"召開會議。在江青没有到會以前，毛澤東對我們説："你們怕江青，不敢抵抗。你們没有錯，而是她錯了。我歷來對她的方針是，她對的我就采納，她不對，我就批評。今後你們不要全聽她的，她做得不對，你們要抵抗，要鬥爭。要批評。" 不久，江青到了場，毛澤東就再没有説這件事情了。

在我們與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後，周恩來爲調解江青和軍委辦事組之間的矛盾，真是費盡了苦心。有一天晚上，周恩來把黃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叫到釣魚臺十一號樓江青的住處去開會。會前，周恩來告訴我們，這次要和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一起，開一個團結的會議，消除彼此之間的誤會，緩和一下氣氛。他還特別告誡我們，不論江青説什麽，都不要吭聲，不要説話。

我們來到江青住所時，周恩來要我們在樓下等候。一會兒，看見江青出來，周恩來趕緊上前去扶着她下樓。見到了我們，江

青一邊下樓，一邊開口罵道："你們軍委辦事組的人，身穿的綠軍裝，頭戴的紅五星，領子上的紅領章，這些都是老娘給你們爭來的。你們目無中央，目無組織紀律，不覺得可恥嗎？"

江青的脾氣很大，一罵就是個把小時，滔滔不絶，姚文元也那裏不斷地幫腔。因爲有周恩來的囑咐，祇是爲了團結，我們就一直站在那裏，聽江青訓斥，一聲没吭，忍氣吞聲，啼笑皆非。當晚十一點鐘就散會了。

過了三、四個小時，大概是次日的凌晨三點左右，我們都躺下休息了，突然之間接到周恩來的電話通知，要我們立即到釣魚臺十六號樓開會。我們到達十六樓時，周恩來已經在門口等着我們了。他一個一個地囑咐我們説："我已經把剛才會議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責備江青太放肆了，要她立即向我們作出檢討。" 之後，他又特别向我們强調説："江青檢討，你們就不要再説什麽了。不要再反駁她，聽她講就是了，她説完就散會。"

當時，我們幾個人都還好，就是黃永勝因吃了安眠藥，腦子糊裏糊塗，説話也不清楚，是閉着眼睛由警衛員扶着進的會場，坐在了周恩來的身邊。

會議開始以後，江青説："我近幾天身體一直不好，經常發燒、説胡話，神志不清，錯怪了軍委辦事組的同志們，特地向軍委辦事組和黃永勝同志道歉。請你們不要見怪，今後我們要好好地團結，一起共事。"

我聽了以後，忍不住説："江青同志的檢討，我們表示歡迎。但是江青同志先入爲主，偏聽偏信，出口傷人，主觀、片面地處理問題，值得引起警惕。" 汪東興也接着説："江青同志好訓人，隨便罵人，侮辱同志，這是最不好的。江青同志的錯誤，常委要負責，總理對江青同志太遷就了。"

江青聽了我和汪東興的發言，氣得臉色發青，表情很難看。周恩來就立即宣布散會。這件事情雖然暫時告一段落，但我們與江青等人之間的矛盾是越來越大了。江青對我們的不滿，林彪看得很清楚。一次林彪對我説："江青説了，第一步是拿掉楊成武，

第二步是拿掉你吴法憲。”

江青爲了分化我們，就想方設法拉攏軍委辦事組的人。她看中了温玉成。還在温玉成剛剛到北京，江青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碰頭會上當面向毛澤東提出，讓温玉成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毛澤東當場表示了贊同，并説：“我也有這個意思。”這樣，别人也就無話可説，事情就算通過了。我想這也是江青和毛主席事先商量好的。也就是以後所説的摻沙子。

接着，一九六八年五月，就發生了這樣一件事。當時，温玉成對軍委辦事組會議，要麽就是不參加，要麽就是唱對臺戲。看到這種情况，我對黄永勝説：“温玉成變了樣了！”黄永勝有個秘書叫李必達的，原來是温玉成的秘書。他這個人很有心計，平時對我們説的話都暗中留意，聽到我們説江青以及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的話，就記下來，集中起來，寫成個“小報告”，説黄永勝、吴法憲等人是“反對江青同志的小集團”。然後，他把這個“小報告”送到温玉成那裏，温玉成便轉交給江青。之後，江青又將這個“小報告”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完，未作任何批示就轉交給了林彪。林彪就又轉給了黄永勝。

黄永勝看了這份“小報告”，十分生氣，認爲温玉成太絶情，竟然在我們中間使用特務手段，把這樣的報告送給江青，險些釀成大禍。于是他和我商量，决定對李必達采取措施，由我派飛機把李必達送到廣州去軟禁起來。

到了此時李必達仍然不死心，在被送往廣州的飛機上，他又悄悄地把一個《毛主席語録》本丢在他的座位底下，上邊寫了幾行字，説黄永勝、吴法憲等人是反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團，希望檢到這個語録本的人，能把它送給江青同志，并希望江青同志能救救他。飛機到達廣州以後，機上的服務員在搞衛生時，檢到了這個語録本，回到北京就立即交給了空三十四師師長胡萍，胡萍又交給了我，我馬上轉給了黄永勝。

在這件事情上，由于毛澤東没有明確表態，這一事件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

在我們同江青的矛盾公開化以後，中央文革的一些人也逐漸轉向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按説是應當和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站在一起的，但這時却向我們靠攏。經過兩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這時衹剩下了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五個人，而在這五個人中間，陳伯達經常處于孤立的地位。江青等人對他都看不上眼，認爲他不過是一個書呆子，辦不了什麽事情，經常對他冷潮熱諷，語帶譏刺。江青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就多次鼓動批判陳伯達，而且動員我們幾個也一起參加批判。可是林彪認爲，陳伯達還是有理論水平的，過去中央的多次重要文稿，都是出自陳伯達之手。由于林彪不贊成無端地批評陳伯達，我們在江青等人批評陳伯達的會議上，就都不表態。這樣一來，陳伯達便與我們的來往多了起來。

汪東興也是同我們比較接近的一個。至于汪東興和林彪接近的起因，是因爲林彪對汪東興的工作經常給予支持。江青對汪東興向來都極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駡，把汪東興當成了她的出氣筒。那個時候，江青對毛澤東經常采用突然襲擊的方式，來干預毛澤東的生活和身邊工作人員的使用，這使負責毛澤東日常生活的汪東興夾在江青和毛主席之間，處境十分尷尬。

一次，江青要求調走毛澤東身邊的一個工作人員，由于毛澤東没有明確表態，汪東興不敢擅自做主。于是，江青便破口大駡，李納也在一邊幫腔。汪東興實在没有辦法了，就跑到林彪那裏，把這個情况告訴了林彪。林彪要汪東興直接報告毛澤東和江青，就説：“是林彪説的，毛主席用什麽人，誰也不能干預，完全由毛主席自己决定，江青不能干預毛主席的生活問題。”汪東興把這些話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很高興。正是由于林彪對汪東興的工作給予了支持，汪東興和林彪之間的來往也逐漸多了起來，有了難事，就經常來找林彪幫忙。這樣，也就基本上與我們站到了一起。

這樣一來，在中央文革碰頭會議上，兩個對立的陣營就逐漸分明了。

三、 八届十二中全會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關于對徵徇召開“九大”的意見的通報》。《通報》説：“關于‘九大’開會的時間，多數同志建議明年秋天國慶節前召開。‘九大’過後接着開‘人大’，把劉少奇罷掉，解决國家主席問題。”

但由于種種原因，原定在一九六八年國慶節以前召開的“九大”，没有開起來。于是，毛澤東提議，先召開八届十二中全會，把劉少奇的問題解决了，并將這個會議作爲召開“九大”的預備會議。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黨的八届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是一次極不平常的中央全會，全會應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一百九十五人，但實際上祇到了五十九人。在没有出席的一百三十六人裏面，除了有十人去世以外，絶大多數都已經被打倒了。在這種情况下，參加這次會議的還有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和各大軍區的負責人和中央直屬機關負責人，共七十四人。所以，實際與會人數爲一百三十三人。

在十月十三日的全會開幕式上，周恩來首先宣布了全會的議事日程，一共三項：一、討論和决定“九大”代表産生的指導思想及辦法；二、討論《中國共産黨章程（草案）》；三、進行專案審查，特別是對劉少奇專案的審查工作。

毛澤東在開幕式上講了話。他説，這次“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産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要搞到底，還是不搞到底？大家議一議。過去我們南征北戰，那種戰爭好打，因爲面前的敵人很清楚。這回“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比那種戰爭要困難得

多。問題是犯了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還搞不清楚，祇好一個省一個省地解决。這場“文化大革命”都要搞到底。什麼叫搞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各項任務，都要徹底完成。把這些任務都搞完，估計要搞三年時間。也就是説，到明年夏季就估計差不多了。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會上一共講了兩次話。他的這兩次講話，都没有講話稿，也没有經過中央文革碰頭會的討論。他還是按照自己的老習慣，事前祇準備一個提綱，然後在會議上即興講演。他説：“‘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他還説，我們國家的面積相當于整個歐洲，我們一片紅就等于歐洲一片紅。

他還在講話中談到了世界文明史上幾次文化革命運動。他認爲，第一次是古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發展，影響了人類文明上千年。第二次是十四、十五世紀在意大利首先興起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産生了資産階級文明，使歐洲進入了繁榮時代。但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次“文化大革命”，其偉大的歷史意義，要遠遠超過古希臘、羅馬文明的産生和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

林彪講話時，毛澤東頻頻點頭，并不斷勸林彪休息一下再講。看來，他欣賞林彪的講話。

全會討論了劉少奇專案組提交的《關于叛徒、内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這個報告認定，劉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曾三次“叛變革命，投降敵人，充當内奸、工賊”。同時，全會還根據康生等人的提議，専門用了幾天的時間，又批判了一次“二月逆流”。

最後，八届十二中全會通過了《關于“九大”代表産生的意見》、《關于“九大”主要議程的决定》、《關于〈中國共産黨章程（草案）〉的决定》、《關于叛徒、内奸、公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并一致通過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内外一切

職務的决定》。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中共中央還没有開除過任何人的黨籍，但是從劉少奇開始，第一次使用了“永遠開除黨籍”的辦法。盡管後來事實證明這一切是錯誤的，但是當時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反對意見。

全會以後，江青還準備以“美國特務”的罪名，把王光美判處死刑。但毛澤東說：“王光美縱然是特務，也要留活的證據。在延安我就不贊成殺王實味。要刀下留人。”以後，周恩來在一次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傳達了毛澤東的這一指示，江青才不得不放弃了這一打算，使王光美得以幸存下來。

在全會上還批判了“二月逆流”。這一點，我已在前面關于“二月逆流”問題的章節裏講過了。

十月三十一日全會閉幕。在閉幕式上，毛澤東再一次講了話。他說：“有些同志對‘二月逆流’這件事情不大了解，經過十多天的時間，就比較了解了。在這個會議上，先由犯過錯誤的同志說明他們的問題；然後大家對他們有些質問，他們再説明問題。這樣經過幾次反復，大家就都比較清楚了。這件事情嘛，要說小，就不那麽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麽十分了不起，也没有什麽了不起。他們有意見要說，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有些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内生活許可的。他們是公開出來講的，不是在背後私下議論的。在這個世界上面，總是有左、中、右。通通是左派，我就不贊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們如果不參加，我看就是個缺點。對于黨内的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階級隊伍’，要注意一個‘準’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對于學術權威，注意不要做得太過分，馮友蘭、翦伯贊可能還有某種用處。批是要批的，但保還是要保。對鄧（小平），有人說開除黨籍，我有一點保留，他和劉（少奇）還是有區别的。”

閉幕式上，還通過了全會的公報。公報宣布：“全會認爲，經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

爲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全會决定在適當時候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這次全會快結束的時候，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向毛澤東提出，批判“二月逆流”應當成爲傳達八届十二中全會的一個内容。毛澤東同意了他的這個意見。

四、九大

八届十二中全會以後，我們就立即緊張地投入了“九大”的準備工作。首先是準備“九大”的政治報告。在八届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曾親自指定由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報告。會後，林彪便考慮組織他自己辦公室的秘書構思報告的初稿。後來毛澤東又認爲，這個報告非常重要，要在這個報告裏很好地總結出“文化大革命”各方面的經驗。所以，他又指定陳伯達來協助報告的起草工作。對此，林彪很高興。

當陳伯達去請示林彪時，林彪提出了自己看法和意見。根據林彪的這個意見，陳伯達拉了一個提綱，并將政治報告的標題定爲《把我國建設成爲强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不久，陳伯達寫出了報告的第一部分。在這部分裏，陳伯達强調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義，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産力，提高全國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把中國建設成爲强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當這一部分拿到毛澤東主持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討論的時候，被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他們說成是“唯生産力論”。毛澤東贊成他們的説法，認爲陳伯達的這個稿子過分强調生産，没有突出革命，没有階級鬥争，不能用。

這一下就把林彪和陳伯達原來關于“九大”政治報告的共同構思推翻了。周恩來在會議上不敢表態，而黄永勝和我們幾個人

多半祇是聽會，總感到人微言輕，講話無足輕重，而且没有發言權。反正都是毛澤東説了算。因此，毛澤東就把陳伯達的稿子給推翻了。之後，毛澤東提出，另外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三人組成起草小組，重新寫。

這件事情再加上前面説的八届十二中全會林彪關于文化革命是文藝復興的講話，反映了林彪對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革命"的目的和作用，理解上有偏差，漸漸的毛主席也考慮到林彪并不是他的思想和路綫的理想繼承人，實際上堅定地執行他的思想路綫的正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祇是把我們全都蒙在鼓裏了。

大概過了半個月，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三人寫的稿子第一部分出來了，題爲"關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準備"。在這一部分裏，康生等人用了很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的話，來論證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後，就是回顧"毛主席的無産階級革命路綫"幾十年來粉碎劉少奇等人的"修正主義路綫"的鬥爭。出乎我們的意料，毛澤東看了這一部分認爲可用，要他們稍加修改後，提交中央常委擴大會議討論。

在毛主席主持的討論會上，大家沉默没有人發言。祇有陳伯達提了一點意見，陳伯達説："還是應當搞生産好，發展生産提高勞動生産率。光搞運動，就象伯恩斯坦所説的'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陳伯達這個話一説出口，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非常緊張，怒目而視。毛澤東一聽，則勃然大怒，説："'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這樣急呢？祇有半個月的時間，你就要報復了！帝國主義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馬列主義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你陳伯達的本質也是不會改變的。在延安時期，你脚踏兩隻船，原來説願意給我當秘書，後來又説願意給張聞天當秘書。一九五〇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兩隻船。你没有報告，也没有經過我的批準，就去見蘇聯領導。是不是看我這條船快要沉了，就趕緊去大抓一把？"

毛澤東一講這番話，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大爲高興，而陳伯達却大爲緊張，連林彪和我們幾個人也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不吭一聲。周恩來也没有説一句話。是啊，一有不同意見，就上綱上綫，就翻歷史的老帳，連幾十年以前的事情都兜出來了，誰還敢説什麼！

看大家都不發言，毛澤東最後説："此稿可用，請繼續寫第二部分。"説完，就散會了。

當天晚上，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動員大家批判陳伯達。爲此，他們在事前還向我們介紹了一些情況，説陳伯達有歷史問題，反對過魯迅的大衆文學，曾在天津被捕自首過，是個叛徒等等。但是黄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在會議上始終是一言不發，因此對陳伯達也就没能批判起來。

不久，報告其它幾個部分也都出來了。這幾個部分都經過毛澤東的一一修改，并在他親自主持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順利通過。

有了上一次陳伯達挨批的教訓，幾次討論誰都没有提什麼意見。祇有一次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討論時，江青提出應當寫一段中央文革小組的功績。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馬上響應，祇有陳伯達不贊成，説中央文革小組祇是一個辦事機構，無功可寫，一切都應當歸功于毛澤東。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不表態，我們其他人也不吭聲。這件事最後反映到了毛澤東那裏，毛澤東説："應當寫上一段，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連中央文革小組都不寫一段，于理不通。"

最後，又在政治報告裏補寫了一段關于中央文革小組的功績。

後來在這個"九大"政治報告的起草過程中，林彪始終没有參與一點意見。幾次討論，他都是一言未發，送到他那裏去的稿子，他也是一字未改，甚至連標點符號都没有動過一個。報告正式發表以前，張春橋曾經想請林彪簽個字，但被林彪拒絶了。

春橋不得已，祇好從《〈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裏描了一個林彪的簽字才算完了事。林彪對于“文革”的態度是越來越消極。

在“九大”即將開始之前，汪東興突然病倒了，住進了醫院。汪東興當時是“九大”籌備組的主要成員，幫助周恩來籌備“九大”，因爲毛澤東已將“九大”的具體組織工作，全部委托給了周恩來。汪東興往院之後，周恩來在一次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提出，由于“九大”的準備工作非常繁忙，希望我兼任“九大”秘書處的工作，幫助他處理“九大”的日常組織工作，會議通過了他的提議。

以後，我就參加了“九大”前的組織籌備工作和“九大”其間的會務工作，周恩來是秘書長，我是副秘書長，我完全聽周恩來的，他叫我幹什麽，我就幹什麽。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正式開幕，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二人。由于當時黨的各級組織還没有完全恢復，代表不是通過選舉，而是通過醞釀産生的，以至有個別非黨員也作爲代表參加了會議。這也是一種十分特殊的情況。

毛澤東主持開幕式并講了話。他説：“我希望，我們的大會，能够開得好，能够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然後，大會選舉了主席團，選舉毛澤東爲主席團主席，林彪爲副主席，周恩來爲秘書長。我也被選爲主席團成員，并被任命爲大會秘書處副秘書長。大會還通過了會議的三項議程：林彪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修改中國共産黨章程、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

接着，大會進行第一項議程，由林彪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由于林彪對整個報告有看法，從没有讀過一遍，所以讀這個報告的時候，有些地方讀得不太通暢，這引起了江青、康生的不滿。這是後話。

大會從四月二日起開始進行分組討論政治報告和黨章修改草案。

在會議快要進行到大會發言的時候，康生交給我一張名單，

要我去布置他們在大會上發言，我請示周恩來，周恩來説：“你就到幾個小組去跑一趟吧。”在這幾個人中間，第一個就是紀登奎。當時我不認識紀登奎，就通過劉建勛找到了他。事後我才知道，是康生提出要把紀登奎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因此才叫他在大會上發言亮相的。

四月十四日，大會舉行全體會議。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黄永勝、王洪文、陳永貴、孫玉國、尉鳳英、紀登奎相繼在會上發了言。在周恩來和康生的發言裏，除頌揚毛澤東以外，也贊揚了林彪，而且評價相當高。當周恩來在講話中稱頌林彪是井岡山會師的“光榮代表”時，林彪突然站起來説：“我没有什麽，一切都應當歸功于毛主席的英明領導。”

大會發言以後，全體代表一致表決通過了林彪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和《中國共産黨章程》。這個章程，不僅肯定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而且高度評價了林彪，説“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産階級革命路綫。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用黨章的形式來明確規定接班人，可以説在中國共産黨歷史上是空前絶後的。

最後，主持大會的毛澤東講了話。他在講話中很高興地表揚了孫玉國，認爲孫玉國三月二日和三月五日兩次在珍寶島指揮反擊蘇軍入侵的戰鬥打得好。

從四月十五日起，大會進入了第三項議程：醞釀和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這個選舉過程，始終充滿了鬥争。在大會召開之前，關于“九大”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的人選安排，其中中央、國家機關，各省、市、自治區，以及解放軍各占多少，已由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黄永勝等幾個人反復協商之後確定下來了。軍隊方面所占的比例比較高。

軍隊幹部占的比例高，是當時的特殊情況造成的。因爲“文革”開始以後，全國各地大亂。爲了穩定全國的形勢，毛澤東明令軍隊參加“三支兩軍”，這才使得全國的形勢逐漸穩定了下來。

以後在全國各地成立的各級“三結合”革命委員會中，領導職務基本上由軍隊負責人兼任。國務院各部門的負責人，也是軍隊幹部居多。這樣一來，在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候選人名單中，軍隊幹部也就比較多。

對此，江青、康生他們很有意見。他們主張要多安排一些地方造反派的頭頭。但是他們的意見没有通過，因爲許多造反派頭頭連共産黨員都不是，怎麽行呢？所以，他們的意見被否定了。

在選舉之前，一次葉群在同我們閑談時說：“林總講，現在江青太猖狂了。張春橋、姚文元過去都是榜上無名的小卒，現在的威望都這樣高，看來當選中央委員是没有問題的，但是要使他們的選票少幾張，不能讓他們得全票，以殺一殺他們的鋭氣。”

陳伯達接着説：“張春橋在上海不過是個小癟三。”黄永勝也説：“張春橋看不起我們，一次在機場公開説我們是大老粗，我當場回敬了他一句，説你在晋察冀不過是一個小記者。”在這以後，我們按照葉群傳達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軍隊有的人在選舉時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大會舉行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九大”代表共有一千五百一十二人，正式選舉時僅有兩人請假，因此當天有一千五百一十人參加投票。選舉結果，毛澤東得了一千五百一十張的全票，林彪得了一千五百零八票，周恩來得了一千五百零九票。據説林彪没有得全票的原因，是他爲了顯示與毛澤東有一定的距離，與葉群一起投了自己的反對票。不過，我没有問過，也没有聽葉群説起過，所以我説不清這是不是事實。

選舉結果，江青衹得了一千五百零二票，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也相應少了一些票。江青的選票不僅落後于葉群，也落後于黄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等。這一下，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的臉色都變了，康生的臉色甚至比江青的還要難看。在大家來到江蘇廳休息的時候，江青起哄了，大發雷霆，對我們喊道：“你們的選票比我們的多呀！你們軍委辦事組的人威信高，老娘得票比你們少得多，難道你們對‘文化大革命’的貢

獻比我還大嗎？”對她的挑釁，我們大家默不作聲。

康生這個人向來比較鬼，對選舉結果發生了懷疑。于是，他和江青就派中組部的郭玉峰來大會秘書處查選票。他要郭玉峰先查主席臺上的選票，再查各個大區的選票，要查清楚究竟是哪個代表團少投了他們的票。

郭玉峰不通過周恩來和我，直接找到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説要來查票。王良恩不敢做主，立即報告了我，我又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和我都認爲，這種作法是違反黨章的。于是周恩來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聽了没有説話。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但在這些問題上，我們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方面，江青在這些問題上是一直和毛主席通氣的，毛主席是真正站在江青身後的人。

“九大”一共選舉出中央委員一百七十名，候補中央委員一百零九人，一共兩百七十九人，其中軍隊幹部約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中央委員會選舉以後，并没有按慣例立即召開九屆一中全會，而是間隔了幾天，主要是“醖釀”中央政治局和常委會的人選。毛澤東便指定周恩來、康生和黄永勝三個人，到各代表團去徵求中央政治局和常委會人選的意見。

對毛澤東的這個安排，陳伯達不滿意了。因爲他原來是中央常委，可這次毛澤東却没有指名讓他去徵求意見；而黄永勝不是中央常委，反而參加了三人小組。顯而易見，這個時候的陳伯達已經得不到毛澤東的信任了。

江青呢？也不大滿意，但是她又不敢反對，因爲她的資歷不行。毛澤東在當時當然不會指定她去參加這個三人小組。江青是很想當中央常委的，她看到黄永勝被指名負責這項工作，就認爲毛澤東可能要讓黄永勝當常委。于是，在黄永勝到中央還不到一個月的時候，就想把黄永勝拿掉的江青，馬上一反常態地變得對黄永勝非常熱情，想讓黄永勝提名她爲當常委。她找到黄永勝説：“我準備向毛主席提出，讓你當中央常委。”

没想到黄永勝却説："我做夢也没有想當這個常委，你千萬不要提。我哪方面都不够資格，才能、威信都比較低，無論如何都不行。我現在連這個總長都當不好，還能當常委嗎？我這不是謙虚，實在是幹不了，希望你不要向毛主席提出這個意見。誰當常委，毛主席自然會考慮，會作出安排的，我們去過多干擾毛主席不合適。"

江青找黄永勝出面提她當常委的事情不成，就找到周恩來，提出要安排鄧穎超和蔡暢當政治局委員，想要拉攏周恩來，讓周恩來提她當常委。她的建議，又被周恩來拒絶了，使她又碰了個釘子。接着，江青又找葉群，要林彪向毛澤東提出選江青當中央常委。對她的這個建議，林彪仍然拒絶了，說："一切聽毛主席安排。"這樣，江青想當中央常委的活動四處碰壁了。

其實，毛澤東對誰當常委的問題，早有考慮。康生曾向毛澤東提出要安排黄永勝當中央常委。毛澤東説："我没有意見，你們去安排。但是江青不能當常委。"另外，在一次由毛澤東主持的討論常委候選人會議上，毛澤東説："陳伯達不能當常委，他和我不合拍。至于黄永勝當不當常委，由大家討論。"但黄永勝還是堅决不幹。下來以後，他向林彪和周恩來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黄永勝説："黨内老同志多，選我當常委不得人心。"

我和黄永勝相交了幾十年，從我對他的了解來看，我相信他説的是真心話。説到這裏，不禁想到"九一三事件"以後，一些人説黄永勝"一心想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話。一個"一心想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人，居然放着現成的中央常委都不去當，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在黄永勝表明自己態度以後，林彪和周恩來經過考慮，都同意了他的這個意見。隨後，毛澤東也表示同意了。根據周恩來和我們大多數人的意見，毛澤東最後還是同意了陳伯達當常委。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九届一中全會正式舉行。毛澤東主持了這次會議，并提出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的全部候選人名單。這個名單裏包括了李先念和葉劍英。李先念很謙虚，當場表

態説："主席，我不能再當選了。"毛澤東説："行，要把你選上。"

以下是九届一中全會新聞公報公布的選舉結果：

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毛澤東、林彪
（以下按姓氏筆畫爲序）
陳伯達、周恩來、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員：
毛澤東、林彪
（以下按姓氏筆畫爲序）
葉　群　葉劍英　劉伯承　江　青　朱　德　許世友
陳伯達　陳錫聯　李先念　李作鵬　吴法憲　張春橋
邱會作　周恩來　姚文元　康　生　黄永勝　董必武
謝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紀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東興

在二十五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中，軍隊幹部也占了半數以上。原來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成員，除了温玉成以外，全部當選了中央政治局委員。

温玉成在軍委辦事組的時候，由于與江青比較接近，同大家關系就不够融洽，人緣不太好。九届一中全會進行選舉的時候，温玉成本來也是候選人之一，但得票比較少，特别是廣州軍區的一些同志都不選他，致使他落了選。選舉結果公布以後，温玉成很不滿意，認爲江青這個靠山靠不住，便同江青疏遠了，轉而靠向林彪和我們。江青看到這一情况，便提出要撤掉温玉成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職務，林彪同意了，建議把温玉成調到成都軍區任第一副司令員。林彪的這一建議得到了毛澤東的批準。

温玉成一家是由我派飛機送到成都的。温玉成臨走之前，在

軍委辦事組大罵江青，説江青是武則天，是慈禧太后，有了她，中國就不會太平。同時，他還揭發江青對他説過的一些話。後來，他又跑到林彪家裏去哭訴。林彪安慰他説："是江青要把你搞走的，我們不贊成這樣做。你到那邊好好工作一段時間再説吧。"

在九屆一中全會選舉中央軍委成員時，毛澤東提出，要選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當軍委副主席。他這樣一説，大家便熱烈鼓掌，于是這些人就都選上了。所以，在當時的人事安排上，基本上是毛澤東説了算，他點到誰就是誰。

劉伯承等幾位老帥盡管在九屆一中全會上仍被選爲軍委副主席，但以後還是没有參加軍委的日常工作。不過，"九大"以後，凡是毛澤東召集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幾位老帥都參加，而且一律坐在前排。毛澤東要接見群衆，特別是接見軍隊幹部，都要通知他們，讓他們隨毛澤東和林彪一起出場。如果當時他們有人在外地，也必定要我派飛機接他們回北京，使他們能參加接見。

另外，在"九大"和九屆一中全會上，李富春除了被選爲中央委員以外，其他什麽也没有選上；而譚震林和鄧子恢，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可見對他們幾個人，毛主席還是區别對待的。

"九大"以後，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是不存在了。雖然没有明令撤銷，但是在中央下發的文件中，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稱已經看不到了。

九大以後，中央政治局會議代替了中央文革碰頭會。會議仍然每天晚上由周恩來主持召開，毛主席、林彪一般情况下依然不參加。凡是政治局提出的問題和文件，或者是毛主席交議的事情，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以後，仍然由周恩來簽署，上報毛主席和林彪，得到他們批準以後執行。

五、與江青等人的分歧公開化

"九大"以後，政治局内部以軍委辦事組和原中央文革兩派鬥争就更加激烈和公開化了。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裏，鬥争主要是圍繞着批判陳伯達和江青等人企圖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而進行的。

林彪從内心裏是看不起江青、康生、張春橋和姚文元這些人的，這一點江青他們自己心裏也很清楚。但"九大"以前，他們還不敢把矛頭直接對準林彪。但"九大"以後，江青、康生等人對林彪的不滿愈來愈深。再加上"九大"以後，不論是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裏，還是在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區的領導中，軍隊幹部已經占了一個相當的比重，林彪的威望越來越高。爲了打擊軍隊和林彪的聲望，原中央文革的一些人，以江青爲首，開始公然把矛頭指向了林彪。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公開議論林彪在"九大"上作的政治報告念得不好，結結巴巴的。我們把這一情况告訴林彪以後，林彪表示説："我從來就不念别人的稿子，我衹習慣自己寫一個要點，在會議上即席講話。因爲這個報告是毛主席親自主持寫的，而且經過毛主席的多次修改，我不得不念。但我根本没有念别人稿子的習慣，所以我念得不够好。"後來，當我們向林彪説，張春橋、姚文元到處宣傳"九大"政治報告是他們寫的，説他們爲"九大"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還説陳伯達的筆杆子已經不行了時，林彪對他們嗤之以鼻。

以後，江青一伙人更加得寸進尺。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他們又公開提出要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説林彪的講話不突出階級鬥争，是貶低了"文化大革命"，從而把矛頭直接指向了林彪。這真是讓我們大吃一驚。林彪是可以隨便批的嗎？這樣把林彪放到了一個什麽樣位置上？真是無法無天！林彪

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已經過去半年了，有意見爲什麼當時不提？再説林彪的講話，已經對“文化大革命”作了高度的評價，説其歷史意義遠遠超過了文藝復興。江青對這樣講還不滿意，這真是吹毛求疵了！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江青這樣做，恐怕還是有人指使。

這時，江青又伙同姚文元，一起批注了俄國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主要是評論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些問題。江青和姚文元對這篇文章，逐段進行了批駁。他們是想借批判車爾尼雪夫斯基之名，行批判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講話之實。

江青竟然想拉軍委辦事組的人，來同她一起批判林彪的講話。一次我去外地檢查工作不在北京時，江青到京西賓館找到黄永勝、李作鵬、邱會作談話，説林彪的講話是不對的，要進行批判。黄永勝問她：“要批判林彪的什麼講話，是不是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江青説，林彪的那次講話，事先没有經過中央文革碰頭會的討論，也没有經過毛澤東的批準，没有經過充分的準備，衹是個人寫了幾條，脱口而出，必須要加以批判和澄清。

江青這一説，黄永勝、李作鵬、邱會作幾個就哼哼哈哈地裝糊塗。等江青一走，他們幾個人一商量，就趕緊跑到林彪那裏去報告林彪。林彪説：“讓她去批吧。不過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麼名堂。”

我一回到北京，黄永勝就告訴我説：“江青可能要找你。如果讓你去，你什麼話也不要講，哼哼哈哈地就行了。”我説：“好！”

果然，當天晚上江青就把我找到她的住地。當時江青住在玉泉山，我一到那裏，她就開始給我看她的照片，又叫我參觀了她給毛澤東準備的房間，然後才開始和我談批判林彪的問題。按照黄永勝的交待，我不對她的話表示任何態度，也是哼哼哈哈地對付。從江青那裏回來，我立即把這一情况告訴了黄永勝，黄永勝又報告了林彪。

江青看拉我們軍委辦事組的人員批判林彪没有得到響應，就

又把這件事情提到了政治局裏。她和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一連提了六、七次，要把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和他們的批注，印發到全國縣、團一級單位。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批判車爾尼雪夫斯基文章這件事，在全國範圍内批判林彪。在這些會議上，康生表示同意，而且認爲越快越好，但周恩來、陳伯達、黄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李先念、汪東興及葉群都一致表示反對。我們的意見占多數。

江青的這些活動，每次我們下來以後都報告了林彪。記得林彪曾有一次對我們説：“現在江青在中央是爲所欲爲，誰拿她也没有辦法。”後來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又提出要發這個文件。這一次，周恩來發了脾氣，他説：“江青同志，你要懂一點民主集中制，懂得一點集體領導的原則嘛！對這個問題，多數人不贊成，衹有你們三、四個人同意，就硬要往下發，這樣做行嗎？你屢次干擾大家，大家不同意，你非要通過，這是一種分裂黨的做法。而且，即使要往下發也要經過毛主席，要經過毛主席同意才可以。”江青當時有點意外，但也一時之間無言以對。這樣，他們才暫時放弃了批判林彪的活動。

在我們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幾個人的對立和鬥争中，我想説一説周恩來。周恩來一直都是我所尊敬和信服的人，在我們心目中德高望重。自“文革”開始以後，他一直都在任勞任怨、苦口婆心地顧全大局、支撑大局，處境十分艱難和不易。我感覺到，他和我們在思想感情上、在工作上，以及在反對江青種種干擾等問題上，都是一致的。當時，我們都在辛辛苦苦、實實在在地工作，而江青他們幾個却是在不斷地找事、發難。在這種情况下，我們時常因憤憤不平而同江青等人進行一番争鬥，可黨性原則强的周恩來，却一直對江青等人的刁難和無理取鬧，忍辱負重，没有對他們進行指責和批評。像上面那樣的情况可以説是少見的。我們心裏時常爲他感到很難過。

與江青等人關系相比，就我所見到和聽到的事情來看，林彪和周恩來個人之間的關系是很好的。林彪也非常尊重周恩來。這

裏，我說兩件自己所親身經歷的事情。

一件事是發生在“九大”期間，一次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湖南廳召集新聞單位的負責人開會，布置“九大”的宣傳工作。由于我是大會秘書處的負責人之一，就正好坐在康生和張春橋的身邊。開會時，他倆悄悄地對我說，“揪軍内一小撮”的口號，是周恩來批準的，《人民日報》上的社論也是周恩來審閱過的，所以這個口號的出籠，周恩來要負責任。

散會以後，我就把這個事情打電話報告了林彪，林彪聽了馬上要我去他家。我去了後，他對我說：“胖子，你不要上當！他們的目的，是要慫恿你出來反對周總理。你千萬要注意，這個話對誰都不能再說。‘揪軍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們提出來的，總理即使看過了，也可能是一時的疏忽，不能怪總理。我們黨内不能没有總理。我身體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針，毛主席正確方針的貫徹和組織實施，全靠周總理。周總理的角色我是幹不了的。看來康生還是想當總理的，是有這個心思的，你們要注意。周總理出國的時候，兩次由康生任代總理，但是據我看他是幹不了這個總理的。”

我說：“我過去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經驗，一些問題的利害關系也不大懂得，謝謝林總對我的關心。我一定記住林總的提醒，一定注意很好地協助總理工作。”

後來，我又向葉群建議，把這件事情告訴周恩來。不料葉群對我說：“我已經告訴周總理了。”盡管這樣，我還是在合適的時候，再一次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周恩來，想提醒他注意江青、康生等人的活動。聽了我的話，周恩來衹是笑了笑，什麽話都没說。

我非常佩服周恩來的這種氣度。他非常有涵養，遇事冷静，沉着大度，絶不會爲了什麽閑言碎語而受到刺激發怒。在這一點上，他確實值得我好好學習。

另外一件事是發生在“九大”以後。周恩來對林彪也很關心。一次，周恩來要我轉告林彪，是不是可以出去走一走，說是出去走走對身體有好處，不要老是住在北戴河或者是蘇州不動。我知

道林彪的脾氣，就有點猶豫，說：“這個話我怕不好說。”周恩來鼓勵我說：“你可以去試一試嘛！”以後，我找機會把周恩來的這個意思轉告給了林彪。林彪說：“謝謝總理的好意！但是我的身體實在是不行了，現在就連轉車也轉不了。”以後林彪還是没有出去。不過我看得出來，他對周恩來的好意是真心感謝的。

周恩來的批評并没有使江青有絲毫的收斂，相反，她的個人野心越來越膨脹，我這裏舉兩個例子。

一件事是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早上，葉群突然通知黄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四個人，到江青住處去開會。我們到了釣魚臺十一號樓以後，見到江青同姚文元在閑談。不一會兒，李德生也來了。李德生來了以後，江青就招呼開會。江青一共召來了六位中央政治局委員，連她自己，一共有七個政治局委員開會。江青說：“今天隨便同大家談一談，請大家不要作記録。”我們幾個都收起了筆記本，衹有李作鵬還是在一邊悄悄作記録。可一會兒就被江青發現制止了。

那天，江青一個人從上午九點一直說到了十二點，一氣說了三個小時。她主要講了三個問題。她首先是吹嘘她自己，從自己的家庭出身說起，說她和康生都是山東諸城縣的，以後上小學、中學，還在山東大學旁聽過。再以後，又參加了革命，從山東到了上海，與左翼文聯搞在一起，支持魯迅的“大衆文學”，反對王明的“國防文學”。抗日戰争爆發後，她到了重慶，見到了周恩來。在同周恩來一同乘飛機去延安的途中，飛機曾降落在西安，她還去華清池裏洗了個澡。

她還對我們說起了毛澤東在延安如何追求她的事情。她說，在未婚以前，毛澤東每天下午都騎着馬去找她，親自和她一同趟過延河水，一起閑游。毛澤東寫的文章，都是她幫助進行整理的抄寫的。一九四七年撤離延安的時候，她是中央直屬機關的教導員兼黨支部書記，一直跟隨着毛澤東在陝北打游擊。當時，他們住在老百姓家裏，和毛澤東一起吃派飯。有時汪東興買鷄給毛澤東改善伙食，但是衹給毛澤東一個人吃。由于長期的艱苦生活，

她的身體越來越虛弱，生了李納以後，就得了子宮癌。後來毛澤東同蘇聯商量，請他們派專機來，接她到蘇聯去治病。她在莫斯科住院以後，做了一次大手術，回國以後就同毛澤東分居一直到現在。

說完自己的事情，江青接着就開始攻擊周恩來。她說："周恩來有行政工作才能和組織才能，這一點我很佩服。但是大的原則問題上他看不清，容易跟着別人走，今天東風來了是東風，明天西風來了是西風。'文化大革命'中他辦錯了幾件事情，寫了檢討，現在還在我的手裏。'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他同中央文革唱對臺戲，衹主持中央常委碰頭會，不參加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後來中央常委碰頭會垮了，這才要求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周恩來這個人不能掌舵，不能當一把手。"

批完周恩來，江青又批判起了陳伯達。她說："陳伯達，小人也，讀書不少，但是具體事情一件也辦不了。當中央文革小組長，不會領導，沒有主張，中央文革碰頭會辦事全靠我和康生出主意。陳伯達在歷史上還有問題，他一貫追隨王明，公開寫文章擁護王明的'國防文學'。在天津的時候，曾經被捕過，還有托派嫌疑。"

江青對康生則半是吹捧，半是批評。她說："康生同志有遠見卓識，辦起事來很有魄力。他讀書多，有理論水平，看問題看得準，但就是實踐經驗少，做領導工作不內行。"

在江青一個勁地信口開河過程中，我們幾個人都是衹聽不說。衹有姚文元出來捧場說："江青同志的話對我們的教育意義很大，值得我們好好學習。江青同志的馬列主義水平高，我們一定要以江青同志爲榜樣，對照檢查自己。"看到我們幾個人仍是一言不發，江青衹好宣布散會。

從十一號樓出來，我和黄永勝同乘一輛車回軍委辦事組，我們倆在車上就議論開了。對這個會，我們兩個人的意見是一致的，都認爲，江青今天召開的這個會議不合法，她本身衹是一個政治局委員，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委托，怎麽就有這個權利單獨召

集七個政治局委員開會！顯然，這是背着中央常委搞小組織活動，其目的是破壞團結，動員和拉攏我們擁護她來反對周恩來、反對陳伯達，并損害毛澤東的崇高威信。我們認爲，她這樣做在組織上不合法，弄不好還會把我們也搞到"小組織活動"裏去了。這件事情必須報告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

回到軍委辦事組，我們又同李作鵬、邱會作商量，大家都認爲這件事情應當馬上報告林彪。

下午，黄永勝、李作鵬、邱會作和我一起到林彪家裏，把這個情況向林彪作了匯報。林彪决定，要黄永勝和我兩人立即去見毛澤東，并要葉群親自打電話到毛澤東那裏聯系。在葉群去打電話的時候，林彪告訴我們："在延安，是江青追毛主席。她通過康生，想盡一切辦法接近毛主席，經常是毛主席一邊寫文章，她就在一邊打毛衣，一打就是一天。她是拼死拼活去追毛主席，以後才結了婚。"

林彪剛說完，葉群就打完電話回來了。她告訴我們說，毛澤東同意接見，并在家裏等着我們，要我們趕快去。

當黄永勝和我趕到毛澤東的住所時，已經快到參加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時間了。由于我們要去參加會議，我們向毛主席匯報的時間很短。黄永勝對會議的情况還没來得及細說，我也衹是向毛主席說了一句一向鬱積在我心裏的話。我說："江青同志衹準演八個'樣板戲'，對其它的戲一概否定，這樣好嗎？"毛澤東回答說："'樣板戲'没有一個是她自己搞的，都是别人幫助她一起搞出來的。"

說到這裏，葉群來了電話說："開會的時間快到了，是不是先來開會，否則被江青發現就不好了。"毛澤東也說："情况我都知道了，你們趕快去開會吧，周恩來還在等着你們。"

臨走時，毛澤東又對我們說："你們不要講到過我這裏來告江青的狀，如果讓她知道了會整你們的。她已經整過你們一次了。我也不告訴她，你們到我這裏來過。"說完，毛澤東還囑咐張玉鳳，叫她不要對江青說我們到他這裏來過。

我和黃永勝都有些失望，感到毛主席對我們的匯報不感興趣。我們原來想，江青的這次活動直接侮辱了毛澤東，并且還把矛頭指向周恩來。另外就是關于陳伯達的問題，我們也感到十分不解，如果早就知道他是叛徒，爲什麼還要委任他這樣高的職位，用他去整天大抓叛徒呢？我們認爲，陳伯達的歷史，毛澤東應該是清楚的，否則陳伯達絕不會走到現在的地步。唯一的解釋就是：江青在造謠。在當時，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別人的身上，早就被打倒了，可毛澤東在聽了我們的匯報後却若無其事，好像江青這樣做并没有什麼錯似的。可以說，毛澤東當時的這一態度，完全出乎了我們的意料之外。

到人民大會堂參加完政治局的會議後，我們又把上午的情况報告了周恩來。也許是因爲這中間涉及到他自己的問題，不好表態，周恩來在聽了我們的報告以後，也是一笑了之。

然後，我和黃永勝又到了林彪那裏，把向毛澤東和周恩來匯報的情况報告了林彪。林彪說："毛主席、周總理知道就行了，讓他們去處理吧。"事情就這樣又不了了之了。

再有一件事是"九大"以後，由張春橋、姚文元控制的新華社曾在全國公開發表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上衹有兩個人，前面是毛澤東，後面是江青。發表這張照片的目的，是想表明江青是緊跟毛澤東的。然而，這張照片是假的。新華社的一個記者告訴黃永勝說，這張照片本來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三個人的合影，是江青告訴這個記者，要他把林彪和周恩來的影像剪掉，然後把她自己的影像合成到這張照片上去，于是這就成了公開發表時的樣子。

我們得知這一情况後的一天晚上，我正從人民大會堂東門到江蘇廳去開會，黃永勝和葉群突然從後面叫住我。接着，葉群交給我三張照片，并告訴我說，這是江青要那位記者剪貼照片的所有原件。她要我回去把這三張照片復印三份出來，讓黃永勝、我與她三人各保存一份復印件。

由于有了上一次向毛澤東匯報的教訓，這次我們就没有再向

上反映，而是把原件復印一下，留一個證據，也就拉倒了。

六、珍寶島戰鬥

說到林彪的"一號命令"，不能不說起中蘇之間的軍事衝突。

從五十年代末起，中、蘇兩黨的關系開始緊張，從而後來導致中、蘇兩國關系進一步惡化。從一九六四年以後，蘇聯方面開始是在蒙古，後來直接在遠東方面大量部署部隊，對中國施行武力威脅。這樣一來，原本親密無間的鄰邦發生了邊界的糾紛與衝突，特别是在黑龍江省烏蘇里江的珍寶島地區，蘇聯邊防軍多次對中國邊防巡邏部隊挑釁。開始，他們衹是推推搡搡，後來發展到用棍棒打傷中國邊防巡邏人員，搶奪我方人員的槍枝。到了一九六八年下半年，他們的行動就發展到用裝甲車碾壓我方人員，并開槍射擊，打死、打傷我方多人。那一段時間裏，軍委辦事組不斷接到下面的這方面報告。每次我們都及時將有關情况報告給了林彪和周恩來，并請示是不是可以采取措施，以保護我方人員的安全。

這樣，由毛澤東和林彪親自主持，召開了兩次有周恩來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全體參加的緊急會議。會上，毛澤東和林彪一致決定：對蘇聯方面的挑釁要給予堅决的回擊，并對此作了具體的部署。



在西山軍委辦事組駐地

根據毛澤東和林彪的指示，我們軍委辦事組作了認真的研究，決定將具體的組織實施工作，主要交由沈陽軍區、北京軍區和新疆軍區去執行。同時，要求解放軍三總部、海軍、空軍以及

國各大軍區密切配合，同時作好全面防御的準備。爲了執行好毛主席、林彪和中央的指示，我們向沈陽、北京、新疆三個軍區發了電報，要求他們加强中蘇邊界特别是東段邊界的邊防警戒工作，作好以軍事上的鬥争配合外交鬥争的準備。我們在電報中强調，各邊防部隊要嚴格執行“針鋒相對，後發制人”和“有理、有利、有節”的邊界鬥争方針，并具體規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先出手，不到萬不得已時，不要開槍；如對方開槍，我方出現傷亡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自衛措施。但無論采取何種自衛措施，都要嚴格控制在我方的境内。

在電報裏，我們還要求邊防部隊在政治上有利的情况下，事先作好準備，多設想幾種情况，擬訂好行動方案，有重點、有計劃地打擊蘇聯軍方的挑釁，力争作到不鬥則已，鬥則必勝。另外我們還强調，邊防上的鬥争主要是政治、外交鬥争，一切要服從政治，服從大局，要嚴格按政策辦事，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

接到我們的電報指示，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親自抓了這項工作的落實和具體的部署。一九六九年一月，沈陽軍區制訂了計劃，調集兵力，成立了邊防鬥争的指揮所，并向軍委辦事組寫了報告。經我們研究，并經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的批準，同意了沈陽軍區的這個計劃，决定以珍寶島爲中心，開展反擊蘇軍挑釁的邊防鬥争。

接着，我們以總參的名義向沈陽軍區和黑龍江省軍區發出電報，通知他們中央已批準了他們的計劃，并要他們注意具體布置多少兵力以及選擇好反擊的時機，要注意盡量减少損失，保護自己，特别要注意一定要抓證據，要想盡一切辦法去抓俘虜、繳獲證據。同時，我們再一次規定，不準先開槍。我們并不想向蘇聯挑釁，而完全是爲了自衛。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珍寶島戰鬥打響了。很快，陳錫聯司令員就打來了電話。他在電話中非常興奮，告訴我們説戰鬥取得了勝利，祇可惜没有抓到俘虜。

不久，沈陽軍區的戰鬥報告送了上來，我們才進一步了解了

情况。當時我們派出的巡邏部隊，在珍寶島上遇到蘇聯部隊的攔截。這一次，蘇聯方面没有像往常那樣祇帶着木棒，而是全副武裝向我們的巡邏人員壓了過來。爲避免擴大事態，我們的巡邏人員隨即向後撤。這時蘇聯方面突然擺開戰鬥隊形，想包圍我們。就在這時候，我們的第二支巡邏組趕到了現場。見我們的增援部隊來到，蘇方的一個上尉指揮蘇軍突然開槍，一下子打死、打傷我們的邊防人員六人。我邊防分隊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開槍還擊，一下子就打開了，蘇聯方面出動了裝甲車，射擊我方人員，而我們岸上的支援部隊，一邊開槍攔截，一邊登上珍寶島，營救我已上島的部隊。大概打了一個小時。我共打死打傷蘇軍六十餘人，擊毁一些裝甲車、指揮車和卡車，繳獲了一批槍枝彈藥。我方共犧牲了十七人，重傷十一人，輕傷二十四人。

我們很快將報告送到了毛澤東和林彪那裏，毛澤東看完後説：“打得好！”

由于蘇聯方面這次吃了一些虧，爲了挽回面子，他們就開始調兵遣將，調集了大批坦克、裝甲車和火炮，準備與我們進行一場大戰。這一次，他們不再祇是由步兵單獨出動，而是讓步兵在坦克、裝甲車的掩護下活動，尋找機會報復中國邊防部隊。

爲了對付蘇軍的坦克，我們也采取了相應的措施。軍委辦事組指示沈陽軍區，調集步兵、炮兵、高炮以及反坦克部隊，在珍寶島地區集結，分批進入前沿陣地和縱深陣地，并指示一綫邊防部隊，要避免在對我方不利的情况下發生衝突。

到了三月十五日，珍寶島上又發生了一次較大規模的戰鬥。這天一早，蘇聯邊防部隊在十多輛裝甲車的掩護下，又登上了珍寶島。島上，我們的步兵一個排利用修築好的工事與來敵對峙。八點鐘，蘇軍首先開火。他們在裝甲車的掩護下，向守在島上中國軍隊發起進攻。我們的部隊沉着應戰，一直等蘇軍裝甲車離陣地祇有幾十米的距離時，才突然還擊，一下子打掉蘇軍的兩輛裝甲車。以後，我們後方的炮兵開火，將蘇軍步兵壓制在島的中央。

十點鐘，蘇軍出動十幾輛坦克和裝甲車，向島上的中國部隊

又一次發起進攻，同時用炮火攔截我們的支援部隊。我們的戰士同蘇聯坦克展開激戰，擊毀蘇軍坦克和裝甲車三輛，擊傷兩輛。蘇軍的裝備本來就比我們要好，加上我們又是用步兵武器對付坦克和裝甲車，這個仗是很難打的。我在戰後看到參戰部隊繳獲的蘇聯坦克和裝甲車上邊，彈痕累累，但是都没有致命傷，不僅步槍、機槍打不進去，就連炮彈也打不進去。個別的彈孔是靠火箭筒在很近的距離内打進去的。我們的戰士是非常勇敢的。

到了十二點，蘇軍利用火炮猛烈轟擊守衛在島上的中國部隊，并對十公里寬，七公里深的地區進行了兩個小時的炮擊。然後，又派了幾十輛坦克和裝甲車，數百步兵來進攻我守島部隊，我邊防隊和支援部隊進行了頑强的抵抗，一直堅持了兩個小時。最後在炮兵的支援下，終于打退了蘇軍的這次進攻。這次戰鬥一共是九個小時，蘇軍共投入了五十多輛坦克和裝甲車，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炮擊。戰鬥結果，我們擊毀、擊傷坦克、裝甲車十三輛，共打死、打傷蘇軍一百四十人。我方犧牲十二人，傷二十七人。

以後中蘇之間雖然又發生了幾次衝突，但是都没有前兩次戰鬥的規模大。以後，蘇軍派人來島上收尸，我們都没有還擊。幾次戰鬥，我們一共打死、打傷蘇軍二百五十餘人，擊毀、擊傷坦克、裝甲車十七輛。

三月二十日，經毛澤東、林彪批準，中央軍委發布命令，表彰了參戰的全體人員。

七、“第一號命令”

在中蘇邊界的東綫珍寶島地區這幾次武裝衝突以後，中蘇之間除了炮戰，没有再發生直接的地面戰鬥。不過，在東面戰鬥中吃了虧的蘇聯人，一直想報復我們。到了八月份，在新疆地區又

爆發了中蘇之間的邊界武裝衝突。在這種情况下，蘇聯方面對我們十分惱火，據我們現在了解的情况，當時蘇聯的最高領導層裏，發生了不同的意見，一些人，特别是蘇聯軍方，主張對我們實行空襲，甚至動用核武器，打擊我們的核攻擊力量。但是也有一些人，主要是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總理）柯西金等人主張同我們對話。

但在當時，我們是不可能知道這些情况的。我們所獲得的有關情報，特别是總參的有關情報説：蘇聯可能考慮對中國采取突然襲擊。

由于當時中蘇關系緊張，正常的聯系都斷了。爲了與我們取得聯系，蘇聯總理柯西金通過郵電部門打來電話，説要和我們的周恩來總理通話。但是我們的接綫員，把他們駡了一頓，説我們和修正主義没有什麼好説的，就把電話挂掉了。這樣蘇聯一直没有找到機會和我們直接對話。

到了九月份，來了一個機會。柯西金要到河内參加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的葬禮，而周恩來也要參加胡志明的葬禮，所以蘇聯方面就千方百計同我們聯系，想讓柯西金在河内同周恩來見面談一談。得知這個消息後，周恩來爲了避免同柯西金見面，提前到達了河内，并且在柯西金到達河内以前回到了北京。但是後來經過毛主席、林彪、周恩來三人商量，同意讓柯西金來同周恩來談一談。

蘇聯接到這個通知時，實際上柯西金已經回到了蘇聯境内的塔吉克，但爲了面子，他們對外宣傳仍是柯西金從河内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在北京停留。周恩來考慮，不讓柯西金進北京市，就在北京的首都機場安排同柯西金會談。

九月十一日，柯西金乘飛機到了北京，在機場和周恩來進行了會晤。柯西金對中蘇發生的流血衝突表示了遺憾，并和周恩來共同商定，近期内就中蘇邊界問題，舉行副外長一級的會談。

然而，這次兩國總理會晤後，中蘇邊境地區的緊張局勢并没有緩和下來。蘇聯在遠東地區繼續大量增兵，使中蘇邊界地區部

署的蘇軍兵力達到四十個師。這些情況不斷地通報到中央，引起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高度重視和警惕。在這種情況下，加强戰備，絶不是林彪一個人想當然。在這方面，毛主席、林彪、周恩來的意見是一致的，要加强戒備。尤其是對主持軍隊工作的林彪來説，在如何應對蘇聯大規模突然襲擊的這個問題上，更是肩負着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他不得不格外慎重地考慮一些具體的問題，否則，稍有不慎就將成爲千古罪人，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

當時我們所面臨的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就是要盡快完成國家軍事防御戰略重點的轉移。一九四九年十月建國以來，我們軍隊最主要的作戰方向是在東南，主要的對手是美國和在臺灣的國民黨軍，戰略目標是解放臺灣。這樣，廣大的東北、西北地區就成了我們的“大後方”。六十年代以後，隨着中蘇兩黨、兩國關系的破裂和日益惡化，東北、西北地區就面臨着蘇聯的直接軍事威脅，對蘇防御也就成爲毛澤東和林彪主要考慮的問題。一九六九年中蘇邊界武裝衝突發生以後，這個問題就更加突出。解決這個問題主要的責任，當然也就落在林彪的身上。當時他要考慮的問題主要是兩個，一是如何解決戰略防御問題；二是如何解決我們的武器裝備不如蘇聯的問題。對此，林彪提出了如何“三防”和“兩打”的問題，“三防”是指“防空襲”、“防突襲”、“防核攻擊”；“兩打”是指“打坦克”、“打飛機”。

根據林彪提出的防御原則，我們作了相應的安排：一、在“防空襲”和“防核攻擊”方面，重點是加强防空力量，尤其是加强東北、華北、西北這“三北”地區防空力量。這些地區原來的空、防力量比較薄弱，許多重點目標的防空都是空白。爲了改變這一狀況，我們陸續把東南沿海地區的地空導彈、高炮部隊調往蘭州、新疆以及“三北”地區，加强這些地區的防御。另外我們還調整和加强了全國各大城市的防空部署，加緊地空導彈部隊的建設和裝備，加强預警雷達的建設和調整“三北”地區的航空兵部署。

另外，根據毛澤東“深挖洞、廣積糧”的指示，在北京、天津、哈爾濱、沈陽、石家莊等全國所有大、中城市中，開展了大規模建設地下人防工事的工作。這些地下人防工事，要達到“防原子”、“防化學”、“防細菌武器”的水平。這樣，一旦發生空襲或核攻擊，地面上的人就可以轉入地下，減少傷亡。在北京開始修建地鐵，既可以解決交通問題，還可以防空襲。

爲了保證國家和軍隊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維持指揮系統的正常運轉，我們還在全國選擇建設了幾個戰略指揮中心。這樣，一旦發生突然事變，中央和中央軍委能够安全迅速地轉移到這些地方去實施指揮。在毛澤東、林彪可能居住的地方，我們還特意修建了可靠的地下工事。

在“防突襲”方面，我們考慮，蘇軍的機械化部隊，特別是他們的坦克和裝甲部隊，從裝備到力量都是世界一流的。他們的突擊力量很强，而我國的“三北”地區又大都是平原，幾乎是無險可守，這就非常有利于蘇軍裝甲部隊的行動。因此，在戰略上我們應采取“誘敵深入”的辦法，以揚長避短。但是現代化的戰爭，不應當讓對方長驅直入，要找一些戰略上的支撑點來進行固守，吸引對方的兵力，然後相機在運動中殲滅敵人。

出于這個考慮，林彪開始提出，在“三北”地區，特別是在華北地區，要進行人工“造山”的工作，以形成有效的戰略防御點。所謂的人工“造山”，就是在選定的地點建築起若干個“山頭”，內部修建堅固的防御工事，每個“山頭”之間的炮火可以相互支援，形成火力網。這樣的“山頭”既可以抗擊核攻擊，又有充分的彈藥和物資儲備，可以保持長時間的生存和抵抗能力。有了這個想法以後，林彪多次出外看地形，并先後選擇了天津、保定、石家莊、鄭州等地，作爲“造山”的試點，以形成對北京防御的支持。以後，他還曾親自視察過這項工作的開展。

對于華北西面的防御，林彪認爲山西一帶的地形是可以利用的，于是要親自去察看地形。一九六九年九月的一天，林彪通知我準備飛機，説他要到張家口一帶去看地形。我準備了兩架飛

機，除了林彪自己乘坐以外，還有一架飛機供警衛部隊使用。

那天上午八點，我到了北京西郊機場。不久，副總參謀長閻仲川、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也到了。等到九點，林彪帶着葉群來到機場。我們一起登上飛機，向山西飛去。

北京離山西并不遠，所以飛機起飛後不久就到了山西上空。這時，林彪指明要先看看平型關，于是我們的飛機在平型關上空盤旋，林彪看得很仔細，説："平型關這個地方是可守的。"

看完平型關，林彪又提出要看大同，最後又看了張家口。看完張家口，我們的飛機就在張家口機場降落，林彪説要看一看駐張家口的某軍，并在張家口住一晚。林彪自己住一個地方，并用自己帶來的炊事員做飯。他是從來不跟外人吃飯，也不吃别的炊事員做的飯。我和閻仲川、鄭維山則同軍領導一起吃了飯。吃完飯，林彪接見了該軍師以上的幹部，他在講話中要求大家加强戰備，還具體指示某軍，要他們依托張家口地區的地形，修築幾個地下防御工事。講完話，他又爲某軍題了詞。

那天晚上葉群來了興致，要我陪她一起到市裏去看一看。這樣，我又陪她去市裏轉了一圈。第二天，我們陪同林彪回到了北京。

以後有人説林彪這次看地形，是爲政變作準備。我想，以上的事實上已經説明了問題。

一九六九年國慶節前夕，林彪到西郊機場去轉車，在車上看到空三十四師的情况。回到住所，他將看到的情况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提出要采取措施，防止蘇聯利用我們的節日進行突然襲擊。毛澤東表示同意他的這個看法。

徵得毛澤東的同意，林彪要秘書把黄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以及總參管作戰的副總長閻仲川等幾個人找到毛家灣，對有關作戰問題作了指示。他説："今天我找你們來，是想談一下戰備的問題。這個仗看來是八成打不起來，但是要作八成可能打起來的準備。明天就是國慶節，説不定在人們歡歡樂樂的時候，戰争就開始打響了。希特勒發動侵蘇戰争是星期天，日本襲擊珍珠

港的時候也是星期天。如果敵人乘我們過節，來個突然襲擊怎麽辦？蘇聯在蒙古的空軍基地，離北京衹有幾百公里，飛機不要一個小時就到了。如果用導彈打，更是衹要幾分鐘。我剛才到了西郊機場轉了一下，看到一排排的飛機還停在跑道上，没有一點應付意外情况的準備。這不行，也很危險，一旦遭到空襲，就會被全部打掉。要立即采取措施，改變這種情况。"

接着，他發出命令："第一、北京附近幾個機場的飛機，除了留下作戰值班的飛機以外，其餘的一律在今天夜間轉場到外地。第二、在機場跑道上設置障礙，防止敵人進行空降和機降。第三，留在機場值班的工作人員，立即配發武器，準備打敵人的傘兵。另外，節日的其它戰備也要抓好。這個問題，我已經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過，毛主席和周總理都同意要空軍連夜疏散飛機。這樣，你們研究一下，回去進行部署。至于國慶招待會，我已經同周總理商量了，你們就不要參加了。"

回到軍委辦事組，我們研究了一下，决定黄永勝負責總參和全軍，我立即回空軍，按照林彪的要求，連夜疏散飛機。那一晚，我們都没有睡覺，到了下半夜，飛機轉場和其它措施全部都已經落實。我打電話向"林辦"作了報告，這才算鬆了一口氣。

過了國慶節以後，從各方面看來，情况也確實比較復雜。十月十五日，林彪親自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當前的國際形勢和蘇聯的戰略動向。會議認爲，根據一部分情報，蘇聯内部確實有一些人，主張乘中國的核武器力量還没有對蘇聯構成威脅的時候，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一次"外科手術"式的打擊。情報還認爲蘇聯很可能會以十月二十一日在北京舉行邊界談判作幌子，向我們發動突然襲擊。

經毛主席批準，政治局做出决定，立即開始加强戰備，由軍委辦事組部署部隊的備戰問題。另外，周恩來在會上傳達的毛澤東的指示："中央領導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原子彈就會死很多人。應該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根據這一指示，會議决定，北京地區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不論是否有問

題，一律緊急疏散。

會後，林彪和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了會議討論的情況。毛澤東還當場表示說：“我明天就離開北京，到武漢去。林彪同志也應當離開北京到蘇州去。至于恩來，留在北京主持工作，但是必須帶領政治局一班人馬，撤離到北京西山去。”

據汪東興後來告訴我，第二天毛澤東快要走的時候，江青去了。毛澤東正在吃飯，江青要服務員拿碗筷，想跟毛澤東一起吃。可毛澤東說：“來不及了，我吃了飯就要走。你要吃另外再搞一點吧。”毛澤東這一說，服務員就不敢動。江青碰了個釘子，很不高興地回去了。

十月十六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去了武漢。同一天，林彪到了蘇州。十月十七日，政治局和軍委辦事組的全體成員，也在周恩來的帶領下全部撤離到了北京西山。周恩來把我們已撤到西郊的事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很快回電話說：“謝謝你們，這樣就放心了。你們這件事情辦得好，一定要提高警惕。”

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撤離北京的不光是毛澤東、林彪及中央其他領導人，國務院各部門、軍隊各部門的領導也進行了相應的疏散。中央、國務院各單位的疏散工作由周恩來和中央辦公廳負責，其它各單位自行負責。這次中央領導人和老幹部的疏散工作，從擬定名單到具體安排去的地方，全部都是他和汪東興及中央辦公廳一個一個研究決定，并具體辦理的。

由于這次緊急疏散行動，草率進行，以至在對一些老同志的安排上發生了問題，對他們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一些傷害，例如造成了劉少奇主席病逝在開封。實在是令人遺憾。

至于以後有些報紙、文章把這個帳統統算在了林彪的頭上，說林彪爲了迫害老幹部，處心積慮地搞了個“一號命令”，一下子把老幹部都轟到了外地，從而造成了劉少奇等人的死亡。我認爲，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也是極不負責任的說法。緊急疏散這件事情是黨中央，毛主席、林彪、周恩來和中央常委、政治局共同決定的，具體執行的是周恩來和中央辦公廳。如果周恩來在世

的話，他是不會同意這樣說的，許多老同志自己也可以作證。爲什麼衹講林彪和我們而不講毛主席和周恩來呢？這是不公平的。應承擔這個責任的，絕對不應該是林彪和我們。

從時間順序上來看，緊急疏散的決定與林彪的“一號命令”沒有關系。“一號命令”是在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疏散的決定之後發出的。林彪十月十六日到了蘇州，十七日下午他才找秘書口授了“防備蘇聯發動突然襲擊的六條指示”。這六條指示的主要內容是：一、要防備蘇聯以十月二十日開始談判作烟幕，實行突然襲擊，尤其是十九日和二十日應特別注意；二、全軍各部隊特別是“三北”地區的各軍區，要立即將坦克、飛機、大炮等重型武器實行緊急疏散，對戰備工事、重要目標要采取隱蔽措施；三、要保證通訊聯絡的暢通；四、加緊國防工業的生產，特別是要迅速抓緊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產；五、各軍區立即組織精幹的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六、戰略導彈部隊要作好發射準備。

林彪口授後，讓秘書整理成記録稿。然後，葉群要秘書把記録稿再抄一份，由她自己通過電話傳給武漢的汪東興，請汪東興立即報告毛澤東，另一份由秘書傳給北京的黃永勝和軍委辦事組。在傳給黃永勝之前，葉群要秘書加上了這樣一句話：“以上六條，已經請東興同志報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當以毛主席的指示爲準。”後來，汪東興給葉群來電話，說毛澤東對林彪的“六條”没有提出什麼意見。

黃永勝接到林彪的“六條指示”以後，把閻仲川叫到軍委辦事組，向他作了傳達，閻仲川作了記録。傳達時，我、李作鵬、邱會作和李德生都在場。傳達完以後，黃永勝告訴閻仲川說：“你去傳達吧。”

閻仲川問：“怎麼傳達呢？”黃永勝說：“先用電話向各大軍區首長傳達。”

閻仲川回到總參作戰值班室以後，同作戰部一起擬了一個電話稿。他考慮，這是軍委辦事組轉移到西山以後下達的第一個命令，就從第一號編起，于是就要值班參謀將這個命令編爲“第一

號命令"。所以，這個"第一號命令"的名字還是閻仲川給起的。

以後有人説，林彪的"第一號命令"是"反革命政變"的總預演，這不是實事求是的。

第一、當時林彪的地位没有受到威脅，"九大"以後接班人的位置名正言順，没有必要搞政變。説林彪當時搞政變没有任何證據。

第二、從一九六九年初開始，防範蘇聯突然襲擊的戰備問題，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以及中央常委會、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的共同决策，毛澤東、周恩來對此有過多次講話、指示，中央發過多次文件，這都是有案可查的，不能因爲林彪一個人倒了，就把責任全都推到林彪一個人身上，甚至把本來正確的東西説成是錯誤。

第三、當時的中蘇關系確實錯綜復雜，以後的多種材料也證實，當時的確存在發生戰爭的危險。世界上有很多因缺乏及時、有效防備而遭到慘重損失的例子，也有不少因采取了措施，而使戰爭没有打起來的例子。實事求是地説，建國以來，毛澤東、黨中央在戰備問題上采取過多次防範措施，是不是事事都料事如神？那也不是。同樣，林彪也是人，預防了一次没有打起來的戰爭，爲什麽就説他是神經質，説他要搞政變呢？

第四，説許多老同志的疏散，是因爲"一號命令"而起，這就更不是事實了。實際上是戰備疏散在前，"一號命令"在後。這件事情，衹要稍稍一查證，就可以弄明白了。

關于這件事情，以及其它與此類似事情的一些説法，當時是爲了穩定局勢的需要，有傾向性，對事實有歪曲。但是現在，我們應該客觀地、實事求是地對過去的事情加以評價，最起碼也要尊重基本的歷史事實。

八、林立果的任職和"講用報告"

一九六八年夏天，一次空軍黨辦的王飛和周宇馳向我提出，林立果到空軍已經快一年了，他學習努力，工作也很積極。現在他想到下面去轉一轉，搞一點調查研究，爲空軍領導收集一點材料，提供一些意見。我説："這些都很好。他是空軍黨辦的秘書，爲空軍黨委做一點事情，應該放手讓他去幹，對他也是一個很好地鍛煉。能够下去，做一些調查研究，提出建議，也算是一點成績嘛！"

爲了工作方便和林立果的安全，我要王飛他們成立一個調研小組，讓他們用這個調研小組的名義下去活動。我給他們的主要任務是：調查下面部隊飛行訓練的情况、事故情况和存在的問題。我還特别叮囑王飛和周宇馳，下去後，一是要注意保密，二是要注意安全，不要出任何問題，否則的話我們就對不起林彪了。

以後，我實在是因爲各方面的工作太忙，一直没有具體過問調研小組的情况。這個調研小組到底有多少人，又開展了些什麽活動，我并不知道。"九一三事件"以後，有人把這個調研小組與"小艦隊"聯系起來，説是我批準成立的這個"小艦隊"。實際上，我批準成立的衹是一個調研小組，而"小艦隊"是林立果他們背着我搞的，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我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後，才知道有這個"小艦隊"的問題。

這裏，我還要説一下關于林立果在空軍的任職的事情。一九六九年十月的一天，葉群對我説："現在中蘇邊界的局勢緊張，戰備工作吃緊，你的工作又太忙，經常直接向'一〇一'匯報情况也有困難。但是空軍又有許多問題，包括作戰和建設等方面的問題需要經常研究。在科學技術方面也需要不斷地改進，航空工業也要逐漸跟上世界先進水平。'一〇一'的意見，立果除了負擔

辦公室的工作以外，如果他能兼任作戰方面的一些工作，就可以從中研究和學習空軍的戰術和技術。另外，通過立果對一些問題的匯報，'一〇一'也可以幫助考慮建設現代化空軍的許多問題，對你們也可以有所幫助。"

由于葉群是打着林彪的名義，她提出來這個問題以後，我想應該考慮一下。在葉群提出這個問題之前，中央已經任命毛遠新爲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李納也已擔任《解放軍報》的副總編輯。我想，葉群之所以會提出這樣的要求，可能與毛遠新和李納的任職有關。這樣，我考慮林立果是林彪的兒子，是不是也可以在空軍任一個差不多的，但是要比毛遠新和李納級別低一些的職務。

我同空軍黨委的同志一起作了研究，我說："林副主席把立果交給我們，這是對我們空軍的信任，對空軍工作的支持。我們一定要把立果培養好。"經過研究，大家一致同意任命林立果爲空軍司令部辦公室付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

十月十七日，由我和政委王輝球共同簽署，同時任命劉世英、周宇馳和林立果三個人任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并任命林立果兼任空軍司令部作戰部副部長。

關于任命林立果的問題，我原來一直以爲葉群傳達的是林彪的意見，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四月我見到林立衡，她對我說起，林彪當時根本不知道林立果當作戰部副部長的事情，這件事情是葉群和林立果背着林彪一手操縱的。經她這一說，我這才想起來，林彪確實從没有對我直接提到過林立果當作戰部副部長，或表示出他知道此事。這件事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内情我就不知道了。

在這之前，空軍黨委辦公室已經改編爲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王飛被任命爲空軍副參謀長兼空司辦公室主任。這樣一來，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就完全被王飛、林立果、劉世英、周宇馳等人所控制了。

林立果的任職命令公布以後不久，王飛、周宇馳帶着林立果來看我。林立果說："謝謝吳司令對我的培養和教育。"我說："是你自己的努力，工作水平有很大的進步。你也要感謝黨辦的同志們，他們費了不少心血。"我說："今後你可以放手工作了，凡是有關空軍建設、科研技術、航空工業、你就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匯報，你在空軍可以調動一切，可以指揮一切。"這句話一出口，我感到有一點冒失了，但是已經無法收回了。我當時說這話的意思，是因爲他可以直接向林彪匯報，可以直接接受林彪的指示，所以就不假思索地衝口出來了這"兩個一切"。

這句話以後產生了不良的影響。我曾經想收回，但是又怕得罪林彪，收回反而"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就没有這樣做。但是後來說我的這句話就是把空軍的指揮大權交給了林立果(見最高法院的判決書)，這不是事實。實際上，不僅是林立果，就是我這個空軍司令，在空軍也不是能指揮一切、調動一切的。對這個問題，我在後面有詳細說明。

我萬萬没有想到，就是這句話，以後把空軍鬧得天翻地覆。這句話後來被黨辦的王飛和周宇馳有意加以利用和擴散，起初是在一九七〇年的空軍黨委常委辦公會議上。林立果和周宇馳他們下去蹲點以後，搞了兩個調查報告，提出有關空軍建設的十個問題，建議研制垂直起降飛機和短距離起降飛機。這兩個報告經毛主席和林彪同意以後，傳回到了空軍黨委。常委辦公會議對此專門進行了討論，并指定周宇馳到會作說明，周宇馳在會議上介紹情况時說："吳司令對林立果評價很高，說林立果在空軍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這次黨委辦公會議我没有參加，但是周宇馳說的這番話，事後我知道了。我當時很想出面加以說明或進行制止，但還是因爲害怕得罪林彪，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回想起來，當時我是應該出面制止周宇馳等人對我在私下場合說的話，當作指示來任意擴散的。現在看來，他們這樣做是別有用心的。

盡管我當時對王飛、周宇馳等人的做法非常不滿，但由于林立果搞了調查報告以空軍黨委的名義上報，并得到了毛澤東的同

意，我還是很高興。爲了對林立果表示鼓勵，我送給了他一塊懷表。這塊表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我們打淮陰時繳獲的戰利品。不久葉群就打來電話，很高興地説："吳司令，你這樣器重林立果！我們立果説，永遠是吳司令的小兵。"在這個時候，我哪裏能想得到，就是這個林立果，以後竟背着我搞了那麽多的事情，還和空軍黨辦的一些人，一起來搞我的材料！

林立果當年還曾經做了一件在空軍大有影響的事情，這就是他作的"講用報告"。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空軍政委王輝球召集空軍司令部、政治部二級部長以上的幹部，在空軍辦公大樓的七樓會議室開會，聽取林立果講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體會，即聽他作"講用報告"。這種"講用報告"是當時全國各地以及部隊學習毛澤東著作的一種形式，是當時的一種時髦。林立果用這種方式，想嘩衆取寵。

林立果的這個"講用報告"，最初曾經在"林辦"講過一次。葉群告訴我，"林辦"的人對這個"講用報告"反映强烈，都認爲講得不錯。我説，林立果是空軍的幹部，既然"林辦"的同志反映很好，那就叫林立果在空軍的幹部會上也講一次吧。隨後，我把這個意思告訴了王輝球。

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我和陳綏圻正好住在西山。這個"講用報告"開始以後，王輝球才要秘書通知陳綏圻去參加會議。等陳綏圻從西山趕到了空軍大院時，林立果的報告已經開始一個小時了。會議中間，周宇馳對陳綏圻説，林立果講完是不是請她也講幾句。陳綏圻因事前没有準備，就説不講了。周宇馳又提議："那就帶領大家喊幾句口號吧？"陳綏圻不好再推，就讓他幫助擬幾個口號。

林立果的這個"講用報告"很長，差不多講了整整一天。講完以後，王輝球首先講話，接着王飛又講了話，他們兩人都對林立果的報告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王飛還利用這次講話的機會，又宣傳了我説的"兩個一切"。最後，陳綏圻帶領大家喊了十幾個口號，會議就結束了。

林立果作"講用報告"的時候，我不在場，事後調來録音聽了一遍。從録音上聽，這個報告大致上可以分爲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問題，第二部分是"抓革命，促生産"的問題，第三部分是中國要强盛的問題。聽完以後，我感覺林立果講話的口氣太大，尤其是第三部分，如果由林彪來講還比較合適。但出自林立果之口，就顯得太過了。

過後，我打電話給葉群，跟她説，在林彪和她的培養、教育下，林立果到空軍以來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他的這個報告講得很好，是在空軍放了一顆"政治衛星"。葉群聽了我的話很高興，説："都是吳司令你的培養。今後對立果還要嚴格要求，讓他不要翹尾巴。"

事後我找到王飛，問他爲什麽没有經過我的同意，就到處宣傳我説過"兩個一切"的問題，王飛解釋説，他當時也没有考慮到這樣多，他認爲，這句話無非是表揚林立果的意思，説林立果水平高，不會有什麽影響。我要他立即在録音上把"兩個一切"的那一段删去，不準再擴散。

當時空軍正在召開"三代會"("四好連隊"、"五好戰士"、"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林立果在空軍機關作報告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了大會。代表們出于對林彪的敬仰和信任，紛紛要求在"三代會"上播放林立果講話的録音。王輝球幾次向我反映代表們的意見。我起初不想播放這個録音，但是在代表們的一再要求下，我也就同意了。在給"三代會"播放林立果"講用報告"録音之前，我再一次告訴王輝球，要他一定要把王飛的講話録音删掉。當陳綏圻得知要放録音之後，也向我要求把她領喊的口號部分删掉，我要她自己去向王輝球反映。結果王輝球把自己和王飛的講話都删掉了，唯獨留下了陳綏圻喊口號的録音，這樣一下子就把陳綏圻推到了前面。陳綏圻對此很有意見，但木已成舟，已經没有辦法了。

林立果的"講用報告"録音播放以後，代表們反映强烈，紛紛要求印發這個報告，王輝球又把代表們的這個意見反映給了

我。我不同意印發，對他説："林立果的報告是好的，但是有些地方還要推敲。這個報告現在不能印發，如果印發了，反而會給林副主席幫倒忙。"

接着，我又就"三代會"代表要求印發林立果"講用報告"這件事，給葉群打了電話，談了我的看法。葉群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意見，説："不要印發。"但是有空軍黨辦的一些人推波助瀾，擋也擋不住。後來在九屆二中全會的後期，連周恩來都提及此事，我就又嚴令將此風刹住，但也未完全奏效。這個事情，我在以後的章節有詳細論述。

第十三章 九届二中全會

一、汪東興傳回的聲音

一九七〇年三月上旬的一天，汪東興受毛澤東的委托，從外地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傳達毛澤東關于召開第四届全國人大的意見。當時，毛澤東正住在杭州。

當天晚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聽取毛澤東的指示。汪東興在會上傳達説："毛主席提出政治局研究一下，文革時間長了，要考慮恢復政府機構，準備召開四屆人大。一是通過人大總結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經驗；二是成立和恢復各級政府；三是要研究發展經濟和戰備問題；主要是這三點意見。"他還傳達説，毛澤東指示，關于憲法問題，要政治局研究成立修改憲法的起草小組。另外，還要準備起草"政府工作報告"、"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和"戰備工作報告"，這幾件事要立即着手做。

最後，汪東興還特別傳達了毛澤東關于是否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毛澤東説："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要不要設國家主席，我的意見是不設。如果大家認爲要設的話，那麽由誰來當這個國家主席？我毛澤東是不當了。如果要設國家主席的話，也衹有林彪同志來當。"汪東興傳達完毛澤東的意見，當天没有討論，會議就結束了。

會後，汪東興找到葉群，想到毛家灣去向林彪傳達毛澤東的意見。但因爲林彪已經按照平常的習慣，在晚上八點鐘服用安眠藥睡覺了，所以汪東興没有去成，衹好請葉群代爲轉達。

毛家灣去不成，汪東興就請葉群、黃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一起到他家裏坐一坐。于是，我們一行從中南海的新華門進去，一直到了靠水邊的小樓，汪東興的家。我們下了車，隨後一起在客廳裏閑談了一會兒，接着話題就轉到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這時，汪東興又對我們説，毛澤東曾經説過，“要設國家主席的話，衹有林彪同志才能當”。這個話，我們聽了都感到很高興，認爲這是毛澤東對林彪特别的信任與關懷。當時汪東興也很興奮，因爲“九大”以來他同我們一直是搞在一起的。

那天晚上，汪東興很高興，一定要請我們吃飯。吃什麽呢?是紅薯。因爲那時已經到了三月份，紅薯已經很少了，但是他家裏保存有。我們邊吃邊談，一直到深夜才各自回家。

二、憲法修改小組

三月十三日晚九點，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研究如何貫徹毛澤東關于召開四届全國人大的指示精神。這次會議，除林彪以外，都參加了。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會議首先成立籌備四届人大的工作小組，由周恩來牽頭，成員由張春橋、黃永勝、謝富治、汪東興組成，負責四届人大的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接着研究修改憲法的問題，决定成立憲法修改小組，由康生任組長，其他成員由陳伯達、張春橋、吴法憲、李作鵬、紀登奎共六人組成。這個方案很順利地通過了，并準備報告毛主席批準。關于是否設國家主席的問題，留待憲法修改小組去研究。

很快，毛澤東同意了這個方案。于是，憲法修改小組就在中

南海懷仁堂後面找了一個會議室，開始了工作。康生組織了一個秘書班子，并確定一個叫李鑫的同志負責。我們每天下午三點到晚上八點開會工作。

小組的第一件事，就是首先研究一九五四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因爲這個憲法是毛澤東親自領導制定的，曾廣泛聽取了包括各民主黨派在内的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所以要大家先研究這個憲法。然後還要研究蘇聯、朝鮮、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以及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各國的憲法，任務是相當艱巨的。這些憲法有的幾十條，有的上百條，還有的衹有三條。另外，我們還研究了辛亥革命以來孫中山制定的《五權憲法》，以及袁世凱制定的憲法等。前後兩個多月的時間，大家傳閲這些憲法，然後集體討論。

在新憲法修改草案的問題上，我們首先是究竟要寫幾章，搞多少條，在序言、總綱、公民的權力和義務、國家機構、國務院等章節該如何寫等問題。在這些問題上，小組裏經常有不同意見，有争論。有的主張寫一百多條，有的主張寫幾十條；有的主張設國家主席，有的主張不設，議論不一。康生主張不設國家主席，衹設人大常委會主任。

經過反復討論，最後我們終于統一了幾點意見，修改的原則是宜簡不宜繁，而且毛澤東制定的憲法原則，基本上都要繼承下來。至于寫幾章、寫多少條款等具體問題，寫起來再看。

三、 林彪的意見

在要不要設立國家主席這個問題上，我想着重説一説林彪的意見和態度。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七日下午，因林彪準備帶軍委辦事組的幾個人去向毛澤東匯報軍委的工作，黃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四個人就先到林彪住處匯報工作。我們向林彪説起，軍委

辦事組已派吳法憲和李作鵬參加了憲法修改小組的工作。我們還說起，關于設不設國家主席，毛澤東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一個是設，一個是不設，如果要設國家主席，祇有林彪同志才能當”。

林彪當即表示：“我不當這個主席，這個不妥。應該是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這才是名正言順。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没有國家主席，没有一個元首，這樣名不正、言不順。這個國家主席、國家的元首，祇有毛主席來當，别人都不合適。但是毛主席的年紀大了，當國家主席要出國訪問，别的國家元首來還要回訪，毛主席出國有困難，可以設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國對其它國家進行訪問。我也不適合當這個副主席，我的身體不好，不能參加活動，不能出國訪問。要設國家主席還是毛主席來當。”

林彪當面對我們表示的這個意見，口氣非常肯定。我至今仍然認爲，林彪的意見比較中肯。他的這一番話，是出自内心的，也比較合乎情理。像以後有些人所説的那樣，“林彪急于當國家主席，急于搶班奪權，急于分裂黨，反對九大路綫”，我感到實在是牽强附會，缺乏根據。我有幾點理由：

第一、當時國家主席的位置是一個虚職，當時國家代主席的職務是由董必武同志擔任的，而董必武同志連中央常委都不是。黨和國家的權力是集中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手裏。在九大，林彪當選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和軍委副主席，這是最實際的權力。而且在黨的九大黨章中和憲法草案中已明確的規定了林彪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在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林彪根本没有必要去争這個國家主席。

第二、當國家主席是個出頭露面的事情，而林彪對搞出頭露面的外事活動是很少感興趣的。這從他建國以後極少參加外事活動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再説他的身體不好，也没有條件參加各種外事活動。

第三、劉少奇是從國家主席的位置上被打倒的，這是前車之鑒。林彪是個聰明人，看到了這一點以後，他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了同毛澤東的適當距離。這一點，有很多事例都可以證

明。

因此，我認爲林彪不存在“急于搶當國家主席”的想法。林彪的一個警衛參謀，李文普，寫了一篇文章説：從來没有聽説過林彪想當國家主席這樣的話，因爲林彪最討厭參加接見外賓的外事活動。[10] 我感到這個説法是真實可信的。這也反映了林彪的性格，説林彪急于搶當這個國家主席，這種説法是違背林彪處事哲學的，也是没有根據的。林彪在我們面前從未表示過想當這個國家主席，給我的感覺，他個人當不當這個國家主席是無所謂的。但他認爲，一個國家不能没有自己的元首。林彪曾經鄭重向中央表示：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他自己不宜擔任國家副主席職務，另選一位國家副主席。有人説不想當國家副主席就是想當國家主席，堅持設國家主席就是想當國家主席，這是什麽邏輯嘛！如果説葉群、林立果有些想法是可能的，但是説葉群、林立果就等于林彪，應該不是這麽一回事情。另外退一步説，想不想當國家主席，這不是犯罪的標準，如果説想當國家主席就是“篡黨奪權，”那麽“篡黨奪權”的人就太多了嘛！

四、憲法修改小組發生了衝突

由于我們軍委辦事組和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從“九大”以來就分成兩派，這個問題，也反應到憲法修改小組裏來了。從一些小的問題開始，就逐漸形成了兩派，陳伯達、李作鵬和我是一邊；康生、張春橋是另一邊。在討論問題時，大家都是放開講話的，就時常有些争論之詞，有些争論還非常激烈。如在設不設國家主席的這個問題上，我們堅持了林彪的意見：國家主席還是要設，由毛澤東來當國家主席，考慮到毛澤東不便出國訪問，可以設國家副主席，總之要設國家主席；康生和張春橋則不同意

[10] 見李文普文章，林彪事件與我。編者注

設國家主席，而且人大也不設委員長，祇設人大常委會主任。在設不設國家主席這個問題上頂牛了。爲了緩和矛盾，康生曾提出在憲法上寫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當時，林彪和葉群住在北戴河，事後我把這種情况通過電話反映給葉群，葉群回電話説，林彪很贊成你和李作鵬的意見。要説服他們同意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没有一個元首，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名不正，言不順。林彪説，各國憲法都有總統、主席等領袖人物爲國家元首。我國開國以來，毛主席就是我們國家主席，後來有劉少奇主席。現在取消不好，引起世界人民懷疑。葉群在電話中對憲法寫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表示高興。

以後葉群在北戴河對憲法修改工作很關心，常來電話詢問討論的情况，并告訴我們林彪的意見：要在國家的指導思想一條上加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對人大常委會祇設主任不設委員長，林彪認爲不妥。這一點康生是最不滿意的。

盡管當時組裏矛盾很大，但工作還是照常進行。憲法草案基本上是依據康生的意見起草的，我們一條一條地討論研究，包括條款、文字、標點都進行具體的推敲，但在有些問題上各不相讓。這個草案一共是六章，即：(一)、總綱；(二)、公民的基本權力和義務；(三)、國家機構；(四)、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五)、民族自治和自治機關；(六)、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在這個憲法草案的總綱裏，也依據“九大”通過的黨章，寫上了“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句話。另外，憲法草案還規定，包括全國人大在内的各級人大常委會，都祇設主任，不設委員長。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四日下午，憲法修改小組在中南海懷仁堂繼續開會。這天到會的有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和我。李作鵬因爲被周恩來派到青島去處理問題去了，没來開會。紀登奎不知什麽原因也没有來。會議進行過程中，陳伯達出去打了幾個電話，長時間不在會場。所以，這一天實際上祇有康生、張春橋和我在那裏開會。

這次會議上發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論。在討論要不要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康生又提出不設，而我堅持要設國家主席，最後争論不下。康生説：“那就各自保留意見吧，以後提交政治局討論。”這個問題就這樣放下了。當討論到國家機構的問題時，我説國務院的這一章應該寫上：“毛澤東思想是國務院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句話。但康生和張春橋一起反對我，他們説：“再寫上重復，毛主席也不同意寫。”其實當時他們的意見應該是對的，可張春橋當時説的幾句話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話是：“有人口口聲聲馬列主義到處都挂。”我想這是完全是衝着我來的。没想到他接着又説：“到處堆砌毛澤東思想，并不是馬列主義，有人口口聲聲説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連赫魯曉夫都是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呢。這簡直是一種諷刺。”當時我認爲，張春橋的話是衝着林彪《〈毛主席語録〉再版前言》來的。我就説：“張春橋，你説這話是什麽意思？是指誰説的？請你解釋清楚。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誰提出來的？你這句話過份了吧，你這是在諷刺林副主席吧？你張春橋這裏不寫毛澤東思想，那裏不寫毛澤東思想，倒是你捍衛馬列主義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裏不寫毛澤東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説赫魯曉夫何時天才地發展了馬列主義，你口口聲聲赫魯曉夫，你指的是誰？”

我這話一説，張春橋一下就急了，説：“我不是這個意思，是毛主席説的，赫魯曉夫發展了馬列主義。”我追問他：“毛主席在哪裏説過？我怎麽没有聽到過？”張春橋一時説不上來。當時我們都很激動，我又説：“你今天吹這樣的風是幹什麽？用意何在？中央政治局的人刮此風，刮到下面就會愈刮愈大。今後中央怎樣解釋？毛澤東思想爲指針你們不贊成，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三個副詞你也反對，你們不準稱天才，你想借口毛主席偉大謙虚貶低毛澤東思想，我堅决反對你這種謬論。”這時康生也很不冷静説：“好、好，在國務院的前面加上‘以毛澤東思想爲

指針'就是了。" 我說："我是個人的意見，寫不寫由你們决定，因爲我是憲法修改小組的成員，有權提出個人意見。" 康生說："對、對、對，寫上、寫上。" 以後他們兩人再講話，我都不吭聲，索性連話也不説了。

看來，張春橋的話不簡單，文化革命中央文革幾個文人，他們説打倒誰，就打倒誰，打倒了那麽多的老同志，現在又公開把矛頭指向了林彪，我心中真是氣憤不過，林副主席有什麽錯，難道又要打倒嗎？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經過幾十年戰爭和政治鬥爭的考驗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是你張春橋之流能啃得動的嗎?!打倒林彪，靠你張春橋能打仗和支撑國家嗎？現在想起來，給張春橋扣上"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虚來貶低毛澤東思想"的這頂帽子，也有點捕風捉影，牽强附會。但當時我在很多事情上對張春橋不滿，積怨甚深，也就借題發揮，這樣吵了一通。我和康生、張春橋在這次會議争吵的情况，李鑫都作了記録。

陳伯達打完電話回來後，我告訴他剛剛發生的情况。我説："老夫子，你這個人，討論憲法三心二意，你跑到哪裏去了？"陳伯達這時立即對我說，"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寫上"。這樣，陳伯達就公開同我站在了一起。

吃完晚飯，繼續討論其它問題，祇有康生和張春橋説話，我一個人氣鼓鼓地一言不發，陳伯達也不説話。就這樣，憲法修改小組完成了最後一次討論，準備將"憲法修改草案"，提交政治局會議討論研究。

散會以後，我和陳伯達走在一起。我對他說："今天張春橋實在没有道理，口口聲聲赫魯曉夫，這明明是反對毛主席，諷刺林副主席嘛！"陳伯達説："走，先到我家去。"我跟着陳伯達到了他家後，他對我説："今天的事情不簡單，你應該向林副主席反映一下，周總理和黄總長那裏也反映一下。"

我按照陳伯達的意見，首先給周恩來打了一個電話。當時周恩來還没有睡覺，我把會議的情况以及發生的問題向他作了詳細的匯報，我説："關于國務院的指導思想，他們不同意寫上'以毛澤東思想爲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周恩來説："我支持你，你批評得好。國務院的指導思想應該加上毛澤東思想，這是應該寫上的。"我又告訴總理，"張春橋説，毛主席説過，赫魯曉夫也是天才的，創造性的發展了馬列主義。"周恩來問："他是這樣説的嗎？毛主席從來没有説過這樣的話，我從來没有聽到毛主席説過這樣的話。"周恩來還告訴我，"三個副詞不是林彪提出的，而是在中央書記處開會時，鄧小平總書記想出來的。我認爲鄧小平提出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三個副詞是很英明的。"他還説："關于設國家主席的問題，這件事情我贊成。"

好了，總理的意見有了，我就更有底了。這件事情我是第一個報告周恩來的，因爲當時我們和周恩來的關系一直是很融洽，也是很親密的。接着，我又打電話給黄永勝。黄永勝當然是全力支持我的，他還提出讓李作鵬立即從青島趕回來支持我，不然的話，我和陳伯達在憲法修改小組裏比較孤立。黄永勝表示："這兩條意見，一是設國家主席，二是以毛澤東思想爲指針，一定要堅持。" 當時還想和林彪、葉群通個話，但是夜已經很深了，所以電話没有打。

第二天下午，我才和葉群通了電話。我把會議上的争論情况告訴了她，并要求她轉報林彪。不到一小時，葉群的電話來了。她説："林彪同志説，吴法憲的意見是對的，要堅持這兩條（即以毛澤東思想爲國務院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和堅持設國家主席）。對康生和張春橋駁得好，抓住了他們的尾巴。"

有了林彪的這個態度，周恩來、陳伯達、黄永勝又都支持我，而且李作鵬、邱會作更不會有問題，于是我就打電話和黄永勝商量下一步如何在政治局會議上與江青、康生等人進行鬥争。我們商定，爲了防止在政治局討論時再發生争論，要準備一些材料來駁斥他們。這時，李作鵬也趕了回來。我和陳伯達、李作鵬各自查了些書和文件，準備在政治局的會議上再同他們鬥一鬥。

八月十五日晚上，政治局會議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討

論爲九屆二中全會所準備的幾個文件。我們都作了充分的準備，葉群還專門從北戴河打來電話，要我們抓住張春橋、康生前一天的話同他們在這個會上鬥一下，因爲他們公開影射林彪是赫魯曉夫，引起了林彪的不滿。當時，我們都預料會上會有一場衝突。

會議由周恩來主持，首先是審議憲法草案。一條一條地念，一條一條地討論和通過。結果很是出乎我們的預料，設立國家主席和"以毛澤東思想爲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都寫上去了，康生和張春橋一句話都没有講，没有發生任何争論，風平浪靜，三、四個小時就把文件都通過了。十五日的會議就這樣過去了。

會議結束以後，我們打電話到北戴河，把會議的情况告訴了林彪和葉群。林彪聽完後説："那就算了吧。但是廬山會議還會有問題，還會提出意見來。"

十六日，政治局再次開會，研究九屆二中全會的的各項準備工作，還是由周恩來主持。會議首先確定了九屆二中全會的議程：一是審議憲法修改草案；二是通過"國民經濟計劃報告"和中央軍委的"戰備工作報告"。最後，周恩來説："已經請示了毛主席，在討論憲法期間中央、國務院、軍委留下黄永勝、紀登奎在北京看家，後階段討論軍委報告黄永勝、紀登奎上山，吴法憲、李先念回北京看家。到了八月十七日，黄永勝提出意見來了，請示周總理，説最好能讓他上廬山，北京有什麽事情留李德生在家就行了。周恩來説："毛主席已經決定了，不好再改，你還是留下來吧。"這樣九屆二中全會前期黄永勝就没有參加。

五、"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擺？"

八月十八日，周恩來和我一起用了整整一天的時間，研究如何運送全國各地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上廬山開會。我提出，用南北分開的形式來運送會議代表。長江以北的會議代表，先用飛機送到安慶，然後用直升飛機飛過長江到九江機場落地，再用汽車送上廬山。我主要是考慮九江機場的跑道短，大型飛機不能降落，所以才想了這樣一個過渡的辦法。南方各省的會議代表，則可以直飛南昌機場，然後從南昌乘汽車上廬山。這樣南北分開，三十四師的專機全部調用，可以在兩天以內，將全會二百五十五名代表從全國各地全部送到廬山。另外，我還提出，爲了絶對保證安全，特别是絶對保證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還應該要布置防空，防止北面的蘇聯和南面臺灣國民黨空軍的搔擾。周恩來同意我的意見，并要我去具體落實。他説飛機的事情他就不過問了，由我全權負責就行。最後，他還特别向我交待，要我次日與江青一起乘飛機上廬山。

那些年裏，祇要是江青坐飛機是一定要我陪同，把我就當成她的人質。這個問題林彪早就跟我講過，他説，江青對他説過，坐飛機一定要吴法憲來陪，一個是防止摔飛機，一個是防止跑臺灣，有吴法憲在飛機上就安全。周恩來當然也知道江青的這個意思，所以每次他都安排我同江青一起走。這個我心裏明白。

我回到空軍司令部後，用全部精力來安排布置飛行計劃。在這樣短的時間裏，要完成這樣一個重要的運輸任務，責任是很重大的，我不敢掉以輕心，尤其是在"文革"那樣混亂的情况下，更不能出一點差錯。這一任務，也是對空軍戰備工作的一個檢驗。除了留下幾架直升飛機準備運送人員和食品外，我决定將空三十四師的大型飛機全部調用，并且在安慶機場設一個指揮所，派空軍副司令員曾國華前往安慶機場進行直接的指揮調度。

這天晚上，周恩來打電話給我，要我第二天把兩個文件，"憲法修改草案"和中央軍委的"戰備工作報告"帶到廬山，交給毛澤東。當時毛澤東還在南昌，他囑咐，等毛澤東到了廬山後，要盡快交給他。

八月十九日這一天，北京的天氣不好，下着毛毛細雨。我八點鐘以前趕到了機場，不久江青也趕到了。江青到了，但周恩來

要我給毛澤東帶的文件還没有送到。江青聽到這事心裏生疑，問我："爲什麽這兩個文件叫你帶而不叫我帶呢？"我衹好含糊其詞。

我們等了一會兒，文件還没有送來。江青急了，叫我打電話去催一催。我衹好打電話問了一下周恩來的秘書，回答説：馬上就到。

我就安排裝運江青汽車的飛機先起飛。江青每次外出，都要我們先派飛機把她的汽車和下飛機用的梯子送過去。不然的話，她覺得下飛機和乘車都不方便。又等了一會兒，文件終于送來了，于是我趕緊請江青上了飛機。飛機起飛後，江青喜歡打撲克，就拉了自己的秘書和護士，又叫上了我，四個人一路打撲克。

飛機到了安慶時，天氣轉好了。我又陪江青從安慶乘直升飛機到九江，并在九江機場見到了江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楊棟梁。楊棟梁告訴我，毛澤東乘坐的專列正從南昌開過來。我要楊棟梁先安排江青上廬山，而我在九江機場留了下來，一是準備把周恩來委托我帶的兩個文件交給毛澤東，二是要接一下從北京和各省來的人，同時布置一下飛機調度和防空的問題。

中午，楊棟梁帶我到九江賓館吃了飯，然後一起去車站接毛澤東。大約一點鐘，毛澤東的專列開過來了。當時，毛澤東外出都是兩列火車，前面一列是警衛部隊，後面一列才是他的座車。

專列到站後，我見到汪東興，他説毛澤東正在休息。這樣，我不便打擾，就把兩個文件交給了汪東興，請他轉交給毛澤東。然後，我回到九江機場去繼續接人，由程世清和楊棟梁陪毛澤東上廬山。

我剛回到機場，江青就派了警衛團的兩個幹部來找我，説是上廬山時，看見一路上都是哨兵，一百米一個，太多了，要撤掉。我就打電話給楊棟梁，把江青的意見告訴給了他。他聽了以後感到很爲難，説："主席要上廬山，撤掉不行哪！"我給他出了個主意説："你想個辦法把哨兵撤到隱蔽的地方去，讓上山的人看不見就是了。江青的意見，不辦不好哪。"楊棟梁覺得這是個好

辦法，就説："馬上照辦。"

晚上快九點時，當天應到的飛機全部到達了安慶和南昌，我才算是鬆了一口氣。趁着當時天還没有全黑，我便乘車往山上去。没想到，車剛走到半山腰上，上面下來了一輛吉普車，是江西省一個電業公司上廬山修理電燈的，和我的車對撞，差一點把我的座車撤到溝裏去了，卧車的門都碰壞了。當時真是好險哪！一邊是深溝，一邊是峭壁，好在没有人受傷，車還可以用。就這樣，我們勉强上了山。到山上以後我找到程世清，把我們在途中撞車的情况告訴了他。我要他不要追究撞車人的責任，但是要很好地安排一下，千萬不要再發生類似問題了。不久，我又接到周恩來的電話，詢問我的情况，我説："好在没有人受傷。"周恩來囑咐道："要告訴程世清，一定要注意會議的安全。"


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看望警衛部隊

我這是第一次上廬山，來到山上一看，廬山上還真不愧是毛澤東所説的，"無限風光在險峰"，風景很好。山上的房子都是依山勢而建，因而不太集中。在水庫邊上，專門給毛澤東修了一所房子，離我們住的地方有二三里。江青住的是蔣介石和宋美齡原來住過的别墅，周恩來和鄧穎超住的是過去馬歇爾住過的房子。林彪和葉群住在一個院子裏，林彪住在這個院子裏的一排平房内，葉群則住在一幢小樓裏。黄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幾個人的住處被安排在一起，陳伯達的住處也與我們比較靠近。

在我們住處的另一邊，是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四位老帥。當時，除了葉劍英以外，其他三位老帥都已經到了。那天晚上，我抽空去一一拜訪了他們。老帥們都很高興，辭别時，

他們都把我一直送到了門口。

八月二十日，我約江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來的人。程世清是東道主，我管飛機。我和程世清過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說起，前一天他陪毛澤東上廬山，汪東興對他講："這次修改憲法，要堅持設國家主席，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毛主席怎麽當我們的國家主席呢？不設國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裏擺？"我聽到這句話感到很高興，我想汪東興傳的話，就是主席的意思吧。這一下，我感到心裏更有底了。

這裏我要特別聲明一下，過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說，這句話是葉群親自對我講的，這根本不是事實。實際上，這句話是我從程世清那裏聽到的，是汪東興傳來的話。葉群從來没有對我說過這句話。這是一個多年的冤案，我要在這裏更正一下。這裏當然我有一定的責任，但歷史就是歷史。當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後對我審查時，專案組爲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證據，千方百計地誘導我，非要我把這句話安到葉群的身上。我開始拒絕了，後來迫于他們施加的種種巨大壓力，就順從他們，說了違心的話。但我在當時寫的材料上，對一些被逼出來的假話都做了記號，怕時間一長，自己也忘了。如果現在還能找到我當時寫的材料，就會看到，我當時特地在這句話下面做了記號。

關于這個問題，我後來看到一篇，"程世清訪談録，"其中寫到，"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九日，我和吴法憲一起到九江車站，迎接毛主席的專列，送毛主席上廬山，由于當時毛主席已經休息了，我們没有見到毛主席，我們和汪東興交談了一會，吴法憲有事先走了，汪東興特別對我提到，這次開會，要堅持設國家主席，堅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裏擺。汪東興把盡地主之誼的江西省軍區政委文道宏安排和他住在一起。文道宏告訴我，二十一日晚上，汪東興給吴法憲打電話說：'邱、李兩個老總都到了，你要抓緊給他們通氣，要提議設國家主席，'汪東興對當時在場的文道宏說：'你告訴程世清同志在會上要提議設國家主席，明天委員都到齊了，叫他（程）告訴江西的同志們，在會上要提議設國家主席。主席說不當國家主席，是主席的謙虛嘛，那不是真的。不設國家主席，毛主席怎麽當我們的國家主席呢？'"[11] 這裏還要提到的是林彪警衛參謀李文普的文章，李文普證實說，從來没有聽到葉群説過，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那裏擺這樣的話。[12] 這也算是另一個佐證吧。

車到九江以後，我和程世清就分開了。這一天，我在機場先接了林彪、葉群，後來又接了朱德、李富春、陳伯達、康生、葉劍英等許多從北京來參加會議的人。下午四點，周恩來、鄧穎超也到了。周恩來要我和他一起上山，我說飛機還没有到齊，請他先走。于是，周恩來就先走了。

六、開個神仙會

傍晚，我上了廬山。我剛剛進到自己的房間，就碰到葉群約了李作鵬、邱會作一起來找我。葉群說："你們從來没有上過廬山，去看看'仙人洞'吧。毛主席給江青的詩，'無限風光在險峰'，就是說的這裏，不信去看看。"

"仙人洞"離我們住的地方大約兩里路。我們乘車走了一段，然後下車沿小路漫步走上去，原來仙人洞是一個懸崖絶壁下的天然石洞，洞前面還有一個井，井裏還有水。我們在"仙人洞"前面一起合影留念。這張照片，以後就變成了他們所說"反黨結盟"的所謂"證據"。

在游覽"仙人洞"時，葉群對我們說："這次來廬山開的是'神仙會'，没有什麽事情。你們都忙了大半年，就在這裏避避暑，

[11] 程世清訪談録。編者注

[12] 李文普文章，"林彪事件與我"。編者注

放鬆一下。林彪同志也不準備講話了。如果能通過'憲法修改草案'和軍委的報告，下面就是四届人大了。到那時，你們就可以散散心，玩一玩了。至于他們幾個（指康生、張春橋等人），也可能提，也可能不提，到時候再說吧。"我們轉了一圈之後也就各自分手回去了。

人都到齊了，可是八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兩天都没有開會。這究竟是什麽原因，我不知道，大概是因爲常委們還没有開會，而開會的時間要由毛澤東來定。我想，正好用這個時間去看看山上部隊的同志們。

當時，空軍在廬山上修了一個直升飛機機場，這是汪東興布置的，他説山上山下都應當有直升機場，整個會議的物資和人員都應當用直升飛機來接送。爲此，我們空軍的人，由副參謀長胡萍帶領的機組和地勤保障人員，都駐在山上。八月二十一日上午，我先到直升機場去看望了胡萍他們，然後又爬到山頂上的雷達站，去看望了長年駐守在那裏的指戰員。了解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下午回來後，才知道陳伯達來找過我。我趕緊來到陳伯達住的地方，他告訴我，下午常委在毛澤東那裏開了會，決定八月二十三日開大會。我簡單寒暄一下就告辭了。

接着，我又去看了周恩來，向他匯報接送全部代表和布置防空的情况。我還建議，在九届二中全會開會期間，不管是空軍還是民航的飛機，都不準從廬山上空通過，以防止出事。周恩來説："你這個意見很好，所有飛機調動的事情，由你全權負責。"我當即表示："一定完成總理交給的任務，請總理放心。"

回到我住的地方，我立即叫秘書打電話，找上海空四軍的王維國和南京軍區空五軍的陳歷耘，向他們布置了會議期間的防空問題。另外，還布置南昌、九江、安慶、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做好戰備防空工作，防止臺灣國民黨軍的飛機來偵察和騷擾。最後我問了一下王維國，上海方面對張春橋有什麽反映？王維國告訴我，張春橋在上海祇宣傳江青，不宣傳林彪。我對他説，我認爲這個問題很重要。

做完這一切工作，我又去看望了林彪。在林彪的住處，我見到了林立果。葉群看我有點意外，便對我解釋説："孩子没來過廬山，上山來看看。"我當時對這件事根本没放在心上，因爲林彪的兒子到處跑跑，這是很平常的事情。接着葉群又對我説："這次開會還帶來了一些書，如果他們還要争論，就到我這裏來找語録。"她還告訴我："明天上午開大會，林總就不準備講話了。"我在林彪那裏坐了一會兒，就回去了。

七、全會開幕，林彪講話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九届二中全會在廬山的禮堂裏隆重開幕，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五個常委的位置擺在主席臺上，我們其他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全都坐在臺下。當毛澤東步入會場時，全體起立熱烈鼓掌。

開幕式由毛澤東親自主持，當他宣布九届二中全會開幕時，全場又一次響起熱烈掌聲。接着，周恩來宣布會議的議程，一是討論"憲法修改草案"，二是討論國家計委的"國民經濟計劃報告"和中央軍委的"戰備工作報告"。他還宣布，會議前半段討論"憲法修改草案"和"國民經濟計劃報告"時，黄永勝、紀登奎在北京看家；會議後階段討論"軍委報告"時，黄、紀上山，我和李先念回北京看家。

周恩來宣布完會議議程，康生便開始作關于修改憲法的報告。在這個報告裏，康生對我們起草的"憲法修改草案"，一條一條地作了解釋和説明。康生講完後，我以爲這天的會議便結束了，没想到主持會議的毛澤東突然宣布："請林彪同志講話。"

毛澤東這一宣布，我們都感到比較意外，因爲葉群會前曾明確告訴過我們林彪不講話的。

林彪接着就講開了。他首先談了對“憲法修改草案”的看法，說對這個草案看了幾遍，總的感覺很好，概括地說是“簡要明了，條理清楚”。他說，他研究了一下，覺得這個“憲法修改草案”表現出了這樣幾個特點。第一是確立了毛澤東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這樣一個地位，同時把毛澤東思想作爲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尤其寫上了整個國家機關工作的指導方針是毛澤東思想。他認爲，這一個特點非常重要，他很高興。第二個特點是憲法草案的條款、章節都寫得很明確，第三個特點是文字寫得很順暢，第四個特點是憲法草案裏寫上了關于民主方面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將這些寫進了憲法，這是“文化革命”創造出來的民主的一種很好的形式……。我記得一共講了五點。

另外林彪還講到了天才的問題。林彪說：“關于‘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這個問題，我有一點看法。人有没有天才呢？我認爲是有天才的，馬克思講了天才，列寧也講了天才。”接下來他舉了幾個例子，說明人是有天才的。然後說：“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列主義，這是延安的‘七大’就提出來了的。當然，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的實踐中鍛煉出來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的。現在有人提出這個問題，好像天才論不對。這如果是下面個別人這樣說還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講的，就會影響到全國，會引起混亂。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列主義，已經提出來很多年了，這個問題是不能動搖的。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尤其是中央的同志刮這個風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動，我們認爲這種說法不妥。”

林彪那天的講話時間比較長，大約有一個半小時左右。他講完之後，大家熱烈鼓掌，場面非常熱烈。

林彪講完話，毛澤東就宣布散會。此時不光我們幾個人很興奮，陳毅、葉劍英、陳錫聯、許世友等許多人也高興地上去和林彪握手，稱贊他講得好。尤其是許世友，對林彪的態度最爲熱烈。許世友對張春橋從來都没有什麼好感，曾多次對我說：“别看張

春橋是南京軍區第一政委，但是他什麼都不懂，一個兵也調不動。”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他們走了以後，我們還都留在禮堂内議論。大家興致都很高，衹有張春橋等幾個人的情緒不太正常。張春橋這個人是很高傲的，一向都看不起我們，平時很少主動同我們搭話。這時他的態度也變了，主動過來問我有没有記録林彪的講話，并說我記録得比他好。這真是笑話！

下午，我們見到葉群，問起林彪講話的事。從葉群那裏知道，在會前常委們休息時，毛澤東說由他主持會議，要周恩來宣布會議的議程，康生作修改憲法的報告。接着，他又問林彪講不講話。林彪說：“想講幾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彪接着說：“有一個問題，想請示一下主席，就是在憲法工作小組會議上，發生了争論，最近聽到吴法憲同志講，八月十三日憲法修改小組會議上，張春橋反對提天才，不同意寫國家機關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思想，公開反對，自從黨的八届十一中全會以來，全黨所通過的，關于毛澤東思想的三個副詞，即‘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一個評價。還說連赫魯曉夫也是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說三個副詞是一種諷刺。”林彪把八月十四日的情况大體講了一遍。這時周恩來也點了點頭，表示他知道這回事。毛主席表示：“這個要講一講，要批評，但是不要點名。”毛主席又問林彪準備怎麽講，林說：“想講兩點，一是關于憲法修改草案，感到這個不錯。第二是講一講天才問題。”毛主席還說：“這個張春橋的後臺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

葉群還告訴我們，林彪當時對毛澤東衹點了張春橋的名，没有點康生的名，這一是因爲康生在場，另一個則是因爲毛澤東很器重康生。這就是林彪在開幕式上突然發表講話的緣由。這個講話的大體内容，毛澤東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態同意了的。

八、改變全會的三項議程

二十三日下午，葉群又叫我、李作鵬和邱會作到她那裏去，說要商量一下林彪講話以後的事情。葉群提出：第一、我們幾個都要準備支持林彪的講話。第二、批評時不要點名，尤其不要點康生的名。康生是常委，如果我們涉及到康生，毛澤東不會同意的。另外，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也一律不點名。第三、堅持在憲法上設國家主席。第四，向陳伯達要一份關于天才的"語録"，争取從理論上說明問題。第五，我們幾個都在各小組會議上帶頭發言。

那天晚上，周恩來主持了一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以外，各大軍區和各省、市、自治區的主要負責人也參加了。按照慣例，毛澤東和林彪没有到會。

會議首先進行了九屆二中全會的編組工作，決定一共分爲六組，按地區劃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分别編入各組中，葉群、李作鵬被編入中南組，邱會作被編入西北組，我則被編入了西南組。

編組問題決定以後，我首先提出："是不是可以先討論一下林副主席的講話。"我剛說完，陳錫聯馬上第一個起來響應，說："好哇，要討論討論！"緊接着，汪東興、許世友、曾思玉、李作鵬、邱會作等很多人都紛紛表示同意。汪東興還特别提出要重新聽一下林彪講話的録音，大家的情緒更高了。這時周恩來也顯得很高興說："這個意見好，就按你們的意見辦，我負責向毛主席報告。"周恩來還提出："是否放兩遍録音，大家反映一遍聽不懂，爲了便于討論，明天上午在禮堂再放兩遍録音，後天再討論，這樣一共是兩天。"

這一下子，康生和張春橋很緊張了。尤其是張春橋竟然給旁邊的邱會作敬開烟了。這樣，政治局全體通過了周恩來的安排。這樣一來，就一下改變了全會原來的三項議程，改爲了首先討論

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

九、稱"天才"的幾條語録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會議組織參加九屆二中全會的全體與會人員，在廬山禮堂裏聽林彪講話的録音。一連放了兩遍，連老帥們都到了。

聽完録音，葉群又找到我和李作鵬、邱會作，要我們跟空軍、海軍、總後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通個氣，要大家發言擁護林彪的講話，但注意不要點名，因爲毛澤東表了態說"不要點名"。她還專門算了一下，各大組差不多都有我們的人，衹有華東組和東北組没有，于是就要我們幾個去跟這兩個組通通氣。

葉群又告訴我們，她上廬山前翻了幾本書，準備了一些馬克思、列寧論天才的"語録"，叫我們需要的時候到她那裏找。

回來以後，我想了一想，作些什麽準備呢？過去書讀得少，現在要想從書裏找一點馬列論天才的"語録"，一時還真是想不起來。想來想去，衹好去找陳伯達，他是"老夫子"，讀的書多嘛！晚上，我來到陳伯達的住處，發現他吊兒郎當地根本没有搞什麽"語録"。我催促他說："你陳老馬列主義水平高，能不能搞幾條'語録'，我們在會議上發言也好有個依據。"我這一說，陳伯達馬上就積極了起來。當時他從北京帶了三個專門搞理論的人上廬山，這時就要他們幾個現找。

從陳伯達那裏回來，我也開始到處找"語録"，結果找到林彪幾條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話。我讓秘書把林彪的這幾句話，送到大會秘書處去打印一下。

不久，陳伯達給我打來電話，說他的"語録"搞出來了。接着，他用電話一條一條地給我傳了過來，我一條一條地記。然後，我把這些"語録"整理了一下，又問他該叫什麽名字。他說："就

叫‘馬、恩、列論天才的語録’吧。”

快到中午時，葉群帶了林立果來到我的住處。林立果見到我就説：“爸爸説你吴司令立了大功。”我明白，他是指我前一天晚上提議討論林彪講話這件事。葉群緊接着説：“我向林彪同志説了，是你吴胖子先提出來的，大家都贊成。林彪同志聽了後很高興。”

我把陳伯達搞的“語録”拿給葉群看。葉群説：“很好，最好能給我一份。”

汪東興聽説了，還把陳伯達搞的這些“語録”拿到中央辦公廳打印了幾十份，給我送來了幾份。然後，我把打印好的材料給了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各一份。劉賢權聽説了這事，也來找我要了一份去。這樣，不少人的手裏都有了陳伯達搞的這份“馬、恩、列論天才的語録”。

十、華北組“起哄”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九屆二中全會開始小組討論。我參加西南組的討論，這一組由張國華、梁興初和譚甫仁三人主持。參加這一組討論的，還有朱德、聶榮臻和李先念等。朱德等人坐在前排，我們都坐在後面。

開始時，發言的同志祇是一般地談談，我是第四個發言的。我在發言中首先表示：“完全擁護林副主席的講話。林副主席關于天才方面問題的論述非常全面，既講了毛主席是領導中國革命戰争和建設新中國方面的偉大天才，又説明了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和戰争的艱苦實踐中鍛煉出來的。”

説到這裏，我念了一條陳伯達搞出來的馬克思關于論天才的“語録”，説明否認天才的存在是錯誤的。接下來我又説：“林副主席的講話批評了一些人所散布的反對天才論的言論，是因爲在

這次討論修改憲法過程中，有人説‘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這個説法是個諷刺。這樣的一種説法，就是想推翻八屆十一中全會，就是想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語録〉再版前言》。對此，我們絶不能迷迷糊糊的，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虚來貶低毛澤東思想。”

另外我還提到有人反對學“老三篇”。[13] 這個時候康生的老婆曹軼歐插了話，問：“是誰反對‘學老三篇’？”這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她明明知道我説的是康生，却還要明知故問。由于葉群事前打過招呼，不能點任何人的名，尤其是不能點康生的名，我含糊其詞地説：“確有其人哪。”她馬上表態説：“反對‘老三篇’是錯誤的。”我説：“這個風不可刮，我們中央全會對毛澤東思想應當是堅定不移的，要起示範作用。”我講完了，全組熱烈鼓掌。這時我心裏却在想：是不是有點講過頭了？

在小組會中間休息時，有很多人向我打聽是誰在反對“天才論”和學“老三篇”。我不好説，祇悄悄告訴了張國華和梁興初，這個人是張春橋，并告訴他們要堅持設國家主席，堅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後來李先念也來問我，我也告訴了他。他聽説是張春橋，就説：“噢，是這個家伙！我還蒙在鼓裏。”以後大家繼續發言，都是擁護林彪的講話，但是再没有人提到別的情況。朱德和聶榮臻、李先念都没有發言。下午小組會開得也是一般，比較平静。

晚飯前，林彪叫我到他住的地方去一下。我去了以後，林彪告訴我：“毛主席講了，什麼人也不要點名，尤其不要點康生。康生是常委，一端出來，打擊面太大，毛主席肯定不贊成。一定要記住，不點名。你也不要講有人反對學‘老三篇’。”

我説：“我在會上已經説了。我説了以後，曹軼歐很緊張，表示反對學‘老三篇’是錯誤的。”林彪説：“你回去和李、邱商量一下，不要點康生的名。”

[13] “老三篇”即毛澤東的《爲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文革”時期人們把這三篇文章統稱爲“老三篇”。編者注

從林彪那裏出來，又見到了葉群。她要我對李作鵬和邱會作說一說，要我們同空軍、海軍、總後的中央委員通個氣，不要點康生和張春橋的名，因爲毛澤東打過招呼，一定要注意，但是關于設國家主席的問題可以堅持。

傍晚，我到空軍的幾個中央委員王輝球、曹裏懷、鄺任農、王秉璋和曾國華的住處，向他們轉告葉群的意見，要他們帶頭發言，擁護林彪的講話，堅持設國家主席，堅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

晚上我們一起湊情況，才知道當天下午華北組“起哄了”。首先是陳伯達發言，他把我的話搬出來説：“吳法憲同志説的好，要警惕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虚來貶低毛澤東思想。”然後是汪東興發言。他的發言是下午所有發言人中調子最高的，他明白告訴大家，一定要堅持設國家主席，要擁護毛澤東出來當國家主席，否定毛主席的偉大天才是極其錯誤的。由于汪東興是毛主席身邊的人，當時很多人都認爲他的話是代表毛澤東的意思，以至後來人們紛紛起來響應。接着，陳毅元帥也發了言。性格直爽的陳毅説：“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見。天才確實有，我贊成，毛主席就是天才，我是堅定不移的相信天才的，誰反對天才我就反對他。”陳老總的講話也得到了大家熱烈的鼓掌歡迎。

他們幾個人講完話，華北組就熱鬧起來了。大家紛紛發言，指責那些反對“天才論”的人，而且要追查這些人究竟是誰?

在其它的幾個組裏，西北組邱會作的發言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連康生都贊揚説：“邱會作同志馬列主義學得好。”他還表示完全同意邱會作的講話。華東組也比較熱鬧。王洪文帶頭擁護林彪的講話，他顯然還不知道這是對着張春橋來的。王洪文還發言批判楊成武，説楊成武反對“天才論”。總之，在六個小組裏，大家都表示擁護林彪的講話，也提出了要追查是什麽人反對天才論，張春橋在會上顯得很沉悶，心情很緊張。

會議的情緒在周恩來的身上也有體現。這天晚上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恩來和我們有説有笑，但是對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表情冷淡，對江青他還是表面應付。

雖然對全會的絕大多數人來講，是不了解情况的，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知道或意識到，我們所指是什麽人。在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眼裏，特别是在那些老同志的眼裏，張春橋、姚文元這些人是没有什麽地位和威信的。張春橋和姚文元他們兩個衹是“文人”，寫寫文章，没有什麽戰功、政績。他們是靠了江青起家的，在“文革”中一步登天，到了這樣高的位置上，大家心裏是不服氣的。另外，對于“文化大革命”，大家嘴上不好講，但是對于中央文革的幾個人，支持、利用一幫造反派，迫害老同志，打擊一大片，制造混亂，破壞生産，大家是有很大怨氣的，也是很頭痛的。

所以，當很多人，特别是一些老同志，查覺到了我們的矛頭是指向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的，就都活躍了起來，紛紛參加對康生等人的聲討和譴責，借機出口怨氣。以後毛主席説我們“幾個人欺騙了二百多中央委員”，其實，别説我們根本没有欺騙他們，就是想欺騙他們，在座的有相當一批老同志，個個身經百戰，獨當一面，哪一個是好欺騙的? 衹不過當時大家心裏都有一種的情緒，對中央文革一幫人心裏都有氣。没有這樣一個基礎，這個火是點不起來的。因此，許多人發言都提出了追查人的問題，不過是借題發揮，出出氣。就像韓先楚同志説的：“這兩天真是痛快！”楊得志後來在回憶録裏也説，看到張春橋在小組會上的狼狽樣，他感覺到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從來没有過的痛快！

八月二十五日一早，大會秘書處就發來了全會的“六號簡報”，反映了華北組討論的情况。華北組的簡報説：大家熱烈地擁護林副主席的講話，認爲林副主席的講話語重心長，非常好，對這次九屆二中全會有着極大的指導意義。大家聽了陳伯達同志、汪東興同志的發言，感到對林副主席講話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我們黨内有人妄圖否認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憤慨。在經過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黨内還有這種反動思想的人，這種情况是很嚴重的。這種人是野心家、陰謀家，是反動分子，應該揪出來示衆。

大家衷心贊成在憲法第二條中，增加毛主席是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國家副主席和恢復設立國家主席的有關內容。

“六號簡報”可以説是所有簡報中最熱鬧的一份，其中陳伯達和汪東興的發言，占了一個很重的份量。

接着，秘書又拿來了我所參加的西南組的簡報，大家的發言也是一致擁護林彪的講話，擁護設國家主席，擁護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彪當國家副主席。另外把我的講話也登出來了，我想還是等等看的爲好，所以叫秘書把簡報扣住了。

十一、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求救了

刊載各小組討論情況的簡報發下來後，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看過以後就不是一般的緊張了。二十五日上午汪東興給我打來一個電話説：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事前沒有經過聯系，突然闖到毛主席那裏去了。毛主席沒有見江青，對她説：“你走。”江青走後，毛主席單獨見了張、姚兩人。兩個人在那裏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褲子都弄濕了，他們説：現在各組都在揪人，連華東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後臺。主席對他們兩個説了些什麼，他不知道，但他已把這個情況告訴了葉群，葉群叫他給我打電話，要我沉住氣。

接到汪東興的電話以後，我心裏有一點疑慮，但轉過來一想，在這件事情上，毛澤東是不會支持張春橋的。這樣一想，心裏就坦然了。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各小組繼續討論。這天討論的情況比較平静，沒有那樣像二十四日那樣熱鬧了。許多小組都已經一致通過了設立國家主席的意見。我所在的西南組也沒有再討論，就一致通過了這個意見。這樣一來，這一天的全會又形成了一邊倒的局面。

午休後，我去參加西南組下午的會議，沒有見到小組長、四川省委書記兼革命委員會主任張國華。我問副組長、雲南省委書記譚甫仁，他回答説是到毛澤東那裏開會去了。這一下我覺得有點奇怪了，通常都是毛主席先召集政治局會議，怎麼這次直接召集各小組長會議呢？而且我們一點都沒有聽説這件事。這裏面，肯定是有什麼問題了。

十二、休會兩天，換換空氣

下午四點多鐘，張國華回來了。回來以後，他立即在小組會議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他説：“毛主席在下午兩點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組組長會議，决定停止討論和學習林副主席的講話，同時也要停止批判。現在會議已經發展到要揪人的地步了，有人寫信要把反對‘天才論’的人揪出來下放，説這樣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這個空氣太熱了，要冷下來。因此毛主席决定，休會兩天，換換空氣。關于設國家主席的事情也不要提了，毛主席説他不當國家主席，林彪同志也不當國家副主席。天才的問題也不準再提了。這兩天把會議的情况搞清楚，然後再開會。”

這真是風雲突變！我當時在心裏想：這個張春橋真有辦法，到毛主席那裏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過來了。現在情況完全變了，但是什麼情況還不清楚。帶着這樣一種心情，吃過晚飯，我急忙到了林彪的住處，想了解一些情況。葉群對我説：“林彪同志到毛主席那裏開會去了，會議可能要休息幾天，不要緊張，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情況，你們沒有來過廬山，可以到外面去玩一玩，散散心嘛。”葉群説的這些話，是在安慰我還是真的不在乎，我不知道，總之她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時間不長，林彪回來了。他一坐下就對我説：“毛主席的態度變了，不高興了。他批評了陳伯達，説陳伯達在華北組跳出來，

起哄要揪人了。還説國家主席和‘天才論’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這個情况，没有什麽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緊張。”

這個事情，林彪對我説得很簡單，看來他也很沉得住氣，但我的心裏還是感到不安了。

晚上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各組的匯報。在這個會上，康生他們又神氣十足起來，氣勢跟前幾天完全不一樣了。因爲毛澤東變過來了，站到他們一邊去了。在這個會議上，周恩來又一次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休會兩天，换换空氣。”

十三、首當其衝的陳伯達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八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全會休息兩天。這兩天裏，説是“换换空氣”，其實是充滿了一片緊張的氣氛。毛澤東整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組長開會，反而把我們政治局委員們排除在外。這種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在這兩天裏，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這幫人也活躍了起來，他們拼命地做工作拉人，這兩天都是他們在活動。而我們一下子沉默了，一天天無所事事，不了解情况，也不好去打聽，祇有去找葉群問問。而葉群却一再跟我們説："没有什麽事情。你們在家不如出去玩玩，散散心。”

可我們哪裏有這份心情呢？後來，葉群真的來約我們一起去上山逛一逛。在山上，我們正巧遇到了陳伯達，由于大家的心情都不好，誰也没有説什麽，祇是打了個招呼而已。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陳伯達突然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要我和李作鵬、邱會作一起到他那裏去一下。我們到了他的住處，見到他的心情很壞。他告訴我們："這次找你們是經過毛主席批準的。你們幾個今後不要再同我來往了，不要互相打電話，也不要寫信了。”他的話音裏充滿了凄凉。我們很驚訝地問："情况有這麽嚴

重嗎？”陳伯達説："毛主席批評我們有一個‘軍事俱樂部’，并且要我到康生、江青那裏去承認錯誤，結果康生、江青他們把我駡了一個狗血噴頭，駡了一個晚上還嫌不够。他們説我是叛徒，是叛變中央文革，出賣江青、康生、張春橋；説我投靠軍委辦事組，把林副主席綁在我陳伯達的戰車上，勾結軍隊想殺害他們；説我可耻等等，什麽話都駡盡了。”

聽到這些話，我們心裏都很氣憤，什麽“叛變”、“殺害”，話説得太過分了嘛！但同時，我們的心裏也感到很沉重，因爲我們當時都感到，這樣的事情可能很快就會輪到我們的頭上。

陳伯達還説："毛主席批評了我，説我自以爲懂得理論，鼓吹‘天才論’，在華北組起哄。毛主席説我欺騙了你們，你們把我的語録都燒掉吧。另外，毛主席還點了汪東興、陳毅、鄺任農的名，你們也要注意。”

陳伯達的這番話，使我們更加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陳伯達這個人膽子小，毛澤東一批評，再加上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跟着整了他一個晚上，這就弄得他非常緊張，也很害怕。我們就對他説："不要怕，我們有難同當！”同時我們心裏也憤憤不平。

從陳伯達那裏出來，我們又到了林彪的住處，把陳伯達説的話告訴了他。林彪説："毛主席是批評了陳伯達。”除此以外，他什麽都没有説。

十四、追查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周恩來打電話來説，他和康生要找我、李作鵬、邱會作談話。我們來到周恩來的住處，康生已經在座，汪東興也在那裏。這次談話，主要是追查我們在小組會議上發言的事情。康生一開始就氣勢洶洶地説："汪東興在華北組點火，陳

伯達跳起來批判，陳毅這個‘反革命分子’說‘站起來鬥争’。”他還總結了四句話：吴法憲造謡，汪東興點火，陳伯達起哄，陳毅跳出來。康生真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周恩來衹問了問會議的情况，没有加任何評論。聽到康生講這些話，他也一聲不吭。我們説："康生同志，你下這個結論未免太早了點吧？"

從周恩來那裏出來，吃過晚飯，我和李作鵬、邱會作一起前往林彪的住處，想向他匯報一下下午周恩來、康生找我們談話的事。林彪正好從毛澤東那裏開會回來。他告訴我們："一是關于設國家主席的事情，不要再提了。這次毛主席説國家衹設人大常委會主任，不設國家主席。主席還説，‘我不當這個國家主席，我勸你林彪也不要當’。"就這樣，在毛澤東的强大壓力下，林彪不得不改變了態度，把"天才論"和設國家主席的意見，都放弃了。

關于下午周恩來和康生追查我們的事情，我們也告訴了林彪，説："這次把汪東興也一起拉進去了。"林彪没有説什麽，衹是聽，最後説了一句："讓他們去講吧，總要有事實根據吧。"

八月二十七日早上，林立果來找我，交給我一本"九大"的黨章，説是林彪要他來送給我的，并告訴我，林彪要我看一看，早在"九大"上通過的黨章中，關于毛澤東思想前面的三個"副詞"，就已經不見了。我翻開黨章一看，果然如此。

這天上午，周恩來和康生繼續找我們談話。去談話時，我帶上了這本黨章。這天上午，我們又被追查了三個小時。康生一上來就要我們交代"軍事俱樂部"的事，説："你們要交待，這個‘軍事俱樂部’是怎樣形成的？你們長時間串通一氣，還有陳毅這個反革命分子……。"我説："康老，你是中央常委，陳毅是中央委員，他什麽時候成了‘反革命分子’，你説話太隨便了吧。説陳毅和我們串通一氣，你康老有根據嗎？他在華北組發言説了什麽，我怎麽知道？他什麽時候成了我們‘軍事俱樂部’的人呢？再説我們是軍委辦事組，這都是公開的，没有什麽‘軍事俱樂部’，八月十四日討論憲法的會議你康老也是在場的嘛。這個争論你是當事人，怎麽是我造謡呢？"我説得有一點激動，聽到這

時，周恩來忙説："康老的話説錯了。"當時康生説陳毅是"反革命分子"這個話我一直没有告訴陳毅。後來，整個會議一直把陳毅元帥算到我們"軍事俱樂部"裏，叫作批判"二陳"（陳伯達、陳毅）——真是冤枉！

這時，邱會作也説："你康老在西北組討論的時候，贊成我講的話，還表揚我説我馬列主義學得好。這個話你忘了嗎？"聽了這話康生臉都紅了，忙説："我并没有説你説的都對嘛！"這樣，康生的氣焰才稍稍收斂了一點。見到這樣，周恩來趕緊説："我們衹是把情况弄清楚，大家都冷静些，現在不評論是非。"

我把"九大"黨章拿出來，把寫着"黨内允許有不同意見的争論"的那一頁翻給周恩來看。然後我問周恩來："‘九大’黨章中的‘三個副詞’爲何删掉了？"

這一問把周恩來給問住了，他説，這"三個副詞"實際上不是林彪提出來的，而是"八大"由鄧小平提出來的，但是"九大"黨章上爲何删掉了這"三個副詞"，要查一查。這個問題康生也搞不清楚。後來周恩來指示要辦公廳的同志去查，結果發現是毛主席審閲黨章時，自己圈掉的。

十五、周恩來要我寫檢討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我剛剛起床就接到周恩來的電話，叫我馬上到他那裏去一趟。周恩來找我，是要我寫一個檢討。他説："你是辦事組副組長，組長没有來，你們組裏出了事情，你應該主動承擔一點責任。還是寫個檢討，把問題説清楚就算了。"他還告訴我："這樣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統帥’擔責任。你明白，問題是‘副統帥’的講話引起來的。要保護‘副帥’，不然的話又要攻到‘副帥’的頭上去了"。

周恩來的講話把林彪稱作"副帥"這個我明白，一是不好點

名，二個是要我爲林彪開脱一下，周講的很中肯，我感到是一片好心。于是我當即表示："我一定寫這個檢討。但是怎麽寫，我覺得有點難。我想是不是檢討這樣一條，説林副主席的講話是我提出來要討論的，這樣做干擾了大會的方向。"

周恩來聽了説："好哇！你也應當替我擔一點責任。不然的話，是我主持會議，好像是我提出來要討論林副主席的講話的。這事是你提出來的，然後大家同意的。"我説："我回去考慮一下，盡快寫出一個檢討，先請總理審閲。"周恩來還問我："你們搞'語録'了嗎？"我回答説："是我向陳伯達要的。他給我找了幾條'語録'，我打印了幾份，給了李作鵬、邱會作各一份。"

周恩來接着就要我把陳伯達搞的"語録"拿一份給他。我回去後，馬上叫秘書找了一份"語録"送給了周恩來。後來周恩來又把這份"語録"送到了毛澤東那裏。下午，周恩來又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再次强調作檢討的目的是爲了保護"副帥"，把事情平息下來。我表示："請總理放心，一定按總理的意見辦。"

我想了一下，覺得這樣的事情還是應該請示林彪。晚飯後，我到了林彪那裏，林彪就對我説："昨晚，是康生的意思，約周總理到我這裏來了，説匯報你們幾個的情況。康生説，這次廬山會議的主犯有三個，一是陳伯達，二是吴法憲，三是汪東興，是吴法憲造謡，汪東興點火，陳伯達起哄，還有陳毅跳出來。我對他説，我不同意這個意見，這個問題根據不充分嘛！説吴法憲造謡，八月十四日的争論你也在場，怎麽是造謡呢？吴法憲這個人我了解，從一軍團到四野，跟了我幾十年，從來没有聽他造過謡。再説陳毅和吴法憲、汪東興他們也没有聯系。説到這裏，周總理解釋説，陳毅是跟着陳伯達來的，發言表示同意陳伯達的意見。我説，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後來周總理看到氣氛不好，就對康生説，我們走吧，副主席要睡覺了。這樣他們才走了。"

林彪説完，我才向他報告説："周總理要我寫個檢討，主要的意思是爲'副帥'承擔一點責任。"林彪聽完馬上説："你不要寫檢討！你没有錯，講話是我講的，錯了我負責。"我解釋説："總

理的意思是要保護你。"林彪説："要檢討你檢討。你的檢討我也不看，用你的名義上送。"我看得出，林彪對我寫檢討是不高興的。

林彪還對我説："我們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點，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過他們。這次不該講話。"我理解，林彪這話的意思是，我們這些人打了幾十年仗，搞政治不行，没有心計，人家一講就當真了，結果上當了，在政治上我們搞不過張春橋他們那些文人。以後有人説：林彪這個話是想搞武裝政變，意思是搞文的不行就搞武的。這完全是顛倒了原話，斷章取義。當時會議還絲毫没有涉及到林彪，他是副主席，副統帥，接班人的地位也還没有任何動摇，有什麽必要搞武裝政變呢？林彪當時講話不是這個意思。

第二天（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林彪專門又告訴我："毛主席又和我談了話，説對張春橋這個人還要看兩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時候我交班給你。"

在當時，我很清楚林彪不願意我寫檢討，可又覺得也不好違背周恩來的好意。前思後想，我感到這個檢討還是要寫。于是，我利用晚上的時間拉了一個提綱，一共是兩條，一、討論林彪的報告是我提出來的，干擾了大會的議程；二、我對林彪的講話理解上有偏差，有錯誤。拿着這個提綱，我又和李作鵬、邱會作商量了個把小時。他們倆都説，言多必失，簡單一點爲好。這樣，我的這個檢討，一共衹寫了幾百個字。

十六、黄永勝上廬山

這時，黄永勝也上了山。根據會前的安排，這次全會從八月二十日起，黄永勝一直留在北京看家。不過，我們在山上天天和他聯系，他是辦事組的組長，我是副組長，應當向他匯報情况。

另外，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也經常同他保持着聯系。

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講話内容，我用電話傳給了他，當時黃永勝很高興，并要我和李作鵬、邱會作一起，交代軍委辦事組的秘書宋誠代他寫一個書面發言稿，表示完全擁護林彪的講話。寫好以後，由宋誠直接用電話念給他聽，并由他作了若干的修改。改好後，他就讓發出去，我説最好再等一等。果然到了二十五日情況大變。到了二十七日的晚上，黃永勝來電話催我，要我盡快把他的書面發言發出去。我説："可是不能再發了，情况全變了。"接着我把情況大致告訴了黃永勝，但是電話上又不敢多講。他聽得不明不白，就很着急，一再讓我講詳細一點，并且很奇怪地問："怎麽兩天就全變了呢？"我説："電話裏不保險，等你上山再説吧。"

二十七日晚，我給周恩來打了一個電話，因爲按照原來的計劃，我是會議後期回北京換黃永勝上山的。周恩來説："這個事情要請示毛主席。"過了兩個小時，周恩來打電話來説："主席説，吳法憲不回北京，同時要黃永勝立即上山，李德生回北京看家。"這樣，我也就有了思想準備，看來是要倒霉了。

二十九日下午 黃永勝坐飛機來到廬山。他這次來廬山，具體的事情都是周恩來一手安排的，不叫我管了。黃永勝一上山，連林彪都没有見面，就被拉到毛主席那裏去了。得知這個消息，我和李作鵬，邱會作，在商量完我的檢討以後，就三個人一起到黃永勝住的地方去等他。我們猜想，這個談話很可能與我們關系重大，因此我們都很想早一點知道毛澤東找黃永勝談話的内容。當時我就想，這下可好，冷落我們，拉黃永勝了！

我們幾個都到黃永勝住處一直等到下半夜，他才從毛主席那裏回來。可他一回來，又先到林彪那裏去了。我們衹好繼續耐心地等，一直等到了八月三十日的凌晨四點鐘，才等到黃永勝回來。看到黃永勝，我們都很着急地想知道毛澤東跟他談的情況。結果還好，因爲他不在山上，毛澤東没有批評黃永勝本人。但他對我們説，毛澤東説："你一個組長不在，你的副組長和副總長

就在這裏起哄……"毛澤東還説："一方面軍的幹部不如四方面軍的幹部好，四方面軍的幹部比較謹慎，一方面軍的人驕傲自大。"看得出來，有些話黃永勝没有對我們講，可能是怕我們聽了思想上有顧慮，我們也不便多問。

過了一會兒，葉群也來了。我們又一起商量了幾條原則：一是各自檢討，互不涉及；二是山上山下没有聯系，檢討不牽涉到林彪、黃永勝；三是不揭發陳伯達和汪東興，以便保護他們。我説："現在周總理要我作檢討。我是副組長，由我來作檢討承擔責任，以保護林副主席。"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意見。

八月三十日上午，我把這個檢討親自送給了周恩來。他看過以後很高興，説："這樣就行了。主要是對林副主席的講話在理解上有錯誤，這個提法好！"

後來，林立果來到我這裏，對我説："爸爸的意見，不要你作檢討。他的意思是，有問題要檢討，也要由他來檢討，你没有責任。"我再一次作了解釋，説是周恩來要我作的檢討，主要目的是爲了保護林彪。這個時候，林立果不高興了。以後他跟人説："吳法憲不如陳伯達，陳伯達根本不作檢討，但是吳法憲檢討了三次。"

我聽到了這個話也不很滿意，心想：我這樣做是尊重周恩來總理的意見，是爲了保護"副帥"。這樣的大事，你一個小孩子怎麽能出來横加干涉！

十七、《我的一點意見》

我的檢討寫好以後，由周恩來送到康生那裏以後，康生借機打擊報復，批了一大通，説什麽"吳法憲的檢討不像話"、"不接觸思想實際"等等。具體我記不清了。這樣我衹好寫第二次檢討，又加了幾句話："没有很好地調查研究，没有學好馬列主義，没

有很好地了解情況……。”

結果這個檢討又一次被康生批回來。我又寫了第三次檢討，康生還說不行，周恩來説：“人家已經寫了三次了。”看到周恩來出來説話了，康生衹好説：“那好，就算了吧。”這樣我的檢討才算通過。由周恩來、康生兩人簽名印發給全會，而且要在政治局會議上再通過一下。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周恩來打電話叫我到他那裏去，又談起我檢討的事情。他把毛主席寫的《我的一點意見》拿給我看。這個材料我記得不全，大意是：“這個語録是陳伯達搞的，欺騙了不少的人，我和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從來没有配合過，兩次上廬山，第一次他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一次可好了，采用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的話是形容這位理論家（可不是野心家）的心的廣大而已。杞國無事憂天傾，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我和林彪同志共同認爲，是唯物論的反映論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是英雄們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的，我們不能和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站在一起。”

看了《我的一點意見》，我心裏就在想：陳伯達完了！但是我又感到想不通，感到不好理解。陳伯達這個人，我認識多年了。他爲人膽小，處理問題不果斷，甚至有些懦弱，不過處事謹慎，書生氣十足，是個標準的文人。“文革”開始後，他雖然身爲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但在中央文革小組，基本上是康生、江青説了算。陳伯達在組裏没有什麼威信。

據我所知，陳伯達從一九三九年起就開始給毛澤東當秘書，三十年多來一直在毛澤東的身邊工作。抗日戰争、解放戰争期間幫毛澤東寫文章，爲此他在延安就當了中央委員。解放後，在毛澤東“四大秘書”的班子裏，陳伯達是頭一個。

毛主席自已也忘了，他兩次出訪蘇聯都是陳伯達陪同的。在毛主席和劉少奇的鬥争中，毛主席也是幾次借助于陳伯達，“四清”中的《二十三條》、“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

席委托陳伯達搞的。毛主席還親自點名陳伯達任中央文革組長，而正是這個中央文革後來在黨内代替了中央常委辦公會。是毛主席把權利交給了陳伯達，陳伯達也是爲毛主席立了“大功”的。

但現在，一有了不同的意見，一有了“錯誤”，就説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這樣，那爲什麼要把陳伯達一直留在身邊，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爲黨内第四號人物呢？這是怎麽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見，就算總帳，算老帳，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層地獄。對彭德懷、劉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讓人心寒哪！

另外，説到這次廬山會議，毛澤東説的那些“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炸平廬山”等等，實際上都是不同意見的争論，而這些意見都是公開的。我們與張春橋的争論，是八月十三日憲法修改小組會議上争論的繼續，這些情況周恩來都是知道的。再説，林彪的講話事先請示過毛主席，毛主席也是點過頭的嘛！毛主席説不要點名，我們就没有點名。這怎麽是“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呢？”

還有，這次明明是林彪講的“天才論，”陳伯達明明衹是擁護林彪的發言，而毛主席明明是批判“天才論”，却又説：“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認爲。”怎麽是一致呢？這個“一致”是毛主席强加給林彪的。我心裏想，毛主席的點子真多，這個話的意思是拉林彪打陳伯達，看來這次陳伯達是個犧牲品，可能還不至于搞我們。這樣，我覺得心裏有了一點底。

在我看了這個材料之後，周恩來又對我説：“原來，毛主席還要把你搞的‘語録’和陳伯達的一起批，是我親自對主席説，這個材料是吴法憲寫的，這樣毛主席才把你的材料拿掉了。所以你還是要檢討，要保護‘副帥’。”

十八、“陳伯達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來”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時，林彪在他的住處召集黃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和汪東興開會。他對我們説：“下午到了毛主席那裏，毛主席指示，陳伯達在全黨、全國的威信太高了，這次廬山會議要把他拿下來，要我和你們先打個招呼，和陳伯達劃清界限。毛主席説，要我先找你們開一個會議批判、揭發陳伯達。”

大約過了半小時，陳伯達來了。林彪主持會議，要我們批判陳伯達。我們和陳伯達的關系不錯，在這件事情上批他，一時轉不過彎子來。大家都不發言，會議冷了場。

最後還是陳伯達自己講開了，説：“我犯了錯誤，連累了你們，不該給你們搞‘語録’，搞‘語録’是欺騙了你們。”我説：“‘語録’是我向你要的。我們看馬列的書少，所以要你來幫忙。”陳伯達説：“你們今後不要再同我來往了。”我們幾個都説：“黨内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經常的嘛。”結果，大家説來説去就是這幾句話，批不起來。本來也没有什麽可批的，因爲在許多問題上我們同陳伯達的意見都一致。會議的氣氛很沉悶，不到一個小時就結束了。

我心裏想，主席説“陳伯達威信太高了，所以要把他拿下來”，這是什麽理由嘛！其實陳伯達的威信一點都不高。在中央文革裏，他就像個受氣的“小媳婦”，康生、江青都是隨便駡他、諷刺他。正是因爲這個原因，他後來才逐漸向林彪和我們靠攏。爲了這個，毛澤東在“九大”前就指責他是“本性不會改變，本質不會改變”。看來，毛澤東主要是不高興陳伯達同我們搞在一起。現在，林彪衹有按毛澤東的指示辦，把陳伯達甩出去救我們。實

際上，這樣也根本救不了我們，反而讓毛澤東分而治之了。這樣的教訓簡直是太多了！

當天晚上，又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破例由林彪來主持，周恩來、康生和在廬山上的全體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及各大組組長和各省、市、自治區的第一書記都參加了。

大家到齊後，林彪宣布開會，會議的主要内容是批判陳伯達的錯誤。康生首先發言。他揭發陳伯達是假馬克思主義，自稱是理論家，實際上是政治騙子。他搞分裂活動，這次廬山會議是他第一個跳出來，分裂黨中央，搞宗派活動，參加‘軍事俱樂部’，欺騙工農幹部。把我們幾個人也拉上了。總之有很多嚇人的帽子，衹差“現行反革命”了。

康生發完言，就是我作檢討。我念完檢討後，表示要與陳伯達劃清界限。但關于“語録”的問題，我説明這是我向陳伯達要的，錯誤在我，不能由陳伯達負責。

我説完後，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他們發言。這個時候他們可神氣了，講話都是手舞足蹈，把陳伯達駡得一塌糊塗，説陳伯達背叛中央文革，挑撥離間、造謡哪……，一個比一個厲害，上綱上綫。各省市的人很少有發言的，衹有王洪文等少數幾個人跟着張春橋一起表態。

會議進行中，我看見周恩來給林彪遞過一個條子，條子上寫了什麽我不知道。後來林彪告訴我，周恩來的這個條子是要他表揚一下張春橋。周恩來是一片好心，因爲張春橋在這個會上的發言衹批判了陳伯達，没有涉及到我和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但是林彪没有采納周恩來的意見，一句話都没有講。林彪對張春橋是很有數的。會議一直開了四個小時，到午夜才告結束，把陳伯達鬥了一頓。

從那以後，陳伯達就被關起來了。他就被關在廬山的一所房子裏，由中央辦公廳和中央警衛團的人看着他，失去了自由。我和陳伯達這一别就是十一年，一直到了一九八一年鄧小平審判我們的時候，我才在法庭上見過他一次。陳伯達已于一九八九年去

世了。

十九、周恩來坐鎮西南組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全會就開始批判陳伯達。九月一日上午，我去參加西南組的會議，這一下氣氛完全不同了。小組會說是批判陳伯達，結果批起我來了。爲了監督對我的批判，康生還親自來到了西南組。

小組會開始後，他的老婆曹軼歐可是來了情緒，説："怪不得你吴法憲身爲政治局委員，在會議上講那樣的話。造謡欺騙大家，你不以爲可耻嗎？"我當時真是忍了又忍，心想：反正這是在黨的會議上，就由她去説吧。

接着，曹軼歐又標榜起了康生和她自己。她説："陳伯達是跟着王明的，康生同志和我是反對王明的。建國以後我們曾給毛主席寫過信，提出要批判王明。我們在莫斯科就反對王明。"這時有人出來拍馬屁了，説："曹大姐，你應該向毛主席再寫個報告呀。"

曹軼歐説完，雲南省委副書記周某和外貿部部長李某等都跟着來指責我。對這些，我也是硬着頭皮聽着，不吭聲。

散會以後，我給葉群打了一個電話，説："現在西南組不是批判陳伯達，而是批判吴法憲了。"葉群對我説："你沉住氣，我報告周總理。"過了一會兒，周恩來給我打來電話，問我："究竟是怎麽回事？"我把西南的情况説了説，他考慮了一下，説："下午我來。"

下午周恩來親自到西南組坐鎮來了，康生就不到會了。會議開始後，周恩來聽了一段，就説："你們這樣批判就不對頭了，我們講要批判陳伯達，没有講要批判吴法憲。'語録'是從陳伯達那裏來的，還是要批判陳伯達。"周恩來這樣一插話，會議的氣氛就又變了。我很感謝周總理當時對我的保護。

西南組還有朱德、聶榮臻兩位老帥和李先念等幾位老同志，他們始終都没有發言，不但没有批我，連陳伯達也没有批。我當時心裏很佩服這些老同志，他們不僅鬥争經驗豐富，城府也很深。

其它小組的會議，也是一樣，除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以外，大多數的人因爲不了解情况，祇是聽聽而已，大都没有發言。

二十、九月一日的常委會和公報

陳伯達的問題批了兩天，後來就没有什麽進展了，本來也没有什麽可批的。九月二日晚，毛澤東通知開中央常委會。林彪開完會回到住處，要葉群通知黄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到黄永勝的住處碰頭。我們見到了葉群，她告訴我們，毛主席提議陳伯達不再批了，準備討論"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和軍委的"戰備工作"報告。毛澤東還提出，六日全會閉幕，散會回家。這次是康生打着大家的旗號，提出説："大家的意見，要把廬山的問題搞清楚，不搞個水落石出，就不下山。"這時毛主席發火了，説："要開會你康生去開吧，我是不開了。"在這種情况下，康生不吭聲了。毛主席還是决定，六日全會結束，發公報。這樣毛主席給了康生一記悶棍，因爲康生很狂。這次會上，除了毛主席就是他了，林彪、周恩來都没有講話。

九月四日上午，周恩來見到我説："考慮起草全會的公報，我的意見是請張春橋、姚文元，你們那邊由葉群、李作鵬參加一下，你就不用參加了。"自從"九大"我被周恩來提名爲大會副秘書長以來，有關會議公報的事情我一直都在參與，但這一次他讓我"靠邊站"了。周恩來對我很客氣，生怕我有什麽思想包袱，其

實我早已對此有了思想準備，我馬上就表示："我參加也不好。"這樣，周恩來搞了一個調和，讓我們雙方各派兩個人來參加公報的起草。

九月四日晚，林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國家計劃委員會的"關于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和中央軍委的"關于加强戰備工作的報告"。"關于加强戰備工作的報告"由黃永勝作了説明，然後討論了三個小時。當時大家都被陳伯達的問題搞得很緊張，所以對這兩個報告，誰也也没有什麽心思討論，也就很快通過了。

接着，周恩來又提出了公報起草的人選問題。大家都同意周恩來提出的意見，由張春橋、姚文元、葉群、李作鵬四個人組成公報起草小組。其實，公報都是張春橋、姚文元的意見，葉群和李作鵬衹是聽，表示同意就是了。這一次公報都是些冠面堂皇之詞，對廬山會議的鬥争，衹字未提。

九月五日開大會，黃永勝代表中央軍委作"關于加强戰備工作的報告"、李先念代表國務院作"關于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九月六日上午，繼續開大會，就以下幾個問題作出決議：

1、通過了憲法修改草案。

2、通過了關于召開四届人大的意見。

3、通過了召開全國計劃會議和一九七〇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

4、通過了中央軍委關于加强戰備工作的報告。

九月六日下午三時，九届二中全會閉幕。會議由毛主席主持，首先通過了全會公報。接着，毛澤東發表了講話。他説："現在不讀馬列的書了，人家就搬出什麽第三版，照着吹呀！你没有讀過就會上那些'黑秀才'的當。當然，也有些是'紅秀才'哟。"這時，我想，那些"紅秀才"，就是張春橋、姚文元他們了。毛主席接着説："我勸同志們，有閱讀能力的，讀幾本什麽哲學史、歐洲史。人家是哪一本、第幾個版本都説了，自己没有看過就上當。"

毛澤東還説："有人想炸平廬山。我説廬山是炸不平的，地球還是照樣轉。總而言之，無非是那個味道。我説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聽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幾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爲他們認爲，代表人民就是要當國家主席。我在十幾年以前就不當了嘛，豈不是十幾年以來都不代表人民了嗎？我説誰想代表人民，你去當嘛，我是不幹。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幹。你有啥辦法呀？"

最後，毛澤東又講到了團結。他説："不講團結不好，不講團結得不到全黨同志的同意。總是團結好一些，人多一點好嘛！我們黨内一些同志，歷來歷史上鬧别扭，現在還要鬧，你有啥辦法？我説還可以允許，此種人不可少。一定要搞得那麽乾净，就舒服了？睡得着覺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時候又是一分爲二，還是有要鬧的。總之，黨内黨外都要團結大多數，事情才好辦。"

接着是康生講話。康生以勝利者自居，神氣十足地大講了一通學習馬列主義的重要性。他大概一共講了四點：一、馬列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一定要學好，不能衹學幾條"語録"；二、學習馬列主義，要注意聯系實際；三、要聯系中國革命的實際學好毛澤東思想；四、要系統的學習，不要各取所需。總之，康生的這些話，是在不點名地批判我們。

在閉幕會上還宣布了對陳伯達進行審查。與全會的開幕式不同，閉幕式的氣氛很緊張，到會的人没有幾個面帶笑容。

二十一、林彪要我們見江青

全會閉幕的當天晚上，林彪帶着葉群去了江青那裏。這次我們打了大敗仗，對林彪來説，這是包括戰争時期以來的第一次。林彪去江青那裏是要緩和一下氣氛。江青要林彪注意保重身體，林彪也告訴江青：這次不回北京，要直接去北戴河養養身

體……。這些都是表面應付，實際上林彪和江青關系早已經破裂了。回來以後林彪又要葉群帶着黃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到江青那裏去。這次來廬山後，我們還是第一次進江青的門。江青住的是廬山上最好的房子，原來是蔣介石住過的。這座別墅前面的階梯較高，上去比較吃力，何況當時我們幾個人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

進門後，江青板起一副面孔來同我們握手，一見面就說："你們不聽我的話，所以犯了錯誤。"

當時我心想：江青真是狂，不過我没有說話。我們在來之前統一了思想，這次來衹聽不說。葉群還特意囑咐我們不要說話，所以，我們衹是聽江青一個人訓話。後來，江青又追問我們："你們向主席告過我什麽狀？"這話我一聽就明白了，肯定是說上次她在釣魚臺找我們談話以後，我們到毛澤東那裏告她的那件事。這件事情，除了毛主席本人外，别人是不會傳這個話的。一方面毛主席要我們一定不要告訴江青，另一面自己又向江青通風報信，我真的不明白毛主席爲什麽要這樣做！這一下我們衹有裝聾作啞，一言不發。

江青又說："你們不聽老娘的話，吃虧了吧！要是早聽了我的話，就不會犯錯誤了。"在江青說這話的時候，我看見黃永勝和李作鵬兩個人雖然没說一句話，可眼睛都鼓起來了。爲了緩和一下空氣，我說："我這次犯了錯誤，對不起江青同志。"

我作了檢討，大家作啞吧，就是江青一個人說話："你們今後要接受教訓。犯了錯誤不要緊，改了就好。你們也許還要檢討。今後要多同我聯系，怎麽樣？"我還想說幾句，但黃永勝拉着我，不讓我說。這樣，我們没有人表態，待了半個小時，就出來了。

回去的路上，黃永勝對我說："這個時候你還說什麽，反正以後够我們受的了，還不知道要檢討多少回呢！"李作鵬也說："從此以後没有完，一直到打倒爲止。"這話讓李作鵬說中了。

這天晚上，我們一起回到黃永勝的住處。這時，各省、市和各大軍區的同志來看黃總長。但是對我、李作鵬和邱會作就不同

了，連過去比較熟悉的一些同志，也不敢來看我們了。大家表面上比較客氣，但是思想上都比較緊張。

二十二、下山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晚上，我想到下山的飛機還没有安排，就給周恩來打了一個電話。周恩來說："請把胡萍叫來，我直接安排。"我說："胡萍衹是一個副參謀長，最好還是由王輝球、鄺任農他們負責一下，他們兩個你也熟悉。把他們兩個留在廬山，替你安排，把曾國華放在九江機場指揮。"周恩來同意了我的意見。于是，打完電話，我就把王輝球、鄺任農、曾國華找來，一起布置了用飛機疏散下山人員的問題。我要他們對這一事情各負其責，一切聽從周恩來的安排。然後，他們三人就分散到九江和南昌機場指揮。

下山的時候和上山的時候完全不一樣了。上山的時候是周恩來放手全權由我來安排的。但是下山的事，周恩來不叫我插手了。由于這次廬山上的情況，我感到周恩來已經和我疏遠了。

九月七日，根據周恩來的安排，黃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同乘一架飛機回北京。那一天，恰巧林彪和葉群走在我們前面，前來送行的還有程世清，他是東道主。我們上了林彪的飛機，當時林彪和葉群的情緒都還好，由葉群安排我們和林彪一起照了相，葉群還開了幾句玩笑，所以照片上大家都是面帶笑容。以後見到有關材料說我們這張照片是"要進一步加强反革命勾結伺機反撲。"

送走了林彪、葉群，我們又和程世清一起合影留念告别。在飛機上，我們幾個人的情緒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爲在廬山，我們經歷了一次殘酷的鬥争。我從八月十七日上廬山到九月七日下山，一共是十八天。這是我到目前爲止最難過，最倒霉的十八天，

整天忙于挨鬥，忙于被追查。

我這個人有一點迷信，我發勞騷說："第一天上山就撞了車，早知道這樣，還不如上山時一下撞死，摔死的好。"廬山這個地方上不得。一九五九年在廬山整掉了彭德懷、黃克誠；這一次又整掉了陳伯達，我們也挨了整，下一次還不知道輪到誰。我在廬山上作了三次檢討，還是沒有過關。我想了想，這幾天真象是一場夢，怎麼會發生這樣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九大"前後，我們同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幾人的矛盾逐漸的公開化了，在一系列的事情上，如在穩定軍隊的問題上；發展全國經濟的問題上；文藝政策的問題上……，毛主席都公開的批評了江青，而站在我們一邊。尤其是汪東興多次傳來毛主席的話，都是支持我們的嘛！汪東興還再三的對我們說："他們（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是不代表毛主席的。"

再就是關于設國家主席，那還不是毛主席自己說的，他要我們討論一下是否設國家主席，還說要設國家主席也是林彪同志當。當時在我的思想上，還是想讓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彪身體不好，不一定當得了國家主席。這件事，要不是毛主席的意見，我們是絕不會這麼做的。

再說，除了華北組的討論和那個簡報外，其它小組的情況還是比較正常的嘛！這比起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判鬥爭李富春、譚震林、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幾個老帥和副總理的情況差遠了。那次會議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他們是指着鼻子，面對面的罵這幾個老帥和副總理的，足足鬥了一個星期。對此，毛主席親自主持會議也沒有說過一句"過火"的話。而這次我們不點名地批一批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他們就不得了了，捅了馬蜂窩了。我心裏真是不明白，毛主席怎麼會一屁股坐到江青、康生、張春橋一邊去了？

黃永勝他們幾個都安慰我說："不要再檢討了，再檢討也是一樣。"我說："我檢討祇涉及自己，和你們沒有聯系。毛主席說了，犯了錯誤允許改嘛。"他們說："看着吧，這件事情沒有完。"我

提出了幾個原則：一、堅持山上山下沒有聯系，强調問題是我八月十四日的電話報告引起來的，由我主動承擔責；二、我的檢討，祇講自己，不涉及別人；三、黃不作檢討，李作鵬、邱會作是否作檢討看情況定；四、我，李作鵬、邱會作也不相互埋怨。總之無論如何不要涉及林彪、葉群，也不要涉及到黃永勝，這是大前提。"臨下飛機前，他們三人又一次勸我說："不要多說話，言多必有失，要沉住氣。"

想起解放前，自己打了幾十年的仗，解放後在空軍也工作了十幾年，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翻船，我深深地後悔自己不該到中央來，如果我仍然在空軍工作的話也不會有如此的遭遇。我想還是林彪說得對，我們這些"丘八"不懂政治，鬥不過他們。

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也就是廬山九屆二中全會十九年後，我才有機會看到中央在"九一三事件"後給我們定性的文件，說是我們進行地下活動，制造謠言，欺騙同志，向黨發動了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進攻，妄圖分裂我黨、我軍；向毛主席、黨中央奪權，其性質是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變。這個結論未免太"高抬"我們了。我想這些應該是康生、江青、張春橋給我們下的"結論。"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幫"以後，對我們的說法又改變了，說這次廬山會議是林彪、我們和康生、江青一伙相互勾結的"狗咬狗"的鬥爭。這樣，到目前爲止，對廬山會議下結論都是爲了當時政治鬥爭的需要，都未能客觀地反映真實情況。

實實在在地說，我們的動機既不是反黨，也不反毛主席，更不是反對"九大"路綫，我們當時的矛頭是對着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他們的。林彪一再說過，對康生不能點名，所以我們祇是想轟一轟張春橋、姚文元而已。所謂"天才論，""設國家主席"之爭也是對着張春橋、姚文元來的，而決不是對着毛主席的。

我個人的感覺，林彪當時對毛主席是沒有"二心"的。不過林彪看不起江青、康生，更不用說張春橋、姚文元了。這不僅僅

是林彪、我們同江青、康生、張春橋和姚文元他們個人之間也有許多恩怨。在對待“文化革命”的問題上，當時中央政治局裏我們之間産生了一系列的嚴重分歧。從“九大”前後開始，在對待穩定全國和軍隊秩序的問題上；在繼續“抓革命”還是“促生産”的問題上；在對待文化藝術中是“樣板戲”一統天下還是“百花齊放”問題上；對待老幹部和造反派的問題上等等，分歧日益公開和加劇。

而這一切，當時周恩來和汪東興他們是十分清楚的。一切大小問題我們都是及時向周恩來匯報，而他也是一再表示贊成和支持我們的。因爲周恩來掌握全盤工作，許多問題上無法和康生、江青合作，因而他經常借重和依賴于我們去開展工作。因此，我們當時和周恩來之間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在一系列的問題上公開支持了我們而批評了江青。還有汪東興不斷地給我們打氣吹風，我們都以爲這是毛主席的聲音，一些表面上的假象造成了我們的一種錯覺。這正是我們政治上的幼稚的表現。當然這裏也有個人恩怨，因爲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從“九大”以後就逐漸地把矛頭指向了林彪，但在這一點上，我們是堅决站在林彪一邊的，這也是在廬山會議上爆發激烈鬥爭的一個焦點。

我們當時萬萬没有想到的，是毛澤東竟然會在最關鍵的時刻站在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一邊。

現在想起來，毛澤東在廬山上搞我們，這裏面也是“事出有因”的。“九大”以前，由于“文革”的衝擊，所有的地方政權基本上癱瘓了。毛澤東决定軍隊以“三支二軍”的形式，接管了各級地方政權。毛澤東靠軍隊穩定了全國秩序，從而使軍隊在國家事務中起了一種特殊重要的作用。這種情况是當時客觀條件造成的，當時如果没有軍隊的介入，很難設想國家將是一種怎樣的情况。因此，在“九大”中央委員會中，軍隊幹部占了一大半，當時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軍隊幹部占十四人。軍隊的勢力越來越大，林彪個人的威望也越來越高。

在這次廬山會議上，林彪一番講話，整個會場一哄而起，連毛澤東都説這是“有黨以來從來没有過。”毛主席幾次説：“陳伯達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來。”現在想起來，不是陳伯達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們對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長的對立情緒，感到不安，據説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曾多次向毛主席進言説：軍隊現在的勢力太大了，這樣下去是一個威脅……。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撥亂反正”，决心把林彪和我們逐步“鏟除”的原因。下山以後毛主席步步緊逼也是由此而來。現在看來，毛主席本來就站在江青他們一邊，是要堅决地保衛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們同江青等人在廬山上的鬥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澤東是决不會放過我們的。

當然，我們在當時的情况下，是不會認識到的。當時我們都認爲，我們這些人，大老粗，没有政治生活的經驗，所以這次上了當，翻了船。這也就是李作鵬在飛機上説的：“我們這些人太不適應中央的政治生活了！”

第十四章
“盧山會議没有完”

一、繼續審查

一九七〇年九月七日上午，我們乘坐的飛機在北京西郊機場降落。李德生前來接我們。這裏我説一句話：無論是在軍委辦事組時期，還是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李德生同我們的關系一直都相處不錯。這也可能是造成了他在一九七五年因被江青等人告狀而被迫辭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職務的原因。

下了飛機以後，黄永勝、李作鵬、邱會作隨即離開機場，返回到他們的住所，我則留在機場，準備迎接從廬山回來的飛機。下午周恩來與康生乘坐的同一架專機回到北京。我看到，他們兩人顯得很親熱。“九大”以後，凡是周恩來外出，都是由康生代替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即被稱爲“康代總理”。然而，很少見到周恩來他們如此親熱。我當時内心裏想：周總理很值得我們學習，善于“看風使舵”。

早在廬山會議上，周恩來就給我們打過招呼，下山以後要繼續找我們談話。果然，九月九日晚上，周恩來和康生就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同黄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談話，繼續追查廬

山會議的問題。

周恩來一開始讓我先談。于是我就又把八月十四日憲法修改小組會議争吵以來的事情，一一説了一遍。然後我説：“我在廬山會議上作了三次檢討，如果需要的話我可以繼續檢討。我在廬山説的話有錯誤，錯了就檢討，但是我們没有什麽非組織活動。”

聽了我這話，康生鼓着眼睛盯着我説：“你們事先就有活動。廬山下有活動，廬山上有活動，下了廬山還有活動。”周恩來也説：“你在八月十四日晚上的活動我就不清楚。”我回答説：“那天晚上我是第一個給你打電話的，當時我在陳伯達家裏。我把情況都向你匯報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見，還説毛主席從來没有説過赫魯曉夫發展了馬列主義的話，而且你也表示贊成設國家主席，贊成國務院的指導思想是以毛澤東思想爲指針。”

我這一説，周恩來很不高興，同時也很緊張。這時康生插話説：“吴法憲，你説毛主席偉大謙虚，這句話不對。毛主席不是謙謙君子，毛主席有的地方要求很嚴格。”康生講話的態度比周恩來凶得多。

接着就是李作鵬講。李作鵬説得很簡單，他説：“具體的情況我也不清楚，我在青島接到黄總長打來的電話，説憲法修改小組發生了争論，要我回來支持吴法憲。我回來以後就没有争論了。”邱會作也説：“聽吴法憲説有争論，但具體情況不清楚。”黄永勝則説：“這件事我是十四號晚上聽吴法憲打電話説的，當然我們的觀點是一樣的。之後，我又打電話通知了李作鵬。我没有搞什麽活動。”

那天晚上一共談了四個小時，由于我們四個人的口徑一致，没有談出什麽結果來。

九月十二日晚，周恩來和康生又在人民大會堂繼續找我們談話。周恩來説：“上次我和康老找你們談話的情況，已經向毛主席匯報了，毛主席批評了你們，説你們軍委辦事組搞宗派，你們一統天下。你們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們之間的活動，在廬山會議前有什麽活動，會上有什麽活動，會下有什麽活動。”

周恩來說了以後，大家都不吭聲，周恩來就點了黃永勝的名，說："永勝同志，請你先談。" 黃永勝說："經過回憶，我知道的情况很少。廬山會議前我没有參加憲法的修改，我衹是聽吳法憲說到會議上的争論。關于設國家主席的事，我同法憲同志的意見是一樣的。上廬山前，我準備的發言材料衹是軍事工作報告，别的工作我没有參與。廬山會議的情况，我上山以後聽葉群告訴了我一些，吳、李、邱在廬山上的情况我不清楚。不過，他們在廬山上的事情我要負責任。"

康生插話問："你負什麽責任?" 黃永勝回答說："我是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組長，從組織上說我有責任。" 康生說："我就不信你没有參加。" 黃永勝也很不客氣地說："那就請你們追查嘛！" 這個時候，談話的氣氛很些緊張了。我就對周恩來說："上次談話，我已經把在廬山上的情况實事求是、原原本本地都說了。八月十四日的争論，我當時就向你總理、黃總長、葉主任都匯報了，這個你清楚，這都是公開的，不是什麽秘密活動。"

我說到這裏，周恩來臉色沉了下來。他說："你們不要激動，我衹是傳達毛主席的指示。你們都是政治局委員，毛主席的話我不能不向你們傳達。你們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實事求是嘛。"

李作鵬說："在廬山會議上，我在中南組没有什麽發言，葉群也没有說什麽。我們在中南組没有放什麽'毒'，也没有起哄。"

邱會作也說："我同你康老在一個組裏，你知道我講了什麽。我贊成設國家主席，擁護"天才論"，還念了語録。你當時還說，邱會作同志善于學習，并且號召西北組的同志向我學習，怎麽過了幾天你就反了過來，說我邱會作怎麽不對，你怎麽這樣兩個態度?" 康生一聽就火了："你念了語録很好，但是你說的錯話我没有同意吧?" 這樣，他們兩個人就争論了起來。

周恩來最後說："你們現在都是政治局委員，現在没有向你們提出什麽意見，有什麽問題可以再講。毛主席的意思還是保護你們的，你們要接受教訓，今後要注意團結合作，搞好辦事組的工作。"

兩次談話，都没有什麽結果，事情就這樣擱了起來。

二、林彪要我見毛主席

國慶節前夕，林彪和葉群從北戴河回到北京，毛澤東約林彪去談了一次話。從中南海回到家裏，林彪打電話叫我到他那裏去一下。

我到了林彪的住處。林彪見面對我說："毛主席談到了廬山的問題，我說，我選吳法憲當空軍司令，是因爲吳法憲是劉亞樓的徒弟，吳法憲的作風是向劉亞樓學的，和劉亞樓一樣，拼命幹，所以我選他當空軍司令。毛主席向我問起曹裏懷，我說，曹裏懷這個人我了解，從延安到東北我都了解他，工作稀稀拉拉，没有幹勁，辦事不認真。我認爲空軍的工作劉亞樓、吳法憲、王秉璋他們是搞得不錯的，所以我把空軍立作標兵。"

從林彪的話中我聽得出來，他的意思很明顯，毛澤東在考慮把我拿掉另找人選。林彪則是在盡力保我。

林彪接着又說："過去在廬山我不贊成你作檢討，但是我現在贊成你到毛主席那裏去說一下，作點自我批評，主要是把當時和張春橋發生争論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談一談。今後空軍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匯報、請示，不要衹是向我說，應該讓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來，我是不會怪你的。"

我當即表示，回去立即就給毛澤東打電話請求接見。回到家裏，我馬上打電話給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請求見一見毛澤東。過了一會兒，徐業夫打來電話說："主席的意見，國慶節前太忙，以後再說吧。"

我原以爲，這件事林彪和毛澤東已經說好，没想到一打電話毛澤東却不見，又讓我碰了一個大釘子。等到國慶節以後我又兩

次請求見毛澤東，他還是說不見。這樣，我前後三次提出請求見毛澤東，都被拒絕了。當時我還是一個政治局委員，副總參謀長，空軍司令。過去在空軍有什麼事情請示毛主席，總有一個答復。這次在廬山犯了“錯誤”，從此坐上了冷板凳。我心裏清楚地感覺到，大概毛主席已決心把我趕出中央了。

二十年後我看到有關文件，毛澤東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在南巡時講話說，黃、吳、李、邱在廬山上分裂黨，犯了錯誤，但是他還是要挽救我們。毛澤東還說，我們幾個在廬山會議以後根本不去找他，但是他還是要找我們。這就很不符合事實了，明明我三次求見都被他拒絕了，還要說我們堅持錯誤，不去找他！

被毛澤東三次拒絕後，我把這個情況打電話告訴了林彪。林彪聽了後，說：“那就没有辦法了。”我說，我準備再寫個檢討。這次林彪同意了。

三、檢討過不了關

我回到軍委辦事組，同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說起此事。我說：“我準備再寫一個檢討。”他們三個都不同意我寫，黃永勝說：“你不要寫。你犯了錯誤，我們大家都不怪你，我們都要負責任。你不要那麼緊張，檢討什麼！”邱會作也說：“我是不寫檢討。”李作鵬說得更直爽：“再檢討也還是没個完。在廬山已經檢討了兩次，你再寫一次，將來就還有十次，够你檢討的。”我說：“不是我願意檢討，看來没有辦法。”

接下來，我不用秘書，自己用了兩天的時間，寫了一個二千多字的檢討，送上去了。一個多星期就批下來了。我當時心裏想，不管批得好批得壞，總算是有了一個回音。哪知道一看嚇了一大跳。我記得主要有這麼幾條：

第一條是：“作爲一個共産黨人，爲什麼這樣缺乏光明正大的

氣概，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中央委員，有黨以來從來没有過。”

第二條不祇是批我了：“軍委辦事組各同志，(除了李德生以外)忘了九大通過的黨章，又是什麼天才問題，不過是一個借口。”

第三條是批我說的“毛主席偉大謙虚”：“什麼偉大謙虚。在原則性的問題上，從來没有客氣過，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在廬山會議上我的態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對這些批示，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通。什麼叫光明正大？當時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來的，在中央全會上公開講的，怎麽就不是光明正大。我在廬山上的講話哪一句是假話呢？那都是白紙黑字有證有據的嘛！說我們“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中央委員都是那麼好騙的嗎？人家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觀點嗎？說“有黨以來，没有見過”，怎麼没有呀？不說陳獨秀、張國燾這些以前的事，就說第一次廬山會議或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鬥争，哪次不比這次厲害得多！一個人站錯了隊，反正是“錯也是錯，對也是錯”。看來，這次廬山會議得罪了他老人家，我是死活過不了關了。

我把毛澤東的批示拿給軍委辦事組的其他人看，黄永勝看完若無其事，李作鵬則說：“我說没有完吧，果然如此。”

以後，黄永勝和我一起把這個批示報告給了葉群，因爲毛澤東在我的檢討書上還寫了“我願意看見其他宣講員的意見”。他的意思是要葉群、李作鵬和邱會作他們也檢討。

這樣，他們也不得不考慮寫一個檢討。當時葉群的意見是要軍委辦事組的宋誠來幫她寫這個檢討。葉群這個人很精，她考慮到“林辦”的秘書們還都不知道廬山上發生的事情，她怕擴散。這樣又由我們找來宋誠幫助，由葉群親自布置，寫了一個檢討送上去了。

這一下，毛澤東很快就又批了，而且批得比我的更厲害。毛澤東批示的頭一句就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綫正確與否是决定

一切的。"接着他說葉群"愛吹不愛批，愛聽小道消息，經不起風浪"。他還說："九大勝利，當上了中央委員，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綫抛到九霄雲外，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綫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風。請同志們研究一下是不是這樣。"

當葉群說"天才"方面的語録時，毛澤東批示道："多年來不贊成讀馬、列的同志們，爲何這時又向馬、列求救，題目又是所謂論天才。不是在九大論過了嗎，爲何健忘若此？"最後，毛澤東又把我們都捎上去了，說："不提九大，不提黨章。也不聽我的話。陳伯達一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除了陳伯達待審查以外，凡上當者都適用。"

拿到毛澤東對葉群檢討的批示，我讓黄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他們比較一下。他們都說，毛澤東對葉群批得更厲害，而且批葉群，直接關系到了林彪，衹不過給林彪一個面子，没有點名。

說到這裏，我想起了毛澤東對江青的態度。粉碎"四人幫"以後，都說毛澤東對江青早有覺察，并且有嚴厲的批評和鬥争。而江青在被"公審"時揚言："都說毛主席對我有批評，你們拿出來，我看看。"實際上，這個證據誰也拿不出來。毛澤東的權威在我們黨内是一言九鼎，不論是劉少奇還是彭德懷，打倒與否，都是一句話的事情。如果當時他對江青有一個哪怕是像對葉群這樣的批示，江青也不至于到那樣一種登峰造極的地步。關鍵是毛澤東對江青究竟是袒護還是"批評和鬥争"。

接着就輪到黄永勝了。這時，毛澤東已經不再像在廬山那樣，一下飛機就拉去徹夜長談，拼命地拉黄永勝了。他看看實在拉不過來，也就批開了。十一月十三日，黄永勝陪同外賓去見毛澤東。接見完畢，毛澤東讓外賓先走，把黄永勝留下，就批評黄永勝說："廬山會議發難，你黄永勝是個頭。你們辦事組一統天下，我要打破你們的一統天下。我現在要謝富治、紀登奎參加你們辦事組。"因爲我們黄、吴、李、邱四個人都是紅一方面軍和四野的幹部，所以毛澤東把我們叫作"一統天下"。李德生、謝富治是

四方面軍的幹部，所以把他們摻進來，用毛主席的話說：這叫作"摻沙子"。毛主席希望他們進來以後同我們來鬥。但是李德生、謝富治對我們没有什麼惡意，大家都是實實在在地工作，所以同我們相處很好，也没有發生什麼問題。

隨後，毛澤東又自己决定，把他在廬山會議期間寫的《一點意見》，轉發到全國各級黨組織，要進一步批判陳伯達，批判"軍事俱樂部"，同時也進一步批判我們。這樣毛主席一手在全國發動了"批陳（伯達）整風"運動。

四、毛主席"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角"

在"批陳整風"運動中，華北會議是一個有較大影響的事件。而華北會議的召開，則是由三十八軍給軍委的一個報告引起的。

三十八軍是北京軍區建制的一支野戰部隊，駐守在京、津一帶，軍部設在保定。這是東北四野的一支老部隊，也是當時全軍在裝備上、力量上最强的部隊之一。當時在保定還有河北省軍區。一九六七年，毛澤東發出"軍隊要支持左派"的命令之後，三十八軍和河北省軍區在保定各支持一派，從而使保定地區從文鬥發展到武鬥，雙方積怨甚深。一九六七年中央下决心解决保定地區的問題，陳伯達到保定講了話，在言論上傾向河北省軍區，引起了三十八軍幹部戰士的不滿。

廬山會議以後 陳伯達垮臺了。三十八軍黨委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日給軍委寫了一個報告，由我們轉給了毛主席。這個報告告了陳伯達一狀，說陳伯達在一九七〇年，從唐山到保定到處開會、講話、接見，說陳伯達是以此來樹立自己的威信，擴大自己的影響……。

毛澤東看了以後，如獲至寶，就在三十八軍的問題上作文章。他在報告上寫了一個批示，指出："北京軍區爲何聽任陳伯達亂

説、亂跑。他在北京軍區没有職務，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軍區所屬軍政問題，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特别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寫上：“林彪同志對我説，他都不便找三十八軍的人談話了。”最後毛主席指示：要北京軍區召開一次會議，各師要有人到會，時間要多一些，進行“批陳整風”。

毛澤東這一批，誰也不敢説二話，全部照辦，林彪也没有辦法。當天晚上，中央政治局會議在研究了毛澤東的批示後，决定將毛澤東“建議”召開的這個會議，擴大到北京軍區團以上幹部和軍委各總部的團以上幹部。這也是毛澤東的意思。毛澤東還指定周恩來、李德生、紀登奎三人領導會議。後來周恩來提出，這是一個軍隊的會議，軍委辦事組不參加不好。這樣，毛澤東又批準黄永勝、李作鵬兩人共五人組成會議領導小組，由周恩來負責。會議是在毛澤東親自領導下進行的，而且他對華北會議的安排和處理，很明顯是表明他不再相信我們軍委辦事組了。也可以説，毛澤東在“文革”開始以後，這次是首先向軍隊開刀了。

華北會議從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開始，一直開到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結束，整整開了一個多月，這也是一個馬拉鬆式的會議。這次毛澤東决心要“挖墻角”（這是毛澤東的語言，即挖林彪和我們軍委辦事組的“墻角”，好讓我們垮臺），所以爲此花費了很大的氣力。會議期間，除了五人小組以外，他還派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參加，江青先後兩次在會議上講話，并點了很多人的名。會議的情况，都由這些人直接向毛澤東匯報，衹有我和邱會作二人完全被排除在會議之外。

華北會議名義上是批判陳伯達，實際上會議的矛頭直接指向了李雪峰和鄭維山。李雪峰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北京軍區第一政委、華北局第一書記，鄭維山是北京軍區司令員、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中央委員。在廬山會議上，他們倆和陳伯達都在華北組。當時，李雪峰是華北組的組長，他把陳伯達在華北組的發言出了簡報，這一來就闖了大禍。

除了九屆二中全會上的牽連外，就是陳伯達在視察保定的時候，由李、鄭二人陪同。陳伯達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他來視察，李雪峰是地方領導，鄭維山是軍區領導，能不去陪一下嗎？毛主席説：“爲何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説。”陳伯達是中央文革的組長，中央文革當時權傾中央，成了全黨、全國的太上皇，還不是毛主席您老人家撑腰的嗎？您委任了陳伯達和中央文革，不但解决各地而且解决全國的問題，李、鄭作爲一個地方領導能不讓他跑，讓他説嗎？就是康生、江青來跑、來説，你一個領導能制止得了嗎？這又算得了什麽？所以説“路綫”錯了（就是跟錯了人）一切都錯了。“路綫”對了（就是跟對了人）一切都對了，爲了打倒陳伯達，也是爲了“挖墻角”，李雪峰和鄭維山也衹好作了犧牲品。

華北會議剛一開始，以三十八軍政委王猛爲首的人就對李雪峰、鄭維山群起而攻之。這個王猛，當時可真是够“猛”的。在會上猛攻李雪峰、鄭維山，後來成了“文革”中的紅人。

華北會議的最後，有一天晚上突然通知我和邱會作去參加會議。我們到會以後，由周恩來代表中央宣布：第一、撤銷李雪峰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華北局第一書記、河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的職務；第二、撤銷鄭維山中央委員、北京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職務。同時，他還宣布了中央關於北京軍區改組的决定：任命李德生爲北京軍區司令員，謝富治爲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軍區政治委員，紀登奎爲北京軍區副政委。

然後，周恩來作了會議的總結，同時又重新宣布了陳伯達的錯誤，但這時已經叫作“罪行”了，并給陳伯達扣了幾頂帽子，“托派、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野心家、陰謀家”等。陳伯達這一下是徹底的完了。從陳伯達的事情上，我看到毛主席的作法是一旦得罪，就要一棍子打死，而且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有人説，鄭維山是林彪的人，這是不對的。鄭維山是紅四方面軍的人。據我所知，黄永勝曾幾次提出要調梁興初來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但是林彪不同意。他對我們説：“一定要保留四方

面軍的人。”這様，林彪幾次將鄭維山保了下來。而這一次是江青向毛澤東提議，毛澤東下了决心要把李雪鋒和鄭維山拿掉。這也是給林彪和我們軍委辦事組看的。

雖然這次華北會議没有批判黄、吴、李、邱幾個人，但是我在心裏感到壓力越來越大，以後事情怎麽發展很難預料。但是黄永勝還是滿不在乎。

五、“不要學軍委座談會，根本不批陳”

一九七一年一月初，黄永勝提出要召開一次軍委擴大會議，部署當年的軍事工作。軍委辦事組向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寫了報告，結果毛澤東批準同意了。

會議準備召集各大軍區司令、政委、總參、總政、總後以及各軍、兵種負責人共一百多人參加。由黄永勝代表總參，李德生代表總政作軍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報告。然後討論戰備訓練工作。這時李德生已經成爲主要領導，李作鵬、邱會作和我的地位都已經降下來了。會議由黄永勝和李德生負責。

會議期間我曾提出，我們軍委辦事組是不是在會議上再作一次檢討，也好下個臺。可黄永勝、李作鵬、邱會作都不同意，他們説：“屎不臭，挑起臭。”我説：“我和葉群已經有過檢討，雖然挨了批，但總算有個交代。你們三個人没有寫過檢討，不如借這個機會過關。”他們還是不同意，都説：“你檢討過不了關，我們的檢討也過不了關，一樣的。”這樣，我也就没話説了。

在這個會議上天天出簡報，都統統送給毛澤東和周恩來。這時我們没有聽到各軍區、軍兵種的人説起廬山會議的事情，反而有不少人説好話，贊揚軍委辦事組是歷届軍委領導中工作最扎實的，説軍委辦事組的工作如何好，如何正確等等。總之是一大片的好話和贊揚聲。我看到以後有些擔心，説：“這個話反映上去

不好。讓毛主席看到對我們不利。”但是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見，也就仍然登上去了。

結果簡報送上去，毛澤東没有什麽反應。可是到了二月十九日，毛澤東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報告的批示上説：“請告各地同志，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跟本不批陳。更不要學華北前期，批陳不痛不癢，如李、鄭主持時期那様。”

毛澤東這個批示下來後交給了周恩來，周恩來又轉給了林彪，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員都傳閲了，這一下黄永勝着了慌，説：“毛主席批評了，怎麽辦？”這時，會議已經結束了，人都已經回去了。我們衹好召集在京的各總部、各軍、兵種負責人連夜開了一個會。

這個會議開得很突然，開始大家都不知道怎麽回事。黄永勝傳達了毛主席的批示，接着我作檢討，我把我的檢討和毛主席的批評都念了。黄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也都作了檢討，這時大家表情嚴肅，陳士榘説：“廬山會議你黄永勝也在其中。”其他人都没有發表什麽意見，因爲大家都搞不清是怎麽一回事情。

會後，我們軍委辦事組一起商量，决定黄永勝、李作鵬、邱會作每人把會議上的檢討歸納一下，寫出一個稿子送中央和毛主席。這時我提出要在檢討中寫上對張春橋表示歉意，但他們三人都不同意寫，關于我們之間串聯的情况也没有寫。

他們三個人的檢討經過集體研究後上送中央、毛主席。我當時還想：怕是你們的檢討也通不過。結果一下子毛主席批了，説他們三個人的檢討是：“很好。”我真不明白了，我這個人一再檢討還過不了關，而他們一再不檢討，反而是一檢討就過了關。看來還是不檢討的爲好。

在黄永勝三人的檢討上，毛主席還批了一段説：吴法憲、葉群過去的檢討不够，要重新寫一個。這個話周恩來又傳給了我們。毛主席還指示：“要召集一個政治局擴大會議，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軍兵種負責人，中央國務院各部、委的負責人

參加。要黄、吴、葉、李、邱作檢討。讓他們下臺過關。并將此情况告訴林彪同志。”

第二天下午，毛澤東在他中南海的住所突然召集會議，要周恩來、康生、黄永勝、吴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等人參加。我們在周恩來的帶領下，來到了毛澤東的書房。毛澤東、周恩來、康生坐在前排，我們在後面坐着。毛澤東説：“第一是黄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三人的檢討我看了，批了很好，可以過關了。第二是吴法憲、葉群的檢討雖然寫過多次，現在看來不够了，要再補寫一個。第三是吴法憲過去多次要求見我，我没有見，要見今天一起見。第四周恩來帶你們幾個到北戴河，去向林彪同志作一個匯報。”

談話中，毛澤東問邱會作：“你的檢討是秘書寫的還是自己寫的?”邱會作回答説是自己寫的。接着，毛澤東又問黄永勝和李作鵬，他們倆也都説是自己寫的。毛澤東説：“邱會作，你的字寫得很好嘛。我死了以後你可以當主席。”邱會作反應很快，趕緊站起來説：“毛主席萬壽無疆！”

毛澤東笑了。這時候，康生起來要去厠所小便，毛澤東説：“李作鵬，你去扶一扶康老。”這樣要李扶康生去小便，李也不得不照辦。讓一個中央政治局委員扶康生去上厠所，這種情况是不多見的。

康生離開書房的時候，毛澤東突然宣傳起了康生。他説：“康生在蘇聯就反對王明，是個堅决的反王明分子。回到延安，又和王明鬥……。”説到這裏，康生回來了，毛澤東又對他説：“你在莫斯科反對王明，你是站在正確方面的。”

其實康生在蘇聯時根本就談不上反什麽王明，相反還是王明最大的擁護者。這些情况毛澤東并非不知道，他之所以要這樣説，主要是因爲康生在廬山會議立了大功。

這次談話不到一個小時，主要是毛澤東一個人講，周恩來和康生都没有講話。毛澤東講完以後，就叫我們走。臨走時，毛澤東對我説：“吴法憲，你再寫一個檢討，我是保你的。”

聽見毛澤東這樣説，我動了感情，説：“主席保我，我謝謝主席！”毛澤東接着又説：“你走吧，你要知道，我是保你的。你早到林彪同志去認個錯。”我説：“我一定記住主席的話。”這次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六、周恩來帶領我們到北戴河向林彪匯報

在毛澤東那裏談話後的第二天，周恩來通知我們，要我們晚上十點鐘在北京車站上車，準備去北戴河向林彪匯報。

晚上，我準時到達北京火車站貴賓候車室。上站臺後見到一列專車駛過來，周恩來分給我們每人一節車厢。車厢很寬敞，非常漂亮，裏面有沙發床和辦公桌，據説這是周恩來的專車。我坐這樣的專車還是頭一次。我在空軍多年，“近水樓臺”，衹坐飛機，没有坐過專車。周恩來除了有專列以外，在我們空軍和民航還各有一架專機。毛主席不坐專機，衹有建國初期坐過幾次伊爾－14型飛機，那是由劉亞樓司令親自陪同。以後怕出危險，就由中央做出决定，毛主席外出衹坐火車不坐飛機。這是題外的話。

上了火車，夜已深了，各自就都休息了。我心中不安，從走廊裏過去見周恩來，見到一個女服務員正在爲周總理剪指甲。我進去坐了一會兒，周恩來問我：“你睡不着覺啊?”我説：“我是在想我的檢討怎麽寫，我想請示一下總理。我寫的檢討同以前差不多，但是有一個問題我吃不準，就是林立果‘講用報告’這個問題寫不寫，這個問題主席提出了批評，不寫，主席那裏交代不過去，寫了怕林副主席不滿意。”

周恩來很耐心地告訴我説：“這個問題不要寫，越寫越復雜，説不清楚，牽涉的面太寬了。”我當時非常感謝周恩來對我是一片好心。周恩來又説：“你寫好以後，先送給我看，我再送給毛主席。你不要有壓力。”

火車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八點到了北戴河。汪東興安排前期工作，已提前到了這裏。他把周恩來安排在原來毛澤東住的小樓，把黃永勝安排在另一座樓裏，我們幾個則住在一個集體招待所裏。

上午休息，當天下午，我們一起見了林彪。首先由周恩來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和決定。這件事情毛主席說要他來請示和徵求一下林彪的意見，還要向林彪匯報一下近來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一些工作。周恩來說完，便由黃永勝匯報戰備工作情況；李德生匯報華北會議情況；紀登奎匯報國務院的工作情況；最後再由周恩來談外交情況；一共談了三個多小時。

聽匯報時，林彪沒有說什麼話。最後，他表示，完全贊成毛澤東關于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意見，以及對黃、李、邱檢討的批示，照毛澤東的意見辦。關于我們的問題，林彪衹說了"無心插柳柳成行"這樣一句話。這個意思我不是完全理解，我想可能是我們在廬山會議本來是想批一下康生、張春橋，但是反而倒了一個陳伯達，又引出了黃、吳、葉、李、邱一大串，這不是原來的本意。就是這麼一句話，也沒有批評我們的意思。他再沒有多說什麼，一共講了三分鐘。

當天晚上，葉群以怎麼寫檢討爲名，把黃永勝和我兩個人叫到她那裏去。我把自己的檢討稿給她看了。黃永勝對她的檢討提了一些意見，我沒有說什麼。當晚，我們沒有見到林彪。

第二天下午兩點，我們從北戴河返回北京。這一次，不象往常，我們沒有向林彪、葉群辭行，因爲是周恩來領頭來的，我們不好單獨行動。看樣子林彪也不想單獨見我們，總之是避嫌的意思吧。在火車上我和邱會作兩個人在周恩來的車厢聊天，天南地北……。晚上十點鐘，到了北京，各自回家。

一回到北京，毛澤東又召集我們到他那裏開會，想了解我們到北戴河的情況。那天，他一見到我們就問："挨批了吧？"他的意思，是說林彪批評了我們了吧。這時沒有人吭聲。我壯着膽子說了一聲："批評了。"周恩來也笑着說："批了，批了。"這一

下子毛澤東高興了。

接下來，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了到北戴河去向林彪匯報的情況。毛澤東說："這下好了，你們去準備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事情，等吳法憲、葉群的檢討送來後一起印發會議。"接着他又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你們幾個不要緊張。你們要有個底，我是保你們的。"

對毛澤東的這句話，我們幾個都表現出感激的心情。并异口同聲的說："感謝毛主席對我們關心和愛護！"

毛澤東又問我："你的檢討寫好了嗎？"我說："明天送主席。"他却說："不用急，好好想一想，想清楚了再寫。也請永勝同志轉告葉群，寫好了直接送給我。"

之後，他又要周恩來召集政治局會議研究一下中央工作會議的具體問題，如各地要有多少人到會等等。周恩來說："回去研究一下，向主席寫一個報告。"

這些問題說完，毛澤東站起身，向我們揮了揮手說："散會。"說完，他轉身就走了，沒有同我們任何人握手。我們從他的書房裏出來時，心情已經有所緩和。

當天晚上，我加了一夜的班，把檢討寫了出來。第二天，我把這個檢討帶到軍委辦事組請黃、李、邱一起研究。他們三人都認爲，我不應該對張春橋說什麼道歉的話，黃永勝說："你這個人一左一右怎麼回事？"我問他們："不道歉能行嗎？"李作鵬說："什麼時候也不能向張春橋道歉。"邱會作也說："道歉有什麼用？"黃永勝則說："你這樣寫，別人一看就會說，你沒有誠意檢討。有意見先吞下去，以後再說。這一次，能讓我們平平安安地過這一關，就謝天謝地了。"李作鵬說："這還是暫時的，這個問題沒有完。"

聽了他們的意見，回到家裏，我又用了三個小時，把檢討稿重新寫了一遍。寫完，反復校對。最後用個大信封，自己親自裝好密封，寫上"送呈毛主席親收"，通過機要部門速送周恩來。

檢討送上去以後，兩天都沒有回音，我心裏又是緊張不安。

我鼓勵自己，要沉住氣，可還是不行。終于，到了第三天晚上，邱會作從人民大會堂打來電話説，他和周恩來一起開會，周恩來要他打電話告訴我，我寫的檢討毛澤東已經批了，毛澤東的批示説，我和葉群的檢討可以了。説到這裏，邱會作還補充了一句，告訴我，周恩來説“可以了”（指毛澤東對我和葉群檢討的批示）和“很好”(指毛澤東對黄永勝、李作鵬、邱會作的批示)是一樣的，要我不要有什麽想法。

我想，毛主席現在對我們已經是“區别對待”了，但是不管怎麽説，也算是勉强過關了。黄永勝、李作鵬和邱會作也安慰我説：“我們幾個人是分不開的，今後也一樣同呼吸，共命運。‘很好’和‘可以了’差不多。”李作鵬的話説得好：“‘很好’也好不了，‘可以’也不可以，都是一回事。”

我寫的檢討稿子，一直没有退回，就直接交給中央辦公廳排印了。等我和葉群的檢討一印好，就立即通知全國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前周恩來召集了政治局會議，規定由我們幾個人在會上作檢討，并要我第一個發言。

七、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中央工作會議（即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到會的有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委的主要負責人共九十九人。會議仍然與九届二中全會一樣分組，我還在西南組，黄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也都在原來的大組。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毛澤東在後面指揮。毛澤東决定，把我們的檢討發給每個人先閲讀，以後再開小組會議批判我們。

林彪和葉群在北戴河没有回來，也是在有意回避會議的意思。周恩來指定黄永勝和我每天打電話給葉群，這是周恩來直接

安排的。他的用意很妙，這樣他可以雙方都不得罪。

會議開始後，各組便開始討論我們的檢討。由于各省、市、自治區和軍隊的同志對我們没什麽積怨，這時的會議氣氛顯得比較緩和，各組都批不起來。這與九届二中全會上對張春橋的態度大大不同，那時大家一哄而起。可現在大家却都説是“情有可原”，甚至有些人同情我們。

會上也有很積極、很活躍的人，如康生的妻子曹軼歐就點名批判我。但她也有友好的表示，西南組的正、副組長張國華（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和周興（雲南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和曹軼歐商量，説要猛鬥我兩天。曹軼歐反對説：不要加碼，不合乎毛主席的批示。因此他們的意見被曹軼歐制止。由于康生是中央常委，所以曹軼歐的意見非同一般，她説不行，張國華和周興也就那樣辦。

我們這個組裏還有朱德、李先念、聶榮臻等老同志。張國華他們不去徵求老同志的意見，而是聽曹軼歐的，也很會見風使舵。當時，讓我感動的還是這幾位老同志，他們自始至終都没有批判我。他們多年了解中央鬥争的情况，政治經驗比較豐富。與他們相反，下面來的一些同志發言比較激烈。也難怪，他們剛剛到中央，積極性正高，和我們當年是一樣的嘛。

會議開始以後，天天出簡報。政治局開會研究情況，把我們都排除在外，因爲我們是批鬥對象。周恩來他們每天都向毛主席匯報情况。我們衹是把簡報的情况及時向葉群匯報，再由葉群轉報林彪，林彪和葉群對會議的問題没有任何表示。

我没想到的是張春橋和姚文元，在廬山會議的前期，他們是被我們攻擊的主要對象。可在這次會議上，他們的發言比較客觀，調子并不是很高。可能他們對中央的情况了解多了，知道這裏面的深淺。康生這次會議以後就稱病了，從此以後基本上不出來活動。這也是一個辦法。總之這樣的黨内鬥争，讓人人都有自危的感覺，不知道哪一天，災難會落到自己頭上。衹是一些下面來的人，積極性犢高。

到了會議中間，出現了這樣的情况。編在東北組的王輝球和王秉璋揭發出我在廬山會議上同他們串聯，要他們擁護林彪的講話，并要他們攻擊張春橋、姚文元。這一下子，東北組哄起來了。陳錫聯當即給我打電話説："這個情况，我已經向周恩來匯報了。"我跟他説："當時我在廬山會議上同他們講過。這不要緊，衹要實事求是，讓他們講就是了，没有問題。"

緊接着，周恩來打來電話問我，廬山上是否有這回事情。我説："有這回事情。我要他們擁護林副主席的講話，要他們批評張春橋。不過，後來我又要他們不要講了。"周恩來説："揭發出這樣的事情，你不要緊張，還是和原來一樣，没有什麼變化。我要王輝球、王秉璋他們去向你説明情况。"我説："不用了。"

這個情况，黄永勝在當天晚上告訴了葉群，葉群又報告了林彪。不久，葉群給我打來電話，要我準備飛機，説林彪要回北京。我想，林彪之所以在這個時候回北京，一是讓葉群參加會議，因爲這個會也有她的檢討，不參加不好。二是林彪親自回來坐鎮，準備在必要的時候直接出面同江青、康生、張春橋對抗。

周恩來不願意擴大事態，于是把王輝球、王秉璋揭發我搞串連的這個事情壓了下去，没有再繼續追查這件事。他爲此還專門給我打電話説："這個情况，不再追究，發言衹限于你們的檢討。"

第二天中午，林彪、葉群回到了北京。葉群直接來參加了會議，林彪一直在家裏。由于事情已經被周恩來壓了下去，看看没有什麼情况，他也就一直没有到會。

大概是毛澤東的意思，想讓林彪在會議結束時講幾句話，作個檢討，因爲整個廬山會議的事情都是由林彪講話引起的。可林彪堅持不講話，一直到會議結束都没有在會上露面。周恩來曾向我説："林副主席要是以講話的形式檢討幾句就好了。"

會議的後期，周恩來把鬥争的大方向引到批判陳伯達身上去了。會議又批了陳伯達一個星期，對于我們來説，這樣才算是鬆了一口氣。到了會議快結束時。王輝球和王秉璋來找我向我解釋。解釋什麼呢？説是在會議上被逼的，講過以後又道歉，説是

不應該講。我説："你們講嘛。我没有意見。衹要你們講的實事求是就行了。"

會議開了十多天後，秘書組要起草總結。原來對我們錯誤的調子提得很高。而且言過其實。戴大帽子。後來由周恩來、黄永勝、李先念、張春橋他們多次修改。把一些過重的話都删去了。特别是張春橋，後來黄永勝告訴我，很多話都是張春橋提出删改的，對我們表示友好。這個稿子送給毛主席，是毛主席親自批示同意的。

四月二十九日，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議結束。在閉幕會議之前，周恩來要我們幾個每人表一個態。根據他的意見，我們在閉幕會上每人都説了幾句。我們表示，中央工作會議對我們的批評，是對我們的關懷和愛護，我們一定接受批評……。最後由周恩來作會議總結。他衹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周恩來念完總結，是當時的國家代主席的董必武帶頭鼓起掌來。董必武是黨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這一帶頭，大家就都跟着鼓起掌來，一下子會議的氣氛變了。在熱烈的掌聲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跑過來同我們幾個人緊緊握手，表示團結。

"批陳整風"匯報會以後，林彪就要回北戴河，我去機場送林彪，向他匯報空軍訓練的情况，但他一言不發。我心裏想，林彪怎麼變了呢？是避嫌？還是因爲其它？但是有一點，我應當實事求是地説明，從九届二中全會之後，我没有聽到林彪説過一句對毛主席不滿的話，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個禁區，或者是有什麼其它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林彪。從那一次機場送别以後，我就再没有見到過他。

八、中美關系的改善

中央"批陳整風"會議結束以後，又緊接着召開第二個會議，原班人馬專門討論中美關系問題，因爲中美關系有和解的迹象。

中美和解的事情，以前就有醖釀了。首先是尼克松公開發表講話，説他願意訪問中國，願意和毛澤東、周恩來會談，解决中美關系問題。這個消息曾在《參考消息》上發表過。接着，就是"乒乓外交"事件。中國乒乓球隊在日本參加第三十一屆世乒賽的時候，主動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這樣世乒賽以後，美國隊來北京訪問了，周恩來還接見了他們。第三是斯諾訪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斯諾在北京見了毛主席。毛主席通過斯諾向美國政府發出信息，説："我説如果尼克松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除此之外，我們還通過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作中間橋梁，經過他多次向美國秘密傳話。

之後，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表示準備來中國進行一次秘密訪問。經過慎重的研究，毛澤東决定同意基辛格來談。毛主席制定的方針是，同意基辛格來談，具體的工作由周恩來全面負責。周恩來讓外交部通過葉海亞總統和巴基斯坦外交部，不斷與美方聯系，最後商定，基辛格從巴基斯坦秘密的到北京來，飛機降落在南苑軍用機場。

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外交部方面由王海容司長和翻譯唐聞生去巴基斯坦接基辛格，還派了中國的領航員一同前往，把他們的飛機領進來。飛機方面的事情，周恩來交給我來負責。一路上的航行安全保護，機場着陸等都由我負責。另外，基辛格來時準備把南苑機場封鎖起來，以免走漏消息。

這件事情是十分突然的。因爲，從一九四九年起，經過朝鮮戰爭，中美雙方一直處于戰争狀態。全黨全國對于基辛格的到來，思想上要有一個很大的轉變。這樣要在黨的高級幹部中打一個招呼，不然的話怕思想轉不過彎來。所以毛主席在政治局討論時决定，趁當時各地各部門的負責同志都在，一起開個會議，怎樣在全黨和全國轉這個彎。

這樣，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剛結束，會議的人員編組都不變，就又開起了中美關系通氣會，内容是討論中美關系。會議首先由外交部和中央聯絡部詳細介紹美國的情况，并通報了中、美通過巴基斯坦之間多次聯系的情况。接着，傳達毛澤東確定的方針，以及外交部的意見。外交部的意見説，我們歡迎基辛格先來，因爲我們認爲中美關系已經到了有所轉機的時候了。我們首先要争取通過中美正常關系的建立，進入聯合國；第二，要求美國承認我們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争取解决臺灣問題；第三，中美之間懸而未决的一些問題可能會提出來，如美國在華財産的凍結問題。如美提出歸還，我們準備怎麽對付等等。

外交部的意見還説，在中美建交以後，我們處理中美關系的原則，是求同存异，能一致的一致，不能一致的放在一邊，繼續和他們鬥争。我們的原則是又聯合又鬥争，又建交又鬥争。

最後，我們要在國内對中美關系的變化進行公開的宣傳和教育，要在思想上轉過彎子來。爲此，會議最後形成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報經毛澤東批準，成爲中央的正式文件。

這裏我要説明一個問題，就是有一些人説，林彪和我們是因爲反對和美國改善關系、反對中美建交而投靠蘇聯的。這個説法没有任何根據，也是不符合客觀歷史事實的。據説毛澤東一九七二年會見尼克松時曾經説過："我們國内有人反對和你們談判，這個人現在見上帝去了。"很顯然，毛澤東這裏指的是林彪，但他的這種説法，是極不負責任的。

事實上，在整個中美關系轉變的過程中，林彪除了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以外，没有説過任何其它的話。當時，爲了廬山會議的事情，林彪自己已經自顧不暇，哪裏還有精力去反對中美關系的改善呢?

據我了解，在國家不受到直接威脅的情况下，林彪是不主張

和美國直接對抗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一九五〇年在決定出兵朝鮮問題上，林彪的態度是消極甚至是反對的。本來，他是率領軍隊入朝作戰的最合適人選，但是林彪的態度是消極的，毛澤東祇好去請彭德懷出山。在毛主席親自批示的"中發一九七一年五十七號"文件中指出："在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問題上，林彪伙同劉少奇反對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張。"

與之相對應，在當時國家受到威脅的情况下，林彪是堅决主張防範蘇聯的。自一九五九年林彪接任國防部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起，中蘇兩黨的關系便逐漸破裂。之後，蘇聯開始大規模向中蒙、中蘇邊界調兵。考慮到這一情况，林彪首先向黨中央提出建設"三綫"的建議。這個問題正合毛主席的意思，所以爲毛主席和黨中央所采納。第二、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林彪的主持下，軍委研究部署了在北方的防御體系。把重點戰略防御目標從南面防御美、蔣轉到了北面防御蘇聯。第三、爲了防止蘇聯方面的核突襲，以及蘇聯機械化作戰的强大實力，林彪考慮了一套"山、散、洞"的構想。即靠山、分散、洞庫隱蔽的防御作戰方案。這個設想，當時得到毛主席的大力支持。

所以，説林彪和我們反對中美關系的改善，這是憑空轉嫁，是没有任何事實根據的。

九、管不了的林立果

林立果到空軍以後，開始還比較謹慎。但後來，在空軍黨辦一些人的慫恿下，仗着自己是林彪的兒子，就越來越不象話了。他和黨辦的一伙人，不但在空軍司令部興風作浪，而且鬧到了外地，將整個空軍都搞得烏烟瘴氣。我由于一直兼任着中央和軍委的工作，對空軍的事没有太多的時間過問，空軍的主要工作當時是由空軍政委王輝球和空軍黨委其他人負責。後來我因廬山會議的事，逐漸從中央退下來以後，回到空軍一看，才開始聽到對林立果等人的一些反應。但由于廬山會議的問題，我被搞得焦頭爛額，想管也無能爲力了。

大約是一九七〇年十月，葉群對我説："立果這個孩子，要想在空軍幹下去，就得好好學習點業務，從技術上去發展。這次他在廬山上看到了一些情况，就再也不願意從事政治了。他願意到廣空的飛行部隊去蹲點，搞一點調查研究，研究一下飛行部隊的訓練和有關安全的問題。"我問："爲什麽要到廣州去？廣州那麽遠，不好照顧怎麽辦？"葉群説："是他自己要去的。"我聽了以後説："既然你同意了，我也就没有意見。"

林立果去了廣州不久，就搞了一個"空九師飛行訓練安全經驗總結"的材料。我看了這個材料以後，感到不錯，覺得還是有一些説服力的，就上報了總參。這個材料後來經毛澤東和林彪的批準下發，并在空九師開了一個現場會。

這之後，林立果和周宇馳回北京來看我，説是要學習開直升飛機，以便掌握一點第一手材料，下去的時候少説一點外行話。對此，我堅决不同意。我説："林立果不是飛行員，學習什麽駕駛直升飛機？萬一發生事故，我怎麽對得起林副主席！了解一點飛行規律，懂得一點飛行技術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去學習開飛機。"

爲了這件事情，我又打電話去告訴葉群，葉群也不同意。在我的堅决反對下，林立果後來没學成駕駛直升機，但是後來事實證明，周宇馳還是瞞着我偷偷地學習了駕駛直升飛機。

我當時完全認爲林立果、周宇馳他們真的是在搞調查研究，學習飛行技術，萬萬没有想到他們竟然還在底下搞一些别的名堂。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後我才知道，廬山會議以後，葉群、林立果背着我，同空軍的少數人搞在一起，幹了許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我陪江青到廣州時，曾想去看一看林立果，但是却不知道林立果住在什麽地方。空軍副參謀長胡萍説他

知道，自告奮勇地把我帶到了林立果的住地。我一看，他住的房子布置得很好，還有專門的厨師爲他們做飯吃。我很奇怪，林立果説是在空九師蹲點，怎麼會住在這裏？但是又不好説什麼，衹好對林立果説：“你們在這裏搞到一定程度就該回去了。”

林立果對我説，他們還要在那裏調查研究一下，過一段時間就會回去的。當時我并没有懷疑什麼，也没有理由去懷疑什麼，呆了一會就回去了。

以後我到了上海，空四軍政委王維國把我帶到空四軍巨鹿路的招待所，我看見隔壁的一所原來是上海資本家的别墅，被裝修得很漂亮。我説：“招待所原來没有這樣的房子呀。”王維國向我解釋，説這是給林立果修的，他來上海的時候就住在這裏。我這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也有住處。

“九一三”以後，在我被逮捕以前的這一段時間裏，經過群衆的揭發，衛戍區的搜查，我才知道不僅在廣州和上海，就在北京的空軍招待所、西郊機場、空軍學院、和空軍二高專等處，都有林立果的專用房屋。這些被稱爲林立果的據點，但我當時却一點都不知道。林立果等人的這些事情都是背着我幹的。

再就是對林立果“講用報告”的宣傳問題，真是讓我傷透了腦筋。我前面提到過，我在林立果作“講用報告”以後，就明確表示了不同意大肆宣傳林立果這個“講用報告”的意見，但是，林立果和空軍機關及下面的一些人，一直在這個問題上興風作浪。大肆宣揚之風在王飛、周宇馳等人的蓄意謀劃和推波助瀾下，在空軍内部泛濫開來，讓我怎麼擋也擋不住。後來，這個“講用報告”不僅在空軍中廣爲傳播，而且還傳向了全軍，傳向了全國。

八月下旬，我離開北京上廬山參加九届二中全會時，北京的空軍“三代會”却仍然進行得熱火朝天。當“三代會”的各個代表團知道我不同意印發林立果的報告，就紛紛動手自己印。一時間，鉛印的、油印的、手抄的，五花八門，就像是“文革”前期的小報一樣。討論的時候，也就没邊没沿了，什麼“天才”呀、

“超天才”呀，説什麼的都有。

我在前面説過，空軍是個高幹子弟雲集的地方，不少人都可以直接通天。空軍内部大肆宣傳林立果“講用報告”的問題，一下子就反映到上面去了。

首先，周恩來在廬山上對我説：“林立果的‘講用報告’是好，但是這樣吹噓不行。”毛主席辦公室的人也對我説：“空軍對林立果的‘講用報告’吹得太厲害了，這樣宣傳不好吧。”

當時我正因爲廬山上的事情鬧得很緊張，聽到了這些，便立即同葉群聯系，我説：“‘三代會’對立果的宣傳過火了，我擔心這樣是爲林副主席幫倒忙。我準備采取措施，全部收回立果的講用報告，不準再這樣宣傳立果。我這樣做是維護林副主席的聲譽，保護立果。你是不是跟林總和立果講一下。”

葉群立刻説：“不用講，就這樣辦！不準他們再幫倒忙。”

我當時就從山上打電話給陳綏圻，要她去“三代會”的駐地，一個代表團一個代表團地去做工作，把各個代表團所散發的“講用報告”統統收起來燒掉，録音帶也要統統洗掉。同時，我又把這個情況告訴當時在北京負責“三代會”的劉錦平，也要求他這樣去做。

陳綏圻接到電話以後，便和秘書張叔良一起來到空軍學院，找各個代表團的負責人，一一説明情況，要求協助收回林立果的“講用報告”。這樣，一共收回了兩千多份“講用報告”和三盤轉録的磁帶。回來以後，就用我家裏燒熱水的鍋爐，把收回來的“講用報告”燒掉了，一直把爐子都燒紅了。磁帶也全部洗掉了。事情辦完以後，陳綏圻打電話到山上告訴了我。

我開完九届二中全會下山，到空軍學院爲“三代會”作總結的時候，還特别對林立果的“講用報告”作了幾個規定：一、不準傳播；二、不準印發；三、已經傳出去的要全部上交。

老實説，關于“講用報告”的事，有些事情是當時我没有想到的，不過也有些事情是我當時想到了，但是没有辦法的。比如，關于收回林立果的報告，我報告了葉群，也當面向林立果和周宇

馳説過，他們都滿口同意，表示堅决執行。但是，他們以後却在空軍内部開始所謂“路綫交底”的活動，組織了空軍機關的一些人，到下面部隊去打招呼，説我在九届二中全會上犯了錯誤，現在又反對林副部長，反對林立果的“講用報告”，甚至還説在空軍中存在着“兩條路綫的鬥争”等等。這真是從何説起！他們搞的些這活動，我當時完全不知道，被蒙在了鼓裏。我想，當時空軍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林立果的撑腰，而林立果没有葉群的撑腰，他們敢這樣做嗎?!

另外，我也開始感覺到，在林立果的支持下，空軍黨辦的人已經開始不聽我的招呼了，而且空軍的事情也有些失控。比如林立果的這個“講用報告”，雖然我再三强調了組織紀律，作了幾個明確的規定，在“三代會”上也收了一部分，但是其它散發出去的已經没有辦法收回了，而且代表們回去照樣宣傳。根本上的原因是這些事情牽涉到林立果和林彪，使我非常爲難。我當時也被廬山上的事情搞得焦頭爛額，已經顧不上空軍裏的這些事了。

後來，空軍内不斷有人向我反映對林立果的“講用報告”的宣傳問題，想讓我采取一些相應的措施。如一九七〇年中，沈陽軍區空軍政委張雍耿曾經給我寫過一封信，反映空軍司令部的一個處長在沈空情報部散布説，林立果就是天才，否定天才是不行的，誰要阻撓學習林立果的“講用報告”都不行。這個處長還説，以後到空軍司令部，不要隨便找人，在司令部就是找曾國華、何振亞，到情報部就是找賀德全，到作戰部就是找魯岷。

另外，一九七一年七月，我的秘書張雲龍調到廣州軍區空九師以後，發現了一些情况不正常，就向我匯報。結果空九師的幹部把他看成是釘子，對他進行跟踪、盯梢，把他所有的情况都記録下來，并且有意地將他派到下面的團裏去，不讓他呆在師部。

還有，一九七一年八月，空軍副司令員鄺任農的秘書李學敏，隨鄺任農到上海出差。回到北京後，他告訴陳綏圻説，劉錦平的秘書在上海揚言説：“不讓學習林立果的報告是歪風。這個歪風，在民航是頂住了的。”

説實在的，由于林立果的上面有林彪和葉群，我對他是不敢得罪的，所以聽到這些反應後，我也没有什麽辦法。不過，我也做過一些制止的工作。一九七〇年底，在空軍三十四師當飛行員的許世友女兒許華山，一次到我家裏來告訴我説，對林立果的“講用報告”，三十四師還在出黑板報，而且調子高得不得了，把林立果宣傳爲“天才、全才、超天才和光輝榜樣”。聽到這樣的反映，我很快給三十四師的負責人打電話，叫他們以後不要再這樣搞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還收到了兩封信。空十二軍的一個署名江衛東的在信裏説，現在從空軍直屬機關一直到廣空，到十二軍，都在以對林立果的“講用報告”的態度來層層站隊，把我和“吴辦”都劃到了對立面。江衛東的這封信，在“九一三事件”後，我要秘書把它交給了進駐空軍的李德生。

我收到的另一封信，是廣州軍區空軍桂林場站政治處一個叫吴統成的幹事寫來的。這封信反映説，廣空政工會議期間，有一個副部長告訴桂林場站的副政委，説林彪曾經把林立果的“講用報告”給毛澤東看了，毛澤東看了以後對林彪説：“這比你當年還成熟。”信件還反映，這個副部長還告訴那位副政委，要他們趕緊對“講用報告”表態，不然的話，就要犯錯誤。吴統成認爲這件事情有損林副主席的威信，因此寫信向上反映。

吴統成的這封信是直接寫給林彪的，但信被作爲一般的群衆來信處理，首先到了軍委辦公廳，辦公廳主任蕭劍飛看了後，因爲信中的事情涉及到空軍，就把信轉給了我，要我負責處理。我讓人把周宇馳找來，給他看了吴統成的信。周宇馳看完後故作驚訝地説：“這是誰造的謡啊！這封信誰看了誰都會生氣的。現在快到國慶節了，還是要保護林副主席國慶節能出場要緊。這封信是不是不要轉到‘林辦’去，我們自己處理就算了。”

我説：“你可以親自到廣空去一趟，主要是到桂林場站去平息這個問題。要找到吴統成，告訴他他的意見是對的，我們支持他。同時告訴廣空，今後不要再這樣搞了。”周宇馳當即答應，説：

"我第二天就走。" 可周宇馳離開我家以後，不久就來了一個電話，說："首長，我不能去了，林立果找我有別的事情。"

這件事情給了我很大的刺激，因爲有了林立果，周宇馳就可以違抗我的命令，我竟然連周宇馳都指揮不動了！

我給當時的廣州空軍司令員王璞打了一個電話，把吴統成信中講到的情況告訴了他，要他注意妥善處理這個問題，同有關的人員談一次話，再不要作這樣的宣傳了。我還告訴王璞，大托鋪基地公開出售林立果的"講用報告"，這很不好，要予以禁止。

過了兩天，蕭劍飛給我來電話説："林辦"正在查找吴統成的信，要我趕快把信退回去，他好轉"林辦"處理。我告訴蕭劍飛說，這封信我已經處理了，處理結果我會給葉群打電話的。接着，我打電話到北戴河給葉群，把吴統成的信在電話上給她念了一遍。然後我告訴她，爲了保護林副主席的聲譽，我要周宇馳親自去一趟廣空，平息這個問題，但是周宇馳竟然不去，没有辦法，我衹好給王璞打電話，現在王璞正在處理這個問題。葉群説："既然是這樣，你把吴統成的信燒掉就算了，不用再轉到'林辦'來了。"

接着，我又打電話責問周宇馳："既然我們已經商定，由我們直接來處理這個問題，爲什麽又捅到'林辦'去？"周宇馳向我解釋說："因爲事情牽涉到林立果，所以我認爲還是要和林立果通個氣。"

這個情況使我感覺到，空軍黨辦的一些人，我已經控制不了了，讓林立果到空軍來，實在是一個大失誤。

現在回想起來，林立果剛到空軍時，確實比較老實，但是很快就在周宇馳等人的影響下變了，變得不知道天高地厚、胡作非爲了。他背着空軍黨委、背着我，搞了那麽多的活動。林立果的這些活動，我當時不知道。至于這一切的内幕我就更不知道。燈光燭影，千古之迷。這一切衹有留待後人去查證了。

十、廬山會議以後的江青

一九七〇年廬山會議以後，江青等人反而對我們幾次故作姿態，表示友好。我想他們主要有兩個目的，一個是對我們制造假象，麻痹我們。一個是到我們這裏來看看動静，表面上嘻嘻哈哈，但是實際上是要把我們一棍子打下去。這方面江青實際上是受命于毛主席。

首先是江青到軍委辦事組來看望我們。江青是從來不到軍委辦事組來的，但廬山會議後的一天下午，江青突然來到我們軍委辦事組。黄永勝和我們一起陪着她，在辦事組裏東轉轉、西看看。她還從來没有像這樣對我們客氣過。她説她是支持軍委辦事組同志們的，然後又同我們哼哼哈哈地扯亂談。在我的記憶中，她呆了個把小時就走了，我們也没有留她吃飯。

不久，江青又想起要照相，請林彪和我們一起去釣魚臺她的住處。江青又是搞燈光，又是擺姿勢，又是拿道具，忙個不停。給林彪照相時，她要林彪手拿毛澤東的著作，戴着眼鏡，做出一副認真讀書的樣子。這張照片，後來就登在《人民畫報》上，以表示團結。

大概是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周恩來要我親自送江青到海南島去休養。以前，江青每次乘飛機外出，周恩來都要我陪同，可在廬山會議以後，周恩來就不叫我陪同了。但這次他又安排我送江青。

一上飛機，江青就要我和她一起打撲克。我没有這個心思，就推説我要保證飛行安全，不能玩。江青堅持要我參加，説："好好玩一回吧，其它事情不要你管。"我衹好從命，打完了撲克，她就開始追問我，到毛澤東那裏究竟告了她一些什麽狀。我衹好含糊其詞，不作正面答復。她接着又説："你還寫了兩次檢討，黄、李、邱他們根本不作檢討，一點責任也没有，太不象話！"我一

聽，心想，她這話，是要挑撥我們之間的關系。衹好來了個不吭聲。

到了三亞，江青一個人獨占一座專門給中央領導修的房子，我則住在海軍招待所。一天之內，江青要我到她那裏去好幾次，一會兒這個，一會兒那個，什麽安排警戒呀、車輛呀、游泳的地方呀，事情真多。她還想去湛江，要我到湛江去看地方。我去了一看，湛江没有適合江青住的房子。回來我把這個情况告訴了她，這才算了。

處理完江青的事情，我便回到北京。結果回來没有幾天，周恩來又要我再去三亞，把江青送到廣州去。原來是因爲江青嫌三亞這個地方不好，住不慣。我又急忙調飛機并隨機飛到三亞，把江青送到了廣州。

在廣州，江青住在珠江邊一所專門爲毛澤東修建的房子裏，我住在廣州軍區招待所。這一次江青不讓我走了，要我陪同她在廣州一起玩幾天。可住了不到三天，又出了問題。江青住的房子雖然好，却由于珠江上過往的船隻過于吵鬧，讓她晚上睡不着覺。

到了第三天，江青坐着汽車，一下子到了機場，要飛機立即起飛回北京。我得到通知，立即趕往機場，并在機場給周恩來打電話，請示怎麽辦，周恩來要我無論如何想辦法拖住江青，不能讓她回北京。我也不知道這是爲什麽，這大概是毛主席的意見，他們倆口的事情我也搞不清。但周恩來的話是必須照辦的。我就對江青説，北京的天氣不好，硬要起飛是很危險的。江青衹好又回去了。

到了晚上，周恩來給我來了電話説："你想辦法動員江青到上海去，我已經給張春橋打了電話，通知他也動員江青到上海去。"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我告訴江青，這幾天北京的天氣都不好，不如先到上海去住幾天，然後再回北京爲好。江青同意了。這樣，我又陪同江青坐飛機來到上海。當時，周恩來爲了江青的事情也是兩頭爲難，爲毛澤東的這個"家庭問題"費盡了苦心。一方面是毛澤東的意見要堅决照辦，另一方面是江青又不能得罪，連我們都感到爲難。

一九七一年八月，周恩來突然要我和李作鵬一起，送江青到青島去。因爲青島有海軍的一個基地，周恩來讓李作鵬去的目的是便于照顧江青。我向周恩來提出，是不是讓李作鵬一個人去就行了。周恩來不同意，説："你是管飛機的，你不去行嗎？"

没有辦法，我衹好同李作鵬一起，陪江青到了青島。爲了一個江青，周恩來竟然要我們兩位政治局委員陪同！一到青島，江青就到處跑。一天，她跑到了一個公園裏，讓當地的群衆發現并圍了上來。群衆圍得越多，江青就越高興。可是我們却十分擔心，萬一出了什麽事情，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但是江青愛出風頭，感覺還很好。

一天，江青提出要到膠州灣去看看。爲此，海軍方面調動了四、五艘艦艇，讓她乘着軍艦去膠州灣看了陣地，玩了一天。江青又心血來潮，要海軍組織演習給她看。李作鵬没有辦法，衹好組織了一場演習。李作鵬還給我們每人送了一身海軍軍裝。第二天，我們都穿上了海軍軍裝，照了不少的相。

就在這時，我接到北京來的電話，説葉群回到了北京，説可能得了癌癥。正好，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和政委袁升平趕到了青島，來看望江青和我們。我和楊得志也是老搭檔了，我就把江青交給了他和李作鵬，立即返回了北京。

剛剛回到北京，又聽説江青把手摔斷了，周恩來要我立即派飛機，送最好的大夫吴階平到青島爲江青看病，但是這樣還是不行，江青非鬧着要回北京。周恩來又要我去青島把江青接回來。到了青島後我問李作鵬，江青是怎麽把手摔斷的，他説："什麽摔斷了手！也就是有一天晚上，她睡覺不注意，從床上掉了下來。其實什麽也没有摔着。"他接着又説："江青難伺候，説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她讓我們把幾個海水浴場的人都趕走了，讓她一個人到那裏游泳，可她還是不滿意。她到海軍的任何單位，我們都是按照最高的規格來接待她。她吃完、喝完，抹抹嘴就走，

完了還罵人。”李作鵬對她也非常不滿意。

就這樣我們把江青接回了北京。這個時候，已經快到九月份了。這時，毛澤東已經到南方去了，一路上去串聯，要拿掉我們，而我們則完全蒙在鼓裏，正在疲于奔命忙于侍候毛澤東的夫人。現在想起來真是又可笑又可悲。

十一、和葉群的最後一面

我最後一次見到葉群是在一九七一年的八月上旬。葉群因爲在乳房上發現了一個腫塊，害怕是癌癥，回到北京，到三〇一醫院檢查身體。那幾天，我正好奉周恩來之命，同李作鵬一起，陪同江青在青島玩。聽到這個消息，我便于八月七日下午回到北京。回來後，我就和陳綏圻一起到毛家灣去看望。

當天晚上，開完政治局會議以後，周恩來要我和邱會作一起到毛家灣去找葉群，向她要回毛澤東寫給林彪的一幅“龜雖壽”的字。周恩來告訴我們説，康生病了，情緒很不好，一次他去看康生，康生拉着他的手説：“你看我有没有歷史問題，材料都在這裏。”後來周恩來就向毛澤東提出，寫幾個字慰問康生。可寫什麽呢？毛澤東想到了以前曾給林彪寫過的“龜雖壽”，毛主席寫給林彪的是全文，就要周恩來把那篇找回來，作爲範本。

我和邱會作就到了葉群那裏。衹見邱會作的妻子胡敏和張清林也在那裏。我們説明了來意，葉群就要林辦的秘書去找那幅字。然後，葉群就一手拉着林立衡，一手拉着張清林，宣布他們兩個當天就要訂婚。我和邱會作立即就向葉群表示祝賀，一個是祝賀林立衡的婚姻大事，再一個就是祝賀葉群經檢查不是癌癥，這真是雙喜臨門。

等林辦的秘書把那幅字找出來以後，我就給周恩來打電話，周恩來要我立即派人把字送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處理完這件事

情，我和邱會作就告辭走了。八月八日上午，葉群坐飛機回北戴河，我又到機場送她。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葉群。

這之後，我與葉群還通過一次電話。九月上旬，空軍召開航校工作會議，部署學校工作，九日下午，我去空軍學院禮堂，向全體與會人員做報告，中間秘書給我遞了一個條子，説是葉群來電話找我。我不知道有什麽急事，就宣布會議暫時休息，去接電話。没想葉群告訴我，林立衡很快就要結婚了，結婚的那天，準備放兩部電影，讓全體工作人員表示慶賀。由于林立衡是空軍的幹部，所以要陳綏圻幫助找兩部影片。她還説，衹要提出影片的名字就可以了，提出來以後，告訴林辦，他們自然就會找出電影，送到北戴河。

接完這個電話，我當時心裏想：這是什麽問題，還要打電話來找我！回家以後，我就要陳綏圻幫着找一找。陳綏圻要秘書從王輝球那裏找了一本《大衆電影》合訂本，坐在那裏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出什麽合適的。以後葉群没有再來電話問，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十二、毛澤東南巡

正當我們如墜五里烟霧裏，認爲：廬山會議的問題已經完了，全黨可以團結起來，爲實現“九大”的任務而奮鬥的時候，毛主席又開始了南巡。這次南巡，是毛主席許多次南巡中最神秘的一次。

歷次毛澤東外出，我們都不了解情况。毛澤東的行踪衹有周恩來一個人掌握，這是組織紀律。但是，毛澤東每次外出，都要派飛機給他送文件、送東西、接送客人。這些派飛機的事情，有時候是周恩來通知我，有時候是汪東興直接打電話來要我辦理，所以毛澤東的行踪我是知道一些的。這一次，毛主席在武漢等地

不斷地派飛機接送幾個省、市的領導，這些情况我也是知道的。祇是我萬萬没有想到，毛澤東這是在搞串連，是在針對我們采取措施。他同當地領導人的談話的内容，對我們，包括林彪，都實行了極爲嚴密的封鎖。

正好是在九月上旬，吳振宇率領的朝鮮軍事代表團來中國訪問。李作鵬陪同代表團到武漢時，見到了劉豐。劉豐把毛澤東講話的一些内容，簡要地告訴了李作鵬。李作鵬回到北京以後，在歡送代表團的宴會之前，把這些情况告訴了黄永勝，但是没有告訴我和邱會作。

邱會作比較機靈，宴會以後，就坐進了李作鵬的車子，追問與黄永勝談話的内容。李作鵬也就將情况簡要地告訴了他。唯獨對我，他們是滴水不漏，説我的嘴不緊。

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我在濟南保外就醫以後，才從一些材料上了解到毛澤東這次南巡的情况和與人談話的内容。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毛澤東離開北京，于八月十六日到達武漢。在武漢，他先後同湖北、河南的黨、政、軍負責人進行了五次談話。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日，他又相繼在長沙、南昌分别召見湖南、廣東、廣西、江西、江蘇、福建等地的黨、政、軍負責人，同他們進行了談話。之後，他于九月三日到杭州、九月十日到上海、九月十一日到南京，先後同上海、南京的黨、政、軍負責人談了話。九月十二日下午，他回到北京，在豐臺車站同吳德、李德生談了話。

毛主席一開口就説："廬山會議的問題没有完……。"毛主席總結了十次路綫鬥争。這樣把我們的問題也上升到了路綫鬥争的綱上。毛主席説："對路綫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廬山會議以後，我采取了三個辦法，一個是甩石頭、一個是摻沙子、一個是挖墻角。批了陳伯達的材料，批了三十八軍和濟南軍區的報告，還有軍委開了那麽長的會議，根本不批陳，我在一個報告上加上批語。我的辦法就是拿到這些石頭，加上批語，讓大家討論，這是甩石頭；土太板結了就不透氣，摻一點沙子就透氣了，軍委辦事

組摻的人還不够，還要增加一些人，這是摻沙子。改組北京軍區這叫挖墻角。"

"你們對廬山會議怎麽看，比如華北組的六號簡報，（指廬山會議華北組那個攻擊張春橋的簡報）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我個人認爲是一個反革命的簡報。九十九人的會議，你們都到了，周總理也作了總結，發了五個大將的檢討，還發了李雪峰、鄭維山兩個大將的檢討，都認爲没有問題了，解决了。其實，廬山會議的問題没有完，還没有解决。他們要捂住，連總參二級部長一級的幹部都不知道，這怎麽行呢？""我説這些，是當做個人意見提出來，同你們吹吹風，現在不要作結論，結論要中央來作。""當然還是要挽救，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救得過來救不過來，也難説，凡是機會主義的頭子，改了没有？改也難。"

在這之後他還説："我一向不贊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四個人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不要靠秘書，不要把秘書搞那麽大的權。我的秘書祇搞收收發發，文件拿來自己選，自己看，要辦的自己寫，免得誤事。"

當然這些是整理以後的毛主席的講話。我還聽説，當時見過毛澤東的一些人説到，毛澤東當時直接點我們的名，對他們説："黄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倒了你們怎麽辦？你們和黄、吳、李、邱的關系是很好地呦。"他們當時大吃一驚，出了一身冷汗，竟然緊張得忘記了表態。

當我在事情發生十餘年後，看到他這些談話時，心情很不平静。幾十年來，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個光輝的形象，我始終認爲，毛主席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我對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義的化身。遇到任何問題，都要想想是不是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這樣的一個講話，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話來説：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第一、毛澤東明明親口對我們說："黄永勝、吳法憲、李作鵬、

邱會作你們幾個不要緊張，你們要有個底，我是保你們的。”可到了下面又說：“黄、吴、李、邱倒了你們怎麽辦？”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議上，經毛澤東親自批準，周恩來代表中央對我們的“錯誤”作了結論。從那以後，我們没有犯任何“錯誤”。可他跑到下面又說：“現在不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來作。”

第三、明明我在廬山會議以後三次要求見毛澤東，都被他拒絶了，不見我。不僅是我，就連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見毛澤東也没能見到。可到了下面他却說什麽“他們不來找我，我還是要去找他們……”。

第四，毛澤東經常親自倡導“批評與自我批評”。但是他自己有意見當面不講，或者是祇講好聽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風點火，還一再對我們封鎖消息，不準參加談話的人把這些情况告訴我們。他有意見可以擺到當面來談嘛！他自己老說“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但是他自己這樣做是光明正大嗎?

看過毛澤東的這個“南巡談話”我才知道，原來我一直都被蒙在鼓裏。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爲，是林彪、葉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這些談話，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澤東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會上把我們徹底拿掉的。他的這次南巡，就是在組織上和輿論上爲徹底拿掉我們作準備。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毛澤東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輿論準備。記得在毛澤東南巡前，他曾通過中央辦公廳，給每個政治局委員發了本名叫《何典》的書，這本書祇是薄薄的一本。當時我看了以後，祇覺得事情有些蹊蹺，因爲其中有幾句話特别耐人尋味。書中説：“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要醫；説嘴郎中無好藥，一雙空手見閻王。”我曾覺得，這可能是指林彪，但當時又不敢多想，因爲從紅軍長征到“文化大革命”，幾十年來，林彪一直是毛澤東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澤東最信任的人之一。我從未聽到林彪説過一句對毛澤東不敬的話。誰能想到，毛澤東這麽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讓人寒心哪！

十三、震驚全國的“九一三”事件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晚八時，周恩來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我參加了，周恩來在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在召開四届全國人大之前，先召開九届三中全會。全會要補選中央委員，如姬鵬飛等。還要補選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爲陳伯達倒臺了。

開完政治局會議，已經是九月十二日凌晨一點左右了。我回到西山住地，告訴陳綏圻，快要召開三中全會了，看樣子還得準備在會議上再作一次檢討，所以要很快再寫出一個檢討來。由于當時我們所有的文件，包括前兩次檢討稿，都保存在空軍大院的家裏，因此我告訴陳綏圻，準備第二天回大院，開始準備九届三中全會上的檢查材料。

九月十二日起床，吃過午飯，我就和陳綏圻及秘書張啓堯等人一起乘車下山，回到了空軍大院。我按照周恩來前一天晚上的指示，開始閲讀中央政治局印發的、周恩來準備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好在討論時提出意見。陳綏圻則是根據我的吩咐，開始找我過去的兩次檢討，準備寫新的檢討的材料。

看完《政府工作報告》，我想再抽出一點時間來處理一些空軍的事情。當時空軍正好在召開航校工作會議，于是我約王輝球和當時主管訓練工作的副司令員薛少卿一起，在晚飯後找八航校的校長和政委談話，解决他們幹部之間的團結問題。我們一起到了辦公樓的三樓，找他們談話。然後，我看還有時間，就又會見了剛剛從部隊調來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六個指導員，想解决一下空政文工團裏的派性和團結問題。

就在與空政文工團六個指導員談話中間，大約是當晚的十一點鐘，周恩來突然打電話來問我："是不是調了飛機到山海關機場。"我回答說："没有。"周恩來再次追問："究竟有没有？"我說："絶對没有。"但周恩來仍然告訴我："還是要查一查。"我說："好！"

放下電話，我立即打電話到空三十四師，問師長時念堂有没有調飛機到山海關機場。出乎我的意料，時念堂告訴我，三叉戟專機被調到山海關去了，并說："是胡萍副參謀長調去的。"我立刻感到有問題了，因爲平時任何專機的調動，都必須經過我來批準，但是這次三叉戟的調動情况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周恩來親自查問過來的。我立刻問："胡萍在哪裏？"時念堂回答："在西郊機場。"

我立刻要胡萍聽電話。胡萍向我解釋說："是飛機改裝以後的試飛，所以没有報告。"我又追問："爲什麽要飛到山海關，而不去别的地方？"胡萍没有答復。我告訴胡萍，飛機要立即調回北京。胡萍答應說："好。"

可是過了五分鐘，胡萍就打來電話說，"飛機發動機故障，正在檢修。"我當即告訴胡萍，飛機修好了立即回北京。

放下胡萍的電話，我馬上打電話給周恩來，報告了我和胡萍通話的情况，以及我要胡萍立即把飛機調回北京的措施。周恩來表示同意，并指示，飛機返回的時候不準帶任何人到北京。我又立即把周恩來的這一指示傳給了胡萍。

過了不大一會兒，周恩來又打電話找我，告訴我說："葉群給我打來電話，說副帥要到大連去轉一轉。我問她有没有調飛機去，葉群說'還没有調飛機，等一會兒，我給吴胖子打電話，要吴胖子調飛機來'。可能她很快就會給你打電話，先不要答應她，你就說要請示我。"

不久，葉群果然給我打來電話說："林總要到大連去，讓胡萍來一下，如果你能來也好。"我說："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說他的飛行技術也不好，還是讓時念堂去吧？"葉群不同意，說："時

念堂不熟悉，還是讓胡萍來吧，他又不是什麽大病。"我告訴葉群說："調動飛機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請示總理。"

同葉群通完電話，我又立即打電話，把這些情况報告了周恩來。我請示周恩來，說我要立即到西郊機場，去進一步追查飛機調動的問題。周恩來同意了。

放下電話，我就帶着秘書張叔良、警衛員薛邦喜，直接從辦公室去西郊機場。這時，大約是九月十三日凌晨零點左右。

我到西郊機場時，胡萍還没有回醫院，正在和空三十四師的龍副參謀長談話。見到我，龍副參謀長就走了。接着，我問飛機調動的情况，胡萍說的還是和電話裏說的一樣。正在這個時候，周恩來又打電話到西郊機場，告訴我說："林彪已經和葉群、林立果乘車離開了北戴河，車正往山海關機場方向開去，臨走的時候還開槍打傷了警衛人員。"

接到周恩來的電話，我頓時感到問題嚴重了。我估計，車從北戴河到山海關機場，需要個把小時，我就要秘書張叔良打電話到山海關機場，找到三叉戟飛機駕駛員——空三十四師副政委潘景寅。我在電話裏命令潘景寅："要絶對忠于毛主席，飛機絶對不能起飛，不管什麽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飛。"當時在電話裏，潘景寅滿口答應。

但是，當我打電話把潘景寅的表態報告周恩來時，他却告訴我說，林彪、葉群已經上了飛機，而且飛機已經起飛了。這大約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點鐘。周恩來要我注意看飛機的航向，注意它往哪裏飛，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報告他，他準備去和林彪談話。我問周恩來要不要準備飛機。他說："你準備一下吧。"我當即要三十四師準備了兩架飛機，因爲隨周恩來去的還會有警衛部隊。

我一直在雷達監視器前關注着飛機的動向，并隨時向周恩來報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飛機一開始向西飛，然後慢慢轉彎向北飛去。當飛機開始向西飛的時候，我要胡萍用三十四師指揮所的報話機，不停地向飛機喊話，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飛。可喊了

大約十五分鐘，潘景寅不作回答。這些情況，我都及時報告給了周恩來。

當飛機飛到了赤峰附近的時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們的殲擊機部隊，就問周恩來要不要把三叉戟攔截回來。周恩來説：“這要請示毛主席。”過了一會兒，周恩來答復我説：“毛主席不同意，説‘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到九月十三日凌晨兩點多鐘時，周恩來又來電話問飛機到了什麽地方。我説：“已經快出國境了，離中蒙邊界衹有一百公里。飛機高度衹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見了。”很快，飛機就從雷達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報告了周恩來，説飛機已經飛出國界，雷達看不見了。

不久，周恩來又來電話説：“絶不準有任何飛機到北京來，如果有飛機飛到北京來，你我都要掉腦袋。”我説：“請總理放心，我絶對保證，如果有飛機到北京來，我會攔截，并把它打掉。”周恩來表示同意。

我當即打電話給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李際泰，向他傳達了周恩來的命令，要他打開所有的雷達進行警戒，絶對不允準有任何一架飛機飛向北京，如果有飛機飛來，就攔截，并把它打掉。

緊接着，周恩來下達了禁航的命令，命令全國所有的飛機一律不準起飛，如果要起飛，必須要有毛澤東、周恩來、黄永勝、吴法憲、李作鵬五人的聯名命令。

我又立即打電話向北空的李際泰、沈空的張雍耿傳達了禁航的命令。其它軍區空軍，我要空軍司令部調度室作了傳達。當時我找司令部參謀長梁璞没有找到，因爲國慶節即將來臨，他到天安門組織國慶節預演去了。命令是由司令部一個值班的副參謀長負責傳達的。

隨後，我又向空三十四師的時念堂當面作了交代，三十四師在西郊、南苑、沙河三個機場的飛機，絶對不準起飛，要立即傳達禁航的命令。

到清晨兩點多鐘，周恩來又打來電話問我在那裏，我説還在

西郊機場。周恩來説：“我叫楊德中到你那裏來。”我説：“好。”楊德中隨後就趕到了機場，和我在一起。我明白，這是不信任我了。

到清晨三點多鐘，時念堂報告我説：“有三個人到了沙河機場，要直升飛機起飛。”我當即命令：“不準起飛，如果起飛就把它打下來！”我立即把這件事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表示同意，同時要我查一查，這三個人究竟是誰，是地方的還是部隊的?

不久，直升飛機强行起飛了。我報告周恩來説：“飛機飛向南口方向，我已經命令張家口的殲七飛機準備起飛攔截。如果直升飛機飛向國界，就把它打掉。”周恩來表示同意我的處置。

當直升飛機飛越南口和懷來時，我又向周恩來報告了一次。飛機飛到張家口附近時，我請示周恩來説：“飛機已經由殲擊機跟踪，如果再向北飛，就把它打掉。”周恩來表示同意。以後，直升飛機開始在張家口上空盤旋，又經宣化、懷來、南口，飛回到沙河上空，并有向西郊機場飛行的趨勢。我向周恩來報告説：“看樣子是要在西郊機場降落，但是萬一飛向北京市裏，我就把它打掉。”周恩來立即表示同意。

放下電話，我和楊德中一起走出候機室，來到室外，遥望天空，這時已經可以隱約地看到飛機了。但是過了一會，飛機并沒有在機場降落，而是向東飛去。我向周恩來報告説：“我已經命令由空二十師來接替空七師繼續跟踪。”周恩來説：“好！”

這以後，直升飛機又開始向懷柔方向飛去。我打電話報告周恩來，説：“如果飛機向海外飛行，或者向大連方向飛行時，我就命令跟踪的殲擊機把他打掉，主要是怕飛機飛往南朝鮮。”這些周恩來都表示同意。

這時，周恩來已經派了李德生到空軍司令部指揮所了解情況和“協助指揮”，梁璞也回到了指揮所。

當直升飛機從張家口往回飛的時候，我已經查明了直升飛機上的人有一個是周宇馳，但還不清楚其他的人是誰。他們乘坐的汽車上留有一雙鞋，還有一大包美金。這些情況，我都及時地報

告了周恩來。

上午八點多鐘，直升飛機迫降在懷柔地區。這時我才徹底查清，飛機上除了周宇馳以外，還有于新野和李偉信。駕駛員一共兩人，機長陳修文。當飛機飛到張家口上空時，周宇馳命令陳修文往烏蘭巴托方向飛行，但陳修文機智地騙過對方，飛回了北京，結果被周宇馳發現，開槍打死了陳修文。直升飛機降落以後，周宇馳、于新野開槍自殺，李偉信被捉。在監視這架直升飛機的過程中，楊德中始終同我在一起。

這時，時念堂來電話報告説："毛主席那裏的警衛部隊，要派人進機場，給毛主席打野兔子吃。"我立即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説："都什麼時候了，衹好叫他們去打一次，以後不要再這樣了。"我把周恩來的這個指示向時念堂作了傳達。

這之後不久，周恩來打來電話問我："空軍還有那些單位，你認爲是没有把握控制的？"我回答説："除了上海的空四軍、空五軍以及廣空以外，其它各軍區空軍，我都比較有把握。"周恩來接着告訴我説："已經決定對空軍的機場、海軍的碼頭各進駐陸軍的一個營，以保證安全，防止外逃。"我表示同意，并希望立即這樣做。周恩來説："好！"

到了中午十二點，我看在西郊機場没有什麼事情了，就向周恩來請示，是不是可以回去了。周恩來説："你在西郊機場再待一會，我派李德生到西郊機場來協助你，回頭我再通知你怎麼辦。"李德生不久就到了西郊機場。到了中午十二點半，周恩來通知我和李德生、楊德中一起到人民大會堂。離開西郊機場之前，我跟李德生、楊德中商量，讓胡萍先回三〇一醫院，并派我的車送胡萍。

九月十三日下午一點多鐘，我同李德生、楊德中一起到了人民大會堂。周恩來、張春橋已經先到了，他們兩人同我緊緊地握手。然後周恩來説："政治局準備集體辦公，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黄永勝、吴法憲在人大會堂，李先念、李德生、李作鵬、邱會作在京西賓館，康生、江青在家裏，汪東興保衛毛主席。"

接着，江青來到人民大會堂。她也同黄永勝和我緊緊握手。她手裏拿了一副撲克，要張春橋、黄永勝和我一起在東大廳打牌。我當時很奇怪，都什麼時候了，還打牌！是想試一試我們的心情嗎？反正我心裏没有鬼，打就打！就這樣，我們四個人一起打牌，結果我和黄永勝一頭贏了。江青看我們没有异常的表現，就出去了。

不久周恩來進來，要黄永勝準備一下全軍的作戰部署，同時要我準備一下空軍的戰備資料，準備晚上開會研究。另外，他還要我們通知副總參謀長閻仲川和總參作戰部的人員也一起來參加研究。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我要張叔良打電話告訴空軍作戰部和雷達兵部，要他們立即準備空軍的戰備情况和防空作戰預案，向我匯報。

九月十三日下午六點，雷達兵部的一個處長向我匯報了雷達兵的部署情况，并帶來了作戰防空部署圖。我聽完匯報以後，又進一步考慮和準備意見，準備晚上向周恩來和黄永勝匯報。

晚上九點鐘，周恩來召集黄永勝、我、閻仲川和總參作戰部的人一起開會，先聽取閻仲川的匯報，然後又聽了我的匯報。聽完匯報，黄永勝提出，南口方向没有部署部隊，這是一個空隙，應該立即調一個師去加强南口的防御。這一措施經毛澤東批準後，馬上進行了實施。

會議上，周恩來和黄永勝都認爲，空軍現在的防空部署比較恰當，特别是對蘇聯的防空作戰部署很好，不要再作變動，主要是提高警惕，防止空襲，防止飛機外逃，要作具體的布置，包括空軍、海軍、民航的一切飛機都不準起飛，不許再有一架飛機外逃，要堅决堵住一切漏洞，堅决守住空中防綫。

會議開完，已經到了九月十四日清晨三點半了。周恩來要黄永勝和張春橋、姚文元一起住在西大廳，要我和他自己一起住在東大廳。然後，我們就各自進入自己的房間休息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上午起床以後，我首先在電話上向空軍司令部指揮所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并要求空軍指揮所再清查

一次，禁航的命令是不是落實了。我還再三告誡他們，無論如何，絶對不準再跑一架飛機。不久，空司來電話請示，各個航校是不是可以在本場上空進行訓練飛行。我説："絶對不行，要堅决執行禁航的命令。如果有那個飛機起飛了，要拿領導是問。"

九月十四日下午三點，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召集張春橋、姚文元、黄永勝和我一起研究全國、全軍的情況。研究以後，由周恩來親自通過電話，將我們研究决定的部署傳達到各個大軍區。

九月十四日晚上九時，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集政治局會議，向政治局報告了防空作戰和保衛首都的部署，以及派陸軍部隊進駐空軍、海軍機場和碼頭的决定。政治局的同志一致表示同意。

我在會議上提出，應當向全軍發一個電報，説明派陸軍部隊進駐機場、碼頭，是爲了協助空、海軍和民航保衛機場、基地，各部隊不要發生誤會，不要認爲陸軍是去監視空、海軍的，以免增加矛盾，引起不愉快。空、海軍的同志應當歡迎陸軍的進駐，陸軍也應同空、海軍多商量辦事，雙方要很好地協作，共同完成保衛機場和碼頭的任務。周恩來和黄永勝都同意這個意見。于是，黄永勝當場找來總參的一個同志草擬電報，交周恩來審改後，交由中央政治局的全體同志傳閱，然後送毛澤東批發。毛澤東立即就批發了這個電報。大約在九月十五日凌晨二點，會議結束。政治局的同志仍然分住兩處休息，大家都没有回家。

一九八一年我來到濟南以後，聽空軍的同志告訴我，當年陸軍進駐空軍機場以後，有的地方不僅不允許空軍的人出入機場，甚至連上街買菜都不允許，以至連日常生活都發生了困難。這樣做就未免有些太過分了，林彪跑了，與空軍的廣大指戰員有什麼關系，他們都是無辜的！

九月十五日上午十點我起床以後，空司來電話報告説，禁航的命令已經全部得到貫徹落實，没有發生什麽問題。我要他們繼續檢查，防止發生飛機、人員外逃，防止出事情。

下午三點，我和黄永勝來到周恩來那裏辦公。我們進去時，張春橋和姚文元也在那裏。接着，周恩來帶領我們集體了解"九一三事件"發生時的情況和研究問題，包括查詢三叉戟飛機的下落等。

到了下午五點，周恩來告訴我們，外交部已經報告，證實有一架中國的大型軍用飛機，于九月十三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温都爾汗這個地方失事，飛機上的人員全部死亡。周恩來説，他已經指示外交部同蒙古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交涉，由我大使館派人去察看情況，并設法拍一些照片，送回外交部。

到了晚上八點鐘，周恩來又告訴我們，三叉戟飛機確實已經燒毁，林彪和葉群、林立果已經全部燒死，飛機殘骸散布在温都爾汗附近大約八百米的範圍内。蒙古人民共和國在這件事情上向我們表示友好姿態，外交部已經電告駐蒙使館，將死亡人員和飛機殘骸拍攝照片送回國内，最好能將遺體也運送回國。

周恩來又問我三叉戟飛機的情況，我説，那是巴基斯坦民航轉賣給我們三架三叉戟飛機中的一架，剛剛改裝出來，準備作專機用的。看樣子飛機是想在温都爾汗迫降而没有成功，起火燒毁的。飛機上没有領航員、副駕駛和通訊員，衹有潘景寅一個人，他没有飛過蒙古的機場，又是個政治幹部、平時飛夜航少，缺乏經驗，所以飛機必然會摔掉。

周恩來説："具體原因還有待進一步查清，明天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處理這個問題。"説完，周恩來就準備去向毛澤東匯報，我們也就休息去了。

九月十六日上午，我起床後首先給空司指揮所打電話，檢查空軍各個機場的情況。下午三點，周恩來起床以後，我向他匯報了自十三日以來空軍貫徹執行命令的情況，以及陸軍部隊進入空軍機場的情況。周恩來聽了以後，表示滿意。

周恩來又問我關于民航的情況，我説："民航的主要負責人之間不團結，有意見分歧，但是我現在無能爲力，我説的話他們不會聽的。"周恩來説："是不是請李德生同志去了解一下情況，同

民航的負責人先談一談，然後再召集會議解决？”我表示一切聽從他的安排。

下午五點，周恩來先找我去他的辦公室，再帶我到福建廳，讓我看駐蒙古大使館送回來的照片，要我辨認一下這些人的遺體。他們人雖然燒死了，但是遺體還勉强可以辨認。我大概找出了林彪、葉群和林立果以及其他人的遺體。至于飛機，大部已經燒毁，衹能看到散布在草地上的殘骸。從殘骸上看得出，飛機在迫降時是右機翼先着地，然後引起油箱起火的。

看完照片，周恩來要我先回房間休息，準備晚上八點鐘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九一三事件”的處理。他準備先請示一下毛澤東。接着他又説：“已經幾天没有洗澡了，想洗個澡。”我看得出，他是鬆了一口氣。我當即回到東大廳的房間裏看文件。

晚上八點鐘，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在福建廳等待。一直到了九點鐘，周恩來才穿着睡衣從毛澤東那裏回來。當時的周恩來神采奕奕，滿面笑容。他首先給大家看了外交部送來的照片，然後説：“已經向毛澤東請示，中央很快要發一個文件，把“九一三事件”通知到全黨。”他提出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文件。周恩來還説，文件上要表揚一下林立衡，因爲是林立衡首先向周恩來、汪東興報告“九一三事件”的。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接下來，周恩來向政治局傳達了毛澤東和他兩人共同回憶的林彪過去的十六條錯誤。我記得大概是：

一、林彪在井岡山時，就懷疑紅旗究竟打多久，毛澤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封長信，就是針對林彪的。

二、一九三四年，在反國民黨第五次“圍剿”期間，林彪擁護王明路綫，寫文章贊揚李德的“短促突擊”。

三、遵義會議後，反對毛澤東的作戰計劃，説什麽“現在是走‘弓背路’，不走直路，弄得部隊非常疲勞”。

四、長征部隊到達貴州以後，林彪主張在土城同敵人作一次決戰。土城戰役没有打好，部隊向雲南轉移的時候，林彪不願意去。

五、在土城戰役之後的不利情况下，林彪又主張在貴州的魯班場同國民黨打一個决戰。

六、紅軍過金沙江以後，林彪在會理會議上提出，不要毛澤東和朱德指揮隊伍，要彭德懷來指揮，并親自給彭德懷打電話，要彭德懷出來。

七、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的時候，林彪擁護張國燾的主張，所以張國燾的僞中央選了林彪當中央委員。

八、紅軍到達陝北以後，林彪不願意留在陝北，要求毛澤東給他兩千人、槍，他要帶隊到陝南去打游擊。

九、林彪不願意當紅軍大學校長，認爲這樣就是貶低了他。

十、紅軍改編爲八路軍以後，林彪又執行了王明的路綫，主張同國民黨合作，不搞共産黨的獨立自主。

十一、陝西洛川會議上，林彪主張搞大規模運動戰，不主張搞游擊戰。

十二、平型關戰鬥以後，毛澤東指示以營爲單位進行游擊戰，而林彪主張以團爲單位開展運動戰。

十三、平型關戰鬥以後，林彪居功自傲。

十四、平型關戰鬥以後，林彪單人獨馬地闖到閻錫山的部隊裏，被閻錫山的部隊開槍打傷。

十五、林彪在負傷以後，要求到蘇聯去養傷。當他從蘇聯養傷回來以後，中央派他到重慶當談判代表時，他有“右傾”情緒。

十六、一九四八年的遼沈戰役中，林彪在東北不願意執行毛澤東和中央的先打錦州的指示，主張先打長春。

今天我寫到這裏，不禁感慨萬千。一個人不能犯錯誤，一犯錯誤，就是幾十年的帳一起算，一無是處，没有一點是好的！林彪既然是幾十年來一貫犯錯誤，一貫反對毛澤東，爲什麽要把他任命爲黨中央的唯一副主席，而且要把他稱爲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呢？

我到濟南以後，看到了蕭蕭所寫的《“九一三事件”以後的林立衡》，也不禁爲林立衡的遭遇大感不解。當年曾受到中央文件

表揚的林立衡，爲什麽以後的遭遇如此之慘？個中詳情，衹有林立衡自己來解了。

九月十六日晚上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最後，周恩來説：“明天政治局的同志都回家住，不用住在人大會堂和京西賓館了。黄、吴、李、邱也回家住。吴法憲在政治局的活動多，空軍的指揮暫時由曹裏懷、王輝球、鄺任農、薛少卿、梁璞組成五人小組負責指揮，并派李德生協助吴法憲處理空軍的一些問題。”説完，周恩來還問我是不是同意。我怎麽説呢，衹有表示堅決照辦。

臨散會，周恩來還高興地説：“今晚由張春橋做東，買一瓶茅臺酒。”張春橋馬上説：“好。”馬上叫服務員拿來一瓶茅臺酒，給政治局的同志每人倒了一杯，大家碰杯以後都喝乾了。我不會喝酒，做了一個様子。喝完酒，周恩來興致勃勃地説：“大家回去休息。”

九月十七日上午，我起床以後就去找周恩來，向他請示説：“我準備回空軍了。看總理有什麽交代。”周恩來説：“你回去吧。回去後可以在空司開會，揭發批判‘九一三事件’。要注意穩定空軍和民航，弄清問題，防止人、機外逃。爲了幫助你工作，我準備派楊德中到空軍去參加你們的會議。”

我回空軍大院以後，先到空司指揮所了解情况，然後立即召集空軍司令部副部長以上的幹部會議，宣布了林彪等人外逃的“九一三事件”，要大家揭發批判。我首先在會議上作了檢查，表示空軍的問題，首先我要負主要責任。會議上，大家發言踴躍，紛紛起來揭發問題，并對“九一三事件”表示憤慨。會議開到十二點鐘，楊德中一直在座。但到下午三點繼續開會時，楊德中就没有再來了。

九月十七日晚上，我又檢查了一次空軍各部隊的情况。結果還好，部隊、機場、學校等所有的單位都没有發生什麽大的問題。到了九點鐘，周恩來打電話問我：“空軍司令部有五個人跑到了廣州，你知不知道？”我説：“不知道。”周恩來説：“你立即查一下，我也要廣州軍區查一查。”我説：“好。”

結果一查，是空司汽車隊的王琢、雷達兵部的許秀緒、情報部的王永奎等人。我當即通知廣州軍區空軍政委焦紅光查明情况和堵截，要他們見到空司的這五個人，就立即逮捕起來，押送回北京。

過了一個小時，焦紅光來電話説，已經找到了這五個人，説這幾個人先是到白雲山雷達站，以後又到了九師沙堤機場，最後向北走了，現在已經到了韶關附近的雷達站。我命令焦紅光立即把這五個人逮捕起來。焦紅光説：“已經要求廣州軍區協助我們辦理此事。”這個情况，我很快報告給了周恩來。

到了晚上十一點，周恩來給我打來電話説：“據廣州軍區報告，這五個人已經抓到。你要注意加强對空軍領導機關的管理，强調紀律，所有人員不經過請假批準，不準外出。如果有人要外逃的話，請告訴我。”我向周恩來表示堅決照辦，同時將他的指示轉告曹裏懷、王輝球、曾國華等人，要他們一起進行布置。

就在這天晚上，梁璞告訴我，林立果和周宇馳等人在空軍各直屬單位還有五個據點：一是西郊機場，二是空軍學院，三是高級防校，四是東郊民巷空軍招待所，五是幹部休養所。他們在前三處還專門修了房子，其中空軍學院和高級防校的房子還修得特别好。我立即將林立果在空軍修建據點的情况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隨後指示要北京衛戍區派人對這些據點進行檢查和查封。

處理完這些事情，已經是十七日深夜了。到這時，我才回到家。見到陳綏圻，我簡要地告訴了她這幾天的情况。我説：“我對‘九一三事件’以前確實毫無所知，如果我知道了，我絶對會報告中央，絶不會去投靠蘇聯。我十五歲參加革命，全家六、七口人被國民黨迫害光了，是黨和人民把我培養成人，我絶不會離開黨，離開人民和祖國。你不用擔心，我在‘九一三事件’中應負的責任我是最清楚的，也最了解自己，我準備向中央寫檢討。”

陳綏圻説：“見到你很高興。今天張叔良告訴我，在查抄于新野的宿捨時，查到了一個筆記本，上面對你和‘吴辦’每天的活動都有詳細地記録，連秘書張雲龍是什麽時候走的，接替他的秘

書是誰，是什麽時候來的，都有記録。真是想不到，他們對我們竟然使用這種的特務手段！”

陳綏圻還告訴我：“張叔良説，王飛已經通過空軍黨委下命令，任命他爲空軍黨辦的處長。王飛下的這個命令我們根本不知道，你看他們把我們架空到了何等地步！對你進行封鎖，連你身邊秘書的任命都不通過我們。”説完，她就叫我趕緊休息，説我這幾天太累了，應該好好休息一下。

九月十八日上午我起床以後，吃了一點早飯，就到空司指揮所去開會，繼續揭發批判林彪、林立果等人。同時，我要曾國華召集空軍直屬各大部的人開會，整頓空軍直屬機關的行政管理工作，嚴格出入和請假制度，以落實周恩來的指示。

晚上接到周恩來的通知，要我晚上八點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政治局會議。我于晚七點半去人民大會堂開會，把空司的會議交由梁璞繼續主持。

晚上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主要是討論修改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中央文件。經過會議逐字逐句地討論，會議通過了這個文件，并由周恩來報毛澤東批發。

散會以後，我回到空軍辦公樓，繼續參加會議。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發言都比較積極，但也有少數幾個人默不作聲，其中有空司氣象部的副部長，他表示不相信會有“九一三事件”，説：“這是不可能的。”會後，我和王輝球、鄺任農、梁璞等人一起找那位氣象部副部長談話，他仍然不相信。我要他好好想一想，就讓他走了。談完話，已經是九月十九日清晨，我就在辦公室支上一張床睡下了。

九月十九日上午起床以後，我仍然没有回家，就在辦公室裏吃了一點飯，然後處理一些日常的工作。我首先檢查了空軍各單位的情況，通知空軍各單位繼續開會，揭發批判“九一三事件”，并將會議記録上報，同時考慮進一步揭發問題。然後，我開始考慮自己的錯誤，準備寫出檢討，上報中央。

下午三點，周恩來通知我和曹裏懷、鄺任農三人，到人民大

會堂談關于民航的問題，至于民航哪些人參加，要我們自己定。我們商量了一下，决定要民航的張瑞靄、劉崇福和徐伯齡參加會議。

下午四點，我和曹裏懷、鄺任農三人來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但周恩來通知要李德生和我先到福建廳談問題。在福建廳，周恩來告訴我們，北京衛戍區從周宇馳和于新野乘坐的直升飛機上，查出了一部分材料，其中有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顧同舟寫給林立果的秘信，密告毛澤東的南巡講話，説毛澤東已經在講話中點了林彪的名。另外還有一個名單，周恩來要我辨認一下。這個名單裏的大部分人我是認識的，但也有少數幾個人我不認識。于是周恩來就要我同李德生一起，到空軍司令部去查清楚。同時他還决定，由李德生負責，把名單上的人都送到亞非療養院監管起來。

接着周恩來便召開會議研究民航的問題。民航到會的有張瑞靄、劉崇福和徐伯齡。由于他們三人意見分歧較大，周恩來便指示李德生負責進一步搞清情况，并找民航總局政委劉錦平談話。

散會以後，我到西山參加黄永勝召集的軍委辦事組會議。參加這個會議的有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北京軍區和北京衛戍區的領導。周恩來指示由黄永勝代表中央傳達了中央文件。傳達完文件，黄永勝又要求各部門回去立即組織傳達，并開展揭發批判林彪等人的運動，運動的情况要向中央寫出報告。

軍委辦事組會議開完，我又回到空軍大院。晚上周恩來告訴我，空軍的傳達由李德生和我兩人共同負責。

九月二十日凌晨一點，李德生找我一起同空六軍軍長吉士堂、政委司中峰談話，追查王飛九月到空六軍檢查工作的情况，看王飛是不是借檢查工作的名義秘密到了北戴河。談完以後，李德生讓他們先回去，準備第二天再找王飛談話。

凌晨三點，李德生又來找我和梁璞一起辨認周宇馳携帶的那份名單，結果梁璞全部認得，名單上的人都是司令部的。李德生决定，他自己立即去亞非療養院準備地方，同時由我和梁璞負責，按周恩來的指示，將名單上的人全部送到亞療監管起來。李

德生還確定，由梁璞具體承辦這件事，他自己在亞療負責接收。之後，我們便開始分頭行動。地方準備好了以後，李德生給我來電話，要梁璞開始送人。等這件事情辦完，天也就亮了。

九月二十日上午，我召集空軍直屬機關師以上幹部在辦公樓開會，首先由李德生傳達了中共中央五十七號文件，接着我補充傳達了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總結的林彪十六條歷史錯誤。李德生在講話中還説：“吴司令多次向我主動作自我批評，并承擔責任，我都報告了周總理。”

下午，在李德生、楊德中的參加下，我開始召集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到會的人紛紛積極揭發批判林彪、林立果等人。我要大家對我的錯誤也進行批評，但他們的發言都没有涉及到我，衹有梁璞説了一句：“王飛曾經説了許多假話來欺騙你，但是你過于相信王飛。”

在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開會的同時，空軍直屬機關各大部，也分别召開了師以上的幹部參加的黨委擴大會議，討論中央五十七號文件，進一步揭發批判林彪、林立果等人。晚上八點，我聽取了各大部的匯報。

當晚九點，周恩來打電話找我説：“要對空軍和民航各單位的情况進行檢查，如果有問題，要立即向我報告。”

放下電話，我馬上找民航總局副局長馬仁輝，一起分析民航所有機場的情况，并研究如何堵塞漏洞，防止人員和飛機外逃。談完以後，已是晚上十點了。我當即將民航的情况和準備采取的措施，一一向周恩來作了報告。周恩來表示完全同意。

從九月二十一日零點起，我開始向中央寫檢討。我一邊回憶，一邊構思，一直到凌晨四點才睡覺。

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點我起床以後，李德生通知我，要我轉告劉錦平到京西賓館去談話。我隨即打電話通知了劉錦平。然後，從十點半開始，我繼續主持召開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一直開到下午六點才休會。這天的會議，李德生、楊德中没有來參加。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我檢查了空軍各單位的情况，特别是陸軍進駐機場以後，雙方團結的情况。一般地説，雙方都是按照中央軍委指示辦事的，没有發生大的問題。下午三點，我向周恩來報告了檢查的情况。周恩來説：“你們檢查一下很好，一定要搞好團結。”

下午四點，我繼續主持召開空軍黨委擴大會議，一直開到晚上十點才結束。晚飯是利用休息，在會議室吃的。開完會，我同李德生一起找廣州軍區空軍政委龍道權談話，他當時在解放軍三〇一醫院看病。李德生首先向龍道權傳達了中央五十七號文件精神，然後我要他立即趕回廣州軍區空軍去主持工作，并交代了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主要是要他堅決貫徹禁航的命令、嚴格管理部隊、一切問題要多請示和報告廣州軍區等。

接着，我同李德生又找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劉懋功談話，他當時也在三〇一醫院治病，要他回南京軍區空軍主持工作。我還特别交待劉懋功，要他特别注意空四軍和空五軍的問題，因爲王維國和陳勵雲已經被隔離，要他認真組織好這兩個軍的班子，以指揮隊伍。

談完話，我就在辦公室主持起草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報告，準備上報給中央。報告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表態擁護中央五十七號文件；第二部分是常委擴大會議的情况和揭發出來的問題；第三部分是如何進一步深入地揭發和批判。一直到九月二十三日清晨四點，才在辦公室休息了。

九月二十三日上午，我在辦公室裏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向中央寫的報告。下午兩點，繼續召開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會上，我再一次檢查了自己的錯誤，同時也對林彪等人進行了揭發批判。我的發言大約兩個小時。我要張叔良記録我的發言，并據此草擬我向中央的檢討。

張叔良寫完以後，我又修改到深夜十二點，然後交張叔良重新抄録一遍，于次日凌晨四點由我簽名以後發出。我在檢討中再次明確請求中央對我進行審查，并在檢討的後面附上了揭發材

料。

大約在九月二十三日晚上十點鐘左右，我接到中央辦公廳王良恩轉達的周恩來指示，要我把空軍的實力，以及部隊、學校的位置和防空作戰的部署制成表格，并附上地圖送給周恩來。我交代給梁璞和作戰部的人員，要立即制作表格和寫好報告。梁璞他們一直弄到天亮才完成。表格和報告作好後，我約王輝球一起審閱以後，簽署上報。

由于這些文件牽涉到空軍的整個情況，屬于核心機密，因此在送走之前，我親自給周恩來的秘書打電話，要他自己到西華門去接。打完電話，我又派空司作戰部副部長吕秋振親自送這些文件到西華門，并交代一定要親自交給周恩來的秘書，并打收條。

在這段時間，張叔良還把他主動記録下來的有關十二日晚上和十三日所發生的一些情況記録，給我看了，其中包括他在場聽到的一些往來電話和我當時對一些問題的處理措施，他都記録在案，我看了以後，表揚他主動作了這件事情，并告訴他，這個記録，我没有時間詳細看，先由他負責，保存在案。

第十五章　階下囚

一、人民大會堂被逮捕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凌晨四點，我的秘書張叔良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電話通知，要我上午八時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參加軍委辦事組的會議。接到通知以後我問黄永勝，準備開什麼會，黄永勝説他也不知道。這時我就估計，很可能是要處理我們的問題了。想到這裏，我就更加急于修改我的檢討和催辦周恩來所要的空軍全部實力的報告，以便即刻上送，了却在收審我之前要辦的兩件事情。待檢討報告送出，吕秋振也把空軍實力報告的收條拿回來以後，我才放心了。這時天已經大亮了。

早上六點鐘，我要警衛員薛幫喜幫我打一點早飯，并要張叔良通知陳綏圻到我的辦公室。陳綏圻來了以後，我説："這麼多天了，我一直在辦公室没有回家，主要是怕下面的部隊出事。我馬上要到人大會堂開會，現在有幾件事情要交待一下。第一、我的皮包裏存放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給中央的報告，你統統帶回去保存一下。第二、我去開會可能回來，也可能回不來，我已經請求中央對我進行審查，我相信自己是經得起審查的，我自己了解自己。第三、今後孩子要靠你撫養照顧，我可能見不到他們了。"

陳綏圻的回答很簡單，她説："你的問題我最清楚。你放心，

中央會實事求是的。我相信你，要經得起考驗，千萬要活着！”

我告訴他，我整晚都没有睡覺，很疲勞，要她先回去。她拿着皮包就走了，表現得非常穩重而安定。我一直站在辦公室的窗户前，看着她走回宿舍去。接着，我要張叔良把九月十二日晚上的記録整理好，因爲那個記録可以清楚地説明我在這天晚上做了什麽。

七點半，我前往人民大會堂開會。汽車一到北門，就有中央警衛團的人員下來拿走了薛幫喜手中的皮包。進門以後，他們把我帶到了門房裏，告訴我説，毛澤東有命令，今天開會不準帶槍。接着，就搜了我的身，把我身上的眼鏡、鋼筆都拿走了。

我到了福建廳以後，看到有兩排坐椅對放着，一排是沙發，一排放的是藤椅。警衛讓我坐在第一排的藤椅上，後面坐了一個彪形大漢看着我。邱會作比我先到，黄永勝、李作鵬跟着我進來，都受到了與我同樣的“待遇”。我心裏想：“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大概這樣辦過了很多人，現在終于輪到我們這幾個了！

我們四個人到齊以後，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劉賢權、張才千，以及北京衛戍區的吴忠、楊俊生，公安部的李震，中央辦公廳的楊德中等也都來了。他們坐下以後，周恩來説：“你們四個人同林彪的關係至今都没有交代，中央等了你們十天。毛主席和黨中央決定，停止你們的一切職務，給你們每個人找了一個地方，好好地反省檢查自己的錯誤。你們年紀都大了，生活上會有人照顧。你們的老婆、孩子祇管放心，組織上會照顧他們，請你們相信我周恩來。”

接着，他就對黄永勝説：“你是怎麽搞的，毛主席對你是非常信任的，你怎麽搞成這個樣子？”黄永勝一聲都没有吭。周恩來説：“好，你去吧。”説完後，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三人同黄永勝緊緊握手，由吴忠把黄永勝帶走了。

接着，周恩來又對我説：“你把空軍搞成這個樣子，你不要出問題呀，會給出路的。”我明白周恩來的意思，他説這話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殺。我説：“我没有做虧心事，我自己最了解自己。”

這時李作鵬大聲説：“曉得你搞了些什麽名堂！”我没有回答。周恩來説：“你去吧。”然後，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三人又和我緊緊握手，讓楊俊生把我帶了下去。

我們坐電梯到了地下室，我看到地下室有一排車，我上的是二號車。很快，我們這幾輛車就從人民大會堂地下室向外駛去。

二、一覺醒來，窗户上都焊上了鐵條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八點半左右，我所乘坐的二號車，隨着前面的一號車從大會堂地下室駛向地鐵，一直開到建國門，然後向東行駛。大約經過一個小時，把我送到了北京衛戍區二師駐通縣的一個連部。

到了以後，有一個高個子團長，把我領到了一座樓房的第三層樓上靠樓梯邊上的一間房子裏，叫我暫時在那裏休息。那個房間很小，祇有一張單人床，上面有軍用棉被和草墊子。還有一張三屜桌和一張凳子。我連日來都没有好好地休息一下，實在疲勞，一到那裏就想睡，但是因爲床太窄，一轉身就有掉下來的可能性，我没有睡着。

到了中午十一點鐘，團長用鋁盆給我送來了一點面條和一點熟牛肉，告訴我説：這是請厨房做的。到了下午兩點，我聽到走廊裏人聲嚷嚷，并且聽到鋸鐵條和焊接的聲音，這時團長進來，我告訴他，這個床太小，請他給我换一個大一點的床。他答應説：“好。”下午就給我搞了兩張單人床拼起來了。由于過度疲勞，我很快就睡着了。

下午五時，我一覺醒來，那個團長就叫我搬到南面的一個屋子裏。我一看，好家伙，整個屋子的窗户上都焊上了鐵條，門上還加了鎖。這是專門爲我焊好了鐵窗、鐵門，成了一間單人牢房。在牢房裏，按照我的要求，用兩張單人床給我鋪好了一張比較寬

的床鋪，床上墊有一塊草墊，放着一副戰士用的被褥。一張三屜桌和一張凳子，也從北屋搬到了這裏。從此，我開始飽嘗鐵窗的風味，開始了另一種生活。

團裏派了一些幹部，組成一個班，由團長帶領，專門負責看守我。除了那個團長，其他人都同我一起在連隊吃飯。

北京的九月下旬，天氣漸漸變冷。由于走得匆忙，我身上衹穿着一身單衣褲，唯一帶出來的一件毛背心，也放在我原來坐的車上没有拿下來。因此，天色一近黄昏，寒意漸深，我就不禁凍得受不住了。

吃晚飯時，他們給我從連隊的食堂打來了兩個饅頭、一碗稀飯，還有一點青菜。我衹喝了一點稀飯，吃了半個饅頭。團長問我："你爲什麽吃這麽少？"我回答説已經吃飽了。這時我看見，看守我的人員已經增加到了二十多人，我的房間門口還增設了雙崗。

那天晚上，因爲冷，加上又比較疲勞，吃完飯我就睡下了。但是却翻來覆去地還是睡不着。到晚上八點鐘，我向看守我的人員提出，請醫生給我吃一點安眠藥。醫生隨後就送來了藥，但是一直看着我把藥吃了下去，才走開。吃完安眠藥，我這一覺就從晚上八點半，一直睡到了第二天早上九點才醒來。

起床後，他們看我没有洗臉的毛巾和牙具，就給我買了毛巾、牙刷、牙膏和一個塑料杯。然後，帶我上一個集體的洗臉室洗臉。到這時我才知道，這裏原先住的是一個班，如今却用來關押我一個人。我還看到，樓上的衛生條件極差，灰塵很厚，到處都是蜘蛛網。

早飯時，他們給我打來大半盆米飯，還給我炒了一點鷄蛋。我知道，這是對我的特殊優待。已經二十多年没有吃過連隊的飯了，現在吃起來，就不禁想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感到有些親切之感。進而想到了紅軍時期爬雪山、過草地的艱苦歲月。現在的條件再怎麽差，也要比那個時期好多了！再想一想，如果不好好吃飯，萬一身體垮了，又怎麽能應付今後大量的審查，説清楚自己的問題？想到這裏，我就强迫自己，一定要多吃一點，盡量把自己的身體維持好。

中午碰上連裏炸油餅，他們給我拿來了一塊，大約有半斤重。我吃了一半，還喝了一碗湯。剛吃完，團長就過來了，又問我怎麽不吃了，我回答説："實在吃不了。"

第三天，九月二十六日，看守人員開始同我説話了。第一個同我説話的是一位指導員，他問我有什麽要求。我告訴他："天氣冷了，我没有帶增添的衣服，凍得受不了。"他答應向團長反映。我又問："你們都是幹部吧？"他説："我們都是臨時調來的連、排幹部，負責保護你的安全。"以後，除了一個副營長在看守的時候對我的態度不大好以外，其他的連、排幹部的態度都很好。慢慢地，我對這種生活也就習慣起來了。

第四天上午，我正在床上坐着，那位團長進來了，突然叫了聲："司令員，身體怎麽樣呀？"我趕緊説："你以後别叫我司令員了，叫我老吴就行了。這幾天累了你了。"他説："你剛來，許多事情我們都没有準備。我們會逐漸給你改善生活條件，讓你休息好。你有什麽要求也可以提出來。我就在隔壁的房間陪你，你有事，隨時可以通過衛兵來叫我。"我説："非常感謝你。目前最大的困難是天氣冷了，但是衣服、被褥都不够，襯衣也没有换洗的。"他説："我們已經向上面反映了，幫助你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團裏先給你一套襯衣、襯褲和一條絨褲。"我説："謝謝你們了。衣服和褲子我家裏都有，能給我拿來就行了。"他聽了後説："那麽請你開一個單子，我們向衛戍區寫個報告。"

于是我開了一個單子。接着，我又向王團長提出洗澡的問題。他説："團裏的澡堂子壞了，要修理一個月才能使用。你現在先用點熱水擦擦澡，以後再到我家裏去洗，我家裏有澡盆。"我説："這樣不妥吧？"他説："没有關系。你不認識我，我在蘇北就認識你。你有什麽困難，盡管向我説，我給你反映。爲了保證你的健康，我們已經把團衛生隊一個比較好的醫生調來，跟你住在一起，以便照顧你。"我説："你們太忙了。請放心，我不會出問題

的。”我説這話的意思是暗示他，我不會自殺和跑掉的。

從此以後，王團長每天早上、中午、晚上都要來看我一次，晚上就睡在我隔壁的房子裏。一個星期以後，王團長來告訴我説：“以後要逐漸改善你的生活，以保證你的健康。現在是住在一個連隊裏，將來要搬到團部的招待所去。”這以後，每天連裏在吃飯時，都給我另外炒一點猪肉，或是鷄蛋，以示優待。

整天蹲在牢房裏，没有事情做，我就請求給一套《毛澤東選集》看，他們立即就給我送來了。我没有報紙看，什麽情况也不了解，向他們提出來以後，每天又發給我一份《人民日報》和一份《參考消息》。後來，我又開始寫毛筆字。這樣，我的情緒慢慢地就穩定了下來。

大約過了半個月，我又要求每天到外面去活動一下。于是，他們就在走廊上劃了一塊將近二十平方米的地方，用鐵絲拉了一個隔離簾子，就叫我在這個地方活動，上午和下午各三十分鐘。

我從來没有蹲過監獄，不知道什麽叫“放風”。有一天上午，一個看守人員突然開門叫我出去“放風”，我不懂，就問他，什麽叫“放風”？他解釋説，就是叫我出來在走廊上活動活動。我這才知道，這就叫“放風”。其實走廊上一點風都没有。他們説，以後給我找一個地方，到外面去活動。

又過了十多天，他們給我送來了一套襯衣。由于長時間没有衣服换，换下來的衣服髒得很厲害。我想將换下的衣服自己洗一下，就要求團裏代我買一塊肥皂，先記下帳，等我以後有了錢再還給他們。他們説，不用記帳，以後我换下來的衣服，都交給他們，由他們來幫我洗，不用我自己洗。

到了十月下旬，團長又給我取來了必要的衣服和洗漱用具，以及棉衣、被子、大衣等用品。這樣，過冬的問題總算解决了。

十月底的一天，我又向那位團長提出要點書看，請他向上面反映一下。他問我要什麽書，我説要一些馬列的書。我開了一個書單子給他，過了一個星期，我要的書全部都給我拿來了，而且還都是我過去看過的書，上面有我過去看書時劃過的杠杠。看到

這些書後，我知道老伴還在家裏，心中稍稍得到了一點安慰。不是嗎，别人是找不到我原來看過的書和衣服的，祇有她才會這樣一本本，一件件地找出來，經過檢查以後才交給我的。

拿來了許多書，我就有事情幹了。這以後，我整天讀書，每天晚上都一直讀到九點。看守人員不斷地叫我休息。我説：“過去戰争年代，是一仗接着一仗。解放以後，又是忙于工作，雖然讀了一點書，但從來没有系統地學習過。現在有了這樣的機會，我得補上這一課。”

大約是在十一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團長帶了一輛吉普車來，叫我去洗澡。汽車先在團裏的營區轉了一圈才進入了澡堂。我一看，好大的一個營區，團部的一個小辦公樓就在附近。

這是澡堂修復以後的第一次燒水，裏面空無一人，祇有團長、看守人員和我。我們在大浴池裏洗了一個多小時，王團長還命令看守人員爲我擦了背。從這以後，每個星期我都要去洗一次。

到了這時，我的監禁生活就走上了軌道。同時，我同看守人員之間的關系也逐漸融洽了起來，一些生活上的問題，他們也不時同我説一説。但我們從來不談及别的。在人格上，他們對我是尊重的。

從我被關押到北京衛戍區以後，兩個多月的時間裏，没有上面的人來過，也没有問過我什麽問題。我心裏想，幾十年來都没有這樣清閑過了，這倒也好，休息一下腦子，看以後怎麽辦吧，反正我心裏没有鬼，不怕鬼叫門。

三、五次提審

大約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團長來告訴我，説要有“中央首長”來找我談話，要我有一點思想準備，等他們到了以後他再通知我。我問在什麽地方，他説就在這座樓裏。我心想，

兩個多月了，没有任何人找我談過話，今天來的“中央首長”是誰呢？難道是葉劍英嗎？要談些什麽呢？是他們搞清楚了情况來放我出去嗎？因爲我同“九一三事件”確實没有牽連，在一些問題上有失察的錯誤，頂多是撤銷我的職務，總不至于把我關在這裏長期監禁吧。

那天上午，我照常看書、寫毛筆字。等到了中午十二點："中央首長"仍然没有來。午飯以後，我就睡覺了。下午三點，團長來叫我，説“中央首長”來了。我隨他走出房間，來到了上一層樓的一個大房間。我看見屋裏擺着一張大桌子，上面鋪了白布，并放上了熱水瓶和茶杯。正面坐着團長説的兩位“中央首長”，一位是公安部副部長李震，另一位是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吴忠。在他們二人的兩邊，又各坐着一個人，一個是公安部政治部的何副主任，一個是北京衛戍區政治部的李副主任。

李震和吴忠都是經我們的手提拔起來的，但今天也擺起了“中央首長”的架子，難道毛澤東已經把他們提升爲“中央領導”了嗎？是不是已經補選成了政治局委員，有這麽快嗎？他們一臉陰沉地叫我坐下。接着開始問我第一個問題，就是九月十二日晚上的情况。我説："九月十二日晚上的問題，我同周恩來總理不斷地通電話，對所有的情况，周總理是最清楚不過的。”他們還是要我再説一遍，我衹好把情况又説了一遍。我説完後，他們就説今天先談到這裏，以後還會再同我談話的。這一次審問讓我感到非常失望，因爲看來他們根本不了解情况，這個審查是没有一個頭緒。看來，我一時出不去了。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團長來跟我説，已經正式來了通知，要我搬到團部的招待所去。我聽了很高興，他要我先過去看一看。我説不用了，搬過去就是了。王團長説："車子就在下面，下午就搬吧。”我説："好。”

下午五點鐘，團長帶來了一輛吉普車。我上車以後，車一直向西開，到了團部宿捨樓旁一座兩層的樓房。他們要我上樓，我一看，二樓上一共六個房間，其中給我兩間，一間放東西，一間

睡覺，事先都安裝好了鐵門、鐵窗。每個房間有兩個窗户，鐵窗外面有紗窗，裏面有玻璃。房間都是剛粉刷過的，空氣也比較好。我住的房間裏有一張雙人的木板床，鋪着新的床單和兩床褥子，被子是從我家裏拿來的。還有夏天用的草席和蚊帳。屋裏有一張寫字臺，供我讀書寫字，還有一張三屜桌，供我吃飯用。另外，還給了我一個新的熱水瓶和茶杯，一個沙發和一個軟椅子，還有一個衣架、一張中國地圖和一個温度計。

我的隔壁，住着一個醫生和一個幹部。我們所住的房屋之間，建有一道取暖用的火墻。後來我才知道，這道火墻每年要燒掉四噸煤，都是公安部送來的。這道火墻的烟筒建得不太好，每到刮西北風的時候，烟總會往裏面倒灌，真是把我們嗆得够受的。

走廊的北屋是一個大房間，也是我的活動間。每天下午，我可以到那裏活動一下或散一散步。另外的兩個房間都是儲藏室，裏面放了不少東西和取暖的煤。還有一個公用的盥洗室和一間厠所。

看守人員都住在樓下，大約是一個班。後來我慢慢知道了，他們都是些連排幹部，一共有三個副連長、七個副排長。他們對外是絶對保密的，不能跟任何人説他們在執行什麽任務，更不能説看守的是什麽人。

他們在樓下安排了一間厨房，由看守人員輪流做飯吃，主食全是大米和富强粉。一般早上有油餅、咸菜和稀飯，中午和晚上都是兩菜一湯。他們還不時買點鷄、魚什麽的，給我改善生活。另外，他們還給我買了一些茶葉、餅乾、糖果和水果等，也可以吸烟。每個星期洗一次澡。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李震和吴忠兩人又突然來到我的牢房裏，問我生活怎樣，有什麽困難，還説天冷了，要我保重身體。他們還告訴我，中央成立了專案組，由他們兩人負責我的專案，所以他們今後還要同我談很多次。今後就隨便了，有什麽就説什麽，實事求是，四川有一句話叫竹桶倒豆子——乾脆。我説："那就好，應該是這樣的。”他們又説，今天衹是來看看我，就不談

了。説完以後，他們就走了。

第二次審訊是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份。一天下午，李震和吴忠又來了。這次主要是問，葉群一九七一年八月從北戴河回北京的一些情況。我跟他們説：“八月八日我奉周恩來之命，到葉群家裏取一副毛澤東給林彪寫的字，并且談了談林立衡的婚事，没有談什麼别的事情。”

他們反復追問：“有没有説到‘搞文的不行，搞武的’這樣的話。我多次説明，没有談到這個問題。我説，祇有在九届二中全會期間，林彪在一次同我談話的時候説過：“我們這些人，行伍出身，搞武的行，搞文的鬥不過他們”。我强調，林彪這樣説，絶不是要搞武裝政變的意思。

他們説：“廬山就是一場軍事政變，你知道嗎？”我回答説：“我不知道，没有聽説，也没有見到軍事政變。我聽毛遠新説廬山是軍事政變，但我想不出這樣説有什麼根據。我知道毛遠新并没有參加廬山會議。”

這次審訊還涉及到“謀害毛主席”和“武裝攻打釣魚臺”的事情，我説對這些事情我一無所知。他們也承認，説：“我們還没有發現你知道這些事情，但是要問問你，以便把事情搞清楚。”這時，天已經不知不覺地黑了下來。李震説：“今天就談到這裏。記録整理以後，你要簽字，你認爲有出入還可以修改。另外你要好好地考慮，寫一些揭發材料。”

到了三月份的一天，晴空萬里，天氣已經轉暖。下午兩點，團長來説：“今天下午‘中央首長’要再一次找你談話，地點是在北京市裏。”

我隨王團長下了樓，看到已經準備好了兩輛吉普車。我上了前面的一輛，坐在車後座的中間，身邊是兩個看守，團長則坐在前面副駕駛員的位置上。後面的一輛車是隨車。出了營房門向西，即上了北京到通縣的公路，到了建國門以後，汽車又向北往清河的方向走。我不禁問：“不説是到北京嗎，怎麼又往郊外走？”王團長解釋説：“‘中央首長’指定了一個地方，走到清河

就到了。”

大約三點多鐘，突然到了空軍高級防空學校。這個地方我是認識的，門口有高大的鐵門，我們的車一到，兩個戰士迅速地把大門打開，車一直向裏開進去，到了辦公樓後面的一座小樓前停下來，祇見李、何兩位副主任在樓下等我。我到了以後，就領我到了樓上一個很漂亮的房間裏，裏邊有很大的一張床，鋪上擺了兩床很漂亮的被子，挂着尼龍蚊帳。我不禁想：這是爲誰準備的？因爲“中央首長”還没有到，他們要我先在床上休息，還給我拿來茶水，

下午三點半左右，北京衛戍區的那位何副主任來叫我出去。我跟着他走過一個過道，然後進入一個大廳。廳裏鋪着地毯，四套沙發擺成四方形，我進去以後坐在南面，李震、吴忠、郭玉峰、楊德中坐在對面充當“法官”。我同他們幾個原來都很熟，但現在我成了囚犯。

李震一開口就要我交代：“二五六號”三叉戟飛機是如何從北京調到山海關機場的。談話一開始，陪着我的團長就要走，但李震叫住了他，説：“你不要走，你可以聽一下。”

于是，我把九月十二日晚上如何得知三叉戟飛機調動的事情，從頭説了一下。説完後，他們又叫來胡萍和我對質。但事實終究是事實，對質的結果和我講的是一樣的。胡萍走了以後，我對楊德中説：“那天你也在場。你是奉周總理的命令來監視我的，我當時的情况，你不是一清二楚的嗎？”楊德中説：“十三號中午你要胡萍不要回家，而要他直接到三〇一醫院去，這是爲什麼？”我説：“胡萍是在三〇一醫院住院，當然要他回三〇一醫院，難道這還有什麼問題嗎？再説，我派車送他之前，也是經過你同意的嘛！”

我這一辯駁，李震勃然大怒，説我態度不好，要我端正態度。于是，我不再吭聲，不再説話。審問陷入了僵局。于是，郭玉峰出來圓場説：“我們主要是搞清問題，不是逼你説什麼。”

不久，吴忠和楊德中退場走了，剩下了李震和郭玉峰，他倆

又要我把九月八日到十二日的情況再說一遍。我說完後天色已晚，他們說："今天就到這裏，吃完飯以後再回衛戍區。"

吃飯前，他們和我閑談了一會。李震問我："你知道這個地方嗎？"我回答說："不知道。"李震說："這就是林立果所設的據點之一。原來是一個車庫，他們在上面蓋了一層，就成了樓房，還修得這樣漂亮。"我說："這個地方我過去來過，但那時沒有這樣漂亮的房子。"

據我觀察，當時的高級防校好像成了一所監獄，門被換成了鐵門，墻上也架設着電網。我估計，裏面肯定關了一些人。

吃晚飯的時候，我一個人單獨在一個房間裏吃，專案人員在另一個房間吃。給我這個犯人吃的居然也有鷄、魚、對蝦和大米飯等。我好久都沒有享受過像這樣的美餐了。我吃飯的時候，李震進來看了一下，說："好好吃飯，身體還是要搞好的，要保證你的身體健康。"

吃完了飯，他們就讓我回通縣的駐地。我上車以後，經過高級防校的院子時，看到有一些穿藍褲子的軍人在走動。我心裏想：這裏可能關押了不少空軍的人吧，還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受到我的株連呢！

我們從通縣出來時，是個好天，到晚上却突然下起了大雪，而且越下越大。等回衛戍區的時候，地上已經鋪滿了雪。由于雪天路滑，我們整整走了兩個小時，才回到了通縣的團裏。回到房間裏，團長又同我說了一會兒閑話。他說："你不認識我，我從前是在新四軍三師的一個部隊裏，你當時是政治部主任，我見過你。我姓王，現在任團長，今後有什麽事情，你可以通過警衛人員隨時來找我，我還給你找了一個'放風'的地方，讓你每個星期有兩、三個上午，可以坐車到那裏去活動。"原來他是三師的老部下，這讓我很高興，我說："謝謝你！"他又說："天已經晚了，你好好地休息吧，等天晴以後，就帶你去活動，那個地方是我們的油庫，一般人是禁止到那裏去的。我們這個部隊是機械化部隊，汽車很多。"說到這裏，王團長看了看表，說："已經一點

多了，你休息吧。"

過了不久，王團長來通知我跟他去"放風"。我隨他上了汽車，這個車的玻璃用布擋住，不讓我看到外面，也不讓外面的人看到我。車子走了沒多遠，王團長就說到了。我看到這裏是個油庫，他們已經在一個草坪上用磚砌成了一個四方形的墻，上面沒有頂棚，衹有一個出入門，但從墻縫中還是可以看見四周的莊稼地，但離村莊很遠。雖然如此，這是這些天來我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新鮮空氣，我真是很高興。我一邊深深地吸着新鮮空氣，一邊在墻中間散步、做體操。活動了一個小時以後，團長就要我回牢房。

從這以後，每個星期我都可以到那個油庫放兩次"風"。不過有時要車比較困難，就會一個星期也不出去。不出去時，他們就讓我在營區的馬路上散步，兩頭放上崗哨，不讓別人通過。

一九七二年四月上旬的一天，已經是晚上十二點鐘了，突然有人來把我叫醒。我糊裏糊塗地起來，也不知道幹什麽。王團長叫我穿上衣服，說是有人要找我談話，就在團部的辦公室裏。

我穿好衣服下樓，上了車。車一直往東開。在夜裏也看不清，好像是在營區的最東面的一座樓，一上樓就是一間會客室，桌子上擺着一盆餃子，還有菜和酒。看來他們剛剛吃過夜宵，還喝了酒。

王團長叫我先在會客室裏等候。這時我聽到隔壁有人說："你的問題就談到這裏，回去寫一份材料給我。"我知道前面已經審訊過別人，下一個就該輪到我了。果然時間不長，王團長就來叫我到隔壁去，我看到李震和郭玉峰在裏面。

我坐下以後，李震就問我："你認識梁璞嗎？"真是怪事，我一個空軍司令能不認識自己的參謀長嗎！難道梁璞也出了事情嗎？李震又說："請你交代一下同梁璞的關系。"我說："是什麽關系？如果是工作關系，我一時說不完；要說私人關系，我沒有什麽好交代的。"李震說："梁璞交代說你們搞了一個作戰計劃。"我說："空軍的作戰計劃很多，有對蘇聯的，有對臺灣的，有對

印度的，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方面的。”李震説：“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份的‘防空作戰計劃’。”我問：“那個計劃有什麽問題嗎？”李震不回答，祇説：“你説説情況吧。”

我説：“一九七一年五月間，美國總統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來華，進行中美會談，中美關系有很大的改善，尼克松本人也向斯諾表示願意訪問中國，中美有建交的可能，同時聯合國也有恢復中國代表席位的可能。這個問題對臺灣的影響很大，因此臺灣必然要想方設法地破壞中美談判。在五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研究對美政策時，毛主席、周恩來都提出要防範臺灣方面破壞中美談判的行動。後來果然，軍委總參和外交部不斷地報來材料，説是臺灣方面準備采取行動。爲此，毛主席、林彪、周恩來批示要軍委辦事組召集各大軍區、各軍兵種的負責人和作戰部長開了一個星期的會，會議認爲，臺灣方面有可能采取陸、海、空軍統一行動的方案。會議分析，陸軍登陸可能有三個方案，第一、以一個師的兵力，在海、空軍的掩護下登陸，企圖占領一個不大的地方；第二、以一個團的兵力打上來，占領幾天就走；第三、以一個加强營的兵力突然襲擊，抓一把就走。另外，他們的海軍和空軍也有可能同時襲擊我艦隊港口、沿海城市和空軍基地。偵察機也可能深入内地進行偵察活動，其重點可能在廣東、福建和浙江。” 會議以後，我們將情况以及對臺作戰的反擊方案，都報告了毛主席、林彪和周恩來。毛主席批示照辦，林彪和周恩來也都畫了圈表示同意。”

我還告訴他們，梁璞參加了這次會議。根據總參的指示，空軍又召開了各軍區空軍首長會議，研究并確定了空軍的作戰部署。會議决定，在不削弱北方對蘇作戰和保衛首都的防空力量的原則下，調整兵力如下：第一、調三至四個地空導彈營加强東南沿海的防御，在連城、福州、南昌、寧波四地配置地空導彈；第二、調四個高炮團加强浙江東，寧波、杭州、上海等地的防空；第三、調動殲擊機師團加强汕頭、漳州、福州、衢州、杭州等地的防御力量。以上安排，于七月底上報中央軍委，總參謀部并上

報毛主席、林彪、周恩來批準後，立即行動，這就是梁璞講的“空軍的作戰計劃”。

我又對他們説：“要搞清楚這個問題并不難，中央軍委和總參謀部都保存有這個計劃，你們祇要去查一下就清楚了。”

我這樣説了以後，李震和郭玉峰都有些明白了，要我寫一個材料給他們。于是我就在辦公室裏寫這個材料，一直寫到天亮才寫完。我把這個材料交給李震他們時，李震對我説：“這個計劃是林彪以廣州爲基地搞‘政變’的計劃，你知道嗎？”我説：“我從來没有聽説過什麽林彪要搞‘軍事政變’，他要搞軍事政變能這樣明目張膽嗎？幾次召開會議研究，上報毛主席、周總理批準，難道他就不怕暴露嗎？我從來没有聽説林彪要以廣州爲基地，這是第一次聽你們説起這件事情。”

李震和郭玉峰同時説：“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們來找你證實這件事情。”我又問李震：“梁璞知道林彪要以廣州爲基地搞‘政變’，嗎？”他説：“梁璞也不清楚，祇是知道有這個作戰計劃。”我又問：“你們掌握了什麽材料嗎？”李震説：“這是我們的事情，你就不用問了。”

我想，這肯定是什麽人爲了邀功請賞而捅上去的。但是也不能這樣捕風捉影。毛主席、周總理和黨中央决定的事情也成了“政變”嗎？這未免太兒戲了吧！這種事情别人不清楚，難道政治局的人，包括周恩來也不清楚嗎？

以後我聽説，這個問題成了一個很大的懸案。這未免有些小題大作了。在那個年代許多問題都被煊染了，被歪曲了。這是那個年代的特點，祇要説得神乎其神，大家就相信。説它很平常，很正常，人們就不相信。群衆是這樣，難道我們的領導幹部也都成了這樣嗎？

這個時候，天已經大亮了。談完以後，他們就走了，我也就坐上吉普車，在兩個看守人員的押解下回牢房了。

到了一九七二年的四月中，一天下午，風沙很大，王團長又來通知我説：“中央首長”又來找我談話，地點是在清河，要我

準備乘車前往。我隨同他下樓上車，沿北京的環城公路向清河駛去。沿途看到路旁的樹已經緑了，春意盎然。但是真不知道我在這牢房裏還要過多少日子。難道這樣長的時間中央真的還搞不清楚我的問題? 真的不知道我和林彪的"政變"没有任何牽連嗎?

大約下午三點鐘，車到了清河。這次，衹有北京衛戍區的何副主任在等我。他告訴我，"中央首長"還没有到，要我在房間裏休息一會兒，還給我沏上了一杯茶。

下午四點，李震和吴忠來了。李震問我："身體怎麽樣? "我回答説身體還好。李震接着説："準備給你改善一下生活條件。我們給你找了一所房子，有院子，可以散步，星期天可以會見家屬。"我問："是真的嗎? "吴忠説："是真的，房子在北京的東面。"

我想：這下可好了，大概我們的問題搞清楚了，可能放出來改爲軟禁吧。

接着，李震要我交代廬山會議的情况。我把廬山會議前後的情况又説了一遍，談着談着又不覺天黑了。李震説："就談到這裏，你先回去休息。"吴忠又説："李部長對你很關心，親自給你找了一所房子，離城很近，買東西也方便。"

最後，仍然和上次一樣，晚飯一共炒了四個菜，讓我吃了一頓飯。完了以後，我回到牢房，王團長告訴我："明天就派人去給你打掃房子和修理暖氣。那座房子已經很久没人住了。"我説："那就謝謝你們了。"這天晚上，我很高興。我想，我們黨畢竟是實事求是的。這一定是毛主席，特别是周恩來還了解我。想着很快將與家人見面，我就不知不覺地睡着了。這一覺，我睡得真好。

第二天上午，王團長來看我，説："今天就派一個班去替你打掃房子。"我問："房子在什麽地方? "他回答説："就在東城外朝陽門南，是一座兩層樓的房子。我們保護你的一個班也搬過去，還準備配給你一個炊事員。現在都是連、排幹部給你做飯，他們不會做飯。"我説："這大半年辛苦你們了。"王團長説："我們是按照中央首長的指示辦事，按照黨的政策辦事，你不要謙虚。"

我親眼看到王團長給宋參謀交代任務，讓他帶領六、七個戰士去打掃房子。下午回來以後，他們告訴我説："房子很不錯，院子裏有走廊，有草坪。你住在樓上，我們住在樓下。"

第二天宋參謀他們又去打掃了一天，回來告訴我説，已經搞完了。我心裏想，大概明天就可以搬過去了。可是過了四、五天還没有消息。我不禁問宋參謀，準備什麽時候搬家。宋參謀説："檢查了一下，説是暖氣不行，要修理。"

又過了一個星期，北京衛戍區政治部的何副主任來找我，要我給一個人寫材料。我問他什麽時候搬房子，他説："暖氣壞了，現在正在修理，等修好了再搬。"我開始有所懷疑，是不是情况變了。但是上面的人説法又那樣一致。心想也可能是暖汽真的壞了。

但是又過了一個月，還是没有消息。我想，搬房子的事情是不可能了。又過了兩個月，公安部的李副主任來了，我又問他："搬房子的事情怎麽樣了，到了現在還一直無聲無息，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他説："現在不行了。這所房子離城太近，容易被群衆和外國人發現，準備另外再找一個房子。"我聽了很生氣，説："你們不要再騙我了。"李副主任説："你不要懷疑，我們給你找房子是真的，是中央的指示，現在不叫去也是中央的指示，我們專案組的人衹能執行中央的指示。不是我們要欺騙你，我們也弄不清爲什麽前面要你去，後面又不要你去了。你就在這裏安心地住下，争取早一點把問題交代清楚。有什麽問題，可以向團裏提出，也可以直接向李部長反映。"

我不知道，這裏面的原因究竟是什麽，但是我想，這是上面有人在作梗。我想周恩來爲人寬厚，做事留有餘地，搬家很可能是他提出來的意見。而江青和康生、張春橋他們向來不與人爲善，最有可能是江青，有她在上面一手遮天，我不會有什麽好日子過。這衹是我的猜測罷了。生活待遇倒是其次，關鍵是我的問題。從李震、吴忠他們的調查來看，他們對我的問題早已清楚了。

但是中央對這些問題不清楚嗎？周恩來、汪東興、楊德中他們親身經歷了當時的事件，難道他們不清楚嗎？難道毛主席不清楚嗎？爲什麼要這樣？要説我有錯誤，我不回避；要説我搞“政變”，事實證明是没有任何根據的。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我真是想不通。

以後的事實證明，當時比較清楚的事情，越搞越復雜，調子越定越高，牽連的人越來越多。前面審查别人的人，過幾天也受到了審查。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問題，什麼情况都可能發生。

就説當時負責我們專案的李德生，本來是毛澤東和周恩來非常信任的人。整個“九一三事件”的過程中，周恩來還派他到空軍來監視、控制我。以後，他也一直負責處理中央和空軍的專案。一九七三年“十大”時，他還被選爲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後來聽説，他被免去中央副主席職務。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和我們有牽連。

再説李震，當時是中央專案組的要人。我們的案子，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主管，我們的情况他是很知情的，全部的底細他也都了解。但是到了現在，我這個“囚犯”還健在，他這個“法官”却早已作古了。關于李震的死因也成了一個疑案，到現在還有争議。公安部的結論是自殺，可家屬的意見是他殺。這樣受到毛澤東、周恩來和黨中央信任的人，爲什麼會自殺呢？許多人説，他的死是因爲他太知情的緣故。他的死，與我們以及林彪案件有什麼關系呢？我是百思不得其解了。

至于空軍的王輝球、曹裏懷和梁璞，他們在“九一三事件”以後曾經主持過一段空軍的清查工作，我妻子和孩子的關押、審查，是他們負責辦理的。但他們在空軍主持抓人和關人工作不久，一九七二年就開始審查他們的問題。到了一九七五年梁璞也被送到了農場勞動了。 當然，這些都是一九八二年我“保外就醫”，到濟南以後聽説的。

所以，毛澤東的策略是分而治之，一批一批地打倒。看見那些審訊我的人很神氣，我就在心裏想：不要自我感覺太好，祇是

還没有輪到你們的緣故，政治上的問題，對錯與是非，要留與後人去評説。事情不要做得太絶、太過，絶則過。

搬家搬不成，我也就在這裏安心地住下去了。黄永勝在被審判的時候曾説過：“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由他們去吧。”

以後時間長了，大概專案組看到我這個人，就是放了我，我也跑不了，没有必要派那麼多人來看管我，影響許多人的工作，就讓一些人回去了。王團長也走了，留下宋參謀負責。聽口音，這個宋參謀是冀東人。他工作十分認真負責，態度也很好。王團長還經常來看一看我，有時還帶着政委、副團長、參謀長、政治處主任等一起來，但是都不公開職務。他們走了以後，看守人員就告訴我這人是誰，那人是誰……

四、囚徒生活

由于長期的監禁，没有事可幹，爲了消磨時光，我向周恩來提出要求，經他批準，把我家裏原有的馬、列著作全都拿來了。以後李震又轉告我，周恩來説：“專看馬、列等大部頭著作太枯燥了，還可以看一些小説和歷史書籍。”這樣，他們又給我拿來了《紅樓夢》、《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和《中國通史》、《世界通史》等許多書。宋參謀爲此還專門給我做了兩個書架子。周恩來專門批準給我一臺收音機。這樣，我每天就可以聽到廣播和新聞了。

以後，周恩來又批準我聽英語廣播，學習英語。爲此，宋參謀和醫生給我買來了英語廣播教材、一些參考書及英漢詞典。那段時間，我每天要聽五次英語廣播講課。由于年紀的關系，我學習起來非常困難，不少英語現在説起來别人也聽不懂。不過在那個時候，總算有一點事情幹，不去想别的。當時，除了寫材料以外，我每天都要學習七、八個小時。看守人員看我每天看書的時

間太長，就經常叫我出來在走廊上走一走。

我住的樓房前面有一個大廣場，廣場前面是一條東西向的大馬路，來往的汽車很多。他們這個團是一個機械化部隊，可能有五百輛汽車。我看見過他們的乘車演習。

團裏派來的醫生整天住在我的隔壁，有病隨叫隨到。小病他自己進行及時的治療，比較重一點的病，他就找團裏的衛生隊長，或者請北京其它醫院的醫生來會診。每年還由北京衛戍區派醫生來，給我檢查一次身體。我關押在衛戍區的期間，心臟病發作過兩次。我請求把我家裏的一個氧氣瓶拿來，他們同意了。以後，氧氣用完了，就派人到空軍總醫院去灌。

由于環境和條件的改善，我的心情也就比較安定一些，開始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有時讀不懂，我就反復地琢磨，以求能够初步了解。但是學了以後又用不上，也就漸漸地忘記了。到一九七二年五月，我讀完了《資本論》第一卷。以後，天氣熱了，讀不下去了，我就改爲看小説，先後看了《西游記》、《水滸》、《紅樓夢》、《三國演義》等。

看守我的人員，和我輪換着看。有時他們拿去看了，我又不好意思找他們要，衹有等他們送回來再接着看。有時午睡的時候，我把書放在床頭上，他們也拿去看。有的看守在放哨的時候，還抄我的學習筆記，并經常向我請教一些繁體字。另外，還有兩個幹部，同我一起聽英語廣播。他們經常同我有說有笑、談天説地，講一些歷史故事，但是從來不涉及國事和政治。至于部隊的情況，我也從不向他們打聽。

剛開始的時候，他們輪流給我做飯吃，一人做一天。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就差一些。後來我提議固定一個人，他們采納了我的意見，改爲一個人做半年。我因爲身體比較胖，不敢吃猪油，就請他們不要買肥肉。他們説，我的油票不够用，衹能去買一點肥肉來熬油。有個時期買鷄蛋比較困難，他們就派人到農村去，買十幾斤鷄蛋存起來。

有一次王團長當着我的面，交代看守人員去買一點餅乾來。

我説，現在的生活已經够好了，要節省一些。王團長則説："這都是用你的錢。照現在這個水平，一年大約七、八百塊，比你過去的生活是差多了。"

就這樣，我一個人生活在這裏雖然寂寞，但是有一個比較穩定的生活環境，過去幾十年都是忙忙碌碌，現在正好借此機會好好學習，看一點書，以便分散和轉移精力。

到了一九七三年八月，原來夏天給我用的蚊帳、涼席和電扇都取消了。一到夏天，就整天汗流浹背，被蚊子咬得不行。經我的要求，他們每天給我的房間裏打點"敵敵畏"。蚊子雖然被打死了，我的喉嚨也嗆得不行，有時整天感到憋氣難受。這樣，對我的身體也影響很大。原來的大米和富强粉，這時也被取消了。我問他們爲什麽，他們説現在是一律吃標準粉，另外，做菜的水平也降低了，有時吃大米用碗蒸，但是淘得不乾凈，砂子很多，也吃了不少到肚裏。對這樣的生活，我也逐漸地適應了，不再提意見，一切由他們安排吧。

到了一九八一年我到了濟南以後，才知道，一九七三年我在黨的十大被永遠開除黨籍，撤消了我的黨内外一切職務，這樣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囚犯了，前後生活的標準當然就不一樣了。

在監禁的時間裏，使我最感到苦惱的就是寫交代和證明材料。除了中央專案組提審以外，找我寫材料的人絡繹不絶，每個星期少則兩、三次，多則五、六次。這些要材料的人大都是突如其來，事前没有通知，來了以後，就在一間房子裏等着。看守人員一聲喊，我就得跟他們去。他們提出問題以後，不給我一點時間回憶，問了就要我回答，答了還要寫，十分不好應付。在當時，我是一個被關押的"犯人"，衹有聽命的義務，没有拒絶的權利。

來找我的人，有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各軍事院校的，還有各省、市、自治區的，幾乎是全國各地的人都來過。至于空軍、民航、三機部來的人，就更是不計其數。有時，一個同樣的材料要寫許多次，大軍區來一次，省軍區來一次，軍裏又來一次。地方上也是如此，省裏、市裏、縣裏來的人反復地

問。有的人態度很壞，當然有的態度比較好，衹是要求我幫助他們弄清問題。我認爲，幫助弄清一個人的問題，是我的責任。

但是來找我調查的人實在太多。當時，凡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同我有過接觸的人，一個不拉，統統都要我一個一個地寫出證明，説明與他們的關系。有的甚至連“文化大革命”以前接觸的人也要寫，還要查幾十年的關系。我十分不耐煩，但是又没有辦法。我心想，這簡直就是懷疑一切，我出了問題，和我有過聯系的人就都有問題。難道同我有關系的人已經統統被打倒了？無一幸免了嗎？他們不論是組織領導關系、工作關系，還是私人關系，一概都要追究。

特别是不少長期在空軍、民航工作的人，不可避免地同我有各種各樣的關系，就成了他們調查的一個重點。另外，“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空軍根據毛澤東、黨中央的决定，在“三支兩軍”中派出了大批的幹部到中央、國務院各部門和各群衆團體，以及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各省、市、自治區各單位。到這時，空軍派出去的這些人，也同我一樣受到了審查。那些專案人員到我這裏追查，要我證明是什麼時候派他們去的，是在什麼情况下派他們去的，去的目的是什麼？有的專案人員甚至還説他們是我的同伙，是我派去篡黨奪權的。當時，我爲他們的主觀無知感到好笑，又爲因爲我的問題這樣地被無限擴大，傷害了很多人而感到傷心。于是，我反復向他們説明，“三支兩軍”是毛澤東所賦予解放軍的任務，中央曾經下達過不少文件，并規定了明確的任務，空軍的“三支兩軍”工作完全是按照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指示辦的。在選派幹部的時候，他們大多數人都表示不願意去，是經過動員，反復説明這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後，他們才去的。現在説他們是我吴法憲派去篡黨奪權的，這是對他們的一種侮辱。况且“三支兩軍”的任務，不僅空軍有，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都執行了，這是很大的一批人，這些情况中央都是知道的。我每次都是實事求地説明這一歷史情况。

據我的粗略估計，在北京衛戍區被關押的五年中，我寫過的

材料總在百萬字以上。真的是寫不完的材料、交代不完的問題！

五、唐山地震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我正在睡夢中，突然感到房子在摇晃，接着墻灰飛揚，樓上堆放着的蜂窩煤都倒了下來。在二十分鐘裏，連續三次，一次比一次厲害。樓外人聲呼喊：“地震、地震！”看守人員急忙拉我下樓，我連衣服都没有穿上，就是一件背心和一個褲頭。過了一會兒，他們才給我拿來了衣服。

當時天没有亮，他們叫我蹲在一棵大樹下面，誰也看不見我的地方。天亮以後，他們又帶着我東躲西藏。最後，他們在兩行樹中間，用幾根木棍支起一個地方，四周用床單一圍，裏面放一把椅子，就叫我在裏面坐着，他們則圍坐在這個簡易的棚子外面。早飯和午飯，都是看守人員打來吃。

等到下午，傳來了消息，説是在距離北京三百公里的唐山地區發生了大地震，地震的詳細情况還不清楚。衹是通知暫時要住在外面，因爲考慮還有餘震。看守我的那些人，家大多都在冀東一帶，所以他們都很擔心家裏的安全。他們攔截住來往人員詢問情况，但是誰也不知道。電話斷了，公路也不通，因此無從查詢。

就在這時，這個團的政委來看了一下。他决定調一輛大卡車來作爲我的臨時營地。他們在這輛卡車上蓋上塑料膜，車厢内給我搭了一張床，并放上一張小桌子和一把椅子，還給了我一個收音機，可以收聽廣播。兩個看守人員搭了一塊鋪板，輪流和我睡在一起。其餘的人員，則在地上搭鋪休息。汽車白天開到樹叢裏，晚上再回到草坪前。

三天以後，王團長决定把汽車固定在一個地點。他選擇了一個長有兩行大樹的地方，把汽車開進去，樹蔭蔽日，白天陰凉。在汽車附近，他們架了一個煤球爐子做飯吃，炊事用具都放在地

上。厠所挖在不遠的矮墻前面，四周用樹枝圍起來。整天不準我下車，晚上九點部隊息燈了以後，就讓我下來活動一個小時，由他們指定一個地方，在那裏轉圈。看守人員就在四周圍看着。

幾十個看守人員白天不出操，不學習，天天打撲克，有時要打到下兩點。他們也搭了一個棚子，但是蓋不嚴，漏雨。下雨時，在裏面根本無法睡覺。從七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在北京是雨季。那一年，有一段時間幾乎是天天下雨。有時是傾盆大雨，遍地是水，道路泥濘，無法行走。

當時，部隊和家屬統統搬出了營房，大家都在樹下面搭起了棚屋，老人和孩子住在一起。他們在北京市的家屬，還一家一家地搬到營地來和他們一起住，就在部隊吃飯，部隊的負擔很重。這樣一來，營區内的清潔衛生成了大問題。天氣又熱，蒼蠅、蚊子特別多。給我做飯的爐竈和汽車幾乎都要被蒼蠅包圍了。晚上，蚊子咬得人滿身都是包，我的肩上、腿上、腳上全都咬爛了。點上蚊香，打上"敵敵畏"，也都無濟于事。最後，部隊裏傳染病大發作，拉痢疾的人不少。我也被傳染上了，幸虧有醫生治療，很快止住了。

這個季節是三伏天，幾乎買不到什麼青菜，我的伙食也就降低了，有時候就吃咸菜，但是他們還給我一點水果，維持我身體的營養。

我生活在車上，雖然車是停在兩排大樹的中間，但是夏日炎炎，仍然可以曬透，中午以後，車内常常會達到四十度，我在車上悶熱難耐。用水又非常困難，早上他們給我一盆水擦擦身子，晚上衹給半盆水洗腳。從七月下旬到九月中旬，我整整五十多天没有洗澡，身上臭烘烘的。

到了八月底，天氣轉凉了，但是仍然不讓進樓房，由于外面睡覺很冷，有的看守人員就悄悄地溜進去睡覺。我請求回到房間裏去，但是他們不同意，説是預測還有地震要發生，北京市區的人，現在也都住在外面和公園裏。

有人説，唐山大地震，對北京、天津的影響很大，天津的房

子倒塌的很多，死的人也不少，北京的房子也有倒塌的，頤和園的圍墻就倒了。至于唐山，基本上是没有了，他們猜測死的人有多少萬，我在報紙上没有見過公布確實數字。

地震以後半個月，看守人員的家鄉開始來人了，他們説到地震的情况，有的房屋倒塌，但是還没有人員傷亡。有個副連長，家裏房子全部倒塌，但是全家十一口人都活着。以後大家紛紛叫家人來探親，看到他們一家一家地團聚，我也很高興。

就這樣，我們在外面一直到九月中旬，地震的警報終于解除，我回到了樓裏。

六、毛主席逝世和粉碎"四人幫"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太陽曬得很厲害，我熱得渾身是汗，中午也睡不着覺。到了下午四點鐘，宋參謀突然來告訴我，説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有重要新聞廣播，要我注意收聽。我問他是什麼事情，他不説，衹是告訴我要穿好衣服。我想國家可能發生了什麼問題。接着，全體看守人員都上到汽車裏來，坐在一起。我感到好像是發生了什麼大事。

過了一會兒，電臺開始播音，先放了一段哀樂，馬上是《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國共産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宣布毛澤東于九月九日零時十分在北京逝世。雖然在此之前我有思想準備，但是跟隨毛主席革命幾十年，這個消息仍然是難以置信。這是一個感情的問題，也許别人是難以理解的。雖然是毛主席把我們關起來了，但是我對毛主席思想感情上當時是不可動摇的。聽着聽着，我的呼吸短促，心跳加速。旁邊的醫生一把拉住我的手，脉搏都在一百三十下以上，于是馬上給我吃了一片鎮静劑，叫我不要緊張。我堅持着一直聽

完了全文。

中國失去了毛主席，是讓我難以接受的，同時我也擔心，毛澤東健在，我們還有一條活路，一旦江青掌了權，我們就完了。好在接着又宣布了以華國鋒爲首的治喪委員會。這時，我的心裏才平静了一點。但是，華國鋒能掌握國家的命運嗎？比他資格老、能力强的人有的是，這些人能服他嗎？

當天下午，我一直躺在鋪板上，一動不動，一方面是毛主席的逝世使我感到悲傷，另一方面是考慮自己的前途。晚飯時，宋參謀幾次叫我吃飯，我都没有動。王醫生在我跟前四個多小時，我没有説一句話。晚上九點叫我下車活動，我也一直在樹下面坐着。從這以後，一連幾天，王醫生每天同我在一起，照顧我的身體。到了九月十八日，爲毛主席在天安門舉行追悼會的那一天，才讓我回到了樓裏，但是叫我住在樓下，防止地震的再次發生。

九月十八日下午三點，我從廣播裏收聽毛澤東追悼會的實況轉播。我聽到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宣布會議開始，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致悼詞。這樣看來，華國鋒是當然的接班人了，江青已經不可能成爲頭號人物，我的心裏才稍稍得到了一點寬慰。

到了十月七日，在報紙上公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根據毛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産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待提請中央全會通過。看到這個報道，我的心裏基本上平静了下來。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原來以爲，毛澤東要把王洪文選爲接班人，因爲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他們在中央已經掌握了大權。

在我這個在押的人看來，有些問題是不好理解的。第一是毛主席把林彪和我們都拿掉以後，張春橋是很有希望接班的人選。毛主席也對林彪表露過，對張春橋似有器重之意，但是又一下子把張春橋手下的王洪文提起來，當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當然地排在了毛主席和周恩來後面成了第三號人物。王洪文和張春橋在許多方面是無法比的，這是我第一個不理解。

第二是在國務院總理人選上。當時鄧小平和張春橋，兩個人顯然都是有實力的，可毛澤東誰也没有選擇，而是一下子把無論資格、能力、水平都不如他們的華國鋒提了上來，一下子任命爲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這是我的第二個不理解。我也因此很擔心，華國鋒够壓住臺嗎？

十月十八日，我突然又在廣播上聽到了《中共中央關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這真是讓我欣喜若狂！我猜到這一定是葉劍英、汪東興他們動的手。看來葉帥也是個統帥之才，處事果斷，不負衆望。我覺得，這一下中國有救了，我們大概也有出頭之日了。于是我對宋參謀説："'四人幫'被逮捕，大得人心，我非常高興。我願意揭發他們的罪行，材料請你們代爲上呈。"

那幾天，看守人員也一直議論紛紛，同我説話的態度也好轉了。一個副連長還對我説："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被逮捕了，你們的日子可能會好過一些。有可能叫你們出去，起碼是進一步改善生活條件。" 我説："那就好了。"但是心裏一直在想，他的話有什麽根據，或者他們聽到了什麽風聲，不然的話他不敢這樣説。

説實話我當時也存在很大的幻想，我總認爲葉帥、汪東興他們對黄、吴、李、邱都是了解的，我們的問題很有可能得到解决。這樣，我吃飯也香，睡覺也好了。

七、反而進了秦城監獄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宋參謀通知我，要過年了，準備去洗一個澡。我很高興地準備好换洗的衣服以及毛巾、肥皂等用具。上車的時候宋參謀没有去，而是指定了另一個排長和三個戰士同我一起去。

一進浴室，就衹見幾個水管子全部都被凍住了，他們用柴燒了一個多小時也没有燒開。我説今天不洗了，等明天再洗吧。但是看守人員不準，用木柴燒了一大堆火，叫我先烤火。又等了好久，他們才燒開了兩個水龍頭，讓我勉勉强强地洗了一個温水澡。

洗完澡以後，他們又叫我在那裏接着烤火，説是要等外面天黑了以後才能回去，怕是有人看見。我説："我們不是白天來的嗎？爲什麼一定要等到天黑以後才能回去呢？"他們回答："這是上面規定的。"

等到了天黑以後，我們回到樓裏，剛一進門，那位副連長就説："今天晚上有地震，不要上樓了，就在樓下休息、吃飯，現在我們正在給你做飯。"我感覺情况不對頭，但是當時身不由己，又有什麼辦法呢？後來才弄清楚，當時他們正在樓上搜查我的東西，所以不叫我上樓。

剛剛吃完飯，團政治處的主任就來跟我説："今天晚上，有'中央首長'來同你談話，你準備一下就走，要穿上衣服，免得受凍。"我心裏想，"中央首長"找我談話，可能是要解放我們了吧？心裏好一陣高興。

一出門，衹見門口停着兩輛吉普車和一輛警衛車，那位政治處主任帶着幾個警衛人員坐在前面的一輛吉普車上，讓我坐中間的一輛吉普車，宋參謀坐在前面司機旁邊，我坐在後排，兩邊各有一個警衛人員。後面是一輛警衛車，上面大約有一個排的部隊。

車一出營門，就向南走，然後轉向東面。我不禁問宋參謀："'中央首長'找我談話應該是在城裏。北京城不是在西面嗎，車怎麽向東開呢？"宋參謀回答説："走環城路好走。"我不相信，又不能問。越走離北京市區越遠，我又問究竟到哪裏去。宋參謀説："到一個地方去，有首長找你談話。"我説："你們不要再騙我了。"宋參謀的態度比較冷淡，他説："確實有首長找你談話，在北面的一個地方。至于是什麼地方，前面政治處主任知道，我們也不清楚。"

車到了沙河大橋，天空出現了月亮，外面的道路看得比較清楚，這時我才猜到，車是在往秦城監獄走。車越走，就接近秦城監獄，就更加證實了我的猜測：是要把我關進秦城監獄了。

大約到了半夜十二點，看到前面有一個大城堡，高大的鐵門和圍墻，上面電網的紅燈亮着。一進大門，衹見有二十多輛車，我心裏想，大概把我們黄、吴、李、邱全都弄到這裏來了。

這就是著名的"無産階級專政"的監獄——秦城監獄。秦城監獄是解放初期由蘇聯人幫助設計修建的，關押的差不多都是原來共産黨自己的高級幹部。

下車以後，就有幾個人把我帶到一座大樓二層樓上靠北面的一間牢房裏。在這間約十步長、三步寬的牢房裏，放了一張約有二尺寬、四尺長的"床"，上面已經鋪好了被褥。有一個人開口，叫我坐在床上。接着又進來幾個人，其中有押解我來的宋參謀和一個副連長。這時，外面走廊上擠滿了人，亂哄哄的，也聽不清楚他們在説些什麼。

進來的幾個人裏，有一個是監獄的管理員，看樣子頂多是一個連級幹部，這就是宋參謀告訴我説的"中央首長"了。他向我宣布説："中央決定叫你到秦城監獄來學習、反省和改造，要遵守這裏的一切規定。"

然後他們就開始交接我的個人物品，并搜查我的全身。他們先把我的手表和身上的皮帶拿走，再把襯褲上的褲帶剪斷拿走，還把襯衣上的鈕扣也剪了下來，同時將洗臉盆、牙刷、缸子、牙膏都統統拿走，把烟和茶葉没收，把我箱子裏的東西統統翻出來，登記一遍拿走，搞了將近一個小時。

看到他們居然把我的牙刷和牙膏拿走了，我不禁發問："用什麼刷牙？"

答："用牙粉。"

問："用什麼缸子？"

答："用洋瓷碗。"

問："用什麽系褲子？"

答："給縫上兩條短帶子。"

問："長褲呢？"

答："同樣用短帶子。"

問："給看報紙嗎？"

答："給《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

問："給《參考消息嗎》？"

答："不給。"

問："可以看書嗎？"

答："可以借馬列的書、毛主席著作和一些小説。"

問："可以聽廣播嗎？"

答："我們這裏没有這個規定，以後可以裝一個有綫廣播，但現在没有。"

没等我再問，這個管理員就説："不用問了，以後的一切，由我們負責安排，給你什麽就有什麽，不給就是没有，問也没有用。你要老老實實地服從監獄的管理和規定。"

他們搜查了我以後，就叫我休息，然後把兩層門，一道鐵門和一道木門關上就走了。我一個人在裏面，頭腦發漲，血壓升高，手脚冰凉，惡心欲吐，没有手表，也不知道脉搏到底跳多少下。就這樣，一直到天亮，我也没有閉上眼。

過去在歷史書上看到的情景和戲劇、電影上看過的情景，在我的身上再現了。當然過去是滿門抄斬，抄家滅九族，鋃鐺入獄，打入天牢。現在是進步多了，起碼不是殺頭。但是不論功、過、是、非，連事實緣由，都是次要的。一切服從政治需要，這才是真諦啊！

我實在想不出送我到這裏的理由。毛主席、周恩來在世，恐怕是不會送我到這裏來的。一切事實翻來覆去已經清查了五年，事實難道還不清楚嗎？我没有參與"政變"，我没有反黨反毛主席，大量的事實還不够嗎？相反，正是因爲我没有用頭腦去分析，没有保留地執行了毛主席、林彪、周恩來和當時的中央的一

切指示。在這個問題上，包括汪東興在内的當時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所作所爲，并不會比我少，他們的心裏應該是有數的。

我思前想後，能送我到這個地方來的，當然主要是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了，當時衹有他們三個人是説了算的。華國鋒不熟悉我們，葉劍英雖然熟悉，但"文革"中有一段時間"靠邊站"了，有些情况不了解，我也不怨他。但是汪東興，我們共事多年，無話不談。當時，我們十分支持你的工作，很多事情是你鼓動我們做的，在廬山上共患難。我們的情况你不了解嗎？到了這個時候，"四人幫"倒臺了，却竟然把我們送進大牢，是出于什麽需要？是要把我們當作替罪羔羊嗎？憑良心自問，你内心裏不受到自責嗎？

我從十五歲起參加革命，跟着共産黨、毛澤東，幾十年的槍林彈雨，拼命工作，什麽樣的危險都遇到過，什麽樣的後果都想到過，也隨時準備爲黨的事業而獻身。但是唯獨没有想過，要爲黨的事業這樣"獻身"，要坐共産黨自己的大牢。要做一個全黨共株之、全國共討之的大壞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這樣的折磨。

我衹有把這一切和滿門抄斬和滅九族來比較，這還算是比較幸運的。這一切不怨天、不怨地，衹是自己的運氣不好。我想到了譚震霖的"三個不該"，至于是不是"不該參加革命、不該跟毛主席、不該活到六十歲，"我并不一定同意。因爲不參加革命、不跟毛主席我也是死路一條。但是思考再三，有一個不該，就是不該到中央工作。可怨誰呢？

第二天，就是一九七七年的元旦了，這是我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個新年。早上，他們給我拿來了兩個饅頭和兩片咸菜，我一口也没有吃。整天我都拒絶吃飯，心想你們既然要置我于死地，我就死了算了！

他們派醫生給我量血壓、做心電圖，但是什麽也不告訴我。我要求給我吃一點安眠藥，醫生也不給，最後給我打了一針。但是我仍然不能入睡。後來，他們又給我輸了一瓶液，到了晚上，我睡着了。就這樣，我一直不吃不喝地睡了兩天。到一月三日，

他們才有一點着急了。他們拿來一碗牛奶，硬是灌我喝了下去，又給我打了一針葡萄糖。我才從迷糊中醒了過來。

到了上午十一點鐘起床以後，就有一點想吃飯了，情緒也穩定了一些，想到我還是要活下去。所以中午飯打來的時候，一碗米飯、一碗白菜，我都吃了。到了晚上打來兩個饅頭、半碗蘿卜，我也吃了。吃完就睡，但是還是睡不着。我要求醫生給我吃安眠藥，醫生給了我一粒速可眠，看着我吃了下去他才走開，但是仍然睡不着，我又要求醫生給我打一針，叫我再睡一天。經過大約兩小時的周折，醫生于當晚十二點來給我打了一針，之後我才睡着了。

一月四日，我醒得比較早，但是仍然讓我睡到七點開飯時才叫我起來。管理員告訴我，以後我每天在走廊上活動，等天轉暖了，可以到室外活動。以後我牢房外面的鐵門不關了，衹關裏面的木門。

以後，除了每天三頓飯和他們有事打開牢門以外，其它時間牢門是一直關着的。我蹲在這一米寬、三米長的牢獄裏，什麼也看不見。這裏的條件比衛戍區差遠了，但是爲了活下去，爲了有朝一日能澄清自己的問題，我决心什麼樣的苦也要吃下去。腦子裏什麼也不想了，衹要搞好身體。爲此我在牢房裏，不斷地活動身體，早起早睡，每天在牢房裏甩手鍛煉，飯後就在房間裏走一千步。“放風”時，我就在走廊上來回走一個小時。吃飯時，不管什麼樣的飯菜，衹要能維持生命，我就把它吃下去。

到了秦城，我們就都没有了名字，衹有號碼，我的號碼是“七六〇二”，大概是一九七六年進來的第二號。我想“七六〇一號”大概就是黃永勝了。但是在秦城監獄關了五年，我們從來没有見過面。無論是在監獄裏，還是在“放風”的時候，我一直都没有見到任何其他的“囚犯”。在裏好像是一個衹有看守和我的世界，與世界上的一切都隔絕了。這所監獄裏究竟關押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的人都進過這裏。監獄設計的如此巧妙，竟然誰也見不到誰，真是一個杰作。

這樣，我的思想慢慢地安定了下來，想到自己所受到的冤屈和不公平的待遇，我决心不管處在什麼樣的境況中，都一定要頑强地生活下去。

收音機被没收，廣播是聽不成了，學習英語也就半途而廢。書也全被没收了，一本也不給看。爲了消磨時間，也爲了保持自己的正常思維，我把每天僅有的一份《人民日報》，都一字不漏地全部看完。後來，他們又發給我一套簡裝的《毛澤東選集》，我又反復地學了幾遍。

在牢房裏，鋼筆、毛筆、鉛筆什麼都没有，寫字也寫不成了。有一天我用筷子蘸水在水泥地上寫字，衛兵看見了馬上就予以制止，還要看我寫的是什麼。當他看到我寫的是“毛主席語録”時，就告訴我，不準在地上寫字，更不準在墻上劃。

牢房裏没有桌子和凳子，墻上也没有釘子，我的衣服和碗筷都放在地下，就有許多小蟲子往裏面爬。吃飯的時候，再洗一下。監獄裏給一個塑料水壺，每次送飯的時候給我打一次開水。還給一個小盆子，把洗臉毛巾、牙刷和牙粉放在盆子裏。洗衣服也用這個盆子，但衣服不能拿出去曬，就晾在鐵門上，讓它陰乾。牢房裏有一個碗大的水池，上面有一個水龍頭，洗漱就在這裏。另外，大小便也都在牢房裏。

一九七七年三月，第一次允許我到樓下的院子裏活動。他們在一棵大樹下面，劃了一個五尺見方的圈子，叫我在圈子裏走了一個小時。我在散步的時候，看到院子裏有許多土坑，上面蓋了一些草墊子，坑裏有一張張的木板床。我猜可能是唐山地震的時候，給“犯人”們住過的。

經過大樓出門的時候，我看見有一排高大的圍墻，上面没有頂棚，外面有鐵門，都上了鎖。我當時想，可能是“犯人”們洗澡的地方。但後來他們叫我也到這裏，我才知道，這是“放風”的地方。這樣，“放風”的時候，誰也見不到别人。這樣的“房子”每間大約五平方米左右，墻高約七、八米，墻厚七十到八十厘米，裏面長滿了草。每一排大約有十五到二十間。另外，圍墻

的上面修成了一條走廊，互相可以通。上面有兩個哨兵看守着“犯人”，還有一個流動的帶哨的人。

每次“放風”的時候，一個管理員押解一個“犯人”，關進一間“放風室”裏把門鎖上，他們就走了，等到“收風”的時候，再來將門打開，叫人回去。“犯人”每人帶一個小馬扎，如果不願意走動，就可以坐下來休息。

一般天氣好的時候，每天上午“放風”一、兩個小時，天氣不好和星期天則不“放風”。有個別的時候，由于管理人員的疏忽，忘記了“收風”。一九七七年八月，有一天下午，把我關在裏面達五個小時。等到開飯的時候，一看我不在，才查問我到哪裏去了，結果想起來了。當時正值盛夏，下午太陽直射，裏面熱得很，我一直是汗流浹背。好在四點以後，有一面墻可以擋住太陽，不然的話我早就中暑了。之後，管理員向我解釋說是“忘記了”。由于吃飯的時間已過，我衹好打一點冷飯吃。

一九七七年五月的一天，管理員對我說，我住的牢房要修理，準備把我換到北邊的樓裏去，原來的床板和東西都帶上，等牢房修理好了再回來，大約需要三個月。就在那天下午，他們把我搬到了北面一座樓的三樓東面的一間房間裏，整個的一層樓衹有我一個人，因此放風的時候，他們就讓我在走廊上來回活動。走廊長約五十米，“放風”的時候可以打開窗户通風，但是不能到院子裏去。時間一長，我很想到院子裏去看一看。後來，允許我每天下午七點半到八點，到樓下院子裏活動半個小時。滿院子裏都是梨樹，樹上的梨又大又多，但是像我們這樣的“犯人”，衹有飽一飽眼福而已。

有一天下午，我主動把院子裏的草拔了，他們很高興，叫我不要累着了。這是我到秦城監獄以來聽到的第一句客氣話。第二次拔草，我一時没有看見，碰到了樹下的一個馬蜂窩，被螫了好幾處，腦袋上腫起了一個一個的大包。他們又叫來醫生來給我治療，這使我得到了一點安慰。

北京七、八月份的天氣，炎熱不堪，西曬的太陽一直從窗户

射到了床鋪上，墻都像火一樣燙，在房間裏實在呆不住。我就要求到走廊上去走一走。後來他們也同意了。我很高興，因爲三樓比較高，上下樓比較累，我也不想多下樓，在走廊上活動很舒服。有時在走廊上“放風”，遇到大雨欲來之時，風吹得我精神非常爽快。

自從搬到北樓以後，我常聽到别的牢房裏有音樂聲，就問他們是怎麽一回事情。管理員説是裝的有綫廣播，我就要求給我也裝一個。他説：“你一個人住這座樓上，要拉很長的廣播綫。等你回到原來的地方，再給你裝。”

到了一九七七年八月底，已經超過三個月了，我就問是不是該搬到原來住的地方去了。他們告訴我説，準備搬到西邊的一座樓上去，説那裏的房間剛剛修好，條件也比較好。我心裏還有一點不相信，因爲騙我的事情太多了。

過了兩個星期，有一天突然通知我搬家。到了那裏一看，果然房間要比我原來住的大一倍。我還是住在三樓，共有十個大房間，我住在中間的一間，裏面有一個小厠所，房間的光綫也好，因爲是剛剛粉刷的房子，衛生條件也好，灰塵少，没有蚊子。原來我住的房間裏，蚊子成群，身上全被咬爛了，所以到了這裏後我就覺得很舒服。

我要求將原來睡過的一塊床板搬來，他們同意了，又給了我一張很小的桌子，我可以在上面寫材料、吃飯。下面還有一個空的抽屜，可以用來放碗筷。飯菜也比以前改善了一些，有時還有包子和餃子。

他們仍然是把我一個人關在三樓這一層樓上。單獨有一個哨兵來看守我，不時來一個帶班的查哨。哨兵有時開門進來同我説話，問長問短。有一個哨兵對我的態度特别好，常告訴我一些外面的事情，没有人的時候還進來幫我拖地，有時問我的歷史，我簡單地答幾句。有一次問我：“你認識彭德懷嗎？”我説：“怎麽不認識。”他説：“彭德懷已經去世了，你知道嗎？”他還告訴我關于賀龍平反的消息等等。

有一次，他對我説："你已經被開除了黨籍，你知道嗎？"我當時猛地吃了一驚，頭昏了半天，足足有五分鐘時間説不出話來。最後我説："這不可能，'文化大革命'以來被關押的人都没有被開除過黨籍呀！而且這麽大的問題，從來没有向我們宣布過。爲什麽這樣背着我幹呀？這樣做是黨章規定的嗎？"他看我比較激動，就安慰我説，他衹是聽別人説的，讓我冷静一點。説完，關上牢房的門就走了。

這番話在我的心裏埋下了一個定時炸彈，日日夜夜考慮這個問題，究竟是真還是假？過了兩天，我實在忍不住了，就去問管理員："聽説開除了我們的黨籍，是真的嗎？"管理員説："没有聽説過，你聽誰説的？"我説："聽一個哨兵説的。"他又問："他們什麽時候對你説的。"我説："是三天前的上午對我説的。"管理員説："他是亂説，他們什麽也不知道。"

從那天下午起，我就没有再見過那個哨兵，其他看守人員對我的態度也變了。我知道這一下壞了，可能牽連到那個哨兵，都怪我當時處事不冷静，真是後悔莫及。

又過了一天，就不讓我一個人住在三樓上了，他們把我搬到二層中間的一間牢房裏。雖然條件同三樓是一樣的，但是我的心裏很不平静。我問管理員，爲什麽要這樣做？這時管理員的態度也變了，他説："我們根據需要對你進行管理，叫你到那裏，你就到哪裏，不要多問！"其他看守人員的臉也變了，過去的笑臉不見了。

從此，我得到了深刻的教訓。因爲我對事情考慮得不周全，辦錯了事情，特別是那個哨兵可能受到了處分。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和現在何處，衹有在這裏向他表歉意。

又過了半個月，大約是一九七八年四月，突然來了兩個人找我，向我宣布了一張紙條，説："一九七三年黨的'十大'開除了黄永勝、吴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黨籍。"這兩個人身着軍裝，不告訴我們是代表誰，是哪個單位的，更不同我們多説一句話，轉身就走。一九七三年開除了我們的黨籍，到了一九七八年

才告訴我們，上面衹是開除了我們拉倒。

我在秦城監獄一共度過了五年零九個月的生活。我從一個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的領導人之一，一下子成爲全黨、全國人民共同專政的"囚犯"，這個反差是非常巨大。我過去不知道我們自己監獄裏的情况，有多少條規矩，對待犯人如何。蹲了五年的秦城監獄，才逐漸地體會到這裏面的情况，才認識和體會自己是一個"犯人"。

一到了秦城，就到了另一個世界。一進牢門，除了看守人員之外，就誰也看不見了。看守人員也衹有送三頓飯的來了才開門。見到的人都是不認識的人，他們都是在牢門外面猛地叫一聲："打飯！"别的什麽也不説，一副冰冷的面孔。有時可以聽到門外面有腳步聲，但是不見人。門上有一個小孔，門外面的人可以看到你，但是你看不到外面。有時醫生來看病或者護士來送藥，可以見到他們，但是除了問病情之外什麽也不説，看完病就走。提審都是突如其來，突然有個看守人員開門叫一聲"提審"，你就得跟他們走，進到一個屋子裏，衹見墻上寫着"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八個字。對面是一排專案組的人員，還有録音機，還有幾個搞記録的，在你毫無準備的情况下，突然提問，一個個聲色俱厲，説話刻薄，動不動就拍桌子。但是我看這些人，并不了解情况，衹是嚇唬人。

提審完就要你寫材料，但是紙和筆必須要經過專案人員的證明以後才能給，紙張也不多給，管理人員問你，需要幾張，説定了以後，當面點數。不够用或者是寫壞了，必須重新提出申請，等待批準後，再由管理人員點給你。寫材料的時候，没有桌子，在鋪上寫，時間一長就腰酸背痛，頭暈眼花，但是不寫又不行。

一進牢房讓你就覺得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是死路一條。但是想死也死不成，他們把一切防止自殺的辦法都想到了，不僅鋼筆、手表、眼鏡、鉛筆要被没收，連衣服上的扣子和衣服、褲子、鞋子上的帶子等，也被收走。吃藥要看着你吃下去，要針綫縫補衣服，也要你在限定時間用完，立即交出。我年紀大了，眼

睛不好用，而且一隻手還殘廢了，加上牢房裏的光綫又很暗，我穿針非常困難，衣服上破的地方又多，我的動作又非常緩慢，幾乎每次都超過了他們規定的時間，每次都要挨駡。

開飯的時候，是管理人員提着一桶子飯、一桶子菜，按牢房的號碼，一個一個地叫。有一次，我由于正在集中精力寫材料，没有聽到開飯的喊聲，就没有吃到午飯。寫到中午，我餓得實在撑不住了，我急的敲門，問爲什麽不開飯。哨兵説："已經送過飯了，叫你不應，以爲你不吃飯了，就没給你。"我要求給我點吃的，哨兵説："已經下班了，没有人了，你就少吃一頓吧。"我説："我現在餓得不行了。"

哨兵對我比較同情，他去跑了一趟，結果到了下午給我弄了一碗面來，放了一點鹽，叫我吃了。

在秦城監獄，我們吃飯用的是搪瓷碗和洋鐵湯匙，不準用筷子。刷牙不準用牙膏，每月給我們發一袋牙粉。另外，每月發半塊肥皂、一卷衛生紙，每年發一袋洗衣粉。洗衣服没有地方曬，有時候拿到"放風"的地方去曬，却要等到天黑以後才能收回來。

監獄裏一個月理一次髮。平時不準刮鬍子，理髮的時候用推子連頭髮帶鬍子一起推一遍。理髮時每人祇有一分鐘，理完後自己回牢房去洗頭。每理一次髮都會弄得我們全身是頭髮。

洗澡是每半個月一次。每次洗完澡，還可以要一次指甲刀剪指甲，但是限定五分鐘就要收走。很多犯人共用一把指甲刀，指甲刀早已經磨鈍了，很髒，剪不動。

夏天，牢房裏的蚊子、蒼蠅很多，監獄每個星期給打一次"敵敵畏"。但是連"犯人"帶蚊子、蒼蠅一起打，常常是蚊子、蒼蠅没有消滅，但是我已被嗆得透不過氣來了。但一到晚上，成群的蚊子還是咬得人整夜不能入睡，滿身都被咬爛了。冬天，雖然有暖氣，但是放得很少，房間裏祇有八到十度，凍得不行。

在秦城監獄，"犯人"和"犯人"之間是絶對不準見面的。每當"放風"的時候，就一個一個地走進没有房頂的房子，將門一鎖，接着再放第二個。有一次他們把我的牢門開得快了一些，我

看到了前面一個人的背影，管理員就駡我走快了，説："你是聾子嗎？叫你走慢一點，等等再走，爲什麽不聽？"我説："我就是耳朵背，聽不見。打仗的時候耳朵打聾了。"管理員説："你是犯人，反革命，擺什麽老資格。"

在"放風"的路上，不準"犯人"東張西望，你祇能向前看，不準向左右和向後看。"放風"的路上要經過一個院子，這個院子裏面種有果樹和蔬菜，但是祇要你看上一眼，馬上就會受到訓斥。"放風"的時候，任何東西都不準往牢房裏拿。牢房裏祇要有維持一個犯人生命最不可少的東西就可以了。牢房裏没有凳子，祇有一個馬扎，出來進去都是它。

一九七七年的夏天，我被關在三樓上，屋子裏的温度達到了四十度。我再三請求，在日落以後，給打開牢門通通氣，但是他們絶對不允許。後來我中暑倒下了，才被他們允許每天打開牢門十五分鐘。在牢房裏要换一點新鮮空氣是十分困難的，所以一到"放風"，就好像到了天堂，每天多麽想在"放風場"多呆一會兒，多呼吸一點新鮮空氣。但是這是不可能的。每天都是時間不到就"收風"了，而且每到下雨和下雪的天氣，就不"放風"。

牢房裏不準吸烟，我進牢房的時候帶去了十三包烟，被他們没收了，説給我十六塊錢，但要"存"在他們那裏。開頭給我買過一塊錢的水果糖，以後就不準買了。牢房裏不準喝茶，祇能喝白開水。喝了幾年的白開水，也習慣了。

春節的前一天，監獄裏可以改善一次伙食，給幾塊鷄和抽去了刺的魚。到了過年的時候就完了，管理人員都回家團圓去了，給我們一點剩餃子吃。

在監獄裏，看守人員對"犯人"的訓斥多于教育。"犯人"有什麽意見，祇能向看守人員説，絶大多數的情況下是没有回音的。要是你多説兩句他認爲不中聽的話，就立即把你搬到一間最小的牢房裏。整個牢房祇有七步長、四步寬。過了一段時間，要是表現好一點，再給你换一間大的牢房。但是爲什麽這樣做，根本不作解釋，祇要你聽從命令。另外，牢房裏裝有監視器，"犯

人”們在幹什麼、說什麼，他們都能聽得到、看得到。

不過秦城監獄裏有一點做得比較好，這就是醫療。我想主要是爲了不讓我們死掉，要留活口。監獄中設有一個小門診部，有各科的醫生。“犯人”有病隨時可以報告，請求醫生來看病，隨叫隨到，并按時給服藥。獄方還半年給我們檢查一次身體，一個季度抽一次血，頭一天通知，早上不吃、不喝。經過上級批準，也可以到北京城內大醫院去檢查和住院。

秦城監獄很像一個縣城，整個監獄圍着數丈高的磚墻，上面有很高的電網。有三道高大的鐵門，從進入大門到我住的牢房一共有十三道鐵門。裏面有四個大院，每個大院有一棟三層樓房，形狀是U型，牢房多爲東西向，北面的樓是比較好的，但是我從來没有住過。這裏住的人大都是共産黨的要犯，自從打敗了國民黨以後，就有不少的共産黨人，輪流到這裏住，無非是這個山頭，那個山頭的。反正不會閑着。

總之，秦城監獄是一個讓自己認識自己不是人的地方。古今中外的監獄大概都是如此。我住的是共産黨的高級監獄尚且如此，更不用說一般老百姓住的監獄了。但是我想，今後是不是除了懲罰以外，也能够給犯人一點人權，一點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體和精神的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辦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經過多年的牢獄的生活，我想到了這一點。

八、切除膽囊

從一九七八年一月開始，我就感覺到肝臟下面疼痛，每天晚上睡覺以後，就不舒服，好象有一股氣從左到右，隱隱作痛，痛的時候，精神不振，全身無力。因此我經常敲門要哨兵轉報管理人員找醫生看病，醫生來了以後，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祇是給一點止痛藥吃。

以後，白天也有這種情况發生。每次發作的時候，我都找醫生要止痛藥吃。就這樣，吃了兩個來月的止痛藥以後，到了三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痛得特别厲害。哨兵從門上的孔裏看到我蜷縮在鋪上，就打開牢門問我是怎麽回事。我把情况告訴給了他，他便立即找來了醫生。醫生詳細地給我檢查了腹部，給我打了一針止痛藥，没有說什麽就走了。

過了一個星期，突然從北京醫院來了一個大夫，由監獄裏的醫生陪同着，來到我的牢房，特地給我看病。我想，這一定是監獄把我的病情報告了公安部，因此請了北京醫院的醫生來給我會診。

又過了三天，北京軍區總醫院又來了三個大夫，兩男一女。他們帶來了一臺儀器給我檢查，着重檢查了腹部的右面。他們檢查了半天，又没有告訴我任何結果。我不由地問大夫，如此頻繁地給我檢查身體，是發現了什麽問題嗎？大夫回答說，可能是膽囊裏有結石，但是還要作進一步地檢查。

這之後的一天上午，這三個大夫又一起來到我的牢房，向我說明，要到監獄的門診部去用X光照相。到了那裏以後，他們首先給我照了幾張大片子，然後叫我吃下四個油炸荷包蛋。我是多年没有吃過的美餐了。吃完了以後，他們叫我休息了一會兒，又繼續給我照了三張片子。他們對我說：“結果出來以後，會專門給你談的。現在條件好，什麽病都能查出來，請放心，不要着急，查清楚以後，給你治療，不要有過多的思想負擔。我們還要請北京醫院的大夫來再給你檢查，他們的設備全、技術高明。”

一九七八年三月底的一天下午四點，管理員通知我晚上不要吃飯，去北京城裏檢查身體，回來後再給我吃飯。天快黑的時候，他們把我叫出了牢房，下樓上了汽車。我坐的是一輛黑色的轎車，管理員坐在前排，我坐在後排，兩邊各一個警衛。監獄門診部的醫生、護士乘坐的一輛吉普車在前面帶路，後面是一輛大車，車上坐着一個排的戰士。

我們的車由秦城往南開，以後轉向了北京市區。因爲是夜間，

看不清楚，車到了東單，我才明白是到了北京醫院。北京醫院已經是大變樣了，新修了一座大樓房。醫院門口有輛吉普車在等候，他們是公安部的兩個處長，事前同北京醫院聯系好了，并在前面引路。他們帶着我徑直走向醫院的X光室，衹見大夫和技術人員都已經身穿工作服在裏面等候，準備工作也已經做好了。他們看見我時有一點驚异，但是態度還是好的，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

我到透視室以後，押送的監獄管理員、醫生和護士，都在另一個房間休息，没有進來，一切都由第一次到秦城來給我檢查身體的那位大夫和技術人員安排。他們先給我打了一針紅色的液體，稍稍休息以後，就扶我上了X光的照射臺，左一張、右一張地先後一共照了十幾張。第一批照片拍完了以後，同樣讓我吃了三個荷包蛋。然後又拍了幾張。最後，我看見大約有厚厚的一迭照片。北京醫院的工作作風還是那樣細致，認真負責，我内心裏非常感動。

我在X光室一共呆了大約有四個半小時，到了午夜一點才統統拍完。回到秦城，已經是大約下半夜三、四點鐘了。管理員給我搞來了一飯盒的餛飩，我全部都吃完了。第二天，我睡到了上午九點才起床。

以後十多天没有動静，到了四月十八日，監獄門診部的一位醫生到“放風場”來找我談話。他告訴我，我的病是膽結石，膽囊裏有三塊石頭，需要動手術來切除膽囊，他們已經寫了報告給公安部，公安部又報告了黨中央和國務院，中央已經批準給我做手術。他還説，這種手術是大手術，但是没有什麽危險，叫我不要緊張。

我一聽説是剖腹的大手術，從心裏就不想做。我問大夫：“不動手術，吃藥是不是也可以治療？”他説：“没有别的辦法，非動手術不可。動手術是没有危險的，如果不動手術，膽囊破了，腹中積水，就會有生命危險。黨和政府對你很關心，讓你住最好的醫院，請最好的醫生給你動手術。没有問題的，請放心好了。”

我還是没有答應，提出要和家屬商量一下。他答應把我的要求反映上去。

四月二十日上午，公安部又來了兩位處長，向我解釋動手術的問題。他們説：“中央對你很關心，决定你住北京醫院，請最好的大夫來給你動手術。一切我們都會安排好的，請放心，不會有什麽危險，手術一個半小時就可以做完，一個星期就可以拆綫，半個月就可以出院。”我又提出要見家屬。一位處長説：“中央没有批準，一切由我們公安部負責。據我們了解，你的家屬都很好，都在北京，你放心好了。”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監獄方面正式通知我，準備去北京醫院住院，要我收拾一下東西，準備天黑就走。身在監獄裏，没有什麽好收拾的，無非是拿上了臉盆和幾件衣服而已。

七點鐘出發，和上一次一樣，乘三輛汽車來到北京醫院。到了北京醫院已經是晚上九點了。公安部的那兩位處長在門口等候，他們已經爲我辦好了住院的手續，我到了以後，就把我帶到了一座朝東的大樓裏，大夫和護士已經在樓裏面等我了。接着，他們把我帶到地下室的一層樓房裏。我一看，大約有二十來個房間，都是空的，他們讓我住進了靠西面的一個房間。隔壁是護士的值班室，給我檢查過身體的大夫就在對面的辦公室和醫療室。後來我才知道，他是主治醫生，年紀大約三十多歲，精力充沛，診斷處理果斷，工作態度也好。

過了一會兒，護士給我拿來了一套住院的服裝，還給了我一件睡衣。她要我洗一個澡，然後睡覺休息。在這個地下一層的走廊上，放着一個皮沙發，有兩個公用厠所，還有一個大浴室，裏面有四個淋浴間，洗澡非常舒服。病房裏還開着暖氣。我一看温度表，足足有二十多度。我在走廊上可以隨便活動和休息，就是不準到外面去。雖然是這樣，這裏和監獄比較，簡直是兩個天地了。押我來的那個管理員和一個副排長，帶着五名戰士住在我病房的對面，擔負着看守我的任務，同時在我手術後不能起床的一段時間裏，幫助我料理生活上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醫院增派了一個護士和兩個特護，都住在我的隔壁，一共四個人輪流值班。衹有那位大夫，没有人替换他，白天夜裏都在這裏守候着。

這一天早上起床以後，他們叫我在走廊裏活動了一下，護士同志給我打來了早飯，有牛奶、鷄蛋、面包和火腿。這是我幾年來吃過的最好一頓早餐了。同時他們給了我中午和晚上的菜單，説規定，我的伙食每頓飯是三菜一湯。

吃過早飯，主治大夫告訴我説："上午做準備工作，有兩位專家要來同你講手術的情况和要注意的事項。下午卧床休息和輸液，因爲手術以後，有兩天不能吃飯，要靠輸葡萄糖來維持。

大約到了九點鐘，進來了兩位專家。雖然他們的年紀都比以前大了，而且帶着大口罩，但我還是一下子就認出了他們：一個是吴蔚然教授，一個是王歷耕教授。他們兩位都是著名的外科教授。爲怕他們感到不方便，我没有開口同他們打招呼，但是從心裏暗暗感到高興。公安部的人對我説，中央批準要找最好的醫院、最好的大夫給我做手術，這一下子得到了證實。

王歷耕教授一九五四年爲我做過切除闌尾的手術，當時我住在北京醫院的老樓上，他對我的情況，應當是比較熟悉的。吴蔚然教授雖然没有給我看過病，但他是負責劉亞樓治療工作的，是他最先發現劉亞樓得了肝癌。另外，中央領導同志得病，都是由他負責組織治療。

他們兩個人，先是給我檢查身體，量血壓，檢查心臟、肝臟，看心電圖，研究X光片等。接着，他們告訴我説："手術的部位在右腹部，因爲你的身體比較胖，刀口可能比較大一些，大約有二十公分。另外，你的膽囊裏裝滿了結石，大的是三塊，還有許多小石頭。這些結石如果不摘除，膽囊一破，就會危及生命。目前其它的一些治療，如針灸、中藥等，都不能解决結石的問題，除了手術以外没有别的辦法。動手術切除膽囊，這是最安全的辦法。摘除膽囊對人的影響不大，這樣的例子很多，手術的時間也很短，有一個多小時就可以了，手術由我們兩個和主治醫生來給

你做，你盡可以放心。"另外，他們還非常耐心地解釋了我關于手術的一切疑問，我心中的一塊大石頭落了地，心裏也到踏實多了。

上午談完話以後，我開始躺在床上輸液。因爲怕我的心臟負擔過重，輸液進行得很慢，一直到下午才輸完。到了下午四點，吴、王兩位教授又來告訴我，手術的時間定在晚上八點，要我放鬆精神。那天整個下午，護士長都在我的床前觀察，并不斷地給我做思想工作。主治醫生也來看我。

到了晚上七點鐘，護士長穿上手術服、戴上帽子，推來一個車子，要我躺在車上。接着。她和另一個護士推我出了病房，經過走廊，上了電梯，一直來到手術室，要我上了手術臺。上面一盞大燈，把整個手術室照得雪亮。

我在手術臺上看見了吴蔚然和王歷耕教授都在消毒。不久，一位麻醉師走過來，要我側着身體曲着腿，從腰部給我打了一針麻藥，然後給我帶上了氧氣罩開始吸氧。我聽到吴蔚然教授説："我要上臺了。"王歷耕教授説："你不要客氣。"我感覺到有人在肚子上給我蓋了一層布，有東西在我的肚子上從左到右劃了一下。在手術過程中，我不覺得有任何疼痛，腦子也一直是比較清醒的。主治醫生和麻醉師不斷地問我，有什麽不舒服的感覺。我説："没有。"當教授翻動我腸子的時候，我感到很難受。王歷耕教授告訴我説："挪動腸子主要是想看一看，膽管裏有没有結石，如果有就一起摘除。搬動腸子是有些難受，但是一會兒就好了，你忍受一下。"

又過了一會兒，主治大夫拿了一個瓶子給我看，面裝了三塊大石頭，還有一百七十多粒小石頭。整個手術祇用了一個半小時，膽囊切除了，膽管保留了。吴蔚然教授給我縫刀口的時候，我的神志仍然清醒，没有感覺到疼痛。

手術完了以後，兩位教授回去休息，主治大夫和護士長就把我從手術臺上，移到了手推車上，推回病房。主治大夫在我的腰上塗了一種藥水，護士長又給我輸上了液，我就不知不覺地睡着

了。

到了晚上十二點鐘我醒了，急于要小便，但是在床上又無論如何也小便不出來。没有辦法，我衹好帶着輸液瓶下床。護士長說："你的身體真好！" 護士給我量了一次體温，没有發燒。這時主治醫生告訴我，要盡量向右側身睡，因爲刀口上還有一根小管子，以便排出血水。他又要我盡量不要下床小便，這樣刀口才容易長好。他還告訴我，要先吃兩天流食，第三天就可以吃東西，第七天可以拆綫。我請他們回去休息。他們不肯，說現在我這裏還不能離開人，需要輪流來護理我。

這一睡就到了四月二十九日上午十點鐘。看見我醒來，主治大夫又來檢查了一遍，又在我的背上塗了一些藥，還再三告訴我要向右側躺，以便讓血水流出來。下午三點，吳蔚然和王歷耕教授又來檢查了我的刀口，問了我的感覺情况，又查了血壓和脉搏，說一切正常。

公安部的那位處長也來看我。他跟我說，拿出了這麽多的石頭，證明不動手術是不行的。押送我來醫院的管理員和幾個戰士也來看我。他們告訴我說，我動手術的時候，他們都在另一個窗口觀望，看到了手術的全過程，手術非常順利，他們都很高興。

北京醫院的黨委書記也來看我手術以後的情况。到了晚上八點鐘，主治大夫和護士長又來檢查了我的刀口。他們都說，情况很好，明天可以吃流食，以後可以吃半流食。我要求晚上停止輸液，他們說不能停，還要繼續輸液，如果晚上睡覺右側比較難受的話，可以讓護士幫助翻翻身。

四月三十日，我整天都在輸液，也不想吃飯。到了下午，我突然放了一個屁，主治大夫和護士長聽到以後都說，這就好了。因爲動手術時翻動了我的腸子，衹有腸子通了，才能放出屁來。我問他們，我在衛戍區吃的飯裏面有不少砂子，是不是吃了砂子以後，才產生這麽多結石的。護士長說，這跟吃進砂子没有關系，結石是在另一種情况下產生的。我又問醫生，切除了膽囊，今後要注意些什麽？他說："注意不要吃太多油膩的東西就行了，因

爲吃多了油，就容易拉肚子，别的不會有什麽影響。"

五月一日，節日放假，但主治醫生和護士長照常來上班。值班護士給我量了三次體温和血壓，一切情况都很正常。他們都說："像你這種情况很少，一般人做了手術以後，總有一些低燒，可你和平常人一樣，身體没有什麽變化，這證明你的身體是不錯的。"

這一天我躺在地下室的病床上，感覺到醫院很安静，衹是看到外面起了風，地面上風沙很大。自從一九七一年九月被逮捕以來，六年了，我這還是第一次在北京城過"五一節"，而且是在病床上度過。自從參加革命以來，没有想到要坐自己人的監獄，而且不知道這一輩子還能不能活着出來。我開始回想自己的過去，想自己爲了革命而拋下的父母，想自己的親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屬和孩子是死是活。他們不會知道我的情况，他們也不能來看我，反而我時刻擔心着他們目前的處境……。

五月二日早上，主治大夫說："你可以下來，走幾步試一試。"我爬了起來，就覺得肚子像捆着繩子一樣，但是對走路没有多大妨礙。從這一天開始，大夫叫我正常吃飯，但還得繼續輸液。

這天上午，吳蔚然和王歷耕兩位教授又來查房，問了問我手術以後的情况，看了看我的刀口，然後告訴我，手術以後的情况一切良好，過四天以後就可以拆綫，就可以正常起來活動，正常吃飯。他們還祝我早日恢復健康。聽了他們的話，我覺得他們真誠負責，對我的病情也很關心。我從内心裏感謝他們！

五月三日，我開始下床在走廊上活動，但是開始吃飯以後，一天大便四、五次，還帶有血色。主治大夫詳細地問了我過去的情况，還拿了我的大便去化驗，結果没有發現什麽問題。

我住院期間，看守我的幾個戰士，無論白天黑夜都輪流在我房間裏放哨。他們每人發了十五天的飯票，到醫院食堂裏吃飯。聽他們說，食堂的伙食很好。

在床上躺着没有事情，就想請護士幫助找兩本小說看一看，但是管理員硬是不同意。這個管理員是秦城監獄中態度比較壞的

一個，動不動就訓斥“犯人”。我心裏想，這裏的人哪個職務不比你高，上面的鬥爭你懂得什麽？但是既然碰到了他，以後我就不再提什麽要求了。

身體逐漸地恢復，到了五月八日和九日，主治大夫分兩次給我拆了綫。九日下午，吴蔚然和王歷耕兩位教授再次來看我，爲我檢查了傷口。檢查以後他們告訴我，一切正常，再過一個星期就可以出院了。

五月十六日上午，主治大夫來告訴我，第二天上午我就可以出院了。他們給我帶一些藥品回去用。下午，公安部的人來醫院結賬，并通知我明天回秦城。

五月十七日上午，主治醫生和護士都在辦公室和治療室清理自己的東西，管理員和幾個戰士也收拾好了自己的東西。下午五點，公安部的兩位處長來接我出院。主治大夫和護士長送我到大門口，我向他們表示了感謝。可惜的是，由于當時我不好問他們的姓名，至今也不知道他們是誰，衹能在這裏向他們表示感謝！

車子開動的時候，有六、七個醫護人員向我招手致意。這對我來説，又是一次心理上的安慰。回到秦城，天已經完全黑了，他們仍然讓我回原來的牢房住。管理人員在門口接我。他詢問我手術的情况，并跟我説，膽囊切除了，今後的身體可能會好一些。監獄的大夫和護士，立即來給我檢查了身體，量了血壓，并看着我吃下了所有的藥。我要求給我一粒安眠藥，他們立即就拿來了。

又回到秦城了，一切還和原來一樣。

九、孩子們的探視

一九七八年的秋冬之交，獄方突然叫我搬到西南樓中一間小得可憐的牢房裏。我不斷地想：我到底什麽地方得罪了他們，要

這樣對我實行懲罰？那所樓房裏没有廣播，我就要求聽廣播。他們研究以後告訴我説：“你剛來秦城的時侯，給你賣烟的錢，還有三十多元，我們給你買一個收音機吧。”以後，他們果然給我買來了一架收音機，允許我早上、中午、晚上各聽三次廣播，但是聲音要小，不能讓隔壁的犯人聽到。這又算是特殊的優待了，我真的不理解，他們爲什麽要一面調整我的牢房，一面又給我收音機，這究竟是爲了什麽？

冬天裏，我的這間小牢房暖氣放得少，牢房裏非常冷。我要求把自己的皮大衣拿來，他們也同意了。就這樣，我整天都披着皮大衣挨日子，白天趴在小桌上讀報、看書；晚上蓋着大衣擋嚴寒。

一直到了七九年的開春，因關我這棟樓要修理了，才把我搬回到一間大的牢房裏，心裏才又覺得舒服一些。這樣，秦城監獄的四座樓，我都住了一遍。以後，他們開始允許我在院裏參加一些輕微的勞動，每天兩小時。雖然累一點，但是院子裏的空氣要比“放風場”裏好得多，而且勞動一下，對身體也是大有好處的。

在監獄裏閑來無事，腦子裏不禁會胡思亂想，有時自己也控制不住。晚上還經常做惡夢。有時好像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拼命地工作；有時又好像是在暗無天日之中行軍走路，走到一個懸崖峭壁，無路可走的地方，就有人告訴我，跳下去。有時我夢見和孩子，家屬一起享受天倫之樂；有時又夢見他們饑寒交迫，受到折磨。但是每次醒來，我都是身處牢獄之中。但是不管怎樣，我都要堅持活着，盼望有一天澄清自己的問題。

一九七九年春的一天，管理員突然來告訴我，説是經領導上批準，我的孩子們可以來探視我。聽到這個消息，我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就反復問管理員。問的多了，他顯得不耐煩了，説：“領導上批的，還會有假的嗎？”

接着，管理員讓我把孩子們的姓名、性别、年齡統統寫了一遍，然後向我宣布了探視的規定：不是直系親屬不準見；每一次探視兩個小時；帶來的食物要當場吃下去，吃不完的東西要經過

檢查才能帶進來；凡是金屬器具一律不準帶進來；衣服要經過檢查才能穿；會見的時候監管人員要在場，不準説監獄中的任何情况。

自從聽説孩子們要來探視，我的生活好像又有了希望。我一天一天地盼望。終于，一天上午，管理員通知我，下午家屬要來探視，要我刮刮胡子，做些準備。他同時勸我，不要過分激動，要控制情緒。

我一聽到這個消息，不禁又喜又悲，泪流滿面。八年不知道孩子們的下落，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在受凍、挨餓、受累？這些年都是如何過來的？我出事的時候，兩個小女兒祇有九歲和十一歲，没有人管，她們是靠什麽生活的？這些年他們的任何情况都不告訴我。我在監獄中，日日夜夜都在惦念和思念着他們。見面的一天終于要來到了。

那天中午，我一個中午都没有睡，心跳加快，血壓升高，我實在控制不了我的情緒。每一分鐘都顯得那麽長。

好不容易等到了下午，管理員把我帶到探視室。我一看來了不少人，但是我一下子都認不得了。這時，我見到一個人走上前來，我還以爲他是公安部門的幹部。看見他走過來，我還問他："同志，你貴姓？"没想到他對我説："爸爸，我是新潮，你不認識我了嗎？"我竟然連自己的兒子都不認識了！接着，我又問新潮身邊的一個女同志是誰，她説："我是采芹呀，你也不認識了嗎？"

這一問，把他們幾個都問哭了，但怕我傷心，他們很快都忍住了悲傷，和我説家常。他們給我介紹説：這是仲秋、這是京秋、還有巴瓘和夢瓘。我走的時候她們那樣小，現在已經長大成人了。再回頭一看，没有我的妻子陳綏圻，我不禁問："你們的媽媽没有來嗎？"孩子們告訴我説："媽媽已經被發配到浙江紹興的一個農場勞動去了，一下子來不了。"我聽到這個情况，禁不住一陣心酸。

雖然他們當時的處境很困難，五個孩子，僅僅靠兩個在農場當工人的孩子的一共一個月五十多元的工資生活，但是個個穿得都比較整齊，還給我帶來了不少吃的東西。他們怕我回到牢房以後吃不上，就拼命地讓我吃，但是我哪裏有心思吃東西，我是急于想知道他們的情况。

孩子們怕增加我的負擔，都没有把真實的情况告訴我，祇是説，他們一切都好。經過我的詢問，才知道新潮已經從部隊轉業，當時還没有工作。仲秋和京秋也早已從部隊復員，被安排在北京郊區的農場勞動。巴瓘下鄉當了知青，夢瓘還在上學，采芹已經成家另過。他們雖然生活上比較困難，却是互相幫助，互相照顧。我聽到這些，感到十分欣慰，因爲孩子們雖然過早地受到了磨難，但是已經成長起來了。

關于這次探視，我的兒子吴新潮曾寫了一個回憶，我把這個回憶摘録如下：

記得那是一九七九年的三月份，我回到北京以後的第二年春，我和巴瓘、夢瓘住在廣安門車站東街十一號的一間破舊的平房裏。有一天邱路光（邱會作的大兒子——引者注）找我，説是公安部的通知，已經讓看了（指探視黄、吴、李、邱），黄春光（黄永勝的大兒子——引者注）他們已經去秦城看了黄永勝，他們找了公安部，也被告知近期内可以去秦城看人，讓我們也去公安部聯系。

第二天我和京秋趕到了公安部。到了傳達室，來訪的人很多，我們説是吴法憲的子女，傳達室的同志很認真，立刻打電話進去，并要我們等一等。不一會兒，就招呼我們到一個房間，出來了十三局的兩個同志，找我們談。他們詳細地問了我們的情况，在京的一共幾個子女，姓名、單位一一記下。十三局的同志對我們説：經領導批準，直系親屬可以去探視，也就是愛人和子女可以去，但是非直系親屬不能去。探視的時間除星期日以外都可以，探視的間隔爲三個月。探視時允許帶一些食品，但是不能帶生活用品和香烟。我們和公安部的同志約定了探視的時間和人員名單。總之，十三局的同志對我們比較客氣。

回到家裏，我們立刻開始通知采芹、瑞榮（采芹的丈夫——

引者注)、仲秋、平原(仲秋的丈夫——引者注),并且分頭去買東西。已經八年没有見過父親了,得到了這個消息我們真是又激動又難過。激動的是又要見到父親了,這對我們來説簡直是一種奢望,在那種嚴峻的形勢下,我們没有想到這一輩子還能見到父親。難過的是在那樣的一種環境下,不知他老人家會變成什麼樣。

我們拿出所有的生活費用,到街上買了水果、點心、熟肉、罐頭……。哪怕不讓帶進去,讓父親看一看也好,讓他知道孩子們在想念他,讓他有堅强的信念活下去。

那天早上,我們起了一個大早。天上還在閃爍着星星,我們就冒着早春的冷風,坐了一個小時的汽車,趕到了北郊市場,在那裏同采芹、仲秋會合。然後,我們到長途汽車站買了到秦城的汽車票。那個時代的北京人都知道秦城是一所高級監獄,是我們黨關押國家要犯的地方。看到我們這一行人,拿着這麼多的東西去秦城,車站的人們好奇地看着我們,好像都知道我們一行的目的。

我們兄妹六人,除我以外,都是女孩子。因爲怕她們見到父親時哭,在路上我們就相約規定:見了父親誰也不準哭,不能讓人家看笑話。

車子一直向北方開去,我們没有想到秦城是這樣遠,而我們想見到父親的心情又是這樣的迫切。車子開了大約兩個小時,終于來到了北京郊區燕山山脉的脚下,遠遠地看到一片灰色的建築,我想那就是秦城了。

車子不能開過去,因爲那是我國戒備最嚴格的地區。我們下車走了兩、三里路到了監獄的門口。這不是我們所想象的崗哨林立、高墻電網、森嚴的黑色大鐵門,而是看上去像是一座廢弃的機關建築,一排排的平房。在門口的警衛室裏,我們通報了來意和一行人的名單。過了不一會兒,來了一位叫黄妙齡的女同志,她一個個地核實了我們每人的身份,然後把我們帶到了一間平房裏。這個房間大約有二十平方米,裏面有一張桌子和幾把椅子,好像長時間没人來,桌上有一層灰塵。

還是和在公安部裏一樣,黄妙齡對我們很客氣,但是絶對没有多餘的話。她和我們講了一下探視的要求:一、不準談和案情有關的事情,不要哭;二、帶來的食品要經過檢查,可以在探視

的時候吃,不準帶進監獄;三、探視時間不得超過兩小時。

我們懷着迫切的心情等待着。過了一會兒,有人來通知我們説,父親因爲心情激動,血壓升高,考慮到安全,他們决定讓父親下午再來,由獄方安排我們中午到招待所裏休息。

我們到了招待所,他們給了我們兩個房間,房間都還乾净。我的心情平静不下來,于是飯後大家就到後面的山上去走一走。無意之中,我們來到了後山,在山坡上看到了秦城監獄的大致面貌。秦城監獄一共是三層:外面是一排深灰色的建築,看上去像是一個小花園;後面是監獄的辦公區,有一排排的辦公樓;最裏面才是監獄的主體。但是在外面是絶對看不見最裏面這個主體建築的,那是一個方形的堡壘式建築,高大的圍墻上布滿了電網。高高的監房上面,是一個個黑洞洞的小鐵窗,一色猩紅,看上去就讓我想起了故宫的午門。午門是“推出斬首”的地方,是權力與法律的象徵。這裏的警衛也分了兩層,外面是北京衛戍區的部隊,裏面是公安部的警衛,可以互相監視和牽制。這樣的警衛體制在中國也是數一流的。裏面不過是關了一些五、六十歲的老人,我想不要説是林立的崗哨和層層電網,就是弄一把“將軍不下馬”的鎖和一米八的墻,他們哪一個人也跑不出去。但是,這些人却是“國家最危險的敵人”!

下午,我們按照約定的時間來到會見室。兩點以後,看到公安部的幾個人出出進進,我們估計父親可能快出來了。果然,不一會兒我們就看到幾個公安同志陪着一位老人走來。是的,這就是父親,我們都認不出來了!他滿頭銀發,穿着一身深藍色的罩衣。看得出來,他的衣服剛剛洗過,臉也修飾了一番,但裏面的棉衣袖口髒得發亮,褲子上没有扣子,用一根綫系着。他面容顯得蒼老,行動遲緩,很明顯地可以看得出一個“犯人”的痕迹。

我趕緊走到門口處去迎接,可父親竟然認不出我來了,問我是哪位同志,我一陣陣的心酸,直想哭。我强忍住泪水,并一再告誡自己,我是一個男人……。然而姐妹們却已經抑制不住自己了,個個雙泪長流。還是父親勸我們,説見面應該高興,不要傷心。

接着,父親詳細詢問了我們每一個人的情況,問了媽媽的情況,還問到了采芹和仲秋愛人的情況。我們也問父親生活的情況,他衹是苦笑了一下,閉口不談。我們知道,這方面監獄有規

定，不讓説，但是我們看得出來，父親在裏面就是“犯人”的待遇。父親要我們好好學習，遵紀守法，互相幫助，搞好生活。

看到父親飽經風霜的面孔，想到監獄裏面的生活，我們想抓緊時間讓父親吃點東西，也享受一點人間的生活，我們有的剥水果，有的拿點心，一個勁地往父親嘴裏塞。父親不住地説，好久没有吃過這樣的東西了，説得我們的心裏一陣陣地發酸。我們想盡量讓父親多吃點，可是在這短短的兩個小時裏，父親又能吃得了多少呢?

我們注意看了一下父親穿的衣服，發現裏面的棉衣髒得很，于是就問父親有没有乾净的衣服。父親連連説有，説是由于棉衣棉被都要自己拆洗，他的年紀大了，動作困難，懶得動，也就湊合了。父親還説：在裏面，不僅鋼筆和手表被收走了，爲了防止“犯人”自殺，連皮帶也都給收走了，褲子是用兩根兩寸來長的繩子釘在兩邊系上的，就像是農村老人穿的“緬襠褲”。每天早上六點鐘起床，每天放一次“風”，吃飯是監管人員從鐵門裏遞進來的。每天可以看報紙，看看革命小説，而他經過上面的批準可以聽廣播，給了一個小小的半導體收音機。另外，還批準他可以學習英語。這些待遇，監管的同志説，都是其他“犯人”没有的特殊待遇。

父親還悄悄告訴我們，在裏面關了許多人，但是天天“放風”，出出進進的，却從没有見到過任何其他的犯人。在這裏面，人都没有名字，衹有代號，他的代號叫“七六〇二”。我想，這大概是指一九七六年被關進去的二號人物。父親還説，他這是第一次走到監獄的墻外，他悄悄數了數，一共經過了十三道鐵門。這些話，我想隔壁房間的監聽人員是都聽到了，但是他們没有來干涉，裝聾作啞了。

我們和父親會面的房間裏没有監管的人員，但是我知道這裏有竊聽器，因爲我出去上厠所時，看見了公安人員拿着報話機閃進了隔壁的房間。我想，讓他們聽吧，讓他們去向領導匯報吧，父親的一切，黨中央都是再清楚不過了。

我們很擔心父親的身體，父親説，他有過幾次發燒感冒，還有一次得了膽囊炎，被送到了北京醫院檢查，以後在北京醫院動了手術，手術是吴蔚然教授親自主持的。父親説着還掀起了衣服給我們看了傷疤，刀口大約有十幾公分長。父親説：你們放心吧，

監獄裏面是定期檢查身體，如果有病，裏面有醫生、有藥，不要緊。他們也怕我們死在監獄裏。

我們有許多話想對父親説，父親也好像有許多情况要問我們，但是時間過得太快了，黄妙齡同志兩次來提醒我們時間快到了。我們向黄妙齡同志提出要求，説父親没有吃完的東西，希望能讓父親帶進監獄去，讓他能多吃兩天。她去請示了一下，回來表示説可以，但是東西要交給監管人員保管，盡快吃完。

時間到了，監管人員要送父親回牢房，我們一起攙扶着父親，强忍着眼裏的泪水和心中的不平，目送他蹣跚離去。然後，趁着黄昏，我們離開了這座名聞天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監獄”。

一路上，大家的心中都無法平静，但誰都没有説話。因爲，這裏關押着我們的父親，爲毛主席和黨中央浴血奮戰過的父親，爲“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日日夜夜拼命工作的父親。作爲前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空軍司令員，他在這裏坐牢，爲人受過，這就是我們黨的路綫鬥争啊！

十、公審

一九七九年初，中央派人來向我宣布説，對我們的案件，要重新進行審查。這個消息對長期處于囚禁狀態，而且無人過問的我來説，無疑是帶來了一綫的希望。我心裏想，這難道是徹底清查我們的問題，然後給予適當處理的那一天終于來到了嗎?

這之後，一直到一九八〇年七月爲止，專案組先後對我進行了十五次審問。審問的内容幾乎和過去是一樣的，衹是參加審問的人變了，都是新的面孔，是我過去没有見過的。

他們的這次審理，是從一九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開始，把“文化大革命”中的幾乎所有的事情，都問了一遍，其詳細程度是空前的。在詢問的過程中，我實事求是地把所有的問題都講了一遍。

有一個問題使我受到了教育。在一九七二年的三月，中央專

案組的人，懷疑我在七一年八月八日晚上到葉群那裏是否涉及到政變的問題。當時在場還有邱會作和胡敏。這個問題當時的審問人員對我施行了高壓，爲了誘供，他們説：邱會作和胡敏都已經交代了，我不交代就是死路一條，在這種情况下，我承認了他們要我説的一些話，但是，爲了以後能够有機會説明問題，我在當時的交代材料下面畫了一些圈，爲了今後證明這些話不屬實。但是這個問題，以後一直無法證實，而且和其他的問題，相互矛盾不能取得一致。在這次審理中間，這個問題和其他人的交代有很大的出入。一天，審問人員向我嚴肅地宣布，交代的問題要實事求是，不能説假話，不能增加辦案的復雜性，過去如果有假的情况，這次可以更正。

我説，感謝你們幫我放下了多年的包袱。在我以前所交代的材料裏，關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和葉群接觸的那個材料，有些情况是不實的，我當時在下面作了記號，材料裏面所有畫了圈的，都是假的。然後，我對那天晚上與葉群接觸的情况，重新如實地作了説明。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上午，我再次被帶進了審訊室。剛一進去，來人就嚴肅地對我説："中央决定，對'林彪反革命集團'要依法處理，交由總政保衛部負責審理。根據你的問題，依照法律，對你補辦逮捕手續。逮捕的時間是從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對你進行隔離審查的時候算起。"

説完，他把逮捕證遞到了我的面前，要我在上面簽字。到這時我這才明白，他們所謂的重新審理，就是要把我們的案件移交到總政保衛部，由總政保衛部來重新審理和提出處理意見。所謂"依法處理"，就是進行審判和追究刑事責任。原來稱我們爲"反黨集團"，那還是路綫鬥争；現在稱我們是"反革命集團"，是要把我們當"反革命"來處理。看來，我們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了。

我們黄、吴、李、邱幾個人之所以被關起來，主要就是因爲在九届二中全會上和江青、康生、張春橋一伙的鬥争。"四人幫"垮臺以後，我原以爲我們會迅速得到公正的處理，不料幻想破滅

了。現在反而要把我們和"四人幫"搞到一起來追究刑事責任了。但"我爲魚肉，人爲刀俎"，我這個階下囚又有什麼辦法，衹有聽天由命吧。

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裏，看報紙、聽廣播的權利被取消，會見親屬也被停止了。我又一切與世隔絶，似乎一瞬間天地萬物都不存在了。

一九八〇年九月三十日，他們正式通知要"公審"我。那天早飯後不久，監獄的管理人員突然敲門讓我出去，把我帶到大門口，叫我上了一輛車。上車以後，車子一直開到了監獄招待所門口，然後把我帶到了一間大房子裏。我進去以後，衹見正面坐着的兩名穿中山服的年輕法官，嚴詞喝令我站在一邊。我的身旁各有一名法警，法警一上來就取下了我的帽子，無數的記者，拼命地給我照相，一時間閃光燈，使我睁不開眼。

兩位法官神情嚴肅，像演戲一樣地對我宣布："九月二十九日，第五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决定成立特别檢察廳和特别法庭，檢察、審判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你吴法憲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之一，應到庭受審。"

整個過程都是要對外宣傳的，所以工作人員的動作和表情都像是事前做了規定一樣。對我來説，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這種場合亮相。

十一月十日上午，我接到了起訴書的副本，并被告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二十六條的規定，被告人有辯護權，可以委托律師辯護。根據這個規定，十一月十三日，我遞交了律師委托書，以後由政府爲我指定了辯護律師，一個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法律系講師周亨元，另一位是武漢大學法律系副主任馬克昌。按照規定，律師有單獨會見被告的權利，但是在律師每次和我會見的時候，却必然有監管人員在場。

在牢房裏，我反復地仔細閲讀了幾遍起訴書。起訴書全文約兩萬多字，所列舉的"犯罪事實"一共四十八條，分爲四大部分：一、"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策劃推翻無産階級專政的政

權"，共二十三條；二、"迫害、鎮壓廣大幹部和群衆"，共十五條；三、"謀害毛主席，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共六條；四、"策動上海武裝叛亂"，共四條。上述這四大部分"犯罪事實"，都是一攬子叙述的，没有分清各個"主犯"所應當承擔的責任，看來是要把我們和江青等人捆在一起審判。主要的問題，是"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而"兩謀"，即"謀害毛主席"和"陰謀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問題，并不占主要的地位。

十一月十七日早飯以後，我收到了法庭的傳票，傳票上注明應出庭的時間，是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三時。這樣，還有三天的時間。

我過去從來没有經歷過這樣的場面，猜想不出是什麽情况，也就無從準備，衹好在牢房裏等，照樣看書、吃飯、睡覺。衹是因爲看不到任何報紙、聽不到任何廣播而感到沉悶。

十一月十八日，管理員拿來一套藍色的中山服和一頂帽子，叫我换下身上穿的一套黑色囚服。我身上的衣服又髒又破，雖然我費了不少的力氣，仍然洗不乾净。爲了讓我出庭受審時形象稍微好一點，這是監獄裏特别照顧。不知道他們是從什麽地方弄到的我衣服的尺寸，做了這樣一身衣服，穿着還很合身。接着，他們又發給我一雙襪子和一雙棉鞋。整個審判期間，我就穿着這身衣服。

十一月十九日晚飯以後，監獄管理員來通知我，説當晚就去北京城裏，準備受審，要我收拾一下東西就走。在監獄裏還有什麽東西可以收拾的呢，無非是些洗臉用具和一身衣服而已。在思想上也準備着此一去就不復返了，反正怎麽處理，都隨便吧。

那天大概是晚上八點鐘左右，管理員來叫我了。他帶我走過一段很長的走廊，下樓出了小門。一路上，不知道有多少記者在給我録像、照相，我又經受了一次次的强光照射。但是我是個囚犯，無法對他們提出异議。

一出大門，就坐上了一輛卧車。我坐在後排的中間，兩邊各有一名警察。前排是司機和管理員。在我坐的車的前後，各有一輛警戒車。我是一個囚徒，居然獨占了三輛車，待遇比我在工作崗位上還高。

一路上，衹見一條長蛇陣似的車隊，有秩序地魚貫而行。真壯觀呀，每個"主犯"三輛車，十名"主犯"就是三十輛車。再加上指揮車、警衛車、救護車，總共大約有五十多輛車。過去任何國賓來訪的場面都没有這樣的規模呀！

從秦城到北京城，大約走了一個半小時。車隊走的不是正路，一路上彎彎曲曲地不知道走的是什麽綫路。一直到了東長安街，我才認出路來。等車進了東交民巷後院，我才發覺是到了公安部禮堂。

我的車在公安部禮堂邊的一排小屋前停了下來，我被帶進裏面一間有暖氣的小屋子裏，裏面除了有一張單人床、一把椅子以外，就什麽也没有了。外面的一間屋子裏，住着看守人員。

我進了屋子以後，有個醫生進來問我的身體情况，還給我量了血壓。我問醫生我的血壓有多高，但是他不肯告訴我，衹是問我要不要吃藥。我心裏想，我問你血壓你不告訴我，我怎麽知道要不要吃藥呢？由于當時我對自己的身體感覺還是比較好，就没有要藥吃。接着，看守人員就催我睡覺。我好像是似睡非睡、迷迷糊糊地過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他們給我送來了早飯。看來伙食還不錯，有鷄蛋、面包等，比在秦城監獄要好。看來是要我們在審判期間保養好身體，以給國内外一個保養良好的印象。

上午，有公安部和法庭的工作人員來來往往，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麽。快到中午的時候，他們給我送來了一份法庭規則。這是爲了維護法庭的正常秩序和安全而作出的一些規定，與我們這些受審的人員似乎没有多大的關系，大可以不必叫我們知道。

吃過午飯後不久，法警就叫我們準備到庭。從我住的那間房到法庭其實衹有百把米遠，但是走幾步，他們就叫我們停一下，這樣走走停停地轉過了一個巷子，才進入到公安部禮堂的候審室。我又在那裏等了個把小時，就由法警將我押到禮堂的後門，

取下我的帽子，押到被告席上就座。

我看了看臺上的人，大部分都不認識，少數幾個人我是認識的。這幾個人中，有的過去是我的同事，有的是我的部下。他們個個正襟危坐，表情十分嚴肅，也看得出他們比較緊張。

十名“主犯”，離得遠的我没有看清楚，衹是發覺我的右邊是黄永勝，左邊是李作鵬。但我不知道，他們是從什麽地方押上來的。

宣布開庭以後，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兼特别法庭庭長江華宣讀起訴書。起訴書宣讀完畢，就叫我們退庭，返回原押的地點。晚飯以後不久，就通知我們立即乘車返回秦城監獄，等待再一次受審。

一回到秦城監獄，衹覺得牢房裏非常冷。一進了牢房，我就立刻躺下睡了。但是千千萬萬的事一時間在我腦子裏不斷地翻騰，無論如何也控制不住。我心想，一定要冷静地實事求是地想一想，究竟哪些是錯，哪些是罪行，哪些事情是在當時特定條件下無法避免的，哪些事情是出于失誤造成的。我下定決心要好好地辯護一下，但是我又想，辯護又有什麽用，在那樣的情况下，一切都定好了，衹是要我們走一下過場而已。

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晚飯前，管理員告訴我，晚上準備到城裏受審，這一次在城裏的時間可能要長一些，要我作好準備，帶好隨身所用的東西。説話之間，他給了我一把剃刀，要我刮一刮胡子。

天黑以後，管理員帶我到了樓下，又遇到一些記者給照相。上了車以後，車隊向城裏開去。這次的車子似乎比上一次減少了一半，但依然是浩浩蕩蕩。這一次，車隊没有駛向公安部，而是經過清河以後，到了清華大學校園，轉到了南面的一個地方。盡管夜間看不清楚，但從外邊看來，好像是空軍學院。進了院門以後，他們把我關進了一幢樓房的底層。看得出來，這間牢房剛剛經過一番修整，安裝了鐵門和鐵窗，加强了防衛。牢房裏面有一張單人床，一張三屜桌和一把椅子，還有一個臉盆架，一個熱水

瓶和一個杯子，還給我兩條新的毛巾。屋子裏比較暖和，床上還鋪了兩條褥子，還有兩條被子。那天晚上睡覺的時候，我感到特别舒服。

雖然從牢房裏看不到外面，但是空軍學院我是十分熟悉的，我在工作崗位上的時候，曾經無數次地來過這裏。這裏一切對我來説，都是那麽熟悉。當初修建空軍學院的時候，是劉亞樓司令員和我共同多次地考察，又同北京市的彭真市長商量，批準建設的，一共修建了三年，開辦以來，在這裏訓練了無數的空軍幹部。没有想到我親手建設的空軍學院，竟然成了特别法庭審判我的地方。想到這裏，我不由得思緒萬千，就這樣我不知不覺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來，我看到看守我們的人員都穿着解放軍的軍裝，態度也比較好。戰士們告訴我，他們是總政保衛隊的。

早飯以後不久，就有人叫我去“放風”。一到外面，看到樓房和廣場，我更加肯定無疑了。他們把我帶到了一個用蘆葦圍起來的圈内活動。這個地方，空氣不錯，比秦城監獄來説要好多了。保衛隊的戰士有時還主動跟我説説話，我的心裏也覺得開朗了一些。

但是，負責管理我的，仍然是公安部的一個處長，我没有見到總政保衛部另外派人來。這個處長對我的態度不錯，他要我把心情放開，不要增加負擔，要吃好飯、睡好覺，法庭問什麽就答什麽，還問我帶的衣服够不够等。到了下午，三〇一醫院的大夫、護士又不斷進出我的房間，仔細地爲我檢查身體。

這裏的伙食改善得很好。早上有牛奶、油條、稀飯、鷄蛋，中午和晚上是兩菜一湯，外加桔子、蘋果等水果。管理伙食的是一個老大爺，每頓飯都是他送來的。他説他以前認識我。對他，我衹能深深地表示謝意。

十一月二十二日，一天都没有什麽動静。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寧焕星和另一個人來牢房裏告訴我説，下午三點特别法庭第二審判庭準備開庭，要我準備一下，到時候不要緊張，問什麽就回答什麽。他們還告訴我，準備坐車先到法庭的側門下車，在傳

訊室裏等候，等到開庭時再到法庭的被告席上就坐。在法庭上要一切聽從指揮，臺下還有旁聽的觀衆，但是要我放心，他們是守紀律的，因爲已經印有法庭的規則。他們兩人對我的態度不錯。

大約下午兩點半，管理人員來叫我起床。出門坐上車，看見有一個醫生和一個護士跟着我。在車上，他們幾次數我的脉搏和心跳。他們還要給我吃鎮靜藥，我拒絶了。從牢房到法庭將近一公里，路的兩邊，站着許多人，主要是空軍指戰員。我看得見他們，他們看不見我。

下午三時，準時開庭，特別法庭的庭長江華和三名副庭長，以及審判員出庭，做法庭調查。我看到在坐的還有黄火青和伍修權，這些人都是我過去的同事，現在他們成了法官，我成了囚徒。還有其他的一些我過去的部下，如黄玉昆和空軍的幾個人。

法庭調查一開始，就問我關于林立果到空軍的問題，問我任命林立果爲空軍黨委辦公室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是不是事實？這還用問嗎？空軍黨委的文件，白紙黑字，十幾年了。誰没有見過？

接着，審判員又問："空軍的一切，都可以由林立果調動和指揮"，這句話是不是我講的。我回答："是。"這時，法庭用一個機器，在屏幕上打出了一九七〇年七月六日空軍黨委常委辦公會議的記錄。在這個會議上，周宇馳説："吴司令曾經説過，空軍的一切，都要向林立果匯報，都可以由林立果同志調動和指揮。"

接下來，法庭又宣布空軍政委王輝球的證詞。王輝球的證詞，説："林立果在空軍可以指揮一切，可以調動一切這句話是吴法憲提出來的，他當面就向我説過兩次。"聽到王輝球的這個説法，我感到非常吃驚，因爲我從來没有和他單獨談過關于"兩個一切"的問題。一九七〇年六月下旬，周恩來派我到成都，代表中央和國務院參加成昆鐵路的通車典禮，并參加攀枝花鋼鐵基地的出鋼典禮。出發的前一天，我把王輝球叫到西山，告訴他，我要出發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裏，要他主持好空軍的工作，有什麽問題，可以向黄永勝請示，也可以向林彪請示。我還告訴他，如

果找不到林彪，可以通過林立果去找。但是，我絶没有向王輝球講過"兩個一切"的問題。

後來法庭又問我，爲什麽不收回"兩個一切"。我回答説，當時没有收回"兩個一切"的主要原因，是怕得罪林彪。之後，法庭又出示了"小艦隊"的種種"罪證"，然後問我："你認爲這些和你所講的'兩個一切'是什麽關系？"我説："王飛、周宇馳利用了我所講的'兩個一切'，我給了他們權利，給了他們機會，等于實際上幫助了他們。"

這個時候，周亨元律師在得到批準以後，向我提問："提出'兩個一切'，究竟當時是怎樣考慮的，對林立果的'反革命活動'究竟知道多少？"我回答説："當時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主持軍委工作，我這樣做是爲了討好林彪。在没有考慮周到的情况下，頭腦一熱，爲了表揚林立果，才在林立果、周宇馳、王飛三個人在場的情况下，説出了'兩個一切'。但是没有想到，這句話被王飛、周宇馳他們利用了。他們兩個在空軍黨委常委辦公會議上和林立果作'講用報告'的時候，對這句話作了宣傳，這樣就越搞越大。我聽到這個情况，一方面叫他們不要再宣傳，另一方面怕得罪林彪和林立果，没敢公開收回，這是我的私心所在。但是對林立果搞的'小艦隊'活動，我確實不知道。"

從這以後，法庭上就不再提我和林立果"小艦隊"的直接關系了。

審問完畢，我又回到了牢房。根據所見到的情况，我肯定這裏是原來的空軍學院的教研室，臨時改做關押我們的牢房。好像黄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以及江騰蛟，都關押在這裏，衹是我看不見他們，在"放風"的時候也看不見他們，防範得真嚴哪！

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十二月六日下午、十二月九日下午，又連續三次開庭審問我幾個問題。記得這些問題有：到上海搜查文藝界人士的問題，關于羅瑞卿和賀龍的問題，關于空軍幹部"受迫害"的問題等。

在十二月九日下午開庭的時候，原南京軍區空軍參謀長顧前

的妻子，出庭“控訴”我對顧前迫害致死的暴行。聽了以後，真是讓我有口難辯。顧前原來是南京軍區空軍的參謀長，他的死主要是由南空内部矛盾引起的一場鬥爭造成的。當時我在中央身兼數職，忙得不可開交，空軍的問題主要是靠空軍政委余立金負責的。說實在的，我當時確實不知道顧前關押在哪裏，是怎樣被迫害致死的。不過，身爲空軍司令員、空軍黨委第一書記，對空軍所發生的問題，我當然負有領導責任。

十二月六日晚飯後，法警又交給我一張傳票，要我于十二月九日上午到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爲江青一案出庭作證。一個審判員來告訴我說：“對江青的問題，你要準備一下，寫上幾條提綱，簡明扼要。江青這個人很凶，她有可能反撲你，你不用怕她。”我說：“我没有什麽可害怕的，有什麽就説什麽。”但他要我寫了幾條提綱，交給他審查修改。

十二月九日清晨，來了法庭的一名幹部和兩個法警，把我帶往城内。從車裏向外面看，很多地方發生了變化，我都認不出來了。一直到五棵松，上了大馬路，才知道車子是在向公安部駛去，進了大門，車到禮堂側面的門口停下，到了第一次開庭時我歇息過的地方。不一會，法警帶我出庭，我看到江青在被告席上，依然是那樣意氣昂揚。

一位審判員宣布由我出庭作證。我按照準備的四個問題作了發言。這四個問題是：第一、到上海去抓人和收材料的問題；第二、抓孫浚青的問題；第三、抓秦桂貞的問題；第四、奪《解放軍報》社的權的問題。江青聽了以後，没有表態，也没有反駁，坐在那裏一言不發。我講完了以後，法庭就令我退場，隨即又帶我回空軍學院的牢房。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又兩位審判員來告訴我，十二月十八日要進行法庭辯論，我可以在法庭上發言，這是法律所允許的。但是要注意，起訴書上的問題，不準推翻，否則要判重刑。

十六日和十七日兩天，我反復考慮，要不要辯論，又是怎樣辯論法。一直到了十八日早上，我才下了决心，不申辯，反正申

辯也没有用。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警衛戰士和醫生先將我帶到候審室。三點，開庭。法警將我帶到法庭内的被告席上坐下。審判員宣布開庭以後，就問我有什麽要講的没有。我表示没有什麽要講的。

接着，公訴人孫樹峰在列舉了我的“犯罪事實”以後説：“被告吴法憲，積極追隨林彪，長期以來進行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反革命犯罪活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有關規定，認定吴法憲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犯，犯有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陰謀顛覆政府罪，請法庭依法懲處。”

這時，辯護律師馬克昌、周亨元在法庭上爲我進行了辯護。他們在聯合發言中説：“起訴書第三十九條，指控吴法憲私自把空軍的指揮大權交給了林立果，吴法憲對私自交權所産生的後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法庭調查證實，吴法憲并不知道林立果利用他交給的權力，組織‘聯合艦隊’進行反革命政變的準備活動，因此他對林立果組織‘聯合艦隊’準備反革命武裝政變這一嚴重罪行，不承擔直接責任。”

辯護人接着説：“起訴書中第四十二條指控的林彪、葉群陰謀帶領吴法憲等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分裂國家的反革命活動，吴法憲也不知道，這一情況，已經爲法庭調查所證實。吴法憲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之一，對此没有什麽疑義，需要指出的是，吴法憲在這個反革命集團中，不是爲首份子，爲首份子是林彪和江青，吴法憲的地位不僅在林彪之下，實際上也在葉群之下。吴法憲誣陷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的罪行是嚴重的，但是他在這方面的不少罪行，是在林彪、江青的指使下幹的，主要的罪責在林彪和葉群。”

辯護人認爲：“雖然吴法憲犯下了嚴重的反革命罪行，但是他也具有一些從輕判處的條件。根據我國刑法第一條所指出的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希望特別法庭在量刑的時候，對被告人依法從輕判處。”

以後法庭又問公訴人有什麽意見，他也表示没有异議。

大約衹經過一個小時，法庭辯論就結束了。實際上這一切都是事先準備好了的，所以進行十分順利。

我同警衛戰士和醫生回到牢房以後，歇息了一會兒，公安部的一位處長就來通知我："晚上回秦城監獄，等待判決。"

天黑以後，管伙食的老大爺給我送來了晚飯，還給了我幾個桔子，叫我帶回去吃。公安部的那個處長也叫我把毛巾、肥皂，以及在法庭調查期間他們給我買的襯衣、褲頭和襪子等，也一起帶走。

這件襯衣，是三〇一醫院的一個女同志出去買的。她回來告訴我說，她跑遍了北京的各大商店，都没有找到適合我穿的衣服，最後是到了前門外的一家小商店裏，總算買到了一件。

吃完晚飯，車輛就準備好了，叫我上了車。還是三輛卧車，我被押在中間的那輛車裏。走的時候，門口的燈都開着，我看見公安部的處長、管理員，以及三〇一醫院的醫生、護士共七、八個人，在門口給我送行，并向我招手致意。公安部的幹部這樣對我，還是我被捕以來的第一次。我心裏不覺一陣激動。車輛開動以後，我回頭向他們看去，衹見三〇一醫院的同志還站在那裏向我們招手。

車子路過空軍學院的禮堂時，我看見法庭外放滿了車輛，法庭裏燈火通明。看樣子，他們還在那裏審什麽人。

出了空軍學院的院墻，我們一路向北行，三〇一醫院的一名醫生和總政保衛部的兩名保衛人員，同車護送我到秦城。

回到了秦城監獄，一片漆黑凄凉。進了牢房，滿目是塵土。衹有自己動手打掃衛生。監管人員見了，也進門來幫了我一把。當晚一夜未眠。不知道是爲了什麽，心裏衹想到了李清照的一句什麽詞："悽悽慘慘戚戚。"

第二天吃完早飯，我躺在床上睡着了，一直到中午才起床。監管人員没有干涉我，他們知道我一夜没有睡覺。

等待判决的這一段時間是最難過的。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宣判，更不知道會判我什麽樣的刑，我向監管人員要了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看了好幾遍。

十二月二十日，馬克昌、周亨元兩位律師來到秦城，要聽我對他們辯護的意見。見面後，我對他們在法庭上對我的辯護表示感謝，認爲他們的發言是有分析的，給了我一些鼓勵和安慰。

這樣，一直到了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管理員來通知我說，當天晚上進城，第二天開庭宣判。

晚上，管理員帶我下樓，走廊上又有不少記者照相。出門看到了無數的車輛。車隊浩浩蕩蕩，一望無際。到了公安部禮堂的臨時牢房下車，警衛戰士押着我，在房間裏休息。這次，我見到了黄永勝和李作鵬。

一月二十五日，早上六點叫我起床。吃過早飯以後，我在房間裏休息。到了上午九點，法警來叫我到庭。來到法庭上，見到了十名"主犯"，仍然和上一次一樣，坐在被告席上。

江華宣布開庭并宣讀判决書。判决書和起訴書不一樣的是，除了"集團犯罪"部分以外，還有"個人犯罪"部分。

對我的判决如下：

被告人吳法憲，以推翻無產階級人民民主專政爲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林、江反革命集團的主犯。吳法憲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

一九六六年八月，吳法憲受林彪的指使，于九月三日寫了污蔑賀龍同志在空軍奪權的材料送給了林彪。一九六八年八月，吳法憲伙同黄永勝捏造事實，誣陷羅瑞卿同志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

吳法憲在空軍誣陷一些領導幹部要"奪權"，批準關押、迫害空軍幹部和群衆達一百七十四人，致使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參謀長顧前和空軍學院教育長劉善本被迫害致死。

一九六九年十月，吳法憲把空軍的一切指揮權、調動權交給了林立果，使林立果得以組成林彪反革命集團謀殺毛澤東主席、策動武裝政變的骨幹力量"聯合艦隊"

被告人吳法憲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

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誣陷罪。

判處吳法憲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本判決爲終審判決，不得上訴。

在“宣判”的過程中，我聽到江青呼喊“革命無罪”、“打倒殺人的劊子手”等口號。我向左看去，有兩、三個女法警將江青按倒在地上，帶上了手銬。

宣判完畢，我便被帶出了法庭。一出門，就看到有一輛面包車。他們要我上這輛車回秦城監獄。我一上車，就見到了張春橋和黄永勝。張春橋滿臉發黑，不像個人樣，但黄永勝的臉色還好。還没上車，他們就對我們三個人宣布，不準彼此觀看，更不準説話。

這天，天氣非常冷，下着小雪，象徵着我們的陰暗的前程。

從預審一開始，就不準我們聽廣播，也不給看報紙，因此究竟是哪月哪日我也不知道，糊裏糊塗地過着日子。有一天“放風”的時候，我在地上撿到了一張包糖果的紙。我就用這張糖果紙來記録時間，一天一天地畫。從通知要公審我那一天開始，到判決的時候爲止，一共是一百一十八天。從宣讀起訴書的時候開始到公判一共是六十八天。這一段時間可以算作我一生最艱難的時期。哪裏知道事情還没有完。

回到秦城牢房以後，到了中午開飯的時間，突然衹給了兩個窩頭和一碗白菜湯。我一開始以爲這是偶然。第二天早上，仍然是一個窩窩頭。我禁不住向管理人員提問，這是爲什麽？管理人員説，我們現在是“刑事犯”，是執行期間的“犯人”，衹能同其他犯人一樣，所以伙食衹能是這樣了。

我不禁黯然神傷，日子是越來越難過了。屈指算起來，我在獄中已經九年了，不知道該怎樣度過今後的歲月，還能重見人間的天日嗎？

一直到了二月十日，他們才恢復了我們聽廣播和看報紙的權

利。到了二月十日，在審判期間停止見家屬的權利也恢復了。孩子們又來看我，我的心中又得到了一點寬慰。

到了四月份，我的身體就支持不住了，眼前直冒一個一個的黑點，有時候就像下雨一樣。醫生給我看病，説是營養不够造成的。這件事情，不知是誰反映到了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那裏去了，據説是趙紫陽總理説：“我們國家那樣大，就那麽幾個人，難道就養不起？給增加一點伙食費嘛！”

到了“五一節”的前一天，又恢復了我們原來的伙食水平。當時還以爲這是給我們過節，但是一直是保持了這個水平，每個星期還給我們幾個水果吃。

第十六章
“保外就醫”到濟南

一、連話都不會說了

一九八一年五月份，我記不清是哪一天了，管理人員對我說：“關你們都將近十年了，關的時間長了，將來連話都不會說了，因此領導决定改善一下你們的生活條件。在這條走廊上，還關着邱會作、江騰蛟、王洪文。從今以後，你們各自的牢房從上午八點打開，到晚上九點鐘再關上。白天你們四個人可以在一起學習，由江騰蛟任你們的學習小組長。走廊上有撲克和象棋，你們可以在一起玩一玩。另外，我們在走廊上放了一臺電視機，晚上你們可以看一看電視。”

這樣算是在監獄裏面第一次讓我們互相見了面。五年了，我們都關在這裏，但是誰也没有見過誰。監獄裏的管理是相當嚴密的。

從外表上看，他們的變化都不算太大。由于分開日久又加上心裏有顧慮，特别是怕周圍安裝有竊聽器，因此雖然彼此相見，但是大家說話都比較謹慎。邱會作比較積極，幾次拉我一起打撲克。

從感情上講，我和邱會作是一伙的，但和王洪文、江騰蛟都有一些隔閡，特别是對江騰蛟。他是我的老下級，當年爲了保護他，我不知道傷了多少腦筋，但是最後他居然背着我和林立果搞到了一起。不是他們搞這一套，空軍也不會是這樣一個情况，我也不會是這個下場。就這個問題，江騰蛟曾幾次向我表示歉意，我想同樣身陷囹圄就算了吧。

王洪文是個小青年，不知道政治鬥争的深淺，衹會跟着江青和張春橋亂跑。但是他的福氣好，混了這麽高的職位。他也來向我表示歉意。他說，他在主持軍委工作的時候，在空軍的問題上搞了我不少的材料，有很多不實之詞，很對不起我。我對他說：“這樣的事情太多了，對我來說，已無所謂了。我們當年打長春的時候，你還是一個孩子。一下子當了接班人，主持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工作，你應該想一想，這個臺，你壓得住嗎？”王洪文說：“想到這些都已經晚了。”

看得出來，他的確是比較後悔。當時正值夏天，我們的牢房裏蚊子比較多，王洪文年輕，每天傍晚就到我的牢房裏來幫我打蚊子。他個子高，站在我的鋪板上，能用拖把幫助我打房頂上的蚊子，算是來補償他自己的過失吧。想想也是，他以前那麽高的職位，落到這個地步，也是怪可憐的。這是一個特殊時代的産物，并不能完全怪他。

在那一段時間裏，時寒時暖的。王洪文身體不大好，經常頭痛，有時候甚至痛得從床上摔下來，爲了防止他跌傷，他們在他的房間裏鋪上了一塊地毯。

我記得，在這段時間裏，我們四個人玩過幾次撲克。一開始我和江騰蛟算是一家，邱會作和王洪文算是一家。後來江騰蛟怕出錯牌時我駡他，不敢同我一家，就换成了邱會作同我一家。有時，我們幾個一起聊一聊天，但是大多數的日子是整日裏個人自己看報紙、雜志、聽廣播，有時也在走廊上散散步。

一九八一年八月的一天，突然來了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長。他先找邱會作，繼而找江騰蛟，最後又找到我談話。他告訴我說：

“中央已經決定，將你們放出秦城，各自安排一個地方，保外就醫。安置你的地點是在濟南，到了那裏可以和陳綏圻住在一起，還可以帶一到兩户子女，去照顧你們的生活。現在我們正在爲你的保外就醫做準備的工作，過一段時間你就可以出去了。爲了保障你的安全，到了濟南你可以改一個名字，至于改什麽名字，你可以自己考慮一下。”

我聽了以後非常高興，總算是有出獄這一天了，可以和家裏人團聚了。至于改一個名字，我想好了，就叫吴澄清。是我原來叫過的名字，衹不過是把“臣”字改爲了“澄”字。我改的名字，他們同意了。但是究竟哪一天才能出去，還不知道。這樣，我更加度日如年。

八月五日上午，管理員通知我，下午家屬來看我，陳綏圻也一起來。我聽了以後，不禁欣喜若狂。十年没有見面了，不知道她變成了什麽樣子。這十年裏，她肯定也遭了罪了。

我坐立不安地等到了下午，管理員來叫我出去。走過層層鐵門，到了接見的房間，看到陳綏圻帶着采芹、新潮、仲秋、平原、京秋、巴璀和夢璀，已經在那裏等我。一眼看去，陳綏圻已經老了許多，臉顯得消瘦，頭上也添了不少的白發，像是剛剛從農村回來的樣子。我心裏難受，眼泪欲出，但是又極力忍住了。他們又帶來不少吃的東西，讓我邊吃邊談。我問陳綏圻是什麽時候回到北京的，她告訴我，是前一天下午剛剛回來的。她説，她是七月二十日離開紹興的農場回到上海的，原想在上海孩子們的舅舅那裏住幾天，但是得知八月五日下午要來秦城監獄探視，就特地在四號這一天趕回北京，想一起來看一看。話剛剛説到這裏，監獄的管理人員就來找陳綏圻，説是秦城監獄的王主任要和她説點事情。

陳綏圻出去以後，我和孩子們一起説説笑笑，時間過得很快。不久，陳綏圻回來了。她告訴我，王主任叫她去商量了一下保外就醫的一些事情，有些具體問題，回家以後和孩子們商量一下。她説，等過幾天再來看我。

很快，探監的時間到了，管理人員催我回去。十年離别後的第一次見面，就這樣匆匆結束了，我的心裏不免有些惆悵，但是又没有辦法。

回到牢房不久，邱會作和江騰蛟都來告訴我，説胡敏（邱會作的夫人）和李燕平（江騰蛟的夫人）都來過了，都在作接他們出去的準備。邱會作準備安排在西安，江騰蛟準備安排在太原。

在這之前，王洪文已經被送到醫院裏去了。實際上，這次保外就醫，衹是把我們幾個放出去，而對“四人幫”是不放他們出去的。把王洪文送到醫院，説是爲他治療，恐怕是爲了防止他的精神受到刺激，出問題。

過了三、四天，陳綏圻和金平原兩人又來了。他們先見到王主任，提出了她和孩子們商量後的三點意見：第一、由我的女兒京秋，跟隨秦城監獄警備大隊的苗政委，一起到濟南去看房子；第二、一九八一年七月九日，胡耀邦總書記曾批示，對陳綏圻的問題要重新結論。空軍也表示要盡快對她的問題作出結論，這樣陳綏圻準備在北京等一等空軍的結論，先由我女兒巴璀陪我到濟南住一個月；第三，陳綏圻離開浙江紹興農場的時候，所有的行李都没有帶出來，由我女婿金平原到紹興農場去，把她的行李運到濟南。對這三個問題，王主任都表示了同意。之後，陳綏圻要求再見一見我，王主任也同意了。

當我第二次見到陳綏圻的時候，她把一切的安排都告訴了我。她還説，公安部的同志告訴她，今後我的生活費是每月一百元，她的生活費也已提高到了一百元，這樣每個月一共是二百元錢，如果省吃儉用應該也够了。我們到濟南安家，公安部可以給一點家具，另外全家人還一共湊了一千多元錢，孩子們説要買一臺彩電送到濟南去，調劑一下我們的生活。她要我再耐心地等待一下，説過不了多久我們就可以在一起生活了，要保護好自己的身體，要對將來的生活要有信心。

我聽到這些，心裏感到了很大的安慰，對未來的生活保障也感到有了着落。時間過得很快，規定探視的時間又到了。從這一

天開始，我衹身在牢房，每天掰着指頭，算着日子。

大約到了九月七日或八日，首先是邱會作出去了。我有一點着急，爲什麽還不來接我呢？到了九月十四日，管理人員來通知我了，説已經全部安排好了，第二天準備動身去濟南。他還對我説，先把我進監獄時扣押的一些物品還給我，叫我去清點一下。

多年没有帶過的手表又還給了我，從此我又可以清楚地知道年、月、日和幾點、幾分、幾秒了。我心裏十分高興。東西倒是一樣不缺，衹是所有的衣物都被蟲子咬得稀爛，没有辦法再穿了。

二、出獄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五日早飯以後，管理員告訴我先到公安部。來到外面，看見幾輛汽車，陪同我到濟南的一共有四人，公安部一位處長，警衛大隊的苗政委，一位醫生，還有王主任拿着報話機，加上一個警衛班，我們分乘三輛汽車，出了秦城監獄進城。到了公安部的院子裏，我見到了新潮、仲秋、京秋、巴瑞和夢瑞來送我，匆匆見了一面之後，巴瑞和我一起上車到北京火車站。

我們的車直接開到了站臺上，上了火車，車就開動了。我和巴瑞坐一個軟卧包厢，王主任他們四個人在另一間包厢。苗政委囑咐我，不要隨便走動，在車厢裏看一看外面的景色就可以了，中午吃飯，會讓送到我包厢裏來的。

多少年没有見過這人間的景色了，看到一路上的田野和村莊，讓我感到又回到了這個世界上。

下午四點，車到了濟南，山東省公安廳的一位處長和濟南市公安局的一位趙科長來接我們，把我和巴瑞一直送到了濟南市南郊一個居民樓的二層樓上。我進門一看，是一套兩居室的房子，

一共四十多平方米，裏面已經配備了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具，有一張床、兩個桌子，還有一個煤氣竈、一個蜂窩煤爐子和一套炊具等，看起來他們花了不少的錢，想得真周到啊！他們告訴我，緊挨着這套房子旁邊，還有一套也是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也是給我們的，以後如果有子女來隨我們住，那就是給他們準備的。

進了屋，趙科長給了巴瑞一百五十元錢，算是預支一個半月的生活費。之後，他還帶着巴瑞去買了一些米和蔬菜。辦完這些事情，趙科長他們就走了。

剛才還亂哄哄的小屋裏安静了下來。一時之間，我還難以相信，自己是不是真的自由了。當我看到衹有女兒在身邊，而没有高墻、電網、重重鐵門和帶槍衛兵的時候，我這才想到，我真的是自由了，又重新生活在雖然十分簡陋，但却是自己的家裏了！

第二天，公安部的那位處長和北京來的人都回去了。臨走的時候交待我，以後的一切都由濟南市公安局的趙科長負責，有什麽事情可以找他們。我的醫療關系安排在省公安廳勞改局醫院，這個醫院離我住的地方很近，看病比較方便。

三、閑居在濟南，全家團圓

從此以後，我便正式開始了在濟南的生活。我從十五歲參加紅軍那年開始，就是過的集體生活。後來當了紅軍的幹部，飯有人做，水有人燒，就連在監獄裏也是如此。到了濟南，一切生活都要靠自己，都要從頭學起。當時，我飯不會做，水不會燒，


在濟南生活

對煤氣竈這樣現代化的東西，就更不知道應該怎樣去使用了。發給我的人民幣也分不清哪是一塊錢，哪是兩塊錢，幸好有巴璀在，不然的話我真不知道怎樣辦才好。全靠巴璀買菜、做飯、燒水、洗衣服、搞衛生來照顧我的生活。

過了兩天，趙科長帶我到醫院去檢查身體。剛剛去的時候還好，人們都没有想到我會出現在濟南。但是等我檢查完身體出來，有人一下子認出了我。一傳開，不少人好奇，就來圍看我，而且人越來越多，把我和趙科長圍了一個水泄不通。趙科長急了，他一邊大聲呼喊，一邊領着我往外擠，好不容易把我和巴璀送上了車。

經過這一次，我白天基本上不下樓，每天都是在清晨天亮以前和晚上天黑以後，才和巴璀一起出來到室外活動。有時候，我白天在陽臺上甩甩手，下面也有不少的人觀看。不過圍觀的群衆，態度都很好，不少人對我笑一笑、點點頭，但是都不敢説話。

九月二十三日，金平原從浙江紹興農場把陳綏圻的行李運到了濟南。然後，他用了幾天的時間忙前忙後，把家裏的房間重新布置了一下，使房間的使用更加合理。



到濟南後和家人合影，不全，缺采芹、仲秋

十月上旬，新潮和京秋從北京來到濟南，給我送來了一臺十四英寸的彩色電視機。這臺電視機是新潮用轉業的錢買的。他還告訴我，他正在辦手續，準備轉業來濟南照顧我。從此，這臺電視就成爲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天可以看到新聞，可以看到全國和全世界的事情，我基本上是每天看電視到最後預告第二天的節目爲止。

到了十月上旬，已同丈夫一起轉業到濰坊的采芹也來濟南開會，到了我這裏。她帶來了不少食品，有鷄大腿、猪肘子等。之後，她和新潮、巴璀幾個人忙了好半天，我們一起吃了一頓我這些年來從來没有吃過的豐盛的晚餐。

十月十五日，巴璀的一個月的假期已經滿，和新潮一起回了北京，剩下采芹一個人一面在濟南開會，一面照顧我的生活。這個時候，我真希望陳綏圻能早一點來濟南。但是陳綏圻告訴我説，她已經接到空軍的通知，要她十月下旬到空軍去看對她的結論，還必須在北京再等幾天。

十月下旬，陳綏圻到空軍去看對她的結論。雖然她的結論，已由原來的"敵我矛盾"，改爲"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裏面的不實之詞，一點都没有變。她認爲，這樣的結論不能接受，因此拒絶簽字。看來，雖然有黨的一貫的政策，有總書記的批示，但是落實政策的阻力還是很大的，因爲這裏面有很大的個人恩怨成分在裏面。不過這樣僵持也不是辦法，于是陳綏圻在十一月十一日交出一份書面意見後，就來到了濟南。從此，我們兩人一直生活在濟南到現在。

在陳綏圻没有來濟南以前，濟南市公安局的趙科長對我的事情十分盡職盡責，幾乎是每隔幾天就來一次，看一看生活上有什麽困難。陳綏圻來到濟南以後，趙科長對她説："你來了我就放心了，照顧老吴的事情就交給你了。"

十二月九日，趙科長來向我們傳達了我在保外就醫期間應當注意的幾個問題：第一、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在家裏會見親友；第二、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在濟南市活動，外出的時候要有家屬和子女陪同；第三、未經過允許，不得探訪親友，不準離開濟南市。第四、不準和外國人交談、接觸和通訊。第五、看病不要到醫院去，由醫生來出診。住院的時候，要有家屬護理。没有家屬護理時，由公安部門派人護理。此外，配發的家具要登記。

以上的這幾條，除了看病要醫生出診以外，其它的我都是嚴格遵守的。我一般看病都是自己到醫院去的，因爲醫院的大夫工作十分繁忙，每次都要求大夫來出診，也有困難。

由于生活上的需要，我學會了做飯、燒水、升爐子，有時還

炒幾個菜。除此之外，打掃衛生、倒垃圾、買菜等，我也樣樣都自己做。我們在支出上精打細算，買一斤肉要分成十塊，每次衹吃一塊。到了月底的收支大抵相當。生活雖然難一些，但是過得還比較充實。

周圍的鄰居對我都很好，也很關心我。出門去買菜，他們看到我年紀大，都不要我排隊。副食店的同志，把好一點的菜賣給我，對我非常照顧。家裏的水龍頭壞了、門鎖壞了，鄰居們總是主動幫助我修理。每一次我們去買煤，看到我們一塊塊地往樓上抬，鄰居們也總是自動地來幫忙。這種種事情，都讓我十分感動。

有一次，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在采訪我時曾經問我，在濟南生活習慣不習慣。我說："在山東生活，我感覺到比北京好，有人情味。濟南的山好、水好，人更好。山東人大多憨厚、豪爽、仗義，好交朋友。"

很快就到了一九八二年的元旦。這個時候，北京的幾個孩子、濰坊的采芹、上海的陳子圻（陳綏圻的哥哥）一家，都提出要到濟南來和我們一起過這個春節。我們老兩口一算，好家伙，一共是十七口人！這樣，吃、住都是一個大難題。

我們把這個情况向趙科長報告了，趙科長答應由他向市公安局的招待所租用被子，再借給我們幾個凳子和幾塊鋪板，用來搭床。我們把兩間屋子分成男、女宿舍，用借來的凳子和鋪板搭成兩個大通鋪，這樣才解决了住的問題。至于吃的，則各自帶一點、再買一點。這樣一來，問題就不大了。



到濟南後和家人的合影，春節團圓。

到了春節的前兩天，各路人馬都到了濟南，小小的房間，擠得不成樣子。但是"人多好過年"，青年人到了一起，説呀笑呀，鬧個不停。當時，采芹還從濰坊帶來了一臺録音機，晚上大家在屋裏跳起了交際舞。看到年輕人的活潑、樂觀，我也就忘記了自己還是一個囚犯，感到生活雖然艱苦一點，但還是充滿了希望。

十年多的監禁生活以後，這是我第一個愉快、熱鬧的春節。但願人長久，花長開，月長圓，全家幸福。過去的一切，就讓它像夢一樣的過去吧！

四、我的妻子

我出獄以後才知道，因爲我的問題，我的妻子和孩子全部都受到了株連，没有一個幸免于難。我出來以後，他們的問題也一個一個地逐漸得到了一定的解决。

我妻子陳綏圻出生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原籍浙江餘姚，但生在上海，長在上海，求學于上海。抗日戰争爆發以後，她參加了上海的學生救亡協會，這是上海地下黨的外圍組織。一九四〇年一月經同學介紹入黨。一九四一年六月，經上海黨組織决定，她到蘇北參加了新四軍。以後一直跟隨新四軍三師部隊行動，在三師政治部任職，抗戰勝利後又隨三師到了東北。解放後組建空軍時，她也隨我調入空軍，在空軍幹部部工作。一九五四年，國防部長彭德懷决定將部隊的女同志，除醫務、文藝工作人員之外的，統統轉業、復員到地方工作，陳綏圻也轉業到了中國民航總局工作。以後，她在民航總局任生産計劃處處長，一直工作到一九六八年，才由軍委辦事組下命令調回空軍，任命爲我的辦公室主任。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被逮捕的當天晚上，空軍政委王輝球到我家裏去找陳綏圻談話，要她和我劃清界綫，交代和揭發問題，并對陳綏圻進行了隔離審查。與此同時，還把我的幾個秘書也都送到了亞非療養院，由中央專案組進行隔離審查。這樣，

他們就都完全失去了自由。

這一年的十一月三十日，空軍成立了"陳綏圻專案組"，把陳綏圻和巴璀、夢璀兩個未成年的女兒搬到了一幢簡陋的小樓裏。這之後，又把陳綏圻和兩個女兒也隔離開，除了節假日以外不準她們見面。

陳綏圻被關的地方名爲"學習班"，實際上就是一個監獄。她所居住的房間衹有八平方米，有六個女看守，一天二十四小時寸步不離地看管着她。晚上除了不準關燈以外，還有女看守在床邊守着。這樣的情景是很折磨人的，幾乎讓她整晚都睡不着覺。平時不準她出門半步，衹在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半個小時可以到室外去"放風"。房間窗户全部都被封死了，白天也像地牢一樣，靠一盞臺燈來照明。這樣，時間一長，視力下降，眼睛就逐漸看不清了。

一直到了一九七二年，才經上面同意打開了一扇窗子，房間裏才見到了光亮。在這個"學習班"裏，她一住就是七年。

説來也凑巧，一九八二年，在發還我們家被他們没收的書籍時，裏面夾雜着十幾個記録本，一看才知道是看守陳綏圻的人員寫的值班日記。筆記本裏篇篇都是這樣的記録："7：20（陳）吃飯，7：40吃光，收拾了一下東西。8：00開始學習。8：25泡了一杯茶，一邊喝，一邊看書。10：05在椅子上想問題，一直到吃午飯。1：05睡覺。3：00起床。4：05點眼藥，4：45繼續學習，5：45在椅子上休息，過了一會，又繼續學習。6：35吃晚飯，收拾了一下，繼續學習。9：40在床上休息，躺了一會没有睡着。10:20看電視的回來把她吵醒了，她好像是生氣地猛一翻身。10:50睡着，打了一小會兒呼嚕。11：20翻身，又好一會兒没有睡着。12:00以後又睡不大着，總的上半夜没有睡好，下半夜睡得好。2：25翻身，2：37動了一下，3：00起來上厠所，躺下就打起呼嚕來。3：10可能是睡熟了，掀掉了半截被子。3：40翻身，3：53翻身，不一會就打起呼嚕來。4：35翻身。4：37起來上厠所。5：00打呼嚕聲音比較響，到5：17翻身，呼嚕也停止了，隨後就一直没有睡着，有時翻身，有時睁睁眼。6：40起床，上了十分鐘厠所，就開始洗漱。"

七年來，看守陳綏圻的人員一共換了幾十個，國家花了大把的鈔票。可每天都是這樣的記録，也真是太精心也太可惜了！

花了這麼多的人力物力，審查了長達七年的時間，可審查來審查去也没有審查出來什麼問題。爲了結案，專案組東拼西湊，于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給陳綏圻下了一個結論。現將這個結論照録如下：

經查證核實，陳綏圻是林彪死黨，積極參與了林彪反黨集團的反革命陰謀活動。

一、一九六八年四月以後，連續五次給林彪、葉群寫效忠信。一九七0年五月十三日葉群同黄、吴、李、邱同游長城，陳綏圻也參加了。

二、無恥吹捧林立果，大造反革命輿論。一九七0年在空軍司令部二級部長以上的會議上，林立果作"講用"報告結束後，陳綏圻帶領喊口號："向林立果學習，向林立果致敬"等。

三、積極參加爲林家"選美"的活動。

四、爲吴法憲炮制假檢討，把林彪反黨集團在廬山會議上有預謀、有組織、有綱領的向黨進攻，説成是偶然事件，把吴法憲同陳伯達的勾結説成是"上當受騙"，極力爲吴法憲開脱，對抗毛主席、黨中央。

五、九一三事件後，堅持反動立場，掩蓋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行。

經與空軍黨委研究决定，陳綏圻罪行嚴重，屬于敵我矛盾，應撤銷黨内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開除軍籍，交軍委空軍送原籍監督勞動。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七日，他們又在空軍體育館召開批判大會，一共有空軍機關、民航、北空、空軍學院等單位三千四百人到會。他們把陳綏圻押在體育場的中央，批判會議開得轟轟烈

烈，很像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種“噴氣式”的群衆批鬥大會。但是這已經不是什麽群衆運動，而是空軍黨委主持的會議。

在批判大會前，主持人就向陳綏圻宣布：“今天批判你，没有你説話的權利。在會議上，你要老老實實地聽取群衆的批判，如果你説話，就將對你嚴加懲處。”

批判大會以後，空軍有關人員于八月二十五日將陳綏圻押送到浙江紹興縣龍虎山茶牧場。這個時候，陳綏圻已五十五歲，已經到了國家規定的退休年紀。

臨離開北京之前，專案組的人告訴陳綏圻，領導上批給她兩千元安家費。陳綏圻要求説，孩子還小，生活没有着落，是不是可以把這筆錢留給孩子們生活。答復説，這是去農場生活的費用，不能留下。最後陳綏圻再三懇求留下二、三百元給孩子們，才總算是同意了。

龍虎山茶牧場離紹興縣城十五里，滿是紅土的山上，到處都栽種着茶樹。另外，場内還有一部分稻田和菜地。龍虎山茶牧場下面分了幾個生産隊，各個生産隊裏除了有生産工人、下鄉知識青年以外，還有一些下放來的“右派分子”。

茶牧場所在地是個雷區，在陳綏圻到這個茶牧場的前一年，有一次雷聲轟鳴，雷電擊穿了一間房子，打死了一個“右派分子”，還打傷了兩個下鄉的知識青年。那個“右派分子”是發配來茶牧場勞動，没有人知道他的親屬在哪裏，衹好草草就地掩埋了。所以一到雷雨季節大家都很緊張。

陳綏圻住在半山坡的兩排磚房，是爲知識青年修建的，也給了陳綏圻一間，場裏找了兩個女青年和陳綏圻住在一起，監視陳綏圻的活動。一開始，場裏給她每月生活費四十元，後來又增加到五十元。

在農場，一到夏天，蚊蟲肆虐，特别是有一種小咬，最是利害，被它咬了後，不幾天臉都腫了。另外，勞動也非常艱苦，尤其是七月底的“雙搶”（搶種、搶收）大忙季節，時值三伏盛暑，火辣辣的太陽曬下來，身上就像着火了一樣，雙腳泡在曬得發燙

的水裏，腿上還有螞蝗叮咬。每天都是早上四、五點鐘出工，晚上八、九點才收工回家。

一開始，陳綏圻也同大家一樣到田裏去勞動，後來茶牧場的領導看到陳綏圻的年齡既大，身體也不好，爲了照顧她的身體，分配她在蔬菜隊裏勞動。這樣，她才很少下農田了。

陳綏圻到了紹興以後，孩子們就不斷跑去看望，他們看到母親身處這樣艱苦的環境之中，非常痛心。特别是巴瑠，一見到陳綏圻以後就抱頭痛哭，説：“媽媽，你這樣的生活條件，太艱苦了！”

到農場的時間長了，陳綏圻和大家逐漸熟悉起來，農場裏的工人和知識青年，經常主動幫助陳綏圻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難。她在農場，首先遇到的困難是自己做飯的問題。由于她是單身一人，無法砌爐竈，更無法自己去砍柴燒，衹能買一個小煤油爐。這樣，除了在食堂買一點飯菜外，自己有時也做一點，可以省幾個錢。當時農村的煤油是定量供應的，不够用。于是，有的小青年就依靠關系，給陳綏圻弄來了幾十斤煤球，又幫她買了一個小煤球爐子。這一下，就解决了做飯的大問題。

又如每年過春節時，家家都要用晚米去换一點年糕吃，一换就是好幾十斤。陳綏圻一個人背不動，那些小青年個個都願意給她幫忙。另外，想炒一點菜没有油，想到城裏買一點食品又没有糧票等等，這些都全靠農場的工人和知識青年幫忙。同樣，陳綏圻也利用各種時間幫助知識青年學習英語，補習文化課，相互之間關系相處得十分融洽。

陳綏圻是在農場聽廣播的時候，聽到要公審“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當時她感到十分意外，因爲她十分清楚，黄、吴、李、邱并不知道林彪出逃和林立果“小艦隊”的事情，也没有參與這些活動。應該説，他們的“問題”都衹是“路綫鬥争”問題，而“文化革命”這樣的路綫問題，牽涉的人就太多了，不是能用審判來解决的。

陳綏圻還告訴我，公審時，她聽到辯護律師辯護説，黄、吴、

李、邱和“九一三事件”無關，就以爲我將會被釋放，因爲我們是因爲“九一三事件”才被逮捕的，而“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則是“路綫問題”和“政治問題”了。既然問題已經澄清，就應該將我們釋放。但她没有想到，我們却因爲“文化大革命”的其它問題而獲重罪，被判刑。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她認爲公審也是件好事，原來群衆并不了解黄、吴、李、邱究竟有什麽問題，這一來至少是把一些問題在群衆中間澄清了。如所謂的“林彪的南下另立中央”、出逃、“謀害毛澤東”等，與黄、吴、李、邱都無直接關系。這都是在報紙上公布了的。其它的問題，留待以後再説吧。

我們被判决不久，中央很快作出决定，讓我們幾個保外就醫。一九八一年七月，空軍派人到農場找陳綏圻談話，告訴她説，中央已經批準我保外就醫。這件事情完全出乎陳綏圻的意料，想不到中央這麽快就作出了這樣的决定，她真是喜出望外。

一九八一年的七月下旬，在北京師範大學學習的女兒京秋放假到了龍虎山茶牧場，她告訴陳綏圻説，她和新潮在北京通過炮兵副司令員吴信泉，找到了黄克誠的愛人唐棣華，向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遞了一個報告，要求批準陳綏圻到上海治病。來農場之前，她又給黄克誠的秘書打了電話，詢問報告的情况，秘書答復説，中紀委已經批準陳綏圻到上海去治病。因此，這次她來到農場，是要帶陳綏圻去上海的。第二天，京秋就去同龍虎山茶牧場領導協商。幾天以後，場裏領導來通知陳綏圻，可以去上海看病。她就和京秋一起，簡單地收拾了一下，于七月二十七日離開紹興到達上海。

離開紹興前，陳綏圻給在上海的哥哥發了封電報，告訴他來上海的車次和時間。可没想到，後來却没有買到那趟車的車票，衹能乘坐稍後的一趟車到上海。在她及京秋到達上海時，原以爲來接站的侄子陳天生、陳復生他們已經回去了，不料剛剛出站，就見到天生他們一家還在那裏等候，這時候已經是晚上十點多了。天生他們告訴姑姑説，第一趟車是晚上七點多到站的，但是

他們找遍了也不見人影，估計可能是買不到車票，就决心再等一趟車，反正是接不到人就不走。

陳綏圻和京秋一起，在上海住了大概有個把星期。這時新潮從北京連續發來兩封電報，説是公安部已經同意他們八月五日再去秦城監獄探望父親，已經把陳綏圻列入了探親的名單，要陳綏圻一定在八月四日以前趕回北京，以便一同去秦城監獄。她就和京秋立即買了去北京的車票。她們走後，浙江省公安廳也派人來到天生家裏，通知陳綏圻盡快回北京，但她已經走了。

八月四日下午，陳綏圻回到北京。她來到幾個孩子住的廣安門附近一個空軍的家屬院。進去一看，幾個女孩子合住在一間破舊的小屋，新潮住的屋子則是唐山大地震時搭的一個地震棚。屋子裏面，衹有幾件破舊的家具，完全是一個貧民家庭的樣子。見了孩子們這樣的處境，陳綏圻的眼泪不禁奪眶而出，但是孩子們十分興奮。鄰居們也來勸慰説：“你還傷什麽心，看到這些孩子，應該高興才是。雖然父母不在家，但是他們個個都很争氣。有父母的孩子們又怎麽樣呢？這些孩子知道節儉，有時買一個燒餅，就着啃一根黄瓜，就算是一頓飯。多好的孩子們呀！”

第二天，她就和孩子們一起，到秦城監獄來看我。

第三天，她又去了空軍大院，要求對她的問題重新作出結論。空軍“兩案辦公室”的同志接待了她，他們告訴陳綏圻説，胡耀幫總書記已經有了批示，他們會抓緊時間辦理的。他們還告訴陳綏圻，她的生活費用以後每月提高到一百元，并當場發給了她兩個月的生活費二百元。回家以後，陳綏圻把這些情况告訴了孩子們，跟他們一起商量到濟南安家的問題。

次日早上起來，夢璀告訴陳綏圻説：“媽媽，昨天晚上我高興得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覺，這麽多年了，我都没有見到過這樣多的大票子（當時人民幣面額最大的是十元），我們去買一點香蕉吃吧。”聽了小女兒的這個話，陳綏圻不禁心裏一陣心酸。她立即上街買了一些香蕉，對孩子們説：“你們一人一個，嘗嘗吧。等以後條件好了，再多買一點。”

過了幾天，陳綏圻才知道這幾年孩子們的生活是怎樣過來的。新潮轉業以後，空軍一定要把他分配到湖北農場，這不符合當時對復轉軍人的政策。爲此他在北京上訪了三年。這三年，别説收入，就連糧票也是一斤没有。巴瓘下鄉插隊，夢瓘在中專學習，都没有收入。因此五個孩子基本上都靠仲秋、京秋在各自農場的三十多元工資費，加上夢瓘二十元的生活費維持。每月僅僅才八十元錢，要維持五個人的生活，的確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他們精打細算，彼此謙讓，平時就把錢放在一個抽屜裏，誰需要買什麽東西就自己去拿，從來就没有人爲了錢而發生過不愉快的事。得知了這些情况以後，陳綏圻的心中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陳綏圻到達濟南後，她除了專心照顧我的生活以外，也一直在集中精力向有關部門反映情况，想盡快解决自己的問題。早在一九七九年陳綏圻還在龍虎山茶牧場的時候，她就向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遞交了一個申訴報告，請求中央重新考慮自己是“林彪死黨”的結論，以及開除黨籍、開除軍籍的决定，請求黨組織實事求是地作出結論。

一九八一年七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陳綏圻的問題作了重新結論的批示。根據這一批示精神和一九八二年中央九號文件的精神，空軍“兩案辦公室”于一九八一年七月、一九八二年三月、一九八三年七月和一九八八年四月，先後四次對陳綏圻的結論作了復議，并四次派人來與陳綏圻見面。陳綏圻對前三次結論都提出了不同意見，但出于各種考慮，在一九八八年四月的第四次復議結論上簽了字。空軍紀委隨即對她作出了“犯了嚴重錯誤，給予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的結論。

從受到審查之日起到這時，陳綏圻被停止黨的組織生活已經十七年，遠遠超過了留黨察看兩年的時間。因此在宣布處分的同時，又恢復了她的黨籍。隨後，陳綏圻又主動補交了十多年的黨費。

一九九二年八月，空軍直屬政治部轉發了《關于陳綏圻同志離休的通知》，規定陳綏圻按副師職離休，離休的時間從一九八

八年算起。同時，還轉發了由軍委江澤民主席簽發的《關于授予陳綏圻同志功勛榮譽章的命令》

到了這個時候，前後經過了二十一年，陳綏圻的問題才總算是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在這裏，我和陳綏圻對原空軍一些領導人的無情鬥争、殘酷打擊的做法感到不理解，對後來參與多次復議解决陳綏圻問題的軍委領導、空軍領導和有關同志表示感謝。應該慎重處理人的問題。祇有實事求是，合情理，才能得人心。

五、兒女們

我一共有一個兒子、四個女兒和一個養女，他們是兒子吴新潮，女兒吴仲秋、吴京秋（後改名金秋）、吴巴瓘、吴夢瓘，養女陳采芹。

陳采芹是我妻子陳綏圻哥哥陳子圻的大女兒。一九五〇年，陳綏圻的母親來北京隨我們一起住時，采芹也隨祖母來到我家，當時還没上小學。一九五三年陳綏圻的母親病逝，臨終時囑咐我們，要我們把采芹收爲養女，把她撫養成人。這樣，按照陳綏圻母親的遺願，采芹以後就一直留在我們這裏，并在我們家裏長大，從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一九六七年，采芹在空軍西安技術學院畢業，分配到空軍第三研究所工作。

一九七〇年底，經人介紹，采芹同總政秘書處的高瑞榮相識而結婚，後生有一女叫高建平。高瑞榮原是總政副主任田維新的秘書，人很能幹，文筆也很好。“九一三事件”以後，因受到我的牽連，在被審查一段時間以後，夫妻倆被轉業到高瑞榮的濰坊老家工作。小高在市農委當秘書，采芹在無綫電廠當工程師。由于小高因受到我的牽連而被迫轉業，心中不平，經常喝一點悶酒。再加上肝臟本來就不好，他突然得了亞急性肝壞死。

一九八四年的春節剛過，我就接到采芹的來信，説高瑞榮病重。不久又接到來信，説高瑞榮已經去世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裏非常難過，一個非常有才氣、有前途的青年，就這樣因爲政治鬥爭而送了性命。

我和陳綏圻商量，要她到濰坊去一次，安慰安慰采芹。對于采芹今後的個人問題，第一步先設法把她調到濟南來，然後再設法解决其它個人的問題。這樣，我們先請求山東省委組織部幫助，將采芹調來濟南，在中國電子器材公司山東公司工作。至于她的個人問題，采芹説要爲高瑞榮守孝三年。直到一九八八年，她才和山東省體委的羅煥庭成婚，終于又有了一個幸福的家。

我的兒子吳新潮，一九四八年在東北出生，當時正值新華社發表了一篇題爲《翻過山頂，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社論，所以我們給他起名字叫“新潮”。小的時候一直隨軍，從東北一直到廣西，然後再隨我們來到北京。

新潮本應一九六六年七月畢業于北京八中，但是趕上了“文化大革命”，全國高等院校的統一考試被停止，就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當“文革”初起，紅衛兵運動席卷全國時，新潮不顧我們的反對，與幾個同學外出串聯，結果在外面染上了肝炎。

一九六八年全軍第一次恢復徵兵，我們在新潮的一再要求下，給他辦理了參軍手續。參軍後，他希望能得到一次實戰鍛煉的機會，鑒于當時中越邊境比較緊張，他就到了中越邊境正在參加輪戰的空三師九大隊，參加了抗美援越的戰鬥并入了黨。一九六九年輪戰部隊回到内地，新潮又調到了空軍第十二師，最後又調到了沈陽飛機制造廠，在研制垂直起落飛機的辦公室任軍代表。

“九一三事件”發生的時候，新潮正在沈陽飛機制造廠。在不知道任何事情的情况下，他突然被隔離審查。同時在沈空機關因“九一三事件”而被隔離的，有沈空司令員王毓淮、參謀長莫陽等大大小小的幹部五十多人，還有空軍副司令員曾國華的兒子和侄女婿。在這五十人裏，新潮是最小的一個。當時整個空軍部隊，

人心惶惶，誰都不知道自己哪一天會被人抓進去。新潮看到，沈空黨辦副主任前一天還在盛氣凌人地抓別人，轉過臉來自己也在第二天被抓了起來。沈空實際上是林立果没怎麼插手的地區之一，但也還有如此大的審查規模，由此可以想象得到，其它空軍部隊是怎樣了。

沈空把新潮關在地下室裏，由一些幹部和戰士看押。整天交代問題，每天衹讓他到外面去放一次“風”。就這樣，新潮在地下室裏過了大半年。由于整日不見陽光，把他的眼睛都搞壞了。在地下室關到了第二年的五月，他們才把新潮轉移到一個裏面關滿了人的招待所，這才使他的生活條件有了一些改善。

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十月，當初被隔離審查的人差不多都被放出去了，招待所裏没剩下了幾個人，于是他們又把新潮和沈空黨辦主任轉移到了沈陽軍區。爲他的事，沈陽軍區還專門成立了一個專案組，一個專案組裏面幹部就有五、六個。

在沈陽軍區，新潮被他們審來審去，又審查了一年多，還是没有審出什麼問題來。一九七三年五月，經王洪文批示，沈陽軍區又將新潮押解到北京，交空軍審查。據新潮説，他離開沈陽的那一天，在車站押送和交接的，有空軍來的，也有沈陽軍區和沈空的，一共有十七、八人，好不壯觀。在從沈陽到北京的火車上，空軍來的三個幹部和新潮坐一個軟卧包厢，這還是新潮從來没有享受過的待遇。

到了北京以後，空軍來的人把新潮帶上一輛裝着窗簾的小車。然後，他們坐着這輛小車，七轉八轉地來到了空軍學院，將新潮關在院内十三號樓裏。關新潮的那間屋子，所有的窗户全部被堵死，不讓裏面的人能看見外面。他們還給新潮規定：晚上睡覺不準關燈，上厠所不準關門。就這樣關過來關過去，也没能讓新潮交代出什麼事情來。連我都不知道林立果在幹什麼，新潮又能知道什麼呢！

一九七五年，經當時的空軍政委×××批準，將新潮送到陝西省大荔縣關家農場監督勞動改造，特地將新潮放到了他曾經下

放勞動的生産隊，真是父債子償。

一九七八年，經當時的空軍主要領導人×××批準，將新潮轉業，特别注明要安排到最艱苦的地方鍛煉，根據這一批示，湖北省將新潮安排到了京山縣九湯山國營農場。

以後，新潮的同學，陳毅元帥的兒子陳小魯，親自向當時的湖北省委書記陳丕顯保薦，由陳丕顯書記批準，才安排到了京山縣農機廠。但是，這樣的安排，仍然是不符合當時國家對復轉軍人的政策的。新潮不同意，就回到北京，準備上訪。他跟幾個妹妹一起擠在一間破舊平房裏。由于檔案關系已轉到沙市，在北京的他既無户口，又無工作，更無任何收入。

在這期間，軍紀委書記黄克誠和我的老戰友軍委炮兵副司令吴信泉，曾親自向空軍交涉，希望按照有關政策安排新潮的轉業，不要株連子女，遭到當時空軍領導的拒絶。這樣，因爲我的緣故，兒子新潮先後被隔離審査、勞動改造達八年之久。

一直到一九八一年，經胡耀邦總書記批示，新潮的問題才得到了最後的解决。有了胡耀邦的批示，空軍爲吴新潮第二次辦理了轉業手續，補發了被扣下的三年的工資，并對原有的結論，一律予以取消。以後，由山東省委李子超副書記批準，新潮調到了山東藝術學院安排了工作。

我的大女兒仲秋和二女兒京秋，因爲我的牽連，一九七三年以後都從部隊復員當了農業工人。仲秋原來是學醫的，却被分配到北京昌平縣北郊農場當了一名鉗工；京秋是學外語的，却被分配到北京良鄉蠶種場當了工人。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以後，京秋先後于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兩次報名參加考試，雖然考分都很高，但因爲我的問題，不能被學校録取。不得已，第二次參加高考并且得知未被録取後，京秋和兄弟姐妹們，分别向中央領導和報社寫信反映情况，最後經當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批示，她才終于進入北京師範大學學習。仲秋也是在一九七九年經胡耀邦批示，才恢復了她醫生的本行工作，調到北京内燃機總廠職工醫院。

我和陳綏圻被收審以後，還在上初中和小學的三女兒巴瑞、四女兒夢瑞，就開始了獨立生活。當時，她們分别衹有十四歲和十一歲。靠着每月八元錢的伙食費，她們每天在空軍的食堂就餐。星期天食堂不開伙，她們就衹好隨便買點東西充饑。這兩個孩子，相依爲命，受盡了别人的冷嘲熱諷。在十年没有父母和任何親人、没有固定生活來源的情况下，過着艱苦的生活。真是不知道這樣的日子她們是怎樣過來的。

好在這一切都已經過去了，我衷心地希望這樣的日子不再有，希望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不再經歷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過的痛苦和磨難！

由于"九一三"事件，空軍、全軍以至全國受到牽連的人究竟有多少，我無法知道，有人説有軍以上職務的人被立案審查的有八百多人，全軍受到審査牽連的達到幾十萬人。這是我軍有史以來受到的最大規模的一次清洗。當年張國燾的出走没有牽連到任何人。但是林彪事件，却對我軍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受到株連的人不計其數，對無數受到傷害的人們，我表示深深的同情，也感到無限感慨！連我都不知道"兩謀"，更不用説他們了。是不是不需要株連這麽多的人，是不是可以團結和解脱更多的人，是不是不必要把這幾十萬人打到對立面上去？這是後話。

寫在最後面的話：對“判决書”的一些看法

自從一九八一年九月“保外就醫”到濟南以後，一轉眼已經有十多年了。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山東省公安廳派人來到我家，送來了國務院公安部頒發的“釋放證書”。由于我當時還居住的濟南市中所屬的七裏山小區，就讓我到市中區派出所申報戶口，領取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到一九九三年九月，“剝奪政治權利”的期限也告結束。從此，我就應該開始享受一個公民的權利和履行一個公民的義務。以後我遷入歷下區，住在省委第一幹休所。我記得，在濟南市歷下區的一次基層選舉時，有關部門給我發了選民證，還專門派車來接我去參加了投票選舉，在場的記者還給我照了相。

在濟南期間，我對“判决書”上所認定的有關我的“反革命罪行”，經過反復回憶與思考，認爲有必要提出我個人的意見。至于這些意見正確與否，留待史家與後人去評說。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給我下了“判决書”，對我判决如下：

一、本庭確認，以林彪爲首的反革命集團和以江青爲首的反革命集團，都是以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爲目的而進行陰謀活動

的反革命集團。

二、本庭確認，十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和應負的刑事責任如下：

被告人吳法憲，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爲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是反革命集團的主犯。

吳法憲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

一九六六年八月，吳法憲受林彪的指使，于九月三日寫了誣陷賀龍在空軍陰謀奪權的材料送給林彪。一九六八年八月，吳法憲伙同黄永勝捏造事實，誣陷羅瑞卿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

吳法憲在空軍誣陷一些領導幹部要“奪權”，批判關押，迫害空軍幹部和群眾一百七十四人，致使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參謀長顧前和空軍學院副教育長劉善本被迫害致死。

一九六九年十月，吳法憲把空軍的一切指揮權、調動權交給了林立果，使林立果得以組織成林彪反革命集團謀害毛澤東主席、策動武裝政變的基本力量“聯合艦隊”。

被告人吳法憲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

根據以上的這些所謂“證據”和“罪行”，特別法庭判處我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對于“特別法庭”認定我犯的這些“反革命罪行”，我認爲事實根據不足。對此，我的申訴如下：

一、關于“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為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的問題。

“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爲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這是

"判决書"給我定的性。我認爲，這不是事實。

衆所周知，從法律學上講，犯罪有四個基本要素，一是犯罪主體，二是主觀動機，三是實施行爲，四是客觀後果，缺乏其中的一項，就不能稱其爲犯罪。在一九九七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改之前，"反革命罪"是中國法律體系中最重要，而且也是應用最爲普遍的一項罪名。但即使是"反革命罪"，也應該具備四個基本的犯罪要素，否則就不能稱其爲是犯罪。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不要說實施行爲和客觀後果，就是最重要的主觀動機這一項，也跟我絲毫沾不上邊。

第一、我從十五歲起參加革命，六十多年來，跟隨黨、跟隨黨領導的軍隊、跟隨毛澤東，出生入死，轉戰南北，爲建設人民解放軍、創建人民民主政權，奮鬥一生。一直到現在，我從來都没有想到過要反對黨，更不要説反對我爲之奮鬥一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了。説我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爲目的，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真是天大的冤枉，完全是强加于人的不實之辭！六十多年來，没有任何人、任何證據、任何言行能够説明，我有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動機和目的。從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到現在，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這二十多年來，從來没有任何人向我出示過任何這樣的證據。没有證據，憑什麽説我"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爲目的"?!

相反，這幾十年來，我是一直擁護黨、擁護毛主席的，對黨中央、對毛主席堅信不移，從來没有過任何的動摇。直到這幾年我反思自己走過的路才感到，正是因爲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盲目地貫徹執行了毛澤東的指示，才犯了各種各樣的錯誤。

第二、判决書説我"積極參與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活動"，也根本不是事實。

先説林彪"奪取最高權力"的問題。不錯，林彪在我們黨内曾經到過很高的位置，擁有很大的權力。當年，他身爲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黨章上明文規定的接班人，所擁有的，就算不是"最高權力"，也是"次高的權力"了。

但這些權力，都不是林彪奪來的。林彪之所以能有這樣的地位，我認爲主要是兩點。

首先是由于他爲中國革命立下了巨大功績。幾十年來，在井岡山創建革命根據地的鬥争中、在長征中、在抗日戰争中、在解放戰争中，林彪爲新中國的建立，爲人民民主政權的建立，爲解放軍的發展和壯大，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方面我已經看到了很多書籍和文章，有許多客觀的描寫和論述。因爲林彪的出逃而否定這些，起碼不是歷史唯物主義。

其次，林彪地位的上升，同毛主席的賞識和一手提拔分不開的。從井岡山時期起，林彪就一直在毛主席的賞識和提拔下，不斷高升。一九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毛澤東解除彭德懷職務後，親自提名林彪爲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讓他出來主持軍隊工作。一九六六年八月黨的八届十一中全會上，毛主席决定把劉少奇拉下馬，周恩來親自要我派飛機把林彪接到北京，由毛主席親自提名，使林彪成爲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事實上的接班人。"九大"期間，毛主席還决定在黨章中明確寫上"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一切，都不是林彪奪權得來的，而是毛主席親自選擇和安排的。

如果所説的"陰謀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活動，是指一九七〇年廬山會議期間我們主張設國家主席的意見，這就更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説得很清楚了。現重申如下：

一、没有任何證據説明林彪本人想當國家主席，相反，林彪幾次説過他本人無意當國家主席。再説當時的國家主席也不是最高的權力，毛澤東本人擔任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才是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事實上，國家主席衹不過是一個名譽上的國家元首，劉少奇擔任這個職務多年，還不是被毛澤東説打倒就打倒了。再有，"文革"期間，擔任國家代主席的是董必武，但他當時的排名却遠遠在林彪的後面。林彪已經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和黨章上法定的接班人，他還有必要

冒着和毛澤東對抗的風險，拿着實權去争一個虚權嗎?

二、不論是從當時看，還是從現在來看，林彪和我們堅持設國家主席的意見起碼不能説是犯罪。法學家張友漁先生早在一九八二年就曾説過："設國家主席是我國一九五四年憲法規定的重要制度，在十年動亂不正常的情况下，把設國家主席的規定取消了。本來，對國家制度來説，對内對外代表國家的國家主席都是不可缺少的。"王德祥先生在《試論我國國家主席制度》一文中也説："從一九六六年以後，由于十年内亂，國家主席被迫停止了活動，當時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同志被迫害而死。一九七五年修改憲法時，正式取消了國家主席的制度，使我國元首制度處于不明確的狀態。粉碎‘四人幫’以後，一九七八年《憲法》仍然堅持不設國家主席的决定。這兩部憲法在設置國家主席的問題上的指導思想都是不妥當的，因爲它把設國家主席看作是一種人爲的結果，這就不能不給我國機構設置帶來消極的影響。"

我想，林彪之所以堅持設國家主席，是希望以這種方式來表明國家秩序已經恢復正常，"文化大革命"的無政府狀態已經結束。他祇是認爲，一個泱泱大國需要設立國家主席職位，不設國家主席則"名不正、言不順"，不像一個正常的國家。堅持設國家主席，即便當時不合毛主席的心意，也祇是不同意見之間的争論，并不違反黨紀國法，何罪之有? 到了一九八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憲法》裏，不是又恢復了國家主席的設置，而且一直延續到了現在嗎? 這不是充分説明，我們當時堅持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是正確的嗎?!

三、就算是林彪想當國家主席，通過正當的競争、競選來争取，這也應該是一個黨員、一個公民的正當權利，絶不是什麽犯罪行爲。自建國以來，有哪一部法律法規，或者我們黨的哪一部黨章，曾經規定過想當國家主席就是犯罪，就是違反黨章? 所以説，不論是當時還是現在，把想當國家主席作爲一種"罪行"，都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如果説的"陰謀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這件事，是

指林彪"謀害毛澤東"和"另立中央"，那麽就請拿出有力的證據來。從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來，我十分希望看到，但是一直没有看到過有直接的或者是有説服力的證據，説明林彪直接策劃了"政變"和"謀害毛主席"的行動。如果有這樣的證據，(我不是説林立果、周宇馳他們的活動的證據，而是指直接證實林彪個人直接指揮和策劃的證據)，爲什麽一直不讓我們看到? 直到今天，林彪是不是直接策劃和指揮了這樣一個"政變"，在我心裏一直是一個迷。

至于我自己，就更是既没有參與也絲毫不知道這樣一個所謂的"政變"。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説得很多，不需要再在這裏多説了。當年的確曾有人想將這個"罪名"扣在我們的頭上，但查來查去也没查出什麽確切的證據，最後祇好放弃了這個企圖。在審判即將結束時，《人民日報》曾經簡要刊登過我的辯護律師的發言。他已經明確説明："吴法憲和林立果的反革命政變以及謀害毛主席没有直接關系。"如果律師的話不屬實，如果當時没有經過中央的認可，是不會登在《人民日報》上的。另外，在當時參加審判工作的總政治部的圖門，也談到："黄、吴、李、邱參與或知道"５７１"工程紀要，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和謀害毛主席的罪證没有查到。"[14]

説到我個人，不要説去奪取"最高權力"，就是一般的權力，也從來没有奪過。我在空軍的任職，包括空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軍政治委員、空軍司令員，以至後來的副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副組長、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都是黨中央、中央軍委任命的，都有毛澤東簽署的文件，都不是我奪來的。至于中央政治局委員，那是"九大"全體代表按照程序選出來的，也不是我奪來的。

其實，説到奪權，在"文化大革命"中，祇有毛主席自己或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號召過在全國的奪權。相反，由于林彪、老帥們和我們的反對，在軍隊中，除了一些文藝團體和部隊院校以

[14] 見《超級審判》一書。編者注

外，任何軍事機關和部隊都没有奪過權。我們不僅從來没有號召過奪權，也從來没有奪過什麽權。而毛澤東所號召的全面奪權，那是有大量事實和根據的。凡是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全部是毛主席、黨中央批準奪權的。

第三、"判决書"裏説我"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那更是無稽之談。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參加的衹有三個組織——中央文革碰頭會議、軍委辦事組和空軍黨委。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和軍委辦事組，那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組織領導的機構，不是我們組織領導的"反革命集團"。在"文革"中，無論是中央文革碰頭會，還是軍委辦事組，都是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的。而空軍黨委，更是一直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下進行工作。除此以外，我就再也没有組織和領導過什麽集團了。

至于林立果的"小艦隊"，我根本就不知道這個組織的存在，自然也就更説不上"組織和領導"了。事實上，在"審判"過程的調查中，他們也從多個方面證實了這一點，最後不得不承認"吴法憲和林立果的反革命政變以及謀害毛主席没有直接關系"。

在同林彪的關系上，我是林彪的老部下，同林彪的個人關系比較密切，這些我都不否認。但我同林彪的關系，主要是工作關系。林彪這個人，生性孤僻，從不拉個人關系，同他見面，除了談工作，没有别的好談的，他也不會跟你談别的。林彪當時是黨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是寫上了黨章的接班人，是我在工作上的直接領導和上級，黨的組織原則規定下級服從上級。由于我的思想水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不可能超越這個框框的。事實上，在我同林彪多年的接觸中，從來没有聽他説過有關反對毛主席的隻言片語，更不要説是有關"推翻人民民主專政"和"搞政變"這樣的事情。

"九一三事件"之前，中央對我們在廬山會議上的"問題"已經作過了結論。一九七一年四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黄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受到了批判。會議總結時，周恩來代表中央指出："黄、吴、李、邱在政治上是犯了'方向路綫錯誤'，

組織上是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此後一直到"九一三事件"，我都是小心翼翼，没有犯過任何錯誤，而且在長達近十年的審查裏，也没有發現我們同"九一三事件"有任何牽連，但是就是一定非要把我們打成"反革命"不可，這究竟是爲了什麽？

二、關于"誣陷賀龍和羅瑞卿"的問題。

我承認，在這個問題上我有錯誤，我一生都將悔恨和反思。

但在這個問題上，我有幾點需要説明：

第一，賀龍的材料是根據成鈞、傅傳作、黄立清和廖冠賢四個人的揭發整理的，不是我個人編造的。

第二，一九六八年八月，黄永勝和我在報告中説羅瑞卿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當然是錯誤的，不過在此之前的一九六八年三月和四月，中共中央在關于成立浙江、江蘇、寧夏、安徽等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批復中，已經把羅瑞卿正式説成是"反革命分子了"，所以羅瑞卿的這頂帽子是中央戴上的，并不是黄永勝和我給他戴上的。而且，如果説在"文革"中的報告中或言論中對當時受迫害的領導同志有過類似的不敬語言，就是"反革命罪"的話，難逃"法網"的應該不止是我們幾個，大概是不計其數。

第三，關于賀龍和羅瑞卿遭受迫害的問題，我認爲主要的責任在毛澤東，以及林彪、周恩來等人，因爲這些問題是他們所决策的，主要的安排也是他們所决定的。這樣的問題，絶不是黄永勝和我這樣的人，甚至也不是林彪和周恩來所能够决定的。在賀龍和羅瑞卿被打倒以後，兩個專案組基本上都是由周恩來全面負責的，不能衹追究我們的問題。

現在不是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不是説"共産黨人最講認真"嗎，爲什麽這裏就不講"以事實爲根據，以法律爲準繩"

呢？如果一定要用法庭形式來解決黨内鬥争，那"犯罪"的應該不光是我們幾個，因爲在幾十年的黨内殘酷鬥争過程中，很難找出幾個從没有整過别人的黨内幹部。據我的回憶，由毛澤東，周恩來親自批示、審閱、劃過圈的賀龍，羅瑞卿和其他人的專案組的報告，也爲數不少。不能説牽連到我們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牽連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誤"，牽連到周恩來的就都是"違心的"。

在這個問題上，應當是以事實爲根據，以法律爲準繩，不管牽涉到誰都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對。我在一本關于這次審判的書裏，看到當時領導這次審判的人是這樣講的："也不能不承認毛主席、周總理有錯誤，但毛主席和周總理是好人犯錯誤，他們（指被審判的人）是壞人辦壞事！"[15] 用這樣的原則來審判我們，對我們還能公正嗎？這樣的規定起碼是好幾個準繩嘛！對同一問題的處理，因人而异、幾個標準，這樣是極不公平，也是不能服人的。

這裏我想説兩句："文化大革命"中，在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受迫害的問題上，毛澤東及周恩來應當負主要和直接的責任。毛澤東是决策者，而周恩來是主要執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説是我們幾個人，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在内，對此都不是説了算的。

三、關于"在空軍誣陷一些領導干部要'奪權'，批準關押、迫害干部和群衆一百七十四人，致使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參謀長顧前和空軍學院副教育長劉善本被迫害致死"的問題。

[15] 見肖思科，《超級審判》，上册，218頁。編者注

首先，作爲當時空軍的主要負責人，我對他們的遭遇負有一定的責任，特别是對顧前和劉善本的死，我更是深感内疚。因爲，對那場運動給空軍所帶來的灾難，我負領導責任。但像顧前和劉善本這樣具體問題的產生，并不是由于我個人對他們的"誣陷"所致。這個問題，有空軍各級黨委的文件報告擺在那裏，完全可以去查，看看究竟應該由誰來承擔這個主要和直接的責任。在"文化大革命"這場運動中發生的問題，不能由我個人來負全部的責任，特别是負直接的責任。對"判决書"中所説的那一百七十四人，我與他們没有任何個人恩怨，也没有利用職權對他們進行過直接的迫害。他們在"文革"中受到迫害，這主要是當時全黨、全國搞運動的結果。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場大規模群衆運動，當時不僅僅是空軍，全軍各軍、兵種，各大軍區、各野戰軍，都同樣開展了這場運動，都有大批的幹部、群衆受到迫害。據統計，全軍共有八萬人受到迫害，一千一百六十九人被迫害致死。也就是説，即使按照他們的説法，空軍中因我而受到迫害有一百七十四人，那也衹占其中的百分之零點二，其餘近百分之九十九點八的責任，七萬九千八百多人受到迫害、一千一百六十九人被迫害致死的責任，又應該由誰來負責呢？每一個有人受到迫害的單位的主要領導，是不是都應該追究刑事責任呢？

我從一些資料上了解到，據不完全的統計，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全國共有七十三萬人遭到誣陷迫害，其中有三萬四千八百人被迫害致死，全國每一個省、市、自治區平均有二萬六千零七十一人受到迫害，平均有一千二百四十二人被迫害致死，有些還死得很慘，例如遼寧省的張志新等。這些責任應該由誰來負責，是不是每一個省、市、自治區的第一書記，都應該負刑事責任？如果都要追究刑事責任的話，是不是各級黨委書記和每個單位的負責人都應該受到刑事處罰呢？

説到底，是不是毛澤東、中共中央也應該對批準關押迫害各級幹部承擔刑事責任，對全國受到迫害的七十三萬人和被迫害致

死的三萬四千八百人承擔刑事責任，而且是主要的責任呢?

據我所知，包括“延安整風”在内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整死過人。比如説“反右鬥争”，死的人就不少，而且很多人死得還很慘，都是罪不當死的。再比如，對我們“林彪集團”的審查過程中，被整的軍以上幹部就有八百多人，一些人還被整死了。像我們空軍的副司令員曾國華中將，大渡河的十七勇士之一，就在這次的“學習班”裏被整死了。曾國華究竟有什麽問題，直到現在我也没有看到一個讓人信服的解釋。對這些人的挨整和曾國華等人的死，是不是也應該追究一下有些人的刑事責任呢?

至于説到對空軍的劉震、成鈞等人處理，我在前面的“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一節已經很清楚地説過了，説他們奪權并不是我所説的，而是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向林彪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匯報情况時説的，而後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由劉少奇定案的。中央軍委常委會議上，包括賀龍在内的幾位老帥都對這一定案表示了贊同。我説的這些情况，都有案可查，并非是我一個人説了算的事。

以上我所説的這些話，絶不是想要爲自己推卸責任，如果是我的責任也不可能推卸得掉。我衹是想説：在“文化大革命”打擊迫害幹部的這個問題上，從毛主席，黨中央到下面的基層領導，在文化大革命打擊迫害幹部的問題上都有錯誤，大家都應當承擔責任，接受教訓，該誰負責就應該由誰來負責，不能衹是把我們幾個人推出來做替罪羊了事。

四、關于“把空軍的一切指揮權、調動權交給了林立果，使林立果得以組成林彪反革命集團謀害毛澤東主席，策動武裝政變的基本力量‘聯合艦隊’”的問題。

關于林立果在空軍“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這個話的確是出自我的口，是我同王飛、林立果私下裏講的。這個話是不妥當的，是錯誤的。我當時説這個話的意圖，主要是爲了討好林彪。然而説了以後，又感到很後悔，想公開收回又怕得罪林彪，以至被林立果、周宇馳等人利用來興風作浪，我負有失職的責任。不過這話我從來没有在公開場合講過，更没有在任何文件上出現過類似的文字。而且我後來意識到有了問題後，確實叫人不要宣傳，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來消除影響。

可話又説回來，是不是説了這個話就等于真的把空軍的一切指揮權、調動權都交給了林立果? 當然不是。事實上，關于空軍的領導權、調動權，我從没有交給過林立果，林立果在空軍裏也没有一分鐘是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的。凡是懂得我們黨基本常識的人都知道，不要説我這個空軍司令，就是林彪要調動和指揮空軍，也要經過毛澤東的批準。除了毛澤東本人以外，誰都不能够在空軍中指揮一切、調動一切。

如果林立果真的能在空軍指揮一切、調動一切，那他爲什麽衹是指揮、調動了“小艦隊”的幾個人，而没有能調動、指揮空軍任何一個軍、師、團的部隊來搞他們的那一套呢? 這一事實充分説明，林立果在空軍是不能够指揮一切、調動一切的。

所以，這個話我雖然在私下裏説過，但是空軍的領導權和指揮、調動權，我從來也没有交給過林立果。事實上，也根本不存

在這樣的問題。在部隊工作過，特別是在空軍工作過的人，都應當知道這個常識。説我在這件事情上犯了錯誤，説了不該説的話，是符合實際的；但利用這個問題來大做文章，甚至據此來給我判刑，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從法律上講也是站不住脚的。

從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我親眼看到了我們國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民群衆的生活水平隨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通過比較，我認爲這才應該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我從内心裏擁護我們黨改革開放的根本國策。

十年動亂轉眼之間早已成爲歷史，成爲了人們所關注的歷史學術問題。由于這一段歷史過于敏感，因而對這一段歷史資料進行了極爲嚴格的控制，用所謂“宜粗不宜細”的原則來進行簡單的處理。這樣一來，這一段歷史，按照有些人的説法，象是一團謎一樣。我感覺到，當時的一些問題，并不是本身不清楚，而是出于利害關系和實際需要，不想説清楚，或者不允許别人説清楚。

我完全同意由後人或歷史學家來爲“文革”作結論的説法。因爲，由于有當事人的個人利害衝突，就很容易造成粉飾或掩飾一些事實的真相。我看到過很多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的描述，是相當失真的。有的人甚至把毛主席和林彪兩人的單獨的談話，描寫得象章回小説一樣。我感到好笑，當時有誰在場？

“文革”這一段歷史的重要當事人和見證人，現在已經不多了，所以我感到有必要把我所親身經歷的這些事情，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説一説。我説的這些是不是事實，自有大量的文件檔案可以佐證，有朝一日這些檔案材料公布的時候，大家完全可以拿來加以對照和檢驗。至于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以及我們這些人的功過，就讓後人去評説吧！

附録

父親最後的日子

吳新潮

父親自從一九八一年保外就醫以來，一直生活在山東濟南，二十多年以來，父親從歷史舞臺和政治漩渦中回到了普通老百姓中間，作爲一個普通公民真正融入了老百姓柴米油鹽、妻子兒女，繁瑣平庸而其樂融融的生活中。整日裏買菜，做飯、燒水、打掃衛生、搬煤，倒垃圾，洗衣服，這一切他全要自己做，閑下來時就看看報，鍛煉身體。濟南的老百姓和街坊鄰居，接納了他，和他交上了朋友。他常常是晚飯以後，拿一個小馬扎，和一幫大爺、小青年一起家長裏短的，邊乘凉邊聊天到天黑，有時候還領了一幫人做健身操。大家都把他看作是自己中的一員，没有任何歧視，而是親切地叫他老吳或者是吳老頭，也有叫他“吳老”的，個別的還有叫他吳司令的。每逢這時，他就連連擺手，説：“我已經不是司令了，快不要這樣叫了。”

這時，生活雖然清貧，但却是他一生最快樂的日子。父親常對我們説，高處不勝寒，還是人間（老百姓中間）好。在他一生中，也就是在這些日子裏，他吃得香、睡得着，再不用擔驚受怕地過日子了。

改革開放以來，他也親身感受到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老百姓的衣食温飽逐漸得到了解決，社會物質文化生活逐漸得到了改善。他説：這一點鄧小平功不可没。他從内心裏擁護黨的改革開放的政策。

山東歷届省委省政府，對父親的生活醫療給與了多方照顧，中央歷届領導同志萬里，胡耀邦、趙紫陽、李鵬、喬石等對父親生活醫療上的困難，有過多次批示，這也使父親在精神上得到了不少安慰。

閑暇之餘，父親撿起了他多年喜愛的書法，整日和一幫書友切磋技藝，由于他多年私塾的老底子，很快有人上門求墨寶。甚至有一次濟南市有關單位爲了外商投資的事情，指明要父親的一幅字，説是要他爲濟南市的建設作一點貢獻。父親爲他的勞動得到了社會的承認感到很高興，父親對我們説，他還是一個有用的人。

二〇〇〇年，父親得到有關單位的批準，到北京探親，見到一些親友和老部下，由于勞累和興奮，不幸得了腦中風，一下子癱瘓了。山東的有關部門，力主我們迅速將父親送回濟南治病。雖然有山東齊魯醫院醫生護士精心的治療和護理，父親從此一病不起，在病房裏住了三年。由于長期的卧床和一生坎坷艱難的歲月，終于熬乾了他的生命，父親骨瘦如柴，包括大腦和肢體都已經萎縮，奄奄一息，像一支生命的蠟燭燃到了盡頭。

二〇〇四年一月三日，父親由感冒轉成肺炎，雖然使用了大劑量的抗菌素，但依然是高燒不退。緊接着父親又發生了呼吸困難，醫院的主治大夫潘教授，向我們發出了病危通知，并説明，將父親轉入“ICU”(加强醫療科)進行搶救的必要性。在十一樓全體醫生護士的幫助下，我們把父親推下了樓，轉入“ICU”病房。大夫隨即切開了他的氣管，并插上了所有能插的管子。幾天以後，奇迹發生了，父親的肺炎和體温得到了控制，一天天好起來，一個月以後已經可以不用藥了，父親的體癥恢復了正常。五月十日，應“ICU”病房的要求，我們又把父親轉回了十一樓保健病

房。保健科醫生、護士都説，像父親這樣的情況，在他們科裏從没有過，凡是去“ICU”病房的病人，從來就是有去無回。醫生、護士都對我們説，你父親創造了一個奇迹。父親在十一樓醫生護士和我們的照料下，漸漸地恢復起來，臉色也好多了。

然而就在父親的身體正慢慢恢復時，又發生了一個意想不到情况。在山東省换發醫療保健證的時候，有關部門告訴我們，吴法憲原省級醫療待遇不符合要求，因此停發吴法憲省級醫療待遇的保健證。得知這個消息，我們都很着急，因爲這樣一來，父親今後的住院和用藥都成了問題。正當我們通過有關部門向上反映，甚至準備直接向中央領導寫信的時候，父親的病情突然惡化了。

十月十六日早上，我從青島回濟南。一路上，我心裏總覺得不踏實，就徑直往醫院去看望父親。一進病房，就看見父親那張蠟一般慘白的臉，甚至連嘴唇都毫無一絲血色。心跳達到了每分鐘140跳。我用手撫摸着父親的頭，衹見他滿臉痛苦，大口大口地喘着氣，在和死神進行着最後的搏鬥。這天正好是星期天，主治醫生一個也不在。值班醫生決定立即給他輸血搶救，但是，父親的血管裏的血液已經乾涸了，保健科的護士想盡辦法也抽不出一滴血來，無法和血。醫生又提出要找“ICU”病房的護士來進行静脉穿刺，但又叫不動。這個時候，正在濟南的京秋也趕到了，我們倆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來院領導的電話挨個撥打，幸好找到了黨委書記。他説他立刻通知麻醉科的醫生來。

又過了大約半個小時，麻醉科的醫生趕來了。當他們正在商量應采取什麽措施的時候，父親的呼吸却突然停止了。一看這情况，醫生、護士以及趕來的麻醉科醫生，飛快的推來了呼吸機，并開始用人工按壓的辦法維持呼吸，但是我看到，父親已經進入了深度的昏迷，失去了條件反射。我從父親因嚴重缺血而失去光澤的眼睛裏看到，一個生命正在不可挽回地離我們遠去。醫生説，父親在臨床上已經表現爲腦死亡。

事後我們才知道，父親的消化系統出現了大出血，出血量應

該在一千毫升以上，出血的時間也應該有半天以上，他的血管裏已經没有血了。不要説是一位九十歲的老人，就是一個年輕人，這樣大量的出血，也已經完了。但是他的一顆頑强的心臟還在跳動，爲了一生没有得到澄清，不肯停息。

醫生、護士們在進行最後的努力。給他做血色素的檢查，發現衹有兩毫克，出血不能制止，輸進多少血，就流出多少血。齊魯醫院的醫生、護士，用盡了一切辦法，山東省老幹部局和幹休所的人員連夜守候在值班室。一直在濟南輪流看護父親的大姐陳采芹得到消息，也趕到了醫院，我在北京的幾個妹妹，也連夜趕來，但是一切已經無力回天，我們盼望着的奇迹没能出現。這一次是死神勝利了，父親臨終的時刻終于來臨了。參加搶救的醫生、護士，告訴我們，父親的生命力十分頑强，腦死亡了二十四小時以上，但心臟還在跳動。

十月十七日下午十五時五十八分，父親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我們急忙趕到了父親身邊。此時，醫護人員還没有放弃搶救，主治大夫徵求我們的意見，我們明白再繼續搶救下去也恐怕無濟于事了，就表示搶救可以停止了。父親終于懷着莫大的遺憾，和我們永别了。

父親去世後，母親領着我們兄妹準備處理後事。我們想按照他的遺願，按照一個普通老百姓的方式，將他平安地送走。

但是我們萬萬没有想到，一場新的政治風波正在到來……。

爲了有尊嚴地送别父親，母親和我們兄妹面對着種種壓力，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最後全部累倒了。在此期間，一些親朋、好友也頂着巨大的壓力，在這最困難的時刻，爲我們的事前後忙碌着。對此，我們十分感謝他們的真誠幫助，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送别父親的那一天，十月二十一日，天氣陰沉而慘淡。下午一點，母親帶領我們準備前往殯儀館。剛一走出家門，意想不到的情况發生了，門口的胡同聚集了大批的群衆，黑壓壓望不到邊，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大娘，大嬸，叔叔、大爺，街坊，鄰

居，把整個胡同都堵住了。見到我們出來，好幾百人一擁而上，争着與母親握手致意，以表達對父親去世的哀悼。這一幕深深地感動了我們，也震撼了在場所有的人。爲了避免事態的發展，母親再一次顯示了一位老革命者的風範。她再三感謝大家之後，就隨即登車離去。我們又耐心地説服大家散去，對大家説："我們的父親是一位普通老百姓，所以我們現在以送别普通老百姓的形式爲他送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在我們的説服之下，情緒激動的群衆才讓開一條路來讓我們離去。

如果父親的在天之靈能够看到這一切，我想他應該可以瞑目了。還有什麽能高于老百姓的聲音，這是對父親一生功過的結論，對父親最大的理解，也是最高的安慰。我們真正看到了在老百姓的心目裏，功過是非，心如明鏡。我們的父親，有錯誤。但是人民群衆給予了諒解，人民群衆看到這樣對待一個老紅軍，老戰士，一位老人，深感悲切。這就是天理。

父親少小離家，爲了千百萬像他一樣的窮苦百姓能過上好的生活，南征北戰，浴血疆場十九年，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爲此，他一家七口全部被國民黨政府迫害而亡。建國以後，爲了保衛和建設這個國家，他夜以繼日地拼命工作，心中衹想着如何才能更好地爲人民服務。當時，與父親共處一屋的我們，一個月下來甚至連他的面都見不着，衹知道他每天都在工作、工作。對父親的這些貢獻，有些人出于某種政治目的，三十多年來，一直在進行蓄意抹殺、歪曲和顛倒黑白，企圖讓人民群衆對父親另眼看待。然而他們没有想到，在可親可敬的普通百姓心目裏，父親依然是一個值得被他們尊重和紀念的人。我們的父親并不是完人，也有很多缺點和錯誤，但是人民群衆不僅能够理解他，願意諒解他，而且從來也没有忘記他爲人民、爲國家所做的一切。直到這時，我才真正理解了"公道自在人心"這句話的深刻含義。

送别的會場，凄慘而凝重，説凄慘，是因爲這是一個完全由我們家屬自己舉辦的送别儀式，説凝重，是因爲所有參加的人，

個個都冒着風險，他們對父親的情誼，各個千鈞重。父親的挽聯是母親親自審定的：

戎馬一生，坎坷一生，是非功過，歷史澄清
來自百姓，還原百姓，窮通榮辱，天淡雲静

父親將自己的名字改做吴澄清，大概是看淡一生的榮辱和功名吧。天上究竟有多少冤魂？ 比起歷史的長河，比起天下的蒼生，這一切又算得了什麽？

父親穿着四十年前的舊軍裝。讓父親穿着這套紅星加紅領章的舊軍裝離去，是母親决定的。這是因爲：當年，他頂着這樣的紅星、戴着這樣的紅領章，參加了紅軍、參加了共産黨領導的革命；以後，他又頂着這樣的紅星、戴着這樣的紅領章，被關進了共産黨自己的監獄裏。在四十一年的軍隊生涯中，父親曾先後穿過紅軍、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包括解放戰争時期、建國初期、五五式和六四式）等各式軍裝。也許是巧合，也許是天意，這四十一年始和終，他都是與紅星、紅領章相伴。所以母親認爲，今天他也應該頂着紅星、戴着紅領章，與我們訣别。

父親身上覆蓋着白色的絲綢，周圍簇擁着鮮花，我們本來可以給他覆蓋紅綢，但是我們想到這血紅的顔色，對父親來講，過于沉重了。父親爲共和國的事業，獻出了他的全部家人。他們大概在召唤父親，他從無色的世界中來，回到無色的世界中去。

母親没有一滴眼泪，她的泪腺中已經没有泪水，她給我們規定，不準哭，要集中精力考慮辦好父親的喪事，誰衹知道哭誰就對不起父親，我們爲我們的母親感到驕傲，父親的離去，没有人比她更悲痛，但是她的堅强，使全場的人感到震驚。在母親的帶領下，我們都没有失聲痛哭。我看到，爲了不讓自己的眼泪掉下來，姐妹們一個個都緊緊地咬着嘴唇，有的甚至咬出了血印。當母親最後一次親吻父親的時候，她喃喃的向父親訴説着什麽，事後我們問她説了些什麽，她説："我告訴你爸：放心的走吧，永

别了！"

最後，我們把寫着"澄清"的白綢和一面"八一"軍旗，覆蓋在父親身上，并與他進行了最後的告别，并目送着他走入天國。

永别了父親，您放心地走吧，我們絶不會辱没您的名聲！安息吧父親，願您在天國裏得到永生！

可以告慰父親的是，關于父親喪事的問題，我們給中央有關領導寫了申訴信。在一些老同志的關切和安排下，不久新的精神下來了，對父親的後事進行了妥善的處理。在這裏，我們全家衷心感謝這些老同志，衷心感謝胡錦濤總書記，温家寶總理和吴官正書記。是他們使我們重新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依法治國，以人爲本，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願我們國家走入民主法制的軌道。願我們所遭受的一切成爲歷史，永遠不會重演。